

第一輯《知青情结》

岁月留痕（二）



《榕树魂》——第一天

找厕所

找个厕所，成了知青们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从县城过来，只在区上停留时上过厕所，到此时已经有好些人感到内急了。问题是在视线所及的范围内，没见到任何像是厕所的建筑。

而要找到厕所，则需要尽快沟通汉傣两个民族的语言。

那些围着知青们的弄迈傣族老乡里没一个会说汉话的，虽然那些老大妈们不停地在对知青们说什么，但知青们没听懂一个字。一路来知青们已经知道，到县城接知青们的赶牛车人中，那个被区上干部介绍为合作社会计的，只会说“开会”、“吃饭”、“出工”这三个汉语单词，其他几个汉子则只会艰难万分地说几个含混不清的字，知青们费了好大劲才听明白，他们说出的居然是那时的时代最强音“毛主席万岁”。

胆大的老猫勇敢地站了出来，以日本人似的腔调，问傣族当中看来是负责人的那个中年汉子（后来知道他是合作社社长，就叫他老社），“厕所地有？”

那汉子摇头表示不懂，口中则发出“木虎”两字。

问其他人，也摇头，说“木虎”。

显然，“木虎”应当是“不知道、不懂”之意。

知青们有点着急了，两个男生走出场外，开始沿着寨中土路寻找，另有两个也出去向另一头搜寻。

他们东跑跑、西瞧瞧，一群小孩尾随着，大人们则疑惑地看着，不知道他们要找什么。

一直找至寨子两端尽头，没有一所建筑物像厕所，探子们只好折头回来。

正在此时，知青老令忽然发现，有一个小男孩正肆无忌惮地拉下裤头在路边撒尿。

他急忙跑过去，指着那个小孩，大叫："对啦，就像他这样，屙尿！"

那小孩被他那猴急样儿吓坏了，顾不得提起裤子，一溜烟钻进了人群中。

知青们则一阵哄笑。笑完，众人更加感到内急，男生原地踏步转圈，个别女生也开始两脚换位。

老猫看着老乡们困惑的样儿，急了，顾不得那么多了，但见他一只手捂在下腹处，食指翘起，口中"嘘、嘘"地吹起了哄小孩撒尿的口哨。

知青们的尿差点就给逗了出来。

傣族老乡们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他们不再说"木虎"，纷纷点头，作恍然大悟状并纷纷重复说一个词"炭锡"，显然那就是傣语的"厕所"，随后他们开始爆笑，笑得没完没了，有人眼泪都出来了，差不多要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了。

老社笑得直咳嗽，走上前来，面对着紧张地看着他的知青们。他没有摇头，却双手向外一摊。没有说"木虎"，却说了句"木咪"。（后来知道是'没有'之意）。

话没听懂，可他的意思大家是明白了。就在大家失望之极，刚发出叹息声时，只见他手指着身后竹林，口中大声地说了些什么。其他傣族老乡也立即仿效他，用手指着竹林，口中大声叫着，边笑边朝竹林方向推拉知青们。

知青们明白了，寨子里没有厕所，有问题请钻进竹林里解决。

钻竹林虽然暂时能解决当务之急，却也带来些问题，令知青们担忧。

首先便是隐私问题。傣族撒尿时与汉人相反，男的蹲下，女的反而站着。男人因为穿的裤子极宽大，前裆又无开口，要撒尿时须将裤腿拉到腿根，蹲下进行。而女人穿的统裙更宽大，又无内裤碍事，只须两脚分开，将裙子前摆稍稍拉起，连膝盖都不露出，站着就能解决问题，比男人还省事，所以她们解手从不刻意避人。知青无论男女，穿着上都很难做到像傣族那样"方便"时不露春光。竹林中即便没有登徒子之流有意偷窥，但被进林子砍竹笋或找竹虫的人无心撞上，也着实令人尴尬。

其次便是安全问题。到不是那竹林里有毒蛇猛兽或妖魔鬼怪出没，而是拉屎时常会被猪袭击。这里的猪不知怎么回事，对人的未消化之物特别感兴趣，见人往竹林中去，便会悄悄跟着，当那味儿弥漫竹林之际，经常会听到人被拱翻在地时的怒骂声。昆明人形容某人笨时常说：吃屎还被猪拱倒。在这儿应为：拉屎还会被猪拱倒。所以傣族进竹林解决问题时都提着根竹棍，用来赶打那些急不可待的八戒。

不过知青们的担心很快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弄迈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知青专用厕所，于数日后诞生。那是傣族老

乡们在西边竹林中砍倒一片竹子，平出了一块空地后，由老地自告奋勇担任建筑设计师，在地上进行图纸作业并以笔谈和手势与老乡们担任的施工队交流之后所建造出的建筑，该建筑从设计到建成，总共只花了不到三个小时。知青们逐一去“验收”之后，对老地平生唯一的设计作品，基本表示满意。

第一夜

等大家都从竹林中方便回来后，老社带知青们去社里安排的暂时居住的地方。男生住粮仓楼上，女生住在社管会（会议室）。没有床，全都在光滑的竹地板上打地铺，蚊帐一拉，排成两列，跟兵营似的，只是不怎么整齐。

刚安顿好，老社就来叫大家下楼到社管会旁的厨房吃饭。

厨师是几个傣族妇女，她们自己不吃，笑嘻嘻地在一旁看着。菜不算丰盛但很可口，大家都一致认为，这里的大米特别好，米粒很大，做出的饭香气扑鼻，不用下饭菜也能吃下一大碗。

吃晚饭时，天空中传来阵阵鸟鸣，引起了知青们的注意，纷纷跑出厨房朝天上看，只见大榕树上空满天飞鸟，景象极为壮观。它们分成三大群落在空中盘旋，白鹭和黑色的鱼鹰（俗称水老鸦）数量较多，飞得也较低。最好看的是那些灰鹤，它们飞得极高，姿态优美，叫声高吭嘹亮。长久的飞翔后，群鸟逐渐降低高度，最终降落到大榕树上。夕阳西下，整个寨子都已被竹荫笼罩，而高大的大榕树仍然沐浴着金黄色的阳光，绿叶丛中点缀着鸟群白、黑、灰三种色彩的斑点，衬着那满天的晚霞，景色美的令人心旷神怡。

晚饭后，不断有傣族老乡们来看望知青们。

老大妈们进屋来看看他们的床铺，再拉着人细细端详，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她们每人都带来些吃的东西，有好些从没见过的叫不上名来的东西，知青们都是先尝尝，好吃就一扫而光，吃不惯的就等她们走后悄悄倒在窗后小沟里。现在想起来，那些被倒掉的酸笋、酸葩菜之类的太可惜了。

男人们只是到楼口站一站，有男知青路过就拿出草烟递上，见知青摇手示意不会，就笑笑走开了。

毕少（姑娘）们不过来，聚在场院里，看着这边叽叽喳喳地说笑。

只有那些鹿旺仔（小孩）则从一开始就毫不顾忌地钻进屋来，每个知青身边都围着两三个，见什么都好奇地摸摸，仰着头问个不停，知青们听不懂，只好拍拍他们的小脑袋，随他们去。

看来小孩子的语言模仿能力的确强，这帮鹿旺仔听了几次知青们互相间的称呼，便能用很不错的昆明腔，叫出每个知青的绰号来。而知青们搞不清他们那些岩什么、依什么的名字，就按各人特征为他们取绰号。一大群小孩排着队让知青们取名，那个长得最黑的孩子就叫“小印度”，有一个小胖子像极了《小兵张嘎》里的胖墩，那就叫

他“胖墩”吧，其他的则多半根据相貌特征取做瘦猴、黄毛等等。

天黑了，老社提来一盏汽灯，点着吊在女生们住的社管会屋梁上，那灯嗞嗞地响着，非常亮，跟一盏100瓦的电灯泡似的。男生们住的粮仓楼上则只发了盏防风马灯，微弱的灯光顶多只算一盏15瓦电灯泡。男生们嘴上不说，心里却嘀咕：这老社，重女轻男呀。不过从第二天晚上开始，女生那边也换成马灯了，那盏汽灯被老社收回了，据说那灯很费油，那灯芯也很贵，因而只有重大活动时才会动用它，于是男生们的心理也平衡了。

小孩子们一个个被大人叫回家去时，9点还不到。

临睡前，女生们挤在厨房舀锅里的热水洗脸脚。男生们等不得，到井边用冷水洗。看看附近的竹楼一片漆黑，只有远处隐约有一点微弱的光亮，四周一个人影都不见，男知青们就干脆脱得只剩内裤，从井里打凉水冲澡。

傣族的井很有意思，井边一个高高的架子，横架着一根长竹竿，一头吊着根直竿，竿头拴着个铁桶，横竿的另一头则吊着个大石头，打水的时候十分省力。这里天气热，清凉的水冲在身上舒服极了。如果是在昆明，2月的晚上水是会结冰的。

正抹肥皂时，忽听有女人边说话边朝这个方向过来，男知青们急忙大叫：“女生不能过来，我们没穿衣服。”不料来人毫不理会，径直朝井边走过来，男知青们赶紧背过身去。

来人是3个担着桶的傣家毕少，吃饭时见过她们在厨房里帮忙，她们从社管会那边过来，可能是为厨房担水。这3人毫不害羞地直盯着男知青们的后背看，还大声对他们说话，窘得男知青们手足无措，躲到井台外边。她们在井边“咣铛、咣铛”放下水桶，一边说笑，一边打水，眼睛一直调皮地看着男知青们，动作故意慢腾腾的。男知青们满身肥皂沫还没冲掉，只好苦笑着等待。直到3人打满水，担起走了，几个死爱面子活受罪的小伙子才回到井边，匆忙冲洗完毕跑上楼去，生怕她们再来担水。

洗完回来，几个夜猫子型的男知青还不想躺下，老地很想知道这里的傣族老乡们晚上都干些什么，就提议出去串门，老猫等几人积极响应，不料他们沿着寨子中大道走了一个来回，却发现三十多幢竹楼没一家亮着灯的，几人只好灰心地返回。

熄灯躺下，几个附中的同学互相谈起来到这儿的第一天的印象，他们认为，比起他们文革前学农时，所接触的昆明附近农村的那些农民，这些傣族老乡看来比较朴实大方。另外几个不是附中的因为互相还不熟，则不发表意见。说着说着，屋里响起了轻轻的鼾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渐入梦乡。

老地快睡着前，听到四周竹林在微风中哗哗作响，林中无数的小虫在不知疲倦的鸣叫，不远处大榕树上的鸟儿不时发出一声啼叫。在这异乡的第一夜，他生出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以前就来过这个地方，见过这些人，这里的

一切他似乎很熟悉。迷迷糊糊中，听到门外有轻轻的脚步声，有人轻声说话，那些话他好像能听懂，但又不明白具体的内容。意思却很明白，是大人们来看望熟睡的孩子后，所说的那些话。



《榕树魂》——

劳动很轻松

首个工作日，一大早，就有人来叫知青们，带他们出工。

这天的劳动是修沟埂，把沟边的草锄去，以免夏季阻碍水流。傣族老乡们似乎没有昆明附近的农民能吃苦，干不了多会儿就叫休息，休息时间则很长。休息时所有人都坐在树荫下聊天，妇女们都用芭蕉叶包着些吃的东西，带到地头来分给大家吃。一天干下来，知青们一点都不觉得累。

以后的一段时间，每天有人带知青们去出工，干的活多是些锄草、打豆、拔秧、栽秧之类妇女活，也学着干犁田、耙田那些男人干的活。第一次犁田时，老地突然想起在一本小说《边疆晓歌》中看到过，犁田时要盯着牛头看，扶犁把时不要太用力，试着照做，果然犁得比较直，深浅也合适。

知青们感觉到，傣族老乡们对于人的劳动的态度似乎不认真计较，干活时从不谈论谁干得多、谁干得少，也从没听到过他们指责过谁偷懒，甚至连抱怨的话都很少听到。也有个别小青年对农活不下功夫，玩世不恭的态度，干什么活都不认真，老人们似乎也不当回事，很宽容地由他们去。他们干什么全凭兴趣，社里分配的活计，一天的活有时拖拖沓沓三天才干完，有时高兴起来半天就完成了。拿挑东西来说，挑多少全凭自觉，感觉吃不消就少挑点，感觉能挺住就多挑点，全靠自觉。

社长拿他们没办法，他安排活计时给的时间弹性都很大。

跟妇女们一起干活的时候边干边说笑，跟着学说傣语，不觉得累。跟男人们一起干则有些闷，男人们不太说话，但干不了一会儿就停下坐到树荫下抽一阵烟，所以跟男人们一起干活儿反而比与妇女们一起干时轻松。连女生们都说这儿的劳动太轻松了，同样也是锄草，在昆明学农时，中间是不让休息的，干一天下来满手起泡，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在这儿即便是农忙时，也并不感觉有多累。傣族们干活跟玩似的，犁田插秧时顺手抓田里的黄鳝、泥

鳅。割谷子时则挖田鼠、追秧鸡。

傣族老乡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与大自然融洽和睦共存，只向自然取用满足生活的少量物质，进行可再生的良性循环生产，不为贪欲伤害一草一木。公社化以后，个别汉族干部却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要求下面多交公粮，多卖余粮，不顾一切地对大自然进行破坏式地掠夺。

以前傣族种田根本不搞什么田间管理，秧栽下去以后就不管了，顶多派一个人看看水。等到谷子可以收割时，有的田里的杂草差不多能把谷子全都掩盖掉，因此那时的亩产量很低。但傣族们并不在意，他们家乡的田地实在是太多了，产量再低也不要紧，随便种点就足够了。后来那些内地来的干部们看不惯了，下令要求傣族老乡们要种新品种稻谷，要种双季稻，要使用化肥，要薅秧。总之，就是要土地多产粮。傣族老乡们很听话，划出一部分田地来种什么台北8号之类的新品种稻谷，那些稻谷粒小但饱满，出米率高，卖余粮价钱高，老品种大谷只能卖8分钱一公斤，而新品种能卖到1角3分钱一公斤。但只有一点不足之处，新品种稻谷极难吃，老乡们从不吃，只吃老品种大谷，新品种的全部交公粮卖余粮。种双季稻也是跟玩似的，在瑞丽这片亚热带土地上，手杖插在土里都会长出根来的，别说种双季稻，种三季、四季都没问题。只是到收割时才发现，大多都是瘪壳，产量极低。用化肥没问题，上级安排了购化肥的钱，老乡们一看，百货公司卖的国产尿素价钱比缅甸那边的日本尿素的贵很多，就跑到缅甸买日本产的来用。撒到秧田里，结果秧苗疯长，到发现不对时赶快拔出来插，老乡们说从没插过那么长的秧，足有二尺长。薅秧最有意思，所有人打赤脚排成一排在积了半尺深水的田里走过，见到杂草就用脚踏进泥里，连腰都懒得弯一下。要是见谁弯腰下去，那他（她）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去拔杂草，而是去拾小田螺，知青们也帮着拾。那种小田螺非常好吃，但吃起来要点技术，傣族老乡们煮了送来给知青们吃，教他们如何将螺肉从壳里嘬出来，笨点的知青始终学不会，只好望螺兴叹。走过时，当然也不放过田边那些说不清名字的野菜，此外水沟里还有一种很好吃的像长发似的水草，所以实际上弯腰下去的时候很多，目的却不是薅秧。

每天劳动休息时，男知青们跟着鹿旺仔们跳进小河里游泳、摸鱼，女知青们跟着毕少、篾巴们摘野菜、捞水草。

收工后吃现成饭，饭后去傣族家串串门，经常玩到深夜才回宿舍睡觉。每逢赶街天（5天一次），就到区上（后来改称公社）去寄信，顺便到其他寨子找别的知青玩。

因为离开家时间还不长，男生们感到这一段的日子跟在校时到农村学农差不多，挺好玩的，听说有些女生晚上因为想家而哭泣，他们不但不同情，还感到好笑。

划成份

大约是下乡3个月后，寨子里来了一支由几个当兵的组成的工作队。他们来的任务是给所有人划成份，为成立人民公社做准备。

听他们说，由于“走资派”搞边疆特殊，这里两年前才搞完土改。去年，在知青们下乡之前不久，当地刚刚进入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阶段。现在则要加快革命步伐，成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没想到，以前在电影中看到的成立人民公社这种历史大事，居然能亲身经历，使这些自小就唱“公社是棵长青藤”的年青人感到有点怪怪的。

头一天上午是自报成份。知青们兴奋地跟随着工作队，看他们挨家挨户地作登记。这几个兵每人都能说流利的傣语，跟知青们也很合得来，把登记表交给知青们让帮着填。走到寨子尾登记完最后一家后，知青们吃惊地发现：全寨子除了3家人外，包括老社等社领导在内，全都报的是中农成份。而那3家，自报是富农。

弄迈自报的结果是：这里没有贫下中农！

知青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接育的，即然这里没有贫下中农，还来干什么？

当兵的向知青们解释，傣族很要面子，谁也不愿意说自己穷，当然不愿意当贫农了。他们说，自报成份并不作数的，最终还要由工作组评定。

到了下午，工作组全体人马把知青们召集起来，要他们一个个自报成份。以前大家都填过不少表，家庭出身一栏五花八门，而成份栏都是填的“学生”，所以大家就都报学生。

这下工作组组长为难了，他的登记表上规定只能有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这么几种，没有其它选项，学生？算什么？

他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按每人的出身来划成份，于是叫知青们一个个顺着报出身。

“工人”，无产阶级，算贫农，很干脆。

“教师”，讨论了一阵，有好有坏，目前分不清，那就先算下中农。

“工商业者”，不好，算中农。

论到老地，麻烦就出来了。

“干部”，不好办了，工作组讨论了半天没得出结论，于是决定再审查细点。

“你爹是不是走资派？”组长问。

“不是当官的，只是普通干部”，老地答。

“普通干部算什么？”大家苦苦思索，真的，算什么？按当时领袖给出的分类，好人似乎只有“工农兵”。原来说过“工农兵学商”，后来“学”都上山下乡了，“商”则早在文革初期就给改为“服务员”，算是“工”。

“你爹当干部前干什么？”组长的确有点经验，既然一下搞不清楚，就不必去钻那牛角尖，将历史往前翻一页看看吧。

老地答曰：“当兵”。

“当兵不算成份”，组长自己就是兵，当然知道。

“他当兵前是干什么的？”组长再问。

“学生”，老地答。

这不又绕回来了么？组长直挠头，作苦不堪言状。众人也跟着挠头。

忽然，组长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一副恍惚大悟的样子，何不将历史再往前翻一页呢？于是他兴奋地大声询问老地：“你爹的出身是什么？”

这下轮到老地苦苦思索了，老地真记不得，他爹是什么出身。

“可能是地主吧？”老地猜测，并向大家解释：解放前能读书的，肯定不是贫下中农。而且他爹说过，参加革命时是和家庭作过斗争才走成功的。

大家也同意老地的看法，一致认为既然他爹当兵前是大学生，出身就很有可能是地主，很可能还是家大地主，因为据说旧社会连富农子女都只可能读个私塾，小地主的子女也一样读不起大学的。

“那么你的成份就是地主”，组长斩钉截铁地作出了结论。

就这样，老地刚18岁，就成了地主。

这下老地当然不干了。他再不省事，也不至于像傣族那样，为了有面子而争当有钱人。何况当地主并不光荣，他穿开档裤时便知道地主是坏蛋。知青们当然也不愿意在同伴中弄出个戴地主帽子的来，于是有人开始发难：

“组长，以后他的儿子应该算什么成份？”说话的是老八。

组长以教训人的口吻对老八说：“新社会了，以后当然不会再出地主了，如果他的儿子当工人，就是工人成份。如果当农民，成份就是农民”。

“他儿子的儿子呢？”老令慢条斯理地插问道。

“一样啊”，组长答道：“干什么就是什么成份嘛。”

“不合理，不合理。”大家开始悟出道道来了，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一个个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他爷爷是地主，他的成份就是地主，这是你说的。那他是地主，他的孙子也应该是地主！对不对？”老八一脸的深仇大恨，似乎不把老地的孙子打成地主，他就要跟组长拼命似的。

老令再加上一码：“对！他的孙子的孙子还是地主！”还郑重其事地为老地计算，如果老地20岁结婚，40岁当爷爷，60岁当老祖，80岁当祖老爹的年份，一直算到了2030年。

组长有点懵了，工作组的人也觉着是有点不对劲，这么一来剥削阶级何时才能消灭？这共产主义岂不是永远无法实现了？他们也开始争论起来。知青们文革中什么没见过？谭力夫、遇罗克谁不知道？会议最后开成了全体知青和全体工作组成员关于阶级血统理论的学术讨论会，吵吵了整一晚上，老地的子子孙孙们该不该戴上地主帽子，没个定论，不了了之。

最终组长还是在老地那张表的成份一栏处，歪歪扭扭地写上了“地主”两字，只是在后面大大地加上了个“？”号。

直到现在老地也没搞清楚，他的地主帽子摘了没有，也不知道那张划成份的表还在不在他的档案里，反正中国人谁都见不到自己的档案，所以也就不得而知。

从那天起，大家都改口叫他“老地”，时间一长，傣族老乡也都改口叫老地，这绰号就一直伴随着他到现在。

后来说是上面的政策下来了，知青全体算一户，成份是贫农。因为知青既没有土地、竹林，也没有牛。

寨子里除知青外，最穷的还有一个抽大烟的单身汉，他本来应该划为贫农的，因为他的地和牛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可他说他还有座小竹楼，不比其他人穷多少，并且坚定地表示，谁要划他当贫农，他就死给谁看。最后只好算他是下中农。地主不好，谁也不愿当。寨子里那几家想当富农的，经过大家评议，认为条件都不够。于是，全寨子除知青和烟鬼外，全都算中农。

就这样，知青下乡来是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结果是知青成了贫下中农，寨子里却都是中农，贫下中农接受中农的再教育，这叫什么事儿？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原来的区、乡分别改为公社和大队，而弄迈三社则改称弄迈生产队。

知青们的生活好像没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大变化，看来人民公社与合作社区别并不大。只是开会的次数增多了。

开会还是很好玩的。全寨子的人济济一堂，席地而坐。妇女们叽叽喳喳的唠家常，男人们相互传递毛烟，大声开暧昧的玩笑。知青们也混坐在其中，男生也抽烟，女生也唠家常。

会议主持人并不单设个什么主席台之类的，谁要说话就大声清一下嗓子，大家就静一下听他说。议题也相对集中，谁要扯远了，立刻有人嘘他。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连那些放牛的小鹿旺仔都有发言权。

知青们此时已经基本上能说傣语了，他们在会上说什么话，傣族老乡们也都会很认真地对待。

开会时气氛相当活跃，不时有人插进两句俏皮话，逗的全场一片笑声。因为大家都是席地而坐，碰上特别好笑的时候，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地趴在地上。那种场面，不像生产队开会，到像是家庭聚会。

在寨子里开会决定重大事务时，多半都要将寨中最年长的老人请到首席坐着，谁要说什么事，要先对着他说，说完后也要先听他的意见。大多数情况下，那老人无论谁说什么事，都只管点头，从未表示过什么与众不同的意见。在知青们看来，这仅仅代表尊重，倘若他真要参政，大家也不一定听他的。弄迈的傣族老乡们处事都比较豁达，没有那些勾心斗角、拉小山头谋私利的花活。成立生产队后，老社再次成为头领，这是全寨子的人推举出来，最后又报到上面，由上面宣布任命。一般情况下，当时边疆各生产队的头还都是群众选举产生的。在知青们看来，当生产队的头既没什么特殊待遇，还反而要比普通群众多吃苦受累，很不“划算”。当到大队一级的干部则要“划算”得多了，不用下地干活，拿国家工资，公社一级的就更“划算”。当然，这些干部就不是选出来的了。

《榕树魂》——

玩了一天

清晨，知青们被一阵阵的鸡鸣声吵醒了，看看天没亮，又接着想再睡。刚要睡着，一种奇怪的“咚、咚”声很有节奏地响起，像是在敲什么东西。不一会儿，四面八方此起彼落地都响起同样的声音来。他们迷迷糊糊听了一会儿，猜不出是在做什么，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睡。后来才搞清楚，那是傣族妇女早起用木臼舂米的声音。

天亮了，知青们陆续起床后，下楼到井边洗漱。几个小孩和二、三个老人蹲在路边好奇地看着知青们满口白沫地刷牙。寨子里其他人则不知到那儿去了，连那些大点的小孩也不见。

早餐吃的是煮饵丝，非常好吃。老社在厨房外等着他们吃完后，把大家带到社管会，估计是要交代什么事。

社管会现在已是女生宿舍，男生非请莫入。老社让女生们也出来，所有人都坐在外面凉台上，然后冲对门大喊一声：“老古”。隔着大路的对面那座竹楼是老社的家，喊过之后，但见一人从楼上下来，朝这边走过来。

此人着中山装，明显是个汉族，大概30多岁。上了凉台，他先跟老社说了一阵傣语，老社不住点头。听他傣语如此流利，知青们立即对他佩服得不得了。

他开始讲汉话时，却是一口川音。先作自我介绍，说他是乡里的干部，姓古，大家叫他老古就行了。他对知青们宣布，因为刚来，先休息一天，不参加劳动。接着他背书似的讲那些大家在县城时就听过的民族政策、边疆特殊性、边境对面有敌对势力等等。知青们没耐心听他说，七嘴八舌地开始提问。很快会议就演变成老社答记者问，老古则变成翻译，也成了知青们的第一位傣语教师。

据老社介绍，全乡共有8个合作社，弄迈是第三合作社。弄迈人口较少，但土地却相对较多，人均土地数十亩。由于地多人少，每年只能轮种部分土地。弄迈还有大片的竹林和荷塘，都没好好利用。也就是说，这儿资源丰

富，有待开发。老社还细致地介绍了寨子里各家各户的情况，老古则不时解释应当注意哪些傣族的习俗。

会议结束时，恰好寨子里的人肩扛锄头从外面回来，不一会儿，家家户户就都冒起了缕缕炊烟。

在社管会楼下，放着一堆锄头、铁铲。这些工具是给知青们用的，酋长代表大家向社里领用了这些战斗武器。酋长是昨天这个刚拼凑起来的知青大家庭民选出的“大家长”，女生也选了一个副家长。

老地拿起把锄头掂量掂量，意识到自己也将跻身于刚收工的那支队伍之中。

他记起文革初那首歌，《拿起笔做刀枪》，心里暗想，革命革到现在，干脆丢掉笔，拿起锄头修地球了。

什么再教育，当农民就是当农民！他暗暗自嘲道。

中午饭后，几个男生决定到四周玩玩。几个鹿旺仔自愿做向导，带领知青们朝通向大榕树的那条小路走去。到了小路口，小孩们却不走了，还一再示意知青们别进去。知青们不明白他们的意思，就不管他们，径直钻进林中。

穿过密不透风的竹林，来到榕树下，知青们才发现，这棵树之大，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

绕着树转了个圈后，他们发现树下放着一张芭蕉叶，上面放着米、花生、红糖等食物，爬满了蚂蚁，旁边还放着只装水的木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是祭鬼用的东西，榕树下则是祭鬼的场所。怪不得小孩们不敢进来。）抬头观察，看到可以顺着几根靠在一起的义根爬到树上去。于是大家跟着老地，避开树枝上的鸟粪，很容易地爬到了树的中部，骑在比水牛腰还粗的横枝上。再往上就不行了，上面横枝距离这一层太高，虽然也有义根垂下，但离得太远，要等它们长得接近地面了，才可能顺着攀到上面。如果能上去，上面的鸟巢便唾手可得了。鸟巢很多，至少上百个。他们往上爬时，惊动了留巢孵卵的鸟，几只灰鹤、白鹭和鱼鹰飞了起来，叫声喧天。后来见人类没本事再继续向上，便陆续回巢了，只是时时警惕地探头出来看看这些侵略者。

他们落坐的树枝，离地至少有10多米，已经高于周围的竹林，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

美丽富饶的坝子，尽收眼底。

环视四周，北边不远处有座原始森林覆盖的大山，据说山上居住着景颇族，傣族则都在坝区。南面远方也有一座大山，两山之间是大片农田、蔗林、荷塘以及被竹林环绕着、像一座座绿岛似的傣寨。一条玉带般的大江，将长条形的坝子纵向分成两块，江那边已是邻邦的领土。

低头观察弄迈寨子，在围绕寨子的竹林外面，靠山的三个方向都被宽阔的荷塘包围着，另一面则是一片很大的草坪。寨子前后各有一条小河流过，寨后靠山边的那条河小些，而前面靠公路的那条则大些。离草坪不远处有个很大的池塘，似乎还有个水坝。

午后的骄阳下，水塘边有一群水牛在嬉水，放牛的小孩躲在竹林边的荫凉处玩耍。整个寨子从内到外都是静悄悄的，远处也见不到人。知青们观察很长时间了，公路上一直没有车辆驶过。他们在县城时就听过介绍，说这儿人口很少，看来的确如此。

下树前，大家商定，先到大草坪看看，再去池塘游泳。

走出寨子南端路口，大草坪赫然展现眼前，其面积堪与昆明东风广场相比。老龙等爱好体育者不由议论：若是上学时学校里有这么一块场地，就不用在街头踢足球了。可惜的是草地不很平整，还不时见到几堆牛粪。好些牛粪上插着小竹枝，他们还以为是当心“地雷”的标志，后来才知道那是表示此物有主的意思。

走到池塘边上，果然有一道水坝截住了河流，池塘实际形成了个小水库。水闸没关死，河水越过闸栏，流往下游，在闸口处形成个小瀑布。

来到河边，眨眼间那些鹿旺仔就已经脱得赤条条地，跳入水中扑腾。虽然四下里一个人影都不见，知青们完全可以像上小学时那样，来个“解放式”，但一想到昨晚冲澡时之尴尬，就都决定还是谨慎点，穿着条短裤头为妙。

鹿旺仔们只会游“狗刨”式，跳水则只会“冰棍”。待他们见识了这帮在昆明滇池傍盘龙江边长大的知青们所表演的各种泳姿和跳水动作后，无不钦佩得五体投地。

玩得累了，大家横七竖八的躺在大草坪当中，看看蓝天白云，再看看四周一片青翠，二月份的天气就这么热，哪有一丝冬天的模样？大家说起在昆明时，只有夏天才能游泳，游泳池里跟下饺子似的人满为患，要游得痛快就得跑老远到滇池或者盘龙江上游。在这儿太好了，走几分钟就到池塘了，以后每天都可以来游。

闲聊一阵后，老豆拿出口琴来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就跟着唱。他们的男声小合唱是在下边疆来的车上时练就了的，唱得很是合拍。

一个傣族毕冒（小伙子）寻着歌声过来了，很友善地对知青们点头微笑，自我介绍叫曼义。曼义个子不高，身材很匀称，黑皮肤沾水后闪闪发亮，老地当即给他起了个绰号“鳗鱼”。后来得知他是鹿旺仔小印度的哥哥。

那鳗鱼坐了一会儿后，对几个小孩说了几句话，就管自跳入水中，几个小孩也跟着他跳了下去。但见他们游到对面一大片水葫芦旁，开始合力去拉边沿的一块。

知青们毕竟是在滇池边长大的，马上明白了鳗鱼他们要做什么。昆明叫这种捕鱼方式为“翻水葫芦”，这是利用下午鱼群游到水葫芦下躲避太阳的习性，轻轻将一片水葫芦拉近岸边，然后众人一起突然将水葫芦翻上岸，把藏在那堆植物根须中来不及逃走的鱼儿给带上岸去捕捉。于是，知青们也一齐下水，参加进拉那块水葫芦的渔民中去。

不一会儿，一块足有卡车那么大的水葫芦浮岛，被众人顺利地翻上岸来。数十条巴掌大小的鱼钻出水葫芦根须堆，在地上乱跳。这种鱼样子有点像鲶鱼，头大身小，无鳞，嘴边长着两根长胡须，两鳃边和背上长着三根硬刺，捉的时候要从正面去抓，否则就会被刺伤。

鳗鱼拿来根长长的竹蔑片，将鱼一条条穿过鳃串在一起，又将这一大串“鱼项链”放到水里养着。在这整个过程中，知青们知道了傣语的鱼叫“巴”。

捕鱼结束后，放牛的小孩们穿上衣裤，开始赶牛。

池塘远处有一群水牛，一直在那儿吃草，也下水塘泡一泡。鹿旺仔们人人手里拿着支竹弹弓，身后则背个小竹篓。但见他们从身后竹篓中摸出个小泥丸，放在弓弦上，拉弓发射，只听“嗖、嗖”声响，一颗颗泥丸远远射到那些懒洋洋地泡在池塘中的水牛身上，劈啪作响，看来水牛们被打得不轻，“哞、哞”叫着，很不情愿地爬上岸来。

男知青们大都属于那种从小就顽皮，至今仍童心未泯的男人，见这弹弓威力非常，立即要过一支来细细查看。傣族的这种弹弓，用硬竹做弓，牛筋做弦，弦中间用竹篾编了个放弹丸的小兜，居然与连环画书中古代兵器相似。

见知青们对弹弓感兴趣，几个小孩便想卖弄一下，便约齐了一起向10米开外的一棵小芭蕉树齐射了一发。

弹丸飞过，但听得“啪啪”几声响，无辜的小芭蕉树杆冒起了一阵烟尘，摇摆了几下，便缓缓地从中折倒了。

老地大吃一惊，忙上前看，只见那手臂粗的树杆上几个弹孔深达寸许，更有几个洞穿而过的。他拿过一个小孩的弹弓，又要了个泥丸，放在弓弦上的小兜里，拉开弓想朝竹林试射。那小孩拉着他持弓的手，掰着他的姆指，不住地说什么，老地听不懂，只管点头。等小孩放开手，站到一边，他开弓便发，但听得“啪”的一声，眼前顿时爆起一团灰烟，紧跟着他的左手大姆指一阵剧痛，令他不由得把弓扔到了一边，握着伤指直跳。

这时，其他男知青也过来了，站在一边看见老地自伤，就一个个过来轮流用那支弓试射。一阵阵烟消云散之后，只见他们有如回到了婴儿时期，一个个将左手姆指放进口中含着了。

老地不甘心，拾起弓来，还要再试。那帮小孩热心地把着他的手，一下一下地发空弦，硬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让他掌握了握弓的诀窍。等到开始实弹发射时，再不会打中自己的手了，只是准头还不行，不如他在昆明用皮弹弓打得准。

其他男知青也有几个掌握了要领。一人一只弓，朝着那些无辜的芭蕉树乱打。

在他们练习射击时，鳗鱼先前派回寨子的一个小孩跑来，带来两包用芭蕉叶包着的椒盐之类的作料。那鳗鱼便指挥小孩们将那串鱼捞了出来，用一把小刀剖开去掉内脏，用小包里的作料涂在里面，一条条翻开平平地叉在竹枝

上，看上去像那个受难的神似的。随后他又生了一堆火，让小孩们围着火堆烤鱼。

不一会儿，那香味就飘了过来，知青们的口水也被勾了出来。

小孩们相当大方，将先烤好的鱼递过来让知青们先吃，知青们连声道谢，边吃边夸“好香、好香。”回想起文革前在昆明的梁家河农村学农时，他们也曾堵起一段河道抓过一脸盆的鱼，那时就只知道用脸盆煮，腥气太重不好吃。早知道用火烤这么好吃就好了。

吃完烤鱼，鳗鱼和鹿旺仔们一人骑上一头牛，并让知青们也自选一头骑上。牛很驯顺，但知青们还是费了不少周折，才顺利地骑上。牛群秩序井然地排成一队，顺着小路朝寨子走。

此时太阳已经偏西，牛队的倒影长长地投到竹林织成的幕墙上，看起来像一队古代武士在行军。老豆的口琴伴奏下，知青们合唱《打靶归来》，小孩们直着嗓子跟着瞎唱，直到寨口才停住。

分手时，小印度和鳗鱼，一再以手势动作比划，邀请知青们晚上到他们家串门。知青们受宠若惊，欣喜的接受了。



《榕树魂》——

音乐

弄线老帕（因为他小提琴拉的好，被知青们公认为小提琴大师帕格尼尼）有一架短波收音机，能收听到很多外国电台。（不像老地那台自己装的四管机，只能收中波，即便收中波也只能收到邻国的电台，中国的电台信号很弱，收到了也只有8个样板戏。）大伙就时常聚在他那儿，抱着收音机细心地调台，说话的都不听，反正也听不懂，专门找那些时常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记下频率和时间，以后按时收听。

三个月就能说一口流利傣语的语言天才老超，被调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每逢街子天知青们都要到他那儿去玩。广播站的收音机才是真正的专业级的，灵敏度极高，好多老帕的收音机收不着或是收不清楚的电台，在他那儿都能稳定地收到。有一天伴晚，居然收听到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达》（天方夜谭交响组曲），为了让人们共享这美妙的声音，激动得忘乎所以的知青们打开扩音机，让优美的乐曲在公社上空中飞翔。播完音乐后，那个电台的信号就没了，老超随手锁上门就跟着老地他们一起到弄迈玩去了，忘了关扩音机。天黑之后，天波变强，广播里传出了曾经是老大哥后来又成了敌人的某国的对华广播，反革命叫嚣声响彻公社天空。因为找不到老超，只好派人上房把广播线给掐断掉，扩音机失去负荷烧坏了。好在老超技术高，（他上小学就装了超外差四管收音机，大家先叫他超外差，后来简称老超），硬是用手工绕好变压器，修好了机器。这事要是发生在昆明，知青们全都得坐牢。好在当时的公社干部不怎么左，说反正那汉语广播傣族也听不懂，没造成多大的影响，只是要老超写了份检查了事。

勐秀有个叫老激动的知青，从昆明带了台手摇唱机、数十张唱片下来。弄迈的知青知道后，全体出动走十多公里山路赶到他那儿，住了整整两天，听完所有唱片才走。他那些唱片中以民歌、民乐居多，不太合他们的口味，但还是感到非常值得一听。名声传出，勐秀成为外五县知青小串连的必到之处，两个月就吃完了他一年的口粮，他只好带上唱机、唱片，也出去串连。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最隆重的接待。他也来过弄迈，住了好几天，那些唱片被弄迈知青反复听了好几遍，都听腻了。后来老激动迷上了个小毕少，跟着那家人跑到江那边去了，唱机、唱片也带走了。据说他后来在那边一座大城市开了家音乐咖啡厅，混得挺不错的。

老地的母亲下放到干校后，某一天偶尔在那个偏僻的小县城的百货商店里，发现了一把积满灰尘的小提琴，当即便买下托人带来。这在当时十分不易，昆明的乐器店那时只有二胡、笛子之类的民族乐器卖，据农场的北京、上海知青说，在那些大城市也都买不着提琴的。有了提琴，老地就开始跟老帕学。老帕授课极其认真，只许老地拉练习曲，不准拉歌，要循序渐进的从《开塞》的“咪、嗦、咪、哆”开始，以一年为期拉完练习曲《开塞》，然后还要用至少五年时间去拉那些《马扎斯》、《小顿特》、《克莱采尔》、《罗特》、《大顿特》直至最高级的《帕格尼尼》。老地一听头便晕了，但在老帕严厉的监督下，老地只好每天三次像杀鸡似的拉着那些极枯燥的音符。拉得自己直想睡觉，旁听的人则睡不成觉，多次集体提出申请，要求他将提琴弓换成长刀，干干脆脆地给他们每人脖子上拉一下算了。幸好一本《开塞》还没拉完，那好为人师的音乐大师便办病退回昆明去了。临走时，再三叮嘱老地，每天至少拉三个小时的练习曲。等老帕走后，老地到是基本上坚持了天天拉琴，但拉的却全是大家喜欢听的歌。所以他的提琴水平，也就永远地停在了《开塞》，还是未完成的。

老帕的音乐知识极丰富，远超学校里的音乐老师。只要是古典音乐，他大多都能说出曲名，并能说出作者的生平逸事。在巴赫、海顿、贝多芬、舒伯特、肖邦、李斯特、施特劳斯、比才、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等音乐大师的名字之后，多半会有一个好听的故事，这些音乐课使大家受益非浅。老地清楚地记得，当第一次听《自新大陆》、《匈牙利狂想曲》这类曲子时，忽然之间，心里有如触电般瑟瑟颤抖、身上泛起鸡皮疙瘩，随后是如醉如痴的那种感觉。老帕说这就对了，说明你们已经“发烧”了。多年以后，“发烧”这个词正式成为音乐界术语，老地认为其创造权应属老帕。

宣传队

弄迈的知青分别拥有手风琴、口琴、提琴、二胡、笛子、吉它、八弦琴这几种乐器，会玩的几人兴致来了便聚在一起合奏，所奏曲目多半是大家喜欢唱的那些歌曲，比如外国民歌二百首当中的歌。他们的水平还到不了分声部的演奏，只能是全体“预备起”的大齐奏，但因为长期一起合练，配合算得上有板有眼的，静夜之中听来，还颇有点韵味。

听到公社要举行文艺汇演的消息后，女生们强烈提议，老社同意，弄迈也成立了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宣传队，动员玩乐器的男生全体参加，组成乐队，又由那几个能歌善舞的女生和她们训练的毕少们组成歌舞队，还吸收了相帅和鳗鱼，让这俩人专唱傣族歌曲。鳗鱼唱得不怎么样，相帅却有惊人表现。她的嗓音天生就好，音域宽、音色纯正，唱起傣歌来，不知倾倒了多少毕冒。后来县里、州里的文工团都来要过她，可惜这女孩不愿意走出家门，最终埋没了又一个“才旦卓玛”。老社很宽宏地给了他们一个月的脱产排练时间，宣传队也很争气，排出了一组节目去

参加公社的文艺汇演，宣传队着实为弄迈争了点光，汇演时以绝对优势技压其他寨子的宣传队，一炮打响，获得了全公社团体奖第一名。

汇演后，附近好几个寨子都来邀请弄迈文艺宣传队去他们那儿演出，弄迈汉傣两族的年青人快乐的“走穴”演出就此开始。

到其他寨子里去演出不比在公社演，由于台下没有领导坐着，面对着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乡亲，演员心理状态极其放松，越演越随便，甚至与场下观众大开玩笑，全场气氛极为活跃。若是去的那个寨子里也有玩乐器的知青，就要邀来加入进知青们的小乐团，并且要出**奏。有唱歌的，要拉上台唱上几首最拿手的。有跳舞的，也必须上台表演献艺。傣族最爱对歌，每个寨子的赞哈（歌手）与弄迈的歌手对歌（他们对的歌当然不是那些革命歌曲，而是世代相传的情歌）成为最受傣族欢迎的节目。而知青们最喜爱的节目，便是由小乐队演奏或伴奏的那些“黄歌”，奏到兴头上，还会来个两寨知青集体大合唱。

女生们带领罕俊等毕少跳的舞蹈则比较合毕冒们的口味，傣族毕少身材苗条，跳那些《北京有个金太阳》、《春新米》之类的舞蹈还很有点份儿。

每次演出的压轴节目是集体跳傣族舞，由当地傣族敲起锣鼓，所有演员包括小乐团成员都下到台下与观众同乐，两个寨子的人围成大圆圈，中间燃起一大堆篝火，起码要跳上个把小时才结束。

此时此刻，与其说是演出，不如说是两个寨子傣族和知青的大联欢。

弄迈宣传队越演越火，名气越来越大，前来邀请去演出的寨子排上了队。

到后来连境外的寨子也一再来请，经过层层请示直到由州里批准，才准许他们去演了几次。

第一次去境外演出之前，县里管宣传的人来审查节目。那是个面无一丝表情的中年人，姓胡，看完全部节目后，他突然冒出一句：“把你们加演的那些节目全部来一遍。”他所指的加演节目，显然就是那些小合奏的歌曲。

见知青们想找搪塞的话，他干脆挑明：“没事，不会给你们上纲上线，就听听你们有多高水平。奏吧，先奏个《小路》。”

于是，乐团专门给他来了次汇报演出。这位老兄先是跟着哼哼，到了后来干脆放声高唱，他唱歌的水平绝对压倒知青歌手，是那种真正的专业级的洋嗓子。听他唱《三套车》、《重归苏莲托》这些歌，真是一种享受。

知青们很想跟他结识，但他可能有所顾虑，过完瘾就变回冷冰冰公事公办的模样。打着官腔说了个别节目要如何修改之类的话，又补充说：到那边不许加演。说完就走了，以后再没来过。知青们到县城去见到他，跟他打招呼，他只点个头就不再搭理人。

宣传队既然给弄迈争了光，队里对宣传队便很是照顾，队员们凡有演出就不必下地干活，演出、排练都算出工，而且记最高的工分。

虽然没有出场费，也没有门票收入，但出去演出仍有不少外快。照例，邀请人得管全体演员的晚饭和夜宵，演出时还得给乐队准备好烟、茶，演出之后则会送上两刀烟丝，几大块碗状的红糖。烟当然归乐队，糖则归舞队，傣族队员自然不会要，东西就都到了知青们手里。

有如此种种好处，当然不能把那些既不会乐器、又五音不全、还手脚僵硬的南郭先生们丢下不管。凡有演出，全体出动，一个也不少。去的人都想法给派点活，光是敲木鱼的就安排了3个，还给两个擅长模仿的每人发一支不贴笛膜的笛子，让他们摇头晃脑卖力地假吹。

如此一来，弄迈宣传队的乐队阵容大增，人数已经不亚于专业文艺团体。

盲目扩张的结果，是这大锅饭自然吃不长。扩大了队伍后，没演几场，秋收在即，老社率先发难，要大家讨论是演戏重要还是种田重要，讨论结果当然是后者重要。于是明确规定，宣传队今后只能用业余时间排练演出，便宜工分也被取消了。

其时，各邻近寨子也差不多都去演遍了。虽说又排了些新节目，可人家一想，为了那么个把节目请这么大帮人吃饭似乎并不划算。再说人家也要忙秋收了，于是那些节目也就算白排了。

没人来邀请，宣传队便散了伙。

那两支没笛膜的笛子却成就了个音乐天才。笛子的主人——那两位当代南郭先生，看到再不能靠它混饭吃以后，随手将它送给了小胖墩。小胖墩贴上芦苇芯里的薄膜，在大草坪上放牛时成天地吹。刚开始吹时，连那些水牛、黄牛都受不了，见他就逃。这小子相当有毅力，有空就练，没多久居然无师自通，吹得满像点样子了。后来，他飞快地超过启蒙老师，知青们又专门找来名师辅导他，他的技艺便突飞猛进，很快便技压县文工团笛手并取而代之，成为本寨唯一进县城吃皇粮的傣家子弟，不过那已是知青走后的事了。



《榕树魂》——

农忙

秋收时节，大地一片金黄。

大榕树上空，小鸟们的翅膀已经硬了，与父母们一样，飞得又高又远。

经过一个春秋，知青们经历了各种农作物生长种植周期，种稻自不必说，其它作物如黄豆、碗豆、蔬菜、花生、西瓜、甘蔗等等，掌握了基本的农业生产技能。老地曾经在瓜地干过一段时间，监守自盗吃过不知多少个西瓜、香瓜，现在挑瓜的技术仍算得上是一流的。

栽秧和收割，使知青们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地广人稀”。栽秧时，人得倒退着，用手指去丈量那些似乎永远退不到边的稻田。收割时则改为往前，用镰刀一刀一刀的去丈量。不管前进或后退，都要弯着腰，面朝黄土背朝天。

农忙时节，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出工。知青们醒不过来，每天都得队里派人来叫。傣族老乡知道每个人的床在哪个位置，边叫名字边用锄头从外面敲此人床头旁边的墙，直到知青们都醒过来答应了为止。

农忙时干活要一直干到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收工，中午饭则要带到地头去吃。

傣族带饭极简单，用一张芭蕉叶包上一包饭，再用另一张包上点菜，用竹编的饭盒装着带去。吃的时候，像印度人那样用手抓着吃。知青们就比较麻烦，得有个人回去弄好饭菜送来吃。

这时才知道什么叫睡眠不足，干活累的时候，田间休息时都要打会儿盹。

为了能偷点懒，知青们曾以极左思潮来破坏生产，所用的手法极为低劣。出工时，带上一本“红宝书”，干活

累了，就向老社提议，应该是学习的时候了。在那种政治挂帅的年代，老社不得不同意。然后大家就到地头坐下，由知青们当中某人捧着小红书，装腔作势的一句一句带着大家读，一直读到大家认为休息够了。后来老社用了个很大度的办法对付这帮奸猾懒蛋，他说只有知青才需要再教育，田间地头学红宝书的事，知青自己何时想学就自便。以后就由知青负责抓革命，而傣族社员群众专门负责促生产。这一招很灵，知青们再也不好意思组织那种田间地头政治思想学习班了。

挑，也是对知青们的一大磨练。春播要挑秧，夏收要挑谷。要经历肩膀由红肿、破皮，然后变成死肉、磨成老茧的过程。

挑秧时，要时时提防脚下油一般滑的路，要提心吊胆地走过由一根竹竿架成的独木桥，或是在陷到齐大腿根的烂泥中挣扎着保持平衡。挑起来后，中间还不能停下歇气，一停下秧捆就散开了，不管路有多远，得一气坚持到底。

有一次挑秧时老地脚一滑，就把腰给闪了，有两个月时间直挺挺的动不了，走起路来像个木偶似的，至今还留有腰疼的毛病。

挑谷子时也得小心看着走，不小心踩在稻茬上，或者是踩到路边的含羞草，脚板心一阵巨痛后添加一个伤口。挑谷子中途也不能歇气，如果停下，会撒得满地谷粒。其实，歇气反不如一口气挑到轻松，因为歇过后要再上肩，会更费力。好容易挑到目的地后，还要走上那架在谷垛上的高高的竹梯，再累也得咬住牙上，腿还不能软，腿一软准摔下去。

相对栽秧、割谷子和挑东西而言，其它农活都不算太苦。犁田、耙田、扬场这类男人干的活，其实比较轻松。妇女干的拔秧、栽秧、打场的活计，反而很累人。打场时最怕打黄豆，大热的天，烈日晒得人无处可藏。可是再热也得穿件外衣，脖子上还得围条毛巾，否则被豆壳上的细毛沾到身上，会弄得奇痒难熬。

虫灾

栽秧时，男生们都学会了抽烟、喝酒。

喝酒是为了解乏，也可解思家之愁。抽烟则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驱赶那些讨厌的小咬，二是可以借机伸展一下又酸又疼的腰背。傣族妇女拔秧、栽秧时也经常会卷支草烟叨着，当然她们吸烟只是为了驱小咬，而不像男人们

是为了偷懒。

小咬是一种小蠓虫，小得可以随便进出蚊帐孔。叮在脸上一点查觉不到，等它叮过后，肿起的包有围棋子那么大，又痒又胀，难受极了。有一次老地发觉左眼皮上有一只小咬，立即果断地给了自己一大耳光。当他眼前的金星还在闪烁之时，又来了一只叮在右眼皮上，他不假思索地再给自己一个大耳光。小咬是打死了，自己也不好受，没多久，他的两眼肿得只剩了一条缝，两三个钟头内他得动手把眼皮撑开才能看到东西。

除了小咬外，还得提防蚂蟥、毒虫、毒蛇。

雨季田里、沟里的水蚂蟥很多，个儿还特别大，在水中，毫无感觉地就叮到脚上，叮上就不松口，扯都扯不脱。知青们第一次下荷塘捕鱼时，酋长突然发现大腿上多了圈黑肉，仔细一看是条大蚂蟥，连拍带扯好一会儿才弄掉，吓得大家连滚带爬跑上岸来，再也不敢下水了。老地曾经见过一条叮在水牛腹下的大蚂蟥，足有手电筒那么大，堪称世界之最。

最令人防不胜防的是那些只有半根火柴棍长的旱蚂蟥，它几乎是无处不到，夜里居然爬到床上来叮人，等到翻身时压出一滩血来，才知道被它叮了。老豆曾经被旱蚂蟥叮在牙龈上，自己却一点不知道，开口说话时被别人发现的。追溯回去，才想起吃饭时曾经用嘴唇拣拾一粒掉在手臂上的饭粒，正在此时，蚂蟥就钻进了他的嘴里。雨季时走路，前面第一个人刚走过，旱蚂蟥就纷纷从草丛中爬出来，站在草叶尖上，伸着头一摇一摇的等待机会，后面的人一过来，它悄没声地就爬到裤子里，专挑最嫩的地方叮。所以到雨季时，人人都想抢在别人前面走。

还有一种大黑蚂蚁，跟马蜂一样尾巴有毒刺。如果不小心踩到它，被它一箭刺进脚心，那人会疼得一下就跌坐到水田中，半天都缓不过劲来。

一次出工的队伍路过一棵芒果树，老龙这家伙手闲，用锄头敲了一下树杆，忽见树上冒起一股浓烟，傣族老乡们喊一声“快逃命吧”，便四下落荒而逃。知青们不知发生何事，还在呆站着，直等到那股浓烟扑面而来，听到满天嗡嗡声之后，才发现是一大群气势汹汹的野蜂。老地算是反应较快的，一头就栽进小河中，潜在水中不敢露出头来，实在鳖不住气时就猛地抬头吸一口，又急速下潜，换了5次气才躲过一劫。其他知青和部分傣族，轻者头上突起一两个鸡蛋大的包，重者则鼻青脸肿，几个街天不敢去赶街，怕被人误认为麻风病。幸好那群蜂无毒，如果碰上的是一种能射杀黄牛的毒蜂，那天肯定要死不少人。

毒蛇是最可怖的，竹林中、荷塘里、菜地里甚至人住的地方，时常见到，毒蛇伤人甚至毒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知青们刚来时，大草坪上有堆新坟，死者是个放牛的小孩，是因为不小心踩到了一条3寸长的黑乌锥蛇被毒死的。

有一天犁田时，老令踩到了一条水蛇，那蛇反身咬住他的脚后跟，他一疼，用劲一甩脚，那水蛇趁机松口飞了出去，却不料还在半空中，被一只不识趣的白鹭从天而降，一口叨住飞走了。

查看老令的伤口，4个小洞两两相对，却没有血流出。不知是谁说了句：“那蛇飞在空中时我看见一节黄一节白的，怕是银环蛇。”然后又有个存心添乱的家伙说：“咬了不见血，肯定是毒蛇。”

老令听了，脸皮发白，忽地往后便到，众人赶快扶住，把他抬到地头睡下，由当赤脚医生的女生们采取急救措施。一个女生很是慷概，用自己的手帕扎住他的腿弯，然后动员男生赶快吸汲出老令伤口的血。众人听后，仍犹豫不前。到不是怕死，都知道只要嘴里没伤，吸汲蛇毒就没事，大家顾忌的是老令平时脚丫子的那股豆豉味儿。

不就是要吸他的血吗？老地灵机一动，一声口哨招来一群鹿旺仔，叫他们抓蚂蟥。鹿旺仔们跑到沟边，垂一只脚到水里钓蚂蟥，不一会儿就弄来了10多只。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蚂蟥往老令脚上伤口处放，弄得他跟穿了只黑袜子似的。那些蚂蟥也怪，人拿它们时，手慢点就会被叮住，可一放到老令脚上，却一个个卷起身，一轱辘滚了下来，放了几次它们都执意不叮他，可见这老兄的脚之臭。不过要是真让这么多蚂蟥给叮上，老令说不定会被吸成个干木乃伊，也活不成。

后来大家决定把他抬到公社卫生所去，一厢情愿地设想那个大队来的赤脚医生不了解老令的脚情，可能愿意发扬光大白求恩精神，为老令吸汲伤口。没曾想抬到半路，老令嫌知青们抬得东倒西歪的，反而弄的他跟晕车似的难受，就跳下竹担架，骂骂咧咧地回家了。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肯定没中毒。

边疆的确有很多毒蛇。有一次老帕在菜地旁拉提琴，忽然听得草响，只见一条眼镜蛇半个身子挺起，正对着他摇晃。好在老帕比较镇静，他保持站姿，悄悄将右手的弓交到左手，然后猛然拨起根竹篱柱子，横着打了过去，正中七寸将蛇打死。还有一次老豆在宿舍走来走去的吹口琴，凭直觉感觉到脚下不对劲，停住脚往下一看，一条银环蛇正蜿蜒在他两脚之间。如果他没停住，一脚踩下去的话，就真得要大家给他的脚汲血了。

知青们也不一定是见蛇就打，在他们宿舍的梁上一直有条两米多长的蟒蛇，最馋的时候他们也没打它，因为有它在，老鼠就少多了。它没来守护时，晚上老鼠敢从知青们脸上跑过，那名不符实的老猫的耳朵就曾经被老鼠咬过一口。知青们的谷仓曾经饱受鼠患，自从抓了条小蟒蛇放进去后，老鼠就基本上绝迹了。

知青最恨蚂蟥。抓到了就用一根小篾片栏腰拴在草枝上，处以曝晒的极刑。蚂蟥命极大，晒它三天，沾水又活过来。知青们也用过乱刀分尸、盐渍等酷刑，虽然解恨但太麻烦。后来总算找到一个更简单易行却更残酷的办法：折根草棍，往蚂蟥屁股后朝前一捅，把它整个内外翻个个儿，再血淋淋地插在田头示众。这种办法对水蚂蟥、旱蚂蟥均有效，但也只有老二这样的无神论者才下得了手，有仇必报，杀！杀！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傣族发现被蚂蟥叮上后，只是将它拍掉，放生。



《榕树魂》——

泼水节

一年一度的泼水节要到了，傣族习俗把泼水节看得比傣历年还要重要。

知青们刚下来不久，便过了一次泼水节。

那次过节，对知青们来说，即新鲜又好奇。社里杀猪宰牛，七天时间全寨子聚在一起吃饭，看着那些傣族老乡们敲锣打鼓，围成一个大圈跳舞，互相泼水。老人们用菩提树的叶子蘸点小金碗里的水撒在知青们头上、身上，以表祝福。知青们则双手合十，鞠躬答谢。傣族老乡们也邀请知青们参加跳舞，手把着手教，女生们很快就会了，男生就笨些，看着动作是对了，但总感到不太协调。男生学敲锣、打钹到是一学就会，老地打的钹还满有些气氛，傣族老乡们直朝他翘大姆指。象脚鼓就不容易学了，看傣族汉子们打得气势滂薄、威风凛凛的，时而用拳、时而变掌，鼓声的轻重缓急时常变化，似乎没有什么规律性，全凭打鼓之人随心所欲，再说那一人高的大鼓横背着也挺沉的，知青们就没人愿下功夫去学。

那时大家还没过语言关，跟傣族老乡也还不太熟，所以头两天一直袖手旁观，不参加泼水。那些浑身湿透的毕少们跑到井边打水回来，路过知青们身边时，每次都作势要泼知青们，大家便瞪眼摇手，她们也就笑着跑开。知青们到街子上和别的寨子去玩，沿路碰到毕少们要来泼知青们，都被他们凶神恶煞似的瞪着眼给吓退了，两天下来知青们身上连一滴水都没有沾。到了第三天中午，刚吃完饭，老地端着碗汤坐在厨房门前喝，忽然觉得后背一凉，回头一看，几个毕少正迅速逃离犯罪现场，才知道自己被水枪暗算了。老地立即跳起，一个箭步追过去，将一碗菜汤全数浇到跑在最后的那个毕少的背上，随着她的惊叫声起，无数只水枪射出的水柱劈头盖脸地朝老地扑来，转眼之间，他全身上下，便没一处干的了。老地逃入厨房，那些水枪从篱笆缝里射了进来，殃及其他知青，不到片刻，人人湿透，厨房也成一片汪洋。大家舀缸里的水反击，老地则用瓢舀锅里的热水朝外面泼，所泼到之处，一片惊叫。

僵局从此打破，男知青们投入毕冒们的阵营，与毕少们大战了几天，每天泼得似落汤鸡般。女知青们也时常受到毕冒们和鹿旺仔们的袭击，但她们只是躲到楼上，没敢应战。

那次虽然也很好玩，但苦于语言不通，只是乱泼一气而已。

今年就不同了，知青们已经过了语言关，倘若穿上傣族服装，到外国赶街，那些守卡的士兵根本分辨不出来。有个别傣语说的特别好的知青去“聂少”，被“聂”的毕少往往信以为真，误以为碰上了个极聪明的傣族毕冒呢。

“聂少”是毕冒们晚上到想约会的毕少家厨房门外，双手背在背后，弹奏一把两根弦的小木琴，在那声如蚊鸣的微弱琴声中轻声唱古老的情歌。那毕少则独自在厨房里做些拣豆、织布之类的活，静静地听着。如果唱完一曲，毕少不吭声，就表明她无意与门外之人交往。那毕冒就很识趣的再见，让位给等在场院门口的其他人。如果那毕少长相人品都比较出众，等在场院门口的毕冒会很多，每人都有机会，挨个到厨房门前去唱。若那毕少对某人有意，与他对唱起来，其他人就自觉地转移阵地，去“聂”别的毕少。有不死心的，也可以等着，等到那幸运儿唱不过毕少了，或是毕少通过对唱认为不合适，就能接着往下轮。

那种琴老地也会弹，只是记不住那些有如长篇叙事诗似的情歌，唱上一两句还可以。有些记性好的知青唱得出10多支，很受毕少欢迎。

“聂”了一段时间后，倘若两人情投意合，就将进入“私奔”这个约定俗成的程序。

所谓“私奔”，是指毕冒得到父母同意后，悄悄地于某个晚上将毕少接过家里，藏在父母屋里。这么做，当然必须得到毕少的积极配合才行。那毕少家中丢了人也不着急，心中已经有谱了。到次日，便会见到男方派来的数名媒婆，前来谈判诸如聘礼、嫁妆、婚礼举办时间等细节。至于两人是否班配，却不容双方家长有什么商量余地，似乎也没有门当户对这类约束，全都由这对小情人以“私奔”这种传统的订婚方式决定了。至此，“聂少”的全过程也就结束了。显然，傣族的青年男女们享有较大的婚姻自由。

泼水节也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好机会，每天晚上有毕少的人家院门前都有不少毕冒聚着，挨个去碰运气。

泼水节原定过七天，上面规定只过三天，理由是要抓紧时间搞春耕。但多数寨子不管这一套，照样放七天假。

泼水节对老地另有一层意义，他的生日正好在傣历泼水节的这几天之中。

老地原打算利用七天假期到处串串，找点书看。等到老八带话来说，好几个寨子的男知青约着要来弄迈过泼水节，老地就决定不出去了。留在寨子里好好地过一次泼水节，也算庆贺一下19岁的生日吧。

这天一大早，远处传来欢腾的象脚鼓声，不一会，寨子里的锣鼓也响了起来，高音喇叭里传出高吭的傣歌，一

切都预示着，泼水节开始了，人们已经开始跳舞了。按惯例，泼水要到10点才开始，下午5点结束，早上、晚上是不许泼的。

睡不了懒觉了，知青们纷纷起床。

老地起床后就直奔老社家，爬上楼去一看，里外屋一个人都不见，估计都到对面社管会去了。他进到里屋，抱了床被褥出来在前厅右边墙角铺好，准备中午饭过后，躲到这儿来好好地睡个午觉。按傣族习惯，男孩睡在前厅右边，女孩则跟父母住里屋。以前如果来玩的外寨知青多到两人挤一张床都挤不下时，老地就要来老社家住上一夜，所以他们家被褥放那里老地都知道。安置停当后，老地又从后楼梯下到厨房。

傣家的里屋和后楼梯只能是自己家里的人才能进出，老社夫人开玩笑说老地走过就算她家的人，不许回昆明了。

到厨房来的动机很明确，老地还没吃早点。这几天来，老猫已经停止做饭了，早饭都吃傣族老乡送的泼水粑粑之类的食物。连吃几天糯食，腻了。老地就想吃碗烫烫的牛肉汤饵丝，这是昨晚就跟老社夫人说好了的。

揭开锅盖一看，锅里放了一点水，蒸着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饵丝，显然是留给他的。又见灶前地上用竹炭画着一个大箭头，指向灶膛，表示灶灰中焐着好吃的东西，老地立即用灰扒刨开热灰，两大条他最喜欢吃的烤牛肉干滚了出来。这种牛肉干是把牛肉切成两指宽、半尺长的肉条，吊在灶头上方让烟熏，熏得像铁棍般硬，要吃的时候就摘下一根，埋在灶灰中焐上一夜，就会变得非常蓬松，用手一点点撕着吃，香脆可口。

狼吞虎咽吃完饵丝后，老地带上牛肉干，一溜烟穿过屋后竹林跑到大榕树下，轻车熟路地爬上树，却发现老龙早已坐在树上，于是两人边吃牛肉干，一边向四面了望。

因为爱睡懒觉，他们还从未在早上爬上大榕树看过风景，现在看来，比之中午和傍晚时，早上的风光更好看些。

朝阳下，一道白云像围巾般绕在对面山腰上，坝子里每一座竹林都有一层薄雾笼罩着，一群群白鹭贴着荷塘水面低飞觅食，荷塘边几只水牛在吃草。面对如此美景，两人议论道，所谓田园风光可能就是这般景象吧。老地虽然能画上两笔，但是绝对画不出一幅正儿八经的东西来。他爹年青时是学艺术的，所画国画、油画作品都曾经展出过，还得过奖。老头子很想教老地，但这小子过于好动，不愿意呆坐着学画，不可教也。老龙说，既然画不出来，用照相机照下来肯定也挺不错。前不久广沙的几个知青带了架相机来，给知青们照了些相。还分别给寨子里每一家人照了一张，相片洗回来后，傣族乡亲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当时因为吝惜胶卷，没舍得照一张风景。

正在闲聊之际，忽然听到从荷塘中响起一阵“噗啦啦”的响声，定睛一看，两人顿时惊呆了。从离大榕树几十步远的荷塘中，飞起6只雪白的大鸟，它们两只一队，不紧不慢的扇动着巨大的翅膀，以极其优雅的恣态，掠过他

们的头顶，顺山边迎着太阳飞去。在它们身后，成百的白鹭、灰鹤沿着地平线飞着，像是谦卑的在给它们送行。

天鹅！是传说中每年春天都要路过此地的白天鹅。

老地如痴如呆地目送着它们渐渐变小的身影，一时忘记了世间的一切，心中有种酸甜的悸动，耳边鸣响着不知名的美妙的音乐。

想放声高歌，却不知道该唱什么，也怕破嗓音玷污了这美好的大自然。

“哦……嗬……嗬……”，耳边传来了悠扬、高吭的叫声，是远方的毕少们在向白天鹅呼唤。是的，就是这么叫，唱什么歌也比不上这发自内心深处的，最原始、但又最能表达人类此时情感的声音。老地、老龙也学着她们的样儿，仰着头，两手拢在嘴边，“哦……嗬……嗬……”，尽力地叫呀、叫呀，直到再也看不到白天鹅的身影了才停下来。

远远地，走过来一群人，是邻寨的傣族毕少和几个男知青，到弄迈来过泼水节。他们吵吵闹闹地走近了，老地他们在树上听到，那些毕少正在“依拉挡”（乱说乱讲），令那几个男知青难以抵挡。

这些话如果是个汉族姑娘用汉话说出来，肯定要被认为太不正经了，甚至可视为耍流氓。傣族却视男女青年之间调情为人之常情，毕少们生性快乐，能说会道，语言诙谐幽默，用词极为大胆，表达能力特强。她们认定，爱情就是要大胆追求，不应当遮遮掩掩，畏首畏尾的。

老超也在队伍当中，被知青们称为“柚子西施”的那个卖柚子的毕少尾随其后。

大多数知青去“聂少”只是为了好玩，却也有弄假成真的。老超就是一个，跟着几个毕冒去“聂”着玩，却不料反被“柚子西施”给“聂”了，与“柚子西施”双双坠入情网。据说，两人已经海誓山盟，订了婚。

弄迈的男知青胆子相对要小，“聂少”这种事顶多去旁听，无人敢亲自上阵实践。

老地、老龙与老超等人会合后，带他们来到场院。全寨子的人都在这儿了，大家一起随着象脚鼓嘎光（跳舞）。跳累了，就到社管会的楼上，与坐在里面的老人们一起抽烟、喝茶、吃瓜籽。

刚坐下不久，忽听到有几个鹿旺仔在楼下呼叫老地、老龙，于是男知青们起身告辞老人们下楼，走到楼梯口，抬头一看，那柚子西施和相帅两手背在后面，笑吟吟地站在院墙篱笆边。

知青们刚意识到要出事，只见俩人柳腰一闪，叫声：“下雨啦！”两桶水便朝他们迎面而来。她们的动作太快，知青们根本来不及作出反应，眼睁睁地看着那一股股在阳光下晶莹透亮的水柱飞至头顶。所做的条件反射动作只能是抱头闭眼，但觉全身一凉之后，紧接着感觉到全身各处都受到了水柱的冲击，有如身处瓢泼大雨之中，口鼻

之中到处是水，连气都喘不出来，耳中直嗡嗡作响。从如此声势来判断，很显然，袭击知青们的不止她们俩人。

这种情形，跟夏季时常碰到的过路雨极为相似。那雨来得极快，没有一点预先的征兆，骤然而至，铜钱大的雨点密集而急速地落下，打得身上生疼。在场上打豆子的时候，碰上这种雨，往往连跑两、三步跳进场边棚子都来不及，全身就湿透了。有时走在路上，眼看着前方大雨席地而来，最聪明的做法是立即脱掉全身衣服，抱在怀中，赤条条地蹲在路边竹丛或芭蕉树下，等到雨过后再穿上衣服赶路。否则，任何雨具都抵挡不住，衣服肯定会被淋湿。刚下乡时，知青们不知道利害，见走在前面的傣族跑到路边脱衣，还笑他们，被淋过后才知道他们的办法是最佳的。好在这种雨来得快去得也快，躲上几分钟就完事了。

单独一人在路上走时碰到过路雨，孤零零地蜷缩着身子，蹲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中，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渺小，在大自然的淫威面前孤立无援。有一次，暴雨持续的时间太长了，老地实在憋得难受，一怒之下，跳起身来，赤条条地站在大路上，双手张开，仰面朝天大喊亵渎神灵诅咒天地的丑话，结果衣服全部湿透，回家后得了场重伤风。

受到袭击只那么10多秒钟的时间，泼水骤然停止，一切归于平静，只听到酋长等人的哀叹声。老地睁开眼睛，只见众人浑身淌水，脚下一片泥泞，个个狼狈不堪。那帮偷袭得手的毕少们，只留下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早已朝屋后逃的无影无踪。

知青们自不甘心失败，拿上水枪、脸盆满寨子追着毕少们报仇。

战斗正酣之时，老社通过高音喇叭宣布泼水暂停，叫大家去吃饭。

战争推迟到下午，先解决肚子问题。

由于今天来客较多，全寨子的人和来客就都在场院上聚餐，人少时则是在社管会楼上举行。

每逢节日或是贵客来访，傣族经常举行这类全体会餐，共同庆贺。队里举办这些活动几乎不用花什么钱，一切东西都是自产的。一般视聚餐几天、来客多少而决定杀几头牛或猪，蔬菜则从生产队地里摘来，粮食从队里谷仓中拿出，酒也是由会蒸酒的人取了队里的粮食去蒸好拿来，炊事用具则是从各家拿来的。干活的人全都是尽义务的，男人负责杀猪宰牛砍柴禾，女人煮饭炒菜收拾碗筷。

如果是结婚、办丧事，一般是在自己家里请全寨子的人和外寨亲友聚餐。竹楼稍小的坐不下那么多人，就得征用左右邻居的家。此时吃的东西得由自己拿出来，不过做客的人也都会带些礼物来。寨子里的老人或来的贵宾坐在楼厅火塘边的首席，其余的男人们坐在楼上，女人们则坐楼下。男知青们比较随便，喝酒时跑去楼上跟男人们坐着，吃饭时又跑到楼下去跟毕少们坐。所有这类聚餐，知青们必定会被邀请，有时连邻寨的也会来请。知青们也必到无疑，连吃几天大锅饭，自己家里就不用生火了。知青们送不起什么礼物，多半是买些香皂、毛巾、暖水壶、脸

盆之类的日用品，甚至有一次实在没东西送了就拿了一套领袖著作送给新人，好在傣族老乡也不计较。

吃饭时，众人都坐在小竹凳上，四、五个人围着一张竹编的小圆桌子吃。菜的品种并不很多，但数量却一定要保证，不能让菜碗空了。傣族毕少们来回巡视，负责端着菜盆给各张桌子添菜，还要提着大酒壶，像茶馆的茶倌那样给喝酒的男人们及时倒满酒。

当知青们到达场院时，数十张小圆桌已经摆满酒菜，那些毕少们已经在那儿张罗着众人入席。知青们湿淋淋的狼狈样，立即成为众人取笑的对象，毕少们更是得意洋洋地不住奚落。当着众人的面，要与她们斗嘴，只能是自取其辱。知青们只得忍气吞声的坐着，大碗喝酒，以期用酒晕压下一脸羞色。

这种聚餐，往往要吃上两三个钟头，晚餐则时间更长。

饭饱神虚，酒也喝多了些，老地开始犯困了。他打着哈欠走到老社家，脱下身上还有点湿的衬衣，随即一头就栽倒在铺上，立即沉入梦乡。刚睡着不久，朦胧中感到，似乎有人轻轻地为他盖了条棉毯。



《榕树魂》——

串门

晚饭后，小印度早早就来到男生宿舍，催着大家跟他走。路过女生宿舍（社管会）时，老蒜、老沙、老平正坐在凉台上聊天，小印度一招手，她们也就应邀参加了这次外事访问。

小印度家离寨子口不远，竹楼不算很大，院子却很宽。到了那儿，鳗鱼已经等候在院子门口，引领着知青们上楼。

傣家的竹楼很实用。楼上住人，楼下半边是牛栏，半边是厨房。宽大的木楼梯通到楼前的凉台，从凉台进入楼上厅房正门。

上楼后，小印度示意知青们脱鞋进屋。进门之后，一位大叔面对大门站在火塘旁，对着知青们不断辑手，口中喃喃有词。另有一位大妈躬着腰站在门边，双手垂膝，不住点头，姿势与日本妇女迎宾一模一样。知青们也急忙合手点头，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客厅很宽大，至少有30多平方米。除正中距墙1米的地上嵌有个方桌大小的火塘之外，屋里没有任何家具。地上铺着竹皮编成的凉席，光滑洁净。

整间屋除了朝南的正门外，另外还有3道门，北边的两道门一道通向里屋，另一道是后楼梯，通向楼下厨房，西面一道通往一个小阳台。所有的门，包括正厅门，除里屋门挂了块布帘子外，都只有门框没有门板。

小印度让男生靠右、女生靠左坐到火塘边，他和鳗鱼也坐到右边。

大妈走到火塘边时的姿态很奇怪，她一直弯着腰，双手按着统裙下摆，碎步顺着墙边绕个圈，走到火塘左边，双脚放在身后，扭着身子坐下。她要女生们也学她的坐姿，女生们坐不了片刻便撑不住了，仍换为正面打坐式，她

也没再管。

主宾全都坐下后，靠手势和推测进行困难的交流。

大叔、大妈显然是小印度的父母，鳗鱼是他的哥哥，可两人却长得不大像，相似的地方是眼睛都很大，后来才知道俩人是同父异母兄弟。

小印度把知青们的绰号介绍给家人，他们也就这样称呼知青们，知青们则按他们所教发音，称呼大叔为“屋弄”，大妈则称“篾巴”。

火塘正中放着一个大铁三角架，上面架着一把铜壶。壶里的水已经开了，冒着热气。大妈将铜壶提下放在火塘边，又将一个铜盘子放到铁三角架子上，随即从墙边一个竹筒里倒出一大把茶叶，放在盘子上，用一根木夹翻动着炒，一会儿满屋都弥漫着茶叶的香气，然后她将炒热的茶叶倒入一个放在三角架旁的小陶罐内，提起铜壶，将沸水倒进陶罐，听到“噗”的一声爆响后，她便迅速地用一个竹刷似的盖子塞住罐口。完成了这一系列复杂动作之后，她从那带嘴的小罐中，将浓绿的茶汁倒入几个核桃大的小茶盅里，然后将小茶盅一个个递给她丈夫，大叔用双手端着递给男生们，大妈也递给3个女生每人一杯。

知青们急忙双手接过杯子，端着，但没敢马上就喝。心想，这么喝茶也太小气了，但没敢表示出来，可能这就是所谓民族风俗吧。

主人们也各斟一杯，也端着，不住示意让知青们先喝。

老豆忍不住了，端起小杯，一口饮尽。知青们正想效仿，却听见老豆呼呼直喘粗气，看看他，嘴张得大大的，就像刚吞下一整个最辣的“涮涮辣”（一种当地特有的极辣的辣椒）。大妈咯咯地笑了起来，小印度他们也笑了。

大叔示意知青们看他，然后将小杯端到嘴边，轻轻地啜了一小口，跟饮酒似的。

老地也照样喝了一小口，香气很浓，但茶水极烫，味道又苦又涩，怪不得老豆会那样。刚想皱眉头，忽然觉得口中生出一股清凉、甘甜的津液，一直顺喉咙往下流淌，一丝丝沁入心肺之中，舒服极了。

其他人的感受可能与老地相同，大家开始议论起来，赞不绝口。

后来知道了日本的茶道、大理的三道茶、福建的功夫茶后，老地想过，如果哪天有了钱，就搞个傣家的茶室，起名为“傣家烤茶”，给真正会品茶的人喝。

大叔让知青们卷毛烟抽，知青们摇手示意不会。他以为知青们是不会卷，就慢慢地卷，示范给知青们看。卷烟的纸可能是特制的，很薄，三指宽、比一支香烟稍长。那细细的烟丝颜色金黄，闻起来很香。于是，男生们不顾女

生们的谴责，每人学着卷了一支。才抽第一口，自称刚上中学就会抽烟的老猫便不由得呛咳起来，其他人更是呛得不得了。这烟闻着香，抽起来却辣得要命。

以后很长时间，男生没敢再学抽毛烟，后来是先学会抽香烟了，才敢再尝试抽毛烟。

喝第二杯茶时，后面楼梯吱吱响了起来，一个毕少抬着张簸箕似的小竹桌子走上来。男知青们认出她是昨晚担水的3个姑娘中的一个。

这个毕少是小印度的姐姐，叫罕俊，个子很高，肤色只略微有点黑，长相有点像鳗鱼，说不上漂亮，但那双大眼睛和两只酒窝很有特色，笑起来样子很可爱。她一点不拘束，放下桌子就跟女生们挤在一起，两手灵活地比划着跟知青们沟通。傣族姑娘似乎对手势语言的理解力特别强，自她来后，两个民族的交流变得容易多了。在她的教导下，知青们学到了好多傣语。

小桌上放满小吃，有花生、牛肉干、木瓜丝、一些不知名的酸果子和用芭蕉叶包成小包的糯米糕。知青们逐样尝试，好吃的就一扫而光。

知青们注意到，火塘里烧的全是干牛粪饼，烧时几乎不冒烟子，用吹火筒一吹，浅兰色的火苗就冒出来，比木炭还好烧。傣族家里不用蚊帐，就因为牛粪烧的轻烟中有驱蚊虫的气味，估计是牛吃的哪种草在起作用。这牛粪是傣家的高级燃料，怪不得大草坪上的牛粪都给做上了标记。

玩到夜深了，知青们才告辞回宿舍。

以后，知青们晚上常到傣族家串门。只是大家逐渐分为2、3个一伙，各去一家。男生们自然喜欢到有毕少的人家去，到不是有所企图，而是跟毕少们交流既容易，又很有趣。

老地经常去的是老社家，到不是因为老社家有个漂亮女儿相帅，而是老社夫人对老地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来叫他。酋长则去小印度家最勤，知青们瞎起哄说他对罕俊有点那个，他也不恼。

知青们刚来时，傣族老乡们传说知青是武斗造成的孤儿。怪不得来的那天，傣族大妈们对知青们说话时都带着极其怜悯的神情。据说这些大妈们在两天之内，就将全体男知青分人到户，私下许配给有毕少的各家了，还为谁家分哪个争了起来。本来老社夫人是抢着认领酋长的，说他是知青的头，正好她丈夫也是头。后来她却改变主意，非要认老地，也不说为什么。有好几家争着认领酋长不奇怪，也许是他长的高大而且英俊吧。而争着认领老令的也有好几家，这难免让人有点妒忌，这个说句话都会激动得手抖的书呆子，凭什么受到众多毕少的垂青？

后来知青们傣语很熟练之后，才从她们口中知道，她们喜欢老令捂着嘴轻轻地笑的斯文模样。

讲故事

没有电的农村夜间相当无聊，到傣族家闲聊天不能太晚，那样会影响人家休息。天气热，夜里为了躲避蚊虫叮咬，大家早早地钻进蚊帐，躺在床上搧扇子侃大山。讲串连时、武斗时的见闻，讲小时听来的鬼故事，讲以前看过的某本好看的书、精彩的电影、或者听过的某个有趣的故事、以及各种奇闻异事。

知青们刚搬入新宿舍的头一个晚上，熄了灯之后，大家躺在床上听老猫讲一个很惊险的反间谍的故事，名字大概是叫《一双绣花鞋》。正当他绘声绘色讲到最紧张的关头，忽听一声女高音尖叫起来，把众人惊出一身冷汗。再听时，却是隔壁的女生在叫。男生和女生住处虽有墙壁隔着的，但横梁之上却是相通的，大声说话相互都能听见。因为老猫的故事讲的精彩，引得隔壁女生也竖起耳朵偷听，听到紧张处，他老兄声音一放低，隔壁就听不清了，一着急，便顾不上淑女的矜持了，大叫：“老猫，讲大声点”。

以后这项活动女生们也参加了进来，她们也讲过些好听的故事。

在那些蚊虫叮扰、又闷又热的难眠之夜，人人搜尽肚肠，把所记得的一切掌故都抖得一干二净。

当然不是人人都能讲故事，老地虽然看过的书和电影不少，但记性极差，表达能力又不行，总是“后来、后来”的，把一个本来极精彩的故事讲的干巴巴极为单调乏味。非得要其他人没什么可讲的，又实在无聊或集体失眠之时，大家才会想起他来。

每次请他讲故事比请老猫讲还难，要经过一再乞谅上次集体睡着了的不是，并一再担保决不敢再睡着，他才屈尊开讲。但每次，都被“老子再也不讲了”的一声怒吼打断众人的鼾声而结束。

有些好书一时找不着，又没人看过，就专门去请会说书的知青来讲。

下乡知青中出过不少有名气的说书人，都是些记忆力超强、口才出众的人物。他们大多是高中生，看过的书自然比弄迈的这些初中生要多。

弄迈的知青们毕恭毕敬地上门去将各个说书人逐一请来，该请谁他们心中自然有数，何人讲哪本书讲得好是有公论的。请来之后并无什么出场费、课时费之类，不过是发烟沏茶勤点，吃饭则是有什么就吃什么，睡觉就在老地的大床上挤一挤。说书人开讲要等众人全都进了被窝，熄掉所有的油灯，都安静下来之后。女生睡前罗索事多点，老被男生催促。此外凡是讲悲剧必会听到她们的抽泣声，若是那种大悲大惨的情节，或是恐惧之中发生的“突

然”，她们的痛哭之声或惊叫，曾惊动过百米之外的老乡。而男生则会在碰到令人切齿时高叫该杀，复仇之际大叫痛快。时常于夜半时分，万籁寂静之中，突然爆出一声吼，有时声音之大，把大榕树上的鸟群都惊的直叫，老乡们更是纷纷点起灯火，前来查看出了什么事。

说书人讲本长篇能讲一个街天（5天），讲《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隋唐演义》或是《小五义》之类的则耗时更长。



《榕树魂》——

棋牌

栽完秧后，进入农闲时节，知青们体会了当农民的农忙、农闲的区别。那时，农闲就拉撑了的闲。而知青们却不愿意闲着，因为闲下来就会想家。

知青们既然不愿闲着，就开始走村串寨找朋友玩，附近都玩过了，就开始走出县境到外县去玩。走在路上，饿了困了，见到村落就进去找知青，不管认不认识，那儿的知青就得免费接待。来访者吃上一顿饭，住上一夜，第二天再赶路。这玩法一下子就成了风，知青们称之为小串连。

老地是个懒鬼，最怕爬山，就没到外县去。酋长等人都去了，只有老地一人留守。弄迈因为不在路边，所以接待外地来的知青不很多。但也时常有来投宿的，来的人中多半是来找认识的本寨知青的，老地就告诉他们米在哪儿、菜在哪儿，让他们自己动手做饭吃，他则跑到傣族家去吃，晚上回来陪他们聊天，听他们吹外县的情况，留下通讯地址，以后互相通信。

这种用脚底板来进行的小串连很快就结束了，它毕竟不比大串连，有火车、汽车可坐。再说只能在外五县范围内，出不了关卡，玩不了几天就玩遍了。于是众知青又纷纷回到了各自拿工分的地方，等着秋收时节来临。

为了消磨农闲时间，知青们玩烂了不知多少副扑克牌。个别聪明的鹿旺仔也学会了争上游、甩小二等简单的扑克玩法，知青们打牌三缺一时就从他们当中选一个来参加玩。有一天，刚玩上瘾的替补队员小印度被赶下场后，忽然宣称他可以用鼻子闻出牌点来。大家当然不信，让他试之，果然一猜就中，令众知青既佩服又疑惑，待到被老八发现他是将一小块镜子放在盘起的双腿之间偷看牌时，气得大家差点把他的小鸡给揪下来。

象棋、军棋、围棋大多数知青都会下，农闲时干脆带到地里去，休息时在地头摆起来，杀得性起干脆不干活了，常常是几盘棋杀完，也该收工了。

知青当中，下棋高手极多。老地偏好围棋，虽说棋艺棋品都不怎么样，但在知青们寨子里却算超一流的。为此老地极得意，经常背着手在棋盘前扼腕叹息："超一流高手的寂寞和悲哀，就在于敌手难寻，吾何时方能求败？"气得大家谁也不愿跟老地下棋。但是碰上哈约寨的老水瓢等人，老地就蔫了。老水瓢他们寨子专出棋手，象棋、围棋都有高手。老水瓢在小学时就达到了围棋业余三段的水平，在整个外五县无人能敌。

哈约的糠麸是个象棋天才，据说文革时碰上一次异遇，得到了几本古谱，精心习研而棋艺超凡。他下乡不久，即背上棋和那几本棋谱，出去串连，以棋会友。所到之处，必然要引起轰动，远近数十里内会两下子的知青都闻风而来。他向来是支起一盘残局，也不下，光问来人如何走下一步，视来人如何回答，将他们分到集体组或单人赛场。集体组由他以盲棋对战，多的时候要支起30多盘来。有幸被选中能跟他单人对战的，虽说从无人赢过，却也一战在当地棋界成名。内五县、外五县，他从未遇到过敌手。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来的农场知青当中那些曾经得过什么少年赛冠军的，碰上他，都只得俯首称臣。走遍边疆找不到对手后，糠麸决定北上寻求，于是便装病办了病退回昆明。回昆时途经楚雄住宿，这棋痴在街上见到一个小老头摆了副残局地摊，那残局看着简单，再看却内藏玄机，他看了半天，居然无从下手。于是他将车票作废不走了，躺在旅馆里不吃不喝想了三天三夜，到第三天半夜想出来了，当即爬起来，出去四处打听，花了不少时间找到了那个摆残局地摊的老头，下赢了。随后两人结伴而行，往昆明去了。再后来听说两人到过思茅、版纳，以后又有人说去了四川，最后不知踪迹。

心灵手巧的老豆以实心竹为材料，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刻制了一副麻将牌。老猫有了赌具后，立即将他不知何时学得的一套麻经传授给众人。此后，男知青们每日挑灯夜战，以香烟作为赌注，要一直赌到所有的"赌注"都被赌鬼们吸到肺里去了，才熄灯睡觉。

老地参加这种赌局没多久，烟瘾就培养出来了。后来不玩麻将了，烟却戒不掉了。

可恶的是，玩麻将玩到凌晨4点，老地就学鸡叫。老地学鸡叫特别逼真，叫过之后，全寨子的公鸡必然跟着叫，把全寨子的毕少、大嫂们都给骗起来舂米。这种恶作剧老地干过好多次，妇女们不知就里，迁怒在那些不按自己的生物钟行事、盲目跟风的公鸡身上，造成不少的冤案。

美术

老地下乡时，从家里带来了厚厚的一大沓画报剪贴，都是他长期收集的世界名画照片，大约有二百多幅，还有几本从他父亲的书架上偷偷拿来的《艺术哲学》之类带插图的绘画方面的书。他的这些收藏，致使弄迈知青大都具备了一点绘画方面的鉴赏知识。就连画个太阳都画不圆的老猫，侃起什么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焚高来，也头头是道的，把那些千里迢迢慕名而来看画、上过艺校的知青都唬住了。

贺沙知青老勋画画极有天分，每个街天必来看画，走时还要借两张去临摹。凡去看过他的画的人，无不惊叹他用水彩将那些油画临摹得几可乱真。老地自知在绘画上没有天分，毫不吝惜地将父亲寄来的一大盒水彩颜料，以及一大把水彩笔送给了老勋。这老勋后来被招去当文艺兵，画的第一幅油画，便获得了全军美术作品一等奖。他把印有那幅作品的解放军画报寄给老地一本，知青们看后却不以为然，认为这种突出政治的应时之作，没有他在这儿画的那些水彩画好。收到老地的回信后，老勋再也没写信来。

一次，老地和老龙、老帕正边听外国电台音乐，边看画时，一个别小枪的军人突然走进门来，看看他身后，还站着几个背冲锋枪的士兵。知青们着实吓了一大跳，心想这可算是被抓了个实实在在的“现行”（即现行反革命），收听“敌台”、收藏“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画，在当时这种罪名可是极容易定性的。知青们暗忖，今天这关怕不容易过。

知青们正惶恐不安不知如何应对之时，那军人璨然一笑，以很纯正的京腔说：“嘿，你们这儿真不错嘛。”说完，过来坐下，跟知青们聊了起来，那些兵则在房檐下各自找竹凳坐下。

这军人来头极大，是昆明军区派来调查前几天邻国政府军的炮弹打过境来的事件，路过时听到熟悉的音乐声后，循声而来，那些兵是保护他的卫队。

这个北京军官也是个音乐迷，按现在的话应叫发烧友，老帕与他一见如故，俩人谈得极为投机。他对绘画也颇有修养，一番评论很有见地。他走时留给老帕通讯地址，俩人后来一直有交往。后来老帕去当文艺兵，估计与他大有关系。

老帕有个青梅竹马的对象，是学弹钢琴的，下来没多久就被州文工团给调去了。后来老帕入伍不久，把他的对象也弄去当兵了。两人结婚时，老地正好回昆明探亲，参加他们的婚礼时也见到了那北京人，那小子官运亨通，已经当上副司令了。

体育

知青们的宿舍刚盖好没多久，队里便专门为知青们在门前的空场上搭了两个篮球架。篮架、篮板全是木的，篮框则是用铁条弯的。还把碾场的大石碌子拉来，把土场压得平平的。知青们到县城买了个篮球，花掉了一个月的伙食费。

球场建好的当天，男知青与傣家男子们各组成一队，举行了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场汉、傣两民族篮球友谊赛。

比赛结果当然是……

先别忙着武断地下结论，事实上是知青们输了！

那些傣族汉子可能天生就是打篮球的天才。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很少有机会打篮球，只是在公社和部队驻地玩过几次，连基本规则都还不大清楚，却将那些少说也打了四、五年篮球的知青球花子打败了。

他们的打法极为简单，4个人在全场抢断球，1人在对方篮架下死等着。这些傣族青壮年身手极敏捷，弹跳力过人，任知青们动作再花哨，他们往往能准确地将球打掉。抢到球后从不运球，反正他们也不会运球，而是直接扔给留守对方篮架下的人。守在篮架下的那个汉子身高至少有一米八五，可能是方圆几十里内个儿最高的傣族男子。气人的是，他们扔球、接球特准，那大个3米之内双手投篮的命中率几乎可达百分之百。

球赛仅此一场，知青惨败。以后任知青们怎么邀约，傣族汉子们都笑笑拒绝再战，可能是认为不好玩吧。

知青们还买了一对羽毛球拍，在地上画了正规的场地，架根竹竿当网，每天清早风小时打。老龙小时练过羽毛球，还差点因此一技之长被选进少体校，有他当教练，弄洪知青们的羽毛球技术一招一式显得很规范。

傣族老乡们对知青们吃饱了撑的那些体育活动兴趣不大，也无意跟他们争强好胜，这可能与这个民族向来性情谦和有关系。但傣族的男子对武术很感兴趣，经常耍刀弄棍练拳，知青中有会两下拳脚者，就很受他们的尊崇。

老地感到纳闷，他们学武术有何用？自下乡以来，从未见过傣族互相之间争吵，更没见过互相动武的，就连大人打小孩也只是轻轻地点到为止。

傣族男子爱刀如命。他们时时刻刻随身都带着两把刀，一把是匕首式的小刀、一把是带鞘的长刀。小刀是削水果用的，长刀既可当作砍竹子、砍草的劳动工具，又是防身武器。

老地有一把傣族男人都想得到的好刀。这是把户撒长刀，是邻县一个知青小串连时带来给老地的。刚带来时，远近几里内的傣族男子都带着他们的刀来比试过。别误会，比刀并非比武功。比刀是由两把刀的主人各自握着自己的刀，架成十字，然后猛地一劈，让两刀来个硬碰硬之后，哪把刀的刀刃被砍出缺口，就算输。结果，他们的长刀全都败在了老地的户撒刀刃下。

大概是“爱刀及人”吧，赶街时常有来比过刀的外寨傣族男子过来友好地拍拍老地的肩头，尊称他“栽龙”（大哥），发烟搭讪。

老地回城时，小富农提出用他那把镶金嵌玉的银刀来换这把刀，老地却将刀送给了鳗鱼。

《榕树魂》——

想家

当刚下乡的新鲜感过去之后，大家就开始想家、想学校、想念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开始考虑前途问题。而当时正值宣传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最盛期，人人感到前途无望。除个别想在政治上博点彩头、成为陈永贵式的“先进人物”的“假知青”在口头上宣布要当一辈子农民外，绝大多数知青，只要思维正常，肯定不愿意毕生去“修理地球”。

每个人小时都有过长大要当各种各样的社会栋梁的梦想，却没人会想到要当八亿农民中的一员。到不完全是歧视农民，而是传统观念所致。知青们与农民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对农民的境遇感受更多的是同情和怜悯。八亿之众的农民群众，理论上享有仅次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却连话语权都没有，知青们是看得明白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个人的一句话，就剥夺了一代青年人学习的权利，打碎了他们儿时的梦想，从生活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城市里被赶到相对闭塞落后的农村。而在不久前，他们还积极响应他的号召，狂热地起来造反，糊里糊涂地受人利用，干下了破坏文化传统，摧毁道德良心的坏事。到了文革后期，当那个至高无上的领袖意识到，这些“红卫兵”已经不容易利用了时，就决定让他们去接受“再教育”去吧。说是接受再教育，这些年青人实际是有家而不能回，跟监督劳改几乎没什么区别。

农村生活的艰辛，缺少文化生活，都让知青们的思想开始变化。当时各级革委会实际上正忙于夺权，根本无暇顾及这些20岁不到的年青人。与家人长期分离，无人安抚他们身体的伤痛，疏导他们心中的苦闷，知青们的精神状态陷入了一个低谷时期。

常到外地出差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与家人、亲朋好友分离的感情忍受期限最多100天，也就是3个月左右，超过这个时间之后，人就会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难受。大多数知青已经离开家人近8个月，早就超过心理极限了，如果不是与同学们在一起，互相安慰，同病相怜，再加上傣族从未将知青当作什么再教育的对象，多少减轻了点精神负

担，否则早就忍受不住了。

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要回家还不容易，买张车票不就行了？

当时，买车票要县知青办的证明和边境通行证。要办这些证件，必须有家里寄来的直系亲属病危、病故证明，或是县医院开据的本人已病入膏肓，需要到昆明就诊的证明。路上，至少有3个关卡要检查这些证明，其中一个，当年连日本鬼子都没打过去。

不少知青想方设法闯关冲卡，大都以悲剧告终。曾发生过知青躲藏在油罐车中闯关，被活活闷死的事。也有知青低估了自己的体能，想游过汹涌的怒江，惨死江中，连尸体都找不到。还发生多起想家心切的女生，被知青办那些披着军装的色狼借机侮辱的事件。更多的人想靠装病来骗取病退回昆明的证明：或由昆明的家长装病，找熟悉的又敢担风险的医生开假证明；或自己装病，骗县医院的医生。两种方法难度都很大，成功者极少。老地知道的人当中，只有糠麸装病成功。他的手法极简单但却极其痛苦，将碘酒涂在一支烟上，点燃抽完。当夜他即咳嗽不止，痰中带了大量血丝。第二天到县医院去看，医生听了听他的肺部，当即给开具了建议长期病休、回昆治疗的证明。他的成功事迹传遍全县，但却无人敢步其后尘尝试。

有不少知青控制不住当时如流感般传染的精神颓丧情绪，走入极端。到边境对面参加反政府武装当兵打仗，就是当时的一项选择。受当时“解放全人类”这类极左宣传的影响，许多知青抱着打赢了，就能掌握政权，一展抱负，打输了，就当革命烈士的单纯想法跑到边境那边去当兵，不少人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老地和老龙曾经一时冲动，差点就去那边当兵。本来俩人已经约好了出走的日子，恰好头一天邻寨有个知青刚好从那边逃了回来，听他说那种反政府武装实际上跟土匪没两样，当官的贪赃枉法，而且搞的是一套比王明还左的路线，当地的人民根本不支持他们。如此一说，俩人才打消了去当兵打战的念头。

当农民固然差点，总比当土匪强。知青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心态，老老实实地继续当农民算了。

中秋节当晚，众人借酒浇愁，喝得晕晕糊糊的把小时玩过的游戏，比如斗鸡、斗牛、跳山羊、瞎子抓跛子、老鹰扑小鸡、丢手帕、跟我做等等，全都玩了一遍，输了就罚酒，直闹到东方发白，人人酩酊大醉。

这次中秋节是知青们在插队期间过得最疯狂的一个节日，以后过的几次中秋，以及元旦、春节、端午等其它节日，包括知青们自创的所谓“离家节”，都是随随便便地吃喝一顿完事。

饭厅会谈

中秋节后的第二个街天，一大早，知青们还没起床，应该说刚睡下不久，老古急匆匆地赶来报信，说是弄迈的知青不知犯了什么事，惹恼了公社的头头，说要狠狠的整治一下，打了紧急报告给县里，听说县革委已经决定派人下来处理。老古满脸春秋，一副杞人忧天的样子，可老地看得出来，这小子骨子里正幸灾乐祸哩。他匆匆说完，再三叮咛别说他来过，一溜烟走掉了。

知青们将前段所做过的大点的坏事回想了一遍，够得上蹲监的似乎没有呀！

老地偷开县农机站的拖拉机，撞倒了公社粮站的门柱后逃之夭夭。此事除本寨知青外谁也不知道，公社的头肯定也不知道。

其次是为了进城看电影，大伙要强行搭车，老豆打了那个重女轻男的司机一耳光。大家认定，那司机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搞报复。

再就是老八在公社邮电所找到一个逾期2个月，早已变质的咸菜包裹后，逼着那个所长吃了一大块榨菜。此人有点权势，但理亏的是他，吃咸菜时至少有100多知青在场，估计他不敢跟知青为难。

还有不久前为了弄迈毕少被农场的四川知青调戏的事，男生们去农场打了一架，但没打伤谁呀。那几个小四川也当着农场的头认了错，上个街天还来敬过一转烟。

对了，最有可能的是上次为送老八看病，大闹县知青办的事。

再不就是老超那次广播事件。但是老超上次已经将责任全承担下来了，要整也只会对着他，再说了，老超并不是弄迈知青呀。

说曹操、曹操到，老超急如星火的赶来了。他的情报就准确多了，据说是弄迈知青不交猪头税那事闹大了，公社打了紧急报告给县革委，刚好州革委的一个头头来瑞丽，听县里的头头汇报后，对这件“首例知青抗税案”极为重视，要亲自来处理，搞不好是要抓个典型。

知青们听后，要老令到其他寨子避一避，这书呆子头一扭，只说了句：“不去！”。

赶街时，其他寨子的知青们听说此事后，决定派几个代表到弄迈来，共同商议对策，应付危机。

晚上，大家一直在玩麻将赌烟，把商议对策之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直到躺在床上时，才由有人想起此事，大伙儿七嘴八舌吵吵了一阵，否定了无数个馊主意之后，老学究开口发言，他是老高二的，岁数最大，大家便静听他做形势分析报告。不等他说完对方可能如何、我方应当如何，鼾声四起，众人已然沉入梦乡。

一觉睡至中午时分，大家正围着井边洗漱，一个鹿旺仔飞奔来报，说有三辆汽车停在弄迈寨口，有一大群人朝

这边过来了。

老学究宣布，大家尽管吃饭，等对方到后谁都别冲动，别先开口，由他与对方交涉。

老猫已经做好了饭，于是每人端上一碗饭，坐在那没有围墙的饭厅里吃，饭桌上只有一大盆辣椒炒蕨菜。

过中秋节时，知青们花天酒地的用完了最后一分钱。老平那几天一反她平素极其抠门的作风，显得特别慷慨，可能她以为留着钱也得给税管所，不如吃光花光算了。没钱了，就只能过紧日子，反正大家也过惯了。

刚开吃，一大群人呼拉拉走了过来。走在头里的人，身着军服，看架式就是个首长，可能是县里来的官。老地注意到，跟着他的另外几个穿军衣的，腰里显然别着“家伙”。县知青办、公社和大队的头头都来了，税管所的那家伙也在其中。老社殿后，不断回头赶开那些跟屁虫似的鹿旺仔。

知青们记着老学究的话，装作没事似的，只管埋头吃饭。

一伙人来到场院中站定，老古先走了过来，对大家说：“州里、县里的领导来看望大家了。”停顿片刻，见大家没有反应，又说道：“是不是请大家现在到社管会开个会，听州革委会的首长作指示。”那语气很是谦卑，像下级向领导请示工作那样。

知青们仍然吃饭，谁也不吭气。

老古还想再说什么，那首长模样的人向他摇手示意，开口说：“别说了，让他们吃饭”。说的一口北方口音，口气似乎很平和。

他这么一说，来的人中再也没人开口，全都站在那儿，身后则围满了几乎全寨子的人，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知青们吃饭。

州革委的首长面上现出微微的笑意，步出人群走向知青们。人人都看着他，全场陷入静默。

那首长似乎没有查觉知青们的敌意，很随便走到知青们身边。他先挨个看看知青们，又走进饭厅，看看桌上，用两个指头从菜盆里挑了点蕨菜尝尝。尝过后便咧着嘴直吸气，显然也是个不会吃辣椒的。接着他又走进厨房去，没多久就出来了，站在一旁。

知青们没管他，仍然吃饭。

弄迈的知青们不清楚今天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没想到连州里的人都惊动了。他们把种种最坏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这些人很有可能要把老令带走。知青们已经作好了准备，除非把大家一起带走，否则休想。

知青们相继吃完放下饭碗后，有的仍坐在饭桌旁，有的则靠着柱子站着，有人开始将草烟袋传来传去卷烟抽。

那首长走到桌旁坐下，掏出包“红山茶”牌香烟，先抽出一支叨在嘴上，然后将封口全部撕掉，将烟放在桌上，大声说道：“会抽烟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足有几分钟没有反应。

首长掏出个“五星”牌打火机点着烟，动作不紧不慢。那烟雾飘向身边的老猫时，老猫忍不住了，他一伸手把整包烟拿起来，一支支扔给知青们，还借花献佛地扔给围在饭厅外的傣族汉子们。一包烟很快就没了，好些人没轮着。

那首长抬手召过一个当兵的，只说了一个字：“烟”。那当兵的忙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给他。他接过来，撕掉封口，在手上一叩，让烟支露出头来，然后站起来，转着圈让大家拿烟。

大家纷纷点烟，全场“咔嚓、咔嚓”响起各种打火机的声音。

老地突有所感，觉得这场面仿佛曾经历过。

想起来了，有一次知青们在街子上跟一伙农场的北京知青不对劲，双方约在饭馆“谈谈”。当时对方为首的也是这样，过来发了两次烟，结果握手言和。

但愿这次也能握手言和。

那首长扔下烟头，站了起来，他清清嗓子，大声说道：“同学们，你们辛苦了，我代表州革委向你们问好。”

老地的心忽地抖了一下，“同学们”，这个称呼已经离知青们似乎很远很远了，今天却再次听到。既然如此称呼，可能暂时不会有什么事了。不过还是得小心，知青们见过那些面上笑咪咪，却冷不防就下辣手的家伙。

他接下来说的，却让知青们心头的石头基本上掉了下来。

他说的大意是：他们是来了解知青目前生活、劳动情况的，刚到县城就听到了公社反映知青抗税的事，就专门来弄迈看看。

他说：弄迈的知青能自食其力养猪，是好事，是值得提倡的。知青杀猪交不交屠宰税，现在先不做决定，以后交不交，等他回去找有关部门讨论后再定。

他还说：大家来到这里快一年了，有什么困难要反映的，可以对他说，他一定带回去，研究解决办法。

知青们松了一口气，敌意顿时消失许多，议论纷起。

老学究突然举起右手，像小学生上课要求发言似的。大家立刻敛声，等他说话。

“有些事我们有看法”。他声音不大，却很清楚。

“说吧。”那首长答的很干脆，不愧为军人。

老学究慢条斯理，一条一条地说了起来。

头一条就说了把犯错误知青当反革命批斗的事。

听了几句，那首长脸色凝重，眉头紧锁。县里、公社和大队的头头们一直站在场院里，被大太阳晒着，脸色十分难看。

接下来老学究说的问题是，到邻国当兵回来的知青被审查、强行抽调知青到电站、水库工地干重活、对知青不同工同酬、知青看病难、有病不能回家治、家里有事比如峨山地震死了人不让回家探望、百货公司不卖收音机等凭票商品给知青、家里寄的信件、包裹、汇款单时有丢失、文化生活贫乏看不到电影、书报等等。

那首长时不时问些细节，众知青也不时插嘴补充些实例。

说到看病问题时，老八刷的一下将裤管拉起来，他那双脚杆，布满了铜钱大的硬疤，那都是插秧时下了痒水田后皮肤生疮留下的。当时，老八被脚上那些红色的大疮折磨的苦不堪言，一股股脓血顺着脚直往下流，连路都走不了。知青们曾背着他一直从乡卫生所到公社医院直到县医院，那些草包医生都是随便看看，给几支治一般皮肤病的药膏了事。知青们到县知青办要求送他到芒市去，县知青办却不给办通行证。大家一怒之下，大闹县知青办，知青办的头干脆躲了起来，还叫县公检法的拿了枪来抓人，好在县公检法的头是个好人，他把知青们带到一位傣族和尚那里，由老和尚用民间草药治好了老八的脚。只是永久留下了那些有如火烧过似的疤痕。

听了老八的叙述，众人默然不语。

正在此时，躲在人群后面的老方突然痛哭失声，转身跑回宿舍去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纷纷询问。

弄迈知青们当然知道她的事，也知道她为何痛哭。

老方挺着个大肚子，有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她至少已经有8个月的身孕了。也就是说，她下乡时已经怀孕了。

老方是弄迈唯一的女高中生，知青们都叫她老大姐。“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刚发表，她家里就匆匆忙忙地将她嫁给了个工人，以为这样一来就不用下乡了。谁知还是躲不脱，跟她弟弟一起下来了。

雨季时，她染上疟疾，打摆子打得昏死过去，知青们赶着牛车连夜送她上公社医院。公路桥让洪水冲断了，是知青们搭起人桥把她抬过去的。晚上10点多出发，4公里路走到凌晨3点才赶到公社医院。知青们几乎是以武力将那个医生从被子里拖了出来，为老大姐治疗。幸好当地的医生治别的病不行，治疟疾却十分在行，把老大姐给救活了。那医生说，如果送来的再晚点她就没命了。

也就是那天，医生说，老方已经怀有5个多月的身孕了。

她提出申请让她回昆明生孩子，从大队到公社都批准了，唯独县知青办不批，说为什么非要到昆明生，到县城医院生不也一样。

算起来，再过个把月，她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不知何时，来的人都进了饭厅，坐在傣族老乡们拿来的小竹凳上。老地注意到，好多人的眼圈都红了。

陪同首长的知青办负责人头垂在胸前，不敢看人。

这场饭厅会谈一直持续到日近黄昏。

走前，州、县、公社、大队、小队五级领导班子参观了弄迈知青的宿舍、菜地。老豆的杰作——那副麻将，所受到的好评胜过了酋长的菜地。

税管所那位仁兄私下向老令打听，说他很奇怪知青们怎么能在一个街天（5天）就吃掉一头猪，老令说："怕你来拿走，大家就拼命吃，只两天就吃光了"。他看看瘦如枯柴的老令，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他后来跟老令成了朋友。

老令没被带走，州里的那个首长把老大姐给带走了。后来接到她的信，说她已经回到昆明。

不久，有些事有了改变。

老八被抽到大队去当邮差，弄迈的信总是最先送达。

知青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不再受限制，傣族老乡们想买什么就托知青帮买。

省里来的巡回医疗队专门在知青们公社医院设了个点，那位医生经常到弄迈来，但不一定是来看病出诊，多数时间是来找知青们玩。

没多久，老沙办病退回昆明了，回去后，来信说她已经被安置在一家工厂当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随后老平、老蒜相继步老沙的后尘，办病退回了昆明。一个进了家街道工厂，另一个则到一个郊区小学校当教师。她们来信说到，诺大的城市，却见不到多少同龄人，因而很想念众知青。老地联想起有个童话故事中，一个魔法师把全城

的孩子都带走了，整个城市陷入恐慌。大家便顺着老地的思路试想，全国数百座城市，突然之间不见了从17岁到23岁的所有年轻人，那会是什么景象？是有点可怕。

老帕本来没什么病，但县里突然来了个通知说批准他办病退回昆明，那病因是什么谁都搞不懂的“帕金森氏症”，知青们估计是那个北京军官做了什么手脚。他所在生产队的傣族认为他戴着手套割谷子，披着棉垫肩挑东西那模样着实可怜，而且居然说他拉琴也不好听，（当时老帕已经拉完《大顿特》，正在苦攻《帕格尼尼》）对他要走没加挽留。

至于“猪头税”是怎么定的，由于知青们再也没养过猪，税管所的那位老兄也就没说，那4元钱也一直没来收。

《榕树魂》——

洗浴

这里无论春夏秋冬，气温都比较高，干活稍用点劲就是一身汗，所以每天收工之后，人人都奔小河去，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上一澡。洗澡时，男的在上游，女的在下游，毕冒、毕少们大呼小叫，互相开玩笑。傣族男女之间很随便，在一起打闹玩笑毫无顾忌，有时真让还未开化的知青们感到难堪。不过他们闹归闹，却单纯得很，绝对没有不良的念头和越轨的行为。

秋收时，男人们整天都只穿条短裤，下河洗澡时直接往水里跳，上岸后不一会儿就干了，极为省事。

妇女们就麻烦了，下水前先得将统裙拉到胸部围好，再将衣服从统裙下脱掉，然后下到水里，随着水的深度将统裙下摆拉高，水快齐大腿时，猛然往下一蹲，统裙全部拉到胸前，蹲着走到水深及胸处，再将统裙往上拉至头顶，卷成一团扔上岸去。有时一不小心裙子在空中散开了，掉在水里，那裙子的主人只好从水中出来亮相，以快速的动作扑过去拣裙子。此时她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姐妹们就会大声喊道：“快看啦”，远处的那些傣族男人们就回应：“看见了”。

洗澡时，男人们时而发出威胁：“我们要游过来了。”女人们也丝毫不示弱：“来吧，你敢过来我们就敢把你的裤子脱掉”。等哪个胆大点的男人真往下游移动一点距离，就会响起一阵尖叫声，接着雨点般的泥团便将他打回上游来。

上游如果只有男知青们在游泳的话，形势就完全逆转。反而是那些毕少们叫嚣：“我们过来了”，然后主动进攻，“噗通、噗通”打着狗刨就游过来，将男知青们吓得往岸上跑，她们则笑得什么似的。在这方面，拘泥于世俗的男知青从来不是她们的对手。

最热闹的是她们洗完澡上岸的时候。她们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上岸时都要尖叫一声，然后全体一起行动，赤

裸裸地从水里跳出来，飞快地跑到岸上堆放统裙的地方，拉开统裙，有如装口袋似的，跳进去，将统裙上沿快速拉到胸前。一连串动作极其快捷，全过程只有几秒钟。

在这整个过程中，傣族男人们大声在起哄，男知青们则急忙别转头，个个脸上发红，不敢往下游看。

在夕阳逆光下，一眼瞥见那一个个苗条而富有弹性、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轮廓在水中跳跃，黑亮的长发在空中飞舞，挥撒出晶莹的水珠，闪闪发光的肌肤上反射着金色的阳光，衬着弯弯的小河、翠绿的竹林，在一瞬间构成了一幅比那些苍白的美女出浴图美得多的重彩画。

看到这种美丽的画面，心里绝不会生出任何邪念来，只有灵魂的净化和人与大自然溶为一体的真善美的感受。

办学

小印度的妈妈不明不白的死，触动了弄迈几个女知青的悬壶济世之心。她们不知从那儿弄了个药箱来，然后动员大家写信向家里要了不少常用药和医书来，凭着这些资本，她们就成了弄迈的赤脚医生。

这几位半路出家的医生的胆子可也真够大的，如果是一般伤痛弄点吃不死的药、抹点红药水给病人就得了，大病疑难病还是送大队卫生站或是公社医务室要保险一些，可她们却不顾忌，什么病都敢医。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们不医，谁医？那些病往往发起来急得很，不等送到好几公里外的大队或公社，人早不行了。

老乡们评价说她们的医术比大队医生、甚至公社的医生还高明。弄迈寨子和邻寨的好几个孩子是她们接生的，治好过好几个生急病的。老乡们说，以前患同样症状的送到大队和公社医务室去，死过好几个。在老乡们心目中，女知青们成了救死扶伤的观世音。

女生们办了个医疗队为傣族老乡提供身体健康保障，还想办个学校向他们传播精神文明。老社自然是大加赞赏，立即安排人盖了一座极宽畅的教室。黑板是自制的，老师用的粉笔则是用坝边的白胶泥搓的。队上还同意给每个教育家每天多记3分工分，她们办医是尽义务，没想到办学还能挣点工分，这3分工分相当于1角2分人民币，每月合计3元6角钱，不知道现在的教师看了会作何感想。

本来傣族的教育是由寺庙来完成的，男孩们到7岁就送到寺庙里当小和尚，学习各种知识。文革中寺庙被关闭，男孩们就不再学习，成天放牛。女孩们则只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生活知识，从不知道书本为何物。

让女孩子们入学反而非常容易，而要让那些野惯了的男孩子们坐进教室，就只能靠老地、老龙等男知青的权威

了。为此，女生们只好放下平时的架子，三顾茅庐来找男知青们，想请他们中的两三位出山当教员。殊不料男知青们居然拿起架子来，声称要当教员就集体担任，否则没人干。女生们到无所谓，老社却为难了，这么多教员，每天晚上要花掉他多少工分呀，不过他为了把所有的男孩弄进教室，也就咬牙答应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男知青讲的课居然大受小孩们的欢迎。老猫讲的历史课和老地讲的算术课，均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因为老猫的历史课基本上是讲故事，每节课都要在孩子们的再三请求下延迟下课时间。而老地的算术课差不多变成了美术课，一节课下来，黑板上画满了让他们数数的各种动物。

教算术的意义重大，很多傣族老乡数到10以上的数目就数不清了。小孩们放牛时，不是数有多少头，而是逐头地认谁家养的牛在或不在。那些傣族大妈根本就弄不清自己家有多少只鸡，只凭记忆辨认什么花色的哪只鸡是她家的。如果是哪只母鸡不见了，就会认为那鸡可能跑到竹林中筑窝孵蛋去了。如果公鸡不见了，会认为跟哪家母鸡跑了。不时丢1、2只鸡，她们根本搞不清。知青们钓鸡之所以能屡屡得手，而一直未被怀疑，就因为她们不会数数。她们去街子卖东西，如果是论个数着卖的，她们往往会多数一倍给买方。如果以那种一头吊个鹅卵石、另一头吊个篾筐的秤称着卖，那秤杆会翘到60度以上。以碗、铁筒作为量具计量的，要盛满至堆不下才算数。有一次老地要买一顶草编的礼帽，卖帽子的大妈要价8毛钱一顶，老地也不还价，抓了一把硬币给她，顶多只有3毛多，问她够不够了，她数不清，就说够了。

当时边境上流通人民币和邻邦外币，这两种货币的民间兑换率有相当固定的变动时间，春季人民币升、外币降，秋季则相反，差价还特别大。只要稍有经济头脑，通过炒汇就能赚大钱。此外，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非常普遍，内地的轻工产品交换边疆或邻邦的土特产品，当中有很大的利润。当时知青认为非常划算的易货贸易，是用解放鞋、汽枪、电筒等内地产品交换日本双狮表、瑞士五星打火机。但只有个别知青敢于偷偷地做这类生意，傣族是很难搞清楚这些换来换去的价值的。他们当时的价值观只建立在生活必须和个人喜好上，比如小富农要拿他那把镶珠嵌玉的银刀来换老地那把毫不起眼的马刀，就只考虑那把刀的钢火好这一点。

女生们把当过和尚的会计请来教小孩们傣文，知青们没事时也跟着学，因为已经有口语基础，没多久也就掌握了傣文，水平高的直到回昆明后还跟傣族年青人互相通信。

自会计加入教育界后，寨子那些从未进过学堂的毕少们，主动要求晚上给她们上课，教师们特别是男教师们当然欢迎，愿意牺牲业余时间来讲课。既然毕少们晚上来上课了，毕冒们晚上没地方可去，也就不太情愿地坐进了教室，于是弄迈的第一座夜校开办了。

夜校的课程实际是文化知识综合讲座，几乎所有会讲故事的人都做过客座讲师，老猫则自称是教授级的。给他们上的课时常要根据实际需要变动教学计划，比如正碰上丈量土地，就改教几何，盖房则讲力学，随他们所提问题而定。从中国比邻国大这个话题开始讲世界地理，正在说美国就又转为历史。讲数学时常变成自然课，从年、月、

日如何来的，讲到天上的日、月、星，讲到宇宙。从风、雨、雷、电这类自然现象，讲到地球的产生，从物种起源讲到人是由猿进化而来。每一堂课，都要全体教师在场，互相补充，谁擅长什么就由谁上讲台。

理科方面的知识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而文科方面的知识要灌输给他们，却比鲁滨逊教星期五还困难。特别是涉及信仰方面的，尽管知青们用尽了肚子里的墨水和嘴里的口水，最终仍不能说服他们相信哥白尼、达尔文的学说，宁愿相信他们世代流传的民间故事。

比如说到地球是否是圆的这个问题，老令以绝对是一级教授的水平在讲地理知识，老地便做他的助教，在黑板上画了个标准的世界地图。傣族青年们便说：看嘛，地球就是块平板。教授只好要老地将地图画在篮球上，画得与标准的地球仪相差无几。不料相帅跳起来，拿一竹筒水，浇在球上，自鸣得意地说：如果地球是圆的，大海不就流走了吗？

曾经为有没有鬼神，全体知青教师与傣族学生激烈辩论了好几天，最后学生们很宽容地说：你们不相信就算了，反正我们信。辩论就此结束。

后来大队办了小学校，弄迈的孩子们每天都去课，女知青中被调了两个去当民办教师，弄迈的学校就停办了。反正该教的也教的差不多了，那些他们不相信、不愿学的也教不了。再说，知青们自己还没完成初中教育，也只能教到小学程度，再往下就没什么货了。

傣族老乡们生活的圈子相对要比知青们窄，因为交通和信息不便，才使这个民族的发展落后于时代。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的确不如读了两年中学的知青，但他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千百年来，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千上万的知青来到这里，汉傣两族共同生活的几年中，给他们带来思想观念、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重大影响，对这个古老的少数民族而言，这种情况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这种影响究竟是好是坏，有待历史来验证。现在看来，正面的影响固然有，而负面的影响也还是很大的。从知青这个角度来说，当然喜欢说正面的喽。

《榕树魂》节选：

看电影

在农村，看电影、看戏是当时难得的精神大餐。

只要在本县或是境外不过江的范围内，凡有电影或演出，不管看过多少遍，也不管演得多臭，知青们必到。

农场经常放电影。电影在哪儿放，那儿的农场知青就义不容辞地负责接待远处来的知青们的食宿。农场各队多数在半山，远的得走半天。知青们吃过中饭就走，每次都约上傣族毕少们一起走。跟她们在一起边走边聊，开开玩笑，好玩，还可以吃到她们带的小食品。晚饭就在农场知青处吃，雨季时，看完电影就跟农场知青挤一宿，第二天再回去。

乡上、区上这些近处放电影时，大家就吃过晚饭才去。走时，人手一只电筒，也有的提着用竹筒做的孔明灯，傣族们边走边对歌。此时若从大榕树上远远的望去，一串串忽明忽灭的灯火、一阵阵悠扬的歌声从四面八方向同一方向汇集，好看且好听。

傣家毕少非常调皮，见到男知青就用电筒直射，晃得你眼睛睁不开，看不见路，一不小心就踩到水田里。她们会笑得前仰后合的，嘴里还不住地奚落人，使你哭笑不得。

为了报复，老地用两只电筒拼成一只装4个电池的强光电筒，跟她们对射。只是她们即使被晃得睁不开眼，也能轻巧地避开路上的坑洼，更不会掉下水田。

傣族看电影极为投入，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全体一起或悲或喜，惊叫、叹息、抽泣、欢笑或痛哭。当看到《渡江侦察记》炸大坝那段时，就会有人大叫，男的别去，叫女的去。没看过的问为什么时，看过的人会说，他去准死，已经好几次了。至于说死多少次，视这人看过的次数而定。

看电影时，往往是各寨子知青聚会的时机。除了新片，凡放老片知青们多半跑到银幕背后空场上去，站成一堆儿闲聊。刚开始时傣族老乡们很不理解，说这帮知青怎么老喜欢看人屁股，等到有好奇心强的小孩也跑到背面看了，告诉大人们背面看到的也是人的正面，所有的傣族老乡都亲自跑到银幕背面查看，大惊小怪地争论这背面看到的人为何只是左右颠倒而不是前后相反。

放电影的换片时，全场一片漆黑，毕少们的电筒光柱从正面射过来，知青们的则从反面反击过去，双方开展电筒光大战。此时，老地的强光电筒大出风头，光柱照到哪儿，哪里就响起尖叫声。光柱照到谁的脸上，她就眯着眼，大叫："呆乍麦。"（你个死鬼之意）但却既不躲避，也不举手去挡。全场毕冒与知青一起叫"照啊，就是她"，并议论她是哪个寨子哪家的，碰上长的漂亮的，散场后她身后定会跟上一大群毕冒。等到换好片开始放映了，电筒光大战才告一段落。那时除了县城电影院有双座机外，巡回放电影都是单机，每一场要换好多次片，每次都要闹上一通电筒选美。

《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在县城放映时，全县知青几乎倾巢出动。弄迈知青们步行20公里进城，沿路各寨知青跟着加入，浩浩荡荡结为大队人马，沿路寨子的傣族不知出了什么事，还以为昆明知青又去跟农场的外省知青打群架呢。

那天电影开映时，守门的县中红卫兵被这伙知青一句："滚开，你红卫兵爷爷来啦！"吓得溜之大吉，平时只能坐500人的电影院挤了至少2000人，差点没把电影院挤垮。当放到跳4个小天鹅的芭蕾舞时，镜头一黑，只能听见音乐。原来是放电影的按上级要求，用手将镜头给挡住了。只听得全场一声怒吼，天花板震得直掉灰，愤怒的知青们冲进放映室，要不是有点理智的人想到还得有人继续放电影的话，那小子差点就被踩扁了。暴动之后，那一小节4个小天鹅舞重放了至少5遍，电影才继续往下放。

省京剧团来巡回演出《沙家浜》的那些天，知青们成了随团搭台、卸台的义务工。剧团有个武生演员是老令的朋友，抽空来弄迈玩了一天。等他走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弄迈男知青和鹿旺仔们工间休息时的乐趣便是在稻草堆上练习翻斤斗。没过多久，包括老地在内有好几个人学会了翻前空翻，老龙和鳗鱼则能翻后空翻。

在国境线那边，时常有反政府武装的文工团进行演出。得知消息后，附近的知青们以那种包住头的方式披着棉毯，化装成傣族，越境去看。结果往往令人大失所望，听不懂，表演和音乐也极差劲，那些活报剧情节极简单，纯粹是宣传，连傣族老乡们都不爱看。知青们还是逢戏必去看，不为别的，纯粹为了戏场周围各种各样的小食品摊，以及与外国傣族毕少们斗嘴逗乐子。

找书看

当知青时，正是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的年龄，艰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都能够适应，最苦恼的事便是没有书看。

为了找书看，老地几乎走遍了全县。

那些高中生带的书最多，所以他们的宿舍是老地定期检查或突击抽查的重点。只要远远地看到老地从大路上过来，高中生们就会大叫：“地主还乡团来了，快坚壁清野”。但不管他们的书藏得有多严密，大都能被老地搜出来，他们也只好让他看。他也不把书带走，吃住在那儿，白天大家出工，他就看书。到他们快收工时，老地就生上火，淘好米，摘好菜，做厨房下手的工作。晚上则要将书还给他们看，他跟其他人聊天或下围棋，等看书的人中有人看完了或是要睡觉了，叫一声：“小地主，来拿书”，他就跟个要饭的似的急忙跑去拿来接着看，有时一天中交叉看3、4本不同的书。每次将全部书看完后，他就回弄迈去出一段时间工，改日再到另一个寨子去搜索。

后来知青们发现，外国街子上有专门租书的，每租一本2分钱1天，租一个街天（5天）1角钱。大家欣喜异常，大量租了来看。只是能租到的书的种类太少，都是直排繁体字，很薄的线装书。他们曾租过金庸的《碧血剑》全套，是用谷箩挑回来的。

租到书后，大家排队轮着看，看得快又能熬夜的先看，其余的人则排队等候。每看完一本，就要吵吵一阵子找下一本。有时某人急着要找下一本，半夜里会忽地响起跟要命似的吼声：谁拿着第某本，快点拿出来。把大家都给吵醒后，如果书是在女生那边，就得从墙头上面扔过来。

看书曾经给老地带来点不大不小的麻烦。

一天上午，大队（原来的乡）干部老古来传达当时隔不了几天就来一次的“最高指示”，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参加，至于那些针对党内斗争的“指示”，连汉话都不懂的傣族老乡们听过后是否明白，也就不管了。

前一天晚上，老地在老社家玩时，被相帅逼着学抽烟，一支烟没抽完，就感到头昏眼花，晕晕糊糊的被别人搀扶回宿舍。他们说这叫烟醉，比酒醉还伤人。第二天老古召集开会时，老地感觉还没缓过劲来，拿了本书坐在会场外凉台上，呆了一会儿就开溜了。

快到中午时，老龙在鹿旺仔的带领下，跑到大榕树下找到老地，说：“老古这个狗X的，他在会上说你看黄书！”

老地一下子跳了起来，这还得了，搞到老子头上来了。

当时正值上面强调要加强对知青的再教育，某些干部成心找知青的茬，组织了好几次批斗会，批判对象都是所谓的“坏知青”，看黄书也是当时给知青定的一条大罪。

“人呢？”老地怒气冲天地问道。

“刚走”，随后赶来的知青们说。

“追！”老地拿起那本“黄书”往腰里一别，大伙随老地一起朝寨口跑去。

寨子里的傣族见这伙刚被批评的知青气势汹汹地去追老古，知道要出事，也急忙随后跟来。

刚出寨子口，就见到了老古。

老地一声大吼：“狗X的，老古，你给老子站住。”

这小子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老地，腿就软了。他也知道，老地的胆子大是远近出了名的。

腿虽软，嘴可还在硬：“你……你想干什么？”

老地冲到他面前，一把就抓住他的领口，咬牙切齿地喝道：“刚才在会上你说老子什么？嗯！”

老古还想给老地来个下马威，脸红脖子粗的大声地叫：“放手！告诉你，我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你敢动我一下，就是现反。”

老地不卖他这帐，不但没放手，右手还已握成拳头，刚想冲他小腹上来一下，老社赶来了，拉住了老地的手。

老古忙用傣语向老社说：“队长，他想打我，快去叫民兵来”。

谁知老社不紧不忙的对他说：“他问你，刚才你在会上说他什么。”那种神情，仿佛老古不懂汉话，需要他当翻译似的。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众所周知，老社一句汉话都不懂。

还是合作社时期，老社曾因此出过一次大洋相。那次传达的“最高指示”是：一是要抓革命，二是要促生产。传达完了，老社讲话：“毛主席说啦，一社要革命，二社要生产，我们三社没事儿了，休息。”老古急得直跳，一再向他解释，他却一本正经地一口咬定：“毛主席就是这么说的，我在乡上也听传达了。”知青们笑得满地打滚，傣族老乡们则莫名其妙。以后第每逢听到这类“一要如何，二要怎么”或是“既要如此，又要那般”的模棱两可的“指示”时，弄迈知青都会补上一句“三社没事儿了”。

老社其实在路上已听老蒜说了事情的由来，他平时就见不得老古颐指气使的样子，这么一说，跟老地的话刚好对上茬。知青们后来还猜测，老社可能是大智若愚，真人不露相，说不定他真听得懂汉话，一直装不懂。

老地容不得老古再废话，将其领口一紧，大吼："说！"

老龙也在一旁神情严峻的发话："说吧，刚才老地不在时你是怎么说的？现在当着他再说一遍。"

"我是说，开会时不要看书。"老古见众人都不向着他，便想大事化小。

"老古，别以为我们不懂傣话，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老平记性最好，她用傣语重述老古在会上的话："你说：'刚才有个知青，胆子也太大了，开会时公然拿了本黄书在看！看来是要请到乡上去学习、学习了'是不是？"

众知青和傣族都纷纷点头："没错，是这么说的。"

"你是在开会时看书嘛。"老古对着老地说，眼睛却低着。

老地松开手，从腰间抽出那本封皮的确是发黄了的书。一手指着他的鼻子，以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老古，跪下来。"

老古奇怪地看着老地，没动。大家也不知道老地要干什么，都静静地看着。

老地把手里的书举起，用傣语向大家宣布："大家看好了，这本书是毛主席最喜欢看的书。老古说是黄书，他说的对不对？"

知青们看清了，那是本《唐诗三百首》。

傣族老乡们当然是完全相信知青的，他们开始议论起来："不对啦，毛主席喜欢的，当然是好的啦，怎么能说是坏书呢。"

老社则直指老古："你错了，老地没错。"

知青们更是威逼老古："你这可是反革命言行，该当何罪？"

有人大叫："把他抓起来，把这个反革命送到乡上去批斗"。

老地直盯着呆若木鸡的老古，准备看他的反应来决定下一步行动。

众目睽睽下，老古满头大汗，目瞪口呆，嘴唇乱抖，半天不说话。

忽然，他噗通一下跪倒在地，双手乱捶胸口，口中念念有词：“我有罪，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

这一下子变故出乎老地的意料。原以为他会跟知青们辩论上一阵，最后结果顶多是双和。或者干脆来句“你给我等着”就开溜，不了了之。没曾想，本乡最高权威老古这么容易地就投降了。

大家也都楞住了。傣族老乡们惊讶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平日威风懔懔、能在会上滔滔不绝讲2个小时大道理的大干部，居然会向个小知青下跪。他们听不懂老古的话，只知道他是认错了。

老地看着老古青筋暴胀的脖子，真想一手扼住，再将他的手拧到背后，弄到乡上去批斗一次，为被斗过的知青出口恶气，却又下不了手。

不知怎么的，老地感到一阵恶心，背过身来不想再看他，低声喝道：“起来！走吧。”

老古急忙站起来，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连裤子上的土都没拍一下。

大家静静地看着他走远了，谁也没说话。

回寨子的路上，傣族老乡们兴奋地议论着，知青们却默默地走着，回想着刚才那一幕人间活报剧，心中只感受到一种无奈。

老地虽然胜了，却觉得胜之不武。知青们是在大城市里从文革的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对这种以更左对极左的文革伎俩，当然比老古这种土干部见的多，收拾他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但也不能小瞧了这些土干部！

邻寨知青分家时，为共用物品如何分争吵起来，老古要他们学红宝书，有个39中的男生说了句：毛主席又不能解决知青们分家的事。老古抓住这句话不放，那傻小子便承认说错了，其他知青又不团结，谁也不出头，结果这个男生被打为反革命，批斗了好几次。

总之，不能承认莫须有的罪，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这是知青们从文革中耳闻目睹、亲身体验所得来的宝贵经验。

老地对这事一直耿耿于怀，难以理解人与人之间居然会闹到这般无聊的程度。

老古仍然来召集开会，就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似的。傣族人民待人善良，不愿提及让人难堪的事，对他仍然是恭恭敬敬的。

不过他对知青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转变，见人就发烟。以后对知青也一直很好，别的寨子的知青都深感奇怪。

《榕树魂》：

打赌

嗜赌如命的老二甚至生吃过一条水蚂蟥。

老二是老大姐老方的弟弟，老方走后他就加入到大家庭里来，老沙、老平、老蒜3位女生走后，大家庭只剩下男生，号称八大金刚。

其实老二生吃蚂蟥并非恨不得啖其肉、寝其皮式的发泄，他只是为了跟傣族毕冒小富农斗气打赌。

小富农家是全寨子最有钱的，划成分时就他家有点富农样子。虽然后来都算中农，知青们还是叫他小富农。

小富农全身都是值钱的东西：他的腰刀镶着宝石，套在银鞘里。全寨子只有三辆自行车，老社家有一辆，他家有两辆，小富农骑的那辆是英国来铃牌。在他脖子上，带着一条极粗的金项链。老地曾经极为可恶地执意要借他的项链来拴小花子，弄得他有半年多不敢戴出来。他手腕上，右边套着一只水色极好的玉手镯，左边则戴着块梅花表，老超曾做过鉴定，说这块表有几十钻，价值连城。

那天，老二正要捅翻一个大蚂蟥，小富农嫌恶心，就劝老二放生。老二说："凭什么，它咬老子，老子就要它死"。傣语中，说吃、喝、咬都一个词。听着就是，它吃我，就该死。小富农便说："你也吃鸡、吃猪，那么你是不是也该死？"老二就跟他讨论达尔文，大讲弱肉强食，生态食物链，以及酒肉穿肠过，佛自在心中等等。

小富农听的不耐烦，就激老二："有本事你就把它吃掉！"见老二迟疑，自认抓到了老二的短处，便一再相逼。

逼得急了，老二凶性大发，吼了起来："吃就吃，赌什么？"于是双方讲定条件开赌。条件是如果老二吃下那

条蚂蟥，小富农的表就归老二，反之，老二的大电筒归小富农。老二的大电筒是他姐姐托人从广州买了带来的，装5只大号电池，碗口大的头，比老地那只自制的强多了。

众目睽睽下，只见老二将那蚂蟥洗净，捅翻后再洗一次，要了点盐撒上，等它扭动稍止，便跟吃羊肉串似的一口咬住，从草棍上扯了下来，然后闭着嘴足足嚼了10多分钟。最后，只见他双眼一闭，一仰脖子就吞了下去。

当时全寨没几个人有手表，即使戴表也只是做装饰用的，根本没上弦。要是问他时间，他们不是抬手看表，而是习惯性的抬头看太阳。知青们也一样，时间全靠估计，他们连个钟都没有，更别说戴手表了。老地下来时带了块老怀表，第一次犁田时就被他弄丢了，埋在地里整整一年，第二年犁田时才被傣族老乡给找了出来。奇的是，埋在地里一年，那表居然没坏。后来老猫将阿凡提骗巴依的故事硬赖在老地身上，到处宣讲：老地主财迷心窍，异想天开，将表埋在地里，想种出棵吊满怀表的树来。

小富农痛失手表后，心性大变，从前知青与鹿旺仔联合举行射斑鸠、烤活鱼、淹竹鼠、剥活蛇之类的狩猎行动，他从不参加，现在却积极地参与甚至组织这类杀生恶行。

老二戴着小富农的手表，得意了好多天，还写信向姐姐吹嘘。等到老大姐回信后，他便悄悄地把手表还给了小富农。

小富农喜出望外，到外国街子上买了10多包草雪茄烟送来，知青们不知他何以变得如此大方，待见到他手腕上的手表后才明白。

老二的拿手好戏是赌吃，傣族吃的那些虫蛹蚁卵，知青们多数不敢吃，他却来者不拒。

有一晚，大雨倾盆，房外沟边有只癞蛤蟆一直在叫，声音极为宏亮，吵得人不能入睡。老二嫌烦，大声宣布：“谁去把它抓来，老子就吃掉它。”

而老猫也较真，一声不吭跳下床，拿只电筒就出去了，回来时跟一只落汤鸡似的，鼻尖上都在滴水，手中提着一只比拳头还大的癞蛤蟆，塞到老二面前。

老二不好食言，只得起身到厨房，剁掉头脚，剖杀剥皮之后，用小锅煮熟。他尝过之后，得意洋洋地端到宿舍来吃给知青们看，一端进来就闻着香气袭人，把大家都引得口水直流，看着他的吃相，哪像个输家的样子，把大家气坏了。

几天后，酋长与他赌吃“涮涮辣”。酋长吃了一个，没事。老二毫不犹疑地吃了两个，赌赢了。半个小时之后，忽听宿舍里一声闷响，酋长等人进去一看，只见老二满脸酱紫色，牙关紧闭，抱着肚子满地打滚，大家吓坏了，火速将他送到公社医院，洗过胃后才好些。后来好几天时间，老猫天天熬咸鸭蛋稀粥给他开病号营养餐。

从此，再也没有谁敢跟他打赌，无论知青还是傣族。

反而是老地跟傣族打了一次赌。

秋收结束，又进入了农闲时节。此时，知青们的傣语已经说得极为流利，讲故事的阵地也移到了有烟、有茶的傣族家里，所讲的故事大多是鬼故事。

一天晚上，老猫讲完一个极恐怖的厉鬼吃人的故事之后，毕少们跟老地打赌，问老地敢不敢夜里独自到坟场去，从围坟的篱笆上折一枝竹片，第二天众人去对茬口验证。

老地二话没说，转身下楼，直奔坟场。

坟场其实就在大草坪的一边，小印度的妈妈刚死不久，围坟的竹篱还很新。

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在人生观上，其实比汉族要开朗。死了人，他们是当作喜事来办的，亲友们虽然也很悲伤，但却认为这是天意，人死了是到天堂去了，要好好庆贺。于是乎，请来四方亲友，杀猪宰牛，全寨大宴7天。结婚反而只办3天宴席。无论婚丧，知青那几天就不用自个开伙了，都去吃现成的，跟办了大食堂似的。

傣族其实是没有什么坟墓的。死人入土之后，用草皮搭起个土堆，上面放上竹做的亭子，周围用挂着纸花的竹篱笆围上一道，防止牛闯进去践踏。用不了多久，风吹日晒雨淋，一切就会回归自然，连隆起的草坪也渐渐被牛踏平。以后如果有人提起死者来，人们或许还记得，会说某某睡在某棵树哪一边几步之处。时间一长，记不起来了，这人也就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他们似乎很少提及前人，但很看重来生，是个向前看的民族。他们非常敬重老人，却又认为如果老人行动不便了，成了后人的累赘的话，那就不如让其安乐死去，于己于家人都是一种解脱。弄迈有位老咪涛（老奶奶），估计至少有90岁了，一直卧病在床。她的家人曾经在她床边敲锣、放鞭炮，打算将她惊吓致死，不料老太太生命力极其顽强，吓不死。有一天，知青们见她家人带着一个背枪的汉人往家里走，便跟去询问，那人是农场的湖南移民，他坦白说，那家人出10元钱请他在床前放枪，想吓死老咪涛，既然已经被知青们发现了，他就不会也不敢做了。后来直到知青们回城，那位老人仍然好端端地活着。

傣族之所以认为坟场是危险地带，是因为那儿一到晚上就有鬼火。晴朗的夜晚，大如灯笼的鬼火会在空中成对飞舞，远远看去的确有点阴森森的。傣族的传说中有各种各样的鬼，还有很多关于鬼神附体的故事，最为著名的当属枇杷鬼。有部电影《摩牙傣》就是讲枇杷鬼的，其实那电影纯属乱七八糟的编造，对傣族习俗很不尊重。极其虔诚地信奉佛教的傣族，决不可能做出那种伤害他人的举动，也不可能产生出那样强烈的“阶级仇恨”。在弄迈就有一家人被周围的百姓认定为枇杷鬼，在知青们看来，这家人与其他乡亲照常交往，与众不同之处不过是有些关于比如牛群行动反常之类的传闻，老乡们在背后说成是枇杷鬼干的，但也就这么一说而已，并没见任何人对这家人有何严重的歧视之举。

老地从来就不怕鬼，他很早就看过一本《世界可知论》的小册子，从那时起就成了个绝不迷信，却也不怎么彻底的唯物论者。他也不信仰任何主义，认为那些玩艺儿不过是另一种宗教迷信，是创造出另一帮神祇来愚民的。

出去找书看时，老地经常半夜独自走回寨子，因为走夜路凉快，也因为喜欢独处大自然之中。曾经有段时间上面要求加强警戒，说境外有敌特潜入境内搞破坏，还曾经发过几支老掉了牙的七九步枪给知青们，参加值守那座毫无战略意义，甚至连战术价值都没有的水坝。在这段时间，老地照样独往独来的走夜路，有人问他怕不怕碰上坏人，他说碰上了也应该是坏人怕他才合情理。

坏人到从未碰到过，但老地曾经碰到豹子，也曾遇上蟒蛇，他顶多感到紧张，从没感到害怕。既然他连动物都不怕，也不怕人，当然就不怕鬼了。

毕少们并不知道，老地独自一人夜里来坟场早已不止一次了。秋天来临后，他发现此地的蟋蟀个头极大，就牵头在知青中玩起了斗蟋蟀，后来此项活动很快推广到鹿旺仔当中。为了抓到厉害的“大王”，不但坟场，连傣族祭鬼的大榕树下老地都去夜访过。

赌别的老地不行，赌胆量他肯定赢。

走近坟场，那些飘浮在空中的磷火向旁边飘逸。他曾经追过磷火，看着就在前面几公尺的地方，却就是追不上。他径直走向坟墓，走到围篱边。由于围篱的保护，牛不能进去，当中的草便长的特别茂盛。小印度的妈妈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坟地内的草已长到齐膝高。

当老地来到围篱前，刚想伸手折一片篾片时，草丛中忽然跃出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伴随着“噼啪”声响，朝他迎面扑来。他吃了一惊，本能地朝旁边一闪，不等他掉转手电筒查看，那东西从他脸旁掠过，一股风扫过面颊，便隐入了夜空之中。老地定了定神，意识到那只是一只猫头鹰。走夜路时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有惊无险，不过吓一跳而已。

折断竹片时，老地突然想到了小印度的妈妈那从来都是带着笑容的脸。她是笑着死去的。在她死的那一天，上午收工时，她还塞给酋长一大块牛肉干，正好被老地看见，见者有份，当即分了一半。下午，几个大妈在她家聊天，说到什么好笑的事，她笑得往后仰面倒在竹席上，便一动不动了。等到那几个自学医术的女知青赶来，她已经没气了。准医生们说，她可能是死于心肌梗塞，如果及时送县医院是有可能抢救过来的。

她不光是对酋长，对所有的知青都很好。老沙、老平、老蒜她们走时，她哭的是那么伤心，拉着她们的手说：如果昆明不好在，就回弄迈来。那语气神态犹如慈母对自己要远出的孩子一样。小串联时，其他知青都走了，只留下老地这个不会做饭的懒鬼。本来老地理所当然是吃住在老社家，她却死活拉老地到她家去吃住了两天。在她的带

动下，全寨子各户人家排着队轮流供老地食宿，直到酋长他们从外面回来。

老地有些伤感地想到，这么好的人，怎么这么早就离去了？又想到，如果她仍活着，她的生活内容仍将平淡如水。回想起她是笑着逝去的，老地仿佛有点明白知足者常乐这话了，也开始意识到人的一生只要活的满足，未必都要追求轰轰烈烈。而这种满足就得因人而异了，换了自己，如此度过一生，肯定会大为不满，似乎有什么东西没得到。可那是些什么东西，他却又一时想不明白。从这点来看小印度的妈妈，她的一生似乎很幸福，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生活中也从来没有什么烦恼，平平静静地活在她的生活圈子中。但她活得似乎又太无味道了，一生中从未走出方圆10公里之外。记得知青们曾经竭力向她宣传坝子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说昆明、北京，火车、飞机这些事物时，她一点不感兴趣，当说到大海、草原、雪山时，她却再三地发问，说在电影上看到过，她太想亲眼看看了。

这何许是她生前唯一未能实现的愿望，如果知青们不说这些事，那她死时就可以算做死而无憾了。知青们时常自欺欺人地说他们的到来，开启了傣族的眼界，给他们带来文明。问题是：这种文明对他们来说是利大还是弊大？几千年来，善良勤劳的傣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他们与大自然友好共处，从不过多地索取，满足于最简单的生活。是的，在知青们看来，他们的物质生活太穷困，精神生活也太贫乏，可以说相当落后。知青们想帮助他们改变，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可是，知青们有那个能力吗？

给人一种美好但难于实现的虚幻，与传播伪善的宗教有何区别？

就这样半夜站在坟墓旁，老地第一次想到人生。

当老地拿着断枝回寨子时，远远地听到酋长等人叫他，边叫边朝坟地走过来，他们见老地好长时间没回去，怕他真是见鬼了。老地笑着回应：“你们叫魂呀！”跟他们会合了一起回寨子，见老地手中拿着的那枝竹篾片，傣族老乡们惊恐万状，指着他大喊大叫，要他把那断枝扔在路边，不许拿进寨子，生怕他把鬼带进寨子去。

《榕树魂》：

广播

雨季时知青们最怕每晚踩着烂泥去社管会开会了。

讲物理课时，老地说，有一种很简单的带电话功能的广播网，可以将全村各家联在一起，那时再不用只为了决定明天谁到哪块田干活，而在雨季时摸黑走一趟烂泥路到社管会来了。

在寨子里其他人看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认为老地是在做白日梦。只有知青们支持老地，公社广播站的老超则说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

农闲时，队里正式讨论了老地的建议，毕少、毕冒们一致支持，老社也同意了。老地就与老社一起到公社开了介绍信，到县城买了一台带对讲功能的晶体管扩音机，又到县广播站去要了些器材来。

所谓器材，其实也就是一个高音喇叭、多只舌簧喇叭、陶瓷喇叭、一大卷铁丝和一堆瓷绝缘子。

设备齐全后，由老超来指导，毕冒们和知青们一起动手树电杆、拉电线、装喇叭。只用了三天，就把弄迈广播网建成了。

开播的那天晚上，老地开开扩音机，让老社对着扩音机讲话，弄迈生产队最高领导人的声音立即飞进了家家户户。随后，老社和老社夫人，约了寨子里的老人们，轮流在扩音机前挡喊（唱歌），全寨子的年青人则聚在场院上嘎光（跳舞），直到深夜。

广播网是打着宣传伟大思想的名义建的，可那时唯一能收听到的傣语电台却是邻国的。于是某几个时间播傣语歌，某几个时间则播知青爱听的音乐。

每天晚饭后，老地就到老社家打开广播，让老社安排第二天的生产任务。那台扩音机有项功能，拨一个转换开

关后，每个外接喇叭都可以变成麦克风，类似铁路电话。各家都聚在喇叭前听，如果有意见，就大声说出，全寨人都能听见。从此，大家不用每天冒雨到社管会开会了。当然，如果天气好，事情又比较重要，大家还是到社管会开会。不时聚一聚，也是一种必要的社交。

如果白天有什么事要通知大家，或者要找人，老地就把线接到高高地架在社管会门前竿子上的高音喇叭上，打开广播一喊，邻寨都能听见。

可惜老蒜没用上，以前开饭前她都要声嘶力遏地叫："吃饭了"，那时要是有这玩艺儿就省力多了。

碾米房

男知青们提议的第二件事是建个碾米机房。他们的响亮口号是把妇女们从舂米臼旁解放出来，私底下也为了自己的肩膀得到解放，不用再担着谷子，来回跑4公里路到公社去碾米。

老地将建碾米机房的建议在广播中提出后，全寨妇女们一致支持，并要求立即召开全寨大会公决。但老社不点头这会就召集不了，妇女们找到他，他只说这事不属生产性事务，过些时间再议。老地私下与老社交换看法时，老社告诉老地一个让他终生受益的道理：凡领导表示某事再议，其实也就是反对，而这种拖延式的反对还能有效地消除抗议。最终，在全体妇女的压迫下，全寨大会还是开了。但在开会讨论时，问题还是发生了，男人们大多持反对意见。男人们之所以不同意，主要是为了省点钱。此事不比搞广播，建碾米房至少要队上拿出2000元投资，而队上当时只有3000元。妇女们不理他们这一套，她们轮流上台痛诉早起舂米的艰辛，并且来了个全体一齐起立，拉起统裙让大家看她们的双腿，凡15岁以上者，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粗。知青们看了虽然有点难为情，但事实的确使人震惊，大家更坚定了建碾米房的决心，而老地则偷偷地为他学鸡叫之举感到有点亏心。

傣族男子有点像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国王，看着似乎地位挺高，但在家中却一点实权也没有，什么事都是老婆说了算。在家里吃饭，男子们在楼上围坐在火塘旁，由女人从楼下将准备好的饭菜用小圆桌端上来给他们吃，女人们则在楼下厨房里吃。等男人们酒足饭饱之后，女人们再上楼来收拾。傣族妇女特别勤劳，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她们做，男子汉则什么家务事都不干，享尽清福。如此养尊处优当一家之主，男人自然满意，也就不去争什么财政、人事乃至外交之类的大权了。不过这男子也得小心，在家中再懒，在外可必须有本事，否则随时会发生回到家来发现人去楼空的情况。那原先真心诚意服侍自己的内当家的，会自行跑回娘家，另择自己的"国王"。傣族对待婚姻相当自由，全凭自己的情感来决定，妇女再嫁几次的事一点不会受到什么非议。

妇女们秀腿之后，男子们再也无话可说。老社当即宣布：通过知青提出的动议，建一座碾米房。

碾米房这一项目的实施，自然是由老地负责，到不是因为将来他可能成为老社家的乘龙快婿，而是大家都公认他是弄迈最能干的修理工。那时寨子里不管谁家有什么机械的、电子的东西坏了，就来叫他去修。当时寨子里连电都没有，也就没有什么复杂的家用电器，要修的就只是缝纫机、座钟、电筒、半导体收音机这几样，大多是在转动部位上点油，在接触部位刮刮锈，就又能对付用一阵子，老地也就这两下子。但在大家心目中，却将他看得“能干”得很，特别是广播搞成后，更是不得了。老地也有点喜欢戴高帽的虚荣心，不管谁来叫帮忙干什么，立即就去。他们使唤老地惯了，就连水井上的桶掉下去，也都叫他下去捞。

知青们到县城农机公司买来柴油机、碾米机，开始安装。

发动柴油机的问题不大，掌握碾米机也没有问题，要把它们固定住，却成了大问题。当时根本找不到钢筋和水泥来打地基，而在泥地上却不可能固定住它们。只有一个办法，在地里埋进一块大木头，将机器固定在上面。本来只须伐倒大榕树的某根义根就足够了，但谁也没提这种建议。傣族将大榕树视为神树，自然不会产生这种念头，而知青们也已将大榕树视作本寨的象征，也不会想到利用它。最终决定伐倒寨口的两棵原准备做渡槽的树，用大铁爪钉钉在一起，做成一个木地基，机器才勉强固定住。

碾米机房开工了，弄迈的妇女们再不用起个大早舂米，老地也算将功折过了。附近的几个寨子的妇女也都挑着谷子来碾，因为来弄迈比到公社要少走许多路。刚开始免费碾，后来来得多了，队里便决定，为外寨碾米要收点加工费。因为收费标准比公社粮站低，加工质量好，服务态度也好，随到随碾，因而生意越来越红火，一个月下来，也收了不少钱，这到有点出乎队里意料。

每天早上，老地被头顶处“篷、篷”敲墙板和“老地，路啦（起床啦）”的声音惊醒后，在来碾米的妇女的监督下洗漱完，然后边吃她们带来的糍粑之类的早点，边开始碾米。

如果老地去干别的事外出未归，就指定由老豆代替他。

傣族妇女们都说老地碾米的技术比老豆和公社粮站的工人高，老豆一直不服气，说老地是靠的投机取巧。其实老地那叫掌握顾客心理，能让她们满意。他的诀窍是碾最后一次时，将出口调小些。由于粮食充足，傣族从不计较出米率，只喜欢出的米干净、洁白。这可是要有点技术才做得到，调得过大，糠麸去不干净，调得过小，米会被碾碎，一不小心还会导致柴油机出故障。

老地以此雕虫小技博得了众多毕少的青睐，连那个长得最好看但自视清高不爱搭理人的毕少，也时常来碾米房有意地找话说，而且两次主动的要老地把脏衣服让她洗，老地怕她将衣服纽扣捶坏，没给她，她似乎还很不高兴。老地的衣服向来是由老社夫人承包的，相帅也洗过。傣族妇女洗东西不用肥皂，是在水边用根木棒反复的捶，一不注意就将纽扣打碎了。

老地担任弄迈“粮食加工厂”第一任厂长时，还兼任着广播员、账房先生，成为弄迈唯一的脱产人员，从此不再参加除春耕、秋收之外的其它田间劳动，工分却是最高的。每天12分，相当于人民币4角8分钱，月工资达14元4角，差不多与头一年国家给知青的安家费相等了。大家说老地懒人有懒福，老地向他们传达“最高指示”：懒鬼、只有懒鬼，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因为老地起得晚，早上的广播从来都是由老社代劳，老地只管中午和晚上。

如果有谁到队里的菜地、瓜地摘了菜，就来找老地给记上帐。碰到队里杀猪宰牛做碗豆粉这类事，老地就去守在一旁，记下哪家分了多少。记帐主要用于秋后分红时扣钱用。有个别劳动力少的家庭，秋后算工分不够扣时，就挂着帐，分东西照样要分。

傣族似乎是以原始社会的方式来进行物质分配的，分东西公平地按人口多少来分。知青们是寨子中人口最多的，分到的东西也就最多。

如果猎到野物，分配的原则便是见者有份。



《榕树魂》——

豹子、狗、鹿子

豹子

一天晚上，老地独自一人顺着后山的小路从外面回来，刚走到寨子后面大榕树旁，直觉告诉老地，身后有什么东西。他猛然转身，电筒往后照去，只见到竹丛里露出一只动物的后半截，瞬间便闪进了竹林中。他的第一印象以为是金环蛇，但立即又否定了，他记得特别清楚，那有着黑花环的棍状物是在空中摇晃着的，他最终认定那是一只豹子的尾巴。

回到宿舍跟大家说起来，谁都不相信，说豹子不可能跑到坝子里来。他只好不说了。睡到半夜，老地被门外的声响弄醒了，听声音像是哪家的猪又跑来舔知青们的锅了。知青们的厨房破的连门都没有，晚上常有没关好的猪跑来舔锅，小花子听到便隔着房门一阵狂吠，老地便起来把它放出去教训那些可恶的猪。奇怪的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那小花子躲藏在床下，一声不吭，装做什么也没听到。

老地悄悄起来，拿起电筒，弯腰想叫小花子出来，它却缩在床角落里，不肯出来。听到外面的声音已经停了，怕那只猪不受惩罚就溜掉，他便抽出插在竹篱墙上的长刀，轻轻打开门。门外什么都没有。他走出门廊，忽然感到左侧有谁在注视着自己，并且感到那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他急转身，右手握紧刀，左手快速打开电筒，第一眼看到的，又是那条有黑环的尾巴。这次，一瞥之下，他完全看清楚了，的确是一只花斑豹子。它正面对着这边，满身斑点的身体微微向前伏下，尾巴直挺挺地竖着，最引人注意的是那双闪光的黄眼，在黑暗中紧盯着人。老地楞住了，也同样一动不动地盯着它的双眼，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神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最终，打破僵局的是小花子的一声咆哮，它终于勇敢地站到了老地身旁，紧贴着他的腿，身体在簌簌发抖。突

然间，那豹子头一偏，轻盈地向右侧跃起，窜出电筒的光圈，隐入黑暗之中，动作之快，使得老地根本来不及反应，等到电筒光柱再次晃过它时，只见它的背影已没入竹林之中。

老地松下劲来，才发觉浑身已大汗淋漓。

小花子的狂叫声，惊起了众人。见到灶前留下的梅花形脚印，大家才相信的确有豹子来拜访过。

次日一早，有个傣族老乡来告诉知青们，会计家的猪丢了，他说肯定是豹子叨走的。知青们去看，猪栏里满地梅花形脚印，奇怪的是猪厩栅栏并没有损坏，豹子是怎么将那只至少100公斤重的肥猪弄出去的？傣族老乡说豹子厉害的很，它跳进猪厩，咬着猪耳朵往上提，逼着猪爬在栏杆上，它低下头钻到猪胯下用劲一拱，就把猪拱到猪厩外面去了。然后，它会叨着猪耳朵，用尾巴赶着猪走，带到目的地才将猪咬死。

下午，全寨青壮年集合，老社和会计手持从大队民兵连借来的两支老掉牙的步枪，其余人则人手一把长刀，从寨口开始进入竹林围剿。进去前，老社一再交代，说豹子可能还在竹林里，叫知青们千万不要单独活动。

老地也提着马刀，带着小花子跟大家一起钻进竹林。

刚进入竹林不久，小花子似乎发现了什么，不断地叫着，显得特别兴奋，跑在大家前面。老社说它可能已经闻到豹子的味道了，让大家跟着它，做好战斗准备。小花子带着众人来到一蓬长得密不透风的矮竹丛前，就不再往前走了，不停地朝里面狂吠。隐隐约约只见里面深处有一大堆竹叶，大家都说豹子肯定是在里面了，便团团将那竹丛围住，但谁也不敢进去。老社决定先朝里面开上两枪，便让大家准备好，他就开始摆弄那支破枪，弄了好半天却拉不开枪栓。酋长急了，一把抢过枪来，极熟练地打开保险，上膛、瞄准、开火，两声震耳的枪声后，里面毫无动静。等了好一会儿，老猫又拿会计的枪朝里面打了一枪，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大家说可能豹子已经跑回山上去了，老地叫小花子钻进去探查，这家伙就是不肯去，于是大家又认为豹子可能还在里面。老地经过昨晚跟豹子单独对峙后，胆量大了许多，何况现在有那么多刀、枪在手的人陪着。他鼓起勇气，挥刀砍出条路来，钻进竹丛，朝那堆竹叶走去，酋长等人举枪瞄着，紧跟在老地后面，那不争气的小花子，则仍在外面乱叫。

小心翼翼地走到竹叶堆前，仍然没有什么动静，老地慢慢伸出刀刺探，发觉里有东西，从触感判断，是个动物。老地心跳得像要蹦出来似的，急忙收回刀，做好应战准备。那堆竹叶里仍然毫无动静，老地仔细观察，被拨开的竹叶下好像有片黑糊糊的东西。他再次伸刀过去，将竹叶向两边扒开，下面的东西露了出来，定睛一看，是只死猪。经会计辨认，正是他家那只失踪的猪。那猪只被豹子啃掉了半个脸颊，身上则中了3枪，其它部位完好无损。大家抬了死猪，收兵回寨。会计宣布：这只由豹口夺回的猪归公。就这样，凶手未抓到，被害者被分而食之。知青们打死猪有功，分到了一大只后腿。那小花子也怪，连猪骨头都不敢啃。

小花子

围捕豹子后没几天，小花子便出事了。

半年时间，这小家伙已经长得比板凳还高了，扑过来拥抱人时，人就得立即站稳点，否则就会被它扑倒在地。老地已经将它训练得叫坐就坐，叫躺就躺，扔出的东西那怕是扔在水里，它也会立即跳下水去叨回来。

可能是从小就跟着老地的缘故吧，这小家伙特别受不了老地的责备。其他人打它骂它再重，它满无所谓。老地对它那怕只是轻轻地喝一声，它便双耳贴在后脑，伏在地上，两眼委屈万分地盯着主人。虽然它名叫小花子，却似乎很有自尊心。

那天半夜，知青们正偷偷地啃吃白天钓到的一只公鸡，老二不注意踩了正在啃骨头的小花子的尾巴。那小花子也是好久没沾荤了，正大快朵颐之际，忽遭袭击，本能地反身一嘴，把老二的脚脖子咬出了血。老地勃然大怒，几脚将它给踢出了宿舍。其实它刚咬过就知道错了，立即趴在老二面前直摇尾巴。老地决定好好地惩罚它一下，不许它再进屋，它也就乖乖地在门前趴了一夜。啃过的鸡骨头扫在一起，堆在床下，它一直没敢进屋来吃。

第二天一早，众人刚要出工，它摇着尾巴跟了上来，老二想起昨晚之事，气还没消，踹了它一脚，不让它跟着。它一声没敢叫，可怜巴巴地又趴在地上。大家走时，它有点犹疑，还想再跟，见老二又要抬脚踢它，才磨磨蹭蹭地缩进宿舍去了。

中午收工时，远远地就见它站在寨子口大路中央，迎接知青们回家。老地走在收工队伍的靠后位置，没看清楚，只见它嘴里叨了个什么东西跑到老二面前。随即，傣族老乡便指着小花子惊叫起来。

它叨着寨子里最大的那只公鸡，那只骄傲的公鸡显然已经死了。

傣族们认为各家的鸡时常神秘失踪的疑案至此真相大白，并一致要求严惩凶犯小花子。众怒难平，也为了使得钓鸡的秘密得以永远隐藏，老地只好忍痛将主动为知青们背黑锅的小花子，流放到其他寨子去，由那儿的知青领养。可是，连送三处，甚至送到隔了两座大山的勐板寨，它都跑了回来。

当请其它寨子的知青第四次来牵走小花子时，老猫将大家的决定转告给老地，他们决定把它流放到肚子里去，这样它就跑不回来了。老地也感到无可奈何，只能认命了。

小花子的死刑由丙乃寨的知青执行，他们派人来叫弄迈知青去吃，但谁都没去，连不管什么肉都不放过的老二也坚决不去。

从此，老地再也不沾狗肉。

捕猎

有一天早上，弄迈出工的人群刚走出寨口，就见到西边邻寨的人成一线排开，手里舞着锄头、扁担冲了过来，“打呀、打呀”喊声震天。知青们还以为两个寨子要发生械斗了，仔细一看，在他们前面跑着一只小动物，被追得无路可逃，只好朝弄迈这边跑过来。

大家正不知怎么办，只听得老社大叫：“大家都让到路边”。傣族们纷纷听令跑到大草坪靠大路的一边，知青们也就跟了过去。等那小动物跑近，老社一声大喊：“快追”，众人就大叫着追了过去。

那逃命的小东西转个了弯，迎面却碰上池塘，只好又转身顺河边跑。知青们起步晚些，它正好朝知青们左边跑来。这时众人才看清楚了，那是一只惊惶失措的小麂子，正飞快地朝竹林跑去。老社要大家让路这一招相当厉害，弄迈三面环水，那麂子被赶进了寨子后就只有死路一条。当知青们反应过来后，便从斜面朝麂子猛扑过去。论短跑速度自然是老龙最快，他几个箭步就跑到离那麂子右侧不远处，但那小家伙四条瘦腿一跃就是好几米，眼看已经不可能追上，情急之下，老龙将手中的竹扁担像投标枪似的甩了过去，真有如神助般，那扁担不偏不倚地正中麂子的后腰，将它打倒在地。两个寨子的人欢呼声刚起，只见那小东西在地上滚了一圈，跳起来一闪便进了竹林。

两个寨子的人合在一起，排成一线，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反复对竹林进行搜索。可那麂子跟钻到地底下去了似的，硬是没了踪影。大家只好鸣金收兵，败兴而归。

这是知青们第二次参加围剿竹林了，搜捕豹子那次是第一次。知青们都在说，如果小花子还在，10只麂子都找出来了。老乡们听了后，似乎很有点愧色，就像小花子是被他们吃掉了似的。

午饭后，酋长叫去几个人锄锄菜地里的草，众人钻了一上午的竹林，只想睡个午觉，谁也不应声，他便气咻咻地独自去了。没过多会，他便回来了，大叫大喊地把大家叫醒，只见他脚下躺着那只小麂子，口鼻流着血，已经死掉了。

原来那麂子就躲在知青们菜地里，因为酋长种的包谷长得跟小树似的，它藏在里面的确很难发现。酋长走到离它只差一步远时才发现它，它可能是累坏了，也可能是吓破了胆，趴在那儿不跑，只抬着头看着酋长。

要是换了老地，肯定是扑上去死死抱住，活捉回来试着驯养。当然也极有可能是一扑不中，便被它跑掉。酋长可没那么多想法，从不杀生的他，一时冲动，顺手一锄，便结果了一条小生命。

老地把老社叫来看时，老猫正准备开剥战利品，老社忙叫他住手，然后告诉知青们关于“搜山打猎，见者有份”的规矩，知青们只好忍痛交出麂子。

下午，邻寨的队长被叫了来，分走了半扇猎物。然后，寨子里各家都分到了巴掌大的一块麂子肉。因为麂子是酋长猎获的，所以知青们受到特别优惠，分到后腿部的一大块肉，还得到了麂子皮。

肉被老猫炒了个美味无比的名菜“宫爆麂子肉”，皮则被老豆细心地用硝鞣好，做成一只皮包，四只脚刚好是背带，式样还很时尚。那包后来不见了，也不知被他送给哪个意中人了。吃饭时，知青们一边毫不留情地批斗酋长，声讨他残忍地虐杀如此美丽的小动物的暴行，一边忙着吃麂子肉。酋长开始时还真有点内疚的样子，等看到这帮厚颜无耻的家伙们的吃相，才明白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想让他不忍心吃，燔然醒悟之后，才急忙下箸抢那所剩不多的美味。

这是知青们常用的伎俩，碰上有好菜而又不多时，男知青们会开始说些让人极其恶心的事，目的是让女生或老令等人吃不下去。不过后来这招不灵了，女生们久经磨练之后，不但照吃不误，还会有意挑逗别人说话，等到那用尽心机说的滔滔不绝的人想歇口气时，才发现菜早已被那些装作极其难受的听众吃得一干二净了。



《榕树魂》节选

分家

下乡快一个月时，知青们住进了宽大的新房子。碗口粗的竹子当柱子、很厚的草顶、用泥糊过的竹篱笆墙、夯实了的土地，成为知青们一住多年的家。房子是队上给建的，里面的床呀、桌子、椅子等家具就得靠自己了。女生们请傣族汉子们帮做，男生们则借来工具，自己动手来做。制作材料当然是都竹子的，反正竹子有的是。老地为自己设计制作了一张很大的竹床，样式似乎是仿故宫里的龙床。一只小木箱子放在床头，成为小书架。床前开了个很大的窗口，窗板设计成向上推开，用根竹竿撑住那种古代式样的。窗前搭了张竹桌，桌面是带皮的竹板做的，看着好看，但写东西时得在纸下垫本书才行，因为桌上的缝太多。桌上的油灯也是用竹筒做的，烧的是煤油，几天就把白蚊帐给熏成灰色的了。

大约两个月后，老古又来了一趟，知青们饭来张口的好日子由此宣告结束。

他把知青们召集起来训了次话，大意是他们很不像话，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一直要贫下中农给煮饭。他宣布，从这天起，每天轮流留两个知青煮饭，由傣族大妈教知青们几天。他翻译了老社补充的话：留下煮饭的人社里同样给记工分。然后又说了一通，看看，社里对你们多照顾，你们要好好干之类的话才走掉。

刚开始学做饭时，是女生打头阵。几天下来，做的很不错，有一两顿还吃到了地道的昆明口味，大家都很满意。傣族大妈们认为知青们已经能独立了，她们就撤了。

开始轮到男生做饭了，质量立即明显下降。女生们开始抱怨，但又不愿意由她们多轮几天。也有人建议一男一女搭配由女生主厨，男生当下手，但女生不表态，男生也不愿当下手。

这天，终于轮到老地和老令两人做饭。

看不出来，老令挺有主见。全靠了他，早饭顺利地开出，大家似乎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老地听见有两个女生说饭硬了点，于是就告诉了老令。

下午煮饭时他们就多放了些水，煮上米后就去菜地摘莲花白（卷心菜）。回来发觉火熄了，于是手忙脚乱地开

始生火。老令对付那一大锅饭时，安排老地洗菜、切菜。老地摘出两棵莲花白菜叶，看着挺大的一堆，想来是够了。于是洗净后一阵乱刀剁碎，倒入锅内，加水、加油、加盐，再把老令上午就切好的一小碗腌肉倒进去。

几分钟后，一大锅菜萎缩得只能盖住锅底，铲起来只有一小盆。

要做别的菜，已经来不及了。而这唯一的一小盆菜，肯定不够吃。正在此时，大家收工回来了，老地急忙把酋长叫进厨房。

酋长看看盆里那些颜色欠佳的菜，果断地说："先分菜，再炒些"。

惯例是有好菜或菜不够时即用小碗盛出，两人一碗，谓之分菜。

酋长、老令两人开始收拾菜，看着那些刚从地里摘来的菜挺干净的，反正也来不及了，于是免洗开切、下锅快炒，腌肉没了，就只炒素菜。

老地急急忙忙的用碗把菜分出来，桌子上放不下，就端到门外放在地下，一点没留心到不远处就有一堆新鲜牛粪。

男生没女生事多，一窝蜂先来了。酋长命令大家等一会儿再吃，让女生先吃。于是男生们就敲碗待命。

女生们来了，看看地上的菜，又看看牛粪，谁也不端碗，只好让她们等下一锅。

男生们也就不讲什么客气，端过碗来，两人一伙，就地坐下就吃。刚吃几口，就说饭是夹生的。老地急忙去看，果然，当中还有米粒。

好在饭煮的多，酋长叫大家顺着头上熟了的盛。

没多会儿，第二锅菜炒好了，一大脸盆端了出来，不限量。

不知怎么回事，女生都只盛饭，不吃菜，端着碗就回宿舍了，看来是菜没洗就炒让她们知道了。女生多半在自己宿舍藏着点咸菜甚至罐头之类的"私房菜"，所以她们端着饭碗回宿舍去吃小灶。

到了晚上，女生们把酋长叫去了。过了好一阵他才回来，让大家到社管会开会。

到了那儿，女生们早已坐在里面了，脸色比红色娘子军还严峻。男生们不明就里，坐下来等待家长发话。

酋长首先发表了自他上任以来最长的演讲，反来复去就说今晚菜不够吃、没洗菜就炒、饭煮的还夹生，是因为老地和老令头一次做饭，没经验，请大家原谅，主要责任在他，没早点回来看看。男生们笑他小题大作，不就是一顿饭没吃好嘛，有什么呢。

等女生们开口时，男生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们尖锐地指出了男生们做饭的很多问题，不卫生是重点、味道差其次。等到她们郑重地提出了分灶吃饭的主张后，男生们才知道事态严重了。

酋长表情严肃地说："要分家的，请举手。"

多数女生、个别男生举手。

一阵沉默之后，酋长问带头提出分灶的女生："怎么分？"

女生们胸有成竹的提出了分家的方案。她们要求，把生活费（每人180元）、劳动工具分到个人头上，大家自由组合组成新的家庭，还提出了对那些厨房用具的分配方案。

知青们这才明白她们是有备而来的。

酋长宣布："不愿意分家的算一家，现在散会，各家回去选出家长，明天由各家家长讨论具体分法。"

从这天晚上起，弄迈寨子这户人数最多的大家庭分裂成5家。

不愿分出去留下跟着酋长的共有10人，算是最大的一家，分出去的几家分别都是由姐妹兄弟或要好的同学组成的，人数都在3人以下。

盖房的时候，就已经按各人的要求隔成了好几间，可以说搬新房就已经为分家作了准备。分家之后，10个人的大家庭仍占用原来的灶房做饭，其他几家则各自在宿舍前搭出小厨房另起炉灶。

社里也不再给留下做饭的人开工分了。

大家庭

何许应了人多好吃饭这句话吧，10个人的这一大家子人日子过得挺不错的。

这是个完全自愿组合起来的家庭，7男3女，所有人互相都以老某相称呼，男生有老令、老猫、老八、老龙、老豆、老地。酋长也有个老什么的称谓，不大好听，就此不提。女生则有老平、老沙、老蒜。

在这个大家庭中，实行的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上各取所需和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完全民主，或者可以称做完全无政

府主义制度。家庭中没有私人财产，谁家寄钱、寄物来都是大家的。任何事情集体决策，谁的主意得到认可谁就是行动负责人。头还是有一个的，家长还是酋长，只是他责任无限，权威却有限，部下不听招呼，他好像也不在乎。

大家庭人多，劳动力充足，专业分工明确，煮饭的、打柴的、种菜的，甚至有专司钓鱼的，反正是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像老地就只能干些饭前烧火、饭后洗碗之类的事，永远上不了掌勺的地位。

通常是由老猫率领女生在家做饭，由他掌勺。他的名堂最多，变着法的做，光是藕就可以做出四、五种样来。他曾经用纱布包着藕块用劲绞扭，沉淀后晒干，生产出纯正的藕粉，极受女生欢迎。他还用锅把咖啡豆炒香，然后拿到傣族家用臼舂成咖啡粉，煮好以后用纱布过滤，倒上一点从外国街子买来的炼乳，好喝的很，真正的纯天然咖啡，不比现在的什么雀巢伴侣差。

老猫做菜的手艺极佳，但前提是要有菜。毕竟经济窘迫的大家庭大多数时间处于缺菜、少菜的状态，老猫也就只能做无菜之炊了。

最困难的时期，时常是几个干焙辣椒当菜，烧一大锅只放了味精和油盐的白开水，被戏称为鸡汤，就此打发一顿饭。

按常理来说，女生们除了做饭之外还应当承担点洗涮缝补的任务，但是男生的衣服卫生基本上已经由傣族大妈、大嫂们承包了，她们也就不必勉强去学雷锋了。

游猎和农耕

跟原始游猎部落一样，男生的职责是外出找吃的、烧的。

粮和油都不缺，瑞丽从不缺粮，油则可以到缅甸街子去买，猪油、菜油都很便宜，所以外出搜山打猎的男生们的主要目标是找肉类、蔬菜和烧柴。

茂密的竹林、两条小河和方圆数十里的荷塘，给知青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烧柴，钓鱼、捉黄鳝、抓田鸡、捕鸟、挖藕、砍竹笋、摘野果、采野菜，都是知青们每天收工后的必修课。偶而，方便的时候，也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比如说用钓鱼钩钓老乡的鸡，半夜去其他寨子偷菜、偷柴禾之类的事时有发生。

他们能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做渔民，把一块少说也有两亩水面的荷塘汲干，抓上两大箩筐鱼。再用一下午的时间做矿工，挖开塘泥，掘出几大箩筐莲藕。也能用几夜时间成为猎人，到沟边捕杀上百只的田鸡，挂在墙上晒干。然后邀约外寨知青来，搞次百鸡宴。

傣族老乡只要发现什么地方有蛇，立即派鹿旺仔赶来报告，男生们就出动去抓回来，晚上大家就得以喝到老猫烧的极美味的蛇汤了。

酋长可能认为，按社会发展史观，游猎部落没有农耕社会先进，决定搞块自留地来种植蔬菜。

刚开始时全家总动员，野心勃勃地在沟边犁出很大的一块菜地，反正这里的土地多的是，只要有劳力，想开垦多少都可以。酋长发动大家都给昆明的家人写信，要求紧急寄蔬菜籽来。家人纷纷响应，大包小包寄来不少。结果，大老远寄了来，密密地撒了下去，大多数却出不了苗，被林子里的鸟儿把种籽刨出来吃掉。酋长不甘心，吃掉一次就再撒一次，反复数次后，老地、老龙等人烦了，不干了。他们恶意指责酋长搞资本主义尾巴，并以此为借口逃避繁重的农耕劳动，继续那轻松刺激好玩的游猎活动。酋长指挥不动这几个懒鬼，只有老猫、老豆、老八和女生们支持他。

为了跟酋长对抗，老地也在宿舍对门路边开了两块只比双人床稍大点的菜地，密密地撒了些昆明带来的白菜籽。播完种后他通知各位男士，晚上倒洗脚水和撒尿不必摸黑上知青厕所了，让他们就近冲这儿泼撒。后来这些白菜长得挺大的，只是包不起心来，大概是让尿给烧的。大家吃的时候带点儿疑心，硬说有点怪味儿。

酋长对他的菜地可谓呕心沥血。

他第一次从知青专用厕所捞了一脸盆粪便，端着穿寨而过去浇菜地那天，全寨子的傣族都呕吐不止，事后向知青们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当时，傣族从不往地里施任何肥料，而且最恶心人粪）。

还有一次，酋长要去浇菜地。有人告诉他马上快下雨了，他本能地戴上顶篾编雨帽，挑起水桶就走，直到雨下大了还没见他回来。为此，老地还创作了一幅酋长冒雨浇菜地的铅笔画赠给他。

有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加上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还有酋长的苦心经营，知青菜地获得了局部的丰产。种籽好，又施肥，菜也长得比傣族老乡种的要好。知青们给每家老乡都送了点西红柿、柿子椒、包谷、茄子，他们尝过之后大为夸奖，也不提什么大粪的禁忌了。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赏识，酋长心里肯定美得什么似的。

说到送菜，知青只送了那么一点给老乡，老乡们却是长年累月地时常送给知青。男知青深得各位傣族大妈们的关心，时常能得到些好吃的菜。吃的时候，知青们会习惯地说：“老某家篾巴送来的”，说者无心，听者也不在意，很是自然，就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家庭，兄弟姐妹们提到未来的亲家母似的。

老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8



《榕树魂》：

人生如梦

睡梦之中，老地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昆明。被工作、婚姻、孩子、房子、疾病等等一连串不顺心的事缠绕着，弄得心力交瘁。

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个恶梦还是现实？想睁开眼睛，两片眼皮像铅铸似的沉重。想大叫一声，却张不开口。他感到全身都麻痹了，一点都动不了。他心里也知道这是睡午觉时经常碰到的梦魇，不必惊慌，继续睡下去会醒过来的。

老地却不敢醒过来，生怕梦醒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醒来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年过半百仍一事一无所成，每日还得为全家衣食而奔忙的穷酸老汉，那么还是就这样酣睡着好了。

可是这梦越来越沉重，梦中他和弄迈其他知青越来越艰辛的经历，与这群十八、九岁的年青人躺在大草坪上，嘴里嚼着一根苦中带甜的草根，看着蓝天白云和在空中翱翔的成群的翠鸟，所憧憬幻想的美好人生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梦中，老学究正用扑克牌算命，他指着一张梅花2对老地说：“你一生中将碰到无数的小人”。转眼间，老学究的脸说变就变，从一个精瘦的年青人变为一个头发花白的瘦老头，两眼从老花眼镜上方盯着大家，叹息一声，缓缓的说：“我们大多数知青的弱点，在于轻信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我们老是以为，跟我们合作的人都像傣族一样善良”。

老地梦见他那些患难与共的知青朋友们，和他一样在光怪离陆的大千世界中沉浮挣扎，饱尝中伤、暗算、背信弃义等等卑劣行径的伤害，强忍着冷嘲热讽、世俗偏见、无端妒忌的折磨。他看到他们那忧郁的眼睛，听到他们那隐含着深恶痛绝却又无奈的叹息。这种压抑着的情感，与知青们18岁时那个中秋之夜相比，已经变得极其深沉。

在梦中他们相聚在一起，去看望生病的老豆。兄弟们相见，长吁短叹，老猫、老八、老令、老二等人从国营企业下岗之后，年近花甲仍得到私企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与老地一样从事业单位提前退休的酋长，情况相对要好一些。而回城后在街道集体企业就业的老豆，家里是名符其实的家徒四壁。

坐在老豆家那张两层床的床沿，看老豆憨厚地笑着发烟给大家，嘴里嘟囔着“烟不好，见笑了。”老地悲哀地想到，如果老豆也学老超，不回昆明，找个傣族毕少成家，他也许不至于生活得如此艰辛。刚想到老超，就见那个不愁衣食、当了爷爷的老家伙正坐在一棵芭蕉树下开心地笑着，那种清澈的眼神显得无忧无虑。在那个小县城里，老超是个受人尊敬的技术权威，人人都认识他，而他距离所谓的“文明”并不比回昆明的知青们远，在他那所宽敞的大屋里，电话、电视、网络俱全。可是如果老超选择回昆明又将会如何呢？他绝对比任何人都要聪明，如果回到昆明，他的“路”有可能会很“顺”，考上大学，毕业后分到一个好单位，当个技术官僚，分大房子，坐小汽车，甚至很有可能出国洋插队。这不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成功么？可谁又敢担保呢，难说他也跟老豆一样，被捉弄人的命运安排到某个街道集体企业，就可能会像老豆一样，艰难一生。

在这恶梦之中，老地看到的是世人的冷漠、麻木不仁，权势的强横霸道、傲慢，势利小人的虚伪、厚颜无耻。还有所有诚实、善良、正直的好人们，所受到的不公正、非正义的对待。他亲身体验到那种想怒吼、想发火却又找不到对手，甚至无人理会的绝望，有如陷身于那令人窒息、想动一下却又无处施力、触手便滑开的烂泥之中。

他感到肺部疼痛异常、喘不过气来，头像要裂开似的疼，胸口发闷。这恶梦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它让他恐惧，使他悲愤，令他痛不欲生。它已经夺去了他的大半生，不能再让它控制他的下半生了。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结束它？

这一代人也太不幸了，连梦都不能好好地做个顺心一点的。

恍恍惚惚中，眼前浮现出四个大字——“人生如梦”。

一场梦整整做了40年，人生又能有几个40年？

在梦中，年过半百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又回到了弄迈。来到18Km路碑处，他们大吃一惊，那标志到家了的巍峨的大榕树不见了。再一看，迎上来的人群中，已然少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乡亲们哭诉道：大榕树被虫蛀空了，就在老社去世的那天，大榕树訇然倒下了。

当着离别40年的老乡亲们，知青们不再讲究成年人的刚强，将那憋了整整40年的泪水，一泄如注，痛痛快快地倾撒在了大榕树那刚开始萌发新芽的残根前。

这一哭，惊天地、动鬼神，恸倒了多灾多难的一代人！

在老地布满创伤、已经麻木了的心灵深处，只留存着一点微弱的希望：

希望这一切只是19岁时，做的一个黄粱梦。

梦中，有人轻手轻脚地走过来为他掖了一下棉毯。

多么希望来为他掖棉毯的仍是那慈祥的老社夫人而不是已经当上奶奶的相帅；多么希望醒来时火塘里焐着的牛肉干还在，吃完牛肉干还要出去找相帅和柚子西施“报仇”去；他想伸手摸一下身边的竹水枪还在不在，希望它还在那儿，而不是他给相帅的孙女买的那支塑料水枪；希望在楼下等着与他泼水嘻戏的，是青春年少的相帅，而不是那个刚会走路的小家伙。

梦还没有醒，也不想醒。老地沉重地翻了个身，希望将这场梦从头做起，圆一场令人愉快一点、欢乐一点的好梦。

空中隐约传来柔和的音乐，那曲调似乎很熟悉却又叫不出名来，旋律有点像《命运》般悲壮，却又逐渐转为舒缓、平和，令人心旷神怡。那世间凡俗的喧嚣退却了，周围一片宁静祥和。

终于，奇迹出现了，大榕树在他的梦境中现身了，它仍然是那样高大，一队白天鹅在它身旁盘旋，青春焕发的知青们欢天喜地，忘情地扯开嗓门大声地呼唤：

“哦……嗬……嗬……”

后记：

1996年泼水节，瑞丽城街头挂着一条横幅标语“每逢佳节倍思亲，亲人就是老知青”，应邀前来这片被他们称作第二故乡的热土过泼水节的老知青们，猛地一抬头见到这条标语，顿时热泪盈眶。

为纪念那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所谓“上山下乡”运动，憋不住写了这样一篇东西。

作者申明：本书的人物和故事情节，有相当大的部分取材于本人的、本人的朋友的以及朋友的朋友的经历，还有一部分则是梦中见闻，倘若当中有何处描述触犯了何人，均属本人无心之为，还请原谅则个。

一九九九年元月二日完成初稿、二零零八年七月二日改定

《华年》节选

想当初（一）



（1）

到草原已经几年了。原来雪白崭新的蒙古包经过风吹雨淋，毡子已经发灰变薄，一些地方已经有过修补；由于狗经常进包偷嘴，门也被这些畜牲扒坏了；包里只有两个人，搬到后如果是冬天，还要铲羊盘，仓促中包搭得歪歪扭扭，很不好看，牧民家虽然大多也是旧包，但搭得浑圆和谐，所以老远就能分辨出哪个是四和尚（蒙语：知识青年——思赫腾的谐音）的家。我们队有八座“和尚庙”呢，放着八群羊，几乎占全队羊群的一半。本来每群有三个

四和尚，可是除了春天，总有一个外出打杂。有的学生包也住着知青马倌，他们要算寄居喽。

每逢换季的时候，差不多住上一星期就要搬家。每到一地先要捡粪，下雪前常常还得挖井，好在一人多深就出水了，井往往是下夜时在包附近挖的。当一切就绪，喘息方定的时候，就又得准备搬了。在这无休止的搬迁转徙之中，多余的东西扔了，新东西旧了，旧东西破了，家业凋敝，无暇重振，生活也过得马马虎虎。有一次赶牛车买粮食，煤油洒了，浸润了面口袋。场部很远，不可能马上腾出人再去买粮食，于是不能蒸馒头，只能烙饼，以期煤油得到充分挥发，但面里的煤油味还是去不了。没灯油了，我们发明出一个办法：把羊粪蛋放在炉盘上烤着，不一会儿就发出幽蓝的火苗。我们并不在乎有烟，因为包早就熏黑了。这种“吃煤油，点羊粪”的日子，我们过了半个多月呢。一年秋天，粪都湿了，只好烧报纸炒面吃。还有一次是冬天，没牛粪，冻羊粪在炉子里沤着烟，趴着吹，捅了几小时也不奏效。干嚼炒米吧，砂子太多，去他妈的，吃这一把就够了。“火着上来了，饭快焖得了。”当M君惊喜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的时候，已经是夜里１点了。那时，穿的也很随便，我们的汉装，有的袖口像狗啃的，有的衣襟上缀上了流苏；冬天，我们的蒙装不但破，而且下摆比地皮还黑，因为轮流做饭，端锅时不免要蹭锅底，吹火要趴下，袍子的下摆就成跪垫了。但我们很愉快，很乐观。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我们都积极地在包里包外收拾整理，还要搞四和尚聚餐呢。

有诗为证：

满天风雪一月末，眼看春节要来了。

心里盘算怎么过，脑子渐渐出轮廓。

学生风格要独特，不比摆设比利落。

毯子遮住被子破，割草再把扫帚做。

每月十三不算阔，也要省出买年货。

各包聚餐挺不错，只是碗少难请客。

两袖清风绕胳膊，坎坷不减眉间阔。

学生历来有其乐，穷日子当成富日子过。

要做注脚的是“每月十三不算阔”和“两袖清风绕胳膊”。当时我们还没记工分，刚立包时每月发１３块钱生活费，买粮食、茶盐、衣物和零用，真不算阔气。“两袖清风”并不是标榜自己的廉洁，而是因为得勒袖子破了。

(2)

不惜漆费，淋漓刷马背。

马在群里认不准，人急必出智慧。

风吹雨淋不褪，这个主意真对。

偏被牧民耻笑，都说马主真水。

我们队的四和尚都是第一年就立包放牧的，每人四匹马。换马的时候，骑着马在群里转来转去。几百匹马纷纷乱乱，觉得这匹眼熟，那匹面善，另一匹也似曾相识，可是又都值得怀疑。只好求马倌指出。碰上个爱开玩笑的马倌，便被奚落一番。后来，一个四和尚小Y发明了一招，他得意地用绿漆涂抹了马背，马在群里非常显眼，牧民们看了都指着笑话，说他“水”（即不顶用没本事的意思）。可是，对于当时的四和尚来说，这难道不是高招吗？

不但不认马，有时还不认牛。往往牛拴到车上，牛主就找来了，只好赔不是。每次用牛，轰到包跟前，总要大家鉴定一番，看看是不是弄错了。有一回小M轰来一头牛，牛绕着包转，就是逮不着。大家非常奇怪，怎么最老实的红牛今天犯起刁来了？大家站住，又一次进行品评。老L说：“嗯，样子倒对，就是看着像是小了一圈。”小M说：“没错，我在群里转着看了，这样的牛只有一头。”结果呢，到底是没抓住——原来，这牛是一头大生个子。

不过，到后来，我们也都有认马认牛的本领了。

(3)

刚到草原时，看到所有的家当都放在牛车上拉走，感到很奇妙，很好玩。但领略了其中的滋味后，感觉就变了。五六辆牛车走在搬家道上，一个人轰羊，一个人驾车，许多意想不到的噩运都在前面等着。家在车上，往前看，空无所有，往后看，已成遗迹。天空地阔，旁无救援。搬到了，刚住稳，又得放弃刚建成的安定生活，再向前去。游牧生活，就是在这种动荡中度过的。这使四和尚修成了独立奋战，对任何颠簸变异安之若素的能力。在数不清的搬家中，令人最不能忘怀的是那年冬天，在白毛风和深深的积雪里搬了一百多里。车顺的人家搬了五天，不顺

的搬了一个星期。那一次羊损失得非常严重，以至于有一家要专门用一辆车拉自己群里路上扒下来的羊皮了，摞得很高。途中住的是陶包（蒙古包顶做骨架支的临时包）。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白毛风吹得早上无法叠顶毡……但终于还是搬到了。

这是一组记录那次搬家的诗：

1．准备

拉锯扯锯，南来又北去。

满眼犹白风未暖，次数已不胜计。

忽然又令转移，路贯牧场两极。

收拾破车六辆，权当战备演习。

2．第一天

停车且喜早扎寨，谁知命蹇事多乖。

陶森有人想发财，打狼夹子雪里埋。(陶森：牧业队名)

老牛路过中圈套，小狗上当叫声哀。

黄昏雪花萧萧下，阴云蔽月天不开。

夜半风向南转北，倒灌白龙进圈来。

移车挡毡累三遍，抬眼忽惊东方白。

头天搬家竟如此，明日行程没法猜。

3．第二天以后

脚下、耳边、眼底，

雪厚、风猛、草稀。

举队向南移，我也牵车前去。

前去，前去，路见弱羊倒毙。

4．搬到（第五天）

朝朝暮暮，赢得家南渡。

我有一言请记住：天无绝人之路。

路从脚下踩出，雪里开辟通途。

经过斗争取胜，便是最大幸福。

四和尚包车少，搬家时车都很重，牛不顾意拉。所以每次搬家，牛头绳不知要断多少回，越接越短变成了疙瘩串，不够长了就合二为一。搬家前先要准备牛头绳，而且要打出富裕来。马鬃都搓牛头绳了，包绳旧了也没法换。老乡包都是三道绳，四和尚的却一律两道。有时搬家途中，临时应急，还要拿包绳当牛头绳呢。车呢，明明搬家前看着挺好，不知怎的，往往才走了几步就出了问题。途中不知要卸多少次牛来修车，有时坏大发了，只好抛锚一天，第二天才能搬到。四更造饭，五更起程，人拉牛，牛拉车，一步一揪心，十步一回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轱辘两半了，重换辐条，再用铅丝、绳子来个五花大绑，可是没走多远，轱辘又拧得不成一个平面了。车轮在地上开始印波纹了，我的心啊，悬到嗓子眼上："沫勒"（车锢）啊，你可千万别掉啊！

（图片来源：达青牧人）





《华年》节选

想当初（二）

(4)

城里人总以为放羊是件很悠闲的事，一提起放羊，脑海里就浮现出这样的想象：蓝蓝的天上有几朵白云，羊群静静地散开吃草，而牧人呢，则悠闲地吹着牧笛。却不知放羊有时和打仗一样紧张。且不提冬天的白毛风和夏日的雷暴雨，就是在那明媚的春光里，也真能把羊倌急得够呛。春天，正是羊群跑青的时候，羊要下羔，走远了就不好回家。而羊群总是昂首阔步，对脚下不屑一顾，好像走到天涯才有芳草似的，谁也休想教它们安静下来吃草。这时，我才知道，羊真是世界上最顽固的动物。有人曾几次隔山听到急躁的小 B 的哭骂声，那是羊群又在疯狂奔窜啦。羊一走起来就排起队，越走股越多，变成无数纵队，简直是稍纵即逝。它们爬山过岭，越走越来劲，却把羊倌累得要命。

诗曰：

羊倌下马把竿放，圈羊累得真够呛。

舒开四肢才一躺，忙又抬头看看羊。

羊群刚一奔前方，便是“朝天一柱香”。

没等羊倌爬上马，又成“凤凰展翅翔”。

羊群前面把坡翻，羊倌后面紧追上。

追到山顶朝下望，我的娘！

只见白波九道下大梁！

(5)

初到草原，艰苦和困难并没有使我们觉得是难以忍受的事情。相反，我们是张开双臂迎接它们的。我们唱着这样的歌:

一杆长竿手中拿，风雪豺狼都不怕。

要让那艰苦和困难，锤炼这青春年华。

在我们的放牧生涯里，最难熬的不是别的，乃是寂寞。羊是一家一户地放的，为了避免掺群，彼此永远保持一定距离。早上跟着羊出去，草原上空空荡荡的，除了羊在地上走，云在天上飘之外，一切都是静止的。远处，虽有几群羊，却是可望而不可及。偶尔有个过路的，聊几句天，心里就高兴极了。要是天气不好，羊群不好放，人得忙活，还不会无聊。要是天气好，人就闲得难受。

诗曰：

地阔天空没有风，放羊闲煞思赫腾。

寂寞无人可共语，登山长啸两三声。

又曰：

仰看浮云卧看羊，小山顶上白昼长。

云不耐看羊不动，怎生排遣这时光。

放羊的出去了，包里就剩下一个人了。虽然有干不完的家务事，还是感到闷得慌，希望有个人来串串门。要是有人在远处出现，老远就盯着他，看是不是奔这里来的，猜想会是谁。如果那人往别处去了，并不路过自己的包，心里就大大失望，要遗憾半天。

有诗为证：

头上青天脚下草，莽原空旷吾庐小。

一片静悄悄，独守蒙古包。

忽见南边人影冒，忙登牛车作远眺。

人向西北影渐消，——来客又没盼到。

(6)

羊喜欢在大石头上蹦, 尤其是羯子(注:阉了的公羊)和羔。它们蹦到石头上跳跃, 有几个厉害的想占据住石头, 便在上面摆擂台, 用头把别的羊顶下去, 然后腾起四蹄直上直下地跳着, 对下面进行挑战。于是一帮不甘示弱的便开始往上攻打, 战斗是很激烈的。要是山上大石头多, 羊就东一拨, 西一拨的在石头上蹦跳顶架, 流连忘返。羊倌轰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有时刚轰完敛齐, 一只羊带头, 众羊又蜂拥而回。用正常的方法是圈不了羊的, 四和尚碰到这种情况, 只好把马绊住, 竭力怪叫, 挥舞衣衫, 乱蹦乱跳 (比羊蹦得还要欢), 以至于满地打滚, 做出种种怪样, 以此来惊吓羊群, 简直是丑态百出。但为了圈羊, 哪里还顾得了体面啊。诗曰:

大石满山， 石上羊撒欢。

已是傍晚闹犹酣， 羊倌奔走挥鞭。

顾东难顾西边， 羊儿回窜流连。

打滚怪叫把羊圈， 羊倌如同疯颠。

有一年秋天抓膘走浩特(注:连续远出放牧, 转换草场, 意在使羊多吃草尖草籽, 速增营养)， 途中支起陶包(注:蒙语。只用蒙古包伞状的包顶支起窝棚)权住一宿, 第二天拆起来很容易， 可以很快起程。陶包很小, 但睡两个人还够地方。秋天的月亮很亮, 明光光的月亮地里, 羊不愿意睡觉, 低矮的陶包给羊羔提供了耍闹的场所。它们像蹦大石头一样地往陶包顶上跳, 愉快地顶着架, 这一下羊倌可没法睡觉了。当羊倌气冲冲地蹿出陶包时, 羊羔便轰的一声跑了, 连鞭子都来不及打着它们。气愤之下, 便随手抄起一件什么东西向羊羔掷去。可是, 等羊倌回到陶包, 还没躺稳, 它们就又来了。诗曰:

秋月高照, 暂宿搬家道。

陶包虽小易拆掉,凑和一夜睡觉。

一帮羔子胡闹,蹦上包顶乱跳。

气得羊倌蹿出包,抄起棍子当镖。

(7)

下夜的人没有不神经衰弱的。冬天，要是刮白毛风或是夜里变风向，羊群就会走出圈去，顺风而逃。人就得对准风向，在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中移车挡毡子，然后拿鞭子堵在羊群前面站着，整宿不得睡觉。如果不是冬天，人也不得安眠。春天，下索白（春天接羔羊群分为两群，不带羔的群称“索白”，带羔的母羊群称“撒合”）夜，羊要下羔，人得照料；下撒合夜，天刚亮，羊就外出吃草，散得特别大，大羊小羊咩咩叫，互相呼应着，人想睡好是不可能的，必须天刚亮就爬起来去圈羊。夏秋两季蚊子多，羊往往一夜不卧，蚊子叮得羊总想迎风逃避。晚上，羊一回圈，人就得在羊前边抡鞭堵住，一打盹羊就没影了，非常熬人。

诗曰：

蚊子真多，下夜罪难说。

不断抡鞭人怒喝，羊群向风挪，挨打不退缩。

拉辆牛车，我往羊前拖。

靠在车旁唱支歌：“要想逼死我，瞎了你眼窝……”

一年到头，天气不好，就会跑羊。如果晚上要下夜，白天就担心地看着天，天气不好，心情就特别沉重。当傍晚天边升起乌云时，那乌云简直是铺到了心上。而且，一年四季都有狼。有一回，几个四和尚刚吃过晚饭，在包里聊着天，忽然“哄”的一声，羊群炸了。赶紧跑出去大喊，围着羊群绕了一圈，在地上捡了个热乎乎的羊尾巴，那是狼咬下来，来不及吞掉的。打手电往羊群里一照，完了，有六只羊都被咬了，这时心里是多么悲愤交加。只要天不是特别冷，人还是躺在外面放心。拿块毡子铺在羊群边躺着，有狗趴在脚下，心里就得到了很大安慰。

诗曰：

月黑星微，羊群旁，心提胆吊。

下夜人，怕狼来，不敢睡觉。

远近处，狗声鼎沸，手电乱照。

今夜事，难预料。

插竿设防，推车布阵，未必有效。

和衣露宿，细听征兆，时而大叫。

困意虽浓，所幸夜短，急待破晓。

却不知，又会传来，几家噩耗。

夜是黑洞洞的，看不远，谁知道狼藏在哪儿，只好悬着心等着它来，又困又紧张，人怎么能不神经衰弱呢？

(8)

烈日当空，羊圈粪气蒸。

雨淋羊尿成泥坑，剪毛在此出工。

大羊四腿踢蹬，捆绑初学手生。

插青未谙剪子功，我的妈呀，

铰个大眼睛！

剪毛对于初到牧区的四和尚来说，真是件怵头的事。看着牧民拿着剪子，手下生风，一会儿剪一只，羡慕得不行。可是自己一干，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第一是不会拴猪蹄扣，两只手攥着四只羊腿，腾不出手来拿绳子，好不容易捆上了，也是一会儿一开。羊腿在地上踢蹬起不少砂土，下风头的牧民都掩着脸叫“倭拉妈”(注:感叹语)。第二是不会使剪子，一点点地探进羊毛里，不知怎的，往往一剪子就让羊身上出了个大眼睛，给苍蝇制造了下蛆的地方。不知铰了多少个眼睛，才学会了剪毛，后来还和牧民比赛呢。

剪毛的圈是铁哈那(注:围栅)围成的，羊在圈里圈边踩没了草皮子，地就成了沙土地。轰羊进圈和抓羊的时候，羊

东奔西窜,拥来挤去,沙尘飞扬,又呛又迷眼。羊一受惊,就吓得粪滚尿流,夏天羊粪稀软,再一下雨,羊圈就成了泥坑,又湿又滑,费了好大劲才能抓到羊。羊毛里都是油汗,羊腿上都是粪泥,捉羊抄腿,剪毛又得按住羊,弄得两手又脏又黑。忽然有阵风,闹不好,眼迷了,羔毛也跑了。人蹲在地上,膝盖酸痛,手也被剪子磨红了,脸上流汗,一抹就成了花脸。剪毛是个抢时间的活计,一干一天,晚上还得下夜,很辛苦。但由于游牧生活太分散了,剪毛时得以集中,人们见了面就谈笑风生,等剪下羊毛堆成山时, 人们都是很自豪的。



《华年》节选——

想当初（三）

(9)

小孩很少有不向往骑大马的，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良辰美景属童年，赏心乐处是公园。

公园何处最流连，爬上转马旋旋旋。

忽然四下成一片，八方同时来相见。

连催快快转，心里还嫌慢。

睁眼光怪陆离间，闭眼飘飘游九天。

心颤颤，目眩眩。

风飒飒，意翩翩。

无数儿童尽狂欢，鼓噪呐喊笑声尖。

令我至今思此事，耳边犹有童音喧。

当我在草原上第一次骑马飞奔的时候,心里真像小时候骑转马一样高兴。骏马驰骋,风入四蹄轻,使人有腾云驾雾、飘飘欲仙之感, 觉得不是马儿在跑,而是自己在草原上飞。那时是多么心旷神怡,骑马总是一再加鞭,使马快之又快。后来,在放了一段羊之后,我才懂得了,为了放牧要保存马的体力,我才懂得了“在马上,马伺候人,在马下,人伺候马”的道理。夏天,我替马在胸前腹下拍蚊子;冬天,我牵着马在深雪中走,为的是省马,而我的毡疙瘩却过早地磨破了。但我仍是“毡靴磨破终不悔,为马不辞人劳累”。马在群里的时候,如果那个部位痒痒,嘴又够不着,它便找一匹马,用牙轻轻地啃啃对方的相应部位,对方就能默契回报。我放羊时,经常用石片给马搔痒,有时搔到好处,马居然也用嘴轻轻蹭我的后背,这时,我的心里就别提多快乐了。

但马也分优劣,好马是主人的骄傲,而破马却只能使主人生气。当破马疲懒时,主人就用靴子像擂鼓一样地夹击它的肚子,或是用鞭子雨点般地抽打它的屁股,甚至鞭及它的脑袋。但这些破马实在是无潜力可挖的,我从心里可怜它们,放羊时,不到危急的时候,我总是信马由缰,任它慢慢地跟着羊走。然而,我一点也不喜爱这些破马,谁不愿意骑好马呢?

但分得好马也不能过份得意,小D便是一例: 小D又分得一匹马,早就听人家说这马不错,骑着舒服,有速度,骑上跑了一段,果然名不虚传。于是兴冲冲地往家去,沿着电线杆子正好是直线距离,小D策马狂奔,电线杆子刷刷地从身旁掠过。骑上快马如同有了缩地术,怎能叫人不目空一切呢?小D高兴非常,却忘了马越贴电线杆子越近。忽然,斜向固定电杆的地锚线到了眼前,要伏鞍已经来不及了,一缩脖,帽子被挂飞了。小D惊出了一身汗,真险！要是被勒下马,那可就乐极生悲了。诗曰:

春风得意马蹄疾, 沿着电杆直向西。

新得马一匹, 真是好坐骑。

速度快之极, 狂喜忘其余。

电杆斜拉地锚线,

哎哟！还好, 刚刚蹭头皮。

一声怪叫，惊飞小K觉。

醒见老A双脚跳，样子实在可笑。

手插裤管弯腰，伸到膝盖直掏。

掏出二人一瞧，是被耗子咬着。

却说老A睡得正香，忽然被耗子在腿上咬了一口。这是冬天的事。冬天蒙古式睡觉是穿着皮裤睡的。耗子找到了温暖，越钻越深，竟然钻进了裤腿里，闻到了人肉香，又竟敢张嘴就咬，真是胆大包天。

不过，这还是冬天，要是夏天，就会受到更多的侵扰。睡在蒙古包里的地上，一般只铺两层毡子，一层破烂的铺在底下，上面再铺一层好的。夏天，蒙古包里上有蚊蝇，下有潮虫，各种知名不知名的小虫都在毡子上爬。有一回，一个四和尚打着手电铺褥子，还看见被垛上盘着条蛇呢。

(11)

灯油已干，摸黑把碗端。

今日饺子格外鲜，吃完一碗又添。

张口再餐，滋味不一般。

火柴一照是只蟾，顿时肠胃要翻。

夏天吃水，没有井时，就去河里、泡子里拉水。此时马、牛正在水里拉屎撒尿，孑孓在水里游来游去。所以经常可以在碗里看见蚊蝇的尸体和其他的什么，四和尚用筷子把它们挑出来，便继续吃喝。有时耗子会掉进井里淹死，四和尚见了，也不惊奇。奇的是这一回摸黑吃饺子，一只蟾不知怎么就进了锅。蟾者，癞蛤蟆之谓也，和饺子大小差不多，被这个四和尚吞进嘴里，觉得滋味不对，吐出来划火柴一照，可真恶心死了。

(12)

这一年,雪下得很晚。初冬,天已很冷,小水泡子冻到了底,饮羊只好到远处的大泡子凿冰窟窿,饮马便去就近的水井。由于洒水,井台结了冰,井口越缩越小,井筒成了坛子形。人把马绊在井旁,小心翼翼地在冰台上提水,要是脚下一滋溜,那就井下冬泳去吧。有一回,小C 在井口滑倒,幸亏穿着大得勒(注:皮袍),井口又小,得勒的下摆翻上来塞在井口,人便卡在那里,两腿在井口下悬着,两手在井口上乱抓乱搔。得勒臃肿,胳膊不灵便,井台上都是冰,太滑,撑不住劲。幸亏又有人来饮马,这才救了驾。诗曰:

初冬未雪已寒, 井边饮马艰难。

冰上提桶步蹒跚, 井口又小又圆。

忽然一下玩完, 失脚要坠深潭。

得勒卡住人空悬, 两手乱抓井盘。

(13)

牧场吃商品粮,冬天,地上的积雪很厚,四和尚老D 和小C 各骑一马,拉着一个爬犁去场部买粮食。两人很高兴: 一百多里路,要是没雪,便只好赶牛车去,且嘎悠呢,闹不好,得三天,这多快。谁知走了一半,小C 的马忽然一闪,人掉了下来,鞍子也转了,马把鞍子踢下来, 没命地跑了,俩人又没带套马杆,甭想逮住马。怎么办? 唉,回去吧。马等回包再说,粮食也先别买了。幸亏是两个人,还拉着爬犁。雪原很平,小C 抱着鞍子坐在爬犁上,滋味还好,苦就苦了前面骑马拉爬犁的老D。好家伙,连人带鞍子一百多斤哪。诗曰:

爬犁虽小, 坐人还挺好。

二人同行真不巧, 一马刚才逃跑。

前面骑马心焦, 无奈人沉路遥。

后面人把鞍子抱, 满脸都是苦笑。

（14）

小Ｑ蒙语很差，便去请教一个学得较好的四和尚，此人外号“大公”。大公给他提供了不少蒙文词，小Ｑ受益非浅。“本人最近做了首蒙文诗。”“是吗？我在此洗耳恭听。”于是大公摇头晃脑将此诗慢慢吟将出来：

俄诺_吉勒_握拉码

加斯_依和_奥布斯_巴嘎

乌呼鲁_也布怪

浩尼_更埃那

翻译成汉话就是：

今年真不得了，

雪大草少。

牛走不动，

羊更害怕。

蒙文诗如此朗朗上口，使小Ｑ不胜钦佩，便写了一首打油诗，呈给大公。

诗曰：

我与牧民话不通，忙去请教高材生。

此人住处不算远，他的外号叫大公。

找上门去一攀谈，名声果然不虚传。

见我虚心来求教，便开腹贮示愚顽。

日常蒙语无不知，而且能做蒙文诗。

摇头慢慢吟出来，此时意态颇矜持。

劈头一个感叹词，突兀不凡露天资。(注：感叹词指“握拉码”)

如此大才谁不赞，不由弟子不尊师。

“哈哈哈”，大公得意地笑了。

后来小Q碰见了一个懂汉语的蒙古族干部，给他背了大公的蒙文诗。那人听了，仰天大笑。“怎么样？不错吧？”小Q急着问，不料那人说：“这叫什么蒙文诗！蒙文诗不是在句后，而是在每行头一个词的头一个音节上押韵的。”



《华年》节选——

想当初（四）

（15）

到草原的头一二年里，走夜道迷路是常事。夜幕一降，白天的近景、远景都没有了。即使能看见山，也是没有层次，而且仿佛变得非常矮。有月亮还好，没有月亮就没东西可参照，连老牧民都要迷路呢。那时，我听说走夜道应该参照星星，结果，冬天有一回我出门开会时回头看了看包上方的一颗亮星星，回来照准一走，转了大半夜，才撞上了营子，得以睡了小半宿。后来，我才知道，星星每夜都在转，这就是所谓“斗转星移”，只有北极星是不变的，而我那次参照的并不是北极星。

某年夏天有一个四和尚在一个无星无月的风天里下羊夜，因为蚊子多，羊不断移动，圈着圈着，已经离开了包，既不知包在哪里，也不能离羊去找——恐怕能找着包回来又找不着羊了，只好大呼“米尼格勒 哈白那（蒙语：我的 家 在哪儿）”。于是这事就成了一个笑柄。

一年冬天，在放牧点，天黑后几个人聊着天，要喝茶，没水了。一个四和尚去打，结果半个钟头也不见回来，包里的人又吆喝，又打手电，才把他从远方召唤回来。只见他手里提着半桶冰——那本来是一桶水，边走边洒，边走边冻，洒了半桶，还剩的半桶水都冻到底了。其实，井并不远。四和尚有时到近处去，回来时为了面子关系，还不好意思喊，怕同包的笑话他爱转向，想充能耐又确实心里打鼓。往往走出一段后，就捏着嗓子学狼叫，以期引起各家的狗叫，等听到狗叫了，定了定神，知道了各家的位置，才一蹦子跑回家。回到包里也许还要说：“今天狼闹得真凶。”

有一回，天亮要搬家，一个四和尚包里车少、东西多，昨天已和近邻商量好，让人家带拉一袋面。天还没亮，

扛着一袋面就奔人家去了，方向偏了。坡坡坎坎的，包里打手电他也看不见；有风，他在上风头，也听不见喊声。结果是一条道走到明，天亮了才看出是在哪儿，腰酸了好几天——怎么能不酸呢，一袋面在肩上哪！

诗曰：

天亮要把家搬，车少实在为难。

近邻新添车一辆，昨天答应分担。

五更面袋在肩，天黑方向走偏。

走到天亮看见包，揉腰一劲说冤。

(16)

放牧多年，都患关节炎。

没有粪烧包中寒，包顶穗穗霜悬。

皮、毡加在上边，负重才能安眠。

却觉脚下还不暖，请人压上案板。

草原的冬天特别长也特别冷，尤其当蒙古包已经破旧，又缺粪烧的时候，人就特别凄惨。有时牛粪只够引火。接连的白毛风把营盘上的羊粪球弄得又是雪又是末，羊瘦，粪又小又没油，添进炉子里光冒烟。做饭的时候只好续上一些牛粪，使计划只用来早晨引火的牛粪提前烧完了。等饭做完了，仍旧是羊粪沤着烟，包里又冷下来。烟里尽是水气，包顶上便结了霜，毡毛上嘟噜着霜穗，四和尚开玩笑地称蒙古包为水晶宫。晚上点灯，灯得放在炉子旁暖着，要不煤油灯不亮，羊油灯干脆就凝了不着。有时非常冷，煤油瓶子放在靠门的地方，就会凝成冰状，得化开才能倒出来。睡觉的时候，尽量多压东西，一条被子、两件得勒还嫌冷，有时再加上块破毡子，后来成了习惯，身上不重就睡不着。有时来人了，不够盖的，便案板、半口袋粮食往上压。人用棉袄蒙着头，鼻子里的暖气在头外边的棉袄、得勒上结着霜。四和尚是轮流早起的，谁下夜谁就早起，先起的滋味可难受了，非常不愿意起。毡疙瘩一夜冻成了冰疙瘩，往里一伸脚，脚底下像火烫着一样。毡疙瘩一冻硬得像铁一样，非常挤脚，必须用脚温把它焐开。

于是早上刚开始走路的时候，总是步履蹒跚。下夜的起来，头一件事就是生火，火生起来，包里有了暖意，炉子上方顶毡上的霜开始化成水珠，顺着陶那棍流了，这时另一个人才起来，迅速穿上衣服，蹲在火旁烤他的毡疙瘩。如果白天天气晴朗，比较暖和，人就非常高兴，出门看着瓦蓝瓦蓝的天空，平常由于天气不好而隐没的远山都一叠叠显现出来，无风无云。这时四和尚就非常非常感激老天爷的开恩。

诗曰：

天亮了，缩头又探脑。

数数数了真不少，几次想起决心小，我再把牙咬。

骂声鸟，毡靴太冰脚。

别忙收拾和打扫，先要生火烤一烤，粪是宝中宝。

粪太缺，烤火要节约。

天上无云风声歇，门前雪山现数叠，谢谢老天爷。

(17)

羊肉饺子是很好吃的,羊肉包子也不错,谁不爱吃呢？只是因为做馅很麻烦,尤其是冬天,肉是冻的,又得化,又得切,又得剁包里的事很多,哪有那么多时间呢？所以,四和尚们不常吃馅。后来,一位四和尚发明出一种快捷的办法:冻肉不必化开,用木工刨子一刨,薄薄的冻肉片一化就成了细细的馅。于是,四和尚们皆大欢喜,各包迅速推广。这方法的确是很高明的,但冬季肉食都是十一月宰,那时羊膘最肥,十一月过后,天寒草枯,羊所摄营养渐少,以内耗抵寒,逐日掉膘,就无人再宰羊了。初冬宰下的羊是要存起来吃一冬的,整整五个月还挂零,知青包这样大刨其馅,肉可就顶不住吃了。诗曰 :

肉片纷飞, 小G 热汗挥。

发明做馅新方法: 冻肉可用刨子推。

包子饺子进嘴,各包伙食真美。

不到半冬肉告吹，大家一齐喊亏。

(18)

老Ｆ悲，接到通知眼发黑。

老Ｆ愁，放羊的日子没有头。

老Ｆ喜，队部请他当管理。

老Ｆ乐：“刷的不止我一个。”

老Ｆ，瘦瘦的，很没有精神。第一年夏天，有一次下暴雨，包里突然见他从羊群回来了。他哭丧着脸说：“赶快追羊去吧，我的腿僵了，上不去马了”——原来他是牵着马走回来的。他们包的人赶紧来追羊，羊却早已混到别人群里去了。后来，他索性和同包的提出要专职下夜，同包的条件是中午回包加餐一顿——我们放羊中午是从来不回包吃饭的。于是同包的天天放羊，每到中午，他们的羊群总是离家很近。老Ｆ做好了午饭，便把一件破红衬衫挑在套马杆上，立在包旁。“升旗喽！”同包的看见了，大喊一声，立刻飞马回家，一边哼着得意的歌。

老Ｆ多想离开这里啊，大学招生，他年年报名，年年下第，已经是第三回了，又没考上。四和尚们给他说了不少好话，队里照顾他，让他到队里当保管员，虽然没上成大学，总算比放牧强多啦。

(19)

有一天，一个四和尚绘声绘色地表演了小Ｄ在供销社受窘的事：

风闻供销社来了不少样吃的，大家云集而来。轮到小Ｄ买了，他点了这样要那样，每样刚称完，趁着售货员没包好，他总要先抓出一些来，自己吃着，还频频让给旁边的人。因此遭到了售货员的不断呵斥，但他满不在乎。眼看柜台上称出了五六包，该算钱了。小Ｄ大模大样地把手伸进怀里。没有，只好再探深一些。小Ｄ的得勒上新接了个翻袖头，很粗，不得已，解开顶扣，再往里伸，还没有。“可能是转到腰后边了吧。”小Ｄ使劲把手伸向后腰，这个动作，迫使他来了个大大的弯腰。居然还没有。旁边有人劝他脱了得勒找。可是，诸位，小Ｄ向来爱光膀子穿

得勒，这个建议可不能采纳。不知是急的，还是掏钱使劲使的，小 D 的头上冒出汗来了。他故作镇静，从刚买的烟里抽出一支，在人群里找人借火。由于小 D 没算钱就吃，售货员早已对他不满，这时不断用话敲打，催促着小 D，别人也不能买，一屋子人都盯着他，逼得他抓耳挠腮，无地自容。在他手足无措地盲目抓挠中，无意将手伸进放在柜台上的手套里，"唉哟，在这儿哪！"小 D 简直喜出望外，要不是得勒沉，他一定能跳得很高。"来，再买他几样！"

"哈哈哈！！"大家听罢全笑了。"给他来首诗，就按《红楼梦》里'悲愁喜乐'的格式写。"于是，好事者们凑成了这样一首：

小 D 悲，人家要钱一劲催。

小 D 愁，找钱急得汗满头。

小 D 喜，原来钱在手套里。

小 D 乐，总算出了供销社。

(20)

四和尚们很爱神聊，只要得到了聚在一起的机会，就眉飞色舞地聊个不停。一天晚上，小R包里来了一个别的包的四和尚，春天要在井上饮羊，这个四和尚包的井水位下降，水车的铁链不够长了，他是来问有没有多余的铁链的，离着远，今晚就住在小R包。包里原有三人，添上一人就显得热闹多了，此时焉能不聊。一说起铁链，小R就联想起一个北京的传说，便给他们讲起来：

小R在北京时，住在北新桥，北新桥有口深井，铁链非常之长。日本侵华时期缺铁，要取这根铁链，倒了一天，还没倒完，井里忽然隆隆作响，原来井里镇着一条孽龙，铁链倒完孽龙就会出井，却见云头之上关帝显圣，而且武穆真君岳飞也前来助战……小R说得兴高采烈，做出舞刀弄枪的样子，本来都是躺着的——在蒙古包里，人不是坐着就是躺着——他这么一舞弄，脚下不由得便是一踢。这一脚正中油灯，灯一下灭了，听的人顿时惊呼起来。诗曰：

油灯半暗，小R 在扯淡：

北新桥里倒铁链，岳飞真灵再现。

连说带表演，仿佛亲眼见。

脚丫飞处灯一闪，顿时一片惊叹。

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马倌



《华年》节选——

想当初（五）

（21）

春节的聚餐是很热闹的，放羊的各包留下一个下夜的，其余的都参加了。有羊倌、牛倌、马倌，济济一包，凑了十几个人，这在牧业队已经很难得了。特地买了瓶猪肉罐头，四和尚一年到头吃牛羊肉，猪肉要算稀物了。天冷罐头凉，先吃别的，把它放在火上烤着。正在进餐，只听“咚”的一声，罐头开了盖，猪肉飞上了包顶。真糟糕，浪费了不少，不过粘在陶那棍上的还可以吃。就这么来吧，几个人欠着脚扬头舔着。嗯，味道真不错，就是还有点烫——要是不烫，它还上不了包顶呢。

诗曰：

草原成年吃牛羊，春节要把猪肉尝。

买来罐头嫌太凉，别忙，暂且放在炉子旁。

酒过三巡声响亮，猪肉飞到陶那上。

欠脚扬脖都亮相，真棒，就是舔着还挺烫。

最后吃的是炸糕，红糖馅，用牧民给的黄油调的。由几个公认擅长烹调的操持，他们垄断了案板和油锅，不容

他人插手。于是闲着的人就天南海北地聊着。当第一批炸糕出锅的时候，人多糕少，一个人提议作宝塔诗，谁先续上谁就吃。大家齐声说：“高！”这个“高”字就作为宝塔顶尖定了韵。立刻有人叫出“炸糕”，同时伸手就去抓。当宝塔续到第九层的时候，炸糕已经出了第二锅，足够吃上一轮的了，而且大家已经满足了宝塔的高度。于是在对宝塔诗极其兴奋的回味中共进其糕，那炸糕同样很有味道，做得很不错呢。

那首宝塔诗是这样的：

高

炸糕

赶快捞

里嫩外焦

香气往上飘

充满了蒙古包

顿时肚里馋虫闹

馋得我口水往出冒

续不上诗你就吃不到

至今我还记得那续第九层的，掰着手指一字一顿地数出那九个字时的得意样子。当时，满蒙古包都哄堂大笑了。

(22)

宝塔诗引起了大家的诗兴,春节聚餐时好几个人乘兴即席赋诗。那时战备很紧张,地处北疆的四和尚想到打仗都有一股兴奋劲儿,经常憧憬着英勇杀敌的场面,随时愿洒青春热血。所以四和尚抒发慷慨的诗,总要写上一些纵马沙场之类的豪言壮语。那年春节席上,施小明同学的两首诗很得大家的共鸣和欣赏:

其一

作诗、谈笑、歌唱，慷慨、快乐、激昂。

幸福非于此，只待枪声一响。

一响，一响，

纵马飞奔沙场。

其二

春节之夜尽狂欢，赛诗会上齐争先。

革命豪情谱成篇。

思想改造非一日，前程远大路艰难。

刻苦磨炼莫等闲。

董士芳同学作长诗一首，其中几句甚为感人：

将舞马刀杀敌虏，百万军中马当先。

将挥双手战天地，无尽荒原变良田。

将指高楼教后代：汝辈可知创业难！

那时，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情。青春只是人生中的一段，而这样热烈兴奋的日子，在我们的青春中，也仅有这么一小段，别看仅有这么一小段，这对于回忆人生来说，分量已经足够了。我们忘不了守护畜群的风雪之夜，忘不了四蹄生风的得意驰骋，也同样忘不了在草原最初几年过春节时挤在蒙古包里的热闹聚会。

(23)

惊惊颤颤，马倌上任三把汗。

一怕丢马，狼吞虎咽吃晚饭。

二怕狼掏，声嘶力竭通宵喊。

三怕混群，脖子伸直不停看。

这是我队四和尚马倌刘玉平的经验谈。我牧场地处边境，狼非常多，经常看见“白马披大红，红马露白骨”(刘玉平诗句)，那都是夜里狼掏的。所以马倌下夜都特别紧张。如果天气不好，去下夜时找不到马群，那是真够马倌一急的。要是马炸了群，那速度着实惊人，往往傍晚“胎巴”得好好的，吃完晚饭便不见了。马倌在茫茫的黑夜中寻找，有时要找上一夜。请看刘玉平是怎样写找马群的:

夜色茫茫如黑纱，电池用旧，心情不佳，

饭后急忙穿大哈。(注:大哈，蒙语:皮外套，毛朝外)

一丘一草将人耍，远看似马，近看非马，

奔波一阵真抓瞎。

找遍山坡找山崖，北风飒飒，马蹄刷刷，

绕山一周又白搭。

主意不定真难拿，本想回家，又一咬牙，

催马向南如风刮。

手电光中毛色杂，找见马群，心才放下，

持枪防狼待晓霞。

刘马倌放马时写了许多诗,多是马倌的实地感受,四和尚马倌成天鳔在马上,对于记载生活来说,怎么便当怎么来,一首小诗就是一篇日记,日后回忆起来,往事历历在目。可以说,四和尚的诗别有一种功用,但这种功用恐怕只有四和尚才能感受得到吧。

(24)

当初插队,是1967年11月16日离开北京的,正值初冬。过了张家口坝上,白雪皑皑,寒气逼人。车子开到东乌旗,蒙古族装备发下来了,有大有小,每人按自己身量自选。这套服装包括皮袍、皮裤、皮帽、毡靴,总重二十来斤,皮袍有两种式样,一种较宽大,另一种较紧便,我惮其笨重,选了件紧便的,长短还挺合身。穿上这身装束,以东乌旗的蒙古包为背景,美滋滋地和同学们合了影。

到了牧场,下了牧业队,我才知道,蒙古袍分男式和女式。男袍肩腰宽大,着装时先在腰下约一尺左右松松系上腰带,然后将袍身上提,勒紧腰带,腰上宽松,嘟嘟噜噜,环腰而垂。女袍较窄,腰带直接系在腰上,袍身并不上提。

真叫露怯,咱穿上这女式皮袍,不仅有损形象,而且大幅度动作起来也确感束缚。怎么办,换是没地方换了,只有求牧民老乡修改了。我翻阅了蒙语会话课本,上门找了一位牧民老太太,按着课本用汉字标注的发音结结巴巴地说:“米尼得勒塔阿了合贵。(我的皮袍不合适)”“噢嗨!塔了怪,塔了怪。”老太太笑了,用当地发音重复着塔阿了合贵,这“噢嗨”就是牧民妇女表示听懂了的语气词。

居然只说了一句人家就听懂了,我为自己的发音成功感到得意。后来再想此事,我才恍然:当时这女袍穿在我身上,我一比划,老太太能不明白吗。老太太是先看明白这袍子不合适,后琢磨出我说的是什么的,故尔有这一声“噢嗨”,说了半天,还是我的发音不地道。

当晚,老太太就改好了我的皮袍,感谢不尽啊,可感谢的话我可说不上来。这时,我才深刻地意识到:来到草原,最先要学会的蒙古话就应该是谢谢。

初到草原,一切陌生,当我们面对着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问题束手无策时,是草原上的牧民热情地帮助了我们,手把手教给我们生产生活上的本领,使我们能够立足于草原。还记得头一年搬家时,刚搬到,牧民纷纷而来,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搭起了蒙古包。还记得在夏天的滂沱夜雨中,一位牧民浑身透湿地跑来,嘱咐我们下夜要小心……

而牧民也要生活,也要放牧,况且还有老小需要照顾,比起知青来他们的困难更大,他们有更多的事要解决,然

而，在知青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伸出了帮助的手。

当时，为了老太太给我修改皮袍子的事，我以我的学生腔写了首诗，兹记录在这里，再表谢意，然而如今那位老太太已离开了人世，知青们也已经离开了草原。

诗曰：

羊油灯，红铜碗，冬夜长，灯苗短。

羊油熬了三大碗，额吉还在飞针线。（额吉，蒙语：妈妈）

老伴上下新崭崭，儿子闺女不等穿，

额吉为谁缝皮袍，连夜把活儿赶？

是谁醒来揉揉眼，看看灯下失声拦。

一听就是新牧民，那蒙语说得不连贯。

“噢，孩子，正好皮袍刚改完，

等明天，你来试试肩。”

肩上加了宽，针脚平展展。

皮袍未穿身先暖，暖流涌心间。

羊油灯，红铜碗，棉线长，灯苗短。

棉线连起两颗心，连在大草原。





知青趣事一：看青·偷菜

文革中，把识点字的人再教育为不识字的运动，叫：知青下乡。千万个乱蹿乱蹦猢狲似的的孩子在“广阔天地”闹腾，少不了鼓捣些令人喷饭的勾当，把一严肃运动抹个花里胡哨。说是趣事，却又似是而非，荒唐年代荒唐事，亦泣亦嘻，苦乐交织。正所谓：笑中有泪，乐中有哀。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感慨。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看青

秋收将至，偷青日甚。想起那天不管地不收的知青，队长计上心来，开会称：“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宝宝，今年就给他们看青！”看青是神仙日子，扛火药枪遛达，回窝棚烧包谷，一天两个全日工，爽！当地人七姑八舅亲戚多，看青玩假中饱私囊，年年看青偷青，年年丢青贴工，队里亏吃大了。亏队长想得出，这知青什么不敢整？你说大坟山有鬼，赌碗菜油他就上那过一夜，还在你祖宗牌牌前出恭。敢偷青？难说他就敢轰你一炮。别不把队长当干部，这招真让那些偷青老手没脾气了。

庄严接过革命的火药枪，煞有介事扛着它神气活现地游荡于田边地角，不时放一两炮吓唬吓唬麻雀和窥视毛豆包谷的孩子，一周下来，看青效果极佳，队长十分得意他的英明。然而，知青不过是大孩子，先是不愿值夜了，把枪机绑上绳子绊于路口后大睡；后来不仅自己吃个肚儿圆，还把邻队知哥知妹邀来共飨，村中舆论大哗，队长加强查夜。一夜，队长不幸误绊机关，下身被轰，大怒，猛扣工分，众知青鬼火怒，阴谋射杀队长家大黄狗，我持抢行刑。不料枪药多了，扣扳机后从底火处喷出的火药吹我个糊头赖嘴。

一阵忙碌，狗肉飘香。一知青心不忍，谎称打了偷青人的狗，邀队长共享，队长欣然赴筵。孰料狗肉发病，筵后，我头大如鼓，队长卵大如球。事情败露，神仙日子狼狈结束。

偷菜

翻粪，即将粪堆边翻开捣碎边泼上各家粪坑挑来的屎尿拌匀发酵。这活累，得爬二里坡一担担将大粪挑到场院，一耙耙翻粪肥，一瓢瓢泼屎尿，小山似的粪堆要翻几天。这当口，青黄不接，断粮了。

天黑定，收工，仅骗得二三洋芋吃下，腹内饥声如鼓。上床，辗转难眠，饿屁喧天。昏暗中，传一声无力长嚎：饿啊——。便有响应：哪怕……有一锅……青菜！遂达成共识：偷菜！于是，两知青提一化肥口袋出发。

夜暗如漆不辨五指，又行梁上君子事，待摸到村边，已是心慌腿软战战兢兢。二人约定要动静小动作快，即卧倒向菜地匍匐前进。到得地头，一知青麻利掰了一抱，另一知青近视，爬到地里恍见前方有脸盆大的一块白亮发出奇怪声响，凑近审视，一股鲜粪味扑鼻——当地农民有在自家自留地解手之习惯。该知青刚反应过来，就听一声凄厉惨叫：鬼——！二知青窜起，如惊狗飞射，途撞粪堆，抹一脸粘糊。

到家，不敢点灯，摸黑煮菜。喘息甫定，魂魄渐归，听菜锅歌唱，想美味佳肴，吞滚滚涎水。忽觉味道不对，点灯，立刻沮丧万分，一夜辛苦，只落得：满头屎尿，一锅烟叶。

知青趣事二：

画 像

逢“秋老虎”，无风，热浪蒸腾，景物摇曳，正午，连狗都不到日头下。又放倒一块地的包谷，汗早没了，包谷叶划破的皮肤已无汗碱腌咬的痛感，晕忽忽扔掉镰刀，把自己仰面摔倒，狗一样张开冒火的嘴，想从瓦蓝的天上发现哪怕小小一片云，闭眼，全身钝痛，有垂死挣扎苟延残喘的感觉。恍惚中，忽听大吼：聋子！喊你没听见？是队长。闭眼想象他的气急败坏有点想笑。他蹲下为我遮住阳光，说公社要来开会，把仓房黑板上的“阶级斗争天天讲”换成“农业学大寨”，再画幅主席像。仓房？对于我简直就是避暑山庄！给几个工？就

10个，不干我找别人。我睁眼说：去！

活该利令智昏。仓房阴凉令昏懵脑袋清醒，方觉这政治工分难拿。写字好办，主席像是好画的？邻公社那个会美术的知青就为画主席像成了反革命。上山继续干活？瞅门外阳光蛰人，打死不去，遂决定不要工分，混！

写好大字，心突然忐忑，不画，得罪队长？公社印象？招工上调？终老桑梓？惶惶如热锅蚁，几攥粉笔，终不敢落。奈何，仰天长叹，目光掠过对面老墙，主席对我微笑，遂三呼万岁，请下宝像贴于黑板，使黄粉笔画出万道金光，大功告成，功德圆满。

裤 子

山区苦寒，布金贵。可偏兴裤管口袋粗的大档裤，与知青的瘦裤腿对比鲜明，他们在庆幸自己拥有颇费布料的大档裤的同时，时常感叹知青的困窘。于是，便有了关于裤子的故事。

头回分到一包日本化肥，都说好，不仅指化肥效能，还指那尼龙包装口袋，都在盘算。化肥未用，争端乍起，先是队长副队长，后又会计，连贫协主任都掺和进去了。社员说他们“敲猪匠打牙祭——炒（吵）得卵子翻天”。终于白热化了，开社员大会，要来个“全民公决”。

开会与争吵几乎同步，嘈杂中，累了一天的知青统统涎水长流鼾声起伏。深夜，知青们被唤醒，会场雅静，队长宣布：考虑小知青裤子困难，社员一致同意，日本尼龙口袋给小知青，缝一大档裤，换着穿！知青们先是愕然，继而大笑，至人仰马翻涕泪横流，随后谦虚谨慎，坚辞不要。

莅日，连夜制好的尼龙大档裤被宣布为“礼服”，供外出开会学习做客用。队长首先试穿，只见大腿正面“日本”赫然，臀部“尿素”鲜亮，知青们当即赋诗一首：我们队干部，穿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都说是好诗！

鼠 汤

鼠，大秽。啖鼠，闻之作呕。然不查而食之，皆曰：香！知青房系牛圈改建，鼠多，其大如兔，鼠精是也，猫鼠对峙悻悻而散，不鲜见。

冬日早饭，是就灶门口的火光做的，昏暗。轮值的人需咬牙钻出热被窝在众人起床前做好饭菜，昏暗中曾有将抹布与干酸菜共切煮汤令食者撕扯不烂的事件。

某日，一轮值男知青被捉弄，闹钟提前一小时将他唤起，生火做饭烧水煮汤，水沸揭盖，高温蒸气直冲房梁，在灶火劈啪、烟道呼隆和沸水哗啦声中，他忽略了一点小小的动静。煮汤时，坐在灶前的他又眯着了，待大家起床，汤沸良久。上桌，一知青舀汤浅尝即眉飞色舞，惊呼：好香！众人抢食，赞叹不已，缺油水的肠胃得到极大满足。汤盆顷刻见底，舀汤的女知青又一惊叹：好大一块肉！众人挤至灶前，蒸汽散尽，锅里赫然漂动着煮褪了毛、即将煮烂的——硕鼠！惊谔数秒，全体争先恐后抢出房门，面对粪堆就是一阵狂喷猛射，前俯后仰呕了个轰轰烈烈。

日后，几个知青饿饭之时，一人喃喃，其口唇吧嗒有声舌头乱舔作神往状，问其故，答曰：那日鼠汤香啊……。

敌台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境外华语广播均在被禁之列，美、苏电台皆为敌台，听敌台轻则批斗游街，重则判刑坐牢。也是物极必反，知青早厌倦了国内电台的千篇一律，听“澳广”唱邓丽君已为时尚，但在公开正规场合仍属于“阶级斗争新动向”，就有了这个故事。

大皂角树上的喇叭刺拉拉地响了，照惯例，队长几年如一日的喊工开场白就将响起：女人都起床了，男人睡着还有什么意思……。一男知青内急，奔粪堆，刚拉出一股舒畅，便与睡眼惺忪出门小便的队长打了照面。这时，音乐过后的喇叭里传来软软女声——莫斯科广播电台。队长面色忽变，手提裤子以难以置信的敏捷冲回屋子。喇叭停了，队长讪讪蹙到男知青身旁，以少有的温柔求其保密，男知青一脸坏笑：我没听见什么，是活路太累导致暂时性耳聋。于是，他得到了放田水的“幸福劳动”。

在田埂刨一板锄，卧等田垄水满。阳光灿烂，心情爽朗，枕如茵绿草，听淙淙流水，看蓝天白云，“幸福劳动，愉快生活”，该男知青快活欲仙……。沉重脚步传来，背粪的行列映入眼帘，一个跛子令男知青的兴致一落千丈，放田水的原是这残废军人。他找到队长，骂：混蛋！队长说：我们都混蛋。真希望你再调错电台。不会了，我把旋钮拆了。苦笑摇头掂起背篓，男知青的“幸福劳动”终结。

批斗

高寒山区穷，生个地主还真难，幸亏土改时硬定，不然知青下乡拿什么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文革时的黑五类中，唯地主不可再生，如同文物，随时间推移，更日见金贵。因而农村的批判会与城镇相比就显现出了另一种色彩。

按上级指示：知青下乡要上好阶级斗争第一课。斗地主，村里竟象过节，扫仓房、杀小鸡、买烟酒、煮米饭，

还套牛车去接，接待规格明显高于干部。知青纳闷，询问后得知，本村没地主，自然也没长工，都是从外村借的，人家还交代不让用坏了。

老地主颤颤巍巍的来了，难为了队长，一边对知青说：悠悠的，斗坏了赔不起，二天咋个完成政治任务。一边又要哄老地主：对不起你家，这回么还是坐着，头怕是要低点，人家学生娃娃老远来叫我们教育，你就教育一下吧。老地主大度的同意了。

酒足饭饱咂纸烟，老地主就坐，批斗开始。知青对批判会见多了，念稿子抑扬顿挫，尤其女知青发言，全体雅静仰望。知青发言后，老长工控诉：地主心狠呀，那年麦收下雨他死活不让下地，把我们关起来……他咂几口烟接着说：关着也就算了，还逼着吃大肉，把我们全灌醉了！是不是？你老实交代！老地主没动静，方知其昏睡已久，涎水吊老长。队长拍醒他，他即发表评论：人家学生娃娃的声音嫩生生的好听，你老声老气刺刺拉拉的难听死球！

口号声中，老地主老长工相帮着爬上备好的牛车，欢送似的。

语录

队长一句“光屁股坐板凳——有板有眼”引知青嗤嗤小笑。再一句“把敌人打得象老奶尿尿稀哩哗啦”，哄堂大笑，传统教育会便毁了。鸡屎（知识——当地口音）青年欺我农村无人？队长恨恨，决定“以夷制夷”，瞎瞎便担负了对知青再教育的重任。此人眼瞎一只，干活不成，嘴巴了得，常以语录新词唬人，凑效，故尔也被村人归入鸡屎青年。有知青不服，又拿“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语录说事，队长磕了烟锅，按瞎瞎教的说：那是毛主席教育我们，你们是他老人家交给我们教育，辈分要弄清。得，事没说成，倒成了孙子。

但知青们很快热爱了瞎瞎的教育，因为瞎瞎不负重任激情满怀囫囵吞枣创造性地演绎联想排列组合，使教育会成了文娱生活极度匮乏日子里的味精。

某日雨，出工不成。队长不失时机地展开教育，知青雀跃。瞎瞎又在左胸补丁处别三只没有钢笔的笔帽以示慎重，银亮亮地闪耀着知识的光辉。他面色严肃，手举半个被丢弃的洋芋，煞有介事：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他独眼眨巴着，忘词了。到底是瞎瞎，顺口就编：是其他生产队。知青起哄：那不关我们队的事。瞎瞎正义在胸面不改色不为所动滔滔不绝一泻千里。……一抓就灵新动向群众眼睛雪亮雪亮，备战备荒民兵胜利之本之本，吃草根树皮水深火热革命先烈打江山打江山，资产阶级丢洋芋丢洋芋，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就背叛修正主义我们不答应不答应，坦白从宽贫下中农金猴奋起千均棒苍山如海血流成河……会场热烈非常，知青前仰后合热泪横流。有知

青嚷嚷：别的队贪污浪费，我们不能，瞎瞎你就代表全队革命群众把它吃了！瞎瞎大喝：不须放屁！会场肃静。瞎瞎环视，满意所达到之效果，遂补充：毛主席教导我们。

教育效果达到，队长扬扬烟锅：天不早了，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绣花纳鞋底。散了散了。有男知青叫唤：我们不会绣花纳鞋底。队长不屑，撇嘴：还鸡屎青年呢。是男社员请客吃饭，女社员绣花纳鞋底。众皆哗然，队长进步了，估计也是瞎瞎教的。





老黑

老黑，优良品种，来自省城。牛！牛气冲天，目中无人。若不为爱情，老黑才不来这鸡鸣三省山旮旯呢。初来，老黑分在公社良种站。异性闻讯至，只要愿意，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简单！可老黑就矜持，任谁不理。可那天见队里拉车的小母牛，魔怔了，闯破藩篱将良种站的人扯一路筋斗跟了来，良种站没法，留队里。优良品种，有户籍的，金贵。村民敬畏。

老黑特立独行，满村晃悠，吃队上的草，喝挑水村民桶里的水，霸道。那知青也犟，挑水偏不让老黑喝，老黑跟来，知青怒，返身出门劈脸就尿。哈，老黑眯眼咂吧，惬意！自此，日日来候。队长正愁白养牲口，见状开窍：都是上面派来的，都犟，让他们同犟，纵有差池，也非队里之过。那知青放牛了，赶老黑相好一干牛等上山，并不理老黑，老黑屄屄跟之。出村，老黑好强，挤开打头牛，获牛铃及尿水奖赏。知青暗喜，得寸进尺，便想牛背横笛，老黑耸臀低头，知青自牛脖滑下，裤勾于角，牛头一仰，那知青裤子被脱，于牛角飘扬。

老黑天生领导。晨出暮归，铃响牛随，自寻食自归圈。老黑在，牛不散，省心。山间水草丰润处，牛群皆争，顶架，胜者牧之，乃规矩。老黑常胜，有功！打斗之伤该知青悉心料理，不失时机地饲以尿水，老黑投桃报李，允骑。该知青曾受其辱，内心耿耿，将老黑套以耕具，耙田。老黑漠然，待那知青上耙，猛挣，耙翻，耙齿勾裤脚，人翻。老黑漫游稀泥，对泥中翻滚的知青叫骂充耳不闻，直至那知青裤子又被脱下，方止步于田埂，啃青草。

老黑的牛儿子能撒欢了。是夜有盗牛贼，窃老黑不成，便看上黑之妇孺，黑力拒，贼调虎离山，且战且退，遂隐。黑返回，圈空，遂奔知青屋，狂哞。知青闻声凄厉，情知有变，提扁担。见知青出，老黑拔腿先去……知青赶到时，战斗已毕：一贼肋断倒地；一贼被牛角叉双腋顶于土埂。二贼被绑送公社，以“盗窃耕牛破坏生产”罪逮捕。嗣后，老黑对那知青俯首帖耳，耕田耙地无所不能，可就不让旁人使唤。队长曾让那知青带老黑到地头，又让其回村背粪。少倾，见老黑奔回，耕具残骸一路散落。知青遂成专业驭手。人牛情深。

两年后，老黑忽于月黑风高夜断了腿，废了。公社来人看过，准予屠宰。队长怯怯告之守侯老黑垂泪不已的知青，那知青让等，乃去。待其归，伸手让老黑舔，那手里是攥了盐的。此时，老黑突淌两行浊泪，知青嚎啕，遁

去……

此案最终无果。后闻，邻省有劳教释放分子被挑了脚筋，跛了。谁知道呢？不关心。

干部

存粮将罄，新粮未继，人心火躁。当值知青倒食入槽转身时，听身后传不满哼哼，登时恶火攻心厉声呵斥：还指望那两把玉米面？老子都没得吃！一声喝，唬得那货一机灵，红眼圆睁，做预备格斗状。那知青忍俊不禁，道：还哼哼呢，倒还象个干部了。

干部成了名号。然此干部非彼干部。干部是头猪。

干部较村里其他同类，应有足够理由自豪，可它除适应干部名号外，仍一如既往地憧憬食有玉米面的幸福生活，一如既往地以哼哼表示不满。浑然不知这名号之尊贵。

知青们叹谓，做猪也不能落到知青户！与原住民相比，知青生活物资与生存技能匮乏，原想养猪过日子，不料自顾不暇。加上“受教育”的低下地位，前途渺茫，苦闷压抑需得发泄。可怜干部自断脐入户以来，终日食不裹腹拳脚加身，这种牛马不如连鸡都不如的生活，成就了干部短小敏捷的身材和凶悍顽劣的特质。

不堪这种极不“猪道”的非猪生活，干部的反抗猛烈而凑效。某日，知青送粪归来啃土豆，无话，气氛沉闷。干部候于前，期些许漏食。猛地，一知青窜起飞身骑猪，干部反应迅速却目的性极强地顺坡朝粪塘疾奔，抵塘边，骤停，那知青遂以自由落体坠入粪汤。干部哼哼，绅士般离开。众喷饭，笑称：奋勇（粪涌）前进！却许久不见人起身，慌忙近前，见那知青仰卧污物一动不动痴望天空，口中喃喃绵绵不绝：想回家想回家想回家……。众皆黯然。

干部饿极，啃栏，栏断，获自由，出没于山民田地。遇妇女儿童相逐，竟凶猛攻击一路咬去；若遭遇山里汉子，就钻青纱帐游而击之。知青屡遭警告，因之。然品尝了解放滋味的干部为争自由不遗余力，令猪栏一断再断。山民几欲捕之而不获，惊叹：知青的猪比狗还跑得快！久之，疲了。知青们对山民警告阳奉阴违，乐得让干部野猪似的自觅其食而疏于管教，干部气焰日渐嚣张，竟掀翻了认为妨碍了它的、在自家自留地解手的新媳妇。干部坏了山里规矩，引发众怒，终招杀身之祸。干部死了。火铳打的。身上挖出小半碗铁沙。

农村宰猪喜庆，拾掇干部那天，知青点没有快乐。天阴着。

狗冢

同为沦落命，惺惺相惜，其被女知青带回时，肮脏邋遢。乍见男知青的冷脸，张皇，益发委琐。吃食匮乏，平空添口，男知青不满。只因不知饱足的胃比女生耗粮，嘴短，眼见其入而发作不得。经女知青们一番洗涮，再露面，其瓜子脸白净，大眼睛波光流溢，尤其小腰，一拧就出了风情，两声怯怯招呼，令人怜惜。女的？遂以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主角名字相予：花妮。

毕竟苦出身，花妮勤谨。上山下地看家值夜鞍前马后任劳任怨，颇招女生喜欢。与男知青之距离，是冬雪天猎回一野兔后拉近的。烟屁股劲大，穷知青命大。又臭又硬的德行花妮仿效，遇赠与，漠然接受，挑逗，慨不买帐；对自家人迎来送往谦恭有加；有知青往来，任穿着破烂仍极尽礼数；若遇当地恶少心怀不轨的觊觎，那大眼睛射出机警凌利足以令其却步。断顿，知青举户回城打秋风。月余而归，花妮瘦骨嶙峋身负数伤守望于门，院内秋毫无犯。近前，花妮摇尾哽咽，幽怨眼里落两粒清泪，众人眼烫。

花妮命薄。知青出工，那执掌知青命运的权势者目空一切强闯知青户，花妮拦阻不成遂裂其腿肚，任狂踢乱踹仍不松口。傍晚，围着几近跺扁的花妮，女生垂泪，男生黯然。花妮死了，埋于自留地。是夜，无话。

翌日，男知青全体称病在家。迟暮时分，女知青收工，闻得荤香扑鼻，猜那几个臭小子定是发了不义财。相视一笑并无多话。此乃规矩：吃得说不得。那是个寡得拍个苍蝇都想送嘴里嚼咕的年月。洗涮毕，围住炖肉盆即开扫。筷勺翻飞口舌吧嗒惟不闻人声，食至半途方觉肉味。那女知青狐疑，起身出门，返回即哭，男生低头，女知青们恍悟，掷箸而泣。少倾，一男知青跳起，犹带悲声：花妮昨晚托梦要做最后贡献，岂能辜负？再说身体乃革命本钱，没本钱还扎屁根干屁的革命呀！抽泣未平。男知青循循诱导：古有衣冠墓，花妮的头和骨以皮裹之筑冢寄托我们的哀思。仍泣。男知青端盆怒道：那我倒了去！拦下。毕竟荤腥难得，经年而不遇，遂边吃边哭诉：那次在山里崴了脚不是花妮回来拽你们我早喂狼了……云云。哭诉声中，汤毕肉尽。

冢不大，半米来高，墓前木牌上书：花妮之墓。与花妮同类比，史无前例。风光。

数十年后知青返乡，冢已荡然。原址上，那女知青喃喃：那次在山里崴了脚不是花妮回来拽你们我早喂狼了……众皆默然。

旷野，有风声呜咽掠过。

回家

白雪衬映，运煤的简易公路黑蛇般逶迤。死蛇！年关近，车少，搭知青的更少，搭男知青者尤少。路那端，家的温暖、城市的气息、父母的眺望……归心切，难言喻。搭车难！那次送负伤男知青至路边，手挥断，车不停。后男生匿，女生招呼。闻刹车，男生出，伤者推送驾驶室，好话说尽，方允。然距城几里，伤者被借故甩下，可怜其满身血污蹒跚步行。终误医时，落残。

天黑了。翻山越岭而至，苦守一天行之不得，焦躁。“回家过年”的念头执拗，惟此无它。一跺脚，走！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年轻气盛，便走。毕竟回家乃快事，话便多：鸟司机！日后我当司机专拉知青。专拉女知青吧？笑。说笑渐行渐稀，至无声。饥生寒，寒助饥，愈演愈烈。饿，如木片刮胃。寂静中有无力嘟囔：求你们谁，有屎屙泡热的我吃。回应是嘁嚓踏雪声。走得迷糊，忽闻狗吠，惊而后喜，趋前求乞，得冷包谷饭一挎包，分食。再走，回家！

翻过大垭口，至国道。车灯扫过雪雾，拦之不停。老办法：扒！于大坡等候，车再至，趁其减速，奔后厢！傻眼：后厢板挂满刺藜。鸟司机早有防备。心一横，据路而坐，逼停一车，众欢呼起身，那司机一脚油门，车擦身驰过。几番拦车不成，发狠，以石断路。一拉煤拖斗车停，众一拥而上，各自于粉煤堆上蹬坑蹲踞。车行，舒气，风如刀，呛回。把身体缩至最小体积，挎包捂脸，防尘防冻。煤粉掩身，反觉暖和。

天亮，互视，人皆半埋于煤粉，与煤同黑，没有嬉笑。至城郊大路，无往日兴奋，依旧迷糊。车进城，一知青忽觉不对，起身，大叫：要把我们拉哪里？众人抬头眺望，遥见公安局大门，慌乱，猛敲驾驶室棚，不停。一知青脱衣趴于驾驶室顶，手一顺，蒙了挡风玻璃，车急刹，惯性使那知青前滚于车鼻再滚落车前，不动。司机忙下车，众人随之。近前，那知青睁眼问：都下了？听答复肯定，起身便走……

城里清晨的大街突现一群行走僵硬、满身乌黑的面目不明者，行人讶异，侧目绕行。内心徒生逆反，索性横行高歌：

沐浴灿烂阳光，胸怀远大理想，

我们革命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心向党……。

嘶嚎发泄中，有泪，肮脏黢黑的脸上开两条白道，煞是醒目。

傍晚，城市街巷声传居委会大妈的通知：年关将近，知青回城；各家各户，管好家人；防火防盗，看好家门……。

过年了。

对子

人穷年穷联不穷。一联一年那！过春节，新桃换旧符，驱邪避晦期盼希冀就都在这联里了。景况任差，对子不能少。知青刚到时，曾见画黑圈的红条纸贴于门框，不解，后得知，那是以小碗描圈充门联的。对联公社是有卖的，对于十个工分才五分钱的山里人来说，爬山过河在其次，可那值好几个鸡蛋呀。既有知青，求之便是。自冬月杀猪到腊月的冬闲里，乡人携红纸带仨俩鸡蛋一把毛烟甚至几两黄豆就陆续找来。写春联，对于值守知青点百无聊赖的知青来说，有吃喝，有润笔，有村姑崇敬和被大人撵来观摩“书法”的细娃，物质精神双丰收，提劲！搬桌子，拉架势，扼腕运气，大字报水平的毛笔字舞将起来。如此，方圆几里的村子，便都有了知青“鬼画桃符”的作品，顺带培养了“知体”书法传人（几十年后回去还见那些字的错误写法，愧疚）。

知青一肚子语录毛诗，懂啥联不联的。秋后有村人娶马家姑娘，求婚联，硬给写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横批还“全无敌”。可好，那马家女子夜半叫声绵延半月，队长说是对子写的。什么事啊！

久了，知青还是积了些新老对子的，可山民为表达意愿，让改动联中字词，为常。

娶马家媳妇的新郎又来，说上次婚联太猛，让弄点悠缓的。知青收“等外烟”而欣然命笔：“人欢马叫学大寨，纲举目张赶昔阳”，谁想冬闲的新郎干劲冲天，夜夜不空。村人笑骂：真真人欢哩马叫哩，欢实。

打趣中，年味浓了。

有不谐：疤脸到，人避让。文盲疤脸，性恶，曾为进城造反司令，“结合”进大队班子，老说省里县里有干爹若干。村人又怕又恨。其擎一精心揭下的老联横蛮拍于桌，命写。其做派，知青不爽，冷眼。其施故技：以前途出路要挟。知青瞅那联：天增日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老联，喜庆。疤脸说他老娘翻年大寿，要这联改字，联中

必得有“娘”。知青眼珠转，乐。从命。将上联“人”改为“娘”，告成，村人亦为知青松口气，皆大欢喜。可一夜间，疤脸门联下联的“福”，被一张写了“爹”字的红纸片覆盖，这联便成了“天增日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纸片粘得不露痕迹，以至于众人皆乐，唯一人不晓。直至村中细娃童谣似地齐声反复诵读：娘增寿，爹满门……爹满门。疤脸方醒，怒揭“爹”字，大骂三天。

人穷年穷联不穷啊，那个春节过得乐呵，家家都在笑。

门路

“只要能回城，扫街掏粪都干！”这狠话，知青说者甚众，没说过也想过。每至秋季，招兵、招工、招生传言飞扬，人耳竖得比狗耳直。一个名额，引无数绿光荧荧的眼睛。知青八仙过海各找门路：有权势者、有能力施惠者、劳动表现佼佼者……。无门路者众多，不甘认命，便走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自然千奇百怪。有自残卖身付惨重代价离开的；有扬言烧房而猪圈失火走运的；有作恶一方令山民送瘟神的；有砸锅卖铁买手表贿赂，待上班后再状告受贿者收回手表的……。多了，其惨烈、无奈和下作，无趣可言，不提。拣趣者道来。

该知青体弱，好不至先进积极，坏不至生疮流脓，头一拨，走了知青里的好恶两极，他没份，郁闷，便一头插进被窝。数日出来，其发如鸟窝，眼珠翻白，念叨不休。神经了？众开导，其怒：你才神经！某日，其眼冒精光忽复常态，自此天黑即出，于无人之际发怪异之声，夜阑方归。众知青盼第二批招工，各想心事，不搭理。时逢鬼节“七月半”将至，村中闻鬼哭，有说是“鬼索债”。村边烤烟房的值夜老倌无论给多高的工分也不干了，人们夜至不再串门，关门闭户准备纸钱柏香。“七月半”黄昏，家家备好浆饭，供奉于柴灰木炭画在路边墙角的圈内，焚香烧钱。村内青烟缭绕，景物竟飘渺了。天黑尽，怕惊了来取供奉的鬼们，连狗都关了，全无了往日喂牲口家畜时的狗吠牛鸣，村子了无声息。

月上东山，岚气初升，景物朦胧。村内月光幽幽，香火点点，静谧，气氛诡谲了。蓦地，一无分头脸之物出现，于岚气香烟中飘荡而来，在队长靠满包谷草的墙脚伏下。少倾，妖声渐起，时弱时强。其音渺渺，阴风惨惨，令人毛发耸立。咿咿唔唔中，队长先人姓名依次报来，无遗漏。屋里有女人捂嘴惊呼，队长声音颤抖：先人有话就讲。呜……哇……欠债啦，咿……哟……有招工就赶快把XXX送走，消灾免祸，嘘……唔……。此时有风袭来，包谷草簌簌发响，满地纸灰打旋，黑影忽听身后传沉重响动，遂感脖颈有热气喷来，味如坟草。惊悸，猛回头，牛头马面……脑际闪过这个词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失踪一夜的他于黎明时分被同宿舍知青找到，其与嚼包谷草的大黑牛同卧，气若游丝。

该知青如愿以尝。据说队长亲自游说于公社，递烟陪笑，铺陈该知青动人事迹，动情处，声泪俱下，差不多要下跪了。知青们做梦也没想到，装神弄鬼也成门路，皆摇头，苦笑。



荤腥

几个知青于河埂出恭，起身发楞：那排泄物晶莹透明点缀些红椒，煞是好看。不记得吃了多久的煮洋芋佐以烤干椒蘸盐，制造出这般模样的粪，干了就是白粉末，风吹就了无踪迹。卫生了，肥效谈不上。那初中小男生冲上粪堆朝天而跪，双手高举状若鸡爪，嘶喊：想吃肉啊——！唉，缺荤腥，肠子寡淡如肥皂洗过，竟活得连做造粪机都不合格了。

细想，那年月还是有荤腥。非正常渠道：鸡猪狗猫马牛羊；正常渠道：鹊鸦鸟蛇獾兔虫。鸡是钓的，以饵相诱，鸡上钩挣而不叫，收之，都会。狗是打的，火铳锄把，也有偷吃猪食的狗被罩于槽内以大锅开水烫毙。鱼是炸的，民兵来查炸药，枪竟被拆了。牲畜病死，山民埋了，夜里刨出就烤。吃猪是邻社知青相邀，谁想他们竟自活猪屁股硬剜一块肉来招待客人……。非正常猎荤行动非常事，正常行动又扛枪不遇鸟可遇不可求。以稀有荤腥应付锈迹斑斑的肠子，实在是杯水车薪。

去公社交烟叶返回，日头偏西，饿。到路旁村子打听知青屋，踅去，屋里没人。按惯例，无论认识否，只要是知青，吃便是。主人若不在，吃了留个条子就行。几人急慌慌于甑子里撬冷饭时，不经意间发现一瓶猪油，大喜，以筷子挑了就吃。那叫一个过瘾啊！每一毛孔都舒展着流淌出幸福来。那知青收工回来，是个女的。见这几个小子冷饭冷油正幸福得无以名状，呆立门口，便流下眼泪。几个大小伙面面相觑，后悔，光想吃，没注意屋子摆设有性别差异，知道是女生也不至于非吃那油不可呀。嗫嚅着道歉，那女知青抽泣不语，益发尴尬，羞愧难当。良久，女知青平静，道：我们怎么就落到这一步了！叹罢，以开水涮了油瓶里的剩余内容煮菜……。饭后，几人劈柴挑水楔锄头磨镰刀卖力表现，天黑才踏上回村的路。后来知道，这丫头老爸被监督劳动，身份“黑”，招工什么的根本轮不着她。路上，几人内心歉疚，约定，无论谁先招工出去，头月工资必须买猪油还人家，以弥补良心亏欠。月亮做证，击掌为誓，庄之严之，很男人。

那小子幸运，先得到招工表，几人在送他时都不言语，只拿眼睛看定他。他毛了，嚷嚷：不就是头一月工资买猪油吗？我连买俩月！小子们笑了，挥手作别。那时学工工资18.2元，猪油是带来了，可听说那小子连做了俩月讨口要饭的叫花子。后来，这几个男生凡离开农村者，都没忘了给那女知青稍干肉腌肉还有油，直到她离开农村。友谊就此延续了下去。

近年聚会，见人惊异他们几十年的友谊，几人笑称：我们之间经历过急风暴雨考验的同志加兄弟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猪油凝成的！

如厕

农村的厕所叫茅厕（Si），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便可。茅厕不分性别，一般以咳嗽为号，因耳背、刹车不及或讯号失误时常发生尴尬；还因松毛遮挡不严令春光外泄；吸烟和照明也烧过茅厕，有悖于安全文明。为此知青决心改革，文明如厕。

首先采用翻牌制。即在一木片两面分别写上男女，如厕翻牌，避免尴尬又可容多人共用，但经常发生人在里面方便，好奇者或好事者在外面乱翻，翻牌制失败。后采用标志式，即如厕者搭皮带于墙头，起提示作用又避免咳嗽暴露性别使耳热心跳便意梗阻，却失败得更快：如厕者常眼看皮带消失而无可奈何。总结：改革不彻底！于是挖一长坑栽以木杆钉上油毡，本村自古以来第一个区分性别的文明示范厕所宣告诞生。

建成第二天即发现男女厕隔墙油毡出现豆大小洞，愤怒声讨后补之；第三天又出现一碗大的洞，愤怒声讨后复补之；第四天洞如脸盆，愤怒声讨后再补之；第五天起床隔墙竟整个坍倒。后来村童发现以石击毡其声悦耳贯通效果极佳，石雨过后，茅厕外墙百孔千窗，又有智者察觉油毡引火易燃，墙就尸骨无存，兀立的几棵木杆被当做椽子材料也尽数偷去，只余粪坑，乱石狰狞。文明示范厕所寿终正寝。

此后知青解手颇随意，虽方便，无粪肥，不久长。莫谈改革，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从此茅厕无恙粪肥丰盈。

屁事

屁，不雅。这人身之气本与饱嗝无二，却因出处不同而“出身”迥异。人食五谷焉有不行屁事之理？骂之不雅而放之又放，虚伪。而屁话，尤辱斯文。放得却说不得，州官放得火百姓点不得灯？然知青打油：屁乃五谷气，肚里溜出去，放屁爽气，闻屁丧气。早反上了梁山。快哉！

春荒。阴雨。饥寒。为保热量而躺倒。想前途渺茫烦闷空虚，众知青眼望屋顶心事重重，寂静。应了“冷尿饿屁”的老话，肠鸣后便有喷薄欲望。可小心翼翼，反憋得声调怪异，丝丝缕缕绵绵不绝。终有男知青耐烦不得，掀

开被窝冲天一怒，轰然酣畅。众效仿。偏牛圈改建的宿舍隔音极差，隔壁女生吃吃笑后还以颜色，亦不让须眉。一时间，不雅响动此起彼伏。此前少男少女尚羞谈这有声无形之物，此禁一开，不可收拾。有呼名唤姓以此相赠者；有举枪瞄准声型俱备者；有冲吉它听余音回声者……。更有甚者，竟以手捉之于鼾者鼻前释放，令呼噜骤停以解鼾声困扰难眠之苦。少年不识愁滋味。笑闹中，竟也暂忘了境困心烦。

山民自称应天府人氏，古风犹存。许是久居边地，风俗变异：同性间偶有这不雅响动尚祥装未闻，异性间则更不可造次。然知青不明究里，闹便闹了，谁晓会因屁惹祸？

知青户这日偏偏主食红豆，产气。出工挑粪，一壮硕村姑持粪瓢专司装粪。这男知青近前时，忽感腹胀难耐，然面对异性，一忍再忍。待粪桶装满挑担上肩起身用力，忍无可忍，如雷贯耳。其声之巨，惊落村姑手中粪瓢。悲剧发生。只见那村姑面色由红转青，捂脸掉头就跑。该知青愧疚，却不当事，挑担吱呀而去。地头，知青起哄没心没肺，闻讯而来的队长问明缘由脸色大变，狂吼“赶紧找人！”众人方知事态严重，忙向村寨山崖树林河沟人仰马翻鸡飞狗跳地几路狂奔而去……。声断气绝哭昏在地的村姑在河边大竹林里找到。村人终日出没于她家开导劝慰，知青登门道歉被泔水泼出，山民皆冷眼相对。事件由小队而大队而公社，知青户连日震荡着干部的咆哮。晕头涨脑的知青渐晓：此举山民视为大辱。按旧时规矩，据女方意愿，事主或娶该女，或赔钱财。队长说，新社会，不兴。人家也看不上你个麻杆，赔工分吧。知青诺诺：赔赔，他的不够就扣我们的。想那干瘦知青若娶壮硕村姑，身形1：2尚显不足，欲笑，却不敢。

此后一段时日，村童见知青，必蹈足击臀而歌：小知青——乱打（放）屁——恶（音：务）俗！是够恶够俗的。知青皆勾头滴水蔫败屁臭心虚气短无人敢应。屁，不可乱打！是为教训。



情书

牛屎还真收到了情书？！男知青翻地，绰号“小青瓜”的小女生找来，把叠成燕形的纸条给他：冷姐给你的。其得意，挥纸条，挤眉弄眼。全体沮丧：不仅为每人输掉一包烟，还应验了鲜花与牛屎之关系问题。“小青瓜”见状，茫然。

牛屎其实不差。长胡子了，肩宽了，肉鼓了，喉结骨碌，很男性了。行为也有异：搽“百雀灵”了，挤青春痘了，使镜子了，讲卫生了，帮女生干活了。山民说得透彻：小公鸡开叫了！公鸡斜翅膀蹬脚围母鸡转的样子，巨流氓。尚存男女界限残余的知青耻笑，牛屎轻蔑：小青屁股娃娃。那还没长开的小女生对其“不同”表示疑问时，其刚吐出“小青……”便想起性别，话到嘴边改成了“小青瓜”。还真恰如其分，遂成绰号。其傲然宣称：月内必得“冷美人”芳心，情书为证！众唱：鲜花（那个）插在那牛屎上呀。其曰：牛屎富含营养，正合适！想那冷姓女知青矜持得跟她的姓氏一样，牛屎竟异想天开，均愿以烟打赌。

牛屎的攻坚堪称火力强劲。从帮厨砍柴挑水一直地里的活计，一帮到底。吃过晚饭找个茬就跑女宿舍：写信问字借书找针心得笔记主义信念远大理想还有上海奶糖炒黄豆烤洋芋……非半夜而不归，那执著，啧啧。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堡垒就是这样攻破的！牛屎还真收到情书了。在知青点这是头一份！其激动难耐，翻地就心不在焉，一会就溜了号，众人知道，他消受情书去了。情书，对于小青头们来说，神秘了，新奇了，撩人了。收工就往宿舍赶，一路发誓，坚决抢来观摩学习。其实不用抢，众人进屋就感觉不对劲：牛屎垂头枯坐，一包“等外烟”抽得云遮雾罩，只半天工夫，嘴唇生了一圈燎泡。众愕然，打问，牛屎将头往床上一偏——情书就摊在床上。围观，抬头，眼神交换，有人鬼脸，随即大笑倒地。那“情书”字体劲健力透纸背，尤其那三个惊叹号下的点，都被戳成三个大洞。可见情绪之激动——

“女生宿舍晚八点后拒绝男同志来访！！！”

呜呼，牛屎的、也是本知青点开天辟地的第一份情书哟。众乐毕，忽觉不妥，遂安慰：这就是情书，烟你还是赢得了。乱中，无人察觉“小青瓜”何时摸来，她手捧“情书”眼望虚空作沉思状，口中傻呵呵地喃喃：是了，爱情了！刚直起腰的人们遂再次栽倒。

牛屎上到底没插了鲜花，种了小青瓜，成一家了。大伙说牛屎种瓜得豆。小青瓜嗔：瓜豆何指？忙摆手，当然你是瓜。牛屎道：还小青瓜呢，都老倭瓜了。话音未落，拳如雨……

打食

打食——山里话中打柴打鞋打野物之众多“打”中之一打。意为：淘生活糊口。非“打”而不得食。蛮荒意味犹存。物竞天择啊，也是正道。

地瘦田薄产量低，上公粮上余粮又是“爱国粮”、“卫生粮”等鸟号召，粮袋瘪了。不打食帮衬，难熬。知青乃纯粹的无产者。无房无地无生存必须的经验技能物资储备和家族后盾，抵御饥谨能力明显低下于原住民。打猎，没那手艺；赶山，只能捡漏食；跳“丰收舞”，满目青苗；钓鸡，山民对“鸡屁股银行”盯得紧……这“打食”就奇异了。

知青浪子，识得“人解凉，狗断肠”的中药马钱子，捣碎裹饵诱狗食下，便至河埂候之。少时，干渴难奈的狗窜来，狂饮，旋即腹胀如鼓，哼唧展转。浪子笑指：倒！便倒。使孩童报其主，山民不食瘟，况死狗，施与浪子。得逞。不想来了“打狗运动”，狗绝，此法休矣。再想辙：于晒场把学生时的少年长拳、广播体操逐一演练，半大小子们敬畏，拜师。浪子啃鸡腿作“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武德”教育，欣任教头，安享供奉。不想学了广播体操的徒儿以“冲拳运动”招摇乡里，终惹麻烦。某日，浪子酒酣，醉眼迷离，有人寻其“切磋”，架不住徒儿怂恿，接招。待清醒，发觉自己漂荡于清水茅坑，徒儿们“轰”的散了。失了供奉的浪子又有发现：木匠为嫁姑娘娶媳妇的人家做箱子，仅以红墨水涂染，便集墨水墨汁乃至红汞碘酒各色染料绘极其恶俗之图案，竟得青睐，遂成漆匠。然嫁姑娘娶媳妇并非常事，漆匠所得那点吃食挡不住粮袋日浅。

数着包谷籽度日的滋味，难过。终于，浪子以令淳朴山民目瞪口呆的“打食”手段，成为了他们暗自认可的“人物”。

大队头头坚持不要返销粮，并不对社员肚子负责。浪子终于开始吃“百家饭”，挨家挨户，一路吃去，不重复。浪子始终不承认是要饭，自不需行头道具。一矣人家饭上桌，进门抄碗舀了就吃，并不理会人家说得多难听。浪子自有理论：不是我要来，是毛主席派我来，当然吃“派饭”。要饭有理。霸气！连吃几家清汤寡水的菜糊糊后，浪子打住。街天，浪子破军衣以烂草绳扎着，没了后跟的解放鞋如拖鞋趿着，大号搪瓷碗钢盔似地顶着，一根棍子腰刀那样夹着，歪斜于公社大门柱革委会牌子上，似笑非笑盯着出入者，并不言语。这很捣毁形象。不成体统。他被注意了，赶而不走，被“请”进去，后来又打着饱嗝送出来……。再后来，公社通知去拉返销粮，浪子在公社的言行被披露，说他威胁：若不给返销粮，他将进城以此形象展现于县革委、省革委大门。

犯上。在这山旮旯里，算大事了。于山民来说，是大好事；于头头们来说，是大坏事。惟浪子没事，依旧悠然于乡间。

妙论

缪知青有这本事，正经说辞到他嘴里皆非驴非马讲成相声，尚能脸无表情直面轰笑。公社知青会，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其发言：滚泥巴抹牛屎磨茧子养虱子把自己培养成真枪实弹的农民老倌。众暴笑，主任气极，拍案怒斥：妙论！都晓应为“谬论”，众知青却以坏笑附和：妙论！他很妙论！“妙论”乃成绰号。就妙论吧，又没说错什么。妙论一脸无辜。笑中，并无人品味其内在含义。妙论之谬论之精妙，后来才为知青们所认知。

知青慰问团将至，公社重视，主任现场动员。知青从山上田间零散而来，大队部笑声就此起彼伏。笑薅地男生鱼网似的背心、笑翻粮女生老太样的头巾、笑背煤的黑、笑耙田的灰。妙论腋夹牛鞭斜挎粪兜，黑绿粪液顺屁股流了半身，臭气熏天轰轰烈烈地来了。文书要提粪兜出去，他不让，说这是工分，出门就成村童的了。笑声如浪。妙论不满：笑什么？世界观大粪臭五谷香滚泥巴抹牛屎要真枪实弹！眼见有人笑瘫，主任脸色变绿。他没了长篇大论的心思，言简意赅：一、慰问团来，知青都要当面表态扎根农村并与慰问团种“扎根树”以示决心；二、要体现知识青年风貌，不准穿瘦裤脚等奇装异服。看看你们，简直是一群……妙论严肃接上：革命接班人！主任一摔袖子，走了。

主任走了，知青愁了。当着各级组织正式表态永远呆在农村？难！那时的娃娃还没练就把假话说得比真话还真的硬功，非此即彼的选择，真真愁白少年头。惟妙论无愁，上山下地吃饭睡觉。众奇，探询。妙论说，到时候他先发言，谁也别抢。再不多言。

慰问团来，集体种“扎根树”的创举自是头项内容。慰问团非生身父母，却都是知青家长。河埂上，老父母们握锄的手抖了，知青们接过来，卖力栽树。开会，讲话致辞一番热闹后，知青表态。众看妙论，其半梦半醒。会场一静，就都明白了。降温！便都装了迷糊。一时间，静若真空。这“表态”令主席台的尴尬非常，慰问团的互递眼神心照不宣。主任坐不住，欲言。此时妙论开口：愿做革命螺丝钉，拧在农村就扎根。一旦工业战线、城市建设、保卫祖国需要，就把我起出来，我不惜头颅热血挺身而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革命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革命青年听党话，党叫干啥就干啥。真正妙论！知青据此创造发展发言踊跃，慰问团报以阵阵掌声……

只一夜，“扎根树”成了拔根树，顺水东流去。公社欲追查，慰问团顾左右言他，登车绝尘而去。后听说，此

后慰问团所到之处，皆先与知青促膝谈心，循循善诱，知青的大会发言就如出一辙，遂成经典。

妙论，高人那！

知青趣事



知青趣事八——

如厕

农村的厕所叫茅厕（Si），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便可。茅厕不分性别，一般以咳嗽为号，因耳背、刹车不及或讯号失误时常发生尴尬；还因松毛遮挡不严令春光外泄；吸烟和照明也烧过茅厕，有悖于安全文明。为此知青决心改革，文明如厕。

首先采用翻牌制。即在一木片两面分别写上男女，如厕翻牌，避免尴尬又可容多人共用，但经常发生人在里面方便，好奇者或好事者在外面乱翻，翻牌制失败。后采用标志式，即如厕者搭皮带于墙头，起提示作用又避免咳嗽暴露性别使耳热心跳便意梗阻，却失败得更快：如厕者常眼看皮带消失而无可奈何。总结：改革不彻底！于是挖一长坑栽以木杆钉上油毡，本村自古以来第一个区分性别的文明示范厕所宣告诞生。

建成第二天即发现男女厕隔墙油毡出现豆大小洞，愤怒声讨后补之；第三天又出现一碗大的洞，愤怒声讨后复补之；第四天洞如脸盆，愤怒声讨后再补之；第五天起床隔墙竟整个坍倒。后来村童发现以石击毡其声悦耳贯通效果极佳，石雨过后，茅厕外墙百孔千窗，又有智者察觉油毡引火易燃，墙就尸骨无存，兀立的几棵木杆被当做椽子材料也尽数偷去，只余粪坑，乱石狰狞。文明示范厕所寿终正寝。

此后知青解手颇随意，虽方便，无粪肥，不久长。莫谈改革，挖个坑，搭几根圆木塞上石块不使滚动，再用木杆支成三脚架胡乱铺上松毛，从此茅厕无恙粪肥丰盈。

屁事

屁，不雅。这人身之气本与饱嗝无二，却因出处不同而“出身”迥异。人食五谷焉有不行屁事之理？骂之不雅而放之又放，虚伪。而屁话，尤辱斯文。放得却说不得，州官放得火百姓点不得灯？然知青打油：屁乃五谷气，肚里溜出去，放屁爽气，闻屁丧气。早反上了梁山。快哉！

春荒。阴雨。饥寒。为保热量而躺倒。想前途渺茫烦闷空虚，众知青眼望屋顶心事重重，寂静。应了“冷尿饿屁”的老话，肠鸣后便有喷薄欲望。可小心翼翼，反憋得声调怪异，丝丝缕缕绵绵不绝。终有男知青耐烦不得，掀开被窝冲天一怒，轰然酣畅。众效仿。偏牛圈改建的宿舍隔音极差，隔壁女生吃吃笑后还以颜色，亦不让须眉。一时间，不雅响动此起彼伏。此前少男少女尚羞谈这有声无形之物，此禁一开，不可收拾。有呼名唤姓以此相赠者；有举枪瞄准声型俱备者；有冲吉它听余音回声者……。更有甚者，竟以手捉之于鼾者鼻前释放，令呼噜骤停以解鼾声困扰难眠之苦。少年不识愁滋味。笑闹中，竟也暂忘了境困心烦。

山民自称应天府人氏，古风犹存。许是久居边地，风俗变异：同性间偶有这不雅响动尚祥装未闻，异性间则更不可造次。然知青不明究里，闹便闹了，谁晓会因屁惹祸？

知青户这日偏偏主食红豆，产气。出工挑粪，一壮硕村姑持粪瓢专司装粪。这男知青近前时，忽感腹胀难耐，然面对异性，一忍再忍。待粪桶装满挑担上肩起身用力，忍无可忍，如雷贯耳。其声之巨，惊落村姑手中粪瓢。悲剧发生。只见那村姑面色由红转青，捂脸掉头就跑。该知青愧疚，却不当事，挑担吱呀而去。地头，知青起哄没心没肺，闻讯而来的队长问明缘由脸色大变，狂吼“赶紧找人！”众人方知事态严重，忙向村寨山崖树林河沟人仰马翻鸡飞狗跳地几路狂奔而去……。声断气绝哭昏在地的村姑在河边大竹林里找到。村人终日出没于她家开导劝慰，知青登门道歉被泔水泼出，山民皆冷眼相对。事件由小队而大队而公社，知青户连日震荡着干部的咆哮。晕头涨脑的知青渐晓：此举山民视为大辱。按旧时规矩，据女方意愿，事主或娶该女，或赔钱财。队长说，新社会，不兴。人家也看不上你个麻杆，赔工分吧。知青诺诺：赔赔，他的不够就扣我们的。想那干瘦知青若娶壮硕村姑，身形1：2尚显不足，欲笑，却不敢。

此后一段时日，村童见知青，必蹈足击臀而歌：小知青——乱打（放）屁——恶（音：务）俗！是够恶够俗的。知青皆勾头滴水蔫败屁臭心虚气短无人敢应。屁，不可乱打！是为教训。

荤腥

几个知青于河埂出恭，起身发楞：那排泄物晶莹透明点缀些红椒，煞是好看。不记得吃了多久的煮洋芋佐以烤干椒蘸盐，制造出这般模样的粪，干了就是白粉末，风吹就了无踪迹。卫生了，肥效谈不上。那初中小男生冲上粪堆朝天而跪，双手高举状若鸡爪，嘶喊：想吃肉啊——！唉，缺荤腥，肠子寡淡如肥皂洗过，竟活得连做造粪机都不合格了。

细想，那年月还是有荤腥。非正常渠道：鸡猪狗猫马牛羊；正常渠道：鹊鸦鸟蛇獾兔虫。鸡是钓的，以饵相诱，鸡上钩挣而不叫，收之，都会。狗是打的，火铳锄把，也有偷吃猪食的狗被罩于槽内以大锅开水烫毙。鱼是炸

的，民兵来查炸药，枪竟被拆了。牲畜病死，山民埋了，夜里刨出就烤。吃猪是邻社知青相邀，谁想他们竟自活猪屁股硬剜一块肉来招待客人……。非正常猎荤行动非常事，正常行动又扛枪不遇鸟可遇不可求。以稀有荤腥应付锈迹斑斑的肠子，实在是杯水车薪。

去公社交烟叶返回，日头偏西，饿。到路旁村子打听知青屋，趸去，屋里没人。按惯例，无论认识否，只要是知青，吃便是。主人若不在，吃了留个条子就行。几人急慌慌于甄子里撬冷饭时，不经意间发现一瓶猪油，大喜，以筷子挑了就吃。那叫一个过瘾啊！每一毛孔都舒展着流淌出幸福来。那知青收工回来，是个女的。见这几个小子冷饭冷油正幸福得无以名状，呆立门口，便流下眼泪。几个大小伙面面相觑，后悔，光想吃，没注意屋子摆设有性别差异，知道是女生也不至于非吃那油不可呀。嗫嚅着道歉，那女知青抽泣不语，益发尴尬，羞愧难当。良久，女知青平静，道：我们怎么就落到这一步了！叹罢，以开水涮了油瓶里的剩余内容煮菜……。饭后，几人劈柴挑水楔锄头磨镰刀卖力表现，天黑才踏上回村的路。后来知道，这丫头老爸被监督劳动，身份“黑”，招工什么的根本轮不着她。路上，几人内心歉疚，约定，无论谁先招工出去，头月工资必须买猪油还人家，以弥补良心亏欠。月亮做证，击掌为誓，庄之严之，很男人。

那小子幸运，先得到招工表，几人在送他时都不言语，只拿眼睛看定他。他毛了，嚷嚷：不就是头一月工资买猪油吗？我连买俩月！小子们笑了，挥手作别。那时学工工资18.2元，猪油是带来了，可听说那小子连做了俩月讨口要饭的叫花子。后来，这几个男生凡离开农村者，都没忘了给那女知青稍干肉腌肉还有油，直到她离开农村。友谊就此延续了下去。

近年聚会，见人惊异他们几十年的友谊，几人笑称：我们之间经历过急风暴雨考验的同志加兄弟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是猪油凝成的！

知青趣事：

打赌

知青吃饭使锅，Φ22cm的铝制品。一次盛够，省却回头添那不知还有没有的饭。包谷饭泡以“玻璃汤”，忙望嘴里塞，没注意脚下，栽倒，锅扣于地。拾锅，骇然，伏地不动，审视眼前赫然矗立的、托土坯那样扣在地上呈完美圆柱体的饭。猜测那瘪腹里的胃，如何容纳这若大一坨？口洞无底，胃壑难填。山民均晓，若无充分之物质与心理准备，与知青相遇切不可以“饭否”问候，一矣黏上，心绞痛。

胸无大志啊！十六、七岁的人，吃字当头，与豚无异。一说吃，便眼放绿光，因而，以吃打赌寻常事，形式各异，蔚为大观——生理反射类：入厕就餐、粪桶捞罐头；胃容量类：灌凉水；体罚类：倒立、俯卧撑、金鸡独立……其中体罚类非高能量食物而不赌，如肉食。一知青探家返回，携干面条二斤。眼馋，起哄，遂以100工分赌之，“一气喝成”。即：喝而不嚼。挑战者为减体积半熟即食，矣最后一口下咽，张嘴喘气口不能合。庄家不甘，命其闭嘴。乃闭。却不料饱嗝袭来，面条自鼻孔汹涌喷射……。100工分啊！擂胸顿足。

狗街有食馆，名“狗街食馆”。防碗丢失，每碗均烧有馆名简称：“狗食”。“狗食”有油水荤腥，对囊中羞涩又常年哽噎杂粮的知青来说，最实惠的，是门口蒸笼里的呛面馒头！细粮。顺溜解馋养胃。不知谁赌输，众人不远十里奔“狗食”而来。十个大馒头喧腾白皙香味扑鼻勾人食欲，便又有赌：立地独食。赌资：购馒头的钱和粮票。众人坐望赌者，是为监督。食至一半，腰带全放。卖馒头老者见状相劝，称呛面馒头“发”，恐撑着。不理。食之剩三，速度减慢。老者惊慌，阻拦，赌者推之。其踮脚尖以后跟蹾地，期颠实胃中之物扩容，续食。其时已食之勉强，腰身犟直。众劝其放弃，并声言不予索赔。那老者已目瞪口呆，泥塑一般。最后一个，众人抢夺，未遂。赌者腮帮圆鼓却不能咀嚼，面色发青，眼珠暴凸，便伸手要水。此时，老者自失措的众人身后冲出，声泪俱下：千万不能喝水呀娃娃，要胀死人的！替家里的爹妈想想啊，钱粮我都不要了！赌者眼神疑虑，老者忙将钱粮取来，一松劲，鹅蛋大一坨自其口中匍然落地，脖子一伸，又一坨、又一坨……。老者连呼有救。

国营食堂，钱粮是要付的。别过老者，回村。山路上，寂静无声，只闻喘息和脚步嚓嚓。一知青猛抬头狂喊：狗日的馒头——！暮色苍茫的山间，远远近近地荡起一阵回声。

神医

那年月书是没有好生念过的，转着圈地学工学农学军，都弄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该男生入“红医班”，跟解放军医疗队“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巡回过，插队后将破挎包漆个十字，装些药物器具随身携带，神圣了，任谁都不能动。再让电影《红雨》“一根银针治百病，贫下中农人人夸”一煽呼，便痴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被翻成破扇，到处搜偏方。出言必称经络，抓草必呼妙药，见人就说有病。看这个的舌苔，翻那个的眼皮，无论男女是只手扯来便摸脉。别和他提医，否则他“望闻问切阴阳五行”地能烦得你撞墙。

干活歇稍，一知青由他号脉，待他渐入佳境，抽手以趴在身边打盹的大黄狗之前腿替之，兀自吸烟去了。他只说别动，并未睁眼，随后呼吸均匀涎水长流，竟眯着了。队长干活哨声一响，他一机灵即回归角色，说：有病！那知青老远冲他嚷：你才有病。哄笑。

农村缺医少药，山民求治。其感责任重大，须实践。知青除上红汞碘酒或开心逗乐，敢把自己交他收拾？他就收拾自己。某日大伙回来，惊呆：其鼻歪眼斜，咿咿唔唔，手脚抽搐——他用银针把自己扎成个刺猬。众人施救，其缓过来，胯下已精湿臊臭。近年读《知青启示录》里有“医痴”将自己肚子拉开割盲肠。此“医痴”，彼亦“医痴”，异曲而同工。

骄阳似火。赶集，路遇老头以手撑地，表情难受。他两眼放光，趋前打问，知其恶心。忙扶于树荫，取银针，命老汉以掌置膝，照虎口一针扎下，边捻边打量老汉。老汉许是中暑，荫凉和针刺令其松活，聊起来，说拉稀吃烧大蒜，奇效。对脾气，嘴聊手捻滔滔不绝。回过神来，忙问：有无针感？老汉不知何为针感，解释：酸麻胀。老汉急呼：有有有，早想说的，不光手酸麻胀，腿也酸麻胀。低头看去，惊一身冷汗：那针已穿透虎口扎入大腿，忙拔针。老汉起身活动手脚，面呈惊异，称奇，说膝盖疼几天了，没想到治恶心把腿给弄好了。

“神医！”该知青名声大噪，惊动公社，遂送医训班，发给红药箱，当“赤脚医生”。

此后，该知青就真象电影红雨那样“出诊翻千重岭，采药攀万丈岩”，终日神游山里。可知青们一说神医都笑，说：真神，神癫癫，是够神的。再后来，“贫下中农人人夸”的他被推荐上学，学兽医。知青们送他时都情真意切地说，只要不医人，我们就放心了。

因果

“师曰：老天下雪不下水，雪落地上化成水，由雪变水多麻烦，不如直接就下水。生答：老师吃饭不吃屎，饭到肚里变成屎，由饭变屎多麻烦，不如直接就吃屎。”一开饭，该男生必谈五谷轮回之物，有好吃的时候尤如此，保留节目。除寻开心外，实则期待人因恶心不食而多吃多占。有女知青斥其：吃屎的嘴！其不恼，指饭菜说：我们都用嘴间接吃屎。知其别有用心，怎奈拳击死猪，奈何不得，其乐此不疲连连得手。事皆有度，久蹲茅厕不觉臭，疲了。其故伎重演，众充耳不闻，至多笑骂：缺德鬼遭报应！

风顺雨沛太阳好，赶山季节。女知青拾得蘑菇，烹之。挨晚，该男知青腹空，不待收工便偷偷溜号。进门闻得山珍之味，涎水咕涌。踅至伙房，腆脸陪笑。知其来意，女知青警告：少在这转，等大伙回来。无机可乘，悻悻回屋。然香味毕竟关不住，丝丝屡屡挥之不去，心痒猫抓，腹内饥火愈盛。鬼使神差，晃悠出门，待发觉自己身在伙房时，手里多了一盛饭物什。凑近锅台，谄笑道：给点吃的。女知青以锅铲唬之：吃屎！其借势发挥，笑答：可能。如便后以草擦拭，漏，指染，本能一甩，指头砸墙，疼，条件反射，以嘴嘬之……女知青以锅铲怒拍其项背，其缩头耸肩飞速伸手至锅中一舀，溜之大吉。

收工。知青们进院，见女知青惊慌无措立于院中，男宿舍砰啪乱响伴以粗重喘息和怪异喊叫，似有惨烈搏斗。冲入，宿舍一片狼籍，该男生不知如何上得房梁，其精神亢奋两眼放光口吐白沫端一根锄把作英勇搏斗状，俨然《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众愕然，问其故，女知青说缘由，一知青大叫：蘑菇没煮熟，中毒了！即奔去寻赤脚医生。知青们一涌而上将其勒住。赤脚医生至，急呼催吐！闻讯之乡邻早已携带给牛灌药的竹管、粪桶等一应物什，拥那叫“牛医生”的放牛老汉奔来。平日稀松老汉，此时如将军发号施令，命勒好中毒者，以水稀释鲜牛粪，竹筒盛之欲灌。知青阻止，疑问。老汉圆睁双目怒喝：救命要紧！知青半疑半信讪讪而退，眼见两竹筒青黑稀牛粪汩汩灌下，该知青随即吐个倒海翻江……

深夜，该知青魂魄渐归，四顾。众人始长喘一口气。一放松，便有吃吃笑声，问何故？云：我说他是吃屎的嘴嘛。说屎者吃，此乃因果。众乐翻。

知青趣事十：

三醉

烟茶酒，嘴里走，天下头，怕个球。旱烟烤茶老酒在嘴里过一遭，心畅了，气顺了，天宽地阔。再起身，赳赳山汉，艰辛世事皆“怕个球！”此乃老天赐予山民润泽锈涩日月的宝物。山民待客亦如此。客入，让于火塘上首，递铜头玉嘴烟锅，一袋烟后，心定神安；颠起烤茶罐焦香弥漫，酽茶汤入口，心旷神怡；哗啷啷酒碗排开，包谷酒香，就心醉神迷了。

烟茶酒“未成年不宜”。当知青却是无论年龄一夜成人。三醉，是成人的洗礼，是那片土地代知青的父母为知青行的成人礼。

听得唢呐响，趸去，婚宴丧饭，便吃，礼却拿不出。有白眼，视若不见。嚎“螃蟹哥，八只脚……”酒歌醺醺。举碗齐眉，仰脖，亮碗，落三滴，罚！热闹，主家高兴。宴毕，一路歪斜。乡间数年，酒喝无数，包括赤脚医生的酒精。那十五岁还尿床的小知青，喝必醉，醉必喊妈妈……醉乃经常。怕的感觉缘自酒房遭遇，厉害了。那次讨水，烤酒师傅在热气蒸腾的酒房睡得不知今夕何年。喝空水罐，便有发现：酒甑上有塞住的竹管，拔开，液体温热。尝，香而不辣，嘴接之，你来我往。“好酒不打头”，未感醉。悄然溜之，出门数十步，凉风袭，忽觉踩波踏浪，山倒树歪，遂地复天翻……一干人醒于次日夜，其间消耗酸菜老汤两坛，浓茶一桶。此后一段，不谈酒。是为一醉。

弹尽粮绝。全体倒立，无硬币滚出，五分一包的“经济烟”亦成奢望。是夜，打火把撅腚遍寻小院，得烟屁数棵，内有二角七一包的“金沙江”，好烟屁！山民吸旱烟，射烟痰，表情若仙。神往，求吸，山民慨允。卷棕黑“兰花烟”塞于烟锅，含玉烟嘴凑火，装得老练。头两口未过喉，辛辣劲烈口水狂涌，便明白山民为何抽烟射口

水，便也射。山民吸旱烟过嘴不过喉，“放屁烟”是也。知青不晓，猛吸几口过喉入肺，肺灼。一呛，口水吞下，胃灼。此时想装老练亦不能：肺憋胃翻，心脏狂跳，眼飞金蝇，一头冷汗，手脚冰凉，就地栽倒。知青装老练，山民不知情，内疚，将知青背回，趴大锅沸水四周狂吞水蒸汽，曰：“吃汽汗水”。数日后，头晕干呕心慌症状渐消。此为二醉。

山民待客以烤茶。小茶罐烤于火塘，冒青烟，茶一捧放入，沙沙颠动。少倾，焦香，不枯不生，水入罐，“嗤”一声，罐溢，吹下，再溢再吹，连续三次，称“三潽”，颇考火候。茶罐置于热灰煨沸，取小盅盛之。只见牛眼小盅内汤色棕黑，其酽似能扯丝，奇香。喝烤茶讲究：闻其香令口舌生津，后以唇舌沾之咂摸其妙。客套聊天说话，以白水“换口”，再尝。此茶以品为主，可知青牛饮为常，不晓其妙，只想这主家小气，此一盅半口不到，何以解渴？然茶香诱人，一饮而尽。主家尚期客人夸赞，见状色变：不是嫌茶不好就是寻事来了。忙续之。干杯！再续。再干！如此喝法，结果可想。凡喝者均糙肠寡肚眼花手抖虚汗阵阵，清口水长流不止，持续一周方解。其乃三醉。

酒醉二，烟醉三，茶醉五天手脚瘫。多年后得知，都是乙醇、尼古丁和茶啡碱给闹的。此一闹，却让我们更深地走入山里人家，懂了规矩，体味了乡情与文化，成人了。

三醉啊！无有三醉，算不得一条山里汉子。

灭虱

“三同”，即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逢一满身虱子的老知青被推荐上学，公社不失时机开展教育现身说法：“红与专”不仅“滚一身泥巴”塞一肚杂粮，“同住”是关键。言下之意：不长虱子不革命。若要“红”，虱子拱。头皮发麻。有传说，那知青是专门向农民讨要了虱子饲养于身实现的革命化。一笑了之，未在意。然而，想不革命都不行了。知青去公社受教育，队里派根红可靠之老贫农看家。该老贫农稀罕知青被窝“恁个白”，享用之。从此，知青便与老贫农之虱的后代子孙，展开了坚苦卓绝的持久战。

生虱，烦腻，时有不恭之辞，一“踢左脚”之女知青以“革命虫”为之正名。有捣蛋男生捉“虫”趁其不察而赠，“革命火种”星火燎原，该女知青终入“革命队伍”，同仇敌忾了。痒！不可耐，手忙脚乱，顾此失彼，随时伸手抓挠于衣裤内。形态不端庄倒也罢，可这虱子吃人还羞人，不时爬出领口招摇于脖颈，令颜面尽失。愤怒！采取各种物理化学方法剿之：六六粉、敌敌畏、篦子……衣物搓洗暴晒、水里溺、雪里冻，用火烤尤解恨，听虱落火中噼啪作响，大快人心。可野火烧不尽啊！遍施酷刑，虱生生不息剿而不灭，人虱相持。

虱喜热，遇热蠢蠢欲动，此乃最佳灭虱时机。冬晴日，墙角地头男女老少烤太阳打灭虱人民战争。自清门户的，协作相帮的，一派动人景象。有捕获，比大小，辨公母。掐之，暴一声响，胜利豪情油然而生；咬之，也暴一声响，恨恨：你吃我我也吃你！酣畅。更有彻底革命者，索性脱衣铺地暴晒，虱与虱蛋暴露于光天化日下，猛抖。再一声断子绝孙切齿，顺衣缝呲拉刮去，便有晶亮虱蛋垒积指甲壳，灿然。魏晋先人“扪虱而谈”那叫风流，而此时我们是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噼啪声此起彼伏，既享受冬日阳光和征服快意，又混了工分讲究了卫生，乐陶陶。

这乐趣城里人享受不到就深恶痛绝。家长均晓知青身上豢养有微型动物无数，至家门而拒入，撵往澡堂，衣物浇以沸水，漂一层……不痒了，手没了抓挠，不习惯。返回乡里，再痒，又不适应。抚身上新创旧痕，涌满腔新仇旧恨，奋起决战！非斩尽杀绝而后快，寄生虫们的末日到了。被褥蚊帐鞋袜连皮带都烫之于沸水，床铺家具地板墙角连板壁皆喷撒以农药，灭虱之战终以知青彻底之胜利而告终。

他日，再见农人们捉虱其乐融融，知青怅然，竟感失落了。

夜盲

突然地，就都看不见了。天擦黑，明白听见门外村民脚步、钩担吱呀和孩童嬉闹，任大睁眼睛，就是漆黑莫辨。摸索点油灯，围坐昏黄光晕，惶恐。山民说得了“鸡蒙眼”。鸡没有夜视能力，人如何得这毛病？连续吃干腌菜汤泡包谷饭，口唇生疮牙床溃烂。知青是“有知识的青年”，很快找到原因：缺叶绿素吧？那得吃蔬菜呀。于是后悔不迭。

山势陡峭，山村地少，知青没划自留地。村民良善，以菜相赠。无地，吃之坦然。数月，村民为知青无地鸣不平。迫于舆论，队上将河滩地划与。此地卵石密布，雨季淹，洪水冲，不可耕。队里也无奈啊。知青未知生活多舛，笑闹欢呼，借夯土工具，要椽子木板。队长不解，但鉴于知青体恤，解其舆论压力，允之。翌日，知青盘地，社员出工。待收工回来，村人愕然——半个篮球场赫然河滩。没心没肺的小子们耍得欢实，引一群孩童喧哗。

有地没菜了。村民不送了。该自己种的。但球场毕竟是脱离父母后建成的首件作品，知青陶然，未有感觉。后来活路重，累半死，球场人迹渐稀；又后来篮球被割开，补了破解放鞋；再后来发了洪水，河滩地复归原样；再再后来就“鸡蒙眼”了。

原因明了，遂求重新划地，队长面若苦瓜，知青不忍，徒返。之后，轮值女生见收工男知青变出青菜，惊呼：偷——。男知青嘘：难听！君子不耻。此乃“丰收舞”是也。偷便偷，还“舞”之，化腐朽为神奇了。这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插曲《丰收舞》的创作者，闻此不知何感想？陋行冠以雅号，少了心理障碍，普及推广，终至女知青。收工，该女顺菜瓜，闻人声，情急掀衣藏之，捧腹与村民擦肩，紧张发抖。身后议论：象是怀上了？该女木然驱动双

腿回来，脸色煞白表情呆滞，众招呼，其醒，一个抖战，手松瓜落碎于地，大恸。

“舞”者出没，舞之蹈之，村民不堪，呼声再起：给知青划地。不想知青“舞”得顺了，坚辞不要。村民默然。此后知青晨出，门口不时可见一捆蔬菜、一小箩菌子……。涕零。

辞典：夜盲症——由缺乏维生素A导致视网膜视紫质减少所致。需食富含维A之动物内脏。这类食物在当年无异于珍馐，想吃而不得啊！

但“鸡蒙眼”是好了的，怎么好的？不晓。反正与蔬菜无关。

汗颜。还“有知识的青年”呢，嘁！

知青趣事十一：

劲舞

县汇演，本公社落第，挨批。引不喜文艺的书记重视，取经便晓：启用知青！宣传队吐故纳新，本地青年遂成少数，内心郁闷。知青自视甚高，往日看公社宣传队演戏，一派鸟状，只为取乐。得知遇，受宠若惊，为“政治任务”禅精竭虑赶排节目。月余，书记审查，众人卖力。“东风吹，战鼓擂……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一番歌舞，感觉良好，静候指示。书记意见有三：一为劲道差，“战鼓擂”而不闻鼓声，轻歌曼舞没有革命气势。二为女知青腰太细，皮带扎成一乍，非膀大腰圆如何“一定胜利”？其三，既为贫下中农服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听不懂，应以当地话“前四盖热门一定射累”为准。并指示本地队员示范。憋一肚子气的本地青年焕发冲天干劲，舞姿铿锵，地板咚咚，确有“战鼓擂”的动静。当唱到“前四盖热门一定射累”时，众知青鸟状欲露，拼命严肃，辛苦了得。才不坚持真理呢。谁不愿在这里流“香汗”而去地里流臭汗？再说，书记掌管知青前途，当然坚决贯彻书记指示！知青们思想通，干劲冲。排练，汗流浃背，跳得竟比本地青年还劲道了。书记满意，但他没料想，矫枉过正啊！这帮娃娃没事还找事呢，不然怎么说知青难收拾？

赴县演出在即，书记提出“演习”，以木板搭台于收割完毕的田坝。夜至，山民闻讯早早收工而来，坝子上黑压压人声鼎沸。大汽灯煞白，舞台雪亮，书记国际国内本省本县本公社一片大好的形势报告后，浓眉大眼膀阔腰圆的演员李逵似地登场，演出开始。很劲道的歌舞声中，台下山民指指戳戳评价争论，谁谁腰粗是好劳力，谁谁胯肥是块好“地”，谁谁的咪咪饿不着小娃……。而意见最统一的是：干这活是很出力，记十个工分不亏。知青们除腰衬棉垫化妆夸张外，相约在“东风吹，战鼓擂”节目时全体奋力跺脚，贯彻书记指示便有了故意的成分。报幕毕，伴随跺脚，“鼓”声隆隆，“东风吹，战鼓擂……”气势夺人。舞至高潮，乐队起立，台前台后咣咣跺脚，舞台尘土飞扬，此情此景感染观众，均以“嘿咗嘿咗”加油，气壮山河。书记笑得灿烂，这般劳动态度这般劲道，何愁好评？感慨：一抓就灵啊！

该节目结尾是以重复口号与劲道十足的动作结束的，此时舞台上下同呼“一定射累！一定射累！”全场跺脚，惊天动地震耳欲聋，谁还能听得见舞台发出的痛苦呻吟？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只听得一阵忽隆喀嚓劈啪巨响，灰尘弥漫，柱歪台垮坍了去，现场一片狼籍。黑暗里滚作一团的演员中，竟闻被努力压抑着的吃吃偷笑……

近年，见小孩们跳什么“劲舞”，张牙舞爪咣当咣当的，不屑：就这？早年咱们就玩过了的。

站长

山中有条铁轨，铁轨旁有个小站，小站有老站长，老站长总说“购票上车”、“验票出站”。

晨至，火把将尽时，小站就在那山间了。静谧。露湿黛绿，叶落晶莹，滴答有声，似有回音。晨雾牛奶样漫漶，浮起站房，淹没月台和手拿信号旗的老站长的半截身子。那是幅令心归复安详的画。脚步骤缓，露浸泥染的脚不再恣纵。画，就印在了脑海。

若非封山，小站乃出山首选。票是不买的。一天十分，分值五厘。辛苦一年，反欠粮钱。窝火。有钱也不买！老站长眼望虚无地说：购票上车。知青嚷：人民铁路为人民，人民坐车不要票！彼此心照不宣见惯不惊。车至，有知青自前车跳下奔后厢上车，矫健。知车上查票，奔车后部。知青都逃票。上车人少就占厕所，爬天棚，钻座位。人多就于某站“换乘”已查过的车厢。展转腾挪，险况叠出，每次都把老站长惊得直叫：悠点，看摔着！

逛省城，就一说，便走。一夜山路，饿。一知青提来大网兜，热气蒸腾。说：老站长给的。他候车时寻煮洋芋香味摸进站长室，抓一个倒着手吹，见站长进门，讪讪。站长问：都一起的？点头。一大锅洋芋便倒进了网兜。

返乡。依然逃票。谁想查票提前。发车后见餐车那头骤乱，忙涌往前车厢，于前方站“换乘”。那偷站长洋芋的知青正卷缩于旮旯梦周公，被擒。众知青跳下前车奔后车时，见那垂头丧气的知青被交到站上。为保全多数，顾不上他。运气丑，放屁也砸脚跟。众知青一上后车便全部落网。餐车，男知青摘军帽拍于桌子，称全身就这最值钱，看着办；女知青哭啼，大诉悲情。车长教育后，轮着念语录，直到小站灰白的建筑在山间出现。

出站口，老站长照例念叨“出站验票”，拦下蔫败屁臭的知青问：还有一个呢？不语，站长色变，厉声喝问，遂答。老站长丢下众人，电话联系，那边告之：那小子逃了。

夜半，又一趟车至，那脱逃的知青见无乘客，混不上车。遂钻过列车另一面，却门门紧锁。听发车铃响，情急，将瘦小身子塞入车门盖板下那四级台阶狭小的空间。列车疾驰，风如刀，切割暴露的肌肤。风呛，气短，呼吸艰难。身体热量被无情搜刮，渐僵。该知青遂感严重，忙以军用挎包带自缚，听任头顶盖板处漏下的污水小便淋漓一身……每秒都难熬。渐渐，身体居然不冷了，反觉舒适异常，瞌睡袭来。该知青警觉，咬牙瞪眼，喊：“要

活！”他知道没喊出来，他喊不出来了，但他意识到必须这样做，他一直在这样不停地“喊”。

老站长第一次违犯路规：在站内及前方无任何异常的情况下使用了禁行信号。他将那知青从那狭窄空间“抠”出来时，那团身体竟掰展不开……。

许多年后那知青回来，小站只停客混短途车了。还是那个月台，还是那座站房，数十年风雨剥蚀，小站老态龙钟。一座新站正于不远山坳处建设，传阵阵机械轰鸣。让过那些匆匆的山民，缓缓走向出站口。还是那句“验票出站。”他递上车票，眼前幻化出老站长那永无表情的脸。他想说：老站长，这次我是买了票的。可脖子硬了，眼泪夺眶而出……。

填表

公社带话，让等通讯员。山那边的知青也叫去背春荒借走的粮食。这阴湿天谁愿出门？便猜拳。锤子剪子布！赢了。爬上知青户前田坝里的大草垛，有些幸灾乐祸地目送那背运的伙伴过河。几番雨后，秋寒日甚。那三条呈十字交汇的清澈小河，平日皆踏石而过，此时浊流齐腰。那知青涉过河，登上裤子招招手，便没入缭绕于半山的雾气。暮秋，草枯叶败红土裸露，旷野稀疏矗立些草垛，大路了无人迹，有野狗惶惶而过，风中几声鸦噪。寒噤，鸡皮陡生。掉头看知青房，铅灰天幕下死寂如坟。无趣。草垛释放氤氲热度，草甜味醉人，恹倦，昏昏欲睡……忽闻暴响，见通讯员砸门，便骂。其急呼：招工表！心狂跳，一跃而下。通讯员交代：快找那小子填表，明天我带走。忙进屋将表埋进包谷面，拔腿就走！

入夜，两人别过邻社知青，返回。刚翻过山顶就摔了个天旋地转顺坡滚去，浑身钝痛。火把没了，夜黑如漆，听彼此喘息，却看不见。秋末山里能冻死人，只有走。没了方向，便顺山势而下。刺蒺荆条劈头盖脸扫挂，树桩石头绊人跟头连连，走的没有滚的多。身上精湿，扎了刺，到处火辣辣的疼。后只要感觉下坡，索性抱头滚去……人瘫软如泥了，待心跳平缓，便感寒冷浸骨。忽闻哗哗水响，寻声摸去。这山沟河对岸一溜几个寨子，随便进个寨子就行。河里的泥沙枯枝冲刷撞击，腰腿伤口疼痛难忍，呼痛的嚎叫自牙缝迸出。踉跄上岸，跌跌爬爬行不远，又有河，疑惑：该是田坝了呀！不可能回头，咬牙再过……热量散失，相互拉扯的手如僵蛇缠绕，浑身抖索抑制不住，颓然而倒，几口泥汤呛入，人便顺水飘去。晕呼中撞上树干，本能地一把抱住：他们被冲到了岸边。一人挣扎上岸，伸手拉水中人，不起，说水里暖和。岸上人抖颤着哭喊：起来填招工表啊——。

上岸的他们一头撞上了个草垛，二人用最后的力气撕扯着钻了进去……

次日午，二人醒，抬头，傻眼：知青房就在面前。回望，一溜连滚带爬的痕迹绕三条河的十字交汇点划一个巨

大的弧。他们连过两条河，又从上游被冲到了家门口。颤颤起身，两人衣服仅余些布条，身上血糊漓拉伤痕累累。两人发愣，猛醒，大叫：“填表！”。

通讯员恐怕早走了。不敢耽搁，扒点剩饭就直奔公社。夜半敲开门，灯光下，两人青紫肿胀渗血的脸令书记大惊。顾不得解释，递招工表。书记说招工的半月后才来。二人说：那通讯员……书记笑：他在上一个大队喝醉了。

悻悻而出，翻入公社会议室蜷缩一隅，无言。少倾，黑暗中劲暴一声：我——操——！



知青趣事十二：

首长

首长在部队官至班长，回村便称班首长。朝鲜战场的功臣当了民兵营长，该叫营首长了。可叫顺了，还叫班首长，班首长总在纠正，不厌其烦。

民兵集训，知青要求编一个班，班首长略想，允。这下，在学校学军到部队训练过的小子们风头出尽：队列，把民兵眼睛看直；劈刺，灵巧迅捷；障碍，玩似的；瞄准，一说一套唬得班首长发楞。好兵！班首长得意于自己的决策。仅数日，知青班就没了正形，睡懒觉串知青户，就等打实弹过枪瘾呢。集合，他们出列就叫班首长！声之怪诞惹一片笑；夜访，班首长的老驳壳枪被拆，弹簧蹦了一找大半夜；让他们教练队列差的民兵，待班首长检阅，却是全体左手左脚地一顺边。班首长怒问，答：我们也让他们给带一顺了。有老妪告状：看操练看得我孙子都不能好好走路了。班首长眼冒金星。

知青班的鬼脑壳们，为班首长之爱之恨。其军事技术好，定能在县民兵比武中挣足面子；其洋相百出，影响军纪还有本首长威信。思忖，定要杀其嚣张气焰。

县武装部长到了。毕竟事关本地荣誉，又有实弹射击之诱惑，知青班立时严整。班首长满意：关键时候不稀松。果然，所有科目令领导们频频称许，班首长乐得皱纹扎堆黄牙毕现。集合讲评，班首长宣布：请领导观摩演习——抓特务！武装部领导惊喜，鼓掌。这得一个班扮特务。民兵们不愿意，惟知青班报名。不出所料：鬼脑壳们巴不得。班首长一阵目标方位的，知青明白了，就那秃山包，草都没几棵，如何藏人？不好玩！班首长瞪眼：军中无戏言，服从命令！知青对视，眼珠转，乃去。班首长诡笑。日落，紧急集合，几百人密密麻麻围去，这阵势，连苍蝇也休想逃出包围，“特务”在没有隐蔽的秃山包被擒，无悬念。班首长没去，他设一大堂，等小子们被捆进队部。看你们狂！他手抚惊堂木挺胸拔背威严于桌后想象审讯场景，很过瘾。起风，马灯摇曳，班首长抬头，几条影子悄声窜来将他按住。定睛，竟是“特务”们。他们二话没有，麻利塞嘴捆绑。然后桌子上就摆了烧包谷烤洋芋干

蚕豆和酒，小子们嬉笑：抓特务咱打小就玩，要玩就玩真的。你不喊，就优待俘虏，喝酒。抓特务的让特务抓了。班首长恼怒，却也暗自感慨这几个鬼的脑壳。无奈，点头。几个人围桌子喂班首长吃喝起来。

班首长就醉了。他靠凳子上嘟囔：你们几个鬼脑壳哟……好兵哟……在朝鲜要是带着你们……。他突然眼泪纵横哽咽了，叫着大牛三狗那样很土的名字。断续述说中，知青们知晓，班首长那一个班都躺在了朝鲜。知青们肃穆，起立，静默。稍许，他们头一次在非正式的场合发自内心地叫了班首长一声：营长！

军臭

军臭，绿色胶鞋，解放鞋是也。其：一为军用品，二因脚汗与微生物相互滋养散发臭鱼烂虾刺鼻气味直冲不幸嗅者脑门令其恶心作呕呈有害气体中毒状，故尔得名。

军臭自穿上就没有过刷洗的记录，算懒吧。可水里泥里粪里的，天天洗也洗烂了。过河若有闲心偶尔也命各脚趾抠蹭摩擦，鞋口黑色泥水突突外冒，色淡了，便算洗过。鞋臭，尤其刚脱的时候，本天经地义，习惯一会就不觉臭了。不想知青点那小女子少见多怪，被军臭呛一口，如遭奇耻大辱。那天收工，累，话都懒得讲，鞋一蹬就瘫倒在床。那小女子轮值做饭，大呼小叫要我们吃饭，见没人理会，便气急败坏奔来，却象被使了定身法似的突然驻步，屏了呼吸，面色发青，眼睛翻白。旋即捂鼻扭身狂奔而出，被门槛一绊，人便横着射了出去……。对我们的恶毒诽谤就随这悲剧的发生开始了。

略举一二。说我们一脱鞋，宿舍就升腾一片蓝雾，苍蝇蚊子纷纷望下栽，老鼠争先恐后向门外奔，还没翻过门槛就趴那里呕吐。说我们在河里洗脚，下游的鱼儿漂了一河面，全中了毒。说我们把鞋放在打盹的队长脸前，队长因此昏厥一天，鼻斜嘴歪一周不能理政……。有这大威力？那蚊子臭虫不照样叮我们一身红包、老鼠把我们的军臭都咬了洞。说近朱者赤，没说近臭者吃呀。就这样，出名了，山风带着这些动人的故事在乌蒙山区传来传去，所到之处，笑声如浪。我们名声大了，真真顶风臭十里！

其实这算什么，户里最小的知青，将狗骑于胯下，以军臭强捂狗鼻，呛得那狗喷嚏连连，涕泪狂流，后见军臭就躲。刚下乡还没改了穿袜子的习惯，军臭里的袜子裹着脚汗泥极黏糊，刚抽出时可以粘蚊蝇；干硬了就比赛谁的袜子能耸立于不倒。一次那哥们脱袜一甩，竟粘在墙上，众笑。夜半闹鼠，来去于头脸，烦！这哥们顺手摸一棍子挥去，鼠惨叫。点灯，他攥着的是那粘在墙上后干硬的袜子。以袜毙鼠，够威够力。

军臭后来破了，被老鼠咬了洞，当时感觉挺透气的；后来帆布帮子成了绺绺，就用麻绳捆着穿；再后来只剩了胶质的鞋尖和鞋底，成了拖鞋；最后鞋底拦腰折了，我们也习惯于赤脚了。那年冬天，我们的脚全都开了血口子，

尤其脚跟老茧最硬最厚的地方，像小孩嘴，疼得钻心。我们学着老乡，拿胶泥填塞那些口子。

返城后，老茧渐褪，某日洗脚，忽见盆底有泥，那糊裂口的胶泥包在肉皮里竟然那么些年！感叹。在网络上偶见《消失了的词语》一文，有一词条：解放鞋——自2003年5月1日新型作训鞋装备部队，伴随我军官兵50多年并风靡民用市场的解放鞋淡出。解放鞋的时代过去了，那个崇尚革命和艰苦朴素的时代。

哦，永别了，军臭！

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一）：

前言

朴素、简单、和谐，在人类社会大步迈进现代化的今天，已经成为了越来越为遥远的过去。在今天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神经紧张的，繁荣、时髦、拥挤、复杂的现代化大千世界中，向往追求朴素、简单、和谐，是善良人们的一场永远做不完的真诚而固执的梦。

内蒙古大草原辽阔深远，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曾经是朴素、简单、真诚、和谐的。我们也是今生有幸，在内蒙古大草原上与蒙古族牧民们，与羊马牛骆驼狗们，一起经历了体验了极为珍贵的朴素、简单而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本书记述的正是内蒙古大草原的这样一段令人神往，难以忘怀的历史。我实在是感到有责任将这一段不可能再重复发生的可贵经历，作为历史记录下来，留给在现代化社会中绝对没有了机会去亲身经历的后来的人们。

我们在草原的时候（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中期），草场牲畜还没有私分到户，草原上的蒙古族牧民们还是生活在公社大队里。一个大队的一二百口人就是一大家子，大家伙儿共同拥有草场和牲畜，分别放牧不同畜群，一块儿流汗搭棚盖圈，齐心协力抗灾保畜，经常围坐成圈儿开草原上特有的马拉松式大队民主会议：一堆神仙过海争显其能，踊跃积极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提建议，共同治家（治队）。

那时候的草原上没有现代化社会的激烈竞争，没有胜者强者的得意忘形，没有败者弱者的失魂落魄，没有人定胜天的雄心壮志，没有一定得挣多少钱买汽车盖新房进入现代化的压力，没有消沉忧郁，没有悲观沮丧，没有神经错乱精神忧郁，有的是日复一日的坦然、平静、简单、开心和愉快。牧民们搬着蒙古包和全部家当，赶着牛羊，逐草逐水游牧于蓝天下绿草上，与大自然和睦相处。那时候的草原，并没有现在这些令人头疼脑袋大的超载放牧，草场大面积沙化退化，以及相应的严重生态危机。那时候你可以骑在马背上任马儿在草原上自由奔驰，用不着担心撞

上现在划分各家草场地界的铁丝网。

草原上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平淡、和谐的相互关系是那样的宽大而深远，勾去了在草原上生活过的人们的魂，它那不朽的魅力永远地溶入了我们的血液里，铸进了我们的灵魂中。

简单是宇宙物理规律的灵魂。

复杂意味着死亡。

这本书写的不是知识青年，而是草原。这本书具体认真地记录了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内蒙古大草原上，蒙古族牧民们生活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度下的社会人文状况，文化习俗，生活习惯；以及那个时期草原上的植物，动物（牲畜和野生动物昆虫），生态和地理环境。

这本书记录的是留在我心中的永远的大草原。

前三章是关于草原一般概况的介绍；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分别说羊牛马和其它牲畜动物；第十三章到十五章是说草原上除了放牧之外的其它生活；第十六章到二十章则是讲牧民们的故事了；以《音乐之声》作为结尾的最后一章。

0　到草原

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正上初中二年级（15岁）。学校停课后没有了学习考试的压力，我们有了说不尽的民主自由，那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此之后的两年里，与其说我们在学校闹革命，不如说我们在街上一群一伙地瞎逛，在家在学校开心地尽情地乱玩。这可是现在被迫玩命学习的孩子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日子。城里没事干的学生太多了，于是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我们这一届初中生本来应该去山西陕西插队，但我的一个高我一年级的好朋友八月份去了内蒙，她从那儿写信回来没完没了地说草原怎么辽阔怎么美丽，马儿跑得多么快，羊肉煮蘑菇如何好吃，吃得她的裤衩都撑开了线。直说得我革命的红心不住地激烈乱跳，于是我下定决心也去内蒙古大草原。

十月初，我伙同另外两个也想去草原的哥们上了路。我们先是坐火车，下了火车搭上运水泥电线杆的卡车，折腾了四五天，终于到达了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内蒙古的“旗”与内地的县是同等级的行政单位）。我们马上去旗政府的知识青年办公室报到，但知青办的头儿坚持说安置任务已完成，让我们回北京。我们已历尽千辛万苦，当然不能回去了。我们就与几个早些时候来的男女弟兄们一起安营扎寨，泡了下来。我们在离安置办公室不远的一排空蒙古包里住了下来。十月的草原已是雪花飘飘了，我们白天去安置办公室蹲点，晚上回蒙古包钻绝对冰凉的被

窝，这一泡就是十几天。我们的赤诚之心终于感动了上帝，知青办的头儿把我们四个女生五个男生安排到了旗北部的大河公社（伊和高勒）。

1 公社、大队、浩特

一九六八年十月底的一天，我们向大河公社出发了。

第一件令我们惊奇不已的事就是：旗里楞是没有通往各个公社的公共汽车！谁要想从旗里去公社，或从公社来旗里都得搭顺路的汽车、拖拉机，或是自己骑马。我们搭上北行的两辆拖拉机，坐在拖拉机的拖斗里向北颠了五个小时二百多里路，到了公社政府所在地。

公社政府所在地大概应该叫作“镇”吧?这大河镇比起内地任何农村的镇来，那可真是小多了。镇上的所有的房子都是土坯盖的。公社政府的办公“楼”是一座只有一层的长条形土黄色的土坯房子，最多有十间屋子。围绕着公社办公楼，散布着仍然是土黄色的供销社、粮店、医院、邮局、银行和小学校，此外还有几个小手工作坊，铁匠、银匠、皮匠什么的。供销社，粮店是我们大河镇公社政府所在地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当蒙古老乡们说“去公社”，都是指去供销社和粮店买东西。

蒙古语里没有相应于“公社”的这个词，于是“公社”成了蒙语中的外来语。蒙古老乡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儿，“公社”一词都说得挺溜儿。

我们公社有五个大队。草原上的一个大队也就二百来人，不似内地农村的一个大队总得有一、二千人。我们被分到了宝山大队。宝山大队是五个大队中最小最穷的一个大队，所以没有分到八月份来的大拨知识青年，但是焉知非福，却是非常有幸地得到了十月份来的我们这一小撮。

宝山大队位于我们公社的西北部，得名于大队西北部的一座半圆形平顶石头山“额尔登乌拉”(蒙语：宝山)。宝山大队那时候只有一百八十人，但领土比起内地农村的任何一个大队都要大得惊人了。我们大队的地形是一个不等宽、略为弯曲，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长条，宽的地方二、三十里（一里等于五百米），窄的地方十几里，从最北端到最南端怎么也得八、九十里地，就是骑着马也得跑上好半天呢!粗略计算一下，面积怎么也是将近400平方公里呢（现在称为平方千米）。

我们大队的大型交通工具是一辆拖拉机，与两辆四匹马拉的大车。当时拖拉机不在队里，队里的头儿就派了其余所有的大型交通工具——两辆四马大车把我们接回了大队部。

大队部离公社二十来里，是我们大队唯一的一座土坯房子，除了一间仓库，一间厨房，一个大会议室外，还有

两间屋子可以睡人。我们四个女生睡在一间屋子的大木炕上，而五位男同胞就在大会议室里搭地埔了。

蒙语中的“头儿”为“不懂达勒嘎”。“达勒嘎”是官的意思，“不懂”是大的意思。你要想表示一件东西是很大很大的，你就多重复几个“不懂不懂不懂”，于是这件东西就真的是很大了。我们大队的头儿，也就是我们大队的不懂达勒嘎们，接到公社不懂不懂达勒嘎的命令，把我们领了回来，但一时没有了主意，不知拿我们这几只跑草原上的稀有动物作如何处理。我们就在大队部安营扎寨，东游西逛了起来。

内蒙古大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不要说跟城市生活毫无相似之处，就是与农村生活相比，也是一点不沾边。所以趁着我们瞎逛的这几天，我先介绍一下蒙古族牧民的住、穿、吃，给大家一些有关牧区生活和生产的起码的基本概念。

草原上没有房子，人们都住可以搬来挪去的蒙古包，蒙古包是一种特殊的帐篷。草原上的蒙古包总是两个或三个地搭在一块儿，这就是一个浩特。“浩特”在蒙语里是居民点，居住区的意思，汉语里没有合适相应的词，于是“浩特”就成了中文里的外来语。蒙古族牧民一般是一家人住一个蒙古包。蒙古包是一个圆形的帐篷，直径一丈（三米半）到一丈五（五米）不等：由极为精巧设计的能够伸拉的木架为支撑结构，上面覆盖着几层羊毛做的毡子。浩特是草原上的基本生产单位，负责放牧一群羊和一群牛。这样，一家人管放羊，一家人管放牛。

我们的羊群真是不算小，一个羊群有一千二百只至一千五百只羊，这里大约五分之一是山羊，其余是绵羊。一个牛群有七十到一百头牛。我们大队有十三个浩特，即有十三群羊和十三群牛。除了羊牛外，我们大队还有两群马，一共一千匹，没有弼马温，每群马由两个马倌负责放牧。还有一群五十多头的骆驼，由一个骆驼倌负责看管。

羊倌牛倌的名字是写一家户主的名字，这一般是一家的主要男劳动力。但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放牧照料羊群牛群的任务却是全家的责任，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家庭承包制了。春季接羔主要是妇女们的事。她们在平时的主要责任是下夜（防止狼来吃羊）。草原上的狼有时在夜晚来访问我们的羊群，这狼大哥总是要咬羊小弟的。狼来时狗会异样紧张地吠叫报警。根据狗的叫声的急迫性，可以判断狼是正在靠近浩特或是已经在羊群中了。当然没有人聪明到整夜不睡地坐在那里等着狼来(草原上的狼只是偶尔露峥嵘，并不经常来拜访我们的羊群)，妇女们多有一种天生的特殊本领，狗的这种异样急迫的叫声会将她们从熟睡中惊醒，她们急忙走出蒙古包挥动着手电筒向着深深的黑夜，向着羊群的前方拉长声连续高声喊叫，那声音甚是起伏悠扬。草原上的狼是怕人的，几千年来大声喊叫这招儿都很灵，几千年来草原上的狼也不长劲，还是那么笨那么土，一听见喊声，再加上这新式武器手电筒的光亮到处乱晃，吓得这哥几个那是绝对无商量地转身撒丫子就跑。一个浩特里的几个蒙古包的妇女轮流着下夜。

这大约两万头的牲畜，是我们这个大队连同我们九个新来的知识青年在内，不到二百人的共同财产。大队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卖绵羊毛、山羊绒，卖羊，卖为数不多的牛和马。对于不同的工种有不同的工分数，羊倌的工分数最高，其次是打井，搭棚盖圈，马倌，下夜，牛倌等等。大队会计给每一个人记工分。每年春节之前十来天，由会计

领头，组成大队年终分红计算突击队，用一把算盘算上三天三夜，算出总收入减去总支出，留下来年的公积金，生产项目开支，救灾基金，再算出总工分数，算出工分值，根据每人的工分数算出每人年终所得，制成表。然后会计与保管一起骑马去公社银行领回一口袋一万至二万元现金，将钱票按表分成堆儿，再通知大伙来领一年的工资。

我们大队的人倌不懂达勒嘎们，包括会计，保管和民兵连长，那可是全队社员在社员大会上直选出来的。这选举过程就是按照西方最权威的民主人权人士的严格标准，也是无可挑剔的民主典范。不仅如此，而且大队的任何一项重大行动，重大计划都是经过全队社员大会的马拉松式的讨论而决定或否定的。比如是不是该买一台拖拉机或剪毛机；是不是要引进改良种公牛，引进后如何管理，由谁在什么地方饲养；明年要搭几个石头与泥垒成的圈，搭在哪儿；是否要打井，井打在哪儿；我们大队是否应该有一个季节小学，谁来当老师，学校设在哪儿；我们大队是否应该有一个流动小商店，供给大伙日常所需如茶砖、火柴、盐、糖、卷烟等，谁来办商店。经常有人干腻了一种工作，比如放羊放牛放马的想换工种，或者有人家想调换浩特，这些事情都由全队社员大会协调解决。

在我去内蒙之前，一想到大草原浮现在脑海里的就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或是公园里浓密得看不到地面的绿色草坪。到了草原后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由于蒙古高原雨水不足，一般牧草长得很稀，不少地方一平方寸才长一根草，地面是绝对见得到的，但是放眼远远望去也是绿绒绒的一片。草原上也有长得茂密的高高的草，那是芨芨草，它们总是一堆一堆地生长。芨芨草是地下水位比较浅的一个标志，在芨芨草滩上打井，一般能够打出好水井来。夏末秋初芨芨草有七、八尺高，随风摇曳起伏，牛群羊群藏在芨芨草滩里那是看不见的，但是站在高处，比如什么小山丘上放眼了望，那可真是“风吹草低见牛群”了。羊还是太矮，比低的时候的芨芨草还矮，所以还是看不见的。在风中一左一右摇曳的芨芨草是真漂亮神气萧洒，但就是除了骆驼偶尔吃几口外谁都不吃，这还真是中看不中吃的植物。

为了让全大队这两万多张大嘴小嘴有足够的草吃，我们的牧场分为春夏秋冬四个营盘。冬营盘在大队最北边的山梁地里，这儿没有溪流，没有水泡子，春夏秋三个季节没有牲口在冬营盘吃草，所以草长得高而稠密一些。浩特搬进冬营盘后可以三、四个月不动窝。冬天的水源不论人还是畜就都靠雪了。春夏秋营盘上各浩特逐水逐草而居，十天半个月就得搬一次家。一个季节的营盘是挺大的一块地方，大队的不懂达勒嘎们并不安排指定每个浩特应该搬到哪儿。一个浩特里的几家人一商量，想搬哪儿就搬到哪儿，这里的独立民主自由就别提了。我们从来没听说浩特之间吵架：“你占了我的地盘。”由于这逐水逐草而居的流动性，牧民们不能住搬不走的房子，而只能住能够搬来搬去的蒙古包。蒙古包的设计可是实在的精巧，木制的骨架有哈那墙和包顶两部分，哈那是像某些栅栏门那样用木棍连接成可以拉伸的结构，一块哈那拉开后有六尺左右长四尺多高，合并在一起时只有一尺多宽。一般一个蒙古包由五块联在一起的哈那为墙，包顶是一个直径二尺到三尺左右的圆形木结构，沿圆周一圈联接着可以活动的五尺多长的木棍，木棍的另一端搭在哈那墙上端。搭好木架后再在木架上盖一层至三层毡子，层数依季节而定。蒙古包的

中间部位有五尺多高，人站起来没有问题，但边上只有四尺高。包里铺着毡子，一般除了靠墙的一两个柜子和一个小炕桌外没有其他家具，所以一个中型蒙古包里可以很轻易地坐进四十多个人而并不觉得很挤。搬家的时候，五块哈那墙、包顶及盖包的毡子可以很整齐地装在一辆牛车上。

蒙古牧民一般都穿蒙古长袍。袍子的颜色是深色的：深蓝，深绿，棕色，紫红，深灰，或是黑色，一条一丈多至两丈长的细布或绸子作腰带，腰带在腰上缠了一圈又一圈。腰带的颜色常常是耀眼的金黄，浅绿，天蓝，粉红色，一圈又一圈的腰带缠在腰上有六寸到八寸宽。明亮的腰带与深色的袍子形成的反衬很是美观特有韵味。冬天的蒙古袍当然是老羊皮做的，老羊皮的羊毛有四五寸长，摸上去就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袍子面是布或绸子。初冬，初春的蒙古袍是小羊皮或羔皮做的，没有人为了羔皮而杀羊羔，羔皮是收集死了羊羔的。春秋的蒙古袍是棉袍，两层布夹一层棉花，而夏天的蒙古袍就两层布而没有棉花了。

在城市里穿蒙古袍是一种民族装饰服装，没有什么实用意义，而在草原上除了夏天之外，蒙古袍可真是生活之必需了。草原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至少三百天刮风(到了最需要风的夏天，风就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先不说冬天刺骨的西伯利亚北风，春秋季节即使一夜平静无风，太阳露头不久晒热了的空气上升，不知哪来的冷空气赶忙跑来补充，这风就刮起来了(估计夏天时到处都是热空气，冷空气没有了，或者太远跑不来了)，一直刮到太阳落山，风才停。放牧的各种倌儿们一天到晚在外边，尤其是羊倌跟着羊群从天亮到天黑，长袍在身可以防寒风吹腰脊。蒙古高原的天气类似沙漠，“早穿皮袄午穿纱”还真不是夸张。春天秋天早上起来温度在零下，中午地面在太阳的直晒下温度可以升高到将近30℃。早上穿着袍子出去，中午热起来时就可以把一只胳膊从袖子里脱出来，要是还热就再脱一只，腰带将袍子挂在腰间。下午太阳西斜气温迅速降低，再将袖子一只一只地穿起来。蒙古袍与老式的中式棉袄一样，扣子系在右边，有腰带勒在中间，胸前这部分就成了极为方便的大口袋，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装，吃的，用的，书报，甚至小羊羔。这袍子的下摆更是个人想方便时的必要了。除了城镇外，草原上可是没有厕所的。冬天零下二三十度西伯利亚北风刮在皮肤上似刀割，用袍子的下摆挡风背风而蹲可真是一种享受呢，但既痛快方便又不弄脏袍子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呢！ 蒙古老乡无论男女都用一条颜色鲜艳六尺到一丈长的布或绸一层一层裹在头上。能把这条布或绸裹得层次分明紧凑利索又有风度，还是真不容易，我试过不少次每次均以失败告终。把头裹起来并不只是为了装饰，高原上的太阳直晒在黑头发上，时间一长能把头晒晕；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头发挡在眼前碍事不说，风能把草爬子刮到头发里(草爬子是一种以吸动物血为生类似虱子的寄生虫，小的时候0。5厘米长，长大后可有2厘米长)。所以用头巾把头发裹起来实在是生活之必需。

我们刚到草原时，夏天短打扮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短打扮是指长裤长袖衫而非蒙古长袍。男青年戴军帽式的单帽，女青年用一块方纱巾蒙在头上系在脖子后面，或者绕一圈后又系在头顶上，像画报上的苏联妇女那样，很是神气。这短打扮很快成为时髦。几年后的夏天，除了老年人与个别中年人还坚持长打扮外，大家伙儿，连不懂达勒嘎们全都时髦地短打扮起来了。

在草原上每天只有一顿正经饭，那就是晚饭，而且是天天一个样的面条。不是打卤面，不是炸酱面，而是汤面。有肉的季节是肉汤面，没有肉的季节是牛奶面，或白水面。做面条一般是一家几口人的合作：一人负责和面，然后用一个长擀面杖将面团擀成一个大面片；一个人负责生火，在锅里加上半锅水；另一人左手拿着一块肉，右手拿刀把肉一片一片削到锅里去，或是在案板上切好一堆肉片倒在锅里。肉汤开锅之后，在灶火上煮开一会儿，加入适量的盐。蒙古老乡做饭不用任何佐料，不用花椒大料辣椒五香粉，不用酱油醋味精，唯一的佐料是盐，而且还是原始的大粒结晶盐，这是从位于我们东边几百里的盐湖俄吉诺尔(蒙语：母亲湖)里拉来的（公社供销社就卖这一种盐）。这时负责擀面的哥们儿已把大面片切成短的细长条，如果面和的软，条儿就切得宽一些，若面和得硬，条儿就切得窄一些，然后把面条儿倒在肉汤里。全家老中小围着灶火而坐，这一圈儿饥饿的眼睛可就都盯着锅里的面条儿了。看着面条儿在锅内翻跟斗，火倌把火压低一些，让面条儿与肉片一块儿在锅里慢慢地翻上一阵跟斗，这一天一顿的正餐就开始了。在春夏季节野葱出来的时候，有的人家还要切上一些绿绿的野葱，撒在汤里，绿色的葱与白色的肥肉漂浮在汤面上，这汤面可真是香得让人口水乱流。多少年后我们回到北京，总忘不了那肉汤面的美味，复制过若干次，每次味道总是不对，无论如何也复制不出草原上肉汤面的那股令人难以忘怀的动人的香味。　早饭是早茶。老乡们用的茶是茶砖，一块茶砖一寸多厚，六寸来宽，一尺多长，硬得真跟块砖头差不多，可以用来砸死人的。这砖茶大约属于红茶一类，但不是用初生的嫩茶树叶子做成，而是较老的叶子加杂着不少短树枝做成的。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是怎么把茶叶茶枝压成这么硬的一大块的。每次我们都得用斧子从茶砖上砍下一小块，再把这小块砍碎，把碎末装在小布口袋里放在水中煮半天，把茶口袋捞出来，倒进牛奶撒入盐，这就是草原上的奶茶了。有的人家懒得用茶口袋，就把从茶砖上砍下来的碎末直接倒在水里煮，煮一会儿后将棕红色的茶水及茶叶一块倒在了一个大桶中。待茶叶沉底儿后，再将茶水慢慢倒回锅中，加奶加盐，重新开锅。很多时候，不少人家还要在茶水里加进一把金黄色的小米煮一阵，给奶茶增加一股特殊的香味，另外茶水煮的小米吃起来还是别有滋味呢！　牧民们用的碗很小，是直径四五寸的很秀气的描花小碗，茶碗和饭碗是一回事。牧民们用的茶壶却很大，是一点也不秀气的中号或大号的铝壶。我在为数很少的几个老乡家看到老式雕花的铜壶，估计这铜壶要是现在当古董卖，一定能卖一把钱的。奶茶煮好后舀到大茶壶里。在小茶碗里放上半碗炒米(炒米是炒熟的糜子米，糜子米是与小米一样的小黄圆颗粒，但个儿比小米大一些，炒熟后体积略有膨胀)，炒米上面洒上一些奶酪和黄油，浇上热茶，炒米黄油都浮在了茶水上面。喝着奶茶嚼着混有黄油的香脆的炒米真是很来劲，别有滋味。碗里的茶水倒进肚子里后，可以不断在碗里的炒米上加茶。炒米吃完后再吃壶里的小米，不用勺子将大茶壶中的小米倒出来还是真本事呢!如果茶壶是满的谁也没本事把沉在壶底的小米从壶嘴里倒出来。这本事就在于：倒出一些茶水后，把装有大半壶茶水的大茶壶提在手里左晃右摇，使沉在壶底的小米浮上来，再趁机连茶水一起倒出壶嘴去。有本事的人可以使小米挤在茶水里突突而出，如同散了电影的电影院门口人们蜂拥而出一样。而没本事的人(像我)，只见可数的几粒小米随茶水流出壶嘴。蒙古老乡们可以坐在那里连喝五六碗茶，直到喝空大茶壶。有时家里的主妇还要再煮一壶。

午饭也是一顿茶，这是为在家的人而煮的，而在外放牧的各种倌儿们却是没有午茶的。放牧在外的人是从来不带吃喝的。当然他们可以停在任何一个浩特喝午茶，但大多数时候放牧地区附近是一个蒙古包也没有的。蒙古老乡很能喝茶，但晚饭的面条用同样的小碗也就吃一两碗，即使是没吃午饭的各种牧倌儿们也是如此。牧民里没有大胖子。牧民们极少吃甜食，每年只是在春节时买一堆月饼(这是我们公社供销社所卖的唯一的一种点心)和糖块。所以牧民们的牙齿很好，虽然他们并不刷牙。我们到草原后的几年，不少年轻人见我们刷牙，他们也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牙刷牙膏，学着我们的样子刷起牙来了。

2 "谢谢"

内蒙古草原是中国的一部份，可是对我们来说真是比外国还外国，好歹我们在学校还学过几句英语呢。游牧的生活方式与我们熟悉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回事，蒙古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语。不要说学，来草原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别人说过一句蒙古语。来到草原后，我们既没有蒙文课本也没有蒙语老师，就连一本蒙汉词典都没有。

我们住在大队办公室，总有人过往。我们是见人就赖上去比划着交流，逮着人就问就学。不几天也学了一些有用的蒙语词组和短句。蒙古老乡把我们知识青年称为"四合腾"(知识分子)，但更多时候称我们为新玛拉泌(玛拉泌是牧民的意思。一位有名的蒙古族作家名为玛拉泌乎，是牧民之子的意思)。与蒙古老乡交谈，我们可是搜肠刮肚用尽创造性的心机了。我们和老乡们用笔在纸上，但更多的时候是用小尖石头在地上互画各种示意图，做各种手式，声音模仿，身体动作，再加上刚学来的几个蒙语单词，词组和短句，也能把意思表达得能够互相理解。一次我们的一个哥们儿想问一个得了感冒的老乡是否咳嗽(因为我们带有一些感冒咳嗽药)，但咳嗽这词谁都不知道怎么说，于是这哥们自己只好先咳嗽作示范："Ka Ka伊和白那?"(Ka Ka多多的有?)蒙古老乡见面时互相问候"赛努?"(你好?)另一个则说"赛"!(好!)转而问对方"赛努?"而不似内地人那么实际，见面就问"吃了没有?"一九六八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草原上没有文化大革命乱七八糟的影子，老乡们还是照样放羊吃饭，过自己的日子。但蒙古老乡们也有自己的革命时髦，他们把见面问候"赛努"改为问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不是蒙语而是说的汉语!)然后另一人则回应"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可把我们给震住了，内地的革命群众有着那么高的革命觉悟，也没有这一创造性的举动。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就连一句汉话不会说的老头儿老太太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说得清晰可懂。这一伟大创举大约续了几年，然后不知不觉慢慢回到了原来的"赛努?""赛。"　十月里草原就封冻了，也就是说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在零下。不懂达勒嘎们已经让一些人家为我们缝制了老羊皮袍(蒙语叫"得勒")与皮裤。因为当时买布是要布票的，而上级只发钱(安置费)不发安置布票。于是我们这些新牧民的皮得勒没有布面，全是一个颜色：羊皮的白色。在白皮得勒的前襟沿上宽窄不同的黑边却也有相当的粗线条艺术性。这皮得勒是真暖和，可就是有一个问题：真沉。老乡们怕我们冷，于是专找毛最长皮最厚因而最沉的老羊皮，五六张老羊皮做成了一个大得勒，这本来是五

六只羊驮的重量，现在都驮在了一个人身上。两张老羊皮做一条皮裤。不懂达勒嘎们又从公社给我们买来齐膝高的毡疙瘩(毡靴)。两只毡疙瘩没有十斤重也差不太多。我们把这一套皮裤皮得勒毡疙瘩都穿戴好，连走路都得从头练起了。

西伯利亚北风可是厉害，刮在脸上真似刀割一样的疼。我们就戴上口罩护面保暖。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戴口罩比不戴口罩害处还大，这是因为呼出的水蒸汽马上结成冰冻在口罩的上沿，而这贴着脸的冰条很快就能使脸冻伤。我们放弃了口罩，在冷中硬挺了过来。其实对于冷，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第二年冬天我们就没有觉得那么冷，再也不去特别注意这个"冷"了。

我们在大队办公室呆了几天，就跟不懂达勒嘎提建议：让我们下到浩特去，一方面了解熟悉放牧生活，另一方面学习蒙语。不懂达勒嘎们正发愁拿我们怎么处置呢，一听这个，立即振奋了起来：这可是好主意！立即给了我们女生一个中型蒙古包，给了五个男生一个大型蒙古包，又给我们每个蒙古包配备了做饭过日子的必需用具：炉盘、烟筒、捡干牛粪的粪筐、粪杈、斧子、煤油灯、大铁锅、茶壶、案板、擀面杖、面盆、笊篱、碗筷。我们去公社买了炒米、面、小米、盐、茶、火柴、煤油。四马大车把我们四个，我们的蒙古包以及过日子的乱七八糟拉到了强各利甫浩特。另一辆大车把五个男同胞以及他们的乱七八糟载到了另一个浩特。　深秋冬天初春季节蒙古包都是搭在背风的洼地山谷中。强各利甫浩特的两个蒙古包就搭在两个山梁之间的山谷中。这是强各利甫和丹木登的蒙古包，强各利甫是牛倌，丹木登是羊倌。丹木登二十岁出头，个不高，身体很瓷实，高颧骨，细眼睛，是个典型的蒙古人。他还没有结婚，与他的姨母和姨父住在一起。强各利甫比丹木登大几岁，但也不到三十岁。强各利甫长得可不像蒙古人：高高瘦瘦的，一双大眼睛，很像一个有关十月革命电影中的俄国士兵。强各利甫有一个五岁女孩。他的妻子阿拉登刚刚生下他的宝贝儿子，他给儿子取名"革命"。

强各利甫丹术登前后一通乱忙，很快帮我们搭好了我们的蒙古包。丹木登拿来几块整的和半拉的土坯，和了一小堆泥，立时在我们蒙古包的中央砌了一个方形灶，摆上炉盘，插上烟筒。强各利甫右手拎来半筐干牛粪左手攥着一把干草。他在灶塘里架好牛粪，牛粪下面放上干草，点燃干草，干草引燃牛粪，热气马上从炉盘上辐射出来。这哥俩的利索麻利劲把我们四个人看得目瞪口呆。随着带着湿泥味儿的热气弥漫了整个蒙古包，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牧区新生活。

我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天两人跟着丹木登出去放羊，丹木登是一个非常耐心极具创造性教学法的好老师。那时我们只知道几个蒙语词组和简单句子，丹木登是一句汉语都不懂。通过用小尖石头在地上画图，各种表演动作(丹木登是一个自导自演的出色演员)，以及声音模仿，他教给了我们很多有关羊、牛、马、狗的知识，还有很多有用的蒙语句子。　另外我们还与阿拉登，丹木登的姨母努勒金轮流着下夜，每天不去放羊的两个人就做所有家务活。这家务活其实主要是捡牛粪。丹木登的姨父根登贵教给我们将圆形大粪筐背在背上，右手拿一把大木杈，兜底

把地上的干牛粪撮在木杈上，然后一甩就把干牛粪甩进了背上的粪筐里。根登贵有一张红红的像圣诞老人那样的笑脸，他的"哈哈哈"笑声格外响亮善良。我把粪筐背在背上，右手用木杈拾起牛粪顺手一甩，用劲太大干牛粪飞出去挺远。这逗起了根登贵一串儿响亮的哈哈哈哈。再试一次少用点劲，牛粪倒是顺着我的后背落在粪筐里，但碎渣却顺着脖子钻到领子里。练了几次后掌握了用劲的大小，干牛粪就总是成功地落在筐里了。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粪筐，我们就向根登贵或阿拉登再借一个筐，这样我们就可以两个人一块出去了。捡几块牛粪容易，但捡满一筐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要东走西走南走北走很远，才能看到一块合式的干牛粪(牛们并不是特别地喜爱为人着想，站在一块儿拉一堆屎，干了让来人捡)，其次当粪筐半满时虽然不是那么太沉，却也是一份不轻的重量呢。背着这份重量东走西走南走北走也不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有一次，我东西南北乱走了半天捡了大半筐牛粪，再怎么使劲地向着任何一个方向走，也见不到一块儿干牛粪。但在一个地方我见到了一堆一堆的干马粪，我用杈子拾起了一堆干马粪，比干牛粪轻多了。很快我就把剩下的小半筐装满了干马粪胜利而归了。回到浩特，碰到根登贵，他见到我捡回的马粪，哈哈哈地笑着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我放下粪筐，顺手拿了几块干马粪进了我们的蒙古包，用了不到两分钟我就明白了根登贵说的是什么了：干马粪放进灶里马上就着了，可就是太快就着过了。就像烧纸一样，你能想象靠烧纸做饭吗?上冻后，喝茶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化雪了。强劲的北风把雪堆在草丛前粪堆前以及任一障碍物之前。我们在粪筐里铺一条床单，拿铁锹把雪堆上层冻硬的雪铲开，把下面的雪面铲到筐里。一满筐雪化不了半锅水。一天傍晚与往常一样我们决定做面条，我和一个哥们拎着粪筐和铁锹到外面装回一筐雪，倒了小半筐在灶上的铁锅里，在灶里添入牛粪，锅底和沿锅边的雪先化成水，锅中间雪堆的高度一点一点地落下去，变小了的雪堆像冰山一样浮在水中间。看到锅里有了空地后再往里加雪，慢慢地直到把筐里的雪都倒光。我把空筐搬到蒙古包外。这时另外的哥儿俩也切好了肉，擀好了面条。我们四个人耐心地等待着锅里的雪都化成水，白色的雪不急不慌慢条斯里地减少着，最后终于都化成了水。水面上飘着一些草叶、草梗，草叶的旁边飘着几个黑黑的圆圆的羊粪蛋!八只瞪大的眼睛盯着这几个自由飘浮的羊粪蛋，然后是眼睛瞪眼睛，怎么办?把漂羊粪蛋的水倒掉重新再来?我用一把铁丝笊篱小心地把羊粪蛋和草叶都捞了出来，我们一个挨一个地把鼻子贴在水面上使劲地闻，四人都说没怪味。然后四人一致作出了决定：不能把水倒掉重来，因为我们实在是太饿了。我们把切好的肉倒在水中煮开一会儿后，把面条倒在锅里，面条和肉片在锅里翻着跟斗，这香味立即从锅里飘了出来。把面条盛在碗里我们仔细地品尝第一口，八只眼睛对看十秒钟后，四个脑袋一起摇：没怪味。这顿饭吃得真香。　一天刮着大北风真是冷，丹木登比划着说服我们不要跟他出去放羊了。我们搬进一筐干牛粪把灶膛里塞得满满的。穿上棉袄、皮裤、老羊皮得勒、毡靴，戴上帽子，我们围坐在灶火边上，还是觉得真冷，这蒙古包里的温度比零度也高不了几度。我真觉得不可理解，几千年来蒙古族牧民们是怎么混过这么冷这么长的冬天的。记得以前读过一本马克吐温写的关于阿拉斯加的小说，写阿拉斯加如何冷，一个来探险的人最后被冻死了。我从来不相信有人会让自己被冻而死：感觉冷了就走步，跑步，跳来跳去，这样总能暖和过来，怎么能坐在那儿等着被冻死呢！可是这时，在这蒙古包里，我相信马克吐温了。我们四个人呆呆地坐在那儿没有一个人说话，四双眼睛茫然无视，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连思想似乎都给冻住了。这时强各利甫进来了，没有人跟他说话、打招呼。他盯着全副武装的我们看了一圈，又掀起炉盖看看灶火，笑眯了眼出去了。一会儿他又进来了，左手提一个铁桶右手一把火钳。他把炉盖打开，用火钳夹出大半桶冒着烟的牛粪，将冒烟的铁桶提到包外，又用火钳把留在灶膛里的牛粪重新摆放了一通，盖上炉盖。半分钟后只听"轰"的一声，扑面的热气从炉盘上辐射出来。热气真好!热气万岁!热气救活了我们。强各利甫从筐里倒出一些干牛粪给我们演示，怎样在灶膛里摆牛粪而不是堆牛粪--留有足够的空隙使空气可以流通。

丹木登和强各利甫教给我们如何骑马，如何接近一匹马，给马上笼头嚼子备鞍子，晚上如何给马上拌子。拌子把马的三条腿控制在一定距离内，马可以走出去吃草，但又不会走得太远。后来这哥俩儿又教我们怎么骑骆驼，拌骆驼。当丹木登、强各利甫、根登贵、阿拉登、努勒金教给我们什么，帮助了我们什么之后，我们总想向他们说声"谢谢"，但却不知蒙语的谢谢怎么说。

一天我们去公社买东西，在小学校停下与几个小学教师聊了一会儿天。一转身我发现书架上有一本蒙汉--汉蒙词典。这是我见到的第一本蒙汉词典，我翻出"谢谢"这一条，小学老师们耐心地帮助我们纠正发音："塔拉日和几那"，"塔拉日和几那"。回到浩特见到丹木登和强各利甫，我们认真地说："塔拉日和几那"。这哥儿俩看着我们笑着摇头，我们又说："塔拉日和几那。"哥儿俩眼瞪眼对看了半分钟，又瞪着我们一块摇头。我们又耐心地清楚地说了几遍"塔拉日和几那"。笑容没有了，这哥儿俩是满脸疑问，连头也不摇了。我们只好作罢，想谢也没谢成。

若干年后我才琢磨出了其中的道理：并不是我们的"谢谢"发音不准确，在这人烟稀少，环境甚为艰苦的草原上互相帮助成为了牧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本能的一部分，这是不需要"谢"的。所以草原牧民们没有"谢谢"这个词汇。离开草原后的很长时间，我自己说或是听别人说"谢谢"总是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来到美国后，经过至少三年时间我才终于学会了不觉得浑身不对劲地客套地说，"Thank you"(谢谢)，以及"You welcome"，(你是受欢迎的)，以适应这现代化文明社会。

草原上的牧民性格直爽，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不喜欢你的服饰，不喜欢你的谈吐，他们会直接了当地当面告诉你。这是因为草原不是商品社会，牧民们不需要花言巧语拐弯抹角地欺骗你，迎得你的好感，以便向你出卖些什么东西；而且草原上地大人烟稀少，人与人之间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

我们离开草原多年了。每当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时，我们又成了直来直去的草原人。当我们中有一人费了半天劲做了一堆好吃的请大家饱餐美食一顿后，没有一个人说"谢谢"。不但不感谢，反而是意见、建议一大堆，一伙人抹抹嘴："这菜咸了点!""这菜多放点糖就好吃了。""肉片炒得太老了。""下次做这个这个，别做那个了!" 我真希望这互相帮助是人类生活的本能。在现代化文明社会的美国生活了这多年后，使我越来越不能理解的是：怎么在这越现代越文明的社会里受了多年优良教育的居民们，这自私虚伪性不是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了?



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二）：

3 成吉思汗的后代

八十年代初来到了美国以后，我惊奇地发现这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在西方美国可是一个大明星。有关成吉思汗不朽业绩的文章和专题报导，不时可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看到：成吉思汗的详细发家史，他如何组织他的强悍骑兵，他出兵中亚、西亚、欧洲的路线图，他的骑兵如何不眨眼地杀人，如何焚烧毁灭了一座又一座的文明城市，……。我在美国学到了解到的有关成吉思汗的伟大历史业绩，远比我在他的家乡蒙古草原、和他的朝代元朝的首都北京，学到的还要多一大截。在美国，一提到蒙古必有成吉思汗，骄横的成吉思汗似乎是蒙古民族的全权代表，好战似乎是蒙古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

我的七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七年的与蒙古牧民朝夕相处，告诉我：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所熟悉的蒙古族牧民，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爱好和平的人群。这里的道理很简单：草原上牲畜和草场大家共同拥有，草原上人烟稀少，居住分散，牧民们不常见面。好容易有机会见一次面，那是要坐下来一通乱聊尽情玩笑，或是扭作一团摔跤娱乐，吵架打架的心情是没有的。草原上蒙古牧民们的好客是有名的：在草原上你不论走到哪儿，碰到任何一个蒙古包，这蒙古包就是不收钱的旅馆饭店，这一家人把你当他们的客人，管饭，管茶，然后给你一个睡觉的地方。

刚到美国时，听说西部是牛仔（cowboy）的世界，牛仔们就是骑马放牛的。在我的想象中，他们也是与蒙古草原上的牧民们同样的憨厚，纯朴，平和，一样的接近大自然。于是，我对美国西部充满了激情的神往，总想找个什么机会到西部去见一见这些牛仔们。每次兴高采烈地去看有关骑马的牛仔们的西部电影，每次都是绝对失望地丧气而归：美国牛仔们离不开枪，那么多的枪击，那么多的暴力，那么多的流血，那么多的死人。美国西部的牛仔世界，除了牛和马跟蒙古草原上的牛和马长得一个样之外，其它与我所熟悉的内蒙古草原没有一点儿相似的地方。

元朝建都在北京，历时八十多年。元朝末年，老百姓计划起义，起义的计划命令是偷偷夹在月饼馅里传递的。所以在我的想象中，这月饼对于蒙古族人来说一定是某种禁忌。可是没想到，当我们来到大河公社时，看到公社供销社所供应的唯一的点心就是一种大月饼：将近四寸（十多厘米）的直径，将近一寸（三厘米）厚，白糖馅，偶尔能吃到一块核桃仁。蒙古老乡们很喜欢这种大月饼，他们一次买十几、二十块，装在布口袋里，拿回去自己吃或是送礼。

在草原上两三年后，我们的蒙语说的利索多了。一次大队开会，在会议开始之前我问坐在周围的老乡们是否知道成吉思汗。坐了一圈儿上了年纪的，中年的，以及年轻的牧民哥们们望着我微笑，一致点头。我耐心地坐在那儿等着他们中的某个人告诉我有关他们的伟大祖先的英雄业绩。但是除了微笑外，这些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们什么都没有说。草原上的人们更知道他们的英雄嘎达梅林。嘎达梅林是二十世纪初领导草原人民为自己的土地而战的英雄。草原上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唱民歌“嘎达梅林”。我忘不了一次在月光下，几个妇女低声吟唱“嘎达梅林”，那回旋的歌声充满了思情，怀念，和伤感，震荡心灵，令人泪下。

现代社会里最时髦的词儿是民主自由。美国人当然地认为他们是最自由的人（这里有一个“自由”的定义问题，我喜欢“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定义。但这一定义与时髦的自由，美国西方定义的自由：“不受约束能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正好是一个大反个，根本不是一回事。下面谈到的自由都是这一时髦的美国西方定义下的自由）。来到美国后不止一个的骄横美国鬼子问我：“你来到美国，很为美国的自由感到震惊吧？”我看着这些得意忘形的井底之蛙笑出声来：“你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他们的眼睛立时瞪得包子一样大，万分不解地望着我，“你说什么？”我给他们讲辽阔草原上的自由。草原上根本没有“纪律”这一概念，就是说没有约束（这成为我们队办小学的主要困难，在后面的章节里还要说到），在草原上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想放羊就可以不去放，不想打井就可以不去打，想说谁的坏话就可以跳着脚大声地叫喊，……。直听得几个美国鬼子没有了神气，自叹不如。

与西方蛮横，粗暴地征服世界，迫使大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态度正相反，草原上牧民们的态度是平和安然地顺应大自然，与自然合一。与不少美洲印地安人一样，蒙古牧民对于生老病死看得很轻很自然。牧民们只要还能爬得起来，是绝不会说自己生病了的。一次丹木登放着羊路过我们蒙古包，那时我们的一个哥们是大队的赤脚医生。丹木登说他不怎么舒服，一量体温，三十九度七，该住院急救了！可是丹木登只服了一片解热止痛片就又去放他的羊

了。我在草原的这七年，我们队里死了两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孩子。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死在医院里的，都是在家里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死去了的。我估计这些人是已经病了很久，但是不认为自己有病，因此不去看医生。草原上没有葬礼，死了人都是个人家的私事。在人死的当天，把尸体装在一个白布做的大口袋里，放在牛车上送到一个固定的小山包那儿，尸体就摆在山包上，并不加以掩埋。我想牧民们不掩埋尸体的原因是，草原上一年中有六个月土地是封冻的，冻土几乎与岩石一样坚硬，没法挖坑。没有过多的悲伤，一家人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生活，牛羊总得有人去放牧，人总得吃饭。

牧业劳动的强度一般较农业劳动的强度为轻，比如放羊放牛放马，但是时间长，环境有时会很恶劣。放羊的从天亮到天黑一直跟着羊群，夏天有十几个小时；而且不论天好天坏，牛羊总得吃草，放牧者就得跟出去。牧区也有劳动强度不轻的活儿，如搭棚盖圈，上山起石头，打井，调训生个子马，与牛摔跤，一天十多个小时地与身强体壮、头脑顽固、绝对不合作的山羊绵羊打作一团，弯腰驼背地剪绵羊毛、刷山羊绒，也能把你累得全身骨头散架，灵魂出窍。

剪羊毛是在初夏羊吃饱青草开始掉毛的时候。因为一个浩特怎么也得有八九百只绵羊山羊需要修理，这修理工作总是三四个浩特包括老人小孩全部人力的联合行动，用两三天解决一个浩特。早上太阳不高时就把羊圈在一个四尺多高用石头和泥垒成的圈里，能剪毛的羊都是那些吃得肚大腰圆，在旧毛底下已长出一层新毛的壮羊。这时几个浩特的青壮劳力蜂拥而上，跟在这些壮羊屁股后面一通乱追，扑将上去，将其摔翻在地，大胖羊一个劲地踢腿挣扎。这时坐在羊的鼓肚皮上趁机喘一口气，然后拼力将羊的四只乱踢的腿收拢用绳子捆上，拖去给坐在墙边的老年人，或体弱的妇女中年人剪毛。若人人面前都有一只羊时就转身从腰带上拔下剪子开始剪绵羊毛，或抓起刷子开始刷山羊绒。关在圈里不吃草的羊们还是特能拉和撒，不一会儿羊屎羊尿满圈都是，加上四尺高的圈墙挡风，太阳直晒下尿汽蒸腾，羊的反抗精神并不因此而减弱丝毫。到太阳落山是，与十几只或二十几只英勇不屈专门与人民作对为敌的绵羊山羊们博斗了一天，那真是筋疲力尽，全身骨头散架。相比之下剪子磨得手上茧子出血，满脸浑身的羊屎羊尿和满圈的羊厕所气味却是无所谓的小菜一碟了。刚到草原的第一年，我是天天咬牙背诵着英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混过这剪羊毛的这十来天的，那是累得我连话都不想说。转头看着周围的青年壮年老年牧民们，他们也累，不断有人伸胳膊，直腰，但没有人抱怨累，没有人念诵任何英雄口号，都是仍在那儿剪毛刷绒，谈笑，瞎聊，乱扯。后来的几年，当我也逐渐成为了一个草原牧民时，对这累这热这臭也是没有多少特别的感觉了：这就是生活吗。

草原上结婚的合法年龄是十八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如果决定结婚的话，就一块骑马去公社某个办公室登

记。草原上的婚姻若不是自由恋爱的结果也是自由愿意的结果，草原上父母包办的婚姻还是真没听说过。婚礼一般很简单，几家人凑在一块儿吃点喝点什么完事。家境好有名望的人家则要趁机热闹显示一通。请来远近亲戚朋友，举行一些仪式，大喝小吃一顿，还得赠送礼品与客人。在一次婚礼上我得到过一块月饼和一块一尺见方的绸子。折腾半天完事。但像内地那样的结婚要彩礼，趁机大吃大捞男方家或女方家一顿却是没有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草原上有哪个男人太穷结不起婚的。草原牧民比起内地的农民或是城镇里的居民来，要生活得轻松、潇洒得多。

孔夫子老人家在草原上没有任何影响，大概这是因为草原牧民从来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草原上没有内地那样以父亲为一家之长的严格的家庭概念。妇女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草原上没有妇女解放运动的必要，男女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平等，谁也不比谁高一截。女人们平静地做着女人该做的事。没有什么社会压力社会舆论阻止一个女人做她想做的任何事，如果一个女人有能力又想干那么她就可以当队长，做马倌。男人们不会嫉妒阻挡，他们会平静地说，“她是不错”。草原上的妇女比美国西方的许多女权主义者们要聪明的多，她们知道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女人不能站着撒尿。她们不会像现代女权主义者们那样非要去做男人胜任的工作，以显示女人的平等权力。

与美洲印地安人一样，蒙古牧民们只有名没有姓。他们的名字有两种，一种是一个蒙语单词或词组，孩子们和不少年轻人的名字是这样的。常见的女孩子的名字是其其格(花朵)，图亚(光)，斯琴(智慧)，那仁其其格(太阳花)，萨仁图亚(月光)等。男孩子的名字如巴特(英雄)，苏和(斧头)，初龙(岩石)，额尔登(宝藏)，额尔登巴特，初龙巴特等等。另一类名字是喇嘛给的，老年人和大多数中年人的名字是这一类，如策仁丹增，丹得布，根登。

几百年前西藏喇嘛从青海进入蒙古。草原上有一些喇嘛教寺庙，在旗政府所在的镇上，有一座保护得很好的由若干座大殿组成的喇嘛庙，在我们大队西北部的宝山下也有一座喇嘛庙叫门土庙，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坏了。喇嘛都还乡了。我们队里就有两个还乡的喇嘛。一个七十多岁身体很弱，人很友好，爱帮人办事。另一个六十多岁身体健康，为人很不友好见人就瞪眼。几年后一天我们听说一个喇嘛死了，开始都以为是七十多岁的老喇嘛，结果正相反。到我离开草原时侯，老喇嘛八十多岁了，还是笑咪咪地慢慢地活着。

除了喇嘛给的名字外，我们看不出喇嘛教对牧民日常生活有任何影响。草原牧民与内地农民一样的实际，当日子过得不错时他们是不关心宗教政治的。我们到草原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年，草原上很多牧民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有些人虽然知道“文化大革命”这个词儿，但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没有兴趣想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天高皇帝远，却是正好自由得意。

在我所了解熟悉的人群中(东方和西方的)，草原上的蒙古牧民是背上背着最少所谓“文化传统”的人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多地方重建寺庙，我们却没有听说我们那儿的老乡们要重建门土庙。他们建起了房屋，改千年游牧生活为定居放牧，向着现代化畜牧业跨出了第一步。每户又安装了风力发电机，还在准备架电话线，一步一步向着

美好生活迈进。最近听说，家家都有了手机无线电话（不用架电线了）。

草原上的牛群马群是没有圈的，是绝对自由的，一年四季可以在草原上到处乱跑。除了在冬天牧民们用羊粪砖为羊群搭一个没顶的羊圈外，羊也是没圈的。冬天号称白毛风的西伯利亚北风夹着雪片席卷了一切。把羊群关在羊圈里一、两天不吃草不会饿死，放羊的羊倌也可以躲在蒙古包里喝茶取暖。当然这时牛倌马倌们也只能躲在蒙古包里坐着喝茶聊天，因为在白毛风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雪过天晴，羊群出圈，牛倌马倌们就得向南几十里，远则上百里地去寻找随风雪南逃的牛群马群。

老乡们出门是从来不带吃喝铺盖的，草原上是没有饭馆，骑马旅店，但草原上的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饭馆旅店，当然是白吃白住，有时候客人还可以和包里的女人睡觉。我们听说过去早些时候，有的好客的男主人会让自己的老婆与客人睡觉。草原上性生活的开放与流动性有很大关系。于是性病梅毒成为威害牧民们健康，妨碍生育的大问题。1945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派医疗队，工作宣传队到牧区做了大量的工作。1968年秋我们来草原时，梅毒已经基本消灭了，对婚外性生活有了不小的社会舆论压力，但草原上这性开放的生活习惯却难于完全改变。我们仍见到不少未成年少女成为母亲，一些孩子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自己的父亲是谁。

有意思的是我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现代工业化的美国社会与原始放牧的蒙古草原的惊人相似之处。两者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是住大房子、有着各种现代化的电器用具、开汽车坐飞机；另一个是住蒙古包、没电没有自来水，骑马坐牛车。两者的相似之处却是令人想不到的：第一饮食，都吃大量的肉和奶制品；第二开放的性生活，未成年少女怀孕，孩子们长大不知道或是不熟悉自己的父亲；第三不喜欢纪律约束，追求民主自由。

我们在草原上住了几年后语言通了，与老乡互相了解多了，也渐渐感到看出一些隐蔽的社会结构。在我们大队掌权的基本是南北两个家族。南部这个家族是一个老太太的两个女儿与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嫁给了我们队的两个强人，这两个丈夫都是我们大队领导班子成员(不懂达勒嘎)，而这两个儿子挺有意思，他们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与这家有远近亲戚关系的人家组成五、六个浩特。北部的这个家族也是一个老太太的两个儿子与一个女儿，这两个儿子都是我们大队的不懂达勒嘎成员，与他们沾亲带故的有四、五个浩特。与这两个家族没有关系的人家对我们大队的事物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两个家族之间有矛盾冲突，但却有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并没有闹得羊狗不宁，更没有天翻地复了。

蒙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竖着从上往下地写。蒙古语与汉语不属于同一个语言系统，我印象里蒙古语属于印欧语系。学习蒙文比学习中文要容易很多，记住了声母韵母，会说蒙语，你就能写蒙文。我们大队的所有成年牧民，无论男女都会写自己的名字。很多人写个简单条子不成问题。不少人喜欢读报(是挺大声地“读”，而不只是“看”)，但报纸不常来。有些人可以看故事书或小说，但书不多。很多牧民家都有装电池的中短波收音机，可以收听内蒙外蒙的广播，我们就可以收听到北京的短波广播，苏联的华语节目，美国之音以及日本NHK的华语节目，声音清晰，没有任何干扰。

我们到草原的第三年蒙语说得不是那么结巴了，大家青春的热血一沸腾，我们决定办个大队的成人夜校，教给年轻人除了牛马羊骆驼之外的一些别的知识。大队的不懂达勒嘎们很是支持，夜校办在五个男弟兄们的大蒙古包里。我们把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挂在北面的哈那墙上，把仅有的几张有关大海、森林、澳大利亚草原的画报照片也想方设法地挂在了墙上。夜校的第一天晚上来了二、三十人，除了年轻人外有相当数量的中年人甚至来了两个老年人，不懂达勒嘎们全部到齐。

我们的一个哥们指着中国地图开讲了：“我们在这儿，呼和浩特在我们西边。这儿是北京，这一块儿是内蒙，这是外蒙，整个这一大块儿是中国。”一个年轻弟兄站起来挤到地图前用姆指和食指量了量从我们“这儿”到北京的距离，回过头来看着大家笑着说：“北京并不很远吗!”大伙一起跟着笑起来。等这弟兄挤回原处坐好后，我们这讲课的哥们指着世界地图接着说：“这一小块儿是我们中国”。他双手沿地图胡噜了一大圈，“这是整个世界，有许多许多和我们中国一样的国家。”他右手停在蓝颜色上，“这蓝色的地方是海洋。海洋是极大极大的水泡子，水是咸的，人和牲口是不能喝的。”他的手又一转，“这儿是澳大利亚，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草原，也放羊，放牛。”他指着旁边的一张画报照片，“他们有时用飞机放牛。”几十双眼睛先盯着蓝色的海洋，又盯着放牛的飞机，有人嘴巴张得老大。牧民们没有见过海洋，更没有见过飞机，连汽车也是草原上的稀有动物，到公社去有时能见到过路的卡车、吉甫车。有的老人从来没去过公社，也就从来没见过汽车什么样。

草原上没有电影院戏院。在夏天的时候，一支政府资助的电影放映队会到各公社甚至大队去放映电影。七年中我在大队看过两次电影，电影都是些老掉牙的片子，牧民们可不在乎新旧，对于他们来说电影都是新鲜的。大伙儿兴高采烈地骑着马赶着牛车来看电影。除了电影放映队外，还有著名的乌兰牧骑宣传队不时来到公社或大队演出，乌兰牧骑人不多，每人都是全才，吹拉弹唱跳样样不成问题，但又精通自己的一项两项专长。乌兰牧骑的舞蹈，独唱，合唱，乐器演奏短小精悍，充满活力。

那达慕是传统的蒙古族庙会，总是在夏天忙完接羔剪羊毛后举行。那达慕的主要内容是赛马，摔跤和贸易活动。那达慕一般是由公社，旗政府举办，但任何一群人感到有事想要庆祝一番，兜里又有钱，他们就可以宣布日期地点，到时准有一大堆人前来凑热闹。

在草原上是个男人就会摔跤，两个男人碰在一块儿总是要扭在一起摔上一通的。蒙古式摔跤是很文明的，不许用腿拌对方，只是凭自己的臂力和腰劲把对方扭倒在地。蒙古式摔跤很少伤人，这是因为人人都有一群羊，牛，马要放牧。牧民们摔跤纯粹是为了娱乐，没有人单凭摔跤换饭吃。我们大队有不少人参加公社的摔跤比赛，但是没有人自愿参加旗里那达慕的摔跤比赛。

那达慕赛马的骑手都是八岁至十二岁的孩子们，男孩女孩都有。草原上没有专门为赛马而饲养的马匹，参赛的马都是从个人的骑马中选出来的。由有经验的牧民选出认为是可以跑得很快的马，在赛马前一个月左右每天晚上要“吊马”，就是把马拴起来不许吃夜草，这样马的肚子会变小，马会跑得更快。什么时候开始吊马，吊多久，这要由经验，马的身体状况，当时当地的草场情况来定。赛马的时候马是不备鞍子的，马背上只有一块毡垫。这样少了二十多斤重的鞍子，加上比大人轻许多的小孩骑马，马是可以跑得很快的。

我清楚地记得站在终点线上等待着驮着孩子们的马们出现的激动不安的人群。当驮着孩子的马们以及背后紧跟的滚滚尘烟出现在地平线上时，人群振奋了，个个仰头伸脖子恨不得身高一丈。不一会儿马就冲到了跟前，孩子们个个喜笑颜开脸颊红红的，马们疯狂奔跑得个个气喘吁吁，因为毛挡着看不出马脸上的颜色(我估计，若是剔了毛的话，也是红红的一张张大长脸)。父亲们叔叔们赶快小心地将孩子们从马背上抱下来，自己翻身上马，或是牵着马，开始溜马，让马的疯狂跳动的心脏逐渐恢复正常。赛马冠军的奖品与摔跤冠军的奖品是一样的，几十元到几百元，或是一只羊到几只羊。

一年夏天旗里要开那达慕，我们大队的不懂达勒嘎决定开着大队的拖拉机去旗里。我们二十多个人一个挨一个挤坐在拖拉机的大拖斗里，跟着拖拉机一块“蓬蓬蓬”地在蓝天下绿草地上颠簸了五个多小时后到了旗所在地。四排成阵新搭起来的蒙古包，雪白的包顶在阳光下耀眼闪光。我们平时只见过两个或三个蒙古包搭在一起，现在眼前这一极为遵守纪律，成排成列的蒙古包阵却是一扫草原上自由散漫之风气，严肃稳重别有风味。牧民老乡们住在了这蒙古包阵里，我们一群则去旗中学的教室里扎根。

摔跤比赛的那一天天气晴朗，比赛的场地是旗所在镇东边的一大块平整的草地。人们围着长方形的赛场坐了一层又一层，我们找了一个空子挤在了人群里。一个身穿紫红色蒙古袍五十多岁的蒙古族艺人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对麦

克风，我记不清他是弹着还是拉着一件弦乐器，在说唱昨天的赛马。先唱跑了第一的马，马的颜色年岁体态，腿有多长，它的魁伟它的英骏；然后唱跑了第二的马；跑了第三的马；…。我昨天没太注意跑在前边的马长得什么样，所以不知道他唱的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信口编来的故事。十几分钟后紫红袍子停了一会儿，然后调儿一转，开始说唱摔跤手们，从有名的摔跤手唱起。伴着音乐他的声音不急不慢低沉回旋很是悠扬，老乡们听得津津有味，不少人跟着旋律一左一右地晃着脑袋。半个小时后摔跤比赛要开始了，紫红袍子停止了说唱。我有一种感觉，要是没有人阻止的话，这哥们准能不急不慢地唱到天黑。

一百多名摔跤手集中在赛场南边。四个人身穿蒙古长袍两两成对，面对面的地站着。一个高举左手一个高举右手两手搭在一起，在赛场南边形成两个三尺多宽的门，每一对摔跤手分别从这两个门进入赛场。摔跤手们都穿着肥大浅色的灯笼裤，白色、浅粉、嫩绿、淡蓝，裤脚塞在高高的蒙古靴里。他们上身穿着无袖的摔跤皮坎肩，有人的在皮坎肩里穿一件衬衫，有人干脆就在坦露的胸脯上套上这件皮坎肩。皮坎肩的下端是一条三寸多宽的腰带，紧紧地扣在腰上。

每一对摔跤手入门后走到场中，一齐跳三十秒钟的摔跤舞，然后走到自己的位置上。这是一种简单的舞蹈：伸出左手抬起左腿，然后一跳，放下左腿左手，同时伸出右手，抬起右腿。这样重复若干次。我第一次看到摔跤舞时觉得十分可笑，摔跤手像大青蛙似的一伸一跳。但我很快懂得了这里没有任何可笑的因素，跳舞的一脸严肃，围看的观众也是一脸肃严：摔跤手们在郑重地宣告自己的出场。不一会儿，一百多名摔跤手全部入场，两两成对站成七八排，他们一齐向观众鞠躬。一声令下，一百多只毫无笑容的大青蛙挥臂抬腿一齐跳起了摔跤舞，脚步声惊天动地，我感到了心灵的震憾，感到联合起来百姓的力量。舞蹈结束，七八排大块头中块头以及若干小块头们又一次向观众鞠躬，然后两两对面站开互相鞠躬，鞠躬完毕双手搭在对方宽宽的腰带上。五十多对摔跤手同时开摔，没准儿应该说同时开扭。蒙古式摔跤是同时靠臂力和腰劲把对方扭倒。一对对摔跤手双手紧抓对方的腰带，低头躬背全神贯注地站着不动或是一同慢慢地转着圈寻找机会使寸劲将对方扭倒。不一会儿数十对选手已决出胜负，一对摔跤手决出胜负后，二者一起向观众鞠躬，抬腿伸臂跳一会儿青蛙舞，然后退场。场里有几个来回乱溜的裁判，但我不记得有裁判行使了他们的神圣裁决权力。

用不了多久场子里就剩下十来对摔跤手了。他们躬着背低着头，或者僵持着站在原地不动，或者慢慢地一同向右转动着(我记不清是否有向左反时针转的了)，等待寻找着时机好用猛劲将对方扭倒。若场子里某一对摔跤手有了什么突然的动作，这边或那边观众席上就会有相应的呼喊声叫好声，或是哎呀叹息声。我扭头寻找喊声最响的地方，只见不小的一群年轻的还有几个不那么年轻的看客高举双手跳着叫好，离他们不远的人群中年轻的和不怎么那么年轻的却是双手托着腮帮子沉默无声。很快随着这边那边响起的叫好声呼喊声，场子里就剩下还在坚持着的两对选手。比赛实行淘汰制，第一轮的获胜者进入第二轮，以此类推。决赛是在下午举行的，冠军是南部某公社的一个大块头，至少一米八高，体重怎么也得200斤吧。大块头冠军和他的对手亚军向大家鞠躬，跳青蛙舞。我盯着大块

头冠军，第一个跳进脑子里的思想就是：他的马可就惨了，得驮着这么沉的一个主儿到处乱跑。要知道草原上一般的马驮的主儿也就一米五至一米七高，一百一十斤至一百四十来斤重。我在心里很为冠军的马喊怨报不平。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所属的人多“武器”精良的乌兰牧骑为我们旗里的这次那达慕带来了精彩的大型歌舞表演。

除了赛马摔跤外，那达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贸易交流。内地的，自治区的各路制造商，推销员大显身手。拖拉机，剪毛机，缝纫机，铁轱辘牛车，蒙古包，大锅小锅大壶小壶，碗盆，各种布匹，绸缎，马靴，鞍具，书籍，还有我们朝也思夕也想的水果！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水果了，我只记得咬着果肉，果汁流到嘴里时感到的那股极其动人的解馋劲儿。在旗里热闹了几天后，我们随着拖拉机的蓬蓬蓬，又颠回了大队。

春节是草原上最重要且唯一的节日。

为全家人缝制新袍子是主妇的事。十月底十一月初浩特搬进冬营盘安顿下来后，主妇就赶着牛车或骆驼车到公社供销社选购布料或绸缎，买头巾帽子蒙古靴马靴腰带。材料买齐了以后，就看各家主妇聪明的脑袋，灵巧的双手，勤快不住地乱忙了。到春节前一天，全家每人一件的新袍子就备齐了。春节的前几天全家大动员一块乱忙，男人骑着马或骆驼去公社买回一口袋十几，或几十块月饼，若干斤糖块，一两条烟，几瓶白酒。孩子们帮助主妇化羊油和甜面团，炸出各种形状的果子。切肉和面做包子，把包好的包子摆在木板上放在蒙古包外，用不了多久包子就比在冰箱里冻得还结实。把板子上的冻包子倒进一个布口袋里，互相撞击的冻包子发出悦耳的清脆叮咚声（热包子是无论如何发不出这如此好听的声音来的）。这冻包子在客人来访时放在笼屉里一蒸，就可以立即拿来待客。现代城市超级市场上的冻饺子冻包子的主意可能还是从这儿学来的呢！

春节这一天天不亮全家人就早早起来了。年轻人，尤其是孩子们兴奋地穿上新皮袍，戴上新帽子，新头巾，缠上新腰带，蹬上新马靴新蒙古靴。喝完早茶，除了老人孩子们及主妇留在家里等待客人外，其他人跃上马背骆驼背迎着初升的太阳，向着大队办公室一路小跑小颠而去了。

用不了多久大会议室里就聚集了四十多个高声谈笑的新袍子新帽子们。我们九个新牧民当然也一定在内，不过我们没有新袍子新帽子，仍然是白色的羊皮得勒。老乡们很能接受新生的不同事物与人物，他们知道新牧民=白得勒。这春节早上没有任何人用任何异样的眼光看我们，白得勒们非常融洽地混在新袍子新帽子群中。人们互相评判着对方的新袍子，新帽子，新马靴，新腰带，几个不耐烦的年轻人两两扭做一团摔起跤来。

不懂达勒嘎们看看人来的差不多了，一声令下，大家伙儿就涌出门外，翻身上马上骆驼，随着叫声，喊声，欢笑声，这春节拜年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支队伍要到全大队每一个浩特拜年。上路后不久马和骆驼的混合赛跑的开始了，先是几个楞头青跃马冲向队伍前面，这兴奋劲儿立即感染了所有的马和骆驼们。弟兄们个个争先恐后，根本不由它们背上主人的操纵控制地在草地上起劲地飞奔起来。我骑的是一头中年骆驼，平时这哥们走路不急不慢有板有眼挺斯文，可这会儿一点斯文劲都没有了，撒开四条长腿跟着马们和其它骆驼们在草地上飞。我紧拉骆驼的鼻绳，直拽得哥们的脑袋一个劲儿地往回缩，但四条腿仍然在飞。于是我就干脆由它飞吧。结果我的骆驼超过不少快马跑在了队伍的前面。

远远地看见了浩特，队伍慢了下来。浩特里所有的孩子们都钻出蒙古包站在蒙古包门旁边看着这浩浩荡荡的拜年队伍，一年中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这么多马，这么多骆驼。孩子们惊奇兴奋地看着所有的人都进了浩特里最大的蒙古包，他们也跟着挤进去站在门口看热闹。很难想象这蒙古包里能坐五十多人，新袍子新帽子们规矩地一个挨一个地围坐成四个大圈。女主人男主人在忙着给每个人敬酒，首先敬给老年人和不懂达勒嘎们白酒，然后敬给其他人奶酒。我们新牧民们也属于贵客一类，得到的是白酒，当然不是一碗白酒，而是刚刚盖上碗底的一浅层白酒。一个浅层还行，两个浅层也能凑合，转了几个浩特几个浅层下来我的脑袋就开始晕乎了，看人也转，看地也转。醉了可不是好事。到了下一个浩特女主人双手举着碗敬酒时，虽然我知道不喝敬酒是很不礼貌的事，但我是实在不能再喝了，就用食指指着自己的脑袋，上身左一晃右一晃表示我已经醉了。女主人会意地笑了，将这碗酒敬给了其他人。

敬完酒后男主人或女主人举起自己的酒碗说一句祝酒词，这时任何人想说春节祝词就高声说几句什么。有人说得逗乐大家就哄笑起来。然后有人起头唱歌，众口蜂拥而上挤进热热闹闹的歌声洪流。我坐在人群中，左耳听到的调儿，与右耳听到调儿，还真是不一样。我左右扭头看去，只见一双双欢笑的眼睛，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根本不理会别人，每个人从自己心里唱着自己的调儿，我真没见过任何一个合唱队是这么唱歌的。有意思的是这各不相同的调汇合在一起，却溶汇成了合谐优美的和弦——这也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动人心弦的优美歌声。

唱完几首歌后，人们开始退场。靠门边最外圈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躬着背走出蒙古包门，然后是第二圈，第三圈，…。女主人开始给少年和孩子们发放炸果子月饼糖块作为过年的礼物，我们这九个白得勒新牧民极其荣幸地属于任何一个特殊等级，于是也得到了一大堆炸果子月饼糖块，够我们吃好几天的。这个浩特的女主人们和孩子们常常加入到这说着笑着闹着的拜年队伍中，骑马骑骆驼或是赶着骆驼车奔向下一次浩特。

欢乐的说笑声响遍草原。

4、绵羊与山羊

蓝蓝的天上飘着白云，

白云下面是雪白的羊群。

—— 内蒙名歌

我们的羊群可是真不小，每群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只不等，羊群散开来还真是好大好大的一片呢。夏天的时候，羊们吃饱了鲜嫩的青草，一个个圆头圆肚，剪了毛或掉了毛以后新长出的毛雪白。蓝天白云下散开的羊群安闲地吃着草，远远望去就似一片耀眼的珍珠撒在了绿色的绒毯上，真是多么爱煞人。

绵羊山羊在草原牧民们的生活中是极为重要的。羊肉是牧民们的主要食品，羊皮做保暖的皮袍子和睡觉时盖的皮被子，山羊油用来点灯，而出售绵羊毛，山羊绒和肉羊则是大队的主要收入。

放羊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羊倌的责任也就是慢慢地跟在羊屁股后面转一天，别让羊群跑散，在天黑之前把羊群赶回家就是了。放羊这活儿，小孩和老人都可以干。但这活儿是从天亮到天黑一天十个至十六个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闰年三百六十六天，没节日没假日，无论天好天坏刮风下雨下雪都要在外边陪着羊群。放几天羊不难，但一年，几年，几十年的放下去就真不容易了；而牛倌马倌骆驼倌是不用每时每刻都跟着畜群放牧的。

我们到草原的第二年夏末，不懂达勒嘎指派我到强各利甫浩特放羊。强各利甫浩特有两个蒙古包，一个是强各利甫和他的妻子阿拉登，六岁的女儿，两岁的宝贝儿子。强各利甫的弟弟小夏克德尔是大队的马倌，那时还没有结婚，仍与他哥哥住在一起。另一家是其其格，三十多岁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在我们来之前的几年去世了。她与阿拉登轮流着下夜。丹木登家已经在去年搬到另一个浩特放牛去了。

强各利甫帮助把我的蒙古包搭在他的蒙古包西边六、七米远的地方。这样三个蒙古包一溜东西排开，强各利甫的在中间。蒙古包前五米的地方就是这一千多绵羊山羊晚上睡觉下榻的床。

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来了。给我自己烧了小半壶茶，在碗里放上小半碗炒米浇上热茶，炒米们立时浮在茶水的上面。喝着茶，嚼着随茶水流进嘴里的炒米，这样还可以避免吃到混在炒米里的沙子。我想起第一年秋天我们刚到草原时我和李卫跟着丹木登出去放羊时的情景，那时我们只是跟着羊群和丹木登，不用负任何责任。现在盯着这近一千五百头羊哥们的责任可全是我自己的了，这还真叫我心里犯嘀咕。喝完茶天已经开始亮了。我走出一里多

地抓回我的马，这时羊群已经散在东边的小山梁上吃草了。太阳出来了还没爬上山梁，但阳光已给在山梁顶上吃草的绵羊、山羊们描绘了一圈金色闪光的轮阔。我备好马鞍子，这时羊群已翻过山梁不见了。我爬上马背开始了这第一天羊倌的工作。

翻过山梁的羊群散成一大片，安静地吃着草。我下马松了马的肚带，摘下嚼子让马也吃草，我右手攥着马笼头的长皮条坐在草地上。没有风，远近羊哥们嚼草的声音嚓嚓嚓嚓甚是动听。过了一段时间羊群开始移动，我牵着我的马跟在羊群的后面慢慢地走着。羊群在一块草长得很好的平地上又散成一大片，低头吃着草。我注视着羊吃草：这羊的脑袋一低下去就不抬起来了，也不知它这脖子累不累。我想象着我要是一只羊，我这脖子早就得累得抽筋了，而且早就脑充血头疼死了（血都流到脑袋里去了）。这么说，羊牛马的身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一定有着特殊的什么结构，能够让它们的脑袋总是低着而不头疼。

太阳越升越高。这一年春天的羊羔已有三四个月大了，母羊们还在给羊羔喂奶，但羊羔们早就开始吃青草了。它们的细牙把草尖咬断，粉红色的小舌头舔着草叶草梗上渗出的甜汁，然后用小舌头把把草叶卷到嘴里，用那些细小的牙齿一通乱嚼。小羊的身体已经有大羊的三分之二那么长，个个吃得肚子溜圆，细软的羊毛比大羊的毛白得多。

突然一只羊羔，一下子跳起来，把自己的身体扭着抛在空中，四只脚一落地，马上开始一阵疯跑。也不知这是一种什么信号，立时，附近的几只羊羔也是同样地一扭身，跳到空中，落地，紧跟着是一阵疯跑。这雪球还是越滚越大，不一会所有的羊羔都加入了进来。只见一堆白绒球一下子滚到南边，又一下子滚到北边。大羊们不理会孩子们的游戏只装作没看见仍然低头吃着草。绒球们滚了一会后停下来，看小山羊们比把式。小山羊们头上的犄角才一寸多长，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长着一把山羊胡子。山羊胡子除了使山羊们看起来十分滑稽可笑之外，我还真看不出一点实际用途。面对面，两只小山羊先是靠两条后腿使自己高高地直立起来，两条前腿挂在胸前。然后头一低两条前腿落地，两个小脑袋撞在一起，犄角太短还架不起来。小哥俩头顶头僵持半分钟，一下子分开来，又用后腿直立起来，头一低，两条前腿着地，两个脑袋撞在一块，再试一回。有时三四只小山羊面对面站成一圈也玩同样的撞头游戏。山羊是天生的爱登高，若有大羊卧在地上，无论是山羊还是绵羊，就有一只或两只小山羊神气活现地站在大羊的背上。大羊的脾气真是好根本不予理会，仍在那儿慢慢地反刍咀嚼着。小羊们的精神头来得快也去得快，不一会绒球们就挤成一堆睡起觉来。

我们的羊群里有二百多只山羊，其余都是绵羊。山羊精力过于旺盛，好奇心极大酷爱登高。如果平地上有几块岩石，那么你一定看到几只山羊得意地挤着站在岩石上，随着反刍的咀嚼，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左右晃动。如果你把牛车摆得离蒙古包太近，几只山羊就会先跳上牛车，再从牛车上跳到蒙古包上，在蒙古包顶上绕着圈探索寻找着更高

可以再跳的地方。如果草地上有什么奇怪不一般的东西，比如一具动物的白骨，一群山羊就要走过去做一番调查研究。调查结果是不重要的，而新鲜好奇是首要的。如果有什么危险可怕的东西，或是声音比如打雷闪电，这山羊们是第一个撒腿乱跑的。严寒的冬天刮着冷风，山羊带头领着羊群顺风疾走；而严热的夏天有那么一丝凉风，山羊就要带领着羊群顶风快上，羊群一会儿就走了个没影。奇怪的是全部百分之百的绵羊毫无怨言、绝对不发牢骚地跟着这领头的山羊，若山羊决定不吃草顺风或顶风快走，绵羊们就不吃草紧紧跟上。山羊们弄得这羊群很难控制。我总是想，如果这一群羊中只有绵羊没有山羊，这放羊该是多么容易呀！ 太阳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热，羊群向着东南方移动着，因为那儿有一个不大不小由雨水形成的水泡子。羊们大约闻到了水味加快了脚步。羊群拉成一条线，山羊们当然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绵羊们还在低头吃草只不过加快了脚步。爬上一个小山梁就看见了水泡子，几匹马站在水泡子中间，看不见马腿。羊们看见了水情绪大振，前边的山羊和几只绵羊跑了起来，后边的羊也不吃草了只是加劲快走。到了水边，羊们沿水泡子西北岸边一溜撒开。山羊绵羊全都一个姿式撇开两条前腿，低下头把嘴插到水里，屏住一口气把水吸到嘴里，咽到肚子里，然后喘一口气，接着再喝。后到的羊顾不得绕到水泡子的东南岸边，却是找个空子一挤一拱插到已在喝水的羊阵线中。正在喝水的羊没工夫也没心思打架就往边上挪一挪，后到者的嘴就插到了水里。羊喝水很文明，只是静静地吸水咽水，不似狗用舌头舔水，舔的响声大作弄得谁都知道它在喝水。我想象着这一千多只羊都跟狗一样地用舌头舔水，那响声是绝对激动人心的。

我的马看见水也兴奋起来，脖子一扯，牵着我绕过羊群走到水泡子的东岸，几步迈进浅水中低头喝起水来。我看着我的马的行动，很是不理解：这可是喝洗脚涮腿的水了。

喝饱了水的羊离开岸边散在山坡上吃草，有不少呆呆地站在那儿养神。我们这片儿草原上没有树，就是说没有阴凉。中午的太阳直晒下来没有丝毫的风，虽说已是夏末，气温仍然很高，没有鸟儿唱歌，草丛里的昆虫们也没声了，真是死热。我的马静静地站在那儿甩着尾巴。羊群拉成一条长长的线，后一只羊把它的头藏在前一只羊的影子里，这样一只接着一只（羊们一定是以为这样就找到阴凉了）。我望着这条长长的羊线笑出声来：这些羊是聪明还是笨蛋?我很敬佩站在第一的那只羊，觉得它真是很伟大无私。若是它突然跳进来，大叫着去寻找它自己的阴凉，这队伍可就要乱套了。我背对太阳坐在草地上，只觉得热气蒸腾，羊群形成的长线在热气中跳动。草原上的人们夏天也得把头包起来，要不太阳直晒在黑头发上一会儿就把你晒得头发昏。我用一块白色方纱巾蒙在头上系在脖子后边。草原上没有人穿短袖衬衫和短裤，因为草原上的太阳真是很厉害，五分钟就能晒爆皮。我穿着长裤长袖衬衫坐在太阳下，真心希望有一个神仙对我说他可以实现我的一个愿望，我的这个愿望一定是：给我几棵大树。这样我的马和我，还有整个羊群就都可以都挤在大树下乘凉了，那该是多么的好啊！

太阳慢慢地向西移去，一股凉风吹来打破了这死热，打乱了这长长的羊线，羊群散开吃草去了。我的马也低头吃起草来，我站起来长长地出了口气，慢慢地跟着羊群。当羊群翻过两个山梁后，我，我的马和山羊绵羊们都有了

挺长的影子。羊群安闲地吃着草，我坐在草地上，然后舒服地躺在草地上。天空是那么纯净透明的蓝色，像平静的湖水那样，我想象着划着一只小船荡漾在这蓝色的湖面上，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不多一会儿感到什么东西在刷我的脸，把我惊醒了。我睁开眼看到一只长山羊鼻子，一只山羊用它的鼻子一左一右地闻着我的鼻子，于是它的山羊胡子就左一下右一下地刷着我的脸。我的头没动，转着眼珠又看见好几个山羊的长鼻子。这时有什么东西在揪我的鞋带，我坐起来只见几个半大的山羊转身从我的鞋那儿逃走了。跑了几步后停下转过身来看着我。我扭头一看，哈，羊群围着我站成了一个内直径五米的圆圈。山羊当然在里圈，绵羊们也不吃草了，站在山羊屁股后面助威。羊的眼睛很大，但瞳仁不是圆的而是圆角的长方形。这三千来只大眼睛小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没有一只羊在反刍咀嚼，整个羊群寂静无声全神贯注。我看着一张张没有丝毫笑容极为严肃假正经的山羊脸绵羊脸，笑出声来："你们不认识我了吗?"羊们闻声立即后退，圆圈的直径增加了两米。山羊绵羊仍是一脸认真严肃(我真希望羊也会笑，我想象着一千五百多只羊嘻嘻地笑或哈哈地笑的样子)，这假正经的严肃劲惹得我哈哈大笑。我站起来驱散了圆圈。山羊绵羊立即忘掉了刚才发生的一切，转身安静地吃起草来。

太阳还有一丈来高，我把仍然在专心致致地吃草的羊群搁在离浩特不远的山坡上，自己回到浩特。昨天晚上我用了强各利甫的牛粪，现在我得自己去捡牛粪了。我背上半圆形的大粪筐右手拿着大木粪叉出发了。牛吃干草时牛粪的质量最好火力大，而夏天牛吃青草牛粪稀乎乎粘上一层土和小石子不说，屎壳螂可以把一堆看起来鼓鼓的牛粪吃个一空，只剩下一层外壳。我东西南北一通乱走，到天黑前捡满了一筐牛粪回到浩特。强各利甫六岁的女儿恩格其其格已将羊群撵回了浩特。我可是真饿了，除了早茶之外一天没吃东西。我和好面，用一把干草点燃灶里的干牛粪，在铁锅里倒上水。强各利甫给了我一条干羊肉，我切下一截来再把这截切成小块，倒在锅里。擀面片切面条，等肉汤开锅煮了一会儿后加上盐倒进面条。一通乱忙后，终于端起碗来吃起这一天唯一的一顿饭。这时怎么也有九点半十点来钟了。牧民们不用表，所以我们也不用表。因为知道不知道几点钟在牧民们的生活劳动中一点也不重要。

晚饭后我就立即躺下睡觉了。这一夜睡得真香。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起来了。赶快烧了茶，倒上半碗炒米浇上热茶。我推开蒙古包门坐在门口，边喝茶边看着门外的羊群。山羊绵羊都卧在地上睁着眼睛反刍咀嚼。我喝第二碗茶时，已有几只羊站了起来。当我倒上第三碗茶时羊群已有一半站起来散向东边的草场，这时太阳刚出来。我急急忙忙把第三碗茶倒进肚子里。看见远处东南方有几匹马，我的马也一定在内。我抱起马鞍子上路了。马鞍子可不轻，我抱一会儿背一会儿好容易走到我的马跟前。这样省了把马牵回浩特再备鞍子的时间。跟着羊群，骑着或牵着我的马，看着太阳慢慢地爬到最高点又慢慢西移下

落。又是十几个小时的一长天。但这一天停晚不用捡牛粪了，天全黑之前我已吃上了面条。

往后的二十天，天天一个样，只是我的自信心增强了，我觉得我是一个成熟的很有经验的羊倌了。放羊这活真是不难，老人小孩都能干，就是跟着羊别让羊散群就是了。但这可是从天亮到天黑，一天接一天的活。几天下来我觉得憋闷的很，一天到晚没人说话，晚上回到浩特也就是那么两三个人。没有任何让人兴奋的话题，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晚会，没有报纸，连看的书也没有。十几天下来我就烦闷的不行了。我跟我的马说话，跟绵羊聊天，跟山羊逗笑，但它们并不跟我说话。要是这些哥们都跟我说话的话，我就不会那么烦闷了。我不能想象我会放一年的羊，更别说放十几年，几十年，一辈子的羊了。我真觉得奇怪极了：这草原上的牧民们怎么能那么安心地一年接着一年地放羊也不觉得烦闷呢?两个月后我平静多了，不那么在意“闷得慌”了。在牧区几年住下来对草原了解多了，我发现牧民们根本就没有“厌烦”，“闷得慌”这样的概念，一年一年一代一代的放羊放牛放马这就是生活。由于没有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或其它生活方式的相对比较，草原上的牧民们安然地过着他们的极为平静的生活。

八月末九月初草结籽了。牲畜们包括羊们，要靠吃带籽的草长一层膘以渡过这漫长寒冷的冬天，这是抓膘走浩特的季节。为了保证羊能吃上新鲜草，浩特每隔五至十天就要搬一次家。搬家虽然不难，但也不是一件轻松易举的事，所以绝大多数浩特在这个时节其实是羊倌的一个蒙古包跟着羊群频繁搬家，而浩特里的其他蒙古包呆在原地不动。强各利甫决定搬他的蒙古包走浩特，我住在他的蒙古包里，阿拉登负责下夜，而其其格的蒙古包和我的蒙古包留在原地不动。

秋天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不冷不热，喜欢趴在人和牲畜动物脸上讨厌的苍蝇已经没有了。草原变成了淡黄色，天特别的蓝，阳光特别的明亮。我的羊群安静地散在一个山坡上吃着草。几只调皮的年轻山羊吃饱了草没事干在往山梁顶上爬着，但是羊群并不理会它们。这哥几个爬了一会儿见没有羊跟上来，就停了下来，转身往下走。我坐在草地上，草有一尺多高。由于蒙古高原缺水，牧草长得很稀，一平方寸有一两棵草就是很不错的了。秋天的阳光柔软而温暖，成百上千的秋虫们在草丛里集体大合唱着。我看见一只三寸多长的蝎了虎子趴在草丛里，两只小黑豆眼瞪着我。我说：“你看什么?”没有回答。“你中午吃什么?我可没吃午饭，但我们的晚饭可好吃了。”我几乎闻到肉汤面的扑鼻的香味。“你大概不喜欢面条汤。你吃什么呢?吃小虫子苍蝇蚊子，你吃蜘蛛吗?”蝎了虎子一动不动，两只黑豆眼盯着我。“虫子那玩艺儿能好吃吗?”仍然没有动静。我抬头看看羊群，糟了，大事不好!三分之二的羊群已经翻上山梁不见了，剩下的三分之一玩命地往上跑。我的马在三百米外吃着草。我跳起来顾不上抓马就玩了命往上追，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终天爬到了山梁顶上。

这是一个长条平顶山梁，梁顶上五十多米宽。我的羊群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三千多只羊都在那“咩咩”地叫，听不出是悲伤还是欢乐。羊脸上没有眼泪看来还是高兴。这时只见一个人骑着马从山梁那边爬了上来，是达布嘎。

达布嘎是另一浩特的羊倌，我们的两群羊掺群了。掺群可是一件麻烦事，虽然比不上让狼咬死几十只羊那么糟。羊掺群容易，但要把羊群再分开可就费事了。达布嘎的马累得气喘吁吁，达布嘎苦笑着摇头：“瞧瞧我们干的好事。”他翻身下马，点燃一支烟，牵着马坐在地上抽起烟来，把我甩在一边不理。我转身看看周围的羊，羊群的兴奋劲儿已过，三千只羊哥们低头吃起草来。一支烟抽完达布嘎镇定下来，他把烟头按在地上左转右转直到认为火已熄灭。他抬起头来对我说：“告诉强各利甫，明天在西边的羊圈分羊。”我们把羊群从中线分成两半，我赶走靠山梁这边的一半，达布嘎赶走了靠山梁那边的一半。

我心情不安地赶着我的这半混群羊回到浩特，告诉强各利甫羊掺群了。强各利甫坐在那儿连声说：“麻烦，麻烦。”他看着我奥丧的脸，安慰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把羊群分开就是了。”

第二天早茶后我把羊群赶向西方。阿拉登赶着牛车，恩格其其格坐在牛车上抱着她的小弟弟。强各利甫还坐在那儿喝他的茶，因为他骑马一会就能赶上我们。我的羊群先到了羊圈。羊圈是用石头和泥垒成的大约四尺高的一个大圆圈，里边可以挤进两千多只羊。我把我的羊先赶进着圈里。这时达布嘎浩特的人也到了，达布嘎的羊散在圈外吃着草。达布嘎和他们浩特的几个人走进圈里要把属于他们羊群的羊挑出来。当他们看见一只认为是他们的羊就拽着它的一条后腿把羊拖到圈门口，放出去。秋天的羊一个个膀大腰圆力气非凡，拖这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连这年的羊羔已有大羊的三分之二长三分之二高少说也有四五十斤，也不是那么容易抱得起来的。强各利甫和阿拉登也在圈里帮助认羊，偶尔指出达布嘎浩特的人认错了羊。我是无能为力只好站在圈门口看大门。使我惊奇不已的是牧民们怎么能在这一大堆羊中认出哪只羊是谁的群里的呢!对于我来说，这羊长得几乎都是一个样，虽有的羊耳朵上有剪刀剪的记号，但大部份羊却没有记号。我实在弄不懂牧民们是怎么认羊的。

被拽到圈门口放开的羊在门口楞一会儿神，然后“咩”的一声窜到羊群中，有时随着圈门口的“咩”，羊群里也传出“咩”，圈门口的这“咩”再“咩”一声，然后瞪眼全神贯注，随着羊群里的“咩”声确定了方向。这“咩”连“咩”带跑向着羊群里那“咩”，羊群里的“咩”也连“咩”带跑朝着这“咩”。一会儿两只“咩”就“咩”在一起了。快近中午时，我的这群羊挑完了。达布嘎把他的羊群赶开。圈门一开我的羊连跑带跳冲出圈门，我把羊群赶到北边山坡上。这时达布嘎的羊群已在圈中。又过了三四个小时，圈门大开羊群涌出圈来，几个累了一天连午茶也没喝的人们跟在羊群后走出圈来。

往后的十来天我是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紧跟羊群，再也没跟蝎了虎子、蚂蚱什么的说话。然后走浩特结束，我们搬回原处。

强各利甫说我们应该去修理我们的冬营盘。我们大队的冬营盘在北边的山梁地里，这儿没有溪流没有水泡子，

所以春夏秋三季没有牲口在这儿吃草，草场较好。而冬天无论是人还是牲畜就都靠吃雪了。修理冬营盘主要是把去年的羊粪层切割成羊粪砖，起出来搭羊圈。冬天夜很长，这一千多只羊一夜要拉好多屎混着掉下来的羊毛，羊们在上面踩来踩去又在上面睡觉，一夜就是瓷实的一层，一个多月下来就有近一尺厚。用方头铁锹把羊粪层切成一尺宽一尺半至两尺长的长方形，用铁锹或撬棍撬起来，就可以用来垒圈墙了。第二天我和强各利甫，强各利甫的弟弟小夏克德尔带着方头铁锹、铁镐、撬棍去了冬营盘，强各利甫又请了两个其他浩特的人来帮忙。阿拉登和恩格其其格帮助放羊。

去年的羊粪砖圈墙已经干了，我们先把干了的羊粪砖堆成三大堆。这是冬天做饭取暖的最好燃料，羊粪砖的火力比牛粪强，而且燃烧的时间要长。我们用方头铁锹把羊粪层划成长方形，因为上层的羊粪已干，有的地方很硬，我们得用铁镐的尖头沿着画好的长方形的边沿凿一道三寸多深的沟，三寸下的羊粪层还是湿的。把方头铁锹插在沟里用脚使劲往下踩。沿着长方形的这一圈都踩过后，把撬棍伸到沟里两个人或三个人一块用劲，把长方体羊粪砖撬起来，抬到旧圈墙的位置垒起新圈墙。有时长方体断裂成或两三块，我们就把小块抱到新圈墙上。踩了半天铁锹以后，我发明了新方法：把铁锹摆好位置后，手扶着铁锹把上端，猛一跳，双脚重重地落在铁锹上沿，这样一下子就把铁锹压下去一大截。这比用脚踩铁锹上沿效果快的多。小夏克德尔和另一个哥们立即效仿起来。

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但几个人说笑不断很是热闹。在草原上人们有机会可以凑在一起可是不容易，所以即使凑在一起干重活累活大家也像过年那样快乐兴奋。强各利甫并不付给两个请来的弟兄任何报酬，他们是白来帮忙的。没有茶喝没有吃的，但哥几个一直兴致很高。到太阳快落山时已经垒起了一圈将近二尺高的圈墙。靠东圈墙还有一块地儿可以起出一些羊粪砖。强各利甫说等我们搬进冬营盘后可以接着干。连声“谢谢”都没有，请来的两个哥们骑着马走了。我们也拿着各种家伙回到了浩特。

搬进冬营盘四十多天后新羊粪层有了一尺厚，一天羊出圈后我们开始起羊粪砖。这新羊粪层压得很瓷实，但没有那么硬。我们很容易地用方头铁锹把羊粪层切成长方块，用铁锹或是撬棍将长方块撬出来，搬到圈墙上。太阳还没落山，强各利普、小夏克德尔我们三人就起完了羊粪砖，新圈墙大约有四尺高。

十一月初是配种季节。种山羊种绵羊没有种牛种马种骆驼那么明白：只应该在每年的一定季节配种。若是把它们放进羊群里与羊群一块放牧，它们会一年四季任何时候都配种(与人类一样!)。这样羊羔出生在秋天冬天就会被饿死冻死。所以草原上的种山羊和种绵羊是强制地单独分为一群放牧的（被剥夺了自由）。

蒙古锦羊又叫大尾羊，它们的尾巴有近一尺宽，一尺多长，大约三寸到半尺厚。羊尾巴是肥肉，但却是那么一种不腻的肥肉。蒙古老乡很喜欢这肥肉，听说中东的穆斯林们也很喜欢蒙古羊尾巴的肥肉。虽然不腻，但肥肉总是肥肉。我们把羊尾巴切成小碎块放进锅里炼成油，一个大羊尾巴可以炼多半脸盆的油。羊皮在老乡的生活中很重

要，冬天的羊皮羊毛有半尺厚可以做皮袍子和皮被子，夏天羊毛很短可以用来做春秋穿的皮袍子，而没毛的皮可以用来做口袋。蒙古绵羊的毛很粗比较硬，只可以用来擀毡子或做毡靴，不可以用来纺织成呢子什么的，所以羊毛卖不了多少钱。新疆细毛羊的羊毛质量很好，但这种羊在内蒙草原上不易成活。用新疆细毛种羊与蒙古母羊配种就成了一种很实际的作法。产生的改良羊能适应内蒙草原的环境，而且羊毛的质量要好得多。我们一九六八年秋来到内蒙古草原的时候，每个大队都有一小群新疆细毛种羊，和一两个经过培训的配种技术员。我们队有十几只细毛种羊，有专人负责放牧。达布嘎是我们队的一个配种技术员。

配种站是一座石头与泥垒成的大羊圈，和两个与大圈有门相联的小羊圈。大羊圈的北边有一个小门，从这个小门可能直接进到搭在圈外的一个蒙古包，配种的仪器设备，已经取好的新疆细毛种羊的精液都在这里，配种在蒙古包里进行。

我把我的羊群赶到了配种站。只见达布嘎里里外外进进出出忙作一团，在配种站达布嘎是司令，指挥着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人们很是服从命令听指挥，配种站里忙而不乱。

我的羊进了圈。为了识别发情的母羊，有人从一个小羊圈里放出十几只蒙古种羊。这些种羊一见满圈的这么多“女人”眼睛都绿了。一个个奋不顾身冲了上去，见羊就追，用鼻子使劲地闻。种羊能闻出发情母羊身上的一种人闻不出的特殊气味，种羊闻到这种特殊气味，淫性大发骑在母羊背上开始交配，而发情的母羊会站着不动。站在羊群中的我们这几个人一见此情景就扑过去，把这母羊抢过来拽着后腿拖进另一个小羊圈中。达布嘎的助手们再从这儿把发情的母羊牵到蒙古包里配种。委屈不幸的种羊也没功夫跟我们打架，好在“女人”很多，一转身它又去追别的“女人”了。被夺走五六个“女人”后，有的种羊急燥起来，见了羊不顾头不顾腚就往上骑，而不发情的母羊是不会老老实实站在那儿不动的。我们只好把这发了疯的哥们送回小羊圈让它冷静下来。我觉得很是对不起这十几只被利用了的蒙古种羊，但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谁让我们认不出发情的母羊来呢！

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时，已经有八十多只母羊配了种。达布嘎和他的助手们洗了手，开始指挥下一个项目：把三岁的骟了的公羊, 和老了的仍然健壮的母羊挑出来, 从羊圈南面的大门放出去；再把瘦弱的羊挑出来送到原来关发情母羊的小羊圈里。从大门放出的一百六七十只羊是准备送到公社卖的肉羊，而小羊圈里的几十只弱羊大概过不了冬，大队把它们集中起来杀掉卖肉。有的年头大队不懂达勒嘎能找到临时劳动力，就在夏末秋初时将这样的肉羊从各个浩特的羊群里分出来，单独组成一群，抓膘走浩特放牧。这一年大队确实没有这样的临时劳动力，所以只好卖羊时再分羊。离我们最近的肉类加工厂在集宁，这是在我们西南几百公里外的一个铁路城市。深秋，工厂派出收购

人员到各公社来收购羊。由于没有运输卡车运送收购来的羊，收购人员要雇人赶着羊群，让羊边走边吃，用十几天时间，慢慢地,使羊不掉膘地,把它们从草原赶到集宁。

从配种站回来,我的羊群掺进了十来只蒙古种羊或改良的种羊，以及两只种山羊。这十几个哥们要在我们羊群中呆一个多月完成继续的配种任务。

蒙古草原的冬天是漫长的，有近七个月地面上没有绿颜色。十月初上冻至第二年三月初解冻，这期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在零下。从十一月到来年二月的很多日子白天最高气温在零下十度到二十度之间。要只是低气温还好对付，蒙古高原正好坐落在西伯利亚南边，冬天强劲的西伯利亚北风是蒙古草原不想要也得要的自然礼物。草原上很少有寂静无声的落雪。雪花总是由大风伴随着扑天盖地而来，美其名曰：白毛风；学名曰：暴风雪。

在我们搬进冬营盘前几天的一天傍晚，天上堆满了乌云。强各利甫看看天说：“今天晚上可能要下雪。”我们把一串牛车摆在羊群北边，在牛车的前面放上仅有的四五块长方形木板。这木板专门是为临时挡羊用的，有三尺多宽五尺长。晚上我睡觉时听见蒙古包外呼啸的风响。想着那个冷劲，我赶快用被子蒙住脑袋。第二天早上风停了。我起来想推门出去看看，结果推了半天推不开，就像有人在故意项着门。包门上的小玻璃窗盖着厚厚的一层冰，看不见外边。蒙古包的门是向外开的，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门关上后山羊撞不进来；第二，这样蒙古包里有更多的空间。我用肩膀顶着门，拼全身力气顶开一条缝，侧身挤了出去。门外是晴朗的蓝天，太阳还没有出来。在我的蒙古包南边门口被风堆了三尺多高一个大雪堆，难怪门推不开，但沿蒙古包外的其它方向却没有雪。

羊们安然地卧在雪地里反刍咀嚼着。靠牛车木板前面是一片厚厚的或高或矮的雪堆，羊群好像小了一点。我定睛细看，怎么看怎么觉得羊群小了一点。别不是昨天夜里随风雪跑了一些羊吧？我转身进了强各利甫的蒙古包。昨天夜里阿拉登下夜，她是一夜没睡。因为挡风的板子不够长，她在外边阻挡羊群随风雪南逃几乎站了一夜，只能不时回蒙古包里坐在离门口二尺远倒扣在地上的大粪筐上暖一暖歇一歇。现在她睡着了，粪筐还是倒扣在那儿。强各利甫正在烧茶。

我不安地说：“羊好像少了一些。”

强各利甫眨着大眼睛看着我：“不会吧?”

我焦急地说：“羊是少了一些。”

强各利甫用一个大舀子把锅里翻滚着的茶水舀进茶壶里，“羊都在那儿。”他说着递给我一个碗，又拽过炒米口袋。“先喝茶，一会儿咱们出去看看。”

无奈何，我只好坐下来，抓出炒米放在碗里倒上热茶。这也好，省得我自己烧早茶了。

喝完第一碗茶，强各利甫在碗里又倒满了茶。他放下碗，头往后一仰然后慢慢地转了几圈，他又左右前后地耸着他的肩膀。强各利甫有比较严重的布鲁氏杆菌病后遗症。布鲁代杆菌是一种住在牛身上的细菌。由牛奶和奶制品传染到人身上，症状是慢性的，发低烧全身关节疼什么的。后遗症类似关节炎。强各利甫发明了他自己的练身法。强各利甫练了一会儿后端起碗来喝着第二碗茶。喝完第二碗茶后我跟着强各利甫走出了蒙古包。

“看这儿!”他指着靠近木板墙前的一个雪包，我这才注意到木板前的雪堆是由许多这样不大不小的雪包组成。这雪包的一端有两个小孔，白色的水蒸汽从两个孔里冒出来。强各利甫拿了一把方头铁锹小心地沿着雪包挖了起来。雪包下是一只羊!这哥们睁着眼并不看我们，继续反刍咀嚼也不站起来。

“雪底下要暖和一些。”强各利甫看着这只羊，又看看我不解的眼神。

我仔细看看这些雪包，每个雪包上都有两个小洞，从小洞里冒着白色的水蒸汽，这显然是雪层下面的羊在喘气。我也找了一把铁锹小心地照着雪包挖起来。我们挖出了一百来只山羊绵羊，绝大部份被挖出的羊仍然卧在那儿，只有两三只站了起来。哼，这些羊哥们居然对我们是一点感激之情都没有，还是在那儿漠然无视地反刍咀嚼着。

由于下雪，羊群“起床”晚了半个小时。当我们挖出最后几只羊时太阳从山梁后露了头，羊们一只接一只站了起来，渐渐向西南山梁上散去。我请强各利甫帮助照看我的马，我决定走着去放羊。我穿上我的毡疙瘩——齐膝高的毡靴，这是由蒙古羊的毛压制成的，毡疙瘩很沉但很暖和。我跟着羊群爬上了南边的山梁。

天是清彻深沉的湖蓝色，阳光灿烂，远近大小山梁，蓝天下的一切全都是耀眼的雪白。毛主席的词立时涌上心头“……，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远处银蛇似的山梁似乎舞动起来。我是得佩服诗人的非凡想象力，他对生命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灿烂阳光加上白色雪地的反射，那是格外的强烈，着我没有墨镜所以得使劲地眯着眼。牧民们从来不戴墨镜，用以避免强烈的阳光和阻挡风沙。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蒙古人的眼睛是细长形的进化论的原因了。草丛前，牛粪堆前，一切或大或小的障碍物前均是或大或小的雪堆。山羊绵羊们见到露在雪上的草梗草叶，就用一只前蹄刨周围的雪，当草丛露出地面时，用舌头搂住草同时搂进一些雪，用牙齿齐地面将草咬断，然后抬起头得意地一通乱嚼。马也可以用前蹄刨出草，将草齐根咬断。但这牛可就笨了，惨了，我从来没见过牛用前蹄刨雪，而且牛没有上牙床，不能齐根咬断比较短的草。它们只能用舌头把草卷到嘴里，再猛一用劲把草拔断。我真是弄不懂为什么上帝把牛造的和马羊不一样，或者说没有上牙床到底有什么优越性，使得进化论仍让倒霉的牛没有上牙床。我在内蒙草原的七年中没有下过很深的雪，每年冬天都有些体弱的牛羊或马死去，但为数

不多。我离开草原的第三年冬天，我们那片儿草原下了一场大雪，很多地方雪有一米厚。我们大队的羊死了三分之一，牛群死了近一半，军队的直升飞机给牧民空投食品，毯子，燃料，但是没有给牲口空投干草。

搬进冬营盘后十几天，我们就碰上了这一年的第二场大风雪。那天早上我跟着羊群离开浩特时并没有任何风雪要来临的迹象（那时候草原上是没有地方天气预报的）。太阳透过薄薄的云层照耀着草原，没有风。羊群散在浩特西南方二三里地之外的一块较平坦的草场上吃着草。没有风的草原真安静，我能听到远近处羊咬断草及嚼草的悦耳之声。

中午时分，突然我注意到阳光暗淡了下来。我抬头看看天，天上什么时候堆起了一堆一堆的乌云？我走到羊群前方将羊群往回拢。天上飘下几片雪花，不一会儿更多的雪花和雪片落了下来。我赶着羊群往浩特的方向走，羊群看着灰暗的天也老老实实地往回走。随着北风刮了起来，呼啸着的北风夹着雪片迎面扑来。羊们转过身，屁股对着风头开始顺风走。我冲过去迫使左边的羊掉转头顶风往回走，然后奔到右边迫使羊群掉头。等我捋顺了右边的羊群，转头一看左边羊群的屁股又转了过来对着风，我再往左边跑。开始时雪片打在脸上，化了，加上冷风猛吹，我觉得脸上刀割一样的疼，但过不多久什么都不觉得了。我估计我的脸已经跟雪片是一个温度了。这时的能见度也就三米左右。我迫使左边的羊群掉转了头，但没有羊愿意顶风往前走，而是站着不动。我拼命驱赶着羊群想使它们向北移动。西伯利亚北风夹着鸡毛大鹅毛大的雪片从空中砸下来，砸得我几乎睁不开眼。我看不见最右端的羊群，但却看见中间靠右的羊群开始掉转屁股顺风而行。这羊群顶风不肯走，但顺风却走得贼快。我顾不得撵左边的羊，疾步走过去想捋顺右边随风而逃的羊群。等我赶到右边发现情况大大地不好。这边羊群已拉成一长条，随风走得飞快。我赶到长条队伍的前端，领头的是几只山羊。我站在第一个领袖山羊前面阻止它前进。但立即从队伍里又冲出一只山羊绕开我，领着队伍顺风而去。我挡住这只自选的领袖，另一只自选的领袖马上奋勇当先担起领队的重任。这时只听见远近羊群里大羊小羊的咩咩声，伴着呼啸的风声。背风而站的能见度不足二米，而顶风而站雪片打得睁不开眼睛，何谈能见度呢？这时的问题已不是怎么把羊群往回赶的问题，而是怎么别让羊群顺风跑散了的问题了。当时绝没有时间去思考应该怎么办，比如今天晚上回不了浩特怎么办什么的。而只能是马上对付眼前紧急情况，见机行事了。

我突然听到呼喊声，透过厚厚的雪片墙我看到有人骑在马上，是强各利甫和小夏克德尔！知道什么是救星吗？他们就是大救星！他们骑在马上左右奔跑着大声呼叫着挥动着长鞭子把羊群紧紧压缩成一团，然后顶风往回赶。羊们一个挨一个，羊脑袋顶着羊屁股连“咩”的余地都没有了。挤得跟伊拉克蜜枣似的羊群倒是乖乖地向前移动着。天黑之前，我们把羊群赶进了羊圈。

坐在强各利甫的蒙古包里端着一碗热汤面，我的脑子这才有功夫思想。我想起上小学时候听到的草原英雄小姐

妹龙梅玉荣的故事。小姐妹的家好像在我们西边包头附近的草原上，他们的羊群没有我们的那样大，也就几百只羊。龙梅玉荣姐妹俩一个十一岁一个九岁，一天早上她们走着去放羊。好像也是下午刮起大风雪的。队里的人们骑着马找了她们一夜，直到天亮才在很远的南边找到几乎冻僵了但是仍然跟着羊群的小姐妹。人们把小姐妹抱到医院里，妹妹玉荣的脚冻掉好几个脚趾头。小姐妹成了全国少年儿童的英雄，有一个很好看的动画影片“草原小姐妹”，说的就是她们在风雪里保护羊群的故事。对我来说原来这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是现在我特别体会小姐妹当时跟着羊群在大风雪里跑的情景心情了。

搬进冬营盘四十多天后，我们修理了羊圈挖出新鲜羊粪砖，把圈墙垒到近四尺高。这个冬天在这次大风雪后又有几次不大的风雪。

除了风雪外，冬天的日子很好过。冬营盘草场的草长得比较密比较高，又有足够的雪，用不着东走西走地找草吃找雪吃，所以羊群可以站在一个地方连吃带喝好久不动窝。冬天气温很低，但有皮得勒皮裤毡疙瘩皮帽子，羊倌挨着吃草的羊群背风而坐，冬天的太阳晒到脸上仍然是很舒服绵绒绒的。冬天天短，一会儿天就黑了，用不着在外边呆十几个小时。而且最棒的是，冬营盘有成堆的羊粪砖而不用隔几天就背着粪筐去捡牛粪了。冬营盘有羊圈，下夜的也可以放心睡觉了(我还是真没有听说过狼先生跳进羊粪砖圈墙里咬羊哥们的例子)。而且冬天遍地都是大小雪堆用不着找牛，让牛拉着抬篓车去装水了。在农业地区冬天叫冬闲。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先人们把春节安排在冬天里的根本原因了。这样人们可以放心轻松地尽情地快乐热闹几天了。

春天是悄悄到来的，捎来这好消息的是风。三月初突然有一天，仍然寒冷的风乱在脸上却没有了那种似刀割的感觉。几天后雪堆开始静静地流泪了，长长的泪流在雪堆周围延伸着。三月中下旬，静静地流泪变成嚎啕大哭的涌泪，只不过听不见哭声。伤心的雪堆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着。先消失的是小雪堆，然后大雪堆哭成小雪堆，最后小雪堆也没有了。这时的风还是冷的，但却不使人们缩手缩脚了。四月份的某一天，沿着地面远远望去看到了一层淡淡的绿色!在雪堆泪水流过和雪堆消失的地方尤其的绿。

在雪堆完全消失之前我们搬进了春营盘准备接羔季节的开始。这时李卫搬来和我住在一起，帮助接羔，并且与阿拉登，其其格轮流下夜。强各利甫去公社买了奶头和奶粉，准备给母羊奶水不足的小羊喂奶。他拿出一个用毡子做成的大口袋，近二尺长一尺多宽，口袋上端钉着背带，背带是四根并排的小手指粗的骆驼毛搓成的绳子，再用骆驼毛捻成的毛线钉在一起做成的。强各利甫把大口袋斜挎在肩上向我演示如何把新出生的羊羔放在口袋里。

从三日底开始每天都有新出生的小山羊小绵羊。冷风吹在全湿的羊羔身上很快会把羊羔冻死，我把新生的羊羔

放在大毡口袋里送回浩特。如果羊群离浩特过于远，羊羔就得在毡口袋里多呆一会。开始时每天只有两三只羊羔，我拼命记住大羊长什么样小羊长什么样，大羊小羊身上和脸上有几个黑斑和黑斑的形状。傍晚羊群回来后，这些羊妈妈马上冲到蒙古包前扯开嗓子“咩-咩-咩-”，蒙古包里的羊羔立时“咩”做一团。由于新生的羊羔不多，我还能勉强指出哪只羊羔是哪只大羊生的。几天以后每天新生的羊羔增至八、九、十来只，对上这么多新生羊羔与母羊的重大责任可是真让我傻了眼。还是李卫英明伟大有主意。那时她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她的医药箱里有白色布质医用胶条俗称橡皮膏。我怀里揣着橡皮膏去放羊。见到有大羊生小羊就在大羊和小羊的耳朵上分别贴上一小块橡皮膏，在上边写上相同的数字或画上相同的记号。到了傍晚羊群回浩特后，这大羊和羊羔是自然成对的了。强各利甫，阿拉登和其其格见了这些贴在羊耳朵上的橡皮膏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楞是不相信我们会那么笨，居然记不住哪只小羊是属于哪只大羊的。我倒没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认羊的本事是无论我再怎么努力也是学不来的。我是怎么也弄不明白牧民们是怎么只看一眼就能极准确地记住哪只母亲生下哪只羊羔，我对他们的这样能力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几千年的放牧生活，已经使得这种识别牲畜的能力成为草原牧民的一种生活本能。

母羊不只是在白天生小羊而且夜里也在生。由于夜晚气温仍在零下，负责下夜的人每夜都得出去在羊群里转几次，见到刚生下的羊羔就抱回蒙古包里。轮到李卫下夜时，她揣着橡皮膏在羊群里转，把耳朵上贴着橡皮膏的小羊抱回我们蒙古包里来。

我们把蒙古包西边的一小半用木板隔开，地上撒上厚厚的一层干羊粪，放进小羊羔。强各利甫和其其格的蒙古包也在西边靠门的地方用木板隔出一个小圈。初春季节天气还冷，白天小羊羔们不能跟着大羊出去吃草，它们就呆在蒙古包内的小羊圈中。每天早上羊群出牧之前，我们得跟在这些小山羊小绵羊的屁股后一通乱追把它们抓回来。小羊们吃饱奶后精神十足跑得飞快，抓住它们真是极好的清晨锻炼。

经过一个长长的严寒的冬天不少母羊很是瘦弱，它们没有足够的奶水。在它们吃饱青草可以产生足够的奶水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就得用奶粉冲成的牛奶给小羊们补充养料。在我跟着羊群出去之后，李卫就将用奶粉调成的牛奶装在瓶子里，瓶口安上奶头，开始给母羊奶水不足的小羊喂奶。她从小羊圈里抱出一只小羊，一手托着它软软瘪瘪的肚子，一拿着奶瓶。小羊的嘴紧紧嘬住奶头，兴奋地吸着奶，小尾巴不停地左右摇摆着。感到它的小肚皮鼓起来了就把它抱回木板后再换一只。只要奶瓶有奶，小羊就不会自动停止嘬。

傍晚我把羊群放在离浩特几百米远的山坡上吃着草。母羊们鼓涨起来的乳房告诉它们喂奶的时间到了。母羊们昂头挺胸集体离群奔向浩特，一边走一边“咩，咩，咩”地高叫着。蒙古包里的小羊们一听这“咩”声，立时乱了套，个个迫不及待地“咩”起来。立时间大“咩”小“咩”响成一片，蒙古包内外到处是“咩”。几只小“咩”拼

命往上跳，想跳出木板。我们赶快把小羊们抱出蒙古包。小羊们站在门口定一定神，仔细辨认寻找着熟悉的“咩”，确定方向后就一个猛子扎出去冲到那大“咩”的身体下吸起奶来。吸着奶的小羊兴奋地快速地左右摆动着小尾巴，大“咩”也立即不咩了，安静地站在那儿反刍咀嚼着，并不时回过头闻闻小羊的屁股，进一步确定这是它自己的小羊。小羊不时停下吸奶，弯曲后腿低下身体再一下子站起来用嘴猛撞母亲的乳房，以使有更多的奶流出，有时小羊后退几步再一下子猛冲上去用嘴撞乳房。随着小羊越长越大，这撞击的力量也越来越大。有时小羊这一撞，撞得母羊的两条后腿一下子离地老高，但是没有一只母羊在意。看看小羊们这先向后退，再向前猛冲的行动，我老是在想：这些小哥们是从哪儿学会应用物理规律的?

不少时候我得在大毡口袋里装两只或三只新生的小羊把它们一起送回浩特，这样小羊身上会沾上别的小羊身上的气味。到晚上有的特别敏感的母羊闻到小羊身上的异味，就转身走开留下可怜的小羊站在冷风中细声无力地“咩”。这时我们把母羊抓回来，从奶头上挤下一些奶抹在小羊的屁股和尾巴上，托着小羊让母羊闻。母羊闻到自己的气味安静了下来。我们轻轻放下小羊，帮助小羊找到奶头开始吃奶。母羊不时回过头来闻闻小羊，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母羊转过头去慢慢地反刍咀嚼着。这时我们坐在地上给母羊和小羊唱歌。草原牧民们深信不移：音乐会使母羊小羊心情舒畅安静下来，增进互相接近的机会。一般说来，这样将母羊的奶抹在小羊身上一次或两次，再加上悠扬的歌声相助，母羊就会认回小羊。但偶尔也有一两只极为愚蠢而又顽固的母羊能把你气个半死。

一天早晨我走出蒙古包，寒流带来的冷空气使我马上想到刚过去的冬天。我看到一只母羊刚生下一只小羊，湿漉漉的小羊躺在冷风中发抖。我马上抱起小羊往我们蒙古包走，母羊一见我抢了它的小羊急得气得猛跺前蹄，然后紧紧跟上我，要它的小羊。我转身对它说：“你没看见你的羊羔会冻死吗？等它身上干了我就还给你。”我进包把小羊轻轻放在灶旁边的一块毡子上。这母羊在我们包门口恨恨地跺了半天脚，没辙最后跟着羊群去吃草了。傍晚羊群回来后，我把这只小羊抱出来放在这母羊跟前，母羊闻了闻小羊转身就跑。李卫把母羊抓了回来，抱着它的头，我挤了一些羊奶抹在小羊身上屁股上，把小羊放在地上帮助小羊找到奶头，小羊开始吃奶。李卫松开手，母羊回头闻了闻小羊扭头又跑。我们把它抓回来，抱着小羊举到它的鼻子前让它闻，然后放下小羊让小羊吃奶。李卫放开手，这次母羊连闻也不闻了，拔腿就跑，好像逃离什么巨大危险一样。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母羊！我们又把母羊抓了回来，迫使它站着不动，让小羊吃奶。在这之后每天早晚我们都得抓住这母羊，不论我们在不在小羊身上抹母羊的奶，这母羊是绝对不会自愿地让小羊吃奶的，我们悠扬的歌声真是对笨羊弹琴毫无作用。我们只好抱着母羊的头或是紧紧揪住母羊脖子上和背上的毛迫使它站着不动，这样小羊可以吃奶。这母羊在这样严格控制下还是不断扭着它的屁股，它甚至找了一个机会狠狠地在小羊背上咬了一口。我们在小羊的伤口上涂上消炎膏。奇怪的是这伤口是怎么都不愈合，后来变成了一个深深的圆洞，不断地流着浓。这母羊的嘴真是毒。夏天到来后下蛆的苍蝇来了，在小羊背上的洞里下了蛆。我们把小羊抓住把蛆挑出来撒上药粉再盖上一块布，把布边与羊毛缝在一起。过了几天

苍蝇找了机会又下了蛆，我们抓住小羊又重新整治一遍。这时奇迹发生了，有一天这只母羊突然认领它的小羊了。母羊对小羊好得不得了，与小羊寸步不离，我们要是抓住小羊给它整治背上的蛆，母羊就愤愤地站在旁边不断地跺脚，就差咬我们一口了。我们只希望夏天过去后下蛆的苍蝇没有了，我们再琢磨个什么招让上羊背上的圆洞愈合。但是小羊越来越弱，背上的洞越来越大。在天气刚刚凉快下来的时候，有一天小羊死了。母羊站在小羊旁边“咩咩咩”不停地叫着，想把小羊叫醒，它用鼻子不断地顶小羊，想帮小羊站起来。母羊守着躺在地上不动的小羊怎么也不肯离去。我看着这情景除了摇头翻白眼，不知说什么。

一天一只瘦弱的母山羊生了双胞胎，两只白色的小山羊眼睛还没睁开就张开嘴“咩咩”地大叫起来，这山羊是真吵。两只小羊一只大些一只小些，母羊的奶水并不好，肯定养不活这哥俩。我们把大一些的小羊给了母羊，决定自己喂养这只小不点。我们叫它“咪呢亚吗”，蒙语“我的山羊”的意思。咪呢亚吗真皮实，喝着奶粉对成的牛奶越长越大，像条小狗一样到处跟着我们。每当它听见我们叫“咪呢亚吗!”它就歪着它的小脑袋大声地“咩-”，然后向我们跑来。蒙古包的门槛有半尺高，几天后咪呢亚吗就可以自由地跳进跳出了。山羊真是喜欢登高，咪呢亚吗在我们蒙古包里爬上了所有的高峰，不论是衣服堆，被子垛，还是小炕桌，木柜子，甚至灶台上，哥们的精力真是旺盛。如果天气较暖我们就让小羊跟着羊群出去，因为它们应该开始吃草了。一天傍晚，我在奶瓶里装上大半瓶奶走出蒙古包叫着“咪呢亚吗!”没有回答。“咪呢亚吗!”仍没有回答。我们找遍了整个浩特，不见“咪呢亚吗”的影儿，这小哥们能上哪儿呢？这时天已黑了，我骑上我的马，怀里揣着奶瓶向着我们东边的浩特一溜小跑而去。我的羊群是从东北方向回来的，可能咪呢亚吗见到浩特就离开了羊群。我问这个浩特的人们是否见到一只自己乱溜的小白山羊，他们都摇头。一个人说，羊群里有那么多小白山羊，就是混进一只来也很难认出。我说我来试试。我对着羊群大叫“咪呢亚吗!”远远的，羊群深处传来一声细细的“咩”。不一会儿随着不断的“咩”声，从羊群里飞快地滚出一个小白绒球。我抱起这“咩”看的小白绒球，从怀里掏出奶瓶，绒球顿时没声了。

初夏时接羔季节基本结束，我们羊群里多了四百来只小山羊小绵羊。母羊们吃饱了青草有了足够的奶水，除了像咪呢亚吗这样的孤儿之外，我们不用再给羊羔喂奶了。而且喂奶也不用奶粉，因为我们有了奶牛，吃足青草的奶牛有了足够的牛奶。小羊们每天跟着羊群出去吃草，用牙齿把草尖咬断，起劲地咀嚼着甜甜的嫩草叶。几乎所有的小羊都开始吃草，只有一只除外。这是一只白色的小绵羊，看上去与其它小绵羊没有任何不同。开始我以为过几天它就会吃草了，可是过了几天又过了几天，这只小羊还是不吃草。别的小羊全在低头吃着草，这只小羊却无事可干，扬着头站在那里。我拔了几棵嫩草逮住这只小羊把草塞进它的嘴里，按着它的上牙下牙，一张一合地帮着它咀嚼。嚼了一会儿我把它放在地上，小羊立即把草叶吐了出来。我又试了一次，它又把草叶吐了出来。别的小羊吃青草又有母羊的奶水帮助，越长越大，而这只不吃草只吃奶的小羊还是那么小。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还有不吃草的羊呢？我问强各利甫，强各利甫摇头。不吃草的小羊越来越弱，它只有其它小羊的一半那么大，有一天它死了。

我常想这只小羊一定是有什么心理障碍，没准儿心理医生可以帮助它。

四百多只小羊使羊群增大不少。小羊们跟在大羊屁股后面吃一会儿草，抬起头来互相张望。突然有一只小羊身体一扭猛地跳在空中，四脚一落地飞快地跑了起来。其它小羊立即加入，身体一扭往空中一跳，四脚着地后就冲刺似地疯跑了起来。有的疯跑的小羊撞到正在吃草的大羊身上，反弹力有时能把小羊弹出去几尺远，摔在地上的小羊站起来定定神，然后跳起来接着跑。而被撞的大羊看都不看这捣蛋鬼，只是把身体向旁边挪一挪，低着头继续吃草。几百只疯跑的小羊像一片在绿草上飞快滚动的绒球。绒球们滚到那边又滚回来。不一会绒球们就累得堆在一起睡起觉来。小羊们的毛比大羊的毛白得多，一堆白绒球在阳光下耀眼闪光。大羊们巴不得这轻闲，安静地吃着草。

山羊绵羊吃了青草，补上了它们在冬天和春天掉的膘，一些三岁的骟羊和没有羊羔的母羊尤其的肥壮，已经开始掉毛了。新疆细毛羊是不掉毛的，它们的新毛把旧毛顶起来，要用剪刀把旧毛剪下来。而蒙古羊的旧毛会自己脱落，这一定是蒙古羊更接近野生羊的缘故。羊毛是从羊脖子上肚皮上开始脱落，然后是屁股上最后是背上。冬天的羊毛又长又密纠缠在一起，掉下的毛与没掉的毛绕在一起挂在拖在羊身上。有的羊掉的毛形成一张羊毛网挂在羊屁股后面拖在草地上有两三尺长。这羊昂起头目中无人地往前走，活像拖着一件大披风的欧州贵族。网眼越拖越大，披风越拖越长越拖越薄，最后断在草地上。很快羊群里就有了十来只连背上的毛都掉光了的大胖羊，这都是没有牵挂的单身壮汉，而有小羊的母羊们和其它比较瘦弱的羊们还需要身上的毛御寒。

1970年6月11日(我还真记得这日子！)阴天。近中午时分随着风下起了雨。雨不是很大但是持续不断，风也不是很强。雨水很凉，加上风一吹真是刺骨的冷。那天夜里羊群背风冒雨而站，站了半夜实在太累了就卧在泥水里。

第二天早上雨还在下，风还在刮。我们用木板隔了半个蒙古包出来，强各利甫与其其格的蒙古包也隔出尽可能大的一块地方。我们冒雨在泥水里东奔西跑，把半大的羊羔和几只弱羊伊拉克蜜枣般紧紧地塞满蒙古包里空出的地方。我穿着雨衣跟着羊群出去了。灰蒙蒙的天是冷的，雨水是冷的，风刮在雨水打湿的脸上手上钻心的冷。羊群不好好地低头吃草，吃几口就顺着风不停地往前走。我不停地走到羊群前头迫使羊群掉头，不是完全顶风而是选择一个三四十度的角度顶着风。羊身体分泌一定的油混在羊毛中，对一般的雨来说，这一身羊毛就是一件雨衣，但对这下个没完没了的雨，这雨衣就不那么好用有效了。

不论如何，有毛的羊好歹还有个遮挡，那十来只没毛的大胖羊可就惨了。冷雨直接浇到光光的羊皮上，冷风把羊身体里的热量都带走了。从中午起没毛的胖羊一只接一只卧在泥水里不肯走了。我用冰冷的沾满泥水的手推它们的屁股，想让它们站起来，我的手感觉不到一丝热气，就像推着一块冰冷的石头。有几只似乎已经昏迷了。卧下的

胖羊没有一只站起来。我跟着羊群在冷雨泥水中走了一天，没有地方也没有时间能坐下来喘口气。傍晚时除了那十几只卧下不走的没毛胖羊外，我把羊群赶回了浩特。盖蒙古包的毡子全湿透了，由于包顶的倾斜角度，包顶的毡子并没有往包里滴水，但湿羊毛的气味却弥漫着整个蒙古包。我们用仅有的一点干牛粪做了简单的晚饭，却没有烤火取暖的燃料了。那一夜李卫可辛苦了，在雨水里站了大半夜阻挡羊群顺风而逃。下半夜时雨停了风住了，羊群才卧下休息。

天亮了，偷懒休息了两天的太阳终天露出了头。阳光马上温暖了一切，青草立时长高一二寸。散开的羊群安闲地吃着草。我去看昨天卧下不走的没毛胖羊们，没有一个动窝全都死在它们卧下的地方。我们大队除了根登丹巴的羊群外，每一个浩特都死了十几只二十只没毛的胖羊。离根登丹巴浩特不远有一座被遗弃的土坯房子没门没窗，根登丹巴在老婆孩子的帮助下把羊群赶进屋子里，堵上门。羊群在土房子里呆了两夜一天，他的羊群一只也没有死。

骆驼和绵羊一样身上只有一种软毛，把这层软毛全脱光后再长新毛。而山羊、牛、马的身上却有两种毛，一种是长的直的硬毛，像人的头发那样(当然没有那么长)，在硬毛下贴着皮肤又有一层弱毛，而每年掉的毛主要是这层软毛。这次冷雨我们大队冻死了二百多只光板绵羊，我不记得有山羊，牛或马被冻死的。到美国后见到那种装垃圾用的大黑塑料袋，我老想，当时若我有这大塑料袋和胶条，我可以给每一只没毛的羊做一件雨衣，这样它们就不会被冻死了。好在冷雨是不常下的，我在草原的七年就碰到过这一次。要是经常下冷雨，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会让肥壮的羊先脱毛了。坏事变好事，由于近两天两夜的雨水浸透了土地，那年的牧草长得特别好。

接羔季节结束后，下一个任务是剪羊毛和刷山羊绒。山羊绒就是开士米。

冷雨下过后太阳一出来，眼见着青草就拔高了一大截。十几天后羊群吃足青草，大部份开始掉毛了。不少山羊身上也东一块西一块地挂着拱出来的山羊绒。

一天早晨我把我的羊群赶到附近的一个石头和泥垒成的羊圈，已经在羊圈那儿等着的好几个人帮助我把羊群赶进了圈里，把门堵上。剪羊毛和刷羊绒总是几个浩特的联合行动，因为每个浩特都有近一千多只羊需要修理，若只靠这个浩特的两三家几个人，这修理工作怎么也得拖上一个月，在这么长时间里很多羊的毛早就掉光了。这时候住的近的几个浩特集中全部人力，包括老人小孩在内，突击剪羊毛刷山羊绒，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全都有活干。

说到羊掉毛，这儿插上一段。蒙古牧民一般大大咧咧没有汉族农民那股精细劲，而且这羊和羊毛是大队所有不是个人自己的，所以除了大堆掉的羊毛外，牧民们并不捡回来。在春营盘和夏营盘的不少地方常看见一片一片白花花的羊毛挂在草上。我们公社有一个从河北农村来的汉族农民，每年夏天他到各大队的夏营盘去搂挂在草上的羊毛，拿回公社卖钱，以此养家，他的日子过得也不错。这哥们是我们公社有名的并且唯一的单干户，到我们来时他

还在单干，我们来了以后那么多年他仍然在单干，他这个单干户成为我们公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著名景观。没听说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过什么批判斗争。

我们大队有一台经常出毛病的由柴油机带动的剪毛机。若机器能转，大队的不懂达勒嘎就会组织一支四五个人的机械剪毛队到各浩特去帮忙。这年很幸运，机器没毛病能转，机械剪毛队来给我们帮忙。剪毛机旁摆着几张桌子，这是剪毛的操作平台。这个剪毛机上可以安装六把电动推子。丹木登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和中年人在玩这先进玩艺儿，这老式的电动推子死沉，而且抖动得非常厉害。从其他浩特来了十几个人帮助我们，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大剪子。

并不是任何羊抓过来就可以剪毛的，要抓那些正好可以剪毛的羊。蒙古羊的旧毛要掉的时候连着皮肤的那层毛变得比较稀疏，剪子要剪断的就是这层毛。而新疆细毛改良羊的新毛顶起旧毛来，新长的毛还不那么密，比较容易插入剪子。恰到时候的蒙古羊好认，因为它们身上左一块右一块地吊着脱落的毛。而改良羊就得拨开它的旧毛，看看是否在根上长出了一层新毛。羊的觉悟可是个大问题，没有一只羊自愿被抓住剪毛。所以任何一只羊发现有人在它屁股后面追，那一定是玩命地在羊群中乱跑。年轻人（我们可是年轻人），十几岁的孩子们跟在羊屁股后面在羊群中穿插，看准机会扑将上去，把这胖羊摔翻在地，压在羊身上将羊的四条腿用力并拢，用羊毛搓的绳子捆上，拖到剪毛机那儿，或是拖给坐在圈的东边用剪刀剪羊毛的妇女和老年人。强各利甫不是妇女也不是老年人，但是他混在这伙人中剪羊毛。

十二岁的巴特孟克一脸成人的严肃，以成人的架式把一只羊摔倒在桌子旁，利索地把四条腿捆在一起。巴特孟克和他十六岁的哥哥眼睛很大，眼珠是浅绿色的，年轻人叫他们“猫眼”。显然他们的一些先人一定是从欧州或是从中东什么地方来的。丹木登拖过这只羊，因为桌子已被其他人占满，丹木登就弯着腰在地上用电推子剪毛。他从羊脖子开始，先小心地把脖子上的羊毛绕着圈推个光，然后顺着脖子沿着脊梁骨把推子平稳地推到尾巴。羊背上立即现出一条洁白的大道，紧接着是几条平行的大道，最后并排平行的洁白大道复盖了整个羊背。丹木登左手提住绑在一起的四只羊蹄子，使羊四蹄朝天倒立在它的背上，右手稳握抖动的电动推子缓慢仔细地饶过羊的腿根，左一弯右一弯地把腿根上的毛推净，然后在羊肚皮上开着平行的洁白大道。几分钟后丹木登关上他的电推子，松开捆羊腿的羊毛绳，挺直了背。小了一大圈但白了许多的羊四条腿一阵乱踢站了起来，楞了几秒钟后撒腿窜进羊群。七十多岁的策仁丹增走过来把剪下的羊毛卷成一大团抱到羊圈外。

我捉了一只羊捆上四条腿拖到丹木登那儿。我从他手里接过电推子打开开关，电推子立即激烈地抖动起来，抖得我得用两只手紧握推子。丹木登笑着走过来演示给我正确的握推子的方法，以及如何稳住右手腕以便拿稳推子。我试看先推羊脖子，但害怕剪破曲里拐弯的脖子不敢将推子紧贴羊皮，结果推子总是被羊毛缠住，我是满头大汗毫

无进展。丹木登笑着教我先推平坦的羊背。推子紧贴羊背，沿着刚刚顶出的新毛层推下去，一条洁白的大道就在羊背上出现了，这倒是不很难，不一会儿又开出几条平行的洁白大道。然后就看我手忙脚乱了，死沉的推子越抖越沉，越沉越抖。沿着羊腿根的羊皮可是皱皱巴巴高低不平，不一会我就把羊的左前腿内侧的皮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我关上推子，使劲按住伤口。丹木登用手指挑了一块黄色的机油抹在伤口上，说这样苍蝇就不会来下蛆了。我把电推子给了丹木登让他去推完那只可怜倒霉的羊吧。这机械化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呢！

我又捉了一只羊拖到近墙根离强各利甫不远的地方，抓起剪子蹲下开始剪羊毛。这剪子比那电动推子可是轻多了，而且绝对不抖动。不一会儿我就把羊脖子上的毛剪了个干净，开始剪羊背上的毛。羊脖子曲里拐弯一剪子不能剪太多的毛，而羊背上平坦开阔一剪子下去可以剪很大一片，但这就要使劲捏合剪子了。几剪子下来我的手又酸又疼。我把剪子放在羊身上，使劲地甩着右手。等手不酸了，接着再剪。剪了没几下，我的手又酸疼得不行了。于是我发明了新方法：用双手握住剪子一块用劲。强各利甫看我这狼狈劲，说："每次别剪太多的毛就容易一些。"强各利甫的方法是容易一些，但剪完第二只羊后我上已磨起一个大血泡。我转头看看阿拉登，其其格和其他几个妇女边剪毛边说笑，强各利甫和几个老年人也在边剪毛边说着什么，他们手上都没有血泡。

蒙古牧民的手很大很有劲很发达。男人们要用他们的手紧握套马杆，用力拉住套子里拼命挣动扎想逃跑的马或牛；他们要用他们的手紧紧抓住牛、马、羊迫使它们站稳不动，或是将它们摔翻在地；他们要用他们的手修理牛车，拉紧固定蒙古包的多条绳子，以及其它很多事情。女人们要用她们的手挤牛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记得我第一次挤奶时手指是怎样的酸疼）；搓马鬃，驼毛，或是两种毛混成的绳子；她们不但要用手缝制全家一年四季的衣服，而且还要用驼毛线将两层或三层毡子钉在一起缝制地毯。强各利甫比我高出七八个厘米，我的手与他的手相比就像一个小学生的手与一个成人的手相比。但是强各利甫的脚却可以容易地穿进我的鞋里。牧民们骑马骑骆驼赶牛车很少用脚走路，所以他们的脚都比较小，不发达。蒙古牧民的手和脚又一次证实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由于剪毛机的帮助，到中午时分一大片羊变小变白了。强各利甫从羊群中抓了一只胖羊，杀了把肉连骨头割成四至五寸长的肉块扔进一口大锅里，锅里已有半锅要开的水。有人把圈门打开让羊也出去吃午饭，羊可是饿了出了圈并不跑，就在圈周围吃着草。锅里的羊肉开始变颜色。我以前从来不吃羊肉，因为受不了那股膻味，但草原上的羊肉不怎么膻，尤其是大胖羊的新鲜肉一点膻味都没有。白水煮羊肉这叫手扒肉，牧民们不用酱油醋花椒辣椒姜葱之的佐料，大多数人就直接吃这白水煮的肉。有几个人在碗里放上几颗大盐粒，浇上锅里的肉汤做成沾肉用的盐水。有人从草地里拔了棵野葱用刀把野葱切碎放在盐水里，做成葱花盐水。牧民们吃肉很是文明，他们每人兜里都有一把作工具用的折叠刀，这又是吃肉的刀子。他们左手托着肉，右手拿刀割下不大不小的肉块送到嘴里。牧民们

可以用刀把骨头上的肉和筋刮得干干净净，就像羊拐这样几里旮旯猫腻极多的骨头也能剔得比我们小时玩的羊拐还干净。我拿着折叠刀试过多次，这本事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得来的。而且我们还是真没那份耐心，手上拿着肉，肚子里叽哩咕噜乱响，我们是没有耐心一小块一小块地割肉吃的。把肉举到嘴边，一咬一大口，这多带劲！因为肉还没有煮得烂熟，有时肉块咬在嘴里筋却没有断，我们就得把脸扭向左边把手里的肉拖到右边，连咬带拽把筋弄断。不一会我们就吃得满手满脸都是油了。强各利甫笑咪咪地看着我和李卫，用手里的刀子指着旁边的一条狗："你们俩跟它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看看狗，狗用它的两只前爪紧紧按住一根骨头，在用牙齿撕上面的筋和肉。然后我们互相看看对方满脸的油，哈哈大笑起来。

强各利甫吃完肉，用左手指把刀上的油抹干净，右手把刀折好放进他的裤子口袋中，然后把手上的油小心地抹在他的马靴上，这样可以防水。

肉吃完是一锅茶。我匆匆地喝完一碗茶，把我的羊赶回圈里来。下午安静多了，没有人用剪毛机，轰鸣的柴油机没声了。人们抓羊的抓羊，剪毛的剪毛，刷山羊绒的刷山羊绒。策仁丹增在内的几个老头老太太们把剪下的羊毛抱到圈外，把蒙古羊毛与改良羊毛分开，因为它们的收购价钱是不同的。不少羊的羊毛剪下来还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找出较完整仍然连在一起的羊毛拉成一张五六尺长三四尺宽的羊毛网，把零碎的羊毛包在里面再紧紧卷起来，成为一个大羊毛卷。他们把山羊绒装在大布口袋中。没有人在指挥下命令，一切进行的自然有序，谁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羊圈里没有了柴油机震耳的噪音，却添了此起彼伏山羊高昂的"咩咩"牢骚声。给山羊刷羊绒用的是一种钢丝做成的前端弯曲，半尺宽一尺长的刷子(梳子)。山羊可没有绵羊那么乖，不论你多么小心翼翼，刷一下这山羊就张大嘴吐出舌头，"咩-"一长声，吵得人很是心烦，只能是赶快刷完羊绒把它放开，这山羊顿时不"咩"了。

太阳真是晒，圈里没有阴凉，而且四尺高的圈墙挡住了风，一千多只绵羊山羊在圈里又尿又拉，圈里的气味实在难闻。没有人抱怨或是注意到这晒这热这臭，人们在说笑聊天，剪着羊毛刷着山羊绒，他们在利用这不常有的聚会机会交流信息，逗笑、玩乐。这平和自在的气氛很快感染了我们，我们也忘掉了这晒这热这臭，成为这潇洒泰然人群中的两分子：这就是生活。

太阳还有一人高时，我们让羊出了圈，羊群散开静静地吃着草。人们直起腰揉着背，收拾起剪子，羊绒刷子，走出圈来。这次由于剪毛机的帮助，绝大多数该修理的羊得到了修理。羊群里还有不少羊没有剪毛，还有一些山羊没有刷绒，但这多数是一些弱羊，新毛还没有把旧毛顶出来。强各利甫说我们可以自己逐渐地修理这些羊。

人们说着笑着，跃上爬上马背，向着各自的浩特小颠大跑而去，背后留下一串欢声笑语。

（未完待续）



永远的大草原（连载三）：

5、牛群

蒙语牛的发音是“乌乎日”。开始的时候，当我们说“乌乎日”的时候，牧民们常常笑出声来，这真是弄得我们莫名其妙。过了很长时间，当我们的蒙语熟练起来后，才发现如果我们说“乌乎日”的时候不注意，发出的音就很像“努乎日”，而“努乎日”是哥们，同志的意思。多年后我突然觉悟到我们把牛叫做“哥们”真是没有什么不对。牛给了我们那么多：劳力，牛奶，牛肉，牛皮，牛粪，它们任劳任怨地给出了能给的一切之后,悄悄地死去。鲁迅先生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血和奶。”

草原上每个浩特都有一群羊和一群牛，牛群是六十多至一百头不等。牛群里有母牛，骟了的公牛，两三岁的牛少年牛青年，当然还是一岁的牛犊子牛儿童。蒙古牧民给牲畜记年龄用的是虚岁制：牛犊子刚生下来是一岁，过了一年是两岁，以此类推。

牛群跟马群最不同的是没有领袖，公牛(种牛)们除了配种季节是不呆在牛群里的。我们常看见几只公牛自己成一群，对有着众多母牛的牛群不屑一顾。不像儿马（种马）那样是极为负责的领袖，公牛是酷爱民主的自由战士，它们可不愿当那个费力又费神，必须时刻盯着自己的母牛们的领袖。由于没有领袖，牛群很容易散群。好在牛腿没有马腿长，散了群的牛不会跑太远。牛倌们过一两天就去找他们的牛，把跑散的牛撵成一群，赶到离水源不太远、牛倌认为是他(她)的牛群应该呆的地方。春夏秋三季牛群会自己去喝水，冬季牛也是靠吃雪解渴，但如果很久不下雪，地上的积雪冻上一层厚厚的硬壳，牛倌就得每隔十天半个月将牛群赶到我们大队北边的泉眼去喝水，一去一回要费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

秋天是牛群的配种季节，公牛回到牛群里干它们该干的活儿，尽它们的责任。牛犊子在春天出生。草原上的牛有奶，但远非理想的奶牛。很少有奶牛能挤一两升奶，一般的奶牛一次能挤半升奶就很不错了。我知道当人手挤不出奶时牛犊子仍能嘬出奶来，但我总觉得心里有不安：如果我们不挤奶，这奶该全是牛犊子的，我们在与牛犊子抢奶喝，这实在是不公平。

我们在草原的第一个春天印象特别深。经过五个多月刺骨刀割似的西伯利亚北风的沐浴，突然有一天风刮在脸上不那么似刀割了，然后积雪开始融化，又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远远望去地上可以看出绿颜色了，春天终于来了。草原上长出了短短的青草，羊和马能用它们的牙将草齐根咬断尝个鲜，牛没有上牙咬不断短草，但牛们却有出奇的耐心，闻着青草的鲜味，等待着青草长高的那一天。

一天下午强各利甫给我们赶来一头奶牛和它新生几天的小牛犊，这是我们的第一头奶牛。这奶牛是棕黄带有一些浅粉颜色，牛犊是闪亮的棕黄色。牛犊子有两只不怕虎，天真无邪无惧的大眼睛，和两只能在头顶上左右乱转的像大勺子似的耳朵。我拍拍它的头，它伸出粉红色的小舌头舔着我的手。还不到挤奶的时候，强各利甫给我们表演如何挤奶，他坐在他的左脚上，一个小桶放在左腿上用右腿扶着奶桶，然后他看看我们，高抬双手演示着如何用手指挤奶头。强各利甫眨眨眼笑着说：“这很容易。”在草原上挤奶是女人们的工作，但是如果需要的话，男人们也会做。反过来，如果需要的话，女人们也会做男人们应该做的工作。草原上男女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由于没有孔老夫子的影响，女人们不是二等公民，所以也没有妇女们的解放运动。

由于没有树，在草原上很难找到木桩木棍，牧民们把一条长牛皮绳钉在地上再把大牛和牛犊子拴在牛皮绳上。我们也在地上钉了一条短牛皮绳。那天晚上我将牛犊拴在大牛旁边。第二天早上我提了一个小桶来挤奶。我先把牛犊放开让它嘬奶，半分钟后牛犊子嘬出了奶我再把它拴上，模仿强各利甫昨天的架式我开始挤奶。奶头软软的，奶水刷刷地射在桶里，真是很容易。但不到一分钟我的手指开始酸疼起来，我停下来甩着手休息了一会。再挤没有二十秒手指又酸疼的不行了，再甩一会儿手，再挤。挤奶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呢!那天晚上我又挤奶，这次用了更长的时间不知中间休息了多少次。

一个月后我的手指不再酸疼了，挤奶这才成了一件容易的事。后来其他几个浩特也给我们送来了奶牛，在这五六只奶牛中，强各利甫的粉牛是奶最多、脾气最好的一头牛。

现在我们可以煮自己的奶茶了，而且可以想喝就喝一碗牛奶了。我们把牛奶烧开，盛在小碗里放一点白糖，真是很好喝。一天我们正在喝奶，强各利甫进来了。他看见我们每人端着半碗奶，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你们怎么喝奶呢？只有牛犊子和婴儿才喝奶的。”一句话说得我们不知所以然。我想：“为什么不喝奶呢？牛奶很好喝呀!”几年以后由于不知道的什么奇怪原因，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喝奶了。

进入秋天后我们听说了一个邻近大队新牧民们的有关奶牛的故事。城里长大的孩子们对农业与畜牧业是一无所知的。我们进入中学后每个学期有一个星期去郊区农村帮助夏收或做些其它的农活儿。这时我们才有机会认识麦子，玉米，白薯，土豆等农作物长什么样，以及亲眼见见牛，马，驴，羊的模样长象。初二时我们开始有了生物课主要是讲植物，初三的生物课则该讲动物了，包括动物的繁殖。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从来没上初三的课。我们邻近大队这几个可爱的新牧民男哥们一定也是初一或初二的学生。

老乡们认为一个大队的所有新牧民是一户人家，而挤奶是一户人家里女人们该做的事，所以各大队的老乡们都把奶牛送给女生们。于是这几个男哥们心里很是不平和嫉妒，他们决定去逮自己的奶牛。草原上没有关牛的圈，牛群是到处乱溜的。我们常常看见成伙的十几头或二十多头牛大摇大摆目中无人地走过。一天二十多头一伙牛走过这哥几个的蒙古包，哥几个兴奋地窜出蒙古包。他们手拿绳子围着牛群转。“逮哪一个?”一个问道。“那个最大个的!”领头的哥们指着牛群中的一头牛。大伙包抄而上费了一番劲把绳子套在了一头大公牛的犄角上。那天这公牛的脾气还是真好，一动不动，两只大牛眼瞪着这几个哥们看他们要干什么。哥几个挺得意：这牛比女生们的牛大多了，牛大当然意味着牛奶多了。这时一个哥们手提小桶围着牛转了好几圈，大声叫道：“牛奶在哪?”哥几个都弯着腰绕着他们的大牛转起圈来，他们只知道有牛就有奶，要不怎么叫牛奶呢!但却忘了问牛奶的开关在哪。这个故事让我们笑了好几天。

布鲁氏杆菌病简称布病，布鲁氏杆菌是由牛传染到人身上的。好几个牧民明显地有布病或布病的后遗症，其主要症状是发低烧和关节酸疼。有些妇女也应该有布病，因为她们接触牛更多些。但是我们极少听见牧民说：“我有病。”对于草原牧民只要能爬得起来就不是有病。强各利甫有布病，他老是说他的胳膊和腿酸疼，他创造了自己的练身操，先慢慢地转他的头，反时针转一会儿，再倒回来顺时针转一会儿；第二是耸他的肩膀，上下耸再前后耸；最后是伸展胳膊。我想强各利甫是因为有布病所以才得到“懒”的声誉的，强各利甫的懒，在我们大队是有名的。他很少去看他的牛群，他的牛散得到处都是，混在别人的牛群里。

强各利甫的眼力出奇的好，远远地我只能看到有几个黑点，但他却能看出这些黑点是牛还是马，不但如此，若是牛他还能辨别出这是谁的牛群里的牛。他的分辩力也是出奇的好，若几个牛群的牛混在一起，他能清楚地分出哪头牛是属于哪一群的。所以若有关于某只牛应该属于哪一群的争论，强各利甫就被请来做裁判，而且这裁判是有绝对权威的。强各利甫裁决后大家什么争论也没有了。当然特别地，他能记住他的每一只混在别人牛群中的牛。他就

让他的牛呆在别人的牛群里，当他需要某只牛时就到某群牛中去找。大多数牛倌对此并不在乎，有的牛倌不喜欢强各利甫的这种作法，但他们也没辙，把强各利甫的牛分出去还得费更大的劲儿。结果是牛倌们干脆不断向强各利甫报告他的牛是否还呆在他们的牛群里，或是哪只不在了。

有一年我们的一个新牧民也当牛倌，一次在找牛的路上碰到强各利甫。强各利甫笑话他的牛群跑散了，说道："你的牛这儿也有，那儿也有，到处都有。"我们这哥们也来的快："是啊，你的牛这儿也没有，那儿也没有，哪儿都没有。"

牧民们用牛奶做奶皮子和奶豆腐。奶皮子就是煮牛奶时牛奶表面的那层皮，牧民们有本事能使奶皮子至少半厘米厚。草原上人们用的锅都是那种尖底的生铁锅，做奶皮子要用比较浅的锅，上口直径一尺半至二尺。把牛奶倒在锅里用微火加热(一定不能让牛奶煮开！)，随着温度的增高，牛奶表面泛起的泡沫越来越多。当牛奶热到快开锅时候，把烧过的牛粪灰撒在燃烧的牛粪上，灶里的火几乎被压灭，只留下一小块牛粪还有红火。这时用一把大勺子将牛奶表层已形成的泡沫轻轻推向一边，再用勺子舀起锅里的热牛奶，高高地举起勺子，将满勺的牛奶稍微有所倾斜，让勺子里的牛奶慢慢地落回到锅里，落下的牛奶会溅起很多新的泡沫。过一段时间（没准有一个多钟头）这些泡沫就会定型，这时用勺子将它们推向一边，这定型的泡沫即奶皮子已占有了大半个锅面。再重复若干次，舀起牛奶慢慢倒下，溅起一堆泡沫复盖了另外小半个锅面。巧妙地控制燃烧着的牛粪，保持锅内牛奶的温度不变，半天过后就有了一锅香得不得了的奶皮子。

夏末秋初，牛吃了带籽的草时奶皮子最厚，能有近四分之三厘米那么厚。奶皮子是牛奶里的精华，奶油什么的全在里面。在碗里放上一把炒米，加一块奶皮子，再放一点白糖，那个好吃劲就别提了，到现在我一想起那奶皮子还口水乱流。美中不足的是炒米里常混有沙子小石头，满口嚼得正香时，"嘎吧"一声硌了牙或几乎崩掉半个牙。老乡们只吃掉一点新鲜奶皮子（当然孩子多的人家办不到），他们把奶皮子积攒在一个大盆里，让奶皮子自然发酸发酵，就行成了一种相当高级的酸奶酪。秋末的时候把这酸奶酪装进洗干净的羊肚子（羊胃）里，冬天喝茶时就可以切一小块这酸奶酪放在炒米上面，热茶一浇黄油花飘在茶上面，茶水泡过的奶酪与炒米混在一起煞是可口。我们做的奶皮子从来是一分而光不能过夜的，根本就别梦想积攒成什么酸奶酪的。

奶豆腐是另一种奶酪。要做奶豆腐首先需要一个装酸奶的木桶，中文里没有这木桶的专用名，但是英文有：churn。而且欧州人（包括美国人）用的churn与蒙古牧民用的酸奶木桶长得一模一样，弄不清是谁学谁的：不知这酸奶桶是成吉思汗带到欧州去的，还是他从欧州带回来的呢。木桶头小底大将近一米高，由三道铁箍把长木条们箍在一起。上面的木盖有一个直径一寸的圆洞，一根下端钉着一块十字形木板的圆木棍从洞中穿出，这是搅酸奶

用的。每天把挤下的牛奶倒入木桶中，再把木棍拔起来按下去地重复几次，把奶搅匀。

奶桶快满时真正的劳动就要开始了。为了把黄油分离出来，要把这奶桶里的木棍拔起来按下去连续上下摇晃一千次。前一二百次不怎么费劲，再往后就不那么舒服自在了。十字型的木板不是那么窄那么短，把这木板在酸奶中快速拉上来，再快速按下去要克服很大阻力。数到三百次时就琢磨着什么时候能到四百次，数到四百次时就盼着五百次，……。就说提上来按下去一次需要要三秒钟吧，这一千次就是三千秒，这可是五十分钟哪！终于地终于，一千次摇完了。把木盖揭开，小颗粒状的黄油都浮在上面，把它用手捞出来放到锅里，慢慢加热熔化成黄油，能灌一般酒瓶的半瓶到大半瓶。

捞完黄油，剩下的酸奶就倒在一口大锅里，在锅上放一个上小下大没底没盖的一尺多高的木桶(木箍)，木桶的下沿刚好盖住或浸在大锅里的酸奶中，一只小桶吊在木桶中，作为盖的一只尖底小铁锅坐在木桶上，小锅的尖底正对着小桶，小桶是积蒸馏水用的。小锅里盛满冷水。灶里加入牛粪，用大火将酸奶烧开。翻滚着的酸奶喷吐着蒸汽，热蒸汽碰到凉锅底凝聚成水，沿着小锅的尖底流进悬挂着的小桶中。这时候整个蒙古包里弥漫着带有酒味的酸奶的香味。连续用大火将酸奶煮开约一个多小时，小锅里的水变热了就换凉水。凝聚在小桶里的蒸馏水就是奶酒，酒的浓度由奶的酸度而定，大约能达到十来度。有的人家将奶酒装在罐子里埋在地下，过几年再挖出来，据说这样奶酒更香。

等大锅里的酸奶凉下来不再翻滚时，就看到锅里有了分明的白色沉淀物。用一把大舀子一舀子一舀子地将冒着热气的酸奶，舀进哈那墙上挂着的一个二尺来长尖底白布口袋中，口袋下放一个盆，透明的带一点绿的淡黄色的水从口袋的尖底上渗出流到盆里。等到口袋不渗水了，就将口袋的上口系好压在两块木板之间，木板上压一块大石头，这样让奶豆腐成形，而且压出剩余的水。第二天早上，把口袋里的奶豆腐用粗白线小心地割成一厘米厚的薄片摆在木板上，再把木板放在蒙古包顶上去晾。这奶豆腐片晾到半干的时候是最好吃的，很有嚼头，而且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奶豆腐片晾到全干那是牙也咬不动的，要用斧子砸成小块。把小块干奶豆腐放在碗中的热茶里，能给茶水带来一股香味，而且热茶水能把奶豆腐泡软。有的时候人们一高兴，就从大白布口袋里切出一大块新鲜奶豆腐放到小盆里捣碎后放上白糖，再用带花的小模子压制成精致的，像小圆点心那样的带花的小圆酸甜奶豆腐。有意思的是这加入的白糖改变了奶豆腐的结构，即使是全干的甜奶豆腐也很容易咬的。甜奶豆腐是待客的高级食品。

九月末天气已经很冷，奶牛们也没有多少奶了，牧民们把奶牛和它们的牛犊子放回牛群中。这就是说，从这时起的六个多月没有新鲜牛奶和奶制品。

第二年春天我们的粉牛又生了一个牛犊，于是粉牛和它的牛犊子又回到我们身边。往后我们又有了三、四头奶牛。每天早上我们一个女生负责挤奶，然后放开牛犊让它们吃奶。牛犊子吃饱奶后翘起尾巴围着它们的母亲又蹦又跳。我们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捉住，拴在地上的绳子上，然后放开大牛让它们去吃草。等大牛走远后我们放开牛犊子让它们在附近吃草。

随着青草越长越高，各种虫子越来越多。有一种专门吸动物血的虱子叫草爬子，草爬子小的时候大约半厘米长，紫红色。草爬子从草叶上爬到动物的身体上，或是被风刮到动物的身上，当然可以刮到人身上头发里。人的好处就是有两只手，怎么也能把草爬子捉出来，但其它动物可就没有这个本事了。我在狗身上牛身上都见过这种草爬子，它们的头深深地扎在肉里喝着动物的血。草爬子的头不长大，但肚子很快就成为一至二厘米长闪亮的暗蓝色，里面装的全是动物的血。牧民们告诫我们不要把草爬子拔出来，因为它的头扎得很深，拔出来草爬子会造成动物身上一个很深的坑，这样动物容易受感染。牧民们用剪子把这大草爬子剪断，暗红色的血流了出来。草爬子死了不久头就会掉出来。每天我都要和牛犊子们玩一会，边玩边看它们背上脖子上肚皮上有没有草爬子，同时也给它们挠痒痒，牛犊子们很舒服地站在那儿伸着脖子让我给它们挠。

有一天傍晚我正在给一个牛犊子挠痒痒，突然觉得有谁在顶我的背，几乎把我顶了个跟头。我转身一看是我们的大粉牛，它站在那儿伸着脖子等着我给挠痒痒呢！它是看到我给小牛们挠痒痒，嫉妒起来了。我抱住粉牛的大脑袋，把我的脸贴在它的眼睛上，感到它的大眼珠在眼眶里转动。“好吧好吧，我给你挠。”这大牛身上的表面积可是比小牛大多了。我给它挠着脖子底下，粉牛的眼睛半闭着很是舒服的样子。挠完脖子它睁开眼睛用舌头舔着我的手，我想它大概是在说“谢谢你。”牛舌头伸出来的时候很软很滑，但缩回去的时候倒刺都竖了起来，跟砂纸似的很刺人，“哎哟!”我把手赶紧缩回来。粉牛的舌头停在半路，和蔼的眼睛看着我：“你不喜欢?”

五年五个春天，粉牛生了五个牛犊，两个棕黄色，一个深棕色，一个灰色，最小的一个牛犊跟大牛一个颜色，是粉色。

第五个春天粉牛一下子老了许多，不再那么有精神。它已经没有奶可挤了，连小粉牛也吃不饱呢。小粉牛的肚子瘪瘪的，毛没有光亮，它不像别的牛犊那样又跑又跳。老粉牛回来的越来越晚，可怜的小粉牛站在那儿可怜巴巴地看着别的小牛吃奶。有一天近半夜时粉牛才回来，我起来把小粉牛放开，小牛哭着喊着扑上去。月光下我看着大牛，它脸上没有表情。眼睛里没有眼泪。第二天夜里大粉牛没有回来，天亮以后我和李卫去找它。我们在东边峡谷的小溪旁找到了它。粉牛实在是累极了，它卧在溪水旁起不来了，我们推不动抬不动它，粉牛睁着疲倦的眼睛看着我们，我们的眼泪流下来了，不知说什么好。我们采了一些野花放在它头上，离开了。两天后粉牛死了。我总想，若粉牛会说话的话，它会向我们说什么呢?

小粉牛成了孤儿，我们得想办法喂养它。我们还有另外三只奶牛，不论你如何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没有奶牛会自愿喂养一个孤儿。每天早晚我们让一只奶牛的小牛吃一阵奶，然后把它拴上再让小粉牛吃剩余的奶。这时我们一个人必须站在奶牛旁遮住它的视线使它看不见小粉牛，这样它以为还是它自己的牛犊在吃奶。我们一边拍着母牛的头,或是给它挠痒痒，一边跟它胡说八道：“你真是一头好牛!”吃完这头牛的奶，我们再让小粉牛吃另一头牛的奶。一个月后小粉牛健壮起来，身上的毛闪亮发光了，与其他牛犊子一起蹦跳乱跑了。九月底小粉牛长大了好多，我们得让奶牛和牛犊子们回牛群了，这就是说小粉牛自此就没有奶吃了。我抱住小粉牛跟它说再见。

下一年春天我在一群牛中看到了我们的小粉牛，它长高长大了不少，瘦瘦的但是并不虚弱。小粉牛与比它大一岁的灰色姐姐站在一起。我下了马朝它们走去，灰姐姐赶快朝旁边走开，但是小粉牛站着不动伸出脖子等着我。我跪在地上抱着小粉牛伸出的脖子，我问：“你冬天过得好吗?”它的大眼睛看着我。我在它身上发现了两个已有一厘米多长的草爬子，我没带剪子就在地上找了两块锋利的小石头，把草爬子的肚皮挤破，再给我们的小牛挠了一阵痒痒，小粉牛舒服地伸着脖子半闭着眼睛。跟小粉牛玩了一阵子后，我亲着它的大眼睛，说再见。上马走了一会儿，我回过头来看看小粉牛，它还站在那儿看着我，它的灰姐姐走了回来站在它旁边也盯着我，好像在问“这是谁?”

在草原的第六年我当了额尔登巴特浩特的牛倌，有了一年多真正“牛仔”的经历。额尔登巴特是我教我们队办季节小学时的学生，他现在十六岁，发育得早长得膀大腰圆像个大人一样，他是浩特的羊倌。额尔登巴特是那仁其其格同母异父的弟弟，他与他母亲，十二岁的弟弟住在一起。额尔登巴特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蒙医，有着很好的声誉，他有智慧，有知识，爱看书；他长得高大，是个很好的摔跤手。在我们来到草原之前的一年，他得了癌症，他知道蒙药里没有多少能对付癌症，就带着全家额尔登巴特和他的小弟弟包括在内，去了北京求医，也许他是去北京作一次最后旅游。回到草原后不久他就去世了。真遗憾我们没有机会见到这位不寻常的蒙医。

人们都说额尔登巴特长得像他的父亲，但额尔登巴特可不爱读书。额尔登巴特的母亲次仁玛贵五十多岁，非常能干，不爱说话，脸上总是带着微笑。看她眼睛我就知道这是一位很有主意很聪明，但不好接近的女人。(草原牧民在年纪大的人的名字后面加一个音“贵”以示尊敬，次仁玛是名字，次仁玛贵是尊称。)

我接管牛群的时候正是夏天，这是牛倌们最轻松的季节。额尔登巴特指给我看他们的牛群，除了奶牛和牛犊子呆在浩特外，牛群的五十多头牛散在一条峡谷的坡上吃着草。这时牛倌们是每隔两三天去看一次牛群，但我是天天来看我的牛群，因为要记住这五十多头牛都长什么样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牛群里有八头骟了的公牛，它们是拉牛车

用的。骟牛的个儿比母牛大好多，但脾气却很好。我走近一头栗色大牛，它站在那儿不动，我抓住它的犄角，拍拍它光滑而平坦的脊背。栗色牛静静地站在那儿在用它的舌头润湿它的鼻孔，它的舌尖很容易地一下伸进左鼻孔又一下伸进右鼻孔。我放开它的犄角，站在它前面两米远的地方盯着它，它的舌头一下子滑进这个鼻孔又一下子溜进那个鼻孔。栗色牛的两只大眼睛瞪着我，似乎在说："你会吗?"我使劲地伸着我的舌头够我的鼻子，踮着右脚闭上左眼舌尖伸向左鼻孔，踮着左脚闭上右眼舌尖伸向右鼻孔，使尽全身力气舌头就是够不着我的鼻子。栗色牛没有丝毫嘲笑看不起的意思，仍然两只大眼瞪着我，极为耐心地继续演示给我看：怎么把舌尖一下又一下地滑进两个鼻孔。我想起上小学时，我们班的一个同学，他的舌头就可以很轻易地舔到他的鼻子尖。那哥们前世一定是头牛。当我向母牛或其它两三岁的牛青年们靠近时，它们就会马上走开，直到走出它们认为是安全的距离后转过身来看着我，若我站着没动，它们就转身吃起草来。

公牛(种牛)们还不在牛群里。我常常看见三只到五只公牛自为一群，它们总是一头跟着另一头地排成队走路，每两头牛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这公牛们有时很有些诗情画意呢：远处，五头牛在爬一个小土丘，第三头牛正在土丘顶上，第二、四头牛一个头朝下一个头朝上，它们的身体与地面形成三十度的夹角，第一和第五头牛则在平地上，配上蓝天白云，绿毯似的草原和近处黄色粉红色的野花，这真是一幅极为赋有诗意与和谐美的照片。

夏末秋初公牛们回牛群干它们的该干活，过过瘾。公牛是草原上最爱自由的动物，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牛群，它们可以在任一牛群中选择它们的"女人"，不受大队边界和公社边界的约束。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一个牛倌说"这是我的公牛。"正是因为公牛交配的这种自由性随机性，所以牧民们不必耽心牛群近亲繁殖的问题。与儿马（公马）们紧紧盯着保护着它们自己的母马群不同，公牛们并不占有任何母牛，就是说没有属于自己的母牛。配种期一过，公牛们立即变成了另一种"人"，它们对"女人"们根本不屑一顾，组成自己的"男人"俱乐部，吃喝休息睡觉在一起，想去哪儿排起队来拔腿就走。不拥有，不属于，不用负任何责任，平和，悠闲，自在，公牛们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实在是飘逸潇洒已极。

我常想：为什么人类没有一个配种季节呢？若人类也有这么一个配种季节的话，配种季节一过，人人都会心情平静轻松愉快地各行其是，少了很多犯罪和乱七八糟；但小说就少了创作素材，新闻记者就少了刺激的新闻丑闻，警察侦探们就少了好多事干，人们也许会埋怨生活太平静没意思不热闹了。

公牛们在配种季节一扫平时的潇洒平和，满不在乎的气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得绝对好强绝对顽

固，可以打架至死。初秋的一天我骑着马往北去找我的牛群。走着走着我突然听到牛叫声，不是平常牛的“哞哞”叫声，而是一种拉得很长不寻常的叫声。开始时只有几头牛在叫，不一会越来越多的牛加入大合唱，声音如响雷惊天动地。我催我的马朝声音跑去，爬上一个山梁，我看见山坡下黑压压的一大片牛，少说也有二三百头围着什么东西站成一圈，伸着脖子仰天嚎叫，还有不少牛从四面八方朝这儿跑。这是怎么了?

我下了马站在那儿观看，走得离这些情绪极为激动的牛太近是不安全的。一会儿一个人骑着马过来了，是强各利甫。他看着越来越大的牛的大聚会，说，昨天他经过这儿附近看见两头公牛在打架，一定是一头把另一头打死了，这些牛们正围着死去的公牛大哭呢。

“牛真的为死去的哥们哭吗?”我问。

“可能是哭，但牛哭时可没有眼泪。”强各利甫看看不断增大的哀嚎着的牛群，转头看看我说。

可是我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个印度电影，一头牛当它知道它要死去时眼泪就静静地流了下来。

后来我确实在那个地方见到一头死了的公牛。那天牛群确实是在围着这死牛哭——嚎叫。牧民们说，如果要杀一头牛吃肉，一定要把血和内脏埋好，要不然有的牛闻到血腥味就会跑来嚎叫，这嚎叫会吸引越来越多的牛从四面八方跑来一起嚎叫。马、骆驼、羊对它们死去的同胞就没有这样的行动。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这牛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那年的草长得很好，前半个冬天很好过。我们搬进冬营盘后下了一两场不很大的雪，地面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雪堆。过一段时间雪堆上层冻成硬壳。羊用前蹄将雪上硬壳敲碎，吃下面的粉面雪。对于新形成的软雪堆，牛舌头很容易将雪卷到嘴里，但牛却对付不了表面硬壳太硬的雪堆。牛倌们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得把牛赶到我们大队北边的泉眼去饮水。那泉眼离我们冬营盘还真是不近，每次我都得早早动身，骑着骆驼赶着牛群边走边吃，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泉眼。在一个山梁的半山腰散布着十来个泉眼。

泉水从半山腰流下来冻成一条二十多米宽的冰瀑布，冰瀑布的下端是一块两个足球场大的冰场。牛们闻到水味激动地向着泉眼跑去，我下了骆驼牵着它向泉眼爬去。每一个泉眼周围都覆盖着厚厚的冰层，冰层中间有个直径为一尺到二尺的开口。我的骆驼看到了开口，三步并作两步超过我牵着我向泉眼开口奔去。骆驼的嘴扎在水里慢慢地吸了一大口，然后“咕咚”一声咽了下去。气温大约是零下10°到零下20°，但我看见在泉眼附近的冰底下游着几条小鱼。泉眼的水现在可是冰一样的凉，牛们喝几口就得停下暖一暖。过了一会儿喝够水的牛一小步一小步非常小心地走下山坡，散在冰场的南边吃着草。我的骆驼头也不抬地喝着冰冷的水，喝了足有好几桶，这哥们真行！终于，我的骆驼抬起了头，水顺着它的下巴颏的毛尖往下滴。它牵着我大步走下坡吃起草来。我把骆驼腿拌上，向着

冰场走去。

整个冰场是天蓝色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干净纯洁的冰场。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冰场。有的地方的冰清澈透明能清楚地看到一尺多厚冰层下的干草；有的地方的冰是一层一层的，一层白色的冰上面一层透明的冰；有的地方透明的冰层里夹杂着白色的条形，云朵形的花纹。不同结构的冰层以不同的方式反射折射着波长不同的阳光，这么看是鲜红，那么看是亮蓝，高看是明黄，低看是闪绿，十光二十色真看得我眼花缭乱。冰场像是一个童话中的世界，我觉得我是走在龙王的水晶宫的屋顶上，龙王该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转头看看我的牛群，三分之二的牛在低头吃草，而其它三分之一抬着头瞪着眼看着我在冰上走。我冲着它们大叫：“嘿！过来呀！”所有的牛，连我的骆驼，听到我的喊声都抬起了头瞪着我，但是谁也不向前迈步不动窝。我记得在来草原的路上人们告诉我们，草原上最厉害最危险的动物是冬天的儿骆驼(公骆驼)，发情的儿骆驼嫉妒心极强，它看见你，一心认为你要抢它的“女人”，这儿骆驼是一定要追上你把你碾死的。真可怕!我们问，那怎么办呢?回答是赶快跑到一大片冰场中，因为骆驼怕滑倒，它们是从来不上冰面的。我盯着我的骆驼，倒是想验证一下这个骆驼怕走冰面的说法。我小心地走下冰场，解开骆驼拌子，牵着它朝冰场走去。在接近冰场的时候骆驼越走越慢，张着它的大嘴大声地发着牢骚。在离冰面还有一米远的地方，这骆驼站住贵贱不动了，长脖子左摇右摆，大张着的嘴巴高声吼叫着一百个不高兴，不论我怎么牵怎么拽这哥们就是纹丝不动。骆驼的软脚还怕滑不喜欢冰，那么马牛羊的硬蹄子更是别想在冰上站稳了。没有一头牛，就连牛青年牛少年们都不上冰面来转一转。那天下午我们边走边吃往回走，天黑之前到了家。

春节前五天的傍晚刮起了白毛风，白毛风刮了整夜到第二天中午才停下。羊群关在羊圈里下午才放出去，而牛是没有圈的，它们早就顺风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第三天早上我骑上骆驼南下去找我的牛群。除了碧蓝的天空之外，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极为纯净的白颜色。太阳好像比往常要高一些，因而小一些，但是却要耀眼得多。我没有墨镜，只能使劲地眯着眼。由于风的作用地上雪的厚度是不均匀的，我的骆驼高昂着它的头并不顾及脚下地面的情况。踩在松软厚厚的雪堆上，骆驼的大脚不会像马的蹄子那样容易地陷在雪中，再加上它们的长腿，这使骆驼们很是轻松地在深浅不一的雪地上快走小颠，而且雪地比布满砂粒小石头的土地要松软许多，骆驼的软底大脚当然是更喜欢雪地的。

骆驼的四只大脚有节奏地落在雪地上，演奏出吱吱咯咯动听的音乐，但我没有心思欣赏音乐，心里翻来复去地琢磨着我的牛能跑到那儿去呢？走了挺长一段时间后，我突然看到前面的雪地上有些黑点。再走近一些我看出它们是牛！五十多头牛在雪地上吃着草，我真希望它们是我的牛。我催着骆驼快走，它张开嘴伊伊哇哇地抱怨着，但是加快了脚步。到了近前一看，真没运气，不是我的牛。我们走一阵小跑一阵，又过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我又看到一伙

牛，这伙里也没有我的牛。在第三伙牛中我看到六头我的牛，两头母牛和它们的牛犊子，还有两只半大的牛。这就是说我的牛群已经走散了。我继续往南走。

中午时分我见到一伙七、八十头牛在一个山坡上吃着草。当我接近这群牛时我看见两个人骑着马从北边过来了，他们是另外两个浩特的牛倌，也来找他们的牛。在这伙牛中有二十多头是我牛群里的，一个牛倌说这里也有他的十来头牛。另一个牛倌说他见到一百多头牛在这西北方向的一个山谷里，这让我进退两难了：是往南走还是往北走呢？两个牛倌都说应该先去南边。我们三个人一块往南走着，一路上我们又碰见了几伙分散不多的牛，其中有我的几头。我们爬上一个山梁，山梁南面是一大片开阔的平地，平地里散着一百多头牛。

正当我们要往坡下走的时候，我们看见远处地平线上一条略为弯曲暗色的粗线在移动着，我们勒住骆驼勒住马定睛细看，三个黑点在粗线的南面时快时慢左右运动着。这是什么玩艺儿啊?年纪大些的牛倌聚睛看了一会笑了起来，说这是三个人赶着一大群牛往这边来了。这到处一片白的大地与刺眼的阳光使景物与平常大不一样。

我们朝坡下跑去，跑进开阔的平地穿过牛群，没多久就碰上了丹木登和其他两个牛倌，以及他们赶着的这一大群两三百头牛。丹木登说他们决定把他们看到的牛都往回赶，因为其他浩特的牛倌很快也会来找牛。在这一大群牛中我看到若干熟悉的面孔和身段。我们三人加入了这赶牛的行列。随着往北，我们的牛群像是滚起来的雪球越来越大。我们走一会儿小跑一会儿，很快牛群增大到六七百头。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一群牛。这一大群牛跑起来的时时候，两千几百只蹄子敲击着地面产生的音响效果震天动地，拌着牛群后扬起高高的雪粉雾，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振奋。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离冬营盘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是又累又饿，决定把这一大群牛就扔在这儿，明天一早再来分牛。我回到浩特时天已经全黑了。我给自己做了一顿香香的面条，吃完面条就睡觉了，那一夜睡得可是真香。

我们搬进了春营盘。

早春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夜晚的气温在零下。额尔登巴特的母亲次仁玛贵观察了牛群里的母牛，说有两头母牛很可能这几天就要下牛犊了，叫我晚上把牛群赶回浩特来，这样可以把新生的牛犊抱进蒙古包里以防被冻死。一天半夜我被牛叫声惊醒，牛叫的声音短促而兴奋，并且不是一只牛在叫而是一堆牛在混声合唱，这牛们在开晚会还是在干什么？我穿好衣服走出蒙古包，在星光下见牛群站成一个圈。我走过去钻进圈里，一只母牛生了一头小牛，站了一圈的观众在扯着脖子高叫庆贺呢！这群笨牛真可笑：“你们捣什么乱呀!”我冲它们叫道。但没有牛理我，大家伙儿仍然在兴奋地高唱赞歌。我找了一块毡子把湿漉漉的小牛抱在毡子上，拍着母牛的头，说：“天亮就给你，外边太冷了!”我抱起小牛朝蒙古包走去，牛群不唱了，但没有一个庆祝者跑过来和我打架，大伙儿站着不动，只

有两三只半大的牛一直跟我到蒙古包门口。

草原牧民不吃马、骆驼，或狗的肉，只吃羊和牛的肉。如果不做新的皮得勒，皮被子，牧民们就把羊皮卖掉，但牛皮是从来不卖的。他们用做奶豆腐剩下的黄绿色酸水将牛皮泡软，把牛皮割成两厘米左右宽的皮条，在皮条的正反面反复涂上羊油，还要加以抻拽，以保持皮条柔软。这牛皮条可是绝对有用的：马笼头马嚼子是牛皮条做的，连接马鞍子的各个部件用的是牛皮条，连接牛车上套在牛脖子上的木套是用牛皮条，钉在地上拴奶牛的长绳子是牛皮条拧的，要拴紧任何关键重要的部位，都可以用牛皮条割成的细绳。老乡们手上总是有一些临时机动可用的牛皮条。

除了春天，如果一头牛因为什么死去了，牧民们是要剥下牛皮的。秋天时一种牛蜂刺穿牛皮表层在牛皮的内层下卵，整个一冬天卵在牛皮下发育成幼虫，变成蛹。我记得看过一张春天的牛皮，在牛的背部有二十多个大蚕茧一样的蛹，蛹几乎穿透了牛皮造成一个个潜在的大洞，这就是为什么春天的牛皮不可用了。春末夏初时蛹变为成虫钻破牛皮飞出来。做一只牛真可真是不容易！想象着几十只蛹在身体里慢慢长大，然后在皮上钻个眼儿飞出去，这让我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当牛虻从牛皮里钻出来的时候，这就是牛“跑疯”的季节。我估计，在牛虻钻透牛皮飞出去的一霎间，牛像触电一样的难受，这牛就竖起尾巴似旗杆疯跑起来。要就一只牛疯跑倒也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别的牛一见这疯跑的牛，立即激起它们的可怕回忆，也感到触电一般，于是大家都疯跑起来。疯跑就是没有方向地乱跑，如同一颗炸弹掉在牛群里，一下子牛群就四处跑散没影了。幸好并不是每个牛虻钻出牛皮时都使牛感到似触电，要不然那么多的牛虻蛹，牛得没完没了地疯跑累死了，牛倌们也得气死了。

一天早上我骑马去找我的牛群。等我把东几只西几只的牛都轰到一起时已是中午了。我想把牛群放在离浩特不是很远的一个溪谷里。我们正在走下一个山坡，大牛中牛小牛们甩着尾巴慢慢地走着。突然走在前面的一只黄色大骟牛竖起尾巴转过身来直瞪着两只大眼似箭一般穿过牛群从我身边跑过，一眨眼黄牛就窜到坡顶消失在坡那边。我再回头看牛群，大吃一惊：像热油锅里滴进了冷水炸了锅，牛牛竖着尾巴向四面八方疯跑而去，很快就不见了。等我明白过来，只剩两只绕着圈乱跑的牛，以及疲劳的我和我的疲劳的马。我顿时火冒三丈，恨不能抓住这只捣乱的黄牛狠狠地咬它几口。虽然我极为同情它为什么疯跑，但看着我和我的马一上午的辛劳全是白费了，我就嗓子眼里冒烟。我下了马在山坡上坐下喘着粗气。这只黄牛真可气，我想象着发明了一根极长的竿子，竿子头上绑一根针，我举着长竿子刺这捣蛋鬼黄牛的屁股。黄牛跳进来惊讶地转身看着我，我朝它哈哈大笑：“看你再捣乱!”这解恨的想象使我平静了下来，我决定回家，让疯跑的牛们冷静下来，我明天再来找它们。

不跑疯时骟牛是很温存善良的。用不着很多训练骟牛就能拉车，把车辕子上的两块略微弯曲的木条一上一下卡在牛脖子上，牛就能拉着车走了。牛走得比人慢，人坐在牛屁股后面的车上，要让牛转弯只要朝相应的方向轻轻拉牛鼻绳即可。牛的脾气真好，赶牛车真是容易，很小的孩子和很老的老人都可以单独操纵牛车。

自古以来牛车的轱辘都是硬木做的，六八年我们到草原时百分之八十的牛车的轱辘还是木头做的，只有少数是铁轱辘，铁圈外包着一层厚橡胶皮，还不是充气的轮胎。一般说来一户人家需要四辆牛车，一辆半装蒙古包，一辆半装包里的乱七八糟，一辆坐人。我们刚到草原时一半多的人家还没有铁轱辘车，那时候拥有铁轱辘车是一户是否富裕的标志。七年后我离开草原时，每户人家都有了至少一辆的铁轱辘牛车，一些日子过得好的人家已全都换成铁轱辘车。

能制做硬木轱辘的一定是不简单的巧木匠。木轱辘的造法还是和几千年几百年前一样，简单而精巧：六块四寸多宽的弧形硬木块正好拼成一个大圆圈，每个弧形木块上连着三根同样是硬木做的插在车轴上的车辐条。这弧形木块们和车辐条们可不是用大钉子小钉子钉在一起，或用强力胶粘在一起的，而是极巧妙地在相接处制造出凸凹结构，凸凹结构严丝合缝地互相嵌在一起的，这木头车轱辘真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呢！木头轱辘用久了就会松动，有时牛车走着走着，木轱辘就会掉下一块来。缺了一块的轱辘不圆了，车当然就不能走了。老乡告诉我们赶牛车出门时带一把斧头和一小桶水，若车轱辘掉下一块时，把掉下的车轱辘摆回去，倒些水在上面。木头湿了就会臌胀一些，再用斧头凿紧，这样木轱辘就可以再走好一会儿的。赶牛车的人很是悠闲自在，拉车的牛更是自在悠闲。人在车上坐一阵，跟在牛旁走一阵，牛车慢慢地在草原上吱呦吱呦地唱着歌。

有一次我和江华赶着一辆很旧的木轱辘牛车去拉牛粪，本来下午就能回来，结果牛车的木轱辘掉一块下来，我们修好，走不久又一块掉下来，我们又修好，这样边走边修，伴着江华时高时低的悠扬的中外名歌声，我们半夜才回到家。

骟牛们与公牛不一样，它们是从来不离牛群的。若是一家人要出门或是要拉水需要一头骟牛，牛群不远的话，就叫一个小孩去找牛。牛的鼻绳是驼毛搓的，平时就系在牛犄角上，抓住牛犄角解开牛鼻绳就可以牵着牛往家走了。有一次我们没水了需要一头牛拉水车，我走到牛群里逮住一头黑骟牛，牵着往回走。走了一会儿，我回头看看平坦光亮的牛背，叫出声来："为什么不骑上走呢!"黑牛真老实，我爬上它的背，牛背比马背是宽多了，两条腿可是绝对夹不住牛肚子的，夏天的牛毛又短又光滑，牛也没有牛鬃，我的手还真是没有地方抓。我拍拍牛背，抖抖鼻绳大黑牛慢吞吞地一步一步地走起来。我坐在牛背上真是很得意，心里琢磨着上哪儿去找根笛子吹，就像画上的牧童那样。正神气时黑牛向左一拐，我立时从它右边滑了下来。牛不高我倒没摔疼。我看着大黑牛，这哥们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也不看我继续慢吞吞地一步一步朝前走着。我坐地上真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呢。

我不记得有哪个牛倌计划着留哪一头小公牛做为种牛。到了夏末秋初的配种季节，那儿总有足够多的种牛在行使责任。没有几个牛倌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牛群里有多少只公牛犊子。再加上牛群散得到处都是，到了该骟牛的时候，牛倌们往往找不全自己的牛，结果总有一些小公牛漏网长大成种牛。

骟牛是在小公牛满一周岁的春末夏初苍蝇还没出来的时候。草原上很多牧民都会骟牛，会骟马的人却很少。我跟丹得布说好请他在一天中午来帮我的牛群骟牛。前一天我用了一天时间把我的牛我全赶到离浩特不远的地方。这天上午我去把牛群圈回来赶进离我们不远的一个石头羊圈中，额尔登巴特关上圈门。我和额尔登巴特坐在圈门口等丹得布。近中午时额尔登巴特的母亲次仁玛贵赶着牛车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小盆。这小盆是装牛蛋用的，牧民们认为羊蛋，牛蛋，马蛋都是好吃的东西，我总觉得那东西味不对从来没尝过。我们坐在那儿等啊等，少说过了也有两个钟头，太阳都开始偏西了，还不见丹得布的影子。次仁玛贵说："他可能明天来吧!"我可是开始生气了，我费了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把牛圈在一起，这要是等到明天又不知得用多长时间才能把牛找齐呢!再说，丹得布要是明天也不来呢？我以前见过别人骟牛，也就是用刀割了口子，把牛蛋从口子里挤出来就是了，并不复杂。

我说："我来骟牛。"

额尔登巴特吃惊地看着我。

次仁玛贵低头想了一想，抬起头看着我，说道："你能骟。"

牛群里有五头一周岁二虚岁的小公牛，这哥儿五的个儿比最大的种羊还大，吃饱青草后身真强力特壮。膀大腰圆的额尔登巴特现在可有事干了，他抓住一头小公牛，一扭就把瞪着两只大眼顽强不服的小哥们摔倒在地上，骑在它的肚子上把两条后腿使劲往前拉。我把我的刀子在一块石头上磨了磨，用衣襟擦干净。次仁玛贵在旁边做指导。我用刀子割了一个二寸多长的口子，把牛蛋挤了出来，牛蛋上连着白色细软的输精管什么的。"把那些连着的东西多揪一些出来，不然的话以后它的行动还会像个公牛。"指导员说话了。我把牛蛋放在小盆中，然后把口子两边的皮肤认真对好，用手指使劲地挤压在一起。额尔登巴特从牛身上站了起来，小骟牛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站起来慢慢地走进牛群。次仁玛贵说："三天内若牛不死，就没有问题了。"额尔登巴特站在他母亲背后向我做了个鬼脸。没用一个小时，我们就给这五头小公牛做完了手术。

第二天早上没顾上吃早饭，我就骑马去了牛群。五只小骟牛三只在吃草，另外两只卧在地上反刍咀嚼着。卧在地上的一只看着我，好像在说："又是你。"然后不屑再看地把头转了过去，看着另一只卧着的小骟牛。

十天后五只小骟牛不但全活着而且跟其它小牛一样在牛群里又蹦又跳又跑了，没有一只还记得十天前的不愉快经历。我在牛群里穿过，两只新骟的小牛伸着它们的脖子等着我给它们挠痒痒，我拍拍它们的头，给它们一只一只地挠着痒痒。在我给第二只小牛挠痒痒时牛群向南移动了，而这只小牛仍然站在那儿伸着脖子半闭着眼，实在是很舒服的样子。我挠了一阵，拍拍它的头，说：“快回牛群吧！”小牛转过头伸出舌头舔着我的手，然后一步一步地向牛群走去。我欣慰地注视着它的背影，仿佛看见一只大骟牛走进了牛群。



正云兄二三事

——宝日格斯台知青二三事

我和王正云兄，很久没有见面了。他留在内蒙，我返回北京，音信两隔，而对他的思念之情未断。我俩不是一个分场的。但我们宝日格斯台知青的友谊，难道是以所居之地来分厚薄吗？最近，我听到不幸的消息——他走了。

我不能相信，大我四岁的他会走得那么早。

而最近从一位知青朋友那里得知，我们的老朋友——王正云老兄，在赤峰平庄，过着平静的退休生活。当我听说正云兄还健在，而且还生活得不错的时候，非常高兴，马上与正云兄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的声音，心情十分激动。

事实上，知青返城后，正云兄留在场部，曾经到一连做会计，在总部生产科工作过，后来做了工会委员；而后调到赤峰的郊区林场，元宝山农林场。1987——2007年后他一直在平庄城建局作技术干部，直到退休。

正云兄有一子，在北京工作，据说干得很不错，这使他很是欣慰。

我与正云兄，相处时间不长，但与他的若干次交往，都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他，高高的，瘦瘦的，说话时，总带着笑，一口的京腔，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成熟。

我欣赏正云兄，我爱看他在风雪中跋涉的步履，爱看他谈古论今时的渊博与幽默，特别是他的一边谈话一边把着长烟袋锅子，喷云吐雾的模样……

初次见到的老大哥

1967年，当我下决心去内蒙闯闯，做一辈子牧民时，我在家里收拾行囊。

院子里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声音很陌生。

我走出门，看见一位大约一米八零左右的高个子男生，身材瘦瘦的，笑着问我：“你是黎烈南吗？”

当他笑时，两颗门牙，突兀出来，衬托着并不英俊的面庞；然而一双朴实友善的眼睛，却让我感觉特别的舒服。

我回答：“是。”

还没等我开口询问，他亲热地说：“我叫王正云，八中的。和你一样，报名去内蒙。咱们就要一起在草原干一辈子了。以后互相照应。你都准备好了吗？”

我点点头。我看着这位明显比我大几岁的高中生老大哥，心里很温暖。

正云兄仔细告诉我集合的时间、地点，然后说：“11月16号早上见！”

他招招手，敏捷地转身，走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一阵踏实。我在北京生活了17年，见到的人不少，而当我见到了正云兄时，才真正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我预感到，我在内蒙会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确信。

在风雪围困之中

到了宝日格斯台牧场后，我分在了汗乌拉分场，正云兄分到了白音温都分场，后来他去了配种站。我们在买东西时偶然相会，开会时互相打一下招呼，他露出两颗突出的门牙，笑问我生活怎么样——风雪中传来的一声“小心”，让我听到了老练的大哥对不太稳重的弟弟的叮嘱。

正云兄那时正在管养改良马。他翻身于坐骑之上，那神态，那姿势，像粘在了马身上，俨然草原牧民的形象。听着他“小心”的嘱咐，我目送他稳稳地驰马远去的身影，看得发呆……

让我真正领略正云兄的为人的，是一次回京探亲的路上。那年冬天，寒风刺骨，一辆汽车载着我们二十多位旅客，从牧场驶向西乌旗。一路上，汽车碾着厚厚的积雪，向远方的目标开去。

汽车开到离西乌旗大约三十多里地的地方，水箱冻了，不能前行。我们等着司机想办法，而车子始终没有发动起来。

夜幕降临，天上的寒星与地上的积雪相映，每一个人在车厢里都冻得坐不住了。

在茫茫草原过寒冷的冬夜，对我们这些放过羊的人来说，不是第一次了，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怎样做，才能叫人们更早摆脱困境呢？

此刻，一直将烟杆儿含在嘴里的正云兄，把烟锅子磕了磕，将烟袋系紧，揣在衣带里，果断地说："去一趟西乌旗，搬救兵！哪位哥们愿意和我一起去？"

漫漫雪夜，摸到三十里地以外的西乌旗？正云兄识路吗？大家质疑着。正云兄笑道："别忘了，我放过马，路熟！"

我应声答道："我跟你去！""我！""我也算一个！"一位一米九以上的大个子军人，与我们总场的张会计，相继呼应着。

人们一阵骚动，七嘴八舍地说："劳累你们了！""小心，一路平安！"……

我心里踏实极了。我想，张会计他们也是——因为有正云兄。

正云兄对大伙儿憨厚地一笑，望一望天空闪烁的星星，对我们道："咱们抄近路，这样可以少走十里路！"他的两颗门牙露出来，和夜雪的白，相互辉映。

我们不走大道，跟在正云兄的后面，向一座小山翻过去。我们放心地跟着正云兄，急速行进。正云兄瘦高的身体在雪地迅捷地跃动，令我想起一头轻灵的豹子。

我们一边在深雪中跋涉，一边听正云兄讲着故事，时时爆笑。我第一次听他侃侃而谈，惊诧于他的知识与口才，忘记了疲劳。

猛然，正云兄停住了脚步，搔首道："坏了，我们走偏了！"我们愕然。正云兄会迷路吗？

正云兄拿出烟袋锅子，停下来，点着火，狠吸几口；望望天空。猛然一拍大腿："明白了。向这边走！"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我们迈开了大步。

正云兄边走边说："牧民们在迷路时，往往是坐在原地不动，连抽三袋烟，再抬头观星象，就能清醒。"我开玩笑道："你只抽了一袋烟呀！"他一咧嘴："够了。"

东方现出了曙光。远远地，西乌旗的一片房屋，映入了眼帘。

大个子军人，由于体力透支，躺在地上，走不动了。我们背他，扶他，坚持着。距离招待所还有四五十米时，大个子突然来了精神，歪歪斜斜地迈开了脚步！正云兄道："护着他，我到前边报信！"他甩开袖子，向前疾进，身后扬起一片雪雾。

我们鼓起最后的力气，护扶着大个子军人，到达了招待所。三个人都冻伤了。大个子军人冻得最厉害，他的鼻子比以前大了一倍——啊，一块厚厚的冰块就要和他的鼻子合为一体了！正云兄赶紧跑到外面，抱来一大盆雪，在大个子的鼻子上面，轻轻地摩擦着；不一会儿，一个大大的冰套，从大个子的鼻子上面，被剥落下来！

正云兄手捧那如艺术品般的冰鼻套，拍着大个子的肩膀，哈哈道："老兄，只差一点儿，您的鼻子就冻没了！"

没有多少工夫，滞留在三十里外雪地中的人们，被旗里派出的车子拉了回来。人们诉说着寒冷难耐的程度，庆幸声，感慨声，混成一片。

我们中间，只有正云兄没有冻着一点儿。面对着众人的感谢，他嘻嘻地笑着，两颗门牙，尽情地向外呈露。

成为永诀的草原一夜

1978年，我正式办好了病退手续，准备回北京了。我路过正云兄所在的配种站，见到了他。

那时，我们宝日格斯台的知青们，除了因工牺牲的，考上大学的，分配到其他省份的，大都办回了北京。我走进正云兄的宿舍，看见他安详地盘腿于土炕上，对他说："你办手续了吗？"

夜，静静的。万里苍穹中一轮明亮的月儿，亲近着正云兄的窗子，温柔地洒在他的屋顶上。他手里把着长长的烟袋锅，饱饱地吸了一大口，说了一番让我一生难忘的话来——

"我，对于上山下乡，只把它看成是干活吃饭。"他磕磕烟锅，再装上一袋，露出门牙，自得地笑了一下："就在走与工农结合之路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时候，我就一直没有改变过这种想法。""老弟，干活吃饭。你看，现在我们也会放牧了。你给我一群羊，一群牛，一群马，我都能放。牧民能生活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工农结合，其实是一种空道理罢了。"

我吃惊地看着正云兄。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任何人敢于如此看问题，敢于如此"挑战"主流思想。但此刻我来不及质询他——我沉静下来，端详着这位老大哥。

我预感到，今天的夜晚，是一个重要的、宝贵的夜晚。

他看我那样子，笑了，然后，不紧不慢地说："老弟，我不回京了。我说过，上山下乡，就是挣钱吃饭，自食其力；我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我很适应这里的生活。"

我出神地看着他。回想起十一年前，他来到我家，说的"互相照应"的那几句话，再回味他此刻"干活吃饭"的独特人生哲理，惊奇地发现，像我们这些当时怀着改造思想、为边疆作贡献的大多数宝日格斯台的知青们，经过十一年，一个个都迅速地离开了；而倒是怀着"干活吃饭"之"落后"思想的正云兄，自在地留了下来。

昏暗的土坯房里，小小煤油灯的光线在摇曳着，盘腿而坐的正云兄那略显驼背的身影，映在墙壁上，俨然一位久经劳作的牧民，叙说着盎然有趣的草原故事；一会儿又俨然博学的说书人，天南地北地讲起了古今趣事。

奇妙，正云兄一肚子古今历史的故事！万籁俱寂，仿佛在倾听。

今天的夜晚真美妙。听正云兄谈古说今，享受啊。我痴迷地倾听着，端详着他装烟的动作——我需要重新来看待我这十一年的老朋友。在进一步的交流中，我恍惚记得，正云兄谈及家庭状况。

正云兄的家庭情况，我记不得他具体的叙述了。只记得他说过，他家的景况并不太好。他告诉我，如果他回京，那么，就会面临家庭成员之间住房等实际问题的缠绕与困境。他宁可不回京（他是老大），也要让兄弟姐妹们享受城市的方便生活。

正云兄续着烟叶，深深地吸了一口，鼻孔荡出一缕烟霞，笑问我："你说，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草原，和家人拥挤在伸不开腿的小屋里，哪个更好呢？"

我无言——我感觉，他在说此话时，声音低沉，好象有什么难言的心事，不便追问，也不想追问；不过，从正云兄的话里，我至少读懂了他的一份真情，读懂了知青朋友中一种最感动我的东西。当年知青上山下乡，实质上给了城里人留下更充足的工作岗位，在利益分配上，是主动扮演了吃亏的角色的——宝日格斯台知青爱"吃亏"的事例数不胜数；现在，正云兄决意不回京，是又一次将更方便的生活让给了他的亲人们，把"吃亏"的适意放在了心里。

正云兄轻松地笑着——不免要把两颗大门牙露出来。那笑容，带着一种深情，一种看破红尘的睿智。

我们谈过半夜，满天星斗，渐渐淡去，一轮明月，向西倾斜；黎明，快要来访问正云兄的低陋的土坯小屋了。

我没有想到，以后音容两绝——这是我与正云兄最后的一个夜晚。

一吐心声而后快

听说正云兄后来与一位赤峰女知青结了婚，安家于元宝山煤矿附近。他做过极普通的工作——为某公园值班下夜。自从知青返城后，一些赤峰知青朋友逝世的消息就不断传来。算一算，在所有的插队知青中，赤峰去世的最多。是因为气候的寒冷，还是地区生活环境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当惊闻正云兄去世的消息后，朋友们都深感惋惜。老八中同学回忆他在高三年级时，屡屡在1500米的长跑中一马当先，罕有能与匹敌者；叙说着他住校时，每天中午到厨房帮忙为师生卖饭——同学们纷纷走向他所在的窗口，向这位朴实的师兄呼唤道："老咪，老咪（正云兄的绰号），盛饭……"

精力充沛的他，竟这样匆匆走了。

一些老知青们最可惜的是，文学历史知识丰富的正云兄未能发挥他最擅长的讲故事才能。否则，以他的出色记忆力与表达能力，回京后学习中文历史专业，一定卓有成就——而今天中国"百家讲坛"栏目中，说不定增添了一位极具特色的讲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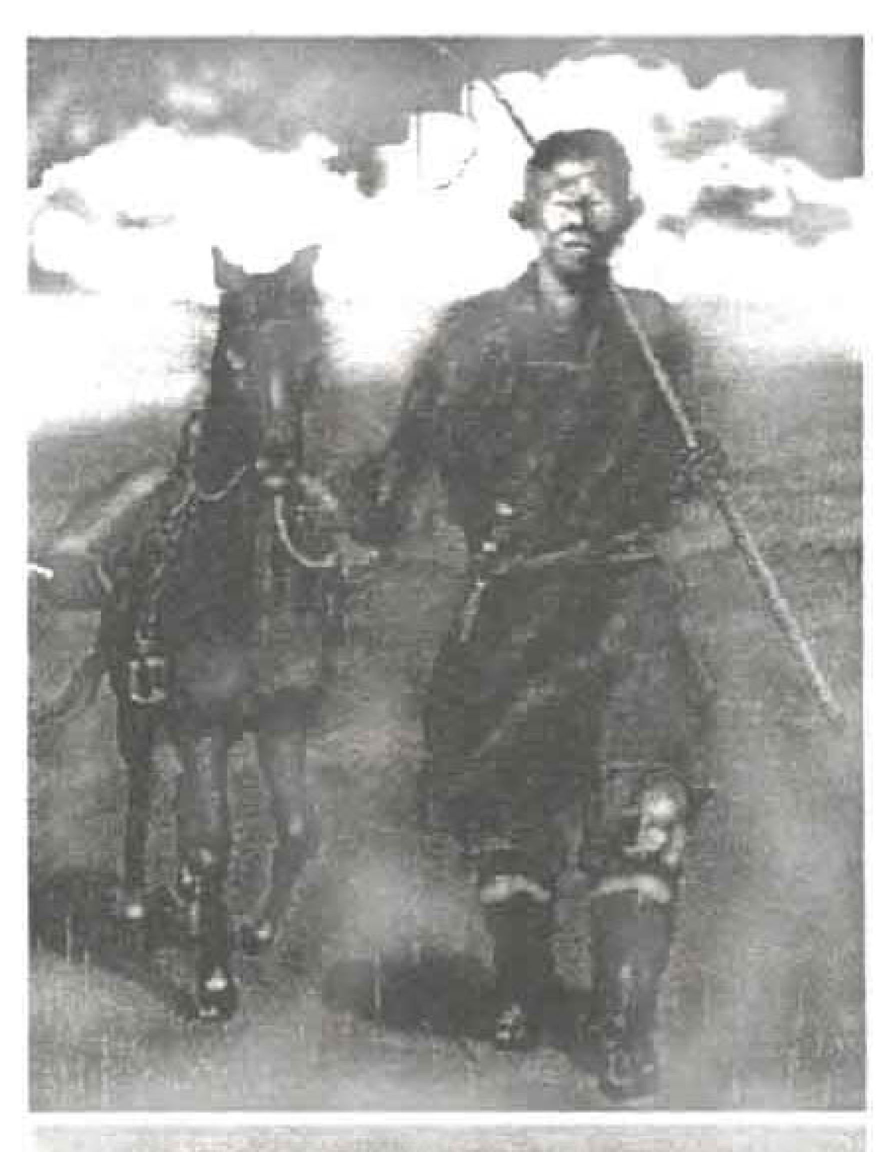
如今，我为失去了一位身体强健的、曾经的北京八中1500米甲组冠军而痛惜，为失去了一位博闻强记、幽默风趣的老大哥而遗憾。但是，正云兄对人生的独立不羁之意识，在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的品质，展现了宝日格斯台知青的最耀眼、最宝贵的一面，使我至今而且今后永远不敢忘记。

正云兄，你的青春和生命，都留在了内蒙。你悄无声息地安眠于内蒙高原，甚至和你最亲密的知青战友们也没有任何信件往来，以至我们不知你离开人间的准确时间与安葬的地点——你为什么要和与你患难与共的老朋友们不再联系了呢？你与老弟我的相处时间，也只那么几次，但对于你的离去，我怎能忘情，必要一吐心声而后快……

本文的两幅画是老糟（xpf）为一篇描写老咪的文章做的插图。

以下这幅是他到陈力民的配种站报到时的情景。据陈的记忆他还特意打扮了一下，虽说那是的条件很局促，老咪还是穿带得很整齐。据我的接触，当时大概应该是：蒙古靴羊油擦过，华达呢毡袜边逢得整齐，蒙古袍干净，腰挂蒙古刀，头发掸了水，认真梳理过。马背上是牛犊皮的捎马子，套马杆肩上扛。这身装束，对那时如同叫花子一样的知青来说，是街头露宿者和燕尾服绅士间的差距。





老陈来报到，可能特意修饰过一番……



小兴安岭林场救火的经历回忆

最近，我在每次上网以后，总会情不自禁常常会在记忆的深处倒腾，时不时想起当年小兴安岭林场救火的情形，那样的同伴、那样的环境、那样的一个一个小故事。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赴黑龙江襄河种马场一分场。马场位于小兴安岭山麓下。在我的记忆中，每当初春，雪溶露出枯草时，队部总有传达大小兴安岭火灾的通知。我几次参加去邻近的小兴安岭林场救火。记得每次都是傍晚或夜晚集合，背上挎包、水壶，带着镰刀、火柴和干粮，登上解放牌的大卡车，开两三个小时到达火场的外围，用镰刀砍下小树叉，人手一杆，用它来扑打草甸子上或树林落叶层的火。出发前，连队领导总会告诉我们备好火柴的重要性，要学会放火自救，在遇到迎面烧来的火势，周围无法逃生时，尽快放一把火，把身边的一块地上的枯草枯叶烧尽后，自己在站到焦地中央去。老天保佑我在四、五次的救火经历中都很顺利，从来没有用到烧火自救的办法。

有一次，卡车颠簸开了半天，下黑到了草甸子里，车轮淤在塔头墩里，大伙又推又抗不顶事，只好摸黑在小路上往里走了小半夜，我估摸着来到小兴安岭的深处了，奇怪啊，就是不见一丁点烟火。没有见到火场，累得大伙是汗流浃背，瞌睡虫爬上眼皮了，说是如此，肚皮却没觉饿，因为大伙的兜里有糖饼和馒头，边走边吃。

我们一行四、五十人，在林子里走必然是一行纵队，大伙互相叫应着，随着向导的手电光和脚步声前进，谁也不知道队伍有多长，一个一个跟得很紧，不知道是谁脚下一滑打了个趔趄，后面的人为了防止重蹈覆辙，黑暗中也向前蹦达一步，就这样，黑暗中大家跳起了集体跨步舞，谁也不敢大意。王大龙是唯一不带挎包的队员，他的糖饼和馒头放在别人的挎包里，他走在谁的后面就在谁的挎包里掏吃的，队伍中一般是排长在前面打头，王大龙想办法跟上去，这一路上大伙跟着他，边吃边走边跳跨步舞。

夜深时分，前面传话说，我们已经绕到火场的前方，晚上先休息，明天白天打防火道。

找到一块林间空地，敛来树枝，点燃火堆。北大荒的夜间依然相当寒冷。那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不一会，睡意浓浓，找到一块凹地树坑，几个人如卷卷虫爬在里面。寒风吹来，胸前冰

冷，翻身换位，背后刺骨，地下的冻土未化，正是卧冰一般，坐卧不宁，真正是无处栖身。

当晨曦穿进林子时候，被彻底冻麻木的身体有了感觉，睁开迷细眼，卡上瓶底样的眼镜，我打量身处的原始森林：不远处参天的椴杨大树和山包脚下的丛生灌木，百米开外的地上积着厚厚的枯叶（夜里看到无论如何是件幸福的去处啊），四下看来，不知大伙是从何处到此，难寻人踏过的足迹，更无道路。

当时，虽然我们这些英雄们没有见到火场，但是，后勤一点不差，麻袋装的甜饼干，平时买不到的大苹果已经很快送到了，大概的平均分配，装入我们的挎包里，水是不供应的，林子里自己找去。一会儿，传来指挥部的通知，通知说：马上向东转移15公里。我到今天也没有弄明白，指挥部是用什么办法通知到我们的，电台？电话？对讲机？骑马的通讯员？……于是，又一场穿山越岭过草地的长征开始。

有一次，在深山老林里转了三天，总算追着火龙的尾巴和顺着残火拍打了几次，穿农田鞋，棉胶鞋的哪里追得上愤怒的大自然的天龙。大火肆虐过的地方，树杆上的火就像上海大楼上挂的景观灯，地面的枯枝落叶或草甸子上的荒草燃烧的火连绵数千米，扫荡过后，焦黑的灰烬，不知道何处地下隐藏着通红的碳火坑。那时，每当我找块塔头墩坐下喘气的时候，希望焦黑的土地是炼狱的新生大地而被燃烬枝叉的树干变成指路的灯塔，随即含着眼泪想起妈妈。

四、五天以来，吃的干糖饼，甜饼干，嘴里出奇地无味，浑身无力，不洗脸无所谓，但是，身上不断出汗，再加上虱子爬咬，起疙瘩包了，有人说是缺盐引起的，水壶里的水早就干了，只好到山沟或树根下的水槽坑里舀水喝，有几次是在晚上借手电光用手掌捧着喝的，这次是大白天，当爬在坑边是看到浅浅的小水沟里清亮的流水，越发感到口渴，轻轻窝起手掌捧上一汪，正要入口，看到那水中粉红色的长条线虫在扭动，吓得摔手连连后退，无奈干咽吐沫转身继续前进。这天下午，派出到供给点领取干粮的六位战友出发了，根据路程计算，在三小时后派人到中途相接，我有幸参加迎接队伍。顺山脚绕树林到草甸子里，开始学跳梅花桩，我从小学体育运动都不行的，不到几分钟，我已经是在涉水草了，那冰面上的水啊，真正刺骨入髓一直寒到后脑髓里。下午的三点多，天色见暗了，和战友见面已经是黄昏，不过在草甸子里走了三分之一路程，扛着月饼、饼干，咸菜麻袋的战友，个个气喘吁吁，我们看到久违了的咸菜和月饼，连忙相接。要扛麻袋过草甸子，可想是要有一把劲的，尽管我们不断地互换，轮流抬、扛、背那麻袋包（也就五六十公斤吧）还是把麻袋的底部弄湿了，里面的月饼在不断的挤压下也开始分解，双脚在冰水里泡的结果是双腿麻木，站立不稳，当麻包放在塔头墩上的时候，人的臀部自然地会靠在上面，目的是不让自己跌倒，就这样，到树林里漆黑一片时，我们回到了队伍里，从两麻袋的月饼里扒拉出八块完整的，其余，统统成了……。在这一路上，几位战友和我都想放弃麻袋包，到底没有敢，回来看到粉身碎骨的干粮心里很难受，对不起大家，尽管这样的情况，大部分的战友非常理解和原谅我们，以那些碎干粮充饥。

在我的记忆中，影响特别深刻的有一次，遇到的事情到现在清楚地记得，那一次进山打火的队伍里增加了娘子

军，我们在山里转了几天，开始转移了，又说要撤退了，总之一句话，走啊！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说的是当时对年青人的一种心理暗示调节，尽管大家不是好成一片，到也努力表现自己的，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男子汉的心理总是要体现出对异性的帮助。

指挥部通知说，到甸子北面的供给点可以休息，队伍开始鱼贯而行，穿过林子，翻过山包，绕过甸子，走进了密林里，说是密林，也时时看到伐倒的木墩，看来是个林场的集散地，与长时间在荒芜人迹的地方相比，感到十分的亲切，穿过这片林区，来到了大有山清水秀感觉的地方，往前渐进，感到有了人类生活的气息，很快看到树林间飘着丝丝炊烟，空气中不时掠过东北冬天住家屋里特有的气味，我在瞬间感到胃里一阵钻心的搅痛，咕咕声伴随呕心，我们太需要汤水饮食和含盐食品了。

在林间小村的场地中央，架起两口大缸，一口缸水，一口缸大米稀饭，木板搭的长条桌子上排着大碗稀饭，簸箕里堆满整个的咸大头菜，旁边用灰白色屉布盖着馒头……，大约在十分种内，扫光了这一切东西，我抓了一只有拳头大小的咸大头菜，狠狠地咬了几口，那种感觉到现在也没有体会到过，用孩子们现在的话说是真爽啊！

吃了特咸的东西和加上本身缺少水分，感觉要喝水，喝凉水怕闹肚子，于是，开始找人家烧开水喝。在供给点不远处有户人家，地道的东北土房，门斗进去是灶坑，安口大锅，堆着几许柴，北墙角堆放的是农具和扁担水桶，不大的水缸盖得还严实，挑开门帘，里屋是连着锅台的砖炕，炕上半令炕席，炕角堆着黑幽幽的被子吧，整个里屋只有一张小矮凳，靠墙有个箱柜，看出有点比较新，除此，没有其他的家具。年青人大大咧咧，开门进屋招呼：有人吗？应声从屋外传来，是个女声，随后从门斗进来的是个身材娇小穿着黑棉袄，盘着发鬏的女同胞，迎面看去不象山里女，长得也眉清目秀，大伙猜想是这家主人的女儿。我们说明来意和要求，特别说明烧水柴给钱，她将我们一帮人让到里屋，却表示出不愿意马上动手烧水的样子，让我们舀水缸里的水喝。对发生的情况，战友们开始互相商量怎么办？为了防止尴尬，用的是上海话交谈，面对女人，男同胞推女同胞再去说说，说话间，她已经不在里屋，挑开门帘外看，她已经开始点火了。唧唧喳喳的、嘻嘻哈哈的声音充满了小屋……，一声婴儿的啼声让我们嘎然而止，她进里屋，从炕角的被窝里抱起那发出啼声的孩子，有人立刻让出那张矮凳，她娴熟地解开黑色的大襟棉袄，在十来个男女的目光下将自己白净的乳房递到孩子的小嘴上，抬头看到我们，含羞地转动了一下身体，以示避让，我们都是毛头小伙和姑娘，一时个个哑口无言，但是，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她的黑棉袄里是光身子。不知道是谁先开口，以关切的口气问孩子多大了？回答是3个月，她答话的口音带着浓重的东北本地腔。那时，话没有聊几句，门帘外一声“妈，我饿。”的呼唤声把我们的目光吸引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身上，诧异的看到小女孩，有人自然地问到女孩几岁？在得到三岁的回答后，开始问到她的年龄，她大方地告诉说十九岁。我们又开始议论和怀疑她到底有多大岁数？这样会成了生小人的机械......，大家的开口都是满口沪语，反正她听不懂，肆无忌惮地随意开口，自居得意。她哄好孩子，安置在炕上，走到外屋烧水去了。

好多天没有在屋盖下休息睡觉了，很快瞌睡袭来，有的人开始有些迷糊时，她端着两碗开水进来，递给我们的手里，将一只水桶扣下来，坐在桶底上，低头静听我们说话，不时抬头看看说话的人，不经意时开口用东北话对我们说："我能听懂你们的说话的。"没有人反应完全，她轻声但口气硬硬地回答："我也是上海人。"话音落地，两眼红红的，鼻翼泪珠垂下，当时，谁也不能开口了，说过怪话的同胞更是感到羞愧。不久她轻声说句："请大嘎吃点开水，房间里冷啊。"听到开口道出腔真音纯的上海话，完全相信了她的自我介绍，同时，新的疑团又产生了。

在这深山老林里，一位年仅19岁的上海姑娘，不单嫁人了，还生育了两个孩子，对我们来说，这完全不可思议。真实的事件摆在眼前，不能不追根寻底。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位战友与她对话了，叙说的内容是：她的家在上海的闸北区东宝兴路，69届初中没有毕业就下乡了，很小的时候，爸爸因病去世，到上小学的年代，母亲改嫁，于是她有了继父，她成了"拖油瓶"，继父对她不好，但是，有母亲的陪护还可安生。在文革中，不幸的母亲也留下她到父亲那里去了，继父的经济收入不多又有自己亲生儿子，没有血缘关系的她的生活很快的下降到最低点，不久，继父又招回继母，同样带着另一个"拖油瓶"，在她所在的家里已经没有位置了，继父母借上山下乡的东风，很快地逼她报名插队落户了。

我们知道，当时的所在地是小兴安岭林场，到这里插队落户的政策上是不存在的，她说的是真的吗？身在异地遇乡亲万分亲切的激动心情，让她毫不掩盖地吐露心语，再一次告诉我们：1969年的1月份，她跟随到吉林插队的同学们到了吉林珲春县插队落户，她被单独派往一个生产队，由于身材瘦小，根本没有参加劳动的体力，队长根据有关知青政策，只能给予免除劳动的照顾。时间很快几个月了，县里发的照顾粮吃完了，要队里发粮了，队长感到是个问题，于是，好心的队长托人说媒，将她嫁到林场来了，那年只有16岁，当年怀孕生女，现在又添个儿子。说到这时，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到现在我才理解的母爱精神，看着她和我们一样稚嫩的脸，和大娘一样的头发，黑油油的棉袄……。

集合的哨声传来，要离开了那小屋，看着婴儿的小脸，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倒出挎包里所有面包饼干和苹果，在炕上堆成炕桌大小一堆，旁边有几张五元人民币。泪眼模糊互相告别，如今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也不知道那疙瘩啥地名。

看过《林海雪原》的都知道森林小火车，我们就是站在那车斗里开出林场的，寒风中急驶的火车上冷啊！天上飘下细细的小雪，落到身上就化了，……。

小火车到龙镇，锣鼓欢迎，汽车接送，每一批人全有热水毛巾洗脸，林场的食堂里，圆桌面上六菜一汤，饱餐后登上大解放，凯旋而归。好象第二天还休息一天。

那天，场部通知："xxx林场因为上坟发生山火，林场工人未能及时扑灭，在西北风的作用下，目前开始向林

场深处蔓延……，根据防火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希望各单位调集民兵和民工作好进山扑火的准备，各单位在同时要做好各项后勤供应保障……。”按照分工，赵永年是连长，也是民兵连长，工作应该有他牵头负责，根据上级通知精神要求，因为发生了知青在森林灭火中死亡事故，不得安排知青参加森林灭火。说句心里话，谁都不愿意去，上级有通知有具体的人数要求，农工二劳改不行，本地职工只有几个人啊，知青不可以去，怎么办？通知里说得很清楚是民兵参加嘛，全连的年轻人都是民兵，能去几个去几个，无论如何先做准备吧。结果，这次的上山是赵连长带队，知青民兵参加。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上海知青夏宁身是食堂事务长，在开完午饭以后马上开会布置，备战做干粮，先烙糖饼80斤（半袋面粉），再蒸馒头和花卷，以往，烙糖饼是加糖精水，今天夏宁身特别关照要加白糖，东北的绵白糖，无论如何要找到大葱做好花卷，花卷是咸的，多搞一些咸菜，其他还有什么？没啦？战友们几次的上山的经历让他知道那是个很艰苦的事情。

听说又要进山打火了，后勤、畜牧队的姑娘和小伙子都来找在农业队的对象或兄弟哥们，因为每次的上山多数都是农业队的哥们。爱情，友情，在烈火面前演化成了亲情。

回家看看

1970年7月，我在云南瑞丽下乡已经一年多了。一个赶街天，哥哥到姐线公社小饭馆找到我，拿了封电报给我，我一看，头就嗡地一下晕了，电报上只有四个字“母病速回”。

当时我全家六口人，散到了六个地方：我们哥俩在瑞丽，在相距七公里的两个生产队插队，离昆明近千公里；妈妈在离昆明有500多公里的一所五七干校，弟弟所在的思茅生产建设兵团距昆明600多公里，爸爸在昆明郊县的五七干校，只有他还能每月一次回家看看只身一人留在昆明读初中的妹妹。跟家人们离别已经有一年半时间了，早就有看看他们的想法。说起来简单，实现却很难，其他地方的知青想回家也许容易，只要生产队同意，买张车票就行了，我们可不行，途中有三条大江挡道，要想过桥必须持有县公安局签发的边境通行证，要得到这张边境通行证，首先必须得到县知青办签发的探亲许可证。

那时的县知青办，可算是知青的最高主管机关了，各公社虽然也有知青办，但没有权力批准知青探家，而县知青办对知青的管制相当严，一般情况下根本不允许知青们回家，能获准回家探亲的知青，只能是出具直系亲属生重病或是死亡的医院证明才行，按知青们的说法，基本上只有“奔丧”才能实现回家看看的愿望。也有另外一种机会，比如经军代表“特批”的少数几个女知青，无须什么证明就能回家。

见我拿着电报发愣的样子，哥哥忙解释说妈妈根本没病，这封电报是妈妈应他的要求拍的。

不久前，云南峨山发生大地震，在那儿的云南教育系统五七干校损失惨重，死了不少教师，其中有不少是知青的家长，于是有不少知青获准回家探望。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县知青办相对放宽了手续，只要凭家里发来的病危电报就可以批准回家探视。正好哥哥一个在保山运输队开车的初中同学要开车来瑞丽玩，他就起了借此机会搭车回趟家的念头，写信给我妈，要她拍个装病的电报来。妈妈也是想儿心切，也不顾什么党性原则了，当即就拍了这封只有四个字的电报。

按照规定，家里人病了只能批准一个知青回去探望，幸好我们哥俩在不同的生产队。哥哥拿着电报顺利办完生产队、大队直到公社的批条后，又把电报给我送来，我接着办这些手续。

我写了份申请，一段语录开头后，就只有因妈妈生病了，希望请假两个月回去探望，只有寥寥数字。生产队长

根本不识汉字，一听说这事，着急得很，当即让我帮他写上同意二字，然后他在下面签上他的傣文名字，还要跟我一起到大队、公社去办，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办这种假事毕竟还有点儿心虚。到大队办手续很顺利，那个管知青的干部吃过我的亏，怕我。到公社也很顺利，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跟哥哥处得不错，明知不能批准哥俩一起走，却二话没说盖了印。

随后，两个队十多个知青陪着我们哥俩一起走了20多公里，到县城办最后的审批手续。哥哥先办，通过。在他之后，等别的知青办了几个以后，已经快到吃中饭时了，我才在一大伙知青的簇拥下进了那间小办公室，递上盖了两级知青办大印的申请书。县知青办那家伙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说，哎，这个姓W的刚才办了一个，你跟他是哥俩吧？众知青立即起哄，你什么眼神呀，他们根本就不是一家人，他们俩就互不相识，你跟我们队谁谁也是哥俩吧，乱哄哄地吵得那家伙头疼。其实我一直没抱多大希望，我也向哥哥说过，不行就他一个人走吧，所以当时我连声都没吭。那家伙在一片哄吵声中，不耐烦地挥挥手，签字盖章，刷地一下就把那纸申请塞到我手里了。我站在那儿还没反应过来呢，在大伙的欢呼声中涌出那间小办公室，一起到县公安局办通行证去了。

拿到通行证，回家等车。跟我同寨子的知青除办病退走了一个女生外，我是第一个获准探亲的，大家都知道我是搭货车走，都要求我帮着捎带东西回家。瑞丽因为毗邻缅甸，物质条件较好，能往家里带的东西还真不少，农产品有大米、红糖、白糖、猪油、菜油、炼乳、花生，当然还有打火机、走私手表等，只是穷知青买不起。我那个寨子有20多个知青，每人托带一包东西，走时装了一辆牛车。到哥哥那儿一看，他要带的东西更多，全寨40多个知青，每人也有一包，加上我们哥俩带的两大麻袋大米，五磅白铁桶装的猪油、菜油各一桶，还有一小箩红糖，一布袋白糖，要带的东西都堆成了小山了。我看着直发愁，这到时怎么带呀？

我在哥哥的寨子等了两天。下午车来了，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一天。听到轰隆隆的汽车声，我从竹楼窗子看出去，大乐——三辆大解放，每辆后面还拖了个挂车，非常有气势地开进寨子。这下子好了，不愁东西带不了喽。我们当即决定，再带两大箩无眼菠萝，哥哥寨子的无眼菠萝可是当地最好的品种，这下妹妹可以大饱口福了。

哥哥的这位同学初中毕业后就去当了驾驶员，这次跟他一起来的，有他两个同事，一个是五十岁左右的老师傅，另一个是个中年师傅。还有两个女的，是那两位师傅的老婆，跟着一起来玩的。这些师傅们家里都有知青插队或是到农场，所以一见面就跟我们很亲热。他们到瑞丽玩两天才走，就在这两天时间，瑞丽其他被批准探亲的知青找来要求搭车，师傅们毫不犹豫，全都同意了。到我们动身时，车上已经有了来自不同公社、不同寨子的六男三女共九个知青了。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用假病证明办的探亲。车开的那天，人人心情愉快，一路欢呼着，乡亲们看着直纳闷：这些个没良心的，家里有人病重病危，他们还高兴成这样？！

我们的车队耀武扬威穿过县城，顺利通过瑞丽江大桥的检查，中午时到遮放停车吃饭。吃完饭上车一看，三个车厢都塞满了人，大都是想搭车到芒市的当地人，其中也有几个知青打扮的女生。师傅们商量了一下，那个老师傅

去驾驶室拿了一叠票，爬上车厢去，要搭车的人买票。他刚上车宣布卖票时，我注意到那几个女知青小声嘀咕着，打算下车了。老师傅先盯住几个穿干部制服的，要他们买了票，然后只收那些穿民族服装的傣族老乡半价，对那几个女知青，他连问都不问。老师傅要下去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忍不住了，问他为什么要他买全票，老师傅翻着白眼说：优待少数民族是我党历来的政策，懂么？知青比少数民族还稀奇，免费。他话刚说完，知青訇然笑了起来，那个干部脸红一阵白一阵，蹲下不吭气了。

车到芒市，一个师傅有孩子在20多公里外的公社插队，他们开了一辆车去看望，我们则找了个旅馆住下等。这一等就是三天时间，可惜了我们那些菠萝，每天都要翻出好几个熟透了的请大家吃。

从芒市出发时，车上又多出了几个知青，途经保山、下关、楚雄，一路上不断有搭车的知青，等到昆明时，车上已经有27个回家探亲的知青了。大家都是知青，见面就熟，一路上故事不少，欢声笑语不断，要到昆明那天，众人商量着到昆明后怎么玩，把插队的艰苦早给抛到了脑后。

车队翻过碧鸡关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昆明城里的万家灯火扑面而来，大家那个激动、那个兴奋呀，连平时矜持的女生，也忘形地直着嗓子欢呼。一年多以后，当我被招工回城，与同车的数十名知青一起再次看到这城市的灯光时，反而没有这么激动了，因为当时心里不仅想到将面对的未知命运，还突然想到了仍在乡下的朋友们和那里的乡亲们。

回到久别的家，首先发现我们哥几个走前住的那间平房居然被人占了，妹妹从楼上跑下来接我们，听她说，院子里什么革委会的趁我们走后，强逼她把那房腾了出来。这还得了，第二天当我们哥俩阴沉着脸找到那革委会时，他们当即就把楼上一间房的钥匙交了出来。休息了一天后，我们分别到同寨的知青们家中送东西，看望他们的父母，跑了好几天才基本完成任务，然后我们去看在干校的爸爸。见到我们，爸爸叫我们等着，就到食堂打饭给我们吃。我看得出来，他虽然没什么表示，但听到别人夸他两个儿子长得壮实时，心里还是很满意的。饭后，父子三人到水库边聊天，爸爸掏出包香烟来，自己叼一支，给哥哥一支，却不给我，两人边抽边聊，哥哥明知我也会抽烟了，却故意不说破，把我晾在一边，气死我了。爸爸没多说什么，只简单问了我们以后的日程，给了我们些钱，就把我们送走了。按照他的安排，哥哥先到普洱、思茅看我妈和我弟，等我哥返回来我再去。

哥哥走后，我成天跟几个朋友在城里闲逛，游泳、踢球、上公园、看电影，一句话，玩疯了。那时的昆明，跟我们同年龄的人几乎就见不到，我们走到那儿都会被人认出是知青来，我们去学校看老师时，那些小校友们围着我们就像看外星人一样，可能在他们眼里，知青跟那种被流放充军的罪人差不多，挺神秘的。

那时我们有几个会玩乐器的知青，常聚在我家里合奏，我会弹八弦琴，加上拉手风琴的，吹笛子的，拉提琴的，我们戏称为知青四重奏。有时我们也带上乐器去公园，一群人在我们的伴奏下，唱起知青们爱唱的“黄”歌，

吸引了公园里的人。

哥哥回来后，我只身一人踏上了远赴普洱、思茅的探亲之路。我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让我们哥俩一起去，他担心别人会对我们家一下回来两个知青有看法。

见到妈妈后，第二天她就带我到普洱县城的百货商店去买穿的。没想到，在那个小百货商店的一个偏僻的柜台上，居然放着一把盒子上面落满了灰尘的小提琴，这可是在昆明都见不到的呀。我当即提出不买衣服了，要买提琴。我妈一问价，42元，这可是她半个月的工资呢，可她还是毫不犹疑地买下来了，这可是我此次探亲最大的收获了。

在妈妈的干校住了三天，又动身去思茅看弟弟。

一年多不见，弟弟明显长高了，也长壮实了。他在的那个农场，除了昆明知青外，还有北京、上海来的，比我妈那个尽是些老头、老太太的干校好玩多了，我在那儿玩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返回昆明。

回到昆明，第一件事就是找那个会拉提琴的哥们来教我学琴，学了没几天，才刚刚入门，哥哥提醒我，我们的假期到了，该回去了。这怎么成？我要哥哥先走，让我再学上一两个星期后再回去。

哥哥也没坚持，他也没走，我们又多留了一周时间，直到爸爸回来。

爸爸回到家，来看了看我练琴，没说什么就出去了，直到下午才回来，然后让哥哥叫我到他屋里，递给我们两张飞机票，说了句：你们明天走吧。

知子莫如父，这句话真是不假。爸爸知道此时如果催我回去，我肯定不干，但如果是乘飞机，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当然是做梦都想坐一次飞机的。

就这样，10月的一天早晨，我们坐上了一架苏式小军用运输机改装的客机，离开了昆明，沿着当年的驼峰航线，飞往滇西。飞机起飞后，我从那小圆舷窗往外看，第一次看到昆明城的全貌，当那碧波荡漾的滇池从机翼下掠过时，我的心突然沉了下去，这么美丽的昆明，真舍不得离开，这里有我的家，不知何时才能再回家……

老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8

北去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无法忘怀。我相信，这个日子肯定不仅只对我一个人具有那么不平常的意义。

我是一个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当年，我从家乡支边，去了当时的吉林省(后来又划归内蒙古)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胜利农场，没有人来动员我，也没有人强迫我。长时间的停课，似乎永不可能停息的武斗、派性，使我觉得无聊，而面对前途，更使我越来越烦躁不安，整日处于焦虑之中。我只是想离开这个环境，我想凭自己的双手，凭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当时，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已经下乡、支边插队落户，但她们中的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凭工分来养活自己。国营农场则意味着集体生活和拿工资，于是我就报了名，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查一查要去的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那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离我18岁的生日还有二十几天。父母亲心慌意乱，他们尽可能周到地为我打点好了行装，还包括50斤大米。三天后，我与两个要好的女孩和整整一列车家乡的"老三届"一起，踏上了北去的路。这两个女孩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这是后话。

记得那天清晨，天阴沉沉的。临出家门前，父亲紧紧拉住我的手，眼泪毫不掩饰地流着，嘶哑着嗓音说："爸爸不去车站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过，不好意思的，如果有机会，爸爸以后去看你。"说完一步一拖地上楼去了。我跨出家门，泪眼模糊里，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阳台、青石板铺就的平整的院子、高高的围墙，似乎觉得我是再也不可能回来的了，心里一阵阵发痛。已记不清有多少同学和亲友将我送往火车站，只恍惚记得马路上都是人。人们互相拥挤着、冲撞着；不知是谁撞了我一下，又撞了我一下，我根本无心顾及，只是由同学们簇拥着下意识地跌跌撞撞往前走。

我的座位靠窗，天开始下雨。站台上黑压压全是送行的人，可我仿佛只看到妈妈和两个妹妹。几天来她们突然变得那么憔悴，眼睛又红又肿，头发湿漉漉的贴在她们的脸上。突然，火车一声长鸣，我的心几乎要被这绝望的吼叫撕裂！我仿佛看到父亲从床上惊跳起来的情景。眼前的妈妈和妹妹们早已泣不成声，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到

车窗口，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妈！--"，就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那时才11岁的小妹，哭喊着冲到车窗下，抓住了我的手，不顾一切地顺着车厢外壁往上爬。列车轰然起动，小妹被悬挂在窗口，泪水、雨水从她仰着的小脸上汩汩地往下流，不知是谁好不容易才将她从我的手里抱了下去。大雨滂沱，站台上哭声动地……。小妹啊，此情此景，你可还曾记得?列车开出了家乡车站不知多远，一回头，我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一个同学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他们坚持要送我一程。我不知道这三个男孩后来是怎么回的家，因为直到他们下了车，我才想起他们的口袋里很可能没有一分钱。

火车上，我们三个没有别的熟人，我们哭一阵，笑一阵，累了趴在窗边的小茶几上睡一会儿，饿了就吃一点随身携带的点心，记得我最爱吃的就是水晶月饼。列车是挂的专列，走的时间长，停的时间短，只知道一直往北，往北，渡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直到第三天深夜一点来钟，火车才停下来，说是"到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车站，铁路到了这里也似乎不再向前延伸，站台上稀稀落落几盏灯昏昏地照着，四下里　是漫无边际的黑暗。6月初的天气，我们披上了棉大衣还感觉冷，似梦非梦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来到了天边。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东北平（四平）齐（齐齐哈尔）线上一个其实不算很小的集镇，叫金宝屯。屯，东北话的意思就是村庄。而实际上我们的农场离此地还有七八十里地。站台上一片嘈杂，来接我们的卡车、拖拉机轰鸣着，人们大呼小叫互相呼应着，召集着自己的伙伴。我们三个人簌簌地发着抖，时而互相紧紧地牵一下手，以此来增加一点应付这陌生环境的勇气。不知听谁的指挥，我们稀里糊涂地爬上了一辆已挤满了人和行李的"铁牛"--一种可以带拖斗的拖拉机。坐在车厢底板上的人们大声地嚷嚷着，拥挤着。我们好不容易挤下身子就地坐下，只听得那边有人喊"啊呀，热水瓶！"这边一位在叫"我的饼干箱子！"折腾了足有一个多小时，车队终于喘着气出发了，一阵风吹来，不知是谁又突然高呼"帽子！帽子！"

初夏时节下半夜的辽河边上，黑暗连着黑暗，寒气追着寒气，偶尔远远的有一点灯火，却总是近不到跟前，一晃又不见了；风裹着沙子，刮得人脸上生疼。我有生以来从不曾有过如此昏暗的感觉，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夜。我们迷迷糊糊地挤坐在这颠簸、杂乱的车厢里，至于这铁牛将把我们拉向何处，明天会有怎样的风雨在等待着我们，前途又有多少艰难困苦需要用自己稚嫩的肩头去抗击，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想像，此时也都无所谓了……。

岁月如梭，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晃已经三十多年过去，可是每当想起，此情此景仍宛如昨天。从这一天开始，此后若干年的艰难人生，逐渐炼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对于苦难的承受力，六月五日，就这样成了我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纪念日。今天，我再一次打开珍藏在心底的这一份苦涩的回忆，将它献给当年与我同一个火车头拉到金宝屯以及不同的火车头拉到别的地方去的同龄人，献给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老三届"朋友，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不堪回首却常常回首、希望忘却但永远不能忘却的青春！

2006-02-14

“支边赴内蒙古光荣证”：http://www.hxzq.net/Essay/5070.xml?id=5070

江南雨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49





《我的北大荒》之一：

十八岁出门远行

1968年6月13日早上，刚过生日10天的18岁女生——我，背着书包去学校，不是去上课，而是去集合，统一坐专列奔赴遥远的北大荒。我是北京师大女附中66届初中生，在学校的5年中闲呆了整整两年，文革初期的激情早就变成了不耐烦。今天就要和学校道别了，以后不可能再回来，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留恋。

“天天不上课，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这世道咋乱成了这样？”母亲经常地唠叨，不停地抱怨。我最不爱听母亲说话，觉得句句不入耳。这下您不用抱怨了，我不会吃闲饭了，以后您也看不见我了。我身体一直瘦弱，从初一第二学期就免修体育，这次毕业分配，除了北大荒国营农场，还有北京亚麻厂、西城红卫服装厂等。我坚决要求去北大荒，老师的耐心劝解也没有用。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不到6岁就在政治运动中失去了父亲。哥哥姐姐都已成年，母亲带着我艰难地生活，对我的疼爱和呵护近乎专制，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是那样强烈和不可阻挡，我巴不得到一个母亲找不到的地方，永远不再听她的唠叨和事无巨细的管制。出门时，我坚决不许母亲和姐姐送我。母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步，大我13岁的姐姐却执意要陪我一起去学校。

9点钟学生们准时在学校集合，和我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是120名66届初、高中毕业生，10点钟我们将在北京站和全市上千名中学生汇合，乘坐专列去黑龙江。这一天，这一列火车，标志着北京市中学生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开始。

接我们的大公共汽车来了，是当时北京城里最好的大轿车，前面的两块风挡玻璃特别大，有点像蜻蜓或蚂蚱的大眼睛。女生们唧唧喳喳地拥上汽车，快乐地挤坐在一起，汽车就鱼贯驶出了校门。永别了，北京师大女附中，永别了，我们的中学时代！

汽车在西长安街奔跑，经过了西单、六部口、新华门，经过了人民大会堂西侧的石碑胡同口，我的家就住在那

条胡同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下意识地回头张望。忽然，我看见了母亲，58岁的母亲坐在胡同口的花岗石灯座上，正茫然四顾，一向腰板挺直的母亲怎么佝偻了？突然衰老了？眼泪突然涌上来，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急忙回过身来，使劲和自己的眼泪做斗争，不让它流下来，不让同学们看见。后来，那一瞬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许多年中，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哪知道娘咋想你？那是抓心哪！”少年时我把感情粗糙、心肠冷硬当成了坚强，曾无数次地伤着母亲的心。只有当我做了母亲，只有当我失去了母亲，我才懂得了什么叫做“抓心”的想念。

姐姐把我送到学校，就被我忘到一边去了。等大家到了北京站，我发现姐姐和许多为我们送行的亲人们、同学们，像刚刚参加了赛跑，竟也同时到达！站台上人声鼎沸，期待着或惧怕着车轮的转动。火车缓缓移动了，直接开往北大荒的北京知青专列，在歌声、笑声、哭声和什么也听不清楚的亲人叮咛中，离开了北京站，离开了北京。这一去，就是几千里，人生的艰辛从此拉开了大幕。

记忆里，那时的六月远没有现在这么热。火车出了山海关，天气就更凉快了。一日三餐，是铝饭盒装好的大米饭、红烧肉，以往从不接触的男中、女中的同学，在一个车厢里度过白天又迎来黑夜。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激动的，就像是去远游，是一次下乡劳动，大家唧唧喳喳，说不完地说，闹不完地闹。天亮了，谁喊了一声：该起来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吧！车厢里有了骚动，学生领队带领大家向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有人小声嘟囔着：干嘛呀，我刚睡着。又一人惊奇地喊起来：才三点多呀，太阳怎么就出来啦？原来东北的太阳比北京出来得早哇！

经过了许多城市——以前只是听说过这些名字：锦州、沈阳、公主岭、四平、长春、哈尔滨、牡丹江……最后，1968年6月15日中午时分，在黑龙江省东部边陲一个叫“迎春”的小站，大家下车了。刚下过雨，雨过天晴，蓝天上硕大的白云朵朵，缓缓地在头顶上飘移，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白的云团，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上千北京学生迅速集合又分开，我和同学们爬上大卡车，奔向852农场6分场4队。一路上经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子和草甸子，满山满野的乔木和灌木棵子连绵不绝，满眼都是新鲜的、干净的绿色。到了六分场境内，每过一个生产队，汽车就会停下来，许多小孩子争相把鲜花扔到车厢里。北大荒的人真好哇，还给我们献花呢！我给家人写的第一封信里，就兴奋地说了这事。后来我才知道，六月正是草甸子里野花盛开的季节，白的芍药，红的百合，黄的金针，紫的马兰……还有大片大片的矢车菊和蒲公英，满眼全是。

终于，汽车在一栋红砖大房子前面停稳，小孩子们好奇地围了过来。这个坐落在广袤绿色中的生产队，就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奉献青春的起点。红砖房子是大食堂，也是全队的政治、文化中心，所有的集会和重要活动，都在大食堂里举行。食堂后面，是成片黑黢黢的茅草盖顶的土坯房子，食堂前面有两座新落成的灰色小房子，分列东西，墙壁是荆条抹泥，房顶是灰色机制瓦，这就是男女生宿舍了。队领导有些歉疚地说，这个马架子是临时的，等到秋天，同学们的新宿舍就盖好了。

一些老职工帮着，把行李卸下车，抬进宿舍。在大通铺上，18个女生依次排开，打开行李卷，这每人不足一米宽、二米长的地方，就是今后的家了。晚饭是炒韭菜，白面馒头。韭菜碧绿，而馒头——竟比碗都大！吃完饭已经八点了，天色才刚刚暗下来。北大荒的夏天，太阳到了晚上九点多才不甘心地落。宿舍里点的什么灯，有没有灯，后来已经想不起来了。大家太困了，脑袋一沾枕头，就睡过去了。青春的睡眠是极其安静的，没有鼾声和梦呓，只有腿长个大的蚊子，在我们的头上盘旋，翅膀震颤的声音，或许是那个夜晚最为响亮的声音了。



到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我穿着统一发的兵团战士棉袄已经油渍麻花。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



《我的北大荒》之二：

生硬的革命者记忆

第二天，队里召开欢迎大会，授给我们每人一个忠字牌（即用红电光纸裱糊的心型纸板，有碗大小，中间贴一个黄色的“忠”字），戴在胸前。宣传队还表演了忠字舞。，只有进入黑龙江，才沿路看到这个阵仗，边疆省份发明的“忠字化运动”还真不一般，太好笑了。会后，每人领到一把锄头，从此，我们就是北大荒的人了。

北大荒的“大”，除了辽阔还有气魄。每个生产队的耕地都是几万亩，地块以数字排列，叫一号地、二号地，一块地号几千亩，播种、收割全部是机械化作业。机械不能干的活，人才去干，譬如玉米和大豆要用人力锄草间苗，一块大豆地横3000米，竖2000米，眼看着不远，半天锄不了一根垅。譬如麦收秋收，粮食进了场院，翻场收场、装袋入囤，连喘息的功夫都没有。譬如连阴雨中的小麦地，大雪埋没的大豆地，都要人力收割，站在没踝的稀泥或没膝的雪地里弯腰挥镰，滋味真不好受。

我们初来乍到，正是麦收季节，每天都有几十吨小麦从地里拉进晒场，从早上三四点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那不是干活而是打仗。一看天边有可疑云朵漂移过来，经验丰富的场院保管员就招呼大伙儿赶紧收场，连队上空响起紧急钟声，后勤人员跑步赶来，连刚卸套的驴马也牵来加入战斗。起先嘻嘻哈哈的我们，往往不等把小麦收拢苫好，大雨就瓢泼般砸下来。北大荒的天空瞬息万变，优秀的场院保管员就是气象专家，我们队的保管员、老铁道兵李顺义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呢。天热活忙，人人汗流浃背，有次我不听老同志劝告，穿了件半袖衬衫，结果两臂的“阳面”晒出了累累水泡，水泡融合，大个的赛过鸡蛋，火烧火燎夜不能寐，就那样也没有误过半天工。把小麦全部摊平，它们晒太阳，我们躺在阴凉地的片刻，别提有多舒服了。

到连队过了大约半个月，副指导员老董（山东支边青年，当年27岁）找我谈话，说队里决定让我担任气象员和出纳，气象员只要6小时一次去气象站记录风向、风速、温度和湿度就行，出纳的主要工作是发工资和日常的资金收支。气象站在大野地里，半夜的查看实在犯难，我既怕鬼又怕狼，虽有要好同学陪着，也止不住心里发毛。出纳的活儿不难，我第一次发工资，从分场领来钱，不懂得要事先点好装袋，而是当场数钱，来一个发一个，好在最后亏得不多，就几毛钱。这些工作都是“业余”，一做完我就上场院去干活。

一个月后，小学校开学在即，连里又决定让我当小学老师，立刻着手准备开学的工作。看到同学们天天晒得面红耳赤，衣服后背全是白花花的汗碱，累得不言不语，一头栽在铺上，我觉得自己好象做了亏心事。有天下工后，趁大伙儿去食堂打饭的空挡，一个同学对我说：麻杆儿，你知道同学们说你什么吗？你根本就没过劳动关，怎么能当老师？我无言以对无地自容，当晚就去找指导员，坚决拒绝去小学校。1958年转业的解放军前军官，胖胖的孙指导员听完了我不当老师的理由，呵呵呵地笑起来，像哄小孩儿一样拍着我肩膀说，女同志干会计和教员，是咱们这里最好的工作，队里让你干是对你的信任啊，当然，也看你还小，长得这么单薄，重活你哪干得了？我说我没过劳动关，老头儿说，劳动关可以慢慢过嘛，等你长结实了再大几岁也可以过嘛。

我负责教一年级和六年级。一年级的新生是我挨家挨户招来的，一共30人，最大的12岁，最小的5岁。5岁的小姑娘叫小燕，长得特别可爱，脸蛋上两个小酒窝，天生一副笑模样。妈妈起初不同意小燕上学，才5岁，大名还没起嘛，就去上学？我说大名叫海燕好不好？苏联作家高尔基有篇散文就叫“海燕”，她妈妈一高兴，就把女儿交给了我。马德花也是我上门招来的，她是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一头棕黄的头发天然卷曲，粉嘟嘟的脸蛋，胖胖的小身子，跑起来摇摇摆摆的，憨厚可爱，像个洋娃娃。马德花6岁多，显然比小燕“成熟”，从我去她家招生的那天起，就成了我脚前脚后的小“跟班”，给我拿粉笔，帮我擦黑板，上课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做完作业总是想第一个让老师看。一年后当我辞职不干后，马德花几次跑到宿舍看我，总是追问：冯老师，你咋不教我们了呀？眼睛里满是遗憾和不舍。

开学了，边疆的学校也在百废待兴中。我教的“复式班”有一年级新生30个，六年级老生3个，是3个老师中学生最多的。没有课本和教学大纲，每天教什么，没人告诉你，全凭自己编。一年级还好说，从1、2、3和A、B、C开始。六年级就很伤脑筋，只能从毛选里挑短文，再编些应用题，算做语文和算术两门。还教体育和音乐，体育就是大小孩子一块玩老鹰捉小鸡，音乐课就是唱革命歌曲。上课了，给一年级讲课时，六年级就抿着嘴笑，像是上边来听课和检查工作的领导，给六年级讲课时，一年级的孩子就大眼瞪小眼。有时看到他们交头接耳，拉起一个厉声问道：“你们在说什么？”小孩子转身指着六年级：“他们说冯老师的外号叫麻杆儿。”真是的，哪里有什么师道尊严？如果看我气急败坏，大孩子反而像家长似的安慰我说，冯老师别生气啊他们不懂事。3个六年级的大孩子都十五六了，我干脆让他们仨做助手，分片包干指导一年级。几个月下来，大孩子虽没长进，小娃娃们却有了不小的收获，会做简单的算术，学会了汉语拼音和一些汉字。当然，也有几个小孩子把字写成蝌蚪文，特别是12岁的那个男孩，幼年得过大脑炎，他总把一个字分开写在两个格里，愣把中文弄成了日文。

一年以后，我坚决要求去农业排劳动，孙指导员被我闹得烦不胜烦，答应可以考虑我的要求。新学期开学在即，一个晚上，全队在大食堂集中收听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孙指导员再次宣布让我当老师，我嚯地站起来，大声宣布坚决不当老师。老头儿非常恼火，手里扬起上级党委对教师名单的批文，严厉斥责我必须服从命令。散会后，与会者照例集合连夜游行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拦住指导员，和他大吵大闹。第二天，我就被派往农业排劳

动。

写到这里，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同学中许多是“老高三”、“红五类”、共青团员，而我，出身不好、初中文化、白丁一个，凭什么总是受到“优待”？领导明明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不让我做重活，把最好的工作给了我，我却执拗偏激，蛮不讲理，毫不领情。当我懂得感激和感恩时，那些关心爱护过我的北大荒前辈们，已经下世了。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



《我的北大荒》之三：

上学的风波

转眼到了1970年，已经整编为“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北大荒各国营农场，按照上级指示将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投机倒把）运动，从基层抽调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春节刚过，地里没有活，每天半天政治学习。排长让我们班抽一个人参加工作队，曾经批评我没过劳动关的那个同学说，让麻杆儿去吧，她能写，算盘打得也好。大伙儿说，行！麻杆儿去吧。第二天，我就带着铺盖卷去了团部（总场），从此离开了我的连队和我的同学们。&&工作队起用了大批文革中靠边站的干部，都是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军官，不少人打过仗、入过朝，刚届中年，在我眼里，他们就是北大荒的头脑和智库，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也许因为我在北京最好的女中接受过一流教育吧，童子功好，什么都知道一点，也有一定的能力，他们都很欣赏我。运动后期，我被留在团部直属商业连当文书。商业连统管全团的商品批发、零售、收购和其它服务业，在物资匮乏的年月里可以说是最好的单位了。文书负责管理文件和职工档案、户籍，协助领导处理各种日常事务，是个重要岗位，我出身不好又是白丁，连想也没想过会让我当文书。老连长李振奎是解放战争中在河北家乡入伍、1958年转业到八五二农场的正营级军官，他对我是否团员，出身怎样并不看重，充分给予了我信任和尊重。看我能写会画，有一点雕虫小技，特地让工人把单位门口一块几米长的墙壁抹平涂黑，任我写写画画。我把黑板报办成了一个小杂志，每当更换新的内容，都会引来很多人看，成为商业连的文化窗口。

当时党团组织的发展工作已经恢复，对我家庭出身的函调如石沉大海，入团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不久，商业连老指导员病逝，来了新指导员，是从1966年集体复员兵中提拔的干部。可以感觉到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嫌他总板着脸，屁股又沉，老连长那么忙，他却整天坐在办公室翻报纸，真够没眼力界儿的。有一次，从边远的三分场来了一个小伙子，进门就找领导“批奶粉”，说小孩出生20天了，奶不够吃，天天饿的哇哇哭。奶粉是紧俏物资，批准权限在连领导。指导员慢条斯理地盘问人家孩子出生几天了，为什么奶水不够……临了说：“嗨！我告诉你个好办法，不用喂奶粉。”人家急忙问喂啥呢？他说：“喂苞谷面糊糊，准保让你孩子长得结实。”那个小伙子急了，说刚出生哪有喂这个的？指导员严肃地说：“我小时候家里特穷，就喝苞谷面糊糊，哪有奶粉？！”那个小伙子再三央求，指导员也不松口。人家走后，我说：“刚出生的小孩，怎么咽得下玉米面糊糊？”指导员说，你咋

知道咽不下？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比讨饭强多了。我说赶明儿你有了小孩就给他喝玉米面糊糊得了。

有一天，新指导员对我说："你的函调材料回来了。"我激动的心砰砰直跳，我已经22岁了，别的知青都在争取入党呢，可是我还没有入团，真是很没面子的事啊！指导员说："你爹是畏罪自杀的，哎！你妈没告诉过你，你家和共产党有仇吗？"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早已原谅了指导员因年轻鲁莽对我的伤害，却无法忘记他阴郁的表情。我说："我母亲说他是盲肠炎死的。"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我，又问："你以前真的不知道？"其实我是知道的。父亲的死是我难以启齿的秘密，在政审表格中我一直写着"因盲肠炎去世"。我父亲在肃反运动后期自杀，那天正是他41生日，而我还不到6周岁。父亲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祖上先后有二十几位在十八、九世纪考取过功名或是贡生。先祖们的事，家谱有详细记载，我家乡光绪年间修的地方志上记载有多处，父亲的高祖父是道光年间的武举人，武举人的胞弟是武进士，授蓝翎，后为道光皇帝的御前侍卫。父亲的家族辉煌了大约一个多世纪，在20世纪前半叶逐渐败落。父亲曾经担任过察哈尔解放区蔚涿宣区的无党派副区长，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为什么选择41岁生日？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疑问。后来，老连长告诉我，你那函调我看了，你父亲参加过国民党，不算啥大事，再说你那么小，懂个啥？后来我终于入团了。

在八五二农场（后改编为生产建设兵团3师20团）商业连工作的二三年里，是我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休息，什么叫做男女有别，什么叫做个人利益。我眼到手到，悉心做好份内份外的一切工作。入冬要拉取暖煤了，我白天上班，夜里跟车去煤窑挖煤（农场的煤窑是露天的）；年底发布票了，我利用星期日，顶着"大烟泡"（狂风夹雪）把布票送到各家各户，一天之内把事办完；连里自盖家属宿舍，我把本职工作放在晚上，白天跟车拉砖、拉石头，到工地挑砂浆，上房顶钉檩条铺油毡……没有我不能干的活。即使生病了，煤气中毒了，只要不倒下，就咬牙坚持工作。在劳动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小"麻杆儿"终于长成了身心健康的大姑娘。我还经常和团支书、上海知青唐坚（现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秘书长）一起组织青年学习马列原著，给全连职工宣讲《共产党宣言》等。1973年初夏，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我是66届，又是北京名校学生，最拿手的就是考试，我信心很足。考试结束后不久，辽宁知青张铁生反对考试的公开信发表，考试成绩立即作废，改由群众投票选举。商业连4位合格候选知青中，只有一个名额，我得到了最多的选票。我的第一志愿是北京钢铁学院电冶炼专业，因为我特别喜欢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里面的女主人公伊斯克拉，就是一位炼钢工程师。我在十拿九稳的兴奋中等待着入学通知书。一天早晨，同宿舍的哈尔滨女知青小李子问我："小冯，你父亲是被枪毙的吗？"我大吃一惊，问谁说的？小李子又问："你哥哥是国民党兵，关在监狱里？"我更吃惊了，说："我二哥当过解放军，还是共产党员呢。"小李子告诉我，某某前几天忽然来上班了，她在商店里挨个柜台说，不能选你上大学，你父亲被镇压了你哥哥关在监狱里你思想反动是个大学迷。

某某是现役军人、总场机关组织股长的老婆，不到30岁，以前在老家当过生产队的妇联主任，随军来到八五二后，安排到商业连当调拨员，该女子一直以"国家干部"自居，非常骄狂。前不久因为休完产假有半年多没上班，

被扣了工资大闹办公室，拍着桌子对老连长破口大骂、恶毒诅咒，我气不过，惹了她。那个女人忽然来上班，显然是冲着我的。我听小李子一说，立刻去找指导员，他既然兜里揣着我的函调，就应该主持一个公道。我说："某某到处造谣说我父亲被镇压哥哥蹲监狱，你知道这不是真的。"指导员冷冷反问："为什么你非要上大学？不上大学就不能干革命了吗？"我被问的哑口无言，知道了他们是一伙儿的。指导员作为党支部书记，决定重新选举，这次不再经过全体投票，而是由班组长推荐。在指导员亲自主持下通过了新的名单，我名列最后。我气得一下病倒了，发烧、半边脸肿得张不开嘴，连续几天不能吃饭，走路都直打晃，还坚持工作。我的好朋友唐坚、小李子和许多老同志都鼓励我要挺住，团支书唐坚在全连大会上义正词严地为我争辩，质问指导员为什么听任谣言蔓延？有的老同志冒着受打击报复的风险跑到团里反映情况。很快，团里派来了工作组，了解和解决问题。正值中共中央下发了（1973年51号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文件不久，针对我上大学出现的反复成为当地打击知识青年的一个事件。在工作组的召集下，商业连第三次群众推选大学生，我再次名列第一。因为延误，大学招生工作已经结束，我被当地的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录取。

1973年8月，我离开了八五二农场。老连长李振奎和知青战友唐坚、小李子把我送到迎春火车站。5年前，我正是在这里下了火车，开始了我的青春旅程。

冯敬兰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3



《我的北大荒》之四：

几十万知青像潮水一样呼啸着来了，又呼啦啦走了。

2006年夏天，八五二农场举办庆祝建场50周年的活动，广泛邀请当年知青回访。我和几个战友搭伴踏上回程，岁月流转，山河易容，而旅途依然辛苦。北京到哈尔滨的“Z”字头列车只要10个小时，北京到佳木斯的唯一一趟火车却走了22个小时。下了火车上汽车，走走停停又是好几个小时。进入八五二的地界后，天已大黑，车窗外面黑黢黢的，只有星星点点的亮儿，不知是灯光还是星光。

前面突然有了路灯，我被告知八五二农场的场部南横林子就要到了，心中不禁一动。自1973年离开，我从未回来过，当年送我到迎春火车站的老连长李振奎已经过世，一些我熟悉的老同志也迁回了原籍，不知还有没有熟人。汽车在两列路灯的映照下，迅速到达了终点。站在璀璨灯光下，我活动着酸麻的腰腿，一时不分南北。大路旁，一侧是白色外饰的居民楼，一侧是灯火通明的广场。到处张灯结彩，大红横幅提示着八五二农场50岁的华诞。我们一行被迎上一辆面包车，拉到新落成的宾馆下榻，宾馆和我住过的国内外旅店没有两样。

接待我们的场办干部王静玲身材苗条、五官标致、衣着时尚，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看上去30岁多岁，但沉着、大方的做派显然是有着历练的，一问，只比我小几岁。听说我从前在场部工作，静玲邀我出去散步。北大荒的夏夜清凉宜人，特别舒服，连从前劈头盖脸的大黑蚊子也没有了。我们顺着马路走，我说从前，静玲说现在，在时空的交叉中，南横林子变成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小城镇。我住过的简易筒子楼不见了，原地矗立着多层的居民楼。那几栋木刻楞大房子呢？曾经住过农场的创建者和发配来此的丁玲、艾青们，也没有了，那里辟为广场、舞台和草坪。我供职的商业连没有了，场部的商业服务业已经私有化，沿街楼房的底层，全部是个体商铺和饭馆，不同颜色规格的牌匾在纷乱中透着竞争的热闹。我天天挑水的水井没有了，那口井有几十米深呢！有时碰上停电，摇半天辘轳才打上一桶水。现在那地方站立着一座宾馆。不过，那座老礼堂还在，从前它孤零零屹立在林子边，现在却成为中心，一边是农场的办公楼、宾馆，一边是农行、电信、税务等部门。

在通向修配厂的路上，集中展示着八五二当今最现代化的农机。静玲一个个给我介绍着，有着巨幅履带的是拖拉机，三角型的履带居然是三个大轮子咬在一起，比我还高；收割机占去了大半条马路，从前的康拜因若站在这

里，简直就是玩具；“五铧犁”变成了宽宽的一排，夜色中巨大的犁片幽幽闪烁着优质钢铁的冷光；……它们庞大的身影尽管看不清楚，我仍旧感觉到了那份恢弘的气势和霸气。只有北大荒，才敢于驾驭这样豪气冲天的机器。只有现代大农业，才能够让它们有纵横驰骋的天地。

静玲说，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哪一台也要几百万。是农场买的？我问。不，是种植大户们买的。哦，我蓦然想起，“北大荒”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了。文革结束，现役军人撤离，“兵团”再次变回农场，随着知青的大批回城，北大荒实行了个体承包制，听说连农具都分了。可是，北大荒的基因里从来不能容下小农经济，大格局的农业怎能忍受被分割成万千碎片的结局？这些为场庆助兴的庞然大物不会说话，却告诉了人们，北大荒的气魄依旧。

变化大吧？静玲问。斗转星移，青春的记忆已经无处可寻，我答非所问地说，你是本地人吗？普通话真标准。她说，我父亲是58年转业来的，我们这儿说话都没有东北味儿，外边的都说，八五二的人说的普通话特别标准。因为你们来了，我们从小学的就是你们。

她的话，竟让我立即动容。几十万知青像潮水一样呼啸着来了，把普通话留下，把对城市的想像留下，又呼啦啦走了。

冯敬兰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3



《我的北大荒》之五：

扎根不走的知青

95%的知青都走了，回到他们的城市，可也有留下的。上海知青郭琦美就是一个，她是我后来供职的商业连被服厂的工人，67届初中生。

出事那天是个星期日，郭琦美早早起床，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水。宿舍在二层，简易筒子楼，楼梯陡窄，走廊里没有灯，不是撞上东家的杂物柜，就是被西家的煤堆绊了脚，挑水是个吃重的活。同宿舍的三个上海姑娘一个比一个爱干净，挑水却是小郭一个人的事。她从不计较，不耍小性，脸上总有随和的微笑。把宿舍的水缸挑满，便去师傅家帮助干活，这是她周日的惯例。师傅刘裁缝让郭琦美同他去林场闺女家拉拌子（木柴），顺便把老伴接回来。人的旦夕祸福，就应在了那天。返回途中马惊了，马车疯狂的颠簸中，刘裁缝从马车一侧跳下，跟着车小跑了一阵，停住了脚稳住了神。坐在马车后边的郭琦美，惊慌中也飞身跳下，立刻重重跌倒，后脑着地，在巨大的惯性中不断翻滚，鲜红的血痕拉得很长……刘裁缝的老婆年老体弱，无力跳车，抓住刹车的绳子等死，而惊马在一阵狂奔之后，气喘吁吁地终于换了碎步。

我是在医院见到郭琦美的。全然不能相认的小郭，一头浓密黑亮的长发被剃个精光，白皙的脸庞肿得不能看，缠满绷带的头颅大如柳斗。伙伴们争着给她献血。小郭是B型血，而我是A型，因为不能给她献血，心中觉得自己很可耻，好象是故意不打算献似的。姑娘根本就没救了，医院尽最大的力气维持着她的生命体征，只为了等她远方的亲人。三天后，郭琦美的舅舅和哥哥分别从云南和上海赶来，当天，她就死了。其实，美丽、质朴、任劳任怨的小郭，灵魂早就飘然远行。

郭琦美幼失双亲，在祖母的呵护下长到18岁，下乡到了北大荒。她的理想是做一个手艺好的裁缝。出事的那年是1972年，北大荒的春天已经来临，她还不到21岁。郭琦美安葬在场部东边一座无名小山下。山上都是树，林中都是草。今天还有谁会知道，林中最茂密的那丛芳草，正是上海女孩儿郭琦美？她守望在那里，目光越过时空，坦然地看着我们。

留下的还有高海萍。

我们回到连队，一下车就看见人群里的高海萍了。她又黑又瘦，一头灰白的头发，很顺溜地用发卡挽在脑后，戴着金属框眼镜，穿一件素净的蓝底白点的褂子，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身前身后还跟着两只京巴，俨然就是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我不由不想起从前的高海萍。1968年6月我们刚到连队就认识六四年北京知青高海萍了，她没事就爱到我们宿舍来，靠着门框，问这问那的一点不认生。凭着一口京片子，人不亲土还亲呢！可是这个女生还真的不敢恭维，一头焦黄头发烫得乱蓬蓬，满脸壮疙瘩，走路横着，说话大嗓门，一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当时她的名声也不好，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从别的连队转来的，好象是“搞对象”出了问题，自然属于“作风问题”。那时候，一个大姑娘一旦有了“作风问题”，几乎就是一切玩完。于是，在我们连的男知青里，就没有谁会正眼瞧她。高海萍后来嫁给一个山东移民的弟弟，在70年代中后期知青返城的高潮中并没有回北京。1991年前后北京市政府颁布了知青新政策，允许所有在外地的北京知青办理返京手续，只要自己找到接收单位。许多人都以假接收证明拖家带口回来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有的甚至成了吃低保的困难户。高海萍还是没有回来。她觉得，自己和丈夫一没文化二没本事，回去干啥？

我们在连队短短的二三个小时里，她极尽地主之谊，一步不落地陪着我们，出了东家进西家，向他们介绍着这个是老表那个是麻杆儿，向我们介绍着那老太太是谁谁的老伴那中年汉子是谁谁的儿子；看了这里看那里，一一指点与我们相关的各个“遗址”，井台、伙房、小学校、托儿所、大食堂、小卖部、我们住过的马架子……等等，虽然都没有了，可是我们的心能够看见它们。高海萍话没有从前多，既没喜形于色也不高声大嗓，却能感觉到她和我们的亲近。可以说，见了那么多老“贫下中农”，只有她能一一叫出我们的名字，她是唯一让我们在心里没有距离感的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她是北京知青，是“我们”中的一个。

满街跑着柴狗，高海萍的两只白色京巴却始终不离我们左右。我是个天生和猫狗有缘的人，那天穿了条白色咔叽布裤子，又是雨后，到处泥泞，高海萍的两只小京巴围着我跑来跑去，把身上的黑泥全蹭到了我的裤腿上。在走家串户中，我们也去了高海萍家。她的家与别家一样，一排旧砖房中的两间，进入篱笆门是菜园子、鸡窝、猪圈、茅房，因为下雨，满院子稀泥，一棵沙果树也没见枝繁叶茂。一进家门，外间是锅台，墙上砌了一截白瓷砖，熏得黑糊糊的，里间住人，摆得满满当当。与别家不同的是，她把炕拆了，换成一张大床。北大荒漫长的冬季，睡在床上的凉被窝里，不冷吗？她说有电褥子。我们几个女生想“方便方便”，她说院里没有厕所，我领你们去公共厕所吧。一同学说，高海萍，你那不是茅房吗干嘛不让用？她不好意思地说，夏天脏，我们也不用。这就是北京知青高海萍的尊严。

高海萍成了真正的北大荒人，却把两个儿子送回了家乡，一个在她的家乡北京，一个在丈夫的家乡山东烟台。两口子每人每月400块退休金，在林子边开了一块小片荒，种点蔬菜玉米什么的，日子一路过下来。

北大荒的冬天漫长而寒冷，不下雪不刮大烟泡的时候，空气也像刀子一样刮脸。那时，连队的老职工多数住的

是草房，土坯垒的，屋顶苫着尺把厚的草。住砖房的很少，即便墙是用砖垒的，屋顶也还是苫草。连队为了让我们这批知青不在简陋的马架子里挨冻，突击盖了红砖机瓦的宿舍。1968年深秋，我们搬进了新房。雪白的墙壁，宽敞的双层大玻璃窗，真爽啊！简直和北京差不离了，说老实话，我家在北京小胡同里的老房子还不如我们的新宿舍呢。崭新的红色砖房座落在连队的最北面，后面就是野地，半夜里常常听见狼在房后呜呜地哭，像小孩子找不到家了一样悲悲戚戚。

前面是一排老职工的家属宿舍，因为我们不种菜园子，空旷中觉得好象离他们的房子特别远。到食堂打饭、到井沿挑水，还要绕过一个大土坑。住进新房子不久，就上冻了，老职工的话立即应验：砖房不保暖。房子还没来得及干燥就住了人，寒冬腊月更不会干了。后墙和屋顶结了厚厚的霜，每天早起，我们的被脚都和墙冻在一起。白灰的天花板一冷一热没几天就吃不住劲了，一天半夜，仰脸熟睡的我，突然被“拍”醒，原来一大块白灰从天而降，正好落在我的脸上，把我砸的满脸花，额头和一只眼睛肿了好几天。

那天我们在密集的红砖房屋和菜园子中，总算认出了当年的女生宿舍。房前屋后被菜园子、小仓房、鸡窝、柴禾堆捂了个严实，与前面一排房子摩肩接踵的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家了！我和同学们愣在那里，不走近，不说话，只让它做背景给自己拍照。房子好象短了，我的发小老表说咱们宿舍怎么给拆了，没错，把头的那间被拆了，那可是我们8个人的家呀。家没有了，蓦然间我想起了一个人，她叫赵静，北京32中66届初中生，我们八姐妹之一。

那些个夏日的傍晚历历在目。收工回来，赵静总是利索地洗完，搬个马扎坐在门口，给我们腾出地方兼看门。她穿着粉色的确良短袖衫，黑色的确良长裤，粉色塑料拖鞋，艳丽光鲜，和穿着补丁长裤、蹬着黑色懒汉鞋的我们，是那么不一样。赵静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翘着腿坐在晚霞的余辉里，拿一把扇子，一边哄蚊子，一边和我们隔着门槛说话，呵呵呵呵地笑个不停。赵静特爱笑，我说一句根本不逗的话，她就笑得喘不过气来，像苹果一样圆的脸蛋憋得更红了，我说瞧瞧！你至于嘛？她家住在人大会堂西边的绒线胡同，离我家很近，独门独院。探亲时我会去她家报平安或捎东西。她父亲是铁路工人，真正的产业工人！母亲是慈祥富态的老太太，她姊妹五六个，只有一弟，看上去是特别温暖、让我羡慕的大家庭。回到北京后，赵静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会干部，一直做到厂长，好象。人更胖了，却不讲究穿戴了。而且，一直没有生育。我们多年失去联系，年初，听说赵静已经去世几年了，继续打听，竟是真的。因为癌症，不到50岁就走了。这样一个爱美的、爱笑的、好脾气的、富态的赵静，怎么会得胃癌？什么不开心的事狠很地伤了她呢？站在人去物非的八五二农场六分场四队的沙土路上，望着已经不存在的我们的家，我想起了赵静。我们的小屋和热炕已经没有了，可是赵静，我却听到了你的笑声。莫非你也来过了？

冯敬兰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3

当年在草原上的看家本事——“打笼头”

与吃牛羊肉长大的牧民相比，主要靠谷物和蔬菜在半饥半饱中长大的我，不免显得单薄体弱。但是，当年凭借自己与马打交道的本事，我从许多牧民那里曾经占了不少便宜，将一些因暴烈而使牧民感到退缩的好马，用老实的劣马交换到自己的手里。经过调理，许多烈马最后都变得很驯顺。

可惜的是，当年集体500匹马的大马群，已经变为今天几十匹马的小马群一个人抓烈马，我主要靠“打笼头”。具体过程是：

1、先在自己的马头上，多戴一个“笼头”。戴在“嚼子”外面。

2、将套马杆的鞭鞘做成可以滑动的活结。

3、套住马以后，让活结滑落，紧紧勒住马的脖子根。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动作。弄不好，就会勒在马脖子的中部。那么，下面的动作就很难完成。

4、抖动套马杆，用鞭绳敲打套马杆，兜住马的嘴，使套马杆绳成为一个马笼头。这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关键环节。

5、跟跑一段，逐渐使被套的马平静。

6、将套马杆慢慢拖到地上，逐渐向左侧走弧线，最终以套马杆为半径做圆周运动。为实现这个圆周运动，套马杆需要足够长。我的套马杆通常都有两丈（近7米）长。

7、慢慢将套马杆绳解下。

8、丢弃套马杆。丢弃的时候要注意地貌特征，便于以后回来找。在茂密的草地上，有时候寻找一个7米长的套马杆也是很困难的。

9、左手从自己的马头上摘下备用笼头。

10、骑在马上给被套的马戴笼头。这是有一点危险的。有时候，被抓的马为了拒绝笼头，上身扬起，前蹄会刨到我骑的马的脖子上面。因此，为了安全，我在抓一些烈马时会尽量选骑身材高大的马，从而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

11、抓住笼头，慢慢取下套马杆绳。

12、回去找丢弃的套马杆。

在整个过程中，都不能着急，需要耐心地让被抓的马平静，适应。动作要慢，尽量避免剧烈、突然的动作。有时候，为抓一匹马，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好在，那时时间常常是充裕的。

选骑套马经验丰富的“杆子马”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过程中，尤其是在“打笼头”的过程中，被套的马会左冲右突，这期间，我完全不用考虑如何控制自己的坐骑，它会自己紧紧咬住被追的马。

必要时，多数男牧民都会使用这种“打笼头”的技术。但是，对于多数牧民，需要使用这种技术的机会并不多。因此，可以熟练运用这种技术的牧民并不是很多，估计十人中不过二、三。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牧民中真正的驯马高手，很少使用这种“弱者的技巧”。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技巧和耐心，不用“打笼头”技术而直接给烈马戴上笼头。这是难度极大的，对力量、勇气、技术和耐心都有极高的要求。在我们大队百余名男牧民中，我仅仅见到土布逊一人具有这种实力。他在50岁的时候，用马尾巴套住自己的脖子，拖在马后，自杀身亡。这是一个草原上的爱情悲剧。

土布逊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30岁的时候，曾经是乌珠穆沁东北部草原上最有权势的人物。50岁的时候，因与一个18岁姑娘的“老少恋”而自杀身亡。

土布逊是博主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退休以后，博主要讲一讲他的故事。

（此文大约写于2000年，曾经贴于知青论坛）

海宽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0

【记忆碎片】：五月夺命雪

作者／ 裳裳


1994年，作者回到草原。摄影：付晓清

谢小庆按:对于许多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落户的知青,1972年5月13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一场春天骤然降临的大风雪,使许多知青和草原牧民一道,经历了一次生死大劫.那天,我自己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每每想起来都感到后怕.本文作者是曾在东乌珠穆沁旗下乡的北京知青.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你可曾有过坎坷的经历?当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你将怎样抉择?我有过插队的经历,曾经亲历了草原上五月的夺命雪,九死一生.走出这场特大暴风雪,我幸运的活下来了!这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坚韧和坚强!我只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面对逆境,你千万记住:在人生道路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命运在自己手中把握!

我17岁离开北京,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牧区),上过大学,到过工厂,又下过海,在商海里漂了十几年.我曾经经历过生活的艰辛、坎坷和挫折,也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有过辉煌,也遭遇过逆境;曾经消沉过,绝望过,但最终我还是重新站起来了!我感恩锡林郭勒大草原给予我的一切!?





1972年5月13日,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追忆曾经的草原往事.五月的北京已进入百花争艳的初夏,爱美的姑娘们早已换上了漂亮的裙装,而初夏的东乌珠穆沁草原上,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风雪悄然而至,灾难突然降临了!45年前草原上那场五月的"夺命雪",至今记忆犹新!有牧民说,草原上冬天的雪再大一般也不会冻死人,哪怕是零下40多度的严寒;然而,五月的雪却时常会雨雪交加,随下随化,遇上气温骤降,那杀伤力是很厉害的!1972年5月我亲历的那场暴风雪,真的是夺命雪啊!

后来听说,那场暴风雪给东乌旗造成了重大损失,全旗冻死了四个人(包括北京女知青曲彩林),冻死的牲畜有两万多头,在我们大队的山沟里,冻死的马就有300多匹(马匹都是从边境那边顺风跑过来的,气温骤降到零下二十多度,马群一路跑出的汗水和边下边化的雪水结成冰壳,冻死不少).

草原上一般从3月下旬开始接羔,到五月初已接近尾声,就该骟羔子了(小公羊去势,一般留下做种羊的,其余全部骟掉,成为美味的羯羊).草原上5月的天气温差特别大,一早一晚冷,但白天还是挺热的.5月12号天气特别好,白天穿两件单衣都不冷,让牧人们感到草原上的春天来了.骟羔子是草原上一个互帮互助的牧业活,谁家要是骟羔子,附近的牧人们都会来帮忙.5月13号那天,男生包放的那群羊要骟羔子了,来了一些牧民,我们知青也都来帮忙了.

早上天气晴朗,我们都没顾上吃饭,很早就把萨和羊轰进圈里,开始骟羔子.人多干活儿快,没多会儿羔子就骟完了.那时候知青们凑到一起也不容易,都是年轻人,玩心特别大,干完活回到包里,急匆匆的喝了碗米茶,大家就开始打扑克敲三家.大家正玩得高兴,放羊的知青捎话回来,说羊群找不到了.这时大家看到天气转阴了,好像要变天,就都着

急了,赶快骑上马,分头去找羊群,我因为眼睛视力不好没去找羊.包里剩我一人,我一看水缸里没水了,心想,大家都去找羊了,我也不能闲着,就去打水吧.我在附近抓了头牛,套上牛车,拉着水缸,奔十几里地以外的那个水井上去打水(这是最近的水井).因为看到要变天,怕起风了坐车冷,临走之前我带上我的方头巾,又顺手从男生包的床上抄了个大皮得勒(一种熏制的老羊皮缝制的蒙古袍),披在身上一裹,就赶着牛车拉水去了(当年拉水的水车参见下图).



草原的天气变化无常,路上还没走到一半,就开始掉小雨点,紧接着没有多会儿,小雨点就变成了小冰粒,等我赶牛车到井上的时候,小冰粒又变成了小雪花.很快的,雪花变成雪片,漫天飞舞,风也越刮越大.我打水的那口井不深,但是每桶水拎上来往水缸里倒时总会飘走半桶,结果原来24桶水就能打满的水缸,我拎了几十桶水才打了半缸.我打水太专注了,这时才发现,雪片已经变成了鹅毛大雪,要刮白毛风了!雪越下越大,铺天盖地,井边坑坑洼洼的地面已经被积雪填平了.我想,雪这么大可以化雪水吃,不用再打水了,要赶紧回家.我马上套上牛车往回走,但那时候已经晚了.水井的跟前一般都是硝泡子地,坑坑洼洼,有一丛一丛的得勒苏草,沟沟坎坎已被大雪覆盖,看不出哪是沟哪是坎,白茫茫的一片.没走几步牛,牛车就被一个深沟卡住,牛车的辕子断了,水缸砸在地上,我根本无法修复,只好放弃牛车,自己回家.

这时候,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风越刮越劲,人被风吹着跑,站都站不住,天上的雪和地上的雪连成一片,几米外什么都看不清,远山、牛车道、还有蒙古包……,什么都看不见!我遭遇了草原上可怕的白毛风,我迷路了!我不知道家在哪里,该往哪里走!

幸亏还有牛!我突然想到手中牵着的拉水的牛,都说老牛认道,这个牛的缰绳不能撒,跟着这牛就能回家,我信心满满的.于是,我牵着牛绳,跟在牛后面走.可是走着走着就觉得不对劲了,牛往一个高高的山坡上走去,而那条路应该是去苗圃的路,这个牛显然不是我们家那边的牛,我不能跟它走.我把牛放了,牛缰绳解下来留着备用.应该往哪里走才是回家的路?我茫然了! 雪越下越大,风依旧是越刮越劲,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我在原地打转.顺风,站不住脚,风吹着你往前走,一熘小跑;顶风,寸步难行;只能侧着风艰难地慢慢蹭着往前.我想,无论如我不能顺风越走越远,尽可能在小范围内来回移动,坚持到傍晚,等风雪一停,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

但是,天渐渐暗下来,风雪依旧,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雪随下随化,随着黑夜的降临,天气越来越冷,看来这一夜只能在荒郊野外过了.早上只喝了一小碗米茶,饥饿、寒冷、黑暗和绝望纷纷向我袭来,好无助!我感到莫名的恐惧!草原上的那些传说,一一浮上脑海.我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真正的恐惧是来自对死亡的担忧!我知道,如果我因为饥饿没有体力走动、体内没有热量,就会被冻僵、冻死,我不想被冻死!大雪覆盖了山里所有的沟沟坎坎,若不小心掉到深沟或枯井里,不但自己走不出暴风雪,别人也很难发现和给予援救,我真怕掉到深沟或枯井里,活活冻死!我也想到了狼,怕遇到狼群,被狼吃掉!好恐怖!……

我意识到,闹不好我真的活不了了,我可能会被冻死,但是我不甘心!不甘心啊!那种求生的欲望特别特别强烈,我想我一定要活,一定要活下去!始终就是这么不停的去鼓励自己:我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呢,我怎么能就这样死了,怎么也要英雄点儿、壮烈点儿吧,像龙梅、玉荣,人家是为保护公社羊群,我这算啥呢,不就是去打水迷了路,冻死了,想到这些就觉得特别不甘心.那时候我就想,无论如何,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不停的走下去,为了活命!夜里,气温骤然降到零下20多度.这个男生包里顺手抄来、没有腰带、长得拖地的老羊皮得勒(皮袍),成了我最后的救命稻草!脖子上围着的方头巾被融化的雪水浸透,不知啥时我已取下来拿在手里,冻成了一块铁板;手中的牛缰绳被打水时飘上的水花浸透,随着温度的骤降也冻成了硬硬的冰棍,像铁棍一样,成了我防身的武器,这样就不怕狼了.天气太冷,我把大皮得勒的袖子穿上,没有头巾护着,耳朵已冻得不行,我就把皮得勒的中间顶在头上,不知啥时老羊皮被顶破,头钻了出去;耳朵还是冻得厉害,我只好把皮得勒换到左肩继续顶在头上,无奈,头又从顶破的老羊皮中钻了出去;耳朵冻僵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把皮得勒再换到右肩,继续顶在头上,直到第三次钻出头去,那时我已筋疲力尽,被顶破的老羊皮挂在脖子上,翻着长长的毛,也只能任由它去;真没想到,仅仅一个晚上,我居然把老羊皮得勒顶出三个大洞!好狼狈!方头巾、牛缰绳我一直拿在手中舍不得扔掉,加上老羊皮得勒,这是伴随我一天一夜、走出暴风雪的三件宝贝.

这个暴风雪的夜晚,我就这样一直在不停的走啊走,深一脚浅一脚的.我当时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活活冻死!所以我就不停地走,还要保存体力,尽量慢慢走.潜意识里,我总是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掉进深沟、枯井里,如果掉进去就没有活动余地了,我肯定是要冻死的,就这么死我不甘心啊!我一直小心翼翼.走着走着,脚突然踏空,我马上就就地打滚,滚完以后爬起来,脚下又踏空,我就接着再滚,这样连滚带爬的一直走,走到了后半夜吧.最后走到一片得勒苏草附近,为了保存体力,我选择了一个缓坡,就是坡度大一点的那种缓坡,然后找了两棵得勒苏草,从这棵草走到那棵草,再从那棵草走到这棵草,就是来回的这样走.快到凌晨的时候,风已经小一些,雪也停了,我就这样在两棵草之间走.如果走得不冷了,我就躺在这棵草底下,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什么时候感觉要冻僵、特别冷了,我就会站起来继续走,就这样一直走到天亮,太阳出来了.

天晴了,我一看那个地方好陌生,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们家究竟在哪边.我就看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判断我们家可能在哪边,就往那边走去.走着走着,我看见两只狗在互相追逐、嬉戏,特别高兴.因为在草原上,看到狗,就意味着看到了人家,我已经走到一个营盘的附近,接着又看见蒙古包了.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走的浑身一点点的力气都没有了,但还是在走,两条腿机械地一步一步向前挪.我一副狼狈相,缓缓地向那个蒙古包走过去.待会儿我看有个人出来了,就那么看着我,一直看着.我走到跟前一看,是我们大队的牧民张宝玉家,他愣愣的看着我说:是你

啊，我都没认出来，你怎么了?你从哪来啊?我却所答非所问，晕晕乎乎、有气无力地说了好些不相干的话.他终于明白我迷路了，走了一夜.



2016年，作者回到当年躲避暴风雪的得勒苏草前。摄影：宋景春。

他看我这副模样，马上把我让到屋子里去.原来他也是刚从他家羊群回来，在外头守了一夜，刚喝完茶，现在要去羊群了.他家的羊群昨晚也在暴风雪中过的夜，明明知道翻过这个坡就是家，但就是翻不过来.天亮以后他的侄子找到他，把他换回家.屋子里暖暖的，刚烧好的奶茶泛出了香味，小桌上摆着奶豆腐、炸果子、手把肉……，好些吃的东西，好香好香!张宝玉把他爱人的衣服拿了一身给我，让我换完衣服先在这儿休息，暖和暖和，喝点奶茶、吃点东西，他还要去圈羊.他走了，我开始脱鞋、换衣服.我穿的是马靴，那个马靴里有好多冰渣子，和脚冻在一起，脱都很费劲，半天脱不下去.屋子里暖和，冰雪化了以后才把那个靴子脱下来.换衣服时才发现，裤子从里到外全部都是透湿透湿的，连里面的裤衩都湿透了.好半天我才换好衣服，喝了热茶，吃了一些东西，才慢慢缓过来，心里暖暖的.

草原上的消息传得很快，大家都知道了我还活着，尤其是牵挂着我的知青姐妹，她们一直焦急地等待着我的消息，这下总算放心了.那天亚林她们看我打水没回来，非常着急，还和牧民说要不要去找我，牧民说不行，这样的天气根本无法找人，出去一个丢一个.的确，后来听牧民说，那天我们队里有17个人和我一样在暴风雪中过的夜，有守护羊群的羊倌、风雪中圈牛的牛倌、追赶马群的马倌，也有出去串门、办事误在路上或迷路的牧民……，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动故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都还活着，身体无大碍.

我是幸运的，在亲历了那场五月特大暴风雪，艰难地度过了一天一夜之后，我深刻感受到:"求生"是人的本能，当人们在面临死亡威胁时，求生的欲望是何等强烈，而人的潜能又有多么大，那真是无法想象的!正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定信念给了我勇气和力量，使我幸运的活下来了!

然而，我们公社达布希勒图大队的北京女知青曲彩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是牛倌，那天她骑了一个生个子马(就是刚驯服的马)圈牛去了.据说她那天穿的是一件夹袍子(就是双层布的蒙古袍，两层布之间薄薄地续了一点棉花)，没有想到会变天.当东乌珠穆沁草原突降暴风雪，风卷着雪花铺天盖地而来时，她的夹袍子难以抵御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但她为了不让知青包放的牛顺风跑丢，还是坚持把牛拢到一起，将牛群赶进附近的棚圈里，自己却倒在了圈门口.这个棚圈离她家不太远，天气好时能看到大队部和她家的蒙古包.

她是在第二天早上被一个放羊的孩子发现的,但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了.或许,她是怕离开后牛群走失,为了守护队里的牛群被冻僵、冻死;或许,她是因为风太大、被受惊的生个子马扔下来,摔伤后失去知觉被冻死;再或许,她是被随下随化的雪水浸透了蒙古袍,冰冷的雪水吸走她身上所有的热量而被冻死……,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什么情况,她都是为了保护大队的牛群被五月的这场暴风雪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难忘1972年5月13日!难忘五月"夺命雪"!更难忘与我一样经历了那场暴风雪、长眠在乌珠穆沁草原的北京知青、我的草原姐妹曲林玲!每次回到草原,我都会尽量安排时间去墓地看望她.曲彩林,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你!

2017.5.13 撰写于成都

谢小庆跋:文中写道:"因为看到要变天,怕起风了坐车冷,临走之前我带上我的方头巾,又顺手从男生包的床上抄了个大皮得勒(一种熏制的老羊皮缝制的蒙古袍),披在身上一裹,就赶着牛车拉水去了."倘若当时裳裳没有这个"顺手"的动作,没有带上这件皮袍,她就很可能会成为另一个"曲彩林".在5月中旬,穿着薄棉袍外出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也一样.那天,我也是侥幸身上穿了皮袍,否则,也"壮烈"了.

****

文明,带来进步,带来更好的生活,也带来对自由的压抑,带来对天性和本能的束缚.科技进步为自由的文明提供了可能.我们仍需思考:构建怎样的文明可在维系共存生活的同时使人获得最大的自由?在追求文明的同时如何追求身心的舒展?如何避免对本能的不必要压抑?怎样成为文明社会中的自由人?

本公众号二维码中间的头像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晚年的主要观点是:文明的进步带来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对自由的束缚,也因此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更多的抑郁,更多的精神心理疾患.今天,公共场所不能抽烟,公路上不允许飙车……这些对自由的限制是文明生活所必须.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婚勿生…这些也是必要的吗?

本公众号试图探讨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1、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文明?

2、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让我们共同探讨吧.请长按或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



为了构建文明社会和获得人生幸福,提高审辩式思维(criticalthinking)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怎样提高审辩式思维水平?请长按或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审辩式思维》公众号:



文章已于2019-04-11修改

海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

【记忆碎片】：

眼泪

1973年9月1日，付晓东、尹晓平和王家宁、阎学丽两对北京知青，在草原上举行了婚礼。

2013年9月1日，应邀参加我当年插队的公社的邻公社白音呼布公社吉林宝力格大队北京知青的聚会。这天，也是付晓东、尹晓平夫妇和王家宁、阎学丽夫妇结婚40年的纪念日。40年前，两对知青曾经在乌珠穆沁草原上共同举办了婚礼。当时，我曾骑马走近百里（50公里）去参加了他们两对新人的婚礼。

9月1日的聚会中，付晓东无意中提到吉林宝力格大队知青张鹤斌的“萨日”马。年逾6旬的老张，竟然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晓东说，这匹马陪伴鹤斌在草原上度过了11年。

这一幕，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外，也使我深受感动。

我理解鹤斌兄对马的感情。离开草原以后，我无数次地在梦中与自己心爱的马相会。

9月1日，在付晓东、尹晓平和王家宁、阎学丽的婚礼上，两位新郎都喝醉了，都醉得一塌糊涂，都醉得嚎啕大哭。引起大哭的原因是复杂的。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局势变化，结婚意味着将永远留在异乡。虽然这是两对新人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非常艰难的。40年后，付晓东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记得那一天，我也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表现为伤心痛哭，我心里很清楚，我在为远在北京的父母而泣。”记忆碎片78当年与我在草原上共同生活多年的牧民和知青们，没有见过我流泪。我那时时而会对别人说：“我的眼泪在幼儿园中就流完了”。我4岁时父亲被关进监狱，14岁时，父亲才在被关押10年后被“免于起诉、宽大释放”，之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参加劳动，接受“监督改造”。妈妈一人在屈辱中将我们兄弟姐妹4人抚养成人。父亲1955年被抓时，子女中最小的我4岁，最大的哥哥9岁。我人生最早的记忆，就是整天陪着妈妈哭，有时候是与哥哥姐姐们一起陪着妈妈哭。

在草原上，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多次陷于“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困境。既曾遭遇过肉体的磨难，也曾遭遇过心理的委屈。但是，我从未在人前落泪。没有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竟然变得更容易激动，感情变得更脆弱。

1998年夏天，我与曾经在同一大队下乡的知青邵乔海一道回草原。她曾经住在钦达门阿爸家放羊、下夜。她1972年离开草原，是我们队北京知青中离开较早的一位。1998年，她的蒙语已经生疏，当我陪她去看望钦达门阿爸时，我为她当翻译。

当时，钦达门阿爸还健在，但他的老伴已经去世。

在钦达门家里，钦说："见到乌兰其力格（邵乔海的蒙古名字，意思是"红军"）回来，真高兴"。

乔海说："我回来得太晚了，阿尕（钦的老伴）在的时候，就该回来"。

我在为乔海翻译这句话时，怎么也控制不住，失态落泪。结果，引得全屋的人，包括钦达门阿爸，包括钦达门阿爸的儿女们，都哭成一片。

相关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

http://blog.163.com/xiexq_1951@126/blog/static/16165854320139215325219/

海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



我的知青岁月

徐进昌 来源：公众号“文明与本能”



锡林郭勒日报

我的知青岁月

徐进昌

徐进昌

在知青岁月，我由两位牧民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位牧民都是乌珠穆沁草原阿尔山宝力格大队深受敬重的人。奥托斯楞是经营良种畜的能手；劳布僧是大队长，是个有威望的带头人。

1967年的冬天，白雪皑皑，冰封千里。莽莽苍苍的乌珠穆沁草原，迎来了一支城里的学生队伍。学生们接受再教育，插队作牧民，带来了一股浓浓的青春活力和蓬勃的气息。

当得知知青车队到来，牧民马队奔驰而来迎接。大队原本安排知青们住在大队部，等春暖花开再安排放牧。但学生们决心早下去放牧，早接受锻炼。牧民们既担心又高兴，各个组带包的牧民，冒着风雪把知青接到自己的浩特，在自己的蒙古包旁就近为知青扎起了蒙古包。

大队已经为知青准备好了行头，给知青作了全副武装。皮袄、皮裤、皮帽子、毡疙达，人人一匹乘马。白茬皮袄成了百里牧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谢小庆按：徐进昌同志的这篇回忆刊登于2021年11月3日出版的《锡林郭勒日报》的第3版。徐进昌是1967年11月与我一道插队落户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的知青。我们不在一个大队，我在额仁高比大队，他在阿尔山宝力格大队。

在知青岁月，我由两位牧民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位牧民都是大队深受尊重的人。奥托斯楞是经营良种畜的能手。劳布僧是大队长，是个有威望的带头人。

1967年的冬天，白雪皑皑，冰封千里。莽莽苍苍的乌珠穆沁草原，迎来了一支城里的学生队伍。接受再教育，

插队作牧民，带来了一股浓浓的青春活力和蓬勃的气息。

当知青车队到来，牧民马队就奔驰迎接而来。大队原本安排知青们住在大队部，等春暖花开再安排放牧。学生们决心早下去放牧，早接受锻炼。牧民既担心又高兴，各个组带包的牧民，冒着风雪把知青接到自己的浩特，在自己的蒙古包就近为知青扎起了蒙古包。

大队已经为知青准备好了行头，对知青作了全幅武装。皮袄、皮裤、皮帽子、毡嘎达，人人一匹乘马。白茬皮袄成了百里牧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跨上马背是学当牧民的第一道考题。许多知青都有着摔下马的经历。生龙活虎的马背，不会让人没有几分胆怯。这第一道关一段时间以后总算闯了过去，庆幸我们队也没有一个被摔伤的。

一个夏季的晚上，我骑着马，挎着一匹马，带着铁锨，去井边饮马。附近传来马群的嘶鸣，我牵着的马兴奋起来，挣扎着向前奔驰，铁锨碰到骑马，骑马也狂奔起来。不知怎样摔下马来，也不知马都跑到哪里。摔晕了。第二天，牧民找来我的马。马鞍子想必也摔坏了。牧民一声不响，为我打理一切。心里好不温暖！牧人的心胸比草原还大，牧人的心地比金子还亮。

我插队的阿拉山宝力格大队三十几户人家，一百多平方公里的草地，二万多只牛羊，二、三百匹马，日子过的还算不错。每个组五六户人家，经营着三群羊，两群牛。牲畜是集体的，大家放牧劳动记工分，互助合作，其乐融融。

大队党支部有六个党员，是阿拉山宝力格草原的一面旗帜。书记帕嘎和劳布僧是一文一武的搭配，成为牧民群众的主心骨。1971年我光荣入党，成为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帕嘎、劳布僧是大队的带头人。

在阿拉山宝力格，没有年轻人喝酒，更没有游手好闲的。党员们带头，关心两户困难一些的牧户，牧民人人勤奋自力，民风淳厚。数年来从没有出现牧民打架的，群众把打人视为恶行。因为喝酒伤害过人，所以多年来一律禁止青少年喝酒，整个队也少见喝酒的。这真是个难以置信的事。草地上的牧马人居然会是不喝酒的！所以，我们队的知青跟着牧民，学习牧民，也没有一个打架的，喝酒的，个个都是生产上的骨干。

在牧民的培养下，呵护下，知青们学习蒙古语，学习蒙古包生活，学习放羊，放马，成为放牧的能手，成为马背上的骄子。与牧民朝夕相处，在草原学会放牧，摔跤，走敖特尔，作毛毡，驯生马，走“阿音”，在牧民的熏陶下，成为展翅草原的雄鹰。

这片草原曾经深遭受土匪的祸患。梅毒病也曾肆虐。牧民的生产、生活都曾苦不堪言。出生的孩子也多有夭折。家中有孩子都可以称得上是幸运。1947年得解放，有了党的领导。奴隶得解放。各个蒙古包都插着五星红旗，户户牧民家都挂着毛主席像。

大队年年都有发展，牧民生活不断提高。每年年终分红，一个工可以分到一元七、八，生活无忧，信心满满。

后来，城里机关单位到队里招工，都没有知青想离开。有的为了完成招工任务要走，还会痛苦流涕，伤心牧民没有留住自己。许多知青都有牧民给起的名字，兄弟姐妹一般，和牧民早成了一家人。

知青包开始都跟随牧民的包，接受指导。那木和阿爸就是三组知青的带包人。奥托斯楞阿嬢是三组的党员。后来，知青为了强化锻炼，进一步与牧民拉近，有的住进了牧民家里。我们三组的知青包是与那木和阿爸一个浩特。我们这个组，还有嘎拉曾、巴代阿佳、通嘎额吉、朝格加布四家。

奥托斯楞阿嬢是大队的种公畜饲养户，一个群牵动着大队的二十个群和全队畜牧的长远发展。草原上条件有限，养好种公畜，着实难！担子重，责任大，共产党员走在前。种公畜由奥托斯楞阿嬢经营，是大家最放心的。一群种羊，一匹洋马，总是远离大部队，独处单养，享受精心照料。犹如蛟龙般的洋马，油光发亮，傲立草原，让人赞不绝口。

种公畜和良种的培育是大队前行的方向，作为共产党员的奥托斯楞承担着草原畜牧发展的希望。她默默无闻地坚持着，难有成果的一年又一年。

有觉悟的人经得起各种挑战，耐得住寂寞，经得起孤单，担得起重托。乌珠穆沁品种在优化，引进品种在前行。小洋马的诞生很是亮眼。



奥托斯楞阿嬢住进边境地区的时候，我在阿嬢家放羊。那年，遭遇罕见的暴风雪。阿尔山宝力格草原上百里雪地，断绝了行人。马匹都已经无能为力，只有骆驼勉强可以闯关。大灾面前，奥托斯楞红颜不让须眉，她驾着车，我们一起闯过了茫茫雪海，筹集了必须生产生活用品。好个牧人的刚毅果断闯关精神，让人叹服！

在生活上阿嬢细致周到。秋天里，她收集短茬羊皮熏制，商量本组的巴代阿佳给我缝制了熏制的德勒。还特别讲究，指着几个针眼说，这是没缝好的。非常善意，惴惴的告知，这活没有做绝！阿尔山宝力格的牧人，蒙古族游牧者，有着草原一样的情怀，一句话可以温暖半年的冰雪严寒！

奥托斯楞额吉98岁走了。她95岁的时候亲朋好友为她贺寿。老人家把四万多元钱捐送给乌里亚斯太镇的环卫工人。胸怀共产党人的志向，彰显了阿尔山宝力格草原人的高风亮节。作为在阿尔山宝力格生活八年的知青，作为在知青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牧人，衷心地对那片草地，对那里的牧民，说一声谢谢！



徐进昌回到草原看望奥托色楞额吉

和奥托斯楞额吉的交情，永难忘记。后来，我到旗里和盟里工作，也几次回大队看望。在我有了孙子的时候，额吉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仍然惦记着给孩子缝制了件蒙古袍送来。情意深深扎了下根。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已有了五十年党龄。记忆草原上的牧民党员，深深地感到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不忘初心，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草地扎根成长，镰刀锤头的旗帜永远鲜亮！

2021、6、5



徐进昌（左）与谢小庆（2017年2月）

****

文明，带来进步，带来更好的生活，也带来对自由的压抑，带来对天性和本能的束缚。科技进步为自由的文明提供了可能。我们仍需思考：构建怎样的文明可在维系共存生活的同时使人获得最大的自由？在追求文明的同时如何追求身心的舒展？如何避免对本能的不必要压抑？怎样成为文明社会中的自由人？

本公众号二维码中间的头像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晚年的主要观点是：文明的进步带来对人的本能的压抑，对自由的束缚，也因此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更多的抑郁，更多的精神心理疾患。今天，公共场所不能抽烟，公路上不允许飙车……这些对自由的限制是文明生活所必须。但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婚勿生…这些也是必要的吗？

本公众号试图探讨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

1、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文明？

2、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人生？

让我们共同探讨吧。请长按或扫一扫下面的二维码关注本公众号：



海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0

一百五十岁

2001年秋天，我们三个人都走进了五十岁。

我跟德芳从小朋友加邻居，阿南是德芳的同班同学。还在十几岁的时候起，我们三个就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那年，我们三人与家乡的老三届知青一起踏上了北去的路，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金宝屯胜利农场。我们被分在距场部最远的四站。

刚去那阵，站里把不多的几间瓦房分配给我们浙江青年居住，三、四个人一间，我们三人当然住一间。在那个“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里，我们有时整夜不睡觉，天南海北地神聊，直到晨光刷白了我们的窗；我们曾经一起钻进黄昏茂密的青纱帐，寻一叶小草，模仿小鸟动听的欢叫；我们一同去哈尔滨、齐齐哈尔游玩，归来才知道，寝室起火，把我们的饭菜票都烧光了，可我们仍然笑着……。夏日的夜晚，营区内时而飘散一曲《敖包相会》，那一定是阿南在弹她那把漂亮的凤凰琴；冬天，我们就着温暖的炉火，共读那本难得到手的苏联小说《勇敢》；有时，德芳会亮开她的“大洋嗓”放声高歌，留神一听，可以听出她那架《三套车》已经一路奔驰，从冰雪遮盖的伏尔加河跑（跑调）到了科尔沁草原上。

内蒙离家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三人却相依着在那里撑起了另一个家。三个人中德芳有主见、肯吃苦，有力气；阿南可谓是足智多谋，小脑筋一转就是一个好主意，是我们的智多星；我没有别的特长，只是比较勤恳，而且做得一手好饭菜。因此一般由她们俩“主外”，我“主内”。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发生争执。比如，长时间没有好吃的了，她们决定要去弄点黄瓜、西红柿之类的蔬菜或水果，她们也向往过象男生们那样尝尝鸡鸭的味道，可是毕竟女孩，受自然条件限制。而我总觉这种事情非读书人所应为，不但不肯同去，不时还要嘀咕几句。但东西弄来了，我与她们一样吃得津津有味。为此，常常要受到她俩的奚落和取笑，被她们攻击为“书生气。

那年冬天，为了解决吃水问题，她俩又决定去弄个缸来。白天，阿南已经侦察到食堂后面有一口空缸。晚饭后，她们俩兴奋地在外屋角落挖坑，我嘴上虽不敢多说，却是满肚子的文章，被德芳抢白一顿，无奈何成了鸭子，被“逼”着上了架。

深更半夜，大雪铺就了世界的洁白与宁静，月光又将它装点得象梦里。我和德芳抬着那口半人高的缸，趔趄

着，走几步，放一放，说几句，又吃吃地笑一阵。阿南一脸的正经，拖着一根树枝边走边划来划去地“断后”，说是为了消除足迹。她头上戴的棉帽一个帽耳朵耷拉着，忽忽悠悠，活像《林海雪原》里的“小炉匠”，引得我和德芳差一点笑倒在雪地里。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第二年年初，上面就要将我们重新编队，说是为了更有利于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瓦房住不成了不说，我们三人被分开编在了不同的连队，分别与天津的、当地的知青一起住进了潮湿低矮的土屋，十几个人一铺土炕。虽然还是同在四站，早晚也仍能见面，但分手前我们还是大哭一场。

农场的劳动是繁重的，尤其是夏锄季节。一次薅谷子，中午收工，我从地里直起腰来，又热又渴，两眼一黑，晕倒在大田里。人们七手八脚将我用毛驴车拉回宿舍。德芳和阿南得到消息，中午的毒日头下，两个人一前一后，老远就泪眼婆娑地来迎我。我心里一热，眼泪终于没能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在那段日子里，虽然离家万里，劳动是那么艰辛，生活又十分清苦，但因为三人相伴着，冲淡了多少孤独、迷惘和委屈。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是那么亲切，那么温馨。

不久，我被调到场部政工组做宣传报导工作，阿南调到四站的后勤，七二年德芳上学，我们三个被真的分开。更严峻的是七四年十月初，我接到了浙江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临走前夜，天飘起大雪。当时因为原来担任场部广播员的天津知青已经返城，我又兼着广播员的工作。冰天雪地里，在农场广播室的小炕上，我与阿南相拥着整整哭了一夜。自德芳走后，我与阿南虽然相隔二、三十里，但可以经常见面。十天一次的休息日，有时她赶着毛驴车来看我，有时我搭便车去看她，每次她给我带点鸡蛋，我给她捎些糕点，无论是她来或是我去，都象回家一样的高兴，我们之间已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可是这回，我也要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她怎么办呢？而且我门俩心里都清楚，这一别，意味着我俩从此将面临不一样的人生。一想到我走了后她再来场部时人去楼空的感觉，休息日她也再不可能有我去“探亲”的盼望，我便泣不成声。一种牵肠挂肚的的巨大痛苦，淹没了我刚接到通知书时的那份喜悦，我矛盾极了。她一边哭一边说：“你放心走，你必须走的。”我说：“我们一起来的，我不能将你一个人扔下，我们一起走吧。”“可是我上哪里去呢？”窗外是纷纷扬扬的大雪，冰冷的小屋里，两个相依为命的女孩为着明天的分手那么无奈、无助地抱头哭泣，一直到天亮。多少年了，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仍难以抑制地潸然泪下。……

我走的当年，阿南从内蒙回到了家乡，后来她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安定的家；德芳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工作，在那里生下了她的儿子后，也调回了家乡；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另一个城市，我们毕竟还是分手了。而且，因为各自都忙，见面的机会不多，可是互相之间总是放不下那份牵挂，一旦三人相聚，仍是当年那份亲切。

还记得，小时候的夏夜，我们三个并排躺在陈家墙门天井里的板床上乘凉，面对繁星点点的夜空，三个女孩曾经神往：“我们以后永远不分开，一直到老。”可是，没有过多久，生活就告诉我们，那不过是小孩子天真烂漫的

幻想。但是，今生今世，是命运，是缘分，确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烙下了共同的印记。这里我想借用我们小时候写信时常说的一句话：愿我们之间的情谊长青！

以此作为我们共同的五十岁的祝贺。

2006-02-14

江南雨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49

下乡时的伙伴

长青媳妇，已经记不清她的姓名了。

我下乡时，长青还没娶媳妇，和他母亲住在一个中农大院里，他家过去可能是富裕人家，长青念书能念到初中。文革后长青返乡种地，虽孤儿寡母，但是家里没有多余的嘴，生活也可以。长青的母亲很会收拾，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长青也一表人才，不久就说了个媳妇。长青结婚那天，我们知识青年全体九人过去吃喜宴，随礼是一套毛选四卷。第一次见识乡下的婚礼很是热闹，虽然喜宴不过是一碗面了事。

新婚第二年，长青媳妇生了个女儿，过满月又热闹一次，长青的母亲还把我们知青中的一个男生认作孩子的义父。

长青命不长，我们返城没多久，他就因挖土垫圈时土方塌下击中他的头部就去世了，留下孤儿寡母和媳妇。

长青媳妇撑着这个家不容易，头发过早花白了，但衣服还是整整齐齐，有她婆婆那时的印记。

村里虽然修了简易水塔，不用从井里搅水了，但是水管没有通到各家，必须到公用水管去担水。

何生泰，当年就是个很直爽的小伙子，我下乡时比较喜欢他。他出身富农，一直吃不开。

我下乡的时候，他父亲在犁地时，对大队传达的形势报告说苏修要侵略中国，不知与村里一个回乡知识青年说了什么，那个回乡知识青年将此事汇报给村上和大队，定性他父亲盼望苏修来了变天，开了他父亲的斗争会。他父亲一时想不开，一天夜里跑到村对面“阴半个”的饲养室上吊了。“当时，我劝过他，人就是关在监狱里，还不是活着吗。”生泰说起此事，恍然如昨日。

生泰为人公正，于是在村里被一再请出山，当了十年队长。“那时，队长一年的补贴才250元，忙着开会、学习、招待上面来的干部，误工不说，贴赔的柴火粮食也不说，一到收农业税费，才难过呢，得罪人，且两头受气。

不像现在的村干部，不收农业税了，干部补贴不少，手里还掌管着退耕还林的退耕费。村民都求着他。”

当了几年队长的生泰看法果不一般。他谈到，过去把牛羊赶在山上可以随便放牧，现在不行了，有《森林法》呢，捉住你就可依法办你呢——也说明法制的威力大于教育吧。

生泰养了三头奶牛，每年都能下一犊，卖掉可获五千元。奶牛一天挤三次奶，约五十斤，五里外的西沟口每天早上有收牛奶的，每斤收购价七角钱，每天收入三四十元，也很可观。生泰说，养奶牛不用买饲料，就用老办法——青饲料加玉米就行。

随着这几年的退耕还林，村里可耕种的土地少了，每个人平均还有七亩多地，但是粮食的总产比过去高了。现在农活也比过去轻松多了。过去施农家肥，主要靠垫牲口圈起粪肥，很吃力。现在主要靠化肥，他一年买化肥要四十多袋呢。但是粮食价低，卖不了几个钱。村里的年轻人在村里呆不住，多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生泰有两个儿子。长子书没念几年，在戏校学了几年器乐，在剧团收益不好，只好在外地打工，做普工。长媳在拉萨做饮食，“心大着呢”——生泰媳妇说。老二两口子，在凤翔做工，留一个小女在生泰身边，缠得他很紧。

长有媳妇，名字也记不得了，是大队杨支书的女儿，嫁到我们村的。

长有在村里的诨名叫“搿山”，当地话是莽撞的意思，他自小没了母亲，和父亲一起凄惶度日——农村家中没有女人的日子可以想象到。长青的父亲诨号叫“蒙古”，起因他年轻时曾当过傅作义的兵在蒙古驻扎过。“蒙古”当过兵，虽然穿着很邋遢，但他性情直爽，身子板好，有力气，就攒下钱早早就给儿子说下媳妇。农村定媳妇那是要用钱说话的。

“蒙古”弟兄几个土改时定为富农，杨支书的女儿嫁给长有——其貌不扬不说，成分又高，我们觉得很不般配。但是杨支书还是把女儿嫁给了长有，虽然那时讲“路线”讲“成份”，但是乡里更是讲信用，杨支书用了“蒙古”的钱就得把女子嫁过去。

没料到长有结婚后日子过得还可以，小两口虽然常有些小打小闹，像孩子般（估计小两口为了结婚都虚报了年龄），但是逐渐把家打扮成家的摸样，“蒙古”脸上都有了笑容。不幸的是前几年长有的农用车出了事故，长有离开了人世，我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对任何事都无所谓的乐呵呵的“搿山”，只见到未亡人长有的媳妇在苦苦撑着那个家。

2011-10-07



我也有过自留畜

那时节确实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记得初到草原，我被派去看秋季草场，就同一个叫矮了巴的牧民住在一个蒙古包里，每天的任务就是看守打下来的草垛并为大车装草。那矮了巴没有鼻子，是因为当年风流病（梅毒）所至，从正面就能看到鼻腔内部，西西：）所以他说话就没有鼻腔共鸣，什么时候听着都象是得了伤风。他会说两句不太听得懂的汉话，比如说：“羊皮式。”就是“羊皮子”的意思。我们俩在一起的生活很闲散，没有大车来的时候就没了事情可作。他就拉我到山坡上抓旱獭子。在草山，由于很少有人或牲口到那里，旱獭子就特别多，那东西长得十分可爱，总爱站起身来蹲在洞口，露出两颗白白的门牙，将两只小手抱在胸前“吱吱”地叫。秋天的它们都生得很胖，毛皮也是最好的，蹲在那里的样子就向是一尊胖佛。所以牧民有个谜语形容它：象佛爷一样坐着，瞪着启明星般的眼睛，披上万根海骝色毛发，将家安在错误的地方。（对不起，这是我的直译，因为我只会说蒙语的这个谜语，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吧？）最后一句的意思是，牧民通常那家总是安在山坡向阳背风的山南坡，而旱獭却奇怪地安在背阴的被坡上。这小东西的皮公社收购，你用大拇指逆着毛向里一插，毛长超过指甲的就能卖到四元。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四元就是一块上好的茶砖啊！所以，牧民就用它来补贴家用。

抓法也容易。先用五股细铁丝做成一个活套儿，就象人上吊用的那种，在套的另一头绑上个木头楔子。然后找到旱獭的洞口，将木楔钉在洞口的上方，让套子正好张开在洞口上。要知道，旱獭是头小肚子大，它出洞的时候脑袋就进入了套子，可肚子却留在了套子外边。它越着急，套子就勒得越紧，它又不会倒退，只会转身向回跑，这下就更糟，反而把屁股留在了洞外动弹不得。我和矮了巴每天两次巡视他放置的三百个铁丝套子，总会有二三十旱獭被抓住的。牧民通常不会吃旱獭肉，他们认为那东西会有传人病。我试着吃过，有点怪味儿，象马肉。但据说，在解放前，穷人就用它充饥。矮了巴就将它们剥皮，然后让我拿到公社去卖。你可能又不信了。在草原上，牧人通常不太会数数的。会数数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所以每年数羊都是个技术活儿，都得知青来干。矮了巴大哥在这方面更差，他不知道这些旱獭皮能值多少钱，就对我说出卖了皮子后需要采购回来的东西，然后剩下的钱就是我的“劳务费”，他通常说：“一个太阳，两条海河，一个二了锅头，三个红糖……”他真的是太爱表现自己的汉话了，但他不知道自己说得有多可笑。我到公社将皮子一卖，仅仅用钱的零头就将他要的所有东西买回了，我就给自己卖点月饼和文具信纸邮票之类的，然后将剩下的钱还给他。他吃惊地看着钱，说：“太多，太多，你一个，我一

个！”他不会将钱分为两半然后给我一半，却总是象发扑克牌一样一人一张地发。好象只有这样才公平。没想到，这事就被知青们知道了，大家很为我的思想意识变化担忧，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道路的开始，应该斗私批修。当然，大家都是好意，没有谁是怀有私念地想坏你，都很真诚。就开了小会，通报了这事儿，向我提出了批评。后来我就再也不敢要矮了巴大哥的钱了，自己也觉得确实是个问题，应该改正的。

可是，草原上的政策真的就象草原上的天气，变化无穷。今天左点儿，明天又右点儿。今天劃一次阶级，这一家也许被劃作下中牧，可下一次就可能劃作富牧了！不知道是哪一年了，突然人人都分了些自留畜。我好象也分到了几只羊。可我是放马的，又不能将羊与马群同放，就将那些羊留在了一个牧民的羊群里，想着到下一年秋天它们肥了的时候再杀来吃。结果是，一过几年，我把它们全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有一天，那牧民见到我，说：“纳格齐勒格（我的蒙古名字），你的羊什么时候吃？”我才想起来，就问：“有几只？”他说：“三十！”我的天啊，怎么会？原来，我的羊是母羊，当年分给我的如果是六只，第二年就会变成１５只，因为它们可能生双羔。几年之后变成三十只还算是少的哩！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牧主了！我就说，我就要我原来的六只，其余的不要了。

1972年冬天，我决定离开草原到西藏工作。但当时没有汽车，只好搭乘一辆前来打黄羊的卡车。那司机很不好说话，说破了嘴皮他也不肯拉我，说是头年他的一个同事就拉过四个女知青，结果到地方的时候再叫那四个闺女，全没了动静，原来是抱在一起成了冰砣！可我回家心切，一定要走，立下了生死文书。最后，他开始松动了，但表示希望能给自己搞两头羊。我这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有点“财产”的呀，就到那个牧民家拉上了两头大羊，给了那司机，算是活着的汽车票吧，西西，离开了草原……

老笨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

牧主子弟

乌珠穆沁的女儿不外嫁，锦达兄说的不错，牧民间盘根错节，亲套亲，兴安队与呼吉图是近邻，那些年两队较着劲，一是争草场，二是斗富。论牲畜数量总是呼吉图占优，生活水准平分秋色，兴安队的牧民干净、会过是不争的事实。两个队既是冤家又是亲家，息息相关往来密切。

锦达的另一篇博文《假冒喇嘛引出一户牧民的经历》让我想起了前些年我队牧民苏那木的儿子，吐门高力涛来北京看病一事。牧民们相信锦达，一来他是医药界的专家，人脉广，更重要的是他对牧民有着一颗超乎寻常的热心。在锦达的带领下，兴安知青倾巢而出，有为小孩联系医院的，有让他们住到家里的，三四岁的孩子住在友谊医院两个多月，总算痊愈而归，吐门高力涛的媳妇就一直住在一位女知青家里。我领着吐门高力涛夫妇在世界公园玩了一天，照了不少相片，没想到竟成绝唱，孩子病好了，他年轻的媳妇回去的第二年突然离开了人世。

吐门高力涛媳妇是兴安队小吾日塔的妹妹，看到锦达的博文我才想起，吐门高力涛的母亲就是兴安队萨木斯愣的亲姐姐。

话说解放前萨木斯愣的大伯和叔叔为逃兵役，一个真喇嘛一个假喇嘛，跑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含辛茹苦抚养大萨木姐俩，萨木斯愣成家立业，成长为优秀的队干部是后话，他大姐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想必一家人穷怕了，嫁给了呼吉图大队最富有的牧主子弟苏那木。

1968年8月我们到呼吉图插队后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在批斗会上，苏那木的父亲、母亲作为牧主悉数上场，他的亲叔叔，彦吉嘎庙的上层喇嘛朝鲁孟更是首当其冲。据说朝鲁孟在庙里的职位最高，文革中对上层喇嘛的批斗也让人匪夷所思。

私下里有牧民偷偷向我们说起了朝鲁孟的过去。在草原上大喇嘛一度是有权有势的特权阶层，朝鲁孟是个喜欢拈花惹草的花喇嘛，那些年，他看上了谁，去他家，主人就得好吃好喝好招待，让出睡觉的地方。

僧侣们找性伴侣古今中外也是常有的事，外国的大主教们时不时曝出私生子的丑闻。被冠以“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第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娶妻生子，人前是大师，人背后过着凡人的正常夫妻生活。莫非古往今来的圣人都

是做给别人看的，圣经都是念给别人听的？

牧民家的蒙古包如白蘑一样浑圆洁白，门前摆着一长串牛车，牛羊成群，奶豆腐、手把肉、奶茶应有尽有。苏那木等牧主家的蒙古包是黑色的，毡子上打着补丁，包外只有一两辆残破的勒勒车，全家没有一根牲口毛，一家十来口挤在一个蒙古包里，我去他家看过病，牢牢记住了牧主家的脏、破、穷、黑暗。

大队里的鞭杆子全由牧主子弟掌握着，赶大车在牧区是桩苦差事，只有出车才给记几个工分，平时饲养大车马费时费力几乎挣不到钱，牧主子弟们尽心尽力把大车马养的膘肥体胖，看他们赶大车，装冬储草真是一种享受。知青们把草胡乱挑上大车，车老板在上面码放整齐，一车青草方方正正，把辕马的身子都罩住了。

后来知青们自己赶了大车，才知道其中的甘苦，饲养大车马费力不讨好，知青车老板把马养的如刀螂一样骨瘦如柴，知青们装的草车上上下下圆咕隆咚，走不出二里地就会散架。

牧主子弟们在贫穷和歧视下度日如年，偏偏祸不单行，一场噩梦更是雪上加霜。请看拙作《为了你走遍草原》里的片断：

幽默善良、心胸宽广、与世无争的大车把式希日布，并没因他的善良得到好报，相反，他做梦也没想到老老实实赶大车竟然祸从天降。

这天，希日布拉着一车牧民和知青，赶着大车从公社买粮回家的路上，边赶车边用蒙语高声唱着革命歌曲。

“毛主席著作像太阳，字字句句闪金光，照得战士心里亮工作学习有方向……”恰逢一只野兔子从大车前跑过，他正巧唱到第二段“毛主席著作像......”顺口接着唱“野兔子”。

坐在大车上的孙满福大吼一声：“好呀！你个希日布，你敢说毛主席著作是野兔子！”

歌声突然中断了，过了一会儿，希日布强打起精神，沙哑地拖着长音又唱了起来。“毛主席著作像太阳……”从他那龇着牙的嘴里迸出的已经不是歌声，而是越来越刺耳的狼嗥。

“希日布，牧主子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孙满福坐在大车上一字一顿口中念念有词，说完将他那张不饶人的嘴巴微微一撇，嘴角竟漾起了一丝笑意。

看到孙满福变了脸，一副认真的样子，希日布自知口误闯了大祸，一个劲央求孙满福：“孙大哥，我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哪敢瞎唱呀，正好赶上那只兔子，钟伟明，钟大夫在车上，他能作证，钟大夫，你快给我求求情，钟……”

希日布的哀求丝毫没能感动孙满福，这个该死的汉人一下车立即到大队部告了状。

“文化大革命”中胆敢辱骂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胆大包天罪该万死！何况还是个牧主子弟。孙满福的话音未落，几个北京知青冲出了办公室，一把将希日布揪下大车，不待他辩解，苏铁伸出双手，一个如雷贯耳，打得希日布两眼冒金花，不等阶级敌人缓过劲来，要武一个猛虎扑食，将希日布扑倒在地，几个身强力壮的老红卫兵冲上去一阵拳打脚踢，希日布立刻口鼻出血，趴在地上不知所措。

这正是苏那木在文革中一段真实的经历。我写作时犯了难，苏那木篡改的那段歌词实在不雅，难以启口。拙作上“毛主席著作像......野兔子”，实际他唱的是“毛主席著作像......大J-B”。

苏那木让知青们暴揍一顿，被打得七窍出血，牧主子弟兼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的批斗会他就不光是看客，而是与他的父亲、母亲、叔叔一起挨打挨骂了。

苏那木的媳妇也挨过斗，她眉头微蹙，一语不发，怎么看都不像面目狰狞獐头鼠目的阶级敌人，不，她原来美极了，皮肤白皙，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身材苗条，面容清秀，长长的黑发，尽管身穿破烂不堪的蒙古袍，都难掩盖她的与众不同。

看了锦达的博文让我茅塞顿开，原来她出身贫寒，来自巴林右旗，难道这就是她与别的牧民妇女不一样的原因？牧民妇女大都晒得黝黑，她却天生丽质。她永远沉默不语，无奈而又绝望地望着这个疯狂的世界。看着丈夫挨打挨骂，任人宰割，自己却无能为力，她此时的心情与圣母玛利亚看着自己的儿子耶稣惨遭涂毒何其相似。

应该立一尊名曰“文革受难者”的雕像。无数地富反坏右所谓的黑五类被打的伤痕累累，奄奄一息，美丽的妻子、慈祥的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悲哀，四周是欢呼的人群。遗憾的是不要说雕像，如果有人提起文革似乎都是大逆不道。知青们很少提起这样的一幕一幕，牧民们也从来不说。

一天晚上，在乌力吉家召开小型批斗会，北京男知青王某人叫骂着，见苏那木低头不语，不禁恶从胆边生，想想毛主席的教导，他义愤填膺，顺手抄起在火炉边的铁熨斗。在牧区插过队的知青都知道，牧民家的熨斗有个长长的柄，熨斗是个小小的三角型实心铁，一个大小伙子抡起来威力可想而知。

王某人抡起来了，打下去了，扑哧一声，苏那木的头血流如注。

文革过后，我没听到“文革受难者”们任何报怨的话，牧主、富牧及其子弟们也从不说起文革前家庭的状况，放在今天叫“炫富”。

牧主富牧们曾经有成千上万的牛羊，数不尽的珠宝首饰，银鞍具，波斯地毯德国望远镜翡翠嘴烟袋，绫罗绸缎，雪白的蒙古包，抄家过后什么都没了。据说国家象征性地赔了一点点，牧主们好像都很知足，感激涕零。阿弥陀佛，不打不骂，能与大家平起平坐就皇恩浩荡了。

改革开放后，牧民们平分了大队的牲畜，所有人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其实有不少贫下牧民、队干部私下里养了自留畜，比牧主家庭的底子要厚实的多。

苏那木是文革中被整的最惨的牧主子弟，文革过后再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好在他的儿子吐门高力涛长大了，小伙子长的高高大大，极其聪明仁义，在队里口碑不错。天道酬勤，不几年的功夫，苏那木家的牲畜数量又在全大队名列前茅。而有几户贫下牧民家的牲畜，像被堵住了屁股眼，繁殖的不多，卖的不少，最后只得沦落为给新一代牧主家打工为生。

苏那木们永远不懂，为什么父辈辛辛苦苦，靠劳动，靠一代一代的积累，却背上了牧主的恶名，就该杀，该打，该抄家；为什么现在的富豪们靠权靠关系靠拼爹，就可以巧取豪夺一夜暴富富可敌国；过去的牧主是剥削，现在的权贵是功臣。

理论家们请不要再瞎白活什么舶来的邪恶理论，什么土生土长的思想，什么三个戴表四个戴表，钱放在别人兜里就是万恶的旧社会，就是剥削阶级，就是地主富农资本家；钱放在自己包里，放在皇子皇孙的包里就是红色接班人，就是特色，就是红色江山万年牢。

插队上山下乡纵有千般不好，这一桩好处我是记住了：认清了谁在撒谎。

我常常会想起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牧主子弟苏那木，在我没饭吃没茶喝的时候，他会把装好了炒米、奶渣子的碗递给我，轻声说：“米尼杜，切吾（我的兄弟，喝茶。）”

2011-09-28

冷明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92



【知青岁月】

（1）啊，勐龙河！

离我们连队十几公里的地方，有一条奔流的大河，刚到农场不久，我们就听到不少关于这条河的美丽的传说。当地的傣族说：古时候，天上有一条五彩的龙，为了寻找爱情，来到人间，卧在这块翡翠般的坝子上，不久就变成一条金色的河，这就是勐龙河。据说，小伙子如到河里去洗个澡，会变得更加英俊潇洒；姑娘如到河中去沐浴，将会更加眉目清秀。由于这些传说，更使我们常想去看看勐龙河—她那艳丽的丰采。

那时，我们刚到这里不久，对当时那种原始而笨重的劳动还没有适应，一天劳动下来，已经精疲力尽，躺在床上再也不想动弹。虽说军垦农场有星期天，但实际上那时的星期天是没有保证的，遇到农忙，或者其他什么事情，只要连长，指导员随便说一声，我们的休息天，便轻易地被取消了。有时万幸，难得遇上一天休息，还有一大堆很脏的衣服、鞋子，等着我们收拾。因此，尽管我们常想，但终究没能去勐龙河看一看。

记得，那是70年代的春节，也是我们到农场后的第一个春节，连里大部分知青，尤其是女生，都处在想家的悲悲切切之中，我与几个朋友却利用春节放假的机会，相约去了勐龙河。

那天一大早，我们从盘山的小路走出连队，不久，便走上了公路，两边就是著名的勐龙坝。我们在公路上走着，晨风，吹开了我们的衣襟，轻抚着我们被露水打湿的头发和脸庞，仿佛要抚平我们深藏在心中的思乡之情。公路两边平坝上的庄稼，长得郁郁葱葱，绿得令人心痛。傣家寨子的竹楼在平坝上的绿树丛中隐约可见，起伏的群山在远处勾勒出黛绿色的清晰的轮廓。面对如此秀美的大自然，两句著名的古诗油然涌上心头，“天涯何处无芳草，青山处处埋忠骨”。尽管我们少年离家，在这遥远的异乡，每天脸朝黄土背朝天地挖山不止，但天下如此开阔，我们相信，眼下的艰难一定会有尽头，我们今天奋斗，将来一定能有报酬的。我们在公路上匆匆地走着，就像我们还没泯灭的进取之心。

勐龙坝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蜿蜒在群山万壑之间，这条直通边境的公路与勐龙河平行地横卧在坝子上，一直延伸到境外。我们走下公路，穿过一大片水稻田，直向勐龙河。快到河边时，是一片茂密的甘蔗林，我们还没有走出蔗林，便听到汩汩的流水声。一出蔗林，哦！一条气势壮阔的大河便展现在眼前。这里静极了，静得扣人心弦，

只有风声和哗哗的流水声。我们脱掉鞋，沿着河边沙滩，朝着河的下游走去，任凭河水打湿我们的裤脚。绿得发蓝的勐龙河水不停地流着，那么从容，那么安然，我们默默地走着，谁也不愿打破这大自然的恬静。

突然，前面河流的拐弯处，出现了一个不断转动着的东西，走近一看，原是个一半浸在河水中，直径不小于五公尺的水轮。这套简单的机械装置，完全是用坚硬的优质木材做成的。它是那么的古老，也许古人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里就有它的篮图；它是如此的巧夺天工，精巧的如无缝的天衣。这是当地的傣族人制作的，是利用水力来榨糖的原始机械。

河水推动着水轮不停地转动，一个傣族老大爷正在将甘蔗塞进两个木制的大齿轮之间，他干得那么认真，黑色的包头布下古铜色的脸容那么壮严，当他发现我们几个陌生人的时候，只抬起那炯炯的眼光望了我们一下，便继续干他的活，仿佛我们并不存在，当那齿轮间塞进甘蔗的时候，水轮的转速便明显地变慢了，但那猛龙河水仍然默默地不懈地推动着水轮，那机械发出“喀吱吱……”的低沉响声。甘蔗从齿轮间经过，被压得扁扁的，留下了那甜美的甘蔗汁，把它放在锅里熬制，就变成了傣家特有的红糖。我们看得入了神，那河水如此不懈地工作，把甘美留给了人间，但愿我们在这里艰苦的劳作，也能像这河水不停地推动水轮一样，虽然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终能将一些甜美留给人间，留给这美丽的边陲。

这时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正中的天空。河对岸凤凰树上盛开的凤凰花分外夺目，红得像天边的朝霞；远处河边那著名的曼飞龙佛塔发出洁白而耀眼的光，那隋园形的塔身，充满着民族的风调；清澈见底的河面，在阳光下跳动着无数银色的光斑，美丽的勐龙河你真像那五彩的龙！你在祖国的西南边陲默默地流淌着，你是那么古老，而你那热情、挚着、不懈的进取之心，又证明你是何等的年青。尽管你那滚滚奔流，并没有全部造益于人间，但你终究是一条未被开发的处女河。

勐龙河，我在你身边生活了整整十年，我们将金子般的年华留在了你的身旁，你那浩荡的流水就像我们当年那如火的年华，但愿我们在那不算短的岁月中流下的血汗，不要像滚滚的河水那样默默地流掉，总该留些甜美在你身旁。

啊，勐龙河！你已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头，不知你现在该是如何的模样。

（2）*南疆一日*

清晨，一轮昏黄的太阳透过迷漫的大雾，把淡淡的阳光撒向这深山老林间的两排简陋的草房。近处，小鸟在蜿转动人地歌唱，一缕淡淡的炊烟从那小小的坝子上冉冉飘起，沉睡的深山老林，孕育着无限的生机。

我们几十个知青，来到这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安营扎寨，已经几十天了。我们要在这野兽出没的地方组建一个青年连队。当时由于大批新知青的涌到，老连队已经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我们奉命在这里建连，为的是迎接新的同伴。

今天是星期天，连里其他同伴，因为不堪平日的寂寞，不惜一周来的劳累仍然爬山涉水，走几十里地去小街，大勐龙赶集。我与指导员留在连里，从山外其他连队来了一些知青朋友，他们热爱静谧的大自然更甚于赶集，进山来陪伴我们消度这难得的休息天。

这时，我们正围着那袅袅炊烟的发源地——小坝子的土灶边。记得当时有人刚探亲回来，带来了这里罕见的美味。当时，利用探亲从家里带大量的食物，早已成了我们的惯律，要知道当时的兵团正处在急剧的膨胀之中，有些方面也无暇顾及，因此，我们经常处在断菜无油的生活之中。我们把大块的腊肉，整条的香肠和着卷面煮了一大锅，不知是谁拿出一瓶酒来，我们大伙乘着性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居然把它喝完了，酒足饭饱以后，我们大声地喧哗，高声地歌唱，歌声在山野中回荡。

这时，大雾逐渐散去，山坡上火红的木棉花，淡雪青的铁莉花开满了树梢，把葱茏的群山点缀的五彩缤纷，三月的西双版纳春意盎然。

我们陶醉于这迷人的山色之中，心里充满着无尽的遐思，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大胆而引人的建议：到这原始丛林里去看看。马上得到大家的附和。于是大家找出精致的傣家小刀，别在腰间；有人背起连队那杆唯一的老套筒步枪；大家都套上了长长的厚布袜子，这样可以防止森林中蛇和蚂蝗的侵袭。就这样，我们朝着这莽莽的原始森林进发了。

一走进森林，脚下便是一层厚厚的腐叶，软绵绵的富有弹性，空气中洋溢着一股由腐烂的枝叶发出的奇异而又浓烈的气息，几条小溪从山间石缝里蹦蹦跳跳地流过，发出叮咚的水声，使这古老的森林更显得神秘、幽静。我们一边走，一边用刀在大树上刻着痕迹，为的是回来时不至于迷失方向。一路上，这些遮天的大树，有的苍劲挺拔；有的像披头散发的恶魔，互相牵扯在一起，扭得难解难分；有的巨大的榕树粗看像一座森林，从它那巨大的树杈上垂下的一根根枝条插入地面，又长得像一棵棵大树。越往森林深处走，地面就越潮湿泥泞，我们在厚厚的腐叶层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身边常会出现这里才能见到的奇花异草。有的草本作物，叶子大的像个八仙桌面，开着大朵深色的花；有的树根尽像一垛蜿蜒的墙似地耸立着露出了地面，这是植物的板状根，这是在亚热带雨林中才有的巨大树种。

我们继续往前走，前面出现了陡坡。原来是一座被丛林覆盖着的大山，大家乘着游兴正浓，凭着年青健壮的体魄，一致赞同攀上顶峰去。刚上山坡，，前面就出现一片原始竹林，粗大的竹子横七竖八地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走在前面的同伴用砍刀奋力砍掉拦路的竹枝。我们猫着腰，从那竹篷间的空隙中弯弯绕绕地直向山顶。

离山头不远了，我们个个气喘嘘嘘，汗流浃背。

突然，前面峰顶清晰地出现了一个傣家竹楼式的小草棚。原来在这沉睡的丛林中，我们并不是第一批主人，那神秘的草棚，又强烈地吸引我们奋力攀登。

我们终于登上了那高高的山峰之颠，这里是另一番天地，山顶上开出了一块不大的开阔地，小竹楼就是就地取材所建，竹楼落成，一片小小的山顶广场便自然形成。这里的傣族每逢收获以后，就将成群结队的牛放进深山，直至第二年春耕，才将牛群引出深山。在此期间就任牛群自行觅食，栖息，这个傣家小竹楼便是放牧人栖息的地方，他们要在深山野岭中住几个月。从这竹楼边一直通向沟底的脚印，是放牧人背着竹筒到山沟底下取水时留下的，留在这陡峭的山坡上的一个挨着一个的脚印，是人类与自然顽强博斗的象征。

这里暂时并无主人，四周安然静谧极了，只有几只美丽的小鸟在欢快的歌唱，似乎在欢迎我们这批远方来的年青人，竹楼周围开着许多不知名的美丽的花。登上竹楼，俯瞰莽莽苍苍，奔腾起伏的群山万壑，白云在半山腰缭绕，一条如带的勐龙河在远处的坝子上闪闪发亮。

刚从潮湿阴暗的丛林中出来，看到如此辽阔壮观的景象，顿时觉得心旷神怡，路途的艰难、登山的劳累都抛向了九霄云外。

那天，我们从原路摸索回到连队，已是夕阳泯灭乱山中的时候了。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好多年了，但我总是不能忘却那遥远而美丽的南疆，尤其是这林中探险的一天。

2009-09-08

勐龙河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3

【知青岁月】：

（三）最初的旅途

（1）

公元1968年12月21日，这个日子我永远难忘。那天，我们乘上南下的列车，行程三千多公里，直下西南边陲，开始了我一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刻骨铭心的生涯。

经过长途的颠簸跋涉，火车在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驶进了昆明车站，简陋而陈旧的站台上空无一人。我们列队出站，当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还没有掀起，车站上的工作人员瞪着惊奇的眼睛默然无声地注视着我们。

车站广场上停着好多公交车，这些车子显然是为了接送我们而准备的。我们很快地上了车，车子驶过夜深人静的昆明街头，街面上空荡荡的，阒寂无声。车窗外昏黄的路灯、狭窄的街道、低矮而土黄的屋舍，恬静中边陲小城充满神秘。面对此情此景，心头涌上一阵难以言状的孤苦无援的凄惶。那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时隔那么多年，仍然记忆深刻。

当晚，我们就在昆明工学院“下榻”。睡得是地铺，只是在水泥地上铺上稻草，然后再铺上铺盖。从那时起，我们就领教了云南被子的短，常常会盖好了肩膀就露出脚。

那天，一切安置妥善，躺下睡觉时，已是凌晨时分了。天一亮，我们仍然硬撑着起来，到外面满街乱窜。工学院外面的马路两边都是整齐而直冲云霄的大树，昆明的街头分外冷落，街面上大都是二层楼的土木结构的旧房子，没有几家店铺开着门。因为我们刚离开大城市，初到这个边陲小城，觉得它分外僻静。我在农场待了两年后，回上海探亲再经过它时，却觉得它分外的繁华了，那是后话。

农场来接我们的人也来了，接我们去东风农场的是个叫竇明理的中年汉子，瘦削的脸，紫黑的脸膛上那端正的鼻梁分外显眼。

这次到昆明的共有一千个上海知青，分别前往版纳的两个农场：东风农场、勐腊农场。去勐腊的早我们一天离开昆明。于是，我们就能在昆明多停留一天，我们当时曾为此而着实地高兴了一番。

这天晚上，云南省委开欢迎会。省委干部、军代表、知青代表依次发言。后来才听人说起，代表我们发言的并不是同我们一起到云南的知青，好像是所谓“上海市中学红代会”的代表——金训华。就是后来死在黑龙江的，那个喊出当时著名口号“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特殊时代的弄潮儿。

（2）

1968年12月26日，一早，我们就在昆明工学院内编组上车，陈旧过时的公共汽车载着我们，解放牌卡车装着我们的行李，浩浩荡荡的车队从昆明大街上驶过。不久上了一条宽阔的公路，一直往南,驶向那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岁末的云南，完全没有寒冬腊月的气息。汽车在花岗石铺成的公路上活蹦乱跳、浑身乱颤地跑着，颠得我们浑身都要散了架。窗外天高气爽，万里无云，天蓝得纯净可爱，一览无遗的滇池在窗外闪过。

旅途上，每天只吃两顿；以后，我们到农场，每逢休息天也只吃两顿。那天，吃午饭在晋宁还是玉溪，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饭后上路不久，汽车就开始爬山。公路弯弯曲曲地盘山绕岭，下面就是悬崖峭壁，让我们胆颤心惊、惊叫不已。

黄昏时分，车队到达峨山，这是个极不起眼的古滇小镇。路边，一座低矮的楼房的门面上挂着峨山彝族自治州的木牌。我们到的时候，天还很亮，这里的实际时差比上海晚2个小时。我们在小镇上闲荡，镇上静悄悄的几乎没有闲人，街道弯曲而狭窄。在崇山峻岭的包围中，小镇分外宁静。

我们在公路边的饭馆里吃晚饭，这天，正好是“领袖”的生日，我们这些天涯沦落人也沾了光。晚饭八人一桌，每桌十来个菜，在当时，算够丰盛的了。离开上海已经有好多天了,大多数人都用贪婪目光盯着桌上的菜肴。突然，不知是谁，提议先要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大家随声附和。于是，在这边远山区的小饭馆里回荡起一遍遍“万寿无疆”的诈唬声，中世纪愚蠢的宗教狂热竟会如此相似地在现代中国重现。真值得社会学家认真研究，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严肃而认真地反思。更重要的是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是否已被铲除。可悲的是：当时,我们这些受过中等教育的学生，对这种情景一点也不觉得可笑，心里还有一种虔诚的情感，甚至，心头还爬上了一种我们城里人比乡巴佬文明进步的莫名其妙的感觉。因为，这种“仪式”在偏远农村当时反而还未出现，我们的诈唬声让接我们去农场的窦明理惊得目瞪口呆。

（3）

第二天,天没亮,我们就被催促着起了床。车子开动以后，我们一个个都还是睡眼惺松的。车窗外，天还是黑黢

黢的，汽车开着车灯在盘山公路上吃力地爬着坡，发动机的声音格外低沉。天渐渐地透亮了，山脚下腾起一股乳白色的大雾，慢慢地翻滚着，升腾着，越来越浓。从车窗里望出去，脚下是万倾云海，一轮血一样鲜红的太阳从云海里挣扎着喷薄而出，给群山万壑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大雾越来越浓，不停地翻滚着、升腾着，终于，汽车和我们都被大雾包围，我们就处在刚才还在我们脚下的云海之中了。这种大雾在内地从没见过，就像下着迷蒙蒙的细雨，隔不了几公尺就看不清东西。车在雾中开非常危险，尤其是在这盘山的险道上。汽车打开车前的破雾灯，不断地按着汽喇叭，慢慢地在雾中走着。这时，四周都被乳白色的大雾笼罩着，摇下车窗，只觉得无数细小的水珠扑面而来，清新的山风夹着雾珠抚弄着我们的脸庞、头发，面对此情此景，车箱里一片静默，只有汽车发动机在低沉的吼着，我们心头都充满了飘飘然、腾云驾雾之感。

我们从峨山出发时，按这里的规矩，没有吃过早饭。带队的说，“今天赶到元江才能吃饭，晚上到墨江才能住宿，今天是行程最长的一天。”将近中午，太阳才从浓雾中露出她那艳丽的脸庞，把酷热带给人间。汽车绕着“之”字形的山路，越爬越高，终于到了山顶。

探头望窗外,令人胆颤心惊。脚下谷底深不可测，一条大江像一条纤细的飘带在山脚下蜿蜒。九天之上，不知是哪位仙女那么悠闲自在，无意间将她的水袖只是那么随意地轻轻一抖，公路就像她那缥缈的水袖从山头飘荡着直落山脚。抬头望远，才知什么是“一览众山小”，远处奔腾起伏的群山层峦叠嶂，一直延绵到天边。

汽车沿着盘旋的公路来回穿梭，从山头到山脚大约走了半个小时。一到山脚，迎面就是一条水流湍急的大河，这就是著名的元江，流出国境便是红河。车过了元江大桥后，拐了一个大弯，前面就是一大片坪坝，元江镇就在这片坝子上。这里天气相对更加闷热，因为四面都是大山，热量不易散发。

在元江吃了饭后，马上又乘车出发了，那天，我们到了墨江才吃晚饭。还没到墨江时，带队的便告诉我们：那可是个穷地方，没什么东西吃的。现在想起，他那时说这个话，是有意与我们事先打招呼。

到了墨江，我们被安排在十字街口的一家旅馆里住宿。晚饭时，果然没有什么好吃的上桌，每桌一个菜，小半脸盆酸腌菜炒肉，有人在抱怨，我却胃口不错，这菜还是别有风味，至少油水不少。据说，当时这里连粮食都奇缺，但当天我们还是有足够米饭。只是，周围不时有衣衫不整的大人、孩子朝着桌上的饭菜投过来那种令人心惊的眼神。

（4）

昨天晚上到墨江的时侯，车队所有的车都停在靠近公路边的停车场里。今天一早，我们醒来后整好队从街中心的旅馆里出来，走了一段路，才上了车。

汽车离开墨江后，不久，又开始不断地爬山。公路顺着山势不断地蜿蜒向前，路上的汽车风驰电掣，你追我赶，掀起滚滚黄尘，让我们个个灰头土脸。翻越了通关的大山以后，汽车就开始一路下坡，路两边林木葱茏，公路仿佛从树丛里钻过，越往下树木就越发茂密，不断地有小股的清泉在公路边山谷里淙淙流过。快到普洱时，路两边古朴陈旧的农舍不时地从车窗外一闪而过，连山势也变得圆润起来。忽然，群山之间出现一个翡翠般的平静如镜的水库，在青山的簇拥下，湖光山色相映成趣。这时滇南重镇普洱也就到了。这时天色尚早，但领队决定不走了，今晚就宿这里。

我们很多人就住在街上一个陈旧的旅馆里，那旅馆好像是原来茶马古道上的旧驿站。大房间里放着很多床铺，只留下勉强可以过人的通道，房间的四周都是深褐色的板壁，窗户也是木板做的，没有玻璃，老式的木板窗开得大大的，空气很流通，采光也不错，房间里倒也很明亮。

经过这三天的一路颠簸，大家都躺在床上不想动弹。还是有人提出："普洱这地方，出普洱茶是十分有名的，是否到街上去看看。"

一踏上普洱镇那古朴破旧的街头，迎面好像真得扑来一股浓郁的普洱茶的气息。那曲曲弯弯的石板路两边，仅有的几家开着的店铺里，陈旧的柜台上所陈列的商品主要也只有茶叶，只是很少看到有买家。

（5）

第二天，我们从普洱出发，很快便到了思茅。思茅当时就是个地级市,它管辖着好几个州、县，但它却很小，只有一条百米长街。不过它是滇南好几条公路的交汇点，是滇南重要的交通枢纽，路上停了许多粘满了尘土的卡车、军车。我们还看到了从路上急驶而过的出国部队的车队，车上的军人都不佩带领章冒徽，穿着那种青灰色的制服。

我们在临街的一家饭馆里吃饭，大概由于领队事先没有联系好，饭馆里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饭菜来，只好分批吃，这下可就乱了套。饭馆里每端出一批饭菜，同伴们你争我夺，好不混乱，其中有一些人可能吃了两次以上。也不是由于饿，主要是由于年青人喜欢凑热闹，闹着玩，免不了其中有些人也为了某种发泄，才促成了这个小小的闹剧。到农场以后，我曾听好几个老四川知青说起，"你们在思茅抢饭吃，好不饿狼。"

这样，我们在思茅耽搁了较长时间，好在最后两天路途不长，山路也没有前两天的险，因而也耽误不了行程。

这天，我们宿在关坪，这可是个名符其实的小地方。这里根本没有像样的街道和商店，公路下只有几长排破旧的房子，这就是旅馆和仅此一家的小饭馆，还带有一个小卖部，只是几乎没有东西可卖。这里只有过往车辆上的人员在此食宿。

为了安排我们的晚饭。傍晚，小饭馆门口摆开了杀猪的架式，几个汉子用力将一头猪按在一条凳子上，临宰前的猪发出尖利的嘶嚎声，让艰难苦涩的旅途平添了一番情趣。这时不知是谁，偏要惹是生非，大声地喊道："大家快来看呵，杀回族人的祖宗啰。"于是发生了一场争吵，以后我们知道，当天出面抗争的同伴，就有以后成为团副政委的蔡家顺。

（6）

今天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是旅途的最后一天，汽车从关坪开出一个多小时后，山脚下又出现了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江，这就是著名的谰沧江。汽车急速地盘旋着下山，很快就到了江边，江两边是陡峭的群山，山上披着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灰蓝色的江水打着旋涡急速地流向远方。江面上横卧着一座色彩淡雅、结构精巧的大桥，这就是著名的允景洪澜沧江大桥。车队经过大桥，桥身发出微微的颤动，桥面上江风浩荡，四周景色如画，两岸黛绿色的群山透迤起伏，站在桥面上向下游的江面望去，江面越来越宽，远处与天溶为一体，变成了水天一色。

大自然古朴、雄浑，而江桥却是近代化的，桥头上站着几个持枪的边防军战士，桥两边的栏杆上还雕刻着美丽的孔雀花纹。

汽车一过江，马上就进了景洪城。那时的景洪还充满着田园风光，城中就有傣家的吊脚楼，街上过往的行人中有不少服饰艳丽的少数民族。整个城镇的风情格调与一路上的那些小镇迴然不同，连路上刮的风都充满了傣家的气息。

载着我们的车队在城中心的十字街口停了下来，但并没有让我们下车，经过领队们的一番临时商量，终于还是不敢让我们下车休整，大约是怕我们出乱子，车队马上又出发了。于是，我和景洪的初次相遇，只能隔着车窗匆匆而别。

从景洪城出发，汽车沿着一条宽阔笔直的大路疾驶前进，不久，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过了流沙河大桥。从这里开始，公路就变成了土路，由于路面即狭窄又坎坷不平，车速便明显的慢了下来。汽车穿过一些傣家村寨，绕过一座座种满橡胶树的山头，行驶了两个小时以后，终于，在中午以后进入了东风农场境内。

我们在靠近红卫一队的公路上停了下来，就地休息。公路两边的山都不是很高，山上的原始森林还未被砍伐，把公路遮蔽的阴森森的。透过树丛，我们看见一队的场地上树着两副简陋的篮球架，有几个人在场地上打着篮球。绕着这个不大的场地的四周，盖着几栋用土坯垒起来的房子，用石灰水刷白的墙，房顶上盖着青色的瓦。不时地还传来几声鸡鸣狗吠，给这山谷里带来了几分生气。

汽车在公路上继续停着,我们在公路上就这么闲站着。估计是领队的去通知分场：我们到了。或许，此时分场部正在布置如何欢迎我们呢。

终于通知我们上车出发了，一分场部离这里很近，很快便到了。靠近分场部的公路边有一座不伦不类的牌楼，上面用红色的油漆涂满了当时各式时新的口号。有一些人站在牌楼附近挥动着欢迎我们的小旗，有人胸前还挂着那种湖南的小鼓。我们的车一停，便听到“扑嗵，扑嗵”的鼓声乍起，欢迎我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还响起几下清脆的鞭炮声，这是农场为我们所举行的欢迎仪式，带有浓厚的农场色彩。

我们在分场部用餐。七、八个人，各自端着饭碗，蹲着围成圈，分食着放在中间的脸盆里的菜。我还记得，饭后每人手中吃饭的盆和勺都不用交还，算发给我们了。

吃完饭后，就有人宣布哪些人分在哪个生产队，本来我是分在八队的，一路上，我已与孙万慷他们混得很熟了，路上就说好，到农场后，尽量争取在一起。因此，宣布后，我并没有去八队，尽管八队离分场部最近，仅隔着一条小河，又是老队，条件较好，我还是自说自话地到了六队。

那天，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是1968年的最后第二天。就从那天起，我蒙蒙懵懵地一步跨入了成年。套用一句话“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那天起，就开始了十年漫长的知青生涯，也是我们人生的艰难起步，那是何等艰辛和苦难的起步，只有亲历者，才能知其中之味。那年，我十七岁。

2009-09-08

勐龙河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3



【知青岁月】：

（四）小河边的旧草房

一栋摇摇欲坠的旧草房背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流过，草房的后墙与小河之间长着茂密的杂草。

这是1968年底，我刚到东风农场红卫六队时住的房子。它歪歪斜斜、破破烂烂，在连队的最边上。草房的背后有一条小河，河的上游有一个叫曼甩的傣家寨子。我们住的房间离那条小河非常近，透过篾笆墙上的缝隙，能看到近在咫尺的河水在河床上慢悠悠地流淌。到了雨季，一阵滂沱大雨过后，河水暴涨，漫上岸来,几乎要侵袭我们那栋摇摇晃晃的草房。

这是全连最差的房子，我们知青没到的时候，这栋草房仅住着一家来自湖南的“盲流”，所谓“盲流”就是从湖南农村自己跑到这里来落户的人家。我们这批上海知青到了以后，才将这栋草房住满。

刚到连队的这一天，队里的领导就粗略地分配了知青的住处。当时的六队是个老连队，除了这栋旧草房以外，其余的都是砖瓦房。所谓的砖瓦房，也就是用土坯垒的墙，房顶上盖着瓦片的土房子。这种居住条件，在当时是属于上乘的,我们一部分男知青没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住进了那栋草房。

我、孙万慷、张信才分在同一房间，我们推开”咯吱”作响的竹笆门，走进房间，四面都是透风的篾笆墙，脚下是高低不平的泥地，靠墙放着三张木床，迎面的墙边在两张木床之间用新砍的竹子搭了个放箱子的架子。我们各自放下简单的行李，挂起了蚊帐，就算正式到了农场，安下了最初的家。

我们隔壁就是那家从湖南来的“盲流”，男当家姓瞿，我们都叫他老瞿，老瞿其实并不老，也就是三十出头吧，人矮矮的，但非常结实，女的姓丁，他们身边有两个女孩，家里一贫如洗。夫妻两人都是队里的临时工，工资大概是做一天算一天的，收入是非常低的。我们到农场时的工资是每月28元，他们的收入大约不会超过我们的，好在农场的生活费用非常低，尽管生活苦，但总能过得下去。这对夫妻待人十分厚道，到了晚上，经常会到我们房间里聊天。

以后，我调到了八营，老瞿一家也调到了八营工作。记得那年，老瞿已在八营六连当上了副连长，在一个雷雨

交加的夜晚，老瞿突然触电死了。那时，他又有了一个男孩子，留下了孤儿寡母，一个人匆匆地离开了人间，当时，他可能还不到40岁。下葬的那天，营里在六连开了追悼会，我也去了。他被埋在六连的那座山上，记得那天，天下着雨，人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抬着那口棺材，艰难地上山，在细雨中将那口粗陋的棺木放进了墓穴。我看着下完了葬，走回山下的六连，到了他家，看到那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妻子。心头瞬间涌上一阵异样的莫名的情绪。

我在六队住在那间四面透亮的草房里，一直到离开六队。这样的房子在上海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透风又透雨，好在西双版纳这个地方，气温高无须保暖。屋顶是用茅草编得草排盖的，由于日晒雨淋，草排陈旧腐烂。从屋里朝上看，很多地方都能透过亮光。但很奇怪，如果下一般的小雨，这样的屋顶居然很少会漏雨；如果雨下得大或时间长时，就会滴嗒滴嗒地往下滴水。

有时，晚上下大雨，整个晚上都能听到雨水滴在蚊帐上面盖着的塑料布上的声音，第二天早上，我们还能在塑料布里倒出一大滩水，因此，我们的蚊帐顶上都会有类似世界地图般的水渍。尽管这样，蚊帐却是知青不可或缺的东西，一年四季都挂在那里，作用首先是防蚊子，其次是让每一个知青都有了相对独立的空间。

西双版纳的雨季，对刚来的知青在身体素质等方面都会有个考验。在连绵的阴雨中，由于水土不服，大部分知青下肢都会出现溃烂。有的还很严重，连走路都会发生困难。在雨季中，有些知青还会生一场或大或小的病。

记得到版纳的第一个雨季，有一天晚饭后，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晚上便发起了高烧。当时，队里并没有什么领导前来过问，同伴们看到我病情严重，向队里借了一辆拉东西的板车，铺上了我的被子，让我躺在上面。一帮年少的同伴，乘着夜色，沿着泥泞不堪的小路，将我从生产队一直送到总场医院。

从六队出来的时侯，我已经迷迷糊糊了，躺在板车上，身心好像轻松异常，有些飘飘然的感觉。身下的板车在高低不平的泥泞不堪的土路上颠簸，我感觉好像是躺在童年的摇篮里。隐约间还听到周围推车的同伴在议论：“我们生病怎么没有人管的？”当时说这话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上海知青罗伟建。

板车从分场部走过，分场部边上就是机务队。当时，孙万慷已经调到分场文艺小分队，他们都住在机务队。从那里走过时，我迷迷糊糊听到孙万慷在叫我，好像他也随着送我的人一起到了总场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我就失去了知觉，据说连着昏睡了3天。醒来后，孙万慷他们来看我，说我昏过去好几天，我却不信。我只是觉得好像沉沉地睡了一觉，醒来后感觉特别累而已。

后来才知道，我得的是一种当地叫“打摆子”的病，并且来势凶险。进了医院，我便不省人事，大小便都失禁了，这是我事后才听说的。据说，是医院里那个景谷来的护士帮我料理的，据她说，我当时是非常危险的。

事请都过了那么多年，现在偶尔想起还有点后怕，同时心头也会陡然生出不少的人生感概。假如当时没有这些知青同伴的热心相助，大约我早就去了天堂，类似的事情农场并不少见，这是我在农场逃过的一劫。那年，我刚十八岁。

我在农场的最初日子就在这四面透风、风雨飘摇的破草房中度过。时至今日，当初我们在那雨夜听着滴在帐顶塑料布上的雨声入睡；月夜，我们透过篾笆与茅草的缝隙望着星汉灿烂的夜空，想着那首“床前明月光”的著名古诗的情景；犹然记忆如新，似乎就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也！

2009-09-08

勐龙河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3

【知青岁月】：（五）

痛打“落水狗”！？

公元1969年3月19日。

在国营东风农场红卫六队通向分场部的小路上，走着一支奇怪的队伍。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个壮年的湖南汉子，他使劲地敲着横挂在胸前的鼓，发出“嘭、嘭”声响。汗水从他黝黑的有些麻点的脸上往下淌，他步伐迈得雄赳赳的，脸上的神色得意非凡。走在他边上的是个年轻的姑娘，从衣着上一看便知是个来自城市的知青，她双手把一张领袖像捧在胸前，在炎热的热带太阳的照射下，同样的也是汗水淋漓。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群男女，两个一排走成两列纵队。纸做的红红绿绿、色彩斑斓的小旗子在他们的手中不停地晃动着。我和我的知青同伴们也随着人流匆匆地走着。

今天，分场部开大会；据说，是要揪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等到我们的队伍从六队走到分场部时，大会已经开始了。我们懒懒散散地走进会场，高音喇叭里传出刺耳的一男一女尖叫着的口号声。当作会场主席台的土台上站满了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一律挂着牌子，站成几列横队，数量相当可观，几乎快把土台子给站满了。我们队的人刚刚在地上找地方坐定，台上这一男一女就大呼小叫地喊起：“把六队的走资派梁××揪出来！”话音未落，只见两个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在人群中架起一个头戴草帽、皮肤黝黑的壮年汉子，把他跌跌冲冲地押上土台。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台上那两个呼口号的男女挥着小红书，在扩音器面前声嘶力竭地喊着，脸涨得绯红。留着分头的造反司令，站在一张围着一块红布的桌子后面，气宇轩昂，唾沫飞溅地作着时髦的演说。台下的人群中此起彼落地响起了不太协调的口号声。台上挂着黑牌，低着脑袋的牛鬼蛇神战战兢兢地举起手，嗫嚅着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声音是可怜的，微乎其微的。

会议或者干脆说是杂耍在烈日下，折腾了一些时辰。又有一场更为荒唐的闹剧即将展开，让牛鬼们化妆游街。今天整个总场都在开类似的会议，据说是为了纪念什么派造反夺权几周年，场面十分壮观。从分场到小街的公路上布满了人流，按照计划我们分场牛鬼蛇神的队伍由北向南朝小街靠拢，其他分场的牛鬼则由南向北向小街靠拢，最终将在小街“胜利会师”。

“新生事物”的伟大创造者们，煞费苦心地给牛鬼们打扮起来。他们拿来各色油漆，给诸位牛鬼脸上加上各种色彩；各种纸做的式样奇异的高帽子，雄辩地表明了造反者们创新的天才；有的牛鬼甚至还穿着各种用纸做的花俏的袍子；有人从河滩上找来了黑色的石头，装在两个箩筐里，让有的牛鬼挑着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游街，名曰：“贩卖黑货”；一块大石头用铁丝捆牢，再用铁丝连着挂在一个体格健壮的牛鬼脖子上，于是铁丝深深勒进脖子后面的肌肉里，在他的肩上再倒挂着一杆破旧的取掉枪拴的七九步枪，据说是象征着牛鬼曾想武装夺权；一个年轻的妇人屁股后面拖着一根纸做的尾巴，她手中拿着一面铜锣，边走边敲，敲一声喊一句：“我是小爬虫……”锣声在公路两边广袤的田野里慢慢地飘散开去，在20世纪六十年代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久久缭绕……

公路上走着这样一支奇形怪状、跌跌撞撞的游街队伍。

一个老者，由于受不了长时间折磨，跌倒在地上。于是引来一阵拳打脚踢，一股鲜红的血从他嘴角里爬了出来，他又从地上颤巍巍地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着。撕破的汗衫被风吹起，舞动着，像纸做的蝴蝶，上面洒上了点点殷红色的血渍。

一个年轻的姑娘，不知道怎么也成了这牛鬼行列里的成员。她头戴纸扎的乌纱帽，手里拿着一支用马粪纸做的足有一公尺长的大“毛笔”，裤带上拖着一把大扫帚，步履蹒跚地走着，被汗水浸湿的头发，散乱地盖住了那张俊俏而文静的脸。

全部的“牛鬼”以及游行队伍都在小街“胜利”地会师了。

时间已近正午，像个火球似的太阳高高地悬挂在正中的天空，向大地散发着毒辣的灼人酷热。

绿得发蓝的小街河水静静地流过小街镇，转了个弯后又默默地奔向远方。这里，偏僻的西南边陲，美丽的西双版纳，满目苍翠，一片碧绿的世界。尽管此时人潮汹涌，红尘滚滚，自然界仍然是这样的秀美，这样的静谧安祥。

已经精疲力竭的牛鬼，都集中在小街河的大桥上。用厚厚的木材建成的桥，边上没有栏杆，清澈见底的河水仍然在离桥面七、八公尺的河床里默默流淌。

“运动”即将进入最后的，也是最扣人心弦的高潮。极富想像力的造反派要在这里发扬一下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

四个人从人群拖出一个牛鬼，每人各拿着牛鬼一只手或脚，嘴里喊着：“一、二、三”，只见牛鬼在他们手里悬空地摇晃了几下以后，便脱手从空中划着长长的弧线抛向河中。西双版纳的河流虽然较宽，但在旱季并不很深。只见那牛鬼在空中变幻着各种奇怪的动作，发出撕人心肺的极度恐怖的喊声，“啪”的一声跌进水中，溅起了白色的水花。隔了很久，才跌跌匆匆地从水里站起身来，浑身精湿。成了造反派奇妙想像中的落水狗，于是，有人也当

然地自然而然地成了痛打落水狗的英雄！

开了头以后，有人就纷纷仿效。刹那间，牛鬼们像弹丸似得纷纷弹出了桥面，空气仿佛被极度恐怖而发出的绝望的嘶叫声撕裂了。

不断地有人被抛进碧绿的河水里，向四面溅起的白色水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还有一个牛鬼被人摔在河滩上，当肉体触到浅浅的河滩时，发出了沉闷的声响……

在如此惨不忍睹的场面中，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造反”者们，精神抖擞，神采焕发！

围观的人群中，好奇者有之，麻木者有之，黯然不语者有之……

时光已经流逝了整整四十年，任何复杂的历史现象都会逐渐地露出它的本来面目。套用一句文革中的老话“挑动群众斗群众”。到底是谁因为一己私利，在挑动人们凶残相斗。这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争斗着的双方，不幸中都成了别人手中的玩偶。在他们的斗来斗去之间，只是苦了“创造历史”的人民。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惜现在有些人忘性太大，前些年总听人说，要建文革博物馆，现在好像也没了声响。

好在历史总算翻过了沉重的一页，我们的国家在发展，综合国力在快速提升。

但我们总是希望这样荒诞的事情，再也不要在我们民族历史上重现。

也么哥！

勐龙河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83

【知青岁月】：

（六）那年，我那班长

十七岁那年，我远行几千公里到了西双版纳的大勐龙地区。到那里后，我就被分在东风农场红卫六队当农工，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涯。按现在的眼光看，那时候，我们应该还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

那时，版纳的橡胶农场还没有改制成军垦，也没戴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头衔。农场的基层单位那时还没叫连队，而被称为“队”，有趣的是“队”下面的生产班组却一本正经地叫作班，俨然有点军队的味道，这可能也是受了当时文革的影响。

到六队两天以后，我们就被分到班里，我和其他三个上海知青分到了四班。班里还有十几个老工人，其中还包括几个文革前就来农场的重庆知青。

班里有两个班长，一正一付；另外还有一个称谓，一个叫政治班长，另一个叫生产班长。这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能从中一窥当时的时代印记。

我们的两个班长是对来自湖南醴陵的中年夫妇，当时大约都还没到四十岁，男的姓叶，是个精壮的汉子，个子不高，身上的肌肉却很健壮、匀称，平时言语很少，性格较为内向；女的姓何，长着两个大眼睛，还疏着两条辫子，性格外向，他们这对夫妻的组合，正好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相反。何班长专管政治思想和学习，就是政治班长；叶班长分管生产劳动，也就是生产班长。

那时的农场明明是种橡胶的，却把政治学习和开会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每天晚上的开会几乎是雷打不动的，不是开大会，就是开班会。

每天，我们从山上劳动下来，已经筋疲力尽，接着就匆匆地吃晚饭、冲凉。没过多久，队长就敲起那挂在场地边木架子上的旧铁块，金属的撞击发出急促而刺耳的声响，于是便全队集合开大会。

大家带着小板凳，以班为单位排成纵队坐在场地上，我们的班长也非常敬职地一前一后坐在他们固定的位置上，前面亮起了马灯，队干部轮流上前讲话，所讲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东风吹、战鼓擂、到处莺歌燕舞、江山处

处红遍。”之类的文革台词。农场虽然地处边陲，但是这些台词的内容与全国应该是保持高度一致的。有些主讲的干部，由于文化水平实在有限，在前面嘟嘟哝哝的半天，实在是不知所云，有时还能留下令人啼笑皆非的笑柄，但他仍然乐此不疲。

有时晚上不开大会，就开班会，版纳雨季多雨，有时雨下大了，不能上山干活，白天也开班会，因此，全班集中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并不少。

我们的班长对于他们的职务是非常尽职的，每当开班会的时候，何班长总是站在她家门口大声地召唤我们前去集中，她的丈夫，我们的叶班长这时总在家里忙着摆放着凳子，默不作声而又满面笑容地招呼我们入座。当何班长在煤油灯旁正襟危坐用带有浓重的湖南乡音认真的读报时，叶班长总是坐在角落里，从身上摸出一个铁皮盒子，从中拿出裁成小方块的旧报纸以及土烟丝，熟练地卷出一支圆锥形的纸烟，点着以后慢慢地吸起来。在昏黄的煤油灯下，何班长那朗朗的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读报声，叶班长那时明时暗的烟头，以及那浓烈而呛人的烟味，组成我们班会的主要氛围。除了那内容以外，那氛围在那年月还真得有点温馨。

到农场后，我们最先参加的劳动是砍坝。清晨，我们套上刚发的厚厚的蚂蝗袜，肩扛着长把砍刀，冒着那似雨非雨的大雾，顺着那蜿蜒的山间小道上山，路两旁杂草上晶莹的露珠，很快把我们套着蚂蝗袜的裤腿打湿了，粘在腿上，有点难受。到了山上，回头看山脚下，那像毛毛细雨般的大雾变成了一片茫茫的云海，那一座座黛绿色的山头都成了云海中的仙岛，真有点像蓬莱仙境。我们全班人马一字排开挥舞砍刀干开了，开始我们还有新鲜感，很快就双手发麻，两臂发软。

这时何班长笑着说：“莫急哒，以后有的干咯！”叶班长却不太吱声，只是看到我们砍到不太容易砍倒的竹篷时，叫我们退后一步，他上前三、二下就把它砍倒了。

第二天，我们再上山时，发现叶班长走在我们前面，边走边挥着砍刀，扫动着小路边的杂草，草上的露珠纷纷掉落，我们的裤腿也不像昨天那样湿了，从此，我们也知道这个小小的窍门。

我刚开始参加农场生产劳动时，也曾经与班长一起上山挖过种橡胶的梯田，也挖过穴。

挖穴可是个技术活，不掌握要领很难挖好，开始时，我只会使蛮力，穴还未挖成型，手上已经打起了血泡，何班长不知从那里找来布条，一边帮我包手，一边又说着：“莫急哒，时间长了就不打泡哒。”管生产的叶班长，仍然是言语不多，只是看到你有挖不断的树根时，他会示意你让开，然后他砍刀、锄头并用，三、二下就挖断了。

六队是个老队，其主要成分是来自湖南农村的老工人，他们一般都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也较会打理自己的生活，因此，相比之下，六队生活条件不算最差。

那时，食堂里每天还是有些单调的素菜，（这比我以后几年在新连队过得日子要好的去了！）有时，班长看到我们捧着饭碗走过，会叫我们到她家里去弄些菜，我记得他们家里那种用小米辣炒出来的小鱼，能辣得你跳起来。

那年雨季时，我生了场差点要了我的命的病，危险期过了以后，我浑身无力地躺在总场医院的病床上，不断地有些知青同伴来看我，但始终没有一个队干部出现，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只是现在想想，好像有点太没有人情味了。有一天，我的班长来了，她还用一块大手绢包了七、八个鸡蛋送给我，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去年，我回农场还想着去看看我那班长，只是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

知青的生涯是苦涩艰辛的，但我刚到农场时碰到的那两个班长是善良、憨厚的。这是我的幸运，这种幸运也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碰上的。

直到今天，我的耳边还会响起，我的何班长用湖南方言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叫我“涛伢仔，涛伢仔,”的声音。我的眼前还会出现那七、八个用手绢包着的鸡蛋。

勐龙河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83

【知青岁月】：

（七）代副队长

我们刚到版纳的东风农场时，红卫六队的主要成分是湖南醴陵人，队里的干部大都也是湖南籍人士。有个副队长却是个例外，他是云南人，姓“代”，讲一口音色醇厚、节奏明快的昆明话。

代副队长三十多岁，高高的个子，大眼睛，四方脸，身材挺拔，走起路来步履轻快，有着明显的军人气质。在版纳烈日的暴晒下，他脸膛黝黑锃亮，却仍然难以掩盖他那英俊的仪表。

那时的农场，强调政治“挂帅”，倡导“斗争”哲学。尽管白天劳动强度很大，但每天晚上的大会（有时也被称作“政治学习”）基本是雷打不动的。开会时，为数不少的队干部会轮番上阵竞相发表言论，而且个个态度积极，神情激昂。这样就使“大会”变得又松又散，又空又长，常常会让我们昏昏欲睡。但我们很快发现，代副队长却很少凑热闹，在这种场合出头露脸。

不久，我们好像隐隐约约地听说他曾被打成过右派，从省城下放到这里。这时他已摘了帽。不知是什么原因，还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芝麻官的位置。

副队长在公开场合一般都比较低调，私下里他却很建谈，在那种情境下，仍然流露出开朗外向的性格。在我们知青看来，他比那些农民出生的干部要有趣的多。

刚开始的知青生涯就让我们苦不堪言，还未适应的繁重的体力劳动，经常累得我们浑身就像散了架。傍晚收工时，我们拖着锄头砍刀踉踉跄跄地从山上下来，一走进房门，随手扔下锄头砍刀，不顾浑身汗臭，倒头便躺在铺着塑料布的床上，再也不想动弹。一直到食堂里敲响了打饭的钟声，我们才会挣扎着从床上起来，拿起碗筷到食堂里打饭，然后才和同伴们一起蹲坐在屋檐下，各自捧着饭碗狼吞虎咽地晚餐。

我们边吃边看着队里场地上来回走动的人们，老工人拿着锅盆来打饭，然后回到他们各自在房前屋后自建的小伙房里，他们可都是拖家带口的。有时，也会看到代副队长像我们一样拿着碗筷，到食堂里打饭，这时他已经换了干净衣服，穿着胸前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某部队字样的背心，从场地上步履轻快地走过。他也是单身一人生活在

队里，尽管他那时应该有三十多岁了，当时的我们也没有过多地考虑到他应该是要有一个家的，觉得他像我们一样地过日子好像也很正常。

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一天下来，衣服上都会结上白花花的汗渍，山上的杂草荆棘又多，劳动时身上的衣服经常会被挂破。刚刚走出家门还未成年的我们大都还不会妥善地照料自己，身上的这些衣服，尽管汗渍斑斑，酸臭异常，我们仍然照穿不误，因而，没过多久，知青们劳动时几乎个个成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叫花子。队干部只希望我们拼命地干活，至于知青们如何生活，他们也无暇关心得更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帮知青穿着破衣烂衫扛着锄头上山，有个队干部看着我们，一本正经地说："看来你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有成果"。那时的价值观，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那时，我们住在队里最边上的一栋破草房中，草房旁边就是一条小河，有一块狭长木板架空着从河边伸到河中，形成一座简陋的栈桥，经常有人拿着脸盆装着衣服蹲在桥上在河水中洗衣物。

黄昏时分，我们也能看到代副队长蹲在栈桥上洗衣服，偶尔我们也会在那里和他相遇。每当这时，他总会仰起脸朝我们灿烂一笑，露出他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就算给我们打了招呼。有时他还会教我们如何在衣领和衣袖打肥皂，如何将衣服放在河水里用力提拉来清洗肥皂水。

他一边用轻快的节奏搓洗着衣物，一边会用他那动人的男中音哼着小曲，那些优美的俄罗斯民歌有时还带着深深的忧伤。有时候他还会哼起旋律激昂的志愿军战歌，现在想来，他或许有过那场战争的经历，才能把这首军歌唱得如此感人。

有一次，我在他身边专心地洗着衣服，突然，他唱出："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这句还算熟悉的歌词，在他富有情感的嗓音演绎下，流露出特有的韵味，竟然使我一时忘了这歌词原本是出自那首熟悉的歌。在那所谓的"革命战斗"的年代，那一句歌声给我留下了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觉。

副队长不是很张扬，在公开场合也比较低调，但他的性格还是比较开朗和外向的。有一次，我却无意间看到了他的忧伤。

那是这一年的夏天，队里来了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用童声讲一口瓮声瓮气的昆明话，长着一对明亮的大眼睛，非常讨人喜欢，这是副队长的儿子，从省城下来看他的父亲。

一天黄昏，我又在那座木板的栈桥上遇到副队长，他正在用河水给他的儿子擦身，脸上再也没有了我们熟悉的笑容，我抬头发现了他脸上闪过一丝明显的忧伤。

历史演绎到今天，绝大多数的右派都已经平反，有些还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代副队长是我几十年前在边疆

农场看到的真实版的脱帽右派，他可能与文艺作品里的艺术形象并不完全一样。

勐龙河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83





【知青岁月】：

雾中的曼甩

曼甩是个傣寨，寨子并不大，离公路也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四十几年前，我刚到版纳的农场时，它是我第一个近距离接触的少数民族寨子，给我留下了特殊而深刻的印象。

那时，勐龙地区还远未被充分开发，四周还是浓绿茂密的原始热带雨林，四处被浓郁的蛮荒、闭塞、神秘的氛围笼罩着。

景大公路还是一条旱季尘土飞扬、雨季满路泥泞的狭窄土路，它从景洪出发，翻山越岭、穿林过寨延伸了三十多公里才到东风农场的地界。

刚进东风境内不久，公路的右边就有一条浓荫遮蔽小路，沿着这条小路向前就是红卫六队。刚到版纳时，我们被安排在这里当农工。六队是个老队，它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它的周围就有成片的即将开割的橡胶林。那时，那条小路的终端就是当时的红卫九队，这是刚刚在山沟里砍倒丛林后，建起几栋茅草房的新队。

曼甩寨的位置几乎是在六队和九队的中间，那条小路却没有从寨子边经过，站在路边远远地望去，曼甩寨被浓密的树林遮蔽着，只能看见一些傣家竹楼枯黄色的茅草屋顶，散落在满目葱茏的密林中。一条悠悠的小河在西双版纳碧绿苍翠的群山间缓缓流过，把九队、曼甩、六队串联了起来，我们的六队就在这条小河的下游。

刚到农场时，我们就对这里的少数民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从老工人口中听说的有关少数民族的趣闻轶事，更是激起了我们极大的好奇心。

我们刚到时，这里正是旱季。版纳的旱季多雾，每天清晨，出门就见空中飘散着一层飘渺的薄雾，就像给天地万物披了一件薄而透明的纱衣，薄雾慢慢聚集，渐渐变浓，等到我们扛着锄头出工时，整个天地就慢慢地融化在一片乳白色的大雾中了。

我们走在路上，能看到曼甩寨隐隐约约地躲在远处的雾中，说来也真奇妙，隔了那么一段距离，仍然能感受到一阵阵浓郁而特有的傣家气息在雾里从寨子中远远地飘过来。

一队身材窈窕的傣族女子迎面而来，她们肩挑编织精美的竹箩，优雅地扭动着细细软软地腰肢，摇曳穿行在朦朦胧胧的雾中......，勾勒出一道优美的风景线。

飘飘洒洒的雾，凝成细细的水珠，空气都是湿漉漉的。路边不远处，那棵大青树浓密的枝叶上不停地往路面上滴着水珠，发出“叭哒，叭哒……”的声响。

一对热恋中的傣族少男少女，用柔柔的线毯裹住他们青春的躯体、相互依偎在大青树下呢喃细语、卿卿我我，这种飘渺而至，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境界，与我们眼前“如火如荼”“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现实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我们走到山上，才发现原来大雾是从平坝上山沟里升腾而起的。此时山腰以上还没有雾，那乳白色的雾团正在山脚下簇拥着、翻滚着。山脚下，小河边，曼甩寨在浓雾中仍然隐约地露出她那绰约的身姿,就像在乳白色的宣纸上不经意间洒上了几抹淡淡的墨痕，真像一幅风格空灵的山水画。

大雾在不停地翻滚着，或漫悠悠地飘过来，或急速的顺山爬坡，有的舞姿曼妙，有的变幻升腾，雾时浓时淡，时迷时茫，不由得让人有世外之想……雾越积越浓，慢慢地汇成了云海，连绵不绝的群山只露出一个个黛绿色的山头，就象一个个漂浮在云海中的仙山琼阁。向远眺望，雾是一片茫茫的大海，扑面而来却是一派温柔的朦朦细雨。

雾团继续向上攻击，翻滚着、旋转着向你压过来，你一接触到它，立刻感到像一只湿润的手在抚摸着你的脸和手臂，那细细的水滴粘上你的头发、眉毛，侵润着你那薄薄衣衫，让你感到一丝凉意。须臾间，眼前的一切渐渐模糊起来，天地万物就像一个待睡的婴儿被盖上了雾做的被子，一切外间物体越来越模糊，很快你也消失在浓雾之中，天地一片混沌。

此时的曼甩已沉浸在浓雾里，变得杳无踪影，只是远远地传来隐隐的鸡鸣狗吠之声，恍惚之间，就像远在天边的世外桃源。

刚到版纳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就对近在咫尺的曼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冒然进入寨子。尤其是看到经常在路边走过的傣族汉子身上都刺着青，个个腰间挎着刀，有的还扛着猎枪，我们就更不敢造次了。

我们第一次进曼甩，是在一个湖南青年小何的带领下，他只比我们稍大几岁。

那天黄昏时分，我们走下小路，一些傣族女子正从田埂上收工回来，看见我们突然尖声地喊了起来：“哆哩

啰！哆哩啰！”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小何笑着告诉我们，“她们说你们漂亮呢”。说真的长得这么大，还从未被别人当面这样夸过，弄得我们都高兴得笑了起来。

进了寨子，四周都是傣家的吊脚楼，这里的傣楼几乎都是用茅草和竹子建的。一些傣家女子正在自家竹楼的露台上，梳洗着自己长长的乌黑的头发。

空气中洋溢着傣民族特有的气味，那么浓郁，那么醇厚，使人很想寻找它来自何处。

傣家竹楼前后绽开的缅桂花，散发着淡雅幽远的芬芳；寨边的田野里糯谷禾苗特有的绵绵清香，一阵阵随着晚风远远地飘过来；寨中路边一堆堆新鲜的牛粪也送来了带有青草和泥土的暖暖的气味。把这些糅合在一起，也许就是我至今难忘的版纳气息，也就是傣家的气息。

我们随意拉开一家院门的竹栏杆，跨步进入竹楼，楼底下栓着一头牛，旁边还有舂米的石臼，用脚踩一下，还会发出“咣、咣”的声响。

顺着吱吱作响竹梯上楼，踩在柔软的蔑笆做的楼面上，从敞开的房门向屋里望，屋里光线较暗，中间还有一个火塘。一个傣族老大娘看见我们一群汉人进入她家里，一点也没觉得诧异，将我们引入室内，让我们围着火塘坐下，她不知从那里拿出一包用芭蕉叶包着的东西，摊开后，原来是剁成小块的红糖。

火塘边的老大娘满脸笑容，露出一嘴乌黑的牙齿，（以后，我们知道这是由于嚼槟榔的原因）她用手指着红糖说着：“嘻啰，嘻啰”。我们高兴地吃着糖，老大娘满脸慈祥地看着我们。突然，她一本正经地说：“龙宰，傣呃龙英奥啰，比比嚷嚷啰！”（意为：小伙子，娶傣家姑娘了！）当时，我们尽管还不完全能听懂她的话，她的这句话，我们还是基本听懂了，这是由于从农场老工人那里早已听说过。
火塘边响起了我们快乐的欢笑声，大娘惊异地看着我们，我们笑着说：“比比嚷嚷，比比嚷嚷啰！”老大娘也咧着嘴高兴地笑开了，又露出她那乌亮的牙……
那天，我们从寨子回到队里，已是满天的星斗。

其实，我和曼甩接触的时间并不长，去那里的次数相比之下也少得多，在以后一些年里，我去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村寨，但曼甩留给我的印象有点特别，它好像总是在版纳朦朦的大雾里，有点神奇、有点神秘、有点空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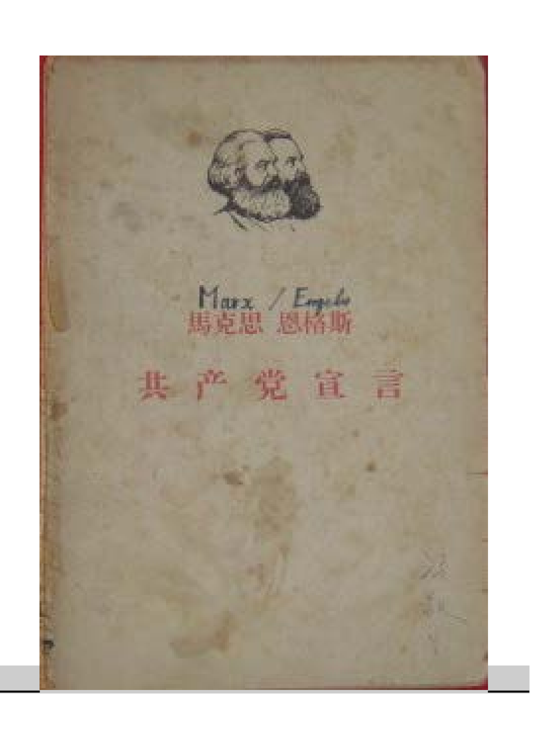
这也许是人们常说的“先入为主”的原因吧。

<u>*2011-01-08*</u>

冬夜怀想

现在的书们也和国际接了轨，不仅华衣彩妆，而且开本日新月异，小32开已不多见，大32开早不新鲜，几乎都已16开本的特大书在争奇斗艳了。堂而皇之的书，当然要摆在明面儿，那些破旧的、泛黄的、小不溜丢的书们，就被置于犄角旮旯，伸手不及的地方。

偶尔打扫卫生，那些小不溜丢的旧书，竟自己跑出来，从高处飞落，直接掉在你的眼前。譬如这本《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恩列思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出版，1967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书价￥0·1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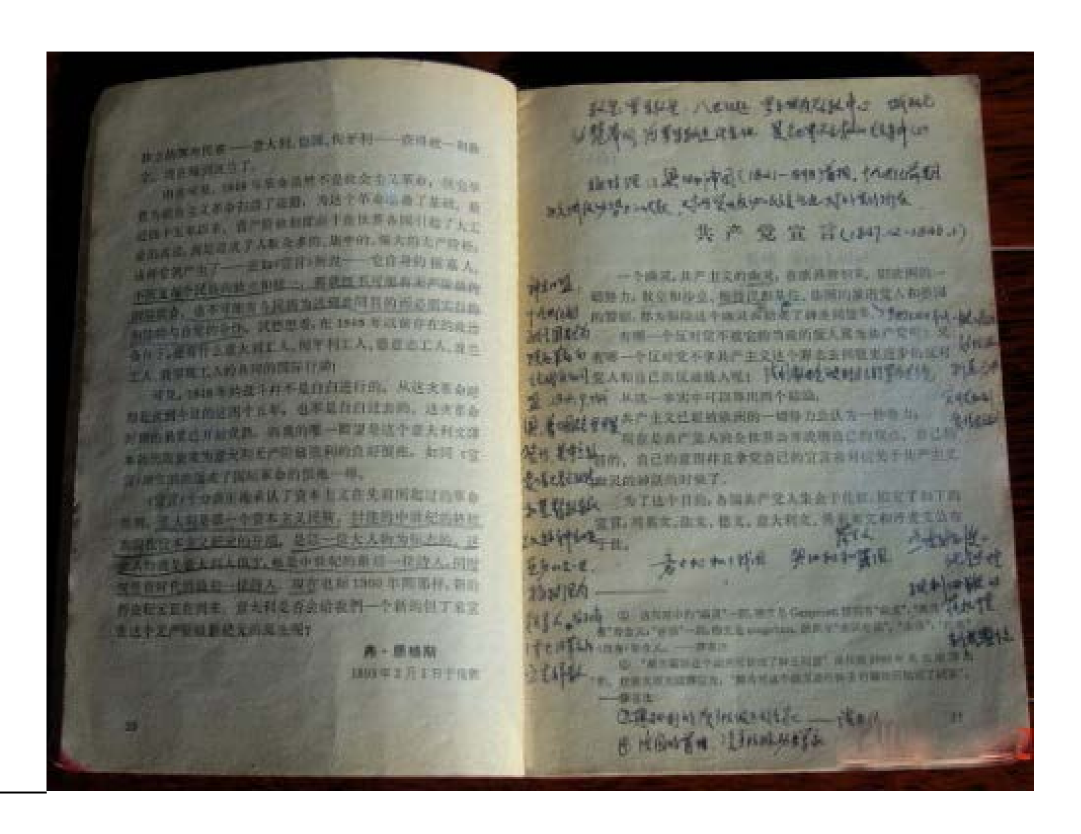
一翻开书页，就回到了北大荒的冬夜。我们围着火炉学马列的场景，和无数尘封的往事就扑面而来。

北大荒的冬夜漫长，下午4点天就黑了，白雪覆盖的大地在漆黑的夜里也反不出天光，即使没有风，冰冷的空气也像刀子一样刮着脸。5点钟在食堂吃完饭，我们再也无事可做。20岁上下的我们都“情窦未开”——认为谈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敢、不想、不屑。于是，我们只有读书。

读书，却没有书，书店里只卖马列著作。



1971年冬天，我们，852农场总场综合批发站的知青自发组织了学马列小组，每周在固定的夜晚，聚到一起读书。《共产党宣言》是烂熟于心的书，在连队的早会上，领导常常让我们小组的成员给大家“宣讲”，那是很光荣的事。



上海知青唐坚是主讲，他是连里的团支书，上海大同中学老高一的学生，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口才特别出众。他从一而终，大学毕业后在哈尔滨某高校马列教研室做教授，继续讲马列主义。唐坚业余兼任哈尔滨知青联谊会秘书长多年，央视10套曾有对他的长篇采访。不过，我们这些半瓶子醋，却把当年懵懵懂懂学到的一知半解的名词、术语、理论全扔脑勺后面了。不过，有句话我始终不忘——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

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

除了在学习小组专攻马列外，我们平时也读点别的，都是回家探亲弄回来的。



譬如这本《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考茨基著，三联书店1958年版，书价￥0·75元。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在俄译本出版说明中提示：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之一，和其他领袖一样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充当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帮凶。在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成为十月革命的坚决反对者，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但是，考茨基曾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广泛传布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正如列宁所说："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该说明还指出：第二国际的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从主张社会革命的党，变为主张"社会改良"的党，最主要的严重缺点——理论和实际相割裂，弃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于不顾，口头上反对机会主义而事实上向机会主义投降。

出乎历史意外的是，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良的社会民主党们，他们的后裔一直坚持到现在，不断改良的西欧、北欧，成了全世界穷苦大众羡慕的富裕、民主、稳定、悠闲的天堂，而苏联却在革命70多年后轰然瓦解。历史由谁人评说？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民众漠不关心的事情了。



还有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71年9月出版，北京第一次印刷，书价￥1·50元。

费正清教授是中国通，在中国留学，抗战胜利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特别助理和新闻处主任，生前多次访华。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三联书店内部发行，1971年12月出版，北京第一次印刷，书价￥0·75元。格瓦拉在全世界有许多“粉丝”，据说台湾高雄的市长陈菊女士，也是粉丝之一。

在踏上人生之初的岁月里，正是这些政治书籍滋养了我们年轻的心灵，使得我们这一代人重精神、轻物质，成为终生不悔的理想主义者，现在则被看成是大傻子。

2011-12-12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列　宁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　宁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
反杜林论
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
馬克思的經濟学說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大荒旧事】：

（1）高烈度冲突

金秋最美松花江那年的麦收结束了，六八年刚到兵团的知青们累得不善。到兵团几个月了，愣是连团部都没去过，更别说附近的大城市佳木斯了。大家都渴望逛逛这个位于松花江畔的美丽的佳木斯，趁着有两天假，20多个小伙子相约上路了。

大家在团部胡乱转了半天，到车站一看，才知道从鹤岗到佳木斯的火车每天就三趟，中午的过去了。等这帮小子乘坐下午的火车到佳木斯吃完饭的时候，天都黑了。住哪儿呀，旅馆？那肯定不行，谁舍得花两三块睡一晚上觉呢？年轻人好对付，大家一商量决定就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忍了。

一夜无话。天刚亮，大伙发现队伍里少了几个人，一看都是哈尔滨的。“哪儿去了呢？这要是把人丢了那还了得？”析析心里想。析析是排长，在这帮人里很有威信。虽说是自己出来玩，但是对战友的责任感还是让析析感到很是着急。“都跟我出去找去，找不到人咱们也别玩了！”析析下了令。大家仨一群俩一伙的在佳木斯站前大街一带开始寻找战友。

佳木斯不大，没转多一会，消息有了。原来那个人几个睡不着觉，在冰凉的候车室里待着也是别扭，决定出门看看，也顺便看看哪儿能吃早饭。早点铺子还没找到呢，他们就叫工人民兵盯上了。人家见这几位东张西望的，浑身上下打满了补丁，满脸黢黑，估计不是小偷也是要饭的，定是盲流无疑，就给抓起来了。

经人指点，析析带领一干人等找到了关人的地方——合江军分区大院。进了大院立刻有当兵的围了上来，问明情况，也说了一大早是送来了几个盲流，放人可以，但是要证明。这不是要了这帮小子的命吗，兵团战士哪来的证件，更别提证明了。有人带了八连的饭票，上边倒是有八连的伙食专用章。一般来说，那几个人也没犯什么大事，又有这么多战友证明，把人放了也就算完了。可是那些当兵的就是认死理，非要证明。

“你们一帮小盲流，敢到老子的地盘撒野”楼上一个军官摸样的人出口不逊。后来才知道，这人是合江军分区政委，或者是副政委，姓卞。“谁他妈是盲流，你说话干净点”析析等哥们也不是吃素的。双方对骂起来。

正骂着呢，来了个小干部，趴在卞政委耳朵上嘀咕了几句，卞这才骂骂咧咧地同意放人，原来还是那几张饭票管用了。他们向同在佳木斯的兵团司令部汇报了此事，兵团司令部又和我们团联系上，证明了这帮人的确是兵团战士，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也都是沈阳军区序列呀，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走出军分区司令部，大家逛街的心情一点也没有了：还没怎么地呢，就当了一回盲流子了。街可以不逛，但是刘英俊墓那是要去拜谒的——可见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向往英雄，崇敬英雄呀。

照完相，就赶快往佳木斯火车站跑，生怕赶不上回去的车。就在大家没精打采地糗在候车室那没事干的时候，豆豆跑过来压低声音对析析说："排长，那边有一个小偷。管不管？""小偷？管，怎么不管！"析析也是老红卫兵出身，虽然都是过眼烟云了，可是还有点就怕消停那股劲，"哪呢？"。

顺着豆豆的手指一看，还真是个小偷，正下手呢。这帮人也不困了，个个都来了精神，一天来的窝囊气全发在小偷身上了，没几下子就把小偷给制服了，一顿拳脚之后，决定扭送公安局。就在大家觉得干了件漂亮事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

先是几个小偷的同伙冲了上来要救人，接着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仅从口音上判断，就误以为是外地人欺负本地人。再加上小偷们的宣传鼓动，大喊什么"日本鬼来了怕一阵，国民党来了怕一会，知青来了怕一辈。看看，这就欺负上我们本地人了"。这一扇呼，老百姓也是莫辨真伪，呼啦上来一大推人，包围了析析他们。这群十几岁的孩子，哪见过这阵势呀，且战且退，就躲到一个大砖堆后边了。

析析指挥着，大家很快分了下工，以砖堆为屏障，两边守住，争取多顶会时间。这边不时地扔出砖头，那边也是捡起砖头还以颜色。最多时外边得有百十号人和八连的人对阵。

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金刚——金刚在我连也是个传奇人物，从来不刷牙，但是却长着一口好牙；干活从不卖力，但是连长、排长从没人批评他；紧急集合从不参加，也没见谁说他；全连从学问最大的峰峰、鸿鸿，到没出过连队，啥也不知道的孩崽子都和他不错。据说功力与瑞瑞齐名。回城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在一次援外工程中受伤，险些瘫痪，靠着自己的毅力还是站起来了。但是还是毕竟伤了元气，五十多一点便撒手人寰了。悲哉，哀哉！此为后话——跑过来对析析说，你得赶快跑，他们要找的头是你，让他们抓到了，你可没好果子吃。再说了，咱们也得有人回去送信呀，要不在哪儿死的都不知道。瑞瑞、昌昌等都是这个主意。

正商议间，两辆大卡车呼啸而至，佳木斯警备司令部的来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很快包围了现场，趁着天黑，大家掩护，析析跳进了车站的围墙，扒火车回到了连队。

这些人被抓上卡车后，没一会到了，下车一看，嗨，还是昨天关他们的地方——合江军分区，熟呀。这回人家可不客气了，要求每人把裤腰带解下来，集中保管，并且让所有人对面站成两排，互相打嘴巴，谁要是不打后边就

是一枪托。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不动手，大家没少挨枪托。上厕所时也是两名战士挎着枪押着。卞政委这回可有的说了，“昨天看你们就不是好东西，非抢即偷，这回非得要你们好看的不可”。

但是领头的跑了，军人，警察还在满大街的找首犯呢。据说啊——据说就不一定是真的，当他们和当地的警察企图搜查兵团司令部的时候，“兵司”的哨兵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未经同意，谁也不准进入大楼，否则就开枪。门前加了双岗还都上了刺刀。那时候，兵团是正军级单位，合江军区估计也就是个团级，最多是副师，他们是怎么也不敢硬来的。当地的警察为此还闹了半天情绪，觉得很没面子。

等到析析回到连里报完信，连长指示一定要尽快带回这帮孩子。指导员带上介绍信连夜赶往佳木斯，费尽周折，好说歹说总算把人要了出来。带着这二十几个兵团战士，连车站都没敢进，坐船过了松花江，再搭火车回到连里。一进连队，战友们纷纷上前慰问，想想这两天的遭遇和委屈，忽地悲从中来，大家抱头痛哭。

看上去八连战士输了，但是他们的团结、机智、勇敢、忠诚的表现，成就了这个连队团结友爱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未消散。

（2）兵团打“火的”

在北大荒，那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在东北那圪垯人情那是火辣辣的，在一段时间里，我竟然乘坐过像现在打的一样、招手停车的火车。不信吧？听我道来。

我们连离鹤岗不远，但那也是几十里的路程，以前到鹤岗办事，除了搭车就得步行了。不久这里修了条铁路到青石山，也就是我们团十三连的驻地。这条铁路经我们连五号地北头，过十三连，但是都没设站，人家鹤岗市哪管我们兵团的事呢？那时，我们到鹤岗，要么就往东十几公里走大路去，要么就得往西走六七里地小路坐火车去。里外里都差不多。

这条铁路是我们眼看着修起来的，主要是为我们连北边新建的一个钢厂服务的，西边通到山里，据说是为了战备。仗是没打起来，钢厂也没炼出多少钢来，这条铁路倒是为鹤岗市的城市建设立了大功，十三连的青石山，这个我团西片地标性的山头，现在几乎夷为平地，采下的石头都变成鹤岗的高楼大厦了。这是后话。

还说那时。别人不常去鹤岗的也就罢了，我这当上士的接长不短的就得往那跑一趟，眼看着火车想坐就是不方便，心里很是郁闷。顺着长长铁路线，我数着枕木向鹤岗走去，不时地还得给呼啸而过的列车让道。

记得有一回我去鹤岗，走到五号地头刚上路基，远远的，一个衣衫褴褛的老爷们，满脸胡子拉碴的，抱着根小鞭子，坐在铁轨上一动不动。这荒山野地的，看见生人比看见野兽还怕人。我一下想起老职工说过，在北大荒的路

上碰上个动物啥的没事。一般的你不招它，它也不招你的。但是要是碰上人可麻烦了，特别是站那、坐那不动的，十有八九不是正经人。

看到那个人一个劲地往我这边看（现在想来也是正常，大野地的，来了个人，人家不看我看谁呀？），我心里砰砰地乱跳，我兜里揣着好几十块钱呢，那可是给食堂买酱油醋的钱呀，越想越害怕。可我也没道绕呀？环顾左右，路基就那么宽，躲都没处躲。原来说过，这条铁路是填平了一段小山谷建设的，路基是用石方堆的，两侧都是十几米深的碎石坡。

哆嗦着就走近了，“哪连的？歇会呀？”那个人竟然还和我说起话来了。我尽量地陪着笑脸，尽量地和他保持距离，尽量地让腿走稳喽，脚底下还是踩得路基上的碎石哗啦啦地往下滚。那哥们呲着叫烟熏得焦黄的大板牙，冲我笑着……

他没站起来，我几乎是屁滚尿流地向前跑去。

从那以后，不管等多久，我一定要坐火车回连了，虽然来回要花五毛钱呢。大黄板牙把我吓坏了。

鹤岗到青石山的火车，没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估计都没见过，看过电影《林海雪原》吧？我坐的火车就和那里的的小火车差不多。那是用闷罐车改装的客车，黑色的铁皮，一点装饰也没有。好点的还有椅子，有的就放了几把条凳，中间有一个火炉子，但是我从没见点过火。车门上按了一个插销，列车员随时可以打开上下乘客。车窗没记得有没有玻璃，即便有估计也黑的看不见外边了，但那时能坐上它也是我的福气，早了，晚了都赶不上呢。

好像是第二次乘车，碰上个特爱说话的列车员，“你哪下呀？”他问。“青石山”我说。“是矿上的吗？”（青石山那边有个铁矿）他问。“我是兵团的”我不知道哪来的自豪感，大声回答。

你别说，我这一理直气壮的，那人倒对我格外关照，一个劲地问这问那的聊了一路，最后以允诺帮助他买几条肥皂，下回带给他之类的结束了谈话。那个时候鹤岗的供应，特别是民生产品如白糖、点心、肉、菜、肥皂什么的，还不如我们呢，我们好歹是归沈阳军区管呀。

就在列车行驶到我连五号地的时候（那里距离终点站青石山还有好几里地呢），奇迹发生了，列车停了，那列车员挥着手叫我下车。我抓起包跳下了火车，因为没有站台，我差点没摔倒。

“你再过来挥挥手呀，我给你停车”那个列车员冲我喊着。

从那以后，我再到鹤岗来去都不用走冤枉路了，就在五号地头等火车。不过每次都会给列车员们带去糖、酒、肥皂和大头菜、黄瓜什么的。记得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团工业五连生产的那种只能拿牙往下一点点刮的月饼，他们掰开看见里边还有冰糖和青红丝什么的，异口同声地叫“好吃”，弄得我还很有成就感。

就这样，鹤岗到青石山的铁路上，隔三差五地能看到我在那里举手停车“打火的”的身影呢。

（故事素材来源兄弟团，谢谢兵团战友）

2011-08-13

东海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3）两只小熊

到底是时代不同了，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时不时都能看到人类爱护动物、善待动物的动人故事。读到这些故事，常常把我带回哪个不知生态为何物的年代，让我想起在兵团时遇到的那两只小熊，每每想起来都会令我内疚。

那天收工后，看见食堂旁边突然增添了一间小屋子，一片用篱笆圈起的小院落，里面住进了两个不速之客，就是那刚刚失去母爱的小熊。大家都感到新奇，顾不上吃饭，立刻围了上去，观看那两个可爱的小家伙。小熊那小巧的身体，黑黑的毛，张着两只大眼睛，畏缩在一角，看神情它们似乎有点害怕，好可怜哦。它们太可爱了，无论怎么看，我都不能把它们和凶狠暴烈的熊瞎子联系在一起。

为了小熊的生命，从大家微薄的伙食费中抽出一点资金，给小熊买牛奶。小熊的饭量可真大，每天需要喝5斤牛奶，还必须是新鲜的。所以，每天都有一个人负责到十几里地的畜牧连去买奶。大家常笑谈，呵呵！小熊在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呐。不过，那些日子里这两小熊确实给我们劳累、枯燥的生活带来了欢乐。每天傍晚后，大家不顾劳累，总是来到小熊的住地，和它玩耍一会儿。胆子大的男生们，甚至于敢把它们抱在怀里，小熊也很配合，用小熊掌拍拍打打，引起了大家的欢笑。尤其是小熊贪吃的摸样，更让人笑的肚皮发疼。那时候的小熊可能饿急了，表现出急吼吼的“熊样”，只要一敲小盆，它们就奔跑过来，一举小盆，它就赶快从地上站起来，两只前爪不住地抓挠。这时候的小熊就是两个笑星，带来欢声一片。

由于营养充足，时间不长，小熊的身躯长大了，黑毛变得粗硬，更可怕的是熊掌上长出了坚硬的指甲，嘴里生出了锋利的牙齿，在和它的打逗中，时不时露出了兽性，有几次甚至碰伤了人的皮肉。为了以防出现意外，司务长只好将它们弄到医院，将牙齿和指甲拔掉。那天夜里正是我巡逻，我听到它们不断的嚎叫，声音很惨，几乎整整惨叫了一夜。第二天，再看到它们时，只见四爪被白纱布包裹着，身子一动不动，好可怜。心肠软的女同学，几乎掉下了眼泪。不行，把小熊送回大自然中去吧，那里才是它们生存的地方。可是，熊瞎子是凶残的动物，又不能够放虎归山，怎么办呢？连领导都想不出好的解决办法。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只小熊闯祸了，它从圈里跑了出来，窜入距离不远的女厕所里，赶巧里面正好有人。于是

乎，一声声呼叫伴随着女子的哭声传出来，外面的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又不敢贸然闯入，整个乱成一团！好在，小熊只是开了一个玩笑吧，转了一圈又出来了，总算是有惊无险。这一次，关于小熊的去向问题真成了一个难题。曾经听说，要将它们卖到佳木斯市动物园，不知最后为何没有成功。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终于宣判了小熊的死刑。一天的下午，它们双双跑了出来，顺着大路，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火车站，一下子闯入候车室，正赶上有人等车。这下子可是乱套了，青天白日来了两只半大不大的熊瞎子，这还得了！人们吓的四处逃窜，鬼哭狼嚎。一个紧急电话打到连部，团首长随即命令出兵，带上冲锋枪，就地击毙。正在玩耍的黑熊不知道末日来临，看到熟人后，还表现的很亲热呢，一下子猛扑过来，就在这时候，冲锋枪响了，它们双双倒在血迫之中。

当天的晚上，食堂改善伙食：清炖熊肉。看到一碗碗冒着热气的肉，发出扑鼻的香味，在当时常年不见荤腥的日子里，真是挡不住的诱惑。面对那碗散发着扑鼻香味的熊肉，我却是没有一点食欲，我只想哭。两只多么可爱的小熊啊！如今却成人类的盘中餐了。忽然，我生出了一个念头：在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可能就是人类本身了，一张嘴可以吃掉所有的生灵。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只是将分给我的那碗熊肉，悄悄地掩埋在它们生前居住不远的黑土地里。

从此，我的心中也深埋下了一个坟冢。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类将热爱大自然，善待一切生灵，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活。或许只有这样，美才会常伴着我们从生命到心灵。

后来我听说，一个兵团战友在山上发现一只花猫，长的非常可爱，他就把它带回来，每天饲养它。小花猫越长越好看，但是有一天额头上竟长出一个“王”字，哇！于是大家才忽然知道，原来这是一只东北虎啊！后来这位兵团战友回上海探家，就将小老虎带到上海，送到了动物园。谁知，他回东北后不久，上海方面竟发来了准许返城的调令！原因是：虎通人性！自打他离沪后，小老虎舍不下了，直耍脾气，也不肯吃食了。真是人因虎而得福。

我知道这事情是杜撰的。就算是真的，也不会有这么完美的结局。这不过是寄托着知青返城梦想的一个美妙的童话。在当时，人们还没有保护珍稀动物的意识。两头小熊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4）搭车之惊怵

我们团到绥滨，相隔有二三百公里吧。那时的路不好，大约要走大半天。那年春节后忙完了，我请假到绥滨去看我哥。经鹤岗、过鹤北、到萝北、穿名山，一路风尘。大客车在茫茫雪原上奔驰，真是雪天一色，横无际涯。那个景致，一辈子也忘不掉。

我哥的卫生所，工作和生活条件比起我们来，那是好多了。早餐我竟然喝到了牛奶和豆浆，还吃到了油饼。宿

舍里的床单竟然是白颜色的？怪不得我哥老说他们团怎么怎么好呢。我哥人缘不错，老是有同学朋友什么的来看我，让一帮大哥大姐宠着，弄得我还很是得意。直到现在见了那些人，我还是感到十分的亲切。

“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乡”呀。快乐之行就要结束，可是赶上了大雪封门，断路了！几天也看不见有车通过，眼瞅着就要超假了，我这个上火呀！我哥看我着急，也是一天几趟地到路上找车。

那天，推土机在路上总算开出一条“雪”胡同，汽车像在小一人高的雪墙里通行，但是总算通车了。一会儿，我拦了辆去师部送粮的车，那司机和我哥也是半熟脸，要不这大雪天谁还还让你搭车呀。

我上车的时候，麻袋上已经有一位了，后来知道是天津知青，要回家探亲。车开了，风卷着雪花直往我们脸上扑，不一会我们满身都是白色的了。好在大家都习惯了，在北大荒这是家常便饭。我俩挤在一起取暖，腿上盖了条破麻袋，感觉好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

“你们团多好呀，守着铁路线，探亲少遭多少罪呀”天津知青说。

“好啥呀，离铁路近也不让老回家呀。不瞒你说，我们那整天的小饼子，把脸都吃绿了。你们团竟然能吃到油饼，这不是共产主义吗？”我说。也许是我羡慕的语气让他高兴，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一口天津味儿，把他们连的生活演绎得活龙活现的。我这边跟听天津快板似的。“来几年啦？见过黑龙江吗？没见过黑龙江你算嘛兵团战士呀？”他一高兴，还把边防证掏出来给我显摆一下。那小红皮本子，很是让我羡慕了一番哦。

从他口里我才知道，要不是我哥有点面子，就像这个天津战友和这个司机是哥们一样，在这个时候想搭车，门也没有，说是上边有令。我问为何，起初他还不说，神秘地卖了着关子。最后耐不住一路上的无聊，还是给我讲了个仔细，又稀奇又惊险！

说起来那是去年秋天的事情，那天也是天不好，秋雨连绵的下了好几天了。一哥们开着大解放在赶路，一路上凄风苦雨，满是泥泞。路上偶有搭车的他也是会停车的（在北大荒一般搭车的都是兵团战士，加上交通不便车辆不多，所以多数司机路上搭客也是正常，还不要钱），但是团里有规定，凡是搭车的，不允许坐在驾驶楼里，这也是爱护驾驶员。

车开了一会，俩姑娘拦车。要说这司机那真是不错，一挥手，俩女孩跳上了卡车。喇叭一响，车走了。

这俩姑娘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杭州的，哪个团的不知道，好不容易请的假，到凤翔（就是萝北县城）玩的。俩人坐稳了一看就傻了，这车上怎么装着口棺材呢？太背了！天阴沉沉的，寒风一吹，又和这么口黑漆漆的大棺材零距离接触，这心里就开始犯嘀咕，越想越害怕，俩人挤在车厢一个角里，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吓得，不住地哆嗦。

雨是一会停一会下，车是一会快一会慢。俩人战战兢兢地靠在一起，四只眼睛就没离开那口棺材。就在俩人精

神处于极度紧张的时候，就见那棺材盖，兀自地刺啦、刺啦地挪开了一个缝。俩人汗毛都竖起来了，紧紧地搂在一起，大气也不敢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真是活见鬼了，她俩眼睁睁地看见一只手伸出棺材，在空中挥舞着……

俩姑娘的神经终于崩溃了，双双跳车而逃，造成一死一伤的惨剧。

其实她们看见的也是一知青，不过是先他们搭上车的。开始这哥们也有点含糊，好在胆子大、不信邪，其实也没别的招啊，一会就看惯了，靠在槽帮上就坐下了。走了没多远，下雨了。起初还能扛着，可那雨是越下越大，这哥们在车上是没地躲没地藏的。灵机一动，何不钻进棺材躲一下呢，总比在外边又冷又湿强吧。

钻进棺材，盖上盖，果然淋不到了，也暖和了许多，困劲上来竟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雨停了没有，这哥们使劲把棺材盖挪开个缝，伸出手去试试还下雨不……于是就……

从那以后，这一带兵团的车都被要求尽量不让搭车了。

（故事素材来源兄弟团，谢谢兵团战友）

东海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5）扔酒瓶儿撒气

我的大铁皮箱里经常存有几瓶北大荒酒。那年新年休息，天气还是很冷。那一天我有点感冒了，浑身发冷，不知怎么回事就想喝酒。正好头天晚上我们班又小小地捣鼓点饭菜，聚在一起小撮了一顿还有点剩菜，于是就约来我的一个同学喝点小酒，他也凑趣的拿出一瓶罐头来入伙，俩人就你一杯、我一杯的喝了起来。当时我们使的是三钱三的小瓷杯，当我们对饮了十杯之后那个同学不胜酒量就上别的屋玩去了，这时，另外一个班的我的同学正好进屋又凑了过来，坐在了刚才那位的位置，我又继续和他喝了起来。

那天可能是由于天寒地冻，又有点受凉所以对酒特别入迷，不知不觉又和那个同学喝了十小杯之后，他也觉得不想喝了，可是我还是意犹未尽还想找人继续喝。但是屋内无人就求他再陪我喝几杯，他死活不干到后来拿话激我说，他喝一杯我要喝三杯他就陪我继续喝。

我当时酒兴正高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坐在热炕上还出了点小汗浑身很是舒坦，一点没有喝多了的感觉。见他同意陪我继续喝酒就一口答应了。他并随手从两个火炕之间的炕头一个战友的箱子上，拿了两个同样的小瓷杯，我这边三个瓷杯他那边是一个瓷杯，我是三对一和他又重新开喝。每次倒满了四个小杯之后是我先喝完两杯再和他共干一杯，我是越喝越高兴，他是越喝越皱眉。等到他喝完第五杯，我又喝了十五杯之后，他死活不想喝了，坚决不让我给他倒第六杯。

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感觉还没喝够，就自己又倒了两小杯。在我还要倒第三杯他坚决的抢过酒瓶不让我再喝了！说道，你刚才和另外一个同学一人喝了十杯，又和我喝了十小杯后，你又和我改为你三杯我一杯后，我喝了五杯你又喝了十五杯，你算算你一共喝了三十五杯酒了？就说是三钱一杯你已经喝了一斤多了，而且每次你倒酒都是满满的绝对够三钱三，到现在为止你恐怕已经喝了一斤二两多了，说死也不让我倒酒了。我一想也差不多了，而且俗话说：听人劝吃饱饭嘛，就说行！我将那两杯酒喝完就收兵不喝了，但总觉得没尽兴。

等我将这两杯酒喝完，意犹未尽地拿着那两个空酒瓶子，到宿舍前面想将那两个酒瓶摔了解解气。走到外面一看，正好宿舍门前有一大块光溜溜的冰地儿，那都是我们每天洗脸洗脚后泼的水冻上的。我将那酒瓶狠狠的摔在那

冰面上，没想到那酒瓶一接触冰面后，却“嗖”地滑向前面蹦出老远没碎。一见那酒瓶没碎，我直纳闷！一赌气又将另外一个酒瓶更加使劲的摔向冰面，但是那个瓶子也像第一个瓶子一样没有摔碎蹦向一旁。

可能那天也有点喝多了自己并没觉得，见两个酒瓶一个都没碎，气得我又跑得老远捡回那两个酒瓶，重新使劲的想摔碎它，没想到那俩酒瓶依然像刚才一样丝毫没受损伤。但是我在宿舍门前摔瓶子的声音，引来了几个知青哥们的好奇，纷纷议论这酒瓶为什么摔不碎呢？有一位哥们不但不信还亲自过去捡回没碎的酒瓶子，自己试着也摔将起来。“砰、砰、砰”地响声招来许多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还有人看到只有区区两个酒瓶，不过瘾，自己又去他们屋拿出来两个，参与到我们摔瓶子的行列。

就在这时我们班的“万能人”，那位哈知青“大厨”走出来对我们说，在东北三九严寒时，任何一块冰面你若想摔碎酒瓶都是不可能的，除了你碰到冰面上有一些突出的石子类的东西，否则基本上酒瓶是很不容易摔碎的，不但酒瓶，就是所有的玻璃罐头瓶瓶也不易摔碎。大伙儿听他这么一说这一下更热闹了，谁信啊？人是越来越多的聚集在宿舍门前的不太洁净的冰面上。大家跟起哄似地，你摔酒瓶、他摔罐头瓶的，轮番上场试把，真是热闹极了！

而我此时却没有争抢的机会，冻了一会儿，被北风一吹感觉刚才喝的酒往上撞，赶紧的跑回了宿舍。靠在折叠起的被褥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没想到这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早晨，看自己已经被脱掉了棉衣裤，躺在被窝里，枕边还有很大的酒味儿呐。

班长见我醒了，赶紧问我，你昨天喝了多少酒啊？从中午一直睡到今天早上，吐得一塌糊涂！你的新毛衣都让你的一个女同学拿去洗了……哎呀！太丢人了！我赶紧向班长认错，说以后一定注意，决不再喝那么多酒了。班长后来笑着对我说，你云山雾罩地喝酒还不算，还要撒酒疯摔瓶子闹得这一栋宿舍都跟着你撒酒疯，整个一下午都乱套了！

如今一想起扔酒瓶儿的趣事，连自己都觉得好笑啊，当年真的太好玩了！

（故事选自兄弟团网，在此致谢！）

（6）猪头烀没了！

九月的北大荒夜里很冷了，晚上有时会肚子饿，兄弟们都是“胃亏肉”啊！聊着聊着，搞起了“精神大会餐”，有的想起了妈妈三十晚上烧的年夜饭，有的想起了九曲桥畔南翔小笼包，有的想起了早点摊上的炸粿子，芝麻饼，天津大麻花......。有的长长叹口气说：“别想那么多好吃的了，现在有一碗冒着热乎汽的阳春面，老子就快活如神仙喽！”真像俗话说的“想娘家人——孩儿的舅舅来了”，隔天一大早连长来派工，让大陈二陈哥俩去帮老职工杀猪。大伙都琢磨着：“有油啦！”果不其然，傍晚时分，就听见屋外传来几声巨吼：“都来瞧，都来看，

来晚了看不见啦！”引得土坯房里的知青们跑出屋子一瞅，“嘿！好家伙！”只见二陈哥俩正拎着一个血淋淋的大猪头，喜笑颜开得意洋洋。

原来，依循东北的风俗：猪头是留给帮忙人的酬劳，所以这猪头可是他俩辛苦所得哦！看到肉来了，大伙个个喜形于色，不用谁发号施令，大家七手八手忙开了，有的烧热水，有的褪猪毛，有的到食堂要来大粗盐，开心地忙活着，劲头十足。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把个大猪头收拾得雪白粉嫩，就差再找一个大锅了。二陈说：“别找了，就拿我的大铝盆呀。”女同胞们说：“去你的，又洗脸又洗脚，多恶心！”二陈说：“多涮几回不就干净了吗，要是等找到锅，天都黑了。”二陈把大铝盆涮了几回放进猪头兑好水、撒上大盐，又扔了几个辣椒，再扣上一个脸盆做盖儿，麻利放到烧火炕的灶口上，咕嘟咕嘟烀起猪头来了。

大陈对大伙说：“别都围着，里屋等着，打扑克去！”二陈说：“我来烀猪头，你们去玩吧。”大陈问：“你行吗？要不我帮你。”二陈拍着胸脯说：“你把行字后面的‘吗’去掉，我咋不行，您老就瞧好呗！”二陈比我们早到一年，就把东北话和北京话揉在一起说了。

众人回到屋里围在炕上打扑克，几把过后，大陈不放心对着外屋大声问：“二陈，好了吗？”二陈回答：“你以为放鞭炮呐，一点就响，等着！”又玩了几把，大陈又问：“二陈，快了吧？”二陈喊：“我再加点煤烧的旺旺的，再烀一会儿就好了！”过了一阵子，大陈忽然放下手里的扑克牌，不放心的对大伙说：“我得下去看看，二陈太二，可别糊了锅底子。”谁知他话音未落，就听到外屋传来一声闷响，炕上的人们来不及穿鞋了，跳下炕冲到外屋一看，糟了！一片白茫茫的水蒸汽，还加杂着一股子刺鼻的焦糊臭味儿，待到水汽散后，大家看见二陈的小脸黑一块白一块，活像马戏团里的三花脸小丑儿傻呆呆地站在灶前。大陈往大铝盆里一看，大铝盆底部烧了一个大窟窿，那已经烀好了的大猪头掉到灶膛里“吱吱吱”地正冒着火苗儿，燃得那个旺！大陈问：“怎么搞的？”二陈看着灶里烧被得冒油的猪头，一副傻样！回答：“没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二陈，突然爆发一阵哄笑，把二陈笑糊涂了，有人学着二陈的声音喊：“没了”从那天起连队里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俏皮话：二陈烀猪头——没了！

本来可以打打牙祭过肉瘾的烀猪头就这样被二陈搞丢了，真是扫兴！也就从那天起，有人拿二陈开涮啦！总会有人大声戏谑发问：“谁有烟啊？”也总是能听到装腔作势的作答：“二陈烀猪头——”众人再齐声回应：“没了！”

东海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7）惊天机密

在“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氛围中我们迎来了1971年的秋收，每天割玉米、割大豆、掰棒子、抱玉米秸，那叫一个忙，累。

那年我每天除了在食堂压面、贴小饼子、切菜之外，就是到菜地收菜，到猪圈看猪——食堂的猪老吃我们的剩饭，不知为啥老是喂不肥，个个长得跟狗似的，跑得比狼还快，要不就是给老职工打油称粮的。

忙忙叨叨的，到北大荒都两年了。感觉那年天冷的早，刚九月下旬，天已经很冷了。不时吹起的北风，夹着秋雨，那个湿冷的感觉，格外难受。雨靴里穿着毛袜，粘袜，还觉得冻脚。

天气冷，人心也不暖和。知青们下乡两三年了，初始的激情已经退去，“解放全人类，让世界一片红”的理想也在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困顿中消磨殆尽，眼看无望了。口号喊得皮了，语录看得累了，看不见前途，今后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没人能解答。老知青中的几位，时常在大会上就“第一国际正确还是第三国际正确、机械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区别”等争论不休。尽管我是不懂欧文、傅里叶他们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道理，听得多了，我也看出来了，其实他们也是一知半解，对马列，甚至毛泽东思想也是二把刀，没人弄得明白那“天书般”的辩证哲学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等等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收割那些离我们很近，马上就要冻在地里的玉米白菜，那是紧要的事。

此时，大家的心就像霜雾迷茫天地间的孤鸿，前途在何方，谁也没个数，真有点“赣江风雪迷漫处”的感觉。每天只是机械地白天出工，晚上学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周而复始地过着每一天。站在冰天雪地里掰棒子，指纹都磨平了，渗着血丝。在青纱帐里，你看不见人，但是能听到不知是谁在带着哭腔唱着“远飞的大雁”。哀婉的歌声，会把大家都带哭的。

这一年春节前，我们连自己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制作的放大彩绘【毛主席去安源】完成，立在大食堂的大门里，很是壮观；这一年“五一”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天安门上】绘制完成，挂在了大食堂的墙上。随

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等大幅彩绘相继完成，我们连的大食堂几乎成了红色画廊。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画像前请示汇报："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萦绕在大食堂里。

那天冒着阴冷的秋雨，我准备搭团部拉石头的卡车去拉粮。凌晨，在十三连拉完石头的卡车从我连经过时，我爬上了卡车。上得车来，看见几个跟车的已经冻得缩头端肩的人挤成一团。从衣服上看，该是北京知青，估计不是农工，他们的衣服都比较干净。仔细一看，个个还都是眉清目秀的，聊了几句才知道，都是团宣传队的。多年后的一天，好像在哪个俱乐部一起吃饭，说起那次凄风苦雨中的邂逅，大家还不禁打个冷战呢。

车到团部，我下车的时候，才感到踩在石头棱子上的棉靰鞡鞋都冻透了，脚怎么也活动不了了，在团部邮局的火墙上烤了半天，才能打弯。当时我就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在这样的邮局工作，那得多美呀？可惜呀，人家这里是"城市户口"呀，没咱什么事。

取信、办手续、装粮食（没人跟车，搭车的伐肩，我一人扛）、滚油桶（这就得求油坊的弟兄们帮忙了），一通瞎忙乎，回到连队，天已经擦黑（北大荒三点多天就黑天）。好不容易卸完车，赶紧上厕所解决问题。

厕所里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跟唱【三岔口】似的。刚蹲下，感觉厕所里还有一个人，未及辨认，那人说话了。

"刚从团部回来？"果然有个人，听声音是ZZ。

"你呀，吓我一跳"我答。

"团部有啥变化？"ZZ问。"水房要修新的了，以后给尤特加水就方便了……"我还要往下说，ZZ打断了我的话头。

"谁问你这个了""那你问……"我有点丈二和尚。

"嘘"ZZ停了一下说，确认没别人后说："团部大门前的宣传栏你看了没有？"压低声音问道。

"没看呀，还不是团党委的决议？"受他的语调的感染，我也有点紧张，但还是莫名其妙的。

团部办公大楼，也就是一座二层楼。楼前像许多那个年代的单位一样，立着一溜宣传牌，做得很是整洁，规矩。一般那里边都是团领导检查工作、关心战士、学习马列的照片和心得什么的。最近展出的是关于团党委决议的全文，大意是在全团掀起向政委同志学习的决定，所以我也没认真看。虽然自己没经历过啥事，但是这样的"决定"以我们十八九岁几乎还是孩子的目光看，觉得很自然。当然，这个宣传栏照例是要悬挂大量的毛主席，林副主

席的照片的。

“真的一点变化也没有，林副主席的照片还在吗？”ZZ的声音更低了。要不是我们俩都在蹲坑，估计他得把嘴凑到我耳朵上来。

“没发现什么呀？”我吓了一跳。

“你真的看见林彪的照片还在里边吗？武装连里还有人吗”ZZ问。

“看了，还看见政委写的【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献忠心的决心书】呢”我说，身上有点哆嗦，这可是掉脑袋的话题呀。

“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ZZ自言自语地说着。

光顾说话了，屁股冻得冰凉。往回走的路上我死活要弄明白ZZ神秘兮兮的说的是啥意思。

“告诉你吧，你得发誓不再对任何人说”ZZ说。

“向毛主席保证，绝不外传，就当是军事机密。”其实，能传到我这的军事机密估计也就无人不知了。

“咱可说好了，要是指导员问起来，你可前别说是我说的呀，打死也不说。”ZZ千叮咛万嘱咐地说。“哎呀，真够费劲的，爱说不说。”话虽这样说，但ZZ那神秘的摸样，还是紧紧地勾着我的好奇心。

在我的威逼利诱下，ZZ先是四下打量了半天，然后以极低的声音附在我耳边说道着……，哎呀！这可不得了了，如同五雷轰顶，如同天塌地陷。我懵了，站在那里半天没缓过劲来。是我听错啦？是我在做梦？还是ZZ神经了，成了现行反革命？……

ZZ啥时候离开的我都不知道，任北大荒深秋的夜风吹透了身上的衣服，浑身打着冷战，我回想着ZZ道出的惊天机密：林副统帅驾机叛逃未果，机毁人亡……我不敢想下去。

曾几何时，林副主席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元勋之一。男孩子对战争有着天生的偏好，林彪征战一生的经典战例我们都耳熟能详。只是文革后他不阴不阳的讲话，有时让人怀疑他还是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名帅了。今天的消息来的这样突然，这样诡秘，真让人不可思议。事情本就蹊跷，ZZ足不出连，他怎么知道的呢？直到今天也是个谜。

第二天，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我心里惴惴不安，看到别人还是那么虔诚的，欲说还止，甚至不时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嘴，以免泄露天机。

世界似乎没啥变化，我们还是一样的生活劳动。

不久，团部派出的传达九·一三事件文件的工作组到了，大食堂外边还站上了武装连的战士，端着冲锋枪，很是威风。我一哥们“白薯“也人五人六的站那了，见了我还似笑非笑的算是打了招呼。

事情果然如ZZ所言，林副主席真的出事了，但是全连也没掀起太大的波澜，大家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不久后我探亲去河南，河南老乡听了传达后有一段演绎，对此事的描述更具特色：“林彪挪着裙子（叶群。河南农民冬天穿的棉裙），拎着果子（林立果。河南人串门带的点心，以油条为主），上差了飞机（三叉戟飞机）跑了。”看看，老乡们的语言多丰富啊，他们的理解多精辟？这样的惊天机密，在他们那儿就是出门串亲戚上错了飞机呗。

（*故事素材来源兄弟团网，在此致谢！*）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8）知青趣闻

有人讽喻：知青情结是“自恋”，是“没有长大”的情感。想一想也有道理。唯有少年情为真，黑土荒原的青春情感应属“没长大”的青涩果，可这种知青情自我温暖，自我怀恋，不伤社会，不碍他人，不侮前者，不辱后生，自相思，自沉溺，自陶醉，有何不可?人心中美好的东西多种多样，各怀美梦真情难道比各怀恶梦鬼胎还可怕吗?

（一）

（1）姓氏与职务:

原直属x队（x连）干部和管理人员要么姓氏与职务一致，要么形成反差，很有意思，他们是：“吕队长”、“马兽医”、“孟（蒙）会计”、“贾（假）大夫”、“庄（装）老师”。若再加上“夏保管”、“胡统计”那就齐喽！

(2)几个月没来了？

当年北大荒的冬天滴水成冰、雪虐风饕。男女老少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头戴皮帽子，若不仔细端详会很容易搞错男女。医院中医科有一个医术不高又工作马虎、快六十岁的黄大夫，大家叫他“老黄头儿”。有一个冬日的下午快下班了，老黄头儿坐在看病的桌前，心思着下班后的事。这时敲门进来一个病号，戴着皮毛子、瘦瘦的、个子不高，老黄头儿接过他的看病挂号条让他坐下把脉，老黄头儿把着脉一会看看天、一会看看墙上的钟、心不在焉的问病人：“几个月没来啦？”病号以为问他几个月没来医院了，就说：“三个多月了。”老黄头儿马上说：“你怀孕了！”那位病号蹭地从凳子上站起来，一把抓下头上戴的皮帽子，老黄头儿抬头一看：“啊！男的’？！”这事儿闹的！

（3）因陋就简:

一天早上，后勤副连长在开全连大会前先念毛主席语录。他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惹得大家都哄堂大笑！副连长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也不知再说什么好，然后转入生产话题继续说道，雨季到了，连队有的房子破旧，漏雨需要检修。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叫“因陋就简”吗，因为房子漏就要检修！......说到这儿时，再次引起阵阵爆笑。

（4）秃老亮:

有一年初夏，师部调动一些团执行任务，每团派遣两个排去鸡西煤矿“倒煤”：将矿山的煤运到火车站。我们有幸跻身于其中。出发前高XX要剃头，大伙起哄让其剃光头。高说：钱XX剃，我就剃。钱说：王XX剃，我就剃。........一阵较劲，大伙全体秃瓢，顿时成了光头排。在鸡西，其他“倒煤”人受我们的影响，也有不少人剃成了“秃老亮”。

我们在鸡西劳改矿的上方干活，劳改犯的活动尽收眼底。热火朝天地干了没几天，有当地老乡对我们疑窦丛生，个别大胆的上来小心翼翼问：“你们这么卖力，每月挣多少啊？”，“32块大洋”。他们有些发愣了，瞪大双眼说：“96都没你们这么卖力啊，你们哪嘎嗒来的？说的话我们咋都听不真亮？”我们回答：“从上海北京天津来的。”他们好像恍然大悟似地：“从那么老远来劳改哦，一准是表现好才让你们跑外面来干啦？你们这么卖力干肯定能提前释放！”。好嘛！把我们当成劳改犯了。

（5）巧劲儿:

农工四班在建造连里最早那两栋土房时，有一次干上棚泥的活。小张爬上房，站在二层棚上泼泥，小兰在下边给小张挂泥桶，小张听到动静刚一提绳，小兰忽然一声尖叫：“哎！慢点!”大家忙问：“怎么啦？”小兰气急败坏道：“绳钩挂我鼻子眼了！”多悬哦！

（6）兵团战士喝错汤:

兵团战士有一首自编自唱的“喝汤歌”：“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暖洋洋、晚上喝汤勤起床、半夜喝汤想老娘。”最有滋味的“汤”是下边故事里讲的“汤趣汤事”：

春节到了，各班排分别自行包饺子。饺子包好了，使什么煮呢？干脆刷刷洗脸盆（兵团战士的脸盆儿，洗脸洗脚合二为一），就用它煮吧！火大心急，一会儿饺子煮好了，可劲儿造吧！打开北大荒酒瓶，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时间不长风卷残云一般，饺子、白酒一扫而光，个别的哥们就有点喝高了，一头倒在炕上歇息了。脑子还算清醒的知青们还把饺子汤倒了，用盆洗洗脸洗洗脚，来不及倒洗脚水也都睡了。半夜里一位喝高了的哥们口渴，于是想起了饺子汤，迷迷糊糊端起盆来就喝，还心满意足之感说道：“原汤化原食哦.....”。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起床了，昨晚上那位洗脸洗脚的知青哥们开始抱怨：“哪位倒洗脚水也不给我倒干净了，还剩点儿干嘛呀？”这下那位喝高的哥们真是如梦初醒：“啊！敢情我昨晚喝得是洗脚水啊！？”

（7）“孵化站长”：

下乡来连队的知青多了，住宿紧张，于是知青、老职工、职工子弟都在一起混住。5号宿舍里，其中除知青外还有车老板“老牛”、职工子弟广存等二十人。有一个深秋的夜晚，大家累了一天都睡了。

深夜时分，这时屋内发出‘吱吱”的声音，有人就被声音吵醒了，“老牛”也醒了，大声喊道：“广存！快把你逮的麻雀放了，别影响大家睡觉！”大家这时都醒了。广存回应：“我没逮麻雀啊！”此时“吱吱”声没有了，暂时平息了，过了一会儿，大家又听到“吱吱”声，大家这回听的可是仔细，一致认为是牛老板那里发出来的，牛老板只好起来翻自己行李。

东北人常说：“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别人一般不能翻动。大家也都知道牛老板行李特乱，谁也不愿帮他理。牛老板行李下什麽都有：毡袜子、旧衣服、旧手套、鞭稍等。这时牛老板好像发现了什么，只见他提溜着一只旧毡袜子往地上抖，不一会儿，五六支花生大小、肉滚似的、四肢蹬踹着、白里透红的小动物落在了地上。广存喊道:“哎呀！耗子！”一些知青头一回见到刚出窝的老鼠，真咯应人！于是都把头缩了回去，钻进被窝里不想再看一眼。第二天知青们很自然的又说起了此事，说来倒去的，不知是谁给牛老板起了个大号叫:“大东亚孵化站站长”。

（根据本连及兄弟连的回忆汇编）

（二）

1：忘了哪年的事儿，各连组织到营部看电影，大伙儿排着整齐的队伍，兴冲冲地赶到营部。明明电影名儿是《宁死不屈》，但是副指导员赵洪富却在放映后，解散队伍前说：“同志们，我们到营部来看电影，电影的名儿是《宁屈不死》。”这下把大伙儿乐得个个前仰后合，队伍立马都乱了。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大伙儿现在说起来，还是会笑半天。

2：我们连紧急集合，663副连长想说发现三架苏修直升飞机，结果他说成“我们发现三升直架飞机”，全连哄堂大笑，战备的严肃气氛全都没了。

3：甲哥们搞恶作剧在乙哥们的被窝里放了个冻茄子，晚上乙哥们一睡觉脚碰上了以为是个耗子，惊得大叫起来，同屋的知青“锅炉”帮忙打耗子，撩起被窝一顿胖削！把化软了的冻茄子拍个稀吧烂，只见烂茄汁把被子污染了一大片，这个悬案的真相几十年后才爆料。

4：连队统计A兄天天跑地号量地。某日天还未亮，他扛着拐尺又出发了。可能是工作太投入了，过了中午开饭老长时间，才见A兄风尘仆仆、灰头土脑返回。肚子饿坏了脸没擦手没洗来到食堂、已经没菜了。“没关系、没关系的”，边说边拿起俩馒头狼吞虎咽。“咦、各个迷头味道蛮好的吗”，A兄用上海话嘀咕，意思是别看没菜，今天馒头很好吃还有咸淡味。食堂人纳闷蒸馒头时没放盐啊、哪来的咸淡味？仔细一看，哈哈，A兄正流着大鼻涕，就着馒头吃的正香呢。

5：由于晚间临时取消了政治学习，大家显得格外兴奋。熄灯号已经吹过了，可就是没有睡意，躺在炕上东拉西扯，70多人的大宿舍里人声嘈杂，乱乱哄哄。忽然灯一下子被关闭了，顿时漆黑一片，屋里也刹那间安静下来。此时就听有人在高韵调地厉声大骂：“我X X X !谁关的!”片刻间一句声调更高气势威严的湖北腔传来：“你骂谁？！”原来闭灯的是连长大人，众皆哗然！

6：在紧张的兵团生活中，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晚间还要值班巡逻。说是巡逻也就是连部、食堂、马号和麦场等所谓重点部位走上一圈。冬天北风呼号，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被叫起来，还要穿衣戴帽，背上一杆枪出去转上一个钟头。迷迷糊糊地在漆黑的深夜迎风走着。走着走着就把上一班传给我的口令忘得一干二净。等转完了一圈，找个背风的地方靠一会儿，就该叫下一班了岗了。我只好随机应变，瞎编一个口令传下去：”口令是：身体，回令是：健康。”直到第二天早上一问才得知，原来应该叫：“口令是：保卫，回令是：边疆。”可当我问传到最后一班岗的口令时，发觉他们创造的口令更是离谱：“口令是：吃饭，回令是：喝汤！”

7：有一次记不清是和哪位战友去团部。兜里只有一点儿可怜的些许碎银，想着好友“武林高手”在连队喝豆芽汤。于是我毫不吝啬地掏出腰包买了肉皮冻放在棉袄兜里。回到连队把衣服脱了放到炕上。直到晚上才想起时，那些皮冻早已化成肉汁了！弄得棉袄兜里黏黏糊糊，只闻到肉味不见肉渣，我是欲哭无泪啊！那时有口好吃的与战友分享是多么高兴和难得啊，呵呵，至今我都为当年的年轻无知而感慨不已！

8：在北大荒的生活，虽然条件艰苦，却充满了无限的乐趣。记得刚组建75连的那个冬天，我担任农工排长。一天下午，大家拖着疲倦的身体从水利点刚进连队，就看见猪号那边围着好多人，走过去一看才知道，原来连里的一头猪被狼掏了。大半个猪头没了踪影，猪的肠肚拖出去好远，一派惨象。可我当时却突发奇想，便说“拖到食堂，给大家改善伙食！”当时，我也不知哪来的劲头，一天的劳累早抛到脑后。我带几位战友把“残猪”拖进食堂，三下五除二，大块猪肉就炖上了。不一会儿功夫，炊事班长就端着一上尖面盆的猪肉，来到我们面前。一股股肉香味立即充满了整个帐篷。大家蜂拥而上，会餐开始了。过程暂且不表。餐后，面盆里除了几块肉骨头外所剩无几。几个人喝多了，都横七竖八的躺下昏昏睡去。我当时也在其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突然感到口渴，便爬起身来。看到周边战友都睡得正香，屋外的夜空中星星闪亮，我知道已经

夜深了。夜色里我看见火炉旁有个小盆，里面有水。于是我随手端起来“咕咚、咕咚”大口喝了，然后“噗通”倒下，继续回到梦乡。“啊，这是谁干得好事呀！”一声大喊把我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天已经朦朦亮了。只见炊事班长一手端着小盆，一手在不停地敲打着：“这是我发面的碱水，怎么没了？”啊哟！我暗自叫苦，不知所措！此时我突然感觉自己的肚子里一阵阵发热，真可谓苦不堪言！

（根据25团集结号本连平台的回忆汇编）

（三）

青春，本身也可以是形容词，它是如此的感性，令人回想起年轻时美好的生活画面。而我们曾经的青春年华却多了几分沧桑......

（1）在北大荒时听说过革命样板戏《列宁在十月》吧？堪称经典。据说是天津知青里的戏剧高手所作，当时有人手抄，得以流传。摘录两段:

列宁（老生）唱：《西皮流水》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有件事朕与你细说端的，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花脸）唱：《二黄导板》道一声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呀-----（拖腔），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无产阶级的……

（2）某连指导员文化不高，他特别喜欢在政治学习读报纸时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以显示水平，引导群众。有一天他读报：“这个这个......，中东啊，有一个小国家叫黎巴……啊，这个小国家名字很怪啊，叫黎巴，别看它名字怪，那也是站在反帝斗争第一线的……”。然后他翻过报纸第二版接着读：“嫩！啊……嫩！这个这个……偶尔，党报也有印错的时候嘛……”

（3）某连开大批判会，声讨美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柬埔寨。一位老职工愤然上台，慷慨陈词：“柬埔寨人民一定能打败美帝及其走狗，他们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坚强领导，这三个人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他们的名字在广播和报纸上从来都连在一起……”

（4）文书给老连长写发言稿，引用了毛主席诗词：“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文书写钢笔字有点拽，“几”字写出了头，老连长眼睛又花，上台后高声读道：“小小寰球，有九只苍蝇碰壁……”。文书在台下急得小声提醒：“是几只……”，老连长又看一遍，不满地说：“是啊，九只啊。”文书急了，大声说：“不是九只，是几只。”老连长拍案大怒：“就是九只！毛主席说的还有错？后面还有九声凄厉，九声抽泣嘛……”，文书错愕！哑口无言……

（5）某连搞文艺演出，要老职工也出个节目。老职工求助知青，知青便代写诗朗诵一首，开篇词为“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因为这两句诗实在耳熟能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青为了省事就简写成“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谁料想上台演出的老职工均为“速成识字班”毕业文凭，很会“理解”省略号的个中含义，只听到台上集体朗诵声声入耳：“四海翻腾，腾腾腾，五洲震荡，荡荡荡……”台下观众先是愕然半晌，然后全体哗然、人仰马翻！

（6）某团召开全团批林批孔大会，台上一男高音与一女高音领着全场的人喊口号,震天动地：（领）打倒林彪！（众）打倒林彪！（领）打倒孔老二！（众）打倒孔老二！（领）狠批克己复礼！（众）狠批克己复礼......。口号声刚落，值班参谋从传达室匆匆跑来，对着主席台上的团首长大声说：“政委有电话！”全团官兵也齐刷刷地一起跟着振臂高呼：“政委有电话！”

（7）某位知青从兵团回沪探亲，受托捎信、带东西，串过不少荒友家的门。有两家的老母给他留下的记忆永远难忘。一位是从街道上退下来的，有文化，说话不落伍。听完他说的情况，很高兴。絮絮叨叨最多的一句话是：当时送"小ning "上山下乡，阿拉"老积极ge "。稍稍有点“跑题”，不知所云，难解其意。另一位从纱厂退休，是解放前童工出身的老工人。这位知青照例夸了我们团我们连一通，各方面怎么怎么好。工人老太太听完，面无表情，忽然直卜愣登地蹦出三个字：“好个屁！”令人顿时“闷特”，不知讲啥好，只能等着老人家下一句话：“再好，能有上海好啊？”呵呵，想想也是，什么地方能比得了大上海啊！还是工人大老粗实诚，怎么想的怎么说，不来半点虚的，最实事求是！

（8）《小故事——狼来啦！》小北京“穗儿”头发里长了虱子，没办法就剃了个秃瓢儿。“穗儿”本来脑袋就圆，现在变得光圆光圆的，特招人喜欢。

为了能呼吸点新鲜空气，晚上睡觉时大伙儿都是头向炕沿儿脚冲墙，“穗儿”也不例外。所以，他那个锃光瓦亮的脑袋瓜儿，就像个小号西瓜摆在炕沿边上，借着月光直闪亮。

那天半夜了，“穗儿”就觉得脑袋痒痒，好像有人用温暖的湿毛巾给他擦头，来回的擦，温存无比。他用手一拨拉，摸着的东西肉呼呼毛茸茸的，睁眼一看，一只“狼”正呲着牙用大舌头舔自己的脑袋。“穗儿”弹簧般的蹦起来有三尺多高，不是人声地大喊：“狼来啦！狼来啦！……”大伙儿都惊醒了，打开灯，啥也没有。“穗儿”一口咬定有狼进屋，要吃他，可没人信。排长不耐烦地说：“狼敢钻宿舍里来？别瞎掰了，大半夜的折腾啥呀，把门关严点，睡觉睡觉……”集体宿舍的门哪能关的住，一会这个起夜，一会那个下夜班，房门只能虚掩着。没过俩钟头，“穗儿”再次爆发鬼叫，裹着被子缩在墙角，吓得脸都绿了，浑身直筛糠。这回真的有好几个人看见了，就在大家起床开灯的一刹那，一条黑色的身影“嗖”的从门缝钻了出去，很像狼。

情况严重了！狼怎么会专门钟情于“穗儿”的秃头？大伙儿把“穗儿”的脑袋扳过来摁过去的细细端详，没有一点伤痕，圆溜溜的完好无缺。奇了怪了？难道是只温柔的母狼要领养“穗儿”？

当天晚上狼再也没来，也使大家折腾地几乎一宿没合眼。第二天晚上，大伙儿在排长指挥下布了局，准备好了棍棒砍刀，有负责看门的，有负责堵窗户的，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负责围殴……

到了半夜，黑暗中，宿舍门“吱嘎”一声，再次被挤开了，一条硕大的“狼”真的无声无息钻进来！它毫不迟疑，直奔“穗儿”的铺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排长一声令下，灯火齐明，刀棍林立，这就准备下家伙！

“狼”一点儿也不惊慌，乖乖的趴在地上，冲着大伙儿“汪汪汪”连叫好几声。有人认识它：“嗨！这不是老黄师傅家大黑狗嘛……”哎呦额滴神呀，这一场虚惊闹的！

排长觉得这里头有事，大黑狗接二连三的找“穗儿”起腻，肯定有隐情。他揪着“穗儿”的耳朵问：“说！到底怎么回事？”万般无奈，“穗儿”从被窝里摸出一只毛茸茸的小狗崽，闭着小眼儿睡得正香，“穗儿”抚摸着小狗无比爱怜：“我在麦秸垛里发现一窝小狗，实在好玩，就抱了一只……”大黑狗领着它的孩子欢天喜地。

大伙儿笑的呀，腰都直不起来了！

<u>（四）</u>

1、“顺鸡”

当年在北大荒，我们正是年少轻狂的青春期，生活条件又艰苦，各个连队免不了闹出些偷鸡摸狗、开玩笑的恶作剧，雷人糗事层出不穷。可谓妙着、高着花样百出。最经典的是某知青相声演员在一次知青联欢会上的一个段子——《顺鸡》：

长时间没有肉荤吃，知青们都耐不住了。连队就常常发生丢失家禽的怪事，于是乎老乡家的鸡、鸭、鹅都开始“坚壁清野”，赶上“一级战备”了。可单单连长家麻痹大意。半夜里他家一只小母鸡就被“顺”回知青宿舍。大伙儿都是同工同酬，当然想吃就同工，七手八脚就把小鸡的“衣服”给“脱”了。

按人类年龄算这小母鸡该算是个少女，这一丝不挂成何体统？！

知青里也有叛徒啊，这连长得情报后，气势汹汹就往宿舍赶，早有把风的通报给大伙儿。宿舍里人慌马乱、急中生智、慌不择路。就把这裸鸡塞到了两个铺盖卷中间。哥儿们几个立时端坐炕沿，以挡住进门者视线。

连长怒气冲冲进屋就问：你们谁偷我家鸡了？

没人偷！众答。

偷了！有人看到了！

没偷！

偷了！

沒偷！

忽然间连长由愤怒变为惊讶，声音也由大变小，眼珠子也似乎定住了。

坐在炕沿上的众哥儿们顺着连长的怪异眼神回头一看：

小母鸡光着身子溜溜哒哒出来了......

2、“顺猪”

连队里夏天只有在麦收时节才杀猪。知青们都“胃亏肉”，整天馋得直流口水。

一天，调到邮局的某知青来送报纸，看到有只大邮袋。把报向炕上一放，拿起空袋子拉着另外一位知青直奔猪号，蹑手蹑脚来到一窝小猪崽旁。小猪崽们正依偎围着老母猪做好梦，全然不知有灭顶之灾将要发生。该哥们看准一个，猛得拽住其后腿顺势扔出猪圈。小猪崽在空中划了个弧“吧嗒”昏过去了。“邮局”捡起往袋里一放，OK了！

第二天就见饲养员老王头一瘸一拐往卫生所走，大家关切地问候。“妈了巴子，我养它一辈子，它找不到自家猪娃了，咬我屁股，哎哟、哎……哟”老王头满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咬牙切齿！

大伙儿不禁对视，原来老母猪它识数！

3、谁是“于迎春”

某君。六八年下乡，分到物资转运站扛麻袋。转运站设在风光秀美的边陲小镇迎春。某君安顿下来后，给在哈尔滨上班的女友写信报平安。在信的落款处写的是‘XX、于迎春、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一周后，此君接到女友回信。通篇只有一句话“谁是于迎春？”外加三个“！！！”，笔峰所至，力透纸背！

4、谁是“角荣”

在全连“天天听”结束后，连首长接着全文传达中央关于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文件；“最近日本首相田中…和

角荣将来华访问…”一个困得迷迷噔噔的家伙发问：“谁是角荣？”一个不屑的声音传来；“首相夫人！”

5、《小故事——捉跳蚤》

北大荒的夏秋，不仅蚊子多，跳蚤也很猖狂。这种无翅、善跳跃、口器锐利的吸血小虫，白天蛰伏于知青宿舍的各个角落，到晚上才发起群体攻击。

蚊子咬了虽然红肿发痒，过15分钟劲就过去了。跳蚤咬可不行，被咬的皮肤上肿块一礼拜也下不去，只要干活热一出汗，就会反复发作，刺痒无比。跳蚤还挑人，同一铺炕睡着，它咬完张三，翻越李四，再咬王五……

挨咬的气急败坏，不挨咬的幸灾乐祸。

挨咬的反唇相讥：那是因为你血臭！……

不挨咬的喜笑颜开：血臭的安睡，血香的遭罪……

北京知青小付属于挨咬之列，而且排在前列，哪怕屋里只有一只跳蚤也优先钻进他的被窝。情急之下迫使他变得超级冷静，经过整整两个夏天的潜心研究实践，开发出一套抓跳蚤的绝活。

床头放只手电筒，睡觉不能穿衣，身上一个布丝都不能挂(衣物会给跳蚤提供藏身之所)，早点躺下，一动不动，静等。

大约半小时，就能感觉到身上有细微的爬行，就好像头发丝划过。跳蚤来了！这个时候跳蚤不咬人，它要爬到它最感兴趣的部位，从那开始，边走边吃，每隔几厘米咬一下，一直到它吃饱为止。

这时，嘴叼手电，四肢猛然将被子举起，你会看到几只跳蚤慌不择路，不停地跃起，又让被子阻挡落在肚皮上。此时跳蚤已经乱了阵脚，只知道蹦，忘记了爬，蹦又蹦不出去，一只只束手就擒。

这一拨儿把它抓净，裹紧被子放心大睡，今晚基本无忧。

此招屡试不爽，在机务排男生宿舍得到广泛推广。

被小付抓住的跳蚤全部关押在一个墨水瓶里，并不处死。

看见跳蚤在墨水瓶里毫无出路，作无谓挣扎，有人奇怪发问：一掌拍死算了，还留着它干嘛？

小付阴测测地笑：这些害人虫，速死太便宜它了，我打算让它们慢慢饿死......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9）没逮着！

我们兵团的“犬”事也特逗！

某年（？）一天，大家正在食堂吃饭。连队里各家大大小小的狗在这时也会不请自来，在桌子底下绕来绕去，等着有赏。

食堂中间摆放着装馒头和菜汤的盆啊锅的，此时就有几只馋狗围着那菜饭直打转，转来转去的，一机务排的知青瞅着生烦，忽然冲上去用脚踢狗。说是迟那时快，只听得大伙忽然一声惊呼！但见一只懒汉鞋在空中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砰”的一声，不偏不倚，准准落在了汤锅里，汤汁四溅！食堂里顿时像炸开了锅，好家伙，神啊！大家一齐乐翻了天！

另有一年夏季，一个傍晚，收工后我们回到宿舍，突然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吧唧”、“吧唧”的，走到宿舍门口细看，原来是一只大狗正在舔一个饭盆，众人不约而同齐声呐喊，那大狗惊慌地迈着碎步从众人身边迅速穿过逃之夭夭。大伙儿再仔细端详，原来是某位沪上老兄的饭盆子，不知是他犯懒没有涮饭盆还是因为没吃完午饭就去开工了？总而言之，肯定是饭盆里的残羹剩饭招来了饿狗。

该老兄闻知此事，大恨。发誓要将饿狗生擒，扒皮吃肉。我们开导他说：“不容易哦，狗是大大的狡猾狡猾的”。因为先前就发生过一次趣事了：

前些日子宿舍里一位北京哥们趁场院干活午休，就回到宿舍取些东西，刚进屋就发现自己的蚊帐中好似睡有一“人”，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大狗四仰八叉睡在帐中。因为屋内阴凉，前后窗大开，过堂风一吹相当凉爽，这狗真会选地方哈！见之匪夷所思的荒诞场景，那北京哥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啊，恨得直咬牙！速关好门，疾步前冲，企图生擒活捉。但是这狗却从容地跃出后窗，溜之忽也喽。闻听此事后，众人皆称奇！有人还幸灾乐祸得戏谑：“如此来讲，哥们睡的床铺岂不变成狗窝啦。”惹得这位北京哥们真是上火！呵呵！

再说这位被狗舔饭盆的沪上老兄还在费劲巴拉得琢磨着抓狗，听他正恶狠狠得自说自话：“本人自有妙计，非

得好好收拾这个畜生！”晚饭后，只见他拿回一个大馒头，神神叨叨得对我们说：“这个畜生不是爱吃吗，就用馒头当饵，引它进屋。把门关上，还怕它不上套？”“哎！你下炕去关门，它还不早颠儿啦？你总不能整个晚上就猫在外头吧？狗的嗅觉是很灵的，有人在开导他。他却回答：“这个问题好解决。”上炕寻出一根背包带对我们说：“把它系在门把上，门稍稍打开，只待那畜生进来一拽绳子，拉上门，到那时我等众人齐心协力，将其擒获，扒皮吃肉，过一番荤瘾岂不快哉！”。众人连称：“甚好!甚好!”都是馋虫给钩得！眼前均出现美妙幻觉，好像马上就有那香喷喷、热乎乎的狗肉在脸盆里烹煮了。有性急者恨不得马上就打回酒来，准备大口喝酒，大块儿吃肉！

天色已很黑了，大伙儿都陆续上炕就寝。我们趴在炕上，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位老兄如何施展。只见他把馒头放在房屋中间，又把绳子系好，上炕，双手攥着绳头，两眼开始炯炯有神紧盯着门口。我们也都等着那个畜生进屋，准备擒拿。由于干了一天的活，我们都已精神怠倦，便叮嘱他：“只要狗一进屋，你拉上门，马上喊我们，我们先睡了”。这老兄好像胸有成竹，答曰：“好嘞，我这儿盯着呢，你们甭管了。吹灯！”这觉一睡就到天亮，我们醒来一看，只见这位可怜的老兄还趴在炕上呢，手里紧紧还是攥着绳头，还在睡梦中与周公相会呐，再看馒头已然不见......

（10）猪油飘香

这是一位北京知青讲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这话一点不假。你别看这会儿大家酒足饭饱的，这个要减肥，那个要节食的，真要饿上几天，保准个个都跟恶狼似的，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一次吃玉米面饼子，单位里一丫头吃了一口给吐了，说：饿死我也不吃这个。我说，你是没饿着，真到了断粮那天，你抢都抢不到。这是后话，咱说说“想当初”。

到北大荒有一段时间了，除了干活太累实在令人难以承受——据说有个哥们竟然累得昏了头，十冬腊月，从头到脚脖子包了个严严实实，独独光着脚，一头扎进麦秸垛，咬着牙呆了半小时。活是干不成了，原来能跑会跳的脚也没了。此事不是我们连的，但是真事——扯远了。那就得说说伙食了。

见天的小饼子，冻白菜，别说吃了，看见就反胃，那也得吃。说起小饼子那也是说来话长。估计不少人都淡忘了，兴许哪位只记住当年的豪情未了，也来点忆苦思甜。

为了增加上交粮的质量，团党委的决定，把小麦尽量多地上交了。为了弥补口粮的缺口，有位“高参”于是就出了个“高招”，那就是以饲料的名义，用一斤小麦换两斤玉米，满足口粮的供应。你想呀，你要的饲料，就算那时候人老实，人家也没必要“快收快打备好粮”的给你。于是没晾干的玉米、潮湿的玉米面在麻袋里几乎发酵成

团，形象地说，往外倒的时候，要一边踢一边倒，要不然肯定倒不出来。

用这样的棒子面只能做小饼子，蒸窝头都站不住。难以形容其味的小饼子自然是人见人骂，于是大伙便迁怒于炊事员，起名叫“兔拽子”。炊事员也不傻，管小饼子叫“拽兔子”。这之中多少带了点自娱自乐的成分，咱谁也不敢骂呀，就拿自己人开心呗。现在是说起来轻松一笑，可那时候死的心都有哦。

有人说了，你们不是老偷鸡呀油的吗？其实在北大荒呆过的人都知道，能偷的机会不多，能偷的东西更少，愿意偷的人那更是少之又少。若不是被逼无奈，谁也不愿意去偷，咱都是受过高小教育的人呀。现在讲起来，偷鸡摸狗的当个乐子，那时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要不怎么还买鸡呢，那时候可谁都不富裕呀。

这一天该是愉快的一天，通讯员大梁从团部回来了，一回来，那就有信，万一谁要是来个包裹啥的，那可就有吃得了。在北大荒，那基本是原始共产主义，特别是吃的东西，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只要你能看得住。玩笑了。

这回是老平他妈想他了，在干校的老妈估计也没啥可寄的，但这独生子在北大荒“嗷嗷待哺”那也是个事呀。老平他妈还真行，竟然炼了好几斤猪油给寄来了。也搭着这边冷，一点没坏。特别是那装油的家物什别致，是他们家的大号茶壶。那壶我记得，在他家玩的时候我就看见过，上边还有一幅画，题款是“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壶嘴上还掉了一个茬，里边还渍了点黑泥或者茶锈。他妈也是，竟然连着黑茶锈都一并给寄来了。

猪油，那是什么东东哦！只一刻，香气就传遍了整个宿舍。这老平就是倒霉啊，邮包来得真是时候，正赶上开饭。闻到喷香气味后，宿舍里的人忽然一下都走了，安静的屋里就剩老平一人在看家信了。不知道他老妈说啥了，反正老平是翻来调过去地看。没一会，那帮去食堂得人像蝗虫一样赶回来了，好家伙！平时一人连两三个都吃不下的小饼子，今天每人都两手举着用筷子串成串的小饼子。

几乎是没人搭理还在看信的老平，一把把长把钢勺伸进茶壶，根本没人注意壶嘴上那黑黑的污迹。勺子下得深，有点像修水利时那锋利的桶锹插进草筏子，那个痛快！抹在小饼子上，猪油会就着热气渗透到玉米面的缝隙里。刚才还丑陋不堪的小饼子，瞬间就金黄起来，看着那么松软，咬一口，没得说了。要是撒上点白糖，盐也行，啊，那还有的比吗？

就在大家你一勺我一勺地暴吃小饼子的时候，老平看完信了，发现猪油几乎见底啦！他起身飞也似地冲向食堂。等他回来，掰开小饼子，用钢勺在大茶壶里转了一圈，也没舀上一勺猪油。他干脆把小饼子塞进壶里，干干净净擦了一遍，再用筷子把壶嘴里的油捅出来，心满意足地吃进三个小饼子......白驹过隙，如今当我沉浸在往日的回忆中，给大家神侃的时候，老平老婆（也是同连战友）来短信了，说他们正在祁连山间流连着呢。人家老俩口，自驾游去了。估计这会儿他们是想不起来那罐香喷喷的猪油了，可我们想着呢！呵呵！

（故事素材来源兄弟团，在此致谢！）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1）蔫人出豹子

蔫人，泛指其人言寡、喜静、体弱、不与人争、不与世争。但蔫人体内孕含的能量一旦爆发，说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犹不及，那简直就是“豹子”。

知青们都是远离故乡的小年轻，我们都不到20，一些兄长级别的也才25，6岁。基本是年轻好胜，吃软不吃硬，个别的还粘火就着，有时就会闹出点动静。兵团岁月也并非莺歌燕舞一片和谐，连队里辣火火的事儿也蛮骇人的。

我就曾目睹几次令人心惊的冲突。暂说其一:一天午休，忽然间“嘭”的一声，房门被人踹开了，只见一位平时蔫啦吧叽的汪姓老兄（上海知青）气吼吼地拎着捅锹闯进屋，那捅锹头铮亮锋利！情况不妙啊！众人齐声呵斥：“干嘛？要玩命啊！”原来他与我同一铺炕的北京哥们先前拌了几句嘴，可能觉得丢份儿，想过来出口闷气！此时，那位与他有过节的哥们正侧身躺着酣睡呢，被屋里嘈杂声即刻惊醒，立马坐起来拿着皮大衣护着自己，那位凶神恶煞一声不吭，抡起了捅锹径直前去......我们立即七手八脚拥上前去，摁住了这个愣头青，才避免了一次“非战斗性减员”。

本文再举三例，均是兄弟连的类似事例，也算是兵团生活的小小一景：

沈某，北京知青，时任连队卫生员，有一“独居”，外间处置室，内间寝室兼药品贮藏。小沈文雅，像个文化人，白静斯文，为人谦和。无论男女老少，口碑极佳。另一老实巴交的佟某不知为何与沈某冲突（要说连里最不可能打架的人，应数他俩了），未见有什么开场白，见墙脚立一锄头，小沈抡起就招呼至佟某的中段儿，寸宽的牛皮带应声而断（铲地的锄头被知青用镰刀头刮得锋利无比），万幸有皮带掩护，否则佟某就有破肚之虞了。

康某，上海知青，面白无须（有须，因其擅用两只硬币将胡子连根拔掉，随长随拔，故无须）。基建排做瓦匠，活儿不错，因买饭与泽某（北京知青，人不高但好斗，一副“别惹我”的外表，一般人还真不敢与其见个高低）发生口角，继而升级为拳脚，康某眼见要落败，忽抄起一大碗将泽某“花”了，反败为胜。而后一日康某跟车

去团部油厂拉豆饼，回连队卸车，卸车地恰与女生宿舍相邻，康某搬豆饼遇英某（北京知青），戏说“用豆饼照照你”，英某厌烦：你自己照吧！一手掀掉康某抱着的豆饼，不成想豆饼翻了个，竟将康门齿立时撞掉半颗，令人称奇！

张某，北京知青，面黧黑，人称“黑皮”,因常常犟头倔脑与众人抬杠，故被戏称为“布哈林”。李某，天津知青，人高且壮，孔武有力，平日与人也相安无事，但个性较强。一日他俩发生冲突至打斗，张被击义齿脱落，众人见两人强弱相差悬殊（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遂劝开无事。过不几时，大家吃喝、闲聊，休息。张蔫蔫的不知从何处觅一健身哑铃，近得身来，照李头部一击，李应声倒地，开了瓢，张得胜后也未再出手，出口恶气而已，可这下手也忒狠了。幸李某体质刚健，未留下后遗症。

沧桑往事，过眼云烟，一笑泯恩仇！在我们荒友聚会中时不时的重温酸甜苦辣的记忆，尤其是那股“辣劲儿”，侃不尽年少轻狂的恩恩怨怨，如今已成笑谈......

2011-10-15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2）小龙和他的师兄

我们于1972年10月23日中午告别故乡的亲人，离开风和日丽的上海北站。三、四天后的傍晚抵达风雪交加的福利屯车站，迅速装卸行李后坐上敞篷大解放，向25团、23团进发，此时天已黑。夜色中，巨龙般的长长车流亮着大前灯，隆隆挺进，绵延无尽，滚滚车轮扬起的雪雾挟着满天飘洒的大雪连成奇特的场景，使我们骤然领略了一种犹如征战沙场的神圣和悲怆。一路风雪兼程，我们第一次领教了真正的寒冷，从未见过夜幕笼罩中的混沌莫测的茫茫雪野，从未呼吸过如此冰凉的空气！

由于大家身上穿的是离开上海时的单衣，临到站时加穿了毛衣毛裤，随身只有件棉大衣，所有的行头全在箱子里，真是寒风冻澈骨！直到凌晨时分终于抵达25团招待所。大家赶紧跳下车，积雪和积水已漫过脚踝。可只剩大平还在车上下不来，原来他的脚上不知何时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只鞋，却浑然不知，致使脚部冻僵动弹不得了！亏得团部战友大哥把他扶下车，又立即背着他进了招待所。过去几十年了，大平至今仍耿耿于怀：“那可是老爹给买的新皮鞋啊！”

到兵团的上海同学中，小龙即是其中一个响当当的好兄弟！他现在还是我们上海知青的召集人，他的故事很多：

（一）惊魂一枪

记得是毛主席逝世的那年，76年10月2日国庆工休，小龙和姚连长（北京知青）借了杆猎枪一起去林子里打猎。遛跶了一整天也无战果，又累又饿。回屋后，姚连长去打饭，小龙也忙着烧炕。挺累的，他就往炕上坐，正好一屁股坐在那杆猎枪上。小龙顺手抄起枪摆弄起来，爱不释手，也没有看看子弹是否退膛......正巧他的师兄也打饭归来，进门后弯下腰把饭盒正往炕沿搁着，小龙就端枪杵住他的后腰，开起玩笑：“不许动！”师兄随手扒拉一下，“烦唻，快点吃饭吧！”小龙就想收手，可他的手指却在无意中突然触动扳机，只听”咣“的一声枪响！师兄即刻也是“嗷”地大叫一声，挺糁人的声音哦！小龙当时彻底傻眼，不知所措。只见他师兄捂着腰站在地上一动不

动，满屋子已经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

许多知青哥儿们闻声赶来，纷纷攘攘，倾刻间屋子里外人声鼎沸。“快看看伤着没有？”众人大声喊道。有人迅速将师兄扶到炕上趴着，师兄此刻也是痛地直哼哼。赶忙七手八脚地掀起他的衣裤，一看，艾玛呀！真是万幸啊！亏得枪口紧顶着棉衣服，铁砂子全散在棉衣棉裤上了，臀部却着着实实的被轰出老大一片乌青块！好像还无大碍，后马上送营部救治。真是太悬了！

两年后返城了，也是冬天的某一天，小龙在上海大街上无意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穿着一件兵团旧棉袄，后身有明显的烟熏火燎的痕迹，还有个窟窿，使他又猛地回想起那惊魂一枪，不会吧？一拍肩膀一回头，哈哈！果然是挨过一枪的师兄啊！

（二）机车陷入沼泽

每到秋翻地的时候，连里的拖拉机倾巢出动，远远望去，一台台“东方红”驰骋前行，翻起无数条黑龙般的土垄无边无际，甚为壮观！

当年的口号就是“多开荒，多种粮”，小龙和师兄为了多完成任务，总想在地头多翻出地块面积，有时会非常接近危险地带，有些冒险了。我们连地处三江湿地的边缘，大多数耕地的周围就是就是俗称“大酱缸”的沼泽地，驾驶机车必须格外小心。小龙直到今天还记得师傅曾经反复教过他一手：拖拉机在湿软地界遇到下陷时必须加足油门继续前行，千万不能刹车或换档。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傍晚，他师兄的机车却突遇下陷，眨眼间泡子水已淹到驾驶楼，小龙见状大势不妙，先把师兄从“大酱缸”里拽出来，赶紧摸黑跑了十几里路赶回连里报信。

连长闻讯立即布署抢险，那时一台“东方红”可是连队挺大的家当啊！能不急吗！机务排紧急应对，一时间机车轰鸣，烘炉房炉火熊熊，锤声“叮咚”震响，连夜打制铁链，气氛紧张极了。

赶到现场后，小龙拉着铁链一头扎进污黑冰冷的泥水中挂铁钩。因为要不时探出脑袋喘喘气，满头满脸糊着黑泥，眼睛也无法睁开，边上的知青哥儿们紧忙将备好的泡子水迎头浇下，一冲一激凛！不知经过几个回合才挂上钩，小龙可是被泡子水浇懵了，也冻得直哆嗦，北大荒的秋天多凉啊！等到大伙儿把他拽出来，好家伙！在拖拉机大灯的照映中，小龙活脱脱成了个“兵马俑”，全身全是泥！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3）“火烧房”

当连长以后，责任就大。全连100多号人，200匹马，战友们都侃我是：“号称300人马，山里点灯山外点明子、天高皇帝远的绺子”（东北话土匪、胡子的意思）。

我们是十七团的最边远连队，与绥滨县搭界。当时的政策是跑马占荒，谁开垦谁耕种。我们是把边的连队，于是就开始与绥滨县的老百姓争地。当时为了开荒，团里支援我十二台拖拉机开荒，而绥滨县也在我们这一带开荒，只有一台拖拉机。他们围着我们连队开荒，我们围着他们所谓的新建公社（新建的三间大草房子）开荒。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利益攸关，哪有不急眼的事。

那年秋后，十一月的一天，绥滨县老百姓在303芦苇站草场打草的七十多辆大马车，就把我们给包围在草甸子（荒野）里。当时我们是3杆7.26半自动步枪5匹马，六七个人，老百姓大约有二百多号人，把我们围得是水泄不通。

眼看天就要黑下来了，老百姓有人喊，抢他的枪！他们不敢开枪！我们一边往包围圈外面挤，一边往一起集中。这时候一个老乡举起四股叉就插向连队的卫生员杨国平，（这哥们是河南人，部队转业的特等射手，老百姓也真有眼力哦！）当时就插透左臂，血流如注。杨国平也真不含糊，一边高叫：日你娘！真干呐！抬手对着迎面的一个人就开了一枪，接着又朝天开了两枪，其他两杆抢也朝天开了几枪。在和平环境中的人听来就是枪声大作了，老乡们一面喊：开枪啦！杀人了！一面像潮水一般退去。

草甸子只剩下我们几个，一面给杨国平包扎，一面赶紧看那个被子弹打倒的人，我一看那个人浑身都是血，不知道伤口在哪里，急忙中把棉袄和棉裤都用镰刀割开，也没找到伤口。结果一翻身看到他右手四个手指头被齐刷刷的被子弹打断，赶紧包扎送团部卫生队。

也开枪了，自己人也负了伤，大家都默默无语的望着我，可能心里在想这下祸可惹大了，怎么办？望着大家困惑的眼神，当时年轻气盛的我心想：他妈的，一不作二不休！高叫一声：来人！天津青年倪梦奎、哈尔滨青年崔

佳，应声而到。我对他们俩说：我断定“断魂泡子”（那地方也真奇怪，叫断魂泡，据说当年被日本鬼子包围的18名抗日联军勇士，全部牺牲在那里，从此以后就一直阴风嗖嗖。）边上老乡盖的三间大草房子肯定一个人也没有，你们俩骑上快马把三间大草房子给我放火烧了！（真奇怪，当时竟没有人反对！）

要说“杀人放火”，知青们才不在乎呐，看热闹的不怕扎采大！说干就干！两个人骑着快马，一溜烟的飞奔而去。不到四十分钟，远处大火腾空而起，新建公社灰飞烟灭。从此以后，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传言，十二连的那枝子青年不能惹啊，连长姓“狼”，杀人不眨眼，惹急啦，屯子都给你点喽，杀个人芽儿不剩！

火也放了，人也杀了，可是这事不能完呐！绥滨县告到沈阳军区、兵团司令部。不久就在绥滨县，由省里、地方领导、兵团、师部领导、绥滨县、十七团举行六方会谈，地方上要当场抓人，关押罪魁祸首！这指的就是我了。幸亏号称李铁嘴的李副团长据理力争，他预先安排带去的二师军法处的人说：这位是兵团战士，我们要带回去，由军事法庭来审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开始李副团长就说:我们兵团战士一怒之下，把人也打伤了，房子也烧了，表示道歉了！可是人家绥滨县去的一位副县长，也姓李，很是厉害。李副团长的话音一落，他就在那儿一边卷着蛤蟆头的大烟泡一边就火气十足地接茬说：你们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呐！沈阳军区的兵团战士呀！你们是又杀人又放火啊！你们一怒之下消灭了我们一个公社，你们要两怒，三怒，再怒而不止的话，我这小小的绥滨县可就够呛啦！

当时不知死活的我，差点快笑出声来！幸亏李副团长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我才没笑出声来。从此以后，在绥滨县的地图上就留下了一个地名：“火烧房”。

(故事选自兄弟团网，致谢！)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4）春节吃狼肉

大部分人都赶在春节前，回各自的家乡、与家人团圆去了，剩下留守连队的人寥寥无几。

这一年的腊月，天格外冷。高纬度地域的冬天，白天很短暂，天亮时就已经九点钟了，而下午三四点钟时，天色即已经黑了下来。当地的人们早已经进入“猫冬”状态，什么事情都不再做了，因为需要做的大事情都在“数九”前均已提前准备好。在未来的两个月里，人们只是专著地等待着过大年、串亲戚。而留守的少数知青们却需要在数九寒天里，每天要去积满厚厚雪层的大田里，拉回一车豆秸。或者是到林子里,砍一车树木回来劈成绊子，用做烧火龙、火炕取暖用。除此之外，连长也就不再安排其它活计了。

二排大宿舍的南北两侧对面炕上，原本睡着三四十个年轻人，可眼下人都快走光了，偌大的宿舍只剩下了排长王xx、车老板儿陈xx、绰号“小红牛”等三、四个人留守。以往喧闹非凡、拥挤杂乱的房间，这些天来显得异常的空旷与冷寂。

为了排解内心的寂寞和孤独感，他们给自己找活干，几个人天天“栓车”进山砍树。一片片碗口粗的树被“剃倒”，将树干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劈成绊子，再将绊子垛满宿舍北面的通铺炕上，码起垛，高到顶棚高，劈好的木绊子几乎堆满整个宿舍房间的一半。宿舍内的火炕和屋内火龙墙的火24小时是不灭的，如此尽可能多多积攒一些木柴，是为了在过大年的那些天里，不必再上山，也不需要干别的活，可以在整个春节假期里，甚至整个正月里有充足的时间串门、耍闹、“侃大山”了。

上级为了让留守的知青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着力改善食堂在春节期间的伙食，畜牧连在忙着杀猪宰牛，团部还按人头，分给每人一斤大米，食堂伙食有了长足的改善。

整个腊月里，有经验的“坐地炮”的猎手们依然继续着他们的狩猎的营生，他们每天凌晨冒着零下四十度严寒，到距离黑嫩公路不远的那片山林里去打猎，还从未空手而归过：他们或是巡视前一天下的兔套子，拎回几只被细铁丝套子勒死后而冻得帮帮硬的野兔，或是捡回来几只用药“药昏”而冻死的山鸡，更幸运的人会从大豆地边的

林子里扛回一只因到豆地觅食而被步枪猎杀的、肥硕无比的狍子回来。野山鸡和野兔子是下酒的好酒菜，味道自然是鲜美无比，而狍子肉，即可以炖着吃，也可以剁成馅包饺子，其味道近似羊肉。这一切，在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的时候，猎户们自是喜气洋洋、乐趣无穷。

这样的好运是不属于北京知青的，尽管他们也有人从团部供销社花了95元购得一支崭新的小口径步枪，无奈他们不具备狩猎所具备的那份手艺与经验，虽进山多次依旧是一无所获，只能灰溜溜、眼巴巴地瞅着别人大口饱餐山珍野味而垂涎三尺，干着急无可奈何。

腊月二十五那天，排长王xx带着自己的人，早早的起了床，到马号套上一挂牛车进山砍树去了。凌晨的气温是最低的，凛冽的寒风如同锋利的刀片一样割得面颊生痛，出了门无需几分钟的工夫，呼出的哈气使他们的眉毛、胡须、眼睫毛上都挂满冰霜，上下眼睫毛因哈气凝结而粘到了一起，眨动眼睛都困难，皮帽的“护鼻”或口罩被冻成硬壳状，不戴护鼻子口罩的人，迎面吸一口吹来的冷风，能让人窒息得半天喘不上气来。凌晨的严寒，让驾车辕最勤恳的白脸花牛“拨愣”着脑袋不听使唤，不情愿在此时刻被栓车、驾辕进山。

几个人驾车向一块以前从未到过的山谷沟行进。牛车沿着厚厚积雪的雪原上缓缓地行进着，车轮碾压在雪面上发出“吱吱”的声响。牛车缓缓地转了两个大弯后，进入了靠近九号地南头的山凹里，对面坡上有一片黑、白桦与杨树、柞树混杂的林木。猛然间，白花脸的辕牛，仰起头，眼珠子瞪得如煮熟的鹅蛋清大，尾巴直撅撅地挺了起来，长叫一声停下不走了！知青们不知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跳下车，双手抓起伐树的板斧朝前方搜索着望去：只见前方不远处的一棵黑桦树旁，蠕动着一个灰褐色、长尾巴的犬类身躯，毛绒绒的身体微微的颤抖着、鼻孔急促地喘息、冒着白气。

年轻人胆怯啊，都是小心翼翼地举着板斧，几个人靠在一起，慢慢的逼近那微微颤抖的身躯。走近见到，有一猎户放置的、寒光凛凛的铁制狼枷捕获了一头灰褐色的、身躯修长、拖着长长尾巴的狼，狼的后腿被打断了，断腿连着的身躯在瑟瑟地发抖，那被人们形容为：勇敢，强悍、智慧、狡猾、凶残、贪婪、狂妄、野心、雄心等褒奖的词汇此时刻早已不知了去向！一双带着哀怨的、冷酷的狼眼，在咧着嘴巴呲出的尖尖牙齿的陪衬下，尚能流露出几分出骇人的凶狠模样。狼枷的另一端由一根细钢丝绳牢牢的套在那黑桦树干根部。那只可怜的、奄奄一息的倒霉的狼，见几个人围拢上来，挣扎着、拖着冰冷的狼枷，挣扎着力图作最后的较量。

断离了后腿、并冻僵了身躯而痛苦万分的林中强者，此时已失去了以往的威风。知青们兴奋地齐声高声叫喊着，一起围上前去，一顿冰冷的板斧就将那可怜的、原本就已奄奄一息的、昔日的林中娇子结果性命、送进天堂。

看得出，那狼枷是老谋深算的猎手下的。年轻人三下五除二利索地将大灰狼的尸体从冰冷的狼枷里脱出，扔上大板车。然后，知青们用比平素快一倍的时间砍伐并装满一车黑桦树干，用大绳刹牢。归途上，鞭子抽得“啪啪”作响，三驾牛的牛车一路连跑带颠儿，飞快向连队宿舍方向奔去。

“凯旋”了，年轻人的那个兴奋劲儿别提了！终于有了收获！心中以往那种见别人猎获后而忿忿的心理此时似乎平衡了许多。然而兴奋之余，每个人内心深处又不免为窃取他人的成果之举而敢感到有点儿心虚。咳！管他呢！“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也该着论上我们“风光”一回了！

回到宿舍，卸了车，排长招呼人打水的打水，烧火的烧火，几个人兴奋的手舞足蹈，兴奋极了。排长站在南侧的炕上，用绳子将死狼吊在顶棚上，学着人家吃狗肉前剥狗皮的样子，用一把锋利的短刀，给死狼来了个大开膛。一面剥皮还一面哼着小曲，沾满狼血的双手忙个不停。陈xx打酒去了，“小红牛”忙着烧火，将洗衣服用的大铝盆刷干净准备炖狼肉。

正值大家兴高采烈地忙碌不停的时候，突然间，外面一阵急促的狗叫声和狗爪抓门的声音，随后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人来。只见那人头带长毛狐皮帽，身穿光板儿老羊皮袄，脚蹬一双“毡疙瘩”，右手拎着一只长瞄子猎枪，下巴垂着一缕子灰白的山羊胡，一双浑浊的老眼布满血丝，激昂中带有强烈的怨愤，那样子是足有六十多岁的老人。他身边那只黑白花狗朝着正站在南炕上手上沾满狼血的排长和被吊在房梁上的血淋林的狼躯，声嘶力竭的狂吠着！“老山羊胡”愤怒地喊叫道：“干哈呀！想当胡子土匪咋的！？馋疯了咋的？个人没本事，还兴个偷啊！”“老山羊胡”的愤骂和狗的狂咬，刹那间让知青们那兴高采烈的火红场面顿然哑场，如红红的炭火被猛地一盆冷水浇灭一般。这突如其来的狗的狂吠与近似癫狂的人的叫喊、责骂声把他们惊呆了！似乎也丢尽了面子，那刚刚找回点平衡的心理，此时也彻底倾斜了，跨塌了，窃取他人成果之举的虚弱心理就如同是被抓住的贼一样难堪。虽然难堪，可是经历“文革武斗”洗礼的北京青年，那天不怕地不怕“爱谁谁”的性格是出了名的，眼前的尴尬逼得年轻人恼羞成怒，脸红脖子粗地抄起家伙，强词夺理地同老猎人对骂了起来：“老丫挺的！找死呐！谁偷啦！那儿写着是你的！……”双方的叫骂声、狗咬声响成一团，气氛越来越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双方的“兵刃”对峙孕育着“战争”即将爆发，年老的“老山羊胡”觉得对方年轻人多且气盛，自知不是对手，如此争斗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便以退为进地喊道：“小子们！恁等着，我叫人来收拾你们这群王八羔子！”说完，策身退门而去。

年轻人心里自然明白：老猎人“遛”套子、“遛”狼枷的时间，晚于他们到达栓狼枷子地点的时间，因而老猎头的成果被他们“提前”收获了。

“老山羊胡”走后，站在南侧炕上的王排长那紧握短刀沾满狼血的双手继续不停地挥舞起来。心里琢磨着：不管三七二十一，无论如何这顿狼肉也得吃上！大约有一袋烟的工夫，“老山羊胡”领着老连长进入二排宿舍。老猎头儿一眼看见已经剥下来的狼皮被刀子戳了很多窟窿，心疼的一个劲儿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唉哟妈呀！完犊子啦！好好的一张皮，给整成筛子喽！”见那“老山羊胡”如此心痛，犹如哭诉一般有些滑稽的表演，知青们方才晓得老猎人只不过是为了要回这张狼皮的。无奈这位排长的剥皮手艺不咋地，生米已被做成熟饭，本来能卖得一个好价钱的一张上好的狼皮给弄得千疮百孔，无法补救了。

山东籍老连长黑黑的脸膛、高高的颧骨，一双亮亮的小眼睛让人们看上去，就是个农民，外人根本不相信他是参加过孟良崮战役的老兵。平素里他对知青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酷似慈爱的老爹，他深知这些年轻人不易，况且过年都不能回家过年。父亲本能的疼爱的恻隐之情，一向对远离家乡数千公里的北京知青尤感为特殊。然而今日的场面让老连长显得格外为难。只见他一反常态，不停地责怪年轻人，申斥他们。

不管怎样嗔怒，年轻人在老连长面前总是乖巧得像羔羊，一言不发，任其数落而不在辩驳。终于，老连长累了，回头向老猎人说："你老看在我的面上，就饶了他们吧。这些孩子大老远地来到咱这嘎瘩，也不易，过年也回不了家。我儿子给我捎回来的泸州老窖我还没动哪！晚上咱老哥俩一块儿尝尝。我看这皮补补还能行，凑合用吧。年根儿底下，这肉就让他们解解馋吧。""老山羊胡"嘴里依旧是不依不饶地气囊囊地咕噜着："这叫啥事儿啊？俺从来没见过，这规矩都不讲了，还兴……""老山羊胡"嘴里仍然喋喋不休，在老连长的拉扯下，极其不情愿地拎着被割破许多洞的狼皮，被推搡出了宿舍的大门。

望着他们走出门去，知青们松了口气，彼此间作了个鬼脸儿，并情不自禁地会心地欢呼起来，虽然挨了一顿呲，可他们需要的"果实"保住了。过年夜时，他们也可以和"坐地炮"猎手们一样品尝野味了。正在暗自高兴时，老连长重新返回宿舍，手指点着他们每个人的头嗔怪地数落道："你们哪！尽给我找事，真不懂规矩？……你们知道那老爷子是谁不？那是二连指导员的老丈秆子，老猎头儿了，没想到让你们几个小子算计了。……往后啊，可不能再干这种事喽！记住啦？啊？……"直到每个人都认错地点点头，才算罢了。

老连长一面说着，一面靠近那只被剥了皮的血淋淋东西："这家伙个儿还不小，知道咋做不？跟烀狗肉一样，多搞（放）点大蒜跟辣椒去腥味儿。"说完转身出了宿舍门。年轻人心中无比感激，望着老连长那高大的背影，似乎像一棵大树，他们靠着他，可以遮风避雨，感觉很安全。

那年春节，知青们用狼肉又去换了些狍子肉、野兔肉、山鸡肉等。除夕夜，几个人围着两炕间的火龙墙灶台口上，用洗衣服的大铝盆炖着山珍野味，喝着连队自己酿造的苞米老酒，吃着虽不如狗肉那样细嫩、有点土腥味儿、但确也别具一格的狼肉，争抢着分食那颗硕大的狼心脏，那时，也顾及不上日后会变成"狼心狗肺"，面对着这些北国疆土上特有的、特具风格的野味佳肴，那一刻里，他们忘记了孤独，忘记了寒冷，忘记了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惆怅。

时至今日，每当回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心中总有一种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滋味，一些专用名词的"过去时态、现在时态"会不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比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珍稀国家濒稀动物，保护生态平衡、"扎根边疆干革命一辈子"、"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等等的词汇糅合到一起，就像倒了五味瓶一样，难以说清楚曾经做过的荒唐事：几年里，被屯垦成边砍光、剃平的万亩林子，当作柴禾而付之一炬；春天里，年轻人无情地赶走母雁，扼杀、餐食那一窝窝的在水泡子草甸子里尚未孵化出壳的"大雁蛋"、"天鹅蛋"等的生命；夏天里，

树林里里一声声猎枪的爆鸣声后，那一只只山鸡、野兔、狐狸、狼、狍子甚至黑熊瞎子都成为了贪馋的人们的盘中餐，此乃“谁之过”哦？！

只有在那样奇特的年月里，才会拥有不同寻常的经历。从另外的角度说，过去的岁月里，社会给了知青们一种特殊的经历，让他们领教过了磨难，经受到了锻炼，同时也让他们真正地接受了北疆边陲大自然所赋予的、然而今后再也不可以拥有的“恩赐”。

将会永远伴随他们一生的是那个遥远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寒冷而孤独的除夕夜，几个人围在火龙墙的灶口上吃狼肉、几个人分吃狼心的经历；那难忘的可亲可敬的老连长对他们的挚爱关怀；还有那位头带长毛狐皮帽，身穿光板儿老羊皮袄，脚蹬一双毡疙瘩，右手拎着长瞄子猎枪，下巴垂着一缕灰白的山羊胡的“老猎头”。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5）狼狈为奸

今天这个段子来源老垦荒人的传说，是否真的有狈，不得而知。

《百度》解释说，“狈”前腿短后腿长，只能趴在狼的身上才能行走。今天的科学事实证明，自然界有狼，而不存在“狈”这种动物。

在公园倒是见过犲，据说，犲是一种犬科动物，生性凶残，狡诈，常言犲狼为伍。也许狈就是说犲吧。不过不同种群，尤其是群居的狼，与其他种群的相容性不会很大。

六十年代一个深秋，有一戏班子，约七、八人，常年游走于东北各地乡镇演出。一日傍晚路经连珠山，此地荒山野岭，人迹罕见，一行人背着道具，急匆匆夜行。

忽然有人发现人群后面跟随一条孤狼，人们不禁惊慌起来，跌跌撞撞向前奔跑。那狼也不追赶，把嘴插进泥土里嚎叫起来，恐怖凄厉嚎叫声传至远方。片刻，周围四面八方的荒野，传来狼群的嚎叫，远远近近的叫声此起彼落交织如网。

人们惊恐的拼命地狂奔起来，慌不择路地乱窜，这时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四下里狼群的叫声越来越近。正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发现一片草甸中有一个大草垛，人们争先恐后地跑了过去，急急忙忙爬上大草垛，在惊魂未甫之中，四周出现了簇簇黑影、萤萤绿灯，二十多头灰狼围绕草垛自成一圈。

人狼对恃处在弱势，人们惊恐不已，看来在劫难逃，胆小的嚎啕大哭，有人吟诵佛经祈祷上天保佑，更多的人紧紧抱成一团唯恐掉了下去惨遭狼口。不一会有狼耐不住美食的诱惑，扑了上来，又从草垛上滑了下去，更多的狼扑上来纷纷滑下去，有人拿出道具长矛敲打恶狼，被打的狼嚎叫着滑下草垛。于是狼群对着草垛围成一圈，毫不放松。

人们发现有一只狼悄悄地离开狼群，不一会儿，这狼又回来了，背上搭着一只瘦小的黑狼，走到近前，那黑狼

放下前爪走了过来。人们定睛一看，那狼前腿短小行走不便，那狼摇摇晃晃围绕草垛行走一圈，坐定跟前，侧着脑袋停了一会儿，于是走上前来叼着一口草往外拽，这时只见群狼纷纷前来叼着草秸往外拽，不一会儿草垛便摇摇欲坠，人们呛天喊地哭声四起！

这时草垛轰然倒塌，人们随着一阵锣鼓钹的撞击声一起滚倒在地，爬起来准备逃命，却发现群狼玩命似地四散奔逃，人们立刻明白了是锣鼓钹的锵锵声音吓得群狼魂不附体！

人们立刻使劲敲打起锣鼓、吹起小号，驱赶群狼，而那只黑色的狼首领（狈）因前腿短小行走不便，落在了后面。人们冲上去一顿乱棍，把它打死。那黑狼（狈）的痛苦的惨叫和哀嚎声令失魂落魄的群狼惊恐不已，不一会儿群狼踪迹全无。于是人们一路吹吹打打走出了险境，直到天亮……

2011-11-27

狼肉白瞎了

作者：王广斌

来源：http://blog.sina.com.cn/zhxyw

教导员是我们很崇拜的打猎高手，因为他枪玩儿得好，打得准。

记得一次他骑车下连队时身背一杆步骑枪，车后架上驮着他刚捕猎到的一只狼，乐呵呵地对我们说：“快招呼几个人采蘑菇去，留俩人拾掇一下，好好炖点儿狼肉解解馋。”大家听了那个高兴啊！断了好久肉荤，今儿就能吃上狼肉，机会难得的野味啊！哈哈！“毛主席万岁！”大伙兴奋地狂呼乱号。随即欣然领命，各自忙活开了。

这已是近两年教导员打的第三只狼了，所以我们对他能打到狼并不感到新奇，就是是对狼肉感兴趣。好几个人进到林子去，不大会儿功夫就采满了一土篮子，有榛蘑、草蘑，还有紫蘑和花脸蘑等，兴冲冲地拎回来，七手八脚洗干净，倒进已放好狼肉的大盆（铝制洗衣盆）里，烧火续水放上大葱大盐。大家团团围坐在炉火旁，边神聊海侃，边候着狼肉出锅。

看着大盆里的肉在热汤水里翻腾，弥漫着诱人的肉香，刺激着大家的味蕾，馋瘾难忍。忘了多长时间，终于炖熟了，大家真像饿狼一样盯上了，有人竟不顾汤汁烫手，迫不及待地下手捞出一大块儿，忙不迭地放入口中。就在大家抄家伙要大快朵颐时，最先吃肉的那位仁兄“呸”地吐出了口中的肉块儿，“好烫！妈的，啥味儿？”只见他不住地用手向嘴边搧呼着，气急败坏的大嚷：“都别动，有毒！”大家不明就里，忙问怎么回事儿，他亮着大嗓门

吼道："哪个缺心眼，竟然采了毒蘑菇，好好的一锅肉，这不白瞎啦！"我也舀了一点儿肉汤，小心翼翼地用舌尖儿舔了一下，真有一种又麻又辣的感觉，完了！白瞎了！我也立马也加入了咒骂的行列，心里那个怒啊！大家彻底体验了一把什么叫作"煮熟的鸭子飞了"。咳！没辙了，最后只得极不情愿地、眼巴巴地看着一大盆香喷喷的狼肉被倒进了茅楼。因为随便倒掉怕毒着连里其它牲畜。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是耿耿于怀......

2011-11-25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6）羊进狼圈

曦吞大野岁月更，无边风月映晨星，铁马金戈今似远，余霞天际唱黄昏。

整个夏季，日复一日。一天后半夜大约一点多钟，一位知青突然发疯似的闯进宿舍，他那近乎绝望的恐怖腔调把沉睡在梦乡的知青们全部惊醒：“羊进狼圈啦！！”“羊进狼圈啦！！！”“大家快起来呀！！！”朦胧之中大家纷纷坐了起来，“羊进狼圈？”等听清楚他喊的内容，立刻有人破口大骂，“你瞎胡嘞啥？找抽呐！”这小子这时似乎清醒了一点，他大口喘着粗气说：“大家快起来，狼进羊圈了，大金子正逮它哪，赶紧去帮忙呀！”闻听此言大家（有三十多人）都纷纷穿好衣服，从铺底下取出镰刀、二齿叉子等家物什迅疾冲出宿舍，把羊圈团团围住。

还得从头说起。晚上，本地青年大金子照旧要到羊圈溜达溜达，巡视一遍，他趴在羊圈门口张望，啥也看不见，里面黑洞洞的，但就觉得满圈的羊不停的贴着圈墙跑，不祥之兆！肯定有问题。他也不敢把羊圈门打开怕羊跑了，就跑回去把那个来报信知青叫起来。

两人一起进了羊圈关好门，把马灯高高的举起照亮查看，这时才发现有一只比普通黄狗大一圈的狼，夹在羊群中贴着个头高的几只大羊身边跑着，羊群跑过的地方露出了几只死羊。大金子毫无惧色立刻冲进了羊群，顺势抄起了狼的一只后腿，只见这只狼猛地回过身来，一爪子挠在大金字的面门上，把鼻孔都挠破了，脸上划出几道深深的血印，看着满脸淌血的大金子，那个知青吓得惨叫一声扭头撒腿就往我们宿舍跑，于是发生了之前一幕。大伙拿着叉子、镰刀高举火把包围了羊圈时，就见大金子用身体牢牢的挤靠着羊圈的大门。

当时，大车排长叫“许大马棒”，按东北话讲是个“虎了吧几”的主儿，他把大家分成三组，一组守住东墙头，一组守在西墙头，（东西墙头上边都有通风口）他带着十个人堵住羊圈门口，大家一起呐喊着，冲了进去。狡猾的恶狼看到外面人多势众，嗖嗖几步爬上了墙，从西面的通风孔窜了出来，就落在我们准备好的包围圈。大家不停的大声叫喊，挥舞着火把，挥舞着二齿叉子、四齿叉子和镰刀......由于心存恐惧大家都不敢围得太近，三十多人把狼团团围住和狼暂时形成了对峙。看着孤立无助的狼，远方又传来噪杂的人声，其他连的知青也赶来支援了。当大家感觉到这只狼跑不了的时候，个别人有些懈怠了，一个北京知青就把手里的四齿叉子叉头朝下杵在地下，用

嘲弄不屑的眼神瞅着那只绝望的狼。

突然这只狼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向了这个北京知青，惊慌中他来不及反应，狼爪已凶狠地经搭在了他的肩头，他下意识的用拄着四齿叉子的双手向外一推，身体向后倾倒，只见那只狼从他胸前一跃而过，狼的后爪在他手上挠出一道爪痕。当大家缓过神来时，这只狼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夜色里。

在大家的一片叹息中，排长安排几个人把受伤的大金子和北京知青送到医务室清理包扎伤口。当时医务室的大夫是个老“右派”姓李据说还是个专家，他立即提出让这两个受伤的赶紧送往大医院打狂犬疫苗，但是领导当时没有同意，主要是考虑夏季大忙时节，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影响生产，就搁置了下来。一周后，大金子突发高烧，连里派车把他和我们那个倒霉的战友送到大医院救治并注射疫苗。经过治疗大金子又重新回来了，那个北京知青半年后借机办病退回京，后来据说还没事。

但是过了两个多月，大金子旧病复发，狂躁，高热、恐水，经医院诊断已是狂犬病晚期，无法医治。为了避免传染别人，在连队的外围，给他找了一处废旧的土坯房，派一个二牢改护理他，在他清醒的时候给他喂点饭，在他迷糊的时候把它捆起来，过了不长时间大金子去世。

就在大金子死后没有多久，天气渐渐的冷了，羊圈的羊群也发生了异常。一开始有两只羊不吃不喝，逮谁顶谁，把这两只羊关在一间小土房里，两只羊就使劲往后退，一直退到房犄角，然后相对着冲上去，高高跃起头顶头拼命的撞在一起，砰的一声同时倒了下去，过了几分钟两只羊又晃晃悠悠的站起来重复着之前同样的动作，紧接着羊群里有越来越多的羊犯起了同样的毛病。经过兽医确诊，这100多只羊都传染了狂犬病。

为了防止扩大传染当时提出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是就地屠宰挖坑焚烧深埋；另一种意见是宰杀后将毛皮和内脏挖坑焚烧深埋，留下羊肉，理由是经过高温烧煮超过两个小时可杀死狂犬病菌，当然这是大家都乐意接受的方案。于是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能吃到水煮羊肉了。食堂没有那么大的锅，每天就用给牛马餇料的大锅，一锅可以煮四只羊。锅里灌满水撒多半簸箕大粗盐，放一挂辣椒，烧开锅后焖一宿，这下可是吃了个够。

（故事素材选自兄弟团网，致谢！）

2011-12-06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7）排烟筒口熏糖饼

在连队里，寒冬时节有些空闲，荒友老兄们就会凑一块儿闲扯哩哏儿棱，会常讲起我连西北边的一个屯子里的所见所闻，使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72届上海知青听起来贼拉拉地新鲜有趣。比如那些所谓的“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十七八的姑娘叼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还有瞎白话（bai-ho）“屯迷糊”（如此称呼老农有些大不敬了）“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等等，尽是些俏皮嗑，老多老多啦。您想啊，这大雪刨天的能躺在这热炕头歇息，谁都觉着无比的惬意啊，倘若在炕头上再支上大木箱，来几场“四国大战”，纵然耳边响彻那些抢不上槽的“瞎参谋”、“滥干事”的傻吆喝声，我自昏天黑地沙场鏖战，“军长师长”、“炸弹地雷”的痛快劲儿，就别提多美啦！

但是连里在猫冬季节会有许多无法猫冬的活计，伐木备料就是其一。

七四年的冬天，连里派我们班夜里去拉木头。说是拉木头，其实是“拣”木头，都是林区里伐倒的现成树木（也不知何处得来的情报），这可是不拣白不拣哦！所以得半夜三更去，必须的！地点很远，去往大北边的树林子，来回有六、七十里地。傍晚收工后俺们都麻溜儿地吃完晚饭，揣满一肚子白菜豆腐汤加大馒头，个个五饱六撑。有位老哥看着发笑，“哎呀，瞧你们这饿狼样，夜班有夜宵，食堂给咱烙糖饼啦，呵呵！”真是的，不大一会儿，忘了是谁，兴冲冲地还真捧着个包袱进了屋，“来啦，香喷喷的糖饼！”我们好感动，连首长和食堂姐姐们真是想得周到！那年头，这可是上等干粮了。

夜里八九点多钟也该是待在热炕头的时辰，我们穿棉袄打绑腿吵吵嚷嚷地出发了。屋外寒风凛冽，月光下亮闪闪一片冰雪，（直到现在还在寻思，北大荒的月亮咋就这么亮呢）。拖拉机拽着大爬犁轰隆隆启动了，卷起阵阵冰雪。哥几个围坐在爬犁上，有人在唏嘘：“今晚又餐风露宿喽！”看着清冷亮白的月亮，再看看几位被月光映得灰白的面孔，俺们唠嗑了：“哎！老穆，这月亮那么亮能晒黑脸不？”老穆满口津味，乐滋滋的，“嘛玩意儿，听老人说是越照越白。”是啊！说了归齐，介人就是有研究，看这老穆平常不言不语，在屋里常常自我陶醉地拉起二胡，（至今记着那首如诉如泣的《江河水》，琴声悠悠令人思绪万千啊）。颇有内涵的少连兄也接茬了，“要说这

月光吧，对树木有用，能使树木长的不松软，真的。”少连兄老有学问了，他讲的有点在理，他可是满肚子的《三国》《水浒》哦，我们在炕头上没少谈古论今。（许多年以后才晓得他是某位荒友作家之胞弟）

夜里可是真冷，拖拉机前行时卷起的冰雪劈头盖脸，挥洒在我们身上，寒风刺骨越坐越别扭，于是开始抽烟吧。哥几位冻得抖抖嗦嗦，摘下棉手闷子，掏出小烟袋，多半会儿才能卷起一根“哈蟆头”，这种暴烈的黄烟叶也是许多荒友的最爱。记得到连队的当天，一位天津哥们就赏俺们这口，说是有劲、过瘾！抽头一口就噎得差点背过气，后来也抽上瘾了（俺们那儿开春后道路翻浆运输不畅，小卖店里的烟卷常常断流，只能抽旱烟）。俺们后来又加以创新，从上海捎来烟斗丝，与大烟叶掺和后立马上了档次，满口余香不亚于后来的凤凰烟。在这荒凉寒冷的荒原雪野，嘬上几口，冒冒小烟，星星点点的寻点小热乎解解无聊。尽管由于嘴唇皮被冻皴了，不时会被烟纸粘出血，还怪疼的呢。

雪夜驰骋近俩小时，我们到达林区，大风吹动树林子的动静真不小，“哗哗”巨响。拖拉机前不时奔窜着惊慌失措的傻狍子，它们是被拖拉机的灯光吓着了。林子里积雪漫到膝盖，我们“吭哧吭哧”扛啊抬啊，也不知忙乎到后半夜啥时辰才装满爬犁的，累的够呛！

身上的汗把内衣洇湿后又被嗖嗖寒风猛灌，不一会儿就是透心凉，肚子也空了。“来了嘿！”听到一位北京哥们大声吆喝着，只见他正蹬在拖拉机履带轮上，双手握着排烟筒在焐手。嘿，真哏儿！哥几位呼啦一下拥了上去，好家伙，可找着热乎地儿了！“XX！这树林子还不能点火！要是在别地儿，拢堆火烤烤多美啊！”牢骚归牢骚，林子里禁火的规矩还得遵守嘛！排长把糖饼拿来了。大伙儿真是饿坏了！纷纷像打劫似地抓上了。我也先拿了两个，上口一咬，嘎硬，冻得梆梆硬哦！只能慢慢嚼着，后来看到有哥们在拖拉机排烟筒上熏着饼，我去瞅了瞅。还别说，排烟筒“突突突”的冒出的烟气蛮热的，我就凑上去，也是两手端着糖饼也来回翻着熏，软乎了，热乎了，真不错，连吃几个也忘了。大伙儿轮流着熏糖饼，这个忙乎！吃饱了后就觉得嗓子眼里总往上泛着一股机油烟味，连打嗝都那味儿，吃的是口干舌燥，只能在雪地里扒拉开浮层，搂几把白雪吞吃解渴。

至今都忘不了这一顿很有北大荒特色的荒原夜宵，别有一番机油味啊！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8）高烈度冲突

那年的麦收结束了，六八年刚到兵团的知青们累得不善。到兵团几个月了，愣是连团部都没去过，更别说附近的大城市佳木斯了。大家都渴望逛逛这个位于松花江畔的美丽的佳木斯，趁着有两天假，20多个小伙子相约上路了。

大家在团部胡乱转了半天，到车站一看，才知道从鹤岗到佳木斯的火车每天就三趟，中午的过去了。等这帮小子乘坐下午的火车到佳木斯吃完饭的时候，天都黑了。住哪儿呀，旅馆？那肯定不行，谁舍得花两三块睡一晚上觉呢？年轻人好对付，大家一商量决定就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忍了。

一夜无话。天刚亮，大伙发现队伍里少了几个人，一看都是哈尔滨的。“哪儿去了呢？这要是把人丢了那还了得？”析析心里想。析析是排长，在这帮人里很有威信。虽说是自己出来玩，但是对战友的责任感还是让析析感到很是着急。“都跟我出去找去，找不到人咱们也别玩了！”析析下了令。大家仨一群俩一伙的在佳木斯站前大街一带开始寻找战友。

佳木斯不大，没转多一会，消息有了。原来那个人几个睡不着觉，在冰凉的候车室里待着也是别扭，决定出门看看，也顺便看看哪儿能吃早饭。早点铺子还没找到呢，他们就叫工人民兵盯上了。人家见这几位东张西望的，浑身上下打满了补丁，满脸黢黑，估计不是小偷也是要饭的，定是盲流无疑，就给抓起来了。

经人指点，析析带领一干人等找到了关人的地方——合江军分区大院。进了大院立刻有当兵的围了上来，问明情况，也说了一大早是送来了几个盲流，放人可以，但是要证明。这不是要了这帮小子的命吗，兵团战士哪来的证件，更别提证明了。有人带了八连的饭票，上边倒是有八连的伙食专用章。一般来说，那几个人也没犯什么大事，又有这么多战友证明，把人放了也就算完了。可是那些当兵的就是认死理，非要证明。

“你们一帮小盲流，敢到老子的地盘撒野”楼上一个军官摸样的人出口不逊。后来才知道，这人是合江军分区政委，或者是副政委，姓卞。“谁他妈是盲流，你说话干净点”析析等哥们也不是吃素的。双方对骂起来。

正骂着呢，来了个小干部，趴在卞政委耳朵上嘀咕了几句，卞这才骂骂咧咧地同意放人，原来还是那几张饭票管用了。他们向同在佳木斯的兵团司令部汇报了此事，兵团司令部又和我们团联系上，证明了这帮人的确是兵团战士，虽然不是正规军，但是也都是沈阳军区序列呀，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走出军分区司令部，大家逛街的心情一点也没有了：还没怎么地呢，就当了一回盲流子了。街可以不逛，但是刘英俊墓那是要去拜谒的——可见那时候的我们，是多么向往英雄，崇敬英雄呀。

照完相，就赶快往佳木斯火车站跑，生怕赶不上回去的车。就在大家没精打采地糗在候车室那没事干的时候，豆豆跑过来压低声音对析析说："排长，那边有一个小偷。管不管？""小偷？管，怎么不管！"析析也是老红卫兵出身，虽然都是过眼烟云了，可是还有点就怕消停那股劲，"哪呢？"。

顺着豆豆的手指一看，还真是个小偷，正下手呢。这帮人也不困了，个个都来了精神，一天来的窝囊气全发在小偷身上了，没几下子就把小偷给制服了，一顿拳脚之后，决定扭送公安局。就在大家觉得干了件漂亮事的时候，情况却急转直下。

先是几个小偷的同伙冲了上来要救人，接着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仅从口音上判断，就误以为是外地人欺负本地人。再加上小偷们的宣传鼓动，大喊什么"日本鬼来了怕一阵，国民党来了怕一会，知青来了怕一辈。看看，这就欺负上我们本地人了"。这一扇呼，老百姓也是莫辨真伪，呼啦上来一大推人，包围了析析他们。这群十几岁的孩子，哪见过这阵势呀，且战且退，就躲到一个大砖堆后边了。

析析指挥着，大家很快分了下工，以砖堆为屏障，两边守住，争取多顶会时间。这边不时地扔出砖头，那边也是捡起砖头还以颜色。最多时外边得有百十号人和八连的人对阵。

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金刚——金刚在我连也是个传奇人物，从来不刷牙，但是却长着一口好牙；干活从不卖力，但是连长、排长从没人批评他；紧急集合从不参加，也没见谁说他；全连从学问最大的峰峰、鸿鸿，到没出过连队，啥也不知道的孩崽子都和他不错。据说功力与瑞瑞齐名。回城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在一次援外工程中受伤，险些瘫痪，靠着自己的毅力还是站起来了。但是还是毕竟伤了元气，五十多一点便撒手人寰了。悲哉，哀哉！此为后话——跑过来对析析说，你得赶快跑，他们要找的头是你，让他们抓到了，你可没好果子吃。再说了，咱们也得有人回去送信呀，要不在哪儿死的都不知道。瑞瑞、昌昌等都是这个主意。

正商议间，两辆大卡车呼啸而至，佳木斯警备司令部的来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很快包围了现场，趁着天黑，大家掩护，析析跳进了车站的围墙，扒火车回到了连队。

这些人被抓上卡车后，没一会到了，下车一看，嗨，还是昨天关他们的地方——合江军分区，熟呀。这回人家可不客气了，要求每人把裤腰带解下来，集中保管，并且让所有人对面站成两排，互相打嘴巴，谁要是不打后边就

是一枪托。百分之九十八的人都不动手，大家没少挨枪托。上厕所时也是两名战士挎着枪押着。卞政委这回可有的说了，“昨天看你们就不是好东西，非抢即偷，这回非得要你们好看的不可”。

但是领头的跑了，军人，警察还在满大街的找首犯呢。据说啊——据说就不一定是真的，当他们和当地的警察企图搜查兵团司令部的时候，“兵司”的哨兵说：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未经同意，谁也不准进入大楼，否则就开枪。门前加了双岗还都上了刺刀。那时候，兵团是正军级单位，合江军区估计也就是个团级，最多是副师，他们是怎么也不敢硬来的。当地的警察为此还闹了半天情绪，觉得很没面子。

等到析析回到连里报完信，连长指示一定要尽快带回这帮孩子。指导员带上介绍信连夜赶往佳木斯，费尽周折，好说歹说总算把人要了出来。带着这二十几个兵团战士，连车站都没敢进，坐船过了松花江，再搭火车回到连里。一进连队，战友们纷纷上前慰问，想想这两天的遭遇和委屈，忽地悲从中来，大家抱头痛哭。

看上去八连战士输了，但是他们的团结、机智、勇敢、忠诚的表现，成就了这个连队团结友爱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未消散。

（故事素材来源兄弟团，谢谢兵团战友）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19）兵团打“火的”

在北大荒，那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在东北那圪垯人情那是火辣辣的，在一段时间里，我竟然乘坐过像现在打的一样、招手停车的火车。不信吧？听我道来。

我们连离鹤岗不远，但那也是几十里的路程，以前到鹤岗办事，除了搭车就得步行了。不久这里修了条铁路到青石山，也就是我们团十三连的驻地。这条铁路经我们连五号地北头，过十三连，但是都没设站，人家鹤岗市哪管我们兵团的事呢？那时，我们到鹤岗，要么就往东十几公里走大路去，要么就得往西走六七里地小路坐火车去。里外里都差不多。

这条铁路是我们眼看着修起来的，主要是为我们连北边新建的一个钢厂服务的，西边通到山里，据说是为了战备。仗是没打起来，钢厂也没炼出多少钢来，这条铁路倒是为鹤岗市的城市建设立了大功，十三连的青石山，这个我团西片地标性的山头，现在几乎夷为平地，采下的石头都变成鹤岗的高楼大厦了。这是后话。

还说那时。别人不常去鹤岗的也就罢了，我这当上士的接长不短的就得往那跑一趟，眼看着火车想坐就是不方便，心里很是郁闷。顺着长长铁路线，我数着枕木向鹤岗走去，不时地还得给呼啸而过的列车让道。

记得有一回我去鹤岗，走到五号地头刚上路基，远远的，一个衣衫褴褛的老爷们，满脸胡子拉碴的，抱着根小鞭子，坐在铁轨上一动不动。这荒山野地的，看见生人比看见野兽还怕人。我一下想起老职工说过，在北大荒的路上碰上个动物啥的没事。一般的你不招它，它也不招你的。但是要是碰上人可麻烦了，特别是站那、坐那不动的，十有八九不是正经人。

看到那个人一个劲地往我这边看（现在想来也是正常，大野地的，来了个人，人家不看我看谁呀？），我心里砰砰地乱跳，我兜里揣着好几十块钱呢，那可是给食堂买酱油醋的钱呀，越想越害怕。可我也没道绕呀？环顾左右，路基就那么宽，躲都没处躲。原来说过，这条铁路是填平了一段小山谷建设的，路基是用石方堆的，两侧都是十几米深的碎石坡。

哆嗦着就走近了，“哪连的？歇会呀？”那个人竟然还和我说起话来了。我尽量地陪着笑脸，尽量地和他保持距离，尽量地让腿走稳喽，脚底下还是踩得路基上的碎石哗啦啦地往下滚。那哥们呲着叫烟熏得焦黄的大板牙，冲我笑着……

他没站起来，我几乎是屁滚尿流地向前跑去。

从那以后，不管等多久，我一定要坐火车回连了，虽然来回要花五毛钱呢。大黄板牙把我吓坏了。

鹤岗到青石山的火车，没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估计都没见过，看过电影《林海雪原》吧？我坐的火车就和那里的的小火车差不多。那是用闷罐车改装的客车，黑色的铁皮，一点装饰也没有。好点的还有椅子，有的就放了几把条凳，中间有一个火炉子，但是我从没见点过火。车门上按了一个插销，列车员随时可以打开上下乘客。车窗没记得有没有玻璃，即便有估计也黑的看不见外边了，但那时能坐上它也是我的福气，早了，晚了都赶不上呢。

好像是第二次乘车，碰上个特爱说话的列车员，“你哪下呀？”他问。“青石山”我说。“是矿上的吗？”（青石山那边有个铁矿）他问。“我是兵团的”我不知道哪来的自豪感，大声回答。

你别说，我这一理直气壮的，那人倒对我格外关照，一个劲地问这问那的聊了一路，最后以允诺帮助他买几条肥皂，下回带给他之类的结束了谈话。那个时候鹤岗的供应，特别是民生产品如白糖、点心、肉、菜、肥皂什么的，还不如我们呢，我们好歹是归沈阳军区管呀。

就在列车行驶到我连五号地的时候（那里距离终点站青石山还有好几里地呢），奇迹发生了，列车停了，那列车员挥着手叫我下车。我抓起包跳下了火车，因为没有站台，我差点没摔倒。

“你再过来挥挥手呀，我给你停车”那个列车员冲我喊着。

从那以后，我再到鹤岗来去都不用走冤枉路了，就在五号地头等火车。不过每次都会给列车员们带去糖、酒、肥皂和大头菜、黄瓜什么的。记得最让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团工业五连生产的那种只能拿牙往下一点点刮的月饼，他们掰开看见里边还有冰糖和青红丝什么的，异口同声地叫“好吃”，弄得我还很有成就感。

就这样，鹤岗到青石山的铁路上，隔三差五地能看到我在那里举手停车“打火的”的身影呢。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大荒旧事】：

（20）最可怕的小“米奇”

耗子就是能搅和，太让人恶心了！一只耗子能搅坏一锅汤，鼠力无边！大象也怕鼠钻进鼻子里，《西游记》里的老鼠精后台很硬，是李天王的干闺女，它爱上了唐僧。在北大荒，随处可见这大大小小的各色“米奇”，食堂、粮库、草原、树林，甚至于宿舍的炕头……但是也有很多治鼠的天敌猫头鹰，黄鼠狼……

今儿讲的这段“米奇”钻到大姑娘的裤筒里的知青轶事，还是头一回听说，真难为了那位张连长，让他如何痛下决心下手抓“米奇”呢？这也算一段旷古奇闻、投鼠忌器的故事了，蒲松龄老先生也没有这样“骇人听闻”的段子！十二生肖鼠为首，真的惹不起呀！

在北大荒，什么东西最可怕？有人说是黑瞎子、狼；有人说是瞎蠓、蚊子、小咬……可我说都不是。那什么最可怕？我说是耗子，尤其是那小耗子。您别摇头，我也不拿鼠疫吓唬你，看完下面一段故事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

那次是在夏末秋初艳阳高照的某天，某农工排三十号人去3号地翻晒青。别看连队养的那群牛什么都不干，但损事干了挺多：麦苗出来吃麦子，豆苗出来吃豆子，冬天拱坏你粮囤子。因为列表上报，就成了碰不得只能养的“神牛”。连里种了300多亩大豆，灌浆时割倒晒青，晾到大半干，堆放撒盐，留作牛冬天食料。这活不累，也就两天的事儿。下地前张连长要求大家要穿紧腿裤子或扎紧裤脚。尤其是女生排，还特地关照排长崔要仔细检查一遍。

天特蓝！可以说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战友们把豆棵挑。大伙儿嘻嘻哈哈地忙活着，谁都不超前不拉后地齐头并进，心情大好，还时不时地跺脚踩小耗子玩。那晒青下面耗子成群，太多了！

突然，一声女高音的凄厉叫声把大家都给惊呆了。怎么啦？怎么啦！光听见叫声不知什么原因。只见张连长和女排长正急速向一位身着新蓝色运动装的女战友奔去，而那位女战友，则万般可怜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那么的无助，只顾一声接一声地不断尖叫着！

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愣头青们，岂肯放弃瞧热闹的机会，纷纷围拢过去。原来是万啊！只见她脸色发青，汗也

流下来了。神情紧张地叉腿站在那里，浑身直发抖！忽然间，万又尖叫起来，叫得撕心裂肺，声音瘆人！张连长把女排长叫到一边，急匆匆商量着什么。但是女排长在那儿又摆手又摇头，完全是一副既惶恐又不敢担当的囧样。和女同胞有关！大伙儿不便多问，但好奇是明显地挂在脸上。这时上海刘从他“kao　ding”（当年的上海俚语：女友）那里得到消息：原来，一只小耗子竟然鬼使神差般钻进万的裤筒里了！

这太恐怖了！也太“滑稽”了！大伙儿既同情又“幸灾乐祸”地看着万。张连长平时就没笑容，这时脸绷得更紧了，摇着头走过来，告诉万：你别动，你动它更往上钻！

万哭喊着：它快爬到上面了！那小耗子也真会欺负人哪。张连长要她一把抓住，使劲捏死它。想不到那小精灵似乎听懂了他的话，感到了威胁，又开始骚动。那万又开始尖叫，哭咧咧地摆手说：哎呀妈呀，我不敢哪！

大家都傻乎乎地在旁边看热闹，张连长来脾气了，摆摆手：你们都给我走远点！得！笑话看不成了。大伙儿都不舍地离开，远远地张望着。张连长又问那十来位女战友，谁敢动手抓那小耗子？没人吱声，有的还直往后面躲。

无奈，张连长让女战友们围着万站成一圈，挡住不让大伙儿看。他戴上了白手套，叫女排长指点位置，一把下去，万又是撕心裂肺地一声叫。偏了！没抓住！小耗子可能感觉到了不妙，使劲儿地往上窜，万又是发抖地叫妈！事不迟疑，张连长这回看准了裤子里的波动，再一把下去，紧紧抓住了这不识好歹的小东西直到它窒息！

警报解除，人群散去。张连长批评女排长怎么不按要求检查扎裤脚，女排长泪汪汪地说：人家问她了，她说没问题。这两天穿了件新衣服，下地也舍不得换。她是老知青，我有什么办法呀！都是爱美惹的祸！一席话，说的张连长直摇头，背着手走了。连着几天，也没见着万来上工，打听下来，说是调走了……

朋友们，这段小故事，能说明一个观点吧？那些遇见过黑瞎子和大灰狼的北大荒知青，无论男女都是吹嘘的本钱，没一个要调走的；那瞎蠓、蚊子和小咬，谁碰到都是狠狠一巴掌拍死它，谁怕谁呀！唯独这无处不在的小耗子，吓住了我们爱美胜过安全的女战友，还以生命的代价迫使她调走了。您说说，在北大荒，小耗子是不是最可怕？

东海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1

关于吃的往事【知青篇】

（一）招待工作检查组

当过知青的人都知道，“吃”是知青生活中十分严峻的一个问题，为了“吃”、尤其是富有油水的吃，知青往往是不择手段的，甚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某年“双抢”(抢收抢种)时期，经济的贫乏使我们长久不知肉味；而繁重的农活，更加重我们对肉味的渴望。这时，上面来了通知，说县知青工作检查组要到我们知青点检查工作，责成我们知青组搞好接待工作。这可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首先，我们可以不出生产队的工，而名正言顺地留在知青点接待工作检查组并拿全工分；其次，也是更具现实意义的，我们可从工作组领取一笔不菲的钱去买菜肉招待工作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肉味的渴望即将成为现实！

穷则思变！真不假！对肉味渴望已久的我们，创造性地将接待工作组的优越性发挥到极尽：首先，我们到公社用招待费尽数买了一大块纯肥的猪肉，再将这块肉切成三寸见方的“肉砖”，加白水煮至五成熟即捞起，堆成一大瓦盆，配上我们自产或向农民“借”的各式青菜，便完成我们招待工作组的筵席。可想而知，结果是工作组只略尝了几筷青菜，对“肉砖”根本不予正视。送走工作组后，我们立即大返工：将“肉砖”分割为肉片，加上酱油及其他作料，喷香的回锅肉便上餐桌了。

我们的胜利，鼓舞了其他知青组，以后每有工作组下乡检查或类似的招待任务，“肉砖”必是招牌菜肴，还更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如某知青组自创的“清蒸鲶鱼”竟然从菜盆中蹦跳出来……

（二）夜半歌声

喝酒与唱歌，是知青两大业余爱好，而且二者还往往结合在一起，激发出更为如意的效应，但也时有副作用产生。

那是在农忙过后的一天傍晚，邻村的明与义来串门，我们边拉乐器(二胡、提琴等)边唱歌，清、俏、丽等女生

也参与其中，大伙儿愈唱愈来劲，末了明提议到生产队赊只鹅来开宵夜。因已吃过晚饭，加上怕我们借机发酒疯，清、俏、丽表示不参与并各自回房睡觉去了。

没了女生，我们更为自如了。明、义、毅和我(生开会去了)四个便到生产队赊了只近二十斤的鹅，到大队供销店买了几瓶白干，待一大盆红烧鹅肉摆上台时，已时值午夜。为摆绅士的谱，开筵前我们还特地一一敲三位女生的门，诚意邀请共赴盛筵，但女生们无一做声，尽管我们知道她们根本是在装睡。

接下来，当然就是我们四个男生大块吃肉大碗和酒，还有大声唱歌。我们唱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山楂树》、《小路》、《灯光》、《深深的海洋》、《红莓花开》、《红河谷》，以及《知青之歌》、《邕江之歌》等等。不知是酒的作用还是感觉到隔壁有女生，我们唱得特嚎、近乎声嘶力竭，直至次日清晨。

天亮后，三位女生相继冲出门，蓬头垢面，眼圈发黑，围着我们尖声臭骂，说我们的嚎叫(指歌声)让她们恐惧万分、几近精神崩溃。尽管她们骂得声嘶力竭，我们也沉默不语；不是我们有风度，也不是我们自知理亏，而是我们都醉了……

（三）贼喊捉贼

小偷小摸是知青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常态”做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过后也不怎么会惭愧后悔。但我对自己参与过的一次“常态”，始终有个心结，趁这次机会，自行了断(心结)了罢。

那是秋花生将收获的时节，快收工时，邻村知青组几位男知青骑单车路过我们队的地头，说他们队长告知邻县某镇放电影。我们一听，顿时来劲了，连家也没回，跳上他们的单车后座便往某镇赶去。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任何电影(包括新闻简报)都具有极大魅力，因此，我们才能饿着肚子交换踩单车，赶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去看连片名都还不知道的电影。要命的是，到达目的地后才知道上了邻村队长的当-----根本没电影！这个当可上得大了，上得窝囊了！

当我们精疲力尽回到村边时，已是下半夜了。又累又饿又气，促使我们路过邻村一块花生地时，不假思索地闯进去一阵狂拔，扫荡了大半块地。随即将新鲜的花生搬到邻村知青组煮了一大锅，吃不完，倒到知青的猪圈喂猪了。折腾了大半夜，却又不觉累了，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天亮后竟径自去敲队长的门，报告说发现生产队的花生被人偷了，并带领队长及民兵排长等赶到花生地，如此这般表演一番。本想作弄队长一番就算了，没想到该队长却当真了，而且认真得很(想必他根本就将捉弄知青的事忘得精光了)，上报到大队、公社。这么一来，我们便不敢戳穿而只好硬着头皮演下去了。弄来弄去，我们也似乎觉得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了。正值知青年终抓典型，我们稀里糊涂就成了“抓紧阶级斗争那根弦”的先进分子。至此，我们惟有义无反顾一往无前了。

贼喊捉贼，弄假成真，画犬不成反类虎啊。就这么回事啦！

（四）“四眼”

西南一带的知青大概都听说过“三线”。只因一个最高指示：“三线建设要抓紧”，整个西南都闹腾起来了。所谓“三线”，大约是从全国战略部署划分，指西南一带穷山恶水的腹地。一般的“三线建设”则指修铁路(如枝柳铁路)，其实还包括筑坝修航道、建工厂(建在深山，如我后来就被招工到一个建于山沟的大型火电厂)。不少知青也参加了这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我便是其中一分子。

我参加的“三线建设”工程是在红水河修航道。红水河是流经西南数省的最大的一条河流。而“四眼”就是我在红水河航道工程生活中难以忘怀的一位朋友。

其实，“四眼”是一条野狗的名，缘由它浑身上下是黑毛，唯眼睛上部有两圈白毛，看起来似有四只眼。我之所以视之为朋友，因此它曾在一次我们在一个山洞探险中迷路，陷于绝望之际，咬着我的裤脚，将我和我的知青排战友带离险境。从那后更日夜伴陪我们，俨然我们知青排一分子。我们的工地就在穷山恶水围绕之中，自然条件艰苦，物质生活条件更为艰苦，有时对外交通阻断，吃喝都成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处处优先照顾我们的救命恩人“四眼”。

某日下班后，我们回到驻地，发现“四眼”没有如往常般在路口摇头摆尾迎接我们，顿有不祥感觉，于是立即四散寻找“四眼”。很快获知，“四眼”被邻县的知青排杀来吃了！

杀来吃了！吃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救命恩人就这么给“吃了”！顿时全排知青群情激愤，不用谁号召，便纷纷抄起钢钎、扁担、木棒等，浩浩荡荡直奔邻县知青排驻地。过来人都知道，知青打起架来都是亡命之徒，当时我们大家都清楚，一场恶战就在眼前，但无一人畏怯，连女知青们也视死如归地紧跟在后头。接近邻县知青排驻地，远远见他们已严阵以待，同样的知青亡命之徒，同样的视死如归！我们依然前进，前进……两军相接，血战一触即发！

这时，邻县知青排的女炊事班长冲了进来，歇斯底里地哭喊道：“是我闯的祸，我杀的狗，我们两个月不沾油腥了啊……”喧嚣的场面霎时静了，静极了，惟有女炊事班长歇斯底里的哭声……

（五）做饺子

我下乡的地方，特重视“冬至”，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某年冬至，人们照旧忙乎起来了。我们知青入乡

随俗，也打算热热闹闹过冬至。怎么过呢？大鱼大肉是不可能的，有人提议包饺子。好主意！一来饺子的原材料较简单，符合我们的经济状况；二来南方人包饺子吃饺子都算是新鲜事儿，可边玩边吃。于是我们组六个知青加上外来串门的俩女知青，八人同心协力策划冬至饺子筵。首先，按人头买了两斤面粉(理论认识：面粉只做饺子皮，每人二两多足矣)，猪肉一斤，鸡一只，韭菜、大白菜、萝卜若干。然后分工合作，男生和面擀面皮，女生剁馅。干开来麻烦事就接踵而至了：我们男生将两斤面粉全倒下去加水和面，和了好一阵，发现面粉根本就不够，加多水了又太稀。我急中生智，提议掺进糯米粉，谁知将家中的糯米粉用完还不够，再加进木薯粉。最后，弄出的“饺子皮”黏黏糊糊，只能勉强捏团团(馅就塞进“团团”内)。女生剁馅也不容易，主要是那只鸡麻烦，为了充分利用，我们将鸡连肉带骨连头带脚一起剁，因此特费劲，不得不调了一位男生去帮忙才将整只鸡剁烂了。看到这里北方的哥们姐们该知道结果是如何的了。但当时我们还傻乎乎地想像有多美味呢。结果当然就是：一煮就乱七八糟，既烂又黏成团，勉强塞进嘴，不仅黏牙还有生粉(糯米粉)，那馅根本就不敢嚼-----满嘴骨头渣子。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动过做过饺子的念头了。

（六）“鸡妹儿”

首先声明，本贴子并无任何性别歧视企图。

我插队时，生产队有一个养鸡场，是队里副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知青(一般是女知青)有时也被派到养鸡场帮忙，主要是做些收发登记之类的杂活，很是清闲自在。一日，我也罕有地获得这个美差，整天都没什么事干，悠闲的有点发闷，下午快收工时，我正百无聊赖地跟养鸡的四伯瞎侃些连荤带腥的笑话，大队一干部匆匆跑来，说有某公社领导路过，在大队吃晚饭，要我们养鸡场先“赊”几只鸡来，并强调该领导吃鸡的嗜好是吃鸡项(音)。“鸡项”，不知是什么吧？那是当地土话，指雌性的未生过蛋的鸡。挺麻烦的解释是吧？得，接下来发生的事才麻烦呢！大队干部抓了鸡了，按规定要写个一式两份的收据。那是我的工作。我也没多考虑，就写上某日某人从某生产队养鸡场提走某某只鸡。谁想那大队干部恁细心，坚持要我写明是“鸡项”(好向公社领导证明)。我想这也不是麻烦事，补一笔就是了。谁知要下笔时才发现不知如何写这“鸡项”。用“项”字吧，这“鸡项”看起来像是说鸡脖子，到以后说大队只是从我们养鸡场拎走几根鸡脖子，那就对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可就大了。我说写“母鸡”行了，大队干部坚决不允许，说“母”是生过蛋的。我又说就“小母鸡”吧，也没通过，说只是年龄小还是生过蛋。我再说干脆去掉“母”字，“小鸡”吧！还是说不行，刚孵出的也叫小鸡啊何况性别没注明。就这么僵住了，在场的人都无计可施了。大队干部急着要走，但没有“验明正身”的收据却又不敢走。这叫什么话？整一个活人叫尿憋死！最终，四伯支支吾吾说道：“叫鸡妹儿如何？”“妹儿”，是当地对少女的称许。好！“妹儿”！就是“妹儿”！“鸡妹儿”！这概念获得一致认可并赞赏。于是我迅即写下收据：某日某人从某生产队养鸡场提走某某只鸡妹儿。

（后补：其实我知道“鸡妹儿”的说法太具地方色彩，但我实在是至今也不清楚，在正规文字上，这个年龄层的雌性鸡们该如何称呼？诚请网上高人指点迷津。）

老例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9



开心年月

如今，很多往事已经模糊不清。记忆象一张褪色的照片，影象也撒满了尿迹。只有个别细节还在脑海里如同跳跃的浪花，偶尔将光斑一闪，让你欣喜地张网将它捕捉。

（一）白洋淀诗人群落

1974年，春节过去了。春天来了。该回村务农了。想到回村我就有点怵头。说实话，我并不怕原始般只靠肩挑背扛的劳动。当初选择那个偏僻、冷落、仅有 9户山民的小山村，不就是去自讨苦吃的吗？不就是想凭着青春热血和精力，体尝一下毛主席号召的“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吗？我们不是都说，要用我们的双手，拼出一个沧海变桑田的世界？况且山民们不是祖祖辈辈在那里生息繁衍吗？但仅仅几年，知青以激情谱写的理想之歌就无可挽回地变成了悲怆凄惶的唢呐声。理想彻底破灭。对“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厌倦，对当时流行观念的嘲讽，对人生价值的新探索，使我们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二次“大串连”，希冀在再次深入社会的过程中，重新找到人生定位。我已经3上华山，数次往返晋祠， 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也已经浪迹了一番，并且不止一次地和朋友们探讨全国旅游的方案。

这当然要比呆在那个写满惨痛的幼稚和失败的小山村有趣得多。想想自己和众多的朋友那么满怀理想、充满狂热地地奔赴农村，甚至有人写血书誓言要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扎根”一辈子，要“改天换地”，建设出一个“红彤彤”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真是觉得“太过份”了——是自己幼稚的过份，是政客们的欺诈手段太过份，怎么能用弥天大谎来欺骗善良的百姓和淳朴的青少年呢？设一场政治骗局，驱使千百万的民众深陷无休止的“运动”之中，最终能收获到什么果实呢？醒悟了的人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回首往事？那些已故的领导人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不，也许他们心里很清楚谎言被识破的后果……

废话暂且不说，只说当时我们到窑子头公社杨庄大队一起插队的30多名同学，无论那些入了党的“坚定的”扎根派，还是始终就处于动摇中的“插青”，都心知肚明：这次深入中国农村的过程，也是认识中国、认识人生和认识骗局的过程。称为觉醒的过程应该更合适。可不是吗，你被官冕堂皇的政治理念所驱使，在荒谬的“反修防

修”、“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治国理念的驱使下，数百万知识青年沦为祭品被送上“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祭坛——你还能偏爱在“广阔天地”里从事那种原始劳做吗？所以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没多长光景，插队集体便作鸟兽散，只剩我因“海外关系”的背景，没任何地方“待见”，于是孤独地守着一大排空荡荡的知青住房苦熬岁月。

谁能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怎么样呢？我只能带着迷惘默默地期待。

所幸我有朋友。这些在文革动乱年月里认识的中学生朋友们，大都与我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爱好。我们在一起犹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穿裤子的云——我们变化多端、形影无踪，倒也逍遥。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可说是在极权时代过得相对自由一些。毕竟， 被扔在农村的插队草民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根本不能构成对高层权力威胁。所以，我们被遗漏在“四人帮”严峻的视线之外。只有当他们眼角的余光不幸扫荡到我们时，才被报刊或电台鼓噪一番。

不想回村，我想去白洋淀游荡一番。早就知道那里是一片云梦泽国。而且有极方便之处：好多同学和朋友都在那儿插队落户：张建中（林莽）、宋海泉、崔建强、栗世争（多多）、潘青萍（乔伊）……等等，有些虽没见过面，比如姜世伟（芒克，又称猴子）、越重、赵金星和陶雒诵，但已久闻大名。很多朋友已去过，如于友泽（江河）、赵振开（北岛）等，他们绘声绘色地描述那儿的水上生活，对久居城市或山区的人，无疑是巨大的吸引。应当说，除了那儿的环境，还有更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这些朋友在当时那个年月，都决非等闲之辈。大家都在读书，都在朝着自我设计的方向蜿蜒迂回。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家都对流行的一切嗤之以鼻，只是表达的形式不同而已。

我、栗世争和其他两个在白洋淀插队的小伙子结伴乘火车前往徐水。栗世争那天穿得挺整齐。上火车前，我们还胡逗乱闹的。可一上火车，一找到座位坐下来，他就摆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样儿。和他说话，他也是作出一副特别矜持的样子。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曾经是“学毛著积极份子”，于是有点诧异：这小子还挺能装孙子的。其实我们在一块儿是最讨厌装孙子的。但细一想， 觉得他如此也有道理：你怎么能知道身旁没有充满阶级警惕的革命战士？！你又怎能保证没有专事告密的人？人人都要有一重厚厚的保护色。“祸从口下生”在那时是生活的现实。二重心理和二重性格是心灵的操炼。普遍的空虚和孤独感，栽培出对人，对事物，对感情的繁杂果实。正是这样的现实使他和当时那些诗友追求一种韵味独特的语言，一种习惯于人云亦云的人所难以读懂的比喻和联想，以及一种令人困惑的句法。他们的诗歌是特殊年月的果实。只有当时占据诗坛的“工农兵”诗人才只会浅薄地直抒胸意。然而直至今天，我们仍把那些平白直露的“诗”称作顺口溜。记得还是在村里，一天，郑光召（《老井》作者）拿了一本当年报刊猛吹捧的诗集，高声朗读了两句诗后，马上翻页到另一作者写的另一首诗的几句，然后又翻页，再念另一位作者的诗，居然，所有不相干的作者胡乱摘的诗句，即使被这样无秩序地组合到一起，完全像是出自一位作者手笔的诗！念完后他就将那诗集顺手一扔：“这么没个性的东西也叫诗！”房间里充满我们哗然不恭的

笑声。确实，寡淡如水的顺口溜始终被我们所不齿。后来，我这群插队诗友走上文坛的时候，被评论界称为“朦胧诗”派。甚至很多老诗人都读不懂他们的诗。艾青不是批判北岛那首《生活》——网——的诗，说题目比诗的正文还长，有这么写诗的吗？其实他很清楚，诗人北岛曾经从他早期诗作里汲取过营养，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派诗人的旗手。对于艾青的批判，北岛只是淡淡的一笑。他知道名人到了晚年往往会面目全非，甚至自己不认识自己。

那天，白洋淀风不小。摆渡我们的渔船顶风向大淀深处荡去。我觉得很开心。和栗世争在船上把此行的路线定下来。先去寨南，然后再去栗世争和芒克所在的村子，其它比较远的村子，只是把人给叫出来或去看一看就可以了，但乔伊所在的村子是必须去住上一宿的。那里朋友比较集中。

第一个晚上在寨南度过。这村的宋海泉是我清华附中的同学。当时在我们这些插青中，他的学问是最庞杂的，可谓博今通古。至今仍能对任何问题旁征博引。他多才多艺，除吟诗作赋，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和他同村的崔建强则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还有我校高一同学刘满强， 他有一副男高音的嗓子，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来，真是声振寰宇。栗世争的歌喉也不错。大概和根子（越重）在一起的缘故，他始终没扔下练嗓子这功夫。除了醉心于现代派诗歌，他还醉心于意大利男高音的用声技法，动不动就是“呵，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这些人在一块儿别提多开心了。轮流唱歌，喝劣质白薯酒、谩骂打闹……白洋淀的鱼鲜美异常。那时食油供应紧张，但在这里做鱼，我从没见过他们用油，只是把收拾干净的鱼往锅里一放，再加点水和盐之类的佐料，就会做出极美味的鱼来。饭桌上我们谈政局、谈种种小道消息，谈那时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流行的黄皮书、灰皮书和蓝皮书，也谈其他朋友写的诗或小说什么的。自然，互相“挤兑”、“踩瞥”居多。然后就把对方的遣词造句、诗歌意境给嘲弄一番，学问好的还能将对方句子的出处索引一番。当然，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欣赏的譬如惠特曼、爱略特、庞德、艾伦堡、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杜琳娜、波得莱尔等等的诗句和意境拿来推崇一番。我则热衷于现代派。像荒诞派戏剧，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涅斯库的如《犀牛》、《椅子》等等。有时我们谈到郭路生。他的诗，如《相信未来》、《烟》、《酒》、《海洋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在60年代后期散布着巨大的魔力。他的诗歌所具有的冲击力，扫荡了当年所有官方发表的顺口溜。我觉得，郭路生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当所有的舆论都在糟蹋文化的时候，他用他的文字重新确立了真正的诗歌形像。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矛盾和局限。郭路生内心同时沸腾着水与火。它们造就了诗人，也使他在煎熬中患了精神分裂症。说他在部队郁郁寡欢，每日以烟为食，说他退伍后就进了精神病医院，出来后又要写名为《壮志篇》的诗，还要写河南“红旗渠”结果在河南林县体验生活途程中，被小偷光顾，一文不名的他再次发病，流落街头20余天才被接回北京……大家听了，除了惋惜，不再评点什么。

那时中国的书架上只有“雄文四卷”，小说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之属，舞台上则是那8 个“样板戏”令人作呕地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文学艺术有“样板”，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事情就是这样——不塞不

流。我们能离经叛道，当然还是“文革”这个催产剂。大批判的号角越高亢，我们就对被批判的东西感到神秘，于是就要研究和探讨和比较一番。出于这种简单而非一句话能说清的原由，还是早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17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通过各种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待补☆）这些书极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维。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这些书在我们之中神秘而神速地流传着。没人问它的来路，只是被催着快读快还——还有别的人在等着看。于是昼夜兼程地读、作笔记。那时，只要谁那儿有这类书，就会成为大家推崇的人物。

白洋淀似乎刚刚通电（这就比我们山村先进多了，我们仍点煤油灯）。为了节省电费，灯的瓦数都很小。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胡吹海聊到很晚才睡去。

第二天，宋海泉在队上借了条船，一行人唱着叫着杀向扺庄。和我们的小山村有个共同的特点，我们的居室前都是水。这里是很深沉、很安静、呈深绿色的湖水；我们建在半山坡的居室下面则是清澈、奔腾的乌马河。“仁者近山，智者近水”。我们都自视颇高。

扺村插青宿舍处的位置不错：房舍前面的地势比寨南插青宿舍开阔一些。乔伊（藩青萍）在北京尚未回来。戎雪兰和她的男朋友在。他的男朋友高高大大，很有艺术家的风度。在白洋淀他和戎雪兰一块儿画那些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现代派油画。我们去那天他们不知为什么事在闹别扭，戎雪兰的小姐脾气发作了，把男朋友的画笔使劲地抛到淀里，他就蹲在淀边默不出声地打捞。赵金星和陶雒诵也在。那时赵金星刚刚出狱（他因写了不少哲学方面的文章而触怒了极左派，被抓进监狱关了几年）。当时的赵金星已在中学生里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学者形象。在哲学和马列经典方面，他很有权威。他的名声在我们这批中学生中不胫而走，受到不少激情澎湃的少女少男的崇拜。在白洋淀我是第一次见到他。关于他和陶雒诵的爱情，也被中学生们广为传播。即使在他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当时抓思想犯已不再直说其“思想反动”，而是弄些莫名奇妙的刑事责任栽赃）投入监狱时，陶雒诵也照常去探监。一出狱，她就把他接到白洋淀来了。在这里他们俨然一对和睦到极点的夫妻。我注意到陶雒诵总是对赵金星流露出掺杂着崇拜的缠绵柔情。在那零乱而又破败的房舍里，我们自然是先把熟悉的朋友们的消息交流一番，谁谁在那里，谁谁在干什么，谁谁“病”了（被抓、或被“群众专政”了的表达方式）。 后来大家就问赵金星蹲监狱的滋味，他告诉大家，最不好过的是案子悬着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结局。而宣判之后，就踏实了。即使有骚动，那也和刚进牢狱的滋味不一样。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刚被放出监狱大门时的情景：“我背着在监狱里用的那些破行头，一走到居民区，一看见那些低矮的房子，肮脏的街道， 蹲在地上拉屎的孩子，还有在狭小的天空盘旋、不愿离巢的的鸽子……就强烈地体会到自由的可贵。监狱外面的一切都被我赋予了梦寐以求的诗意。 恰好我行走在一家人的窗口下，从那里飘出贝多芬的《欢乐颂》，我一下就坐到墙根下，街道上所有的糟杂声都消失了，只有伟大的贝多芬在诉说着生命音符……”

我听得十分感动。一个希冀洞察社会和人生的青年在追求中付出了代价。　也许这是中国特定的环境里普遍的现象？也许这是一个不安定的青年必然的命运？在亚洲、在第三世界、在中国……在白洋淀的这间房舍里，陶雒诵痴迷地望着他。那目光显示她的全部世界都集中在他身上了。

一大船的来客要吃饭。又是陶雒诵为大家操持起来。她不声不响地收拾活鱼，买来了一些蔬菜和花生米什么的。赵金星也去给她帮忙。很快，他就成为主做而由陶洛颂打下手了。饭菜很丰富。全部上桌时已经天黑了。我们这群人只管饕餮，胡吃海哨。赵金星忙得满脸汗油。烧的是柴灶，他和陶雒诵的脸上还有碳黑的痕迹。陶雒诵指着一样菜带着骄傲的口吻说："这是他挣的。是他给人看病挣的。"赵金星不是这里的正式插队学生，但他不愿靠陶雒诵养活，便在研读哲学之余自钻医术，给淀民医个头疼脑热什么的，居然得到了淀民的认可。作为回报，患者就送他一些土产、蔬菜什么的。在大家惊讶赵金星生存能力的时候，陶雒诵柔情地依在他肩上，轻抚着他的面颊，说："你总是这样富于奉献。"在众目睽睽之下，赵金星有点不好意思。他没理睬她。至少那一天赵金星表现了高尚的奉献精神。

第二天我们都显得有点睡眠不足。因为夜里凑在一起，躺在床板上聊各自经历的事儿，谈自己阅读的好书，讲点鬼故事，是很有气氛的事儿，谁也不肯早早睡去。一直在村里呆着没回城的同学则问京城又有什么新的政治事件。自那年2　月起，"中央文革"又开始部署"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党内大儒"的运动，　矛头直指周恩来。党内层层扒皮的斗争正引起社会普遍的不满。认为一个这么大的执政党号令全国去批判章回小说《水浒传》、批判"克己复礼"、"反儒尊法"之类的运动，实在是愚不可及的事情。很表现极"左"派在当时已是黔驴技穷。"上帝叫谁灭亡，必先叫他疯狂"。80多岁的老人郭沫若，在那一年1月25　日的"批林批孔"誓师大会上，被拉到北京工人体育馆，几次三番遭点名批判……黑暗中有人背颂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看看，历史典故倒是不少。可在动员了全国各民族人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史无前例"的、已经搞了数年的伟大"文革"后，却透露出"焚坑事业要商量"，而且"百代都行秦政法"的信息——就是说，焚书坑儒的事儿，是历代都"行"的"秦政法"，这可是批不得的！那么，搞得天翻地覆的"文革"，究竟搞的是什么东西？！想想，实在让人胆寒。

栗世争和我睡的床铺为近邻。每当谈到形势严峻时，他总是特别认真。我知道他在创作上很有魄力，同时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自我保护能力。在这点上，我们很多人都不如他。记得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气极败坏地跑到我家，　说他已奔忙了一整天，到现在还没吃饭，"哥们儿，有剩菜剩饭端出来点。"我那会儿已吃完饭，招待他吃毕，他才说，据可靠消息，已经开始查抄"地下文学"，"我知道你有个稿箱，他妈的我得查查，你准抄了我的

诗。”那会儿我们之间经常传看一些文稿，看到有漂亮的句子，意向深邃的诗篇，总要摘抄到笔记本上。谁愿意拿自己的文稿让别人乱翻乱动？“哥们儿，你得对我负责，我不能进去。告诉你，万一我折进去了，在酷刑之下，岂有完卵？我他妈的准一一招供。”他咧着嘴笑着说，“你怕也没好果子吃！”虽然我们俩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着这些话，但我还是让他翻了我的那些笔记本，撕下了有他诗句的那些页码。然后他问还看见谁抄过他的诗句，谁从我这儿抄过这些诗。他让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我说我再没扩散过他的这些诗。他于是说他还要去谁谁的家去翻找，告辞走了。他的气极败坏让我也沉不住气了。那时我写过一个5万余字的中篇，叫《第四次慰问》，从知识青年的命运揭示那个时代对良知的摧残。这篇东西我在一些知识青年聚会的场合里念了3次。我从来不敢让它落在第二个人手中。记得有一次我在徐浩渊、李胜平那群朋友家念它后，徐浩渊到我家提出借手稿带走，我拒绝了。第二天，她们家就又被有关部门彻底地抄了一遍。抄她家1小时后我去找她，才知道事情的可怕，　同时庆幸我没将手稿借给她，否则，我必难逃牢狱之灾。不能没有安全意识。我当然担心成为地下文学的查抄目标。他走后，我便将稿箱里的文字，通通付之一炬。现在想起来十分后悔。当时干嘛不将稿件转移呢？事实上栗世争也并没将自己的稿子焚毁，他只不过转移到什么别处去了。

划着那条船，我们一行人前往栗世争他们村。我很想见见猴子（芒克）。　那时我只是听说过这个侠气颇重的诗人。他的诗纯净美好，象是无邪的单簧管在大自然里抒发情感。他不太和书卷气浓重的人厚交，但却喜欢和同村的劳动人民为伍。盛传他在村里爱上一个姑娘，拼死拼活地要娶她。他和村里的后生交朋友，　把他领到家里住。一次，猴子的姐姐终于发了脾气，轰人家走，猴子就帮那村里后生一块儿和他姐姐干仗。很显然，这是我们很多人难以做到的。我还知道他和一个叫彭刚的现代派自由画家一同流浪过——效仿美国作家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那种既浪漫又疯狂的方式，但在出北京没多久便被擒获遣返京城。

在大淀里很容易迷路。我尤其辩不出东西南北。我看淀里的景致总是大同小异：水路的两侧是方阵一样的芦苇荡，鸭子在那里游来游去。靠苇荡的地方总能看见鸭子下的蛋。他们村距离抵庄有半天的水路。记得那一天划船的是栗世争，他竟然一路划一路辨别方向，没出什么差子就到了目的地。他辨别方向的能力确实让我佩服。猴子不在。据说是追哪个妮子追到什么地方去了。

没见到猴子，我有点失望。说实话，我真想知道他对身边的一切是怎么看、怎么想的。他能那么投入地融入村舍之中，那么真心地交村里的朋友，在我总是难以做到的。但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我那个太行山的小山村里，知识青年已大都谋生走了。只剩我独自留守。他或许能启发我点什么。

周游后，我又在宋海泉的寨南住了一个月左右。在那里我读书、游泳，真是悠哉游哉。我们在大堤上闲聊，有时讨论一些颇为深奥的问题。谈文学，谈诗歌，粪土当年政局。当然我们都坚信，中国不可能永远是眼下这个样子，危机已如狼烟四伏。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尽快地成熟起来。这样，当祖国摆脱了病恹步入健康发展那一

天，我们就不会是隔岸观望的帮闲，而是搏水弄潮的健儿。

（二）太谷插队青年——节日捉奸

村子里30多个一起来“扎根”的同学都飞鸟各投林，上大学的当了光荣的“工农兵学员”，进工厂的当了“领导一切”的工人老大哥①。再不济的也投奔父母另谋高就。唯独剩了我一个人。没任何地方投奔，没任何单位接收，甚至连村书记还找来特意对我说，人家都走了，俺们村小，容不下城里的大学生，走时可把水桶呀、灶具呀什么的，都给留下来呵。我随口答应着，心里却异常清楚，村子里已经安排了我们全部走光的事宜。我已像社会渣滓那样被遗弃，成为各层组织和机构的累赘，我无处容身。我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已沦为可悲的弱者。

“嘤其鸣亦，求其友声”。孤寂的太行山永远都是我巨大的慰藉。我和大山做伴，倒也逍遥，只是一到逢年过节，我就无法排遣巨大的孤独。我便要下山，找那些和我一样处境的“同类”聚会一番。

是国庆节前夕，我提了两只老母鸡，蹬着自行车下了山。在我们太谷县平地的西吾村里，还留守着我们清华附中的十几个男女同学。　他们集体居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在那里，我们大锅炖肉，大碗筛酒，胡乱讲着龌龊的故事，是那样的放松、那样放荡无羁。然而又总觉得还不够刺激。总应该有点什么让人心情激动的事儿才好。但一时间又找不着什么。我们在一间宿舍里吃吃喝喝、打打闹闹地折腾够了又去打牌、算命、聊着耳闻目睹的男女之间的性事、谈各自的性经历……总之，想方设法地开心、高兴，谁知事与愿违，越是胡聊越是无聊，总觉得人生的失意犹如潜伏在角落里的毒蛇，一刻不放松地窥视你、搅乱你。所以胡闹了片刻后，总是会出现沉默。这时，大家就无聊地抽烟。突然，一个女同学进了房间，无表情地宣布道：“王八蛋又来了！”满屋人中，似乎除了我，谁都知道她说的是谁。沉默了片刻，一个男同学愤愤地说：“敲了他小子他就不来了！”另一个骂道：“天天来这里鬼混，操他妈的！”我便问和我一起在大土炕上靠着被垛的同学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说，他们集体里有个女同学和村里一位后生发生了恋情。两个人每天在一起厮混。这引起了众多同学的不满。一个同学提议说，要不把他妈的电闸拉掉，那两个狗男女一定乐得不得了，一准会一丝不挂地操起×来！然后咱们就去“捉奸”，把那小子痛打一顿，再押着他们俩光着眼子满村游街，让他们满世界地丢人现眼去！这个主意让我们喜形于色，有人拍手叫绝。于是分配了任务，谁谁去拉电闸，谁谁冲进房间“捉奸”。还设想万一出现的意外，比如，动作慢了会让那对奸夫淫妇穿戴整齐，那便不好处理了。最好能将他们赤裸裸地按在床上……

滑稽的捉奸行动开始了。待电闸拉下三五分钟后，我们一个个心怀异样的兴奋和紧张，蹑手蹑脚地朝那女生的宿舍走去。绰号叫小咧镑的同学一声令下，早已埋伏好的这些男女同学便争先恐后地挤到门前，一边高喊着一边踹门。谁知门封得挺死。屋里沉默了片刻后，那个女同学显然懂得“擒贼擒王”的哲学，在房间里厉声叫骂带头的那个同学：“小咧镑，跟我玩这套！我知道全都是你他妈的捣的鬼！”这一招果然厉害。毕竟都是同学，毕竟在文化

大革命中是一个派别的战友，毕竟在插队初期都是因为志趣与爱好相同才凑到一起来的。小咧锛在啃节上当然不能退缩，扯着沙哑的嗓子和她对骂，说要抓流氓、捉奸。一听这话，里面那个女生骂得更厉害了。乱哄哄地叫骂和踢门击窗了一阵子之后，门突然开了，那个女同学衣冠齐整地站出来，插着腰跳着脚和众人争吵对骂。这帮人多，一部分人冲进屋去捉那奸夫。他正站在屋子中间浑身筛糠一般发抖呢。两个人都穿着衣裤，让众人好生失望。毕竟只是个农村子弟，平时也知道这些城里来的“野种”没人敢管教，不知道他们能闹出什么事儿来，村里后生只是一个劲儿地哀求：“不敢了不敢了，以后俺决不敢了！”还是那个女同学朝他厉声喝叫：“别怕他们！咱们没干犯法的事儿！”这句话提醒了那后生，他开始以沉默来对付叫骂。这帮同学便你一拳我一脚地揍他。他就是一声不吭。突然，那个女生不再搭理任何人的围攻和谩骂，分开人群往外走。大家当然要阻拦。她却声音极高地叫起来：“你们算他妈的干什么的？！我连尿尿的权力都没啦？你们有本事一刀砍了我！我他妈的借你们俩胆儿！”这女生在我们学校里可谓是久经风雨考验的井冈山红卫兵战士，参加过多次武斗，审问过敌对派别的俘虏，如此在在大风大浪里行过船的人，如今怎会在这一汪汪连纸船都掀不翻的尿泡里跌份？！吓唬谁呀！她径自往北墙根处的茅坑走去。这边，大家伙就继续对付村里的后生。问得更直接了：“你们俩黑灯瞎火地操×没有……”他露出一副可怜而又无害的模样：“俺……有那贼心也没那贼胆呀！你们都是什么人呀！俺敢沾吗？！真的，俺向毛主席保证……”“别他妈的保证！向谁保证呀！”说着又是一顿拳脚。这时那女同学上罢茅房回来了，声音更加理直气壮：“你们他妈的有事没事儿？！别瞎耽误功夫，我们还有事呢！”为了体面的下台，小咧锛又带着大伙儿屋里屋外地和那女同学吵闹了一番，最后义正辞严地宣布了几条“禁令”，诸如在知青大院里不许非法同居，不许搞流氓活动，特别是非本院知青，不得擅自出入等等……

事情当然以我们这帮人什么也没捞着而告结束。在房间里大家总结经验，说自己太没经验了，干捉奸的事儿，应当不由分说踹开门就把人按在床上，就像警察抓人一样，什么叫捉奸捉双呀，还让她去茅房！她的×里准夹着避孕套呢！她借口上厕所，把避孕套给扔茅坑了！众人恍然大悟。立马有人提议去搜查茅坑！于是赶快找手电，男女人马又火速杀到北墙跟下的狭小露天茅房里。众人伸着脑袋往茅坑里探寻，几个哥们儿先后用搅尿棍把个茅坑搅得臭气熏天，也没在里面捞出个所以然来。有人说，那娘们儿准是先把避孕套包在手纸里再扔进茅坑的。有理！于是大家就又专挑浸在粪便里的手纸，一个个像侦察员那样每当找到一块手纸便翻来覆去地研究，全然不顾那里的恶臭与龌龊。当然还是一无所获。大家兴味索然地放弃寻找避孕套的努力，重新回房间里“欢度国庆”。

但是无论如何大家也提不起任何兴趣。我则决心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西吾。

后来我就以这次生活感受编了一篇名叫《聚会》的短篇小说。发表后居然引起了一番轰动，海内外不少刊物翻译和转载。此为赘述。

（三）再次“大串连”

在村里我看那些盖着县图书馆公章的书籍。那还是我和同村同学郑光召一起刚刚来插队时，在县图书馆被查封的禁书屋里偷来的。读书、做笔记、在纸上胡乱写些小说……日子过得倒也逍遥。突然一桩好事出现了。我的一个在北京认识的朋友来信，说他要借着探亲的机会去全国旅游，他知道我在大串连时期有着丰富的走南闯北的经验；况且去旅游，安全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他便选择我做他的搭档。但我没钱。怎么办？只好施展我的木匠手艺，打了一个碗柜，让村里的车把式穆夺小给拉到太谷县城，卖了30块钱人民币，又把没吃完的谷、小麦、玉米装了3口袋， 用自行车驮了，拉到太谷纱厂，卖给了一个儿女成群，粮食月月紧缺的家庭。这样，我兜里揣着100多块钱，浑身轻松地和那位朋友在火车上汇合了。当然， 这百十来块钱是根本无法用来全国旅游的。但穷人有穷人的招儿。我只有动“知识青年”的脑筋，想了个万全之策：只花5分钱买张站台票即可，两人有一张车票足矣。至今我对我那逃票招数自鸣得意：我们上车时会在一起聊天逗乐，然后其中一个到另一车厢去找个座位坐下，将其中一人的外衣挂在座位旁的挂衣钩上。如果查票，先查到谁，谁就将票从身上掏出给列车员验票，然后，就将此票放到挂着的上衣兜里，待在另一位被查到时，会说：我的票放在上衣里了。带着列车员回来验票……所幸那时验票并不剪豁口，所以我这招儿屡试屡灵。令那个朋友佩服得不得了。

我爱旅游。那是读“无字之书”。它能给你书本上永远也学不到的东西。三山五岳、大江大河、各个城市和村镇走一走、串一串，真是十分刺激的事儿。

这一行真是辉煌。从山西太谷上火车，当夜就到了陕西华阴县。我已经是三上华山了。我喜欢华山。它那样雄伟险峻，那样气势磅礴，而登高望远，又是那样让人心胸开阔。所有这些，把旅游的辛劳和磨难都远远的甩在九霄云外。华山同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一样，所有的庙宇都被摧毁。中国文化中有这样的说法：乱世和盛世看庙宇。那意思是说，庙宇总是在动乱的年月里首先遭到破坏；而在盛世，又总是首先将它修葺一新。事实正是这样。华山没有一处庙宇是完好的。西峰顶上的气象站因由解放军驻守而成为华山顶上唯一完好的建筑。在华山3天， 我们就又登上火车，去了临潼。这是个美丽的小城。有杨贵妃洗澡的温泉。如今叫“华清池”。在这里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平生第一个温泉澡。这里还是西安事变的关键所在——蒋介石便在这里的骊山夹缝中被生擒。遛够了，我们又去了西安，在大、小雁塔、碑林等公园浏览了一番，便又乘车去了四川。

四川真是天府之国。这里绮丽的风光和俯拾即是的名胜古迹真是太丰富了。峨嵋山、乐山大佛、杜甫草唐、都江堰以及诸葛墓等等，能去的都去了。1974年的四川和全国各地一样，贫穷、动乱，到处可见上访的人群和四处游荡的“盲流”，在街头闹市，随处可见鸣冤叫屈的大字报。

一路上，我随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到处都弥漫着怨声载道的不信任情绪。在成都，我们看到一张大字报，在诉说了自己遭受的冤屈以后，该文作者表示，如果得不到平反，他将在某一天吊死在省革委会门前的大树上。四

川省还是缺粮大省。和这里的人聊天，说只要给一位姑娘一个火烧钱和粮票，她就能跟你随便上床，甚至只要你愿意，还能娶她当老婆。所有这些，我都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中。我那个朋友带的苏修135相机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镜头。

真是逍遥游呀。在当年那样动乱的年月里，谁有心思和经济能力去全国旅游呢？所以我们的行为总是引起不少人怪异的目光。毕竟那些旅游景点只是在太平盛世里被人光顾，而在朝不保夕、人命危浅的岁月里，几乎沦为荒山野冢。然而越是在这样的地方，越是能让人产生历史的思考。能让人发怀古之幽情。在一些佛家圣地坍塌的墙壁上，我们看到很有水平的“七言绝句”，大多是在发泄不满情绪。记得在峨嵋山金顶上的破庙墙壁上，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千秋璀灿蒙糟粕，敢有佛风随我来。”我也将它抄了下来。

峨嵋山除了青山依旧，流水潺潺以及猴子成群以外，最令人感慨的就是那些原本辉煌的庙宇，无一幸免于“破四旧”的浪潮。庙宇被大火焚毁，到处是颓垣断壁，真是惨不忍睹。而且这样著名的大山里人迹寥寥。我们走了半天也没见到其他游人。只是快到山顶时，才见到几个背着巨大包袱的乡下模样的人。他们小心谨慎地躲避我们，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自然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发现，他们是虔诚的佛教徒，是来朝拜的。他们总是面对那些坍塌的寺庙磕头、烧香、摆上微薄的贡品。他们有人放哨，一看见有人影在山路上出现，就立即抽身离去。但多次狭路相逢之后，他们知道我们只是两个单纯的游客，便不再提防。

我们在洗象池的庙宇里住了一晚上。整个庙宇里只有我们两人，明朗的月亮无比皎洁，晚风徐徐吹来，让人浮想联翩。记得洗象池庙宇里有一水井，里面的水极为清洌，喝之甘甜无比，而在月夜里看那汪井水，荡漾着那那轮明月，就象在戏弄一个巨大的晶莹剔透的珍珠。

……一切都那样值得回忆。记得是在开往昆明的火车上，我实在太困了，便钻到一排座位底下睡觉去了。这样，便没来得及安排对付查票的事儿。半夜里，我正睡得香甜，被脚踢醒了。“车票！”乘务员凶巴巴的地朝我吼叫。我只能说没有。毕竟已不是毛主席号召全国“大串联”、不花一分钱乘火车的年月，我老老实实地掏了10来块钱补票款。这是此行我唯一买的一张票。

云南是个不折不扣的春城。到处都是花香。这个城市真是让我流连忘返。八百里滇池烟波浩淼，滇池旁的大观园那幅全中国最长的对联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不知为什么这里的文物古迹在浩劫之中能幸存下来！而在任何景点，都有那些无照人人员兜售相关的景点介绍。我在这上面还是肯花钱的。无论对方开什么价钱，我都要买来保存。特别是蜡版刻印的介绍清朝诗人孙髯翁写的那副长达180 字的对联的小册子，仅几页巴掌大的纸，字体也歪歪斜斜的，竟然卖1块钱！ 贵是贵了点儿，但想到其价值，我还是买了。对联中透视功名利禄的辞句堪称警世恒言：“……把酒凌虚，看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朱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于暮烟落照，只赢几杵疏中，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

霜……”看古人如此超脱，真令我佩服不已。对照身边那些“费尽移山心力”的男女“强人”，如今又怎么着？即使呼风唤雨，应者如云，最终还是“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成了“断碣残碑，都付于暮烟落照”！大观园里还有副对联：“千秋怀抱一杯酒，万里云山一水楼”何等胸襟，何等潇洒，何等超脱！至今，我还以为我在为人处事过程中，渗透着这样的哲理。它们已融入我的血液之中。看来是终生不能变了。

我那个同行朋友回家与父母团聚去了，只剩我独自在昆明街头闲逛。　终于等到他回来了，我们便游石林去了。

途中我们迷了路。两个人在荒山上走了很久，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看到山下有依稀的灯光。所幸这里的山并不陡峭，借着月光，我们在草丛中没有小路的荒野中盲目地走着，终于抵达了灯光所在的地方！一问，竟然就是石林招待所！交验了各自的证明，我们住下了。房间原来是一间偌大的礼堂，还都是地铺，所有的旅客都住在这里。我就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足足有一百多张地铺上，只睡了七八个人。

石林真美呀！那些千奇百怪的石头千姿百态地戳在清澄碧透的水中，游人们沿着水中蜿蜒的石头小路，欣赏着、惊奇着、兴奋着，忘乎所以的境界正是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据说，如今石林的那泓池水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了那些石头依旧。我听了不免黯然。那水、那石，本是孪生姐妹，一个已干涸作古，另一个岂能一枝独秀？不过是勉强支撑罢了。

此后我们就沿贵州、广西、湖南……北上了。也许我的赘述太多了。应该早早结尾。那就只谈我在南岳衡山被“抓”一事吧。火车没进入湖南，我就决定登衡山。同行的李胜平欲去武汉看望女朋友，我们相约在武汉汇合后就分手了。记得在衡山站下了火车，乘摆渡过了湘江，在码头看到大型公告，说禁止一切闲散人员在南岳衡山一带逗留。我并没往心里去。类似的公告在不少地方都有。我一个游山玩水的插队学生又怕什么？当时已是傍晚，我在路边搭了一辆拖拉机，赶往衡山脚下。在路边的小饭馆里随便填饱了肚子，我就开始找住的地方。起初，我想在长途汽车站忍一夜，但又觉得应该好好睡一觉，毕竟我们坐的是火车硬座，再加上颠沛流离的，住旅馆吧。街头就有小旅馆。是当年流行的名称——“工农兵旅馆”，门面上写着“为人民服务”“顾客之家”、“住宿请进”等字样。挺干净。我进去了。谁知登记时，我竟然找不到介绍信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时的介绍信（又称“证明”）犹如今日的身份证，没了它是寸步难行的。找不到，我想，那就算了，去长途车站吧。但那女服务员说：“没证明也可以住。你不就住一晚上吗？”我当时这个感激她呀，夸她服务态度好，夸她长得漂亮，夸她们旅馆干净……好话说了一箩筐，她也高兴得不得了。晚上，我坐在床上写完日记，将日记本往枕头底下一塞，便睡觉了。

半夜里，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把我从沉睡中吵醒。“谁呀？”我迷迷糊糊地问。门外的男人说是查房的。我只好穿着小裤衩去开门。是两个警察。他们要我出示介绍信。我说介绍信找不着了。他们便查看我的书包，里面只有几

件换洗的衣裤和袜子。他们又让我掏兜、查看钱包。他们审视我放在枕边的那块苏修手表，问我“那块手表在哪里？”我知道他们在把我当歹徒——起码是小偷在审查。我说我就这么一块手表。钱包里只有十来块人民币。他们让我把藏在身上的钱都拿出来，我说你们也看见了，这就是所有的东西。书包里有个小小的通讯本儿。里面写有我认识的各路朋友。他们像抓住什么证据似的将它死死地攥在手里。我想到我那压在枕头底下的、记录着一路见闻的、抄录有庙宇墙壁上的“反动”诗词的日记本就胆战心惊。要知道，那里面任何一页的随便几行字，若被当时的执法人员看见了，我就肯定完蛋——会成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我心想，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发现它。越想越紧张，我竟控制不住地浑身哆嗦起来。那警察锐利地问：“你哆嗦什么？”我说我从来没遇到这种场面，紧张造成的。他瞪着我说：“是吗？”我继续筛糠一般抖动着，点点头。最后，他吩咐我“先睡觉，明天一早到派出所来。这些东西我们先拿走了。”他们把我的手表、钱包、通讯录以及那个书包和里面的衣服都拿走了。他们一走，我可松了口气。连忙将那日记从枕头下取出来，藏到了床板和床头衔接的地方。此后，在忐忑不安中，我居然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将日记本再次取出。本儿不大，我将它藏在裤腰里，然后就去派出所。昨晚上查房的一个上了点年纪的警察又审查了我一个上午，问我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听说我就是为了全国旅游而来，他有点不相信。“你兜里就这么几块钱，能全国旅游？”“我的钱都在同伴身上呢。”我解释说，我怕被偷被抢，所以在与朋友分手前，将重要的东西都放他那里了。“火车票也放在他那里了？”我铁嘴钢牙地说，我下车下得匆忙，忘了跟他要。他还详细地追问我家庭住址、插队地点。关于这两个问题，我是必须撒谎的。我知道，只有我在这里被扣押的消息一传回去，那就会引起轩然大波，说什么的都会有。况且我那会儿正在办着“病退”（即因身体不好，无法务农，申请返回北京），有点闪失，一切将鸡飞蛋打。所以我就铁嘴钢牙地胡乱编住址和插队所在地。他似乎察觉出我在瞎编，反复问，我则在反复回答的过程中始终没前后矛盾过。他便问我那个同行的朋友的下落。幸好我那通讯录里有他去找的那位女友的电话。这是为了防备失去联系他才给我的。那个警察就往这里打电话。虽然没找到那个朋友，但看我说的是实话，他便没再纠缠我。后来他出去办什么事儿，留我独自在那个院子里。院子里有个干活的木匠，他悄悄对我说：“别怕，没事儿。”为这句话，我挺感激他。快到晌午，那警察回来了，让我跟他走。他也不说带我上那里去，只是让我跟他走。这一路我非常忐忑不安。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终于，目的地到了。原来是警察分局。地方挺大，来来往往的都是警察。他让我在一间房外等着，他要去办理手续。我心想，坏了，可能是办理拘留手续……我便说：“我想上躺厕所。”他顺手一指；“那边，快点啊！”

南方小市镇的茅坑是真正的大坑。上边用木板与粪坑隔开。往下一看，足足有两三米深，发酵的大粪热烘烘的，蛆虫在里面奋力地蠕动，特别是风一吹，又臭又热的旋风便从下面掀上来，弄得你浑身不舒服。况且那木板年久失修，踩在上边咯吱吱地响，真是既可怕又恶心。我真不愿意把那个本本扔入这种龌龊的地方。可是不扔又怎么样呢？万一被发现……我一狠心，将它扔了下去。虽然心痛，却如释重负。心想，这回我就什么也不怕了。

谁知，再见到那警察，他却是还给我各种扣押的东西！钱包、手表、书包、通讯录……“打长途电话核实你的身份，用了5块7角，这是剩余的钱。你在这里签个名字……”

一场虚惊！我一边签名留念一边这个懊侬呀！那个本……唉，可惜了！

此后，他又押着我去了码头，监视着我买了一张渡过湘江的船票。在码头上，他指着我曾经看过的公告，说：“你擅自闯入不许闲散人员逗留的地方，是犯法的。念你是插队学生，放你走吧。”

真他妈的懊侬！西岳华山、东岳泰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都去了，惟独这个南岳衡山！上了船，听乘客们聊天才知道，说此处正有大官在疗养呢，于是便封山育林了。噢，难怪呢。很久，我的心才彻底地放松下来。 在我身边的船梆上坐着一个年青的母亲，她正逗着怀里的孩子玩耍，我听她那再普通不过的哄孩子的话语，就像听一首动听的歌谣。我想起在白洋淀听赵金星讲他刚出监狱的感受。于是更深有体会了！

然而，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就是那本被抛在茅坑里的日记。如果它还在我手上，该多有意思呀！但它已经作古。想起它，我就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怀。怎么说呢？它有点像我们逝去的青春，它属于你，却又被别人牵着。你没有机会自由地表达自己。你不得不被迫让你的青春流放。就像那本日记，你不得不偷偷摸摸的，关键时还不得不让它在茅坑里打滚，然后再去怀念它。但它最终还是没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那个茅坑改观了吗？已经九十年代末期了，小镇的厕所已经改观了吧？不会是当年那种浮泛蛆虫的大坑了吧……即使它没改观，那日记本也一准沤烂了。你只有靠残缺的记忆来追述那个在茅坑里打滚的青春了。不是吗？

注①：文化大革命中的响亮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摘自甘铁生《高中》，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附】老友现状：

张建中（林莽）——著名诗人。现任职《诗刊》。

宋海泉——目前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任教。

姜世伟（芒克）——自由诗人。目前在北京。常受邀出国进行诗歌交流

史宝嘉——目前在北京。著名律师。时有作品问世。

赵主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学者。

陶洛诵——居住在北?。女作家。听说已与赵离异。

于友译（江河）——诗人。目前居住在美国。

赵振开（北岛）——诗人，目前届住在美国。

郭路生（食指）——诗人。目前在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小咧锛（李燕乔）——在美国定居。学者。

郑光召（郑义）——作家。在美国定居。

乔伊（潘青萍）——作家出版社编辑。女作家，时有作品问世。

栗世争（多多）——诗人。目前定居法国。

甘铁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51



我是怎样来到牧区的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有四个去向：1.留天津；2.去三线工厂；3.去兵团；4.去农村。前三个去向，我自知无任何可能性，因为那时讲"成份"。只有第四个去向属于我了：去农村。当然我不想去了。

那些日子里，刚开始动员，没有催促和强迫，所以我每天到学校走一遭，听听消息。看到过有的学生表决心，写血书积极要求上山下乡，学校也组织学生听报告。谁知，过了一段时间将上山下乡运动提到纲上线上来了。上山下乡与否是忠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大问题。街道和父母单位也开始动员工作。有的地方甚至敲锣打鼓到你家门口，你不报名他们就敲打个不停，直至你报了名。我仍没报名，想等等看，等什么，看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些日子里，学校都是去东北开鲁县农村的。

一天，父亲对我说："你妈妈夜半三更跑了。我找了好半天，才从公园找到。原来你妈厂里有个地主出身的老太婆，让红卫兵一脚踢死了，你妈吓坏了。"这时我才想起前些日子，我妈对我说："去农村吧，别给家惹事了！"看来那时母亲就心事重重了。父亲说完后，我什么也没说，呆呆地看着窗外，好大一阵子后，我独自上街，漫无边际毫无目的地逛，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办呢？母亲的身形不断地在我脑海里出现。两条腿还是把我带进了校园，我报了名去农村。

我轻松多了，我把报名的事告诉了父亲。他没说话，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母亲的头发又白了许多。我想她一定知道我报名的事了。

我没有把报名的事告诉给同学和班主任老师----王老师。名是报了，但我心里恨极了。

过几天，学校要求各班同学报名上山下乡，搞全班一片红。王老师生气地问我："你为什么不报名？"说罢狠很地拍了一下桌子。我当下也很地拍了一下桌子："你为什么不报名？"这一拍正好拍在《毛主席语录》本上。王老师一瞪眼："你这是什么行为！"我怕极了。那个年代这种行为可定为反革命。

那天我连饭也没吃，脑子里乱极了。整夜没睡，悄悄地哭了。怎么办呢？前些日子，学校里批斗了一个学生，只因他说错了一句话。挨斗、挨打、低头、挂牌子，丢人……..想到这些我怕的浑身发抖！最后我决定找校军管会

人谈谈，也许会好些？

第二天，我和军管会的负责人哭述了事情的原委，并强调自己不是故意拍"语录本"的。他听说我已报了名后就说："报了就行了。"我走了，心里略略安定了些。事情就这样完了吗？那以后，我仍忐忑不安。

过了几天，我听说有去牧区的消息，我高兴极了。脑子里立即闪出草原、俊马的画面。可听说要"成份"好的，因为那是边境。于是我找到了班主任王老师，求他帮忙。他笑了，答应帮忙。看来那拍"语录本"的事过去了，谢天谢地！

那天我连饭都没吃，从下午六点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老师告诉我批准了。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其他什么心情，我向王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回家的路上，我心中一阵酸楚：上音乐学院，当音乐家的梦彻底完蛋了！我感到眼前一片漆黑。

我把这事告诉了爸妈，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回到屋里，关上了门。一会儿传出母亲的哭泣声。我的心碎了。

校方组织我们看了介绍内蒙古草原的记录片。有一个镜头是：戴眼镜的青年，在放羊，草有半人高。

电影散了，我的情绪很低落。来到海河边，看着平静的海河水，心想，再也喝不到这清澈的海河水了。一群孩子欢蹦乱跳地在我身边嬉闹，我问自己，难道我和我那未来的孩子都将在大草原渡过一生？

第二天消了天津户口。走在街上有一种外地人的感觉，从今天起自己就是内蒙人了。抬头看看天，蓝蓝的，太阳红红的。内蒙也是蓝天红日？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呢？

上火车的那天，父亲和我坐在一起吃的饭，吃的是面条，我喜欢吃面。爸爸只说了两句话："好好照顾自己，不要惹事！"他哭了。我第一次见父亲哭。他当年41岁，我不到19岁，妈妈43岁。

父母亲要送我，我不让，独自去了火车站。

想想家，想想自己，都被弄得一塌糊涂，心境坏极了乱糟糟的。在火车上，没说一句话，我那着本："五线谱"，心不在焉地胡乱翻着，还想在某一天能够圆自己的"音乐家"的美梦。

到了牧区大队，大家各自靠在自己的行李上，看这眼前的这一切，即新鲜又陌生，让人茫然的环境，一言不发。我鼻子一酸哭了出来，弄的大家不知所措。本来就死气沉沉的屋子，一下子变得更加糁人。从那天起我和我们的知青朋友，便开始了新的生活----草原上的知青生活。

以后我才知道，当年我是班里第一个报名上山下乡的，同时也是唯一的要求来牧区的，实际上班里也只有我一个人来到了牧区插队落户。

来到内蒙草原我不后悔！因为相对地来说，这里比兵团和农村的日子好，劳动强度也不大。更重要的是，草原把我培养成为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要说来内蒙是当时形势所迫，到不如说是上苍的安排更确切些。1960年我11岁，听了叔叔说内蒙草原这好那好之后，我高兴地说："我长大了，也去内蒙草原！"这不，八年以后真的来了。一语成谶！

要问来内蒙有什么遗憾的吗？.还是那个当"音乐家"的梦没实现吧！

内蒙的天也是蓝蓝的，太阳也是红红的，我眼前一片亮亮的，我和我的孩子、爱人都很幸福！

作者：白新卫 六六届初三天津九十中学下乡：四子王旗白音朝克图公社依克吾素大队在队时间：1968年9月-------1973年9月

白新卫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3

工分情感

丢失了，再也找不着了。那本工分簿，是我返城时简陋行囊中的内容之一，当时只是郑重地想要保存它，匆忙中未及多想有什么意义。忽悠一晃，日子就过去二十多年，已是两鬓斑白时，好象悟到了点什么、想说点什么的时候，去找，却失落了。那是一本牛皮纸封面印制粗糙的小本，上面逐日记载着我十七岁一年劳作血汗的数字，尽管年终分红还倒贴了几块钱才背回了口粮，但那却是全村的较好水平。

工分，对于在乌蒙大山的皱折里挤压了一辈子的农民来说，是一年的吃食；对于插队的知青来说，它不仅关乎肚子的问题，还是接受再教育的表现，关系着今后的出路问题。工分簿上数字的多少，实在是很要紧的。然而，那些瘦薄贫瘠的土地就那么多，产量就那么高，并不因增添了知青而增产，这就意味着我们插队落户就要从农民的口里分走本来就不多的粮食。你越能干，工分越高，单位人均获得就越少，分值就越低。你的努力，无意中加剧了父老乡亲们的贫困。然而，你得生存。

今天的小青年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也是难以置信的：分值五厘钱的工分，竟然可以让人为之玩命去挣。世界真是进步了，小青年们对自己的未来，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毫不忸怩地算计付出与获得、时间与金钱、投入与产出。也许正是这种进步，忽然的让我想起了工分簿——我的十七岁的劳动日记，想起我面对它所记录的艰辛和劳苦发出的第一声成人的叹息，想起了那些与农民一道土里刨食养活了自己每一个日子的蓝墨水数字，想起那方水土那方人哺育了我虽粗糙却鲜活的十七岁青春。事实上挑担背粪耕锄犁耙蹒跚于绿野大山的感觉从未消失过，那不断充盈我人生的，是力量、奋争、耐受、真实、富有魅力的：劳动启示。

评估工分

背篓几乎是高寒山区唯一的运载工具。一年四季人们的肩背都在背篓的重压下，山里汉子的自尊自豪没有例外的是由他负重的多少来决定的，工分的档次当然由此划定。刚下乡时，给我定4分，是因为第一次收豆拼尽全力收了25斤，背不动而是拎回来的，尚不及农民小孩收的一半，我的工分因此定为“半截劳力”。面对这非得用力量和

汗水换取的数字，一切的浪漫和幻想都被无情地碾成了齑粉，十七年来的一切竟都变得毫无意义。没有同情和怜悯，你只能沉默地以实力去改写自己，第一次，我开始认识生活、生存含义的真实与残酷。于是，咬牙忍痛磨砺自己稚嫩的肩头，任全身肌肉在重压强力的撕扯下颤抖——不仅为少年人的自尊也为工分。当肩背上磨出似牛背上那种拳头般大小的“肩包”时，我以负重50斤获得了“妇女劳力”的8分；当我在相当距离内负重超过我体重一半的时候，我不仅能熟练地使用“拐耙”歇气，熟练地挎住背篓侧身卸载，还能坐着从平地将80斤重的粪肥背着站起来，我可以毫不心虚的向队长要求10分：“全劳力”工分了。

初冬的第一场雪尚未化完，开始背粪，这是整个冬季唯一的活路，在春耕前要给每块地备好粪肥。清早，我挎着背篓啃着洋芋，向磅秤旁的队长会计提出了我的要求，他们一楞，随即嘻嘻哈哈的指着那又陡又长叫“背着落”的山脊，让我背完顶上的那块地所需的粪，他们的话招来了其他社员的责备，我一声没吭摔了半个洋芋装好粪站到了磅秤上，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眼中流露出的不安，在人们的注视下我一步一滑的上了山。

……不知第几趟了，也不知是累了还是饿了，这趟感觉不对，腿遏制不住的发抖。我气喘如牛喷着白气，热汗一颗颗砸到地上，心跳在耳鼓敲出快而响的雷鸣，大脑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挪动双腿。半山腰上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只能拼命往上挣。当踏进一个脚窝抬起另一只脚的时候，突然感到脚下在滑，我拼命弯曲脚趾想抠住但没成功。我后悔，后悔穿了这双断帮裂底的解放鞋，光脚肯定能抠住；后悔意气用事没把洋芋啃完；后悔……背篓突然倾斜，巨痛自腰部袭来，眼一黑，我连粪带人从山腰向山脚烟地翻滚而下。烟地里，躺在背篓上，疼痛和眩晕令我直想呕吐，队长奔来将我背起，会计却扯不起我的背篓——五根干硬尖利的烟桩将背篓穿透钉在了地上，要是面着地呢？背篓救了我的命。……

我获得了对我劳动的评价——全劳力日工10分。

政治工分

工分也不尽是一颗汗珠摔八瓣挣来的，有的来得也轻省，譬如开会、排戏、写标语、画宣传画等，都是为政治形势需要而布置的“政治任务”。既是完成任务，自然不能没有工分，又因为是“政治”的，也就不由分说当然的要记给全劳力工分，即“政治工分”是也。这工分不用上山下田滚一身泥巴抹一脸牛屎挣一身臭汗便可轻松获得，自然令所有知青垂涎，但凡有机会，必欲争之。于是，左嗓子说能唱美声，敲几下碰铃也言乐器，横平竖直拎不清也声称搞书法，任歪瓜裂枣都敢当演员。殊不知政治工分也是要担风险的。知青中有演戏念错词当了“反革命”的；有毛手毛脚弄坏道具获“破坏分子”称号的；有用乐器奏“黄歌”遭批判的；有写大标语从架子上摔下留下残疾的。我因为有些不是正经庄稼人应有的特长，很有些挣“政治工分”的经历，其凶险至今记忆犹新。

逢“秋老虎”，无风，热浪蒸腾得景物摇曳，狗都不到日头下。晌午，我又放倒一块地的包谷。汗是早没了，包谷叶划破的皮肤已无汗碱腌咬的痛感，我晕忽忽扔掉镰刀，把自己仰面摔倒在包谷杆上，张着开裂起皮的嘴，想从瓦蓝的天上发现哪怕小小的一片云，闭眼，身体钝痛，有垂死挣扎生苟延残喘的感觉。恍惚中，听人大骂：聋子！喊你半天没听见？是队长。想象他的气急败坏有点想笑。他蹲下为我遮住阳光，说公社来开会，要在仓房黑板上画一幅主席像，把大标语换成“农业学大寨”。仓房？对于我简直就是避暑山庄！给10分，不干就找别人。我睁开眼说：去！

仓房的阴凉令昏懵的脑袋冷静，我才发现这政治工分不好拿。字好写，主席像好画？邻公社那个会美术的知青就为没画好主席像成了反革命，更何况我根本就不会画画。回山上继续干活？看门外阳光炽烈，打我一顿也不愿迈出一步，我决定不要工分今天就混了。大字写好，心却忐忑起来，不画不就得罪了队长？公社印象？政治表现？鉴定评语？招工上调？还是终老桑梓？林林总总左右为难搅得我惶惶然如热锅蚁，几攥粉笔终不敢落。无望，无奈，仰天长叹，目光掠过对面老墙，两眼为之一亮：墙上贴着一幅主席像！那一刻的感觉真是“满天的乌云风吹散”啊。小心翼翼将主席像揭下，用糨糊贴于黑板，再使粉笔在四周画上道道金光，一番修饰，满室生辉，大功告成。该“杰作”获所有与会者称赞，队长褒奖，额外奖励5分，我却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从此再不敢揽此类瓷器活了。

多少年后每每想起，我都会为那时的机智拍案叫绝并为之庆幸，当时要是没有主席像呢？要是有也没注意呢？要是看见了也没想到用在我的“杰作”上呢？那种形势下，不用别人收拾，自己就能把自己废了。

啊！政治工分，真是“想说爱你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啊。

补贴工分

出差到城里开会学习，若非指明知青就轮不上，采买物品物资，为免受城里人欺负偶尔也带知青同行，而有些不合政策不上台面的事，就非知青而不能了。那时布票紧，彝族老乡按政策可多发几尺，可大档裤和包头布得花不少钱，有票没钱，票如废纸，一个穷字了得。肚子第一，服饰第二。队长懂这哲学。于是，我获得了出差的机会：倒卖布票。

换上内里贴了不少胶布补丁的“客服”，看大队文书拿图章哈气在出差证明上戳章，满心欢喜。脑子里全是遥远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气息，洋溢亲情的家，能置换满腹包谷洋芋的白米饭……队长唠叨的叮嘱担忧的眼神全没往心里去，“倒卖票证”、“投机倒把”对一个光腚知青奈何？揣证明上路像一干部，行路住店遇查，拿腔拿调逗弄调侃，一扫往日无证回城的委琐窝囊，验查者也少了死头干僵的牛气，解恨。一路好心情。

回城，混迹于人头攒动的菜市，瞻前顾后鬼鬼祟祟，见红袖套就若无其事拣菜砍价，转身即作不法交易。布票好卖，几天下来，布票所剩无几，心中窃喜：可轻松几天了。也合该倒霉，最后一天我竟然将布票卖到了便衣手上。二话没有，钱票没收关入黑屋。那房子不大，初入只闻人声蝇嗡，后才看清总有二三十人，空气浑浊闷臭，腿一软，靠墙坐下，屁股立刻冰凉精湿，那地方被人尿了小便，一阵哄笑。恼怒却不知骂谁，依墙而立，想我堂堂知识青年竟与小偷流氓共囚一室，心悲凉，这才想起队长的唠叨与担忧不无道理。拘留蹲监，挂牌游街，一顶“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戴上，回城就成了绝望。想父母，想知哥知妹父老乡亲，想前途命运，心乱如麻。

讯问我的是个着兰警服的络腮胡子，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他问我职业时，我竟脱口：杨子荣。他将手中的笔一扔，抬起从未抬起的头，那是一张疲惫的脸。我忙改口：我是说你像杨子荣我是知青。他恼怒的表情缓和了。连问带训中好歹把事情说清，他没再吭气，低头踱步，我察觉出他内心的不平静，忙将苦情大肆倾诉。他出门片刻后回来，把一铝饭盒放我面前说：吃！饭盒里是青菜荷包蛋和乡下难见的白米饭，这是他的晚餐。我无泪，却哽咽了。

挠着被虱子跳蚤叮咬的满身疙瘩走出黑屋时，见队长捏包皱巴巴的“金沙江”点头哈腰向络腮胡子敬烟，我心一沉：完了，“投机倒把”的帽子算戴定了。到办公室，我被留在外面，室内猛地爆发出络腮胡子的咆哮，这是我从未见识过的狂怒，直听得我头皮发炸心惊肉跳。片刻，队长奄败屁臭地倒退出来，满额汗珠地捧一张纸，只是谦卑的笑容，弯曲的腰腿和那包烟不变。

回村的山路上，一直沉默的队长突然站住说：那民警是个好人！然后取出那张纸（估计不是好东西）卷烟抽，烧了。后来才知道，络腮胡子把没收的布票处理了，钱都给了队长。晚上分钱，大家一致同意每人给我拨一个工分。会计扬着我的工分本问：记什么名目？队长沉吟片刻说：补贴工分！

好一个“补贴工分”。蹲黑屋拿补贴，也算按劳取酬？

包干工分

包工，知青们称“硬工”，即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指定活路获相应工分。与日工不同在于没人催促监督，没了扎堆打滚混工分的便宜，活就放在那里，怎么干、什么时候干悉听尊便，但得在一定时间完成，队干部不时还要“质量检验”。包工劳动强度大，有时累得你哪怕泥水里趴下就从此不想起来，但相对自由，工分高，若遇抢季节或天气原因还会高些，找一定额适中的包下，早干完时间就是自己的，潜意识里我更愿干包工。干包工要有眼光经验的，同样的稻田，有疏密干稀之别，收割捆扎工分一样，背回稻子又是称重记分，选大了苦不动，小了又划不来；还有先来后到等原因。总之，便宜你只能占一头。

一次到十几里外山后收萝卜。那是一嵌入邻大队的“飞地”。解放前就为它打冤家，解放后也没从我们彝族队划出去。种正经庄稼老被偷，又没法看，只能胡乱种点什么以示主权，就苦了人。我起大早上路，露水重，行不多远鞋和裤腿就糊一层红泥，精湿冰凉。到地头太阳还没出，选地插拐耙以示该地有主，跟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庆幸。村里的二憨来了，在我地里转了转说：你整不了！照顾我换他坡下那块小点的。哪承想，那被牛啃光了叶子的地朝阳近水，萝卜长得又密又大。庄稼好是喜事，我却边刨萝卜边发愁，出远工往返顶多两趟，可现在至少要三趟。竟让二憨涮了。

日当午，背萝卜上路。歪歪倒倒爬坡，踉踉跄跄下坎，挣得脸红筋涨汗如雨下。日影斜了，又斜了，奔命中，无奈地眼看我映在地上的阴影越拉越长。夕阳似一颗颤颤欲滴的血珠悬在西山尖，它想振作却力不能支，终于沦落，霎时，天地被湮个鲜血淋漓。赤辉中，我似血人踏酽酽血色，尽力驱动双腿追赶这最后的光明。步履疲沓，骨节生涩，肌肉僵硬，浑身说不清那里痛。有一刻意识突然飞升，俯瞰山脊上的我如同牛背上的虫豸，生命渺小得微不足道。黑夜降临。燃起松明火把，惶惶蹒跚于黢黑大山的沟壑中，火把每烧一截，心中就度量一次回村的距离。背篓越来越重，腿越来越沉，歇气的次数越来越多，数着步子，每次都挣到极限，先五十步一歇，后来只走十几步就得歇气。几次想把萝卜掀了，可一想到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和“五类”分子的非人待遇就不寒而栗，农人对劳动成果的情感也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咬牙前行。……终于不行了，这次连杵着拐耙歇气都吃力了，放下背篓人即瘫倒，身体木钝没有感觉，我明白，我不可能把萝卜背回村了。懵懂中，火把将燃尽的劈啪声提醒了我，挣扎着燃起一堆篝火，把自己大面仰天摔倒，半睁眼望着深邃的夜空。夜风浸人，夜声嘈嘈。记得那晚我想得很多，想没平反的爹妈，想那些跳出农村的同学，想捏着我命运的、冥冥中的那个主宰……最实际的是想回村后怎么臭揍二憨。就是没想到害怕，事后有人问过我，我也竭力回想过，我没有力气去怕也没来得及去怕，那是应该怕的呀，牛鬼蛇神还有狼，可是没有——我睡着了。

昏睡中，被人搡着叫着弄醒，朦朦胧胧见人影幢幢火把耀眼。老乡们找来了。我看见二憨愧疚地挎起我的背篓就走，看见扶着我的队长，令我终身难忘的是房东大娘眼角那颗母亲的眼泪。

包工——硬工，生命的张扬，人生的宣示。经历了，就永远不会、也永远不该忘记。

工分情感

不知何故，我总把深蓝当作底层的颜色，深海的颜色，那是诸多层亮丽色彩的层叠沉积，厚重、深沉、博大，一如工分簿上的蓝黑墨水。岁月荏苒，“肩包”早已消失殆尽，老茧褪成了一层亮皮，但在我支配的这个躯体里，血液依然奔流乌蒙山的洪水，骨子里积淀着乌蒙山赐与的钙质，感情怎么也走不出乌蒙大山的那个皱折，面对着飞

速运转的世界我还是奔突于山岳沟壑挣工分的感觉，我摆脱不了也不想摆脱泥土、粪肥、汗碱、血渍、垢痂混合的深蓝，那是我生命的旗帜上永不消退的底色，是底层的本色。

我满怀感情地注视着记忆中的工分。“小知青，唱个山歌我听听”的童谣响起，雨雪风霜中背粪挑担耕锄犁耙的场景再现，队长、二憨、房东大娘、络腮胡子民警等众多鲜活的面庞闪过，黄的包谷饭、白的煮洋芋、黑的荞麦疙瘩养育了我青春年华的五谷杂粮呈现眼前，胸中一股荡荡热流涌动。

我充满感激地面对着记忆中的工分。“既然眼泪和汗珠苦咸的滋味一样，那就选择流汗。”这是我面对它发出的第一个男子汉宣言。于是，去耕种企盼、收获欢乐、走向成熟，去了解中国的农民融汇他们的情感，去认识生存的含义、生活的本质和生命的坚韧，去体会底层的人性和平民的亲情。

工分——劳动，我生存教育的试卷，我认识人生的范本，我劳动崇拜的图腾。尽管返城时我们一贫如洗，也许我们今天仍然一无所有；也许我们即将也应该被超越，但只要你过了挣工分的日子，还有什么日子不能过？有这碗劳动酿就的老酒垫底，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工分情感——底层情感——平民情感——知青情感。这就是工分——劳动留给我们的、一辈子也受用不尽的珍宝。

感谢工分！

感谢劳动！

2005-3-23

孙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8*



在园林局田径队的日子

我们刚到林场没几个月，就和邻近的园林局中专举行了一场田径友谊赛。那是1975年的事了，园林局中专的学生都是刚从海南岛农场招回来的老三届知青。

记得比赛那天刚下完雨，操场的水渍左一滩右一滩。我们穿着解放鞋，试跑了一下，滑溜溜的。有人提议，不如我们打赤脚吧？我们都说好，就把鞋子脱了，打着赤脚站在起跑线上。呵呵，别看中专的学生似模似样地穿着钉鞋，她们可跑不过我们！比赛结果，林场知青大获全胜！

中专的学生围住我们，很亲切地询问我们脚痛不痛，又捶胸顿足没有拿多几对钉鞋来分给我们。我们觉得这没啥大惊小怪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我们只有小学二年级，但为了表示我们也要革命，我们天天上学都卷着裤腿，赤着脚，早习惯了。

后来我们几个知青就被招到园林局田径队。园林局田径队在广州可是有名气的，在多次广州市职工运动会上都取得好成绩。广州市多项长跑冠军就是园林局田径队的队长林叔，他还是园林局的工会主席。

林叔当年也就是30出头，国字脸，浓眉大眼，说话带点乡音。听说他是个复员军人，因为有胃病，刚好又住在园林局在越秀山的宿舍里，就天天早起跑步锻炼，不知不觉把病治好了，还练成了飞毛腿。至于因为给园林局争得荣誉，被领导发现他人老实，提拔他做了局工会主席，且赢得了号称园林局一枝花的美人阿娟做老婆，可能当初他也未曾料到呢。

因此他在给我们作动员的时候，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来，翻来覆去就是那个意思：“跑吧，好好地跑吧，什么都会有的……”我们训练的地点都不错，平时在越秀公园或者烈士陵园训练，临近比赛就住在动物公园集训。在动物公园住可恐怖了，晚上上厕所要经过狼圈，黑暗中只见一对对绿荧荧的眼睛；到半夜，虎哮狼嚎此起彼伏，吵得难以入睡。那时晚上做的梦，不是被老虎咬掉自己的头，就是自己吃了老虎。但是白天训练完后，我们可以满园跑，去看刚出生的动物，穿上花衣服去试孔雀会不会妒嫉，跳到猴山里看猴子会不会调戏妇女……

林叔的训练方法就是埋头苦干，死跑。他给我安排的任务是每天跑10个100米。那可是每次都要全力跑的呀！他常常在我累得休息的时候，把蒲扇似的大手一挥：“冲破极限、冲破极限、要冲破自己的极限！”那时候我相信

他的话，毛主席也说过："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相信每次只要尽了自己的极限，积少成多，就会有质的飞跃。我咬着牙，一次一次地尽全力拼命冲刺。只有接受过训练的人才知道，那零点零几秒的成绩提高，渗透着多少的汗水呀。

那时候我很瘦，1.68米的个子，才100斤。因为每顿饭才供给4两，好的时候有一片薄的能吹起来的猪肉，不好的时候盐水捞饭。有一次我在训练的时候，竟然晕了过去，掉在水塘里。幸好林叔在一旁，赶快把我捞起来。林叔马上去努力，田径队的伙食改善了很多，老虎和狮子的口粮悄悄地扣下来一点，我们顿顿有鱼肉了，虽说数量还是不够，但饭是可以任吃的。

田径队的人很团结，中专生把我们当小妹妹宠着。晚上那些大姐姐会打来热水，逼我们烫脚；当时老三届的已经二十多岁了，他们忙着眉来眼去，培养感情，我们几个小知青就在一旁偷偷观察他们火辣辣的眼神，傻呼呼地跟着到处去玩。休息的日子，我们成群结队去"内部地方"玩，比如当时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兰圃、植物园里的温室等等。大家相处得就象一家人一样。

不要以为喜欢体育的人就是五大三粗的，我们田径队里的人，女的斯文，男的英俊，穿上绿色的运动服，白色斜纹布的短裤，戴着白帽子，走在宽阔的运动场上，阳光晒得我们脸上红红的。好些坐在看台上的农友，都说至今仍记得我们当年青春的样子嘞。

唉，那一段记录着青春的日子，与速度、冲线、汗水、掌声夹杂，我们用少年纯真的心，去热爱，去感受，去创造，去真心真意过好每一天，想起来真是无悔。

岁月流逝，当年人材济济的田径队，已然人事全非。老实的林叔经不住人事的倾轧，竟然疯了；满脸洒着细细的小雀斑的丽新，总是那么斯文地咪咪笑，跑起来象一只小羚羊那么快，却得了妊娠中毒症，突然死了，她的婆家还烧了她的衣物叫晦气，气得我们田径队的人差点想拉队去砸他的家；总是埋头苦练的"钢筋"，平时不大出声，却在一次晨跑的时候，勇斗抢劫别人的歹徒，被歹徒用刀插死了；其他的成员，经常会在报纸上发现这个那个的消息，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难道真的有遗传基因吗？我女儿也喜欢田径。我的态度是犹豫的，既觉得体育能培养人的毅力与团体精神，又觉得太剧烈的运动对身体不好。但她执意要参加，她的成绩比我好，是区的冠军呢。

奥运的项目里，我最喜欢看田径。我最崇拜的是乔伊娜，她不但速度快，还处处展现了美。她的跑姿美，她的容貌美，她的身材美，她的服饰美……她就象一只美丽的花蝴蝶，翩翩在田径场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愿她安息。

2000年9月21日奥运期间于广州

白云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



插队日记

偶然想起要收拾一下多年没有人进去的杂物房，门上的锁幸好还能打开。费了很大劲才弄干净蜘蛛网，老鼠的残迹到处都是。没想到，居然翻出了一箱故纸。原以为当年搬家时它们已经失灭了。

这个小本子上居然是我下乡时的日记。封面上红底衬托着毛主席的木刻像，放着光芒。还印着“四个伟大”，以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最下边是我当年自己写的“永远忠于毛主席！”几个字。里边的日记当然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就是这样，不能持之以恒。摘录几段，忠实于原作，一字不改。

（1）一九七五年

十月二十四日

回到乡下，刷了一天的标语，农业学大寨。

队里在深翻，搞今年的小麦种植。要求方田、深沟。一个小孩挑了一对鹅，走过。队里的社员告诉他：“前边有岗哨，不准过，抓住了罚你劳动三天，不管饭，鹅也收了你的。”“我又不是这个公社的，他也管么？”小孩问。

“咦！你在不在毛主席领导？你不在，他不管你。你要在，就得听。”“……”夜里，生产队卖高价谷子，为的是交任务猪，买任务条子。每人头4.6元。

十月二十五日，天下雨。

无聊。老庄员们在打扑克赌钱。

刘副队长说：“李建英昨天要请假赶集，不准。她说来（客）人了，来人也不准。今天她赶集回来，我问她给谁请的假，她说，我跟老天爷请的假。跟你们这些干部请死了也不中。”下午大队开会，我打电话给李德发，告诉他飞鹰车不能要。

中午收到妈妈的来信。下午写了回信。

十月二十六日

我在花生地边巡视，万和队的鹅被罚了钱之后，我就不见它们再来了。

大队季医生也被罚了，他找刘文富，他推说不知道，知道的话，找大蛮子去。真会推脱责任。大队里，几个干部在打5、10、K，中午老祁去买了六条鲫鱼。招待干部。

十月二十七日

公社邮电所的老朱来送报，他讲起那个小朱，他犯了贪污罪。共弄了两三千块钱，现在县里反省。还讲，他偷了周保国的私章，伪造单据诬赖好人。老社员们自然是不胜感慨之至了。他们说，这小朱一个月拿几十块钱还不知足，为的啥。有的说，林彪比他还高，咋不知足。

公社要求育秧栽小麦，社员自然没话说。县里的电话会议一开完，公社书记说：县委指示，无条件坚决执行。各大队看怎么办。其他的几个公社干部也表示坚决执行国均同志（注：当时的县委书记。）和县委的指示。下级服从上级，党员服从组织，这是纪律！

社员说，干部咋说，咋办。管他呢！

（注：那时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突发奇想，想出了一个“育秧栽小麦”的高招。他的理由是，稻子栽秧产量高，小麦为什么不能栽秧？于是全县执行。）

十月二十八日，雨一直不停。

村里烂得跟稀泥糊糊一样。猪拱的，人踩的，乱七八糟，臭气熏天，一个个粪坑都满了，尿水横溢，到处都是。我在花生地里瞄水，逛了一天，腰疼起来，雨也大了，于是躲到大队去休息一会。

夜里，我点燃电石灯，几个老乡好奇，来看看。不急（注：一个社员的外号）：说老实话，咱们都要细细想的话，真不想活。活着啥意思，一个劳日六两八钱，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前几年，听说要饭丑的慌，现在，光荣得很。赶明个，我也去赶狗去。

刘文海对我说：农村可广阔？！妈妈也，那咱子我复员，回来一路恼一路，越走近这越不想回，像个啥样子，恨不得一脚蹬死个日贼舅子的。

龙王（外号）说，唉，死了又不甘心，还想看看。活下去真不敢细细想。想就活不下去了。怎么过。

夜里，也就是现在，我在灯下写日记，马（生产）队长说，写吧，把我们农村的苦日子都写下来，千万嘛忘了，以后你不管到那儿，都可以看看。我还能到那儿去呢？他不识字，当然也不知道我在画些什么东西。

给裘贝写了一封信。

十月二十九日，天放晴了。

老乡们抓紧这难得的时机，剥麻。不然，等散了土，又得上麦田里忙去。再说，也等不及地要用钱。一年一度，全靠这自留地的麻换些钱来买新还旧。

队里公布了结算，每个劳日划二角三分钱。我的工分是二千五百多分，只我一个人，分397斤谷，除去160斤代管，扣去麦季的外，还余一百另几斤米。

队里共收15万斤稻。去了公余粮，支援灾区的外，还有六万多斤，分配给全队的二百五十三口人。还有种子。

汪贤说，自从食堂关之后，就再也没有舒坦的时候了。57年收了十八万斤，分给一百四十余口。他家的人口不及现在，分了五千多斤谷，八百多斤麦。稻子穴上屋。现在不行喽。

汪泉家说，上纲上纲，上缸不上穴。一家一缸就够了。

前者还讲，大队一年光来客吃喝一项，二千元下不来。我问了小点，他说，就是这样。今年夏天来检查批林批孔，几天工夫，光酒就打了十几块钱的，鱼还不算。肉买了几十斤。我记得了，那次我也见了，如妇联主任说，象过喜事一样。

（注：汪贤是本大队贫协主席。）

十月三十日，天晴

我想起二十八日那一天，我在大队。公社的几个干部与大队干部一块打5、10、K。老祁在忙着剖鱼准备午饭。昨晚，公社又来了人。又在弄酒肉了。听说徐学文的弟弟结婚，把肉给借来了。

（2）一九七六年

七月四日

买麻种，到广西去混了五个月。又到郑州呆了一个月，总共半年了。

县里要招一批亦工亦农的工人，那些多少有一点门路的人都开始慌忙了。李春秀告诉我，那一阵，公社院子里

脚踏车都快堆起来了。

公社曹书记在县里住院，妹妹（注：医学院实习生，正好在我们县医院。）告诉我，县里的大大小小头头都去看望了，他跟县委书记很好。据说，光人参都不少。去年他爹死了，公社老沙叫木匠半夜赶到县里去，结果人没齐，老沙大发脾气。盖房子可以停下来，先忙死人。食品站送了半边猪，办白喜事。献殷勤的人就象是种地一样，撒下种子，为的是要收获。

果然，今年公社八个名额，曹一个人在县里就批掉三个。县头头的子女到公社来下乡，曹把他们安排入了党。现在入党的人，有多少是一心为公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我不得而知。共产党成了执政的党，这一条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阶级关系也就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必须有新的观点来看待新的阶级斗争形势。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是何等高瞻远瞩啊！

为谁谋利益？！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

张世民（注：公社财政助理。）的大女儿去年高中还没毕业，退学了，安排到瓦房教书。四月，二女儿又退学了，安排到公社当电话员。（注：当时政策规定，中学毕业生必须下乡，不得直接安排工作。）这个位子，武装部长早要给他的妹妹安插的，张凭着他与书记（张永昌）的关系先走了一步。六月，瓦房支部批准了张大女儿入了党。她是先进分子吗？不，是一个为自己谋利益的人。八月，大学来招生，张又忙了起来，客也请了，饭也吃了，表也填了，准备走了。谁知，要调走的武装部长找了新调来的公社书记，奏了一本。他要把自己的妹妹送上去。官司正打，新书记的未婚妻把她的表妹杨巧推荐给新书记。（是她去求表姐帮忙的。）于是新书记把这一个大学位子给了妻表妹。手续送到县里，却驳了回来，县里点了另一个名字，此人乃县卫生局某局长的侄女儿。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

正好，中央叫各地公社办好兽医站，要成为公社的正式机构。张代荣进去当会计了。那两个竞争者一个进了潢师，一个进了信阳卫校。各得其所。这都是工农兵学员吗？！

好心的人们叫我不要不舍得花钱，去招待一下干部们。

我学不会，也不想学这一套。

这是一种腐败的迹象，几千年来，就是这种腐败坏了国家的事。

总有一天，人民要站在太阳光里，把这一切混蛋的现象扫荡干净。

七月八日

张学英到杨丙法（生产队贫协组长）家的鸡舍去寻找自己失了的鸡，打巧，杨妻回来了，吵了起来。又打了起

来。

我拿了一巴斗麦子到村东头石磨去磨面粉，正好杨丙法在磨着。告诉他打架的事，他说，女人家打不了多大仗，管他的。接着又问我：你们这些个学生，在城里好好的，下乡来干熊？我说：毛主席号召下乡嘛。他又说：妹子的，你们听他的干熊！都不来，他能咋的？还能拿盒子炮押你们来？我笑了，说：你还是贫下中农协会的头咧，咋就说这落后话？他道：啥鸡巴落后话，实话！你在这住了这些年，还没瞧够？饿不死也吃不饱，就这么混吧！

我看他磨的面，连麸子也快没有了，说：你咋不留麸子哩？他苦笑道：不连麸子咋能吃饱肚子？

七月十日

三老子的猪要卖了，钱文明领了一个远亲来买，讲定0.78一斤。过秤之后，买方有些犹豫，又不要了。

一大群人围着看。张学英的孩子与孙日新的孩子打了起来。孙日新上去拉，张的儿子骂了孙一句，孙给他一掌。张不愿了，也骂了起来。互相骂了几句之后，就打了起来。大人互相打着孩子也各各上了阵，张的男人回来了，挥舞着薅锄上了阵，这一架连打带骂，直到人们上来拉扯，才结束。

人们无聊了就打架。

七月四日

今天，北京为朱总司令开追悼会。

一个举世瞩目的伟人，离开了人间。

七月十三日，天阴。

村里找了一个唱书的人，也许是个乞丐来唱书。

这件事吸引了村里每一个人。公社在开队长会，有电影招待。除了几个年轻人和孩子去看电影而外，其余的人，天刚黑都聚在杨达家门口的空地上等候了。孙日新在煎饼、煮鸡蛋，招待唱书的。队里拔火麻，留了三个作为酬劳。每个约五、六十斤。共值七、八元钱。

在当家的副队长老汪，在人群中吼了起来：“谁在这儿装鬼！”几个妇女说，你回家睡觉去不好了么？！唱书是四旧，上边知道了，要追查的，当然，只能问干部们的事。老汪是党员，出来吼吼，是让人们看看的。事实上，他蹲在一角，听到最后。

另一个大队干部在家睡觉，佯作不知。

唱书的先扯扯嗓子，大唱了几段批林批孔之类的话，尔后农民们表示要听旧的。他全不理会。突然，他一顿：“大路上跑来几匹马！同志们，我现在唱的是什么？唱的是大宋王朝的事，叫做‘美贞进宝传’！”人群里顿时鸦雀无声，天上的星星，被云渐渐遮住了。书唱到两点多，大雨来才散。

第二天还要唱的。

七月十四日，大雨滂沱。

杨达家里里外外都是人。外边的人在大雨中站着。打着伞，穿着蓑衣，一直听完。

七月十六日

今天是毛主席畅游长江十周年。

我早上上了集，公社新盖了招待所。每个常委一间住室，每个干部一张上海买的、价值17元的靠椅。每个干部配一辆自行车。八成新的才30元。每月公社补助二元修车费，一年就24元。

下午，我到胡家大塘游泳三圈。

七月十七日

清早天晴，风和日丽。我与三老子、老爹上张广去串门。路上清河集一带正拔火麻。成群的燕子在拔过的地方低空俯冲；因拔了麻，无处藏身的虫儿飞得多了，成了燕子们的好菜。

到了漂桥，钱聚山的弟媳正在抢救。她头天有病，为没钱治，两口子争了几句嘴，就喝了1605下肚。

下午离开了人间，扔下了三个孩子。

（注：次日离开乡下，日记中断。）

（3）一九七六年

九月三十日

从外地回到乡下。

村子里热气腾腾，姜庙队已经分队了。我到达时正在拈阄，东队分去了柴油机与碾米机。西队抽来了水泵和小钢磨。据说，公社是不承认的，曹书记说，你们干脆，几个大队分分，成立个党委选一个书记，我这位不斗了，让给你们。官腔打了也无用，老百姓听惯了。瓦房大队共分了四个队，一分为二成了八个。

三老子大约又病了，我问他，为什么要分队？他说，没人干活。那几天打场，人都在场上躺着，分开了有好处。我问大队会计钱如生，他说，分分干劲也大些。我问，公社批了吗？他说，不批也弄不长。今年队里又减产了几万斤谷子。估计一人可分到一、二百斤稻子。

我到大队，老祁躺在床上，快死了，他得了食道癌。两个月以前，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千万不要忘了，帮我买一双皮草鞋（注：塑料凉鞋。），象吴瑞堂那样的。而我却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现在他躺在床上，哼哼着，叫我吸烟。他那早就备下的棺材，在窗下放着。几个亲戚在旁边守护。他从未结过婚，是个老光棍，并无儿女的。巧得很，他的侄儿生了个小女儿。

明天是国庆27周年。公社正传达中央文件，是纪念国庆的活动方式方面的。

十月一日

今天国庆节。乡下从来是不举行什么活动的，今年，更加不举行了。我买了几斤鱼，改善一下。

十月二日

到叶集去了一趟，什么也没买到。一路上都在收红麻。

刘文富下台了，他把我买回的种子拿去卖高价了，村里的农民们告了一状，写了大字报。大队去调查，确有其事。每斤四元，秋天付钱的五元。怎么处理还不知道，这也是共产党员吗？

大队正在处理永乐队的何生友、王XX,这俩是政治犯。在做义务工。一个在买（悼念毛主席）黑纱时说，这下我翻身了，我买六个，一起戴上。另一个说，什么解放，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干两三天一改善，现在改善不成了。这些话谁都说，可他俩在悼念活动时公开说，贫农一下就会变反革命。

何的检查上还说，他与大队主任吵过一架，他骂刘家楼，你叫我们种地侍候你，还叫我们盖楼咧！就是老东家！

怎么处理，不清楚，可能要送专政队去。材料在整，还没定案，永乐队架桌子开了几次批斗会了。我问何生友，要坐劳改咋办？他笑一笑，说：坐劳改也比当老社员强。在那儿一个月还有45斤大米吃，现在连一天七大两也吃不上。

大概是孟子说吧，哀，莫大于心死。的确，自我下乡到现在，没有哪年队里每人头达到过七大两米的。

夜，队里在杀鸭宰鸡。大队干部要到本队来成立新班子。必须招待一下。

十月三日

大队开干部会，吃了忆苦饭，即白菜烫干饭。干部们打趣说，这比家里平常吃的还强些。

明天要几十斤肉，大约是思甜饭了。

十月十八日

足足半个月没动一笔。这半个月，在紧张的劳作、远途的跋涉、快乐的麻醉以及热望中度过了。

九号那天，崔会友跑来报告说，北京把张、江、姚、王抓起来了。刘文才、敖家新几个和我一起，大家喝了一通，都觉得太痛快了。这几天，无论走到那儿都在议论这件事，果然是真的，而且人人都高兴。不过，从报纸上看，我估计的“换药不换汤”也许对了。其实还是那条路线，只不过换了几个人而已。

桃园队崔会田家老奶奶烧锅失了火，远远看见浓烟冲天，又变成了白烟。三家人家成了废墟。陈培祥向公社的胡书记汇报说：烧得真快，一小会的功夫，三家都封了门，除了崔会田抬出一麻袋稻，别的连大锹刨锄都烧光烧尽。衣服也全都烧光了。公社指示，要自力更生，盖屋由本生产队负责，大队各生产队每队出十元，救灾。因为其中一家有现役军人。于是照办了。

目前正值种麦、收麻的时期，集市被禁掉了，全部劳力都要投入种麦。中午，公社来了四个书记常委，检查布置情况。大队杀了一只鹅、一只鸭，还秤了七八斤肉、沽了酒，招待他们。

（暂时就到这吧。一个字没加，一个字没减，甚至错别字也没改。我想，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更好。）

wenjunq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4



【知青记忆碎片】：

（1）下乡前后

当年到内蒙下乡插队，虽然无奈，却还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天津老三届学生六八年开始大批下乡，我就读的师院附中头批六六届的去了黑龙江，我们这届还在宣传阶段，一个班留城二三人其他都得走，年底在内蒙武川插队的二十中的几个朋友回津探亲，说他们那里条件相对还好，火车十来个小时路程比黑龙江近多啦，况且我们相交多年志同道合，于是内蒙武川成为我的目标。在朋友帮助下我曾几次到渤海大楼找县里经办负责人，最终获准时心情复杂。说实在的，我对接受再教育之类没什么认识，但厌倦了无书读无事做的日子，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出去闯荡磨练一下，对未知的生活充满好奇与期待，高兴一阵儿随即又陷入即将离开家乡与亲人的愁绪之中。

离开天津的日期，我只记得是六九年四月，后来有网友说是四月九日，也有人说是十二日。留在我记忆里的是在天津站火车驶动一霎的哭声，车上车下，男女老少，惊天恸地，令人震撼终身难忘，或许就是这项运动必然终结的一个征兆吧。此前我曾送过同学见过这样场面，因此坚持不让家人送站，至多八九个月冬闲不就可以回来探亲了吗，何必弄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出了门转身掩门不让家人送出来，然后头也未回径直走了。

这批知青都是投奔亲友的，来自各个学校互不相识也没什么话说，火车上一路呆坐。我依稀记得，那趟火车破例走货运的丰沙线，抵呼和浩特后坐大卡车去蒙语专科学校。呼和浩特是自治区首府相当于省会城市，那时候比北京、天津可差得远啦，那天天气阴沉，两旁街道灰突突的，路过了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墓园，不远就是蒙语专科学校，听说原来是清代外嫁公主的府邸，再就是过夜时的彻骨寒冷......

次日乘汽车去武川县哈乐公社，出了城就上了大青山，蜿蜒盘山路，悬崖深谷，令人既兴奋又紧张，还有点儿晕，到哈乐下了汽车，见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朋友们，心里顿时轻松下来，一起上了马车不大一会儿就进了村。

天色已暗，朋友们包好了饺子，烧开了水，屋里雾气缭绕暖烘烘的，昏暗的油灯一闪一闪的，来了不少村民，说着当地方言似懂非懂......热闹过后，我独自走出屋子，外面寒气逼人，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清，几声狗吠引得周围的狗都跟着乱叫起来，头脑清醒过来，昨天还在天津的家里，现在跑到几百里外陌生村庄，昨天还是学生，今后就是农民，将来呢，不愿再想了......

2012-02-22

大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6



【知青记忆碎片】：

（2）我的小山村

我插队的地方，离呼和浩特大约七八十公里。从呼和浩特乘汽车，翻过大青山（阴山脉系）到武川县城可可以力更镇约摸五十公里，地势险峻的盘山公路，北魏时开辟，史称“白道”，以蜈蚣坝一段最为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时曾在此伏击日寇，那时候破车烂路得走几个小时。翻过了大青山不远就是武川县城，可别小看武川这个地方，史称“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也曾是帝王之乡。山北地势平缓，再走二十来公里就到了哈乐，哈乐到我们村一里来地，走路也就十来分钟。哈乐那时是公社，现在是乡，蒙语是“关卡”的意思，是呼和浩特往北部草原的交通要塞，那里是个三岔口，从呼和浩特到此之后分成两条路，一路往东去察右中旗。一路往北去四子王旗，到四子王旗的旗府驻地乌兰花镇约五十来公里，那边是蒙古族聚居的牧区，格根塔拉草原，也是航天人杨利伟、翟志刚他们降落的地方。

这里地处大青山北麓，当地称“后山”，丘陵地带，内陆干旱气候。春季沙尘暴一来暗无天日，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此地有时却是雪纷纷，六月雪也不稀罕，国庆前后又见雪花飞扬，冬天的“白毛风”，狂风夹着沙砾般雪粒打在脸上生疼，夏天倒是避暑的好去处，夜里得盖被子，所以当地民歌说，（出门人）“三天带上五天的干粮，夏天带上冬天的衣裳”。这里无霜期短，一年只有一季收成，没有河渠，收成好坏全凭当年雨水，干旱年景地里几口大井杯水车薪，典型的靠天吃饭，很多村名都带与水有关的“渠”、“泉”，可见人们对水的想望，我们这个村就叫前马莲渠。

这里还保留了不少蒙语地名，可能最早是游牧之地，逐渐被农耕蚕食，当地大多是“口里”即长城以南的晋北一带的汉族人，所谓“走西口”过来的，流行于内蒙西部和山西的民间歌舞小戏二人台有一出《走西口》，在当地流传广泛深入人心，即使在文革环境里老乡也会不经意地哼上几句。当初先人为谋生计，生离死别背井离乡历经苦难，是非常悲惨和辛酸的事情，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后辈，偶尔有“讨吃的”到村里乞讨，挨门挨户无人拒绝，至少拿给一碗面，遇到饭口，还会拉他一起上炕吃饭，“人家是遭难的，都要帮一下”。对知青私下也说“娃们离了家离了娘可怜啊”。

村里二十来户人家，大都姓王，互相沾亲带故。人少地多，广种薄收，说地多，可以休耕轮种，说薄收，一般年景有些地块亩产也就百八十斤。作物种类少，粮食只有小麦和莜麦，都是细粮，也种一些青荞麦做大牲口饲料，油料有菜籽和胡麻，胡麻油味道好，但产量低种植少，只供村民食用，蔬菜只有马铃薯（当地称山药）、胡萝卜、圆白菜，一年到头以此为主，夏天在镇上可以买到一些所谓的细菜如西葫、韭菜、豆角等。队里养牛马骡驴羊，农户养猪养鸡，逢年过节包括“六月六吃羊肉”习俗还分点儿肉。人们几乎没有消费，日常买咸盐、灯油都得先用鸡蛋换点儿钱，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当地老人说，除了那三年灾荒，人们吃饭不成问题。但是一年下来没有收入，尽管好年景每个劳力一年分红三四百块钱，扣除一家数口粮油肉菜柴之后所剩无几，只有知青没有家口负担能分到点儿现钱，勉强够回家路费和零用。本地特产黄芪、党参，经济价值高，可上面只准种四分地，多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啦。

2012-02-22

相关图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3a03e00100xces.html

大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6

【知青记忆碎片】：

（3）面朝黄土

知青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突然间由学生转变为农民，从繁华城市来到僻陋乡村，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对农村、农民缺乏认识，体力劳动更不适应。就个人而言，我刻意磨练自己，虽然什么都不会干，但不惜力不耍猾，老乡都看在眼里，过了不久大家就说这后生挺实在，有一个不错的开头。

这里一年只有一季收成，活计相对简单，主要是春种、夏锄、秋收。刚来正赶上播种，分派我给一个老农帮手，他吆牛把犁摇耧，我跟着添加种子和肥料，另一人耙地。那时节常有沙尘暴，况且前面牛犁翻地带起滚滚风尘，置身其中只能忍耐，满脸满身都是一层尘土，说有一铜钱厚也不为过，踏着翻起的松软土地小跑一样几个小时，下来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我没歇一天坚持下来，休息时还试着扶犁摇耧，慢慢也能走起来，只是牲口不太听使唤……

夏锄时节景致最好，满山遍野一片翠绿，活计不赶时令，人们都很轻松，一群人一字排开，锄头一放一收除草松土，一边干活一边说笑，到地头就休息，休息时间也长，有人挑来开水，里面放了本地特产甘草等草药，汉子们掏出“一口香”，那是用羊骨制成的土烟斗，一次装一点儿烟末抽上一两口，女人们家常家短叽叽喳喳，半大后生不知疲倦打打闹闹……

“一口香”

秋收最累，这里的麦子低矮，用不上镰刀，用手拔。手上带着护套，左右开弓，半蹲半跪，干到天黑收工，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手上开始是磨泡，后来都是裂纹，护套磨烂几付。好不容易拔完麦子，又开始割莜麦，猫着腰割一会儿就想直直腰，干到最后腰都麻木了，只是两手一拢一割机械地动作。那些日子，收工回家大家都累得不想动弹不想说话，炕上躺一阵儿再起来做饭，吃了饭就想睡觉，好在睡火炕铺毛毡暖烘烘的很解乏，第二天起来轻松许多……

地里庄稼要束成捆，装车运到打谷场上，然后脱粒、晾晒、扬场、入库。头一年还是人们手持麦谷在简易的土

机器上脱粒，莜麦的麦芒沾在皮肤上很刺痒，男人也都扎上头巾围巾。第二年租来大型脱谷机，日夜连轴干，几天就完成了。

期间队里给知青盖房，干过脱坯、垒墙抹灰等。墙垒高了，要飞锹送灰，铲上一锹泥灰，平稳地扔上去，锹把甩到接锹人的正手，有时还要从梁檩空隙中飞过去，很刺激。还在饲养棚铡过草，往铡刀下续草的老汉非得让队里派我来，说他把刀我放心，因此干了挺长时间，铡出来的草料差不多够牲口吃一冬。

记得到村里第二天一早去挑水，从驻地到水井几十米，晃晃悠悠地勉强挑回来......一年之后，我们到公社粮站交公粮，一两百斤不封包的麻包我们扛上就走，到粮仓跟前踩着两尺来宽的踏板走上去，肩头一歪让麻包里的粮食倾入仓内，必须恰到好处，不能让肩头的麻包掉下去，麻包差不多倒空了快要落下来的一刹那，抓住袋子一角一抖楞把粮食倒净，然后从踏板上慢慢踮下来，挺有成就感，这是壮劳力的活儿。

一分耕耘就有一份收获，第二年我被选为先进知青，还去县城开会，开会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每顿饭每人领一个馒头一盆烩菜，那个馒头很大，大家都叫它“小枕头”，以后再也没见过那么巨大的馒头。

2012-02-22

相关图片链接请移步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23a03e00100xceu.html

大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6

【知青记忆碎片】：

（4）后山的吃食

莜麦也叫燕麦，据说是粮食中蛋白质、氨基酸等含量最高的，后山高寒地区出产的莜麦最好，是当地人的主食。我们刚来时吃麦面多，慢慢也以莜面为主了，觉得挺好吃而且耐饿，民谣说“三十里莜面四十里糕，二十里荞麦饿断腰”，因此吃莜面不能吃得太饱，所谓“莜面吃个半饱饱，喝上点儿汤水正好好”。

做莜面要经过“三熟”，一是莜麦要先炒熟再磨成面，二是和面时须用开水烫，三是做成形后蒸煮。那时，早上煮一锅莜面山药糊糊，拌莜面炒面，干稀搭配；中午也吃莜面，或“栲栳”，用一种专门器具压出来的莜面条，或“鱼鱼”，用手撮捻出来的更筋道一些，将莜面与山药切片一起上笼蒸，吃时用胡萝卜和圆白菜腌的酸菜、腌汤、醋，把蒸好的莜面和山药片放进去拌着吃，如果有羊肉汤那就更美啦。最好吃的是“窝窝”，用手在光滑细腻的石板上把小面团推压成薄片，一甩卷在手指上，然后立在蒸笼上，一个挨一个好象蜂窝，可能经过手工揉搓更多，它比“鱼鱼”更好吃，不过做这个东西太麻烦，费时费力，老乡请客才能吃到。

离开后山，再也没吃过那么好的面粉，做出的面食那么香甜那么筋道，自己种出来的当年头年的麦子磨出来的，实在是农民独享的口福，一说起城里人吃的都是不知储存了多少年的陈粮，老乡都很得意。不过，如果麦子淘洗不净，磨出的面很牙碜。

后山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吃糕，黄米做的，或炸或蒸，不过我在乡下没吃过油炸糕，都是蒸的，就着烩菜吃，蘸点儿糖都极为奢侈。

本地不产黄米，每年秋后口里人赶着马车拉着黄米、小米、玉米、高粱等杂粮过来换莜麦或麦子。当地人换杂粮主要为了做醋，他们大多籍贯山西喜食醋，家家自己做醋，醋曲不同味道也各不相同，我们吃百家醋，东家送一碗吃几天，西家送一碗又吃一阵儿，吃了老乡自酿的醋，才知道了醋的真正味道，不是简单的一个酸，酸里头透着醇香。

当地民谣说“后山三件宝，山药莜面羊皮袄”，后山山药确实好。个头大、含粉多，老乡告诉我们挑拳头大

小、沙皮的最好吃，分下来的山药储存在地窖里，可以吃到第二年新山药下来。

夏天阴雨过后天一放晴，山坡草滩可见白蘑，一圈下来能摘不少，据说杀羊滴血的地方生长最佳。未开苞新出土的白蘑，生吃非常鲜甜。昆虫也喜欢蘑菇，稍晚一步，掰开蘑菇就会发现蠕动很多细小蛆虫。白蘑晾干可以存放，干蘑芳香异常，用白蘑做汤做菜，味道鲜美，是大自然赐给后山乡亲们的美味佳肴。

后山做菜，极少用油煎炒，一般都是吃烩菜，不放油一锅烩，最后倒炝锅，铁勺里放点儿油，伸到灶里在火上烧热，再撒上葱花、花椒，出味后搅入菜中。后山人喜食花椒，做菜煮肉不放酱油必放花椒，北方不产花椒，因此每年回家探亲乡亲都要托我们捎花椒。本地人不吃酱油，也买不到酱油，我们都从家里带固体酱油，做饭时先切一块融在水里。当地吃的盐是一种岩盐，块状晶体，要拍碎后再用擀面杖碾压成细末儿，吃起来有点儿牙碜，讲究的就用水融化过滤，岩盐对人体如何，那时从未想过，反正供销社只卖这个，照吃不误。

尔后离开内蒙，有次老乡捎来一小袋莜面，蒸出来粘呼呼不好吃，从此不再奢望，只能买些燕麦片，咂摸一下莜面的味道。后来在北京一家饭店吃莜面，他们说开始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做了很多实验，包括把内蒙的水土带过来煮水和面，都不成功，最后还是一位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来也简单，两地海拔不同气压不同应当调整蒸煮时间。我到南方后很长时间没吃过莜面，几年前本地有家山西人开的饭店也做莜面了，号称是武川莜面，本地人全家要一笼尝鲜，我家则一人一笼，有意思的是每次服务员都生怕搞错总是反复确认，而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儿子也很喜欢吃，可见莜面之魅力。

大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6



【知青记忆碎片】：

（5）乡村纪事

冬闲回天津探亲，转年清明前回村，在乡亲们撺掇下买了只三个月大的猪崽，每天一早，小猪就过来拱门要吃的，长大了，简直就是理直气壮来势汹汹，拱得咣啷咣啷的，一边拱一边哼唧，意思好象是不给我吃的你就别想睡懒觉。肥猪拱门大吉大利，我们闻猪起床，起来就应付猪，一般头天用麦麸加剩饭和土豆萝卜煮好，早上热一下，着急了就用热水拌麦麸先打点一下。到了时辰，村里猪倌一吆喝，各家各户的猪就颠儿颠儿跑过去，猪倌带着它们在村外河滩山地转悠找野食，它们过得倒是挺滋润挺有规律。我们一边应付猪，一边点火做饭，吃罢早饭，人们就聚在队部前，等队长分派活计，要是人没来齐，有人扯开嗓子吼几声"动弹喽"，全村都能听见。

上午收工回家，老乡家里都做好了饭，到家就吃，还能休息一阵儿。我们回来现点火现做饭，虽然吃的简单，吃上饭至少三四十分钟，吃过饭差不多又上工了。春秋大忙时天又冷活又累，回家来清锅冷灶，倍感凄凉。头年是队里派工做饭，这批投亲靠友的来了以后，有兄弟姐妹的就提出分灶，剩下我们几个人也只得如此。

下午收工回来，远远望见村里炊烟袅袅，走近了听见拉风箱呼达呼达声音，肚子也轱辘轱辘饿起来。牲口在井旁水槽饮水打着响鼻，猪也回来了，吃了一天的野菜野草，还得喂点儿麦麸，吃饱喝足了自己溜溜达达回窝。

我们早上和中午大多吃莜面，莜面耐饿，晚饭吃馒头、烙饼、贴饼、面条等，正当长身体的时候，也没什么油水，饭量甚大，一人能吃一笼馒头。那时口粮定量，有一年夏秋新粮下来之前断了粮，只好找老乡借，当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多生个孩子就多份口粮，小孩吃不了就填补大人，孩子多的老乡粮食往往相对宽裕，很快村里也决定借粮，真正"寅吃卯粮"，打这以后，我们也精打细算起来。

我做饭不行只好打杂烧火，一手往灶里续麦秸，一手推拉风箱，说起来拉风箱也有点儿窍门，要让火力均匀，拉、推、换挡时都要有所控制。天冷了烧炭，炭和煤差不多，没那么硬，用手就可以掰开，很容易点燃，燃烧完全，但不耐烧，烧尽了一坨白灰，似是尚未成煤的状态。记得那年队里派车到县里煤窑给知青买炭，交了钱到了矿井口，先吊上来一筐，没装满且大多碎屑，车倌一见就冲井口大喊我是某村某某，又掏出几包烟扔下去，再上来的立马就是满筐满篓，让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目瞪口呆。

常常是饭没吃完，村里十多二十来岁的小青年就来串门，听收音机，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乱聊一气……村里没有报纸，知青来了才听到收音机，知道外界一些消息，后来给每家装了个小喇叭，铁丝裸线损耗大，耳朵凑到喇叭跟前才能听清楚。那时乡下无电，天黑了点油灯，吃过晚饭就把灯捻拨小，如果没事干也就早早睡了，真可谓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偶尔也到老乡家串门，也许是“敬惜字纸”的古训，炕席底下往往有一些不知什么年代的旧报纸、旧书散页，甚至还见过石印的，翻一翻挺有意思。

晚上有时队里开会，念文件读报纸，听说头年抓得很紧，当时牧区清查内人党，打死不少人，其实那些人大多是蒙古族党员干部，有些人就跑到农区亲友家躲避，不久这边也开始清查，也是又抓又打，我们到内蒙后不久中央决定给内人党平反，局面缓和了，可这么一折腾，老乡和知青们有了教训，都悠着来了。村里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地主子女，都是三四十岁老光棍，还有一个遣送回乡的右派，村民大多不以为然，平日并没有什么特别安排，他们一样干活一样说笑，不过苦活儿一定是他们的。

附近村的知青同学时常互相串门，那年夏天队里一头牛被雷劈死，肉分给各家，当地人不吃杂碎，心肝肺牛下水几块钱卖给我们了，我们炖了一大锅，那时一只鸡一块来钱，买了几只鸡，还买了酒，请邻队同学过来吃饭，酒足饭饱之后，一伙人横七竖八挤在炕上，有人讲福尔摩斯，有人讲拍案惊奇，很佩服他们的记忆和口才。还有人讲起亲身经历神灵鬼怪，半夜三更村后有女人嚎哭，传是鬼狐不祥，人心惶惶，恰巧部队拉练经过，埋伏一夜却又毫无动静……；某君冬天未回家探亲一人独宿，深夜被大力敲门声惊醒，开门出来无人，以为有人开玩笑，房前屋后转了一圈儿也没见人，回屋倒头再睡，次日与老乡闲聊说起，众人蔫笑，后来一老汉说那里原来是坟地，于是不敢独宿，邀人做伴也无人敢来，只好到老乡家借宿……

那时中苏关系紧张，有一阵儿中蒙边界吃紧，夜里听到坦克部队轰鸣经过，不久村里驻扎了一个高炮连，他们供给不错，经常关照知青，一日连队集合拉练，回来后某班长悄悄说，在你们门口一个战士擦枪走火打死了旁边一个战士，连队拉到山里开追悼会……部队开拔后，民间传说，中蒙边境至这一带基本是草原丘陵，难以抵挡重兵突袭，大青山才是第一道屏障，山里修了很多阻击工事和坑道。那时知青大都希望打仗，期待出现什么转机。

庄稼上场拾掇完，我们就请人杀猪，本地习俗是把进刀的那块肉送给杀猪人就行了。养了不到一年的猪也就七八十斤，送给老乡一部分，其实是礼尚往来，他们平日时常送些东西给我们。肉折腾的得差不多了，我们就张罗回家探亲，那年探亲我带了一块猪后腿，那肉质与城里卖的不同，不长时间就炖得烂泥一般。第二年开春刚回村，老乡送来几坨冻得硬邦邦的羊肉，原来是过春节时队里分的，还给我们留着，肉塞在羊肚里冻成圆坨，放在凉房或地窖里，过了两三个月一点儿没坏。

2012-02-22

大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6



【知青记忆碎片】：

（6）追梦

小学时受老师影响接触民乐，经过专业老师调教进步显著，愈发喜爱，心中渐生音乐梦想，因为喜欢文史，我不想做演奏家，梦想成为音乐史论研究学者。

下乡后痴心不改，始终心存进取。我带去了《和声学》、《对位法》等，临走时同学赠送了丰子恺的《音乐十八讲》，解放前的繁体版，纸都发黄发脆了。后来还借到《曲式与作品分析》、《民族音乐概论》、《汉族调式及其和声》等文革前的教科书，我埋头其中自得其乐。那时手头没有任何乐器和视听资料，全凭记忆与想象的虚拟音响去揣摩，乡下无电，同屋两人油灯下夜读，我攻音乐，他读无线电或制作调试半导体收音机，天亮发现鼻子都是黑的，油烟熏的。

那时是收音机时代，我们地处阴山北麓，中央台的信号很差，外蒙台、苏联华语台却很清晰，当时中苏敌对，当然不能收听，偶尔发现这个台经常播中国音乐节目，我们就依时悄悄收听音乐节目，节目开始曲是民乐合奏春江花月夜，结束是苏南吹打将军令，有时是民乐三重奏春天来了，都是五十年代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代表团的获奖作品，还有五十年代的一些民歌如小河淌水、康定情歌，中央民族乐团陕北民歌合唱等，京剧如谭富英的空城计、周信芳的追韩信、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等经典唱段，记得听着梅先生唱，想起少时见到梅先生到我家邻居名票夏山楼主家里拜访，我们几个孩子围着梅先生的汽车，扒着车窗窥探坐在车里等候的梅夫人，车里的好几只猫，记起夏日昏暗路灯下须眉花白的琴师徐兰沅先生坐在门口台阶悠闲下棋……勾起了思乡之情久久不能入眠。还听过魏喜奎李宝岩的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的一折，其中狱中杨氏一段哭腔，令我顿生寒意由头上一贯而下，竟然起了鸡皮疙瘩……若干年开禁后再听，却没有了当年的感觉。朋友不断改进收音机线路，改善音质、抑制频率飘移，声音越来越好。我们一进门，必定先开收音机，全波段搜索，凡有音乐就听，外蒙台的蒙古族民歌及马头琴、三弦的乐曲，短波频道里的外国管弦乐……哈哈，那时我们已经进入全球化啦。后来才知道，那时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皆是如此，真是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啊。当时的中国，除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样板戏，听不到其它任何音乐，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才能听到，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我们真得知足，那时能够如此胆大妄为。村小人少，没有乱折腾的人物，乡亲们对外面的“革命”“斗争”例行公事不甚了了，乡间平静而生活淡然，种田是大事，其它无人过问，没有太多禁忌，除了贫穷，简直就是桃花源中人。我最大的收获，是实地接触了民间音乐，与学校、书本完全不同的音乐状态，口传心授中的发展变化，当地语言、生活、环境等因素形成的地方特色，都有了一定认识。

一次我跟几个乡亲到山里犁地，收了工慢悠悠地下山，一个中年汉子牵着牛，突然吼出一段爬山调“大黑牛牛……”对面山坡外村几个女人听了有人唱着回应，现抓词互相调侃，上下两句，曲调似乎只是有个轮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经意的自然流露，那情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回家后我记了谱，同时起了搜集当地民间音乐的念头，或许就是现在所谓田野考察，于是田间地头请老乡唱山歌小曲，听说大队拖拉机手原先在民间剧团，找去听他唱二人台和爬山调、漫翰调等，其中一首说媳妇望见婆家的门，是“孤苦伶仃一座坟”，见到娘家的门，又成了“青山绿水一座城”，比兴生动形象鲜明，越琢磨越觉绝妙，愈加尊崇。

一次邻村人家办丧事请了两班吹鼓手，两班对擂肯定精彩，收了工我们就去了，此前我从未见过丧事，少时去儿童影院路过河北路那家棺材铺都绕着走，进了丧家，真的是头皮发麻，不过却也值得，他们吹的都是我这个年纪城里孩子无缘聆听的传统曲牌。当地习俗，晚上丧家包括吹鼓手要出去转一圈，我跟在队伍后面，漆黑夜里，丧家点燃包着胡麻籽的纸包一路扔下，胡麻籽油性大可以烧很长时间，回首望去，星火点点一大片，颇为壮观。

恢复高考后第二年，终于说服单位同意我报考，在中央音院我顺利通过三试，其中面试要求仿唱民歌、说唱、戏曲等，我就哼了一段二人台和一段京韵大鼓，有个老师下来说你真是受到熏陶啦。就便还考了上海音院，也顺利通过。三试三榜，每一次发榜都由忐忑不安转而欣喜若狂，一路小跑到西单电信大楼与家人通话分享快乐……在北医三院体检后高高兴兴回到天津家里，不想泰极否来乐极生悲，几天后电报通知我到北京同仁医院复查，原来转胺酶高疑似肝炎，查验几次没有康复，最终不能入读，虽梦幻破灭，但我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精神上和学习方面的收获，以及后来一直关心帮助我的中央音院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足以让我终生受益。音乐、梦想，伴随我度过了艰难岁月。

大宽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26

【知青岁月实录】：

69年国庆节

69年国庆节，到团部参加“阅兵式”。天已经很凉了，大家都穿着从北京带来的崭新的绿大衣。不记得什么时候，天上漂下了小雨。于是大衣变成了雨衣。回到连里，都已经湿透了。

雨，一直在下。晚饭后，坐在帐篷里属于自己的铺位上写家信。将新买的肥皂箱盘在腿中，将蜡烛立在肥皂箱上，铺开信纸，用钢笔写信。信的开头，照例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信的末尾，滴上一滴蜡烛泪。

帐篷里，谁在吹着伤感的口琴。有人在哭，和着帐篷外凄凉的秋雨...

帐篷生活

刚到四连，就被分配到基建排，住进了帐篷。

那是一顶崭新的棉帐篷，墨绿色的外表、浅绿色的内衬，南北长、东西短。两个门分别在南端和北端，门帘在白天向外掀开、有绳子固定在帐篷上。东侧和西侧均匀地分布着若干窗户、窗户外有遮帘。

帐篷里面，东侧和西侧各有一个长长的大通铺。不记得通铺是离开地面的、还是直接铺在地面上了，甚至可能连床板都没有、褥子直接铺在地面的草席上。我的铺位在靠近北门的西侧。不记得左邻右舍是谁了。

每个人的“领地”就是自己的铺位，面积与自己的单人褥子的面积相同。随身带的小手提箱自然是没有地方摆放了，还好，连里将箱子集中堆放在另外的房间中。

洗脸大都在帐篷外的空地上，然后随手将脏水泼到旁边的水塘中。厕所自然是露天的了，几根木桩、几卷席子。一年多以后，升级成为有屋顶的转木结构。

帐篷里大约有四十多名小伙子，来自哈尔滨、北京、天津、上海、温州。北京知青最小、16岁左右，上海知青

最大、也没超过20岁。青春四溢、活力四射，摩擦也是难免。闲暇下来，最常见的就是侃大山，5种方言、海阔天空。不过，谈恋爱是被禁忌的，偶尔冒出几句带点颜色的惊人之语，也是以“过来人”的口吻启蒙着这群青涩的毛头小子。

不记得帐篷里是否有电灯了。即使有，其光亮也不足以看书写信。于是蜡烛成了易耗品。那时，主要读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写了不少笔记。但文学作品极少见，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十讲》好像是在帐篷里读的。

10月底上大冻，外面的气温降到了零下，帐篷里没有取暖设备，夜里非常寒冷。记得是在11月的某天，终于告别了帐篷，搬进了我们自己盖的、红墙灰瓦的宿舍。

四十年过去了，岁月已经磨灭了多少故事与恩怨。只记得被谁发布的惊人消息：“看见小怀依偎在老倌儿的大衣里了”。还有温州小陈时常唱的一首歌：“高粱红了棉花白，密麻麻，牛羊盖地天上来。”

挑砂浆

四连的驻地，是两个相对孤立的“高岗”，北面、西面和南面被大片的草塘子（现在的说法是湿地）包围着。北边的高岗上有连部、老家属区、小学校和马号，南边的高岗上有新家属区、知青宿舍、食堂、保养间和猪舍。我们69年9月到四连的时候，南边的高岗上正在建设男生宿舍。

男生宿舍坐落在女生宿舍和机务排宿舍之间。当时还在打地基。新来的知青没有任何手艺，只能当小工。和砂浆、挑砂浆、搬砖，等等。老职工们是“大工”，砌石、砌墙，等等。记得当时很崇拜一位老师傅，手艺最好，技术活都是他领头，例如“发碹（xuan）”，用红砖砌出一个半圆的拱形，砌得又快又好。

小工不需要多少技术，很快就学会了，但却需要体力，开始时很吃不消。特别是挑砂浆。两个铁桶、一根扁担，装满砂浆的重量有两百斤以上。站都站不直，更别说走了。只能少装、多跑。装砂浆的量从四分之一桶、三分之一桶、半桶、四分之三桶，逐渐递增。有一天，终于可以挑起满桶了，很有成就感！再到后来，可以挑着满桶砂浆上跳板了。

即便如此，和别人比较，还是有很大差距。记得有一次比赛（赌一包烟？），挑四个满桶砂浆，我只能勉强走几步，毕竟当时还不到16岁。最后获胜的，好像是一位本地小伙子，绕着房子走了将近一圈！

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若非如此，很难承受这些重体力劳动，也很难面对其后更加艰苦的生活。下面的照片是后来在另一处工地上照的。



住新房

69年初冬，终于告别了帐篷生活，搬进了我们自己盖好的新房。

记得我们班住在东头第一间。房间内，东西两边各一铺新式大炕。称其为“新式”，是因为它不是由砖与灰垒成的传统样式，而是木质结构的板床，下面铺设砖垒的火道。其优越性在于，既有火道取暖，又可以在床下放鞋。冬天还可以在火道上将返潮的棉鞋烤干。即使鞋不怎么湿，也可以在火道上烤鞋垫或玉米叶。早上将暖烘烘的鞋垫及玉米叶铺进棉鞋，穿进去，舒服极了。

墙上还有一排架子，可以将自己的箱子放上去。与大炕平行的绳子上可以挂毛巾。

雪白的墙面，崭新的床铺，明亮的电灯，对比阴冷潮湿的帐篷，真是像进了天堂一样！看书、写信的时候，可以不用蜡烛了。

然而，没有取暖的煤。大概是因为突然有大批知青到来，事先没有安排足够的取暖用煤。15团的地面上没有煤窑，但近邻鹤岗市却是个煤城，据说巷道都挖到了我们这边的地下。于是团部安排卡车给各连送煤。每当运煤车驶进四连，都会爆发一场抢煤大战。全体出动，男生、女生、老职工、孩子，蜂拥而上。麻袋、桶、脸盆，没有铁锹用手刨。转眼之间，数吨黑煤就被一抢而光。

起初，抢来的煤不够烧到下次运煤。有煤的时候，房间里温暖如春，有时热得踢被子；无煤的时候，房间里冰冻三尺，毛巾冻在一起摘不下来，房顶上结一层厚厚的冰霜。再有煤的时候，或者到梧桐河砍来条子（干树枝、韧

性极好的灌木条）的时候，房顶的冰霜又会化成水，将所有人的棉被打湿。

到后来，煤炭运输跟上了。生活逐渐进入正轨。

2008-11-19

老边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天天读

69年是文革的高潮，天天读是每天上班前的必须。住在帐篷里的时候，条件太差，无法组织全排的天天读，只能各班自行组织。住进新房以后，房间大了、条件好了，有时就在男生宿舍组织全排的天天读。注意，此时女生们就会鱼贯而入，坐在大通铺的炕沿上。男生们只能坐在卷起的被垛上。女生们都很拘谨，男生们也会表现得中规中矩，不想给女生留下坏印象。老职工在开会前活跃些，抽着呛人的自卷纸烟闲聊天，但在当时严肃的政治气氛之下，也不敢开过分的玩笑。总之气氛略显沉闷。

天天读通常由排长主持，每天念一篇或一段毛主席原著、或重要社论文章等。然后排长结合当前工作训话。

大家都是知青，念文章还是不成问题的。我的嗓音比较好、又能模仿广播电台播音员的音调，就经常被指名念文章。记得有一次指导员来听过以后，我就有幸在全连的天天读上念文章了。后来我能进机务排，或许也与此有关。

好像是在70年的春播开始后，农活越来越忙，天天读的频率就越来越低了。71年林彪事件以后，就不再有天天读了。

51号车

70年年初，我被调到机务排。排长张芳咏，一位瘦小的湖北人。当时，机务排有四台履带式拖拉机，分别是75马力的13号、17号，54马力的51号和55号。保利和我被分到51号当助手，和王希民一起。记得，先后到机务排的，有老何、张维亮、冯晓龙、马学强、孙笑荔、杜志刚等同学。大家都是以此为荣，工作非常努力。

我们搬进了机务排宿舍。我住在东头房间的东侧、从南边数的第2个铺位。挨着“老马”（张继德）和希民。此后就没换过宿舍。

51号车的车长是老田，典型的东北大汉。豪爽、健壮、能抽烟、能侃山，且技术精良。师兄老马是转业官兵子

弟，典型的河南小伙子，朴实、能干。我和希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懂，但干活不惜力，也有“眼力架”。所谓“眼力架”，是指不必师傅说，就能领会其意图、把活干到前头。例如，师傅在修车，一伸手，不说什么，就要递上他正要用的工具。为此，要能迅速识别螺丝帽的规格，14、17、19、22...

那时也没有“培训”，边干边学。冬末春初，机车和农具正在保养，正是学习这些机具的机械结构的好时机。当时，几乎所有的机车维修都在连里做，只是在大修时将活塞和缸套送到40里外的团部机修厂。所以，每位师傅都是身怀绝技，对自己的机车和农具了如指掌。记得当时的技术资料很少，也买不到技术书籍，反正有师傅的言传身教，我们还是很快掌握了初步的机械常识。

我们都把履带称作“链轨”，其主要作用是防陷。到了雨季，链轨还不足以防陷，还要加装“木鞋”，就是将若干长度超过链轨宽度的方形木桩依次固定在链轨上。当然，如果穿着木鞋在硬地上走，就颠簸得很了。下面是当时的照片。照片中的机车应该就是51号车了。

履带式拖拉机是右舵，即驾驶员座位在右侧。没有方向盘，用操纵杆控制方向。两根操纵杆竖立在驾驶员的正前方，向右转拉右边的操纵杆，反之左边。两边还各设一个转向踏板，拖拉机空载转急弯时使用。离合器在右边，而不是像汽车那样在左边。没有刹车。油门手动，可固定在半圆弧的某个部位。变速器手柄在驾驶员左侧，5个前进档，1个倒档。老职工们常说：“开拖拉机不难。在操纵杆上挂个包子，狗都会开！”开拖拉机习惯了以后，再开汽车就有危险。因为，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会习惯地伸出右脚踩离合器，如果此时踩在汽车油门上，就反而会加速。据说，四连的一位老驾驶员在驾驶轮式拖拉机时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就是这个原因。

开始时，我们这些助手都是“跟车”，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观察学习驾驶员的动作。如果当时副驾驶座位上有人，就只能座在旁边的工具箱上。不长时间以后，有一次，老田让我开车了。当时是在从连部下地的那条东西向大道上，周围没有人。坐在驾驶员座位上，还是有些紧张。踩离合器、挂1档、加油门、缓慢抬离合器，拖拉机开始前进。心里又高兴又紧张。慢慢走了一会儿，收油门、踩离合器、换档、抬离合器、再加油门，拖拉机开的快些了。然后，练习转大弯（只用操纵杆），练习转小弯（加用转向踏板），最后把车停在了保养间门口。

这是平生第一次开车。其实，当时还没到现在所说的法定年龄。

我们51号车的主要任务“整地”，大致有如下工作：

*秋翻。秋天，作物收割以后，耕翻土地，将地表残留的植物根茬翻到地下作肥料，将地下的沃土翻到地表。此类土地通常用于第二年较早播种的小麦。

*秋耙。秋翻之后的耙地，疏松地表、保持土壤水分（保墒）。

*春翻。对前一年深秋没来得及耕翻的土地，在春播前进行耕翻。此类土地通常用于较晚播种的玉米或大豆。

*春耙。春播前的耙地。

*开荒。在草甸子中选择地势较高的荒地，进行首次耕翻，将荒草翻到地下、将积蓄多年的腐殖质翻到地表。通常在春播之后、雨季到来之前进行，有时还能抢播一次大豆。

*开荒后的耙地。先用重耙，将大块的“塔头”切碎；在用圆盘耙整理地表。

*在麦收中，通常是牵引割晒机、而不是牵引收割机。

每年的3月中旬，地表化开，先进行春耙，为小麦播种做准备。然后是春翻、春耙，为玉米大豆的播种作准备。接下来就是开荒及其耙地。7月份的麦收前，通常有一个间歇期，整理机具，准备麦收和麦收后的秋翻。麦收后，8月份开始对麦地的秋翻、秋耙；紧接着就是秋收后对大豆地和玉米地的秋翻、秋耙。直到11月初“上大冻”。

机务排的另一台54马力的55号车（助手孙笑荔），也是整地车。而两台75马力的机车，13号（助手张维亮、李振东？）和17号（助手冯晓龙），主要任务是播种（牵引播种机）、锄草（牵引锄草机）、麦收与秋收（牵引收割机），其技术含量和操作要求都高于我们。另有一台自走式收割机和一台牵引式收割机（助手老何），都是专人维护、专人操纵的。

（哪位帮忙，给出机务排的全体成员名单？）

全连唯一的长途交通工具是一台28马力双缸轮式拖拉机，国产品牌“千里马”、而不是苏联进口品牌“尤特兹”。驾驶员小杜，非常帅气的靓小伙儿，驾驶着“千里马”、拖着一辆四轮拖车，往来于团部与四连、鹤岗市与四连，极其风光。

有了上述交待，不熟悉北大荒生活的读者，对我们四连机务排，就有初步了解了。

耙地

北大荒的土地真大。一眼望不到边。站在地头，能看到远远的天际线。

第一次下地干活是割玉米。因为在北京上中学时参加过麦收，对拿镰刀干活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在北大荒的土地上干活的感觉，与在北京郊区的小地块里干活，是绝对不一样的。似乎永远也到不了头的长垄。每次累得不行了，抬起头来想看到地头、给自己一点期望的时候，看到的还是无穷无尽的青纱帐。

到了第二年初春、开拖拉机下地的时候，感觉就爽多了。在数十公顷的大地上任意驰骋。

记得第一次跟车下地是耙地。拖拉机拉着11米宽的圆盘耙行进，直径约50厘米的若干组耙片转动起来、疏松着刚刚解冻的地表，为小麦春播做准备。由于前一年秋天土地耕翻时的方向是正南正北，所以耙地的方向就是西北方向或东北方向。在一个地块上的第一次行进被称为“打堑”，耙过以后的湿土翻到上面、颜色稍深，于是形成一条宽11米的深褐色长带。到地头以后右转调头直行，让圆盘耙的右边紧贴着深褐色长带的边沿，重合部分要求不超过两个耙片（30厘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拖拉机的正确位置完全靠目测。

耙地时，要求尽量跑直线。因为每个弯弧都会在下次过来时被迫随之拐弯。多次之后，弯就会越来越小（弧的曲率越来越大），最后的某次就会取直线，甩掉一小块地耙不到。

如果碰到干旱天气、或者是“打夜班”，耙过地的颜色不很明显，就会看不清右边的痕迹。弄得不好，还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俗称“跑堑”。

耙地的另一个技术活儿是调头。试想，拉着一个宽11米的大家伙掉头，不是很容易吧。方法是“拐灯泡弯”，难点是开始拐灯泡弯的时机。有一次，我就拐晚了，把耙拉到了地边的树丛里。那才是进退两难，因为多组圆盘耙的倒车是几乎不可能的。

跟老田出车比较轻松，他很少训人，就是自卷的纸烟太呛人。老马有时就会瞪眼睛。希民则是好脾气。不久，这些技术也差不多掌握了。

播种

每年春天，机务排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播种。首先播小麦，然后是大豆、玉米。北大荒地处高纬度地区，作物不能越冬，每年只有一季作物。

小麦播种的地块通常都经过前一年的秋翻秋耙和本年的两次春耙，地面平整疏松、墒情良好。

播种机具是三台专用播种机，每台3.6米宽，呈倒品字形排列，前二后一，经由一台宽11米的连接器连接到牵引拖拉机上。每台播种机由种子箱、肥料箱、播种器及轮子组成，设有踏板站人。通常由两人站在播种机上、每人操纵半台。人手紧缺时，常由一人操纵。播种器装有抬杆，控制播种器的起降。播种器落下时，两只呈锐角对接的圆盘在地面上划出一道槽，种子和肥料沿专用软管流下、落入槽中。播种器抬起时，圆盘抬起、种子和肥料停止流出。共有（？）组园盘横向排列（小麦垄的间距是多少？）。种子箱和肥料箱内有若干齿盘，转动时将种子或肥料拨到软管中。播种机本身没有动力，所有转动器件的动力都来自大轮子。故当播种机停下时，所有转动器件都同时

停止转动。连接器两侧各装一支约5.5米长的金属杆，端头装一片圆盘耙片，用于划出标志线，指示相邻轮次拖拉机的位置。

播种前，农业技术员已经计算好种子量和肥料量，且指示马车将一堆一堆的种子袋（每袋20公斤？）和肥料袋整齐地摆放在地头。

记得，播种机的牵引机车是17号车，75马力。车长王（？）师傅是公认的技术高手，河南人，不爱说话，冯晓龙的师傅。我们这些其他车组的助手，都是站播种机。我们的工作责任是：在地头给播种机加装种子和肥料，然后站在播种机上、到正确的位置放下播种器、开始播种，行进中要经常检查各播种器的工作状态、处理可能发生的堵塞，到达另一边的地头时在正确的位置抬起播种器。

记得，1970年的第一次播种是在3号地，离连部最近的地块。地头插着出发的标志旗。王师傅开着17号车，拉着11米宽的播种机，调正机位后停下。我们将种子和肥料装满。我站在播种机上，内心有些激动。开车了。我们在标志线处操纵抬杆、放下播种器，机车负荷加大，发出悦耳的轰鸣。算上两边的划线器，总共约22米宽的机组，向正北方，开始前进了。

第一次行进的轨迹必须是笔直的。只有技术最好的师傅才有资格操纵拖拉机为播种“打堑”。我们站在播种机上，无暇欣赏这条在广袤的大地上划出的笔直轨迹，只顾拿着一根小棍，时而拨拉种子箱或肥料箱中被卡住的齿盘，时而敲打软管。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要抓住播种机拉手不致摔下。播种机后面，还拖着一组圆滚滚的镇压器。

播种的中途不能停顿。若停顿，软管中的所有种子就会下落到同一个地方。再起步时，种子在软管中行进造成小段延时。等麦苗长出，就会看到某点特别密集，但近邻的一段却没有麦苗。但若遇到紧急情况，例如手被齿盘咬住（蒙星的手就被咬过一次且相当危险），就拉动中间播种机的联络绳，示意驾驶员停车。

春播的时间很紧迫，中午饭都是在地里换班吃。有时到地头加装少量种子肥料，只减速不停车，我们就要飞跑着加装，有时还一手拎一袋。小麦种子都拌有驱虫粉（666？）、肥料中有许多白色的尿素颗粒，粘到脖子上、被汗水一杀，生疼。开始时，肩上还有白布披肩，到后来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行进中，正向逆风还好；若侧向风大、卷起的尘土扑过来，站在播种机上想躲都没地方。还好戴着风镜，不致迷眼。

一天下来，脸上、身上沾满尘土、驱虫粉和尿素，只有被风镜挡住的一小块皮肤是白色。

数周之后，麦苗覆盖住大地。从地头走过，看着无边无际的嫩绿色原野，心里充满了愉悦，发自播种人内心的愉悦。

老边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入团

记得是在1970年的春天，连队的共青团组织开始了接收新团员的工作。那时，入团、继而入党，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会积极申请。介绍人是上海知青朱戬仁。

朱戬仁，瘦瘦的、略有驼背、戴眼镜，谈吐儒雅、文笔极好，后来调到团宣传股、和尤权（15团知青中目前职位最高的官员）一起，成了15团的大笔杆子。我们当时很谈得来，他也愿意作我的入团介绍人。

大家都认为，我第一批入团，应该是很有希望的。

然而，我没有被批准。原因也很清楚：社会关系复杂。我母亲的亲属中，当时有多人在台湾，而且她的一位堂姐夫，曾任三青团高官。

于是，第一批入团的名单里，没有我。（谁是第一批团员？）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不记得当时有很多沮丧的情绪，反而激励了自强不息的意志。在第一次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上，我代表入团积极分子发言。

后来，在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记得又发展了四批团员，我又多次代表入团积极分子发言。几乎成了“积极分子专业户”。到了1971年夏天，记得是在第六批发展团员时，我终于加入了共青团。

应该是在71年冬天，我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非常认真、严肃、虔诚。现在还有在小学校教室里写申请书的印象。

伙食（1）

到四连后第一年的伙食是最差的。主食基本上以玉米面为主，极少见到荤菜，白菜、土豆、萝卜是主菜。这也难怪，估计在69年春天做计划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秋天会增加这么多人，于是把小麦都上交了。

记得，开始的几个月是在食堂吃饭。8（10?）个人一桌，人数凑够就去端饭。都是年轻人，桌上略好的菜立即被一抢而空。几个月下来，每个人吃饭都是飞快。到现在，四十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还保持着吃饭快的习惯。

有一个听来的笑话，发生在20连。有一天，正在吃晚饭，大家围着一盆面条汤。突然停电了。黑暗中大家都摸黑抢面条吃。一个人夹起面条放在嘴里，却嘬不动。正在这时，又来电了。大家发现，面条的另一端在另一个人的嘴里。这两个人还是一男一女。哄堂大笑...

到后来（几个月以后？），就改成自己用饭票买饭了。（谁还保存着当年的饭票？）

那时，虽然连里有畜牧排，但能出栏的肥猪很少，也没养鸡。猪肉和鸡蛋只能从团部调拨（25连专业养鸡，27连专业养猪）。每次从团部拉回来猪肉或鸡蛋，大家就能改善一次伙食。但时间长了，大家对食堂很有意见，认为有人将有限的肉蛋私吞了。

记得有一次，又拉回鸡蛋来了。连领导征求大家的意见，是全都煮熟、一次给大家分光，还是留着慢慢吃。知青们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前者。于是，炊事班就真的把鸡蛋都煮了。每人分10只，各班端脸盆去食堂领。我当时在基建排，每人分到的10只熟鸡蛋，都是一次吃光了。

多年以后，此事还被女生们作为笑谈。

1970年的麦收以后，主食就以面食为主了。毕竟，宝泉岭农场1年的小麦产量，够自己吃10年。

伙食(2)

白天下地干活儿，经常在地里吃饭。通常是马车送饭。大笸箩里装满了包子，上面用棉被盖严。炊事员跟车，负责发包子。不是吃完一个再领一个，而是一下领好几个。

包子很大，10公分直径应该是有的。皮儿很厚，若在食堂买要用2两面票。白菜馅儿、萝卜馅儿，只有很少的肉。男生饭量大、吃得多，至少拿4个，拿6个也不稀奇。包子一个摞一个，放在手掌上、用小臂托住，一直排到臂弯。另一只手拿着包子吃。必须吃得很快，否则最后的包子就很凉了，深秋季节甚至有可能冻成冰砣。

送饭马车还会带着水桶。用的搪瓷缸子舀水喝，讲卫生的人会舀水洗手。缸子是公用的，不会有人计较。

有一年夏天下地锄草，远处开来了一辆汽车，停在地头。一个人站在车头上喊：“雪糕来啦！来吃雪糕呀！”大家立刻扔掉手中的锄头，跑到地头吃雪糕！（免费？每人发几根？）太爽了！！雪糕是团部食品厂自制的，很难说质量有多高。但在当时，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了。

机务排的条件好一些。干活儿的地块只要不是特别远，有时就开空车回家吃饭。后来好像还为此事挨过批评。但若上夜班，总会回食堂吃“夜班饭”。不但有好吃的面条（平时只有病号饭才有），还能见到漂亮的女炊事员。至于后来这位美女如何成了机务排某帅哥的夫人、是否在某次吃夜班饭时擦出了“火花”，还是留待他们自己“交代”吧。

如果干活儿的地块实在太远，也会带饭。还是包子，到吃饭的时候已经凉了。若地里有豆秸、麦秸或玉米秸，就会点燃篝火，把包子扔到碳灰中烤热后再拿出来吃。表皮糊了、里面还是凉的。如果运气好，附近有土豆地，有时也会扒出几个土豆放到火堆中烤。香极了！吃完饭，嘴巴两边都是黑的。抹几下嘴巴，背风伸手烤火，权作休息。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是我们当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或许也是现代都市年轻人所追寻的意境？

机务排宿舍里的一天

早晨，宿舍门被推开或踹开，进来的是刚刚下夜班的弟兄们。呼号一喊，躺在大通铺上的人想睡也睡不成了。于是，起床的人和下班的人一起洗脸，一起吃饭。班里天天读的时候，下班的人已经呼呼大睡了，反正也没女生。

下夜班时，机车有时停在地头、有时开回保养间。上班的助手要在出车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加油、加水、带上地里需要的零件配件。然后就和师傅一起，下地干活了。

上午的宿舍里很安静，只有熟睡者的鼾声。到了中午，下夜班的人有时会起床吃点什么，有时会翻个身继续睡。下地干活的人大都在地里吃饭，中午没有休息。只有在保养间工作的人回宿舍吃饭。

下午，夜班休息的人通常会起床，做些自己的事情。看书、写信、洗衣服，然后吃晚饭、换工作服，下地接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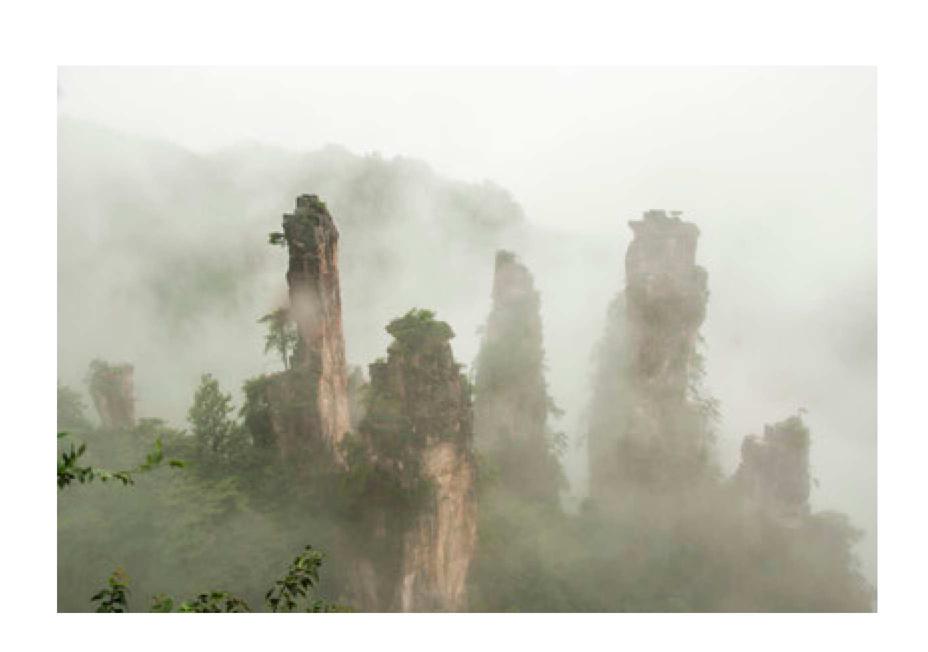
晚上的宿舍里是最热闹的。我们宿舍的电工杜志刚有一台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此时就会送出音乐或社论，但总有些杂音。两边的大铺上通常至少支起一个牌局，“敲三家”。作为奖惩，胆子大的时候是“归楞（以香烟作筹码，有赌博嫌疑）”，起码也要“弹（tan）脑奔儿”，而且绝对是“真弹”，被弹者的脑门上真的会立刻鼓起大包。

当然，也有写信的、看书的，出去找同学聊天的，到老职工家串门的，到连部看报纸、取家信的，等等。但是在开始的两三年里，好像还没有公开出去谈恋爱的。男生女生之间也极少互相串门。

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娱乐场所，团部电影队的光顾就是最重大的娱乐事件，小卖部里的零食也只有很少几种。即时出去散步，也仅在方圆数百米范围内，周围的草甸子里据说有狼。在这个无话的夜晚，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

晚风，掠过广阔而寂静的松江平原，送走了平凡的一天，也送走了年轻人本该读书的青春时光...

老边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翻地

翻地，是拖拉机牵引专用器械耕翻土地的作业。记得当时我们都称专用器械为“大犁”，学名？忘了:(

大犁，由一具钢架悬挂着最多5具犁铧。右轮前置，翻地作业时行进在前道作业翻出的沟壑中；左轮靠后，翻地作业是行进在未翻的地面上；尾轮是个可摆动的小随动轮。犁铧由犁铲（？）和翻土板组成，二者在前进方向右侧构成一个平滑的内弯曲面。犁铧头部锋利且坚硬，用于划开地面，斜置的板状犁铲随之铲入地下。被翻起的土壤向上拥起，沿翻土板的曲面自然向上翻转，最后被翻扣在右边的地面上。第2具犁铧在第1具犁铧的左后方，翻起的土壤正好落在第一具犁铧翻出的沟壑中。后面的犁铧依次类推。翻“熟地”通常挂4具犁铧，开荒则挂3具犁铧。

大犁由1人操作，座位在第四犁铧的正前方。由一个轮盘式螺丝杠调节耕翻深度、熟地为10厘米（？），由一个踏板控制犁铧的升起和降落。

拖拉机牵引大犁，在地头贴近前道作业的沟壑旁、使大犁右轮进入沟壑。大犁操作者脚蹬踏板、放下犁铧、“进堑”翻地。操作者应根据地面高低和软硬随时控制耕翻深度，过深则翻出深层黄沙、过浅则耕翻效果不佳。大犁向前行进，3条或4条黑色的土带随犁铧翻起、扣下，平滑而顺畅，宛如黑色的波浪此起彼伏，煞是好看。

翻地作业一组三人，一人开车、一人扶犁、一人在拖拉机助手位置观察。保利和我刚上车时，开车不熟练，经常扶犁。后来会开车了，有时也开车。再到后来，就变成两人一组了。

开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使拖拉机右侧链轨紧贴前道沟壑。若偏左，则翻出的土壤不足以覆盖前道沟壑，地面上就会留下一条沟，既不利于整地、又影响播种乃至收割。若偏右，则右侧链轨就会掉到沟壑中，拖着重负载，很难从沟壑中爬出。

履带式拖拉机的发动机前置，排气管竖立在前方，没有消声器，重负荷翻地时轰鸣声巨大。夏天车厢闷热，开着前窗，开车时间长了，回家睡觉时就有长时间的耳鸣。

每年的深秋时节，都要在上大冻之前“抢翻”。土地开始封冻、但冻层较浅时，仍然坚持翻地。此时翻出的土

已经是板状了。深夜，穿着厚厚的大衣座在大犁上，仍然是冷风刺骨。还不敢睡觉，因为万一摔下座位，有可能被后面的第四具犁铧铲伤。

坚持到冻层很厚、犁铲不能入土时，秋翻就结束了。

开荒

四连的可耕地集中分布在驻地的东方和东北方，面积共约400（？）垧（公顷）。在15团，四连算是一个小型生产队，比起1连、6连、8连、13连、15连、20连等拥有超过1000垧地的大型生产队来说，只是小兄弟。当初在鲶鱼哈设立生产队，主要意图也是开垦驻地北面、西面和南面的大量荒地。因此，我们每年都有开荒数十垧的任务。为了充分利用现有的排水渠、道路等设施，开垦的荒地大都选在毗邻现有耕地、且地势相对较高的地块。我在四连的3个年头，1970年到1972年，大都在驻地东北方向名为“四道坝”的地块西侧开荒。

每年的开荒季节是在5月份到6月份。春播已经结束，夏锄尚未开始或刚刚开始。经过一个漫长的旱季，洼塘（地势较低的湿地）里的水位下降到了年度最低点。只有在这个季节，拖拉机“误车（陷在泥地中）”的可能性才是最小。

所谓“荒地”，并不是多年前曾有耕种的“撂荒地”，而是已经沉睡千年的真正的“处女地”。地势高低起伏，在大片的洼塘中有少量孤立的“高岗”。洼塘里生长着大片的荒草（小叶樟，细茎多叶的速生草类），千百年沉积的腐殖质，在地表形成了一层数十厘米厚的黑土。黑土的下面，就是深不见底的黄沙。洼塘的地表并不平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塔头”、一种由多年的草根积聚在一起的不规则圆柱，软而韧。大型塔头的高度和直径都有数十厘米。高岗上，杂草丛生，各类灌木盘根错节。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在这里维系了千百年的生态系统，并不欢迎我们人类的驾临。

可我们，还是满怀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豪情，驾驶着威武的拖拉机，翻开了这片沉睡千年的黑色湿地。

开荒前通常要“烧荒”，烧掉各类植物、暴露出洼塘里原本被荒草覆盖的真实地表。机车轰鸣，大犁插入，黝黑的毡状腐殖质被翻起，掀起一条条的黑浪。

高岗上，最怕遇到树根。犁铧插到树根底部，立即遇到巨大的阻力。若硬性前行，有时能将钢制的犁铲或播土板生生掰断。处理方法是：倒车、抬起犁铧、绕行，留待人工处置。洼塘中，只要不掉进最低洼的泥坑中，一般不会误车。但行进在一个一个塔头上，非常颠簸。塔头即使被大犁翻起，通常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扣过来，时而斜躺在

地面上，时而卡在大犁钢架中。所以扶犁的人会很累，不但要随时调整耕翻深度，还要拿着一根撬杠处置那些不老实的塔头和树根。再加上遍地都是烧荒后的灰烬，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沾满了黑灰。

翻地过后，是反复多次的耙地，用重耙、齿形耙片，切碎毡状腐殖质和塔头。然后是轻耙耙地，然后是播种大豆。

如果运气较好，当年的雨季未发生涝灾，这个地块就可能被保住了。第二年的庄稼一定是长势良好。但如果连续两个雨季都发生涝灾，新开垦的低洼地无法耕种，这个地块就可能被放弃，尽管孤悬在外的高岗上仍然有好收成。

转眼过去了近四十年。不知道当年开垦的荒地，如今是什么状态。只是听说，最近几年，松江平原上正在大面积地恢复湿地。当年的革命者们，重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中。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打夜班

在机务排，打夜班是正常工作状态。以耙地居多，秋翻或春翻紧张时也会翻地，但通常不会安排牵引播种机、锄草机和收割机的作业任务。

记得是每周对调一次白班与夜班。换班时间在中午，早晨刚下夜班的人睡到中午就下地接班，而上午干白班的人下午回家睡觉，傍晚再来接夜班。当然，如果赶上全连统一休息，就在休息后的第一天自然换班了。

交接班很简单：检查水箱水位、发动机机油、农机具的状态，交待作业任务。然后，下班的人就带着满身的灰尘与疲倦，回家休息了。而上班的人就启动拖拉机，拉着农具，继续着前一班的工作。

翻地是3人一班，两人开车、一人"把大犁"；耙地则是两人一班，一人驾驶机车、另一人观察机具。若是耙地，在机车"入堑"、开始直行以后，坐在非驾驶位的人没什么事好做，很容易就睡过去了。我们做助手的，开始时操作不熟练，师傅不敢睡觉。到后来，操作熟练了，师傅就可以放心休息了。我们年轻、身体好，大都是后半夜工作。但前半夜又不困、与师傅聊天，所以常常是一夜不睡觉。

夜班耙地，最怕"跑堑"，就是丢失了前道作业留下的轨迹。通常，第一遍耙地很少跑堑，因为耙过的土地是深色的、未耙的土地是浅色的。但第二遍耙地时，颜色的变化就很不明显了。若是白班，还可以根据周围的参照物判断方位，不会有大的偏差。但在夜晚，视野只有被大灯照亮的十几米开外，看不到参照物，就只能死死地盯住右边5米远的堑位了。一时看不见，也要镇静，保持直行，过一会儿或能看见；即时没找到，只要坚持到地头，就能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最忌胡乱拐弯。我最惨的一次是跑堑约半小时，自己也不知道转到哪里了，只好叫醒旁边睡觉的田师傅。

夜班的时间，以吃夜班饭为中点，前后各5小时左右。记得那时大家都没有手表，（只是田师傅有？）如何判断回去吃夜班饭的时间，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是晴天，就看月亮的方位。如果是无月之夜，就看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旋转的方位。但若是阴天，又看不见附近居民驻地的灯光，就很难判断了。早晚的误差会有1小时。

北大荒的夜空很美。满天星斗，密密匝匝，一条银河，横贯苍穹。明月高挂在天际，陪伴着我们，每每给我别样的感受：新月的羞涩、满月的圣洁、残月的眷恋……若值夏夜，还能看到落日的余晖沿北方地平线缓缓地向东移动，逐渐变大、变亮、变红，直到日出。

每天早晨看到的日出都不一样，因为有云、有雾、有丛林的遮挡。有一天，我发现东方的地平线极为清晰，就停下机车，看到了绚丽的日出过程：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个红点，在水平方向延展为一根红线；红线的中央又跃出一个红点，再向左右延展；红点继续跃升、红线不断延展、长度增加，外轮廓从弧形渐渐变成半圆；当红点不再出现时，太阳开始整体跃升，与地平线的交接线越来越短，最后缩为鲜红色正圆下方的一个突出点；但这个红点像是舍不得离开地平线，被略略拉长，迟疑片刻、骤然抽回。一轮红日告别了地平线的挽留，冉冉升起！

夏锄

玉米和大豆“出苗”以后，弱小、细嫩。与之同时钻出地面的，还有杂草。此时需要人工除草，至少两遍。直到幼苗长到足够的高度，除草机堆起的垄台才不会将幼苗埋没。另一方面，当时的播种机械还是“条播”、即连续撒种，而不是自动隔开一定距离的点播，因此玉米需要“间苗”，用锄头铲除一些幼苗、以保持合理间距。

锄草，使用长把锄头，在幼苗“队列”的两侧各拉一锄、长度约1米至2米，即所谓“夹板锄”。接下来是间苗，再用锄尖剔除夹在幼苗队列中的杂草。然后，向前跨两步，拉出下一个夹板锄。熟练之后，可形成每两步一个周期的节奏。

无论是锄掉的杂草还是间掉的幼苗，都要切断根部，稍大的杂草还要将根部翻出。“斩草除根”。道理好懂，做到也不难，但长时间认真坚持、每一锄都能保持足够的深度，却是需要体力和毅力的。如果遇到较硬的地表，在向后拉锄时，下压力稍稍不够，锄头就会滑出地面，即使锄断草叶，也不能伤及根部。而且，锄头带出的松土会将后面的地表盖住，从表面很难看出。所以，锄草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锄草者的责任心。

不记得是在1970年还是1971年，锄草任务紧，机务排也派人参加。我们做助手的，自然是责无旁贷。记得有一天，在“78垧”（地块名）锄草，天气很热。到下午的时候，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头昏脑胀、浑身乏力，感觉要虚脱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可能是中暑了。但当时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坚持、坚持、坚持。终于，坚持住了，挺过来了。那种感觉，在以后的很多年里，都牢记在我的心中。这样的经历，可以说是我终生的财富。

后来，我从团机关到7连，在1976年参加了夏锄的全过程。再后来，1977年转到北京密云县插队，与当地老农一起锄草（耪地），技术（左右均能熟练使锄）和能力立即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虽然，锄草技艺本身，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值得炫耀。但对于年轻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种认可，会增加他的自

信，会鼓励他继续自强不息，尽管从事的行业已经改变。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宣传队

（1）

在北京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的宣传队就十分活跃。到兵团以后，宣传队的几乎原班人马都到了四连，只是少了男高音杨昭庭（我们班的少部分人被分到了团部面粉厂）。

应该是在69年年底，四连宣传队成立了。徐达成是第一任队长，女生：朱玉梅、张路、胡素云、王文英、杨淑兰、张文霞、小怀（？）、高美华（？）（还有谁？），男生：蒙星、潘刚、张树泉、赵殿旺、我、（还有谁？），乐队：刘鹤滨（二胡高手）、米连喜（笛子）、马宝仲（黑管高手）、（还有谁？）

第一台节目有：歌颂房树松在北京见到毛主席（题目？蒙星演房树松）、学哲学的短剧《内因与外因》（编剧王朋）、长篇诗朗诵《雷锋之歌（贺敬之）》（？）、鹤滨的二胡独奏（保留节目）、宝仲的黑管独奏（保留节目）、朱玉梅独唱（？）、胡素云独唱（远飞的大雁？）（还有什么？）

后来，宣传队到鹤岗市拍剧照，还有房树松节目的造型（过些天我会将照片扫描到博客中）。

宣传队平时排练节目，好像是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很冷。有时还停电、点着蜡烛排练。

第一台节目，应该是在70年春节前上演的。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观众。效果非常好。

不记得当时的礼堂里有舞台了。观众们都是坐在由圆木、木板搭成的简陋座位上。即便如此，前排座位也很早就被家属区的孩子们占上了。在那个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能看上这么一台自编自演的节目，已经是很难得了。

我们这些几乎毫无演出经验的年轻人，策划、编剧、作曲、编舞、排练、串场，都是边干边学。对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组织能力、团队精神，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次的演出成功，使连队领导更支持宣传队的工作了。也就有了宣传队后来的发展。

（2）

应该是在1970年春节前后，我们到团部参加了全团汇演。那次汇演有很多连队参加，最好的是10连宣传队，陆宁等一批北京老高中生，给我们树立了标杆。其实我们演得也不错，胡素云应该是在那次汇演后被团宣传队选中的。

后来，不记得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我当了宣传队队长。也不记得到底是1970年的夏天、还是1971年的夏天，宣传队排演了的一台以麦收为主题的节目。排练节目的时候，正值麦收紧张进行之际。宣传队队员可以在下午提前下班、回驻地排练，足见当时领导的重视。

那台节目在连里的演出获得好评，不久被安排在全团政工会议上演出。虽然是第2次在团部文化宫的大台上演出，但这次的观众是团首长和全团的各连指导员，大家都非常紧张。何仁霞督战？陈指导员事后也说，在台下替我们捏着一把汗。当晚，大家非常齐心、状态奇好，演出大获成功。下面是后来补照的剧照：

那台节目中的中心节目，是一个名为“麦收鼓动组”的歌舞。张路应该是主要编舞者，但台词和旋律却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大概是因为这台节目，我曾在当年冬天到团宣传股参加过“面试”。记得那天很冷，坐着马车从梧桐河到了团部，冻得手脚发僵。进了宣传股，翟干事叫我跳个舞，我就跳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效果肯定很差。面试也就没有通过。要不然，也有机会和现在大名鼎鼎的濮存昕做同事了。

（3）

1970年的秋天，宣传队开始排练《沙家浜》，是全剧、不是片断。现在不记得，当时15团其他哪个连宣传队有排练样板戏全剧的实力了。

演员表：（请大家修正、补充）

阿庆嫂：杨淑兰郭建光：臧寿松沙奶奶：魏雪沙四龙：张树泉卫生员：王文英伤病员小王：潘刚战士：赵殿旺等胡传魁：荣继革刁德一：边晓春刘副官：蒙星刁小三：潘刚导演：？

音乐指导：王卓京胡：？

二胡：李光全笛子：米连喜化妆：伊正石、王文英排练过程的很多细节都记不清楚了，请大家补充。只记得以

下几点：

*音乐和戏曲的原调很高。我们全部降调，好像还不止一个调。即便如此，我唱“新四军就在沙家浜”一句时，还是唱不上去，就做一个背身的动作，由臧寿松在后台替我唱这句；*我为了演刁德一，专门练习抽烟。周围都是烟民，很快就学得比较像样了。标志是：烟从口中吐出，再从鼻子吸入；*第一次演出是1971年2月2日。下午就开始化妆，大家都很兴奋。是不是在大食堂专门搭了一个台？过程很顺利。观众爆满。

*演出结束后，大家都没有卸妆。带妆坐着睡觉。第二天早晨，坐在“千里马”的拖车上，到鹤岗市照相。在1连大道边截车去鹤岗时，引来围观。后来1连的人告诉我，他们觉得我们真逗，晚上不卸妆怎么睡觉呢？但也佩服我们很齐心。

*鹤岗市照相馆当天上午专门为我们照相。照了《沙家浜》的剧照。后来余兴未尽，又摆了几个其他节目的造型。（大家分摊的费用？）

（4）

到了1971年的下半年，宣传队已经积累了一批不错的节目，阵容也相对稳定。于是，我们开始到附近连队演出。1连、2连、3连、5连、32连、梧桐河农场某生产队，都留下过我们的歌声。在有的连队还演过两场：一场小节目、一场《沙家浜》。最远到过15连？

记得，只有梧桐河农场的礼堂里有个不错的舞台，其他连队的礼堂都没有舞台，通常只是在食堂兼礼堂中的一端临时辟出一块不大的平地作为舞台，再拉起一块幕布分割出后台。专业灯光是肯定没有的，通常只有临时拉过来的几只大灯泡。

每次演出，都有很多观众。座位也大都是一排原木、与4连一样。前面几排通常是被家属区的孩子们占据。开演前，打闹声、哭叫声，乱作一团。孩子的后面坐着几排老职工和知青。再往后的原木并不比前排高，观众视线被遮挡，索性就都不坐了，站在地面上。最后几排的观众仍然被挡，就站到原木上。所以，从“舞台”上往前看，观众不是在下面、而是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正前方，且有四个层次。好像只有1连的秩序好一些，因为那里的原木排列是有梯度的。

节目开演之前，是乐队调弦。观众们渐渐安静下来。报幕员出场，一男一女。典型的红卫兵装束：绿军装、解放鞋、皮带束腰、手捧红宝书。第一句话通常是：“15团4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战斗，现在开始！”随即一个小造型。然后应该是：“我们代表4连官兵，向x连战友致以崇高的战斗敬礼！”随即一个军礼。台下掌声雷动。

如果是演《沙家浜》全剧，就从第一幕开始。如果是演小节目，第一个节目通常是场面较大的歌舞，然后是各种类型的单人节目和集体节目，最后是一个压场的大型歌舞，整场时间约1小时。演出过程中，大家都是全身心投入，每个人，上台是演员、下台帮别人，秩序井然，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差错。

下面的照片是张文霞（右）和胡素云演的对口词：《水》。王朋的作品？

但“小插曲”还是有很多。记得在梧桐河演出，舞台上的木板没钉好，有人一脚将木板的一端踩下去，木板另一端跷起，打到脸上，当即倒地。还好无大碍。

演出结束后，主人通常招待一顿晚饭，质量很好。大家自然不会客气，风卷残云。

1972年春节前后，大批知青回家探亲。宣传队的活动随即停止。回来后就是春播、夏锄，好像也没排演新节目。夏天以后，张路、胡素云、朱玉梅等人陆续离开4连，我也在秋天被调离，宣传队的活动也就越来越少了。我自己在兵团期间的“演艺生涯”，就此结束。

4连宣传队的经历，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还不是最重要的。策划、组织、协调能力的提高，面对种种困难与挫折的积极、乐观与自信，演出成功带给大家的喜悦与激励，甚至在当时极为难得的与女生的交往机会，都持久地影响着我的人生。

当然，最珍贵的，是与兄弟姐妹们纯真的、永恒的、浸入血脉的深厚情谊。

相关剧照手稿等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d5de50100bqvb.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d5de50100c1jl.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d5de50100c3ka.html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跑火

在北大荒，春季是烧荒季节。烧荒时，如果不慎未能控制住火势、点燃大草甸子中的茂密枯草，就会形成大面积的火情。当地人称之为“跑火”。1970年，在我们到北大荒的第一个春季，就看到过多次跑火。有一次，北面、西面、南面同时多处跑火，火光冲天、浓烟滚滚，颇为壮观。

每年的烧荒季节，领导都格外紧张，因为即使自己不烧荒，也经常有其他连队烧荒的野火蔓延到我们的驻地周围。最南端的女生宿舍和最北端的家属宿舍距离草甸子只有数十米远。

不记得是在1970年还是1971年春季的一天，北面的草甸子跑火了。那天刮北风，火势很大，北边的家属区、马棚和学校都处在危险之中。刘宗昌连长带人去打火，被火烧伤脸部。我当时没在驻地，未参加打火。（谁参加当时的打火了？请回忆细节）

跑火时，最危险的地带是火头。已点燃的枯草被大风吹起，飘在空中，形成高数米、宽数十米的巨大火墙，随风推进，温度极高。据说，刘连长当时只是被火头燎了一下就形成烧伤；若被火头围住，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人工扑火时，只能跟在火头的后面，扑灭剩余的零星小火。即便如此，若遇到风向变化，仍有被烧伤的危险。

阻断跑火的常用方法有：在远离火头的下风处打防火道，即用镰刀割掉枯草，形成一个保护带，使得火头无法跃过；或者在下风头靠近被保护建筑的地带主动点火，由于过火距离较短，火头尚未形成，不致威胁建筑，但已经形成保护带。即便如此，火势特别大时，火头仍可能会从空中跃过数米宽的保护带。

到后来，可能是有了明确的烧荒禁令，也可能是不怎么开荒了，就没再听说严重的跑火事故。

麦收（1）

春天播种的小麦，到7月底就成熟了。麦收，包括田间作业和场院作业两部分。我在四连时没参加过场院作

业。

当时的宝泉岭农场已经是经营十多年的国营农场，具有国内一流的机械化作业水平。在正常的气候条件下，麦收的田间作业几乎全部由机械完成。

1970年，四连只有一台前苏联CK4自走式收割机。车长是甘师傅，助手是赵排长的弟弟。自走式收割机的收割台在前面，好像是三米多宽。记得是1971年，又增加了一台全新的东风牌自走式收割机。红色机身，威风、漂亮。（车长？）助手卢殿明。照片附在下面。

四连还有一台牵引式收割机。车长是王寿昌师傅、助手是何家荣。后来又调来一台旧的160号收割机。车长是姚春发师傅，助手是卢保利。牵引式，就是需要拖拉机在前面牵引。所以收割台在右侧，4.9米宽。

两种收割机，都是边行走、边收割、边脱粒。收割台前方的刀床将小麦底部割断，转轮将割下的小麦向后拨到收割台上。收割台的滚轮或传送带将小麦送入收割机机身，两只大型滚筒将麦粒从麦穗上挤压出来。麦粒经过多重细筛与麦皮分离后，进入麦仓；麦秸经过多重粗筛后不再夹杂麦粒，从机身后部吐出。牵引式收割机后面拖着一部草车、收集麦秸，堆满后将麦秸垛卸出。收割机的左侧装有传输滚筒，用于将麦仓中的麦粒传送到旁边的汽车或拖斗上。有时为了抢时间收割，收割机边收割边卸粮，“千里马”拉着拖车接粮，场面颇为壮观。

好像是从1972年起，小麦收割加入了“割晒”的工序。割晒，就是先将灌浆结束但尚未晒干的小麦割倒，放在地里晒两天或三天，再由机械“拾穗”、脱粒。经过割晒的麦粒，质量更好、更干燥。

实施割晒，是将牵引式收割机的收割台卸下，安装在一台专用的“割晒艇”上，由拖拉机牵引。行进中，被割下的麦子从割晒艇的后部送出，铺放在麦茬地上。后面的麦穗压在前面的麦秆上，形成一个长长的金黄色队列。如果麦秆与一行一行的麦茬形成合适的角度，就会被麦茬撑住、而不使麦穗掉到地面上。

实施拾穗，是卸掉收割机的转轮和刀床，在收割台上加装专用的拾穗器。行进中，拾穗器上成排的钢丝向上翻转，挑起铺在麦茬地上的麦穗，传送到收割机中。

我们51号车是整地车、不是牵引车。1970年的气候正常，我们没能牵引收割机。1971年遇到了严重的内涝，沉重的收割机在松软的麦地里下陷很深，一台拖拉机拉不动了、需要两台车串联牵引。我们车参加了牵引。这段经历，在《麦收（2）》中记述。1972年，我们车的任务是牵引割晒艇。这段经历，在《麦收（3）》中记述。

麦收（2）

我们4连驻地的地名叫“鲶鱼哈”。“哈”，也不知是满语还是俄语，意为水塘，可见其地势之低。每年

的8月，是北大荒的雨季。如果气候正常，在麦收结束前后才开始下大雨。但1971年的雨季提前到来了。几场连续的大雨下过，低洼地被积水覆盖，高岗上也有了明水，大部分麦田被浸泡在水中。艰苦的麦收，开始了。

橡胶轮胎的自走式收割机，一下地就被陷住。收割台前置，无法牵引。所以，全连的目光，都集中在仅有的一（两？）台牵引式收割机上。收割机的钢轮被装上“木鞋”，被两台同样穿着木鞋的拖拉机牵引，在泥泞的田地里艰难地作业。穿木鞋的拖拉机如下图所示：

我们51号车担任前牵引车，两根数米长的钢丝绳拉住13（17？）号车的前牵引钩，13号车牵引收割机。起步时，前车先行、拉紧钢丝绳，后车随即起步。一定要控制好油门，太小则力量不够、太大则链轨打滑。通常，只要成功起步，就能顺利地前行。通过泥泞地段时，一定要全速前进，绝对不能停车。但即便如此，遇到过于泥泞的地段，收割机下陷过深，还是会误车。这时，我们助手的任务，就是挖开收割机钢轮下的泥土，将木板插在轮下，由拖拉机将收割机拉出。但有时拖拉机自己都陷在了泥塘中，被烂泥拖住地盘，无法前行。这时就由另一台拖拉机先将误车的拖拉机拉出，然后两台拖拉机在相对干燥的地面斜向拉动收割机，脱离险境。

最艰苦的几天里，终日周旋在泥塘中。没有雨靴，挽着裤腿。裸露的小腿被蚊虫叮咬，奇痒难忍。抠破的伤口不能愈合，长了多处脓包疮。好像由此还休息了半天或一天。经过了二十多天的奋斗，完成了大部分地块的抢收。低洼地实在进不去车了，我们也拿起镰刀，和农工排一起泡在水里割麦。

每天早晨下地时，都到水房用热水冲热裤腿，脏兮兮的套在腿上，下地干活。三十多天下来，裤腿已经成了烂布条。

九月上旬，麦收终于结束了。全连放假两天。放假的第一天，大部分人都是睡了一整天。实在太累了。

麦收（3）

1972年的麦收是从小麦割晒开始的。我们51号车是主力机组。记得分成两班，早晨天一亮就下地（5点左右？），中午交班；晚上天黑收工（9点左右？）

小麦割晒，一人操纵拖拉机、一人操纵收割台。我是助手，主要任务是操纵收割台。坐在割晒艇上，面向收割台、左侧是前进方向，手握舵轮。舵轮很像轮船的舵轮，两手分握两只手柄，控制收割台前面刀床的高度。收割台的动力来自拖拉机的传动轴，由拖拉机驾驶员控制。

相对于大犁、圆盘耙、重耙等农机具，割晒艇是很轻的负荷。拖拉机在直行时经常挂上5档、跑到最高速度。这时操纵舵轮还是很紧张的。若刀床过高，则导致麦茬过高、相对较软，不足以支撑平铺在上面的麦铺子；若刀床过低，则导致麦茬过短，麦铺子的麦穗容易接触地面、影响晾晒效果。若不小心使刀床啃到地面，轻则打坏刀床、

重则导致收割台翻车。通常，平整的地面没有大问题，保持平稳即可。遇到前进方向的坡度，则在下坡时压住刀床、上坡时抬起刀床。但若遇到与前进方向垂直的坡度，就要看住刀床最接近地面的一端，使其不致贴地。记得割晒艇上还有一根信号绳。紧急情况下拉动信号绳，提醒驾驶员减速或停车。

在割晒时开拖拉机，在所有拖拉机作业中是最爽的。油门拉到最大，保持住位置和方向，拖拉机发出的吼声都充满了收获者的愉悦。

正在收割的麦田，也是北大荒最美的景色之一。碧蓝的天空，金色的大地。红色的拖拉机在原野上奔驰，转轮在麦浪中翻滚，割晒艇吐出长长的麦铺。机车过后，在黄色的麦茬之间，可以看到嫩绿的小草刚刚钻出地面。坐在割晒艇上放眼望去，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麦田，背后是碧绿与金黄相间的条状大地毯。在这美丽的大地毯上，整齐地铺着一行一行的麦铺子，麦穗在风中微微晃动，享受着阳光的沐浴。

我爱北大荒的田野…

相关图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5d5de50100bsly.html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严寒

如果以穿棉裤作为冬天的标志，那么，北大荒的冬天就是从“十一”到“五一”，整整8个月。从1969年到1976年，我在北大荒过了8个冬天。

北大荒的冬天，真冷。客观的数据是：在1月，最高温度为零下20度左右、最低温度为零下40度左右。主观的感受就有很多了：

*冻伤。经常被冻伤的部位有：颧骨处、手、脚、耳。冻伤的体验过程是：先感到针扎般的刺痛，然后逐渐麻木，直至没有知觉。从没有知觉开始，外观表象就变成局部的白色，灰白、惨白；然后就会慢慢隆起水泡。处置冻伤，切忌热敷，要用凉的柔软物体，例如棉手套的被部，慢慢揉，直至皮肤恢复正常颜色。被冻伤的事例多得数不胜数。通常，从4连走到1连，顶着西北风走1小时。在23号地的上坡处，口罩边沿的某处就会开始上述过程。1连的知青说，有一年乘拖车去团部看《卖花姑娘》，下车以后发现，很多人的口罩两侧都被冻起了一串水泡，震惊。

*结冰。30多度的温水沿墙面流下，流不到地面就会结冰。道路经常被雪层或冰层覆盖，汽车需要带防滑链。

*雪原。从第一场大雪开始，广袤的原野就被白色覆盖，直到第二年开春。家属房被大雪封门，是常有的事。

*结霜。早晨，所有的树枝与枯草都会被厚厚的白霜包裹。走在路上，在纯白的世界中会有一种飘飘欲仙的幻觉。

在严寒中，皮帽、棉靰鞡鞋，是必备的装备。各种类型的皮衣和棉衣，就是各有特色了。女生还要外加一条长长的拉毛围巾。但有一个规律：越是南方人，穿得越少。温州男知青居然有不穿棉裤过冬的。

在住房中，抗拒严寒的主要依靠就是火炕。其面积占据了居室的一半以上。知青宿舍的标准配置是火道加木板大通铺。走廊中，屋门的两侧各有一个炉门，炉门边堆煤。冬季有专人烧火，而且是双班制。入夜后，火炉从不封火，房间里温暖如春，炕头的褥子被烧糊是常有的事。双层玻璃窗，中间填充锯末，但里层窗户上仍然会布满各种形状的冰花。

在室内外的温差高达数十度的情况下，到远在数十米之外的露天厕所去方便，就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所以，男生宿舍两端，总会被越来越高的冰山所困扰。

严寒，也不能熄灭一百多名年轻人的热情。在两排宿舍之间的空地上，泼出了冰场。休息日里，冰场上总有哈尔滨知青穿梭如飞的矫健身姿。

回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被严寒困扰过，但严寒中的那种极其清澈的身心体验，也离我远去了。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雪花

女儿正在学日文，在博客中贴了一张雪花的显微照片，是大约200年前日本人用刚刚发明的显微镜拍摄的。于是想起了北大荒的雪花。

北大荒经常下雪，下大雪。刚到北大荒的时候，看到在北京从未见过的大雪，还是很兴奋的。若在屋外，有时会伸出带着棉手套的手，接住一些雪花，观察它的结构。多数雪花的颗粒不大、几乎就是小冰粒，看不清楚结构；落在地面上显得比较松散，踩下去是“刷刷”的声响，打雪仗时不容易捏成球。但有时的雪花结晶较大，捧在手心仔细看，像是缩小的蒲公英；落在地面上容易粘连在一起，踩下去是“咯吱咯吱”的声响，打雪仗时容易捏成球。现在想起来，或许与下雪时的空气湿度和气温有关。应该是在湿度较大、气温较高时，结晶过程较长，容易形成较大的雪花。

走在厚厚的积雪里，雪粒很容易钻进鞋子，袜子很快就湿透了，凉得钻心。冬天在外面干活，也不能回家换，只能咬牙坚持。棉靰鞡鞋都是高腰，鞋带一直系到脚腕处，还要在脚腕上紧紧地绕几圈，牢牢地扎住鞋口。即便如此，每天收工回宿舍脱下鞋，里面还是湿漉漉的。鞋垫很有讲究。毡鞋垫可以垫底，但上面最好铺一层草鞋垫，上等的是靰鞡草鞋垫、外包一层布、缝在一起；次一等的是玉米皮，直接垫进去即可。烤鞋垫是每晚必做的作业：将鞋垫平放在铺板下的火道上。味道肯定会有一些，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若当晚的火道烧得过热，鞋垫就会被铸糊，所以备用鞋垫或玉米皮就成为必需。第二天早晨出工前，踩在热乎乎的鞋垫上，别提多舒服了。

51号车（续）

在51号车当助手近三年，至少惹过两次祸。

一次是晚上耙地跑堑，跑到一块已经播种的地里。不记得耙了多大面积，但还是为此在全连大会上挨了批评。

另一次也是耙地。带班的田师傅（还是继德？）上午回去办事，我一个人开车。转弯的时候，发现右操纵杆不

灵，就停下车，拿着扳子去拧右侧制动器的调整螺栓。现在还记得，那只螺丝帽很粗，用24号扳子；且下部有定位器，每次至少拧半圈。我先是拧紧半圈，走了一段，发现还是不管用，就下车又拧了半圈（一圈？）。再往前走，闻到了少许糊味，没有在意。糊味越来越大，才一下想到可能是右侧制动器的原因。停下车来检查，已经晚了，右侧制动器的磨片已经烧坏。心里十分沮丧。

当时，刚上车不久，对拖拉机的构造还是一知半解。见过师傅们调整制动器螺栓，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出了这次事故以后，就更加注意学习理论知识，记得仔细阅读过一本东方红拖拉机的构造图册，类似A3幅面的大开本。

再往深处想一想，当时还是过于自信。如果在一开始遇到问题就停车等师傅回来，肯定不会有这次事故。多年以来，“过于自信”已经可以归为“难移”的本性了。由此引发的类似的小事故不胜枚举。当然，也不是没有好处。敢于去做在别人看来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或许也是出于这样的本性。

看准的事情，还是要去做；但在做决定时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低级失误。

抡大镐

大镐，又称丁字镐，方形截面的钢质镐身，两头尖、或一头尖一头平，中间嵌入木把，重约10（？）公斤，专门用于刨开坚硬的土层。在东北农村地区，是冬季积肥、刨冰、挖排水沟的主要工具，所以也是下乡知青冬季劳动的主要工具。

北大荒的冬天，天寒地冻。无论是肥堆、田地还是草塘，表面都是厚达数十厘米的冻层。将结结实实的冻层刨开，谈何容易！

如果不算在驻地刨冰，我参加过3种类型的“抡大镐”：挖肥堆、挖排水沟、挖腐殖土。

挖肥堆是相对容易的，因为肥料在发酵的过程中散热，使得冻层较薄；而且肥料质地松软，冻层也不是很硬。因此，挖肥堆，就要首先刨出一个深槽，底部要能见到未封冻的部分，侧面则是尽量垂直的冻层断面。然后，在冻层表面处选择一点，该点距离断面约20至30厘米，抡圆大镐，集中打击该点。打击的声音从“当当”的清脆声逐渐变得“咚咚”的低沉声、打击点的周围会出现细细的裂缝。如果有与断面平行的裂缝，就在该裂缝的延长线上选择另一个点，集中打击该点。这条裂缝就会逐渐加粗、加深。这时，在裂缝与断面之间选择一点，集中打击该点，就会出现一条与断面和第一条裂缝大体垂直的裂缝。继续打击该点或另选新点，使得这条垂直的裂缝更粗、更深，且逐渐延伸到断面。照此办理，再刨出另一条与断面垂直的裂缝。这三条裂缝，就围成了一个长方形的区域。然后，站在冻层上面，抡镐打击长方形区域的冻层底部，震松这块长方体冻块底部，其表象是冻块的震动逐渐加剧。再适

当地扩大、加深周围的三条裂缝，最后再用镐头撬、撬杠撬，一个长方体冻块，就脱落下来了！

缺口形成以后，接下来就相对容易些了。在缺口附近、第一条裂缝的延长线上选择一点，集中打击，待裂缝扩大、加深后，再制造另一条垂直裂缝，就可以切下第二个长方体冻块。依此类推。每一个冻块被切下来，都会引来一片欢呼。大家一起上，七手八脚、将冻块抬走。随着若干个冻块被切下，深槽加宽、第一条裂缝处形成新的断面，即可开始新的一轮推进。

腐殖土，是草甸子里面多年沉积的黑土。将腐殖土挖下来、运回去，是加工颗粒肥的主要原料。1975、1976两年，我在7连时，是冬季的主要工作。腐殖土的厚度通常只有数十厘米厚，下面就是黄沙。所以，挖腐殖土的过程，与挖肥堆的过程类似。

挖排水沟，是难度最大的。因为必须挖掘黑土下面的沙土，才能达到规定的深度。而沙土被冻住以后，极其坚硬，即使抡圆大镐打下去，也就是留下一个小白点。除非距离下面的非冻层比较近，否则很难形成较深的裂缝、并最终切下长方体冻块。几乎只能一小块一小块地往下抠。

抡大镐，是重体力劳动，需要绝对力量。在众多类型的田间体力劳动中，这几乎是唯一的一种劳动，男生明显地比女生有优势。记得是两人一组，一镐一锹。两人轮番抡镐。抡镐时汗流浃背，棉衣很快就穿不住了；被换下来后必须马上穿棉衣，严寒之下，流在脸上的汗水能被冻成冰。好在冬天的白昼很短，如果中午回驻地吃饭，上午下午也就是各两个小时左右的劳动。

下午，收工了。橙红色的夕阳慵懒地挂在天边。我们扛着大镐、拖着疲惫的脚步，往回走。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回头看一眼刚刚凿开的排水沟。一望无际的雪原中，我们的身影是那样的弱小，只有大李滨浑厚的中音在微风中飘荡：“……前进，前进，奋勇向前进。到处都是闪电般的火光。我们用，歌声当食粮，歌声当食粮。”（苏联老歌）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知青岁月实录】：

探亲

（1）

“探亲”，是部队的专用词，意为现役官兵返回家乡探望父母和家人。在准现役编制的兵团，这个词也被沿用下来，而且规章制度也与现役部队相仿。例如：每两年（而不是一年）一次探亲假，每次假期12天，探亲假照发工资（这点与现代公司相仿），报销往返火车硬座车票。超过12天计为事假，事假扣发工资。

北京知青的大规模探亲始于1971年年底。大多数人都选择了1972年春节之前回家。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领导每次只批准有限的人数探亲。我和家人商量好，与王朋、蒙星等少数人没有回家过春节，而是在春节之后才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乘车路线是：鹤岗乘慢车至佳木斯，佳木斯换乘直达快车，隔日凌晨到达天津，乘天津至北京的快车、上午9点、在北京站大钟的《东方红》乐曲中走出站台。

我们三人在火车上，拟订了一个周游全国的伟大计划。但一回北京，该计划立刻被抛到脑后。与家人已经两年半未见面了，怎么可能放我们走呢？

在我下乡期间，我家从苏州胡同101号大院搬到了和平里10区。回家时，是拎着提包、拿着地址找到家门的。仍然住在5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感觉好极了。父母当时还在北京郊区下放劳动，但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每月定期回家休息。上小学的妹妹平日寄宿在邻居家。全家人在分离两年多之后团聚，都很高兴，做了一大堆好吃的。父母说我长大了，我说妹妹长高了，其乐融融。

几天以后，父母回去继续劳动。妹妹白天要上学。我在家里难得地真正休息了几天，找些闲书看。

但很快就闲不住了，从张路家借了个120相机，纠集王朋和蒙星，开始了在北京各大公园的“巡游”。

看得出，当时的美学水平还是很初级的，常以青松、飞檐为背景。当时的时尚，也还有很深的文革印记，像章、军帽，尽管已经是林彪事件以后了。

（2）

知青探亲，要带走很多东西，也要带回很多东西。

带走的，主要是食品。哈尔滨知青带面粉、豆油、白酒，北京知青带大豆、白酒、黑木耳。每人至少两只大提包，每只提包可装40斤面或更重的大豆。连里从来不承担送行的责任，再多的东西，也要自己想办法运到鹤岗火车站。到鹤岗的公路从1连经过。只要到了1连，就有办法乘公共汽车或拦截货车到鹤岗。然而，从鲶鱼哈到1连，12里路，再好的体力，也无法扛着这许多东西走到1连。

运气好的时候，赶上“千里马”（连里的轮式拖拉机）去鹤岗办事，是最幸福的了。运气差点，也能搭“千里马”或马车到1连。实在不行，就只能借自行车、找人送行。每个男生都有多次送人的经历。有一次，我去送人，大雪封路。23号地，积雪没膝。无法推自行车，只好肩扛手提，将大包小包运到没有积雪的高坡上，再回来扛自行车。

1连距离鹤岗只有约15公里。即使坐在运送粮食的货车上面，时间也不会太长。但对于远在黑龙江边的知青来说，在货车上蜷缩1个多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就是很苦的事情了。或者蜷缩在驾驶楼后面，可以抓住前面的栏杆、相对安全些，但驾驶楼也遮挡不住刺骨的寒风，人很快就被冻得僵硬了；或者蜷缩在车厢后部，风相对较小，但危险较大，发生过多起转弯处翻车、麻袋砸伤人的事故。

上火车也不容易。那时虽然没有“春运”的概念，但火车也少，春节前后也十分拥挤。进车厢、占行李架，就像打仗一样，推推搡搡、分秒必争。这就苦了女生们。此时若有男生同行，必定骁勇异常。

我每次从北京站下车，出站台，都在108路电车起点站上车，还能有个座儿。到终点站和平里下车，还要走约1公里，爬5层楼，才能进家门。见到家人，十分兴奋，所有的旅途疲劳，一扫而光。辛辛苦苦带回的东西，其实也没派上什么用场。记得父亲将“北大荒”酒用于醉枣，因为它的度数太高了、75度，不敢多喝。

到了北京，还要给当地战友捎东西。前日翻出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当时的“购物清单”，扫描如下：

（回家办理事项。张路，军棋。孙笑荔，哑铃。老马，扣子（小）。老田，加重辐条10根，裁缝书3本。李治平，加重辐条10根。轴线10轴，白3黑7）

从家里往回带的东西，就是五花八门了。吃穿用，一应俱全。每次临行前，母亲都要给我装满一大瓶炸酱，肉多酱少，还有花生仁、核桃仁，美味至极！

离开北京，经过两次换火车、1次换汽车之后，隔日傍晚到达1连。在1连连部给4连连部打电话，请小叶传话，

叫人来接。大约1小时后，有人骑车来接。

进了宿舍门，一片欢呼。第一件事，就是将所有的食品拿出来“共产”。炸酱最受欢迎。烤馒头片抹炸酱！满满一大瓶炸酱，顷刻见底！

……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坐在家里，看着电视转播的春运节目，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似乎闪现着我们当年探亲的影子。

哦，岁月流逝，亲情永恒。

送别

（1）

边疆生活8年，经历了许多次送别。多数是送战友回乡，或上学、或病退困退、或转插（转到离家较近的人民公社插队），也有因工作调离去其他单位的。

根据日记记载，最早的一次送别，是在1970年1月4日。当时，兵团组建战备值班团，从各连抽调战士。我所在的1排某班被抽调走4人。当天“中午包饺子，大家凑钱买了些东西，和将要走的同志们举行了小小的送行宴会”。“这几位同志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虽然相处数月，但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紧紧地联在一起。还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吧！”

最后的一次送别，是在1977年3月27日，根据王文英保存的笔记本记载。当时，王文英去哈尔滨上学，我们一行7人去送她。下面是我们在鹤岗的留影。

后排左起：景玉芬，张凤琴，江锡华，尚德宜，王文英前排左起：边晓春，郑文新，王朋

在鹤岗火车站，我将一首小诗写在一张纸上，送给她。内容如下：

临别赠文英同志（寄调《诉衷情》）

同窗同志亦同心，转瞬已十春。
当年壮志何在？
大浪荡烟尘。今去矣，待明春，会故人。
携手笑谈，征程万里，重任千钧。

郑文新，王朋，边晓春77年3月27日写于鹤岗

到了1977年的4月某日，再一次去鹤岗的时候，就是别人送我了。

（2）

前日整理旧笔记本，发现封底的塑料皮里夹着一张1970年的年历。抽出来准备扫描留存，却带出了藏在里面的一张照片。扫描如下：

这是1973年送张路上学。可惜当时已经几乎不写日记了，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相关的文字记载，甚至记不清这张照片是在鹤岗还是在宝泉岭照的。

1968年，毛主席就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到了1973年，邓小平等人复出以后，停顿了7年的大学招生才重新开始。由于采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而不是考试招生的做法，故1973年至1976年入学的大学生后来被统称为“工农兵学员”。

1973年，对于已经下乡4、5年的广大知青来说，能够被推荐上大学，即使是后来不被看好的“工农兵学员”，也是梦幻般的出路。那年，我已经离开4连。推荐上大学时，张路和杨葳幸运地被4连推荐，而我所在的团机关却没有批准我的申请。所以可以想见，送张路上学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她的幸运感到由衷的高兴，又为自己未能如愿感到遗憾。

不过，当时的我，还是“扎根边疆”的坚定分子。即使上学，也是坚决要“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所以，对前途悲观失望一类的情绪，应该还是没有的。

（3）

1973年刚把张路送走上学，转过年来，又要送孙笑荔上学了。当时的照片如下：

与前一张照片比较，才过了一年，但大家都好像成熟了许多。特别是笑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其庄重的形象，好像就没变过。

笑荔的运气很好，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那是我少年时代的梦想。心里真是替他高兴。笑荔能被连里推荐，十分不易。他1971年回京参军未能如愿，曾一度比较消沉。在那样一个政治压力无处不在的环境中，重新振作起来，得到全连上下的一致推荐，需要怎样坚韧的毅力啊！

后来，1975年，我回家探亲，还到清华园的学生宿舍看过笑荔。当时就在想，不知我能否作为学生，踏进这幢大楼。两年以后的高考，本来是有机会圆梦的，却又不够自信，未能抓住。

人生有许多机会。每个机会都是岔路口。40年前，大家一起走进了鲇鱼哈；若干年后，又逐一在自己的“路口”离去。如今，就职业而言，彼此之间的距离已经不止一座高山了。然而，大家的心却好像从来就没有离开多远。只需一个小小的机会，就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在一个新的虚拟的“鲇鱼哈”里。

这里，不曾有送别。

老边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06



【大返城的日子里・一】：

（1）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2007年12月7日

作家孔捷生谈到知青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代人的大迁徙，人类活动史上能与之相比的事件屈指可数。于是就有了关于它的史诗。无论后世以何种标准，从何种角度去评价，事实都无可变更----它铸造了一代富有特质的中华儿女。”（这是我1970年到云南农场后，在芭蕉树下的留影。

那时瘦的像个猴子，苦啊。）

在1978年冬到1979年春，云南的西双版纳发生了一场五万知青罢工情愿大返城的事件。

它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毕竟留在知青们的记忆中。

我有记日记的习惯。（尽管父亲极力反对，生怕遭遇“文字狱”，他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作为一名知青，我经历了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的过程。关于云南知青的大返城，已经有许多的文章作了记载。那个时候，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在一个偏僻的连队里，我的记录不可能反映大返城的全貌。仅仅是一个知青的视觉，一点经历而已。

记得恩格斯说过-----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咬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

我们何尝不是。

今天，我把这个记录放在我的博客上。需要说明的是前一阶段已在博客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就是这个过程的记录。如知青诗词、返城日记、赴京简报等。

全文从1978年12月1日开始到1979年2月14日止，共计有77篇。

（2）一个馊主意，把我从上海叫了回来

1978年12月1日（星期五）

我回到了连队。

我是接到署名农场党委发来的电报匆匆赶回来的。一到连队，几位知青的伙伴就全乐了。原来是这几个朋友冒名发的电报，就是想叫我早点回来。在连队我还算是一个“小秀才”，写写画画的事，知青们都来找我。现在，知青都起来请愿了，需要我为大家写点材料。于是，大家就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把我从上海叫了回来。我一点怨言也没有。我们知青开始为了自己的命运奋斗了，我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吗？

和以往的回云南不同，这次探亲尽管在上海只待了十来天，一接到电报就启程。父母到车站送我的时候心情也不一样。上海这里已经知道中央在开知青工作会议了，知青可以顶替父母的传说基本得到了证实。父母反复叮嘱我：安全第一，只要平平安安回来就行了。父亲还反复告诫我，千万不要去参加闹事。他们也知道了云南知青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的信。父亲说，我们家庭出身不好，到时间是要算帐的。我明白父母的一番苦心。57年父亲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后，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来临，都会使我们担惊受怕。一句话，平安回到上海！

大家已经不干活了。只有一些老工人还上山去干活。这个日子倒是很清闲的。大家争相告诉我这段日子在农场发生的事。知青们开始罢工了。

唉，一下子就闹成这样，这是始料不及的。也许是压得太深了，这反抗也就激烈。知青的口号很简单------我要回家！这样的行动纲领是很有号召力的。这是个最低的纲领，可以看出组织者很有天赋。因为这个要求能够把知青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也许是农场的领导们无法解决的一个大难题了。

我开始记录下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一些过程。

（3）请加入到我们罢工的行列里

1978年12月2日（星期六）

小张来找我：“哥们，别生气，我们叫你回来，就是一起战斗。给你看一篇诗，是我在场部抄来的。有劲！”

我把它也抄了下来。

《请加入到我们罢工的行列里》

你是知青吗？

那么，请加入我们罢工的行列。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这曙光即将呈现的黑夜，

你，还有什么理由，采取观望的，

出于自私的动机。

也许，你畏惧官僚主义者的威胁？

那么，请看这千万人组成的铁壁，

任何阻挡者将在这里，像苍蝇一样碰壁，抽泣。

也许，你抢着病退的希望？喂，那是乞求。

在我们的行动面前，将显得多么软弱，无力。

也许，你，纯洁的姑娘，

为离开这里而嫁给一个素不相识，

两鬓斑白的男子？

啊，那将是多么可耻、卑鄙。

也许，你想在这场运动里投机取巧，坐享其成。

呸！

你将遭到人们的唾弃！

起来吧，善良的年青人。

八年前，火车站里悲痛心欲裂。

难道你已经忘记？

日夜里，母亲盼子归家的泪痕，

难道你已从心里抹去？

够了！

我们的命运，全靠我们自己。

醒来吧！

沉默的年青人，不要犹豫，不要彷徨。

为了我们正义的事业，

为了我们合法的权利，

请在罢工宣言上，签上你纯洁的名字。

请在共同事业上，作出你应尽的努力。

那么，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日子里，

你就会毫不惭愧地说："我，做到了力所能及。"

我问小张，这样的诗还有吗。他毫不犹豫的向我保证，明天我再去抄。他知道我是很喜欢搜集这些作品的。

（4）一封公开信

1978年12月3日（星期日）

1978年2月，作家徐迟发表了《生命之树常绿》的报告文学。他赞美西双版纳，赞美在这块土地上的知青。

他写道----

风光美丽的西双版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志气有抱负的知识青年进入橡胶园。来自上海、北京和四川等各省市的知识青年，（祖国向你们慰问！祖国向你们致敬！）来到了边疆。感谢他们的献身精神，中国已进入世界橡胶的国家的前列之中（开垦梯田，种植橡胶）

同样是在1978年，10月16日的那一天，有一封公开信被知青们广泛的传抄着。信的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

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亲爱的邓小平副总理，您好！

回顾以往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于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心声向您倾诉。

1、由于对生活失去信心，吸烟酗酒的现象日益增多。青年的吸烟率高达95%以上。酗酒现象也到处可见，特别是逢年过节时，趁伙食稍有改善，许多青年狂吃滥饮，伴之猜拳行令，真是一片乌烟瘴气。

2、为了达到回家的目的，许多青年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寻找各种途径，甚至不惜冒生命之危。近来，农场各医院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而真心实意治病则寥寥无几。多数人是来找病的，希望求到高明的医生，能从身上找出病来，以便能通过病退这一途径回到家乡。这样使医生正常工作受到影响。人员来往频繁，又使交通运输紧张。药品也浪费惊人。无病找病者，且不说就连那些确实患病者，为了保持病状，争取病退，有药不服，情愿痛。

人为的造病者，故意乱服药品，为病退创造条件，结果弄巧成拙，造成事故的发生，甚至丧失生命。此类情况，大家非常痛心，必须加以制止。从此例情况说明知识青年返家心切的夙愿达到何等程度。

3、由于知识青年思想波动不安，造成出工不出力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普及全农场。这种现象存在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

我不想再抄录下去了。

短短的几天，这封信如同蒲公英的带冠小果，高飞远扬。在我们的西双版纳地区，有的人奔走欢呼，有的人惊叹不已，有的人忧心重重。

短短的几天，这封信一下子搅动了农场平静的生活节奏。知青们谈论它，那股劲头比在文化大革命中传达“最高指示”还要迅速、热烈。

短短的几天，在那绿色长廊的油棕林、孔雀之乡的橄榄坝、大象漫游的小勐养；在农场那东倒西歪的茅草房里，长满杂草的农地旁；从雾气腾腾的黎明开始，一直到夜风凛凛的深夜，年青人们被这封信鼓动起来了。

可惜，我们的农场领导对此束手无策。他们还在认真的学习贯彻197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的精神：知青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他们甚至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可悲啊。

（5）“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

1978年12月4日（星期一）

丁惠民的公开信，使西双版纳的土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场风暴。

倾诉！

倾诉，一封信似一团火在燃烧。

倾诉，向党和国家最有威望的领导人诉说自己心中的话。

倾诉似火种，点燃了，扔进干柴里，可以燃起熊熊的大火。

十年了，这动乱的十年。

十年前，知识青年天真烂漫，头脑里的革命真理就是这样的简单：狂热的崇拜领袖，真诚的捍卫党。

十年前，毛泽东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一场在特定的年代中出现

的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了。

十年前，被革命的浪潮卷进深渊，曾经举起皮带、挥舞过棍棒的红卫兵们，从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大城市，千里迢迢来到这梦中最富饶美丽的西双版纳。

十年前，我们曾经做过许多“梦”，发誓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要与修正主义对着干；要用汗水冲洗灵魂，乃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成为最忠诚最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从繁华的城市来到了边疆农场，我们看到的是-------老工人们怀抱着一捆捆青草往手扶拖拉机的油箱里塞。就说是要给“铁牛”喂点吃的东西。

老工人拿着卷好的旱烟，对着第一次亮起的电灯拼命的吸，可就是吸不着。于是他们愤愤的说，还不如煤油灯好。

我们随手抛在地上的半截饼干，被一群光着屁股和脚丫子的孩子们争抢着。

我们的心在跳，血在沸。尽管住草棚、喝盐汤，我们感到这是创业的前奏曲，美好的远景规划一定会实现。尽管这里还是“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我们更觉得自己的肩头担子的重大。要改变它，用我们年轻人的汗和血。

我们在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与老农垦们一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批邓、追查天安门事件有关人员等等。我们开始对自己的信念发生了怀疑。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和老农垦们一起披星戴月，大干苦干，突击加会战。那些在五十年代时期种植的橡胶开割了。那些靠文化大革命所激起的狂热般的“大跃进”，不仅毁掉了万亩森林资源，造成西双版纳严重的水土流失，而开垦的荒山、种植的橡胶绝大部分在杂草丛生中报废了。七八年过去了，住的茅草房已经换了几次草顶，喝的盐巴汤仅仅是多了几片菜叶。我们洒下了汗和血，开始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

1976年的10月，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希望，光明。

十月的胜利似春风滋润着整整一代人干枯的心田。

然而，就像这千里边疆的崇山峻岭那样，一切都不是平坦的。总是有高有低的。两年过去了，在农场，在整个农垦系统，那些靠“四人帮”势力发迹的人还在发号施令。

有人哀叹：“这叫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也有人不服：“总有一天会算总账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云南省委的改组；坚冰一块块消融，航道渐渐疏通。

感谢我们的作家刘心武发表了小说《班主任》。

“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这呐喊猛烈的震撼着知青们的心灵。石红、谢惠民、宋宝琦，这些带血带肉的呐喊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小说时，我们围坐在广播喇叭下听着，有的掉下了眼泪。

知青，受到了“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流氓的强奸，留下的是耻辱。该奋起了。奋起固然很难，奋起和沉沦之间只有选择前者。沉沦等于堕落，奋起才能获得力量、新生、光明、前途。

丁惠民就是在这个时候讲话了，是代表我们千百万知青发出了怒吼！

（6)西双版纳各个农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

1978年12月5日（星期二）

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发表以后，我们东风农场的武装民兵加强了巡逻。农场的领导断定，这封信的产生与境外的敌人的破坏有关。保卫部门通宵达旦的进行工作，如临大敌。

在我们各个生产队里，就像两年前追查《天安门诗抄》那样，层层发动、揭发、检举、搜查丁惠民的公开信的抄件。

农场党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了三条指示：

1、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丁惠民的信在这个时候出现与境外国民党残匪的蠢蠢欲动有关。

2、不许传抄丁惠民的信，已经抄的必须将抄件上交。

3、各生产队党支部要抓紧对青年的管理教育，以阶级斗争为纲，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又要狠抓阶级斗争了。因为这是一抓就灵的。

事与愿违。1978年10月已经不是1968年的10月了。成熟代替了幼稚，思考代替了盲从。强烈的反抗呼声通过大字报、小字报、标语向我们的领导者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在连队，一场辩论会------知青：丁惠民的信怎么是与境外的国民党残匪有联系，这不是乱扣帽子吗？

领导：我们看问题要有阶级斗争的眼光嘛。

知青：宪法上都写着，公民有言论的自由，抄丁惠民的一封信有什么错？

领导：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党委的决议，不许抄就是不许抄。

知青：难道我们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信的权利也没有了？

领导：这是你们的权利。

知青：你们为什么不想想，这样的一封信会在我们知青中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

领导：这就从反面说明，我们要加强教育。信里面是污蔑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大好形势。利用青年不安心边疆，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坏思想，煽动闹事，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这几天，各种传说都有。

“丁惠民被景洪公安局抓起来了。”“丁惠民被开除团籍了。”“丁惠民被下放到连队劳动了。”“丁惠民又在给邓小平写信了。’“许多知青都去看望丁惠民了。“从丁惠民的第一封信开始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在我们知青中，丁惠民的信不仅没有被收完，反而越传越广泛了。不少人把信原原本本的抄好，寄给在祖国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在农场的各级领导中，也有不少的人很同情我们。

争论着、辩论着，这已经成为现在西双版纳各个农场压倒一切的中心话题。

（7）丁惠民的第二封信

1978年12月6日（星期三）

我看到了丁惠民的第二封信。特意抄录下来。

给邓小平副总理的第二封公开信敬爱的邓小平副总理，您好！

上个月写给您的信，不知是否收到。我们这些在边疆整整度过八个春秋的知识青年想要向您讲的话是很多很多的。虽然，我们要讲的问题有许多不那么愉快的。然而，您是尊重现实，讲究实际的，乐于听取并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上次只讲了极少一部份，仅仅开了个头。今天，我们把要讲的继续讲下去。同时，我们仍然怀着诚挚的心情和希望，等待着您的指示。

（艰苦的劳动场景）

一、上山下乡运动动员工作的问题。当时上海的方针是所谓的“一片红”。即不管本人是否愿意，家中是否困难，凡应届毕业生一律下农村。近者江西、安徽，远则东北、云南。在动员时，往往用各种变相的强制手段。不愿去农村的青年，大办“学习班”。名曰说服，实为强逼。父母兄弟也收到株连。什么不发工资、不安排工作等等。以夜以继日的车轮动员，敲锣打鼓，吹吹打打，闹得你昼夜不得安宁。连恐带吓，不择手段，直到你通了才罢休。于是红榜一张，户口一迁，车票一张，红花一朵，大功告成。但人心不服，怒气难消，只是出于无奈。重庆的青年大多数是被骗来的。当初招人时，一些云南的同志采取卑鄙的手段，编造各种动听的谎言，使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信以为真，纷纷来到云南。等真相大白时，已后悔不及。如今虽已事隔八年，但一提起此事，人们仍然怒不可及，愤慨不已。这些情况不知中央是否知道，这些极端错误的做法，给党的事业和威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家长、父母很失望，知青本身怨气冲天。当然，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但打到“四人帮”以后，这些问题仍未拨乱反正，造成的影响还未纠正和弥补。

二、经过十年时间的检验，知青上山下乡究竟有何利弊？我们听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事实真是如此吗？也许至今还有一些同志是这样认为的。然而，我们以八年来的亲身经历，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与体力的这三种差别丝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知青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进一步扩大加强了。这些年来，农业人口剧增，工业发展迟缓，除了“四人帮”破坏的主要原因外，知青上山下乡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不能不是一个因素。大量的青年从城市跑到农村，打乱本来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引起各种矛盾。而且，目前在各地农村的知青所处的思想和经济状况，都是极不稳定的。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决心在本世纪内赶上世界先进行列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把数量如此众多的青年放在农村，究竟对国家有何好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用什么方法来表现呢？是看农业人口多少吗？是喊上几句漂亮的口号吗？

三、从经济看，上山下乡同样是得不偿失的，不可取的。虽然，知识青年也在从事生产劳动，但实际上究竟有多少创造？拿我们农场来讲，国家用于我们的各项费用，超过了我们的实际创造。十年来，国家为知识青年不知化了多少钱，尚能将这笔钱用于工业建设，想必利非薄也！可是为什么有利而不图，偏偏要干人们不欢迎、经济上年年亏损的事呢？以前的就不说了，但今后还要这样下去吗？林彪那套“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的滥调已没人唱了。但有的同志还死抱“政治至上，理论至高”的看法不放。以为凡是理论上说的过去就行了，经济上受影响无所谓。这与当前的形势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其原因之一就是吃这种政治饭，不懂经济规律的干部太多了。我们坚持认为：第一，搞社会主义必须按照经济法则办事；第二，一切必须接受时间的检验，即使是真理也要不断检验。今天是正确的，到明天就不一定仍然适用。事物是不断发展，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凡是不利于实现四化的东西，应该坚决干脆的统统丢掉。

四、贫下中农和当地群众对上山下乡态度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些地方开始是欢迎的，但后来就不那么欢

迎了，甚至还闹起了矛盾。听说，有个地方的农民问起当地的知青：“当年我们是带着土地、耕牛入社的，你们现在带来什么？”且不谈这个传说是否真假，但从中可以看出些问题来。我们农场，大批青年的到来，虽然都有一双手，但也有一张嘴。由于各种原因，农场生活长期搞不上去，老职工生活比以前明显下降，当地经济也被打乱。农林副产品价格飞涨，附近村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少数青年侵犯民族利益，影响社会秩序，损害民族团结，给当地人民造成不良的影响。农场生产规模的扩大发生了与当地群众或集体生产队争自然资源的各种纠纷。总之，问题很多，引起了人们思想认识的逐步变化。

五、我们到边疆的这些年，实际上只不过干了各种笨重的简单的体力劳动。思想教育很少，有人还以此为满足。我们发现，农场并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少数干部横行霸道，欺压青年，做了不少坏事。上山下乡到底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好处？知青到底愿不愿意？人民到底拥不拥护？这些问题我们心里很清楚，有自己的看法。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认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上山下乡出现和积累起来的问题已经不少了，现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何去何从，我们听中央的！

顺便提一下，我们给您写信的行动，受到了某些干部的非难和威胁，我们希望自己的正当权力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信飞向北京。

知青们在等待。我预感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8）版纳知青写的诗

1978年12月7日（星期四）

我认真地抄录了知青朋友们创作的一些诗歌。有人称之为“版纳知青罢工请愿文艺”。是否妥当，另当别论。

或许是受1976年“四五”天安门广场诗文的影响，或许我们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或许是因为“有知识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当版纳知青开始罢工请愿后，短短的时间内，在西双版纳，这些被称之为“知识罢工请愿文艺”在广泛地流传着。

作品的艺术性高不高，暂且不作评论，但它是真实情感的流露。

作品的思想性如何，暂且不作评论，但它是我们在农场八年真实的写照。

知青们是如何看待这八年的农场生活的---

《农场实况》

冬去春来年复年，

八载已似二万五。

知青吃穿谁来管，

良心人道飞九霄。

白饭米汤充肌肠，

茅屋透天雨水凉。

捆绑吊打不为奇，

上梁投河宿阴曹。

有一首诗的题目很有趣《油啊，油》，从吃油的一点来反映知青的生活，这是我们的农场真实写照，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时人民生活的一个缩影---

《油啊，油》

大家都知道，炒菜要放油，油啊油，为了要点油，脑筋都伤透。

刚来一、二年，菜里没有油，我也根本不愁油，身上油水没干透。

过了三、四年，写信给父母，要点油水有道理，父母只当儿年幼，把菜泡在油里头，其实这里没有油。

五年六年探亲走，回家吹吹牛，云南有油不合口，需要带点家乡油。一带就是四五十，吓坏一栋楼。

七年八年难开口，编点鬼话骗父母，又怕父母愁，自己日子又愁过，要到几时好度愁，只想明年真有油。

那想日子如箭走，八年过去还愁油，伤透脑筋无路走，小孩正好是借口。孩子喜欢吃猪油，最后再骗一点油。

今年怎么办？想想没借口，九年以后再要油，提笔手发抖。年年回去刮，父母没办法，今天找阿姨，明天求舅舅，谁知家家都作难，尽有儿女在外头。

油啊油，真叫人发愁，如果炒菜不要油，省去脑筋多少愁。可惜人啊不同牛，吃菜还得放点油。刮也刮了油，骗也骗了油，求也求了油，今后哪里再搞油，哪里再搞油。

谢谢连队里的知青朋友向我提供了这些出自于我们知青之手的诗词。

（9）一个知青的遭遇（一）

1978年12月8日（星期五）

今天，同一连队的重庆知青王远成向我讲述了他在农场的遭遇。我认真的记录下来，可以说简直不相信。但大家告诉我，这是真的！

（这是当年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的重庆知青于2006年7月8日的聚会留影。最后一排右边穿红T恤衫的那位就是王远成。）

我叫王远成。是四川省重庆市知识青年。一九七一年七月，我来到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工作。

一九七二年三月，我调到十五分场一队。刚刚安排好住宿，支部书记葛××就来催我上班。一天，我因为没有工具，没能完成任务，回到队里，被排长××打了几个耳光。当时，我一下子惊呆了。支书葛××知道后，下令不许我吃饭。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凭什么不给饭吃，凭什么可以随便打人。我不敢说，眼泪只好往肚子里淌。第二天，我没完成任务，又遭到毒打和不给我吃饭。我想不通，横下一条心：逃。于是，我就和同学曾××一起逃出生产队。

——亲爱的同志们，也许你不相信吧，中国的大地上会有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年月里，这种事又有什么奇怪呢？耳光、拳头、不给饭吃，这就是“再教育”。在西双版纳各个农场中，何止王远成一人！他逃跑了，能跑到哪儿去呢？以后，等待这位年青人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我一直跑到景洪农场十分场，就被葛××派人抓住了。我被带到连队的文化室（即农场生产队开会的会场），里面有十几个人。他问我：“你懂不懂党的政策？”我点点头。葛××说：“那你把写反动标语的事交待一下。”我说：“我没有写！”葛××就说：“你不承认，以后就不要怪我了。”说完，他就离开了。他刚一走，那十几个人就一拥而上，对着我一阵拳打脚踢。当场把我打倒在地，打得我遍体是伤，鼻口流血。这时，葛××又走了进来说：“只要你承认了，就没事了。他们也不会再打你了。”我想，先承认了吧，躲过这场灾难，以后再向上级反映。领导上总不会乱冤枉一个人的。于是我就说：“我写了反动标语。”谁知，我一承认，葛××就下令把我捆起来，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整整一夜啊，这是多么难熬的一夜。思来想去，我下了狠心，还是要跑！跑回重庆去，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去。第二天，我乘着看守的人不注意逃走了。还没等我逃出农场，就又被他们抓住了，便说我是企图“叛国投敌”。

那时，我的罪名是“写反动标语”、“叛国投敌”。我才十六岁啊，我从小长在红旗下，出身在工人家庭，志愿来农场，我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祖国、父母、兄妹而去做一个可耻的叛徒呢？他们为什么要凭空捏造我写什么反动标语呢？

当我被抓回生产队以后，葛××亲手把我反绑起来，吊在蓝球架上，脚下垫一些砖。然后，他使尽把砖一脚踢开，使我全身悬在空中。烈日无情地烤着我，汗珠子似雨点般地撒落在地上，手已麻木了……我绝望了，感到一切都完了，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说：“我写过反动标语，喊过反动口号。在学校的时候就写过。九·一三事件后，我紧跟林彪……。”葛××问：“你是什么思想支配下写反标的？”我说：“我不知道。”又是一记耳光，一阵拳头。

葛××说：“你干反革命的事，就是反对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示，从怕苦开始变为对社会主义不满。”葛××下令把我放下。这时我的双手已经全麻木了。葛××用八号铁丝做成一副“手铐”、“脚镣”，把我的手和脚铐起来。然后他用钢丝钳用力拧这副土“手铐”。一个人拧不动，换一个人来拧。直到把铁丝夹进我的皮肉里，血一滴一滴地流下来为止。

——这究竟是云南西双版纳的国营农场还是中美合作所？这位重庆来的知识青年，从小就戴上红领巾，他只是从电影上小说里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旧社会的暗无天日。从懂事开始，爸爸告诉他，要不忘过去苦，珍惜今日甜。妈妈希望他，好好学习，为工人阶级争气。教师上的第一课是“东方红，毛主席”。对这样的青年，为何如此残忍？可惜在当时，农场基层干部还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最忠诚的捍卫了革命路线。

（10）一个知青的遭遇（二）

1978年12月9日(星期六)

葛××打累了，便用电线拧成的皮鞭，交给他十岁的儿子。他儿子也挥起鞭子朝我狠心地打来……

从此，我成了一个没进监狱的囚犯。每天从早上六点起床就上山劳动，一直要干到晚上十点以后。每天只给吃八两饭，每顿饭只给三分钟时间吃。有时，在中午强烈的阳光下，他们把我捆起来，吊起来打。我要喝一口水，他们不给。我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到厕所粪坑边的小水塘里喝几口水。每天休息时，我的手脚全被绑起来，我要上厕所，他们也不松一下。我只好跳着走，跳到哪里，脚上的血就流到哪里。就说吃饭，他们不给碗，我只好用芭蕉叶当碗，草棍子当筷子。后来，有一个好心的同志偷偷地送了一只碗给我。我每天劳动回来就要写检查，一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我的身后每天有两名持枪荷弹的民兵。大大小小的批判会，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我决心跑！

乘他们不注意，我又跑了。为了防止他们追捕，我先跑到深山里住三天。这三天，我一粒米也没吃。每天，到了天黑，才悄悄溜下山。吃几口山泉水，找几个野果子。从西双版纳到重庆，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却整整走了一个月。沿途，见汽车就搭一段路，见到车上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东西，饿得实在慌了，讨一口饭吃吃。夜里，在旅馆

门口躺一下。这样，我怀着满腔的仇和恨，怀着对故乡，对父母的无限思念，怀着要伸冤、报仇的决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山城。

－－山城，你哺育了英雄的儿女。两年前，你的儿女豪情满怀的地向你告别。两年后，你的儿女遍体是伤地来向你报到了。这千秋功罪啊，山城的山，山城的水，你快想吼一下，你快说句公道话啊！可那时“四害”横行，又有谁来“救救孩子”呢？

我到家后才得知父亲住院了。我急匆匆地赶到医院。父亲是那么苍老，也许这是思儿留下的痕迹；父亲是那么憔悴，也许这是盼儿留下的印记。他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紧紧地把我搂抱住了。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父亲看见了我额头上的伤痕，他挣扎着直起身子：“孩子，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说！你为什么不说呀？”我为什么不说呢？爸爸，原谅我，我多么想告诉你，把心中的苦水倒出来，可你的身体……

在亲人面前，我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恨和冤。

这一切来得是这么突然。父亲哭了。从我懂事开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而且是那么伤心。

父亲紧紧地抱住了我，似乎怕我逃走一样。他用颤抖地声音吼叫着：“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写信来告诉我。”父子俩抱头痛哭。父亲说：“孩子，你受苦了。你不要再去农场了。没有饭吃，全家吃稀饭也要养活你。”可恨那个葛××，见找不到我，便写了一封信到我父亲的厂里，说我是反革命分子。为此，使父亲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了压力，病情一天天恶化。葛××不仅害了我，还要害我父亲，这一切是为什么？

－－在十年动乱中的这个“上山下乡”。在中国的历史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像王远成这样的知识青年却经历了艰难的岁月、痛苦的岁月、带血的岁月。历史将是一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它在给每一个人作出最公正的判决。这判决包括“接受再教育者”和“再教育者”。这千功罪啊，该怎样来评说呢？

（11）一个知青的遭遇（三）

1978年12月10日（星期日）

一九七三年，党中央发出21号文件，解决上山下乡中的一些问题。葛××来信叫我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我想，有中央文件，我不怕你葛××再来欺侮迫害我。我说服了父母亲，又回到了农场。

但是，一切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一回到生产队，葛××就派人持枪把我看押起来。接着就是一顿毒打。我回队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葛××给了一第像从水里捞起来的湿被子。我就在这湿被子里睡了三个月。

我上当了。这是叫我“抓革命、促生产”吗？这是在“落实党的政策”吗？我一个月劳动下来，只发给我一元钱，其余都被扣除了。为什么扣，我不敢问。我上山劳动，用力过猛，把锄头把挖断了。回来后全队开批判大会，罪名是“破坏生产”。又比如，集体食堂分肉，其他同志两斤，我只能拿一斤；分鸡蛋，大家两个，我一个。因为我是“反革命”。……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我先后逃跑过五次。每次抓回来，都被打得头破血流……

在农场几年，我总是个坏人。从七六年开始，我又成了什么“社会基础”。那时搞“批邓”，葛××在全队大会上说：“批邓要上挂下联。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王远成紧跟。他们是一条线上的，唱一个调。王远成要翻案，翻不了的。我葛××在一天，哪个也别想从我手中把权夺去。”而到了今天，葛××又在全队会上宣布：“王远成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然后，大会批，小会斗。

——据了解，在这个生产队（约六、七十人）中，像王远成同志这样的遭遇，有十几个同志。有的甚至被打伤，留下终身难忘的伤疤。试问：有什么理由说丁惠民信中说的不是事实呢？

七七年，我接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拿着电报找葛××请假，他百般刁难。一会儿说：“场部领导不批。”一会儿说：“你探亲假期还没到。”一会儿又说：“你只能请事假”。我苦苦哀求，他置之不理。我心急如火，他冷若冰霜。一天又一天，时间过去了，可我还不能回重庆。我只好找场部领导，得到批准后，急匆匆地踏上归家的路途。这是我来农场六年的第一次探亲假。这第一次，来得多么不容易啊。

当我回到家，我惊呆了：父亲去世了。

我哭着叫着：“爸爸，我回来了。”可他老人家再也听不见我的呼喊了。我恨啊！要是葛××及时批假，这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最宝贵的一面，我完全可以见的。可今天呢？望着爸爸的遗像，捧着爸爸的骨灰盒，我哭着，叫着。我的命啊为什么这样苦？

妈妈说：“爸爸一直在等你，可你……”

哥哥说：“爸爸的死和你的事有关。你们农场领导写信给他厂里，说你是反革命……

我哭啊。我诉不尽心头的冤和恨。我叫着：“爸爸，我对不起你！爸爸，你原谅我吧……”

哥哥告诉我：“爸爸临终时说：‘我是等不到远成回来了，我快死了。一定是他又碰到麻烦事了。我见不到他，死不闭眼。我死后，就是对他放心不下。为什么党的政策在农场得不到落实啊！唉，我死了，这孩子更苦了。”

王远成调到我们8队后，断断续续听他讲起过这些经历。当然，在云南知青还没有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奋斗的时

候，大家只是悄悄的说一些。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敞开心扉大声说话了。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啊。

好几次我想哭。为我们的知青，为我们的命运。好在王远成和我们一样，最终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好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它决不可能在重演。

一股地下的烈火在奔腾着！

今天的西双版纳发生的一切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未完待续）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大返城的日子里・二】：

（12）知青工作会议给我们带来什么？

1978年12月11日（星期一）

今天，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了。老实说，我们都感到很失望。这几天，知青们愤怒的情绪到了要爆发的极点。

云南农场的知青已经开始罢工了，请愿了。而我们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却一点反映也没有。还是重弹一些在“文革”中常见的老调。当然，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定的事，要改变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四十条》中有这样的话：“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照顾范围。”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是很混蛋的。他们恰恰忘记了农场的知青是从城市里来的。如果是知青，就有回城的权利。一纸文件就可以为我们定了终身吗？

中央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农场的知青将转正为正式农场的农业工人,今后的待遇是国家农工待遇,不再是知青身份.这个文件有将我们农场的知青打入18层地狱的感觉,这样的感受“插队”的知青是不会有的，因为他们大部分已抽调进城市,没有被抽调的少部分国家将另行安置.而我们那时已经下乡快10年了。这样的文件对我们而言简直是噩耗.难道非要我们云南知青痛恻心扉的集体上访和后方绝食卧轨的大行动才能让中央在忙于百废待兴中回眸注视这群被历史遗弃的流浪儿,才痛下决心彻底解决。这对我们而言是转变命运的关键。我们也应体谅国家的难处,我们这代人出生就是以人口爆炸的形式来到这世界,因此伴随着我们生命中的坎坷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开会期间，西双版纳的知青已经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知青上山下乡的不满的情绪。我看，关键是各级领导还是处于一种无所谓的精神状态中。满不在乎的结果是要吃苦头的。

这不，酝酿已久的知青罢工请愿的浪潮开始了。

（13）知青们写的诗

1978年12月12日（星期二）

• 如果说《油啊，油》这首诗以点带面般地反映了知青的生活，那么下面摘抄的一首诗歌则简单明了地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知青在农场的生活，反映了“四害”横行期间农场的状况---

《今日农场》伙食----白菜米汤不为常，茄子可烧汤。南瓜煮煮一顿菜，死猪人也抢。

住房----茅屋顶上见月亮，四周到处可乘凉，大雨一下满屋湿，赛如泪水呼爹娘。

劳动----锄头砍刀命中定，八年时光它为伴。只见劳动无硕果，汗水得来是凄凉。

雨季----版纳不分春与夏，每天雨来湿淋淋。规定下雨也要干，生病之时谁来管。

旱季----赤日炎炎似火盒，三十八度不为奇。烤得头昏不敢躲，口号之声要大干。

病假----请假如求佛，包裹送前头。小病请假你得笑，大病请假你得哭。

坐车----乘车一次不容易，身贴身来背靠背。车子不翻算命大，要么只好炼脚筋。

过节----每到佳节肉一斤，几天之内由你定。馒头饺子全靠它，客来另得动脑筋。

文化----电影几周放一次，小说连队找不到。闲谈蜚语一夜过，扑克噪声震星空。

官人----小车一溜烟，楼房沙发椅。轻按后门钮，招财有权术。

这就是我们的西双版纳农场。发牢骚、咒骂又有什么用呢？知青们不满足写写这些农场的“镜头”了，他们把镜头对远了。有这样两首诗写道：

《上山下乡》

“革命”十年国灾深，

内府夺权共知明。

失业否能扬出外，

只有上山下乡来。

千万青年担国祸，

尝尽人间苦难处。

指望三五能有置，

八载依旧原地徘。

《变相》

六十年代去镀金，

七十年代变劳改。

根本方针谁制定，

历史无情作鉴定。

违背人心人民反，

一朝一代有见证。

十年之错无人纠，

共声诛讨声更高。

（14）“知青北上请愿团”诞生了。

1978年12月13日（星期三）

罢工！

知青们终于等不及了。我们选择了罢工这条路。

这就是我们农场的一幕------知青们每天吃饱了饭，三五成群的涌向农场场部和景洪县城，打听来自各种渠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消息，谈论这罢工后的结局。随后就三三两两的回到自己的生产队。

干部们每天泡在伙房里把三餐饭要烧出来。他们再也不去叫我们上班了。他们知道，这一切是多余的。不把饭烧好，说不定是要挨揍的。

老工人也开始活跃起来了。五八年从湖南省支边来到云南的人串联起来，也要学着知青们回老家。

你可以经常听到哪个连队的人把锄头砍刀烧掉了；哪个连队的人把能跑的猪全杀了；哪个连队的人把住的草房全烧掉了。

农场每天的起床号不响了，拖拉机不动了，橡胶林安静了，晚上再也不开大会了。

一切仿佛在发生变化。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知青们感到不能再等待了。我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走出了第二步-------北上请愿！

到北京去告状！

“西双版纳地区知青北上请愿团”诞生了。

请愿团的团长理所当然是丁惠民。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我们知青的当然领袖了。

参加北上请愿团的代表是民主产生的。代表的条件是必须出生是红五类的，敢于斗争的。据我的一位朋友解释，这是为了斗争的需要。至少说明我们的行动是没有人操纵的。

西双版纳地区的五万知青第一次当家作主，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在有序的进行之中。没有强迫的命令。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当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奋斗时，一切将是很有秩序的。

（15）请记住这些知青战友

1978年12月14日（星期四）

我看到了一份名单，这是西双版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全体人员。

我们要记住他们。这是需要勇气和毅力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他们是为了我们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在抛弃自己的一切。历史将不会忘记！

丁惠民　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

刘先国　景洪农场十分场七队

朱一平　景洪农场十分场三队

黄有志　景洪农场机务队

谭德超　景洪农场十分场十队

李长寿　勐腊农场七分场二队

邹盛永　勐腊农场六分场六队

赵国富　东风农场十三分场三队

王庆　勐腊农场二分场六队

郑国芳　东风农场十分场三队

熊占国　勐棒农场三分场三队

胡寅康　勐腊农场二分场基建队

凌正龙　勐腊农场七分场二队

潘方林　东风农场七分场十队

张秀英　勐棒农场八分场副业队

孙炼　勐腊农场六分场基建队

朱德昆　东风农场七分场六队

瞿荣志　勐腊农场六分场基建队

顾新华　勐腊农场四分场基建队

李万云　东风农场十分场八队谢继红　勐棒农场一分场二队

陈允龙　勐腊农场八分场筑路队

邱亚德　东风农场十五分场五队

赵兵　勐腊农场八分场六队

刘桂英　东风农场九分场四队

刘胜　东风农场九分场二队

曾永庆　勐棒农场六分场十三队

西双版纳的五万知青不会忘记丁惠民起草的这一封请愿书，有10041名知青在上面签了字。这场签名活动是自愿的。由于交通的原因，许多生产队的知青们还来不及签字。应当说，这份请愿书的拥护者是五万知青。因为，这份请愿书所到之处，知青们是争先恐后的签字。

（16）请愿书

1978年12月15日（星期五）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们壹万另肆拾壹名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已达八年之久的今天，奋起全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出有全权资格的代表请愿团，前来北京您们递交这份凝集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火热信念的请愿书。这或许是一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社会是多么不公平啊。同样一代人，同样是知青，命运却截然不同；有权有势的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了，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普通的工农子弟，像一堆被人抛弃的东西丢在这里，连过路人不屑一眼，疾苦痛痒谁人过问？为了回去，有人不顾一切；女孩子被迫出卖自己的纯洁青春，有人像禽兽一般地蹂躏她们；男青年不惜一切断肢断手，自毁前程；这难道是编外的神话吗？不！这些事例在八年生活中，我们看够了，听够了。血淋淋，凄惨惨，令人悲，令人愤。沉重的

劳动，缺少油盐的饭食，枯燥无味的生活，望月思念的热泪，它充满了这整整八年的光阴。有多少人挨过领导的谩骂、干部的拳脚，无情的棍棒、狠毒的枪托……这一桩桩一件件充满了我们多少青春的血和泪。问一问，哪一个青年没有一肚子苦水帐，想一想，一切的一切为什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我们害的好苦啊。是这几条野兽用他们恶毒的爪子把我们推向死亡的边缘！对林贼一度狂吠的“变相劳动”成为现实。这八年的青春，要向“四害”讨还！这八年的怨和仇要向他们清算！万恶的“四人帮”是我们知青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我们仰天长叹，失去的青春再也不会重复的了，迷茫悔恨交织着我们的心房，激烈着我们的热血。千刀万剐“四人帮”也难解我们的深仇大恨。八年的岁月中，我们辛酸多于甜蜜，愁云多于笑容，痛苦淹没了幸福，这是多么难熬的八年！父母的眼泪、斑白的头发，儿女的悲伤、思亲的惆怅，千里赶云，望眼欲穿。莫非人间真有“望乡”崖？遥望银沙喜鹊的搭桥，牛郎织女有个相传，可是我们知青啊，何时再能回到父母的膝下……

喜鹊报捷了。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拯救了人民，挽救了党。我们敬爱的邓副主席也出来工作，知青总算盼到曙光。“四人帮”一手布下的乌云驱散了。我们欢笑，我们等待着……一年、二年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会议一个一个开过了，可是知青问题却不见动静，音讯杳然。八年还不够吗？人生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剩二、三年了，还能无端地消磨下去吗？上了三十岁还能多大指望。“四人帮”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没有染指吗？毛主席关于接受再教育的指示，我们是拥护的。但是具体执行的方法，到底是对是错？我们不明白，中国这么多的地方，为什么只有农村才是我们这批人的归宿呢？难道再教育就是用八年来所进行的笨重简单的劳动来表现和实现吗？我们要提的疑问太多了。八年的苦水一下子也诉不完，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过多地重复辛酸的历史只能给人带来悲伤和忧愁，而这两样东西对我们这些在农场八年的人来说，已经够了。如果中央认为以前上山下乡的具体执行方法是错误的话，请赶快为我们拨乱反正。八年了，父母的泪快要流尽了，我们肉体的青春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的身边吧！我们可以干最脏的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但只要回到父母身边，再苦也是甜的。

恳求中央早日决策！

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丁惠民执笔1978年12月3日云南版纳地区一万零四十一名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等知青签名

这里，我不作任何的修饰（包括因历史原因，有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全文地抄录下来。历史会对此作出公正的评价。

我想，这或许是全国知青们的心声吧！

（17）知青的心声

1978年12月16日（星期六）

连日来，知青们的情绪达到了沸腾的顶点。各种议论交织在一起。我记下了大家的议论。（为了预防不测，我不能写下大家的名字）

A:我们真可怜。八年了！人生有几个八年？人生有几个青春？我们这些知青啊，文不像李白、杜甫，武不像关羽、张飞。我们上山下乡为国家承担了困难，现在，八、九年过去了，粉碎“四人帮”也快两年了，这困难就永远要我们来承担吗。

B:毛主席说要我们接受再教育，说我们是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最近，报纸上又说，他老人家说十七年是好的。这叫人如何理解。现在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为啥我们知青的问题就不能波乱发正。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开了，对我们来说顶个屁用。陈永贵说的话真是胡说八道。

C:农场八年，天天菜汤泡饭，还不如劳改犯。农场的生活没搞好，能怪我们知青吗?我们流了八年的血和汗，换来的是一日三餐盐巴汤。是的，现在有饭吃了，比旧社会好。那么我们就该永远的吃盐巴汤吗。还要干什么四化？我们受骗了十年了，好话空话我们不要听了。我们现在要看到实际的东西。什么增加工资、什么婚后有探亲假，我们统统不要。我们只有一条路，回家乡去！

D:中国的天，中国的地这么大，却没有我们知青一点门路。不怨天，不怨地，只怪父母没长征。否则我早就离开农场了。有的人可以办病退、顶替，我一样也轮不上。没门路啊。你再看看那些农场的干部，一个个叫我们安心农场，而他们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城市和工厂。唉，更何况更大的干部了。

E:我们承认，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但是，就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这件事，他办错了事。文化大革命好不好，不要去问老干部，就来问问我们知青吧。我们这批人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不要说别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早就上大学了。

F:建设边疆，人人有责。就像爱国卫生一样人人有责。为何非要我们这些人背靠城市，安心边疆？八年了，该想想我们这些人了。谁叫我们知青回家乡，我就喊他万岁。

G:我都27岁了，还没有一个对象。姑娘们纷纷到外面去结婚生孩子了，为的是离开农场。我呢，只好当光棍了。谁不让我们回去，我就去找他的姑娘当老婆。我真想去刷一条标语：“是谁剥夺了我们婚姻自由------上山下乡！”落款是知青光棍队。

H:有的人发了知青财。从我们知青身上捞了油水。这帮子贪官实在是可恨。这些农场的土皇帝你能得罪他们

吗。我们这儿是“天高皇帝远”。是土皇帝们无法无天的世界。

还有许多许多。

这就是人心啊。

(18）父亲可以平反了

1978年12月17日（星期日）

在上海探亲时就得知中央对右派问题将要有个说法。今天，报上说中央已经作了决定，为错戴右派帽子的人平反。父亲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这个困扰我们家庭多年的阴影终于被驱散了。感谢邓小平同志，从心里感谢他。我想，毛泽东又欠下人民一笔债。我真的很想快些回去，与全家分享这个快乐。

（我在傣族的竹楼上留影）

多少年了，为了这个出身问题，我和弟弟是吃尽了苦头。现在想想也是“好事”。至少我们都夹紧尾巴做人了。当我知道父亲是右派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父亲始终没有一点怨言。因为，从小他就是个慈祥的父亲。我不相信他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真不知道那个年代是会如此的混乱和可悲。

明天，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团就要出发了。今天，我搭了便车来到了景洪。就是想亲眼目睹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19）北上请愿的一幕

1978年12月18日（星期一）

让我详细地追述西双版纳地区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的全过程－－－

在写有“云南省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字样的一面红旗引路下，西双版纳地区的知识青年开始了艰难的北上请愿的征程。

上午九点，请愿团出发了。

景洪农场场部里人山人海，知青们排列在大道的两侧目送着自己的代表向前向前。没有人来组织，一切是自发的，但又是那么的有秩序，一种相同信念的力量使这些年青的人汇聚在一起，进行着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行动。

请愿团的大旗下，十辆自行车为先导，在人群的簇拥下缓慢地前进着。不知是谁带头唱起了《国际歌》，一瞬间，这歌声在景洪县城上空回荡着。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队伍来到了县城街心花园。代表们进行了告别演说。

“……

我们的任务是：

1、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代表团全体成员一律步行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代表云南知青向敬爱的周总理献上我们的花圈。

2、要求有关部门安排代表团前往毛主席纪念堂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花圈在，寄托我们深沉的哀思。

3、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当面递交请愿书。如尽到最大努力未能达到上述目的，请愿书可委托其它中央首长移交，但其身份应是政治局委员，这一点是明确无疑的，任何人无权另作更改。

4、口头汇报云南知青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央派工作组下来调查情况，直接听取广大知青的呼声，实地考察知青的工作、生活、思想等等方面的状况。

我们不达目的，誓不返回！”……

“请大家放心，我们既然是大家信赖的代表，我们决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八年了，这辛酸的泪、这带血的事实，我们一定报告给中央。我们一定要回家乡去……”有的代表慷慨激昂地说的流下了眼泪。

有的代表高举起写的血书来表示决心。

有的代表和大家一一拥抱告别……

队伍又缓缓地向前走去，沿着县城的大道，一直走到兰沧江大桥。

“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同志们！请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51名代表出发了，他们唱起了由请愿代表团团长丁惠民作词的《请愿团团歌》。

迎着寒风坚决北上，任重道远无尚荣光。

我们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不畏艰险誓死北上。

我们要见华主席，八年的苦水要倾诉。

我们要回家乡去，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北上北上坚决北上，肩负数万知青愿望。

我们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团，宁可坐牢也要北上，

八年的冤恨要昭雪，我们要回家乡去，要为四化贡献力量。

望着他们搭上一辆货运卡车远去的身影，我衷心祝愿大家一路顺利。

据说他们于当天晚上九点二十分到达了思茅！

（20）扎根运动

1978年12月19日（星期二）

今天，我在回连队的路上遇见了我们十五分场的风云人物-----肖xx。这使我想起了诞生与我们分场的“扎根运动”

那是在197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有一天，一位知青说了一句话：“我们人都长大了，现在该懂事了。”

这是一句极其普通的话。随着知青年龄的增长，我们确实懂事了，也该懂事了。懂得了正确与错误，懂得了理想和前途。就是这句话，被当时担任十五分场七队支部书记肖xx听见了。于是他就导演了一场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闹剧。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农场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开始了。肖xx站在全队的前面，亮着大嗓门吼道：“在我们队里，阶级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有人说，人大了懂事了。懂什么？我看，这些人是受了阶级敌人的挑动，就是懂了不安心农场，想要溜了。”

接着又是党支部会议、团支部会议，层层布置，下令要批判这句话。

真是啼笑皆非！

于是，知青们你抄我，我抄你，应付一下。大家给这句话上纲上线，然后一一表态：“人大了，懂得了要把农场建设好。”

事情也很凑巧。就在这时，一位昆明的知青因为家庭困难，按政策可以回家了。调人的公函也来了。肖xx马上

找这位青年谈话，劝他不要回昆明。然后，他又找了几个团员，叫他们写一份决心书，要扎根农场一辈子。他还叫那位昆明知青也签上名。

事情没有完。肖xx马上跑到分场党委那里，振振有词的开始宣传他的功绩--------

“最近，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在我们党支部的领导下，抓住队里个别人讲什么人大了懂事了这句话，开展了大批判。知青们回答的好，要扎根边疆一辈子。”

“好！”党委的领导大为赞扬，决定马上树起这个典型。

在东风农场，这个七队的十七名知青一夜之间就成了新闻人物。

在肖xx的授意下，这封决心书加上了三条：

1、上大学，不去。

2、招工，不去。

3、参军，不去。

好家伙，上大学、招工、参军都成了不扎根的罪名。

左，一切都在左的发狂。

所有知青都要填一张表，要写上决心扎根的话。犹豫者，教育。对抗者，批判。

而这位肖xx因此升任分场的经营办公室当主任了。

一时间，数不清的决心书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假话，谁越说假话就月能红的发紫。当年签名的知青们，今天已经开始了觉醒。

我真为肖xx们可怜，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

(21)一份勒令书

1978年12月20日（星期三）

我们在焦急的等待北上知青请愿的消息，农场所有的人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时而，干部和知青之间发生了磨

擦和撞击，爆发出一些小的火花，星星点点的。从北京和上海探亲回来的知青又带来了西单“民主墙”、上海人民广场的消息。那些根本就没有听到过的奇闻，包括对毛泽东的重新评价在知青中交流着。这些就像一把把火，把农场中已经撞击着的星星点点的火花点燃了。

在我们东风农场的一个生产队里一天突然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勒令

本人在农场八年了，受尽了各种折磨。现在我勒令：自现在开始的24小时内，凡是欺压过我的干部，必须向我赔礼道歉，低头认罪。否则，一切后果均由自己负责。

Xxx

很快，我们的一些农场的干部们，从生产队到分场和总场的领导们，一个个排好队，登门向这位知青来“赔礼道歉”，来“低头认罪”。

“我过去错怪了你，开批判会主要是上级的要求，请你原谅。”“对不起，两次没有探亲，卡了你。现在就批你回家一趟，两次假期给你补上。”“是我官僚，没有想到队里的干部这样对待你们，我的工作没做好。”“我打了你，向你赔不是了。”等等，等等。

在这股强大的冲击波面前，知青们似乎扬眉吐气了。好像第一次感到“自我的存在”。而那些农场的干部却是束手无策。八、九年了，“左”的那一套发号施令都习惯了，有的人就是靠“造反”起家的，整人的时候心狠手辣。而现在，轮上自己了，害怕了。

一切似乎在颠倒。

“揍这帮土皇帝们！”知青们开始发泄了。于是，一切开始更加混乱了。

（22）我们的王场长的家被冲击了

1978年12月21日（星期四）

这是我的一位知青朋友讲给我听的事------我们东风农场的王文希场长的家被冲击了。

那一天，在橡胶林间的小路上，一支近百人的队伍，随着手电光的闪现在行走着。人声喧闹，使宁静的夜间顿时热闹起来。

“这回非要他说个明白。”一个粗狂的声音：“这个老家伙说，只有我王xx不死，你们知青就一个也别想回城。他口气不小，非要教训他一下！”“对，揍他。”“老子调回去的公函就卡在他的手里，害得我至今还不能回

去。这口气不出，我死不瞑目！”“快走啊，别叫他跑了。”他们很快就来到了农场的场部，把王场长的家包围起来了。

敲开门，人不在。

场长的夫人惊呆了，不知所措。

知青们涌进屋内。询问声，怒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把场部宿舍里的人都吵醒了。只有几个干部出来看了一下。胆大的上来劝了几句，但很快就被知青们骂了回去。

“瞧，这红灯牌收音机肯定是谁烧的香。这个贪官！”“还有缝纫机。”“那么多的油？”几个知青从厨房里搬出几口大缸，里面盛满了油。这一下，他们被激怒了。

“我们天天喝盐汤，他却藏了这么多的油。这个吸血鬼。”“这油还不是从我们身上榨取的。”“咚”，“咚”。随着木棒的敲击声，这几大缸油哗哗的流满一地。知青们把收音机、缝纫机、棉被、书籍统统丢在地上，有的砸坏，有的浸泡在油里，有的扔到窗外。

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扫四旧”那样，知青们在怒骂声中扬长而去。

西双版纳的农场瘫痪了。

空前的大混乱。

（23）终于得到北上的消息

1978年12月22日（星期五）

通过朋友的帮忙，我在第一时间得到了丁惠民他们北上的消息，而且是书面的文字稿。抄录如下----（我们要回家）

1978年12月19日代表团团长宣布休整一天。

上午，丁惠民召集全团开会宣布纪律1、一切行动听指挥。代表团成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允许脱离集体自我行动。

2、有事必须请假外出，外出两人以上同行，请假时间不许超过三小时。3、在外期间，除与当地组织、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正常和必要的接触联系外，代表团成员均不得与其他任何单位、个人发生接触，包括外国侨民。

4、在外期间，绝对不允许参与和加入当地发生的一切事情。绝对不允许对这些事情发表任何评论和看法。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坏人利用。在京期间的外出活动，要尊重有关部门的安排。

5、递交请愿书后，代表团立即返回云南。向周总理献花圈的活动可酌情提前进行，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外停留。往返途中不准任何变相的游山玩水。代表团返滇后，要将整个在外期间的一切活动向全体知青作详细汇报。任何违反上述纪律者，一律取消代表资格，不予任何宽恕或悔改机会，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往返车旅费的由本人自己负责。

北上请愿团的知青们对自己的组织进行了调整，成立了纠察组、宣传组、写作组，安排了秘书长、财金员、卫生员。

当天下午，云南省农垦总局╳副局长、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副局长和两位秘书来到北上请愿团的住地，同丁惠民等人进行了交谈，听取了知青们的意见。

晚上，思茅地区的一些国营农场知青团讯后赶来看望丁惠民，并且希望代表团能到他们那儿做些宣传工作。

1978年12月20日凌晨五点三十分，代表团出发了。没有车，他们在雾蒙蒙的公路上步行着。天很冷，大部分人都穿的很单薄。他们一面走，一面浑身在发抖。

从思茅镇出发，走了约三公里的路，他们搭上了一辆开往普洱的货运车。货运车无遮无掩，在浓雾和寒风中飞速行速，一部分知青代表们被冻得脸色发青，手脚麻木。到八点左右，他们到达了普洱县城。

再向北，天气将越来越冷了。几位负责人一商量，决定买些白纱布和棉絮，等到了北京以后做棉背心和棉裤套。于是，他们在普洱的商店里了买了三面七十二尺白纱布，二百一十条小棉絮，又踏上了路程。

再搭一辆车，到了墨黑。34公里的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十点，他们再也等不到车了。全体代表就在墨黑城外的公路两旁排队坐下，耐心地等车。每人发了一个甜馒头，作为一顿午餐。到十二点四十分，又搭上了开往通关的车，于二点三十分到达通关。

还要继续前进。

他们来到墨江林业局的路口等车。一直等到三点四十分终于又搭上了开往墨江的车。一路颠簸，于六点到达墨江。

一天，四次换车，走一段停一段，行程二百二十公里。

晚上，在丁惠民的主持下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让一部分返回农场，由丁惠民给这些人写了一张“因代表团人

多经费少，行动不便”的证明。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我们不能忘记啊。

（24）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8年12月23日（星期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公报发表了。

我仔细的阅读了全会的公报。有这样几点体会：

1、从现在起，阶级斗争终于结束了。主要的方向是搞经济建设。这是一件大好事。这十年，我们七斗八斗，结果是民不聊生。邓小平的功劳在这一点上就是大。

2、实事求是的提法再次得到了重申。我感到这一条很重要。就以我们知青的问题来说，如果实事求是的去解决，也不至于闹到今天的地步。但是，要真真做到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很难的。特别是在经历十年的“文革”后，我看农场相当一部份的“土皇帝”们的思想是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还是老一套。难啊！

3、平反的问题。这次全会对一大批老干部的错案进行了平反。事实上，这十年来有多少事是如此荒唐。再追述上去，一直到反右，老人家做了多少错事。不能把一切都说成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事。许多事没有老人家的点头，他们也不敢干的。我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可以得到平反了。对于这一切，我从心底里感谢邓小平。

每天无所事事，也很难过。家里来信说是我可以顶替父亲回上海进厂工作。父亲已经填表了。看来，我们终于可以回上海去了。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心里反而矛盾起来。毕竟在这里生活了九年了。而且使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现在要离开了，去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既是激动，又很留恋。人啊，就是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

晚上，和几个哥们一起喝酒，大家都有这样的同感。Xxx、xxx还流下了眼泪。是啊，来云南的时候是眼泪，真的要走了，还是眼泪！

（25）北上请愿的消息

1978年12月24日(星期日）

继续抄录知青北上请愿的消息-----（当年就是这样走了）

1978年12月21日从墨江步行出发了二公里，便停下来等车。

早晨起来以后，每人吃了两只馒头。走了二公里以后人还是受不了这晨雾中夹带的寒潮，他们有的不停地跳着，活动活动身体，有的干脆大声唱起来；有的却蹲在路边忙着写材料……

上午十点，来了一辆货运车，只能上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原地等车。

一点左右，他们在离安定22公里处下了车，等后续的队伍。云南的天气，早上还是雾气重重、寒潮袭人，到了中午，太阳还是烤的人发热。先前出发的人在路边等了两个小时，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又饥又渴，一个个都躺倒在路旁。

三点，后续队伍上来了。大家一起乘车到了无江。车子仍要前进，司务长见大家渴得慌，连忙用自己的钱买了十几斤番茄，每人两只以解口渴。

晚上八点，代表团经过一天约一百五十公里的路程，到达了杨武。

1978年12月22日从杨武到昆明只有一天的路程了。

代表团反复研究，决定在杨武“休整”一天，来一个“观察观察”。

他们在杨武住下了。有的忙着做棉背心、棉裤套，有的赶写材料。而几位“首脑”人物一直在研究下一步如何走。

从昆明下农场路过杨武的知青们，向代表团提供各种各样来自北京、上海、昆明的消息。

“省委要派人阻止你们进京！……”“昆明很乱，有的说我们知青好，有的也有反对的”。

“上面（指昆明）都知道你们到杨武了。我看你们还是小心一点吧……”“有一批知青同铁路局干起来了。昆明到北京的火车停开了……”“……”丁惠民和代表团们一起仔细地研究着。

祝愿他们一路走好啊！

（未完待续）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大返城的日子里·三】：

（26）国务院来了指示

1978年12月25日（星期一）

昨天，北京隆重召开了悼念彭德怀、陶铸的追悼大会。这也许又要记在毛泽东的“功绩簿”上了。

今天，国务院来了指示-----

“国务院决定由省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组成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意见。青年职工代表不要来京，望很快返回本单位，坚守岗位，搞好生产。”

还是青年职工？叫一声知识青年就那么难吗？

还是“马后炮”-----云南知青的请愿团这个时候应该在赴京的列车上了。

拨乱反正的年代，我们的各级机关似乎还是老一套，还是如此的缓慢的对待正在发生的一切。这真是天晓得。

（27）他们终于上北京了

1978年12月26日（星期二）

好消息，丁惠民他们终于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我继续抄录他们情况----

1978年12月23日

代表团突然分成三路。

丁惠民带一部人上北京。

巫学建带一部人去上海。

钱桂梁带一部人到重庆。

他们把请愿代表团的大旗收了起来，把每个人胸前佩戴的代表证收了起来。九点四十分搭乘一辆去峨山的车，于中午一点到了峨山。又从峨山乘客运班车到了玉溪，再换车到达离昆明很近的中谊村。

丁惠民对赴上海、重庆两地的代表们布置：

到北京去的一组，不进昆明。在读书铺去等昆明发往成都的列车，由成都直赴北京。而赴上海、重庆两地的小组进昆明，大造舆论，扬言要上北京，然后见机行事，分赴沪、渝两地。

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经过周密研究的。代表团给赴沪渝两地的小组下了六条纪律：

1、不能在上海、重庆进行募捐。

2、不能吸收一个新代表参加活动。

3、不能和任何组织发生任何关系。

4、对违反纪律必须严肃处理。

5、上海、重庆两组一切活动由丁惠民负责。

6、服从组长，少数服从多数。

到上海和重庆的两个小组进入昆明城，而丁惠民则带人在读书铺这个地方，晚上八点，他们乘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1978年12月24日

晚上6点20分到达成都。11点15分到达德阳车站。为了把进京的准备工作做的更充分，代表团在德阳下车，住宿在车站招待所。

1978年12月25日

上午，代表团全体人员做各项准备工作；有的刻写腊纸；有的抄写文章；有的画漫画；有的外出买宣传品。

上午11点30分，他们乘上了成都开往北京的64次特快列车。

（28）私下的一次议论

1978年12月27日（星期三）

今天有机会与《西双版纳报》社的一位好友交谈。她给我看了一份1968年12月22日的报纸。上面是这样记载的----

新华社1968年12月22日电从昨天到今天，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

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锣鼓声和鞭炮声中，各地军民抬着毛主席的画像和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色宝书，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欢腾的海洋里，人们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红心。

那天，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所谓“12、21”指示。十年来，这就像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使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是他从个人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用来对待我们知青了。什么“书越读越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阶级斗争应当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等等。

我们在交谈中谈到，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了好皇帝。”毛的思路很奇特。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有过这样的观点：“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的理论就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还是不识字、少识字的人可靠。于是今天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幕。晚年的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的毛泽东可能是出于更深层的原因考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承认农民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而把农民当作无产者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了。

可悲的历史。倒霉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啊。

好了，小范围的议论。尽管拨乱反正了，可还是要小心啊。

（29）两难的选择

1978年12月28日（星期四）

这几天，我们最多的话题就是罢工请愿和用什么方式回去。有的是搞病退，有的是可以顶替，还有的是想搞困

退。大家都在与家里联系。

该走了，该作出决定了。

（这就是小柏----柏宏富。当年，他选择了留下，在农场安家了。这是他在2007年春节，中央电视台到西双版纳拍摄《情系云南农垦》专题片时，请留在农场的老知青表演节目。他们选择了我在1975年时写的《创业者之歌》。这是记者采访他的情景。小华后来回上海了。与女友的事处理的很好。）

我们连队里有两位知青很难。一位是上海知青小华，一位是四川知青小柏。他们都与湖南来的老工人的女儿谈上恋爱了。而且已经是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当我们在谈论回城的事时，我看见他们总是刻意的回避。是啊，确实是很难的。

应当说，这两对青年都很好。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也很喜欢。可是，现在未来的女婿可以回到城里去了，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去了。大家都很难的。我们有的时候也刻意回避他们，尽量不在他们面前谈起这些。

我和小华都是上海知青。前几天我们有一次悄悄谈起这件事。我感到小华太为难了。好几次他都掉下了眼泪。他很感激女友的父母这些年来对他的照顾，他很珍惜与女友的这份感情。可是，上海家里的父母急切的盼望他回去，毕竟他是家里的长子。走还是不走？难啊！在这个时候，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办法，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安慰和劝导他。

能怪上山下乡吗？天晓得！

爱情，亲情。这真的是两难的选择啊。

我暗自庆幸自己还是一个快乐的单身汉。我是出身在“黑五类”家庭的子女，有哪个姑娘会看中我呢。现在是光棍一个，一打背包就可以出发了。

真的很同情我的好友小华和小柏。

（30）看《伤痕》，想责任

1978年12月29日（星期五）

今天，又一次打开《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上面刊登的是《伤痕》。这是我这次回上海探亲时特意带回来的。我太喜欢这篇小说了，还有刘心武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等。从我们懂事开始，就是这十年“文化大革命”，十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精神的缺失，导致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这些留在我们心中的“伤痕”将

深深的印在记忆中。

弟弟寄来一封信。信中还有他最近创作的一首诗。弟弟很有才华，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这首诗写得不错。我把它抄录下来了。

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

我曾焚毁你的一切手稿和书籍，

使你失去了智慧的财富和宝贵的光阴。

而今，看见你那苍苍白发，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幼稚，

竟把乳汁当成剧毒的水银。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我曾用拳头和棍棒对你审讯，

给你留下了鱼麟般的血印和伤痕。

而今，望着你那瘦骨病驱，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天真，

竟把鲜花当成醉人的酒精。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我曾在你的档案里打满了“xx”

给你带来了数不清的流放、苦役和监禁。

而今，望着你那满脸皱纹，

我要向你忏悔，诉说我的心情：

我怨恨----

怨恨我是那样糊涂，

竟把蜜蜂当成可恶的苍蝇。

啊，假如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为何我的罪责是那么轻？那么轻？

是的，历史是杆公正的天平，

忏悔，决不能使它的两端平衡。

为了洗清我的耻辱和内疚，

我要在天平的另一头

加上千吨重的砝码----觉醒！

我十分欣赏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这责任就是一个孩子咬在母亲乳房上的带血的牙印！

今天，我们迫于无奈，奋起了，同样也有一个责任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是悲哀的。曾经是“文革”的“冲锋者”，现在呢？应该觉醒了！

（31）来自北京的消息

1978年12月30日（星期六）

收到了来自北京的简报，得知赴京请愿团27日的活动情况------

27日午12时许由成都开往北京的64次列车即将抵达北京站时，请愿团全体代表的心情非常激动，随着列车上的广播声，深情地唱起了深情优美的《北京颂歌》。

12时25分列车抵达北京时，代表们在旅客下车时唱起了请愿歌，尔后在站台上整队高举国旗走出车站，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天安门进发。

3点零5分，队伍来到了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旁。望着雄伟的天安门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代表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们的团旗在天安门前迎着寒风挺立飘扬。全体代表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展开了写着“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和“我们要控诉，我们要告状”的两条横幅，代表们就地而坐下。不少群众围着代表索取传单，希望了解版纳知青的真实情况。我们组织了几个讲演小组向群众宣讲了目前西双版纳知青的情况，首都人民深表同情。我们同时散发了一部分《告全国人民书》。全体代表在一起照了相。

7点30分，国家农垦总局刘副局长亲自乘车将全体代表接到了农林部招待所，安排吃饭和住宿。

在广场静坐的过程中，有的代表冻坏了，冻病了，可代表们的心里是热的。我们终于冲破阻碍，来到了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身边，我们终于把版纳五万知青的心愿带到了北京，我们作为代表吃点苦是应该的。我们一定要把版纳地区知青的情况和愿望向党中央汇报。

（32）78年的最后一天

1978年12月31日（星期日）

1978年的最后一天。新的一年就要到来，等待我们知青的命运是留下还是回去？一切都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

（珍贵历史镜头----云南知青北上请愿团行进在首都的大街上）

又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

28日上午8点30分，在农林部招待所召开代表大会，丁惠民主持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离开景洪至北京途中的情况，进一步强调了代表团纪律，重申代表的任务，使全体代表明确目标，树立信心。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团结，做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根据实际情况对请愿团的任务作了必要的补充：

1.请中央承认赴京请愿团的行动是合法的。

2.明确分清引起罢工的责任在谁方。

下午2点30分到5点派了两批代表前往北京“民主墙”张贴告全国人民书，版纳知青诗抄，漫画，把版纳农场的实况公布于众。

（33）对《全国知青会议纪要》的不满

1979年1月1日（星期一）

今天，得知请愿团在京的活动情况。我感到他们提出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对《全国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施行草案》的看法，我们生活在边疆和农村的知青最有发言权。应当听听我们的意见。很可惜，这种真实的声音非要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反映的北京，这真是很可悲的事。我抄录了他们发自北京的简报----

29日上午，全体代表在农林部招待所学习了国务院批发的《全国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施行草案》。通过学习，代表们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归纳起来有两点：1、两个文件对知青今后的上山下乡作了统一安排，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在今后实践中接受检验。2、对已上山下乡八、九年的知青实际问题（如“一片红”、农民上山下乡，中学没毕业上山下乡等问题）没有提及，对此全体代表表示有保留看法。

中午12时15分，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刘先国主持了会议，着重提了两个问题：1、继续向首都人民公开版纳农场血淋淋的材料。2、进一步深刻领会上述两个文件，提出我们对两个文件的意见和看法。

下午3点，根据丁惠民的建议，代表团一致通过了版纳地区五万知青与首都居民“对调工作启事”，并刻印张贴。

晚上7点20分，国家农垦总局刘副局长又来看望全体代表，并转述了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对代表团的关怀。

（34）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书

1979年1月2日（星期二）

我抄录了我们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书》。特别是六条说明，详细的解释了六条提出的根据。这些是我们云南西双版纳知青真是情况的反映。结论就是知青应当回家。------

（云南景洪大勐龙地区）

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建议书

我们版纳地区赴京请愿代表团，受五万知青全权委托，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如下建议：

1.农村来的青年农民应该回去。

2.中学未毕业迩来的应该回去。

3.受骗上当来的应该回去。

4.强迫来的应该回去。

5.没有门路和靠山，也不会巴结领导干部，但确实有病，未能办理病退回去的，应该回去。

6.找不到对象，年龄已满二十五岁以上的，应该回去。

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

代表团团长丁惠民（签名）

1978年12月30日

为了使上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能理解我们建议书中建议，特作以下说明：

第一条：云南农场有两批上海郊区来的农民青年，本来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农民出身，都在当时也被动员来云南接受再教育了。

第二条：毛主席说：“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而许多四川青年才进中学一年或二年后没毕业就被动员来云南上山下乡了。

第三条：云南农场到各地动员的人造谣撞骗说：“到云南是参军，到昆明就发一月的工资，每年一套军装，部队待遇，三五年可复员。”等等。许多青年就怀着参军当兵的幻想来云南的。

第四条：上海来云南的知青，大都是被林彪“四人帮”在上山下乡工作中搞的“一片红”硬逼来云南的。

第五条：在云南农场中开后门成风。真正符合病退条件的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未能病退。

第六条：云南农场中男多女少，相差数字约占总数百分之二十，许多青年已满额皱纹了，但还是光棍一条。

（35）方方面面的领导终于出现了

1979年1月3日（星期三）

从北京发回的简报看，12月30日，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终于出现了。请愿团已经将我们知青的意见转诉了。问题是这种“谈判”的结果是谁也无法估计的。这些级别的领导是无法来答复这些问题的。我继续抄录来自北京的简报----

30日8点，在农林部招待所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丁惠民同志起草的代表版纳五万知青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建议书》。

8点30分，国家农垦总局第二把手，副局长张修竹来到农林部招待所看望全体代表。

9点15分在国家农林部招待所会议室举行了第一次接触的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农垦总局副局长张修竹，农垦总局副局长刘纪民，农垦总局计委主任于延栋，农垦总局办公室副主任贾大勤，团中央李晓芳，国务院知青办张亚群，王进仁，国家劳动总局赵志坚，周起光。代表团全体代表出席了会议。

全体代表一致强调了代表团的四项任务。丁惠民同志代表全体代表对中央转发的《全国知青会议纪要》和《国务院解决知青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上山下乡究竟是为了再教育，还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因为我们当时去云南，不是为了寻找职业，糊口谋生。

二、现在党的政策是动员和鼓励知青上山下乡，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但以前强制性的做法，如上海的“一片红”应如何解释？如何纠正？

三、上山下乡已八年的知青有否退职权？

四、《试行规定》的二十一条中，是否包括以前的案子。（未能认真处理，民愤仍然极大，罪犯仍然逍遥法外）

五、《试行规定》的二十二条第三点，对已婚知青的三次探亲时间，本人是否有充分的选择、决定权？如减少一次，是否能把文件下达以前的事假工资费给予报销？

六、国务院关于知青问题的规定条文，如果在农场得不到落实或歪曲或打折扣怎么办？到那个部门告状申诉？

在会议中，代表团重申了复工条件，张局长表示尽快答复。代表团摄影师胡寅康同志东奔西跑第抢拍珍贵的镜

头。11点25分会议结束。

下午1点30分，领导上派专车来农林部招待所接全体代表前往故宫，安排参观。全体代表深感在华主席、邓副主席身旁的温暖。代表团地位显著提高。

（36）两个复工条件

1979年1月4日（星期四）

今天得到的消息稍有鼓舞。对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的命运来说，不会是什么“非法组织”一类的结局。至少是采取了承认现实的态度。我想，这在毛泽东时代也许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知青就是想向中央反映边疆农村的真是情况，恳求加以解决。如果农场的领导早一点采取这样的开明的态度，事态也不会发展到非要上北京的地步。

当然，实质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回家，到现在还是未知数。来自北京的简报是这样说的----

31日上午，本团派出部分代表往北京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继续向首都人民公开版纳农场的典型材料。

下午1点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丁惠民同志主持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几天来的工作，由于来访人员较多，代表团组织了一个临时接待小组。中午，全体代表欢聚一堂，举行会餐，送旧迎新。

下午四点，国家农垦总局刘纪民副局长、农垦总局办公厅副主任贾大勤同志来到代表团驻地，代表国家农垦总局同意代表团提出的两个复工条件：

1.明确承认代表团的性质。

2.同意所有罢工人员的工资照发。

双方交换了草拟文稿。

代表团立即发出了复工令，声明罢工结束。农场各单位收到电令后立即复工。

代表团中两名画家熊占国、曾永庆同志所创作的揭露农场少数干部贪婪无耻行经的漫画受到首都群众的热烈称赞。代表团已作出决议，为两位画家的创作提供一切方便。

（37）《对调工作启事》

1979年1月5日（星期五）

这是我们云南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代表团在北京时张贴的一份《对调工作启事》。写得生动、形象、逼真。把我们的生活活龙活现的反映出来了。特意抄录下来。

《对调工作启事》（括号中的话是笔者加的注。）

兹有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农垦分局五万知青愿意和首都每一位自愿去边疆的居民对调工作。如愿去的居民，在一个星期内前来农林部招待所和我们联系，并带上工作证，我们的情况是这样：

四面环山，风景秀丽，出门爬山，住在山中。四面透风，清凉舒适，适应中老年人生活。尤其是对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是个良好的休养地。

生活上特殊照顾，九（即“韭“同音）菜一汤，每日有鸡蛋炒饭（即指玉米与大米饭混合烧），菜牌墙上挂七昏（“荤”同音）八数（“蔬”同音）看不清。只收8元伙食费，病号另加特殊饭。萎缩一团看电影，苍蝇蚊子如唱机，娱乐生活样样全，早上拍头（指上班时昆虫咬），晚上拍脚（指蚊子咬），自由活动无人管。

工作不受限制，病假自行开。上班三只脚（指爬山时需用手帮忙），下班自动化（指下班下山路滑）。我们生产地球牌自然图，每月收入36元，工作轻松、四肢发达，交通方便，11路（指步行）四通八达。用电方便，不收电费，使用空气灯。住房不收房费，三四十平方，四周配备电风扇（指房子四周漏风了）内墙一切家具，美观大方，价格便宜，用户满意。

我们的条件不高，不管对方的工种如何，我们宁可牺牲这美丽富饶的条件，“优美”的工作，换取低工资。任何人不愿做的工作我们都换。望北京各居民同胞互相转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愿对调者可持工作证前来本部联系。超过时间一律不办。

（38）农场医院一景

1979年1月6日（星期六）

去了一趟农场的医院。这个情景也许今后是再也不可能见到的。

每一间就诊室里都拥挤着我们知青。大家手里拿着办理病退的表格。人们争先恐后的询问医生该怎样来填写。医生的回答也很干脆，问你填什么病？然后就教你如何来填写。整个就诊室就像是一个学校的教室。又像是一个集市，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中学的同学小章，原来是五分场卫生所的医生，后来调到农场医院了。他告诉我，为了知青朋友的利益，这几天的工作就像在打仗。嗓子也快哑了。他也要走了。他说，我们知青当医生，在医院里已经

是骨干力量了。这么一走，这农场的医院将来可麻烦了。

是啊，都要走了。人心思走，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走，会给农场留下多少后遗症呢。

回连队的路上，路过一片橡胶林，我不由自主的停下了脚步。一棵幼小的胶苗，从苗圃到山上，我们要移植。首先要挖好梯田，然后要移植。小苗要生长七八年才能割胶。这期间，年复一年的砍坝，施肥。头顶烈日，脚踩杂草。风里来，雨里去。这艰苦的岁月就这样结束了？

要与我们辛勤培育的橡胶说声再见了。还是有点难受难分的感情的。

唉，人就是一个复杂的高级动物。谁说的清楚呢？

（39）北京的消息

1979年1月7日（星期日）

继续抄录来自北京的消息----

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为了庆祝元旦，代表团全体代表前往天安门广场集体活动。在毛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前集体合影留念。

下午二点二十分，国家农垦总局特为代表团安排节日文娱活动，派专车接送全体代表往电影院看电影。

晚上六点，代表团电令上海组，重庆组停止一切活动原地待命。

元月二日，国家农垦总局派专车接送全体代表看电影，作为组织上对代表团在京节日专门安排的文娱活动。

下午五点，召开了全体代表大会。刘先国同志主持会议。根据国务院转发的三点意见，代表团决定留下十名代表留京完成递交请愿书任务，其余代表分成两批，前往上海、重庆两地给两个小组宣传传达国务院三点意见，在定期内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回云南后，协助中央派出组搞好知青工作。

（40）来自北京的消息

1979年1月8日（星期一）

还是继续抄录来自北京的消息。这几天，我们可以说是在无聊中打发时间。大家天天在宿舍里睡觉，都不上班

了。天天在盼望着去北京的知青能带来好消息。到农场这么多年了，还是第一次有如此空闲的时间。

元月三日上午，全体代表为前往上海、重庆两地的宣传组作准备工作。

下午一点，我团全体代表由共青团中央李晓芬同志、国务院知青办张亚群同志、国家农垦总局孔教清同志陪同，坐专车前往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毛主席八十五寿辰摄影展览》和《周恩来同志生平展览》。革命老前辈的英勇斗争史使全体代表深受教育。同时，大家决心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上海宣传组由朱一平同志带队，在下午三点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国家农垦总局派专车把代表送到火车站。

重庆宣传组也将于明天上午出发。

（41）一封《声援信》

1979年1月9日（星期二）

声援信

亲爱的代表们：

您们好！今日有幸拜读了你们张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及漫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是含着泪水读完这些大字报的。回来以后感想很多，故提起笔来给你们写下此信。

我原来也是个“知识青年”，于一九七三年下乡。虽然我有幸地离开了那里，但是在那里所过的生活，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特别是在那儿还有着多少同我一起战斗过的同伴们，还仍然在接受着“再教育”，就更使我难以忘怀。今天，我看了你们的大字报，心里更觉得你们的可敬。你们现在所进行的事业，是有关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事业，你们所要求的也正代表了数以万计的广大知识青年的共同要求。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多少家庭被这种上山下乡运动所折散。有多少天真无邪的青年人，被这种运动摧残而丧失理想、前途，对人生的热望以及青春与生命。我们所进行的事业，不但关系我们这一代，而且还关系着我们的子孙后代。因此，望你们在任何关头不能退缩，九亿人民站在你们一边，真理也在你们手中。

社会每发生一次大变革，伴随而来的都是城市的扩大与城镇人口的增加，只有原始社会才没有城市。城市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只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个号称社会制度最光明的国家，才有人独出心裁地想出一种逆历史而动的运动----上山下乡。把大批的青年赶到遥远的边疆与偏辟的乡村去，从而来巩固“红色政权”，防止把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赞成的生产停滞转嫁到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身上。

回想起在农村的那日日夜夜里，真是悲愤填膺。当初是那样纯洁烂漫的青年人，经过了几年的再教育，都变得玩世不恭，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对人生也变得冷酷无情。有多少人甚至对我们党和祖国推动了信心而逃亡国外，并且是由一个社会制度“最先进”的国家逃向一个最反动的国家----苏联。这难道不是对现行的这种政策的一种绝妙讽刺么。一个人不到十分绝望的时候是不会做出这种背叛祖国与祖先的举动的。难道这些人是生来就极端仇视我们的祖国吗？不是。难道是上了“某阶段敌人”的当吗？细想也不是。但是他们最后为什么会成为广大人民的敌人呢？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这场万恶的运动以及由它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而使这些人已经看不到自己的生命不会有什么意义，感觉不到人生的快乐。因为那里所说的快乐，大概也就是有点轻活干，休两天病假，痛饮一顿酒，或者和姑娘们亲吻这样可怜的几件。曾经有一次，由于一个姑娘而引起了上百人的械斗，以死二人伤十人而告终。难道青年们的性命就这样不值钱吗？为了探一次家，竟然到了出卖肉体的程度。知识青年的生命是多么的廉价啊！

在知识青年中为什么能盛行起那些青年们自己编的歌曲呢？为什么能流行起那种手抄本《少女的心》一类的黄色书刊呢？这根本的原因就是还没有人来为青年们创造一些好的歌曲或书刊。让那些“广阔天地炼江心”一类歌曲与《征途》一类的小说见鬼去吧！看这样的文章不是“画饼充饥”吗？真正能说出青年心里话的人，我直到今天才看见，可是还不是在报刊上。

若干年来，流氓犯罪，盗窃抢劫大都发生在下乡青年中。知识青年成堆的地方，仿佛是这个社会最阴暗的地方。那里到处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充满了暴力与淫乱。有的如高尔基作品中的《在人间》。每当发薪的时候，大批的酒与罐头都买来，许多人围着暴饮，其中也包括一些姑娘们。喝醉了就开始唱那些歌曲，或者是互相谩骂。平时的谈话似乎除了女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博得大家兴趣的议论。枯燥无味，庸庸碌碌，醉死梦生，这就是青年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什么“政治”“阶级斗争”之类，只是大家诅咒的东西。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已经没有多少人对它产生希望了。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干一天活挣一天钱。这个简单的事情在人们的心头脑中重复。

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副主席的一次次鼓舞人心的讲话也令人振作起来。中央最近也开了上山下工作会议，但是结果仍还不够理想。画饼充饥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为什么现在还不能把这个千百万人民所痛恨的“上山下乡”彻底抛弃呢？为什么中央的指示到了基层就行不通呢？当然，在现在社会上已有很多没有分配的青年，再骤然加上这样多的上山下乡青年的确也是个问题，但是，中央应发文件纠正以前的错误，并对这些人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最起码也使青年们有盼头。我想，这正是你们所应当争取的。这牵涉着千千万万个家庭和无数子孙后代。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些人的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

亲爱的朋友们，我由于心情很激动，所以可能有些语无伦次或者有错误的地方。但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你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退缩，若能召集全国各地的青年们都来办这件事，那就大有希望了。你们的勇敢精神一定会唤起更多的人。但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只要你们相信你们身后有着无数的人民群众，就可以战胜这些。亲爱的朋友们，我很希望我能成为你们的忠实的朋友，很愿望我对你们能有所帮助。尽管我的精力不应该用在这上面但如

果能为你们一些事，将会使我永远高兴的！

紧紧握你们的手，并预祝你们成功！

为你们胜利而干杯！祝全体朋友们新年好！

1979年元旦

（未完待续）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大返城的日子里·四】：

（42）中坚力量

1979年1月10日（星期三）

今天，与分场的一位干部聊天。同样是知青，我们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期，那些过去无法交流的思想可以大胆讲出来。（我不想记下人家的名字，以免将来的麻烦）

他说----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为难。我也是知青，我也想回去！可我又是一个分场的干部。农场党委的要求我总归要执行吧。我的心里也明白，完全按照农场党委的要求办事，知青们非把我揍扁了。完全站到我们知青这一边吧，（我的心里完全是向着知青）我就是担心万一北上请愿搞砸了，秋后算帐时，我还可以帮一下我们知青。所以，我现在采取不表态的态度。你们有事，相信我的话，可以交流交流。但是我不代表领导。我还是我，一个知青！

至少，你们罢工了，我没有说一句话。你们外出请愿了，我是默认的。你们贴大字报，我是认认真真的看的。为此，农场党委已经批了我几次。我只能装糊涂。

知青的问题是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农场没有搞好，我们都有责任。我感到，对知青的问题要放到全国的范围去看。这是“文革”留下的一个大难题。光靠我们云南的知青还不够。我们仅仅是起到了突破的作用。当然，结果如何还不知道，要看中央了。但是，现在是邓小平当政，我想结局不会很差。小平是个很开明的人。我们寄希望与小平同志。

你由于出生的问题，一直在连队当工人。我早就想启用你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谈了。我建议你好好记下这次西双版纳知青的事件，将来一定是个好素材。你能写，现在要参与，但要注意一个度。留有余地。

我们谈论了很多。我为有这样的知青朋友感到高兴。这些长我们几岁的“老知青”，用他们丰富的社会经验在帮助我们。我想，版纳的知青如果能请愿成功，千万不能忘记这些担任着领导职务的知青朋友们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贡献！

（43）国家农垦总局下发了一个文件

1979年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看见了1月2日国家农垦总局下发的一个文件-----（79）国垦办字1号

文件是这样讲的："我局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听取了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国营农场知识青年丁惠民等28位同志的汇报，认为他们来京反映问题是正当的。鉴于国务院已派调查组前往云南农场，就地听取意见，青年同志们要响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号召，贯彻国务院1978年12月25日的三点指示，安定团结，顾全大局，坚守岗位，搞好生产。丁惠民等28位同志应动员农场青年立即复工，并动员现在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地的农场青年返回生产岗位。自本文下达之日七返回工作岗位复工者，这次停工期间的工资可予补发。"

在说到这次大规模的知青罢工请愿事件时，文件是这样讲的："这次西双版纳国营农场知识青年罢工事件涉及面广，给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这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前我国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是很不利的。我们国家农垦总局在组建前后，对云南省国营农场知识青年思想上不稳定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没有及时会同有关部门在云南省委的领导下，帮助云南省农垦总局切实解决"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在农场知青工作中遗留下来的一些实际问题，对这次事件的发生，我们是有责任的。"

在讲到事件发生的原因时，文件说："各级领导干部要看到，由于我们本身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对"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一些冤案、假案、错案没有及时昭雪、平反、纠正，对个别干部中捆绑、打骂、迫害青年的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没有把生活搞好，青年们不满意，有气。这也是引起这场罢工的原因之一。"

说的都是实话。就是晚了一点。

局面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些话或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反正把帐都记在"四人帮"的身上，没错！可这四个人已经被打到两年了，我们的这些干部都在干啥？天知道！

（44）可以顶替回上海

1979年1月12日（星期五）

接到父亲的来信，我可以通过"顶替"的办法回到上海，进父亲的单位----上海第三机床厂。这真是梦寐以求的大好事。有关的手续已经开始办理了。父亲叫我再耐心等一下，他在信中再三叮嘱我，安全第一，一切以平安回

到上海为目标。

终于可以回去了。我兴奋了整整一天。从1970年4月离开上海，快九年了。这里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我想，没有这次我们云南知青的大罢工，可能我们回城的日子还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惠民是我们知青中最勇敢的人。换了我，一定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我们西双版纳五万知青的行动终于有了收获。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些还在北京的请愿团的知青战友们。他们的付出赢得了我们的大返城。

终于可以回去了。我兴奋了整整一天。这个时候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感受。毕竟在这里度过了我的青春年华。我把人生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西双版纳。昨天，我们的一位分场的领导（和我的关系不错）对我说：你们都走了，谁来教学生？谁来开拖拉机？医院关门？我们舍不得你们知青走啊！唉，真是抱来的孩子养不家啊。你们知青一走，农场十年难以恢复元气。

他一直在哀叹。可现在已经是大势所趋了。我很同情他说的话，这也是现在农场的真实情况。知青已经是农场的主力军了。但是人总是有血有肉的，亲情是无法用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我们的家在城市，回去是唯一的选择！

晚上和几位好友痛痛快快的喝了酒，一醉方休！高兴啊！

（45）云南知青历史资料

1979年1月13日（星期六）

我想，知青一定会成为今后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在是到农场后最舒服的日子。可以不上班，可以安安心心的看书，还是做一些关于知青的笔记----

上山下乡运动，一般以1968年毛泽东12月21日的号召为开端。在西双版纳，早在50年代，就有小批知青到来。资料显示，1955年4月，西双版纳农垦事业拉开帷幕。1956年1月24日，550名昆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到达西双版纳黎明农场，他们可以算是最早一批来到农场的知青，随后，1957年41名昆明青年学生，1958年47名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学生被安置到勐养农场，1962年894名昆明青年学生到达垦区，1965年重庆青年学生1500余人到达垦区，这是垦区早期首次成功接收大批省外知识青年。但是，这些知青还远不是现在所谓“知青大潮”的成员。

在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展开之前，1967年11月25日晚，北京市二十五中、六十五中、女子第十四中的55名应届毕业同学，通过努力，向周总理递交了报告，强烈要求到西双版纳建设祖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第二天周总理在他们的报告上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后面是时任副总理的李富春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1968年2月8日，55名学生踏上南下列车，10天后到达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疆

锋（今六分场）5队。

10个月之后，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声令下，全国上百万城市青年开始向农村迁徙。

1968年12月初，上海376名知青奔赴西双版纳。我们经常叫他们“老上海”。此后从1969年到1972年，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等地共10批，53294名知青来到西双版纳垦区。垦区职工总数是87955人，其中北京知青3051人，上海知青30245人，重庆知青15548人，昆明知青4097人，其他地区知青353人，知青占职工总数的60.59%.

除垦区外，在此期间，西双版纳州农村还接收安置知青2868人，其中上海知青1830人。至此，西双版纳接收知青共56126人，而据《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志》记载，1972年年底，全州人口为563894人，知青约占全州人口的9.91%。

西双版纳是傣族和哈尼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地区，解放后直到1960年代都几乎没有什么汉族传统，是大规模的农垦开发，为西双版纳迁入了大量汉族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是来自南下部队以及湖南（祁东、醴陵）、云南（思茅）的农民，他们来到这里，带来了他们各自家乡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心理认知甚至方言土语，开始在西双版纳建立起不一样的生活图景。但这批人的主要身份是战士和农民，本身的文化素质并不高。随着知青的迁入，我们可以说，这将近10％的人口是西双版纳最有文化，最有见识的人，我们的到来，带来的是一种先进的城市文化，什么“再教育”，究竟是谁在教育谁呢？

这样的结果恐怕是毛泽东所料不及的。现在，知青起来了，又给这块土地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

（46）我的北京知青战友----汪绍良

1979年1月14日（星期日）

今天，接到汪绍良的来信。他是去年离开连队到辽宁的铁岭去了。

汪绍良是一位北京知青,是我在云南东风农场十五分场八队最要好的战友.他为人忠诚,在连队里是大家的老大哥.我们一起生活了有五年.绍良是“曲线救国”，先到铁岭，而后再回北京。信中说回北京的事办的还比较顺利。祝愿他早日能够回到北京。我详细的给他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们云南知青大罢工的情况。边写边回忆起我相处的日子。

记忆中,有一次上山去排除树桩,为拖拉机开梯田清除障碍.当我们来到一棵大树桩时,想了许多办法挖不出这个树桩,只好添埋炸药,把它炸掉.于是,我们埋好炸药,把导火线点燃,可过了好长时间不见起爆,一定是哑火了.我们俩都明白,排除哑火的事是很危险的.绍良抢着要去,还说他有经验.我坚决不同意!争了半天,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一起去!为了预防万一,决定留下遗言.于是,我们把一包香烟拆开,在烟壳上写起了"遗言".写完以后,搬来一块石头压上,还把衣服盖在上面,为了万一出事能被人发现.结果是没事.我们十分小心地爬过去,一看是导火索断裂.与绍良患难中的情谊一直记在心里!

（47）这也是一种选择

1979年1月15日（星期一）

今天，在小街的东风农场场部门口，碰到五分场三队的阿敏，我们是一个学校一起到云南来的。他现在还在五分场三队。为了搞病退，特意到农场的医院来。好久不见了，以前我们就是好朋友，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当然，现在的话题自然是我们知青的回城一事。已经有不少的知青回去了，特别是那些女知青。阿敏告诉我一些情况-----小胡，本来和小邬谈朋友，已经是到了很投机的阶段。其实小胡的父母也不是说小邬人不好，就是为了离开西双版纳，就在武汉为小胡找了一个对象，于是小胡就匆匆嫁到那里去了。好在是进了工厂，就此可以结束种地的生活了。

还有小王和小袁，一个嫁到河南，一个嫁到江苏，都离开了连队。从此就可以离上海近了一些。

当然也有留下的。比如，小管就嫁给了我们连长的儿子，她已经是云南人的媳妇了。

我感到这些都是选择，只不过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罢了。

女知青可以通过结婚的方式离开西双版纳，我们这些“和尚”就只好在这里扎根一辈子了。我对小袁说，好在现在我们也有希望了，也可以回家了。唉，这些女同胞是不是走的快了一些呢？当然，谁能预见到今天。况且，女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像我们男孩子，总是要嫁出去的。这也是一种归属吧。每个人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听天由命吧。

祝愿我们这些女知青在异乡生活的好一些。

今天，我们可是真的要回家乡去了。

（48）见到了我的学生

1979年1月16日（星期二）

又是在场部，我意外的见到了我在72年时在五分场学校当老师时的一位学生小彭。如今，小彭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他考上了云南大学。农场的后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交谈之余，使我想起了当年当老师时的情景。

72年的时候,我调到云南东风农场五分场小学当语文老师。我教的是五年级.第一堂语文课时,我要求学生们写一篇作文,题目已记不清了.有两件事至今还记得.有一位学生举手问:老师,煤油灯的灯字怎么写?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灯"字.这时候这位学生一看说:认识,红灯记的灯.那堂课上,我不停的在黑板上写着学生们"不认识"的字,结果大都是这样:沙家浜的浜,杨子荣的荣等等.另外一次上课时,课本上讲到"公共汽车",一下子许多学生都问,啥叫公共汽车?我想了半天,只好这样解释,就象大家看到的拖拉机,上面有蓬子盖着的,里边有椅子可以让你坐.上去后要买票,汽车可以送你到目的地.比如,从我们五分场到六分场.我解释后,也不知学生们是否明白.我补充说,我们大勐龙将来一定会有公共汽车的.多少年过去了,我想,这两件事印记着我们这个年代的烙印,今天听来是好笑呢还是一种苦涩?!好在学生们都长大了，他们将是这个农场的未来！

（49）我写了一篇小说

1979年1月17日（星期三）

我在《西双版纳报》社的好友小赵走了，通过关系调到安徽铜陵去了。她来信希望我把去年我写的一篇小说寄给她。今天，我又把这篇小说修改了一下。给小赵寄去。

去年的五月，我到小赵那里去玩。她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农场的一位女知青看了电影《红楼梦》以后自杀了。留下的遗书说，林黛玉这么好看也死了，自己长得很难看，又受到欺负几次恋爱不成，活得没意思了。

真的很可悲。我们知青中竟然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实在是太可悲了。于是，我一激动就写下了这篇小说《她，安静了》。怪谁呢？文革？毛泽东？还是我们自己？留给历史去作出鉴定吧。

附：小说《她，安静了》

她，安静了

“她，终于安静了。”我默默地祈祷着。

小燕刚死的那几天，大家都议论纷纷。几天后，人们很快地把她忘了。偶尔说起，大抵是笑话一则。

“这个人真傻，看一场《红楼梦》电影，就去寻死了。”“哟，她还要跟林黛玉相比，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的

面孔。”“十三点呀，死得一点也不值得－－－轻于鸿毛。”于是，大伙儿给小燕作了结论：戆头戆脑！渐渐的，小燕就像在地球上永远消失了。那座新坟上已经长起了新草。

好像一定要是一位战士，才能够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灵里。当人们来到烈士陵园时，或许会记起死去的人那可歌可泣的事迹。或者是在呼风火哨的炼钢炉旁，在降龙伏虑的广阔天地，在杀声震天的练兵场上创造奇迹的人们，才会使人永久地怀念。可是小燕则“戆头戆脑”地死了，有谁还记得起她呢？

夜，静极了。呼呼的朔风似乎把一种可怕的“灵魂”吹进了草屋里。我呆呆地凝视着小草房里空余的角落，那儿曾搁置小燕的床，地盘不大，可我却感到空旷极了。是我内心的空虚、惊慌吗？不！我是从不信神的，决不信那些幽灵重返人间的邪说。也许这时，只有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八年的同伴，还依稀记得起她的一些片断。我仿佛感觉到小燕站在我面前在说，在诉说，在不停地讲述－－

－－我命苦哟。您瞧瞧我这长相。真的，鲜红的脸庞上怎么都长满了疙瘩呀，难道是西双版纳的水土给我打下了印记。娇嫩的皮肤上怎么尽是小疱呀，难道是蚂蟥、蚊子、可恶的小虫儿留下了烙印？啊，不能怪这一切。我把爹妈的一切缺点都集中起来了。爸爸那双倒挂眉毛下的小眼珠子，妈妈那猪糟鼻子和肥大的嘴唇。还有先天不足的原因，我那庞大的乳房和圆桶体的腰杆，把贴紧肉体的衬衫快撑破了。我的脾气最暴躁，每天发牢骚，不停地诽谤，可没有一定的责骂对象。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兄弟姐妹中，哥哥早已就业，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姐姐在上海近郊的国营农场；弟弟在上海的一家机械厂当工人。其实，我真不愿意来农场。那时老师说：“你，不去农村，你的弟弟就不能进工厂。”我的天哪，弟弟的责备，妈妈的叹息，爸爸的咒骂，姐姐的劝告，哥哥的安慰。好了，我终于来到这个“夹皮沟”里，噢，西双版纳，美丽的西双版纳。是的，我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太苦了。当工人的爸爸和终日操劳家务的妈妈，他们并没有给我更多的“财富”。我不像萍萍，她爸爸是个大资本家，虽然说受了点冲击，毕竟还有雄厚的“底子”。我不像丽丽，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大学的老师，她有许多的书，对，叫什么“精神粮食”。我不像琴琴，她的父母都是工人，就两个孩子，生活够宽裕的。我有什么呢？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亚热带地区无情的娇阳和倾盆的大雨，农场那一个“突击”连一个“会战”。每天比部队还要机械的生活，给我增添了数不清的皱纹。我过早地老化了，外表和年龄是极不相称的。我心爱的伙伴只有锄头、砍刀，终日行走在茅草房到大山的崎岖小路上。唯一的安慰是在信中向爸爸妈妈写上几句知心话。可这知心话，一旦被发现，支部书记马上会将此作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研究分析，然后就是大会批判。我唯一想往的是三盼：一盼星期天，可以睡个懒觉。二盼逢年过节，队里杀个猪，有肉吃。三盼两年一到回家探探亲。不过这第三盼最难了。理所应当的探亲，非要我弄虚作假。比方，叫父母打个谎称“病危”的电报，否则，队长那粗鲁的声音：“生产任务紧，不批！”呵，我的妈妈呀，他这么一句话，我又不知到何时探亲了。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我不像萍萍有一双会做生意的嘴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她来农场后，很快就当上了小学教师。按她说的："这下好了，教教书晒不着太阳了"。我不象丽丽那样有一个聪明的脑袋瓜，打倒了"四人帮"以后她考上了大学，终于向这儿告别了。我不像琴琴那样心情畅快，一帆风顺。她当上队干部，甚至自豪地宣称："我以后在农场结婚了，请事假回上海，不扣工资。"我呢，一个渺小的农业工人，发高烧三十九度，队长说："挖渔塘去，劳动能治病。"我，一个女人要跟男爷们一样干活。完不成任务，还要扣工资。我，一个被人厌烦的人，不像琴琴那样，找到了一位能干的男朋友，瞧她的宿舍里，都是她的男朋友做的桌椅板凳。我，只有一张竹笆床和爸爸给我的小木箱。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没有人爱我。像萍萍，她在昆明城里找到了一个对象，以后可以远走高飞了。因为"女跟男走"嘛。随着年龄的增长（绝不是性欲），我是多么渴望在某一天夜晚，一个小伙子，（不要漂亮的呀）突然闯进我的心里。因为，我没有能力考大学；没有能力在农场天地以后的城里找男朋友；没有本事办病退，所以，爸爸妈妈来信要我安心了。可我，向三个小伙子提出过爱情的要求，回答我的却是刺耳的嘲讽、尖刻的挖苦、冷言的拒绝。他们说我"太丑了"，"象个树墩墩""柏油桶"，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渐渐地爱情成了我心头的一件烦事，三盼成了四盼。农场的天地就是这么大，一个生产队，张三李四王麻子，心里都明白。谁也不会来找我。到别的队去找对象，天啊，我们队在山沟里，离我们最近的队也要走一小时的路。难得一个休息天，去找对象，让人见了多么好笑。我没有像琴琴那样有地位，没有萍萍那种艳媚多情的美姿。总之，没有男人们喜爱的一切。我的脾气更坏了。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脑袋瓜里好像少了些什么。昨天，场部放电影《创业》，那个章工程师的一句话："我这个丑媳妇不怕见公婆"。这话使我脸色灰白，浑身打颤。我这个丑媳妇怕不怕见公婆呢？哈哈，老天有眼呀，那位尖刻嘲讽过我的"光棍班长"竟爱上了我。起初，我怎么也不相信，但他是多么诚挚、热情、亲切。从此，我这个渺小的农业工人，请病假不用犯愁了，因为他是班长，可以批假。从此，我干不完的话不用担心被扣工资了，他会帮我干完。从此，在我的破草房里增加了他给我的小木凳子……这光棍班长怎么搞的？他那满脸胡楂竟狠狠地印在我宽厚的嘴唇上；他那双粗大的带硬茧的手使劲地揉着我的胸脯。他似乎不满足，永远地不满足……我的天哪！起初，我感到这一切太可怕太突然了，怎么能这样呢？突然，那些冷嘲热讽又在耳边响了起来。啊，我命苦，这下好了，满足了他。他永远不会厌弃我了。哼，你也没法厌弃我了，我心甘情愿了。当黎明将要来临时，光棍班长满足了，悄悄地环视了一下宁静的连队，象老鼠一样溜走了。他走了。我仰望茅草顶，唉，我苦哟。

——我命苦哟。真的，我命苦啊！他满足了！他抛弃了我！不！这怎么行呢？我不同意。可我又没有办法。我说不出口呀！真的，这些人世间公开的秘密啊，我简直说不出口。天啊，我的天啊！可恨那光棍班长！啊，天下的男人们啊，他们自私、肮脏、卑鄙、缺德！我快疯了，不顾一切地跑了，晕头转向地走啊。我来到了县城的大街。

啊呀，我还没有吃饭呢。耳边却传来了郁抑的音乐。咦，电影院！是《红楼梦》。听丽丽说过，这是讲爱情的。好，我不吃饭也要看。等着，耐心地等着。终于，我走进了烟雾腾腾、汗臭熏人的电影院……我……我……大声地叫了起来：“啊呀－－林黛玉呀！”我狂叫了。唉，我苦哟。

－－我命苦啊。那些可恶的男人们把我送到了派出所，说我是精神病、疯子。于是，我向一位女公安人员急切地说出我要说的话，郑重其事地说：“我命苦。我比林黛玉还苦。同志，你看我，多丑啊。没有人爱我。林黛玉多漂亮啊，可她死了。我命苦，同志，我命苦啊！同志，你们派出所能找人啊，你帮我找吧，林黛玉在哪里，我有许多话要对她说。谢谢你，同志。”说着这些话，我的心跳得更加剧烈了。林黛玉死了呀。在宝玉和宝钗隆重的婚礼声中倒下了。嗯，她安静了，死了－－我战栗起来。战栗到内心的深处：这样漂亮的人居然死了，那么我呢？我吓得毛骨悚然。于是我跑了，发疯似地跑了。林黛玉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我求她宽恕，求着，求着……

呵，爱情，多么可怕的字眼。我有过错。我以为最幸福的时刻正是在那疯狂的热恋之中呵！我是个人啊，决不应该那样干！我必须沉默！我不得不停留在我生命的荒漠无垠的原野之中。我害怕我的生命会缩短：澜沧江水滚滚向东流，我们队就在下游的江边，快把我放进这浪花之中，江水抬着我，顺流而下。去告诉他，光棍班长；告诉萍萍和琴琴，告诉支书和队长。然后，让我消失在浪花中，卷进湄公河，葬入太平洋那水中吧……

小燕还在说。

我凄淡地一笑……啊，林黛玉，是你的魂勾去了她？是林黛玉吗？

我想起了《红楼梦》七十回中林黛玉的一首词－－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

一团团，逐队成球。

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浪！

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

叹今后，谁舍谁收。

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流！

小燕安静了。

“我命苦”这是她自己的结论。

小燕终于安静了。

“这人戆头戆脑的！”这是众人给她的鉴定！

我呢！

我想，时间啊，是一位铁面无私的巨人，或迟或早会给每个人（包括伟人）作出真、善、美的鉴定，或是假、丑、恶的结论。

窗外，下起雨来了。

闪电如金蛇在空中狂舞，霹雷打断了门前的朽树枯木。

写于1979年1月东风农场十五分场

（50）我们的诗歌

1979年1月18日（星期四）

继续抄录我们知青的诗歌。我想，若干年以后，这些诗歌是历史的一个见证。

《北上誓言》

八年沉醉黄梁吃，

生死一别梦已尽。

请愿无罪北上坚，

项颈宁伺利剑刃。

丹心一片甘自由，

满腔热血争人权。

若能获得此物归，

先抛我颅何不可。

《浪声》

涛浪掀起愤悲潮，

八载苦水决堤哨。

四害毒注昨方知，

平冤昭雪看今朝。

赴京请愿泻心声，

旧恨昔冤滔天浪。

倾尽余勇伐四害，

还我青春回家乡。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北上请愿，在此期间，在西双版纳各个农场中，开展了一场捐款运动。我们从每个月三十多元的收入中，毫无保留地捐款给他们自己的代表。有一首诗这样写

《捐》

--为此上请愿捐款作

捐，

为了四化早实现。

别犹豫，

拿出青春献。

捐，

父母兄妹泪流干，

归心切，

八年不算迟。

捐，

数载岁月多辛酸，

心欲碎。

盼子家团圆。

捐，

该向四害讨血债，

同心干，

革命勇向前。

捐，

赴京代表已推选，

众知青，

同心表意愿。

还有一首《好了歌》也别有一番味道。这是写知青中几位“代表”的，知青们称他们为知青的败类———

知青都晓代表好，唯有升官忘不了。

张三李四在何方，早随四害殉葬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只有地位忘不了。

“卫疆”“小兵”在何方，早被人们唾弃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只有扎根忘不了。

铁心扎根在何方，城市内地早到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只有大家忘不了。

真才实学去不成，狼亲狗戚早走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真正代表在何方？

知青命运全不顾，那管菜少房漏了。

知青都晓代表好，真正代表出来了，

丁君惠民开头炮，知识青年齐叫好。

诗中写的“张三”指“白卷英雄”张铁生。朱四指朱克家。卫疆指原勐满农场党委书记、知青罗卫疆，小兵指原勐棒农场党委副书记、知青郭小兵。

这首诗是勐满农场的知识青年写的。同其他诗一样，在大量印发的油印诗传单上，知青们是不署名字的。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只要用诗来抒发自己真实的感触！

没有虚假，只有直言。有的诗或许还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当然对我们的罢工和请愿，包括这些诗，我只想说，知青们在说真话！在76年以前那个假话连篇的"文革"年代之后，敢这样说话，而且不止一人，是成千上万，这是多么值得我们对此进行一下反思啊！

谈不上同天安门广场“四五”的诗歌比较。但毕竟这些诗的背后，它所产生的缘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真的总是真的！这里，才是真的！真话！

（51）胆战心惊的日子

1979年1月19日（星期五）

在农场的这些年里，阶级斗争是天天讲、月月讲的。我们始终处于一种“恐怖”的精神世界里。

记得有一天，我们正要上山，天上的乌云翻滚而来。小E一见就说了一句：“要变天了。”是啊，马上要下雨了。这句话没有错啊。可是错了。走在后面的指导员听到了。他没有作声。

晚上，全连开大会，指导员不点名地说，要注意阶级斗争地新动向。有个别人就是想要变天。我们要提高警惕！原来，小E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吓得小E从此再也不敢“乱说乱动”了。

我自己就经历了一次“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过程。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场部通知我们到场部设置的灵堂上吊唁。

那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去吊唁。队伍走进灵堂，我突然发现一位老朋友站在那里在守灵。好久不见了，此时不能说话。我只能默默地向他点头示意。他也用眼神向我示意。

第二天，连队开大会，队长很气愤地说，据反映，有人在悼念毛主席时还微笑。

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啊！全连地人都吓傻了，谁有这么大地胆子呢？

大会结束后，和我关系较好的副队长告诉我，说的就是你！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连忙打了一份探亲报告，匆匆回上海探亲去了。要知道，我可是“右派分子”家庭出身，那个年代，惹上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行，麻烦可就大了。好在躲过了一劫！！

好了，现在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能怪谁呢？

一句话，一切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52）可敬的老工人

1979年1月20日（星期六）

我们都准备回城了，留下的是那些老工人。这些人有的是从湖南来到、有的是部队退伍的、有的是云南当地的。加上我们知青，就形成了这样的农场。现在，已经成为农场“主力”的知青突然要大撤退了，显然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事。这么些年来，与这些老工人天天相处在一起，现在要分别了，在感情上一下子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这些天，我们知青是基本不上班了，可我们的老工人还是在坚持岗位。

每天，我们还是能够听到队长老赖的叫声：“上班了。”只有几个老工人跟在他的后面上山去了。我曾经问过老赖，还叫啥呢？他说：“这是我们的责任呀。我们还要生活下去的。当然，你们是叫不动了。”每天，我们还要吃饭。我们可以看见退伍兵韩路在食堂里忙碌，到时就听见他的叫声：“开饭了。”他还风趣的对我们说，以后你们就吃不到我烧的饭了。

每天，我们还是能看见老苏夫妻俩扛着锄头下菜地去了。这对从湖南来的老工人可是我们队里的宝贝。他们就是有办法在雨季天保证蔬菜的供应，使其他连队的人好羡慕。

就要和他们再见了。这些与我们共同生活了多年的老工人，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体会到什么是“中国人的脊梁”！他们将在这一片土地上永远生活下去，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生生不息啊！

（53）难忘的一幕

1979年1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幕是我永远难忘的。

在我们去场部的崎岖小路旁，一个婴儿躺在包裹里。小孩很乖，睁大着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们。不时那张小嘴还

咧开冲着我们微笑。包裹的一旁放着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收音机下压着一张纸。我们几个把它捡起来看着。上面写的大意是，我们是知青，现在要回家了。政策规定，上海和重庆这两个城市的知青是不能一起回上海的。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离婚了。可怜我们的孩子，那位好心人把他收养一下吧。这台收音机使我们结婚时买的，也是我们唯一值钱的东西，就送给收养人吧。

我们无语。同去的小王是位女知青，她先哭了起来。现场的气氛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

我真的是无话可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知青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吗！就是如此的下场！孩子是无罪的，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今后，这孩子的命运将是如何呢？也像我们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一辈子？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大城市去了，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被当地的老乡收养了，结局会是怎么样呢？能怪这对狠心的父母吗？！你们就这样不负责任吗？这可是你们的亲骨肉啊。唉，这真是人世间的悲剧啊。

我们知青越围越多，谁也不说一句话。有的是凄惨的哭声。

一会儿，来了一位傣族“老咪涛”（老大妈），她默默的抱起孩子，拿起那台红灯牌收音机走了。我们默默的跟在她的后面，一直走到寨子里。忽然，一阵嚎啕大哭的声音在我们的身后传来，只见一位女知青发疯似的冲了过来。她一把从“老咪涛”的手中抢过孩子，头也不回地就逃走了。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老咪涛”连忙抱着收音机想追上去，可一眨眼，那位女知青已经消失的无影无终了。

我身边的小王说，这就是孩子的母亲。我认识她。

好了，孩子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我记下了这一幕，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

哦，我们苦难的知青！

（54）王震接见

1979年1月22日（星期一）

今天，得知农垦总局领导向机关全体同志传达了国务院副总理、老农垦部长王震，民政部部长程子华1月4日接见几名知青代表的谈话纪要：

王震首先表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广大知识青年的关切。

王震说：今天我同民政部长程子华同志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我们交交心嘛！我们两个老头

子来对你们讲清楚，请你们这些青年人务必要关心国家大事，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不妨同自己的父母、祖父母谈谈，看看这个道理对不对？你们闹事，不对嘛！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王震在听取了关于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语气沉重地说：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整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多少年的老同志。我被游了街，程子华同志也靠边站多年，我们的叶剑英同志，八十多岁了，老人家也受了苦。邓小平同志也一再被他们诬陷。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过去那些。中央已派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了。你们回去后也要帮助改变农场某些干部的领导作风。

当谈到知识青年的婚姻问题时，王震说：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有不少同志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像贺老总、陈老总、彭老总，都是三十多岁了才结婚。

王震勉励知青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立志建设边疆。他向青年们讲了唐大宗李世民与他的左右丞相房玄龄和魏征讨论创业难还是守成难的故事。他说：我们现在还在创业，这么穷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还要花很大力气，还要过困难日子。知识青年要在边疆安家立业，创造新乐园！

王震还很有感情地回忆说：你们西双版纳农场，周恩来同志、贺老总、陈老总都去过，我在北大荒过过春节，也在你们勐腊那里过过春节。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还可以养鸡、养鸭。把菜也种好，就是现在也能有茄子、辣椒吃。

王震最后对青年们说：你们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长一些，看远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请你们赶快回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贡献！

话说的都对，可就是没有我们知青需要的----回家的承诺！

现在，农场的知青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回家！回城！

（55）父亲的来信

1979年1月23日（星期二）

今天接到父亲的来信。到云南以后，父亲几乎每周要给我来一封信，大多是一些叮嘱。有时他也会纠正我回信时的语法错误，包括一些字，我写的不好，他都要一一纠正的。父亲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做事一丝不苟。工作又很

认真。我真的有点搞不明白，这样的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父亲的来信也许是很及时的。我把父亲的信抄录下来----杰儿：

来信收到。顶替的调令已经寄出，望查收。全家盼望着你早日回家。你妈妈为了你的调令，天天到我的厂里去，我很担心她的心脏病，可她就是不听。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你可要记住啊！

你不用担心家里的事。回来以后，我们家里总比别人宽敞一些。我和你妈妈商量好了，等你回来以后，我们在家里搭一各阁楼，你就可以和弟弟一起睡在上面。你弟弟已经在筹备材料了。总之，我们急切的盼望你回来。

我们在上海已经知道你们云南的知青在闹事，有的上北京去了。我知道你是一个正直的人，有时比较冲动，爱打抱不平。这既是优点，可又是缺点。记住我当年的教训，什么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要全面。二十年了，我能活下来，能看到自己平反的一天，已经是尚尚大吉的事了。我们已经经不起折腾了。望你切记。当然，也要服从大局。大家都在干的事，你也不要推脱，这毕竟是关系到你们命运的事。我的意思你应当明白。

回来时，一切以安全为主。东西可以不要，只要人回来就可以了。你有很多书，你弟弟也有很多书，那些重复的书就处理掉吧，减轻一些负担。

总之，我们盼望着全家团聚的一天！

父字　1979年1月15日

（56）其实他们是好人

1979年1月24日（星期三）

在云南东风农场这些年中,有好多领导对我的教育直到今天也难忘.由于文化的原因,有的领导也闹笑话。

1.那年搞批林批孔,我们连队的一位副指导员在大会上说:最近,在我们共产党内出了两个坏人,一个是林彪,一个是孔老二.2.70年,我们刚到农场,赶上毛泽东发表五.二0声明,指导员在大会上说:最近,柬浦寨出了两位英雄,一位是诺若敦,一位是西哈努客.3.评<水浒>时,一位副连长在会上读报说,水许(浒)上有个李达(魁),挥舞着两把大爷(斧),不当投降派.还有不少.绝不是讥笑这些领导。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文化少了一些,但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在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边疆的精神和对我们知青的爱,永远是令人难忘!记得一次上山砍树,我被一棵树击中,当场倒下了,是我们的连长把我从山上背了下来.后来他还专门烧了鸡汤到卫生所来看我,至今难以忘怀!他们是好人!

（57）要打仗了

1979年1月25日（星期四）

边境的局势紧张起来了。这几天，到处在流传越南人在我们云南的边境挑起事端，尽管与我们东风农场（大勐龙地区）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战争的硝烟已经闻到。在我们从景洪到昆明的公路上可以看见部队在不停的调动。到处是军人，就像前几年帮助越南抗击美国人一样，军队的大量出现预示着战争的来到。

我们这几天也在议论这件事。但大家更为关心的是我们何时可以回家。对于越南的行径，不少知青都在说，这么多年，我们省吃俭用支援他们，现在反过来用我们的枪炮来打我们，这叫干的什么事。我们在“文革”中干了多少蠢事啊。

好笑的是，农场有一位领导跑到我们分场，竟然要求我们分场的领导赶紧把我们知青集中起来，要准备打仗。还是我们分场的领导脑子清醒，说了一句很幽默的话：你把枪发下去，弄得不好，知青们首先要打贪官污吏。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搞得那位农场领导很没面子。

家里也来信，知道我们中越边境可能要打仗，十分紧张。父母希望我能尽快回去，担心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再发生意外的事。我想，还不至于吧。

总之，现在是归心似箭啊。

（58）我们知青的诗

1979年1月26日（星期五）

今天，我又抄到一些我们知青写的诗。不去评论这些诗的艺术性如何，但这是我们知青的真情实感。特记录于此----

忆秦娥 问天

别故乡，

坎坷八年艰辛尝。

实指望，

全家圆欢，

齐聚一堂。

几番省亲尽悲伤，

恰似梦中倚黄粱。

新凄凉，

洒酒问天，何日返乡。

清平乐 望乡

重口雾障，

登高欲远望。

历尽艰辛志未酬。

誓将枯骨归乡，

赤城肝胆相见，

团结一往无前。

今日呕心沥血，

笑迎春风来年。

西江月 集会

惠民三信飞勐棒，

今日勐棒人万千。

“恶帮”潦倒两年余，

激讨盛会已初开。

八年怒火似岩喷，

深苦怨仇当众诉。

勐棒街头群声齐，

还我青春何不成。

北上行

----北上请愿途中有感

历历沧桑尽，

餐风宿值营。

五万众志城，

盼我北上行。

红墙南海处，

请愿万人心。

急令南下归，

金鸡报捷日。

十六字令　手

一

手

扶着孩子把路走，

孩子笑，

仰脸眸母手。

二

手，

整理行装送儿走，

恩未报，

叫儿怎开口。

三

手，

梳理白发强按愁，

屈指算，

望儿归膝头。

四

手，

盼儿归来颤抖抖，

苍天啊，

要她伸多久？

五

手，

不向儿女索报酬，

归来吧，

愿儿不再走。

（60）在西双版纳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1979年1月28日（星期日）

今天是大年初一。这也许是我在西双版纳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已经知道可以顶替回上海了，已经开始在作回家的准备了。从1970年到今天，我在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过了9个春节。记得1974年的那个春节，我们知青在一起喝酒，然后唱起了那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抗日救亡歌曲：“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堂？”一时间大家热泪盈眶，有的嚎啕大哭起来。事后，我们被连队领导狠狠批了一次，说我们唱的是“大毒草”，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唉，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了。

我们云南知青大罢工已经有一个月了。大返城的浪潮真的有点势不可挡。大家都在做着各种准备，计划着自己的将来的路应该如何走。

我和几位知心的朋友一起做了几个菜，喝着从小商店里买来的烈性白酒。年年的春节都是这样，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干啥呢。今年喝酒的话题就快乐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青的命运将发生剧烈的变化。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就在今天了！爹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堂？------也就在今天了！

我就要离开这片红土地了。

今天，朋友们都在喝酒，狂饮，一醉方休。我有点头痛，便独自一人出去了。

可能是知青大罢工的原因，加上过节，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很安静。我来到墓地。此时，寂静的墓地里只有我一个人。身后的橡胶林在微风的吹拂下发出哗哗的声响。这里很静，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在我的面前只有沉睡的伙伴-----施德全。当年，他才15、6岁就来到西双版纳。今天，我们要走了，要回家了，可他却留在这里。

记得1977年的9月29日，德全临死前，他张着嘴，眼眶里流下一行泪水。这情景是永生难忘的。

施德全是来之上海市上海县（该县已撤销）的一位知青。我是73年到十五分场以后认识德全的。他比我们小两岁，不是应届毕业生。他有一个绰号“小猪锣”。德全个子不高，胖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脸。因为年龄的关系，大家都把他当作小弟弟。干活时他可是一员虎将。平时他和大家的关系很好。后来他调到其他连队去了。

德全是因为在上山砍竹子时被蜂子叮咬后受了重伤的。当时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十分震惊。场部领导十分重视，连夜把他送到景洪医院去抢救。可惜没有救回来。。

场部后来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因为我们曾同住在一起，我当时十分伤感，专门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德全下葬那天，我把写的文章放进了他的墓穴里。这里埋葬的知青战友，看见这里的一切，你能说我们没有感情、没有贡献吗！

再见了，我的兄弟，我的朋友。你安息吧。我相信，会有一天来看你的。

哦，大年初一，新春来了。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就这样，我们还将迎接明天！

（61）知青的诗

1979年1月29日（星期一）

今天是年初二，没有什么事可干，书也不想看。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回家的事。小张又送来几首我们知青写的诗，我抄录于此----

送别

汽笛一鸣别千里，

泪水未干父母还。

版纳八载尽悲忧，

穿吃住宿谁悬念。

父辈旧昔关东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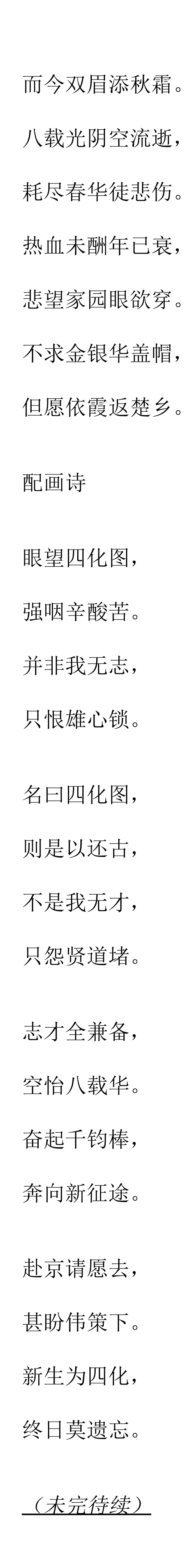
孟女泣声撼长城。

儿女何故困南国，

我盼明秋月重圆。

有感

来时少貌方十六，



而今双眉添秋霜。

八载光阴空流逝，

耗尽春华徒悲伤。

热血未酬年已衰，

悲望家园眼欲穿。

不求金银华盖帽，

但愿依霞返楚乡。

配画诗

眼望四化图，

强咽辛酸苦。

并非我无志，

只恨雄心锁。

名曰四化图，

则是以还古，

不是我无才，

只怨贤道堵。

志才全兼备，

空怡八载华。

奋起千钧棒，

奔向新征途。

赴京请愿去，

甚盼伟策下。

新生为四化，

终日莫遗忘。

（未完待续）

大返城的日子里【五】：

（62）赵凡，知青心目中的英雄

1979年1月30日（星期二）

赵凡，是我们知青心目中的英雄。

这是勐定农场的一位知青朋友告诉我的故事----一月下旬，刚到勐腊农场处理突发事件的赵局长，突然接到州委转来的中央办公厅给他的急电，告知中办接到勐定农场知青长途电话，称已全面罢工，并已开始绝食，要求答复回城的要求。中办指示他迅即赶往勐定处理一切。

勐定农场，地处1988年大地震震中区的耿马县，是滇西南的农场中规模最大、植胶最多、知青最集中的地方，5000多名成都知青占了云南垦区成都知青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当赵局长一行星夜兼程赶到这里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进场部的宽阔大道上，一千多名男女知青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用嘶哑的、呜咽的声音，有节奏地喊着："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望着这一令人心碎的场面，赵局长跌跌撞撞地跳下北京吉普，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赵局长哭喊着，去拉跪在地上的知青们，连声说："青年们、孩子们，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中央调查组的几位女同志，抱着几名跪在地上的女知青哭在一起。两代人都哭了。历经十年浩劫之后，两代人的心贴在一起。勐定农场场部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中，知青们那震撼人心的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一场早到的春雨洒落。细细的雨丝在勐定坝上空飘飘洒洒，似乎翠绿的勐定坝也在哭泣。

赵局长直起腰，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泪水，拉着一位知青的手，硬咽着，但却是那么郑重地向仍跪在地上的知青们保证："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知青们听得真真切切。顿时，他们的哭声、叫喊声、欢呼声响成一片。有的知青干脆躺倒在地，歇斯底里地吼叫着，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放松过。知青们真想把赵局长抬起来。

而此时的赵局长和他的同志们，却还没有从沉重的心情中解脱出来。他们比知青理智得多，知道事情的艰难。

后记：我记得．就在勐定坝的事情在我们知青中传开后不久，赵局长返回了昆明。很快，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的领导人和知青办负责人，于一月底在昆明参加紧急会议，会上果断作出由原动员地区尽快分期分批地接收云南农场知青回城的决定及部署。

（63）终于接到了调令

1979年1月31日（星期三）

终于接到了调令，我可以顶替父亲的工作，到上海第三机床厂工作了，可以回上海了，这是真的！我手捧着这一纸调令，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多少年了，就是盼望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们捐款的记录）

我连忙跑到小街的邮局，发了一份电报给父母亲，告诉他们调令到达的事情，免得他们挂念。

接下来干什么呢？来到农场快十年了，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带回去的。唯一的是珍藏的这几箱书。今天，我是边理书，边流泪。这是高兴的泪水。我把那些没有保留价值的书统统送给了永新（他因为和老工人的子女结婚了，留下来了）。其余的书整整打十包，每包估计有五公斤重。借了一辆自行车，跑了三趟到邮局，把这些书寄了回去。这可是我的“宝贝”。朋友们笑我，说还要这些书干嘛。唉，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就是爱看一些书吧。自己也没有其他的爱好。

哈哈，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64) 再见，德全

1979年2月1日（星期四）

我就要离开这里了。

今天，我们将在农场这些年来写的文章整理了一下。看见了写于1977年9月29日安葬施德全时的悼念文章的底稿。这篇文章在那天德全下葬的时候，我把它放进了他的墓穴中。唉，要离开这里了，我的心里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回家了，可德全他们却永远安睡在这里了！！！

施德全同志，你安息吧你就是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可我们还清晰地记得你亲切的慢声细语的话音，你那终

日带着微笑的脸庞。你驾驶着铁牛在崇山峻岭中，你挥动着板锄战斗在万倾胶林里。

你就是这样突然地离开了我们.可我们还在以前乘坐着南下的列车，还在一起倾听老农垦给我们讲场史，还在一起捧读毛主席的著作，还在一起行进在欢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行列中。

亲爱的德全，你就是这样离开了我们。虽然你不是牺牲在炮火连天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可你是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虽然你没有像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炸碉堡，可你是为了祖国的橡胶事业，为了培育千万株碧绿的胶苗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不死！

亲爱的德全，你就这样离开了我们。虽然你没有看见伟大祖国第28个国庆，虽然你没有看见祖国橡胶自给的那一天，可你不死！因为你无私无悔地战斗了一生，你的鲜血浇灌的幼苗一定会长得更加茁壮，茂盛，结实，挺拔。

德全，你的一生是如此短暂，才度过了二十二个春夏秋冬，可我们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踏上西双版纳的土地时，你兴奋无比，激情满腔，干劲冲天。然而你又是那样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你不愧为光荣的农垦新兵。

德全，你的一生时如此匆促，才走过八千个日日夜夜，可我们还记得当你第一次坐在驾驶台上，你的心里已装下了实现机械化的宏图，你的眼里已看到边疆的未来，光明的前程。你为之奋斗，你下决心努力。你不愧时光荣的拖拉机手。

当我们向你告别时，你还睁大着双眼在注视着我们。我们理解你目光中寄托的深情。德全，你放心，在你长眠的土地上，你千千万万的战友在描绘四个现代化的蓝图，建设富饶美丽举世无双的农场。在你安息的土地上，将会是胶水成河，牛羊成群，铁牛奔驰，花果满山的壮丽美景，你看到了这一切，我们就看到了你那欣慰的笑容。可现在，你却永远在西双版纳的土地上长眠了！

当我们向你告别时，你还张着嘴向我们说着什么。我们听见了你的话语。你在说，努力啊，战友们，为建设大寨式国营农场而奋斗。你在说，伙伴们，跟着华主席，继续革命。我们知道，你还有千言万语要和同甘共苦的同志们述说，你还有千歌万曲要向亲爱的党，英明的华主席纵情歌唱。你快唱，你快说呀。可是，你已永远地在西双版纳的土地上安息了。

啊，亲爱的德全，你此刻安详地躺在高高的山上，你一定不会寂寞的。你心爱的拖拉机永远在你的身边轰鸣，你尊敬的首长们永远在你的身边指挥战斗，你可爱的同伴永远在你的身旁，将你用鲜血浇灌的幼苗抚育成参天大树。

你永远在第二个故乡----西双版纳。

你永远在第二个革命大家庭----十五分场。

你永远在亲爱的战友----我们的行列中。安息吧，施德全同志。

死者青春常在!

你生前的战友 余杰 1977年9月29日

（65）大返城开始了

1979年2月2日（星期五）

我们知青的大返城开始了。

在农场的医院，只要你开口说要病退，医生们就会按照你的要求立即为你开出病例的证明，为你办妥各种手续。速度之快、效率之高是前所未有的。而这样的“速度”在知青罢工之前是想也不要想的事。

在车站，本来为保证知青两年一次的探亲，车辆已经难以保证。现在，这里每天是人山人海，几乎到了瘫痪的境地。加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打响，本来就狭小的公路更加拥挤。为了搞到一张车票，大家你争我夺，有点拳脚相加。一片混乱。运输部门只好动用大卡车来运送我们知青。

为了回家，最为悲惨的一幕发生了。不同地区来的知青，在农场结婚了，有了孩子了，现在为了回家只好离婚，将他们的孩子（有的是婴儿）送给老工人，傣族老乡，还有的甚至扔在路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在连队，知青们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具，生活用品送给了相处近十年的老工人。有的把衣物用品到处乱扔，放火焚烧简直是一副大逃难的情景。

开始走了，心情是复杂的。

说句心里话，对农场的干部和老工人，我们这次罢工也或多或少伤害了他们一些感情。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那些蛮不讲理的干部毕竟是少数。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就是方式方法简单了一些。他们是含淳朴的。否则，能有农场的今天吗？他们从创业开始，要一辈子在这里艰苦奋斗，我们则可以回去了，开始第二次人生的旅程。唉，人啊!

我们都走了。只有xxx还在。他找了老工人的子女，就要结婚了。今天，我和他一起上了一趟山，帮他拉一块木料回来。来回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来安慰他。我们要走了，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

（66）办好了回城的通行证

1979年2月3日（星期六）

今天，一切的回城手续都办好了。明后天就可以回上海去了。忙着联系车辆，整理行李。好在我最多的是书，已经通过邮局寄回去了。

手捧着回上海的“通行证”，真的是感慨万千。到农场第九年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我连忙给父母发了一份电报：“手续办妥，即日回家！”这八个字包含着多少辛酸和血泪啊。

现在一切是真的，这绝对不是在做梦了。我来到老工人的家里，一一向他们告别；我来到留下的知青家里，一一向他们说声再见。

顶替、病退、困退，反正你能说出一个理由，就可以办理回家的手续了。现在想想，在几年前这绝对是痴心妄想的事竟然来的这样迅速。如果没有我们知青的奋起，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啊，还是要靠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云南知青开了大返城的先河，我们云南知青是好样的！

（67）在农场的最后一天

1979年2月4日（星期日）

一切都联系好了，明天就可以回家了。今天是我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最后一天。

我来到了胶林，尽管我们的橡胶苗还很小，最长的才种下去三年，可是这里留下的是我们的汗水，是我们劳动的成果。抚摸着这一株株橡胶树，我真的很感慨。当年，我们曾经怀着建设祖国第二个橡胶基地的理想来到这里，历经风风雨雨，历经艰难险阻，育苗、垦荒、挖梯田、砍坝。唉，这一切都历历在目，今天要和它道别了。等到再过三四年的时候，橡胶树可以开割了，我们是见不到了。但愿我们的农场一天天好起来。这熟悉的胶林，熟悉的菜园，熟悉的森林，熟悉的大山。我们把一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你，我们为你付出了许多许多。

我漫步在这大山的深处，那碧蓝的天空、碧绿的森林、那潺潺的小溪、那崎岖的小路，这一切都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每走一步，就能想起这些年的一段段往事。我对着大山吼道：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大山没有回答。就像是一位沉默的老人在感伤、在感叹。这种情感是别人无法体验的。九年了，人生有几个九年呢？一切的一切都化为烟消云散了。一切要从头开始了。

今夜我无法入睡！

今夜我又听见了胶林的呐喊和朋友的呼唤：一切都结束了，该启程了！

（68）再见了，我的西双版纳

1979年2月5（星期一）

天还蒙蒙亮,一夜未泯的我就起床了.连队里静悄悄的.

都走了.一场席卷西双版纳的知青大返城已经使昔日喧闹的连队如此安静.分场的广播已经好多天不响了.原来的广播员是上海知青叫张燕炜,她和我一起参加了高考.后来,她上昆明读书去了.我是接到通知后,父亲打来了加急电报,说上海可以"顶替",于是我放弃了在云南读书的机会,决定回上海了.这样的早晨太不习惯了.以往,我们在起床号的催促下早就准备要上山干活了,可现在呢,仿佛这世界已经改变了.连队里还剩下5名知青,过几天也要走了.

拖拉机是昨天晚上就停在连队里的.我和殷广发(上海知青)把行李装上了拖拉机.开车的也是上海知青,他娶了农场的老工人的子女,只好安心在农场了.好在平时的关系很好,大家也就尽量不谈返城的事.

拖拉机发动了,我突然看见许多老工人的房门打开了,人们纷纷来到拖拉机跟前,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我强忍住泪水.队长老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以后有机会回来看看!"我连忙说:"一定,一定!"

拖拉机启动了,我一直回头看着他们.再见了!尽管我是归心似箭,我是多么想回到父母的身边,我是多么渴望新的生活,可这里毕竟是我的青春,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第二故乡啊.

从1970年4月24日离开上海,这一片土地上有我们的血和汗,由我们的奉献和付出.有我们的迷茫和困惑.我们是幸运的.那些长眠在这一片土地上的知青战友们没有等到这一天.渐渐的我看不见连队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们赌咒"文革",赌咒"上山下乡".于是我们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抗争.可以说,我们云南的知青是在为全国的知青打开了一条返城的通道.

再见了,红土地.

在景洪换车的地方,到处是我们知青.一位四川的知青扯开大嗓门说:咯老子以后撒尿也不朝这个方向!人也许到了一种极限时说的话是如此的极端.可有谁能理解我们知青的怨和恨!一派大撤退的景象.

明天就可以乘上到昆明的汽车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69）回家,一个太沉重的话题

1979年2月6日（星期二）

天还没亮,我们的车就出发了.由于返城的知青太多了,我们乘的是加班车,说好了是三天到达昆明.原来一般是要开四天的.归心似箭啊,最好是一天!

出了景洪,客车就驶入大山.盘旋公里上车还真的不少.迎面而来的是一辆辆军车,一定是开往越南前线的.现在,我们这里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知青在返城,解放军在上前线.同以往的心情截然不同,这一次是我向云南告别的旅程.心里总是在默默的说着:再见了!再见了!以往总是想着,嗨,还是要回来的.可真的走了,我尽可能的看着窗外的一切,心里在默默的说着,何时再能看到这一片红土地呢?

今天我们在思茅住了下来.驾驶员说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住到元江.路上要走十多个小时.

思茅是个好地方.它是专区.晚上,我们来到街上好好吃了一顿.街上人很多,主要是知青和军人.看见军人,就有点战争的味道.原本安静的边疆小镇一下子就成为前线了.我们知青对前方的战事似乎不是很关心,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见面以后谈的更多的是你是"病退"还是"顶替"?关心的是自己将来的命运.

我们是单身汉,一切都比较自由.那些抱着孩子的知青就比较累了,拖儿带女的.在旅馆的门口,我看见一对知青夫妇,男的是上海知青,女的是四川知青,小孩已经两岁了,长得很可爱.见了我就叫叔叔好.那位孩子的父亲告诉我说:"病退的手续办好了,就是要各回各的老家.孩子跟母亲走.爷爷和奶奶不同意,叫我们回到上海再说."我心里在想,幸亏遇上了这么好的爷爷和奶奶,要不然这个家就散了.我们离开农场的时候,有多少这样的知青家庭就此散了.最倒霉的是那些可怜的孩子.我是亲眼看见一位知青把孩子送给了一位傣族老乡的情景.妻离子散,嚎啕大哭的一幕就发生在几天前.这上山下乡造成了多少人间的悲剧啊!

旅馆里,更多的是喝醉酒的知青同伴们的哭声,叫声,骂声.一切似乎都在发泄.好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回家,一个对于知青来说是太沉重的话题啊,有多少血和泪啊!

（70）向邓小平他老人家磕三个头!

1979年2月7日（星期三）

元江处于哀老山脉,四面环山.可能是驾驶员知道我们的心情,傍晚6点就到了元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

我们入住的旅馆是县城里最大的旅馆,可是服务员对我们的到来似乎很不欢迎.一位服务员对我们说:"又是知青,告诉你们别在热水瓶里撒尿."天哪,竟然有如此的发泄!现在,一切的一切只要是与知青有关的,几乎是"破坏

者"的代名词.同车的一位知青愤愤的说,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就要在这里撒泡尿.还是在发泄.

明天就可以到达昆明了.大家都在默默的祈祷一路平安.十年都下来了,可千万别出事啊.这叫人提心吊胆的山路,谁知道会发生些事叫你哭笑不得呢.远方的父母此刻正在焦急的盼望者儿女的安全回家.

晚上,躺在床上还是想着回家的事.想想还是幸运的.我想起小学的同学陆国海.70年3月来到东风农场五分场工程连.当他写信回家时,我还去看了.因为我要在4月24日离开上海.从他的信中得知了一些云南的情况.后来,他在上山伐木时被大树压死了.我们是从小一起上学,又住在一条弄堂里的.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陆国海却永远留在版纳的土地上了.还有施德全,一个连队的上海知青,被毒蜂给咬死了.下葬的那一天,我把悼念他的文章放入他的棺材中,想必早已化为泥土了.他们没有等到今天,没有盼到回家的一天.这是一条条鲜活的年轻的生命啊!记住这些永远不能回家的知青伙伴们,在庆幸自己能回家的时候以及将来的日子里,多多安慰他们在天的灵魂.

在离开云南的时候,父亲来信说,他的右派问题要平反了.我听了以后很高兴.父亲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我真不明白这样的人会反党.舅舅告诉我,那时反右是有名额的.父亲所在的厂因为名额不够,就把父亲凑上去了.理由是在一张别人写的大字报上签过名.荒唐透顶!母亲曾告诉我,那年我6岁,父亲回家时抱着我痛哭说:"孩子,爸爸害了你."现在,终于都过去了.我不知道毛泽东在天之灵会不会安宁.现在,知青中谩骂,讽刺这位"伟大领袖"的话太多了.好在中国有了邓小平.同车的一位上海知青说,我到了上海火车站,如果那里有邓小平的像,我一定向他老人家磕三个头!

人心啊!

（71）再见了,云南!

1979年2月8日（星期四）

我们终于到了昆明,美丽的春城.

我们终于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

劫后余生的昆明啊,还是老样子.我们在一家破旧的小旅馆里住下.一位五十开外的女服务员听说我们是知青,显得很热情.她告诉我们,自己的女儿在思茅插队,已经嫁人了,回不来了.好像是见了自己的长辈似的,我们就和她聊起了知青的生活."哎,你们够苦的!"大嫂说着说着就流起泪来,吓得我们再也不敢说起知青的话题了.

我们几个商量,明天去火车站买票.晚上就去饭店改善一下肠胃.于是我们几个在短短三天相识的知青开始了狂饮.反正只要留够上火车的钱就行了.想想也是,在农场这些年,我们吃的是些啥?芋头,卷心菜,茄子.没有菜的雨季

天,天天吃"韭菜一汤". 该长身体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吃的. 该学习的时候,我们在挖地球,搞"文革". 现在都一把年纪了,我们回到上海,一切要从头开始. 总要成家吧. 想想有点后怕. 今后的路该如何走啊!反正今日有酒今日醉吧.

我们喝得醉汹汹的回来了. 有几位吐得厉害. 那位大嫂一边打扫,一边叹息. "都是爹妈生的,谁会叫子女受这份罪. 想出上山下乡的人,没屁眼!"

我的酒量还可以,还比较清醒. 我一面向大嫂表示感谢,一面要照顾知青朋友. 其实,在农场,这样的场景见得多了. 俗话说酒后消愁啊. 母亲为了我生了心脏病,病危通知书下了几次. 她还不告诉我. 后来我知道后大哭了一场,也大醉了一场. "儿行千里母担忧",好在我可以很快见到日夜思念的父母了.

住在隔壁的一位上海知青是水利兵团的,他在嚎啕大哭. 我不忍心去劝住他. 在车上他告诉我,他上山下乡后,父母相继病逝,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 现在可以回家了,家里只有一位瘫痪在床上的姐姐. 这以后的日子可真的是艰难啊. 他是病退回家的,以后的工作还没有着落. 相比之下,我还是幸运的,马上可以顶替父亲到上海第三机床厂工作. 哎,我们这一代人的命啊全由不得自己,一切听天由命吧.

再见了,云南!

你有我值得留恋的吗?

你留给我的是什么呢?

(72)广场上的一幕

1979年2月9日(星期五)

一大早去汽车站取托运的行李,被告知行李还没有到。我的心情一下子糟糕透了。同去的知青伙伴们都拿到了行李,我就劝大家赶快走吧。我只好在昆明等行李。

我又回到了旅馆。那位大嫂得知情况以后安慰我说:“别急,这几天你们知青回去的太多了。你就住下吧,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了。”

下午,我去火车站送同来的知青朋友上了火车。在火车站的广场上,我看见许多知青在那里变卖从西双版纳带上来的家具。因为火车站有规定,一个人只能托运二十公斤的物品。知青们只好忍痛买了自己亲手制作的家具。广场上成了家具交易市场。一个好好的大衣柜,那些昆明人竟然开价十元钱。这些人真是在乘我们知青之危来发财了。

忽然，我被一阵争吵声吸引了。

“你以为我们知青好欺的！”几位知青在一堆家具前指着围观的人群说：“十元，你开的出口。老子不买了，把它烧了！”

“你烧啊。”有人说。

“你以为我们不敢？！”

站在一旁的一位知青一言不发的拿出打火机，从地上捡起旧报纸点燃后，往一个书架上扔了过去。一会儿，书架被点燃了。愤怒的知青们把家具一件一件往火堆里扔。

广场上的空气一下子凝故了。

火在燃烧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人越来越多。我们知青们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成果在这里化为灰尽。火光中，一位位知青巍然站立着！

一位女知青哭了，怀抱中的婴儿惊恐的哭了起来。而更多的是脸色铁青的知青们。除了火光声，就是婴儿那撕心裂肺的惊哭声。这一幕幕深深的刺痛了我。我能做的就是走上去和战友们一一拥抱一下。

今夜，我注定要疯狂！

今夜，留给我们知青的是什么！

苍天啊！

（73）我的弟弟

1979年2月10日（星期六）

行李还是没到.

我又一次在昆明的街头流浪.想去找朋友和同学,但又忍住了.自己要离开他们了,太伤感了,还是一个人吧，也比较自由.

我来到翠湖公园.70年到云南时我也曾经到此一游,还专门拍照留念.一个人静静的坐在湖边,欣赏着美丽的湖面.不远处有两个小男孩在玩耍.弟弟不小心跌了一跤,那位哥哥赶紧把他扶了起来,还帮他拍拍身上的尘土.兄弟之情啊.我不由的想起了我的弟弟.

弟弟现在上海东风电焊条厂工作.我到云南后,他毕业分配时沾了一些光,可以留在上海进工厂了.为此弟弟总是把这件事挂在嘴上.其实,这不是我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69届中学毕业生是"一片红",全部要上山下乡.去年我探亲回上海时,云南的知青已经有了动作.丁惠民的第一张公开信发表了.我回到上海不久,就收到一份以农场党委的名义发来的电报,要求我速回农场.我当时就有所怀疑,可又不敢违抗.谁叫我是"黑五类"子女呢.后来才知道是知青朋友们发的,要我回来投入罢工的行列.可能是我还会写写,回来以后我的任务就是不断的为知青朋友们写各种材料.这也是应该的.在我再次返回云南的时候,弟弟送我上火车.临别的时候,他说:"哥,你一定要回来.家里再苦,就是吃咸菜汤,你也要回来!我工作了,我可以养活你!"火车启动的时候,我和弟弟都流泪了.记得我曾经对弟弟说过:"你以后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善良的人.以后我的孩子回上海到你家,这位婶婶要对他好一点,我就放心了".那时谁会想到我们还会回上海.

我和弟弟都喜欢文科.父亲是搞财务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就没有书读了.父亲一直要求我们多读些书,理工科我们不懂,就自学文科的知识.也许是这个原因,弟弟在厂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秀才"了,经常在各种报刊上能见到他的文章.可惜,我们是"黑五类"子女,他还是在干着拉丝工的活.这几年他自学了英语,水平还不错.我回去以后真得好好追赶啊.现在要搞四个现代化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学习快成为废物了.不甘心啊!

（74）我们总算盼到了

1979年2月11日（星期日）

上午,再次去汽车站,行李终于到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行李送到了火车站,办好了手续.今天下午我可以走了,可以回家了!赶紧给父母发了一份电报.

我还是回到了旅馆,向那位热心的大嫂告个别。相处几天，她还有点舍不得了。她一再嘱咐我路上要小心。临别的时候她哭了，天下知青的父母是一样的。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给她留作纪念的，就把一把指甲钳作为礼物送给了她。离开旅馆的时候，我走了很远了，回头一看她还站在门口向我挥手。

下午，当火车一声长笛启动后，我打开窗户，再看一眼那熟悉的昆明火车站。再见了，云南！真的要离开你了。虽然在这块土地上更多的是伤感，可毕竟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随着列车的加速，昆明火车站消失在我的视线之中。

我们这一节车厢都是返城的上海知青。与我同座的是三位上海女知青，都是勐腊农场的。我们天南海北的聊了起来，感叹我们知青的人生。那位叫小花的女知青说：“我们总算盼到了。”她告诉我一起到云南的女知青中，有几位嫁到宁波，苏州去了。当时是多么羡慕啊。现在呢，我们回上海了，结果比他们好。

结果？谁会知道今天的结果呢？首先要感谢丁惠民，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为我们知青呐喊！历史会记住这些在急流中奋起的带头人。今天，我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起，把握了命运，那么明天呢？

列车在云贵高原上行进，向着广阔的湘江平原进发。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75）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

1979年2月12日（星期一）

再一次欣赏广西的十万大山和桂林的山水.来来回回多少次了,今天的心情可以用欣赏两个字了.以往,只要一想到还有回来,再好的风光一下子就变的十分无味.

车厢里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我们知青.火车一停靠小站,站下的人只要听说这节车厢全部是知青,一下子就往别的车厢跑去.我真不知道这"知青"两个字意味着什么.从昆明出发到现在,也不见列车员来过.反正是知青,大概她们感觉也无所谓,我们的知青车厢反而十分平静.大家都明白这列火车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将开始一种什么生活.

闲的没事,我就看《契可夫小说选》.这是曾在《西双版纳报》当记者的一位上海女知青送给我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的眼前一下子看到了这个精彩的世界.要是在"文革"时,我在列车上看这样的书,早就被乘警没收了.身边的三位女知青又说开了.她们认为我们知青最倒霉,没有文化知识,担心回去以后能干什么.那位叫小花的女知青还好奇的问我,送你这本书的人是不是女朋友?因为她看见了书上的赠言.

好了,闲的无聊,只能如此打发时间.我们这些人是"小学的底子,中学的牌子",回到了上海以后,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会挖梯田,会种橡胶,剩下的是一无所有.这十年的"文革"闹得真是祸国殃民.毛泽东的错误祸及了整整一代人.虽然是林彪和"四人帮"搞的,但没有毛泽东的许可,凭着几个人能闹起来?我在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说不上什么,相信我们的后人一定会对这段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几千万人的大迁移,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毛泽东能办到,这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悲哀.从内心来说,真的要感谢邓小平同志,没有他,我们至今还在大山深处与天与地奋斗呢.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

（76）我们云南的知青是好样的

1979年2月13日（星期二）

明天，确切的说是14日的早晨5点我们可以到达上海了。

今天是返城的最后一夜。列车快要到向塘西站（南昌）时，车上的几位知青朋友提出了一个建议，今晚是返城的最后晚餐，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到车站上去买些酒菜来庆贺一下。于是大家把衣袋里剩余的钱都掏了出来，派了几个身高马大的知青朋友下去采购。晚上，我们欢聚在行进的列车上。尽管先前还不认识，但都是知青，而且是云南农垦的知青。一杯下肚，豪气冲天。唱歌的，朗诵的，感叹的，临别赠言的，号啕大哭的。更多的是留下上海的通讯地址，相约到上海安定后再相聚。这短暂的旅途生活就像人生旅途一样，相聚，分离，再相聚，再分离。

总得考虑一下工作吧，也得考虑一下成家立业吧。离家得时候是十七八岁，回来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可一想又打消了念头。拿什么去成家立业呢？有哪个姑娘会爱上我们这些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知青呢。不过我一点也不自卑。我们有人生宝贵的经历，有在广阔天地里锻炼出来的毅力和勇气。经历了风雨的洗礼，我们成熟了，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相信上帝是不会亏待我们这一群历经磨难的知青的。

夜很深了，列车行进在浙江鱼米之乡的土地上。今夜我们无法入睡。我们仿佛是在做梦。我们没有后门，没有关系，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尽管我考上了），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博得了回城的机会。一股热流是从我们云南开始波及全国的。就凭着这一点，我们云南的知青是好样的。

上海，你快敞开胸膛迎接你离别多年的孩子吧！

（77）上海，我回来了！

1979年2月14日（星期三）

上海，我终于回来了！这一次我不走了。

清晨5时40分，当列车缓缓停靠在上海火车站的时候，接客的人流涌向车厢。我看见了父亲。在拥挤的人流中，他是那么若不经风，好像一叶小舟随时要被这潮水般的人流挤翻似的。我全身探出窗外大声呼叫着：“爸，小心，小心啊！”父亲不知是那里来的力气，拼命挤到窗前，紧紧抓住我的手，生怕我再会离开似的，他不停的重复着说：“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弟弟陪着父亲一起来的，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哥，你怎么像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

是啊，三天三夜了。这拥挤的列车上，哪一次不是躺在地板上过夜的。好在平安回来了。我急切的问母亲的情况，父亲和弟弟告诉我说，只要你能平安回来，她的病就好多了。弟弟还告诉我，为了等我的电报，母亲天天趴在窗口等邮递员。有一天刚睡下，听见弄堂里有摩托车的马达声，母亲马上神经质地跳起来说，电报来了。结果一看是环卫的清运车。

火车站离家很近。弟弟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我们父子三人一起回家。在离家还有三四百米的地方，我突然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母亲。晨曦中她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人行道上。我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我飞快地跑过去紧紧地抱住母亲说“妈，我会来了，儿子回来了！”

母亲哭了。

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到家后，父亲拿着户口本要到派出所去为我报户口。我说，还没开门呢。可父亲说：“我去等！”我不好阻止，这种心情是难以理解的。

到了8点多，父亲回来了。六十岁的人像孩子似的，一进门就大声说：“户口回来了，回来了！”

回来了。

回家了!

一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

母亲的身体好多了。她告诉我是常吃中药的结果。我到家了，可她说着说着就是要流泪。我十分关心父亲的右派平反的事。父亲告诉我过几天就要下文件了。他很认真的说：“你们兄弟俩不错，没有和我搞什么划清界线。这些年连累你们了。”我连忙说：“这不能怪你的。”弟弟说“你一直是我们的榜样，为人正值和善良。有你这样的父亲，我们骄傲。”

一个国家劫后余生，一个家庭呢？我们还是幸运的。

今天，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渴望新的生活!

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全文完)

《大返城的日子里》写完后的感想

——我的知青朋友的热情鼓励

《大返城的日子里》一文断断续续发表有四个月了。在此期间，我的知青朋友们陆陆续续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衷心的感谢知青朋友，谢谢大家的支持。

邵玉玲是我当年在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五分场学校的同事，北京知青。现在她的博客很大部分是反映我们当年知青的生活的文章。最近，她发表了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系列文章，写的非常好。

在我开始发《大返城的日子里》连载的第一篇时，（12月9日）她就留言说：“我在《勐龙记忆》里，看了一些四川知青书写了的东风农场当时大返城的情况，给历史留下了一份很真实的资料，你的连载将从一名知青的角度感受这段历史！”确实，这是我想写这篇连载的动机。邵玉玲在12月19日又留言说----

“这个连载非常好，不是文人总结和归纳的大块文章，不是知青事后书写的回忆笔记，而是博主当时亲笔记录的《日记》，是“知青”自己书写经历的史实，这些保存了30多年的非常难得的资料，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笔研究《知青史》的宝贵财富！”

邵玉玲的留言一直是很有激情的。她说----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作家丁玲到东风农场参观,曾良久地驻足在橡胶林地边,问陪同参观的农场领导：“农场种植的橡胶林,知识青年一定出了力吧?”“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非常感谢她的鼓励----“余杰的每一篇日记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蹉跎岁月,记录着知青在广阔天地里的心路历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一定会有人说这是在讲故事!这令人辛酸的往事，是历史的悲剧，而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了！这是我们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年的原因所在！”

还有李再延大哥，他是北京55名知青之一。尽管在农场我们没有见面，他到五分场的担任党委副书记时，我已调到十五分场了。是知青的情结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经常到他的博客上做客。去年，再延大哥生了一场大病。好在好人有好报，再延大哥痊愈了。2月3日，再延大哥给我留言说：----

余杰：衷心感谢你的关心和鼓励！我现在上网受限制，不能及时给你留言和评论。浏览了《大返城的日子里》，让我感慨颇多。我相信，每一位上山下乡到西双版纳的知青，从他（她）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心底里都会盘算：何时回家？怎么回家？那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抗日救亡歌曲曾被知青深情传唱。“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堂？”

知青上山下乡是历史潮流所裹挟，而知青的返乡路却要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走出来，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多少次探亲时的离别更加重了对回家的向往。上调、参军、上大学、曲线返城都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知青的漫漫回家路，走了整整11年，其间的彷徨、希望、艰辛、痛苦、欢乐……，那些点点滴滴都是永远不能忘记的。记录下这些，远比那些唱赞歌的文章要有意义的多。现在看着在暴雪中民工艰难的返乡路，不免让我想起文革中知青漫漫的回家路。

还有一位老北京知青，署名“梦回山枕”，现在美国。今年我去美国出差前，她特意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留下她在美国的电话。可惜我在美国没有去费城，没能和她见面。她多次在《大返城的日子里》一文上鼓励我----

“余杰：你能将那段历史纪录下来，真是有心人。我当时在昆明上学，都是知青上来时给我讲的。惊心动魄！圣诞节来临，祝圣诞快乐！要注意休息！”

“日记太珍贵了，你也是个很执著的人，才可能留下这么详细的日记。拜读了！”

她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

“记得我离开农场时，我最好的朋友小胖子带我回到勐捧十营，和老营长对饮三杯苞谷酒，然后到了连队，一个小四川，为我抓了小螃蟹打了几只鹌鹑，祝我走得远远的，飞得高高的。我当时为了知青情谊很感动。最近，才知道那不是什么小螃蟹，而是仓库里的小老鼠。不管是什么，他们的祝愿是实现了。”

上海知青署名“山那边”的博客，她也是我们东风农场的知青。她的博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基本上记录了东风农场的知青的生活片段。她在我的博客上说：“在东风时，你和我一样，都到了新建分场新建连队。都是最艰苦的地方。从那儿走出来，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再也没有比那个地方更苦了。我们经受了最最艰难的磨练。”

“你手里有那么多的历史资料，如请愿名单等等，都很珍贵。因为当时我们很多人都已离开了农场。在看了你的介绍，才能了解东风农场当时的情况。慢慢写，因为还在上班。”

北京知青署名“春辉”的博客，一直是我关注的。都是知青，所以就有共同的语言。她在看了《大返城的日子里》以后给我留言----“感慨万千，我与你离开西双版纳的时间相差不多，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

她告诉我----

《报刊文摘》是上海办的一份报纸，3月14日刊登了一篇《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在返城这个事情上，云南知青当了排头兵，虽然“北上请愿”最后没有什么结果，但是为以后的行动做好了铺垫。《中国知青梦》里面写的更清楚，不知你看过没有？这部中篇纪实小说，我当时是边看边哭，知青的命运的确太惨了。你写的文章，知青都

有同感。十年呀！”

谢谢春辉的评论。她说：“我看完了你的知青经历连载，仿佛一切都历历在目，因为咱们都是知青。那张年轻时的照片与现在相比虽然外表判若两人，但他代表了两个时代，年轻时，英俊，有理想有抱负。人到中年，睿智，有阅历有业绩。其实这段经历也是一笔财富。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北京知青许平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你的《大返城的日子》我每一篇都拜读了，因为我当时没有回城，坚持在农场学校上班，所以大返城中的许多事件我不清楚，看了你的这些文章才更加了解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返城实在是不容易呀。我1991年返城，还是比较顺利的。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今年一月我从美国和日本出访回来，许平马上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美国回来了？又看到你的博客了。因为那时我已在农场成家，知青们忙着回城，我只能望尘莫及。而且学校知青走了许多，到了快停课的地步，我知道自己回不了城，所以只是老老实实在学校监守岗位，当时成了几学校的主力。”

许大姐的留言很多。在看了《一个知青的遭遇》这一篇后，她说：“看了以后，我无语。”“好在一切都过去了，祝愿王远成今后的日子快乐，健康。”“其实象葛XX这样的干部，当时还是有不少呢，我们11分场（水工队）就有一名上海知青被活活打死。当时农场太“左”了，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署名“行云流水”的博客是重庆知青高维。我们曾经一起在十五分场工作。去年，他开了博客。在30多年后，通过网络我们取得了联系。因为我的日记反映十五分场的事比较多，因此，高维的留言就很有“针对性”了。例如，我写到“两难的选择”，讲述知青在回城和爱情上的两难，高维留言：“不知道华老三当年的女友小苏现在过得幸福吗？我两次回农场都没见到她。”“当你重返农场，回到阔别多年的连队时，你会从老工人质朴的盛情中感受到他们对知青深厚的情感。韩路你是见不到了，再晚些回去可能见的老工人会更少。”高维是很优秀的重庆知青。恢复高考以后，他考上了中专离开了农场。大返城的事他只是听说。因此他说－－还是第一次看到原版的《请愿书》，写得很不错。“我们可以干最脏的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但只要回到父母身边，再苦也是甜的”，这一句现在来看是过了，但当时的心情可以理解。

高维告诉我：“当时我们机务队的知青写信告诉我，开推土机的都不干活了，可开轮式拖拉机却更忙了，成天要拉知青们去这里那里的，景洪都不知跑了多少趟啦。”

署名“岁月如歌”（博客）也是我们云南知青。他的博客很精彩。他的留言是这样说的－－“这段历史我还是在后来看《知青梦》知道的，因为那时我已经离开云南了。”“别看我也是云南知青，也许因为离开得比较早，没赶上最苦的那段日子，还真是第一次看见这类诗歌。”

“小豫”是北京知青，著名的55个。是我们这些小知青的大姐。我经常去看她的博客。看了我的记载以后，她

说：“今天看来如果说知青下乡还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是带去了科学技术，并普及和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品，给那里的年青一代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

署名“荷糖”，也是我们十五分场的重庆知青。也经历了大返城。她的留言是这样说的——“弹指30年以过，历史在你字里行间鲜活。”“那期间每一个人都毫无顾忌的在“请愿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争先恐后的捐钱捐粮票。我是亲历者。”

上海知青，署名“木瓜”也是我们一个农场的朋友。他说——是啊,觉醒!要做到真不容易.而且不同社会处境的人认识永远不会一样.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醒着的,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要觉醒首先要取消新闻管制和书报检查制度,如果没有不同信息的公开流动和历史事实的真实报道.各种观点公开的争论.那么,在谎言和欺骗下的人们,觉醒是多么艰难呵!

在网络世界，我还结识了一位老知青“董建华”。我也经常到她的博客上浏览。董大姐说：“您是否一直记日记的，当年的细节还记得那么清。”“看了一些您写的“大返城的日子里”，真好，历史的再现。您记录了当时发生的那些事，太有价值了。从您的文章里，了解了当时云南的情况，我们那时在北大荒，还不太知道这些事。看来知青大返城，还要感谢云南知青的大无畏精神。”

还有当年一起去云南的同学孙菲，在新年来临的时候给我留言说：“新的一年好!寄来贺卡收到,谢谢!发给你的信息想必也收到吧。看了你大返城的日子里的文章，感触很大，不知连队里的知青都看了吗？你能把照片保存着真不容易呀!这是历史的见证，非常宝贵。希望能看到你更多作品。再次祝你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事事如意、顺利！”

署名“华腾梦歌”，是我们农场的一位老同志。现在开了博客，办的相当不错的。他说：“你们返城前前后后的日子里，还在我的脑海中放映着黑白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还有许多许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总之，十分感谢知青朋友们的鼓励。署名“浪子大哥”的朋友建议：“老朋友：建议你将这些系列博文，好好整理一下，出版吧！即使要自己付费，也值的！我们只一代人真的是很不易啊！”谢谢了。

我只是作了一个知青记录员的义务。

把近三十年前的日记整理一下，写出了《大返城的日子里》。没有想到知青朋友们的反响还可以。从去年12月开始，断断续续发了77篇日记，其中因为到美国和日本去了一趟，中断了12天。有一篇还是在日本北海道的小樽发的，这世界真的不大。好了，终于完成了。算作对我们云南的知青朋友一个交代吧，也是“丑媳妇见了公婆”吧。

在这段日子里，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们给了我不少的鼓励，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3月22日上午，我正在上海的南北高架路上开车，手机响了。我听到了一位陌生人的声音。他自我介绍说，曾经是云南的知青，叫庄金凌。他是在上海知青的《浦江情》论坛上看到《大返城的日子里》的全文。他再三表示文章写的好，反映了当年的真实情况。据他说，是通过施大光得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因为我在开车，匆匆聊了几句。他一再建议我把这篇连载印成书。后来大光告诉我，庄先生现在在美国。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一位在美国的知青朋友，特意来电，实在是使我受宠若惊。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知青情结！谢谢庄金凌先生！

还有大光兄，是我们《上海知青网，云南频道》的主编。他在我的文章后留言实在使我不敢当－－－前星期，我们读了《南方周末》从版纳知青“高层”角度追忆与反思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史实。上星期，我们读了《云南日报》从知青领导层处理大返城起始事件的角度的报道，今天我们又从基层的版纳知青角度体会那场终结上山下乡运动的云南知青大返城斗争。

这场大返城运动对终结上山下乡运动，对当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对全国知青尤其是农场的知青以及他们的家庭和与之息息相关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今天，当我们处于“准老年”的后知青时代，重新回顾与审视我们那段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确实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既恨又爱的第二故乡，割不断的相思情，始终萦绕在知青的心头！即使是当年对第二故乡“恨之入骨”的大多数知青，也都曾做过多少“返乡”梦的哦。毕竟那里曾经有过我们难忘的青春时代——这样的知青情结，只有经历过当年风风雨雨岁月的知青才能有深刻的切身体会。

感谢“滴水湖畔”的文章！

大光也是云南知青，现在南汇工作。巧的很，由于上海洋山深水港工程的开发建设，作为深水港的一部分－－上海在南汇的东海边建起一座临港新城。我有幸参与了这个新城的开发建设。于是就到了大光的家乡工作。所以大光说－－“你的博客里，大多是知青与滴水湖的故事与感情。看着你对港城的不断跟踪报道与不断升温的感情，连我这土生土长的南汇人都自愧不如的啊。如果说，第一次的上山下乡，你是被迫的话，这第二次的“上山下乡”可是你完全自愿的哦。呵呵~~你是来“抢”南汇人的饭碗啊，呵呵~~这个星期起，南汇区政府四套班子已经搬迁到港城正式对外办公，到下月14日止，南汇区政府下属局机关都必须在港城办公（行政上直属市局的不包括，比如公安、检察、法院、工商、税务不在内）。港城又拉开了新的一页！可以期待，用不了几年，港城将更加美丽，更加展现其独特的魅力！”记得去年《知青，上海》创刊发行，是施大光打来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29日的聚会。原先我们不认识。是他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称我是“新南汇人”，并告诉我在06年他参加由南汇区委宣传部和我们港城

（集团）公司联合举办的征文活动中，得了一个二等奖。那天发奖的时候我也在，就是没有“接上关系”。这一切也是一种缘分吧。在上海知青网的云南频道上，有大光不少的文章，值得好好学习。

2006年南汇区委宣传部和我们港城公司联合举办了一次《我看港城发展变化》的征文，大光的了二等奖。没过多久，大光就在我博客上留言：“哈哈，原来你是新南汇人啊？去年港城举办“我看港城发展变化”征文比赛时，我见过你作为主办单位组织者出来发奖的，同时出来发奖的，还有你们集团公司的副书记（党委邵新华书记）。那次，我的文章得了个二等奖的呢，哈哈，有意思啊。想不到，你我还有版纳知青的缘分的啊。我乃版纳勐捧农场（原水利二团、十九团）的南汇知青大光是也，向你敬礼、握手！你的博办得很好，尤其是你大力推介港城的文章，令我感动，向你学习！”2006年9月21日在颁奖前，获奖者参观了我们的南汇嘴观海公园。上面是大光的留影。下图是他获奖的证书。

总之，通过博客结识了不少的朋友，这是值得庆贺的！

在《大返城的日子里》一文的连载过程中，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

一位署名“卢仗义”的博客朋友特意写了一首诗——

七律读余杰先生《大返城的日子里》有感

十载边陲风霜冷，

岁岁离情难煎熬，

劫波历尽终有日，

相逢一泣泪滂沱，

如烟往事逐波逝，

万千惆怅萦胸怀，

把酒向天独吁叹，

谁解我辈此时情。

特别是署名“无花果”的知青朋友，我也经常到他的博客上去做客。我的每一篇大返城的日记，他都留下宝贵的留言。每次一句话，每一句都把我所要讲的事“画龙点金”般地写了出来。真的是很感谢他。

我一一记得：顺风船、山城珠珠、平安就是福、陈丽潭、徐德文、山东冀成、郑宝宝、白头心儿、舒晴、历史上的今天、流浪闻英、骆宾王、草原红霞、蓝天白云、梅子、我是兔兔、浪子大哥、玲玲、倾国、驱邪先生、自由人、雁过留声、温凌辉、无我、高山流水、细语、秋天会回来、马弓手等等许许多多的朋友，在此就一一谢谢你们的留言和鼓励了。这些朋友把我的文章在圈子里转载了。

我把《大返城的日子里》放在《重庆版纳知青》网上以后，看到了署名“箩北太平沟”的朋友的留言----作为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一代人，我们不仅仅有过文革时代的无知愚昧，同时我们也有过知青磨练中的辛酸苦涩，更有过企业转制、下岗的迷茫与无助。这些组成了说不尽道不完的催人泪下的故事。

对往事的回忆，只是真实地记录那段扭曲的人性，原汁原味地保持那段历史的痕迹，今天我们揭开自己的伤疤，并非在向谁作忏悔更不是在炫耀、歌颂，当然也没有谴责之意，只是还历史一个真相，当然若因此能还知青们一个公道，这是我们梦魅以求的。

面对知青的经历，翻开每一页都是“泪与汗，血与火”的洗礼，过去的历史除负载在我们双脚上沉重的镣铐外，只留下了恶梦般的记忆。狂妄、荒唐、无奈、惆怅、思索、苦撑、奋起的过程已经结束。所幸的是我们还有时间与机会去回顾、反思这段难忘的岁月。

谢谢滴水湖畔的日记。

另外一位署名“mxy”的朋友是这样说的----我也是79年回城的知青，今天在3月19日的《燕赵都市报》上看到了知青大返城肇始者丁惠民的有关报道后，在百度搜索了丁惠民，找到了此网又一口气读完了余杰的十篇文章，才知道了许多当年的事情，真的感谢知青网、感谢余杰、感谢丁惠民，让我们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共同珍惜知青经历、珍惜今天、珍惜未来！

是的，让我们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共同珍惜知青经历、珍惜今天、珍惜未来！

余 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3



【插队云庄】之一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产生了写回忆录的念头。但是工作与家务的双重压力使我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2007-2-24自己病倒之后，才意外地出现了转机，而2008-11-1正式开张的“不老阁”与网络世界朋友们的互动交流，促使我二十年的夙愿得以梦想成真，而且逐步形成了纪实＋回忆的思路与架构。经过一年的摸索与尝试，终于初获成果——《插队云庄（纪实与回忆·1968戊申年）》“出版”了。

其中，我在八九十年代完成的4篇回忆录，约1.6万字，是自己最初的作品；2009-2，找到一些“知青文物”完成3篇说明，约1500字，到2009-10以后，在2008-12初步尝试整理自己的日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整理日记，陆续发到博客和论坛上，得到许多网友、博友、坛友、插友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建议，使我信心大增。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整理了1968-11～12的日记，形成16篇日记选，2.5万余字；结合新近找到的一些“文物”增写了6篇约8000字说明，专题回忆录4篇约1万字。

合计33篇，6.1万字，9件实物的图片15幅。

“纪实与回忆”的做法与常见的回忆录或自传等不同的是，我不是按事先的规划进行整体性的写作，而是把陆续写成和收集的“碎片”汇总起来，按照当年插队生活的时间顺序编排起来，其中一二十年前写就的也不予重写改写，以保留当时想法的原貌和变化的轨迹。这一次也是为尔后继续按年份形成《插队云庄》系列的一个尝试。

(1) 我打开1968年的日记

1968-11-19，告别上海，我开始了终身不忘的插队生涯，同时也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日记日程。

我的第一本日记本富有“时代特色”、具有“时代风采”。那是个100开的小本子，有塑料封套，当时最最流行的是“象征革命”的红色。除此之外还有天蓝、草绿等明亮的色彩，很少深色调、冷色调，罕见黑色的。这样的本子是“脱卸式”结构，内芯写完以后，可以换一个内芯，使得外面的封套能够反复使用，还便于清洗以保持整洁美观。这

充分体现了那个“节约闹革命”年代的鲜明特点。可惜的是，那样的塑料封套早已老化断裂而扔弃了。

当时封套正面留出了一大块透明的“窗口”，以供使用者根据自己的喜爱插入不同的领袖照、“语录片”、“革命样板戏”剧照。1968年那时候还没有恢复文革前就有的年历片。我是什么也没插，但白乎乎的又不好看，就自己动手，在内芯封面上、“窗口”大小的范围内，用红颜色圆珠笔写上：“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毛泽东”这样，就省去了买画片之类的“装潢费用”，还反映出这个本子的主人“有的放矢”地“学习最高指示”，每天写日记时也要提醒自己“执行最高指示”。（直到1970年初第一次回沪探亲的时候，见到许多新出的小画片，我选择了一张放在“窗口”里，自此以后日记小本子的内芯上不再自书最高指示了。）

打开小本子，扉页上又是自己手书的“时尚”口号：“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打开，是预留的两页，用于及时记载“毛主席最新指示”。这本日记本的使用期是1968-11-19至1969-01-31，在这期间共记载了四次“最新指示”。

第一次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和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后面另一页上又誊抄了一遍，并注明“11.25晚传达”。

第二次就是与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12-21”那一次了。我字迹潦草、断断续续地写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各地农村”。大概是当时听广播时记录的，但没有速记的本领，无法记全。所以，下面有一段完整的，估计是若干天以后从报纸上抄录下来的，并加上了引导语：“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第三次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第四次是：“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这后两条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像读天书了，说起相关的往事来，绝对是一言难尽的。

预留的空白页上还抄录了班主任老师给我的同班同学、同行农友的鼓励词：“给我亲爱的战友：一寸丹心三尺剑斩断绯绯儿女情立志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不回头1968.11.19上午于上海车站”。

除了封面封里扉页以外，封底内也抄录了两段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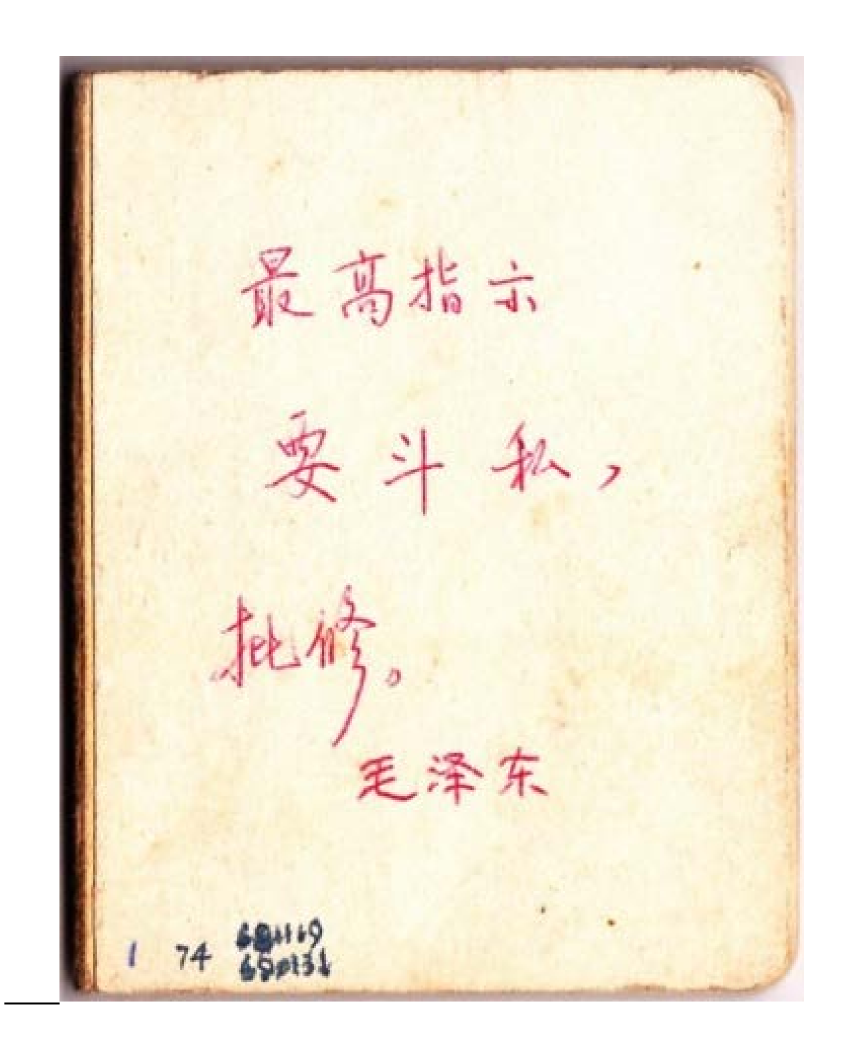
一段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毛泽东”。

另一段是当时的“励志格言”（当时是忌讳“励志”一词的，因为国共两党内战期间国民党方面有一个“励志

社”，所以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一最高指示，我们肯定不能再用“励志”一词了。而最常见的说法是“豪言壮语”）是典型的排比句：

“紧张的生活，可以使我们永远朝气蓬勃泥泞的道路，可以使我们立场永远坚定刺骨的寒风，可以使我们头脑永远清醒简陋的茅房，可以使我们生活永远简朴”

时隔四十年，人世间天翻地覆沧桑巨变；目睹当初自己的所作所为，重读当年自己的所写所记，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毛主席最新指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 再教 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干部

各地农村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毛泽东

艰苦的生活，可以使我们永远朝气蓬勃，泥泞的道路，可以使我们立场永远坚定，刺骨的寒风，可以使我们头脑永远清醒，简陋的茅房，可以使我们生活永远俭朴。

（2）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近日，在犹如汪洋大海的网络博客上，看到一段关于当年首批上海知青到江西插队落户的回忆文字：

当年我们是写了血书，到当时的市教育局毕工组多次表决心，成了全上海第一批到井冈山地区插队的1000人中的20人。因为我们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被分配的，因此这个社会大学的同学就是自己选择的，志同道合的。后来又增加了几个弟弟妹妹，这兄弟姐妹也成了社会大学的同学。其实，到农村后不久，我们便知道，在我们1000人之前，已经有十几个上海的学生自己跑来插队落户，因为相同的理想和信念，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好同学。我们这些同学共同生活了10年，现在还经常联系，每年都要不定期地聚会多次。

写血书，表决心，完全自觉自愿，相同的理想和信念……。多少年没有看见这类字眼了。

与此同时，又在网上看到早在2004年就发表在网络论坛上的回忆文字，详细叙述了写血书的经过。

1967年初，寒风刺骨，我徘徊在吴淞口码头。刚结束在上钢一厂轧钢车间为期一个月的所谓“学工运动”，准备回家休息几天，随后搬回学校。报上登出消息，要求学生返校“复课闹革命”。这是在“文革”开始时，号召学生杀向街头和社会的逆向运动。年底，上海市各中学酝酿拉队伍去农村，与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相结合。

第二年，受北京第一批去内蒙古插队同学的鼓励，我校以火晓星、阮一民和杨胜辉等为首的部分同学再度组织起来，联系去内蒙古插队，但当地的回音是等待明年。其时，自步行串联时便留在井冈山地区拿山公社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回上海作报告，我们与他们接触后，遂决定转向井冈山。我们与上海市毕业工作组联系，要求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务农，并请人特制了一面“井冈红旗”四个大字的旗帜，上面绣有“毛泽东思想五七钢一连”。

此时，上海市有关部门已计划组织1000名中学生，100人一个区，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几位高中同学作为代表频繁与毕业工作组接触，争取把我们列入计划，但我们大部分人的出身不过硬，面临部分同学被留下的局面。

为表示同进退，共赴井冈的决心，一位女同学提出写血书，该倡议获得积极响应。夏日的一个晚上，上海中学龙门楼西侧底层的一个教室里灯火通明，10多位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写血书以示心志。男同学用利器，女同学则以齿破纤指，就流出的热血用手指在纸上书写。俗话说十指连心，当时的各种表情不言而喻。血既少又稠，只能边挤边写，一会儿干涸了，便挥挥胳膊，转几圈抹一下。实在挤不出来了，去操场跑几圈，跑得浑身血液充分循环，面红耳赤的回来继续写。有人割到第二、三个手指，方得竣工。教室里熙熙攘攘，群情激昂，大伙都被自个儿感动了。我们每个人写一张，约两本《红旗》杂志大小，我写的是“做井冈人”。最后，大家合写了一张，“不到井冈非好汉”，约《人民日报》两个版面大。第二天，我们集队前往市革委会递交血书，一路高呼口号，途经徐汇剧场，在临街的墙上张贴了大标

语，“吃了秤砣铁了心，不到井冈非好汉”。在我们之后，学校里其他同学又拉出“吉林红旗”和“淮北红旗”两支队伍，分赴长白之麓和淮河之畔。　不久，我们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当时还有数位外校的学生慕名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至离开上海时，我们共有22位同学同行，全部去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县洋湖公社插队，其中10人在桥头大队枧头生产队，其余的去樟树下大队后坊生产队。1968年11月20日上午，我们举着“井冈红旗”大旗，作为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的青年，乘上西去的列车，奔赴赣江之滨。我母亲和弟弟妹妹来北火车站送行，这是一个难忘的秋日。

看到这样的回忆文字，五味杂陈，不知道如何描述作为那1000人中的一分子的心路历程。

我曾经钦佩，那20多位插友，意气风发写血书、满怀豪情上井冈。

我曾经遗憾，听说血书壮举，但无缘一见真容，无从知晓其经过。

我没有想到，足足四十年以后，网络让当年的同行者邂逅了。

我更加感慨，四秩风雨留在每个人脑海中的记忆是如此不同。

我更加觉得，要把尽可能完整、全面的史实留给后人去评说。

那在网上已流转多年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一件有价值的史料。

那在网上刚刚出现几天的博文，为多年前的回忆录作了佐证。

可是，它们反映出来的并非那个时代发生的那个事件的全貌。

1968年夏秋之际，上海计划首批组织1000名中学生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插队落户（文革前称为吉安专区，文革中改名为井冈山专区。其范围大体相当于现在的吉安市）。当时，上海的市区划分为10个区，所以，把1000个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个区，就是每区100人。当年也确实由区革委会的毕业生工作组举行过报告会，由1966年大串联期间，步行串联到井冈山地区，就留下插队的上海师范附中的同学介绍他们的情况，鼓动66、67届的毕业生到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

这就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在那时候知道的背景情况。

实际上，在此之前、之后的毕业分配情况绝非如此简单。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66、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

工”；而出身于“黑七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

当66届开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七类子女”！1968-8，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现在回想起来，“66届有去黑龙江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这件事就够耐人寻味的了。】

1968-10，在66届毕业分配高潮过去之后，67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登台亮相。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10月下旬，公布了首批“外农”去向和名额，全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名额1000人，去向是江西中部的新干、峡江两县。我所在的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我立即报了名。初步的日期安排是11-5左右公布名单，11-12左右集中行李，11-15离沪。

这时，父母正在郊区参加“三秋劳动”。他们和我都觉得，我是“外农档子”，到江西插队落户，肯定会被批准的，所以商定，一旦有确切的日期了，立即写信给父母，让他们立即请假回家，为我打点行李。然而，公布名单的日子拖延到11-8，而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比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政审要求”差不多。于是，我又忙不迭写信给父母，“解除警报”。

11-15上午，父母结束了三秋劳动回到家里。一家人说到我面临的变化不定的分配情况，都茫然不知所措：“外农档子”去不了黑龙江兵团，又去不了江西插队，那么“出路”究竟何在？

与此同时，又是突如其来的变化。11-15一早，“早请示”的时候，一位曾经报名的同学被突然通知去江西插队。原来，到11-14为止，原定的指标（每区100人）只完成了四分之三。区革委会毕工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更加没有想到的是，11-15傍晚，又突然通知我也去江西插队！（详见《人生第一步》）

就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我的“政治待遇”来了一个180℃的大转弯！从“政审不合格”成了“首选对象”！如果说，我们学校4位“正选”的“首批插队落户红卫兵”虽然都不来自“红五类”，但还算得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那么，11-15突击完成指标而确定的4名，就无法用先前的道理来解释了：我是出身于“黑帮分子家庭”，另一位同班同学是有海外关系的，还有两位就更“邪门”——不仅都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而且都还是68届初中生！重演了“66届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的一幕。

至于那“每个区100人”的指标，还是没有完成。

至于同行人写血书表决心的事，是到了江西才听说的。

至于这个号称“首批1000人”的群体中，究竟有多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报名“的，没有人做过调查、分析、统计。

那个年代啊，阶级斗争、阶级阵线、阶级队伍、阶级觉悟、阶级教育、家庭出身、家庭成份……都是怎么一回事啊！

时隔数十年，文革在一些人心目中已经淡化甚至异化了。作为一个亲历者，我要记下这些真相细节。

（3）人生第一步

我的十篇“一”系列中，这一篇并不是最早写成的。现在是按照其中叙述的事情实际发生的时间来排序的。这次是把十多年前的“原创”原样拿到网上来“晒”了，只是对一些因为文字处理软件从WPS、WWS、英文版WORD到中文版WORD的不断变化而造成的错误作了纠正。

需要说明的是有一处“历史错误”。文末说：“1968年11月15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最终决定；这是在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四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其中提到的“一幢四层楼”应该是三层楼。那是嵩山路路西、拐角上的一幢房子，1968年还是“原汁原味”的三层楼，我们下乡后若干年上海为解决居民住房的紧张状况而刮起“加层”风时才变为四层楼。不过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从谷歌、E都市等网站上可以看到，嵩山路以西、太仓路以北的那个地块已经成为一片工地了。（08-11-02）

每当如今的中学生们高谈“十六岁的花季”时，我总要回想起自己的十六岁那一年。那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1966年初夏时分，初二年级的升级考试即将进行之际，大革文化命的狂飙横扫神州大地，从此，我就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莘莘学子一样，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到了1968年夏秋之交，我们这些初二学生就被宣布为“67届初中毕业生”，进入毕业分配阶段。这时，我刚满十六岁，就面临了跨出人生之路第一步的重大抉择。

当时，伟大领袖的“12.21最新指示”尚未发表，66、67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还不是后来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片红”，而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在“家庭出身论、家庭成份论”横行天下的那个年代里，“四个面向”是有相当明确的指向的，出身于产业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家庭的“红五类子女”因为“根红苗正”，可以不必经过艰苦的劳动来“改造世界观”，故可直接进入“军工”或“普工”（指军事工业企业或普通工矿企业）；出身于职员、店员等“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可进入“普工”；而出身于“黑六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黑帮分子----泛指“文革”中“揪出来”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等）家庭的，则必须进行艰苦的世界观改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

限”，因而毕业分配的去向理所当然地就是“郊农”（上海郊区农场）和“外农”（外地农村）。早在66届开展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算”了“命”，我的去向非“外农”莫属。因为我属于“黑六类子女”！

1966年“文革”初起之时，我的爸爸就被打入“牛棚”，“罪行”是曾经发表过几篇与“三家村”中的吴晗观点相近的文章，“名为学术讨论，实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于是，年不满四十、名不见经传的爸爸一夜之间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爸爸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妈妈作为“牛鬼蛇神”的妻子，即被冠以“苍蝇蚊子”，也被列入“另册”；再加上爷爷有所谓“历史问题”，我们一家真是倒霉透顶了：家里两代“黑”，“扫四旧”时被抄了家；以后又被扫地出门，全家三代七口人被“压缩”到十多平方米的斗室中；“群众专政”开始后，黑漆大门上常常被勒令并排贴上两张白纸“认罪书”；邻里都把我家“视为畏途”，不懂事理的小孩更是连我们兄妹几个都敢欺负，走在弄堂里，常常遭到他们的袭击，石块、唾沫，辱骂、冷拳，而我们岂敢评理，更妄论反击，唯有忍气吞声，眼泪往肚里流……。这是一段极为痛苦的日子，生活在“精神地狱”中的我急切地寻找一条解脱之路。

当66届毕业分配去向中有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多余名额向67届开放时，我就报了名，结果是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黑龙江兵团直接面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需要挑选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去“屯垦戍边”。当67届的毕业分配方案正式公布、我被明确无误地列入“外农档子”后，我对上山下乡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68年10月底，首批“外农”去向和名额公布后，我立即报了名。那是全上海第一批插队落户名额，全市1000人，去向是江西中部的新干、峡江两县。我所在的东风中学有4个名额。然而，到11月8日公布名单时，我又“落榜”了，原因是，这首批插队名额的“政审要求”较高，与去黑龙江兵团的“政审要求”差不多。这一下真令我茫然不知所措：我的“出路”何在？……谁知就在此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转机。

11月15日一早，我们照例来到大操场上参加“早请示”仪式，排在队伍末尾的小费突然被毕业分配工作组（毕工组）的余老师叫到一边，余老师问小费：“去江西插队的人数还不够，你曾经报过名，现在让你去，你去吗？”小费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去，去！我去江西插队！”老师让小费立即回家准备行李，因为11月19日就要出发，只剩下4天时间了。班主任薛老师对迷惑不已的同学们介绍了这一“突然事件”的原委：原定全市首批去江西插队的有1000个名额，卢湾区为100个名额，但是直到昨天（11月14日），只完成了四分之三，为此，区革命委员会毕工组昨晚开了紧急会议，动员凡曾报名的同学行动起来，争取完成去江西插队的任务……。

我的毛笔字还算可以，所以，大家推举我为小费“被光荣批准赴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书写大幅大红喜报。当我蹲在地上、摊开红纸的时候，刹那间，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让我也立即去江西？但是，我很快自我否定了：不会，不可能！如果真要我去江西，为什么不在通知小费的时候同时通知我呢？再说，前一阵子已经告诉我，我的“政审要求”不合格，小费虽然不是“红五类子女”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点“海外关系”，总比我这“黑六类子女”强。这么一想，我也定下心来，蘸饱墨汁，挥笔疾书，很快就在一片称好声中写完了喜报。

下午，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和班主任等老师一起来到市中心人民广场和外滩等处，同小费以及先前获准赴赣插队的小徐、小刘、小金、小李等合影留念，度过了依依惜别的半天。回到学校时，已经天黑了，大约是五点半左右。大家说说笑笑地涌进校门，只看见同学小周疾步走来，高声问道："小王回来了吗？"我应声道："在这儿呢！"话音未落，小周一步冲到我跟前，说："快回家，快回家，老师上你家找你去了，要你也去江西！"什么？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耳边又明明白白地传来小周的声音："去江西的人数还没满，想叫你也去江西！"去江西！现在刚刚通知我！我惊呆了，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脑子里一片混乱。在小周等同学的催促下，我才想起，此时最要紧的是赶快回家！一是老师在那儿，二是要和父母家长商量。

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家里，老师已经离去，爸爸妈妈见我姗姗来迟，很不高兴，但又不便厉声责怪我，因为这是关系到"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大事，纵然我回家再迟，也不可加以叱责的，更何况在当时爸爸还是"带罪之身"呢？我和全家人胡乱地吃着晚饭，商量着该怎么办。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敢为我作主，要我自己拿主意。

在短短的一餐晚饭时间里，我真的想了好多好多。我想到了"文革"两年半来全家的逆境，想到了向往已久的逃离"精神地狱"，如今机会来了，还犹豫吗？再一想，我走了，也许可以得到解脱，可家里其他人怎么办，他们的日子将会怎样？……我忽然想起，"去江西插队的政审要求和去黑龙江兵团差不多"，这可是很要紧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我到江西插队，学校里一定会来报喜，这样，我家大门上将会出现一张极其难得的大红"喜报"，取代那触目惊心的白色"认罪书"，这会使家人在里弄里的日子好过一些，这样，不仅我自己能获得某种解脱，对家人也有好处……。再说，已经获准去江西的小费、小徐、小刘是我的同班同学，小金、小李我也都认识，和这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互相照应，恐怕也是难得的机会。……于是，我向全家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到江西插队落户去！爸爸妈妈和爷爷都不做声，慢慢地向嘴里扒着饭粒，饭桌上一片沉闷。

吃过晚饭，爸爸妈妈和爷爷开始为我打点行李，我则来到学校，来到班主任薛老师的宿舍里，还有好几位要好的同学也闻讯赶来。老师和同学们都对我去江西插队感到担忧："你这么瘦小文弱，能行吗？"我心中的矛盾、痛苦实在无法如实相告，只是简简单单地回答说："我想，能行。"除此之外，我再也不说什么。老师同学也不再追问，一起为我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完成行李的准备而出主意、想办法，大家分了工，各司其责。我说不出是喜还是悲，默默无言，唯唯诺诺地听从大家的安排，直到九点多钟，大家才散去，各自回家。

班主任薛老师说要送送我，就和我一起沿着嵩山路缓缓南行。老师再一次关切地问我："对插队落户的艰苦生活，你有思想准备吗？"我说："我是外农档子，我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薛老师又问了一些行李准备方面的情况，我见时间已晚，就让老师留步，早些休息。老师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下，又象是鼓足了勇气似地以一种沉重而缓慢的语气对我说："这件事对你来说是太突然了，太急促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说不去，还是允许的。"我惊讶地望着老师，不知该说什么，脑海中刹那间又成了一团乱麻，"去，还是不去？"老师又说："直到现在为止，你赴江西插队的批准书还

在区毕工组，还没有正式下达到学校，所以，现在改变主意还是可以的。”老师静静地等着我。我抬头看老师，只感到在沉重的夜幕下、初冬夜晚的寒风中，老师的目光是那么温暖、慈祥。我心头一热，眼眶湿润了……。耳边又传来老师的亲切话音：“这是人生的大事，插队落户肯定要比农场艰苦，小费、小刘、小金他们的身体条件要比你强，你又比他们小一两岁，你可要慎重考虑啊！爸爸妈妈对你去插队放心吗？”一提到爸爸妈妈，我忽然清醒过来，一种强烈的“逃亡感”（摆脱“精神地狱”的要求）再次战胜了我：“插队去，到江西去，快快离开这样的环境！”再有，薛老师此时的处境也不容乐观，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已经开始明显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矛头指向了他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倘若在此时刻我突然“变卦”，岂不给老师带来麻烦？然而，我不可能和盘托出我的全部真实想法，只是说：“反正是外农档子，早走晚走都一样，就到江西去吧，有那么多熟悉的同学在一起呢。”老师似乎心照不宣地理解了我的内心苦衷，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多保重，注意身体……”他的双手是那么有力，和我握了许久许久……。

这是1968年11月15日，一个初冬的夜晚，我“自主”作出了人生第一个重大的最终决定；这是在嵩山路靠近太仓路的丁字路口，一幢四层楼房下，成为我跨出人生第一步的起点！从此以后，每当我经过那里，总会在脑海中重新浮现出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1995年9月28日附记：

日前，《人生第一步》中提到的小周看了此文，认为所述与他的记忆相符。他说：“我直到今天（也就是时隔27年之后）才了解您当年作出人生第一次重大决定时的内心世界！”是啊，我原本就比较内向，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我更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使别人无法窥探我的内心。

小周还清楚地记得，当他一听说要我也去江西插队，十分着急，可四处都找不到我，所以看到与我一起外出拍照的同学回校时，赶紧大声发问找我。他着急的不只是我还蒙在鼓里，而且是认为我不宜去插队，因为我是个“文弱书生”，身体条件不如小费、小刘他们。当他找到我以后，还明明白白地对我说穿了这一点，可我却一言不发，使他十分费解，也成了他心头一个二十多年不解的疑团。直到此次见到我的这篇回忆录，方知其中原由。

我虽然记不起这一细节，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怎么会把自己心中的痛苦随便告诉别人呢？打那以后，我自己也把这段流血的内心独白深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几年，才与极个别知心知己偶尔触及这至今还令人隐隐作痛的伤疤。

（4）细说1968-11-16通知书

我是上海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11月19日离开上海，20日到达江西省新干县鸡峰公社云庄大队云庄村插队落户。当时是如何作出这个决定的，详见《人生第一步》。

当年11月16日——距离出发日11月19日只有三天——发给我“通知书”，其顶端“最高指示”的内容还不是“12-21最新指示”。因为“12-21最新指示”是我们到达第二故乡之后一个月又一天发布的。所以，这是这份“通知书”的特别之处。

对于上海知青、上海家长、上海家庭来说，这份“通知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12-21最新指示”发表之前，上海对毕业生分配的方针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到了12-21以后才实行“上山下乡一片红”。

当年的生活用品供应十分紧张，凭“通知书”可以少量供应若干品种。我的那张“通知书”背面有三项记录：

背面放大图

（1）甘油。这是当年最主要的护肤品，属于紧张商品之列。但是一个知青也只能买“25□2并”。□难以辨认，可能是ml（容量：毫升），“2并”即2瓶的意思（“瓶”被不规范地简化为“并”）。后面“瑞金”两个字，是售货的店名。

（2）只是一个方形章。“国营利用旧花布什品商店革命委员会西藏路服务部西藏路号电话293393”。当年，凡是售卖修旧利废的用品店就直截了当用“利用”作为店名。“旧花布”，并不是狭义地指旧的花俏、花花绿绿的布，因为沪语中的“花布”还有广义的“品种繁杂”的意思。至于“什品”，是现在鲜见的用语，意即“杂品”。所以，这店家是出售那些利用旧而杂的布制作的杂品。没有写明所购物品的名称、数量。我也记不清究竟是什么。但是八九不离十，无非是挑担子时的“护肩”之类。

（3）电池。这是当年绝对紧张的商品之一。所谓“大电池”，就是指1号电池。“4只”，即4节。记得当年我们全家都在埋怨，4节电池够用几天？就是苦苦哀求，也未能多买一节。这个细节曾经在我心头掠过一丝阴影——上山下乡的许多具体问题似乎遭到冷遇啊！末尾那个红色印泥盖的长方形章“培红电料商店”，则是当时的售货店。记得此店离我家不远，大约四五百米路，它位于西门路（80年代初恢复60年代初的名称“自忠路”）上，坐北朝南，在与济南路相交的十字路口西侧，是三开间的门面，这在当年也算是不小的了。不过此处在90年代后期已经夷为平地，成为与上海新地标“新天地”相邻的人工湖“太平湖”的一部分。（09-02-09初稿，02-28修改）

——

最高指示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通知书

同志：

你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坚持走下乡上山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光荣的被批准去 江西 插队落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望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去，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鍛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奋斗。

上海市卢湾区革命委员会毕工組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注意事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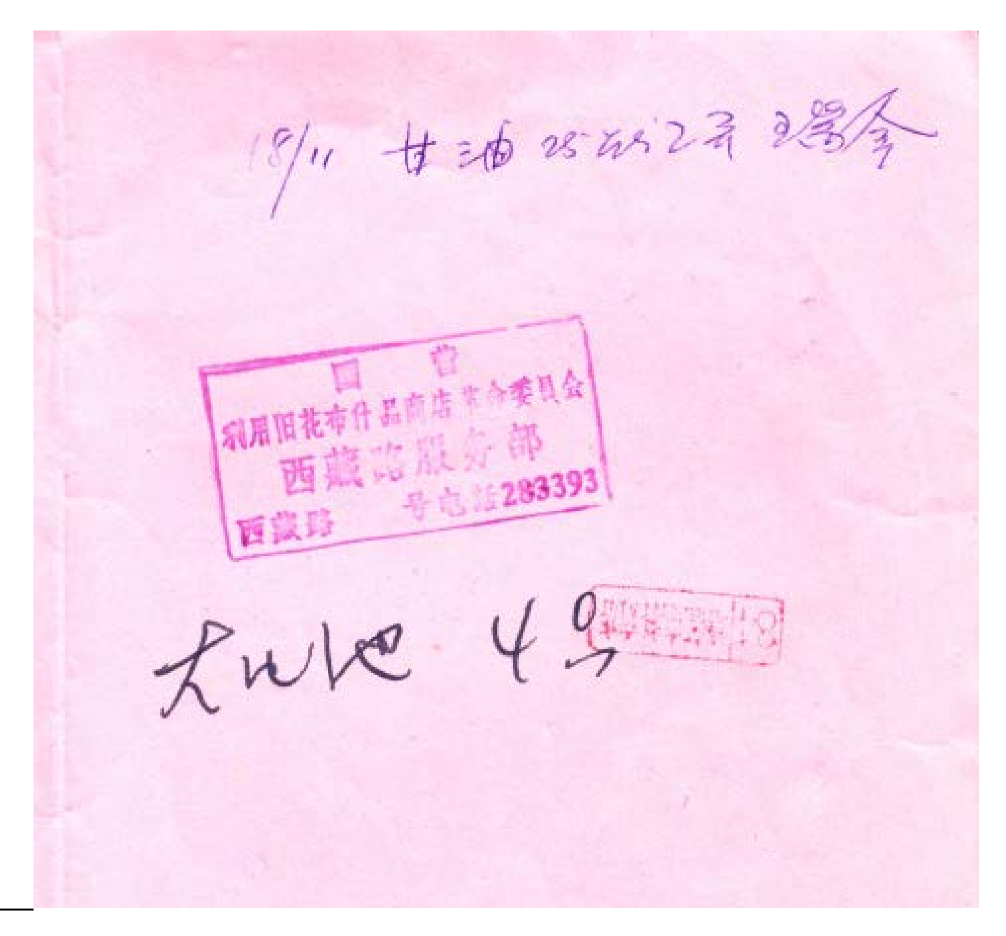
一、请凭此通知于 11月17日上午 时办理报到手续，

二、报到地点：本校毕工组

三、携带油粮户口转到 江西新干县鸡峰公社

四、行李等物请于 11月18日上午十时送到 北站 集中。





（5）慷慨激昂的1968-11-17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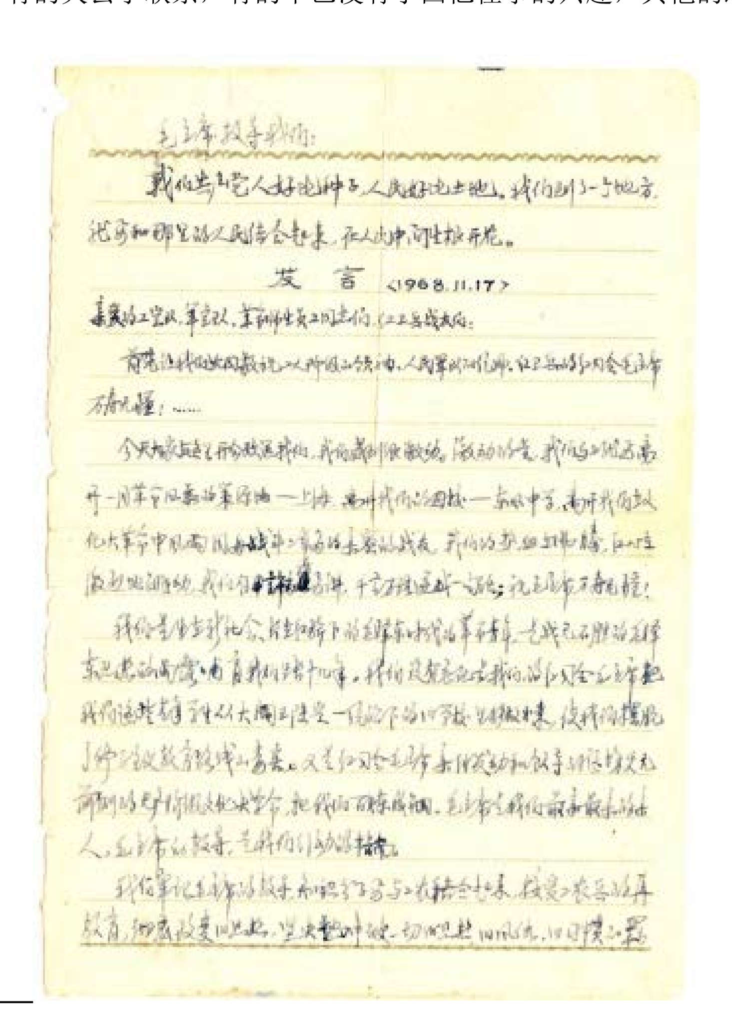
今天在我1973～1974年的一本笔记本里，无意之中看到随意夹着一张折起的纸头，打开了一看，使自己大吃一惊，居然是1968-11-17在母校欢送赴江西插队落户大会上的发言稿。

在那张旧纸的右下脚，特别注明：“刘××执笔并发言”，“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重抄于云庄。（赴赣已四年又五个月）”。所以，这份稿子并非原物原件，而是抄写的复件。

对这次大会，对这次发言，我已没一丝印象。相信那个大会也一定会拍照留念，但后来从未有人提及，恐怕也没有人保存至今。当然，我们这些都是平民百姓无名之辈，不会有人看重这些废纸堆。问题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对这样“隆重”“热烈”的场面也会失去了记忆，说明了什么呢？这么多年来这样的形容词实在听得耳朵里生老茧，而真正在心目中留下了什么呢？

我全然不记得自己曾经在1973-4-18特地抄录这份发言。应该说，当时的大环境是，在下乡四年多的时候，我们最初的天真幼稚已经成为过去，同伴中“自谋出路”的不乏其人，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我有意特地抄录这份发言稿，以永久保留收藏？至于那次抄录活动的小环境，则有待整理自己当时的日记了。

不知道当年起草、发言并收存原稿的刘同学是如何处置这份发言稿的，他已经在世纪末因绝症告别人世。其他几位同学，有的失去了联系，有的早已没有了回忆往事的兴趣，其他的还记得自己有过如此慷慨激昂的发言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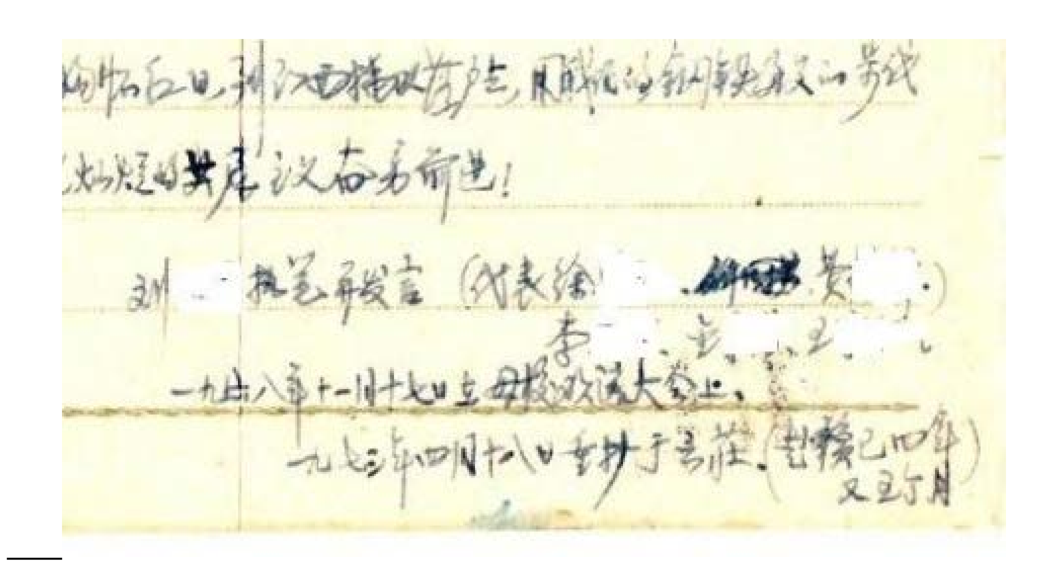


毛主席教导我们：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发　言（1968.11.17）

亲爱的工宣队、军宣队、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将来的一日，到江西插队落户，用我们的钢铁意志的劳动…

…共产主义而奋勇前进！

刘　执笔并发言（代表徐　　黄　　李　彭　王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在母校欢送大会上。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八日重抄于吉安。

网中人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纪实与回忆·1968——

【插队云庄】之二

（6）爷爷留下的一份“不完全”支出清单

近日，适值祖父祭日32周年，我重新整理他的遗物，看到一张费用单。显然，这是当年上山下乡第一次离开上海时的支出清单。

我在1968-11去江西插队后不久，69届的弟弟又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狂潮中于1970-3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所以，这份清单究竟发生在哪一年就难以定论。但是，兄弟俩的上山下乡只相差了一年四个月，去向又都是江西，农村环境大体相近，所以，下乡所需的行李不会有很大的区别。

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到，当年在震天响的锣鼓声中，在“上山下乡干革命”的背后，一个普通家庭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第一次“出远门”，添置基本的日用品就花费了将近70元，其中：

由于去农村生活劳动不可少的，有：帐子、劳动鞋（当年流行的草绿色跑鞋）、托肩（垫肩，保护上衣的劳防用品）、劳动裤、雨帽等，合计18.03元。

出于“自立家门”的需要，有：毯子、被单、调羹、手电筒、搓板、镜子等，合计18.66元。

基于长期生活需要而预备的，有球裤（卫生裤）、毛巾、工农皂（工农牌肥皂）及衬衫料、被里白布等。合计27.67元。其中衬衫、被里买回布料后由母亲加工，省去了上衣服店请裁缝师傅的工钱；但上鞋子（鞝鞋子）就没法自己动手了。

至于其余“杂项”合计3.92元，其中有“出远门”路上需要的面包、蒴饼、蛋糕，还有邮票、信封，并考虑了到那里以后可能有办户口等需要而添印了报名照，草包绳子则是托运行李之必需品。

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第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还少不了还要带若干白砂糖、洗衣粉、火柴、电池等等，均未见之于清单。再仔细想想，清单中还不包括家里已经有的衣被箱、行李袋、脸盆、热水瓶等必不可少的“大件”生活

用品。以上这些都是从家庭“库存”中“无偿调拨”了。如果再仔细看看，花点时间对祖父的日记记载进行梳理，一定还能发现不少“疏漏之处”。所以，这是一份很不完全的支出汇总。

仅就这份“很不完全”统计而言，共计将近70元。这个数字在今天可能是算不了什么。但是，凡事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环境。70元是个什么概念？必须放到那个岁月去解读。当年刚进工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7.84元。四个月不吃不喝、一分不差地全部积攒起来，才有70元！所以，那时候家里“支持”子女“上山下乡干革命”的实际负担，与在城市工厂“参加革命工作”的比较，实在是绝对绝对的天壤之别。难怪乎伟大领袖在最高指示里直白要“说服”、要“来一个动员”。至于到了“广阔天地”之后的工农城乡“剪刀差”就愈来愈大了，所以，以这种方式奢望“消灭三大差别”又能有什么实际效果呢！？难怪乎，到了七十年代末会有“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的说法，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此寿终正寝了。

补记：

今日在祖父的日记中看到，1968-11-30有这样的记载：“午后，将孙带江西去的东西抄一本册寄给他，以便作根据。杂事多，就没抄成功。”这使我想起确有其事——在我下乡后不久我收到过一份祖父写的清单，以后一直保存着，我也记得曾经有过“帐物核对”。估计是在我病退回沪以后因为“事过境迁”就把这份清单销毁了。然而，“抄一本册”这几个字提醒了我，遂到祖父留下的收支日记账里查找与那张清单相应的支出记录，从而确认，这份清单是1970-3发生的支出。于今想来，祖父抄录制成这样的清单，是让我们不要小看这些“身边之物”，实属来之不易，它们给家里带来了许多额外的沉重负担，艰难时月更应该爱护和珍惜它们……。】



（7）一碗蛋炒饭

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较之二三十年前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越穷越光荣”的荒唐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了，在日常饮食中，蛋炒饭已经算不上什么美味佳肴。但我至今仍对蛋炒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相隔一段时日，总要重新品味一番。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碗蛋炒饭格外地香、格外地诱人，也格外地揪人心肺，令我终身不忘。

1968年11月15日晚上，我在百般无奈之中作出了去江西插队落户的决定，经过两天紧张的准备，将行李送到学校集中。原先我总以为，我这个“黑六类子女”能象其他“政审合格”的同学成为上海首批插队落户的“红卫兵”一样，也会由学校敲锣打鼓地给家里来贺喜，使我家那扇沉重的黑漆大门上终年不断的惨白色“认罪书”能有机会换上代表革命的大红色光荣喜报，从而给在里弄里被整得抬不起头来的全家人带来一丝喘息之机……。谁知，

这一美好企盼全然落了空，盼了三天，直到我离开上海的前一天11月18日晚上，仍然没听到一声锣鼓，没见到一缕红色，“有罪之人”——被宣布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我的爸爸、“有历史问题”的我的爷爷——对此都深感失望，我更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同样是“插队落户干革命”，为什么我没有资格享受同等“政治待遇”？可是，“黑锅”在身，还是老老实实为好，所以也就忍了、认了，没有去追究个中的原因。想到自己马上就要踏上“革命征途”、平生第一次离家“远游”，我怎么也睡不着，迷迷糊糊之中，一宿就过去了，这是在上海家里的最后一觉。

11月19日，天晴，气候闷热。

年过花甲的爷爷比平日起得更早，当时他被勒令必须每天天不亮就打扫里弄的清洁卫生。这天，他二时半去扫里弄，三时四十分完工。四点钟就烧了早饭。全家也就起身了，为我送行。爷爷特意为我炒了一大碗蛋炒饭，雪白的大米饭，黄澄澄的炒鸡蛋，油光光，香喷喷，极其诱人。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上海人爱吃的大米成了稀罕之物，按人头配给，每人每月三至五斤，其余的能吃籼米就不错了，有时还硬性搭配面粉、山芋等等（据说，为了解决国内粮食紧张状况和“备战、备荒”，国家出口一斤大米可以换回几斤面粉）；鸡蛋等副食品同样是严格地定量供应的，一个七口之家每个月只能购买两到三次鸡蛋，每次仅250～500克；炒菜的油也极为宝贵，每人每月仅250克……，所以，能吃一餐蛋炒大米饭是一种相当奢侈的享受了。

可是，在与家人离别的时刻，我无论如何吃不下这蛋炒饭。为了我突如其来的投身于上山下乡的“革命行动”，家里倾尽全部财力准备我的行装，因为已经说明是去插队落户，是到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所以不能象去市郊农村参加“三夏”或“三秋”劳动那么简单地打个背包就行的，光衣服就得一年四季的全部备齐，还得有替换衣服，甚至考虑必要的“后备”——谁知道这一去何时再回家？一个男孩子孤身在外地，又不会女红活计，衣服的更新怎么办？此外，在那穷乡僻壤之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体力之消耗是可想而知的，为此，又从全家配给的食糖中硬是挤出几斤让我带上。还有，肥皂、洗衣粉之类日常生活用品都得备上一些。再有蚊帐、雨具等等，都要一一添置……。这一切对我家是不堪承担的重负。因为自从1966年夏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我的爸爸就被扣发了工资，扣发的幅度是让我们全家维持在最低生活线上，籍此来“改造世界观”。所以，全家的生活费用一直是极其拮据的，突然之间要为我花费那么多钱，只能举债应付，向亲友借一点，向妈妈所在部门的互助基金借一些，但这终究是“寅吃卯粮”，也就是说，我走之后家里还要勒紧裤腰还债！家境如此窘迫，家人如此痛苦，我的食欲早已荡然无存，爸爸妈妈爷爷再三再四地催促我吃早饭，我都没动一口，一口都没有吃，我反复说：“时间太早了，我不饿，所以不想吃任何东西。”他们见我实在不肯吃，也就依了我，可是也没有人去碰那碗蛋炒饭，它默默地、静静地呆在方桌上，仿佛被人遗忘、冷落了，也许，它和我一样，内心充满了孤独、感伤？

五点一刻，我一步三回头，离开了家，到学校集合。在老师同学和家长的陪伴下，我们这些插队落户“先行

者”坐上大客车，在全市数十万人的夹道欢呼中来到北站，一路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还设立了许多高音喇叭支持的宣传鼓动站，革命乐曲响彻云霄，革命口号震耳欲聋，整个上海城失去了清晨的宁静，气氛之热烈，场面之壮阔，仿佛是欢送铁军出征、欢迎英雄凯旋，这种排场即使在当年也可算得上高级别了，记得1966年来自“反修前哨”的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由周总理陪同莅临上海时，欢迎场面也不过如此。

爷爷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他送我离家后，就去买了一角钱大青菜，把小孙女从被窝里拉起来，急忙替她穿衣服，揩面，刷牙梳头。早饭后两人乘18路电车到北站，沿途由西藏路淮海路起，夹道欢送的人们，直至北站，锣鼓喧天，热闹空前，隆重至极。

离开车还有两三个小时，为的是安排正式的有“市革命委员会”领导出场的欢送仪式，可是，偌大一个火车站，根本无法举行象样的集会，那边轰轰隆隆地在举行什么大会，我们这里老师同学家长聚集在一起开小会。班主任薛老师了解我们这些才十六七岁的“小青年”的心理状态，有意安排了拍照留影等活动，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依依惜别中分散开去。为了把自己学校的“小场面”搞得大些、热闹些，老师还在事先“纵容”同学“伪造”了一批由“区革会”盖章的粉红色“欢送证”，使一批同学混进了北站，就使原本不大的车站站台更加拥挤不堪。

老师灵机一动，从火车厢底下钻到列车的另一侧！虽然那是路基，但场地空旷，几乎无人，相当清静。不记得是谁带来的照相机，大家尽情拍照留念。由于没有一尺多高的站台，在“摆拍”车厢门前告别老师同学的镜头时，由于在车厢门口的踏步上实在挤不下我们几个插友了，有一位插友只能依靠别人在身后用力抱得高高的，以免进不了镜头，偏偏那位“摄影师”还要指导一个个插友调整站位角度、面部笑容等等，让那位“默默无闻”的抱人者累坏了，忍不住大叫“快点啊！吃不消啦，抱不动啊！”那张照片拍得相当成功，洗印了几张寄给我们，被一抢而光，我落手太慢，只能“望片兴叹”。可惜没有人保存至今。

由于有一列火车的相隔，尽管近在咫尺的其他人哭哭啼啼的，我们这里却始终未受影响，一片笑语欢声……。爷爷带着小孙女进了站，到火车上寻找，由尾至首，跑了两次，都没有见到，后来巧遇我的同学，才知道我们是在路轨对面，他同学和薛老师等拍照留念。他只是“隔台相望”，在日记里说，“今天亲眼看到薛老师的活跃，与学生的活动，真令人佩服，他使同学在等候时间减少与家人离别难过”。

确实如此，我在这种氛围之中，也暂时减轻了痛苦和烦恼。我们从车厢底下重新回到站台这一侧，没多久，将开车前五分钟，听大喇叭叫喊：到江西去的红卫兵上车。我向车厢走去，爷爷与路过身旁的我握了一握手，“嘱他冷热当心，路上平安”。我强颜欢笑，和家人说上几句，互道珍重。

我们离开了欢送的人群，来到列车上，挤在车窗口，与站台上的老师、同学、亲人挥手告别，许多人到此时再也忍不住而放声痛哭起来，我们的老师仍然激励着我们：“坚强些，好样的！”年轻力壮的同学老师挤在最靠近列车的地方，我的视线越过他们的头顶，向他们身后扫描，寻找着我的亲人，啊，他们在我视线右前方的一根柱子

边，和拥挤的人群保持着一些距离，大概怕患有高血压的爷爷经不起人群的碰撞；他老人家老泪纵横，神情漠然，怀里抱着才五岁的小孙女，这是我的小妹妹，此刻，她还不懂事，好奇地看着她还无法理解的场面；爷爷身边是我的弟弟妹妹，再过去是我的妈妈，侧身护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满含泪水的双眼，紧紧盯着我所在的窗口；爸爸呢，爸爸没有来！他被“革命造反派”告知，不得参加“欢送红卫兵上山下乡”的活动，他被剥夺了为自己的儿子送行的权利，还得象往常一样准时去单位报到、打扫卫生！我想起在离家时和爸爸道别的情景：他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只是一再叮咛我，凡事要多动脑筋思考，好好参加劳动，同时要注意身体。……

十点，南下的列车终于启动了，亲人们无法挤到前列来和我握手，只能站在远处挥动手臂和我告别，我向着他们使劲地挥手，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再见，爷爷！再见，妈妈！再见，弟弟妹妹们！……还有，我向着爸爸所在单位的方向默默呼喊：再见，我的爸爸！我再度想到了我的爸爸，我不敢想象我走之后他的命运如何，全家人还会遇到些什么样的厄运……，顿时，我感到极度的悲哀：我以插队落户为自己寻找了一条摆脱“精神地狱”折磨的路径，可是，他们呢，他们今后受苦受难，我却撒手不管、不闻不问，这不是太残酷太无情了吗？！我对不起他们！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失声痛哭起来，眼泪如决了堤的洪水，把我许久以来、特别是三天前突如其来地决定“出家”以来压抑在心头的苦闷通通发泄出来……。

爷爷在日记里也是这样写的，“火车汽笛又鸣，是开车了，乃与孙遥远挥手送别，那时孙也眼泪流出，难过分别。”那一次，我确确实实把泪水熬到了最后一刻。

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平静下来，肚子感到有点饿了，这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呢，想起了那碗一口未动的蛋炒饭，又想到了离家时的凄惨情景，不免又伤心起来……。从此以后，我经历了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段艰苦历程，在那食不果腹的岁月里，我无数次地想起那碗蛋炒饭，想到它就仿佛在眼前浮现出那雪白的大米饭、黄澄澄的炒鸡蛋，油光光的，香喷喷的，仿佛还感到了它那飘浮在空气中的诱人香味扑鼻而来，直叫人垂涎三尺……。如今吃蛋炒饭早已不再是一种享受，但我总觉得自己炒出来的蛋炒饭比不上那碗令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蛋炒饭，因为缺少了一份特有的情与爱，缺少了一种特定的时代感……。

（1995-04-29初稿，2010-01-20根据祖父日记增补一些细节）

（8）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

【写在前面】

1995年我写下了这篇关于首次进入“第二故乡”的回忆。

我是1975年“病退”回沪离开“第二故乡”的。到写回忆，已经时隔20年。

写回忆后，又过了10年，2005年，我坐2005次列车回到“第二故乡”！真是“无巧不成书”！（08-11-02）

1968年11月19日，上午10点，我作为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队的1000名“红卫兵革命小将”中的一员，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踏上了“革命征途”，到“第二故乡”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隆隆的“红卫兵上山下乡专列”在沪杭、浙赣铁路上奔驰了十多个小时，于20日凌晨七点差十分抵达江西省中部的樟树镇，这里不仅是清江县的县城，更是全国中药材的重要集散地，历来有“药都”之称。但毕竟处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加上又处在“文革”动乱年代，火车站之简陋、县城市容之邋遢，实在难以将它和“中国药都”的美誉联系在一起。

我们还来不及细细观赏“药都”风貌，就被安排上了大卡车。1000号人从此分为两拨，一半去峡江县，一半去新干县。约九点，我和近80位来自卢湾区的以及其他大约400名来自徐汇等区的“革命小将”上了去新干的大卡车，延着南昌至“革命圣地”井冈山的公路，长驱五十多公里，前往新干县城。一路上，砂石路面的公路倒还算平坦，天气也不错，撩开车上挡风遮雨的篷布，急切而贪婪地观望即将成为自己“第二故乡”的景致。大家看到公路两边是一马平川，根本见不到山的影子，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这哪儿是江西山区啊？”从小在大上海生活、长大的“小将”们只有长风公园“铁臂山”、松江佘山这样的概念，对“真格”的山区充满了好奇与急切的向往。前来樟树迎接我们的新干“县革委”的同志解释说：你们要去的生产队离这儿还远得很，到那儿有的是山……。

卡车一路疾驰，不知是谁，第一个高呼起来：“大家看，前面有山了！”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向车行的前方望去，呀！真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在初冬的阳光下，果真出现了山的影子！远远的，淡淡的，连绵起伏。很快，公路就逼近了那片山脉，嗬，好一片郁郁葱葱的青山，尽管离我们还远，但我们仿佛已经听到了雄壮的松涛，闻到了山林醉人的清新……，以往只有在书上报上读到的充满诗意的描写，如今是身临其境、置身其中了。我们这些头一回踏进社会的“小青年”都陶醉在兴奋之中，有人还感到不满足：这山还不够高呀，算不上“崇山峻岭”。

谁知，刚高兴了一会儿，视线中的山岭又渐渐消失了，大家又不约而同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新干“县革委”的同志说：“快到新干县城了！新干县城周围的山比较少。”“那我们究竟去哪儿？”上海护送团的“工宣队”师傅再次拿出一张在火车上得到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落户”的生产队队名，是什么“庄生产大队”，在火车上大家琢磨了半天谁也不认识那个由“雨”字头下加一个“亏”组成的字。新干“县革委”的同志一看就认出来了：“喔，这是个繁写的‘云’字，你们去的地方是云庄生产大队。”云庄，好一个不乏诗意的名字。也许它位于高山之巅、云彩之中，故而有“云庄”的美称？于是有人发问：“云庄有大山吧？离县城多远？”“我们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大山、高山，属于丘陵地形。云庄离县城五六十里，在山里，但不是全县最高的山。”听这么一说，大家有点泄气了，不是山区，只是丘陵；到了“山”里，还不是全县之最，真没劲。

谈笑之间，卡车在一个广场似的开阔地带转了一圈，停了下来，此时大约十点半。周围有些人群，充其量有百

余人，举着伟大领袖的画像和红旗，敲着锣、打着鼓、高呼着口号。可是，这里的锣很小，鼓更小，只要一个人敲，“咚咚咚”地响，脆脆的声音传不了多远，与上海四个人甚至八个人同时擂响的大鼓根本无法相比，上海那种大鼓才真有震天动地、憾人肺腑、令人亢奋的雄浑壮观气魄，听起来才带劲呢。那一拨人喊的口号，是夹杂着普通话的方言，我们只能断断续续地听懂“欢迎”、“上海”、“革命小将”等单词。“县革委”的同志说：“新干县城到了！”喔，原来这就是县城，这就是县城对我们的欢迎仪式！

这里是当年相当典型的内地县城格局：在紧靠交通干道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角是县政府（当时叫“县革委”）办公大楼和招待所，此乃全县的政治中心；一个角是县百货大楼，代表了全县的经济中心；一个角是图书馆、文化馆之类，是全县的文化中心所在；再一个角是长途汽车站，是全县的交通枢纽；中央有个圆形的花坛，是个小型广场，各种政治集会在此举行。

由于欢迎仪式太简短、太简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们还沉浸在对昨天规模巨大的欢送仪式的回忆之中，欢迎仪式就结束了，以致在我脑海中除了“简陋”之外就几乎再也没有留下更多的印象。只记得，这天代表即将接受我们去“落户”的云庄大队来欢迎和迎接我们的，是云庄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他与我们年龄相仿，操着一口带有浓重方言味的普通话，听起来挺费劲。他自我介绍说，他也念到中学，也算得上是个“知识青年”了。

我们在县城什么地方吃怎样的午饭，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肯定比较简单，所以没有印象了，当然也有“归心似箭”式的心态，急于对“第二故乡”的真面目见个分晓。午饭后大约十一点多，就再次上了卡车，向最后的目的地进发！离开县城没多远，道路开始变得高低起伏，视野中出现了山峦，而且渐渐地逼近道路两侧，我们开始在山路上颠簸了，此刻的知青们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兴奋劲儿，也许是因为县城的欢迎场面与昨天离开上海时隆重热烈的宏大场面宛如天壤之别，是几个数量级的巨大差异，令大家失望了……。道路越来越“山路化”，卡车在一个个山包之间打转转，绕来绕去，视野越来越狭窄，景深越来越短浅。路边的山沟里是层层梯田，已经收完稻子，留下的只有淡黑色的土地和一行行一列列的稻茬；紧贴山脚边也有些水田模样的地块，也留有稻茬，可泥土却呈桔红色；山坡上倒是郁郁葱葱，有高大的松树、杉树等乔木，也有漫山遍野的灌木丛。一路上见到过几个村庄，都不大，几十户人家的规模，也经过了几个集镇模样的地方，有好些卡车分别停下了，陆续有知青下了车，离开了长长的车队，可我们卢湾、徐汇等区知青乘坐的卡车却是“一往直前”，一直没有停车。

卡车在砂石路面的道路上一路颠簸，卷起阵阵黄尘，望望路边的里程碑，已经离开县城十多公里了。“究竟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呢？”我心里正嘀咕着，卡车停下了，哦，它载着我们来到了“鸡峰公社”——云庄大队就归它管辖。公社所在地叫麦？（此字为上斜下土），离县城十五公里，是个很小的镇子，紧靠公路有几排平房，办公室模样，就是公社“革委会”所在了，还有几家门面，是供销社，卖些日用百货、针头线脑的。这天，镇上也集合了几十人，排在路边欢迎我们，照例是红旗、画像、锣鼓声、口号声，……不知是谁心眼多了一点，悄悄地在知青人

群中传话："喂，你们注意了没有？那么多人都穿的上下一身黑！"经这么一提醒，大伙儿果真发现，真是头一回见到的新鲜事儿，那一溜儿数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一副模样的打扮，黑色的上装，黑色的裤子，加上黑黑的脸膛，哎呀，"一片黑！"在"文革的中心"上海，黑色是代表反动、落后的颜色，是"牛鬼蛇神""黑六类"的专用色，因而是"忠于伟大领袖的革命群众"最最忌讳的颜色，怎么这儿的贫下中农居然如此钟爱它？这是怎么回事？！深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知青们在脑海中留下了大惑不解的疑团。

云庄大队的支部书记这天正在公社开会，他参加了简短至极的欢迎仪式，与我们见了面。看上去他有五六十岁了（下乡后没几天，他做了排场不小的庆寿活动，我们才知道他的确切年纪是五十虚岁），虽然背微驼，但瘦瘦的个子仍显得比其他当地人略高些，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带有忧郁的笑容，略显苍老的目光中不乏精明与狡黠。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他的形象与多年来从书本与银幕上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想象相差甚远，我们还来不及打听当地人如何称呼这位"父母官"，于是就按照从书本与银幕上学来的"革命队伍中的称谓"，想当然地叫开了"老支书"。他似乎一下就听懂了上海知青的普通话，坦然接受了我们对他的"敬称"。从此一叫就是近十年——不，直到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这么称呼他（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了，他在前些年谢世了）。

公社的欢迎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正式"各奔前程"了，分头前往"落户"的各大队、生产队。离开上海时我们被仿照军队编制，编成若干个连、排、班，此时番号为？排一、二、四、五、七、八班的62名卢湾区知青分配到云庄大队，这样，除了三、六两个班的十多人外，卢湾区的知青几乎全部集中在云庄大队了。

载着62人的卡车再次启动，云庄距离公社还有二十多里！而且不在县域公路主干道的附近哩。公路左一拐，右一拐，行进到22公里的里程碑后，一个右转弯，开上了一条明显低一个等级的公路，这路面坑坑洼洼的，被来往的卡车、拖拉机轧出了两条深深的沟，好多地方连路基石也裸露出来了，又没有及时修复填平，更使路面七高八低的，卡车在这路上颠簸、摇晃，象是一条与大海波涛搏斗的小舢板。大家从未乘过这样的车，神情都十分紧张，可谁也没吭声，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简单而纯朴的信念：我们是来插队落户干革命的，就是来经受各种艰苦环境艰苦条件的磨炼的。

在这段支路上颠簸到五公里处，又向右拐上了一条更低档次的公路上。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公路了，它不属于国家的公路管养段的管理范围，是沿途的生产队分段负责修筑的供拖拉机行驶的机耕道，并且简易到不能再简易的地步：两边各开了一条排水沟，就算是路界了；用山上开来的不规则的石块垫一层作为基石，再倒上些泥土填填平，就算是路面了。

开了没几步，车子停下了，是个村子，"到了！"不知是谁叫了起来。"不，不，还没到。这儿叫小坑大队，离云庄还有三里路。"一路带领我们进山来的支书的儿子连忙纠正，又招呼道："大家下车吧，云庄的贫下中农今天到这里来欢迎大家呢！"果然，又有一溜儿黑衣黑裤黑脸膛的人们，举着领袖像和红旗，敲着锣打着鼓呼着口

号，只是这锣更小了，巴掌那么大；鼓也更小了，脸盆那么大；锣鼓声，叮叮咚咚，更无章法了；口号声，稀稀落落，更方言化了。云庄大队“革委会”成员、民兵连、共青团等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全部来到小坑欢迎我们，以示隆重。欢迎仪式比县、公社两级更简单了，可我除了记得知青与贫下中农互相高喊“学习、致敬”的口号外，就记不清它的全过程了，也许，当时过于“归心似箭”了吧，因为“第二故乡”就近在咫尺了，而且仅仅是在一百个小时前才决定到这“第二故乡”来的。

只记得，大队的干部们与卡车司机商量了许久，才再次招呼我们重新上车。原来这条通往云庄的简易非凡的“公路”不仅路面状况极差，令司机胆寒，而且在接近云庄的时候还有一个几近45度的向下的陡坡，它的末端又紧接着一个90度的急转弯！司机在大队干部的百般请求下，勉强答应了继续把我们送进山里的要求，驾着车，小心翼翼地驶上号称只有三里路的“小坑－云庄公路”，在那个45度的陡坡上最终停了下来。

“大家下车吧！这公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车子没法开下去，只能请大家步行了。”大队干部们向知青们招呼着。听说到家了，大家的热情又高涨起来，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向四下里一看，果真有点惊险的味道：这陡坡的顶端，是实实在在地把一个山坳挖地十几尺、硬劈出来的一条“公路”。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告诉我们，为了打开云庄与外界的交通，经过反复踏勘和比较，才选定这个突破口，经过几个冬天农闲季节的“挖山不止”，才基本形成道路的模样，估计今年再挖上一冬就可以通行拖拉机了。听着他们充满自豪感的介绍，再环顾这山坳中的陡坡“公路”，我们心中不由得升起了最初的敬意。

在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簇拥下，我们走下陡坡、靠近急转弯时，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好大一片农田，好宽阔的一条山沟，对面是绿油油的一座山，山脚下还有一座庙宇式的小白屋，边上有一棵高大粗壮的香樟树。向右看，“公路”的尽头有一座村庄，那就是云庄——我们的第二故乡，就在这里！

我们站在陡坡坡底的急转弯处，远眺云庄，相距大约四五百米，只见云庄座落在一条山梁的尾端，村口有一座高大的牌楼，白色的方形立柱，白色的门匾，黑色的飞檐，十分醒目，在它后面，一栋栋的农宅延山坡而建，依次升高，上黄下红的墙，乌黑的屋顶，层层叠叠，鳞次栉比，正值午餐时分，村庄上方飘浮着一缕缕淡淡的炊烟，与山间尚未散尽的雾气交织在一起，使山村笼罩在迷人的云雾之中；山村的背后，是生机蓬勃的青山绿林，山连着山，山靠着山，连绵起伏，越往远处山峰越高，最终挡住我们视线的是全县的最高点——鸡落峰，我们所在的公社就是以此山峰命名的。（二十多年后的1990年，中华地图学社第一次公开出版了《江西省地图册》，将此山峰标为海拔638米“尖老峰山”，山名为何有如此差异还有待考证。）在初冬的阳光里，葱茏苍郁的鸡落峰在群山环拱下更显得鹤立鸡群、巍峨高峻，峰顶在飘浮不定的雾气中时隐时现。它又象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居高临下，默默地凝视着脚下这片古老的红土地，默默地迎接着一群来自远方、初涉人世的小青年……。啊，云庄啊云庄，果真不乏诗情画意。

结束了这“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欣赏和感叹，我们踏着坎坷不平的“公路”，一步一步迈向云庄，迈进我们的“第二故乡”。全体贫下中农和人民公社社员在大队“革委会”的统一指挥下，男女老少“倾村而出”，在村子东头生产大队的大仓库门前，又举行了简短明快的欢迎仪式，欢迎远道而来的上海知识青年。世代居住在山里辛苦耕耘的农民，都是头一回见到来自中国最大城市的城里人，眼神中充满了新奇与好奇，许多人在窃窃私语，似乎在评头论足，更多的人则对高呼口号、发誓要在这儿扎根干一辈子革命的我们感到迷惑不解。锣声鼓声口号声渐渐平息了，我们终于走进了云庄村。

1968年11月20日下午1时许，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第二故乡”，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最难忘的一页。

2008-11-10根据日记纠错、补正

（9）插队第一夜

【写在前面】

2005年初夏重返“第二故乡”时，当年度过第一夜的屋子已经翻造过了，那里的主人乃至主人的儿子（支部书记和他的儿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08-11-02）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无论是出差还是旅游或是其他公私外出，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第一晚常常难以入眠。我也不例外。不过，近30年来，南来北往，经历多了，也就见多不怪了。只是有那么一个“第一夜”，使我终身不忘。

1968年11月19日，我与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队落户干革命”的66、67、68届中学毕业生告别了亲人，告别了老师和同学，告别了大上海，坐上“红卫兵上山下乡专列”，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行程，于第二天11月20日的清晨到达火车行程的终点——江西省中部的樟树镇，随即又兵分两路，分别奔赴新干县和峡江县。我被分在去新干的行列中。我们换乘大卡车，颠簸了80多公里，来到从未谋面的“第二故乡”——云庄村外大约二百米的山坡上，大卡车再也开不进去了，在生产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簇拥下，我们步行进入云庄，从此开始了历时十年的“蹉跎岁月”。

云庄是个有百来户人家、四百多人口的村庄，规模之大在全县名列前茅。这次共接受了30名上海“红卫兵”，连同本大队其他三个自然村组成的另外三个生产队，共“收容”了60多名上海知青。当时，国家下拨了每人三百元的安置费，这笔费用除了为我们添置简单的农具如锄头钉耙之类以及购买下乡后第一年的口粮口油外，最主要的是建造住房，但是我们所到的云庄非但没有造房，连造房的准备工作都没做，精明的大队支部书记早早打定了这笔总数几近二万元的安置费的主意：当年，这可算是笔巨款了，可以办好多大事，颇有眼力的大队支书正筹划购买拖拉

机，此时此刻上海知青的安置费就仿佛是不期而遇、从天而降的神助之力，就在我们“落户”后的几天，一台崭新的“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开进了山村。当我们得知这是挪用了国家下拨的知青安置费而购置的内幕后，非但没有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而愤怒，反而为自己能给山村的发展作贡献而感到自豪。第二年春天，不知从何处刮来一阵“不要国家一分钱，自愿上交安置费”的风，我们这些天真、虔诚得无以复加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又率先响应……。多年后才知道，国家并没有接受我们的上交，在1973年毛主席亲自答复福建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信件后，有关部门更加强调专款专用，不得挪用，生产队才归还了这笔巨款，为我们知青盖了集体宿舍。但这已经是我们下乡后第五个年头了。

然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身居深山的大队支书居然凭着他近二十年的“从政”经验一口断定：“你们上海知青是毛主席派来的，不要多久，毛主席又会叫你们回去的。”我们知青虔诚地说：“不，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他带着狡黠的微笑，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毫不掩饰地宣称：“知青在这儿呆不长！”虽然这番对话是我们“落户”后的事情，但大队支书这样的认识早在我们到达以前就形成了，所以他压根儿就没有为知青“扎根农村”考虑过住房等长期规划，甚至还不相信真会有那么多上海知青来到这深山沟，于是，仅仅是在我们到达之前，草草安排了几家地主、富农腾出了三处房子，充当知青的住房。不料我们一下到了30人，使他猝不及防，当天实在来不及安排了，只能让我们八班的八名男生——小沙、小陆、小宋、小金、小郭、小刘、小费和我，挤在他家的西后厢房里。昏暗的油灯下，只见六块一尺多宽的床板一字儿排开，四周是尚未打开的行装，已经没有多少立足之地了。大家一看这情景，都说：“今天晚上是没法躺下睡觉的了。”怎么办？和衣而睡！有人还讲起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时露宿街头的故事，以此激励大家共度寒夜难关。

大家“排好坐次”，拉过几个小旅行袋，当作枕头，再打开行李，取出几条毯子，两三个人合盖一条，这样，八个人紧紧地挤在六块床板上，加上都是十六七岁血气方刚、天真纯朴的小青年，“热气足”，倒也能抵御这初冬的寒气。“噗”的一声，睡在最外侧的小费吹灭了油灯，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这就是我插队的第一夜！

屋外静得出奇，绝无大都市夜晚仍不绝于耳的汽车马达轰鸣声，只是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犬吠，但很快就恢复了宁静。我张大眼睛，望着什么也看不清的黑暗，思绪又回到了昨天，回到了上海，耳边又回响起动员大会上先期到井冈山地区考察的上海“红代会”常委们慷慨激昂的报告声，回响起上海百万“革命群众”隆重热烈欢送的歌声、口号声、锣鼓声，回响起亲人、老师、同学的亲切道别、谆谆叮咛，……可眼下的景况，能不让人产生若有所失的感觉吗？然而，在那个“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里，任何对贫下中农不满的想法都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必须“自觉地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正是在这种思想禁锢的氛围中，我暗自狠狠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走上山下乡的道路，本来就是来吃苦、来磨炼的，哪有舒舒服服干革命的道理？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话说得多好、多有针对性啊！……”突然间，门外响起了汪汪汪的狗叫声，还忒有叫人心惊肉跳的感觉。随着脚步声由远而近，狗也叫得越来越凶，更增添了寒夜的恐怖感。尽管挤在一起的八个人没有一人吭声，但可以感觉到大家的呼吸急促起来了，毕竟从小在大都市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过“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经历……。脚步声由近而远，狗也仿佛叫累了，安静了下来，周围又是死一般的寂静，静得令人心悸。

我终于抵挡不住睡意的进攻了。因为已有五天没有好好睡觉了：11月15日夜里，我咬咬牙关作出了去江西插队的决定，连夜开始了紧张的行装准备。16、17这两天，也不知是怎么过的，茶饭不思，睡眠不香。18日上午把行装送到学校，这一晚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夜。19日是平生头一回远行，又是头一回在火车的硬卧上过夜……，连续的睡眠不足带来的浓浓睡意，吞没了初来乍到的新鲜感、陌生感、恐惧感、失落感……。

【08-11-10翻阅当年的日记，发现有一个差错：第一晚是七个人和衣而卧，不包括小沙。回忆起来，沙是副班长，身体不好，好像照顾他睡到大队部还是某个队干部家里了。

另外，还发现一个已经遗忘的情节：生产队对我们如此之多的上海知青到达云庄村毫无思想准备，使得突击征用“地富分子”的住房也措手不及，以至于我们连续两个晚上七个人和衣而卧。】

1995-11-20夜起草，“插队第一夜”27周年

1996-02-22改定　　2008-11-10纠错、补正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三：

（10）第一次分红

〖写在前面〗

翻出1990年的旧作，重读一遍，不禁哑然失笑，40年前30多个十几不到二十岁的小青年，居然在乡村一隅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当时是谁创意、倡议、策划、发动，我全然不知，就是直到今天也依然蒙在鼓里，只记得在“彻底体现大寨式评工计分法的壮举”的欢呼声中，举双手赞成，全身心拥护。幼稚随着时光磨砺而渐趋成熟。到1976年10月听说有人对“除四害”感到疑惑和忧虑时，我是万分惊讶，更不可能随声附和了。可见成熟的程度、速度都不是整齐划一的。（08-11-03）

八十年代，从86年开始实行单位内部按部门进行经济独立核算以后，除了逐月发一点奖金外，每年有两次较为集中的奖金发放：一次在国庆和中秋期间，称为“奖金预支”；另一次在春节前，叫做“奖金决算”。这种制度与当年农村中的“分红”颇为相象：头一回在中秋前，叫“预分”；第二回在春节前，叫“决分”。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渊源关系，只是每每唤起我对“分红”的回忆，特别是那第一次分红。

1968年11月，我们一批六七、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来到江西的一个山村插队落户。下乡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时值农闲，没啥重活儿，“阿拉”们还能适应，干得还挺欢。谁都想从一开始就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干了三四天，我和小郭被通知去参加搞“红海洋”式的“献忠栏”和“批修栏”工作。原来，我们俩的“书法”在此时此地就象在没有老虎的山里猴子称起了大王。我们俩很不情愿，一心想去参加修水库，“战天斗地”。在那个年代，修水库、修公路一类的活动被传媒宣传得十分伟大，能亲身参加就象革命战争年代参加了某一伟大战役一样光荣。

然而，我们的要求被拒绝了，还“斗私批修”了一番：“贫下中农在三座大山压迫下和刘修（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如今是把文权夺回来的时候了。贫下中农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无论工分高低，首先要突出政治，献忠栏、批修栏就是当前全队的头等大事，不能‘工分挂帅’……”。这样，我们只能留在村里，眼巴巴地望着其他知青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水库工地。

谁知一个多月后，首次为“阿拉”评定工分时，我和小郭居然在“阿拉”中拔了头筹，双获最高分——6分。其他“阿拉”顶多只有5.5分；女同学更惨，最高只有4分，一般仅有3分挂零。到这时我才明白，在这缺少文化的山村，单凭字迹端正就挺受尊重呢！

没几天，年终决分结果张榜公布了。我和小郭因为搞宣传工作是“全天候”出勤，一个多月挣的工分折成人民币达25元之多，在插队的知青中高踞榜首、遥遥领先。在通货膨胀的今天，25元似乎不足为奇，但在二十多年前实在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几乎接近当年上海青工学徒的工资水平了。这又是平生头一回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更感弥足珍贵。然而，我没有如数得到她。

分红之后，我所在的知青班开了一个会，一致决议对全班十三人（共有九男四女）的分红收入在班内进行再分配！为此，拟定了四项“照顾原则”：对女同学、对因病因伤影响出勤的、对为班里办事而误工的、对在下乡时家中举债较多的，要有所照顾。我和小郭很自觉很自愿地交出部分“高收入”纳入全班统筹。在友好协商、互相谦让的气氛中，全班达成了“再分配”方案：我和小郭为全班创收多，应有所鼓励，故给予最高额，每人16元；对家中负债较多的小金，补助到15元；其余的同学，按照我们自己的出勤统计，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每天按人民币0.51元计算劳动所得。由于大幅度提高了女同学的工分，使我们班内的工分值大大低于当年生产队的工分值——每天1.22元。

这一“改革”在同村的另外两个知青班中引起议论，更在当地老乡中引起轰动，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我们自己则得意洋洋，觉得是“彻底体现大寨式评工计分法的壮举”，尤其是大胆打破了当地农村男女同工不同酬的传统，引以为荣，值得自豪。但是，在上海的家长、老师中间，不乏有识之士，及时提醒我们：“此乃‘战时共产主义’，难以持久。”对这种当头棒喝，我们还真不愿听进去呢！可是，半年之后，1969年的“预分”时，就再也没能重演“壮举”。因为知青开始了难以避免的分化。

于是，那个第一次“战时共产主义”式的分红，就成了最后一次，成了永恒的记忆。

（11）蹉跎岁月第一春

〖写在前面〗

这是我的“早期作品”之一。1989年10月底，单位内部小报的编辑开始向我约稿，我从此开始了“爬格子、变铅字”的业余爱好。1990年2月春节来临之际，编辑又来“命题作文”，于是就有了这篇习作。当时的题目是“有那么一个春节——新年忆旧”。后来我自己策划“一系列”的时候，把题目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08-11-03）

除夕之夜，尽管电视节目精彩纷呈，但终究抵挡不住睡意的袭扰，劳碌了一天，一家人就早早熄灯就寝了。可是，没多久，有禁不止的鞭炮、爆竹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在寒冷的冬夜里，它还真有点惊天动地的气派。我被它从睡梦中唤醒，亮灯一看，嗬，十二点了，过年了！窗口忽闪忽现的烟火光，窗外联绵不断的鞭炮声，驱散了睡意，脑海中闪现出“蹉跎岁月第一春”的情景。

那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就在两个多月前，六八年的十一月，我被刚刚掀起的“上山下乡革命洪流”卷到了江西中部的一个山村，从此开始了后来被称为“蹉跎岁月”的插队生活。那山村，叫云庄。这村名与邻村“洲老上”、“小坑”、“拿埠”之类的名称相比，还有几分雅趣哩！可是，这里纯朴的乡民们向来只知道，唯有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下放到这偏僻的山村来。所以，当我们这批号称“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从上海志愿来到云庄时，乡民们认为准是从城里下放来的“牛鬼蛇神”。直到一个月后，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来，知识青年才神气了，贫下中农也服气了。

按照江西的规定，我们同当地的下放干部、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五七”之称来源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又按照从上海出发时的编制，我们在云庄落户的二十九名上海青年分成三个班，“番号”分别为四班、七班、八班。我在八班，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班，九男四女。云庄是全县排得上号的大村庄，所以，安排在这村的“五七大军”也就特别多。

下乡伊始，我们班还是一股子学生气，每周有两个晚上要开会：一次政治学习，一次民主生活，“政治气氛”甚浓。不过，我们既没有搞揪斗“地（主）富（农）分子”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卷入“路线斗争”幌子下的村内宗派纠纷，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搞好“革命化”。转眼就到了岁末，班里专门作出决定：要过好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不能追随落后的习俗；要“节约闹革命”，不搞年夜饭大吃大喝那一套；思想上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要想家，……。

作为“革命化”的具体行动，班里在生产大队的支持下。特地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时，请了两位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并且共进“忆苦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儿的农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种拌杂糠菜的饭食，只是由于“阶级教育”的需要，才从外村引进了“忆苦饭”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岂知到了年初一，班里有人自作主张，多搞了几个菜，请了几位贫下中农来吃晚饭。当晚，就连夜召开了班务会，专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当时叫做“斗私批修解决问题不过夜”！

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是相当顽强的。小年夜那天，贫下中农热情地送来了两大盆自制的米酒全班就乘兴聚了一餐、乐了一场。这米酒不凶，吃口尚佳，于是就有人开怀痛饮，一连喝了五大碗，终于醉倒了，酩酊

大醉，还开了“罐头”，颇为狼狈。对于这种酗酒行为，大家漠然处之，无人提出异议。毕竟是人心相通，心照不宣：都是十六、七岁、近二十岁的人了，几乎全是第一次不在父母、亲人身边过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不健康”的情调无处宣泄，只得求助于杯中物了。也许还得感谢祖先发明了这种“中性”饮料，既可表示喜庆，也可表达忧愁，此刻，妙就妙在可以借助于它，用表面的欢乐掩饰内在的心酸。

大年夜，当地有烤火、守岁的习俗，几乎彻夜不眠。乍来初到的上海青年对此虽感新奇，却提不起劲头来参与其事。在“忆苦饭”席终人散之后，就钻进了被窝。江西的冬天别有一番风味，又冷又湿。那年的春节前后，整整一个月没有出过太阳，阴霾满天，还不时下点雨雪，寒冷加上潮湿，分外地冷。被窝里尽是潮气，全靠体温来慢慢地暖和它。困乏到了极点，才会迷迷糊糊地入睡。下乡后的头一个大年夜，仿佛人人都有重重心事，谁也不吭声，可谁也没谁着，不时可以听到辗转反侧的身子把床板弄得咯咯作响。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传来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黑暗中有人惊喜地叫起来：“这是过年的鞭炮！”拧亮手电筒一看，九个男生仅有的一只闹钟上，时针正指向12点！“过年了！过年了！”大家兴奋了一阵。爆竹声很快就稀疏、消失了，黑洞洞的屋子里有恢复了平静、沉默。

迷糊之中，听到阵阵尖利的哨声。呀！天亮了。大家不敢留恋温暖的被窝，毫不犹豫地起床、穿衣，匆匆洗漱完毕，就连奔带跑地朝生产大队的仓库跑去。

这是一件当年没有人敢斗胆怠慢的大事情——“早请示”。春节更不能例外了。在冬日的晨雾中，全村的贫下中农、“五七大军”在仓库前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好队，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仰望“宝像”，手挥“红宝书”，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三呼“万寿无疆！”尔后，全体高歌《东方红》，又高声诵读“最高指示”；再后，是贫下中农代表、“五七大军”代表慷慨陈词，“献忠心”、“表忠心”，……。每一个人都带着庄重、严肃的神色，仿佛在“灵魂深处”爆发着“斗私批修的大革命”，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幽灵无一例外地徘徊在这偏僻山村的大地上……。

这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步入蹉跎岁月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光的流逝，冲刷着对往事的记忆，但这“第一春”却是那么令人难以淡忘。

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如今想起来，仿佛是痴人说梦、不可思议。好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我重新进入了温馨的梦乡……。

庚午年春节新年忆旧

（12）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

〖写在前面〗

这篇“一系列”有一段“趣话”。1991年我完成了初稿，其中完全回避了有关“收听敌台”的内容（即蓝色字体）。1995年3月在内部小报编辑来约稿时，我补加了这些曾经十分敏感的话题。同时，又应景式地增加了当时热播《孽债》作为话题引子（即绿色字体）。其实，对那部红极一时的电视剧，我没有看完就产生了反感。到这年夏天，同类题材的电视剧《遭遇昨天》播出后，我觉得忍无可忍了，就向有关报刊投稿表示异议。结果，在《每周广播电视》上发表了，同事同学朋友以至素不相识的知青来电来信表示支持……。稍后，我会把那份“异议”投稿拿出来“晒”一“晒”。（08-11-03）

电视里正在播放《孽债》，牵动了沪上百万观众的心，更在当年的知青中掀起巨大的感情波澜。然而，我们这一代“苦难而风流”的知青的后代们，却难以体验他们的父母的经历，当同为插队知青出身的我和我的爱人专注地关心着荧屏上诸多人物的命运时，对人世似懂非懂的儿子却坐定不下来，不甘囿于大人们为他划定的娱乐范围，自个儿寻找着新的乐趣。终于，他在家里发现了“新大陆”，举着一只和录音磁带盒大小差不多的玩意儿跑过来问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哟！这可是我的一件宝贝啊！我忙从儿子手中夺过来，轻轻地抚摸着，深情地讲述起这“宝贝”的来历。

这是一只极其普通的半导体收音机，是六十年代末期半导体收音机刚刚进入我国寻常百姓家庭时的一种最简单的单管机。它的外壳是用塑料制成的，鲜红、奶黄两种颜色极富那个时代的特色；机壳正面的上方，还可以隐隐辨出“九、一三事件”以后被刮去的“副统帅题词”的痕迹。就是这么一只毫不显眼、早已在市场上被淘汰得无影无踪的单管机，因它陪伴着我渡过了终生难忘的“蹉跎”岁月而被我视为一大“宝贝”。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我从上海到江西插队。下去后没多久，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看报纸、听广播习以为常的知青们，很快就体验到消息闭塞的痛苦。乡邮员名义上每星期进山两到三次，可是，稍有风雨，他就不愿进山了。逢年过节或是农忙时节，更是十天半个月见不到他的身影。有线广播则是“聋子的耳朵－－摆设”……。生活在这种现代的“世外桃源”里，身不由已地做个与世隔绝的“现代隐士”，别说有多难受了！

熬了一年多，到１９７０年年初第一次回沪探亲时，我下定决心要买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我走访了好多家无线电商店，又走遍了“扫四旧”之后仅存的几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当年为了显示“大好形势”，连“旧货店”的名称也被革了命），反复“考察”，进行经济分析和可行性研究。那时，一只四管半导体收音机的价格为４０多元，比“３６元万岁”时代中一个青年工人的月工资还高出一截。我这个“修地球”的，每天只能挣３毛钱（这在插队知青中还算“高收入”呢，原因是我所在生产队的境况比其他地方稍好些），面对４０多元的“奢侈品”，唯有望“机”兴叹，紧攥着一年辛勤劳作换来的“血汗钱”的手，始终不敢从口袋中伸出来。就这样，转悠了一天又一天，尽管失望接着失望，可又不甘心来年再去做“隐士”，在失望中依旧满怀着希望，企盼着，寻觅着……。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天下午，我又一次来到老西门的一家“日用品调剂商店”，在那店堂深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灰暗的玻璃柜台中静静地躺着一只小巧的单管半导体收音机，我眼前顿时一亮，只见标价为１０元，心中大喜，忙叫营业员取出来，插上耳机插头，拨动调谐转盘，改变机器方向，耳机里真的传出了清晰的广播声！收音机的包装纸盒中，还附有一张发票，第一手买主是１１月买入的，不知为什么，１２月就卖出了，而眼下才１月，所以，少说也有９成新吧。比起新货的价格１２元５角，还可以省下２元多钱哪！在那个恨不能将一分钱掰成两半来用的日子里，真正是碰上了“价廉物美”的好运气了。我赶紧掏出钱把她买下了，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就象是在和别人争夺似的。我如获至宝般地把她捧回家中，又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好包，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回江西的行李中。

从此，她使我摆脱了“隐士生涯”，忠实地陪伴着我，为我服务了十多个春秋。三伏酷暑，头顶烈日苦战“双抢”，她伴我进入香甜的梦乡；数九寒冬，朔风凛冽，她为我驱走漫漫长夜无尽的寂寞。无论是上水库工地，还是外出开会、看病，不管到哪，我都携带着她，保护着她，因为是她维系着偏僻山沟和大千世界的联络，让我“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至今我还难以忘记的一件大事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在蒙古机毁人亡。当天，我这只选择性不太好的单管机中就漂来“敌台”的有关广播报道，虽然当时外界尚不知晓机上人物的身分，但从我方正式渠道对此震惊世界的“坠机”大事三缄其口的鲜明对比中，可以觉察到事态非同一般。尽管自己有此种分析，但在不久之后“敌台”透露了其情报机关得到的消息时，我还是吓得大气也不敢出：竟会是“副统帅”出事了！？……随后，当“十一”国庆节突然取消了二十多年一以贯之的盛大庆典活动而引起人们议论时，我心中已有谱了。又过了两个月，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了基层，此时我已经没多少新鲜感和惊讶感了……。这些在当时都是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绝密”，说出来可要召来灭顶之灾的，“收听敌台的现行反革命”，这大帽子谁也消受不起。无奈，我这单管机的选择性能就那么一点水平，对“敌台”是让你“不听也得听”，除非把它甩了。

许多年过去了，由于我的精心爱护、小心使用，她从未出过丝毫故障，所有的元件始终运行正常。最后，她又随我走进大学生宿舍，帮助我补习、提高外语。直到我成为“工薪阶层”后她才“功成身退”。但我仍然一往情深，不忍割爱，在局促的居室中，为她保留了一隅栖身之地……。

儿子听完我的讲述，似乎并不以为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我想，等他长大了，能理解那一页沉重的历史吗？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四：

（13）一本地图册

〖写在前面〗

这是1990年为内部小报写的，题为：地图伴我度“蹉跎”。我策划“一系列”时改了名。（08-11-03）

1966年夏天，“大革文化命”的“狂飙”铺天盖地席卷神州，我的学业就此中止。两年后又被打发到江西山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个年代，除了“大学习大批判资料”外就很难再找到可读之书。偏僻山乡消息闭塞、文化落后，令人乏味，令人窒息。

好不容易才出现了转机，1972年春天，我终于找到了一本足以“百读不厌”、真能“常读常新”的书——世界地图册。那是1971年“乒乓外交”成功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以后，为适应外交新形势而出版的“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本世界分国地图册。

打开这本蓝色塑料封套的地图册，可以强烈地感觉到那个特定年代留下的鲜明印记。在总体次序上，由以往的亚、欧、非、美变成亚、非、欧、美，反映了当年我国对外交往的重点与格局。在具体内容上就更具有时代特色了，比如，亚洲部分突出了“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最前线”的越南，专门为它设置了红河、湄公河两个三角洲的区域图专页；又如，对非洲各国，不再象以前简单地分成“东北部”、“西北部”、“中部”、“南部”等几大块，而是大大增加了篇幅，几个国家就是一幅图，使非洲的篇幅增加了两三倍，与此相反，欧洲诸国被大幅压缩，挤到了五六幅图中。20多个欧洲国家的排列次序上，也充分体现出“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时代精神，“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跃居全欧之首，“现代修正主义”的苏联则理所当然地位居全欧之末了。倘若地球上没有南极洲，那么，“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国就必然成为全书之殿后。

这本地图册定价2元，在当时几乎是一个青工月薪的十分之一，对我等插队知青来说就更显得昂贵了。但是，为了补充严重匮乏的精神食粮，我还是硬硬头皮、咬咬牙关买了一本。从此，广播里、报纸上报道的天下大事几乎都能在地图册里找到相应的“坐标点”。地图册里的文字说明，涉及自然、人文、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

可谓用之不尽的新闻背景材料。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之中，一种“神游列国”的感觉油然而生，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的有一点“身在山村、放眼世界”的“豪情壮志”。说得实在些，是地图册帮我驱走了蹉跎岁月中许多难熬的寂寞时光。

寒来暑往，几度春秋，世界地图逐渐印入我的脑海，曾几何时，我能背出各国的首都，默出各大洲政区图，指出当时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再加上平日读报时常常留意我国驻外使节的任免消息，经过几年积累，我竟能如数家珍般地报出当时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黄镇、曾涛、姚广、陈楚、柴泽民、熊向晖等二三十位大使的任所及变动情况！

当然，在回城、上大学之后就很少有这份雅兴了。不过还是发生过一件与此有关的趣事。一天，我作为“毛脚女婿”到女友家去，还未及落座，担任地理教师的未来岳母就把我唤了过去，要我帮她在地图上找找尤卡坦半岛在哪儿，她抱怨道：“不知是谁出的地理试卷，出了这么一个偏题。”岂料一种神奇的力量突然唤醒了我多年前留下的无意识记忆，我脱口而出：“它可能在中美洲。”我赶紧拿过地图册，三翻两翻，在墨西哥南部找到了尤卡坦半岛！未来岳母惊讶不已，她教了几十年的地理课，还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地方呢。我把自己当年在山村的陋室里、昏暗的油灯下“捧读地图、神游天下”、地图伴我“修地球”的往事告诉了她，大家都乐开了……。

（14）大笔一挥

〖写在前面〗

1995年国庆期间，心血来潮，大半天的时间就写了这3800余字，可谓一气呵成。万万没有想到，这篇回忆文字会有做梦也想不到的“续篇”——整整十年之后的2005年，我重返“第二故乡”。三十多年前的“小伙伴”、团支部书记冬仔带我旧地重游，没走多远，就问我：“还记得当年你写对联吗？”我说：“记得啊。”“那些对联现在还在哦！”“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是你们刚下来那一年你在各家门前墙上写的那些对联啊，现在还看得到！”我惊讶极了！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我看到自己的真实手迹，热泪盈眶，激动不已，驻足凝视，久久不愿离去……。（08-11-03）

从小我受到颇为严格的家教，五岁起就每天练习毛笔字，虽然没有最终掌握任何一位书法大家的真谛，但也算领悟了基本的书法知识，懂得怎样分析字体结构，怎样构筑笔画排布，只是写出来的字缺少“书卷气”。到念小学时，我的字自然就比同伴高出一截。“文革”时期，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专栏”比比皆是，少不了要用毛笔书写。正当我在家做“逍遥派”闲得发苦之时，一位同学来找我，要我帮忙抄写“大批判专栏”，我也就应允了。自此之后，我经常赶忙赶紧地完成一些紧急的抄写任务，结果给逼出了不大不小的一起“绝活”——毛笔大字行书

快写。最快的记录是，有一次，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我一口气抄写了篇幅为16张白报纸的“大批判专栏特刊”——“中央首长重要讲话”，总计约九千字，令老师和同学们啧啧称奇。

1968年11月，我到江西插队。在那个缺少文化的偏僻山村里，绝无仅有的能写好毛笔字的是个富农子弟，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里，重要的政治活动需要的大幅标语是断然不能交给他写的，于是，每当有重要政治活动，写大幅标语就成了一件令干部们头痛的事。上海知青的到来顿时使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了。

下乡伊始，正碰上当地开展“红海洋”式的“献忠心”活动，为了在村里形成“革命化”的气氛，凡是贫下中农家的大门口，一律要写上红底黄字的革命对联和横批。我们刚到时，生产队已经派人完成了底板制作，并开始用红色油漆漆刷对联和横批的底色，还挑选了大队支部书记的儿子主笔书写对联。尽管他“根正苗红”，还号称中学毕业生，但毕竟缺乏书写技能，爬上爬下地忙乎了一天，也写不了几副对联。可是，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有完成期限的，误了期谁能担当得起如此重大的政治责任？

大队干部找到知青的“头儿”小徐，要求知青积极配合和支持大队完成这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小徐是我的同学，知道我写得一手毛笔字，当即点了我和小郭两员“大将”。殊不知，我的父亲和祖父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小郭则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要论“出身”的话，我们两人无论如何是“黑”的，八辈子也赶不上“大队支书的儿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身份又是从上海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所以，由我们来书写革命对联大可放心也。因此，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投入了“战斗”。

当我站到梯子上，握着油画笔，蘸饱油漆，朝垂直的墙面写大字时，感觉是比在上海拿着排笔刷大幅标语要轻松自如得多了，这不仅是因为写一行五至七字的对联犹如小菜一碟，也不仅是因为在上海曾多次锻炼过在墙壁上直接书写大字标语，重要的是没有心理压力，不必担心会有高手来和我一比高低，在这儿非但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还有小郭来为我作“衬托”，虽然他的字写得不错，但缺少类似于我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和锻炼，所以效率远不如我；然而，最最重要的还在于，不用害怕有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说我是“黑几类的子女”！

心情轻松了，下笔有如神。我使出了在上海练就的“功力”，每到一家门口，先站在远处估摸一下对联底板的长短宽窄，再爬上梯子，简单地用粉笔在红色底板上粗略地划分一下间距，用不着拿着尺子和粉笔在梯子上爬上爬下比划来比划去地打格子，大大节省了时间，接着就“挥毫疾书”，眨眼之间，就完成了上联。挪过梯子，搁到另一边，三下五除二，把下联也解决了。再将梯子往中间一放，爬上去写上“中国共产党万岁”或“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就算是完成了横批。前前后后，大概不到一刻钟。

由于到山村才几天，在上海练就的“本领”远未生疏，经过多半天的“磨合”，就已经适应了这种工作的特点，工作效率逐渐提高。我们的工作是从村子的中心开始的，所以，一天功夫就让村中心地带实现了“一片红”。我心里明白，这还仅仅是“小试锋芒”。即使如此，当村民们傍晚收工回到村里，见到村中心已经实现了“一片

红”，惊讶不已，交口称赞“吃价”、“神速”。

这名声后来还传到了山外，我去公社办事或开会时，好几次有人来找我“救急”写大字标语、横幅。至于村里每次要写标语口号横幅什么的，则非我莫属，全由我“专业承包”了。再后来，就连部队征兵、大队武装基干民兵的政审材料也都由我参与整理成文并誊清归档。这些活计在“工分手册”上统称“写字”，可按同等劳力记取工分。与日晒雨淋、翻山越岭地下田、爬坡的劳动相比，实在是件令人羡慕不已的“美差”了。在农活特别繁重或自己身心状况不佳的时候，我也巴望着能再来一份这样的“美差”，调剂调剂，挣一两天省力的工分。坦白地说，在最后几年中，我也确确实实辜负过贫下中农的期望，在干“写字”活儿时，偷过懒，“混”了好几次工分，居然没有一次“豁边”、“翻船”，这也许要“归功”于自己的谨慎小心，或者“归功”于“又快又好”的表象骗取了贫下中农的信任吧。

不过，这“美差”也不是毫无风险的。就拿上述写对联来说，工作了几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我心惊肉跳的意外“政治事故”。这天晚上，我还在吃晚饭，有人跑来问我：“你今天怎么搞的？怎么给一户富农家门口也写上了对联？”这一说，真要把我吓得灵魂出窍了，这事如何是好？我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我可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队支书的儿子事先挨家挨户作好的记号行事的呀！他在每户人家大门旁的墙上用不同的记号指示出该户的“成分”，我就根据这记号，按不同的“成分”书写内容不同的对联。比如，贫农、下中农家门口都采用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诗词中豪迈奔放的语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等等。上中农家门口多半是写“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当中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家门口是不刷红色对联的。由于事关“阶级阵线分明”的大事，所以才郑重其事地由支书的儿子事先作了区别记号，而我也深知此事的重要，因而特别小心，每到一户人家门口，总要仔细辨明记号，写完后还要再次“验明正身”，严防出错。所以，是不可能在我手中出纰漏的呀。

如今，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真令人不可思议。我在最初的一懵之后，清醒地领悟到此事必定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发生了问题。我连奔带跑地来到“肇事地点”，一看，“成分记号”清晰可见，竟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乖乖，整个儿颠了个个儿了，怎么会把贫下中农的记号错标到富农家的门口呢？我急忙去找支书的儿子，得赶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当我气急败坏地跑到他面前时，他倒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我刚开口，他就知道了我的来意，笑眯眯地说：“别着急，我已经知道了，这事情是我出了差错，没你的责任，放心吧。明天找人去铲掉就是了。”哇，好大的一场虚惊啊！我如释重负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咚咚直跳的心还没有全部平静下来。

与笔有关的“风险”还有一事值得一记。那是1974年的9月底，国庆前夕的一天下午，我在大队部书写庆祝国庆25周年的标语。冷不防，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来：“小王，在写标语啊？今年是民国几年了？”我大吃一惊，什

么人如此胆大妄为，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叫大嚷“民国”？回头一看，又吓我一跳，这人竟然是老贫农艾奋发的妻子！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她。她以为我没有听懂她的一口方言，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问－你－哪，今－年－是－民－国－几－年？”这一来，我更紧张了，忙向四下张望，还好，没有别的人在场，我连忙制止她的大喉咙，用当地对年长女性的敬称称呼她：“婆大，你搞错了，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今年是国庆25周年。”“什么？不叫民国了？共和国？共产党？才25年？不是早就三十几年了吗？”哎哟，我的妈，还在念叨民国哇！我赶紧打断她的话头：“婆大，那是早就过去的事了，千万别乱说，别搅和在一起啊！”她见我的神色挺紧张，也就知趣地走开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真没想到，堂堂一个贫农竟然会连共产党、人民共和国都不知道！要是在六年前我们刚到山村那会儿，说不定会把这事儿当成“阶级斗争新动向”向大队“革委会”汇报呢。不过，经过了山村六年的“再教育”，“阶级斗争”的“嗅觉”反而大大麻木了，不说别的，就说刚才那个“婆大”，虽说她家是贫农成分，实际上，只是在解放前几年的一次赌博中输光了全部家产，才在划定“阶级成分”时成为“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的。诸如此类的“内幕”还真不少，这可大大模糊了我们头脑中原先清晰的“阶级界限”。从旧社会过来的“婆大”目不识丁，年近花甲，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里生活了一辈子，又哪能弄得明白政治上的风云变幻呢？

再说，六年前我们知青刚来的头几天，还没有自己“开伙仓”，由生产队安排到贫下中农家吃“供饭”，我就是在奋发“老大”（当地对年长男性的敬称）家就餐的。他家只有“老大”和“婆大”这老两口，膝下无子无女，年过五十，体弱多病，加上“老大”在“文革”期间的一次宗族械斗中被人用扁担打歪了脖子，更难以参加繁重的大田劳作，一直由生产队照顾安排在仓库当保管员，挣不了高工分，所以这两个相依为命的老人生活得相当拮据。可是，当他们接到通知“供”上海知青“饭”时，他俩还是尽其所能，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直到我们自开伙仓后，“老大”和“婆大”还不时来关心我们的饮食冷暖……。想到这一切，还能去“举报”吗？“阶级斗争”这根弦未必就该老绷得那么紧吧？不过在那个年月，我还是得把这件“非同小可”的事严严实实地密封在自己心底。

许多年过去了，我这支笔早已离开了山村，也用不着再涂抹大幅政治口号了，又听说那位“老大”和“婆大”已经先后谢世，只是每当我见到国庆标语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往事来。

（15）*有这样一个“影迷”*

〖写在前面〗

这篇又是1990年的“作品”。回头一看，“一系列”的10篇，90年写的和95年写的，四六开。90年是第一波，

是三十周年纪念的余波和自己“爬格子”新潮涌起这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95年是第二波，正值自己跳槽成功、还未完全进入角色的“过渡与磨合期”。不过，在此以后再没有出现第三波，“一系列”彻底搁浅了。（08-11-03）

这几年，我国与“山鹰之国”的关系慢慢解冻，阿尔巴尼亚影片重返我国银屏。到了11月28日（阿独立日）和11月29日（阿解放日）前后，中央电视台总要播出一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今年（1990年）是《反正有理》（据说是部喜剧片），去年则是一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在中国银幕上放“滥”了的《宁死不屈》，描写二战时期反法西斯斗争。

记得去年11月28日晚上，我随意转动着电视机频道旋钮，突然，一阵熟悉的乐曲声使我停止了动作。“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宁死不屈》的主题歌！我把电视频道锁定下来，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主题歌的旋律反复出现，激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1968年11月，一批挂名初中毕业的上海初二学生来到井冈山下，开始了“双手绣出地球红”的“壮举”。很快，这些受过大城市文明熏陶的年青人感到了“文化沙漠”的荒凉。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是彻底净化了的，御用文人拼命鼓吹“百看不厌、常看常新”，“八亿人民八个戏”又怎能改变百花凋零的局面？而在偏僻山村里，只有半导体收音机能勉强听到“样板戏”，还夹杂着叽叽喳喳的电磁声，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它娱乐活动了。寂寞难耐，困守愁城。

1969年夏天，已在大城市放映了许久的“九大”纪录片姗姗来迟，总算到了偏僻山沟里。这是下乡半年多头一回“文化享受”，谁都想一睹为快。大家早早吃完晚饭，顾不得一天劳作的疲劳，顾不得月黑天昏，黑灯瞎火之中，一脚高一脚低，在坎坷崎岖的山道上，翻山越岭，赶了三四里路，来到邻队的晒谷场上，“享受现代文明”。纪录片很短，因为纪录的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九大”上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光辉形象，所以，连映两遍。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大家依然兴致勃勃，没有人退场或躲雨的。从此以后，只要电影放映队下乡来，我们这批“上海人”是最积极的先锋，崎岖山路上最起劲最兴奋的必定是“阿拉”。

1969年年底，有人去上海探亲后回到山村，告诉大家，他在上海看到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还带回一份印刷粗糙、内容简单的电影说明书。这一下，他成了大家的“明星”，不断有人来到他的床头，让他讲述电影情节。听众们如痴如醉，仿佛是坐在大光明电影院里欣赏着声与光技术的结晶，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讲述者则口干舌燥，声嘶力竭，为的是让“阿拉”同伴们分享一份“幸运”。那份说明书也成了宝贝，经过几十个人争相传阅，面目全非，破烂不堪，但那上面的主题歌却在山村里传扬开来：“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战斗生活象诗篇……”。这充满异国情调的歌声居然会在古老、偏僻的山沟里回荡，恐怕连当今名列排行榜榜首的名歌金曲也要自叹弗如了。

随着山区简易公路的建成，电影放映队终于能进村了。尽管老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

地“转”来“转”去，但送上门来的“奢侈享受”是断然不可白白放弃的。至今仍使我不能忘怀的要数“四天三看《侦察兵》”了。好象是1974年的夏天，由王心刚主演的“文革”期间第一部国产故事片《侦察兵》在“阿拉”们望眼欲穿之中终于来到了山区。不知为什么，放映队此次不进村。“阿拉”岂肯放弃这个难得的“享受”机会，拖着一天劳作后的疲惫身躯，赶了三四里山路，去欣赏了一场别具风味的当时上海滩都没有的“夏夜露天电影”。谁知，过了两天，放映队改变初衷，进山来了。他既来之，我则看之！于是乎，二看《侦察兵》。次日，大雨滂沱，简易公路一片泥泞，载着放映队的拖拉机怎么也爬不上出山的那个陡坡，“老天留人”了，既留之，则放之，当夜，再放一场《侦察兵》。看不看？看！既放之，则看之，送上门了还不看？！呜呼，四天之内三看《侦察兵》！其中的滋味，是欢乐还是乏味，是甜还是苦，有谁说得上来……。

就是那么一个年代，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影迷”。每年回沪探亲期间，总要到电影院一饱眼福，解一解压抑了一年的“馋”。“阿片”、“朝片”、“越片”无一遗漏，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地区”这类纪录片也不放过。几乎是每天要看一场电影，有时还要“赶两个场子”。坐在电影院里，能使人忘却“文化沙漠”中那可怖的寂寞感，但一走出电影院，回到现实中，又一片茫然：这也叫“影迷”么？

电视机荧屏上闪现出“上海电影系统《宁死不屈》译制组”这一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字幕，“……战斗战斗新的战斗，我们的祖国要获得自由解放”的歌声余音绕梁，而我的心潮仍然翻腾不已……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五：

一捆井冈山扁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写知青生涯回忆录时，首批开列了十个题目。虽然进展不快，但写得还算顺手，就决定“扩容”。在1994-7开列的第二批十个题目中，为首的就是“一捆扁担”。然而迟迟未有动笔。直到不久前清理旧账时，我细细分析了这篇回忆录为何“难产”的原因，给自己留下了“备忘录”——寻找1968-11日记，回忆扁担上的题字。近日总算把这件事梳理清楚了。

（一）护送

在整理自己四十余年前的日记时，看到有好几次提到“区里护送我们来赣”的护送团。

1968-11-28日记提到了有四位，邹、殷、吴、王。

11-30日记则提到护送团将于次日回沪，还特地记录了这四位的身份。

“区革委会干部老邹”。他是带队的。记得当年他已经四十上下了，如今应该是八旬老翁了。在上山下乡狂潮中，他一直处于区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组（区革会毕工组，后来改称“乡办”，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安置第一线。印象之中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他还在为云庄大队知青成立独立核算的生产队一事出谋划策。

“区工宣队老殷”。1968年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在区一级也有相应的工宣队指挥机构。对上山下乡这样的大事，工宣队当然少不了参与其中，以“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

“吴老师”。不记得是哪个中学的教师了。在一大批十六七八岁、没有社会经验的“学生娃”走上人生之路时，有一个中学教师来送一程。

“王医生”。一个区上百个学生，全市上千个学生，远征千里之外，这在上海还是头一遭，所以配备了医生“护驾”。

这“四路人马”真可以说是在组织、政治、思想、生活上面面俱到。

12-1日记写到，上午六点半，护送团离开云庄，“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及插队落户的青年们热烈地欢送他们”。“后因汽车没有返回，明日出发”。

（二）爬山

1968-11-22，是我们来到云庄村的第三天。天气晴朗。上午，生产队干部带领我们爬山，区护送团成员也一起参加了。

记得那天是村子背后的一条山沟，上山的小路只有一人宽，蜿蜒曲折一路上行。生产队干部边走边介绍情况，但三十多人是一字队形，无法集中在一起，只能断断续续听到大队支部书记的一些话语。当地的基本生产情况是，山沟里是层层叠叠的水稻田，山坡上有杉、竹、油茶等经济林以及大片野生树林。但主要的生产劳动还是在水稻种植方面。至今还依稀记得云庄村的劳动力要摊到每人十多亩水田。

尽管新干是丘陵地带，有山但不大不高，但是，长期住在大城市的人们还是被这样的山林田野深深吸引住了。忽然又传来一个消息：这条山路曾经留下过红军的足迹。云庄乃至新干虽然属于井冈山地区，但在二三十年代并不属于“红区”范围而是“红白”交界地区，毛泽东林彪等都曾经在新干的麦？（上斜下土）有过一夜留宿（1970年曾经策划修建纪念馆，因9-13事件而终止）。大家听了很兴奋，就把这座山叫做“红军山”了。

这座只能算得上丘陵的小山，的确有点非同一般，有一段路特别陡，几近40度了，用锄头挖出一个个凹坑作为踏步，才得以一步一步上山。不久之后一个晚上，有一个“阶级敌人潜逃”，我们连夜到各生产队追捕，适逢下雨，到了这一段滑溜溜的山坡陡路，就只能手脚并用了，或曰四脚落地。

（三）扁担

当地人都有习惯，上山必带柴刀。那天爬山时，经过一片竹林，生产队的干部们就顺便为我们砍了一些竹子，当场就削制成了一根根扁担。这一举动，激起了刚刚下乡三天的我们的“革命情调”——做一些扁担让护送团带回上海去！这是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的扁担！那个时代的人往往还记得“朱德的扁担”这样的故事。……我们掮着正宗的“井冈山扁担”满载而归，兴致勃勃地回到村里，老乡们还迷惑不解——上海人要那么多扁担干什么？大城市里也用得上扁担吗？

以后的几天，护送团去另外几个公社、大队执行本区毕业生的安置任务去了。到他们完成使命即将回沪的前

夜，11-30晚上，我们纷纷拿出“井冈山扁担”，让护送团带回上海。由于毕业于不同学校，大部分同学还没有走上工作岗位（67届毕业生中赴江西插队是属于离校较早的），更由于在充满革命豪情与政治热情的年代里“井冈山扁担”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向母校师生们赠送“井冈山扁担”，成为护送团的一个重要负担。虽几经协调，各校平衡，但最终还是有偌大的一捆。就以云庄村计，三个班，平均每个班来自两个学校，就有六个学校；每个学校两根扁担，就有十二根！还有来自其他村的呢？

我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年在扁担上的题字。“我们东风八个人合送一条扁担，上写，赠东风中学工宣队、军宣队、校革会、全体革命师生，八名井冈山战士。”这是“校级”的，另外还有一条“班级”的扁担，上写“赠老师们、同学们、亲爱的战友们，一根扁担寄红心，战友用它干革命，昨日东风杀沙场，今在江西开新宇。你们的战友、井冈山战士。”除此之外，还捎上了一些油茶籽和野果子，让上海人们看看当时赫赫有名的洗涤剂——茶籽饼的由来，尝尝山上摘来的两种外形相似但味感相反的野果子“甜杜”与“苦杜”（谐音）。

（四）感叹

许多天之后，上海的老师同学来信了，他们收到了我们托护送团带去的信与纪念品，但是没有“井冈山扁担”！幸好护送团对师生们如实相告：他们带回去的东西确实不少，火车又很拥挤，所以在上火车之前决定，把那些扁担全部留在了火车站外面！我们都惊愕不已，这可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纪念品啊！但是还有消息传来，他们每人还买了几十斤橘子，新干三湖出产的小小的贡橘也是颇有名气的土特产啊！带到上海是绝对受欢迎的好东西、抢手货喔！……于是，大家都恍然大悟，那个晚上的慷慨激昂全部付之东流了！至此，区里的护送团在当地活动了十余天，带走了一捆“井冈山扁担”，留下了一段难以评说的往事。

光阴荏苒，时过境迁。我曾经在1994-7写下这样的感叹：“请护送团的老师、工宣队师傅带回上海的‘井冈山扁担’被遗弃在火车站旁的旷野中。无知青年的狂热与成年人的冷漠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段话不免有些过激，但是，随着社会生活资历的深化，我们自己的感受也在不断变化……。

（五）遗憾

那捆扁担是“送”给了远离山区的樟树火车站附近的农民们了，也算是物尽其用，有了合理的归宿。之后几年里，我倒是在回沪探亲的时候陆续带回了三件“井冈山制品”——竹扁担、木扁担、竹杠棒。这是家中生活的需要。因为那时候家里没有煤气，要到煤球店买煤球，虽然可以送货上门，但家里还是想节约那笔送货人工费。而我在江西锻炼出了“挑担功夫”，于是带回了“井冈山扁担”，每年冬季的春节前后，在南阳桥街头可以看到一个小青年，一脸稚气与书生气，居然能够挑着一百斤煤球稳稳当当走在马路上。后来又带回一根木质扁担，其使用寿命

肯定要比竹扁担长得多，也是上海滩上不太常见的东东。再后来，城里推广使用煤饼（蜂窝煤），店里不用煤球筐了，也就无担可挑，就带回一根一米五左右的竹杠棒。但是不记得有两个人抬一摞煤饼格的经历，也许那时又取消了送货人工费？

1978年，全家迁居到了有煤气供应的新房子里。我出于“插队情结”，把它们三位也一起搬进了新居。以后两度迁居，依然“形影不离”。2001年再度迁居时终于遗失了，我还特地到到几处可能的地方寻找，一无结果，真是成了终身的遗憾。

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

很多年了，提到1968-12-21，我总觉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因为我们是在这一天之前的一个月又一天，从上海“城里”来到江西“乡下”的。千百年来，这些山里的“乡下人”已经把自己的穷乡僻壤看作是“流放地”。从城里“发配”到乡下的，“冇好人”（冇mào=没有），凡是被从城里下放到这里的，多多少少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到离县城最远的山沟沟里来吃苦呢？不就是为了改造“坏人”的思想吗？……到了文革年代，“坏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了。至于我们这些“短个仔”（当地对十来岁青少年的称呼），则成了当地人从未见到过的、如此年轻的“小牛鬼蛇神”，从几千里外下放到这里，更是非同小可。多少年了，村民们遇到大事都以干部的说法为准，这样的习惯思维已经深入人心，群众也罢，干部也罢，莫不如此。所以，这种“无稽之谈”起源于当地的一些干部。尽管我们再三再四地解释，“我们不是小牛鬼蛇神，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青年……”，毫无效果，无人相信。我们都感到是有口难辩的莫大苦衷。

根据我的日记记载，1968-12-21晚上，“我们正和支书、大队长烤火”，应当就是在离我们住地不远的大队部，正好听到有线广播中传来“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就一起“进行了学习”。当晚，我立即在日记本扉页上草草记下了梗概。数日后从报纸上抄录了全文（参见《我打开1968年日记》）。

当天日记里有并不怎么起眼的一句话——“我深深感到，插队落户这条路走对了，我坚决走到底！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为毛主席争气！”——粗看只不过是一句那个年代的“应景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因为，我们已经背了一个月“小牛鬼蛇神”黑锅！乍一听到“最新指示”，真有获得平反的感觉：“毛主席为我们说话了！”自从那晚之后，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小牛鬼蛇神”的说法果真从此销声匿迹了。我们也似乎从此有了一个钦定的统一称呼“知识青年”，也不再自称“红卫兵”“插队青年”“革命青年”“革命学生”等等了。

然而，面对知识青年的扬眉吐气，很快又传出新的说法了："毛主席让你们来，毛主席也会叫你们回去的。"是谁竟敢如此大胆、口出狂言？不是别人，正是那天晚上和我们一起收听广播、一起学习"最新指示"的大队支部书记！

这位"农村的同志"，担任大队书记十余年，那年刚满五十虚岁，算不上已经上了年纪，但大家还是按照当地对上了年纪的男子的称呼，尊称他为"老大"。"老大"不愧在农村基层领导岗位久经磨练，以至于对最高指示也有另类解读、独特见解！如果要较真的话，"老大"讲错了吗？没有。"最新指示"中，确确实实没有要求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啊。

"老大"对"知识青年会回去的"不仅仅是这么想的、这么说的，也真是这么做的！——"知青安置费"被"老大""挪用"，买回了一台拖拉机——全县第一个生产大队拥有自己购置的拖拉机！当时，全大队六十余名知青的安置费共计两万多元，加上大队已有的一些积累，买"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就不差钱了！也许，在那里的城里人居然真会如此长时间地下放，是"老大"没有见到过的现象，而且还没有出现"号召回城"的明显迹象。所以，到我们下乡后四年半，1973年上半年，总算开始启动"知青住房建设"。若这一年没有李庆霖的信，工程的完工可能还会遥遥无期。

12-21那条80来个字的"指示"，不到80年代就被彻底摈弃了。"老大"当年的先见之明、"大胆狂言"就大方向而言是说对了——知青的确没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我不知道，当大返城形成十年之中的另一次狂潮的时候，面对他从未遇到过的下放时间几近十年的知青一个一个离他而去的局面，"老大"又是什么想法、什么说法。

到1980年初，村里的上海知青已经一个不留了。可是那一年春节期间，知青们还特意邀请"老大"到上海来游玩了一次。几天之内，中午、晚上的饭局接连不断。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多的饭店酒家，回城的知青还是在蜗居斗室里"螺蛳壳里做道场"，各显身手予以招待。轮到我接待"老大"时，还特地在当年上海的"地标"——上海万人体育馆门前，一起摄影留念。足以在"日记选"中专写一篇了。【1980日记选：庚申春节接待"老支书"】

下图为1980-2-24的留影。

（右起：知青小徐，"老大"，我。站在前排的小孩是"老大"的孙子。）

那位"老大"已在九十年代撒手人寰，如今"回去看看"的知青们，只要有时间都会去祭扫"老大"。下图为2009春节期间当年的知青"回去看看"时特地去看望"老大"。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每年到12-21前后，我总会想起那些公然与12-21指示"大唱反调"的人和事。我依然对"老大"当年的另类解读感到钦佩，也为自己当年的幼稚与天真感到可笑与可怜。

图片地址：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001092012537/

平安夜的一声爆炸

现在似乎人人皆知，12-24是平安之夜。而在那个“彻底批判封资修”的年代，没有人会想到、更不会提起这个夜晚。我则是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直到这些年才略微晓得一丁点儿。1968-11下乡到江西新干的云庄村后一个多月，恰恰就在这个平安之夜经历了一起心惊肉跳的爆炸事件。

到云庄不久，上海知青时常有家里通过邮政寄来的包裹，需要到邮局领取。头两年，云庄村的邮政投递关系在曾家邮电所，距离云庄村10多里路，大步流星单程也需要一个多小时。1968-12-24，是我们云庄知青的第一次“曾家陂之行”。一路上，除了亲历了那“终身不忘的一条河、一座桥”（详见该文）之外，还有另外一起爆炸事件，令人难忘。

那天上午，我们知青集体户八班去砍了半天柴，劳累之余，稍事休息，已经到半下午了，我与小郭一起去曾家陂邮局领取邮政包裹。我们俩在“拿埠河”那座曾经令知青“谈桥色变”的桥上，颇有点意料之外的顺利地来了一个往返，成为云庄知青中最先“吃螃蟹”且大获成功的两个人，心里颇有成就感，喜滋滋地快步走回云庄。因为冬天日短，此时夜幕就要降临了。

在拿埠过河过桥后不远，就开始进入一处山口，去云庄村的必经之路——“拿埠口”。这处收拢的山口，有点像电影或电视剧里那种典型的设埋伏打敌人的“袋口”“关隘”，两侧的山逐渐靠得近，且比较高，因而更觉得比别处光线差一些，昏暗了不少。我们俩也就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走出这个口子，就是云庄村所辖范围内最大的一片良田沃土“大垅”的最南端，虽然地势开阔了一些，但天色也渐渐暗淡下来了，所以我们的步伐不敢怠慢。

向云庄村蜿蜒而去的小路，位于东边山脚下；紧挨着一条小溪，这是当时“大垅”里一条重要的给排水沟渠。进入“大垅”后不久，这条通往云庄村的小路向西拐弯、横跨“大垅”的时候，要越过这条小溪。虽然小溪十分狭窄，纵身一跃就能跳过去，但这条小路是一条重要的对外要道——交公粮、卖余粮，化肥农药的进村，无论是肩挑还是推独轮车，都要走这条小路，所以，一路上都是青石板的路面，在跨越小溪时，还用青砖搭起了一个拱形涵洞。青石板路面和青砖的涵洞面上，都有独轮车留下的深深的车辙。

我和小郭提着包裹，一前一后，在小路上疾步往回赶。我大步跨过小溪上的那个涵洞，继续前行，突然听见身后“轰”地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差点一松手把包裹掉了。我回过头一看，小郭掉下去了，还好，小溪很浅，大约一尺多深而已，所以一条腿还跨在涵洞上。他一个跃步转身就回到了小路上，包裹也还抓在手里。我心里砰砰直跳，忙不迭问小郭是怎么一回事。他有点不知所措地说，不知道啊，只觉得一脚踩到了什么东西，紧接着就

是“轰”……。的确，空气中有类似玩烟火爆竹的气味。

我们四下打量，没有别的动静，除了我们两个人的对话，一片寂静。我们左右张望，没有别的人影，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片空旷田野里。不远处是东边的山坡，是漫山遍野的灌木丛，一阵风吹过，沙沙作响，树影摇晃，说不清楚那里有没有“潜伏”？我们脑海里闪过小说电影中的那些描写，心里不免紧张。我们甩动手脚，都是一切正常。看看天色愈来愈暗，二话没说，就赶紧一路小跑，朝隐约可见的村子跑去。

到家了，我们气喘吁吁地向老乡叙说自己的历险记。老乡说：一定是有人发现了那附近田里路上有什么野兽的脚印了，于是就在砖砌涵洞的隐蔽处下了埋伏。据说是用香喷喷的饵料夹着土制炸药，引诱夜间下到溪里喝水的野兽，或吞咽咀嚼，或踩响炸药，非死即伤。

所幸的是，炸药威力很小，我们没有受伤！不过，总归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惊险呀！

于是，我在日记里记下了一笔——1968-12-24，“下午与郭同去曾家陂取包裹，天黑才回家。回家路上还踩响了一个老乡用来打野兽的火药。”

1968日记选

（1）插队落户的最初三天

1968.11.19 星期二 晴

上午十点，我们离开了一月革命的策源地——上海，向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进军！·······（28）

【忆与议】

这是我历时四十年的日记的开篇第一天。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当天日记。因为1968-11-19的晚上是在火车上度过的，记得那一天我们大家在火车上挤挤挨挨着，在闲扯到疲乏至极后摇摇晃晃进入梦乡。不知道为什么几十年来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一节卧铺车厢，但涌进来许多插友，不可能享用卧铺。这个细节直到现在无法查证。也许是个梦境？

相关链接：《一碗蛋炒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可能在列车上写日记的。我又注意到以后连续几天日记的末尾都有“（28）”，而1968-11-20到达目的地云庄之后又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行李也是两天后才打开，所以也

不可能当日事、当日记。所以，“（28）”的含义应当是补写日记的日子。

1968.11.20 星期三 阴

大概是半夜进入江西境界的。今天上午七点差十分，火车胜利抵达江西省清江县樟树站。稍休息，约九点，卡车把我们送到新干县城，约十点半。午饭后，十一点再乘卡车，经过约五十里路程，来到距离云庄大队三里路的小坑大队。云庄大队全体贫下中农倾村而出，连午饭都没吃，赶到这里欢迎我们。虽然场面不大，但气氛相当热烈。随后由贫下中农带领我们步行来到目的地——江西省新干县鸡峰人民公社云庄生产大队第三生产队。

后来行李也送来了。贫下中农帮着我们搬行李。

晚上，我们，东风的费、刘、郭、金和我，南塘的宋、陆【共】七个人睡在六块二尺宽也不到板上，连衣服都没脱，熬过了一夜。因为地方实在太小没法子拆行李，也没法子睡。（28）

【忆与议】

这段日记与1995年10月写就的《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互为补充。回忆录中对细节写得较为详细，而日记中对一些“时间节点”的具体数值——到达樟树站、向新干进发、到达新干县城、向最后目的地进发——近乎是即时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相关链接：《第一次走进“第二故乡”》我在1995-11-20（“插队第一夜”27周年纪念日）夜起草、1996-02-22改定的《插队第一夜》中，在细节上还是经不起“原始记录”的检验。翻阅当年的日记，发现有一个差错：第一晚是七个人和衣而卧，不包括副班长沙。回忆起来，沙身体不好，生过肝炎，好像照顾他睡到大队部或是某个队干部家里了。

相关链接：《插队第一夜》1968.11.21星期四晴上午也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下午由大队开了一个会，介绍这里的生产情况、阶级斗争情况。

由于睡床问题没有解决，只得又将就了一夜。（28）

【忆与议】

在这天日记中发现了一个已经遗忘的情节：对我们如此之多的上海知青到达云庄村毫无思想准备，使得突击征用“地富分子”的住房也措手不及，以至于我们连续两个晚上七个人和衣而卧。

1968.11.22 星期五 晴

抽空写了一封信，算是给家里安家信。今天搬了场，是一家富农家搬出来的。我们东风的五个人和南塘的三个人和建庆一个人睡在二楼。原来是堆放东西的，很脏，光线也不太好。但比起前两夜要好得多了。上午爬山。（28）

【忆与议】

末尾仍然标着“（28）”。似乎是来不及补写许多已经过去多日的细节了。11-22上午的爬山是很兴奋的一件事，但是4个字就带过了。11-21甚至写道：“上午也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其实最初一个星期的生活充满了诸多根本想象不到的情况，以至于自己也记不清楚了，糊里糊涂之说也还算合适。

（2）下乡三天，开始三光

1968.11.23 星期六 晴

今天上午第一次出工。内容是锄草。由于长期生活在大城市，受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脱离工农，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了生产劳动实践，就是连锄草这样轻活，也觉得很累。下午整理东西。（28）

1968.11.24 星期日 晴

今天整天锄草。···（28）

【忆与议】

1968-11-20到达“第二故乡”，11-22上午由大队干部带领去爬山（在那天的日记里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上午爬山”，实际上大有文章，我在1994年计划写的“一系列”回忆中就专门列入了与之相关的一个题目，十五年了竟未能成文，汗！），算是“认识”一下吧。11-23就开始正式参加劳动了。

不过，这个日子在大脑记忆中似乎“集体失忆”了。去年是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我向好多插友提问，“还记得哪一天开始出工？”回答都是“不记得了”“忘记了”“大概是12月1号吧”。若无日记，我也是绝对想不起来的。

“脱离工农”之类“三脱离”的自我批判，活生生地表现出那个时代沉迷于“政治挂帅”“无限忠诚”的现代迷信与虔诚之中，这在如今是无法想象的。

至于日记中的“锄草”之说乃谬误也。时已初冬，作物均已收获完毕，大田一片空荡荡，何以“锄草”？实际上这是冬闲季节整修农田的一项内容，就是把田埂上的杂草除掉，仿佛是剃胡子，因为田埂有三个面需要“修整、理光”，所以当地农民称之为“三光”，很形象、又风趣。

记得刚开始听到“三光”一词时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同时，我也有点过敏：为什么用日本侵略军的罪恶行径来称呼我们自己战天斗地的正义行动呢？只是没有人带头提出异议，我就不吭声了。日子一长，对这个词也习以为常了，自己的日记里也用上了“三光”的说法。那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12-22了。

时至今日，说到“三光”，上了一些年纪的中国人仍然几乎都会联想到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但不会与农事项目联系起来。然而，在貌不惊人的山间小村，为何硬是把两者绑到了一起？抑或偏居一隅的山民们不乏幽默调侃的本事？幸运的是，当地既没有矿产资源，又远离交通要道，在三四十年代躲过了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

其实内中还很有名堂。无意之中，今年四月我到“金山词霸”去看看那里面有没有“三光”。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高级汉语词典》在“常用词组”中有“三光”——古时指日、月、星。又是“偏居一隅的山民们”的创造，把古义延伸引用到农事记工上来了？事实上，江西有着庐陵文化的深厚底蕴，对“三光”一词的来源、运用与变化是不是值得探究呢？

相关链接：《从修圳说起》（附图）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093109033899/

（3）最初萌发的抱怨情绪

1968.11.25 星期一 晴

今天一天是捡油茶籽。活儿不重，可就是上山、下山比较累，挑担也蛮够呛。

给周信完成。另给郑写了一封信，但无法寄出，邮递员要明天才来。

徐公社开会回来，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晚上生产队传达了。这里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28）

【忆与议】

在“大上海”无论如何现象不出偏僻山乡的闭消息塞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下乡后快满一星期了，邮递员还没有进过山，又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于是就“亲口尝到了滋味”。日记中提到的周、郑都是我的中学同学、好朋友，直到现在还有联系。周还保存着我们当年写给他的信件！可惜他太忙，一直没时间找出来复印一份给我。

下去后没几天，我们在云庄大队插队的六十余人的“头儿”徐与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回来说又有“最新指示”发表了，此时的我们还远远没有淡忘“上海滩”连夜赶在第一时间“庆祝”“学习”的情景，相形之下，我们在山村里却要等着一级一级传达下来……。如此这般的偌大反差，如此这般的思维惯性，就更加增添了抱怨情绪。

我在日记本的扉页上用当时的习惯记下了“最新指示”的全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和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后面还注明“11.25晚传达”。记得这是当年10月13～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以后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深入批判“刘修”。随后的日记中反映了我们在山村“抓革命”“红海洋”的亲身经历。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还有过一阵幻想。某日看到江西的什么报纸上刊出省革命委员会一个常委叫万什么的被揪出来批判了，我们依旧像在上海时那样，对这类“路线斗争新动向”颇为关心，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消息，居然异想天开——打算有机会去县城的时候买些报纸看看，甚至写信告诉家里争取有机会寄些材料去！真是天真到了极点，以为穷乡僻壤的县城就像上海一样那么方便就能买到报纸、资料。后来才知道，去公社就不容易，需要步行几十里路；去县城则要走上百里路，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再往后，我自己有一年居然没有去过县城一次！具体年份待考。

这天日记开头所说的“捡油茶籽”农活，写得相当简括，容当细细回忆。

（4）仅四天，不必劳动了

1968.11.26 星期二 晴

今天一天又是捡茶籽。这儿要修水库，班里决定把我和郭留下搞三忠于布置和大批判专栏。这件事前几天就在说了，开始时我不乐意留下，但经过思想斗争，决定服从班里的决定，并决心一定要搞好。战友们明天就要出发了。・・・（28）

【忆与议】

当年，下乡后三天，11-23就投入了“战天斗地”。但是仅仅干了四天，11-27开始就不要劳动了！

当时，生产大队按照上级指令，凡是贫下中农都要家家户户开展“三忠于布置”和“大批判专栏”。在我们到达以前已经开始，但进度很不理想。（详见《大笔一挥》）

我们云庄村的三十余人延续了离开上海时的军事化编制，分为三个班，“番号”为四、七、八班，插到云庄村的两个生产队（云庄村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村，所以划分为三、四两个生产队）。大队把这项“光荣的政治任

务”交给了八班，我是其中一员。“头儿”与班长们开会决定让我和小郭完成这项任务。刚刚下去的时候，大家还真的好天真、好淳朴，在最初的激情下，人人都希望自己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积极、出色，所以对这类“非生产”的劳动是十分不乐意的。

而这样的日记中反映出来的，可谓是当年典型的思维方式。凡是要经过考虑斟酌的，多半冠以“思想斗争”，“斗私批修”，其结果总是“学习最高指示、执行最高指示”！

1968.11.27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和郭、沙布置大队部。似乎什么事都没干就过去了半天。

下午，修水库的同志出发，我们帮着挑行李。

晚上，在大队部布置，有线广播里广播“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头条新闻就是，全国军民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学习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真搞好斗批改，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另外还广播说，最近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历史文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而我们这里却啥也不知道，太落后于形势了。（28）

【忆与议】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天开始“三忠于布置”时增加了沙，也许他是我们八班的副班长，需要在我和郭即将开始“独当一面”地工作时“面授机宜”？沙早已不在人世，就是在，恐怕也记不清那么多细枝末节了。

当年对修水库是十分向往的，因为在小学、中学里接受了多年的教育灌输，对大寨、红旗渠等等“战天斗地”的壮举耳熟能详，所以能够亲手参加修水库的战斗，真是望眼欲穿。记得那天我与郭帮忙挑行李到几里路外的水库工地时，既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亲眼目睹了水库工地的盛况（那是在隔壁大队修建的水库，公社决定“八方支援”，所以水库工地上已有许多人马，当然由于规模很小，故用不上“人山人海”），失望的是自己不得不“置身度外”，与壮举无缘。

1968.11.28 星期四 阴

今天布置大队部，搞了一天，基本完成。

区里护送我们来赣的老邹、老殷、王医生、吴老师今天回来了。他们是到其他大队、公社去安排的。卢湾区有些学校的同学确实很艰苦的，他们的位置在拔海1200米的山上，气候寒冷，生活艰苦。我们云庄大队要比他们好得

多，我们有什么理由不鼓足干劲，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为人民多作出些贡献呢？拿我来说，当前就是要全力以赴，搞好宣传布置工作。（30）

【忆与议】

说到当年的卢湾区，总共有八个班，八十余人，都在新干县。其中六个班、六十多人到了鸡峰公社云庄大队，另外两个班去了其他公社。

1968.11.29 星期五 阴

今天是布置室外了。给贫下中农家门口写对联。由于物质条件差，故进度相当慢。又说井冈山专区将在二日检查三忠于活动情况，而现在进度如此慢，真急死人！（30）

【忆与议】

所谓“布置室外”，就是为贫下中农写家门口的对联，在那篇近4000字的《大笔一挥》中有详细的回忆。到了2006-5，还发生了绝对属于意外的一件事——做梦都没有想到，时隔38年之后，我竟亲眼目睹了自己留下的“遗迹”，详见《2005第二故乡行——（3）意外惊喜，卌载遗迹》。2009早春时节，插友回云庄，见到那些“遗迹”依旧赫然在目。时至今日，想起这个情景，看到那些照片，就有一种特殊的激动。

<u>（5）头一回，日记近千言</u>

1968.11.30 星期六 阴

发生了一桩事情。昨天放在大队部的一听黄油漆不见了。这黄油漆是当前三忠于宣传布置活动的急需品，离2日【井冈山地区来检查三忠于宣传布置活动】只有两天了，偏偏在这关键时刻，黄油漆不见了，就像是过河没有桥、烧饭没有米，故工作只能停了下来。估计可能性有二：一是可能其他队的人顺手牵羊，带走了，但可能性不大。二是可能阶级敌人蓄意破坏。这儿云庄大队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是全县清队重点。“树欲静而风不止”。对于轰轰烈烈的三忠于活动，阶级敌人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就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必然要来破坏，我们务必不要松懈革命警惕性。晚上班开会时，支部书记通知，十二点以后不能通行，今晚有民兵放哨，全体民兵都出动了。支部书记又一再叮嘱沙，把厨房门锁上。估计领导上已作出了一定措施。

到了这里，只看到过19、20、21日江西日报、井冈山报，以后就一直没看到。毛主席最新指示，至今还未看到，只听到传达，也从未学习。据费、刘说，昨晚他们在水库工地上看到报纸，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学习党

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咳，真倒霉，这里报纸都看不到，消息都不灵通，怎么谈得上紧跟形势呢？订报纸，可又得从明年一月份开始订。也就是说，12月份我们又将看不到报。

【卢湾区护送团】老邹他们明天要走了。今天晚上，八班开了一个会，欢送会，开得很好。老邹、老殷、王医生、吴老师都发了言，启发很大。各校都托他们带些东西给母校和战友们。我们东风八个人合送一条扁担，上写，赠东风中学工宣队、军宣队、校革会、全体革命师生，八名井冈山战士。另外，费、刘、徐、李、金和我给薛、沈、余、罗等教师和战友送了若干油茶籽和野果，另还有一条扁担，上写赠老师们、同学们、亲爱的战友们，一根扁担寄红心，战友用它干革命，昨日东风杀沙场，今在江西开新宇。你们的战友、井冈山战士。

今天修水库的同学都请假休息。写信托老邹他们带回去。费、刘各写了一封给薛等老师和战友。我本来也想写，可就是思想乱得很，没有心思去写。这两天是干轻活，空下来，想着想着就想到了上海，想到了同学们、同志们、・・・心里乱糟糟，理不出个头绪来，也说不出究竟在想些什么。

修水库请假回家休息、写信的同志们在今晚的会上，都作了自我批评。班长金更是激动，感到自己作为班长却如此轻率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很不应该，表示要从中吸取教训。（1）

以上是1968-12-1补写的11-30日记，将近1000字，是离开上海十天后最长的一次日记。当时“干轻活”——宣传布置，大多数时间是一两个“阿拉”在一起，全靠自觉，没有别人来指挥督促，加上工作时必需的油漆失踪，几乎无事可干，因而也就有条件去胡思乱想、胡乱涂鸦。

前半段，这真是极为可笑的往事。在那个“千万不要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因此要“提高革命警惕性”。明明一件简单事，却人为地复杂化，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两天之后，真相大白，恰恰就是当初分析的两种可能中的另一种！我在日记中，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上次少掉的那桶油漆，原来是给二队拿去了，昨天追了回来。”当时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后半段，是天真无比的“自我批评、斗私批修”，实在是当年日记的典型。至于区里的护送团在当地十余天，及至他们启程回沪，还留下了一段难以评说的往事。这与11-22的第一次爬山有关联，数十年来一直想专文回忆。

（6）红卫兵又发誓又发愁

1968.12. 1 星期日 晴

今天依旧布置。由于黄漆的短少，故一天没干多少事。四点多钟，黄漆又买来了，也没干下去。一方面，郭和我一样，心思不集中，老想着去水库工地，另一方面，我的右脚给压伤了，也不大好做事。

这里最大的缺陷，我看不外乎是消息闭塞。前天晚上从有线广播里听到：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致电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等同志，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黄永胜同志率中国党政军代表团抵地拉那，参加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庆祝活动。而报纸却老是迟迟不见，真倒了老霉。

上午六点半左右，护送我们到江西的区革会干部邹同志、区工宣队老殷同志和吴老师、王医生胜利完成护送任务，光荣返沪。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及插队落户的青年们热烈地欢送他们。同志们都说，亲人走了，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向一千万英雄的上海人民汇报，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

后因汽车没有返回，明日出发。

晚上修水库的同志们回来，向我问长问短，我深深感到革命集体的温暖，我从心底里感谢同志们。

【忆与议】

时隔数十年看这些日记，让我自己也忍不住开怀大笑。当初“政治第一”“政治挂帅”到了如此地步——对自己的脚伤一笔带过，至今也无法回忆起第一次意外是怎么一回事了；与此同时，又幼稚到了如此程度——连外交礼仪活动都觉得相当重要，看不到那些程式性报道就牢骚满腹。而更为可笑的是，区革会护送团回上海的时候，我们豪情满怀地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向上海人民和毛主席汇报！实在是把严峻的生活和漫长的道路想象得太简单、太浪漫了。

1968.12. 2 星期一 晴

今天继续布置。上次少掉的那桶油漆，原来是给二队拿去了，昨天追了回来。

因为脚痛，使不出力，郭辛苦了一天。

本来我不想出工，脚痛嘛，但是我想到，宣传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红卫兵的神圣职责，宣传毛泽东思想一分一秒都不能停，脚痛算得了什么？“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轻伤不下火线，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决定不顾脚痛，坚持出工。（4）

【忆与议】

如此的日记，如此慷慨激昂的语言，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年是很正常的，其中有纯真，有模仿。天真、幼稚、愚昧、愚忠，无以复加。

值得一提的是，下乡至今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了“红卫兵”。记得那年11月15日“兵临城下”似的决定到江西

插队落户的同学，无论是真正的“红卫兵”，还是文革的“逍遥派”乃至“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到这时候一律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成为“红卫兵”一员。到了乡下，我们也张口闭口自称“我们上海红卫兵”。直到12-21指示发表以后，才有了全国统一的正式称呼“知识青年”，而且是最高统帅亲自命名的哦。这也许是我们这些12-21之前上山下乡者特有的一段简短经历吧。

1968.12. 3 星期二 晴

今天仍旧是三忠于宣传布置。脚好了一些，成果比前几天稍大了一些。

中午，邮递员送来一迭信件，内有费的家信一封，・・・这是来江西半个月内第一次收到的来信。多谢费的父亲，寄来了19～26号的文汇报，使我们看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中央两报一刊社论。

・・・用了三天时间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较详细地谈了一下此地的情况。・・・（4）

【忆与议】

下乡后11-22给上海家里发出第一封信，12-3有几位同学收到家里回信了。相距为11天。这是他们家里回信特别及时。基本上是两个星期为一个周期。费父似乎早有计划“成竹在胸”，是我们之中第一个收到上海报纸的，看到了11-19～26号的文汇报，解决了我们看不到报纸的愁与恼。

我大概是比较木纳，反应迟钝，直到下乡两星期之后才有了写信的灵感，居然花三天写了一封“详细报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写第一封信那晚，睡在阁楼上的九个男同学是“集体行动”，费、刘等“一呼百应”，大家都提笔写信了，而我还不大愿意动笔，全靠费等催促：“赶快写封信吧，让家里放心”。但我迟迟难以下笔，因为脑子里空空如也。幸亏大家是围坐在床沿写信（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偷偷看旁人在写什么，才勉强涂了一点点。那位费同学写得很快很多，衣食住行，面面俱到。由于我向来不善于记住饮食内容，所以一路上、下乡后吃了些什么，都想不起来、写不出来，恰巧偷看到费同学写得头头是道，就“连续作弊”似地照抄照搬，不料被费发觉了，公开爆料，让我羞得不行。

（7）年久失修与十月过节

1968.12. 4 星期三 阴

昨晚八点半左右开始下雷雨，时大时小，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因房子结构简陋，又加上年久失修，有几处漏了，但还好，没有漏在床上和行李上。清晨，雨止。修水库的同志们昨晚回来，因下雨，就挤在一起睡了一

夜。因为天下雨，今天他们没有出工。上午，有的写信，有的看报刊。下午根据大队支书的意见也未出工。

按此地风俗习惯，今天是十月十五，他们杀猪、磨米做团圆，有的还穿起新衣裳，有如过年。但问他们，叫什么节，又不知所以然。

下午各班排练文艺节目。我和郭没有参加，继续搞三忠于宣传布置。

【忆与议】

当年的住房，实在不算最差，是一家富农被生产队勒令搬空了给我们住的，自下而上，全部是青砖墙，这在云庄村是不多的。因为相当多的农户盖不起全青砖的房子，墙壁只有最下部的一米高是青砖砌成的，以上都是土坯（土砖）。这是由于当地全年雨水丰富，比较潮湿，所以必须有一定高度的青砖墙垫底，如果是全土坯的，就容易受潮、变酥，用不了多久就会倒塌。

当然，在结构方面，的确简陋，在屋顶的椽条、檩条上直接排放小瓦片就算是屋顶了，没有任何隔热、防水措施，这也是在当地经济条件下的习惯做法。我们云庄村有三个班，四班和八班的男生被安排在这幢房子里。四班的男生挑了“底楼”，认为这样比较方便，省得老是上上下下。我们八班的男生认为“二楼”比较干燥，衣物之类不易霉变。

所谓“二楼”，其实是搁楼，当地农民用它堆放杂物，不做卧室的，所以即使刮风下雨的时候发生一些透风漏雨也大体无碍。一般每年请人“拣瓦”一次，把由于刮风下雨或被猫踩踏而略显凌乱的屋顶瓦片整理一下，恢复阻风挡雨的功能。

而我们是把“二楼”作为“卧室”了，显然与房子结构原有的功能大相径庭。刮风下雨导致透风漏雨我们就有点大惊小怪了。习惯于用城市眼光观察世界的我们，“下车伊始”，就轻率地给出了“年久失修”的结论。记得到生产队反映情况后，毫无对策。以后又叫嚷了几次，来了一个村民，东张西望，用竹竿拨弄了几下就说好了。当晚又是连夜雨，漏得更厉害了，只能把床铺搬来挪去，避开漏雨处，一夜不安宁。由于“拣瓦”的泥水匠们不是上海的房管所，不可能召之即来，还不知道他们在何处“打工”，无从寻找，所以让我们着实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再往后我们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这天日记里说，农历十月十五，“像过年一样”。这样的习俗确实在发达地区不大看得到了。记得回上海时问父母辈，也没有人答得出来。现在到网络上查询，才得知此乃“下元节”，源于道教。至于为何在江西一些地方仍然流行，肯定与经济、文化等等的发展有关，但具体缘由要请教专家了。

附：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4185001.html中国道教一向认为天玄地和地玄天，地生万物，水为生物之本，且地含水。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农业文明注重地水两元素对人类万物的重要作用，所以，在中国道教文化理念中一直蕴涵着以地为中心去观察世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按照道教这种世界观，道教习惯将一年的“天官”（上半年）的正月的十五称之为“上元节”；下半年的地官节段的七月十五，则叫做“中元节”；由于地含水，水作用地，所以，地官下半年中段的十月十五则是“下元节”。这上、中、下三元，则组构出了道教对世界的三元一体系统认识。

参考资料：民俗节庆网http://www.1155815.com/。

（8）政治事故与政治学习

1968.12. 5 星期四 晴

继续搞布置。今天我们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教训。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错给一家富农门口也写上红底黄字的对联。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也说明了我们同贫下中农接触太少了，感情太淡薄了。

小坑水库胜利完工。同志们凯旋而归。···

【忆与议】

1995年在我的“一系列”回忆文字《大笔一挥》中，把埋没在心底将近卅年的“政治事故”记录下来了。而当年发生“事故”的当天，日记却写得如此简单。因为，在那个阶级斗争年代，这一“政治事故”的责任是可怕的，但是不能给“领导阶级及其同盟军”抹黑，内幕是不能随便泄露的。所以，在日记本上也要充分注意不要给“敌对势力”留下可乘之机，并且把可能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说白了，是为贫下中农和干部们“避讳”。看来我的“革命警惕性”是超级敏捷的。其实，那个时代那种气氛究竟有什么意义？纯粹是自己吓唬自己罢了。

附：《大笔一挥》的有关内容——

工作了几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令我心惊肉跳的意外“政治事故”。这天晚上，我还在吃晚饭，有人跑来问我：“你今天怎么搞的？怎么给一户富农家门口也写上了对联？”这一说，真要把我吓得灵魂出窍了，这事如何是好？我顿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我可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大队支书的儿子事先挨家挨户作好的记号行事的呀！他在每户人家大门旁的墙上用不同的记号指示出该户的“成分”，我就根据这记号，按不同的“成分”书写内容不同的对联。比如，贫农、下中农家门口都采用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诗词中豪迈奔放的语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等等，等等。上中农家门口多半是写“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这当中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作

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家门口是不刷红色对联的。由于事关“阶级阵线分明”的大事，所以才郑重其事地由支书的儿子事先作了区别记号，而我也深知此事的重要，因而特别小心，每到一户人家门口，总要仔细辨明记号，写完后还要再次“验明正身”，严防出错。所以，是不可能在我手中出纰漏的呀。

如今，不可能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真令人不可思议。我在最初的一懵之后，清醒地领悟到此事必定是在哪一个环节上发生了问题。我连奔带跑地来到“肇事地点”，一看，“成分记号”清晰可见，竟然是贫下中农成分！乖乖，整个儿颠了个个儿了，怎么会把贫下中农的记号错标到富农家的门口呢？我急忙去找支书的儿子，得赶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当我气急败坏地跑到他面前时，他倒是一副轻松自在的模样。我刚开口，他就知道了我的来意，笑眯眯地说：“别着急，我已经知道了，这事情是我出了差错，没你的责任，放心吧。明天找人去铲掉就是了。”哇，好大的一场虚惊啊！我如释重负地回到自己的宿舍，咚咚直跳的心还没有全部平静下来。

1968.12. 6 星期五 阴

整天阴沉沉的。上午还下了几点雨，地上潮湿得很。

上午全体到云庄的青年到小坑听南模介绍经验。下午讨论。晚上老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今明两天办学习班。

1968.12. 7星期六阴今天继续办学习班。上午讨论，中午吃忆苦饭，下午不了了之。

这个学习班办得真天晓得。大家干劲都不足，也没有信心办好它。下午甚至连金班长也擅自去小坑了。

晚上算是结业式，开得不伦不类，好多人都溜了。后来老支书到我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女生宿舍，讲了很多事。从他的话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到贫下中农对我们的许多作为是不满的。

【忆与议】

下乡半个多月，这是第一次专门为我们办的政治学习班。具体内容无从回忆。但从日记中看出，当地公社、大队对我们是有管理要求的。反过来，我们还是用“城市运动式”的眼光来评判周围的事情，例如对学习班的失望。

小坑距离云庄三里路。下乡半月有余，我是第一次出村，往山外跑一次，见识见识供销合作社的“下伸店”（想不到那栋建筑物到2005年还能看到。在《2005第二故乡行——（3）意外惊喜，卌载遗迹》有照片）。“南模介绍经验”，具体情况也难以忆及了，可能就是1968年夏天写血书上井冈的一批热血青年（参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来为我们这些“后来人”进行“现身说法”。

1968.12. 8 星期日 晴

上午男生锄草，女生捡油茶籽。下午队里抽水捉鱼，未出工。女生三点多钟才回家吃午饭。

本来今天继续搞三忠于宣传布置，可是用具又不见了。停了两天，结果笔、漆又不知上哪儿去了。

【忆与议】

办了两天学习班，宣传用具又不翼而飞！但是有了几天前的经历，这一次就“泰然处之”，再无“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紧张气氛了。

“队里抽水捉鱼”是平生第一次见世面，以后由于自己年年回上海过年就没有再次身历其境了。那一年是在村口一个池塘里，人工“拷浜”，几乎大半天，才池底朝天，捉到不少大鱼，家家户户分一份，打打牙祭。1969年起，在云庄村北面的山沟里修了一个小水库，“鱼塘”就北上且扩大化了数十倍。

（9）我们开始分班做饭了

1968.12. 9 星期一 阴

这几天都下了阵雨，气候开始转冷。

今天出了早工。整天价锄草。

晚上就后天开始分班开伙问题，全班开了会。由于气氛不严肃，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来。

【忆与议】

下乡以后半个多月，我们三十余人依然保持着三个班的编制，集体化的生活、劳动。一日三餐是吃“供饭”（一种由村民为来村的外来人员包括干部和劳务人员提供饭餐的制度，生产队给予一定的工分补贴）。我们是“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当然不可能一直享受“供饭”。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开伙仓的呢？当年的插友中没有一个回答得上来。如果没有日记，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一定会同样的目瞪口呆。

1968.12.10 星期二 阴

明天起各班分开搞伙食。今天一整天没有下雨。

下午与刘一起去砍竹子，真够呛。刚回来洗好脸，砍柴的同学“求援”来了，他们干劲真足，砍了好多柴，完

工时已天黑了。

【忆与议】

那次砍柴可能是我们下乡后的第一次上山砍柴，我“错过”了这个第一次。记得那一天砍柴的同学们是到一处被山火烧过的山坡上去砍柴，到处都是黑咕隆咚的，衣服碰到树干就是一片黑，两只手则很快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黑手，尽管已经是初冬，但是大家对砍柴的巧劲一窍不通，所以不一会儿就满头大汗，习惯性地用手或者袖子捋一把，脸孔也就成了大花脸。所以，大家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挑着柴回来的时候，天黑、路黑、人也黑了。

我被安排去砍竹子。记得这与即将买猪崽、搭猪栏有关。云庄周围山上有竹子的几个地方离村子都很远，但其中一处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假如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我在2008-12-15写的《云庄，不乏诗意之外的不明白》里描写过的一个地方——

当年去大队所属自然村之一东岭背的路上，到了山顶，走过一段杂草丛生的小道，在乱树丛中，分开树枝藤蔓，可以看到一片断壁残垣。村里老乡只是简单地说，这里是一座荒废倒塌的庙宇，因为没有饮水水源，大约在四十年代末就破败了。我发觉，它背靠高山密林，而正面却是视野开阔、一片幽静。真有非同一般的意境。我曾两次因砍柴砍竹子到过这里。面对风光不再、被湮没在山野之中的遗迹，我的好奇心总让我把那些“稀奇古怪”留在脑海之中。

1968.12.11 星期三 阴

早上出早工锄草。上午因雨停工。下午继续锄草。

最近发现了一些情况，如大队支书与民兵连长之间的矛盾等等。今天民兵连长把王拉到家里，谈了此地一下情况，并约好明晚续谈。我们务必保持清醒、慎重的头脑。

这两天与×班关系相当紧张。我想应尽快正确处理这一矛盾。

×××近日数次对我说：“你太不果断了，否则你就不会到这里来了。”我倒不这么想，我总觉得来到江西没有什么不好，这里确是我锻炼改造一辈子的理想之地。我下定决心在这里艰苦奋斗一辈子了。

【忆与议】

对这几天的日记有几点回忆。

一是下乡之后我们分班开伙仓的确切日子是12-11.。在此之前，都是两三个人到一户贫下中农家里吃“供

饭”。但是，我在日记中对生活细节几乎没有只字反映。记得我是和费分在一对无子无女的老贫农家中。所谓老，也不过五十多岁，但“老大”“婆大”（当地对老年人的尊称）已经是满脸皱纹，“老大”由于在文革的派性冲突中被打伤颈部，下田劳作不便，生产队予以照顾当仓库保管员，但收入对日常生活还是有很大影响。记得有的同学说自己吃的“供饭”不错，时有腊肉或小鱼干款待远道而来的上海学生，我和费就只能听听、不说话了。与各“供饭”人家并无二致的是，我们一日三餐也是和大家一样，饭前诵读“最高指示”不可忘！

二是“革命热情”已经在一些人身上发生变化，除了有人“擅自”去邻队玩而置学习班于不顾，各班之间出现矛盾，更有人对我的赴赣之举提出异议，实质上也反映了他自己心里深处已经出现对“革命行动”的“动摇”。而我还没有脱离天真幼稚，继续“下定决心在这里艰苦奋斗一辈子”。当然，更有难以启齿的内心痛苦。出于谨慎，日记中只能记述到这个层次。

三是日记中逐步显现出我的特点与个性。一方面，在集体中处于“边缘”，尽管那个晚上对“吃饭”这个头等大事专门开会讨论时“不了了之”，但第二天分头去砍柴砍竹子时就表明实际上是早已有了安排，只不过我自己不知道这个决策的过程罢了；另一方面，这种处境与我长期表现内向有关，在学校里属于“黑×类”出身而沉默寡言，到了云庄我更主张“保持清醒头脑”，因为我牢牢记着11-19早上离家时父亲一再的叮嘱：“遇事要多动脑筋。”

（10）67届下乡的几个日子

1968.12.12 星期四 阴

看来天气要转冷了。每天可以看到北风吹来大片大片的冷云。

上午收到了郑6日晚在闵行来信，他已分配到市建筑工程局七公司七〇三队。李在四公司，将赴安徽。戎、朱他们延期赴崇明。估计延期赴崇明是为了四万六千插队、赴云南军垦的任务。

今天整天是锄草。女同学捡茶籽真够呛，早上八点出工，要到下午四点才回来。中饭也没吃。

昨晚梦见章打着背包来到这里插队落户，梦中的我真高兴极了。从最近几次来信中，他均未提及插队落户事。周信中曾提到他与弟弟中可能有一个留在工矿。估计章是还抱着留在工矿的一线希望。杨来信中说，68届工矿名额仅10～20%。由此看来，章加上其他原因留工矿是可能性不大的。

【忆与议】

这是我的日记里留下的当年有关67届毕业分配的零星消息，虽然我已经身处偏僻山村，但还是关心着许多同学

究竟如何“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应当说，对67届毕业生而言，1968-11告别校园是比较早的，当时属于“军工”（军事工业企业）、“普工”（普通工矿企业）、“上农”（上海郊区农场）档次的，都没有公布方案，而“外农”（外地农村）档次却首当其冲地“送”出了去江西插队落户的第一批“毕业生”！

尔后的分配方案似乎还沿用旧习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12月初，有了“军工”方案，而去“上农”——崇明农场的，据说是推迟了，因为要完成首次大批量“外农”——四万六千人，去插队、去云南军垦。这个数字应该是上海全市的计划任务。不知道当年在“毕工组”工作的人们是否记还得具体的情节了。

这天日记中提到的同学章，是当年一个典型的“杯具”，我一直在心里称之为“章江号事件”，另作别记。

1968.12.16 星期一 阴・・・

明天又是星期二，邮递员该来了。上回杨等来信说15号赴云南军垦的同学要出发了。全市一千人均要六七届，母校东风中学有三、四个名额。不知哪个战友又出发、走上征途了。让我们牢牢记住这几个光荣的日子：

1968年9月17日 星期二（赴黑龙江军垦的战友出发日）

1968年10月25日 星期五（赴大丰干革命的战友出发日）

1968年11月19日星期二（赴江西插队出发日）

【忆与议】

这里记下了与67届毕业分配去“外农”有关的几个日子。

1968年9月17日，星期二，赴黑龙江军垦。这实际上是66届毕业生赴黑龙江军垦农场的日子。1968年8月，66届毕业生分配去向中，黑龙江军垦有多余名额，故宣布向67届开放。其实，这件事本身就够耐人寻味的了——为什么这样的计划会完不成？在政治热情高涨、“屯垦戍边”、“打倒苏修”的口号声中，没有什么人会有异议。记得我们要好的同学中有两个女生被光荣批准，大家在学校操场上合影留念。

1968年10月25日，星期五，赴大丰农场。应该是属于67届毕业生分配的范围吧。位于苏北的上海大丰农场是上海的一块“飞地”，能够分配到那个农场也算不错，“上农”档次，工资待遇。由于那里有“劳改犯”在那里服刑，所以“政审条件”也很严格。

在此之后，就轮到我自己了：1968年11月19日，星期二，赴江西插队。再往后的日记里，记录了原定12-10去

崇明长征农场的同学推迟到12-22出发，而赴云南参加军垦建设的则于12-21出发了。这两个日子都是从事过之后写来的信中得知的，想来不会有什么讹误。

回味回味这个日程表有一个感觉，那时候似乎一个月左右就有一次出发高潮。而12-21最高指示之后，真的是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狂潮。真希望看到当年在计划、分配等部门的工作者们留下一些真实的回忆录。

（11）锤炼红心的豪迈气概

1968.12.13 星期五 阴

今天队里缴公粮。要挑着担跑上五六里路。本来，我也去，但大队要我加紧搞三忠于宣传布置工作，我就留下了。我想，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现在是应当把文权夺回到劳动人民手中的时候了。上午写了七家。下午有时阵雨，但坚持到五点收工，写了14家。效果比以前高多了。郭昨天劈柴把手指也砍了一下，没法子写字了。

【忆与议】

关于“文权”云云，完全是照搬文革发动者的说法。在“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时代，平民百姓更是唯有统一思想、绝对服从。可惜的是，在那个年代，纵然再叫破喉咙，偏僻山沟里就连中学生也出不了几个，且质次量低。而如今，同样还是那个山村，新出现的大学生犹如雨后春笋，一口气还点不过来。

记得1968年刚下乡的时候，对“公粮、余粮”的概念并不清楚，只是在读书的时候听说过、看到过。所以，到了12月份，不应该是“缴公粮”而是“卖余粮”的日子了。因为，在夏季双抢时节新谷一到手，完成“缴公粮”就是第一要紧的大事情。

那一年，生产大队还没有拖拉机，所有进国家仓库的粮食唯有人工肩挑。出于好奇与新奇，我又为无缘挑担送粮而感到遗憾。日记中所云“跑上五六里路”，是指云庄村向南五六里路的拿埠粮站，是离云庄村最近的一个粮站。肩挑上百斤、持续跑上五六里，是件不简单的事。记得有插友回来说，几十个人一长溜的担子在田间小道上仿佛“长蛇阵”，哼呵哼呵，气喘吁吁，自己想停下歇歇都难，不仅不好意思，还阻挡了后面的队伍，说不定还会挨责备，就只能硬着头皮在“长蛇阵”中拼S一搏，一心期待有个领头人到某处大声号召“歇一下”，“长蛇阵”就逶迤停下了……。这样的阵势，那个冬天是最后一次（1969年春天就有大队自己的拖拉机了）；这样的滋味，我没有亲身的体会。时过境迁，有时候也会觉得是个小小的遗憾。

1968.12.14 星期六 阴

昨晚刮了一夜北风。那风真大，如同千军呼啸，万马奔腾，气势磅礴，在上海是少见的。今天气温骤然下降，前几天还只穿两件衣服，今天穿棉袄也可以。

整天除草。

1968.12.15 星期日 阴

早工除草。上午是三忠于布置。至今天已经全部把贫下中农门口的对联写好了。仓库周围的布置看来难以“开工”，因为天气冷，这样干上半天一天吃不消。下午挑粪。挑上四十来斤重的担子，来回要走四五里路。整个下午挑了四担，很吃力的。回来后挑水力气也没有了。

晚上是对地富分子训话，大大杀了阶级敌人威风，大长了贫下中农、插队落户青年们的志气。

昨晚与×谈了很久，主要是云庄文化大革命历史。从今晚训话会上看来，此地两派仍旧存在。···我们务必提高警惕，以免误入阶级敌人的圈套。···翻了一下前些日子的“流水账”，想起这几天一点消息也不知道，报纸没看，广播没听，一想起“消息闭塞”就感到很不舒畅。

【忆与议】

记不清当年初冬的气候情况了。既然是“前几天还只穿两件衣服，今天穿棉袄也可以”，可见温度波动相当大。至于“千军呼啸，万马奔腾，气势磅礴”的风声，则是永生难忘。那里的山上，四季常青，杉树、松树、油茶、竹子、樟树、枫树等等等等，人工林自然林，乔木灌木，漫山遍野，山风一起就是“涛声滚滚”。

前天还在羡慕“缴公粮”的荣耀，不明了“路远无轻担”的道理，今天就尝到滋味了——挑上四十来斤重的粪担，来回要走四五里路，整个下午挑了四担，就感到很吃力了。所谓四五里，有一半是“承重”的，回程是“空载”，但毕竟包含了上坡下坡的起伏跌宕。这是按生产小组的集体劳动，是“短蛇阵”了，但还是要紧跟队伍不停步。记得当时还有规定，半天四担的指标达到以后就可以收工回家，所以当地农民的劲头就格外足，力求早点回家料理自留地或砍柴等等。

我不记得这粪担的重量是怎么来的，因为冬天不可能往大田里送那些包装袋上标明重量的化肥，而是送牛栏粪等农家肥，但没有过秤称重的印象。或许是听谁说了一个估计数字？抑或是每家每户的猪圈粪肥，生产队按重量予以收购？一时想不起往事的细节了。

那些关于“阶级斗争”的词藻，虽然不全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但如今回头看看自己四十年前留下的笔迹，简直难以相信，我曾经思考这些、这样思考！？

在我记忆里，那样的“训话”只有过那么一次，我也只看看没说话。印象中，某班组织过一次以插队青年为主力军的“训话”，我就没有去现场。听别人回来说有一些武斗行为。我就回想起1966年“天兵天将”红卫兵狂扫四旧的“革命行动”，太……。

1968.12.16 星期一 阴

这两天风倒不大，就是冷，特别早晚更冷。估计上海还要冷些。但是这里比上海好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劳动使人感到心情舒畅，一劳动冷也就给赶跑了。如果说在上海，房子里一坐，非冻死不可。

早上出早工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一方面早，另一方面冷，够呛的。但这些天来坚持出早工，也逐渐习以为常了，没有什么特殊感觉。

・・・黑龙江战友董在来信中说，想往有那么一天，明年或几年后，我们这些老战友能和老师们再次欢聚。我想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只愿战友们、同志们能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出一分力、发一分光，多作出一份贡献，互相交流、互相支持、互相鼓舞、互相促进，在伟大导师毛主席指引的大道上永远并肩前进！

早工锄草。上午、下午均为挑粪。挑粪是比较吃力的，但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毅力，磨炼一个人的意志，锤炼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

【忆与议】

有关战胜寒冷的高谈阔论、并肩前进的豪言壮语、不怕劳累的豪迈气概，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12）最初一个月的“修炼”

1968.12.17 星期二 阴雨

早工、上午均为锄草。下午没有出工。这几天老是下雨。上午我们是半路收兵的。

祖父来信。把大衣等物寄来了，我将跑三十里路去取。

【忆与议】

我决定到江西插队是太突然了太匆忙了（详见《人生第一步》），一些生活用品来不及打理，只能日后邮寄。祖父父母又没有在南方丘陵地带的生活经历，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为我制作了一件棉大衣，连同其他东西一起，给我

寄出了一个包裹。我连忙写信，说明棉大衣是不适用的，但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也就有了我第一次“跨越拿埠河”的经历（参见《终身不忘的一条河、一座桥》）。

1968.12.18星期三 阴

早上和上午仍旧锄草。下午全体出动砍柴，准备过冬。大家干劲很足，又干到天黑才回来。

【忆与议】

其实在云庄这地方，“上山砍柴、准备过冬”的说法并不成立。那里一年四季都可以上山砍柴，除非遇到瓢泼大雨的日子，那是上山下山实在不易。而寒冬腊月大雪封山的情况，在那几年插队生涯中也没有遇到过。所以“准备过冬”一说属于“不实之词”。真正需要准备的是农忙季节来到之前，需要为连续一个到一个半月的大忙日子备足柴火，大忙季节是没有时间去砍柴的。

日记里没有记下当时三个班的“行为差异”，只是几次出现“全体出动”的字眼，这是当时八班的特点，凡事多采取班集体行动；而同村异队的四班则较快地与当地农民“接轨”了——利用参加生产队集体农活之时，特别是傍晚时分，顺路到山上找柴砍柴，多少不论，一捆一把都行。这样的方式，虽然对参加集体劳动无甚影响，但是对体力消耗无疑要多一些。事实上，我们八班利用半天的时间集体出动，往往很难找到能使十来人一下子满载而归的薪柴林，结果效率不高。至于次日日记中所述，“砍了一整天的柴”，愈加是得不偿失了，当地农民也忌讳这种连续的高强度劳作。记得在农闲季节常常搞“砍柴副业”，让全体劳动力上山砍柴，卖到县城里去，固然满足了镇上居民的生活需要，但对山林的破坏极其明显。当时，生产队按重量结算工分，曾经有人一天砍柴数百斤的，工分的确可观，但体力消耗也可想而知。

1968.12.19 星期四 晴

今天终于放晴了。砍了一整天的柴，够累的。

早上的早工真叫人笑。按支书、大队长的要求，叫我们去赶猪，就是把跑散在外的猪赶回猪圈，跑了猪的家要罚五毛钱。这钱算作我们的伙食费。不知是真是假。

【忆与议】

这天的“赶猪”的的确确是下乡之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后来才慢慢晓得，这种事情叫“罚议”。至于日记中记下的罚款作为伙食费，应当是戏说之语。

村中有“罚议”的规矩，就是对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进行事先大家约定的处罚。

具体做法是，对各家饲养的家禽（鸡、鸭、鹅）、家畜（猪）以及各家分担喂养的生产队集体所有的黄牛、水牛，若因各家“看管不严”而跑出村子范围或擅下农田的，社员可以赶回圈中或“捉拿归案”，并报生产队给予相应的处罚——扣除工分。鸡、鸭、鹅、猪按只计，分别是4、5、6、10个工分；牛是归生产队所有，即使“犯规”触犯了集体利益，还是手下留情、网开一面，处罚力度稍轻，黄牛、水牛各为4、5分。记得也有过另一种处罚方法。按牛咬损水稻的棵数计罚工分，但没有具体实例印象了。

1974年，我因为骨折，有一年多时间在非农忙时节几乎成了“罚议”专业户，留下了不少难忘的经历和有趣的话题。另见《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

1968.12.20 星期五 阴雨

昨晚又开始下雨。早工没去。上午冒雨出工，大半路收工，衣服也淋湿了。

到江西以后也够懒的了。一个月了，只洗过两次头。要不是昨天砍柴，看样子还不会洗呢。10号换下的外套到今天才洗掉。

晚上，徐给我们谈了关于四班了解的一些有关此地阶级斗争的事。事情的确是复杂的，我们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坚持这一条，坚决依靠广大贫下中农！

【忆与议】

这是我到达云庄整整一个月。纵观这一个月，只是对山村生活与劳动的一些方面有了最初的体验，远远比不上后来的春季插秧、夏季双抢等大忙季节的“严峻考验”。所幸，我一直没有卷入所谓的“阶级斗争”这种令人痛心不已的折腾。一个月里，除了到三里路之外的晓坑村去参加学习班而出山半天之外，就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云庄。然而，也没有好好“修炼”——基本上是“半脱产”，因为“三忠于”宣传、布置等非生产性活动占去了一半日子。

我对11-23第一次参加“三光”劳动到12-31为止的39天作了一个粗略统计，除了因雨未开工的四个半天“意外”得到的歇息外，宣传布置达到15.5天，插队青年政治学习2天，合计17.5天，占29天的45%；至于参加集体劳动，几乎都是冬闲季节最轻的农活“三光”（11天），捡茶籽2天，挑粪2天，合计15天，占29天的38%。另外，青年班里砍柴等4.5天，占12%。

（13）12-21之夜出奇的平静

1968.12.21 星期六 阴雨

又是下雨，早工没出。上午也没法出工，把给家里的信写好了。下午锄草。

1968.12.22 星期日 阴

整天搞三光。

昨天晚上传来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正和支书、大队长烤火，进行了学习。我深深感到，插队落户这条路走对了，我坚决走到底！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为毛主席争气！

【忆与议】

看当年12-21、12-22的日记时，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漏看了内容？对“12-21最新最高指示”的反应居然如此平平淡淡！？——12-21那天，没有一字一句的记载；12-22提到了一句，数十个字仿佛是当年的新闻稿。此后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激动、振奋”的心情描述。生产队、大队以至公社、县等各级管理部门，也没有一点点“欢呼最新指示、学习最新指示”的活动安排，一切照旧，照样劳动、照样过日子，平平常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这在当时的上海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多少年之后，连我们这些“过来人”也难以相信当年会如此平淡、平静。似乎，也难怪，那些统一思想的广播听得多了，舆论一律的报纸看得多了，潜移默化，也就习惯成自然地变成了自己的日记？！

其实，我的日记中的反应平平、简单而空泛，实属无可奈何的“回避”，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与想法是不敢作声也不敢记述，但还是熟记在心。

我们是在这一天之前的一个月又一天，从上海“城里”来到江西“乡下”的。按照穷乡僻壤的习惯思维，是从城里“发配”到乡下的，“冇好人”（冇mào=没有），到了文革则统称为“牛鬼蛇神”。至于我们这些“短个仔”（当地对十来岁青少年的称呼），则成了乡民们从未见到过的、如此年轻的“小牛鬼蛇神”。尽管我们再三再四解释，“我们不是小牛鬼蛇神，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是上山下乡干一辈子革命的青年……”，但是，毫无效果。

12-21那晚，“我们正和支书、大队长烤火”，应当就是在离我们住地不远的大队部，正好听到有线广播中传来“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就一起“进行了学习”。日记里并不怎么起眼的一句话——“我深深感到，插队落户这条路走对了，我坚决走到底！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为毛主席争气！”——乍一看来，是那个年代的“应景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难言之隐。因为我们已经背了一个月“小牛鬼蛇神”黑锅，听到“最新指示”，真有获得

平反的感觉："毛主席为我们说话了！"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自从那晚之后，"小牛鬼蛇神"的说法果真从此销声匿迹了。我们也似乎从此有了一个钦定的统一称呼"知识青年"，从此再也不自称"红卫兵""插队青年""革命学生""革命青年"等等了。相关详情另见专文《当年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

而今再回味回味这段"最高指示"，又有几多滋味——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何谓知识青年？为何非得去农村？为何要再教育？必要又在何方？如此重大的国计民生，其来龙去脉、决策过程，直到今天依旧千人议万人谈，若要追根究底，仍然是一片朦胧，许多内幕尚未揭开。

"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又是说服，又是动员，与当年一系列最新指示"一言九鼎、一锤定音、横扫千军、舍我其谁"的冲天气概相去甚远。倒是可以套用一句最高指示"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炮打司令部》1966-8-5）

"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寥寥数语中貌不惊人的"应当"一词，是否反映出决策者当时多多少少预感到了些什么呢。

短短七八十个字，把几千万人折腾了七八、十来年，其后遗症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

1980日记选：庚申春节接待"老支书" 日记选

【前记】这些天整理1968年日记，忆及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见同名文），即当年曾经是我们知青"父母官"的大队支部书记"老大"，又想起了在大返城之后他曾经应知青之邀到过上海，还到过我家，并且摄影留念。我找出那张照片，但找不出有什么信息表明摄影的年月日。遂与照片中的知青小徐联系，得知事情发生在1980年春节期间。据此，我很快找到了1980年庚申春节前后的日记。

1980-1-26. 日记记载，插友小刘告诉我，"小徐将在年初二结婚"。三十年后，近日小徐也说，当年是邀请"老大"来上海参加她的婚宴。2-13，日记中提到，"前不久徐邀我初二去她家聚会"。那时候的婚宴，有很多人家是在自己家里办的。那天我自己有事，没有参加聚会。

2-18，农历庚申年正月初三。日记记载，下午顺路去看望插友小程，得知他"今晚宴请来沪过节的云庄大队党支书启发"。由于我晚上已有安排，故到八点多再至程处，"那儿空无一人，悻悻而归"。

2-22，正月初七。日记记载，上午插友小周来电话，"商定今晚去会会启发"。晚上赴周处，因为周得知"明天下午徐与启发来我家"，所以取消了去看"老大"的计划。

2-23，正月初八。日记记载，“徐与启发未来”。

1980-2-24，星期日在家。阅《百科知识》80-1，兼作笔记。洗被子。下午3时半去徐家汇，购得马寅初《新人口论》，边走边阅。行至蒲西路口，忽有人碰了一下我的手臂，我也未在意，继续前行，又闻有人呼我名字，这才止步，原来是徐和启发及其孙建军。想不到会在上海见到云庄的“老俵”，真是喜出望外。

这时正是四点半，电梯暂停。我让他们在下面先浏览一会儿，自己则直奔上楼关照妹妹准备晚饭。尔后再下楼与他们到万体馆前摄影留念。摄影处已过下班时间，好说歹说，才肯照一张。然后到徐汇百货商场转了一下。再回家，直上十三楼，鸟瞰观光。下楼入室坐下后小叙、吃晚饭，至6:50。我送他们到万体馆门口，握手道别。我送启发1斤糖果、5条肥皂。

当我问及一些云庄的人物，忆及许多小地名时，启发很是高兴。我确实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云庄的。可惜的是，谈兴渐起，启发就走了。这真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同那难忘的七年一样，这种相处、重逢的机会是难得的。

徐为我惋惜，下乡七年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年华。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有失有得，差别在于得失多少不同而已。无可非议的是七年的损失是巨大的、难以弥补的，但终究还是有所得的。我懂得了什么叫艰苦环境，什么是农民生活；我了解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中国农村的一个角落；我学到了吃苦耐劳的精神，脚踏实地的作风；我看清了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我迈开了人生的道路，经历了如梦的厄运，……这一切都在我人生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于云庄的人们，对于“老支书”是感激不尽的。

短短十来天的寒假行将过去，很有意思，会晤了当年的“农友”，更没想到见到了那位曾被我们敬畏而今又值得怀念的“老支书”。

【忆与议】

我是1968-11到1975-9在云庄将近七年整，病退回沪，后参加了“高考1977”，幸运地于1978年春天跨进大学校门。两年后遇见当年的“老支书”，的确是感慨万千，以至于告别之后“浮想联翩”，写下了几百字的感言。眨眼三十年过去，回眸这次难得的会面的经历与记录，重读当年在兴奋、激动之余写下的感言，至今没有什么变化。而生活的变化又是何等巨大。

当年市内联系依靠“公用传呼电话”，通信手段恨不发达，信息传递可想而知。我回忆起来，自己曾经感到很是沮丧——年初二的聚会没有去，年初三晚上不期而去又扑空，年初七计划去又没去，年初八计划中的来又没来，看样子没有机会会会阔别近五年的“老支书”了（我是1975-9-17离开云庄的）。所以，到年初九在路上不期而遇小徐和“老支书”，真的是喜出望外了。

当年谈及云庄，我忆及许多小地名，“老支书”很是高兴，离开云庄五年了还记得那么多。确实很有趣，2008年下乡40周年时，云庄来了六位“后代”，特地来看我，没有交谈几句，又很快回忆起云庄的许多小地名。翻开我的日记，不少小地名跃入眼中，仿佛神游在山间一样。

当年知青在与“老支书”告别时送给他的多是生活日用品，记得知青每年回沪探亲总有不少“采购任务”，糖果、肥皂等等是最欢迎的。那次“老支书”也特意给我带来一瓶茶籽油，这是一种时至今日依旧抢手的高档食油。我一直舍不得吃，偶尔在有客人的时候拿出来点缀炫耀。后来由于保管不善，过度氧化，变质变味了。

我注意到自己三十年前的日记中始终没有出现“老大”一词。也许是因为那时候还很忌讳这个词，在正式的媒介上它都出现在与黑社会有关的场合。出于谨慎，我在日记里也回避使用它，尽管我们在口头上对这位曾被我们敬畏而今又值得怀念的“老支书”，已经用了十多年的“老大”乃至“老头子”。

至于当年万体馆的高层住宅，是上海第一个高层小区，但是，电梯是人工操作，每天11点和16点半必须两次暂停半小时，以供电梯操作工吃饭。现在，那些楼依然在，设备设施也有所改进，但毕竟还是湮没在新兴的高楼大厦群之中了。

（14）12-24知青首次评工分

1968.12.23 星期一 晴

早工是三光。上午砍柴。沙、陆去新干买面条。明后天回来。下午的出工很不象话，队里没有很好安排，加上出工人很少，实在没有劲，4点多就收工了。倒霉的是刘误砍了一根私人种的竹子。反正很不是滋味。本来说要到菜园去浇粪，结果不了了之。那菜也是天晓得，种得不死不活，看样子快成兔子尾巴了。班中一些人还自鸣得意。我们如此下去，迟早要掉队的。

大队要编村史、家史，上海青年也要抽人参加。徐把我也报了上去。老实说，我这笔头烂了，真不高兴参加。结果给拉下了，不知道后事如何。

【忆与议】

那时候，下乡才一个多月，到县城去一次已属“奢侈享受”了。很难说没有人视之为一趟美差，尽管有可能因为赶不上汽车而走上五六十里路！班里开始产生龃龉，实属正常；腹诽不已，大可不必。

去新干买面条，就是买“卷面”。新干属于水稻种植区，在云庄乃至新干县城都是一日三餐吃米饭，没有吃稀

饭或稀粥的习惯！而小麦面粉则是稀罕物，几乎没有供应。对下放干部和知青则是网开一面，有一点照顾性质的卷面供应，难得有机会换换胃口打打牙祭。

至于编写村史家史，似乎就是一句话而已，说过了也就再无下文，自那以后也再没有任何人提起，更无点滴动静。重点还在于我自己，尽管我在中小学时作文还过得去，但自从1966-6“停课闹革命”以后，整整两年半与作文无缘，更难以言表的是，哀莫大于心死——我自己家里已经是两代人饱尝因言获罪之苦，黑锅在身，难道我还要去重蹈覆辙？所以，“笔头烂了”就成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知青的头儿小徐是我的同班同学，对此也是清楚的，没有继续为难我。假如像现在网上看到的知青回忆，要要笔杆子能够改变命运，我岂不有希望提前若干年跳农门的潜在良机？且不说这样的“假如”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不是喜说违心话、善做违心事的人。

1968.12.24 星期二 阴

从昨天下午开始就开始转阴。凌晨下雨。早工三光。费、刘早饭也没吃就去公社理发。估计还有他事。可能是去买柴刀，因昨天费遗失了一把。

上午挑粪。下午与郭同去曾家陂取包裹，天黑才回家。回家路上还踩响了一个老乡用来打野兽的火药。！

晚上，由贫下中农给我们初评工分。先自报。一般都自报1分，也有自报0.9、0.5的，更有说不要工分的。后来由贫下中农评定。我和郭均为6分（据说是插队青年最高标准），是因为搞三忠于宣传布置的缘故。其他同学，金5.5，屠5，费4.9，刘4.8，徐4，陆4，李、王3.6，潘3点多，宋未评。七班刘5，王4，张3.5，程3，两个女同学3点几分。···奇怪的是：1、本来说是要到明年七、八月份才记工分，为什么又从现在开始每天由生产队给我们记工分了呢？2、本来三队只字不提此事，为什么四队前日评了之后，三队突然急急忙忙地宣布初评工分了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看来这两个问题也可作为分析此地阶级斗争情况的线索。

【忆与议】

恰好是参加生产队劳动满一个月之后，毫无思想准备地迎来了第一次评工分！我对自己得分之高，是没有想到的。然而更没有想到的是，同伴们的得分竟是如此之低！当时“深入我心”的是“同工同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呢？我还差点将此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幸亏我是独自一人在胡思乱想，要是个鲁莽之徒，说不定会在平安之夜闹得不太平。不过，这首次评工分的经过与细节已无记忆，也许是因为几小时之前亲历的一起“爆炸事件”给我的影响太深刻了，见《平安夜的一声爆炸》。而评工分的余波在不久之后的分红中又激起一阵浪花，见《第一次分红》。

1968.12.25 星期三 多云

天气比较闷，搞了一天三光。看来我们脑袋里私字还很顽固，种田为工分的错误思想还在不断抬头。八班好些人，包括我在内，今天似乎有什么在束缚着我们，劳动的时候连直一直腰都不敢，害怕被抓住小辫子。这一情况已在今晚班务会上作了严厉批评。

×班同学的确存在思想问题。昨晚口口声声向贫下中农表示同意，今天一整天骂娘的声音不断。民兵连长已注意了。看来如他们不注意的话，往后将更糟。

贫下中农给我评了6分，是最高标准了。我想，这是贫下中农对我的鼓舞、鞭策。我今后应当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不能把6分当作包袱来背。队里要求我们搞批判刘少奇的漫画专栏，我决心马上就干，要主动些！

今晚开的班务会，很有意思，很有成效，以后应当多开这样的会，才有利于同志间的互相促进！

一算日子，已是12月25日了。明日是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诞生日。不由得又使我回忆起去年的今天晚上，为了赶出大批判专栏，薛、章、费、刘、郑和我几个人搞到深夜一两点钟……。这一切的一切，我还记忆犹新。・・・【忆与议】

第一次面对“干部群众的评议”，第一次决定自己的“劳动所得”，知青们没有思想准备，所以情绪波动，也属正常。平心而论，当时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尽管习惯于“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做法，但不至于趁机捞一把、攫取一批“无价”“无偿”劳动力，而是为我们一天不拉地记录在案了。倒是我们患了极左幼稚症——又是可以不要工分，又是批判工分挂帅。

这天日记里提到的1967-12-25之夜，另见《那一年的12.25夜》。

（15）革命化的日记与生活

1968.12.26 星期四 阴

敬祝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今天，12月26日，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全世界人民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七十五寿辰来到了！我们——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从英雄城市——上海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的上海红卫兵千万遍地从心底里发出时代最强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以一个红卫兵的名义向我们伟大的红司令毛主席宣誓：永远永远忠于您老人家，永远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生为您战斗，死为您献身，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事业！

为了纪念毛主席生日，全班吃了一顿面条。这面条是新干出的，和上海的差不多。面粉好久不吃了，故大家吃得很欢。

从今天开始，又正式干起我在上海干的那老行当了。为了争取在元旦以前把批判刘少奇的漫画贴出来，我和郭每天除早工外，专门搞这个。漫画是根据上海《工人造反报》复制的。早工三光。

【忆与议】

看到自己在四十多年前亲笔写下的日记，看到如此这般“革命化”的文字内容，真是啼笑皆非！

全靠12-26这个日子，才难得吃上一次面条。在几乎以水稻为唯一粮食作物的新干，要买一点面粉都很难。所以，“面粉好久不吃了，故大家吃得很欢”。这面条和下乡以前在上海吃的切面不一样。上海市区的粮店里每天供应刚刚从制面机上下来的含湿量颇高的新鲜面制品（学名：生切面，各地方言中又称水面、湿面、鲜面、活面等），并且可以一两为起秤购买。而那种卷面（学名：挂面，即以小麦粉为原料，经和面、压片、烘干、切断等工序生产而成）是大约20多厘米长、圆柱形包装、每包一斤（500克）的干制品，可以贮存很长时间。二者的口味当然以前者为佳，记得在新干买来的卷面就带些许酸味。至于当时大家的心里到底感觉如何呢？没法记下当时的真实。

有一点是真实的，我在日记本末尾记载有“日常收支”，12-25支出：卷面，1斤，0.21元。

1968.12.27星期五阴昨晚，我们八班全体同志在仓库为贫下中农十来首革命歌曲。支书谈了一些生产情况。通过此次会也看到了一些阶级斗争情况，···。

早工是三光。上下午继续搞大批判。明天开始要修公路了。不巧，我又不能参加了。

费、陆两个同志学理发。今晚分别给金、郭、我三个人剃了头。还不错，很有前途。此地老乡，村里也有人剃头，剃一个头要一毛六分钱，才不合算呢！

【忆与议】

云庄村的修公路，虽然与大寨人、红旗渠等典型不可比拟，但毕竟是在山岩上一寸一寸地挖出来的、一条沟通山里山外的拖拉机运输道路。直到2005-6我重返云庄的时候，面对当年不断修路的地方，依然有一种复杂不已的感觉——

这个看起来是十分平淡无奇的镜头，既没有万仞悬崖，也不是“一线天”险境，只不过十来米高、两三米宽、几十米长，当年没有一分钱外来资助，全靠全村人三十多年来利用农闲季节“炸石不断”、“挖山不止”，硬是在没有路的地方，一寸一寸地“蚂蚁啃骨头”似地劈山开路，如今已经成为平坦通衢，大小车辆飞驰而过。

至于日记中提到的知青学理发，是真实反映了当年“革命化”的生活。在最初四十天，我的日常收支总共只有8笔：

11-19，在火车上买了一本64开毛选合订本，3元。记得当时这是紧俏品，一个班只有一本。

12-7，订阅69-1江西日报一份，1元。也许当时班里是轮流付每个月的报费的？

12-21，邮票一张，0.08元。

12-24，邮票一张，0.08元。

12-25，卷面一斤，0.21元。

12-25，班集体资金，1元。这是“班务费”，用于什么呢？想不起来了。

12-31，刻私章，0.30元。这是因为领取邮件等必须具备的“身份证明”。

七项支出，合计5.67元。

收入只有一笔。12-25，本月零用钱，3元。这是按规定从安置费中每个月发给每个人。

这笔“零用钱”也是变化多端，先是1969-1-19还补发了11月的十天，计1元。但到1969-3往后的收支帐上就再也见不到这笔收入了。查阅日记，有明文记载，3-30至3-31办学习班，某知青点发出了“献忠书，决心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从4月份起不拿国家一分钱”……。彻底革命化！

1968.12.28星期六阴今天搞大批判。为了争取多一些劳动锻炼的机会，我们出早工，参加修公路。···×班整牛鬼蛇神很凶，有时甚至发展到了打，这是偏“左”了。他们常常问我们为何不搞。支书、队长都几次要我们也像×班那样搞起来。我们都认为，应当以贫下中农为主，上海青年协助搞为宜，此事还在商量中。

【忆与议】

尽管那年头我们也是深受左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要来真的，又成了“口头革命派”，打起了“太极拳”——“此事还在商量中”，并且有话在先——“以贫下中农为主，上海青年协助搞为宜”。这样的策略应该说是很老到的，这与几位家长在“幕后策划”不无关联。家长们深知“政治运动”的冷酷

与“阶级斗争”的无情，1968年那时候也面临着“清理阶级队伍”的压城黑云，所以再三关照我们，农村里“阶级斗争”与宗族纠纷常常是交叉在一起，相当复杂，在刚刚下乡、不知底细的情况下，小心谨慎是必需的。

（16）喜见电灯，告别六八

1968.12.29 星期日 阴

根据上海《工人造反报》第188期所载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少奇叛党叛国的滔天罪行》连环漫画复制的大批判专栏，今天宣告完成。早上贫下中农把已画好的二十张贴了出去，促使我们更快地完成了余下的十张。×老大说，你们画得很好，贫下中农看得懂。证明连环漫画是贫下中农喜闻乐见。所以我在想，以后应当多搞些这种形式的大批判专栏。

另外，还帮大队贫下中农革委会写了几条标语，内容是关于对敌斗争、大批判和征兵问题。

中午帮食堂挑了两担水。我现在决定从今开始，每天为食堂挑水。出了早工，修公路。

晚上从半导体收音机听到特大喜讯。我国于12月27日下午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热核试验。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对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的献礼！喜讯传来，同志们奔走相告，欢喜若狂，个个喜笑颜开，人人拍手称快。祖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飞跃，更坚定了我们在农村艰苦奋斗终身的决心！

【忆与议】

也许如此这般的“脱产”搞宣传工作，持续得太久了，以至于使我想入非非——“以后应当多搞些这种形式的大批判专栏”，而把修公路等等生产劳动的艰苦当成了点缀，每天帮知青食堂挑两担水已经属于不脱离劳动之举了。殊不知，讲究实际的农民们对那些宣传，哪里会看得那么重要、那么认真呢。而自上而下统一布置的工作，更是由不得我来盘算的，什么“多搞些这种形式的大批判专栏”纯属自己的“痴心妄想”。没有多久，水土不服等等症状接踵而来，第一次出现了情绪的低谷，也是不奇怪的了。

1968.12.30 星期一 阴

早工修公路时下放干部老姚通知我和郭今天起继续搞宣传工作——制作毛主席语录牌。本来我们计算：专栏搞好了，可以“下放”了——参加劳动。现在又不行了。

由于我们目前尚作为“市镇户口”，故买米须到鸡峰公社，离云庄有二十多里路。大家意见很多，但一时无法

解决。为了一月份吃饭，决定明天全体出动到鸡峰去。

【忆与议】

宣传工作的确是接连不断，大批判专栏刚刚完成，又要开始制作语录牌。这就是当年用“农闲变农忙”的精神大搞革命化！至于制作语录牌以及后来使用语录牌的具体细节，日记中未有提及。记忆中最多就是农闲季节带着语录牌在村子附近下地时忙乎一阵而已，一旦到了春插大忙，牵牛、掮犁、送肥、挑秧等等，一双手两只肩膀都忙不过来，还得翻山越岭地带那玩意儿？春插的头等大事就是“不栽立夏禾”（就是必须在立夏之前完成插秧），也就是那个时候的“硬道理”。

去公社买米，往返几十里地，“大家意见很多”，这是颇有印象的另一件事。当时第一年我们属于“非农”户口，吃的还是国家粮站供应的大米。不记得刚下去那个月吃的米是怎样买来的。后来传说每个月要到粮站买米，就在知青中炸开了锅。因为我们已经得知，生产队还有余粮要卖，因而就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把生产队要卖的余粮和知青要买的口粮进行划账，不是两全其美了吗？村民们省去了把稻谷肩挑十余里到粮站的辛劳，知青们则不必影响参加集体劳动而跑二十几里到公社去买米。想想是很容易的事情，居然无法行得通！坐在谷堆上没米吃！这真是那种不可理喻的僵化体制的典型缩影。

1968.12.31 星期二 阴雨

八班全体同志今天都背着红色语录包，臂佩“红卫兵”袖章，每人挑一副筐，向鸡峰公社出发。九点多钟启程，十一点多钟到达。速度不能说是慢。买好米，下起雨来了。吃过午饭，四、七等班均冒雨回家，八班则决定留下，明日出发。公社为了准备庆祝元旦社论的发表，把我和郭请去写标语。写完以后，看报纸、参考消息。好久未看了，一看就是一个半钟头。窗外公路上汽车来往不断，再加上室内光线充足，比较暖和，几乎使我忘记了自己还在江西。稍后吃晚饭。饭后和公社革委会负责同志和我们谈了一会儿。八点，收听了中央二报一刊元旦社论，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马上，公社举行集会和游行。百来人的队伍也很有气势。可惜没有锣鼓。

公社有一部柴油发电机，每晚六点到十点半发电。大家都说，我们在1968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看到了电灯。

晚上睡在公社里。

伟大的光辉灿烂的一九六九年就要来到了！

【忆与议】

胳膊拧不过大腿，好办法虽简单而不可行，只得长途跋涉去买米。虽然已经离开大城市一个多月，学生味与革

命狂热还是很浓，居然会齐刷刷地打扮成那种模样去买米。这是我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走在“红卫兵”队伍中。

老天留人？其他班的知青都冒雨回二十几里路以外的村里了，唯有我们班在公社逗留了半天又一夜。不知道当年的班领导为何作出这个与众不同的决定。这一晚睡在公社的招待所里，在记忆中似乎是极为难得的一次。在离开大城市40天之后，能够在光亮、暖和的室内看上一个半小时的报纸与参考消息，能够“在1968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看到了电灯”，喜焉悲焉？而从这年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来看，似乎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天真的希望。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六：

蹉跎岁月第一春

〖写在前面〗

这是我的“早期作品”之一。1989年10月底，单位内部小报的编辑开始向我约稿，我从此开始了“爬格子、变铅字”的业余爱好。1990年2月春节来临之际，编辑又来“命题作文”，于是就有了这篇习作。当时的题目是“有那么一个春节——新年忆旧”。后来我自己策划“一系列”的时候，把题目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08-11-03）

除夕之夜，尽管电视节目精彩纷呈，但终究抵挡不住睡意的袭扰，劳碌了一天，一家人就早早熄灯就寝了。可是，没多久，有禁不止的鞭炮、爆竹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在寒冷的冬夜里，它还真有点惊天动地的气派。我被它从睡梦中唤醒，亮灯一看，呵，十二点了，过年了！窗口忽闪忽现的烟火光，窗外联绵不断的鞭炮声，驱散了睡意，脑海中闪现出“蹉跎岁月第一春”的情景。

那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就在两个多月前，六八年的十一月，我被刚刚掀起的“上山下乡革命洪流”卷到了江西中部的一个山村，从此开始了后来被称为“蹉跎岁月”的插队生活。那山村，叫云庄。这村名与邻村“洲老上”、“小坑”、“拿埠”之类的名称相比，还有几分雅趣哩！可是，这里纯朴的乡民们向来只知道，唯有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下放到这偏僻的山村来。所以，当我们这批号称“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从上海志愿来到云庄时，乡民们认为准是从城里下放来的“牛鬼蛇神”。直到一个月后，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来，知识青年才神气了，贫下中农也服气了。

按照江西的规定，我们同当地的下放干部、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五七”之称来源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又按照从上海出发时的编制，我们在云庄落户的二十九名上海青年分成三个班，“番号”分别为四班、七班、八班。我在八班，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班，九男四女。云庄是全县排得上号的大村庄，所以，安排在这村的“五七大军”也就特别多。

下乡伊始，我们班还是一股子学生气，每周有两个晚上要开会：一次政治学习，一次民主生活，“政治气

氛”甚浓。不过，我们既没有搞揪斗“地（主）富（农）分子”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卷入“路线斗争”幌子下的村内宗派纠纷，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搞好“革命化”。转眼就到了岁末，班里专门作出决定：要过好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不能追随落后的习俗；要“节约闹革命”，不搞年夜饭大吃大喝那一套；思想上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要想家，……。

作为“革命化”的具体行动，班里在生产大队的支持下。特地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时，请了两位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并且共进“忆苦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儿的农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种拌杂糠菜的饭食，只是由于“阶级教育”的需要，才从外村引进了“忆苦饭”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岂知到了年初一，班里有人自作主张，多搞了几个菜，请了几位贫下中农来吃晚饭。当晚，就连夜召开了班务会，专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当时叫做“斗私批修解决问题不过夜”！

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是相当顽强的。小年夜那天，贫下中农热情地送来了两大盆自制的米酒全班就乘兴聚了一餐、乐了一场。这米酒不凶，吃口尚佳，于是就有人开怀痛饮，一连喝了五大碗，终于醉倒了，酩酊大醉，还开了“罐头”，颇为狼狈。对于这种酗酒行为，大家漠然处之，无人提出异议。毕竟是人心相通，心照不宣：都是十六、七岁、近二十岁的人了，几乎全是第一次不在父母、亲人身边过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不健康”的情调无处宣泄，只得求助于杯中物了。也许还得感谢祖先发明了这种“中性”饮料，既可表示喜庆，也可表达忧愁，此刻，妙就妙在可以借助于它，用表面的欢乐掩饰内在的心酸。

大年夜，当地有烤火、守岁的习俗，几乎彻夜不眠。乍来初到的上海青年对此虽感新奇，却提不起劲头来参与其事。在“忆苦饭”席终人散之后，就钻进了被窝。江西的冬天别有一番风味，又冷又湿。那年的春节前后，整整一个月没有出过太阳，阴霾满天，还不时下点雨雪，寒冷加上潮湿，分外地冷。被窝里尽是潮气，全靠体温来慢慢地暖和它。困乏到了极点，才会迷迷煳煳地入睡。下乡后的头一个大年夜，仿佛人人都有重重心事，谁也不吭声，可谁也没谁着，不时可以听到辗转反侧的身子把床板弄得咯咯作响。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传来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黑暗中有人惊喜地叫起来：“这是过年的鞭炮！”拧亮手电筒一看，九个男生仅有的一只闹钟上，时针正指向12点！“过年了！过年了！”大家兴奋了一阵。爆竹声很快就稀疏、消失了，黑洞洞的屋子里有恢复了平静、沉默。

迷煳之中，听到阵阵尖利的哨声。呀！天亮了。大家不敢留恋温暖的被窝，毫不犹豫地起床、穿衣，匆匆洗漱完毕，就连奔带跑地朝生产大队的仓库跑去。

这是一件当年没有人敢斗胆怠慢的大事情——“早请示”。春节更不能例外了。在冬日的晨雾中，全村的贫下中农、“五七大军”在仓库前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好队，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仰望“宝像”，手挥“红宝书”，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三嗯“万寿无疆！”尔后，全体高歌《东方红》，又高声诵读“最高指

示”；再后，是贫下中农代表、“五七大军”代表慷慨陈词，“献忠心”、“表忠心”，……。每一个人都带着庄重、严肃的神色，仿佛在“灵魂深处”爆发着“斗私批修的大革命”，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幽灵无一例外地徘徊在这偏僻山村的大地上……。

这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步入蹉跎岁月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光的流逝，冲刷着对往事的记忆，但这“第一春”却是那么令人难以淡忘。

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如今想起来，仿佛是痴人说梦、不可思议。好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我重新进入了温馨的梦乡……。

庚午年春节新年忆旧

那年体验了一次“打麻糍”

说到春节的话题，就忘不了当年在江西的那些蹉跎岁月中度过的那个春节。

1968-11-19离开上海，不到三个月，1969-2-17就是春节了。山村尽管是那么偏僻，过年的气氛还是少不了，重要内容之一是“打麻糍”，快过年时，全村家家动手，热热闹闹打麻糍，是不成文的乡规民俗，似乎不打麻糍就不像过年。许多人家都有打麻糍的石臼和粗大的杵。而我们这些刚到村里不久的上海知青，多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有打麻糍这回事。老乡们说，打麻糍很累，需要集体动手，强劳力轮流上场，挨家挨户逐个打，村子里象过节一样热闹非凡……。但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是凭空想象不出来的。我们一方面是入乡随俗，另一方面是充满好奇，就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也要打麻糍”！

轮到我们知青打麻糍时，已经是小年夜了，当地老乡已经差不多备好了自家的“年货”，所以听说知青要打麻糍时，热闹程度就愈加非同一般，一边是新奇的“上海人”——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边是稀奇的当地人——看看“上海佬”究竟怎么玩。我的日记上有这样的简单记录——

1969-2-15 星期六 阴

……下午在老乡们热心热情帮助下“打麻子”。……

的确，那年打麻糍这件事的全过程都是有老乡们热情帮助才完成的。

我们知青十多个人一个集体户，每人享受生产队社员“同等权力”——生产队按人头定量供应的糯谷，不能多买。生产队的碾米机挑灯夜战，全村人挨家挨户排队碾谷风米。生产队也有人做我们的“指导员”，指挥安排打麻糍的“全过程”。记得第一步是提前若干时辰把糯米洗净，浸泡，让米粒吸足水分。

打麻糍前，把糯米捞出，放进江西等地特有的蒸饭木桶里，用大火蒸熟成为糯米饭，然后把热气腾腾地倒入石臼。石臼不大，用麻石（花岗岩）凿成；三个人各持一根一米多长的杵，交替勐捣，把糯米饭捣烂，直到成为米泥。

打麻糍第一要义是“趁热快打”，趁着糯米饭未凉的时候快打勐打才能省力些，也容易捣得更烂更粘稠。由于蒸熟滚烫的糯米饭极为粘稠，一杵捣下去就很难拔起来，没有几分力气是打不了麻糍的，所以是体力相当的三个人围着石臼边捣边转，打累了还一起喊号子，很有趣的。也有女老乡端来一盆凉开水，用手沾水后，帮着把石臼内的糯米团翻转过来，使糯米更均匀地被捣烂捣粘稠。周围看热闹的妇孺老幼更加起哄不已。在大冷天打麻糍，用不了多久就开始脱衣服，直到一件毛衣，还会冒汗。由于一家一户往往没有没有三个强劳力，所以是一家一家轮着打麻糍。

知青一开始是旁观者，很快就上阵了，无论男女，都尝试打上几下。但这打麻糍真是技术活，节奏要协调，用力要均匀。三个知青齐上阵的时候，力量不均衡，更谈不上节奏，所以，两三下就彻底乱了套，石臼被捣得东歪西斜，最后侧翻在地，引起一阵惊叫和哄笑。真正打成一臼麻糍，还是当地老乡的功劳。

据说，打麻糍的时候，讲究的家庭还要举行一个仪式，由家中最长的男子先捣第一棒，然后按辈份接下来捣……。按照当地的习惯，打好麻糍之后，趁热把米泥伴上豆粉、白糖和成一小块一小块，热啯啯、香喷喷。当场“开销”。不过，大部分是做成一大块，约1寸厚的大饼子，阴干凉透，再切成长条形，便于存放。有的还抹上用山里采来的草药制成的水，最后还可以浸到“晶晶亮透心凉”的山间泉水里，不易发霉变坏，可以保存到开春。正月新年，客人来到，就端上麻糍，表示对客人的敬重。记得是把麻糍切成片，或蒸或煎炸。

那一年我们刚离开上海不久，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念上海的年味。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躺在黑咕隆咚的“阁楼”上，例行的睡前聊天。有人说到上海的汤年糕真好吃呀，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足了。第二天天一亮就有人直奔知青食堂，把麻糍当年糕，切成一片片；另一边，早已有人直奔菜园子，摘来“春菜”（形似上海的莴笋）叶子，把灶膛烧得旺旺的，开水滚烫，青菜碧绿，加上盐、味精等调料，哗，把“年糕片”放进锅里，只要看到沸腾状就能一饱口服啦！在众人围观中，用锅铲晃了几下，……傻眼了，“年糕片”无影无踪了，成了一锅白晃晃的烟煳！于是有人恍然大悟，上海吃的年糕不是纯糯米做成的！

怎么办？吃呀！绝对不可以浪费粮食！于是，这一年春节你吃什么了？鼻涕！那白晃晃、粘稠稠的，真像……。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打过麻糍了，因为我是每年必回上海。至于糯米，都分到个人，带回“物以稀为贵”的上海了。

1969日记选

（1）兴奋的元旦

1968-12-31

到公社买米，因为下起雪来，故在公社留宿一晚，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在家过元旦，尽管我已经离开了老家到了“第二故乡”。1969元旦之日有如下日记——

1969. 1. 1 星期三 阴 有雪

新的一年开始了。

元旦一早，吃过早饭，九点十五分全体同志启程回家。此时开始飘雪花。走了不多路，都感到吃力。正在这时，冬生等四个社员拉着两部劳动车来接我们了！他们一早，连脸都没洗、饭都没吃就赶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四个社员帮我们装好车，去公社吃早饭，我们则先行返云庄。到了新街上，大概十点半，在此等候社员。结果，到了十一点半，他们还没来，雪却下大了，只好背约而行。一路上，大家放声高唱毛主席诗词歌曲，“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迎着扑面而来的雪花，快步往回走。正是“雪里行军情更迫”。到小坑附近，他们赶了上来，随后一同回云庄。大家都十分感慨地说，1968年的最后一天和1969年的第一天过得太有意思了！

一回到家里，大家就忙着看信。・・・章也来信了，章等尚未安排的同学与章的弟弟章、费的弟弟、李的弟弟等进行革命串连，报名到江西插队落户，并要求我们为他们想想办法，他们想到我们这儿来呢！我看完了信，仿佛感到我的心和战友们的心一起在激烈地跳动！多么感动人哪！当场我们决定，尽力满足战友们的要求，尽力实现战友们的迫切愿望。从来信中知道，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掀起了上山下乡新高潮，68届全体毕业生将百分之百插队落户，67届尚未安排的同学则在1月10日前安排停当。毕业分配形势大好！江也写了同样内容的信。薛因没空，托方把我们的红卫兵证及临走前拍的照片寄来了。这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啊！

饭后即给家中写回信，写得老长，从来没有写得这么长。

晚上参加大队召开的“热烈欢呼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大会”。

【忆与议】

1968的最后一晚和1969的第一天是下乡插队后第一次过年，尽管不是中国人最重视、最热闹的春节，但在“城里人”心目中，元旦毕竟也不是个小节日。所以，在公社见到了久违的电灯，看到了多种报纸，就相当的兴奋（详见《1968日记选（16）喜见电灯，告别六八》）。元旦之日返回山村时，恰遇风雪，更是“引吭高歌”“斗志昂

扬”“意气风发”“意犹未尽”。

而在当时的上海，12-21最新指示引发的“上山下乡一片红”席卷全城，无论尚未分配的同学及其兄弟姐妹，还是已经达到“第二故乡”的知青，都陷入了狂热之中，用当时的流行语就是“形势大好！”未下乡的想到我们的“第二故乡”来，已下乡的认为“小事一桩，好办”，简直把农村当成了似乎我们可以作主的场所了。这些就是12-21之后的狂潮波及到我们这里的余浪。

日记中又说到，使得“大家是多么高兴”的还有“我们的红卫兵证及临走前拍的照片寄来了”，这说明在此之前我们是“无证”的，难怪乎，当初生产大队的干部还硬说我们是“小牛鬼蛇神”，我们“再三再四地解释，……毫无效果，无人相信。我们都感到是有口难辩的莫大苦衷。”（参见《1968日记选（13）12-21之夜出奇的平静》）12-21指示为我们揭掉了黑锅，当得知将收到兵证时，怎么不让“大家是多么高兴”呢——现在是证件齐全的正正规规的红卫兵啦！记得是离开学校之前发了袖章，那天晚上还让学校“红卫兵团”负责人亲自执印在袖章背面盖章。但是为什么姗姗来迟直到此时才补发兵证？已经记不起来了。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当我们还在为自己获得“正名”而欢喲雀跃的时候，伟大统帅早已是对红卫兵失去了信心并作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四十年后媒体如此披露了当年内幕——

“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见凤凰网，来自人民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1473893.shtml）。

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停课闹革命，各地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如此等等等等，谁之过？

（2）首次受伤事故，投下心理阴影

1969. 1. 2 星期四 阴

今天气温显着下降。早工修公路。上午、下午继续制毛主席语录牌。

下午，李在砍柴时，不小心将右手砍伤，立即由徐、潘、王护送至小坑医院。不久，潘回来报告说，李的动脉血管已断，小坑无法医治，可能要送新干县医院。她是回来取钱钞和衣服，准备连夜送新干。费、陆闻讯同去。费当然另有任务——为战友们开证明来赣。・・・此时天色已晚，又开始飘雪了，同志们都为他们担心。・・・我没

心思再写给老师们的信了。

【忆与议】

这是下乡四十多天后云庄知青当中首次发生的较为严重的受伤事故。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但这件事情在我心理上投下很重的阴影，因而记忆颇深。这样的受伤在城市、在工矿、即使是在农场都算不了什么大事情，劳保（劳动保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插队落户知青来说就不能比拟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与世世代代在农村艰辛苦斗的老乡们一起“战天斗地”，同样没有如何劳保，遇到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的时候，就显现出强烈的危机感。知青离乡背井、举目无亲，固然知青之间可以互相照顾，毕竟不是一种长久之计。

虽然第二天日记说，“费等护送李去公社，今午胜利返回。”但是，从这事故以后，在我尚处于建立之中的“处世信条”里，“小心谨慎、远离伤病”开始上升成为一条位居前列的要义，乃至成为“接受再教育”表现平平的直接根源。

随着时间推移，知青与老乡的关系逐渐密切，知青的病痛也有望得到些许老乡的热情关心——有一年夏天，在知青小徐被毒蛇咬伤的关键时刻，大队支书亲自上山采集草药——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是一场逆势而动，知青亲历中跌打损伤时有发生，不断动摇着“坚持乡村”的信念（例如李在三年后的72年再次在劳动中滑倒造成手臂骨折而回沪疗伤，后“自寻出路”到了离上海较近的皖南农村），但又可能“因祸得福”，成为争取“病退”的“机遇”（例如我自己在73年劳动中跌倒造成骨折，终于75年病退回沪，参见《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至于到了78年，无须任何伟大号召就出现“胜利大逃亡”则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虽然这些都是时隔多年的后话，但1969-1-2事故的心理影响是即时的，至少对我是如此。

1969. 1.11 星期六 阴 雨

・・・李自2号手砍坏之后，一直不能出工，故她的工分至今只有3.6分，还是办学习班的“外快”。如此下去，非产生严重后果不可。所以，从9号起，根据本人自愿，让她要求参加了搞语录牌的工作。每日才2.9分。如按大寨式评工计分制，照她的出工情况来看，再照我与郭大江的工分计算，应当是4.8分。不管怎样，我们下放知识青年一定要为在云庄实行社会主义的大寨式评工计分制而尽出最大的努力！当然，目前来讲，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忆与议】

李因砍柴受伤直接影响了工分收入。因为砍柴不属于“生产劳动”，尽管知青是个“集体户”，此集体非彼集体，所以只能是井水河水各管各。上述日记中所说的“她的工分至今只有3.6分”就说明了她在生产队的工分帐上，元月的前11天总共只有3.6分，即使按照工分分配水平10个工分在1元左右来计算，也只有3毛6分的收入，这样

的状况显然是无法维持生计的。且不说自从知青到了以后，生产队再也没有达到过1968的分配水平。

“还是办学习班的‘外快’”一说则是指，11天中曾经办过一次学习班，因而得到了3.6分工分。查这11天日记，确实有“1969. 1. 5 今天是分班办元旦社论学习班”这样的记载。但是，学习班不可能天天办，而且不久之后当地干部群众对知青的学习班怨声渐起——办这样的学习班是公社、县里规定的，往往还有公社干部来主持，时间不会少于一整天；而按照当时当地的规定，这样的学习又必须给工分。这种非生产性的“工分”因为知青的来到而大幅度上升，而我们所在的村子接收的知青还达到三十余人之众，给生产队增加的“开会成本”是很明显的，村民们的负担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9号起，根据本人自愿，让她要求参加了搞语录牌的工作。每日才2.9分。”这件事写得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按照现在的志愿者概念，既然是“自愿”，怎么又会有工分？“让她要求参加”的说法也莫名其妙。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哪怕是增加一个临时性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也不是可以随便决定的事情，可能是要经过生产队乃至大队同意的。因为这又是明摆着要增加其他社员的负担啊！

至于我有感而发的关于“大寨式”的想法，连同那简单的几行字，都是记下了当年面对生产劳动体制的莫大无奈。事实上，在农村那些年，“社会主义的大寨式评工计分制”究竟是什么，从来没有看到过明文规定，都是口头传说、各自理解罢了。

（3）热情与无知

1969. 1. 3 星期五 阴

早工是修公路。继续搞语录牌。

昨天起，大队举办元旦社论学习班，各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上海青年班、排长参加。昨天没有什么名堂，今天上午起发生争论，×××和前民兵连长×××同大队会计×××吵了起来，据说是从向上海青年介绍情况“不符事实”开始的。下午路过此地的公社革委会段主任参加了会议。

徐把章等战友的要求向公社反映了，说明天4号打电话给她回音。薛的意见是不能来江西则去淮北，更利于自我改造。

【忆与议】

记得那些日子搞宣传工作，即制作语录牌，是在大队部办公室做的。所谓办公室，就是把一户地主赶出家而腾出来的，是全村一栋最高大的住宅。中间的厅堂是会议室，两边的厢房除了西后厢房是放手摇式电话机的地方因而“全天候”开放以外，其余的三间都是上锁的，供上级干部来大队、生产队指导、检查工作时住宿，间或也有一

两个存放大队文件资料的柜子，常人难以一窥真面目。

当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办学习班时，我正在厅堂的一角搞语录牌，就成了会议的“旁听”，更有幸耳闻目睹了当地干部因向知青介绍情况“不符事实”而发生的口角。极为巧合的是，日记中提到的两个干部，当年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路线斗争”不可开交的情景仿佛还在耳边眼前忽隐忽现，而我在2005年重返“第二故乡”的时候，竟然恰巧亲眼目睹了这两位耄耋老人促膝谈心的亲密情景，并且还和我一起畅叙旧情。抚今追昔，当年箭拔弩张、誓不两立，早已相逢一笑、泯灭恩仇。我愈加为自己和一些插友当初没有卷入其中加剧宗族纠纷而深感欣慰。

不过，另一方面，虽然当年在上海目睹了两年多的文革斗争局面，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所了解与认识，毕竟还是乳臭未干、稚气十足。此处日记说到，为了自己的同学在“一片红”狂浪中希冀“在井冈山会师”而热情倍增，一有机会就再一次向公社提出了要求，公社答应在第二天就回复。但我的日记里再也没有提及此事。显而易见，这是一厢情愿，以为只要是听从伟大领袖的指挥，就能一路绿灯如愿以偿，农村生产队劳动力的增加与安排哪有“革命学生、红卫兵、知识青年”想象得那么简单！

知识青年实在是没有多少知识的青年，尤其是缺乏社会生活的知识。到了六九届毕业生更是连文化知识也更加可怜，他们于66年夏天小学毕业，68年春天进入中学，70年初春就委以“69届中学毕业生”的桂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贻误多少青年学子！

1969. 1. 5 星期日 阴

今天是分班办元旦社论学习班。上午没有什么成效，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下午至晚上比较好，金、刘下午分别作了比较好的斗私批修，检查了自己到江西一个多月来的生活中所存在的不够之处，气氛严肃也是从此开始的。下午谈得很好。晚上就加强政治学习、生活管理等方面作了几项“决议”。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

想到此次学习班的成功，看着金、刘的诚恳的斗私批修，使我回忆起去年的2月17日我初三（1）的一次极为成功的会议，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忆与议】

我真是“书生气十足”，把社会生活看得如同学生时代那般简单。1969年春天插秧这第一次农忙之后这样的班务会就“名不存、实也亡”了。知青的分化是必然的，“再教育”毕竟不是学生环境。生活在慢慢地教育着我们逐步懂得社会、参透人生。

1969. 1.10星期五阴薛老师5号给我们寄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象、薛还附了一张条子，说章他们已等不及我们的回信，已于5号早上报名赴安徽淮北插队落户。据杨来信说，母校学习兄弟学校的办法，大办学习班，要求人人报名插队落户。有些人则被“关”在学校四、五天。不来校者则敲锣打鼓到他家“请”。

看来章等战友上井冈山是不大可能了。他们如果批准的话，15号就要出发的。

【忆与议】

我们这里还在一厢情愿地为同学“在井冈山会师”而奔波祈望，高潮汹涌的上海这边则已经等不及了。1-15日记中又记载，“章5号来信。他已光荣批准赴安徽淮北插队落户了，18日要出发了。”从这些当年日记中摘录下来的信件的片言只语中，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到“12-21、一片红”的狂热是急不可待，1969-1-18已经是农历十二月初一，离开春节只有一个月，还是要如同“急行军”似的，赶往“农村广阔天地第一线”。回首此等往事，真是不可思议！

（4）从知识青年到五七大军

1969. 1.10 星期五 阴

半夜里又开始下雨了。没有出早工。今天继续搞宣传工作。

大队干部今天开了一天会。上午由老姚传达关于发展林业会议的精神。下午讨论了三、四队合并成三队的领导班子的名单。晚上召开贫下中农大会，通过了这个名单，还将报公社批准。徐和聂作为五七大军的代表参加了这个领导班子。这是贫下中农对我们五七大军的最大信任与支持。

【忆与议】

日记中说“徐和聂作为五七大军的代表”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徐是上海知青，聂是当地的下放干部，记得当年已经是四十多岁了。当时同在云庄村的下放干部有四人，聂最年长；其次是姓姚，年轻一些；均为当地本县人。另外两个下放干部则是上海籍，他们是文革之前的江西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在新干县商业部门，一位姓周，一位姓马，比我们这批知青大十岁。由于同为上海人，所以很快就熟悉起来。

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下放干部放在一起管理，从而把这两部分人员合起来称为“五七大军”，据说在全国仅江西一家。到底是什么时候正式使用这个称唿的，我无从得知。在我的日记中是1969-1-10第一次提到了这个称唿。

五七大军的称唿似乎是想沿用“五七指示”的含义。这个指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了。该指示是指1966-5-7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他在信中充分表达了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乍一看是面面俱到地讲到了各行各业都要全面发展，好象没有错，但仔细看看仔细想想，就有问题了。如今的社会发展潮流则把这种思想叫“小而全”、“大而全”，或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

是样样都会，样样不精通。这是违背市场经济下专业化发展趋势的。也许，现今还有人在幻想，假如八十年代以来不走市场经济之路而走五七道路呢？其实，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空想。七十年代初也听说上海确实有一些工厂组织工人去“学农”，真可谓荒唐透顶，结果是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无果而终。

附一：《五七指示》解读光明网2006-05-23 06:00来源：文摘报http://www.gmw.cn/CONTENT/2006_417219.htm《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的新世界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背道而驰。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对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是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马立诚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附二：五七指示全文http://idof.3mt.com.cn/%u8D34%20---%20ido.3mt.com.cn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

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5）再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

1969. 1. 7 星期二 晴

早工修公路。抓紧天晴之机又砍了半天柴。昨天下午爬的山很高，竟然可以鸟瞰小坑。今天上午和昨天晚上搞应征青年政审材料誊清工作，大开眼界。

【忆与议】

可以“鸟瞰小坑村”的山大概在云庄村的东北方向吧。到这样的地方去砍柴也是乱跑一气的结果。当地老乡心中有底，哪些山上的薪柴林比较丰富。

在我记忆中，参与“应征青年政审材料”是后来几年中的事情，没想到，实际上是下乡后第一次冬季征兵时我就参与了。而三个月前在上海，我这样的“家庭成份”注定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治贱民的第二代，我成为政审重点对象，连报名插队落户还通不过政审关（参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没有想到，为了凑满插队落户的人数，颇为严格的政审关忽然不见了。更没有想到，到了乡下，又摇身一变，整理起贫下

中农子女应征参加人民军队的政审材料了！如此政审，犹如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算得上是我踏上社会之际最有感触的“触点”之一。

“应征青年政审材料”主要是一份政审表格，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在一些空白格子里要一律填上“没有其他问题”。我觉得说不通的是，表格上没有一个地方填写过有问题啊，怎么叫“没有其他问题”呢？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我忍不住问负责此事的民兵连长，他只是说“这是上面的要求”。我还是担心这种的写法会挨批评，连长说“一直是这么做的，没问题”。既然如此，就别动脑筋了，依样画葫芦，誊写清楚即可，轻轻松松地拿工分吧（当然，这最后一句是我在成为“老兵油子”之后的逐步形成的“思想认识”）。

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再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按上级说的办，没错的。

1969. 1. 8 星期三 晴

早工修公路。今天继续搞语录牌。郭和章主要负责搞阶级教育展览馆。

昨天晚上，队里发下每人一块肥皂，各班五包火柴。

1969. 1.13 星期一 阴雨

天不好，整天价下雨。大队阶级教育展览馆的布置工作到今天为止告了一段落。早工未出。

【忆与议】

我至今记得“阶级教育展览馆”是云庄村当年的村中心地带的一栋地主住宅中。那展览占据了那住宅的厅堂，都是些文字与画画。当地住房的建筑结构决定了厢房里必然是黑洞洞的，再说那几个厢房是下放干部的宿舍，所以也不可能用于展览。具体内容是回忆不起来了，这与我没有参与展览馆的布置有关。但是，真要说那个村子里有什么“阶级斗争、深仇大恨”，实在是说不上来，几十户人家，除了偶有一两户外姓，都是一个姓，真可谓“亲不亲，一家人”。在那里插队几年老是听说家长里短的宗族纠纷，却没有听说有过黄世仁杨白劳式的血海深仇。

下乡之初，免不了要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对其内容实在是没有点滴记忆了，倒是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负面印象——当年流行的在“忆苦思甜报告”之后必吃“忆苦饭”，尽管村里的干部和我们一起吃那些难以下咽的糠菜食物，私底下却告诉我们：这村里的人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饭哦，所以根本不知道“忆苦饭”怎么做，都是到别的地方学来的！如此的阶级教育！

更有一次啼笑皆非的“再教育”。大家在田里干活，不知是谁说“啥时候能够收工啊，我的肚子饿啦”。那年头，手表是奢侈品，没有一个人带得起，只能全凭太阳的方位确定收工时间，遇到天阴下雨，就没辙了，只能“跟着感觉走”。那天正是个不见太阳的天气，只要生产队干部不吭声吃饭，大家就得继续干下去。虽然有人喊饿，也

没有人随声附和。又捱过许久，仍然不闻“恰饭”的吆唤。有人就愤愤然地发起牢骚来了：“以前为地主干活，除了供给一日三餐以外，上下午还各有一次点心送到田边地头……”我们知青听了，大惊失色，这就是阶级仇恨？！

所以，“再教育”使我们越来越糊涂了，书本报纸上的理论与耳熏目染的现实之间，距离实在太大太大。

回顾反思我们亲身体会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不是千篇一律的黄世仁与杨白劳那种状态呢？就云庄村的贫富差距而言，并不显着，最富有的地主只不过住宅比较高大一些，全部采用了青砖，屋内使用了油漆，并没有什么深宅大院或硕大庄园。我们亲眼目睹的“地富分子”大多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干出来的农活质量多是一流水平。而阶级的划分则是有点莫名其妙，以某年某月某一天拥有的土地数量为限。有的“老”贫农恰好是在那条“日期决定线”之前不久由于赌博而把家产输给了自己的舅舅，于是一无所有，成为贫农，否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了；而真正因为交不出租而被剥夺成为贫农的，则未曾听说。因此要说阶级、要讲仇恨，是有难度的。既然没有达到那样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地步，还用得着大张旗鼓地搞阶级斗争吗？我又想起《1968日记选（14）12-24知青首次评工分》中提到过，1968年底曾经说“编写村史家史，似乎就是一句话而已，说过了也就再无下文，自那以后也再没有任何人提起，更无点滴动静。”现在想来，就凭如此这般的“阶级阵线”能写得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村史家史么？

（6）平生第一次劳动所得与“再分配”

我在1990年写的《第一次分红》，是纯粹的回忆录，乍一看，振振有辞、无懈可击，但是与当年的日记一对照，就漏洞百出了。回忆录中写道，在生产队“分红之后，我所在的知青班开了一个会，一致决议……在班内进行再分配！”其实，回忆录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岂止是一次班会啊，现在发现，前后会议至少有四次之多。

1969. 1.11 星期六 阴雨

天气很冷，又下雨。早工没出，白天继续搞宣传工作。

班中最近气氛不好。自上月24日评工分以来，“工分挂帅”似有出土之势。6号公布了1月份6天分总数后，更有暗中追赶之状。9日队里结算了整个12月份的工分之后，则气氛更不好。金确有“工分挂帅”的思想、行为。另外一些评得较低的同学也有不服气思想。看来，若不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制很难从客观上解决这一问题。

费、刘提议将日工分平分。照此计算，我班每日每人为4.6分（不到一点点），再按出勤率计算全月工分总数。这样比较平衡，不致出现两极分化。此事本在今晚的班务会上提出讨论，但与生产队的会议相冲突。晚上，我挑了一个机会，与近日心情不好的金谈了一下，了解了一些他的想法，也把费、刘的建议对他讲了。看来，此建议不光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的还大有人在，特别在工分较高的人当中。

所以，我觉得，非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不可。

【忆与议】

这是日记中有记录的关于“再分配”的第一次班务会。当时，对云庄村上海知青三十余人首次评定工分时，有两个“最高分”——6分，我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在寒风凛冽的冬季里，早出晚归，修水库、卖余粮……，虽然初次干农活然而竭尽全力的知青都只有可怜兮兮的一天三四分、四五分，而我干的活儿是最轻松的“写字”，却比大家高一截，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有人提出在生产队分红的时候进行“再分配”，我就“高姿态”地积极响应，还主动找其他“高收入者”开展谈心活动，以求取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问题是“再分配”的思路与“工分平分”的方案有不少人无法接受。

1969. 1.15 星期三 阴雨

没有出早工。上午我和大家一起修公路去了。下午仍旧搞语录牌。

晚上开班会，一致通过了费、刘提出的关于平分工分的建议。

【忆与议】

第二次班务会。从日记中“一致通过了……平分工分的建议”这寥寥数语来看，所谓“再分配”就是平分工分，这就是我们当时理解的“大寨式同工同酬”？

1969. 2. 6 星期四 晴

晚上开了第一次新选了领导班子后的班务会。从晚饭后开到近十一点。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一些同志进行了批评、自我批评，并作出了一些决议。每周二晚上为班学习时间。每周五晚上为班民主生活。并就作息时间作了规定，因为最近以来睡懒觉的现象很厉害，往往睡到九、十点钟才起床。现规定每天七点半起床。不出早工时，各人自学毛选。另外，就分红事也作了讨论。

1969. 2. 8 星期六 晴

晚上分红。看来整个云庄数我们班最慢。但是大家反复协商也有好处。办法是：郭和我每人16元。理由是为全班挣的钱多，理应多些。金15元，照顾到他家中还欠着债。余下的，按照总出勤率平分，每工0.51元，再照个人出勤率计算。当中潘打破了老表们的记工，把12月头10天排里烧饭也作为出工算了进去。另，沙、陆为班里买东西去新干，每人加上两天工。一般来看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实际上有些矛盾目前还掩盖着。早工学习元旦社论，没有什么劲，也没学好。

【忆与议】

拖拖拉拉了将近一个月，经过四次班务会，知青首次分红终于在“再分配”中降下大幕。实际上这种“再分配”就是在蛋糕的大小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分蛋糕。

上述日记的内容与《第一次分红》是吻合的。那里回忆并归纳成四项“照顾原则”：

（1）对女同学要有所照顾；（2）对因病因伤影响出勤的要有所照顾；（3）对为班里办事而误工的要有所照顾；（4）对在下乡时家中举债较多的要有所照顾。

除了第（4）条是“补助性质”的以外，其他三条的确是“大胆打破了当地农村的传统”——

第（1）条“照顾女同学”，就是把全班九男四女的日工分一律拉齐，每日每人为4.6分，以为这就是体现“男女同工同酬”。而生产队为我们评定的工分底分男女生相差将近一倍。相形之下，这的确是对生产队的挑战。记得当年就有干部批评我们无视他们作出的决定。

第（2）条“照顾伤病员”，的确打破了农村从来没有病假的惯例，仿佛就是工厂里的病假工资了。

第（3）条“照顾办班务”，这也是农村没有的“集体户”特色，总不能出了力、费了时却没有一点报酬。

有没有道理？似乎有理，“这样比较平衡，不致出现两极分化”。问题是，无论能力大小等因素，只看出勤率，确有忽视差异的平均主义。所以，“再分配”结束后，就不乏对一刀切、大锅饭的异议，及至半年后就再也没有人“旧话重提”了，彻底摈弃了这样的“壮举”。

1969. 2.21 星期五 阴雨

沈老师返乡途中也给我们来了一信，谈了一些问题，如：如何解决矛盾啊，等等，也对我们分红采用“战时共产主义”发表了一些意见，并提了建议。

【忆与议】

那封信是早已不见踪迹了。毕竟是比我们大了十岁的老师，对我们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真是一个既保护积极性、又冷静面对现实的恰到好处的评价。在那个狂热的革命时代，我们的老师能够适时地指出关键的幼稚之处，免得我们“一头撞到南墙上”，真是十分及时非常必要。

我在日记本的收支栏里，对自己的平生第一次劳动收获有这样的详细记载——

工分164.4分；工分值1.22元/10分；折合人民币 20.06元。

班里“再分配”扣除 4.06元，本人实得16.00元。

在《第一次分红》中，我写过：“一个多月挣的工分折成人民币达25元之多”。现在根据日记查证，25元是记忆出错了。164.4个工分应该不会有笔误，所以，按日工分底分6分反推，出勤为27.4天。而从68-11-23开始参加劳动到12-31为止的实际出勤情况，我的日记中虽无逐日的详细记载，但与27.4天基本一致。所以，这一个月劳动所得的准确说法应该是20元。

随后的春节期间，我从这平生第一次的劳动所得中取出10元，夹在信封里寄回家中，给全家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这只是稍纵即逝的快乐。因为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开始……。

（7）五七大军让公社干部头疼

1969. 1.22 星期三 阴

早工搞三光。刘、屠两同志赶了回来。油粮关系也未转成功，还挺气人的。上午搞修路、三光。

刘、屠昨晚在公社就知道公社要召集全公社五七大军开会。大家一听就有意见。上午又来通知，要在今天下午赶到公社，并要带好被子，每人口粮7斤，钞票七角。大家都不赞成这种方式，不大愿意前去。但后来又决定去了。下午五点多，就全部到了公社。伙食搞得很乱。

1969. 1.23 星期四 阴

今天开始“政治工作会议”。早上是学习元旦社论。上午听县五七大军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下午是讨论。无甚意思。借这些机会，看了一些书。费昨天从新干回来，得到一本《语录》，内容相当丰富。

今天晚上还是讨论，根本没有意思。

【忆与议】

这是第一次在公社集中办公社范围的五七大军学习班，正式名称叫“五七大军政治工作会议”。估计在此之前省里、县里先后开过这样主题的会议，然后一层一层地“下达、传达、学习、讨论”，这是当年一成不变的模式。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叫程世清，是“全党全军全民的副统帅”林彪的得力干将，很有可能正是他把下放干部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了，因为“五七指示”是最高统帅给副统帅的一封信。

日记中提到的转油粮关系，参见《1968日记选（16）喜见电灯，告别六八》，当时第一年我们还属于“非农”户口，粮油关系还在公社粮管所。每个月要往返几十里路去买米买油，就在知青中炸开了锅。首次长途跋涉买

米之后，就开始与有关方面联系——采用简单的办法，把生产队要卖的余粮和知青要买的口粮进行划账。想来简单，谈何容易，几经交涉，才得以实现。在日记中提到过几次，但无细节。

关于“三光”，参见《1968日记选（2）下乡三天，开始三光》。

1969. 1.24 星期五 阴

上午召开“鸡峰公社五七大军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几个比较先进的单位，如梅峰大队五七大军、阳团大队五七大军、小坑大队乐门生产队五七大军均在会上传了经。下午与他们进行了广泛座谈，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比昨天收获要大得多！晚上听忆苦思甜报告，报告人是公社革委会委员、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省农代会代表。这次他作为鸡峰公社三名代表之一光荣地到南昌参加了省首次农代会。

【忆与议】

这也是当年开会的一种模式——连续的会议，不同的名称。

日记中提到的几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基本上都是当年12-21指示之前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报名插队落户的，所以在下乡后两个月就表现突出，上台讲用了。但是，这次交流却成为一种“绝唱”——由于五七大军的“参差不齐”使得会议发生了一连串令公社干部头疼的事情，进而使得公社决定以后不再进行这样的“全体大会”，上述那些先进单位、先进分子在以后很多年里再也无缘与大家“近距离接触”对话交流，充其量成为一次次“讲用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会议被传达被宣传的偶像，而在广大五七大军心目中的实际形象则越来越虚幻飘渺、敬而远之。

1969. 1.25 星期六 阴

上午是听省农代会传达。结果有人睡觉，有人逛马路，参加的人很少。我乘此机会把给郑的信也写好了，同给周的信一起寄出了。

下午是分班、排找差距、订措施。也无甚效果。晚上是大歌大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文艺演出。各大队五七大军汇演。

云庄与××发生了矛盾。……云庄的演出及台下的云庄“观众”的的确确存在问题，必须对之实行冲击；××的同志则操之过急，大方向正确，但应注意方法。……

早饭是忆苦饭。有些人不愿吃，虽然吃了，叽里哌啦，议论不止。

【忆与议】

同时同批下乡的知青，同县同公社插队的五七大军，两个月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记得那个晚上的小规模、低烈度的“肢体冲突”起源于对文艺节目“革命性”的争议。云庄的节目中有一个忆苦思甜题材的歌舞节目，主演是一个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知青，舞姿优雅，掌声连连，本大队的知青更是兴奋不已、热烈喝彩；然而，××大队五七大军认为是缺乏“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反抗精神”，未等演完，就有十来人冲上舞台，高唿最高指示，高喊革命口号；云庄的五七大军则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中不断遭受批评、好不容易有一些“显示自己”的机会，却遭到当头棒喝，自然不会服气……。于是乎，脸红脖子粗的口水大战，大眼瞪小眼的“短兵相接”，肢体冲突必不可免，几乎重演了1966夏天上海街头“辩论台”“演出台”上屡见不鲜的“冲击”与“反冲击”的一幕。幸亏有关干部竭力劝架，双方脱离接触，演出也匆匆结束，事态才趋于平静。

这也许是决定“今后不再开全体大会”的因素之一吧。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青年聚集在一起，稍有不慎，很容易引发难以收拾的局面。

1969. 1.26 星期日 晴

听说云庄被“评”为：老大难、老骨头、落后的典型等等。早饭前学习时，公社段主任参加了云庄的学习，也弄不出什么名堂来。差距在何，差了多少，何种原因，这些东西连自己也心中无底，却急着要订措施、搞规划，这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

上午算是结业式，也没有什么名堂。许多人没有参加。云庄×队某人拔刀威胁××大队的人，闹到公社。结果云庄大队全部人被留了下来。午饭后由段主任、五七大军办公室刘主任召开会议。这一下不得了。云庄的上海青年欠了四笔账：1、老账，指×班从公社买粮归途中打了拖拉机司机。2、昨天与共大篮球友谊赛时“打”人。3、今天上午，×队某人拔刀威胁××大队的上海青年。4、……反正我也记不起了。段主任、刘主任都作了讲话。弄不懂的是，他们都说要清理五七大军阶级队伍。会开了一刻多钟，就结束了。我们马上启程返云庄。

老天终于放晴了。可就是不逢时机。返云庄的二十多里路真够呛，热得要命。二十度总有的。很早就睡了。共大财会一排有十人到我们云庄大队实习。晚饭后与他们座谈。学生遇上学生，话题就多得说不完。

×班的×与支书吵了一场。支书今晚气得不得了，公开说：我不当这官了，我管不了你们；你们去公社、县、省去告我的状吧，越多越好；我知道你们告我好多次了。支书“辞职”，是云庄的新动向。

【忆与议】

连头带尾持续五天的全公社五七大军参加的学习班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就传开了，公社领导觉得：五七大军不好办……。我们也在私底下说，虽然有些人的言行确实有些出格，但公社领导对上海知青也太小看了，以为是当地的干部群众那么听话、那么容易摆布？至于要“清理五七大军阶级队伍”，更是惊

人。事实上，公社也确实有点“如临大敌”的态势——1969-1-28日记：“公社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今天下午到云庄来了。速度也是够快的。宣传队有七人组成，下午来了5人，还有两人据说在开会，日后再来。公社五七大军办公室刘主任也在内。”字里行间，不免显得紧张。幸好后来没有成为可怕的现实。“五七大军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也许只是一时无知的气话、过头话，在知青中也要开展阶级斗争未免太极端化了。

知青公开与支书吵架，这在当地也是极为罕见的“犯上”之为。幸而事态没有扩大。

（8）学珠算，无风险，也无用

1969. 1.14 星期二 阴雨

・・・天气是够冷的，却老是下着或雨或雪，讨厌得很。故一天都没出工。上午大家聚在大队部烤火、看书报。下午学了整整半天的珠算除法，有所成效。晚上又在大队部烤火玩耍。

【忆与议】

自从1968-11-20到达“第二故乡”以后，冬季不时出现连绵雨雪的天气，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书可看、无报可读……，愈加觉得无聊乏味。有时候，我们知青去大队部烤火，因为知青没有那么多用于取暖驱寒的柴火或茶籽饼。无意之中，发现大队部办公室里并不把算盘收藏起来，这就给了我“可乘之机”——玩算盘。我记得好几次和插友小郭、小刘等玩珠算的加减法，先是1+2+3+……+99+100的加法，正确答案是5050.；然后是5050-100-99-98-……-2-1的减法，正确答案自然就是0，但要做到又快又准是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小学四年级的珠算课上曾经布置的练习，但是练习过几次以后就扔到一边了。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已经从天真学童长大成为“知识青年”的我们，会这样“温故知新”。

按照小学里的做法，把连加、连减复习并且熟练之后，又想出了新花样——“逆序连加”（即100+99+98+……+2+1）和“逆序连减”（即5050-1-2-3-……-99-100），同样要求做到又快又准。初始几次还真的不容易从已经习惯的“顺序”中转变过来呢。因此，有时候会对着算盘一连玩上几个小时。就这样，算盘上的“连加连减”玩得多了，玩得顺了，但也就觉得玩腻了。

恰在此时，我听说小郭把小学课本《珠算》带来了，他大概也是因为小学珠算课上略过不学除法的缘故，没有把这样的课本扔掉，而且还带到了乡下。我就向他借来那本教科书，边看边操作，从二的除法开始，一点点自学，特有趣味。也许较之于小学四年级时毕竟又长大了六年，理解能力增强了不少，原先视为畏途的特别繁多的除法口诀，到此时竟有豁然开窍的感觉，完全用不到死记硬背，什么“逢…进…”“下加”以及乖戾怪气的“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之类，很快迎刃而解，而且很快把二到九的除法口诀都学会弄懂了。

其实，那些口诀是用不到死记硬背的，脑子里想象算盘上珠子是怎么变化的就可以想出写出口诀来。例如，三一三十一的基本含义就是10÷3，商3余1。关键是记住珠算除法中算盘上小数点的定位后退一位的规则，这样，无论是1÷3还是10÷3或1000÷3等等，都可以计算，但在盘面上是“一成不变”，都是把1个珠子变成了3个珠子再在后面跟1个珠子。由于算盘的特殊性，显示出来的过程与结果就是不动盘面左侧的3、把右侧的1变成了31。同理，四一二十二的基本含义是10÷4，商2余2，不动盘面左侧的4、把右侧的1变成了22。把基本原理弄清楚了，到自学六的除法时，不用背也能写出口诀来了。如此的突破，意外的成功，学习的劲头也就更足了。

在蹉跎岁月中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玩算盘，自学珠算除法，并且“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曾经是一大乐趣。因为在当时这一类实用性比较强的“看书学习”不大会招来非议，而看其他书则有风险了，要是翻出文革以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下的书籍，更是大逆不道了。我在《一叠教科书》中曾经回忆到，有一次我把带到乡下去的中学各科教科书翻出来看了老半天，其味无穷。但是，现在从日记里居然找不到一点踪迹。联系到当时的左风甚烈，所以，可想而知，那时候在日记里都不敢写上一笔。

在乡下的这第一个冬天过去以后，去大队部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算盘也不容易找得到，至于运用珠算除法之类更是无人问津。也许村里毕竟富有“庐陵文化”底蕴，初高中生也不在少数；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毕竟只不过是下放到这里的知青而已……。而真正的劳动与生活的考验来到了，我的学习热情也就戛然而止。

网中人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七：

“冲击主席台”的一次重演

我的1969日记选（7）“五七大军让公社干部头疼”中提到一次学习班上发生“冲击主席台”的插曲，是我下乡初期的生活中印象颇深的一件事。

在那个“大破大立”的年代，“大喊大叫”“大叫大嚷”也成了时髦用语，当年就有造反派的报纸、刊物这样堂而皇之地命名的。而“身体力行”的“大喊大叫”“大叫大嚷”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太深刻了。

最初是1966-8“大破四旧”的时候，街头出现许多“宣传台”，成天高分贝地诵读最高指示、高唱革命歌曲、广播社论文章；到1966-9北京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时，“宣传台”成为“辩论台”，在我的母校大门外，淮海中路嵩山路拐角上就有一个，几个高音喇叭挂在树叶茂密的梧桐树上，扩音机等设备就在紧挨路边的学校图书室里（此时已经封存不得借阅），用已因“停课闹革命”而闲置的课桌搭成了一个大台子。北京红卫兵嘭腾嘭腾地大跳“造反舞”，哇啦哇啦地大唱“造反歌”，还声嘶力竭地宣传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连续几晚引起激烈的街头大辩论，最后形成抢夺话筒“话语权”的“肢体冲突”……。尔后，到了“夺权斗争”阶段，各个单位里山头林立，能够不发生武斗已是上上大吉，在各种会议上冲击“主席台”、抢夺麦克风则是司空见惯。

类似这样的场面，原以为在下乡插队以后就可以不再看见，想不到，两个多月后居然还在远离文革中心城市的一个偏僻山乡里重演了一次！

1969-1-22～26，全公社的五七大军（绝大部分是上海知青，大约三百人，还有为数很少的当地下放干部）集中在公社办学习班。按照当地的习惯，结束之前有电影放映或文艺演出。当时这一次办学习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请到放映队，也没有找到演出队，于是，只能“自娱自乐”，搞一次“各大队五七大军文艺汇演”，主题是“大歌大颂伟大领袖”。

“汇演”的场子是一个简陋的大礼堂，一端是一个兼作舞台的主席台，无遮无挡，只是高出地面大约几十厘米

而已，两侧各有若干个台阶踏步。除此之外就是有一些长凳。而这样临时决定的“汇演”也确实用不到任何“后台”“化妆间”之类，因为大家都没有一点准备，也没有半点乐器，更无需任何化妆。所以，来自各大队的知青都是临时凑合凑合，难得有“小组清唱”，几乎都是“无伴奏的大合唱”，或按大队，或按生产队，或按两个月前离开上海时的班排编制，加上“清一色”的“自选”工作服、劳动装就是“演出阵容”了；用不到、也没有什么舞台监督指挥之类，找几个人在一起商量商量就开场了；万一冷场，就来一些“拉唱拉歌”以保持气氛，仿佛就像是当年电影里屡见不鲜的军营生活。于是，知青中一些文艺爱好者就成了显示各大队“实力”的主角。

我所在大队的知青里，有一个曾经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同学小潘，能歌善舞，边歌边舞，一曲《白毛女》里的《红头绳》，一首《抬头望见北斗星》，掌声不绝，迅即走红。“再来一个”的喊声接连不断，本大队的知青更成了“铁杆粉丝”。同样辛苦了两个月却在连续数日的学习中不断遭贬挨批评，郁闷至极，所以，此刻看到本大队的同学如此出彩，觉得大长志气，也就格外兴奋。或是高声叫好，或是尖声口哨，引得其他大队知青侧目相望，似乎有点出格了吧。的确，在当年看“革命演出”时是绝对没有如此“疯狂”举动的。

在这样的氛围中，小潘一再出场，继续奉献。几段当红的歌舞之后，小潘边歌边舞，开始了耳熟能详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全场肃静，这是好久没有听到的老歌了啊！歌停舞止，掌声雷动。小潘在“谢幕”之后，仍然欲罢不能，“再来一个！”震耳欲聋。于是，再一次回到舞台中央，“台湾岛啊，我的故乡”，哦，又是一首熟悉而喜爱的老歌！台下知青情不自禁地一起唱起来……！大家沉迷在歌声舞姿之中，这是下乡两个月来从来没有过的自娱自乐。

就在这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台下有人在向“主席台”前侧移动。突然，十余人跃上舞台，大声喝道：“停止！”全场愕然。有人冲“主席台”了！他们是××大队的五七大军，先进集体！这是怎么一回事？

冲击者高声朗读最高指示，高声呼喊革命口号，慷慨激昂地宣布：刚才的演出是“封资修”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台下哗然。冲击者继续说，“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这样的歌曲没有反映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台湾岛啊，我的故乡”更是靡靡之音，没有打倒美帝和反动派的革命气概。所以，这些都是大毒草！

话音未落，我们大队的知青有人高喊“我们要看演出！”“我们要看演出！”应声四起。冲击者针锋相对地大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有“横扫一切大毒草”的气魄。

口号战很快演变成口水战。台上台下激烈争论起来。“粉丝”们一口咬定：这几首歌没有明确为毒草，为什么不能唱？冲击者们坚定不移：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越是针尖对麦芒，火药味也就越来越浓烈。一方高呼“下来！我们要看演出！”另一方大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口号口水又升级成“肢体冲突”了。台下的“粉丝”忍不住上台驱赶冲击者，冲击者手挽手坚决抵抗呈“宁死不屈”状。主席台上用绳子牵起来挂着照明用的几盏汽灯，在台上台下的冲突中摇晃不已，整个大礼堂里人影摇曳，人声鼎沸，或支持冲击，或反对操之过急，

声音噪杂，莫衷一是，一派大乱的迹象！

“粉丝”一方原本以为可在“汇演”中抒解郁闷，不料遇到“先进集体”一方“高歌猛进”，冲击主席台，大有追穷寇的态势。因此，从争强好斗的暗中较劲，到脸红脖子粗的口水大战，到大眼瞪小眼的短兵相接，再到拳腿交加的全武行，甚至……。这样的逐步升级绝非不可能，在文革中是见得太多太多了。

公社干部数十人闻讯赶来，或呵斥，或劝解，双方终于“退避三舍”，脱离接触，一场“冲击”与“反冲击”的重演，总算平息。双方虽然偃旗息鼓，各自回营，但毕竟在心中留下了疙瘩。幸而公社方面富有经验，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从此以后，不再召开全公社的五七大军全体大会了！的确，自此以后，双方就再也没有过“狭路相逢”。

改变命运的一跤

（一）

1973-5-7。至今整整37年了！

正是在那个“五七指示”七周年的那一天，为了“五七大军”（江西对知青及下放干部等的统一称呼）建造住房，去砖瓦厂买砖，不慎从拖拉机上摔下，造成骨折，从此成为我的命运转折点。

虽然我们是1968-12-21“最高指示”发表之前就到了江西新干县云庄村插队落户，虽然我们知青被统一称呼为“五七大军”，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自己的栖居场所（参见《烟熏火燎的几十天到黑咕隆咚的五年》），国家下拨的知青安置费理所当然要盖知青住房的，但迟迟没有兑现。这是为什么？

“12-21指示”中“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倒是说出了真实情况——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下乡，并不是农民欢迎的！否则，还需要伟大领袖专门指出这一点吗？

然而，纵然“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也还是能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言之，这种以“对策”应对“政策”，绝非最近三十年的发明创造，而是早已有之，是某种体制的必然。

知青下乡固然是伟大领袖的巨手指挥，知青中也确有一时冲动高喊“扎根一辈子”，然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人和事——那位大队支部书记就是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公然大唱反调“毛主席让你们来，毛主席也会叫你们回去的。”那个偏僻山村，远离县城，不通公路，历来是安排下放干部的“首选之地”，然而，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下放干部一批批来了，但是又一次次走了，没有一次更没有一个人久留的！这就是基层干部和平民百姓从实际生活中学到的知识与道理。

纵然是把知青和下放干部“等量齐观”，合并在一起用最高指示冠名，称之为“五七大军”，似乎大大提高了知青的政治地位，但是也有巨大的反作用——正好说明，知青与下放干部是一样的啊，早晚要离开这里的，不可能一辈子的！

这样的认识来自基层，来自民众，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强词夺理，简单朴素，自然纯粹，言之有理，合情合理，理所当然，无可指摘。那位另类的书记更是实实在在地付诸实践。第一步，就是借用了六十余名知青合计两万多元的安置费，为大队购置了全县第一台归大队所有的拖拉机，创下了全县第一！此前，这类大型农业机械统归公社一级所有。

固然，这是违反政策的，但得到村民乃至知青的欢迎。因为有了拖拉机，偏居一隅的山民和知青可以有机会“以车代步”到山外办事了。真应验了一句古话，天高皇帝远。

然而，文革又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君不见，差不多同时进山的下放干部陆陆续续走了，符合二十年来的惯例，可是，知青的“出走”缓慢至极——到1972年底，已经下乡上山四年的三十余名知青只有两人正式上调进工厂！按照这样的速度，真的要“一辈子”了。

另类的支部书记终于沉不住气了，按兵不动四年之久的“知青住房工程”不得不在1972年秋收结束后启动了。由于规模大，工程量大，而资金缺口可能蛮大，偏偏村民的干劲不大，知青接二连三回沪探亲的劲头倒很大，所以，从1972-12月初开始挖墙基，一个冬季下来，到1973-3月底还在平地基。由于“一年之计”的春插开始了，“知青住房工程”就理所当然地宣布暂停。春插结束，工程再度开工。

（二）

1973-5-7，上午，生产队长安排我和刘随拖拉机去距离云庄村二十多里路的公社砖瓦厂装运砖头。那是一台手扶拖拉机，拖斗很低很小，但也顺便带了一些柴火，我们俩分坐拖斗的左右两侧。到达砖瓦厂附近，拖拉机手让我们下来，感觉是已经停了，我们就跳下。以往四年多的插队生活中，常常与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或解放牌汽车打交道，扒上跳下，已经“小菜一碟”了，所以对手扶拖拉机并不放在眼里，虽然它的拖斗太低，扒上去反而不容易，但跳下来是太简单了。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手扶拖拉机并没有停稳！仍有惯性前行着，我们俩都是两脚着地以后忍不住往前冲，双双倒在地上了。在拖拉机右侧的小刘是一个转身就站立起来了，而我忽然发觉自己的右手无力支撑自己，再试，仍然不行，只能翻向左侧。小刘觉得奇怪，过来问我怎么还没起来，又来帮我一把，我才站起来。再甩甩右臂，不能动弹了！小刘也觉得情况不妙，就招呼拖拉机手过来看看，他也觉得有问题。

正好有一个知青会议正在公社召开，拖拉机手立即把我和小刘送到开会的地方。那是各大队、生产队的知青班长会议，插友们闻讯围观，异口同声，“立即去新干县医院检查！”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坐什么车到三十里路以外的县城的，只记得知青班长小程送我去就医。

在县医院经过X光拍片检查，明白无误地确定：右锁骨骨折！医生是极其爽快的：“你是上海知青吧？就回上海治疗吧！”我几乎惊呆了，就像是灭顶之灾！我春节探亲结束回村才四十多天，就遇到这样大的事情！我问医生：“我今天是穿着劳动的衣服出来的，所以想回村里换一下，至少要两三天才能回到上海，有没有问题？”答曰：“没问题。”我说：“我感觉很痛。”答曰：“我给你开点止痛片。”另外扯了一些纱布，帮我把右臂挂在胸前。

小程陪我走出医院，想赶回家的客车（其实，下车后离家还要步行十多里），已经来不及了，一天就这么一班。这就意味着明天才能回到村里，后天再出来，如果一切顺利，大后天晚上能回到上海。显然这是太理想的计划。因为天正下着雨，不知道何日放晴，而雨日对山区道路的影响无法预计。小程当机立断：“我送你立即回沪！”他带着在公社开会的知青班长们刚刚凑集的“紧急预备款”，用于回沪的费用是足够了。我想，也只有这么办了。

不记得是怎样坐车到了百里路外的樟树火车站，如果按正常的途径，新干县城到清江县城是有汽车的，而清江县城到樟树火车站则必须步行好几里路。

小程认识火车站的站长，他让我们在站办公室度过难熬的大半夜——回上海的广州—上海50次客车在下半夜的4点多钟（？）经停樟树。右肩骨折带来的疼痛，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使我毫无睡意，就利用桌上的蘸水笔，找到一本空白报告纸，平生第一次“左书”，写了一封委托插友办事的短信，又涂鸦了七八首打油诗。（没想到有“好事者”收藏了我的这份“左书”，次年（1974-4）我回江西后又“完璧归赵”！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位有心的“好事者”已经不幸英年早逝，我也淡忘了这份“左书”。2008年底“上山下乡40年纪念潮”中，我整理自己的收藏，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这份“左书”，热泪盈眶，不胜唏嘘！另见《我的的五七打油诗》）

我让小程在送我上火车后给我家里发一份电报，让他们到火车站接我。于是，我孑然一身“劳动装”，两手空空，一脸痛苦，充满倦容，于5-8晚上8点多出现在上海北站。爷爷和妈妈见到我，几乎哭出来……。旋即“打的”——当年三个轮子的出租车，俗称“癞蛤蟆”——直抵上海瑞金医院，急诊部。医生听完我主诉经过，见我白纱布悬着断臂，孤身一人回上海，感叹万分，医生对县医院这样的处置办法只有摇头叹气。再次拍X光，确认右锁骨骨折，立即上马甲状的石膏，三个月以后才能拆……。

1973-5-7，一个纪念日，特殊意义的纪念日。

（三）

五年后，我在大学宿舍里，与同学们谈起这件往事，无不感到，1973-5-7的这一跤是改变我命运的一跤。的确，它让我开始走出看不到插队前景的迷茫，找到了一个“跳农门”的方向——病退回城，又有幸赶上拨乱反正的恢复高考。详见《我的高考1977纪实》。

自此以后，我一直想写一些回忆文字，但始终没有时间。1990年开始涂鸦，也没有想到列入这个题目。1995年在与七零后的交往中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关于插队生涯的十篇“一字系列计划”予以“扩容”，就增加了“改变命运的一跤”这个题目。然而一晃就是十多年，计划仍然是计划。

最近看到网络上有识之士在收集“回家”的历史资料，的确，与四十年前上山下乡狂潮初起的“离家”相比，这是一个更不一般的话题，可以充分揭示那个时代平民百姓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如果说，“离家”多是“巨手一挥”，户口一迁，车轮一动，何其简单；那么，“回家”就是挖空心思，苦苦求索，“千姿百态”，何其困难，何其复杂！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抓紧时间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缺憾，正值“五七”，一气呵成，作为自己“回家”系列的起步。

（2010-5-7下午写完，37年前的此刻，正是一筹莫展）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八：

回想那一年年的“双抢”

时值盛夏酷暑，虽然受制于瘫痪的右侧身体而只能留驻家中，但是望着窗外火辣的阳光，感受着滚滚热浪，禁不住又一次回想起那一年年的“双抢”。

双抢

抢收与抢种双抢是个缩写词，全称是抢收抢种，具体而言，是抢收早稻、抢种后季稻。南方水稻种植区大多是一年种两季，七月上半月早稻成熟，收割后，立即耕田插秧，在八月上旬前栽完后季稻（双季稻中的后季稻，也称“二季晚稻”、“二晚”。另外有一种“一晚”，一年只种一季，又因其插秧和生长期比一般春季插秧略晚，故名“一晚”）。如果误了季节，收成将大减。所以就有了“抢”的概念——抢时间、抢季节。由于八月七日或八日是农历立秋节气，所以双抢中又有“不栽立秋禾”的口号。

也是“防暑降温”？

七八月份正是南方一年之中最炎热的季节，而双抢偏偏就是在这个时候！时间紧，强度大，只能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四五点钟起床，趁着凉快，干上一阵回家吃早饭，随后再次下田，干到正午，饥肠辘辘之时还要挑着一百来斤的谷子回家。饭后，稍稍打盹，大约两点多钟，再一次离家下田，这时候虽然日头已经不在正中，但辐射大地的热量已经积蓄到一天的最高峰。于今回想起来几乎不可思议的是，当我们来到收割或插秧的水田边，伸脚下田，会忍不住退缩回来——这水是烫的！当年没有温度计测量水温、留下具体的数值，但是就凭人体皮肤会觉得水烫这一点就能够说明温度之高了！此时，干脆下到田里，让双脚插进烂泥里，还能感到些许凉意。

当年绝无“防暑降温”措施，唯有仰仗体力与大自然抗争。我所在的江西新干云庄村，农民有一种“呼风”的习惯，在田间挥汗如雨，加上烈日蒸烤，热不可耐，就“打喔嗬”——长长的o加上短促的ho，“o——ho！”有时

候真能召唤来一阵凉风呢。当然，这样的办法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因素在发挥作用。

真正有降温作用的是冰凉的山泉水。云庄村的水田位于众多的山沟之中，不少山沟里有泉眼。有的泉眼就在田里！水温偏低会影响周围水稻的生长发育，收成大减，但也为人们指示出泉眼的位置。所以，大热天来到田间，就去寻找泉眼，在稻子生长不佳的地方，寻到幽幽冒泡之处，就用烂泥围起一个直径不足一尺的圆形“微型井栏”，再用食指在“井栏”顶部小心翼翼地划出一条浅浅的溢流沟。不要几分钟，泉眼附近就“吐故纳新”形成了一个碗状的出水口，只见清澈无比的泉水徐徐涌出。山民、知青就轻手轻脚地走近这个出水口，深度弯腰，把嘴巴伸到“泥碗”里，把晶晶亮、透心凉的泉水喝个够！即使遇到毛手毛脚的愣头青把出水口搞浑了甚至搞砸了，也不必着急，立即重新围一个“微型井栏”，几分钟以后又可以畅饮豪饮了。

哪怕就近没有泉眼，山脚下的小溪还是可以解暑的，跳进小溪往自己身上头上泼凉凉的溪水，也能快活一刻。实在太热太渴，难得喝上几口清凉干净的山间溪水也无碍大局。

鲜见的禾镰——非典型镰刀

说到割稻，就离不开镰刀。毋庸赘言，“斧头镰刀”标记中的镰刀是标准的镰刀样式。对此，小时候学习画画的时候就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到了云庄村，当地老俵给我们看的镰刀——当地人称之为“禾镰”，禾的发音为wo第二声——使我们傻了眼：咦，有这样的镰刀？！我实在难以描述清楚，就在网上寻找有关照片，很久很久，未能如愿。数月前偶尔见到一张勉强相似的照片，收藏起来了，近日打算再查看有关说明，却已经消失在茫茫网海里了……。

说它“勉强相似”是因为它与我们使用过的禾镰只有一点是相似的：上半部分的形状十分相似，狭窄、长条，端头是个短弯钩。其余的就不同了。

其一，我们用过的禾镰的刀口是相当独特的——在其整个使用寿命期里不需要磨刀！一次都不需要！原因在于它的刀口不是光滑的，而是整齐而紧密排列着一条条细细的约二厘米长的刻痕，与刀口成135度夹角。一把新的禾镰只要使用了半天，刀口刻痕的凹下部分就在与稻杆摩擦中被磨掉了，留下的凸起部分就形成了一排密密的细针状的刀刃！这样的刀刃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稻杆一截两断。别小看这样的一把禾镰，不过大约二十多厘米长、约四厘米宽，薄薄的仿佛是张厚纸，重量大概只有一百多克，实在是貌不惊人，但在割禾的田头大显神通，可以“独领风骚”数个年头。

其二，我们用过的禾镰在刀口以下部分极为简短，只有一个用于装刀把的圆孔，不像照片上还有那么长一段金属结构。

其三，我们用过的禾镰对刀把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无需照片里那么考究，只要捡一段光滑顺手的柴棍，装进刀把孔里就可以了。

记得当年初见禾镰，就在心里嘀咕：自小在心目中不乏神圣之感的镰刀，到了一隅山村竟是如此简陋、其貌不扬。然而在实际使用了之后，不由得发出来自内心的赞扬：禾镰啊禾镰，轻巧简便，别具一格！



<u>田间脱粒</u>

说到水稻的收获，记得小时候从书报上电影里见到的都是把一捆捆割下的稻子从田间运到村里的谷场上脱粒晒干。然而，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在田里割稻的同时就地脱粒，稻草随即还田，挑回村里的是一担担湿漉漉的“水谷”即“湿谷”，再在晒谷场上晒干。（参见《水谷、冷谷及其它》）

千百年来都是人力甩稻脱粒，在田间脱粒又有书报上电影里不曾看到的方式。一只长方体的木质禾戽（wo第二声，fu第一声。也叫禾桶），像是一只放大的斗，上端的口长约一米、宽约七十厘米，往下均略有缩小，呈倒置的梯形；深约五十厘米。长度方向的两端都是用上好的硬质耐磨木材板料做成的（依稀记得有的是用樟木板），这是用力甩打稻穗使稻谷脱落下来的地方，所以要取经久耐用的材料。与此禾戽配套的是“禾戽tian dei”，是竹篾编制而成的，宽约六十厘米，长约二米七，安装在禾戽上部，围住三面，因为甩稻时有一部分谷粒会随着稻子一起扬

起，“禾戽tian dei”可以把他们拦截在禾戽之内。当然要减少“飞溅”的损失，还需要甩稻者在握紧稻杆根部的同时，掌握好甩稻的角度、力度、节奏、程序，并不是单靠力气大就可以做得满意的。记得当年的甩稻是先使劲甩一把，翻个身再甩，然后再翻甩一次就差不多了。每次翻身的同时都要轻轻抖动，让脱落的谷粒从稻杆之间被抖落出来。

这种割稻脱粒方式必定是一种“小集体劳作方式”，一般是四到五人结成一个“禾戽组”，两人甩打，其余人割稻。割稻者弯腰割一把，直身后转身交给甩稻者。甩稻者与割稻者处于背对背的方位，两个人甩稻一起一落，发出有节奏的“嘭、嘭”声。禾戽由甩稻者不时拖动，使割稻与甩稻保持适当的距离。禾戽底部有两根一寸见方的硬木滑条，减少禾戽底部与烂泥的接触以便于拖动。

当禾戽中的谷粒逐步增多以后，拖动禾戽还是很费劲的，通常到差不多有100多斤的谷子了，就拖近田埂进行“出谷”操作。首先把围在禾戽三面的“禾戽tian dei”收起两面，大家一起用手翻抄谷粒，把掉入谷堆的稻杆稻叶捡掉，尔后用竹制的簸箕把谷粒装入谷箩（装谷的箩筐）。经过“出谷”，禾戽即可轻装前进，大家继续投入割稻甩稻。

<u>脚踏脱粒机</u>

1969年夏天，云庄村首次“引入”了几台脚踏脱粒机，次年大面积推广，开始淘汰千百年的人力甩稻方式。岁月荏苒，这种“第一代”的脱粒机如今也难觅踪影了。我在重读2005年6月重回第二故乡的照片时，发现自己无意之中留下了脚踏脱粒机的“身影”，下图中右侧是辆板车的车斗，左侧就是当年的第一代脚踏脱粒机！想必是弃用多年了，但我看到它，格外感到熟悉，掐指算来，与这样的“机器”也相伴了三个酷暑（即1970、1971、1972年。而1973年由于5-7的工伤骨折、返沪疗伤，直至1974年初春返回云庄。1974年夏天的双抢期间被安排担任生产队保管员。1975年病退回沪）。2009年2月插友在同一地点拍的照片中，它已经无影无踪了。

“第一代”的脚踏脱粒机是在千百年的禾戽上增加了齿轮组结构、脱粒滚筒等机械部件。可惜现在难以仔细描述它们了。记得它的脱粒滚筒是最重的部件，长不到一米，直径大约四十厘米，两头是铸铁的圆环，之间是一根根木条，每根木条是是一排相距十厘米左右的“骑马钉”——这些由粗钢丝制成的倒V形在滚筒旋转时打击稻把，使谷粒落下。据说这样的脚踏脱粒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就在上海郊区的农村出现了。十来年后推广到了偏僻山区。这就是“地区差别”吧。

把那张照片里的脱粒机“抠”出来，并摆成接近正常使用时的水平状态——



图中的下方是脱粒机的底部；左端两片板条就是“脱粒手”站立的地方；稍往右可以看到一根与底部呈-30度锐角的条条，其端部连接着板条，板条另一端头也是与底部呈-30度锐角的条条，这就是脱粒机重要的传动机构之一——踏板，“脱粒手”一只脚站在左端的板条上，另一只脚就不断踩动这块踏板，给脱粒机提供动力。前述“与底部呈-30度锐角的条条”伸入图中黑乎乎的部位，那里就是把人力转化为脱粒机的原动力的齿轮组结构。由于长年的使用润滑油加上累积的尘土，齿轮结构早已变得乌黑一团，紧挨着的禾戽板壁也被浸淫得漆黑一片。当然，图中的脱粒机是只留下外壳的残骸，它的上部有好几块防止谷粒飞溅的木板，以及最关键的脱粒滚筒已经不见踪影。

图中右侧正是两台脚踏脱粒机！当年收割季节结束后“马放南山”的脱粒机就是这么挨着墙放置的。想不到时至今日还能看到脱粒滚筒！

1 

脚踏脱粒机的出现，使“小集体劳作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脚踏脱粒机的脱粒效率比纯粹人力甩打要高，所以“禾戽组”就由原来的四五人扩大到六七人。“割稻手”的增加也常常使“脱粒手”应接不暇，脱完粒的稻杆来不及马上撒得很远，于是，在“出谷”时，常常安排一两个人在已经割去稻子的田里把过于集中的稻杆均匀撒开来，以便下一步犁田耙田。

脚踏脱粒机把极为累人的甩稻方式摈弃了，但也有新的烦恼，两个“脱粒手”站在脱粒机上操作，使脱粒机除了稻谷和脱粒滚筒的重量外还增加了两个人的体重200多斤，因而在水田里陷得更厉害，“脱粒手”每次挪动脱粒机的时候，第一关是最难过的——要把脱粒机从烂泥里拔出来，真有屏出血来的感觉……。

“转移阵地”

每年的收割季节免不了要在各条山沟之间“南征北战”，每次“转移阵地”时都是以“禾戽组”为单位的。大斗一样的禾戽由一个人负责，办法是把禾戽翻成底朝天，在禾戽的底部和顶部的一个立体对顶角之间架一根竹杠，再放到人的肩膀上，大约三四十斤重的禾戽就像一个大盖把人罩住了，远远望去，看不见人，就看见一只禾戽在“蜗行”。

卷拢的“禾戽tian dei”就像一卷竹席，加上簸箕、谷箩等农具，组员们分头挑在肩上，恍如一家人挑着被头铺盖等等在搬家。“引进”脚踏脱粒机以后，“禾戽tian dei”被四五块木板替代了，但又增加了一个颇重的脱粒滚筒，所以“转移阵地”时“辎重”队伍就庞大了，远望就像在山间小道上出现了一溜搬家的队伍。记得有一次，好几个“禾戽组”同时“转移阵地”，开往另一条山沟开辟收割战场，我所在“禾戽组”远远看到他们，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活计，因为难得看到有那么多人集体“搬家”的壮观场面，尤其是几个禾戽“搬运工”，特别显眼，特像蜗牛，我们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也算是苦中寻乐罢。

在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难忘经历中，有许多细节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了。但是那些最艰苦的日子留下的记忆仿佛是历久弥坚。

补遗1：禾戽：

上山下乡插队落户42周年马上要到了，数位插友近日重返“第二故乡”，带回不少照片，引起无限回想。其中有几幅珍贵的照片，为数月前所写的《回想那一年年的“双抢”》作了极好的补充。

当年（1969年），我们知青经历了水稻收获季节从“人工脱粒”到“脚踏脱粒机”的演变。而今许多事物已经近乎湮没。曾经使用了千百年的“禾戽（禾桶）”就是其中一例。

云庄村曾经是数十户的大村，而今只剩下一只“禾戽（禾桶）”了！村民们听说当年的知青想再看看当年的“禾戽（禾桶）”，就乐滋滋地把“禾戽（禾桶）”找出来，打扫一番——

从照片里可以看到，在墙角的阴影里有一卷东西倚在墙上！这正是“禾戽（禾桶）”的重要配套设施——“禾

戽tian dei”。难能可贵的是，这户村民还完好地保存着，并且安装就绪——

2 

正值晚稻收割时节，知青取过一把稻草，秀了一把“人工脱粒”——

说起当年在山沟田间搬移“禾戽（禾桶）”的经历，当年的小伙伴乐呵呵地为大家留下一张难得的照片——

如此的照片，如此的情景，令人感动，感慨不已！如若不是疾病缠身，我一定亲临其境，回味青春、世间百态……。

补遗2：禾镰

插友近日“回乡”，适逢秋收时节，忍不住下田重温挥镰收割的滋味，我从照片上发现了“非典型镰刀”。数月前我在《回想那一年年的“双抢”》始终未能找到它。这次终于觅得其靓影了。由此可见，这种镰刀确有“非典型”的小巧。



在诸多照片中，我注意到了另一张——

偏处一隅的山沟里，也出现了当今流行的水稻收割机的英姿——



想当年，我们只晓得在广袤大平原上的麦地里驰骋着神奇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无论夏日双抢还是秋收时节，终日弯腰收割，累得直不起身子，更是渴望着企盼着憧憬着在层层梯田里有一天也能实现水稻收割机械化。如今，终于看到了那小巧玲珑、深受农民欢迎的水稻收割机。我没有机会就近观察，忍不住把这张照片端详了一次又一次、许久复许久……。

<u>补遗3：脱粒机</u>

在写《回想那一年年的“双抢”》时，忆及当年在江西接触到的“田间脱粒”方式，苦苦寻觅古老原始的“禾戽”之余，我也搜寻着“脚踏脱粒机”的照片，因为它是当年使知青与村民摆脱千百年人力甩打脱粒的第一代机械。虽经周折找到了一些，但总觉得不满意。近日插友“回乡”，适逢当地正在秋收，留下重返田间地头、回味挥镰脱粒的身影，也留下了脱粒机的形象。

照片显示了“田间脱粒”方式下在田里运作的轨迹，虽然无法重现当年一台脱粒机六七个人“集体劳动”的场面，但依然可以看到，卧倒在地上的是两排已经脱粒的稻草，尚站立着的稻株则显示出收割操作面。而位于照片的中央，正是一台脱粒机——

——

插友在另一处还特地拍摄了这种脱粒机的特写——

——

这种形式的脱粒机，动力是人力、脚踏，从1969年进入云庄村算起，已经41个年头了！如今它尚未退出历史舞

台。因为，在高低不平（相邻的两块田上下相差可达两三尺）、大小不一（大的一块田可达六七亩约4000平方米，小的则不足一分地小于60平方米）、形状各异（几乎没有一块田是规则的几何图形）的山间梯田里，这样的脱粒机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机械。

网中人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九：1970日记选议

（1）第一次回城探亲的农民

我的第一次回城探亲，是离家之后的一年一个月又一十一天——1969-12-30。曾经是“上海人”初中生，此刻重返上海，已是没有了上海户口的“曾是上海人”，美其名曰知识青年或“一代新农民”。

1970. 1. 1 星期四 晴

时代的列车告别了光辉灿烂的60年代，昂首阔步跨入了伟大的七十年代，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了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鼓舞我们继续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和指路明灯。

【忆与议】

那时候每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两报一刊”都要联合发表一篇社论，总结去年，展望来年，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或中央新的精神，号召为什么而奋斗而奋勇前进之类。作为当时舆论或曰话语权的制高点，两报一刊社论相当于中央文件的细化论述。对于看不到中央文件的平民百姓，就依靠两报一刊社论猜度又要让全国人民干什么了，因此举国上下都非常重视。我在日记里说传达了“最新指示”，但没有连夜庆祝的印象。

我在网上查到那篇元旦社论全文，确实没有出现“最新指示”，而是重复强调了一些“最高指示”和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例如，开篇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去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以豪迈的战斗步伐，跨进了伟大的七十年代。放眼全球，展望未来，我国各族人民心潮澎湃，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当代反帝反修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最可靠的朋友，成为世界革命的希望。”“不管美帝、苏修怎样互相

勾结、互相争夺势力范围，不管它们施展多少阴谋诡计，发动什么样的侵略战争，都逃脱不了注定灭亡的命运。它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如此等等，通篇的豪迈气概一如文革以来重要社论的风格与气派，特别能够让青年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

然而，在“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一年之后，对于这类社论是注重它的实际内容了，在如此重要的社论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字未提。仅有一处用到“知识”二字——“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只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国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就能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所谓“革命知识分子”究竟是指什么，语焉不详，不能不大失所望。虽然日记里不乏习惯性的“节日应景语”，但对这样的社论只能是草草带过。当初的政治热情已经明显降低，实际实在实用占据了上风。

1970. 1. 5 星期一 阴雪

上午由祖父陪同去曙光医院检查身体，肺部透视正常，小便化验也尚正常，但医生嘱咐要吃得淡些。

1970. 1.14 星期三 阴

早上起床后觉得不适，一测体温达39℃。早饭后就和祖父同去曙光医院看医生。配了些药片药水，后去淮海路旧货店等处转了一圈才回家。回到家后觉得支持不住，就上床睡觉，直到下午近5时才起来。体温仍在38℃以上。晚饭稍吃了一点。但终于在8点多钟大吐三口，此刻才如释重负，万分轻松惬意。

【忆与议】

记得后来又去医院一两次，对在乡下出现的经久不愈的病态也无法诊断。医务人员看到知识青年就医，有同情的、可怜的，也有冷漠的。给我留下的总的印象是，我们已经不是上海人了。

1970. 1.15 星期四 晴

小潘已定明天回江西。火车票已购好。在她家中看到李1.7写的信。信中说到，老胡什么的要我们赶快回去过春节。信中还谈到，县革会组织了一个赴上海家庭访问学习慰问队，7日动身赴沪，25日离沪返赣。鸡峰公社有两个代表，由梅峰和乐门各派一人参加。该队的任务是，1、向上海青年家长汇报，2、动员返沪同学回江西度春节。他们说，要搞春节战备，防止苏修在春节搞突袭。在我和刘看来，此队的组织及任务完全没有必要，浪费人力物力。

【忆与议】

插队地的各级领导部门居然派人到上海动员知青回去搞“春节战备”！当年在“政治经济的要地”上海都没有那么紧张兮兮呢，难道我们插队的穷乡僻壤还会有更准确的消息？难怪刘和我对此类作为大有异议。在随后的日记中，也不曾出现那个“慰问队”的活动。再则，假如真的是7日离赣，而看到有关消息时已是15日，也没有任何人听说“那边来人了”。或许我们没有被列入“慰问”范围？此类细节似乎难以查考。当年那些管理知青的部门，至今没有什么人回忆自己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经历与感受，与知青写就的回忆录汗牛充栋的景象成为巨大的反差。这对于知青史研究是一大缺憾。真希望那些“过来人”不要失忆、失语。

（2）学生离校一年以后

在号称“文革发源地”上海，经历过两年多“革命”教育的中学生，在1968年“毕业”离校走上了社会。不再是学生了，在实际社会中生活，短短一年多，的确使人发生了不少变化。

1970. 1.11 星期日 晴

上午去建国电影院看电影《创伤》。一个小鬼退了一张票给我，学生票，比成人票便宜0.15元，仅0.10元。按理应补付0.15元，但检票员没有发觉。

【忆与议】

这样的“混票丑事”在我脑海里有较深的印象，不过记忆中的事发地是在淮海路龙门路路口的“嵩山”电影院（从小就记得它是一个带有偌大圆顶的公共建筑物。文革中更名为“红光”，文革后恢复原名。九十年代被拆除，原址一带成为硕大的“时代广场”）。无论“建国”也罢，“红光”也罢，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留下“混票劣迹”的地方还不止这两处！很可能日记中的“建国”是“混票”的始发地，而且是“诱发地”，第一次尝到了甜头，以后多次“犯事”就是“主动行为”了——尽可能去找“学生场”电影。而“红光”，也许是第一次“故意”、并且获得成功，或者正好相反，拿不出学生证而不得不补票，从而在记忆中印象深刻。回忆自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都是要争取“做一个革命接班人”，也以优秀的学习成绩屡屡获得“三好学生”的荣誉，绝无混票之类的邪念。从三好到混票，恍若两人。

在我的印象中，诸如这天日记里的混票，成功率不低。固然是因为自己天生一个娃娃脸，屡屡骗过检票员，但心灵深处是出于对自己处境的无可奈何。同一届的毕业生，留在城里当工人与下放农村当农民，天壤之别啊！回家探亲才几天，满耳朵都是“真辛苦”“太可怜”之类同情之声，为什么我要被同情？我确确实实尽了力，却无法实现养活自己的愿望，难道是自己的无能？

一年的社会生活实践“再教育”，不能不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不平衡。这种心理问题来源于社会（上山下乡制造的新差别），积聚而成为新的社会问题之后，就陆续出现了年终岁末面向回沪知青的一些“优惠活动”。这种安抚民心的“季节性措施”在1970年的春节期间似乎还没有出现。

其实，以后逐步出现的“照顾知青”的诸多做法，实际上已经间接承认了上山下乡的不合理，所以采用一些优惠来怜悯知青、安慰民心。对于好胜心强烈的青年人来说，这类安抚做法往往会产生逆反心理：我为什么要接受安慰怜悯？我为什么不能自我选择实现自力更生的道路？……

那么同一届“毕业生”中有幸留在城市甚至进入“军工企业”的同学在离开学校一年之后又如何呢？在某厂工作的同学Z告诉我们一件令人咋舌的真人真事。

1970. 1.20 星期二 晴

据Z说，前不久，H建议各自找些自己喜欢乐器的朋友，在星期日或其他日子大家聚在一起吹吹拉拉玩玩，消遣消遣。Z表示赞成。以后几次两人碰头时，H又对此事只字不提。前天晚上，H又去Z家，再次提起此事，并问Z串连得如何。这一天H“畅所欲言”。请听他在说些什么！“光是男的吹吹拉拉不过瘾，最好还要搞几个女的来唱唱，这样才有劲。”并问Z，“你们厂里有吗？风流些的最好。”Z表示惊讶。然而H还是不以为耻，对原来班里的几个女生评头品足，不堪入耳（也不堪上纸），充分暴露了这个人丑恶的肮脏的灵魂。在他心目中，钱是万能的。从他谈吐中，估计他为了金钱，企图（或已经在）追求资产阶级出身的M。这就是堕落啊！多么活生生的事实呀！

【忆与议】

或许应验了一句老话“饱暖思淫欲”。如果在当年必定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剖析，结果必定归咎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即使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女到了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军工厂，也还是在“腐朽思想”面前“打败仗”。因此，对于六六年文革以来亲身经历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不能不产生巨大的怀疑。时隔数日，又发生一件使我目瞪口呆的事情。

1970. 2. 6 星期五 夏历庚戌年正月初一 晴

今天是七十年代第一个春节。

上午在家里说说笑笑，很快就过去了。午饭后不久，刘和X来我家，……。刘还向我讲了一件挺气人的事。日前一天上午，刘等人在校门口，忽然看见了甲，叫住了甲。一问原来他和乙刚刚从江西回来。刘等马上去乙

家。……乙向刘有声有色地讲述：乙与甲在樟树火车站，看见一个小偷去扒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的钱包。他们俩互相碰了碰，各自暗示不要声张。等那扒手走到厕所里，他们也跟踪而出。甲问扒手“你刚才拿了人家什么东西？”扒手不得不承认自己扒窃到一个皮夹子。甲又盘问了扒手的身份。扒手又反问甲：“你是什么人？”甲答“我是插队落户的。”“你不回上海吗？”“我是来送同学的，我不回上海。”扒手马上从袋里掏出一张岳阳到上海的车票给甲，“我这里有一张到上海的车票，你拿去，回上海吧！”于是双方就成了一笔买卖！后来，甲胆小了，害怕在车上会被查出。此时，乙说“来，我与你换一下车票，出事由我负责！”乙回沪后还恬不知耻地广之于众。

【忆与议】

前面那个留城的同学，在“阶级理论”之下无须接受再教育就进了工厂，却在短短一年中就心生邪念，图谋色情活动！后面那两位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插友，也不过一年时间，就在公共场合干起了黑吃黑的勾当。当然，我自己也不是“一尘不染”，玩起了混票之类的小玩意儿。如今回想起自己的混票，感到脸颊发热。当初将之记入日记，再结合后两件事情上的态度，说明自己的良心并未泯灭。

我相信，当年诸如此类的风气决非偶然与个别。结束学校教育只有一年，无论务工务农，社会教育的结果竟是如此背道而驰，那么，这样的学校教育是成功的吗？虽然上述实例与当今动辄亿万的贪官不可比拟，但从社会风气社会心态等角度而言，至少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今还有人在鼓吹那个时代的纯洁无暇，犹如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至少是对历史的无知。

（3）难堪的重逢，无奈的困惑

元旦春节期间是“广阔天地炼红心”的知青们回城与家人亲友团聚的日子，也是互相交流情况的时候。那时候天南地北的交流手段，只能依靠通信，一封信常常要个把星期甚至半个多月。然而，难得的重逢聚会充满了难堪与无奈。

1970. 1. 4　星期日 雪

下午去看电影。午饭后，刘、周来约我，到嵩山电影院（红光）看《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是三点钟的，时间尚有一个半小时，怎么办？串同学家去！可是很不走运：秦家没人应，蒋没在家，杨刚外出。嗨！上哪儿去呢？风雪太大了。只得在淮海路马当路口一爿鞋帽店坐了半个小时！票价是0.15元，周很客气，算是请客。

1970. 1.21 星期三 晴

下午，吃完中饭就补衣服，直弄到吃晚饭才歇手。

按昨晚约定，今天晚上去校。我在6点半到校。据解说，江已被抽调到凤阳（？）毛纺织厂当工人去了。上午据徐说，最近江西亦在南昌学生中调了一批去洪都机械厂做工。

西门路、顺昌路口分手后，周对我说，按刘的说法，我在江西在生活、劳动等各方面都不适应，刘还抱怨当初我不该这么决定。周说我性格变了，变得沉默了。据他说是因为我在江西不能适应环境所致。唉！叫我怎么说呢？

1970. 1.31 星期六 晴

晚上，周顺路到我家来，向我借有关报头等宣传材料。我送给他一张“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油画。他为我、费、刘各定了一张《地雷战》的电影票。

【忆与议】

那段日记里时常出现向亲友送油画的记录，使我隐隐回忆起，1969年在江西刮起一阵“油画风”，自从那张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于1968年红遍全国以后，油画“毛主席在井冈山”就在江西“应运而生”了，成为我们首次回沪馈赠亲友的上佳礼品，更符合革命化的要求。四十多年过去了，那张火热了一阵的油画已经没有人想得起来，只是收藏、拍卖类网站上还能见到。据http://book.kongfz.com/9546/71826487/介绍，该画作者：刘春华、王晖。江西省新华书店1969-10出版。

日记里的周同学是同班好友，当年有幸留城，所以对下乡插队的好朋友特别关心，业余时间几乎都在陪伴我们游玩散心。而我等作为同龄的同班同学却因不可选择的毕业分配带来的“工农差距”，不能不深深感到无可奈何的难堪——为什么做不到双方“平等相待”而是单边“接受援助”？我在接受了几次请客以后，就借故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了，因为周同学自己家里也很困难啊。

当谈到我在江西的生活与处境时，我又能说什么呢？在那时候我能选择吗？记得我曾经和同学好友“探讨”过其他的“可能性”——如果68-11-19不去江西，随后就必定“迎来一片红”，那么，去安徽淮北吗？更加养不活自己；南下去云南贵州，或北上去内蒙吉林黑龙江，无一不比江西更加遥远，且不说其他方面。唯一可以“后悔”的是，安徽那里率先传来“知青上调”的大好消息，那次回沪探亲之前已经从通信中获悉了，回沪后又得到证实了（见70-1-21日记），去安徽插队的同学确确实实在下乡不到一年的时候就“跳农门”了。事实上，那里的“喜

讯”也只是昙花一现，并不乐观。

1970. 2.20 星期五 阴雨

在红旗影院碰到东风67届3班的钱等二人。钱是去年1月去淮北插队的，据他说，有传说被调至阜阳毛纺织厂的知青被退回，说要劳动二年以上方可入厂。

【忆与议】

此事确实是传闻，退回农村的事情并未发生。但“两年以上”这一门槛是确定无疑的了。走后门的风气从此愈演愈烈，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翘首企盼的“上调”依然是水中月镜中花。还是得面对无奈的实际，正视困惑的现实。

1970. 1.20 星期二 晴

晚饭后刘又来了，到校，遇到阙等，最后大家决定去徐家。在徐家中，看到徐13日写的信。徐信上说，她现在在代小潘的课。队里分红约在17、8号，今年我队一工仅8角钱。现在口粮减少，许多人都吃不饱。

1970. 1.26 星期一 晴

五点多钟，刘来我家。带来了沙、费、徐、陆20号前后给他的信。沙信中说，……班里“偿还内债”，沙已结算完毕，最高者要付出27元（可能有误）。回沪同学回沪期间按每日2角5分计算。

1970. 1.31 星期六 晴

费告诉我，决分时我分红收入14.25元，而班里还“内债”“外债”，我要支出17元。

【忆与议】

在偏僻山乡拼搏了整整一年，终于迎来了“年终分红”，亦称“决分”。《那年这样度中秋》中有“年中预分”的“工分值”——每一工（十个工分）折合人民币八角。按照当时的习惯，决分时的工分值高于预分。所以大家都是伸长脖子对待决分好消息的。不料，这一年决分是罕见的维持预分水平！1969-9-22日记里记录了我在预分时领到15.32元。1970-1-31日记里说，决分时我分红收入14.25元，但需要还班里的“内债”“外债”17元。所谓“内债”“外债”的具体含义已经记不清了，大体上是指当时大家“享受”安置费，由集体户共同使用，用于购买小农具和日常生活支出油盐酱醋以及煤油等等，由于集体户里不时有人因家人生病而回家、或本人罹患肾炎等病

症而回沪治疗、以及被生产队安排外出当修路修水库的民工等等，他们不在集体户的日子里用于日常生活的安置费理所当然地要退还给本人，因此就有了“内债”“外债”一说。年终结算安置费以后，集体户决定按每天0.25元偿还曾经暂离集体户的人员。这样一来，我全年劳动的净收入就是15.32+14.25-17=12.57元。买一张“回家看看”的火车票（15.20元）还不够！

假如没有1969年12月中旬下达的“压减口粮”的规定，这一年我的净收入就更低了。当然，不管是多少，1970这一年的口粮、口油是已经买好了（可以称之为“预购”），到生产队称谷称油是不大会遭到拒绝了。那么，想到自己只能勉强对付自己的嘴巴，心里就绝对不是滋味。

（4）当年“影迷”的行踪

早在1990年，我写过一篇回忆录《有这样一个“影迷”》，主要是回忆在插队期间经历的“文化荒漠”，也提到了回沪探亲时的“文化享受”——那么一个年代，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影迷”。每年回沪探亲期间，总要到电影院一饱眼福，解一解压抑了一年的“馋”。“阿片”、“朝片”、“越片”无一遗漏，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地区”这类纪录片也不放过。几乎是每天要看一场电影，有时还要“赶两个场子”。坐在电影院里，能使人忘却“文化沙漠”中那可怖的寂寞感，但一走出电影院，回到现实中，又一片茫然：这也叫“影迷”么？

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找到了当年“影迷行踪”的具体记载。“每天看一场电影”是记忆中的夸张，当年也没有那么多电影可看。

1970. 1. 4 星期日 雪

昨晚开始下雪，气温骤降。……下午……到嵩山电影院（红光）看《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这电影实在精彩，激动人心，动人心弦，具有强烈的鼓舞作用。

【忆与议】

这是下乡一年以后回沪探亲的第五天，首次走进电影院。记得当时打算把所有在映电影都看一个遍，无论故事片还是纪录片，为此还有过一份“日志清单”（利用文革开始前留下的俄语练习簿的空白页作为记录纸），以免重复观看，浪费了原本囊中羞涩的“板板”。这张清单估计是在1975年病退回沪时因事过境迁而销毁了。

1970. 1. 6 星期二 阴

午饭后，到长征（长城）电影院看了电影《宁死不屈》。

1970. 1. 9星期五阴转雨雪午饭后，到淮海路，到人民（国泰）电影院一看有2点15分的《南征北战》。买了

一张，因时间尚有一个多钟头，就到旧书店去看了一下，返回电影院恰好开映。散场是4点多钟，小雨小雪把路上打得很湿。我很天真，想冒雨坚持走回家，便打消了原先在瑞金路口乘26路电车的念头。走了不久，才感到这样不行，后悔莫及，到重庆路口终于下决心乘了车。到西藏路口下车，再步行至家。

【忆与议】

那个时候实在囊中羞涩，乘电车也是不舍得的，发扬风里来雨里去、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再则也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反正是闲着，省钱才是第一位的。

1970. 1.11 星期日 晴

上午去建国电影院看电影《创伤》。……下午三点多钟，爸爸和我及小妹同去老西门，买了一只单管半导体，11元（旧货）。说旧并不旧，去年12月20日被人购进，20天之内又出卖了。回来后发觉天线被剪得近二寸来长。

【忆与议】

下乡一年有余，且不说无法养活自己，消息闭塞是又一大痛苦，这次回家探亲时，父母决定资助我买一台收音机，详见《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一个曾经的城里人，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真理。

亲身体会这样的城乡差别是必要的，然而相应的措施政策彻底葬送了这种“美好的愿望”，违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无视民众百姓的基本要求，自以为是地推行“再教育”，直至实行强迫以求加快实现“革命化”，这种做法充其量是空想，结果必定是失败。

1970. 1.17 星期六 晴

下午1时出门，到红旗新闻科教电影院看了彩色纪录片《南京长江大桥》，心中真有说不出的自豪感。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只能用口号来表达我激动的心情。晚上又与缝纫机打交道至9点多钟。

1970. 1.19 星期一 晴

下午与祖父去淮海电影院观影片《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1970. 1.25 星期日 晴

上午合家搞吃的，包馄饨。午饭后，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参观票是上星期天×××送的。此次参观大开眼界，大为有益。上海工人阶级不愧是忠于毛主席的战士，在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战斗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工人阶级万岁！永远向工人阶级学习！

【忆与议】

记得在乡下的第一年，除了几次“露天电影”之外，也在村里办过展览会，到山外看过展览会——阶级斗争教育展览会。而回沪看到的电影多了一些，展览会也五彩缤纷、琳琅满目。那些革命化的电影、展览等等，政治挂帅宣传教化，加之“舆论一律”的严格控制、闭关锁国的环境氛围，只作纵向比较而回避横向比较，很容易人云亦云、盲目服从，夜郎自大，陷入歧途。

1970. 1.28 星期三 阴

晚饭后与祖父去电三大礼堂看苏联故事片《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点半才回到家。票子是××设法搞到的。

1970. 1.31 星期六 晴

晚上，周顺路到我家来，向我借有关报头等宣传材料。我送给他一张“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油画。他为我、费、刘各定了一张《地雷战》的电影票。

【忆与议】

当年把“反修”（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又提高到“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所以对苏联的电影愈加如临大敌，即使是以列宁为题材的电影也控制得很严。《列宁在一九一八》这部电影恢复上映以后，一票难求，是亲戚××为我找门路想办法搞来了电影票。原因在于，该影片中有无法删剪的镜头：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时，四个小天鹅穿超短裙赤裸大腿跳芭蕾舞的情景（据说另外还有列宁在瓦西里家席地而睡时瓦西里夫妇相拥相吻的画面）。传说曾经有的地方在放映该电影时，一度采取了“临时用手挡镜头”的原始操作方式，以防止中国人受到毒害。但我看的时候没有这类“处理”。无论有没有“处理”，社会上的这种逆反心理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虽然“引进”了一些“阿片、朝片、越片”（意为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的电影），但乏善可陈，只能把《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被戏谑地谐音为“南战北战”→“乱转八转”）等老片子拿出来炒冷饭，竟然也一时间出现票子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所以就有在沪同学为插队同学订票的事情。

（5）当年“影迷”的行踪（续）

1970. 2. 1 星期日 晴

上午兜了老大一个圈子，从老西门出发，走云南、北海、西藏、凤阳、黄河、南京、黄陂、武胜、延安、龙门、西藏、寿宁，又回到老西门再返家。一路经过了中华剧场、革命剧场、战斗、红旗、遵义、长江剧场、东方红、七一、上海音乐厅、红光等十个影院、剧场。我在战斗买了一张明天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下午三点钟，又去老西门一次，补袜、配钥匙、钥匙圈。另在中华剧场买了一张后天的《海岸风雷》。

【忆与议】

日前我在网络地图上按1970-2-1日记走了这么一圈，写下了《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也算得上是一个意外的历史收获吧。

1970. 2. 2 星期一 阴

下午，先把衣服洗了，再赶到“战斗”，观看了电影《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欢呼我国三次核试验成功》，同映《1969年新闻简报第8号》《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1969.5.19）。散场后，一路看看望望，到5点钟才回家。

1970. 2. 3 星期二 阴

下午1时去中华剧场看电影《海岸风雷》。

1970. 2. 4 星期三 晴

上午先把水磨粉搞细，后包馄饨。午饭后，先去“七一”影院买了一张明天下午第一场《中国人民有志气》，再从重庆路到淮海路，一路看看专栏。到达红光影院，观看《地道战》。

1970. 2. 5 星期四 晴

上午补了一条裤子。然后帮着搞馄饨、团子的馅。

下午去七一影院看电影《中国人民有志气》《千吨屋面双手擎》。回家后包馄饨，做团子。今天晚上一直搞到十一点半才上床睡觉。明天是春节。

【忆与议】

这里出现了每日看一场电影的记录，从2-2到2-5，连续四天一天也不少，故事片、纪录片各2场。在“战斗”电影院看三次核爆成功的纪录片《伟大胜利》，在这样的地点看这样的内容，倒是搭配得不错——战斗也要靠核武器来取得伟大胜利。《海岸风雷》是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地道战》则是老掉牙的国产故事片。《有志气》这样的名称太一般化了，想不起它到底纪录了什么新闻。

在1970-2-4的日记里，提到“从重庆路到淮海路，一路看看专栏。到达红光影院”，说明自从1966年夏天大字报铺天盖地上了大街以后，直到1970-2仍然到处可见大字报，但其“专栏”形式比较吸引眼球。

1970. 2. 8 星期日 晴

上午去上海展览馆参观驻沪三军举办的“打倒新沙皇展览会”。十时参观完毕。因时间尚早，就步行回家。

1970. 2.10 星期二 晴

饭后，即去七一影院购了明日午场《地雷战》三张及第一场《万岁伟大的中阿友谊》一张。回家时又到长征买了一张下午3点50分的《珍宝岛不容侵犯》。回到家才一点半。阅《苦菜花》至3点20分，去看电影，5点回家。晚饭后续阅《苦菜花》。

1970. 2.11 星期三 晴

午饭后到七一影院连看了两场电影，4点半回到家。

【忆与议】

这里出现了“赶场子”看电影的记载。1970-2-11那天是大年初六，又看《地雷战》，又看《中阿友谊》，有老的故事片，也有新的纪录片，貌似丰富，实则空虚。

大年初三看“反修”的展览会，初五看“反修”的纪录片。与当时的备战氛围不无关系。一月底到三月初的日记里有几次记录，另详。

在1970-2-10日记里提到“长征”电影院，在《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一文中没有提到。该文言及的文娱场所都在当年我家的北面，而“长征”位于当年我家的西南面，文革“破四旧”以前叫“长城电影院”。距离我家大约500米，接近复兴中路黄陂南路的西南角，其东侧是人民银行，西侧不远有新疆建设兵团的上海办事处。近日查看E都市网站，该处变化甚大，银行的大楼尚在，向西成了硕大的大同商务大厦，电影院不复存在。

1970. 2.12 星期四 晴

下午1时许，徐、刘又来我家，去“东方红”看电影。可惜票子早已售完。于是同行到外滩兜了一圈。四时半左右到家。弟弟今天碰巧买到一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从外回来后及晚饭后把该书大致翻了一下。

【忆与议】

当年电影太少，当场票还一票难求。至于那本《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当时极为难得的“外国书”，一时间洛阳纸贵。

1970. 2.13 星期五 晴

午饭后乘车到红旗买了两张明天下午第一场《广阔的地平线》，然后再乘车到建国影院看了《1969年新闻简报第8～12号》。

1970. 2.14 星期六 晴

午饭后一点四十分乘车看电影《广阔的地平线》。散场后到市百一店转了一圈。到五点多钟才回到家。

【忆与议】

这里又是连续两天看电影。《广阔的地平线》是阿尔巴尼亚故事片。至于把5辑“新闻简报”连续放映作为一场纪录片，恐怕也是那个时候独有的“风景线”。

日记中说到的“建国电影院”，在我家南面大约700米，位于建国东路的东端，坐南朝北，是文革“破四旧”以后极少数未改名的电影院之一。现在从E都市网站上看，那一带已经夷为平地成为工地了。

1970. 2.15 星期日 晴

晚上去长江剧场观看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的革命话剧《金训华》，整两小时，受益很大。十点钟回到家。

【忆与议】

这是上海知青到黑龙江不久遇到洪水时为抢救电线杆而献身的烈士金训华牺牲后没多久就完成编剧并演出的一

出即兴话剧，其内容情节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受益很大”实是空话。

1970. 2.19 星期四 阴

午后去长征影院看电影《新沙皇的反华暴行》。散场后在顺昌路、复兴路口搭17路电车至福州路、西藏路下，到红旗影院购了明天第一场《九大》影票两张。然后走西藏路步行回家。

1970. 2.20 星期五 阴雨

下午4时，乘18路电车去红旗影院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观完为5点3刻，因天下雨，搭18路车回家。

【忆与议】

又是一次连续两天看电影，都是纪录片。对“九大”的纪录片，在江西乡村的晒谷场上看过“露天电影”，回沪后再“正视”一遍。至于反华暴行之类早已到了九霄云外。倒是记得日记中屡屡出现购票两张，都是为了让祖父也有机会上街走走逛逛、看看电影，他在里弄里深受“革命群众专政”压抑到了极点。

1970. 2.22 星期日 阴雨

午后与小妹妹去“长征”看了《草原英雄小姐妹》。

【忆与议】

这是一部文革前拍摄的动画片。在文化沙漠时期也拿出来充数了。那时候我的小妹妹才七岁，更谈不上什么儿童电影，于是就从小接受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了。

这年二月份看了11次电影，其中故事片仅4次！如果加上3-12在“长征”看的《列宁在十月》，则在70多天里，看了19次电影，其中，故事片为10次（含动画片），“囊括”了当时公开上映的4部国产片（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草原英雄小姐妹）、4部“阿片”（宁死不屈、创伤、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2部苏联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位朋友回忆当年的国产片“三战”的“片头语”，非常真实传神——

什么是片头语？就是那时的影片在放映前，为了跟上形势，都重新做了包装。怎么包装？非常简单，也非常革命化的，就在正片前面，在片名之前，加上一段毛主席语录。于是《地道战》一放映，一个男声就朗读道：伟大领

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于是，推出片名，紧接着，硝烟滚滚，炮声隆隆，杀声阵阵。把我们带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去了！我们激动万分，我们热血沸腾，我们热泪盈眶，我们沉醉其中，不能自拔......（摘自网易博客《在农村看电影之很好很强大的片头语》）

（6）感受当年家里的战备

四十年多前，轰动全球的1969-3中苏两大国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即著名的珍宝岛事件时，我在江西山区“偏安一隅”，没有什么震动，直到1969-9的日记选《八二八命令与一清五打》和1969-10的日记选《基层民兵建设及演习》中才略有提及，总的感觉是没发生什么大事。在记忆中家里曾经写信告诉我，有可能会“人口疏散”，但在日记里未有找到这方面的记载。我在1970年初回沪两个多月，对当时的“备战”气氛有所感受，日记中也有一些记录。

1970. 1.29 星期四 阴雨

下午先与弟弟观赏收集的一些邮票，后去复兴中路178号买了半斤白纸，回家后就和弟弟一起“搞战备”，给玻璃窗上贴上“米”字形防震条。晚饭后还干了会儿，才全部完成。

【忆与议】

当年城市防空的一大措施是家家户户把窗户玻璃贴上“米”字形防震纸条。所以这也是春节前“家庭战备”中的“规定动作”。当时走在马路上，无论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防空洞工地，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标语“奋战三个月，建成地下城”，回家说给大家听，结果是对此等高速度都一声不吭，因为实在没有可能、但又不敢说出来。

现在一时想不起是哪一年，我在家听邻居纷纷传说“大世界游乐场的外墙昨晚出现裂缝啦”。回沪探亲但闲得无聊的我就很快跑到现场（当时我家距离“大世界”大约800米）。果然，在“大世界”塔楼的西侧即西藏南路上，很多市民驻足张望、轻声议论。只见墙上已经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小纸条贴在裂缝上，据说不同颜色代表了裂缝出现时间的先后。塔楼底层的饮食店、布店等早已停业数月，可以看到沿街的店堂里正在挖掘防空洞，穿越墙壁的地方有木棍支撑着。这是当年防空洞施工中常见的形式。由于施工都是在既有的房屋底下进行，所以承重墙会不可避免地不均匀沉降而产生裂缝。“大世界”是公众注目的“地标”，因而墙上裂缝引起小小的骚动。关于那个时候的“人防工程”，参见本文附录一。

至于“复兴中路178号”，是一家无名小铺，专门称分量出售一些纸张边角料，一直勤俭持家的祖父是那里的

常客。记得我每年回家探亲时，都会去那里看看有没有适合当信笺纸的边角料。直到1978年春天我有幸进入大学以后，还特地到那里看看有无大小合适的边角料，称重买些回来订成本子，代替正式的课堂笔记本。

1970. 2.16 星期一 晴

下午，里委里搞防空演习，我不乐于在居委会白呆几个小时，故饭后就出去了。乘18路到北京路，然后走北京路、福建路到南京路，到中百十店及新华书店去看了看，再走福建路到福州路几家书店看了看。3点3刻左右乘17路电车回家。

1970. 3. 4 星期三 晴

午饭后，里弄里两点钟开始搞防空演习，我于1点半到老西门去了。那里也有一处在搞人民防空演习。三点半回家。

1970. 3. 7 星期六 阴

下午地区街道演习，我和弟弟均在家。弟是上午由爸爸陪同去宝山看病，感觉疲劳才呆在家里睡大觉的。

【忆与议】

面对接二连三的防空演习，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是上海人了，真要打仗的话，乡下、山里不会这样防空的。

1970. 2.18 星期三 晴

晚饭后居委会开会，是有关人口疏散问题。

【忆与议】

很可惜没有留下一点有关人口疏散的具体情况。忽然想到，不妨查阅一下祖父留下的日记。想不到真的会有结果。那天晚上是对13个“群众专政对象”逐个谈话，内容是打算如何疏散人口，如果自行挂钩疏散，则立即向进驻里弄的“工宣队”汇报！这样的记载又让我把当年留在记忆中的一件事联系起来了：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准备回江西了，祖父向我详细打听一路上换乘车船的情况，还说是他打算到我插队的云庄村去！当年我只是觉得奇怪，并不知道那么多内情细节，如今把祖孙的日记联系起来方才恍然大悟，爷爷曾经准备“自行挂钩疏散”啊！不过这件事似乎很快就“风吹云散”了，再也没有提起过。查阅上海地方志，竟然持续六年，涉及全市86万人！参见本文附录二。

附录一：关于当年上海的“人防工程”

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军事志>>第六编防空>>第三章人民防空>>第四节　人防工程建设，有这样的描述：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上海建造的人防工程分布较合理，设计与施工质量尚好。1969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鉴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毛泽东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全市人民依靠各单位人力、财力、物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构筑人防工程的活动，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加上材料设备简陋、施工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所建人防工事大都属于简易工程，质量较差，三防设施不完善，不但战时难以发挥战备效益，平时使用效益也较差。

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民防志>>第四编工程建设有较为详细的资料：

1969年全市掀起修建人防工程的高潮，1969～1978年，共修建人防工程建筑面积200余万平方米。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又在无设计、无监理的情况下施工，所建人防工程除少部分等级工程外，大部分属于简易人防工程，质量差、渗漏水严重，内部三防设施又不完善，除部分加固改造后可供使用外，大部分在城市建设中被拆除或报废。

专业志>>上海民防志>>第四编工程建设>>第三章勘察、设计、施工>>第三节　施工1969年，全市掀起了一个找料、献料、建设人防工程的群众运动。工程施工所需劳动力由各单位分片包干，工程使用的材料也由各单位自行筹措，如自己烧砖，自制土水泥等。据1970年5月统计，全市有13个街道、10多家工厂、学校、医院建砖窑159座，烧砖1371万块。使用工业废料146736吨，水泥渣5269吨，电石渣28470吨，石灰下脚料5923吨，电炉粉5983吨。群众献砖1583万块。截至1975年，全市建砖窑1533座，烧砖49558万块。1971年2月，修建的肇家浜路人防工程，是这段时间规模最大的工程。其中徐汇区段工程全长2500米，面积6000平方米地下通道投资36万元，发动53个工厂、学校、街道、里弄等20万人参加了义务劳动。

在战备形势紧迫的情况下，动用群众性施工队伍，突击抢修临战应急工程任务是必要的。但长期抽调厂矿企业的职工参加施工，影响厂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加上施工人员变化大，调动频繁，队伍技术提不高，影响工程质量。当时还组织“五七”施工队，是“准专业化”的施工力量，由街道妇女、居民以及没有工作单位的社会闲散劳动力，按施工需要进行编组，这一部分施工力量，以后逐年转入正规的人防工程队伍中。

据1978年普查统计，列入人防工程统计数10771个，使用面积160万平方米；不列入人防工程统计数7019个，使用面积51.6万平方米。

附录二：关于当年上海的城市人口疏散

上海地方志中，专业志>>上海民防志>>第二编防空指挥>>第四章人口疏散、目标防护>>第一节　城市人口疏散，有这样的资料：

上海解放后，1969年全面战备期间，全市进行人口疏散，市人防办会同上海市公检法、市革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市劳动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粮食局、市公用事业局等8个单位联合制定《关于疏散城市人口几个问题解决办法》，提出了解决疏散经费、口粮、户口、转学的具体意见，报请市人防领导小组和市革委会。为摸索经验，市人防办布置各区人防办，抓一个街道的人口疏散的试点工作，全市10个区试点街道总人数为612302人，占市区总人口的10%左右，动员回乡及投亲靠友长期疏散（指迁出户口）的共3733人、动员临时疏散的共6728人。

1969～1974年上海市人口疏散统计表年份疏散人数（人）

1969年上海市10个区试点街道疏散人口统计表：

区别	街道名称	街道人口总数	1969年9月至1969年12月疏散人口数		1970年1月疏散人口数	
			长期	临时	长期	临时
合计	10	612302	3042	4188	691	2540
长宁	江苏	72605	441	336	70	251
静安	江宁	52439	519	279	187	252
南市	露香	62892	212	613	44	75
卢湾	打浦	51550	370	1266	38	49
闸北	青云	65211	382		96	676
虹口	虹镇	59663	393	577	128	363
杨浦	控江	68284	43	620	59	140
普陀	沙洪浜	57307	144	12	6	43
徐汇	徐镇	56396	204	125	38	297
黄浦	广东	65955	334	360	25	394

说明：长期疏散人口数系指迁出户的人数。

自1969年第四季度至1974年，全市各级组织先后疏散人口合计为857526人。

1969～1974年上海市人口疏散统计表

年份	疏散人数总数	年底全市人口	其中	
			市区（万	郊县（万

	（人）	（万人）	人）	人）
合计	857526			
1969年第4季度	42006	1094	608	486
1970年	320587	1073	583	490
1971年	144676	1065	569	496
1972年	188503	1064	564	500
1973年	81178	1070	562	508
1974年	80576	1069	560	509

1975年以后，全市停止疏散人口工作。人防部门转入和平时期拟定战时防空袭疏散人口的计划工作。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

1970日记选议（7--12）

（7）时隔一年又遇“一片红”

我的第一次回城探亲，在上海呆了70多天——1969-12-30到达上海，直到1970-3-19才离开上海。原因在于我的弟弟是69届，碰上了继68届“一片红”之后的第二次“一片红”。

当年的69届毕业生实实在在算不上是中学毕业生，他们是66年小学毕业，恰遇“停课闹革命”，直到67年底才在中央三令五申“复课闹革命”时就近进入中学（参见《1967我经历复课闹革命》），不仅已经短少了一年学校学习，而且在中学里又是两年“无书可读、无课可上”，到69年底竟然就被宣布中学毕业了！这种史无前例的“教育革命”摧残了多多少少无辜青少年的宝贵青春啊！如今还有人闭着眼睛说瞎话，为那极左路线下的“教育革命”涂脂抹粉，真不知道居心何在！？

自从那个12-21指示“横空出世”、极左路线的宁左勿右给当时多子女家庭带来“灭顶之灾”——68、69两届接踵而至的“一刀切”，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家虽然没有兄弟姐妹两三个扎堆下乡，但也是“祸不单行”，刚刚在1968-11把我送走、去插队落户，才过去一年，弟弟就迎来69届的“一片红”！我们全家怎能不揪紧了心呢？凑巧的是，67年年底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我弟弟进入的学校正是我的中学母校。所以，我回沪探亲之际，就常去学校找自己当初的的班主任薛老师以及毕工组的余老师等人脉打听消息。

1970. 1.21 星期三 晴

薛老师透露了69届毕业生分配方案，江西5～6万，安徽4万，吉林4万，黑龙江4万，云南3万，其中仅黑龙江1万和云南3万共4万是军垦，余皆插队。另外，凡家中哥、姊有人在外地插队者，可予照顾去一处，只要队里同意。薛的意思似乎有若我弟弟身体可以、是否让他亦来我处之意在内。我未表态。

1970. 1.24 星期六 晴

上午，弟去体检。弟晚上去校，填写登记表，并听取毕业分配报告。69届毕业生去向是：黑龙江4万（其中1万军垦），吉林4万，安徽4万，江西5万，云南3万（全部军垦）。

【忆与议】

上述日记中有可能遗漏了内蒙古。另外从总人数20～21万来看，似乎也偏少了一些。所以对当年69届“毕业生”的去向与人数有待查证。

回忆当时我对老师的建议（让弟弟到我插队的生产队去）不表态，主要在于我家已经切实领教了插队落户的真实滋味，而我弟弟从小就有哮喘病，怎可再向毫无劳保的插队泥沼里跳呢！？而69届20余万“毕业生”去“军垦”的名额不到五分之一！真是急死人。

1970. 2.22 星期日 阴雨

徐、沙信中说，云庄12日开始发电。男生宿舍装了一只40支光电灯，食堂门口也有一只路灯，每晚11时熄灯。最近传达了中央三个文件，江西农村四反要重搞，许多地方四反是走过场的。队里要求我们回沪青年赶快返队。武装基干已集训完毕，内容是打飞机、坦克。基干民兵也将进行训练。南昌居民将下去一批，云庄大队也来少量。大队拒绝任何非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插队。

【忆与议】

中学里的老师还在希望我“动员”自己的弟弟到我插队的地方去，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我的插友写信告诉我，生产队方面“拒绝任何非国家分配的毕业生插队”！这说明了“各地农村的同志”在12-21指示发布一年多以后，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彻底地理解和执行“应该欢迎他们（知青）去”的最高指示。再则，南昌居民又要来农村（人口疏散），更使农村感到压力骤增。（后来的发展情况是，并没有南昌居民下放到村里，生产队接收了个别知青的弟妹来插队。）

日记中提到的三个文件，就是当年“一打三反”运动的政策依据。现在对这个声势颇大的运动的来龙去脉，似乎还有许多难以言说的苦衷，尽管它属于被正式文件否定的文革的范围之内。

1970. 2.28 星期六 晴

晚上去校。进校即遇见孙、余、郑、肖等老师。孙、余向我均问了我弟对分配的意见。孙要我多做动员工作。

【忆与议】

孙是“校革会”副主任，“三结合”中“革命干部”的代表。当年他要我多做动员工作，可想而知是遇到了麻

烦，关键仍然在于弟弟的身体状况。根据上海地方志的资料显示，“1968、1969年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除了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称为‘一片红’。”所以，我的弟弟当时不属于“极少数身体残疾”之列，因而成为连“校革会”领导也关注的重点动员对象。

1970. 3. 3 星期二 阴

昨晚，妈妈去比乐中学参加69届毕业生家长会。会上公布了69届分配方案。回家后就弟弟今日填写“志愿”直搞到11点才上床睡觉，今天到八点钟才起身。

1970. 3. 4 星期三 晴

因周说费曾看见余老师在排69届毕业生去向，故家里都叫我到学校去一处。晚饭后即去校。……余老师回来了。他问起我弟弟事，我照实对答。他说弟弟志愿“填得不错”“江西可能性不大，云南可能性较大，因报名去江西的人很多”。

1970. 3. 9 星期一 晴

据弟弟说，分配事，基本已定：江西“兵团”。金老师说还要报“领导批准”。

【忆与议】

从日记中的片言只语来看，当年填写“志愿”还花费了不少脑筋，可惜没有留下痕迹。显然，无论知青还是家长，越来越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无可奈何的“一片红”面前“选择”得实际实在实惠一些，避远求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响应号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则已经成为空洞的时髦口号，“接受再教育”之类越来越显得虚无迷茫，养活自己才是首要任务。

1970. 3.10 星期二 阴

校内已将69届赴黑龙江逊克、安徽凤台、霍山等三地插队的名单公布于众。据费说，我弟弟在江西军垦。……薛老师今天又告诉我弟弟分配在江西“军垦”。

1970. 3.11 星期三 晴转阴

早饭后，祖父、弟弟、小妹妹和我四人同去西郊公园玩了一次。下午三点半回到延安路黄陂路，我和弟弟各自到校去转了一圈。

【忆与议】

弟弟去江西兵团似乎已成定局，爷爷就带着孙子孙女到当时上海最有名的动物园——西郊公园去游玩了一次，

作为告别上海时的一个纪念。我也与插友商定了3-16买火车票回队，岂知天有不测风云，我家又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

（8）磕磕碰碰，弟弟进“兵团”

满以为弟弟在“一片红”之中可以不再走我的插队之路、成为“军垦战士”已成定局，想不到风云突变、全家老小心惊肉跳——

1970. 3.14 星期六 阴雨

上午，吴同学来说，他去校，金老师告诉他，我弟弟去江西“兵团”在初批中未能通过。这真叫人伤脑筋。晚上……薛、沈、费均不知我弟弟的事。

1970. 3.15 星期日 阴雨

上午余老师说，江西“兵团”要求如同参军一般。

1970. 3.16 星期一 晴

吴等同学又来，弟弟肯定不会批准去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了。

1970. 3.17 星期二 晴

出人意料地，今晚弟弟参加全市69届上山下乡大游行后，回来报告了大家一个想不到的好消息，他已批准去江西“兵团”了。据说是名额不够才搞上去了。并说原先是因为眼睛不好才被退下来的。

1970. 3.18 星期三 晴

晚上按原计划赴校。在毕工组接待室见到余老师，他今晚值班。他说，我弟弟的名额是争取来的。如到江西后身体不行，还可能退回来。他要我弟弟表现好些。

下午四点多钟，由父亲陪同，我们兄妹四人到红花照相馆合影。

【忆与议】

真的就像是“历史重演”，短短几天之内的折腾，一如我去江西插队也不是“一锤定音”的，也是在个把星期内翻来覆去，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

可以想见，虽然当时我家兄弟俩上山下乡了，但都是近在咫尺的江西，而且还有一个是去兵团，相对于北上黑龙江内蒙古、南下云南贵州，也未免太“优惠”了吧？所以在“初批”中未能过关，不足为怪。什么“接受再教育”“走革命化道路，做革命化新人”统统都是空谈，真正需要反复斟酌的“筹码”是兄弟姐妹的分布、下乡路途的远近、农村环境的优劣等等“硬指标”。当年毕工组余老师说我弟弟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兵团名额”，究竟是怎样的内幕就不得而知了。他另外一些话（如果身体不行还可能退回来，表现要好些），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无法揣测，所以我把它们写入了日记。记忆中我当年的担心是，如果被兵团退回上海，岂不是成为无职业者“社会青年”了吗？（自从六十年代初上海开始动员“社会青年”去边疆以后，在我脑海中“社会青年”一词多带贬义。）“表现好些”是不是争取在兵团有个好安排以便适合身体状况呢？熬了三年，1973年，中央出台了有关新政策，我弟弟得以因为严重的哮喘病而退回上海，是为所在十团的病退第二人。

记得1970-3我们兄妹四人合影留念之前，妈妈一直期待着“江西兵团哪一天发军装”，弟弟可以穿上军装留影。然而，直到三年后我弟弟病退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过一身戎装。最近一位网友告诉我，当年的江西“兵团战士”并没有军装，仅仅是“基层连队武装班发过，团武装连也发过，但发的不是正规部队被服厂的军装，而是兵团化纤厂自己生产的，所以人们戏称其为土八路军装。”数十年后，江西兵团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在知青论坛上，在知青博客中，实在很少看得到江西兵团。在洋洋洒洒的知青研究大作中鲜有提及，即使偶尔有人提到，也往往把“江西生产建设兵团”简化为“江西农建师”。这与兵团史书“汗牛充栋”的黑龙江、云南、内蒙古乃至新疆的兵团是绝对无法相提并论的，难怪乎，不少知青网友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番号”。我曾与一位江西兵团的博友谈及编写“江西兵团史”，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文化水平太低啊。”的确，当年江西兵团是69-11才组建的（与身处“反修前线”的黑龙江等兵团相比，要晚得多），上海到江西兵团的“中学生”之中鲜有老三届，也就是说，他们几乎都是69届及以后的“中学生”，但在实际上最多是小学毕业生！所以，江西兵团被遗忘、被边缘化，还与这支知青队伍的文化底蕴有关。追踪研究这个史实可以让知青史的研究者更加明白，当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目的与根源究竟何在？仿佛雨后春笋般建立、尔后又悄然销声匿迹的“兵团”究竟是何功能与作用？至今还有人打着为知青正名的旗号为当年的“血肉之驱筑成的长城”高唱“英雄赞歌”，却避而不谈“知识青年无知识”的悲剧。

黑龙江兵团有过参战珍宝岛的辉煌，云南兵团有过下跪请愿回城的悲壮，江西兵团的“战士们”实在是不可比拟的默默无闻，甚至连自己兵团的来历身世都说不清楚。最近看到一篇相对完整的“简史”（2010-07-27发表于网易博客），一大缺憾是没有提到江西兵团、农建师何时回归“民间”“农垦”。

附录：

http://li407906357.blog.163.com/blog/static/166625218201062735845679/历史上的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撤消过去近四十年了，那段历史至今仍然记忆忧新，而当年的青春年少的兵团战士如今快已步入花甲之年了，现有很多当年的兵团战士和相关人士都在探究那段历史，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又

是什么时候撤消的？历史上有多少下属团？本人作为亲历者，今天应圈主晨光之约根据掌握的相关资料写出来以飨广大兵团战士并与大家共同分享。因年代久远，考证艰难，难免有疏漏之处，万望读者宽宏大量，并恳请知情者予以扶正，本人不胜感谢.

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69年11月隶属当年的大军区福州军区管辖．副司令员胡定千原为军事学院预科系主任1955年授少将军衔．政委郑国1955年授少将军衔原为31军政委。兵团组建之初总部设在南昌市新建县长凌镇，同年年底迁往新建县望城岗原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即现在的南昌陆军学院院内．1971年6月福州军区发布命令撤消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同年7月兵团总部停止办公，公章封存作废．稍后组建江西农建师.

根据现有掌握的资料，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分别下设农业团和工业团．其中农业团共有十一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农业团主要集中分布在江西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周边。兵团组建前农业团大多为劳改农场或国营农场．下面以番号为序一一道来：

一团为赛湖农场，位于九江市瑞昌县境内；二团为芙蓉农场，位于九江市彭泽县境内；三团珠湖农场，位于上饶地区鄱阳县境内；四团成新农场，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五团为朱港农场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六团乐丰农场位于上饶地区鄱阳县境内；七团安福农场位于吉安地区安福县境内；八团为恒丰农场，位于上饶地区鄱阳县境内【一说在九江永修县涂埠镇——笔者注】；九团鲤鱼洲农场，位于南昌市南昌县境内；十团为恒湖农场，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十一团为邓家埠机械农场，位于现鹰潭市余江县境内以及现属抚州市的资溪县境内的塔桥农场；另外还有一个独立营，进贤永桥农场，位于现南昌市进贤县钟陵乡.

兵团工业团的前生也大多为劳改工矿企业．工业团共有十二个团和一个独立营．下面以番号为序分述如下：

二十一团为九江国棉三厂〈九江灯心绒厂〉，位于九江市区内；二十二团为浮南瓷土矿，位于景德镇市浮梁县境内；二十三团为景德镇新生印刷机械厂，位于景德镇市内；二十四团为景德镇三六无线电厂，位于景德镇市内；二十五团为东乡铜矿，位于现抚洲市东乡县境内；二十六团为东乡磷肥厂，位于现抚洲市东乡县境内；二十七团为高安新华煤矿，位于宜春地区高安县八景镇境内；二十八团为江西化工机械厂，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境内；二十九团为桐木林汽车制造厂，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三十团为南昌化学纤维厂，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三十一团为江西光华塑料厂，位于南昌市新建县境内；三十二团〈待考证〉．另外在南昌市新建县还有一个工业独立营，叫开关厂。

兵团的历史已离我们远去，物是人非，物换星移，人还是那些人，但变换了时空．为保持资料的原汁原味，我还是延用了老地名因为当时江西只有三个省辖市＜南昌市　九江市　景德镇市＞其他的都叫地区。

（9）年味里掺入了边缘感

一年多以前还是上海的学生，一年多以后就是回沪探亲的知青，这种身不由己的角色变化，加之政治高压与城乡二元结构，不能不使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 1. 7 星期三 晴

今天下午两点我去约刘再摸索去徐家。小潘等也会去徐处。・・・我们是照祖父所说的，准备先去派出所查询一下徐的住址。走到顺昌路菜场附近迎面见到潘、胡、徐，她们刚去徐处，徐不在，才往回走，打算去“老城隍庙”。我们问了徐的地址。分手后，我们两人糊里糊涂地继续往南走。后来刘提出去张家。但地址不知，可能小潘会知道的，于是转身去追小潘等，结果落了空。怎么办？决定去“东风”。校内正上课，老师是没有空的。转了一圈出来，刘说他准备回家了，我说准备到淮海路上逛逛。他马上表示赞同。行至马当路口时，迎面遇上王。她说她知道小潘的住址的。我们约她晚上到校。因为刚才亦与潘约定晚上到校的。再往前走，在重庆路口，又遇到了阙与杨。于是四人边行边谈。前进至淮海电影院时，杨提议往回走，一致通过。但始终找不到落脚之处。四人沿淮海路—嵩山路—复兴路—淡水路—西门路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到西门路顺昌路口分手“各奔前程”，并约定晚上到校。

【忆与议】

这是首次回沪探亲期间第一次无可奈何的“遭遇记录”，正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记录得最详尽。在以后的岁月中类似的境遇数不胜数，不足为怪，也就很少再写下来。一群青年人不由自主地游荡在十字街头的，他们既有当初并不并不认识、因为“插队落户干革命”而“走到一起来了”的插友，也有曾经是同校不同班不同级、因为“上山下乡”而各奔东西的同学，纷纷在外地农村“苦斗”了一年回家探亲，在茫茫人海中邂逅会面，竟然找不到落脚之处，只能在马路上晃来荡去，犹如无头苍蝇一般……。40多年过去了，看到这段文字，尽管早已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彼情彼景仿佛还在眼前。

1970. 1.12 星期一 晴

上午九点多钟，刘、周来叫我，说是今天云庄大队返沪青年在潘家大会师。果然人不少。据有人统计，目前，云庄大队上海青年有26人返沪，今天在潘家中即有15人。

【忆与议】

那年2月6日是春节，所以1月12日只是腊月初五而已，全大队约60名插友已有半数在上海了。查找当时日记中不完整记载，此后虽有个别插友回生产队过年的（村办小学的知青老师要赶回去上课），但更多的还是暂别山村，

回家与亲人团聚。那些年无数次提到说到写到的“家”这个概念，都还是指向城市的亲人家庭，说明知青虽然成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五七大军”，在偏僻山乡与农民朝夕相处，但灵魂深处的潜意识中远非“五七指示”描绘的“一代新人”，真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因此，那个指挥了千百万人大迁徙的空想早晚要烟飞灰灭，不可能留下名垂青史的惊世奇功。

1970. 1.31 星期六 晴

按昨天的约定，今天上午八点半到徐家碰头。我顺路约了刘。今天在徐家的有费、徐、章、程、刘和我外，还有张、胡、李、王和周及王的弟弟。九点钟，人到齐后，就去“老城隍庙”。“豫园”上午不开放。张所带2卷胶卷无用武之处，索性到外滩。在外滩和黄浦公园里拍了卷胶卷。此刻时间已经在十二点半以后了。干脆不回家吃饭了。到红园去。然吃饭问题竟是如此棘手，一般吃食店里午市均结束了，只得吃价钱较大些的煎面（2两0.15）和煎馄饨（1两0.10）。在这里正遇上吴。进餐后一行13人到豫园游玩，摄影留念。至4点才离开，走上回家之路。我是第一个到家的。到家四点半。大概是在外滩受冷风吹的缘故，故中午起就感觉头脑胀痛。

【忆与议】

这是那个蹉跎岁月中第一次小范围的集体留影。我留存的照片中也仅有这一次。图中八男四女主要插队在云庄村（9人，另有2人在东岭背村、1人在洲老上村。时隔41年，12人中已有2人去了天国（前排右一刘TN、后排右三徐JC）。

日记里反映出我的“弱不禁风”。在乡下一年，虽然四上县城就医，始终没有确诊病患；回沪之后检查身体，竟然也无大碍，所以当年的病态是极度的营养不良所致。记得回家探亲的最初几天，连续腹泻，但很快自己发现了其中的病因，是由于家里特地让我多吃一些油水，只要略受风寒，甚至吃了冰凉的香蕉，就会发生“滑肠”。这种现象在以后几年春节回家都是“屡试不爽”，所以，不能心急恶补，而只能慢慢进补。

1970. 2. 8 星期日 晴

下午，继续走访同学。去汤家。汤是赴黑龙江军垦，未能回沪。再去汪家，汪母说汪大概在春天回来。最后来到程家。程回沪了。他是上月16日让家中打假电报说谎取得了队、大队、公社三级证明后才回家的。我们很有兴趣地谈了半小时。

【忆与议】

在整理1969日记的时候，专门有过一篇《1969日记选（41）知青想回家看看》，不少网友对其中“知青回沪要有生产大队出具的身份证明，以备路上住宿等不时之需”表示难以理解。这反映了当年各地政策的差异。从1970-2-8日记可以看到，当年我的中学同班同学程（实际上与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同学了）也是“骗取”了三级证

明才得以回家的，他插队所在地正好也是在江西，这说明了江西当年对人口流动的管理“有特色”。那位同学自1970年春节以后就失去联系，只记得当年他插队在赣州地区，好像是在崇义县。同样是从上海到江西插队，但路途远不少，需坐火车绕道到广东韶关，再换乘长途汽车进江西的山区。

1970. 3. 7 星期六 阴

方约在18日离沪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忆与议】

方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当初67届是“四个面向”，方属于“普工”（普通工矿企业），分配到某区手工业局下属的鞋跟木楦厂，专门为制鞋行业做配角。12-21指示发布后，方积极报名上山下乡，成为耀眼一时的新星，后被内蒙古兵团录取，又分配在内蒙古某工厂，于是在上海一个对口工厂学习培训了近一年，1970年春节后终于“踏上征程”。自此以后，与该同学的联系中断。听说，没有太多时间又退回上海、进了别的工厂。后来我们同班同学都不太愿意打听方的这段“折腾史”。

1970. 3.10 星期二 阴

今看到了沙、徐、陆的来信。工分已重评，普遍升高。金与陆6分，费以升至5.8，刘5.5等。徐竟把我的忘了写上。信上说，各生产队团支部均建立，一队支书为赵，二、五队为×，三队为××和××（副），桂是支委之一。沙信上说队里在搞“六清”，现在搞××，有5个方面的问题。队里要我们早些回去。

李等三人打算15日动身。章、宋、郭都可能和我们同行。但车票不易购买。

1970. 3.16 星期一 晴

早上四点半即起身，吃过早饭，5点多钟即与祖父同去人民路售票处买车票。郭是第一名，章次之，我再次。刘、宋、费先后到达。9点半买到了票，然后分道扬镳。

【忆与议】

如今的“春运难”，其实并非今日始。当年知青在春节期间“制造”的客流也是相当“壮观”的，如果敢于像现在那么大胆，“无奈裸奔”一定也会屡见不鲜。

文革初期被“砸烂”的团组织在中共九大以后也重新建立起来了，云庄大队五个生产队，建立了四个团支部，知青中的“老团员”有两人在新的团支部中任职，也为这年夏天知青首批有人入团打下了基础。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团票”也是很看重的，知青意欲“跳农门”不能不作“多方面”考虑。

（10）下乡“第二春”办起“大食堂”

云庄村的三十名知青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迎来了新的一年1970年。新春伊始新变化——办起了“大食堂”。

1970. 3.19 星期四 晴

上午9:50乘49次列车离开上海返江西云庄。到车站送行的有薛老师、……等。费的父亲、母亲，刘的弟弟，郭的父亲，宋的母亲、哥哥，我的祖父、父亲、弟弟和小妹妹等亦来送行。

【忆与议】

从日记中的不完全记录来看，那年我离沪归队的日期属于比较迟的，因为按照插友之间互相送行的习惯，到我等数人离沪时只有自己的亲友到车站送行的了。

1970. 3.20 星期五 阴雨

火车在半夜一点左右抵樟树，误点半个小时左右。在刚到嘉兴时就误点28分，到杭州时更误点40分钟。从火车站到轮船码头有六七里路，各自挑行李步行了一半不到，就累得不行，休息了四五次。因为像费、郭负重达八九十斤呢！最后决定由我看守部分行李，其余的人先挑一部分到码头，再回来挑完。这样分两次走，轻松得多。

很顺利地买到了早上5点开往吉安的船票，价0.50元。“赣胜”轮今天人很多，同在火车上一样，也有不少上海青年是归队的。5点钟起程，9点多钟抵新干。此时开始下小雨。事情很巧，恰有养路队卡车前往潭丘，我们就搭此车于11点左右到达新街上。（票价照旧0.55元）虽然刚到新干就打电话通知队里同学下午到新街上来接，但未曾料到事情太顺利了，中午之前就到新街上了。大家决定，先让费、刘、章……返队，我和宋、郭留在新街上看行李。谁知他们（刘、费）吃了午饭和陆、屠拖着板车到2点多钟才到。我们三人仅各吃了一两饼干。此刻雨下大了，没有办法，只得出发。道路泥泞，到处积水，用了三个多小时，到5点多钟才回到云庄。板车是由陆、费、刘、郭和我五个人拉的。到家已淋湿了，又冷又饿。马上吃了四两饭（饭粥各半）。

离开云庄已有80天了。这儿的变化可谓大矣，一言难尽。

【忆与议】

平心而论，在当年上海知青到外地务农的地点中，江西新干云庄实在算不上遥远，今天上午离开上海火车站，明天下午就可以到“接受再教育”的“第二故乡”了。如按现在的网络地图测距，两地之间不过八九百公里。若自驾车，当天能就到。这在四十年前绝对是“一枕黄粱”。

日记里“时隔80天，变化可谓大”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查证。从字里行间，如“吃了四两饭（饭粥各半）”可以看出，云庄村的知青已经实现三个班“大联合”、办起了“大食堂”，并已投入运转。至于创办的经过已经没有什么记录了，只留有少数口头传说。

那年2月6日过春节，节后即陆续有人离沪，到3月20日我回村时，绝大多数插友已经回到村里。“大食堂”就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逐步运作起来（从后来的日记中看到，据说是3月中正式开张的）。以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个班都是“自顾自”，每天每班留一个人在家，“轮流值日”，搞烧饭等“班务”，现在则变成了“专职”——协商确定两个人，每天为大家做饭、种菜，又“为生产队集体增加了一个劳动力”，而做饭种菜的两位不可能到生产队记工分，所以由知青插友分摊工分“养活”。这是和农村农民的生活“接轨”了——不管是劳动力还是家庭主妇，无论是常年在家从事家务，还是每天早上在家打点一天的家务，或者临时发生的家务，只要不是直接“为集体做贡献”，必定没有工分！这正是知青“接受再教育”成为“新农民”深刻而关键的一步。

当年“大食堂”有“管理委员会”，还特地去买了空白的饭票，面值有一两、二两、五两等几种，盖上负责食堂管理的插友老沙的私章，即属有效。

1970. 3.21 星期六 阴雨

今天睡到九点钟才起身。19号晚上仅在轮船上打了会儿瞌睡，20号下午又是“拼了全力”，人十分疲乏。早饭吃了2两，中饭3两，晚饭2两。下午冬生来装灯。乘此机会将代买电线交给了他。

【忆与议】

云庄村在1970-2-12开始水力发电，也算是山村亮灯了。但是，相关的电线、电灯泡等材料在县城里都很难买到，就要求知青在回沪期间代为采购。

1970. 3.22 星期日 阴

今天出了全工。早工作田塍。上午和下午作缺。两个多月不曾劳动，故今天一天下来觉得腰酸背痛。

早饭3两，中饭4两，晚饭3两。

午后及晚饭后应潘之要求刻了一张蜡纸，内容是文艺演唱材料。

【忆与议】

有趣的是，我在日记里连续两天记录了自己一日三餐的饭量。当时还不是农忙时节，所以一天不过一斤左右。我印象极深的是有一年的“双抢”，每餐都是七两、八两，说得上是一生中饭量最大的时候。

日记中的“作田塍”，详见《从修圳说起》。“作缺”一事在工分册上不常见到，是一项工作量不很大、但很重要的农活。当地是山区梯田，田间的水全部采用自上而下的自流灌溉方式，从来不需要水车之类的工具，因此，控制每块田的水位是一个“系统工程”。每块田都有一个“缺”，也就是该田块较低一侧的田埂上有一个一尺来宽的缺口，这是控制该田块日常水位的重要“阀门”。尽管通常每次进水之后只要简单地铲来一块草皮、加上一些烂泥就可以做成“阀门芯”、关闭“阀门”了，但这个“阀门”关系到一年里水稻生长的需要和收成好坏，“阀门座”不能有漏水等隐患。日记里整整一天“作缺”，想不起到底是为什么？

1970. 3.23 星期一 阴

今天仅出了一个早工，仍是作田塍。今天比昨天冷，两脚冻得通红，但是终究是克服了艰难，坚持到收工。今天轮到郭、刘和我（第8组）挑水。我在早饭后和上午共挑了三担。感觉很累。

【忆与议】

无意之中看到日记中留下了分组挑水的记录。当时为了防止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对三十个知青作了分组，值日挑水。食堂里有一只大木桶，倒圆台形，上口直径大约90厘米，高度大约80厘米，可以存放七八担水。当年的食堂到水井，单程距离是300步，这个距离不大有插友还记得，我是在那些寂寞难耐的日子里轮到挑水时，为解闷而一次次点步数，久而久之把这段路记熟了——从食堂出门左拐北去，到生产队的牛栏边，是第一个100步；右拐向东偏北，到村子的边缘，是第二个100步；向东北方向继续沿着一条田间石板小道，略带一些下坡和几个拐弯，就到了井边，这是第三个100步。第一年分班烧饭时，最多一天要挑七八担水；办起“大食堂”以后“轮值挑水”时，通常是一口气三个来回，连续挑三担满满100斤的水回来。翻阅日记，兀然看到，1970- -，我曾经有过一次连续五担的记录。见此不免惊愕，当时竟能肩负百斤重担而“大步流星”“一气呵成”，如今着实难以置信。

（11）激情重燃的片刻

也许那年春节在上海休整了一段时间，被“一月革命发源地”的氛围再一次点燃了近乎熄灭的激情？1970-3-20回村以后的若干天里，在日记里留下了激情重燃的痕迹。

1970. 3.24 星期二 阴雨

今天出了全工。早工修坎，上下午作田塍。

费今晚与徐谈了一次。谈毕，与刘和我交换了一下。明或后天我们再好好聚会一次。费说，要认真吸取去年失

败的教训。他说，薛先生在谈到此事时说，人生不能老是悔恨，若干次后，悔就会变成灰。从此再也鼓不起干劲来了。我想这是十分对的。我现在可以说是灰的，丧气，精神不振。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很好地找出来，并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天劳动的结果，感到十分劳累，右侧腰部感到很酸。这是一个教训，以后回沪时间不能太长。

1970. 3.25 星期三 阴雨

今天同昨，出了全工，内容也一样。只是阴雨绵绵，给行动带来很大不便。

今天有一件事很有教益。下午出工时，队长未关照带耙。屠、刘、郭和我四人不知。等到在牛栏里上好肥后，几个社员走过，才知道此事，当时我差一点马上倒掉。但刘等三同学说“做件好事！”挑起就走。我才跟了上去。差一点倒掉，正是我头脑中私心杂念的一闪念。为什么要倒掉？是怕不吃亏，怕不好走路，怕挑担。试问，如果连这一点点事都不愿干，还谈得上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吗？道路泥泞、道滑，就愁怕了，这样怎么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一辈子走革命道路呢？如果这四五十斤的轻担都不愿挑，怎么能挑起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任？如果连这点小风小雨都受不了，又怎么能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呢？

……晚上，张、陆、沙、费等在我们宿舍就队里一打三反议论得很热烈。到十点钟熄灯为止。

早上吃瘪子团（米粉），晚上吃豆渣饼。今天伙食大大改善。

【忆与议】

在多年“正统”教育的气氛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第一年苦涩现实中残留下来的“革命积极性”得以“绝处逢生”了。上面这样的日记在当年是很典型的，无限上纲、胡乱上纲，越是“自虐”越是革命，愈是“自残”愈显坚决。

关于“一打三反”，系指按照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开展的运动，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现在网络上“百度百科”的“一打三反”http://baike.baidu.com/view/3407207.html?wtp=tt有上述三个文件的全文。该词条认为——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死刑的决定，原本应该在最高法院，但为了在短期内达到规模，杀人不够，所以将杀人的权利下放到省一级。省一级只要把杀人人数报到中央备案就可以了。然后省一级将权利进一步下放，一步步地下放下去，县一级都有权利宣布执行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完全是数字的任务。

所以，这是1969年九大以后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是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新高潮。如今在文革史研究中对“一打三反”的评价涉及某些敏感的话题。

1970. 3.26 星期四 阴

早工是送肥。路非常之滑。上午没有出工，本来准备补裤子，但因为找这找那，整理衣物，花了半天，未能补成。下午，队里召开“云庄大队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AYX大会”。午饭后，我就去写标语，直至开会。会开了两个钟头，气氛非常高，效果也较好。这当中知识青年出力不少。

原来以为带来的单管机不会响，昨晚无意中听到了它发出的声音。今天上午装了根天线，接在宋的天线上，效果大大地改良。

近闻大食堂即将发生“菜荒”，我决定把所带的咸鱼、菜干交给食堂。但沙说要“折价收买”。晚饭前、后补完了裤子。

【忆与议】

日记中的“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大会”就是当年“一打三反”的具体表现。至于“气氛高、效果好”也是当时的套话。不记得AXY到底是地主还是富农，反正是“黑五类”，加上人缘较差，又爱发牢骚，所以就成为“一打三反”的对象。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于他并没有什么“反革命行为”的“滔天罪行”，所以开完批斗会以后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惩处。

这里说到的单管机，是那年1-11在上海“淘旧货”买到的，见《1970日记选（4）当年“影迷”的70-1行踪》。3-20回村后一时没有“投入运行”，因为还书生气地以为一定要有正规的铜质天线才能帮助收音。后来很快“实践出真知”，貌不惊人的细铁丝也完全可以当天线，所以最简单的单管半导体收音机也就把外面的大千世界与偏居一隅的小山沟联系起来了，参见《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

1970. 3.27 星期五 阴

昨晚9点多钟入睡，一夜睡得很不舒服，早上微有感冒。人很倦，故再睡到七点三刻才起身。今天出工内容都是挑，或挑粪，或挑土砖，或挑瓦片。男生均惧路滑难行而未出工。

1970. 3.28 星期六 晴转阴雨

天气转晴，气温显著升高。昨天晚上睡得较好，今天早上早工未出，多睡了一会儿。上午和下午都出工了。在牛门口及长坑仔和榨边作田塍。……劳动一天有一点体会。如果今天害怕路滑而拒绝、放弃体力劳动的锻炼，那么明天就可能滑到帝修反所期望于中国第二代、第三代的反革命道路上去！

今天方才了解到食堂伙食管理委员会的存在及八个成员：沙、陆、徐、张、程、汤、郜、刘。

【忆与议】

前两天还在日记里慷慨激昂地说要“站稳立场”“走革命路”云云，旋即烟消云散，但又卷土重来了。这种没有止境的艰苦锻炼、自我折腾，又怎么可能实现“革命化”、“永不变色”？

知青“大食堂”总共三十个人（1970-4增加了一位“投奔”姐姐的69届“一片红”“插妹”而增加到三十一人）竟然设置了八个人组成的伙食管理委员会！现在看看想想也觉得奇怪，不可思议。

（12）在最基层接受的再教育

从1969年的日记来看，我插队所在的云庄村，最晚从1969-5就出现了“多劳多得”的“计件”工分，当时还只是用于副业生产方面。虽然让知青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当地农民在“多劳多得”方式下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惊人热情，但还是认为是“批资反修”的重要对象（见《知青发起“批资反修”争论》）。及至秋天，在收割晚稻、收摘油茶籽等主业生产中，采用按工分底分规定各人定额的办法，效率明显提高，但又出现只顾完成当天定额指标、早早收工回家而不关心整体收获进度和集体利益的现象（参见《下乡后首次上山“摘木籽”》等文）。然而，这些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当地农民的“落后表现”了，曾经大喊“批资反修”的“五七大军”也卷入其中，数月前的“高度政治觉悟”显然已经淡化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备耕伊始，“计件”工分进一步扩大，使得在最基层插队的知青进一步得到了另类的再教育。

1970. 3.28 星期六 晴转阴雨

天气转晴，气温显著升高。昨天晚上睡得较好，今天早上早工未出，多睡了一会儿。上午和下午都出工了。在牛门口及长坑仔和榨边作田塍。任务是1分8丈，我与宋、郭、屠四人合伙，底分为21.5分，任务为172丈。上午超额2丈，下午超额10丈，全天超额12丈。但活儿挺累人的，加上天气闷热，我是担任抹的工作，几乎没有停歇，汗流浃背。

【忆与议】

日记中记载的“作田塍”，见《从修圳说起》。这样的农活采用“计件方式”、再往后还有愈来愈多的农活采用“计件方式”，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它说明了单纯依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已经在基层农村产生怀疑，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实际状况使讲究实际的基层干部与群众寻求新的出路。像“作田塍”这样的农活，老实本分的农民都知道它是农田基本建设之一，竟然偏偏遭遇没有生产积极性、鼓不起干劲来的窘境，于是开始了丈量田埂长度这种史无前例的促进方法。这不是很值得深思吗？

这些事情在时过境迁以后的今天，在我脑海中还会显现出当年“作田塍”时，有“丈量员”手持手指粗细的一

丈长的竹子（合3.3米），在田间跑个不停，丈量每个“组合”（一般是四五个人临时组成一个作业小组）完成的工作量。幸亏度量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竹梢或竹尾在水汪汪的泥巴上轻轻一点即可，“丈量员”马不停蹄在田间奔跑，还要小心提防在“水泥”田埂上滑倒。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似乎不值一提。但是，从当年日记的点滴记载里，可以看到那时候人们对天上掉下来的“精神至上”的乌托邦理想的认识是如何在实践中一步步地发生变化的。

1970. 3.29 星期日 阴雨

由于昨天的劳累，一夜睡得很香。今天也未出工，一方面是由于身体上需要休息接力，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心不在焉，因为今天是弟弟离沪赴赣的日子。自从他面临毕业分配，尤其是他正式接到通知被批准参加江西生产建设兵团以后，我一直为他担心。一是他思想上能否过硬，二是他身体上能否适应。

上午听[下放干部]周讲，公社109名下放干部除18名外，其余的在前几天都委任了职务。我大队，吴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聂任公社拖拉机站副主任，周任我队科技小组副组长，黄做赤脚医生，徐任三队副队长，金任一队助理会计，曾任二队副队长。赖历史上有问题，是汪记国民党党员，做过维持会长。孙直至最近还在犯错误，故后两人属全公社的“18名”之中。

晚上食堂管理委员会开会，争论激烈。

【忆与议】

在那个年代里下放干部也是折腾得够呛！在1969日记选中曾经记载了“五七大军”中“两大主力”——知识青年、下放干部——之间的“恩恩怨怨”（见《知青如此插队，干部如此插班》等文）。

至于下放干部在生产队的“任职”，与1969-12-17日记里的“初步说法”有不小变化（参见《亲历“新的大跃进”（续完）》），“18名”入“另册”更体现了当年“阶级路线”“阶级斗争”的特色。

1970. 3.30 星期一 阴雨

清晨下起雨来，雨量较大，床上多处漏水，4点多钟醒来，好久未能入睡。直到7:30方才起身。早饭后挪动了一下床的位置。今天全天下雨，感觉沉闷。

晚饭后，三个班的同学在食堂开会，讨论并选举了云庄三队五七大军领导班子成员，报大队革委会批准。成员共三人：徐、沙、桂。另加两个贫下中农共五人组成云庄五七大军领导班子。

会后，沙、徐、李、刘、费和我聚在一块交谈到11:15。在这两个小时中，我几乎是一言未发，但是心理是极

其矛盾、痛苦的。

据费说，[下放干部]吴讲，江西今年要完成一条从分宜到赣州的铁路，另外还要建设一条吉安—？的铁路。

【忆与议】

那一天我“心里是极其矛盾、痛苦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已无记忆。但那些年我一言不发、寡言少语的时候是很多的。这是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中“炼成”的。

那年省里雄心勃勃要依靠本省力量建设铁路，更因其是“井冈山铁路”愈加煊赫一时，结果是一事无成、劳民伤财。据当时传出的消息说，关键是当时省里掌握的技术满足不了铁路钢轨的要求，所以根本就无法铺轨，铁路泡沫也就此破碎。江西省境内纵贯南北的铁路线直到九十年代“京九大动脉”建成以后才得以圆梦。据说，七十年代初几乎是无偿征用的民工高速度筑就的铁路路基，时至今日还在默默地显示着极左路线下“第二次大跃进”“人海战术”“大兵团作战”等等“丰功伟绩”。

1970. 3.31 星期二阴雨

雨量较大，到今天上午才渐渐减小。昨晚睡得很熟，一觉到2:00醒来，马上又睡着了，直到7点多钟方才醒来，是来此之后睏得最好的一次。

今天仍未出工。队里上午更有一部分人不开工。晚上班里开了一次会，改选了班领导，由刘、陆、李三人组成领导班子。另外讨论了一下班内一些事情。

宋昨晚在曾家陂过夜，今午方回来。据他说，在潭丘公社红旗大队上海青年中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该犯书写了大量反动日记，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下乡上山运动，该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忆与议】

翻阅1970年的日记，三个班的“大食堂”是办起来了，各种各样的领导班子也作了不少调整，但“政治学习”却大为减少了，毕竟一年多的历练使知青逐步走向实在，现实赋予知青一种另类的再教育。当然大环境依然如故，知青中居然抓出了“现行反革命”，而且源于“反动日记”！幸好这种“思想犯”“文字狱”没有蔓延到我们那儿。



【插队云庄】之十一：1970日记选议（4--5月）

（13）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

那年3月下旬回生产队以后有过短暂的“激情重燃”，及至4月，更出现了意料不到的事情。

1970. 4. 1 星期三 雨转阴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今天是一周年了。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九大指引的航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社论。应该说，在九大召开以来的一年中，我确实没有多大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在后退。我应该从中吸取教益，振奋斗志，在新的一年中，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中有所前进。这应该是最起码的要求。刘今天差不多花了一天的功夫对自己进行总结，我想，我也应如此总结一下（以往历次说总结，都未曾见之于行动）。

上午整理了书籍，捡出一些准备寄给弟弟。另外按规定给食堂挑了两担水。午后躺了一会儿，开始给家里写信。下午感到很无聊、空虚，实在是浪费时间，白度光阴。五点多钟我们就吃饭了。今天除郭和费外，其余男生均未出工。

晚上各班干部开会讨论明天学习班如何办。会上宣布了三结合科技小组成员，有LX、JL、[下放干部]周、桂和我。这对我是一个意料不到的事。队里已拨给科研小组十亩试验田。这十亩田从耕到收，全由科研小组包干。另外还要搞气象台什么的。日内将正式开始。这无疑是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极好机会啊！

【忆与议】

从网上查到1970-4-1的社论，不禁回想起当年电台广播的“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现在网上某些视频资料再现当年“气宇轩昂”的游行场面、“慷慨激昂”的广播话音，确实具有类乎如今“传销培训”那种致人走火入魔的“神力”，不知道这样的作为在心理学上是什么道理。

当年恰恰就在此等“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宣布我成为生产队科研小组成员！实在

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问题是，我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知识，却要我搞科研！使我不知所措，惶惶然，唯有勤勤恳恳地干活、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听指挥吧。

1970. 4. 2 星期四 晴

今天从早到晚办了一天学习班。内容是落实中央三个文件，狠抓五七大军中的阶级斗争。主要目标是×××，但他的态度不好。△△△主动承认了自己偷窃班里的公款、粮票一事，并作了一番“深刻”的检查，但其他问题没有坦白。学习班将于明后天晚上继续进行。△△△晚饭后承认了自己与半导体失窃一事有关。

中午，食堂吃了一顿糯米饭。

【忆与议】

日记中“落实中央三个文件”，正是指当年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尚方宝剑”——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现在网络上“百度百科”的“一打三反”中有上述三个文件的全文。我们那儿把知青也列为运动对象，知青中确实有一些手脚不干净的事情，恰逢“阶级斗争”的风头上，实在恐怖。幸好我们大队没有发生无限上纲的杯具。

1970. 4. 3 星期五 晴

不知怎么搞的，脚底一处红肿灌脓，疼痛，行走不便，故没有出工。午饭后……3点半左右被老周叫去打扫科研小组“办公处”，五点多钟结束。据老周说，桂、周和我将搬到那儿去睡觉。吃饭大概也要另起炉灶了。“办公处”是在原BY家里。（此新屋系BY贪污退赔，作700元给队里了）。目前小组仅一张方桌、二条长凳。队里拨下了13坵田。小组内应有良种培育、气象预报等。这是老胡中午对我说的。

昨天晚上，支书说，今后林场、猪场概与队里无关，故费与黄不必参加五七大军的会议。今后，若不经大队和林场同意，费不能继续下山了。

【忆与议】

我始终不知道当年“科研小组”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看来也不过是“起蓬头”而已。组员LX、JL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正儿八经的科研就说不上了；两个下放干部也不是从事农业科研的；知青更是两眼一抹黑，刚刚知道一些基本农活而已，就要“一步登天”？！既没有恶补基本知识的机会，也没听说有具体的科研计划，头一件大事是撑起门面——啼笑皆非的“办公处”。至于把BY的新建房收归队有，作为“办公处”，是生产队干部BY的“贪污退赔”，这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新房子也物归原主了。

那年在大力发展林业副业等等的口号下，一批林场、猪场犹如“雨后春笋”。知青最关心的是，被安排去了山上林场的知青，未经同意不能下山！当地农民尚能回村里与自己家眷团聚呢！实在有画地为牢的恐怖感，理所当然遭到知青抵制，那几位知青根本没有理会那些莫名规定，照旧隔三差五参加知青的各种活动，让那些规定最终无声无息地化为乌有了。看来试图用军营化方式管理尚处于原始状态的农业生产是注定失败的。大跃进如此，五七指示绘就的“蓝图”也是如此。

1970. 4. 4 星期六 晴

早工没有出。上午挑肥，下午（足耒）秧田。都比较轻松。

我是不大愿意搬到原来BY家、现在科研小组所在地去住的。可是[下放干部]老周说，住在一起是最起码的条件，是否在一起吃随我们的便。桂也没有坚决地反对，于是在中午搬了床。这真正是只搬一只床，其他东西仍留在楼上。搬过去睡觉，比在楼上要寂寞得多，而听不到半导体，则是万分遗憾的事。

【忆与议】

科研小组也要实行“同吃同住”，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但还是随了大流。因为当时流行的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其实，这种注重形式的做法很快就付之东流，仅仅十天就结束了！后详。

1970. 4. 5星期日多云转阴

今天出工一天，觉得非常疲劳。早工是挑瓦两担，掮木条一次。从上午开始，科研小组正式“开张”。今天仅周副组长、桂和我三人。挑土砖灰到田里，上午各挑7担，下于1号田。下午结束前周因要烧饭，提前收工，挑5担，我俩挑各7担。1号田共下肥30担，2号田下肥8担，5号田2担。全天共40担。

1970. 4. 6 星期一 阴转雨早工挑塘泥。我和桂各挑4担。其中2号田6担，？号田2担，共8担。上午挑塘泥，还是三个“上海人”。除周挑7担外，我俩各挑8担。其中8号田3担，3号田12担，4号田5担，6号田3担，共23担。下午继续送肥。第一担是塘泥，以后仍挑土砖。因下雨、路滑等缘故，下午只挑了6担（老周5担）。其中4号田9担，5号田8担，共17担。全天共48担。

据老周说，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所在鄱阳湖畔是血吸虫病流行地区。

1970. 4. 7 星期二 雨转阴

前几天劳动，使我很疲劳，身体也很虚，挑担时，常常是满头大汗，汗如雨下，再加上今天桂、周都去公社开

会，剩我一人，所以早工没有出。昨晚还在同队里商量把我班的猪卖给猪场，可是到今天早上突然发现死去了。据诊断，是猪瘟。猪既死，也无法叫它起死回生了。早饭后，我班都未出工，杀猪。我帮食堂烧火。猪肉一部分卖给社员，大部分是给食堂，0.65元/斤。

刘今天参加了公社召开的春耕生产誓师大会。晚上队里也开会传达了大会精神，主要是专区五年计划。费今晚下山。他们林业队工分全部在底分上加一成。今年仍在小队核算工分价值，明年起林业队成为独立的核算单位。5月开始修山。

【忆与议】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如何有关科研的基本知识，但从书本报刊上看到的科研介绍中，还是知道单单埋头干活是不够的，当年我的日记总体上是“无心插柳”，但也有例外的“有意栽花”——确实是刻意把“科研小组”每天的具体活动记录下来，目的是留下原始数据，因为我发现没有人收集这些资料。不过，那个“科研小组”最终还是昙花一现，后详。

（14）科研怎么搞？“随便你们”

虽然作为一个念到初二年级就被迫辍学的识字青年，没有经历过任何专业学习和培训，一旦“委以重任”参加“科研小组”，还是想认真干活、虚心学习吧。可是，事情的发展实在出乎意料。

1970. 4. 8 星期三 晴

早工挑猪粪。我和桂各挑4担，5号田4担，6号田4担，共8担。

上午照例送肥。桂不再参加科研小组的送肥，而回到自己组里去了。他昨天对刘说，过几天他搬出来住了。前几日他也几次对我说，过几天准备退出小组。我征求老周的意见。老周说，等老胡回来后再说。我本来也打算回组，但最后还是采纳了刘的意见：一个人去挑！上午共挑了8担，其中6号田6担，9号田2担。下午还是一个人“唱独角戏”，9号田1担，6号田1担，10号田5担，均猪栏粪。休息以后，挑塘泥5担，下于11号田。共12担。全天共计28担。

下午出工时，恰遇支书，我问他“下午是否仍给试验田送肥？”他说“随便你们嘛”。下午他就在试验田附近拖泥船。

晚上基干民兵开会，评五好战士。反正评来选去还是那么几个。睡觉前，桂说，日内将床搬回宿舍去。这是我也赞成的。他还说，以后试验田活计干完后，就回组劳动。

【忆与议】

当时为了解决“出工不出力”的难题，生产队对送肥制定了指标，完成了指标即可回家，增加了村民自由活动的余地，受到了大家欢迎。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其中主要的一点是知青“大食堂”有每月每人交柴的指标，如果早早完成生产队的劳动指标，就可以去砍柴，免得以后砍柴占用出工时间而少挣工分。这是插队知青面对生活的现实不能不考虑的实际问题，而那些空洞的“热情、理想、奋斗”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从4-1宣布“科研小组”成立，4-3小组“办公处”开张，4-5小组活动开始，一直只有三个“上海人”（两个是上海知青，一个是原籍上海的本县下放干部）在忙活，都没有农业生产知识，能忙活些什么呢？而作为“科研小组”成员的干部LX、老农JL则从未在“小组”中露过一次面。支书那句回答：“随便你们嘛”，使我大惑不解。

1970. 4. 9 星期四 阴雨

半夜起下起倾盆大雨，终日未止。早上送肥三担。我和桂仍往试验田送。今天是11号田，6担塘泥。早工结束，身上被雨淋湿百分之五十以上。故上、下午工均未出。上午，先换去湿衣服，然后与刘、沙玩扑克，直至中午。午饭后，想写信，但心思集中不到这上面来。近三点钟，徐召集未出工的同学开会，商量了一些有关大食堂的事情。会开到五点钟结束。晚上也没什么事。八点半，听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后就去睡觉了。睡在科研组很枯燥，又不方便。

【忆与议】

那些年无聊的时候最常用的解闷方式是玩扑克，虽然自己每每觉得是虚度光阴，但又不想鹤立鸡群，还是追随大流吧。此种心情是很痛苦的。所以到1975年“病退”回沪以后，我决计与扑克绝交，从此再也没有玩过一回。

1970. 4.10 星期五 阴雨

大雨一直不止。早工送肥4担。我和桂仍送试验田。7号田，6担塘泥，2担牛栏粪，共8担。

近两天来，我对科研小组似乎是越来越失去信心了，本来劲道很足，自8号后，我越想越馁气了。开始我的信心尚大，决心坚持下去。后来，支书说“随你们的便”，就开始有些泄气了。昨天以来，更觉得“没味道”了。而队里对科研小组也太缺乏关心与领导了。怎么办呢？不知其所以然也！

【忆与议】

在“科研小组”开始活动以后，我望眼欲穿的是希望能够恶补农业生产科研知识，因为我不懂生产，也不懂科研，满以为干部和老农已有安排，我会在努力劳动的同时学习做好科研方面的事情。不料，支书如此回答，实在大

失所望。如今想来，也实在怪不得支书，他以及其他干部和下放干部都是按照上级命令办事，对于科研也实在是不知道个所以然，因此。我问支书也等于白搭。进而言之，那个时候把“科学种田”喊得震天响，实际上是一场“大跃进”式的闹剧罢了，把来不得马虎的科学研究变成了滑稽。

记得我们两三个“上海人”天天往那几块“试验田”里送肥，村民们不屑一顾地说：“我们谁不知道多下肥会增产啊？这也要做试验吗？”我等知青哑口无言，下放干部也当作没听见。村民们说的是真话、实话啊！当时我们所在的云庄一直被批评是“老三百”（意思是亩产一直在三百斤上下徘徊），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肥料，一些山高路远的田块几乎年年无肥可施，无止境的获取却没有必要的投入，显然是亩产无法提高的原因之一。当然还有自然环境条件（如山区的日照、气温、水温等等）对水稻生长和产量的影响，这些都是后来慢慢了解到的一些肤浅知识。但在当年就只强调亩产。

其实，当年的亩产要求也大有“一刀切”之嫌疑。按照《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又称“四十条”。新华网、百度百科等网站上均有全文），对粮食生产有这样的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整个中国都要在十二年之内实现亩产翻一番甚至更多，对偌大区域里各不相同的自然条件，只是轻巧地带过一句话“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不知道这句话是怎么理解执行的，恰恰相反的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了“长江以南要达到亩产一千斤”的口号。当年还把八百斤、一千斤的亩产指标形象化地称为“过淮河”“跨长江”。

结果呢？时间已经到了七十年代第一年，我们那儿亩产量还远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五年的要求！更遑论翻一番、“过淮河”“跨长江”了。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样的“三大革命”口号，但事实上是把阶级斗争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生产、科研也不时采取“群众运动”方式。且不说我们知青在农村那么多年，压根儿就没有看到过《纲要》；就是科学实验，在那个时侯也是只知道按照上级通知办就不会错。在我1970-5的日记里，记载了“大队革委、三队支部、民兵的试验田，亩产指标分别是1200、1400、1100”。当然后来没有人提起这样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人追究空话、大话的责任。若无日记，我也早就把它们忘记得一干二净，倒是村民们的真话、实话至今仍在脑海中回旋。

直到八十年代我从事科技工作以后，从切身体会中懂得，科学研究决不是可以一哄而起、采取群众运动乃至大跃进形式的。联想到无疾而终的“科研小组”，农村要发展并不是只有提高亩产量一条路可走，即使是要提高亩产量也不是简单的埋头苦干就能解决问题的。

（15）“科研小组”人去楼空

1970. 4.13 星期一 阴雨转晴

今天出了一天工。内容是翻地，这活儿挺累人的。

1970. 4.14 星期二 晴

由于昨天劳累，所以今天起得较迟，出工一点儿也不知道。上午洗衣服，然后揩了席子。席子发霉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睡在科研组，室内潮湿；其次是因为席子使用至今竟从未揩过一次，去年夏天汗水如今回潮了。同时还晒了被子、棉袄。

中午吃菜饭，一下吃了7两。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扫宿舍。3点左右开始。把床铺从科研组搬了回来。关于搬回原处一事，中午我问了老胡。老胡说，随你们的便，搬回来也可以。老周这下觉得“要自觉地做人”“一个人睡这么多的房子，老俵有意见”。征得老胡同意后，也决定搬回原处。还叫我帮忙哩！他和桂今天再睡一晚，明天也将正式搬出来了。我从4日中午搬进去，到今天下午搬回来，整整睡了十个晚上！

【忆与议】

看到这段日记真有点不可思议，在那些蹉跎岁月里，按照我的“惯例”和“脾性”，我只会跟在别人后头，只知道老实、听话，从来不会“冲锋在前”，怎么会在“科研小组”三个“上海人”当中第一个提出搬离“办公处”、“打回票”了呢？如今实在想不起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即使再勉强维持着，也无济于事，因为那样的“科研”实在没有一点基础，犹如无米之炊，必定难以为继。

1970. 4.15 星期三 晴

今天没有出工。早饭后去牛门口上面山上砍柴。原以为不多，跑去一看真不少，先掮了一捆回来（此时9点），然后取一挑夹与刘再去。又砍了一些，约有近百斤，挑了一半，实在无力到家（因肚子饿），就放在路旁一些，恰刘回来帮我挑，我也把留在路旁用裤带一扎，掮了回来，比较吃力。12点多钟回到家，3个小时。午饭后，稍休息了一下，帮食堂称谷。2点多再去砍柴，5点多回来。先挑了一担回来，约80斤，再去扛了一根，约20斤，计100斤。上午算120斤。全天共计220斤。下午由于体乏，故砍起来就不如上午有劲。以后应注意，不要花一天时间砍柴。这样，本月任务还有30斤。上月还有85斤尚“欠”着哩！一天砍柴使人感到很疲劳。

1970. 4.16 星期四 多云转阴

老周通知我，上午往试验田送土砖灰。可是我感觉非常疲劳，昏沉沉的，只想睡觉，于是就未出工。上午昏沉

沉地睡了半天，仍感不适，浑身发烫，所以下午也未出工。

1970. 4.17 星期五 多云转晴

昨天傍晚起风，半夜下起雷雨，床头漏得很厉害，不能入睡。大约2点左右才进入梦乡，故早工没出。然前天砍柴伤了的元气，至今未复，故一天未出工。

上午开工时遇到老周，他说昨天一个人挑了一天肥，吃力得很。老胡说“他们（指我和桂）不愿搞，就算了”。

1970. 4.18 星期六 阴雨

从上午起，又开始下雨了，真讨厌。身体仍感不适，上午头昏，故仍未出工。

1970. 4.19 星期日 阴雨

今天午前又问了一下老周科研小组一事。他还说那句话，“老胡说‘他们不搞，就算了’”。我真伤心、灰心透了。大队领导对此太不重视了。

【忆与议】

回想当年，我埋怨大队干部不重视科研小组（还不敢公开说出来，仅仅“腹诽”而已），而大队干部无奈于知青不想搞科研（也始终没有面对面的对话），实际上这种互相不满意的原因之一是彼此之间的“互动”有问题——他们指定了“科研小组”成员，就以为可以等待“摘桃子”（成果）了，知青不是有知识的青年吗？而知青以为领导上已经有具体要求与办法，我们照办就是了。总之，彼此以为对方“成竹在胸”。如果再深入一步想想，就可以发现，当年的双方存在一个共同的误区——对科研都没有最基本的认识与知识。

这件事使我想起一件时隔二十年的往事。九十年代初期，云庄村的新一代干部与“大回城”已经十余年的知青联系，说是他们打算在村里搞一些小工厂，我很高兴，没想到会有这么快的变化。他们又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现在村里有许多高中生了，办厂没问题。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误区，提醒他们：文化知识是个基础，办好工厂还离不开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市场知识……，所以要培养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市场人才……。嗣后，有关办厂的事情再未提起，倒是听说村里愈来愈多的青年人成了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据说，凡是考上大学的，村里奖励600元。虽然大学生纷纷飞离了山沟，但山沟里的日子也在慢慢好起来，农业生产的方式也在缓缓变化中。当年“高速、快速”口号下的“大干快上”式的“大折腾”不再出现。

1970. 4.20 星期一 晴

早工是翻地。上午和老周、老胡插秧，试验试验。由于天气不好，秧苗生长缓慢。所以，无论拔秧还是栽禾都非常费力。加上又搞密植，用禾架插秧，速度更慢。上午3个人仅栽2.2分田。

身体很虚。早工翻地不说，就是栽禾时，头上虚汗也滴落不止。下午周、吴去买米了。刘、郭、屠都不准备出工，于是大家都未出工。

【忆与议】

虽然“科研小组”的“办公处”是人去楼空，但活动还暂时持续着。那年春天气温偏低，早稻秧苗生长十分缓慢，也是正常的，却非要“试验”插那些又矮又小的秧，半天时间只栽了人均7厘田（40多平方米），实在笑死人。而为了实现“密植”而“发明”、使用的“禾架”，则的的确确是史无前例的“新农具”，待整理下一步日记时细谈吧。

1970. 4.22星期三阴雨终日下雨，雨量太大，此雨不佳，影响生产，插秧因此延期。然而季节的飞逝却不肯延期或减速呀！早上没有开工。上午三组未开工。二组规定女劳力不准出工，未免有些滑稽。下午开了些工，多半是无事找事，勉强着干。

【忆与议】

在那样的“集体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出工不出力，另一方面是不讲究实际效率的形式主义。

（16）不要不安心，愈加不安心

在我们下乡一周年之际，1969-11初，我们第一次听说了“两年后可以上调”！见《1969日记选·如此传言“动摇军心”》。虽然这样的风波很快平息了，但是就像俗话说的，“有了一就会有二”，仅仅过了四五个月，“军心动摇”就卷土重来。

1970. 4.10 星期五 阴雨

陆在午前回来。这是他们的休假期（每月三天）。不少人对他们民工的生活待遇垂涎欲滴。民工每日伙食费0.60元，同时队里工分照记。

1970. 4.13 星期一 阴雨转晴

队里重评了工分。每个人都增加了若干。我又恢复了6分。不知是什么道理？而郭反而仅5.7分，所以他又“想不通”了。

陆今天早上回大洋洲“新干战备公路指挥部”去了。

【忆与议】

在那个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年代里，除了极少数“苦行僧”式的“真正革命派”之外，芸芸众生还是要面对实际生活的。在“农村集体经济”下拼命干一年仍然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怎么办？当时，征用“民工”是司空见惯的，所以，村民和插队知青都期待着有机会到外面去挣一些“快活钱”（待遇相对好一些的活儿），同时也是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日记中那次修“战备公路”征用“民工”，就可以有每个月三天的休假，还有每天六毛钱的伙食费折合18元/月，再加上生产队给工分，真是了不得的“美差”啊。相形之下，知青即使是评上了6分工分，最高7分，又值几何？即使是达到1968年1.22元/10个工分的最高纪录，也不过一天七八毛。而1969年由于老天不帮忙，收入水平大幅度跌落到0.80元/10个工分，只相当于一年前的六成多！一天出工干活还不及“民工”的一天伙食费补贴。这种冷酷的现实并不是什么热情、口号、精神就能改变的，因而促使大家更加渴望有机会摆脱“靠天吃饭”的境地。

1970. 4.14 星期二 晴

费傍晚下山。前天支书到山上给林业队办了一个学习班，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什么“不准下山”“下山不准带东西”“不参加队里的一切活动”，等等等等，多得很。

1970. 4.15 星期三 晴

公社刘主任来云庄。晚上召集干部开会，十点钟才结束。沙回来传达了一些内容。与我们关系最大的是可能要吃商品粮（公社常委会决定，上报县革会批准）。公社报了15万斤粮票，云庄大队3万斤，但仍不够。

1970. 4.17 星期五 多云转晴

宋今天听BZ说，可能要在上海青年中抽人去工矿了。据说，分宜到赣州的铁路沿线多是工厂。听说樟树至吉安的铁路是系误传。

【忆与议】

接二连三的风言风语——知青可能要吃商品粮了，知青可能要有人进工矿了……，把知青的心搅活了。因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干部们说的，他们是不会乱说乱传的啊。虽然这些风言风语又像数月前那样没有了下文，但是知青的心思在连续的波动之下是越来越难以平静了。至于这不准那不许的“清规戒律”连村民也管不了，知青就更加当做耳边风了。这种五十年代就试图在“集体化经济”的同时实行“军营化管理”的乌托邦，直到八十年代终于彻底垮台。

1970. 4.19 星期日 阴雨

中午，我班男生“聚餐”。费将其带来的一瓶“五香带鱼”和一瓶“油焖大头菜”拿出来吃了。

晚饭后，食堂开会，由刘、李、徐传达了公社五七大军讲用会精神，赵作为我公社6个代表之一、全县34个代表之一，将在5月上旬去专区开讲用会（比例是1%）。

闲谈时，大家都认为，此次公社五七大军讲用会强调“政治可靠”之后，在我们基层也将照此办理。这是必然趋势。事实上是将注重出身。

【忆与议】

生活上的清贫、艰苦并不是知青生活的全部，还有可怕的“出身”幽灵，犹如“紧箍咒”！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家属也为父辈甚至祖辈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从小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说充满歧视和不公的世界，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险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过程。（参阅羊城晚报《〈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回忆》）

1970. 4.23 星期四 晴

刘带回这么一条消息：专区有文件明确指出，知识青年二年后另行安排，但“五大员”（即教员、猪场、林场等）不在内。是四个面向，“面向工矿、军垦、边疆、基层（文教财贸单位）”。21号晚，老胡在传达公社讲用会传达的专区政委的讲话时就流露了一些，如“两三年后”、“不要不安心”等等，有一点是毫无二致的，即“国家分配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讨价还价”。

【忆与议】

看到这些记载，感叹不已。不知道当年的专区文件是否还在？何日可以解密？如此“动摇军心”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早在1968-11就出现了“异动”！参见1969日记选的《如此传言“动摇军心”》。尽管如今有人在网上收集并发布了众多资料，力图证明大规模的强制性的知青上山下乡出自于伟大领袖的决策，又由敬爱的伟人亲自筹划，还充满对一代青年的无限期望，云云云云。事实上，围绕着知青上山下乡，自上而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思想”“一致行动”的，在各地、在低层，对如此规模、如此做法的上山下乡，有着不同的想法与做法，

层出不穷的知青“另行安排”是值得研究的。

1970. 4.24 星期五 晴

早饭后，老胡叫我去栽禾，我说我们搞芋头地，他说“你就去搞吧！”我乘机问了试验田一事，他说“怎么不搞呢？现在田还没搞好。”说实话，自昨晚听刘那么一说之后，确实不大想搞下去了。

【忆与议】

接踵而至且仿佛是近在眼前的“另行安排”消息，能让知青安心下来吗？而我对“科研小组”也就从先前的期望转变而成的失望，更增加了“敬而远之”！毕竟，“跳出农门”才是“硬道理”。

（17）无可奈何的种稻“缺粮户”

下乡之后的第二个春天来到时，我们对那些绵延了千百年的原始种植方式并没有多少新奇感了，倒是“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让世代种稻为生的农民也觉得目瞪口呆、无可奈何了。

1970. 4.24 星期五 晴

一早五点多钟，社员们就去新街上担谷，我们都是“缺粮户”了。部分人去四、八班芋头地开畦。我班男生全部去本班菜园，砍了园子里的一棵树，以利今后蔬菜生长和搭南瓜棚。
上午全体出动搞四班和八班芋头地。桂叫我和他一起到旁边山上砍柴搭蓬，几乎砍了半天，连桂都连声叫累，我更不谈了。午饭后，又是几乎全体出动，去新街上挑米，平均每人负重在60—80斤之间。近2点到新街上，2点15分左右出发回家。我与刘、郭、屠四人同行。在大富坪、小坑、香山亭共休息了三次。回来后疲劳不已。大约4点回到云庄。

中午吃面条，每人5两。下午新街上回来后，吃了“点心”面泡饭3两。晚上又吃了三两饭，全天共1斤5两，创最高纪录。7点1刻左右吃晚饭，闲扯一会。再抄了一张三组的挑战书，已是9点了。

【忆与议】

春插大忙在即，却迎来了一番体力大折腾。由于1969年初夏遭遇山洪暴发，无力胜天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粮食收成大减的事实，可是，原定交纳的粮食却是一点不能少！夏季收获的早稻和秋季收获的晚稻都源源不断地送到公社粮站，完成交粮指标是“硬任务”。结果，到了1970年开春，就发生了生产队粮库底朝天、稻谷告罄的局面！种粮户成了缺粮户，稻农无谷食用，实在非同小可。幸好，在此关头由有关上级部门协调，农民和知青都可以去粮站挑

粮。于是就有了浩浩荡荡的挑粮队伍，但不是那个年代常见诸于报章的“喜送公粮”，粮食流动方向是逆向的。

尽管解决了吃粮危机，但仍然是怨声载道——为什么在交粮时节以完成任务为唯一目标、而不考虑生产队仓库里应该保证留足存粮维持到夏季新谷进库？再者，当初交粮的时候，因为有1968-11我们知青插队落户“带来”的意外惊喜——两三万元安置费，被生产大队挪用而购置了一辆“丰收27”型轮式拖拉机，虽然交纳粮食的地点由五里路外的拿埠改到了十多里外的新街上，但有拖拉机运输毕竟大大缓解了交粮的劳动强度。可是，到了春天去粮站挑回粮食的时候，竟然不能用拖拉机运输了，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一起上阵，往返近三十里路，还没有一分一厘的工分！如此折腾丢失人心是不言而喻的。至于农民与知青的待遇也有差别，前者是挑谷，后者是挑米，个中原因一时想不起来。

日记里又有抄写挑战书这样的话，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每逢农忙来临总有这类“挑战”“应战”之举，然而精神鼓励法的作用毕竟不是万能药、也不是长效药。

1970. 4.25 星期六 晴

早工是拔秧。昨日的疲劳尚未恢复，但咬咬牙关也就挺过来了。只是左边腰部隐隐作痛，不知何因。眼睛附近也微有浮肿。据说，近日皆是如此！桂脸和脚肿得很厉害，不知什么缘故。刘也脸肿。

早饭后，给上次费带下来的一根DU树棍子去皮，兴趣甚浓。忽感觉时间不对，该出工了，赶快下去一瞧，人影儿都没了。再一问，人家早就出工了。屠、郭两人在搞禾架，同样没了时间。下午扯秧。收工后到大仓库“争”得架子一只。从这几天情况看来，不少人对架子表示反对，一组反对得最厉害，该组上海青年也是先锋。一些大队干部也反对用架子。

晚上去上了工分。后听半导体“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原有的电池，因几次开了整夜（听着听着睡着了，开了一夜！）电量耗去不少，改用新电池，增加收听效果。8点半，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4月24日）。新闻公报传来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还传来了人造卫星发回的歌颂毛主席的“东方红”乐曲录音和遥测信号录音。我们要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忆与议】

日记中出现的“禾架”或曰“架子”，可谓真正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这是为确保1970年开始推行的“密植”而物化的行政命令和具体化的手段。

在1970年以前，我们那儿是沿袭了多少年的“广种薄收”。原因在于田多人少。现在没有找到当年云庄村劳动力的数据，只有若干记忆：（1）全村范围有一千五多百亩水稻田，（2）老老少少的劳动力人均10亩，（3）假如在10天里完成春插，就是每人每天1亩。实际上，不可能所有的劳动力都是插秧，还有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必不可少

的犁田耙田等劳作，所以10天完成春插是不可能的。后来好多年的实际情况也是15天左右。此中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插秧的密度。1970年以前，没有上级对插秧行间距的指令，所以相当宽松，七、八寸是习以为常的，九寸到一尺的也不稀罕，更有达到一尺及以上的！如果是7×8寸的行间距，每亩田约1万株。插秧时通常是一人一行插四株，插秧高手简直可以边插边后退而无需停歇。这样的稀植保证了没有一块田是空白的，这也许是当年不允许有空白田？有待考证。

但是，1970年省里下达命令，实行密植！而且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惊人高度。不记得当时的具体数字是多少，但有一点是我至今没有忘记的，那就是实行密植以后，每人每行必须栽6株！印象中，行间距不低于5×6寸，那么，插秧时每亩达到2万株，较之过去7×8寸时的工作量至少翻了一番！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以往的“广种薄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那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年代，没有可以论理的余地。密植带来的工作量巨大、惊人，自然会遇到抵制。于是就“发明”并强制推广了一种“禾架”或称“架子”，不知道有关文件上的正式“学名”是什么。在杉木、竹子丰茂的云庄，赶制这种“禾架”也不困难，四根约一米长、近一寸宽、约三四分厚的杉木条，由两对正十字架把它们构成一个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方体架子，然后在四根木条上按密植要求的株距5寸的距离钉上6根竹钉，就成为规范插秧的“尺规”。插秧手每人带一个“禾架”，把这个立方体横卧在田里，有两条边在泥面上，插秧手按照靠近自己身体的那条边上的竹钉插秧，插完一行6株后，翻动“禾架”，“禾架”跃过刚才插下去的那行秧苗，翻过来的那条边上的竹钉则为插秧手指示了新的一行插秧的位置与秧距；翻动一次的距离就是“禾架”截面的对角线距离，也就是密植要求的行距6寸。

这样的“尺规”不复杂，造价低廉，份量也很轻，可是对栽种了千百年水稻的稻农来说却是破天荒第一遭！难道我们都不会插秧了？！出现不同程度的抵制也很自然，知青中不乏从众的。当时最响亮的反调是，要相信大家的自觉性，“禾架”会影响插秧的速度，不利于按时完成春插任务。这种“禾架”直到知青离开农村的时候还在使用，因为存在行政命令的“高压线”。然而由它“确保”的密植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成本（种谷、劳力等）的成倍提高并没有相应地提高粮食产量。

巧合的是，在推行“禾架”的同时传来了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的好消息。一个国家有了卫星，还有了原子弹氢弹，可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很强大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全面的提高与发展。数十年来再三再四鼓动农业生产“新跃进”，立足于“四脚落地、屁股朝天”（村民对插秧劳作的戏谑语）式的原始状态和行政命令、长官意志，就是很成问题的。知青在这样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别具一格的“再教育”。

（18）第二次参加春插大忙

1970. 4.22 星期三 阴雨

终日下雨，雨量太大，此雨不佳，影响生产，插秧因此延期。然而季节的飞逝却不肯延期或减速呀！

1970. 4.23 星期四 晴

上午栽禾。据李说，昨晚队里开会，贫下中农都有决心、有信心，在15天内栽完禾。我听了以后感觉非常惭愧，我对此次栽禾甚至今年收成是抱什么态度呢？——灰心！这与贫下中农的决心信心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根本上是差了十万八千里！贫下中农对毛主席就是最忠，革命干劲就是最大。相形之下我是显得多么渺小啊！也证明了我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不来不得了；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多！！！

下午仍旧栽禾。晚饭吃面条（三两），加饭一两。下午收工后在七班菜园搞了一阵子，移植刀豆。

晚饭后，根据队里的要求，我班开会讨论了分成两组、刘、沙、宋与徐、李一组，郭、屠、我及潘为一组。

【忆与议】

记得那年春天的回暖姗姗来迟，早稻秧苗生长缓慢，插秧季节不得不推迟。实在是无力胜天啊！当年我在日记里痛作自我批评，正是在当时的氛围与语境中留下的历史痕迹。

1970. 4.26 星期日 阴转雨

昨天晚上10: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经祖国各地的时间。10:30又广播了它飞经世界各地的时间。故睡得很迟，约11点钟。今天也萎靡不振。脸又有些浮肿，估计是睡眠不足所致。

今天拔了一天秧。中午给架子上加上了竹钉子，准备明天开始参加栽禾。下午收工前约一小时全部去栽禾，感到很累，腰酸得很。下午开始落雨，手臂部分均被雨打湿。而上次换下的脏衣服至今未洗，非常难受。

昨天捉来的四只小猪在食堂“仓库”的“地下室”里开玩笑地呆了一天，今天下午终于出来了；将原四班厨房改作猪栏。

晚上听完联播节目。广播说，人造卫星运行良好，不停顿地播送“东方红”，40”钟播两遍，间隔5”钟发遥测信号10”钟，再隔5”重新开始新的循环。

胡今天开始出工，烧饭由王一人担当。我认为，我们不但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还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

【忆与议】

看到这样的日记，当年情景仿佛重现眼前。那时候对卫星上天一类的大事相当关心，而春插刚开始就脸部浮肿并不完全与睡眠不足有关，连续几天终日弯腰劳作（当地农民戏谑为“屁股朝天、四脚落地”）则会导致常见的“倒肿”现象。

知青“大食堂”建立起来后，差不多一年前建成的知青四班厨房（见《烟熏火燎的几十天到黑咕隆咚的五年》）改成养猪的猪栏，一直到三年半以后的1973年下半年知青屋建成后再一起搬迁新居。而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大食堂”则很快面临一个实际问题：担任“炊事员”的知青不参加“集体的大田生产劳动”，势必会影响个人收入、声誉、前途，因为即使有知青集体给的工分，但毕竟要以生产队评定的工分为依据，而生产队评定工分又以“参加集体劳动的表现”为唯一依据。正是当年这种顺理成章的担忧——长期“脱离生产劳动、脱离贫下中农”一定会产生一连串的不良后果与反应——在“大食堂”开张一个多月的时候就产生了“炊事员危机”。

1970. 4.27 星期一 阴转晴

早工拔秧。上午去栽禾，比较轻快。下午起分成两组，郭、屠和我以及潘跟FX、QX等一组。这一组多是些栽禾强手，如：QX、CS、KS、ZY等等。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下午栽禾时先是用架子，后来架子少、人多，社员渐渐不用它。我和郭也试着徒手栽，还可以！兴致极浓。挺浓的睡意和倦意顿时消失了。可是距收工没多少时间，未能多学。晚上大食堂学习。读了“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9:00才睡觉。

【忆与议】

在一年前的首次参加春插中，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每天服从安排调配，拔秧为主，结果竟然因为插秧少而遭遇扣减工分的厄运。第二年，谢天谢地，终于安排插秧了，而且从此一跃而成为插秧好手，尔后几次春插借助“多劳多得”的“土政策”，名正言顺“捞工分”，成为那些年中少有的几件开心事之一。

日记中，那晚学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一文，那是当年为了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在4-22联合发表的“重要文章”，在4-21日记里有该晚收听广播的记载，还写下了当年的流行语“痛斥了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滔天罪行。每一个中国青年、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一定要完成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万岁！伟大的列宁主义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0. 4.28 星期二 晴

今天比昨天累得多。早工拔秧。上下午仍在榨边栽禾。上午没有用架子，还可以。有几次左右均是社员，只能拼命栽。这样，虽然腰酸得不行，但却可以学点技术。下午，主要是因为上午×栽禾实在要不得，队长让我们三个男生用架子栽。一个大坵之一半由我们包了下来，非常之累，是自农忙以来最累的一天。晚上听半导体至9:00睡

觉。

1970. 4.29 星期三 阴

又出工一天。早上扯秧。上下午在榨边栽禾。

今天继续徒手栽禾。昨天队长就说我“还要得”，今天连长等也说“不错”，是因为横行比较直。但是，应当警惕的是，骄字抬头。有一个很好的教训，非常及时。上午连长刚说我还不错，没多久就栽弯了。这是一个必须牢记的教训。

今天队里杀了猪，每个“脑壳”一斤，故今日伙食大善也。早上黄豆，中午晚上均为肉汤，晚上是红烧肉。

县革会贾主任和公社刘主任今天到云庄检查生产。

【忆与议】

那两天在插秧技术上大长进，应该说其中有“禾架”的一份功劳。插秧的基本要求是“横平竖直”，更高的要求是斜里也成一条线。千百年来练就插秧高手的诀窍是什么？没有人言传身教，只能自己琢磨了。这一年强制推行“禾架”，使我很快发现了徒手插秧的重要诀窍——在插秧的时候，除了注重自己插的一行6株在一直线上，还务必用眼角余光注意自己的一行处于左侧那行线的延长线上，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整体的“横平”。具体操作时的要诀是，一行左起三株一般不会有大问题，越往右端越是关键，尤其最后两株，未必要把自己的身体向右探出去，同时必须用眼角余光看准延长线，才能保证最右端实现“横平”。这在插秧插到腰酸不已的时候，特别重要，腰酸会使得身子难以探出去，势必无法瞄准延长线，最终使最右端的几株歪离延长线，6株也就变成弧线状。这在用“禾架”插秧的时候很快感觉到了这样的要诀。也是徒手插秧时不容易较快摸索出来的经验。

感慨不已的是，在那个年代何其艰苦，因实行密植而成倍增加工作量，但相应的农忙“犒劳”——人均一斤猪肉却依然如旧！

1970. 4.30 星期四 多云

昨晚十点，我们正兴奋地吹着牛皮，忽然徐来通知说，贾主任、刘主任召集干部开会，必须抓紧时间，抢季节，奋战七天，完成春插。明天起打早工，三点钟吹起床哨，并且必须用架子，否则作破坏生产论处。这一消息出来，如同平静湖水中顿时起了轩然大波……。议论到10:30以后方才入睡。

晚上仅睡了四个半小时。三点整吹起了起床哨。人实在想睡啊！但还是爬了起来，睡眼朦胧地来到牛门口扯秧。大约从3:30起，到近7:00才收工回来吃早饭。支书今天早上也和我们一起扯秧。

吃罢早饭仅休息了五分多钟就出工了，在“禾下”栽禾。腰酸发展到了新高峰，简直难以克制。12:30收工吃午饭。午间休息了约半小时，1:30出工，在东边栽禾。腰酸发展到了疼痛阶段。特别是到结束时，更是拼命栽了，两边都是社员快手，逼得我只能拼命。今天到7:30天黑了才收工。全天共出工14小时之多。疲乏之程度乃为一生至今之最！

今天的出工使我有了这么一点切身体会：毛泽东思想是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证！腰酸的时候，我默念着毛主席的光辉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多打粮食，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顿时就有力了，栽起禾就更有劲了。

【忆与议】

当年如此起早摸黑地连续作战实在是一种“疲劳战术”，血肉之躯又能坚持多久？日记里记录的“精神鼓励法”，还是最初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后来（可能是71或72年）上海知青“创造”了登峰造极的集体行动——在腰酸背痛得难以支持的情况下，大家一起边插秧、边唱沪语小调，还想出了把三个知青小组的姓氏分别串连成为一句戏谑语，在腰酸背痛得痛苦万分的时候，三个小组你呼我喊，此起彼伏，彼此呼应，一时间苦中作乐的嬉笑声充满山沟，驱散难熬的疲劳酸痛。恰恰是舍弃了语录和豪言壮语之类。此中的原因恐怕只能用心理学来解释了。

（19）第二次参加春插大忙（续）

1970. 5. 1 星期五 阴转雨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节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要社论《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人民》。社论极其鼓舞人心。

今天2:45就吹起了起床哨。人实在疲倦，没有起床，仅郭、屠两人出工了。6时许收工。早饭后即出工。上午在东边栽禾，完成任务后即收工。11:30，比昨天早些。下午1点多出工，到拿埠口栽禾，7时收工。下午开始落雨，尽管我们回来取了雨具，但衣服仍被打湿了。晚饭后换了全部衣服。罩衫也湿了，只能把棉袄罩衫脱下来代之。

费今天下山。带下两副秧篓。我的篮盘被郭遗失一只，这一来真是及时雨。

【忆与议】

对两报一刊社论一概称为“极其鼓舞人心”是那个失去独立思考的时代屡见不鲜的阿谀之词。

五一节继续劳动而不休息，也许是如今对“法定假日可获三倍加班工资”耳熟能详的青年人难以理解的。在我们这代上山下乡“当事人”中刻骨铭心的则是，当年插队知青较之于兵团知青农场知青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自由散漫”，不像后者有军事化的严格管理，以至于直到现在仍被后者中的不少人羡慕不已。平心而论，二者“各有千秋”。前者若无“自我保护”意识，一味“拼命干革命”，趴下了也没有点滴劳动医疗保障，而家长家庭的负担又会有几多飙升？这是当年不能不面对的现实问题，毕竟是和平时期，轻率地“光荣”有意义吗？

日记里提到的“秧篓”，不知道现今是否还有这样的“专用农具”。这是用山上的细竹子（直径仅有一厘米左右，记忆中是难以“大有作为”的竹子）一剖为二，编织成十分稀疏的篓子，直径大约三四十厘米，高约二三十厘米。当年的拔秧流程是，在秧田里把秧拔起来，洗净根部的泥土，甩干、理齐，用稻草扎成秧把，装入容器，挑至已经耕耙平整就绪的待插秧的稻田。其中所说的容器，一般是“篮盘”，簸箕状、多用途的农具；而“秧篓”属于“专用”性质。长处是自重很轻，估计一只秧篓没有半斤重，而“篮盘”因其厚实耐用而比较沉重；用“秧篓”装秧时十分方便，上百个秧把随手扔进“秧篓”即可，而“篮盘”需要认真装载，否则装不了多少，降低运送效率；再有就是用“秧篓”仿佛竹篮子打水，从水田里“问世”的秧把虽经过甩干动作，但其含水量仍高，使用“秧篓”时，因重力流下的水会很快淌到地上，挑秧的一路上还在不停“减负”。所以，这种其貌不扬的“秧篓”颇受欢迎。我在网上寻觅许久未见近似的照片。如今那里都是用抛秧取代了插秧，具体操作流程与农具就不得而知了。

1970. 5. 2 星期六 雨

4点钟吹了起床哨。因为天雨，DS才延迟了开灯时间。早工在庙下扯秧。6:45左右收工。7:00多出工，拿埠口栽禾。12点多收工。下午1点多出工。7:00多收工，仍在拿埠口栽禾。

1970. 5. 3 星期日 阴有雨

今天出工、收工时间与昨天差不多。支书今天也出工的。上午耙田，下午也栽禾，故下午收工较迟，天黑才收工，到家已完全天黑了。

疲劳已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但应庆幸的是，拿埠口已经全部栽完了。全面、彻底胜利已为期不远了。这几天身体感觉疲劳，脸有时有些浮肿，左腰部甚至感到隐隐作痛。

【忆与议】

在农忙期间，大队干部的举动言行引人关注，这在1969日记中屡有痕迹。这说明了当年的干群关系并不像现在某些人所说所想的那样情同手足、鱼水情深。普通的群众起早贪黑、坚持苦战，实属不易，而作为上下级之间桥梁的大队干部，就成了“钻进风箱的耗子——两头受气”，既不能有违上级指令，又无法得到芸芸百姓的理解，加上

没完没了的学习、会议等等安排，使这些基层干部真正“参加集体劳动”的时间少而又少，与群众之间愈益失去亲密感和共同语言，所以，群众见到他们是敬而远之，装模作样，应付了之。到了农忙时节，对那些干部的参加劳动更是敢怒不敢言，背地里怨气冲天。因为那些干部所到之处“出工早、休息少、收工迟”是毫无疑问的，这对迫切渴望休息的普通群众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血肉之躯怎可视如钢铁机械？插队知青则更多了一层“菜荒之虑”。

1970. 5. 4星期一多云

今天是我陆续第三天打早工了。早上4点起床，在仓库门口扯秧。6:40左右收工。上、下午在牛门口栽禾。人是极度疲乏了。下午又因为右脚划破，行走困难，更使人感到无力。前些日子的干劲，再也鼓不起来了。带来的青川鱼至今晚全部吃完了。然食堂正面临着吃白饭之可能。

晚上沙、刘、费买了一斤葡萄酒。费取出了“五香黄花鱼”。因为社员们说，吃酒能消除疲劳。社员们也不是不累的。近两天来，栽禾速度大大、大大地减慢了。

1970. 5. 5 星期二 阴有雨

早上实在疲乏，除费一人外，其余男生均未打早工。上午7:00出工，在牛门口栽禾。12:30收工。中午休息时间延长了，到1:45左右方才出工。到7点多才收工。下午把牛门口栽完，然后到东面路边栽禾。社员们完全理解我们疲乏极度、极需休息的心情，故对我们未打早工未多表异议。而他们肯定也是很疲乏的。

晚上8点，新干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小分队到云庄宣传演出，9点半结束。刘、沙、费、宋4人今晚又喝酒。宋太吃多了，较狼狈。

这几天传说，大队革委会、党支部、基干民兵等都搞起了自己的试验田。

【忆与议】

虽然这年4月份热闹一时的“科研小组”很快人去楼空、无疾而终（见《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科研怎么搞？“随便你们”》、《“科研小组”人去楼空》），但在我的脑海里犹如“余音绕梁”，难以一下抹去，事过境迁之下还是注意着有关动向。当然，当年动辄“××试验田”，实在都是作秀之为，应付上级检查而已，根本没有半点试验的意味，能够不发生劳民伤财就是上上大吉了。

1970. 5. 6 星期三 阴

昨晚到10点多方才睡觉，所以今天又未打早工，仅费一人去了。上午7点多出工。今天三组“两大主力”在东

边会师了。到1点钟才收工，把东片全部栽完了。

中午没有菜。每人按饭的两数在饭里加上几匙猪油。菜荒终于发生了。

中午未休息多久，1点3刻即出工了。在乌坑栽禾。收工较迟，到家已7点半了。

社员对我们今天未打早工表示了异议。×等人仍认为这是非难我们上海知青，“坚决”表示以后耘禾分组时分到QG一组去。我认为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社员们心情是十分焦虑的，只有赶上季节，才能多打粮食，打击帝修反。他们再三督促我们出工，正说明这儿需要我们！说明这儿正是我们大显身手、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这种情况也正说明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今天发下布票14.9尺，化纤票2尺。

徐今天连走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总认为，这种精神必须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要拿身体和钱当儿戏。

【忆与议】

这一年的春插是我心情较好的一个短时期，因为很快成为公认的插秧好手，使我感到高兴，这对于年轻好胜的青年人是一针强心剂，所以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大堆豪言壮语。如果实事求是地评说那个时候，，应该说，讲究实际的村民面对能够聊以一时解决劳力紧张的知青还是欢迎的，当然，到了收入分配的关键时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情了。这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而空空洞洞的“精神”“理论”失去了决定意义。

日记中提到的知青徐，身患肾炎而坚持劳动，成为一时美谈。之后不久成为云庄大队知青首批入团的新团员之一。

（20）第二次参加春插大忙（续完）

1970. 5. 7 星期四 雨

早工从4点45分开始，6点20分收工。门口扯秧。上午7点1刻出工，12:45收工。下午1:45出工，7:00收工。均在乌坑栽禾。刘白天未出工。屠、郭、潘下午未出工，休息养神。据队长说，还要打4天早工，完成栽禾。

晚上五七大军部分班长参加了干部会议，传达了程政委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忆与议】

我注意到这些日记中留下了云庄村许多小地名，几乎涉及该村所辖1500余亩水田所在的山沟，根据当年农田耕

作与管理中“先近后远”规则，大体上可以回想起那些小地名的远近关系。如果借助于网络上的卫星图（参见《鸟瞰云庄》），还可以把那些小地名逐步标注出来。如果再依靠QQ等交流工具，与有兴趣的同好一起，更有望实现神游云庄的梦想。

1970. 5. 8 星期五 雨转阴

早工从4点45分开始，7点收工。在门口扯秧。上午7:45出工，在乌坑栽禾。昨半夜起下大雨。雨量之大与去年水灾时差不多，幸而时间不长。但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许多已栽下禾的田里灌满了水，一些未栽的也无法栽禾。上午收工回家已12:45了。今天仅费、屠、郭、QX、BH、YS、CS、QF媳妇及我8人，栽了9担。吃过饭后即出工，1:30出工，在旧木坑栽禾，7:00栽完收工。今天下午比较轻松些，主要是今天气氛活泼些。

霉豆腐已全部吃完。晚上是吃胡的鱼。吃白饭的日子即将到了。有人建议去扯笋。但事实上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且很难扯到。在扯笋误工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在买不买菜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

农忙已基本过去了。一则早工越来越晚了，二则妇女大部分今天下午都去扯笋子去了。所以这种打早工可以结束了，打了反而是得不偿失。人疲倦了，工效降低了，近日来社员们栽禾速度已极大降低。

【忆与议】

持续十多天的疲劳战，知青在“人困马乏”的同时又遭遇菜荒，“扯笋”似乎是救急的方法之一。当地山上有一种直径约一厘米左右的细竹子。在《1970日记选（19）第二次参加春插大忙（续）》曾经提到过，用它编织秧篓。平日里在山上捆柴或绑草，这种细竹子唾手可得，把它一剖为二代替绳子。除此以外，就是春季的嫩笋可以食用。虽然平时就地取材十分方便，但真要用它的嫩笋佐餐，又不简单了。之所以叫“扯笋”，就是说它可以像拔秧一样，在山坡上一把一把地“扫荡”，然而它是野生的，不可能像秧田那么就在村子附近，成片地人为种植，所以，不懂得这种细竹子生长的习性喜好，又没有对村子周围山林的熟悉了解，盲无目标地漫山遍野地寻觅成片的细竹林，既累人，更没效果。都是上了年纪的村民尤其是妇女才掌握其中的“诀窍”。

近日与“云庄人”（我在《2009-12-25相逢在网络》中邂逅）在网上QQ聊天的时候说起这种竹子和“扯笋”，这位八〇后也是这样的感受，她说喜欢吃这样的笋，但是不知道哪儿山林里这样的笋多，所以每次上山收获不大。事过卅载，回想当年知青集体户打算“扯笋”度菜荒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在1970年以后直到“大回城”再也没有哪一年重提“扯笋议案”。

1970. 5. 9 星期六 雨

早上非常疲倦，身体也不大舒服。昨晚费给我吃了糖，竟不知其味！所以早工未出。（4点起床哨）

上午先在牛门口拔了一担秧，后去长坑仔栽禾。7点半出工时还出太阳。到近10点时，竟下起倾盆大雨。尽管小潘回家取了雨具，但终究还是淋得湿透。中午12:00回到家，又来了一次全身换。外套只能把前几天淋湿又晾干。但已有霉气的衣服重新穿上。下午大雨未止。没有出工。睡了一觉。大概是连日劳累，一下休息反不能适应，所以，休息后反觉不适些。

陆午后返大洋洲，5点半又折了回来，因新干又遭水灾，公路已不通了。据说照此大雨，云庄水库很危险。这两天已抽人工去采取了措施。

1970. 5.10 星期日 晴

4:45吹响了起床哨，在门口扯秧。上午在小塘坑栽禾。下午我们三组奋战小塘坑，到天黑终于全部栽完。大约7点半才回到家。

昨晚水库很危险。如果下雨的话就可能发生危险事故。大队干部守夜。大坝上已新挖了一条溢洪道。

1970. 5.11 星期一 多云

今天没有打早工。5点半钟出早工，在井边扯秧。上午到12:30才回到家，栽完了“船仔背”。下午在龙潭里栽禾。队里没有安排好劳动力，让我们栽禾的扯秧到6点钟才到龙潭里，致使没能完成任务。7:45才回家。今天身感不适，口中无味，头脑昏沉。估计是前天在长坑仔栽禾淋雨后所致。

1970. 5.12 星期二 阴雨

今天到6点多钟才出早工。在沙功背扯秧。上、下午均在路心仔栽禾。我们三组在挑应战中未能赢二组，但一组远远被抛在我们后面了。下午下起大雨，虽说披戴了雨具，仍无济于事，又一次淋湿了衣服。内衣尚可换干净的，但外套又只能将前几天湿了又晾干的衣服重新穿上。收工较早，6:45就回到家了。下午仅8亩余田。

栽禾终于基本结束了，明天我组栽秧田。组长QG、HD均同意我们男生集体休息。但是脏衣服一大堆。可谓“了不得、不得了”。晚些日子又得洗被子。又是一个“农忙”！

午饭后为食堂挑水3担。栽禾是迄今为止我受益最大的一次锻炼，应予充分、广泛的总结，以利继续前进。

【忆与议】

记得早在1969年11月的日记里就信誓旦旦地要总结下乡插队一年的体会，结果不了了之。半年以后又说要总结，只不过一时兴起而已。

1970. 5.13 星期三 阴有小雨

今天我们班男生集体休息。早上睡到7点多才起床。5点半左右就醒了，但没有能够再睡下去，睡不着了。早饭后给家里写信，此信从上月22日写起，至今尚未发出。写了会儿信，就躺在床上看《散文杂文选编》，至中午。午后休息了一会儿，2点多钟开始洗衣服。脏衣服实在太多，只能分批分期洗涤。

1970. 5.14 星期四 阴偶有小雨

我班男生今天又集体休息了一天。食堂今午饭又只能以猪油代菜。

1970. 5.15 星期五 晴

今天仅出了一个早工，在沙功背扯秧。我队今年栽禾之慢可谓史无前例矣。

早饭后看看日头蛮好，就决定继续洗衣服。8点半开始，到10点10分完成。洗完后取出了蚊帐，随便整理了一下东西，然后开始补衣服。午饭后补衣服至2点。然后拆了垫被，破了塑料袋。3点，再次去洗衣服。4点1刻完成。随后整理衣物和床铺等，到6点许。

【忆与议】

下乡插队后知道了“不栽立夏禾”的说法，就是在“立夏”这天（公历的五月五日或六日）之前完成早稻插秧。据查，1969年和1970年的立夏都是是5月6日。从日记来看，1969年在5月3日就“大功告成”了。而1970年居然直到5月15日才最后结束！这年春寒使开插推迟了几天，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更何况从4月30日起还连续一个多星期增加了从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的“打早工”！原因在于“密植”。在《1970日记选（17）无可奈何的种稻“缺粮户”》中我定量地分析了“密植”与工作量之间的关系。听上去把株距行距缩减一两寸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工作量成倍增加。而且从此以后“密植”还上升到“执行革命路线”的高度。由于没有什么增产的实效，不能不怨声载道，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二：1970日记选议（5月）

（21）潮起又潮落的转折

这一年的春插是下乡插队以后第二次参加春插，与上一年春插前传出削减工分（见《兴趣盎然换来一盆冷水》）相比，这年是春插前就加了工分（见《不要不安心，愈加不安心》），虽然只是把上一年削减的工分恢复到原先的水平，但多少得到一点安慰，而插秧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仿佛是“一俊遮百丑”，所以，这一年在“顺境”中度过了春插大忙，而这种短暂顺利的表象的后面则是“潮起又潮落”。

1970. 5.13 星期三 阴有小雨

傍晚，费让我看了杨的来信。此信与往常来信不同，对我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迄今为止第一次收到味道不好受的来信。但我觉得应该感谢他。这对我是一种鞭策、鼓舞、促进。这与贫下中农在生产劳动在从正面来教育、推动、鼓舞、感染我们是相辅相成的。

1970. 5.15 星期五 晴

费也开始觉察到自己思想境界狭窄了。这是在上午洗衣服时说的。的确，杨的来信犹如一颗炸弹，引起了思想王国里的轩然大波。

【忆与议】

这是1968-11离开学校以后第一次与留城同学发生意见分歧。那位同学的坦率直言，恰好发生在我们处于顺势的时候，所以没有出现对立情绪。当然，一两年后，这种状况就“大为改观”了。插队知青的“情绪低落”、企盼回城，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个别当初留城的同学甚至包括个别去崇明农场不久就荣膺官爵的同学，仍然无法理解我们，继续用“大道理”批评我们，结果，曾经要好的同学终因“城乡差别”难以弥合、“话不投机半句多”而渐行渐远。真是验证了“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老话。

1970. 5.16 星期六 晴

今天出了早工和上午工：耘禾，在东边。二、三组栽禾完成，一组是远远落后，彻底失败了。昨天下午刘、郭、屠帮一组扯秧哩。下午，2点3刻开始缝被，4时完成。然后整理箱子衣物，并装了蚊帐，理了床铺。完成，已近吃晚饭时分。

上午耘禾时，我们班除宋以外的五个男生在一块，一边议论着目前云庄五七大军的状况。大家都感觉，目前风气不大好，作风问题在某些人身上很是明显，我觉得，像5月12日晚上刘以1.7斤打破张1.5斤纪录、5月13日中午刘创2.5斤纪录，以及愁情逸志，搞什么鸟笼之类的情形，正说明了目前五七大军中竟存在着多么荒唐、无聊、低级、庸俗的思想面貌，某些人思想空虚到了何等地步啊！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大家都认为，要拿起“小评论”这个武器来，开展一场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

晚上班长们开会。会上决定，食堂订报一份，建立学习制度。明天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生活问题另行开会再议。

【忆与议】

那个时候发生的这种“吃饭比赛”，当事人至今也啼笑皆非。当年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能够与之抗衡的只是“灭资兴无的思想斗争”，那个年代把慷慨激昂的政治理论当作“粮食、武器、方向盘”，可又有什么实效、长效呢？

1970. 5.17 星期日 晴

今天出工一天，在榨边耘禾。中午全体出动，搞四、八班芋头地。

关于抽上海青年去安福修铁路一事，今天流传极盛。据老周说是我大队7人，LX将带队前往。另外，我队要选20余名查虫员，70亩一人，检查防治稻螟虫。

原定今晚的学习，因大队召集班长开会而改期。关于修铁路，会上说，分宜至永新的铁路经过井冈山专区44里，土方170万，5月25日去一批。我大队7人，知青占2人……。割禾以后还要去一批。十一通车。我们这儿是因为人少地多，故抽人亦少。去向是永新。

【忆与议】

云庄当时是一个生产队，要按70亩一人的比例组织一支20余人的查虫员队伍。这样的记载验证了我脑海中多年来一直存在的关于云庄拥有1500亩水田的记忆。

把征集修路民工等同于知青上调，这样的误解似乎挺好笑，其实正好是一个重要变化的印记，即，知青已经

从“干一辈子革命”的天真，开始向着不再安心转变。这是无法挽回的变化。次日（1970-5-18）日记中记下了更加值得注意的转折。

1970. 5.18 星期一 阴 有雨

今天是有意义的一天。一些人从外面借来了一只照相机。今天云庄五七大军除陆、汤、金、董、刘、徐以外，共26人，在早饭后开始拍照，以留作纪念。在村口拍了几张集体照，然后各自寻找镜头拍照。张、张、程、沙、费、刘和我到水库上拍了几张。费、刘和我就回来了，余则到船仔背去了。饭后休息了会儿，又到村口把余下的几张都拍完了。近三点，陆公假回来，就是仅差了这几分钟啊！下午本准备写信，但因大家聚在一起，东拉西扯，没有写成。

【忆与议】

这天拍摄的这张照片，的确珍贵，因为它是云庄村上海知青处于“鼎盛期”时留下的唯一一张“全家福”，仅仅四个月以后就开始了缓慢而漫长的“回城之旅”，据了解，1979年3月，云庄村最后一名知青离开了“第二故乡”。

详见《难忘的云庄知青集体——珍贵的1970-05集体照》。

虽然在日记中把这一天自诩为有意义的一天，可是，时隔四十年，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它到底是哪年哪月哪一天？更不用说把照片保存至今的寥寥无几。所以，真正有意义的，必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晚上食堂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还读了去年5月4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五四运动五十年》。学习中，大家议论很热烈。但我觉得议论的内容不大对头。我们不能老是议论什么“接受再教育完了与否的界限”，什么“与工农结合与否的界限”及对贫下中农及其干部进行评头品足。我觉得，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对抗日时期的青年寄托了无限希望。在各个历史时期，他老人家对青年都寄托了无限的希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这是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人不变质的伟大战略措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我们一定要安心在农村认真接受再教育，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千锤百炼，炼就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一定要叫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忆与议】

初看这样的日记，觉得很陌生。记忆中留存的一些事情是可以被唤醒的，说明它们的的确确“牢记在心”了，而上面那样的情绪亢奋、斗志昂扬，却没有了记忆，说明它们不过是过眼烟云，很快烟消云散了，并没有真正留下深刻的记忆。

不知道当年当天是不是有人有意这么安排，在合影留念的当晚组织了这么一次政治学习。这一年这时候我尚未摆脱天真的“潮起”，而插友中开始显现出“潮落”先兆——值得注意的是，那是1970-5，出现了对“再教育”结束年限的大胆置疑！此时距离1968-12-21巨手挥动仅仅一年半。尽管现在会有一些“无悔无怨”者对此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它终究是确实发生过的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值得有关学者研究。

回想当年，在没有“全面阐述”指示真谛的情况下，就把千百万青年人迁徙他乡进行“再教育”的做法，恐怕无论如何也难以归类为现代领导方式。时至今日，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代青年人已经开始告别人生舞台，然而，对那个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最新指示”的本来意图与真实含义，依然没有一个正式而透明的说法。

1970. 5.23 星期六 多云到晴

18号拍的照，软片已冲洗，可实在令人失望，大约只有三分之一是成功的，主要是因为三个不好，“天气不好、照相机不好、胶卷不好”。

【忆与议】

那年5-18拍的照片，五天之后有了下文。也没有人记得当时是这样的下文。除了“天气不好”属于“不可抗拒力”以外，照相机、胶卷怎么会都不好呢？永远无解。

照片地址：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13922646747/

（22）不敢声张的实况转播

这一年春节在上海期间，到“日用品调剂商店”（即文革前的旧货商店）“淘宝”似地“淘”到一只单管半导体收音机，带到了消息闭塞的插队地，沟通了与外界的联系，但是仅两个月就发生了一桩不敢声张的事情。

1970. 5.20 星期三 晴

晚饭后队里又开会，关于四好、五好初评。因人实在疲劳，又听重要广播，未去。

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庄严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红色电波一次一次地反复广播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声明。我决心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彻底埋葬帝修反，为全人类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做一个无愧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青年！

【忆与议】

在春插农忙结束以后又要评“四好集体、五好个人”了，对于这类“例行公事”，我早就觉得枯燥乏味了，能不去就不去。而这一天令人感兴趣的是预先通知了晚上八点有重要广播，所以就带着单管机的耳机躺在床上等候。原来，广播的是“五二〇庄严声明”。声明全文不足一千字，见本文附录。

现在查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该书对这篇文稿的注释（1）是这么说的——

这是毛泽东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周恩来等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声明稿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几位同志起草，在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要突出主席同黎笋同志谈话中的思想。”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照办”。这个声明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于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宣读，载于当日《人民日报》。

1970. 5.21 星期四 阴

今天仅出了一个早工，在东边门口耘禾。

近日来一直萎靡不振，老是倦意不散。前天下午出工前睡了足足一小时。昨天下午也不大愿意出工，只因耘禾棍还留在田里。今天终于熬不住了，躺了下来。原因有这么几种：前几天睡得太迟，均在10点以后，这是其一。其二，农忙时的疲劳尚未完全解除、恢复。其三，新的疲劳。

躺下不外乎是睡与看书。上午10: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的实况。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林副主席宣读了毛主席的庄严声明。西哈努克亲王发表了讲话。首都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红卫兵、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代表分别讲了话。大会在11点半左右结束。

【忆与议】

当天有一个细节不敢写入日记。那天上午的首都大会实况是通过广播电台直播的，由“副统帅”宣读“庄严声明”的声音是真真切切的。忽然，我听到“副统帅”把“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了（原文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我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不料，广播中又传来“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基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显然，又把“巴勒斯坦”变成了“巴基斯坦”！

在那个造神时代，对伟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副统帅”也是不能随便非议的。从单管机里发现了实况直播中的“异样”，断然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宣扬。当晚，中央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重播大会实况

录音时，已经作了技术处理，“巴基斯坦”回复到“巴勒斯坦”了。至此，就更不敢斗胆“惹是生非”了。

当时注意到这个“疑团”的人好像并不多，我回沪探亲时与家人亲朋说起此事，都说不曾注意。在1971-9-13事件以后可以比较公开地议论“副统帅”时，也是如此。近来，我在网络上搜索有关资料，据称是专门研究林彪的作家舒云在《林彪绝对隐私》中提到了这件事——“1970年5月20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林彪宣读毛泽东关於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声明。他拉着湖北腔的长调……过了一会儿林彪才正常起来，不过还是念错了几个字，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叶群归罪於工作人员，特别是李文普给林彪的安眠药服过量了。据说林彪每次上天安门，叶群都让卫生员给林彪打一种针，使林彪比正常人还精神。回到家药力过去，林彪又像大病一场”。

1970. 5.22 星期五 阴雨

今天没有出工，昏沉沉的，老想睡觉。

早饭后，应潘之命，以大字报形式抄了一份毛主席的庄严声明。大队长接到公社通知，今晚大队开大会，欢呼毛主席声明发表。大队长要知识青年迅速赶排一些节目，今晚演出。潘、李、郜、刘等要求我们男生也参加编写。我们未去，因为我们无能为力。后又要我们参加演出。我们更是无能为力。沙豁了出去。

昨天中、晚两餐又是猪油拌饭。今天以少量莴苣维持了两餐。

晚8点1刻，大队召开大会，欢呼毛主席庄严声明发表。会后，大队文艺宣传队演出了节目，质量实在太低了。10点后才睡觉。

【忆与议】

因为当时邮政投递系统实在太落后，偏僻山村是不可能天天有邮递员进来的。当年能够在5-22就收到5-21见报的5-20声明全文，实属不易，抑或巧合。但是当时报纸又极其稀缺，整个大队只有一两报纸，所以，只能发挥“文房四宝”的功能，用大字报形式把“庄严声明”抄写出来公诸于众。

日记里留下的片言只语，反映了当时把“庄严声明”放到了很高的位置，因为一年前“九大”召开的时候也没有自上而下地布置基层都要立即赶排节目、并召开大会欢呼庆祝。知青高涨的热情好像以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真的就要来到了。

附录：

1970年的“五二〇庄严声明”全文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23）都是一堂堂“再教育”课

如今回味当年随手写下的日记，感觉其中真是一堂堂“再教育”课，

1970. 5.20 星期三 晴

今天是小满，天气很闷，但没有下雨。

早上在东边门口耘禾。上午和下午均在拿埠口。为了尽快耘完第一道禾，今天开始，休息时间缩短。今天整天是“不得闲”，几乎没有一点空闲。早饭后就开了工。中午，饭后挑了三担水，歇了不满五分钟，正要去翻水蕻菜地，又开了工。下午收工回来，通知我们去翻水蕻菜地，直到漆黑才回来。···今年与往年不同，第一次耘禾就要上肥了（往年要到第二次）。今天规定每人必带不可。结果是滥以施用。幸好是钙镁磷，施用过多对水稻无甚影响。但这恰证明科学种田是多么必要。这些天耘禾时看到了大队革委、三队支部、民兵的试验田，亩产指标分别是1200、1400、1100。

食堂全天无菜。早、中两餐是少量酱菜勉强维持，晚饭是猪油拌饭。

【忆与议】

当时，农业生产“以粮为纲”，把增加产量视为头等大事。我们插队地的水稻产量长期徘徊，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肥料。而这一年一哄而起的“试验田”，动辄就定为一千几百斤的目标，幻想从“老三百”（当年对多年来亩产一直在三百斤左右的揶揄）一跃“过长江”（当年对亩产过千斤的形象化说法）。当然，也知道当地的最大问题是缺少肥料。所以，这年一改旧例，提前施肥，却又缺乏必要的正确指导。更大的难处还在于大量肥料的来源处于“无米之炊”状态。下详。正是这样的现实“再教育”了知青，慢慢懂得什么叫科学种田。

1970. 5.23 星期六 多云到晴

上午是打药灭虫的人民战争。我原来分在QG、FQ一组，在榨边。但因我们三组没有人留下筛土砖灰和拌六六六粉，FF就让我和徐留了下来。时间大约过了三分之二以上，FQ说组里人手不够，把我叫了去，一起撒虫药。12点1刻完成。

听徐说，程政委为了今年早稻收成连觉也睡不好，因为今年是我省首次推广矮杆，正遇上虫灾，还可能有旱灾发生。

【忆与议】

日记中的程政委，是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文革前是部队里的一个军政委，文革中根据最高指示“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而介入地方，继而成为江西省的“第一把手”，是诸多省份进入“军管时代”后管经济的将军之一。我的日记此处提到他因为首次推广矮杆而夜不能寐，这是关系到他在1969年提出“一化带七化”口号，其中就有“良种矮杆化”。（参见《1969日记选（53）那一年再次号召“大跃进”》等文。当年江西流行“一化带七化”，具体而言是“思想革命化带动社队公路化、耕地田园化、灌溉水利化、良种矮杆化、养猪糖化饲料化、运输

车子化、路边村旁绿化”。）

近日在网上查找“良种矮杆化”，没有查到直接的资料，看到一份《江西泰和水稻种植模式变迁大回放》，其中提到，1964年到1971年，江西泰和县用7年时间基本淘汰了水稻高杆品种。其缺陷是：产量低、株型松散、不耐肥、易脱粒、易倒伏、多数经久退化、生育期长。矮杆化的最大历史贡献就是：成功解决了水稻生产中高产与倒伏的两难矛盾，使经济产量与生物产量之间的比例有提高，高杆杆多谷少，矮杆杆少谷多，平均亩产在600斤以上。1975年，开始了杂交水稻选育，替代矮杆品种。

文章里对高杆与矮杆品种的定性描述，读来恍如就在眼前，太熟悉的说法了，尤其是高杆品种易脱粒、易倒伏的缺陷，在1969年双抢之后深有体会。但是，对其中定量数据就找不到感觉了，如果真的在亩产300斤长期徘徊、实行矮杆化就达到亩产600斤以上的水平，那么以水稻为收入来源的村民们就不会在1970年实施矮杆化以后仍旧停滞不前。

倒是有一年（1972？）的双抢留下了这样的记忆：尽管是矮杆，又是密植，不知道什么原因，非但产量没有增加，还出现明显的谷少杆多的局面，脱粒之后的稻杆在田里铺满一层后还绰绰有余，只能把大量稻杆拖到田埂上，否则，实在无法翻耕、栽插后季稻。所以，对那场“矮杆化”在稻作史上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有待查考专家们研究的结果。

1970. 5.24 星期日 阴转雨

发觉自己自栽禾结束以后，虽然身体需要休息、恢复，但思想上也休息了、停滞了。18号买薄荷糖吃，纯粹是个浪费。出勤的减少，正是这个从生活上打开的缺口的扩大。这是危险的倾向。防微杜渐，这是一句很好的有益的格言。必须从日常生活的任何细小环节起，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这样才能有效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

这几天好些同学在设法买笋干。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作”的“大事”。大队规定不准进行笋干买卖。而这些人却违反规定，这是什么行为呢？无政府主义！更深入一步看问题，就使人感到实在严重！这些人为什么要买笋干呢？为的是，来赣时亲戚朋友送礼赠物，至今无甚答谢，说不过去。重要的是，进行这些非法的买卖，究竟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没有利？与当前开展的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否相符合？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来看这些人的“人情”，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眼下这些行为与之相符合吗？更有甚者，竟向地富分子购买，这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有必要展开一场思想交锋，立即刹住这股歪风邪气！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忆与议】

如此的日记，如此的无限上纲，幸好只是写给我自己看，没有贻害他人。其中提到了“当前开展的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也许就是当年的“一打三反”？大队里不允许进行笋干买卖，真可谓典型的“再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

1970. 5.25 星期一 晴

今天一日耘禾。早工在棕木坑，上午在路心仔，下午在小塘坑。

今天下午干部开会。月内将组织武装民兵。民兵班长、知青班长的民兵训练，时间为二天，要带被子、餐具等，搞野营、露宿、爬山等训练。以后所有民兵都要进行此项训练。

晚上开群众大会。我未去。主要是开展积肥运动。我队有三类苗（即栽下至今未返青）360亩。公社要求三日之内积肥七千到八千担，每亩不少于15担。此外还要大搞土农药灭虫。公社批评云庄大队不搞自力更生，到樟树买农药。

【忆与议】

当年就是这样搞生产的——动辄就是几天之内、如何如何，犹如调动千军万马的大兵团作战，十分气派，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玩数字游戏。记得当时猪圈牛栏里的农家肥刚刚出清不久，换进去的稻草、茅草、“路基”（山坡上的一种蕨类植物）还很新鲜，鲜有粪水，更未腐烂，就被当作农家肥出栏，撒到田里，其中的肥料养分可想而知，但是层层上报的只关心数量，不关心质量。与此同时出现的“怪现象”则是生产队有能力购买农药，竟然遭到批评！这是接受了一次玩弄形式的“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的“再教育”。

1970. 5.26 星期二 晴

早工，往牛门口送牛栏粪。上午出猪栏粪，人多事少，竟休息一小时以上！中午12点不到就收工了。下午到3点才开工。社员积肥“刮地皮”，每个底分一百斤。照顾到我们上海青年无此本事，就让我们挑土砖灰8担（每人）至长坑仔。中间休息也足有一小时之多！

MF等“老大”及老周搞土农药。我未接到通知，未去。

天气很热，挑担时，汗如雨下。今天下午社员“刮地皮”，真是“一举两得”，既积了肥，又打扫了环境卫生。

【忆与议】

记得那次“刮地皮”积肥，“照顾知青无此本事”实在是无奈之辞，因为各家各户都是在自己的宅基地范围

内“刮地皮”，而一大帮知青哪来宅基地？一旦动手“刮地皮”，以一个知青半天工分2分计算，二三十个知青就是四五十分，到哪儿去刮四五千斤肥料？势必诱发抢工分的纠纷。至于这样的“刮地皮”也是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依靠人畜踩来踏去、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地皮肥料”，今年刮了一回，明年到哪儿再刮？所以都不是治本之策。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依靠化肥才解决了农家肥和绿肥不敷需求的难题。

（24）从盼望到失望

近年来浏览有关知青与上山下乡的文章，不时可见其中提到一个文件——中共中央中发（70）26号文件。重读自己的日记，唤醒了有关的记忆。

1970. 5.27 星期三 晴

今天比昨天更加闷热。今天仅出了一个早工，不外乎是送肥，送到棕木坑。刘前天砍柴时，砍了漆树，皮肤过敏。昨天起眼部不适，今早更甚，红肿很厉害。上午由沙陪同去小坑，诊断是漆疮。

老沙因外婆近查出患胃癌，决定日内返沪。傍晚草书一纸，附上布票一丈，托其带回上海。

明天五七大军全体去公社开会。我等头发太长，晚饭后，郭和我两人请张剃了头。后去河边洗了头。

【忆与议】

当地山林中有一种野生漆树，其木质比较疏松，所以砍倒砍断比较省力。但是它具有强大的“自我保护能力”，属于有毒植物，其毒性为树的汁液有毒，过敏者皮肤接触即引起过敏反应，数小时到数日的潜伏期之后，脸及唇、手指、胳膊、脖子等出现红肿、痒痛。所以，当地村民上山砍柴时很注意避而远之。

在那个“票证时代”，上海市区居民每年的布票为1.55丈，江西则为1.44丈。上海允许户口迁到外省市的知青凭户口簿到粮管所票证组把外地布票换成上海的布票，一个年度可兑换一丈。不记得其他地方的知青和“支内”（支援内地建设）人员在这方面的“待遇”如何。

那天倒不是因为要去开会听中央文件传达而特地修剪边幅，也不完全是由于春插大忙无暇理发，是囿于囊中羞涩，插友中养成了“发长逾寸”才“剪毛”的风气。那年5-18留下的云庄知青“全家福”可见一斑（见《难忘的云庄知青集体——珍贵的1970-05集体照》）。农忙过后要去公社、要去集镇了，总得稍稍打理一番吧。

1970. 5.28 星期四 晴、多云

早饭在早工时就吃了。饭后即步行去麦斜。桂、刘、张、徐、郭和我六人是第一批到达目的地的。肚饥，买

了4只油煎饼。

9点多钟开会。公社刘兆丰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发（70）26号文件，“批转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的报告”。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最大的关怀、爱护、鼓舞、鞭策。我们从心底里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午后各大队讨论、表决心。刘兆丰作了总结。近4时，大会结束。除老周、老徐、小毛、小宋是溜出会场外，我和郭是第一批回到家的。今天在公社的表现，表明我们现在相当懒散。

【忆与议】

没有在日记中记下那时候谁表决心、怎么表决心的，倒是写下了三呼万岁。其实，当时是很失望的，但又不可能写进日记。自从1969-11从下放干部口中听到“”（参见《如此传言“动摇军心”》）以来，知青的不安心已经开始萌发。1970年开春以来又传言不绝（参见《难堪的重逢，无奈的困惑》《不要不安心，愈加不安心》），就更加“于心不安”了，因为传说中的“两年大限”越来越近——我们已经插队一年半了。所以，听说传达有关知青的中央文件，实在是从心底里盼望着听到这方面的正式消息。记得那天我坐在会场后侧，左手靠窗，光线不错。公社干部宣读文件时，全场鸦雀无声，担心自己的耳朵漏掉了重要的内容。等到文件宣读完毕，不禁面面相觑，实在失望至极。接下去讨论、发言的时候，气氛就截然相反了，没有什么人认真听取发言，会场里嘈杂不已，当年我简单地记下“相当懒散”，也是一种“借景抒情”，因为不可能如实记叙当时心中的莫大失望。

1970. 5.30 星期六 晴、多云

上午在塘坑耘禾。天气很热，太阳很毒。中午洗了个澡，换洗了内衣。然后应徐之命，写了些语录、标语口号。下午五七大军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章节，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改造世界观》。学习班还有贫下中农代表JL、下放干部代表黄。学习班办得很不成功，互相扯皮、挖苦。结束后在我班菜园种菜。

最近几天连续吃白饭，简直难以下咽。

【忆与议】

按照当年的惯例，有最高指示或/和重要社论发表，都要办学习班。现在看来，（70）26号中央文件是68-12-21指示发布一年多以后第一个专门针对知青工作的文件（见本文附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上山下乡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九条规定。我发现该文件几乎完全针对插队落户，对兵团、农场只是一笔带过。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么一句话——既要把下乡知识青年当作“再教育”的对象，又要把他们看作是三大革命运动中“一部

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

至于社论，是1970-5-23的两报一刊社论《改造世界观——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八周年》。其实，那个社论与中央文件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也没有谈到知青上山下乡，只有一处提到“知识分子”和“插队落户”——广大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通过插队落户、参加“五·七”干校、定期去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和蹲点等各种形式，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不论采取什么形式，我们都要以毛主席这一号召对照一下自己：是有了长期的打算呢还是只有短期的准备？是无条件的呢还是有条件的？是全心全意的呢还是半心半意或者三心二意的？——社论中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是两码事，当年的“知识分子”是指大学中专以上的科研与管理人员，而千百万“知识青年”不过是识字青年罢了！社论中的“插队落户”是“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的一种形式，一度打算与“五七干校”的做法“并驾齐驱”，并使之成为“识字青年插队落户”的领导与管理者，但是，毕竟此“插队落户”不同于彼“插队落户”，关键在于：知识分子是拿工资的，知识青年是挣工分的。而不同的体制是很难相处的，“知识分子插队落户”很快就式微了。这是我们已经亲身经历过的（见《知青如此插队，干部如此插班》），所以社论中“知识分子插队落户”的说法对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并没有吸引力，而真正吸引我们眼球的是其中的一句——是有了长期的打算呢还是只有短期的准备？——照此说法，果真要准备长期！？插队知青不能不从盼望跌落到失望。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三：

1970日记选议（6月）

死打硬拼把产量搞上去

1970 .6. 1 星期一 阴 有雨

为消灭三类苗，今天早工是积肥。仅屠、李和我3人出工。

科研小组一事不提了，但试验田又提了起来。早饭后老周通知我，上午积肥并送到高坑的试验田去。但上午出工时不见人影。我仍去三组。在东边耘禾。

下午，周、桂和我三人在科研田耘禾。拔草……

【忆与议】

此处“三类苗”一说，可以从1970-5-25日记得到一些解读——“我队有三类苗（即栽下至今未返青）360亩。”那年云庄村有360亩插秧以后半个月以上不见返青的“三类苗”，这在当年种植的一千四五百亩早稻中占到四分之一。不过记不清返青与施肥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了。

这年四月份刮了一阵短暂的“科技小组”风，十多天之后“人去楼空”（见《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等文），到了春插的时候，只是在一块田里有过半天插秧活动，此后的活动仍然是一头雾水，从无小组活动，只是偶尔通知我去劳动。五月份的第一次耘禾没啥动静，进入六月份，忽然又开始活动了。而此时的我面对如此这般的“试验”活动，已经愈来愈失去兴趣了。

1970 .6. 2 星期二 阴转雨

早工是在东边耘禾。上午去新街上买米。···下午，周、胡和我三人在试验田耘禾。试验田今天竖了牌子，上写“五七试验田（科研田）、品种：铁骨矮、广矮，规格：5×7，产量：早禾700，晚禾400，面积1亩7分2厘。

负责人：胡、桂”。上坵1.06亩，下坵0.66亩。

昨晚干部会议上说，毛主席前些时候在江西。程政委说，今年江西全部采用矮杆，是一种“冒险”，背水一战，胜败在此一举，死打硬拼，一定要把粮食产量打上去。专区王主任说，哪里没粮，饿死活该！另外落实了我队杂粮种植。

【忆与议】

好像是要让“科技小组”起死回生，找了两块田，命名为“五七试验田”，就算是科研了！而4月初“科技小组”最初活动时设定的十多块田，在此刻已经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段日记特地记下一笔，干部们在会上被告知，伟大领袖前些时候在江西。伟人到过了、来过了，这在那个造神时代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至于具体有些什么活动则是极度机密。近日在网上查询有关资料，1969年底到1970年春天，伟人确实不在北京。

新华网江西频道首页>>新闻中心>>史海回眸http://www.jx.xinhuanet.com/news/2010-12/09/content_21589574.htm1970年开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在此【北京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政治局会议。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开始进行修改宪法和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从1969年底外出到武汉长沙等地视察，至今未归。但他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注意力依然集中在北京，并以他的绝对权威决定着中央的决策。……

4月11日夜11时30分，林彪突然在苏州让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三条意见】……恰在此时，国际风云四起，美国入侵越南的战火不断扩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态势，中国外交斡旋在即，毛泽东在接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了北京。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

昆明党史网首页→党史博览→重要会议→“文化大革命”时期http://kmds.km.gov.cn/dsbl/zyhy/whdgmsq/271538164665FJ5605HKHHFK8DBFJ5605HKHHFK8DB.shtml中央政治局、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3月8-20日)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北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

http://kmds.km.gov.cn/dsbl/zyhy/whdgmsq/271538301952I78E4IEA5C3A43BI78E4IEA5C3A43B.shtml中央政治局会议(1970年4月12日) 1970年4月11日，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林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达给中央政治局。

上述不完全的资料显示出，从1969年底，伟人就一直武汉、长沙等地，其中确认1970-3-8在武汉，4-11在长沙，4-12回到北京。所以，6月初江西基层干部被告知“前些时候”伟人在江西，不会是瞎说。而上述资料都是围

绕着当时设不设国家主席，也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毛林在九大以后出现重大裂痕，直至1971-9-13事件。所以，看不出1970年那几个月里伟人在江西有些什么活动。

至于江西的程政委（即当时江西的“第一把手”程世清）提出“冒险”全面实行水稻矮杆化（属于他提出的“一化带七化”中“七化”之一，参见《1970日记选（23）都是一堂堂“再教育”课》），“背水一战，胜败在此一举，死打硬拼，一定要把粮食产量打上去”这样的口吻确实体现了将军作风。固然也有“科研”之名，但还是热衷于“冒险”，“死打硬拼”，其后果可想而知。而专区王主任的“哪里没粮，饿死活该”则实在令人惊诧万分。在极端化的年代，就是如此极端化地理解和发挥上级领导的意图。时过境迁，回忆往事，不可思议！

当年种植杂粮不知道是谁的心血来潮之作。云庄已有1500亩水田、数千亩油茶林，偏偏还要把缺水少肥的一些撂荒地和山坡开荒种上杂粮（记得有山芋、花生、大豆等品种），仿佛人人都有使不完的体力、用不完的时间，而且是无所不能的多面手。在这里世代耕作的稻农并无旱作经验。正巧1969年底有三户来自县城附近的“地富分子”被强制搬迁到远离县城的山里，他们在祖居地不种水稻，倒有不少旱作经验，于是，“地富分子”一跃成为杂粮“种植能手”，活跃在旱作“战线”，指挥着贫下中农……。毕竟，山地有自己的特点，不适合旱作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所以仅仅忙活了一季，就偃旗息鼓了。

1970 .6.12星期五多云早工在牛门口耘禾。上午与桂两人搞试验田。这是老胡、老周昨天通知我们的。今天拔了一天稗草。草长得相当茂盛，但禾很不错。下午老胡也来参加，并撒肥。

【忆与议】

这年六月份的日记里就只有这几天提到了“试验田”，几乎每次都提到拔草。这使我想起在云庄插队的那些年里，稗草是一大祸害。它的来源是稻种混入。七零年是首次引入矮杆品种，出现稗草茂盛的现象，主要原因似应在制种单位，在上一年在制种过程中忽视了对稗草的“封杀”。

记得灭杀稗草的关键时刻在早稻第二次耘禾的时候，此时稻稗的区别十分明显，又都处于分蘖之前，所以应该在耘禾时见稗草必拔。有一年稗草特别严重，我们又是采用“持杖站立式”耘禾，所以，连续不断地拔除茂盛的稗草使大家在田里蠕动，耘禾变得“寸步难行”，实属罕见。

<u>大吃一斤的端午节</u>

在八十年代末动手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把“大吃一斤”列为一个专题，由于想不起“大吃一斤”的时间等具体细节，所以就搁置一边，不料一搁就是二十多年！如今翻开当年的日记，方才知道那次“大吃一斤”发生在端午

节。

1970 .6. 2 星期二 阴转雨

早工是在东边耘禾。上午去新街上买米。总共32人，除去猪场1人、林场1人、食堂1人以及徐（开会）、徐（病）、潘（教书）、刘（外出）、陆、汤、董、金、沙【民工或回沪】，余20人；临时又通知班长开会，又除去刘、刘、桂，仅17人，要挑1400斤左右的米。而新街上仅有600斤米了，另外在张、程等力促下，买了60斤卷面，各人挑轻担回家。

【忆与议】

没有想到又一次出现到新街上买米的记录，在我的记忆中，来回二十多里路买米，确实有过，但似乎没有日记中反映出来的那么频繁。看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疑点”了，如果说1968年11月下乡后最初若干个月插队知青属于“商品粮”还说得过去，那么，到了1970年五六月也即插队已经一年又半的时候，仍然“买米不止”，究竟是什么原因？有待下一步整理日记时密切注意。

1970 .6. 5 星期五 多云

出工一天。早上拔“一晚”秧。上、下午在榨边耘禾。

1970 .6. 6 星期六 阴转雨

又出工一天，内容同昨。今晚吃油煎糯米饼。

1970 .6. 7 星期日 阴转雨

出勤一日，内容同前、昨两天。天气很闷，下午更热。5点半开始下雨，就收了工。衣服淋湿了，回家后换了全部衣服。

晚上徐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公社检查团的意见引起了某些人的强烈反感。于是“工分挂帅”“出勤第一”“突出政治落实到工分”等等的谬论都出来了。

后来讨论明日去新街上买米。决定明天张、张、程、汤（毛）、刘、刘、郭、桂、陆九个男生去挑米。其任务是700多斤米！其余人明天（足来）芋头田。

【忆与议】

回头看这一年的日记，发现自己对班里学习、会议内容等的记载较前一年减少。所以对一些只言片语的回忆也就搞不清楚了。此处“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公社检查团的意见”云云，可惜日记中没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只能

估计是五月中下旬传达中央（70）26号文件（参见《1970日记选（24）从盼望到失望》）以后公社对知青工作开展了检查。其结果可能是要求插队知青多参加劳动、提高出勤率。但只有空泛的要求而没有可行的措施，引发知青不满。

1970 .6. 8 星期一 阴转有雷阵雨

今天是端午节，原准备好好休整一下，但并未如愿。

5点刚过，九个男生即出发去挑米，余则去芋头田。很快就完成了。早饭吃面，我一下吃了一斤。饭后宋提议去接他们挑米的。……在小坑？塘遇上他们。我接了张的担子。张说脚痛，挑不动了。于是我把这85斤米挑回家里，中间在大园、香山亭休息了两次。回家时，已是浑身上下湿透。马上去洗澡。

【忆与议】

回首一年前1969-6-16日记，有这样的记录——过几天就是我国人民传统的“端午节”了。老乡们正紧张地筹备着过节。我们班里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度节。然而无巧不成书。今年中午队里一个小牛犊饿死了，我们仅以六角钱就买来了。（参见《农活虽轻松，知青不太平》）这说明，那两年的端午节，生产队都没有开宰吃肉！插队知青比不上当地农民还有一丁点儿剩余年货来打点端午节。1969年是凑巧吃了一头饿死的小牛犊，1970年用油煎糯米饼打了一次牙祭，又以面条“大吃一斤”来过节！

我们插队所在地云庄村有数以千亩计的油茶林，盛产茶油，所以，额定口油是每个人每个月9两！（当时上海居民每人每个月也不过四到五两食油。）所以，我们在度菜荒的日子里会有过“油炒盐”下饭。也可以把农忙期间生产队杀猪“犒劳”时难得的猪油留一部分“备荒”，遂有猪油拌饭的“奢侈”之举。端午节前夕油煎糯米饼也就顺理成章了。

云庄以水稻为单一的粮食作物，在云庄乃至新干县城更是一日三餐吃米饭，没有吃稀饭或稀粥的习惯！小麦面粉十分稀罕，知青中每逢有人外出“当街”（赶集）时，多要帮大家带些馒头油条之类回来，解解馋。那几年公社粮管所是对下放干部和知青供应一些照顾性质的卷面（冲抵稻谷口粮）。这样的卷面和下乡以前在上海吃的切面不一样。上海市区的粮店里每天供应刚刚从制面机上下来的含湿量颇高的新鲜面制品（学名：生切面，各地方言中又称水面、湿面、鲜面、活面等），并且可以一两为起秤购买。而那种卷面（学名：挂面，即以小麦粉为原料，经和面、压片、烘干、切断等工序生产而成）是大约20多厘米长、圆柱形包装、每包一斤（500克）的干制品，可以贮存很长时间。二者的口味当然以前者为佳，在县城制作的卷面就带些许酸味。即使如此，难得换一次口味，又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就以“量”充“质”，大吃一斤，也就“大快朵颐”“欢度端午”了。

也是讲究“投入—产出”

1970 .6. 5 星期五 多云

出工一天。早上拔“一晚”秧。上、下午在榨边耘禾。晚上队里开大会，公布了昨晚评定的底分。此事早在今天早工时就已传开。主要有，桂、李、郭各加2厘（6.7、5.7、5,9），程加1厘（6）。

【忆与议】

下乡插队一年又半载了，知青的工分一直纠结不已，自从一年前调整知青工分以来，三十余人的工分在一年后只有稍许微幅变化。如今看来，插队知青与当地干群的这种利害冲突是无法避免的，纵然有多少上级文件、领导指示，也不会有神马作用，因为知青插队本身就不是一件合乎发展规律的事情。

1970 .6.10 星期三 阴

早工是拣石头，社员叫“没脑壳”，任务是150斤。我们均未去。上、下午在拿埠口耘禾。

【忆与议】

记得1969年已经有过这样的劳动安排。“没脑壳”是方言mo lao ko的谐音，一种近乎花岗岩的石块，在某些山沟里会有，捡回来作为修筑拖拉机机耕道的路基石。但是山里哪儿有这样的石头，就绝对是插队知青的弱项。如果盲无目标地到山沟里瞎跑乱找，个把小时的早工完全可能空手而归，既谈不上完成任务，更不可能有什么工分报酬。虽然当时还没有“投入—产出”的明确理念，但在实践中已经懂得，这样的“瞎起劲”实在犯不着！面对那样规定的任务指标，插队知青的直觉是，看起来“按劳取酬”，实际上处于不一样的起跑线上，所以并不合理，干脆就不出工。

1970 .6.16 星期二 晴

早工是大家都不大乐意干的撒石灰灭虫。一个早工撒了两担，先在牛门口，后在东边门口。待收工时，满头是白灰，衣服上也沾了不少光。故早饭后即与刘到河边洗了外套。

本来右脚趾上昨天搞了一处伤口，一夜发炎，加上石灰一呛，更是疼痛，故上、下午均未出工。

晚上开始举办我大队五七大军学习班。今晚主要是宣布了学习班程序。学习班要办两天。

1970 .6.17 星期三 晴

学习班从早到晚整整一天。早上学文件。上午，支书作了报告，回顾、总结了一年半以来五七大军工作。老胡

作了补充。赵传达了专区第二次五七大军讲用会精神。下午分班进行总结。晚上，分班进行个人斗私批修。有贫下中农QX、QG参加。中午（足来）了芋头地。傍晚施大粪于芋头地。

1970 .6.18 星期四 多云

早上，先抄了五七大军出勤统计，继续进行斗私批修。上午评“四好”“五好”。云庄村评四班为“四好集体”。五好个人，我班评了李、徐、潘、郭、陆。下午，各班订措施，进行交流。最后由支书作了学习班总结。会后，学习班共青团员、正副班长会上宣布了大队五七领导班子，有老胡、LX、JL、徐、赵及六个班政治辅导员（云庄4、7、8班分别是JS、GM、QG）。傍晚搞芋头地。后洗澡、洗衣。

【忆与议】

与1969年日记不同的是，这一年我对学习或开会的内容似乎记录得少了。所以为期两天的学习班是什么主题，无从得知。从日记里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估计是结合学习5月份传达的（70）26号中央文件，传达专区五七大军讲用会精神。而抄写公布“五七大军出勤统计”，则说明重点可能在于抓五七大军的劳动出勤。其实就出勤抓出勤，并没有抓到根本的点子上。

1970 .6.25 星期四 阴转阵雨

一早起来，就感到浑身没劲。早工又是捡石头。每个工分40斤（45斤），没有去。上、下午到船仔背那儿耘禾，也没去。据徐说，日后将开始搞副业。另，支书说我班对有指标、任务的活出工最少。

【忆与议】

看来当时捡石头的进展并不理想，把硬性指标（早工完成150斤）改成了按劳计酬（40斤折合1个工分）。至于传说支书批评我们知青班不愿意干有指标任务的活。不知道原话如何，可能以讹传讹，也可能对知青缺乏了解。其实，插队一年半的知青最不愿意的是处于不平等地位。那年以至于以后的几年，即使是春插、双抢这样的农忙季节，由于是按劳计酬，知青有希望实现多劳多得、同工同酬，所以也会拼命干一番。看上去是“挑肥拣瘦”，实际上是反映了对合理报酬的向往与渴望。这也就足以说明插队知青出勤情况不理想的基本原因。

1970 .6.27 星期六 阴有雨

昨晚队里开有关生产的群众大会。今后利用早工和午间、傍晚业余时间搞副业，砍柴和割茅草。柴是100斤1.5分（10分700斤），草是100斤4分。不准利用出工时间。

1970 .6.30 星期二 晴

今天一天是割路基，100斤4分。男生除陆一人外，均未出工。

今天是6月30日，本月出勤22.8天。是否还可高些呢？这对我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上午为食堂挑水三担感觉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要吃力。且左腰部时而感到不适。

晚上，在食堂收听了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10点半睡觉。

【忆与议】

这一年有一个“新举措”，把大家的业余时间也要充分利用起来。作为副业，最常见的就是砍柴，为集镇居民提供燃料。而割茅草则很少见。山上的茅草有许多品种，主要是“路基”。

“路基”是当地方言lu ji的谐音，意指长在山坡上的蕨类植物，属于比较低级的一门植物，在网络上有许多介绍。在我记忆里，它只用于铺垫猪圈、牛栏，继而作为农家肥。前些年在上海的花卉市场上看见过“路基”的身影，正好与在新干云庄打过交道的一个模样，市场上把它叫做“野鸡毛山草”。如果要完成100斤，工作量不是一点点，需要懂得“路基”在山坡上生长的规律，熟悉附近山坡上“路基”分布的情况，还有在称重方面的“诀窍”——挑选在背阴的山坡，割下饱含露水的“路基”，就可以在重量上占不少便宜。如果几个因素都不掌握，那只能在山坡上攀上爬下，而割不到几斤，所以这活儿被知青归入“拣瘦”之列。

随着插队知青对生产生活的了解逐步深化，自然也就愈来愈“实在、实惠”。纵然又有政治上新发布的重要社论出来，也无昔日那种浓厚兴趣，而是愈来愈淡漠。

<u>还是要统一思想</u>

1970 .6. 3 星期三 晴

今天出工一天。早工在东边。上午二、三组帮一组在龙潭里，下午在榨边。

中午收到了父亲5.28来信，说买些笋干。恰早饭后林业队来卖水笋干，1元钱一斤，不大好，没有买。看来只可买小的了。

昨晚因检查知青工作，队里没有学习，补在今天中午进行。约二十分钟。读了新党章。

【忆与议】

恰好几天前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1970-5-24，“这几天好些同学在设法买笋干。……大队规定不准进行笋干买卖。”（见《1970日记选（23）都是一堂堂“再教育”课》）转眼间又有“林业队来卖水笋干”的记录。似乎

前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当年农村中不允许农民个人从事小买卖，所有经营活动都要在集体经济的范围内进行，所以后来就有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援引老话的说法，就是地道十足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自从1969冬江西的“一把手”程世清提出“一化带七化”的口号以来，从上到下想办法铆足劲响应号召见诸行动。为了体现“一化（思想革命化）”的“带头作用”，形式主义到了极点，那一年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因大队干部不在而暂停的学习，非要补足。然而，啼笑皆非的是，让参加学习的男女老少一律学习党章！如此这般的“思想革命化”真可以算得上登峰造极了，准备让人人都成为“先锋队一员”？可能吗？！

1970 .6.13 星期六 多云到晴

5点3刻启程去麦斜开会。上午是斗争拿埠大队现行反革命分子XJY（下放干部）和池岸大队三个打人凶手。下午传达专区积代会精神。会议到近5点方才结束。除一些中途滑脚溜回家的人以外，刘、郭、屠和我四人是首批回到云庄的（近8点）。宋因扒车不成，右足跌伤。

【忆与议】

无止境的斗斗斗，往返六十里参加斗争大会，不可能要求当地农民如此来回跋涉，只有知青最“合适”，既符合对知识青年进行杀鸡儆猴式的“再教育”，又可以满足造声势的需要。

1970 .6.14 星期日 晴

昨晚，听费对刘说，最近将要进行大队领导整顿，和抓五七大军内部阶级斗争。同时对各人组织鉴定，每人还要自我鉴定。

【忆与议】

不过此后日记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仅见到对下放干部的鉴定，见6-21的日记。

1970 .6.21 星期日 阴有小雨

耘禾一日，同昨前两日一样。午饭后即与刘到后面山上砍柴65斤。三日来共斫柴165斤。午饭后挑水3担。今传昨晚贫下中农对下放干部作鉴定。上海青年仅徐一人参加。

【忆与议】

再往后也确实有下放干部离开山村另行安排了工作。对于插队知青似乎不一样，并没有类似的人人鉴定。虽然这一年的九十月份云庄有两个知青幸运地首批上调进厂，但只是“个案处理”式的单人鉴定，以后许多年里知青自

谋出路离开农村也都是如此。

1970 .6.20 星期六 阴

全天耘禾，同昨。中间又砍柴50斤。上、下午耘禾时，大部分时间与GD、SM在一起，与之进行了热烈的交谈。其中又以下午更为精彩，受益更多。我们觉得这一类人具有两重性。他们有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但又有富裕农民的落后性。后者又分为两层，首先是其家庭地位的影响、烙印；其次是多次失败后的灰心、不满。我们应当警惕后者的影响，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忆与议】

很遗憾，与两位高中生的交流未能有胆量记录下来。云庄村在文革以前就有好几个高中生，当然“家庭成份”比较“高”，上中农，虽然还不是“阶级敌人”，但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是没有胆量与他们有深入的交谈，避而远之，就是偶尔有过一次交流，还不能忘记进行“阶级分析”。实际上，“立场”“方向”到底是什么，根本就说不上来，只不过鹦鹉学舌罢了。

时值耘禾季节，农活相对轻松，插队知青也“入乡随俗”“公私兼顾”地利用集体劳动的间隙上山砍柴，这是知青集体“大食堂”义不容辞的任务，必须完成。在日记中留有数字记载，提醒自己尽早完成义务。

1970 .6.25 星期四 阴转阵雨

晚上班里开会，讨论开展整风和小评论。无多大收获。

1970 .6.26 星期五 阴雨

一日大雨，间歇不止。早工是捡石头。我们都十分好睡，无一出勤。上、下午没有开工。早饭后续写信，后补衣服。下午补了整整半天的衣服。小评论即将创刊，由张、刘等负责。今天张出面四出征稿。刘写了一篇。

1970 .6.28 星期日 多云（阴）

下午，陆与张搞小评论，并正式出刊了。有张执笔的“创刊词”以及徐、汤、刘、李等六个女生和陆的五篇“小评论”。

【忆与议】

在这年五月中旬，知青集体中就有出刊小评论的打算（见《1970日记选（21）潮起又潮落的转折》）。一个多月后终于问世。“大食堂”里的政治气氛似乎高涨起来。不久之后，又配合“双抢”，以诸人“决心书”作为第二期，实际上已不成其为“评论”。随着“双抢”大忙的开始与结束，“小评论”也悄然收场。若无日记，此等潮起

潮落早已没有了记忆。而今只记得在那文革十年中确有鼓噪一时的“小评论热”，以此名称表明是“来自革命群众的声音”，并与官方报刊的正式社论或评论相呼应，从而体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

值得回味的星星点点

这一年六月份的日记里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内容，看上去似乎缺乏明显的聚焦，但还是值得思考思索。

1970 .6. 4 星期四 阴有雨

上面又发下一笔补助费，平均每人15元。某些人提出要提取买农具。这本来是早应解决，并在各班安置费中解决的。

【忆与议】

此处是由于“又发下一笔补助费”中的“又”字，引起我的注意，隐约之间记得六九年日记中似乎也有过类似“补助费”的记录，所以值得“上下求索”，到底对插队知青有过多少此类“补助”？

这一年的此刻已经是下乡一年半了，插队知青赖以生活的农具仍然没有解决！仅仅几天前传达的70（26）文件中就有“国家拨给的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上面。”（参见《1970日记选（24）从盼望到失望》）随之而来的“检查工作”也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1970 .6. 6 星期六 阴转雨

陆、汤今天中午回来。他们修路工程（南昌——井冈山公路）暂时停止，以后是否再去，另行通知。

【忆与议】

看来那几年征用民工的事情不少，插队知青是与农民待遇相当了？

1970 .6. 9 星期二 阴有小雨

晚上听新闻广播，至11点半左右方才入睡。注意的是我乒乓球队出国，而广播中杂音很多，听不清。

【忆与议】

当年乍一听到广播里说中国乒乓球队出国，甚是惊喜。因为从小刚刚识字看报就知道了中国乒乓球威震天下，如果说1959年3月容国团在联邦德国首夺世界冠军时我还只有一年级，对此还有点迷迷糊糊；那么到1961年4月在北京夺得男团冠军、庄则栋邱钟惠双双荣获单打冠军以后，我就成为亿万乒乓“粉丝”之一，一直关注着这个激动人

心的热点。之所以近乎狂热，是因为事实上早在文革开始以前，国内外已经出现了把体育与政治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做法（现在从网络上很容易找到相关的资料，参见本文附录），使得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小青年”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对乒乓球队的动向十分关注，在偏僻山沟里得知自1966-6文革开始以来已经“偃旗息鼓”四年之久的乒乓球队居然“复活”了！所以欣然写入了日记。

时隔四十多年重读日记，我很快产生疑问，这项记录就是“乒乓外交”的开始吗？因为我一直记得世乒赛是逢单的年份进行的（2003年以后才改变了赛制），所以，被誉为“乒乓外交”的发端——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不可能在逢双年份1970年发生的，那么，我在1970-6日记里注意到的的乒乓球队出国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互动百科>>百科词条《1970年6月4日》有这样的内容——

http://www.hudong.com/wiki/1970%E5%B9%B46%E6%9C%884%E6%97%A51970年6月4日，对国家体委军管会和外交部关于中国乒乓球队访尼泊尔有关事项的请示批示：“拟同意。”“这是自从一九六六年秋参加柬埔寨金边开的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后第一次出国的乒乓球队，需要给予鼓励。建议今晚十时到西郊体育馆观看他们出国表演赛。”这个信息中提到了中国乒乓球队在1970-6访问尼泊尔，实在有点出乎意料。继续在网上搜索，在“上海政协网”有《乒乓外交的来龙去脉》一文，其中这么说——

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node4864/userobject1ai35118.html1970年，尼泊尔国王要举行一个典礼，就想到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尼泊尔国王是一个乒乓迷，但尼泊尔的乒乓球水平比较低。于是，中国少数几个运动员到尼泊尔去表演了一次。

至此得知，1970-6乒乓球队在文革开始后首次出国了，但还不是乒乓外交的正式开端。

1970 .6.11 星期四 多云

晚上队里开大会，主要是增产节约和发扬协作精神支援四队。

【忆与议】

看到生产队开会提出“增产节约”这样的口号，有点将信将疑，直觉是，不像基层生产队的“战略部署”。估计又是来自上级的指示。恰巧为查询前述乒乓球队出国一事而打开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还没有关闭，突然跃入眼中以下字眼“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其中的注释解开了我的谜团。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稿〔１〕的批语（一九七〇年五月）

照办。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１〕　中共中央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发出的这个指示中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具体要求是：１．努力增加生产；２．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３．大搞综合利用；４．提高劳动生产率；５．大力降低消耗定额；６．提高运输效率；７．提高产品质量；８．改善经营管理；９．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节约代用。指示说，上述各点主要是讲工业战线，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

看来，生产队里开大会也确实是执行中央指示，把“同样适用于农业……战线”的9条要求传达下来了，然而这样的“同样适用于”也只能是传达而已，不具备可操作性。

1970 .6.19 星期五 多云

晚上队里开会。连长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纪念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八周年。段主任今天作了一番精彩的鼓舞人心、振奋斗志的讲话。10:30睡觉。

【忆与议】

对“民兵工作三落实”早已淡忘淡漠了。现从网上查得，“长江日报”数字报纸有这样的信息——

http://cjmp.cnhan.com/cjrb/html/2008-06/18/content_366096.htm1962年6月上旬，毛泽东同志视察武汉。18日，在听取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汇报工作谈及民兵情况时，提出“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要组织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拢来。”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提出的雏形。同年6月19日，毛泽东同志和广州军区领导谈话时明确提出了“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著名题词。

1970 .6.29 星期一 多云（晴）

晚上9点半队里分组评五好，三组仅18人参加，草草讲了几句就结束了。

【忆与议】

尽管白天辛勤劳作，晚上评比“五好社员”之类的“政治活动”仿佛就是那个时候的“夜生活”。然而不得人心，参与者寥寥无几。

附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85%B4%E5%8A%9B%E9%87%8F%E8%BF%90%E5%8A%A8%E4%BC%9A新兴

力量运动会（Games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简称GANEFO），是在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倡导下举行的世界性运动会，举行一届后即告夭折。

背景1962年，印度尼西亚举办第四届亚洲运动会，以政治原因拒绝接受中华民国代表团以中华奥委会的名义参加比赛，以宗教原因拒绝接受以色列参赛，导致国际奥委会宣布不承认该届亚运会。次年2月，国际奥委会宣布不定期地禁止印尼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此情况下，印尼总统苏加诺提出自行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倡议，希望能够创建一个国际奥委会之外的独立体育运动。

该倡议立即得到了已经退出国际奥委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欢迎。1962年11月，印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于次年11月在印尼举办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筹备1963年4月，新兴力量运动会筹备会议在印尼雅加达举行，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苏联十国代表，以及锡兰和南斯拉夫的观察员出席筹备会议。在筹备会议上，苏联代表提出将国际奥委会的宗旨写入新兴力量运动会章程，以表示新兴力量运动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该提议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的反对，最后经过妥协，各国一致同意以奥林匹克理想同万隆会议精神并列，作为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宗旨，并决定新兴力量运动会四年举行一次。

举办1963年11月10日，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共有48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代表团，共有2404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曲棍球、游泳、水球、跳水、举重、体操、射击、射箭、拳击、自行车、击剑、柔道、摔跤和帆船共20个大项的比赛。尽遣精英出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独得60余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第一。苏联虽然派队参赛，但迫于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仅派出不具奥运参赛资格的运动员。11月20日，运动会闭幕，在此次运动会上共打破了5项世界纪录。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团决定第二届运动会将于1967年举行，首选地点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开罗，备选地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

夭折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办，招致了国际奥委会及其下属单项组织的反对，认为其将政治和体育相联系，违背了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新兴力量运动会举办之后，国际奥委会立即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取消他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一些单项组织也对参赛国进行了处罚。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出面举行了一些单项新兴力量运动会，比如举重、游泳，以安抚参赛各国，并协助柬埔寨于1966年11月在金边举行了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亚运会。

1964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其建设体育场馆，否则将放弃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由于其要求金额较高，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最后决定由北京接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北京为此紧急开工修建一

批体育设施，著名的有北京首都体育馆等。但是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苏加诺被推翻，苏哈托上台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敌视态度，退出了新兴力量运动会。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局势陷入混乱，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一事从此不了了之。随着印尼和中国的退出，新兴力量运动会也随之宣告夭折。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四：

1970年7月、8月日记选

办学习班，写决心书

1970. 7. 1 星期三 晴

今天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九周年纪念。昨晚听了二报一刊重要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社论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谈话，对每一个革命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新的要求，也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回想自己一年多来的表现实在惭愧，对不起党和毛主席，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在党的生日里，我决心从今以后，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标准处处、时时要求自己，争取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队里要建造水泥晒谷场。今天是捡石头。我和陆到？坑山顶上捡。因身体不好，体力不支，下山时跌了一跤。拣得85斤，扣篮盘4斤，为81斤。上午在短坑、水库下、树下耘禾。下午在路下。

晚上大食堂学习，由张主持，发言人甚少，匆匆结束。要求每人写一份总结。

【忆与议】

在几个重要的政治节日，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是不能不收听和学习的。如果说在学校里的时候还挺认真地参加政治学习，那么，在经过一年多“再教育”以后对这类政治学习的热情却是背道而驰。

文革开始以后“小红书”天天不离手，《语录》中许多片断背得滚瓜烂熟。至今还能熟练地找到，其中早就公布的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来源是1964年“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九篇“战斗檄文”中《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时隔六载，1970年又发表伟人在“九大”的接班人谈话，又提出了五项标准！如今浏览一下这两个“五条”，发觉其中最大的“发展”在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70. 7. 2 星期四 晴

天气很热，3点半出发，至少是4点半才开工，中间又休息了半个多小时。汗流如洗，浑身湿透。晚上班里学习，亦是无效。

1970. 7. 3 星期五 晴

5点钟即起身，吃了些饭，就与费、章去新干接沙。6点半左右到达新街上。到9点半才搭到拖拉机前去新干。客车因无汽油暂停。

【忆与议】

县境之内的客车因无油而停车似乎很少发生。

1970. 7. 4 星期六 多云转阵雨转阴

晚上开始举办学习班。队里实无诚意，大家深感不满。待布置完毕，就不耐烦听传达了，就草草结束。

1970. 7. 5 星期日 多云

早上起办学习班。早上和上午均是传达县五七大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下午讨论。效果不大。

1970. 7. 6 星期一 多云

早工分班办学习班。学习了程政委的有关指示。晚上分班办学习班，进行讨论。在“等待领导”问题上进行了激烈争论。

1970. 7. 7 星期二 晴

早工分班办学习班，进行讨论，谈对插队落户的认识。上午与刘、郭、屠去塘坑砍柴，乃队里副业。身体不佳，加上心境不好，很不顺利。郭不慎把脚砍伤，中途回家。我与刘合伙，刘爬树打杈，我在下整枝。刘、屠和我三人总共只有400多斤。却使人疲乏至极。

1970. 7. 8 星期三 多云转雷雨

早工仍办学习班。分班讨论。上午与刘在乌坑砍柴。11点半即回家。基本完成任务。中午睡了2个小时。下午我俩在船仔坑砍柴。5时许，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我们把柴全部挑到路上，冒雨奔回家。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晚上的学习班因不少人挨了雨淋而暂停。

1970. 7. 9 星期四 多云转雨

早工仍是办学习班。同前几次一样，没有什么成果。上、下午均在拿埠口割稗草。上午收工后，与刘一起把昨天下午砍的柴打了箍。午后洗了衣服，还睡了一觉。傍晚又开始下雨，雷电交加。晚上的学习班刚开始，雷雨大作，电灯暗了几下，估计可能会熄灯而中止。后来因雨小，灯未熄。

1970. 7.10 星期五 雨

早工继续办学习班。仍是分班。还是谈不出什么来。大雨终日未止，全日未开工。午后2点半，继续办学习班。支书作了讲话。今年要奋战20天完成双抢，云庄三队有早禾1400亩，要栽连作800亩，任务艰巨。傍晚，学习班宣告结束。

1970. 7.11 星期六 雨

又下了一天雨，队里仍未开工。早上多睡了会儿。晚上队里开会布置双抢。今年的双抢有一个特点，即特别注重工分。

【忆与议】

拖沓不已、长达七天的学习班！也许对学习班缺乏兴趣，在日记中无从寻觅其中内容。倒是热衷于完成知青集体食堂的砍柴，关心即将开始的农忙不重政治重工分。这些才是不可须臾舍弃的生活必需。

如今许多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里常常提到，1970-7-9《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抓好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现在网上也不难查到原文。奇怪的是，我们当年正是在7-9前后连续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居然没有学习这篇社论！再想想，也不怪，7-9前后持续阴雨天，邮递员不会进山来，所以我们看不到报纸，自然也就不会把此内容列入学习班。而以后似乎也没有“补课”。

1970. 7.13 星期一 阴转雨

今天早工是掮竹子。因昨天下午劳累，今天醒得较迟，未出工。

队里是砍柴。除了桂一人外，几乎全部上海青年都未出工，砍食堂里的柴，以完成任务迎接双抢。刘、屠、郭、沙和我翻山越岭，跑到牛内田砍柴。一上午基本完成。把柴全部挑至山顶，挑了一担100斤回家。午饭后稍作休息，又挑了一担104斤回家。正值开始下雨。稍作休息，再去挑，随带又砍了若干，冒雨回来，71斤。总计275斤。超额25斤。

晚上较早睡觉，以恢复疲劳。班里开会讨论生活事宜。昨天晚上班长开会讨论决定，小评论出刊双抢专刊，要求每人写决心书。

1970. 7.14 星期二 多云

早工在牛门口割草籽。上、下午队里砍柴，未去。昨天砍柴时异物飞入左眼中，今天左眼充血，很不舒适。上午吃了2片苯海拉明。睡了一大觉。

1970. 7.15 星期三 多云

早工未去。上、下午在大园附件修马路。

1970. 7.16 星期四 多云到阴

早工未出。上午在短坑耘一晚。今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畅游长江四周年。根据上级指示，中午去水库游泳。

【忆与议】

当年不仅仅在大中城市，就连偏僻山村里也要举行庆祝伟人畅游长江的活动。1966-7-16的畅游长江实际上也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时值文革伊始，《人民日报》在1966-7-26配发重要社论，“借题发挥”，号召亿万人民“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帝国主义，不怕修正主义，不怕反动派，不怕一切牛鬼蛇神，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什么人间奇迹，我们都可以创造出来。”

1970. 7.17星期五阴雨因雨，早工和上午工未开工。早饭后写了一份决心书。后补衣。

【忆与议】

这年的“决心书”可能是插队期间我在这方面的唯一“杰作”。近日发现，1974-3，我把那份“决心书”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使之保留至今长达四十余年。其过程估计是这样的：1970-7-17留下了“决心书”的草稿，四年后的1974-3我开始寻觅“病退、离村”的途径（参见《改变命运的一跤》），逐步处理一些杂物，又不忍一概毁弃，遂抄录下来。

决心书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七十年代第一个夏收夏种双抢战斗已经来到。

我决心，在双抢战斗中，坚持革命统帅生产，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双抢战斗的火线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虚心做贫下中农的小学生，主动接受再教育。立足农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打粮食，多做贡献。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夺取双抢战斗的全胜，夺取思想、劳动、体质三丰收，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忆与议】

把报刊上的时髦话语、豪言壮语收得多、编得妙，是当年这类“决心书”的通行特色。“夺取双抢全胜”属于年年必有的通用口号，并不稀罕；如今，觉得生疏的是“夺取思想、劳动、体质三丰收”，也许它特别适用于“接受再教育”的知青。然而，这一年恰恰是在体质上打了大败仗。后详。

第二次参加双抢

重读四十年前的日记，许多储存在脑海深处的记忆渐渐浮出水面，思绪万千。

1970. 7.19 星期日 多云

早工未出。上午在东边割禾。双抢战斗是今早打响的。现在还是前哨战，大战、苦战还在后头。我班男生六人加上SY、JL、RX、ZX共十人，半天割了五担谷。下午在塘坑割草籽。男生六人加上李、潘两人共带回六捆“筷子”。

【忆与议】

双抢前哨战还是有一些公私兼顾的余地，知青带回的六捆“筷子”是指在山上砍来的灌木柴禾，细细长长的，适用于引火，是灶头每次生火时不可或缺的。

1970. 7.20 星期一 晴

早工在东边门口割草籽。上午和下午在东边割禾。上午十人，男生三人、女生两人加上SM、QX、GC、ZJ、KS割谷六担。下午八人，QX、GC未到，ZJ换FX，割谷四担半。

【忆与议】

从半天割谷的数量来看，人均只有半担左右，说明确实还没有进入大战、苦战阶段。

1970. 7.21星期二晴早工在东边扯秧。上午在东边割禾。八人，男生五个、女生两人加上KS，割谷六担。下午2点半搞芋头地。近日某对打禾机“恨之入骨”，对这一新生事物彻底否定之，说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能加40%的工分，竟可丢弃质量，浪费谷子？！

【忆与议】

日记中的恩怨之词，乃起源于当时脚踩的打禾机（脱粒机）缺少润滑油等维修保养，使用者费劲无比，引来众

怒。而“加40%的工分”一说，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工分簿。查查、看看、想想，回忆起当年的集体经济为了保护和提高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真是煞费苦心。

当时一日三工，早工、上午工、下午工，按2:4:4的比例计算一天的出勤率和应得工分数。1970年春插之前一度作了改动——早、上、下的比例改为1.5::4:4.5，原因是下午的劳动时间比较长，往往超过上午，于是一些村民觉得有机可乘，就想方设法不出下午工，这样一来早上与上午的六成就划算了。针对这样的现象，生产队决定，压低早工的比例，从原来的两成降低为一成半，从而把下午的比例提高到四成半。

对于农忙季节的工分，也作了调整。1969年的激励办法是，春插、双抢期间是统一增加工分，即在底分上增加20%。此法延续到1970年春插，发觉如此作为的效果并不好，仍然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没有什么差别。于是到双抢期间加大激励的力度，把加分幅度增加到40%。结果还是没有什么激励作用，1970年双抢结束后总结经验教训，不得不把在副业生产上已经初见成效的“多劳多得”扩展到主业生产上。时过境迁，返顾这样的变化过程，忒有感触，对“大锅饭”的明显弊端是切身的感受和反感，对“大锅饭”的点滴冲击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后详。

1970. 7.22 星期三 晴

昨晚分了组。经过摸彩，我、陆、李三人跟QG组。刘郭潘跟FX组，宋、沙、徐、屠跟QX、HD组。今天早晨在东边割禾。上午开始分组。QG组到榨边。李、陆和我及ZH组成一个禾戽组。铁骨矮没熟透，没有三百斤一日，一下午仅131斤。陆与ZH割，我与李打。一天下来，双臂很酸。

1970. 7.23 星期四 晴

今天在榨边。比昨天好不了多少。又打了一天禾，双臂更酸。左手手指也开始疼痛起来了。

干部到公社开双抢誓师大会。晚上开群众大会，宣布从明天起要完成任务。

1970. 7.24 星期五 晴

今天仍在榨边。有300、350两种不同的田。我们组割了近八百斤，超额十多斤。QG组超了一二百斤。FX组亦超了200斤左右。早上五点即起床，数第一。

晚上公社裴部长召开大队基干民兵会。宣读了中央7.21关于四届人大的文件。后又就双抢作了动员。

今天打禾一日。右手食指、无名指已破皮出血。

1970. 7.25 星期六 晴

仍在榨边。陆因割破了脚，去QG组踩打禾机。李、ZH和我三人一个组。除上午外，又打了半天多禾。今天更不

行，双手痛得不行。左手食指被割了一刀，左手真是“伤痕累累”，咬着牙关挺了过来。臂酸已发展到痛了。早上五点多开始。完成任务，还超了三十多斤。明天可能无法完成，因田差又任务高。

1970. 7.26 星期日 晴

今天仍在榨边。ZH和李、我三人一个禾戽组。昨天吃完了“老本”，但今天早工与上午硬是完成了任务。下午本可完成，但没禾割了，还差四十几斤。榨边割禾基本完成。禾桶已回到仓库边听候新的分配了。手上用了昨晚费借予的指套，疼痛稍好些。

【忆与议】

记得当年推广矮杆品种，阻力之一是矮杆稻收割的时候弯腰的幅度大，几乎是紧挨地皮割稻，否则割下的稻杆太短，不便脱粒操作；阻力之二就是脱粒难，比高杆品种脱粒费劲得多，这是矮杆品种的特色之一。其中又以早熟的“铁骨矮”更为突出，稻杆又硬又矮。所以，人工甩稻更需要抓住稻杆使劲甩打，不要几天，手指皮肤就被磨破。插友中有家长具有先见之明，早早寄来保护手指皮肤的塑料指套，帮助大家度过难关。

这年7-24晚上传达中央7.21关于四届人大的文件。这在网络上一下子找不到相关资料。这也难怪，四届人大是十年文革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70-3开始筹备，到1975-1正式召开，历时近五年时间！而理论上却是人大每五年换届一次。所以这本身就是极其不正常的，还发生了1971-9-13的副统帅折戟沉沙！可以想见，有关的信息资料，翻来覆去，何其多也，全部解密遥遥无期乎？

1970. 7.27 星期一 晴

因劳动力没有安排好，早工出得很迟。我们禾戽组四人把禾桶拖到牛门口下面。虫害极重，加上无心割禾，早工仅50余斤。上午在榨边栽禾。下午与陆两人在牛门口割禾，按任务还差二十斤左右。

1970. 7.28 星期二 晴

早工在东边栽禾。8:40收工。上午分配我们到扇的坑扯旱秧。天热心烦，上午仅扯90只，折1.5分。下午在乌坑扯，156只。某人应当问心有愧，暗中舞弊，少扯多数，以一作几，实在太不应当。早工扯了25只水秧，另挑了2担秧。

1970. 7.29 星期三 晴

早工在乌坑扯秧。心平气和，不紧不慢，扯了120只。某拼命加作弊，164只。从中作弊，这是什么作风？！

上、下午在榨边栽禾。因上午李、陆和我三人是从乌坑到榨边，去得较迟，社员不愿与我们一起栽，于是三人

干脆另起炉灶，一日栽禾近3亩，基本完成任务。上午到1:30收工，下午又到7点半收工。

【忆与议】

当年按底分规定任务，也是难以解决“积极性”问题。如7-24日记中所说，小地名“榨边”的田块也不能一个样，按照品种、生长情况等因素，分别制定了每10个底分300斤、350斤两种指标。但也只能是一种大体合理的办法，如果斤斤计较到每块田的情况也有不同、区别对待，那是无法操作的。

可以耍些花头的是那年双抢的拔秧（方言称“扯秧”），规定的指标是每个底分60只秧把，由自己点数、报数，无人稽核。于是有人作弊，且很快成为风气，生产队不得不每天指定“算秧”者（专人点数字），杜绝作弊。后详。这些小事情上又说明了什么？私心？人性？

1970. 7.30 星期四 晴

早工和上午工仍在榨边栽禾。因任务不多，10:45就回到了家。下午到拿埠口割禾。陆、李、ZH和我4人，一下午割了三百多斤，超额完成任务。下午能超额完成是不简单的。但我感到身体开始有些无法支持了，下午打禾可谓有气无力矣。

1970. 7.31 星期五 晴

昨晚开了干部会议，班长们参加了。会上公社干部批评了云庄的低产，产量竟低于其他大队的最低产量；批评了没有发挥打谷机的作用，浪费严重；批评了在关键时刻犯了关键错误，虫灾严重，把责任竟归咎于QG（负责打虫药）一人身上。

早工我们四人在拿埠口割禾。公社柏主任、聂部长从云庄去拿埠检查生产，路经过们这儿，命令停止割禾，说无打谷机不准割禾，指出用禾桶打禾，每亩浪费达五十斤！我们执行了命令，挑谷回来，仅99斤！上、下午是灭虫。我与陆未去，休息在家。晚上队里开会，布置开夜工、增产节约等事宜。

【忆与议】

已经不记得那一年的水稻虫害是怎么一回事了。真是流年不利。1969年的早稻眼看就要收获，6-30一场山洪，损失惨重，减产四成！1970年又遇到虫灾，倒找到了替罪羊，负责打虫药的人！其实，那位副队长是个力大、听话、肯干的贫农子弟，然而缺乏文化知识，更难以胜任灭虫重担了。幸而没有深究责任。

现在想想，要把水稻产量搞上去，实在是个覆盖水稻生命全周期的“系统工程”，单单春季育秧插秧“早、小、密、矮”，再加上矮杆化，竭泽而渔式的施肥，就够了吗？防治病虫害方面的缺失，已经显现出来；收割环节

的脱粒也没有提前做好应对措施。结果，能够帮助解决“脱粒难”的脱粒机没有配套跟上，面对人力甩打造成的严重浪费，公社干部的杀手锏是停工！没有脱粒机，不准割稻！

1970. 8. 1 星期六 晴

今天在拿埠口割禾。根据前几天夜里开会的精神，打谷机人员作了调整。原来我们4人的禾戽组拆散了，陆、费和我以及志和参加七根等4人的打谷机组。我们终于从落后的禾桶中解放出来了。今天早饭是在拿埠口吃的。身体不好，社员照顾我，中午叫我挑了一担八九十斤的谷回来，一口气到家后，又到村口串了七根一担130斤左右的谷。下午收工，搬打谷机到门口，我挑了一付架子，上置打谷机盘、板等物，有六、七十斤。全天割禾2284斤，超了16斤，底分达64.8。风祥今创最高纪录，634斤（超额）。

【忆与议】

读到“社员照顾我……”，下文还有类似记录，犹如旧景再现，不禁感慨万千。时至今日，当年的小伙伴在长途电话中言及往事，每每对当年知青的“恰苦”（吃苦）也是感慨不已——你们知青正好赶上了我们那段艰苦的日子！

日记中说“串”一担谷，使我想起当年挑长途重担的一种方法。假如某人在数里之外有百斤以上的重担，又不可能一次一担挑回家，就采用“串”（谐音，也接近“传”的发音）的办法：分作A、B两担；先挑A担，跑了一段路累了，卸下肩上的担子，但不停下休息，而是回头去挑留在田里的B担，也就是利用这段“回头路”喘了气接了力；把B担挑回家以后，再回过头去挑留置在路上的A担，又是利用“回头路”喘气接力。这样的办法可以用于两担以上的情况，也可以用在更长的距离上，即“中途的留置”可以不止一次；还适用于多人互助。日记中，我是感激社员对我的照顾，挑着较轻的担子，先行到家，然后回过头接了一重担，这种方式也可以称为“串”。

我在“69日记选”的《回想那一年年的“双抢”（续）》里含糊其辞地说——1969年夏天，云庄村首次“引入”了几台脚踏脱粒机，次年大面积推广。而《《1970日记选（31）第二次参加双抢》又有这样的记载——1970. 7.31，昨晚开了干部会议，班长们参加了。会上公社干部批评了云庄……没有发挥打谷机的作用，浪费严重；……。早工我们四人在拿埠口割禾。公社柏主任、聂部长从云庄去拿埠检查生产，路经我们这儿，命令停止割禾，说无打谷机不准割禾，指出用禾桶打禾，每亩浪费达五十斤！我们执行了命令，挑谷回来……。

由此可见，1970年的大面积推广脚踏式脱粒机，是在行政命令之下实现的。这是我们下乡插队的那么多年里最有感触的情况之一，所以在日记中会写“我们终于从落后的禾桶中解放出来了”！这不由得又一次想起了一位插友不止一次地带着诡秘的笑容悄悄地背诵“最高指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闻者面面相觑，尽在不言中。我一次次听了，也一次次想过，可就是无法弄明白，教育农民是严重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偏偏还要我们知青接受他

们的再教育？知青究竟是什么呢？

1970. 8. 2 星期日 晴

今天在门口割禾。全日底分有59.2，任务有2368斤。大约超了100多斤。上午起让我负责出谷，虽不太累，但腰也很酸。早工挑了138斤。下午大约挑了八、九十斤。晚上队里开会，主要干部今天去公社开会，晚上传达会议精神，主要是抓紧双抢。昨、今天早上4点3刻就起床了。

【忆与议】

上述“拿埠口”距离村子大约三里路，村民照顾我，挑得轻一些（90多斤），所以，次日在“门口”（即村口附近），我就主动挑了139斤。近日，正巧看到当年自己在1970-10-14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载，“昨天下午称一称体重为93斤。7月份双抢前为101.5斤，8月份双抢期间为90斤。”以90斤体重屡屡与130多斤的担子PK，已经超过了1969年的记录（98PK110），见《首次参加双抢之三》1969. 8.12日记：昨天下午，收工时挑了一担110斤的谷子，是迄今为止我挑得最重的一次，且超过自己的体重（98斤）12斤呢！我确实是硬撑着，几乎是跌跌撞撞地挑到仓库的。

如今会有人看到这样的数据及其变化来为那场运动高唱颂歌，“这是劳动锻炼的丰硕成果！”问题是，这样的成果的代价是什么，又带来了什么？

1970. 8. 3 星期一 晴、多云

今天起来也很早，5点都没到。早工在乌坑扯秧，扯了108只。上午扯了180只。下午因土湿，尽管手上起泡，才扯了84只。

1970. 8. 4 星期二 晴、多云

今天我班大部分人休息。男生仅费、宋出了一天，沙下午也未出工。李也休息了一天。

1970. 8. 5 星期三 晴

今天栽禾一天。费、陆和我，加上树茂（除上午打碌碡），很有劲，天也不热，时而有风，十分快慰。

【忆与议】

日记中“打碌碡”的“碌碡”并不是北方农村中那种用来轧谷物、平场地的石制圆柱形农具，而是我自己杜撰的写法，当地方言发音接近“lu du”，它是一种牛拉动的农具，用于水田里收完早稻以后把稻茬打压入泥。不知道应该用什么称呼在网上搜索资料或照片，若以纯文字描述其形状、结构与原理是太费劲了，留待再版更新吧。

1970. 8. 6 星期四 晴

早工在坑后扯（水）秧，60只。上、下午顶替陆的任务：点秧并挑秧。上午除点秧外，扯秧10只，并挑秧4担，约410只；下午扯秧30只，挑秧2担，约220只。天黑才回到家。一天下来很累。加龙的爱人、梅发的爱人等很感谢我，因我帮她们挑了不少秧。相形之下，×遭到许多社员的批评，说他像监工。而他今天却说我是傻瓜！

1970. 8. 7 星期五 晴转阵雨

全天在尺仔背割禾。陆、费、李、我和树茂、春林、国栋，七人，超额完成了任务100多斤。下午一块1分多的田割谷220多斤。

天气极热。上午开工不久，身体极度不适，头昏脑胀，但也总算坚持到底了。中午下雷阵雨，下午凉快不少。下午，队里黑板报表扬先进。我班几乎全部受到表扬。仅三人未上报。晚上开大会，号召搞工效、树标兵，尽快完成收、种。

中午传出：昨晚干部会上，九生等对×点秧时凶如监工表示“看在五七大军面上，否则定揪出来斗”。确实×很不像话。但×不顾劝阻，与九生讲理。

【忆与议】

那一年种后季稻时拔秧也实行“量化管理”了，按工分底分定指标，指定专人点数核定工作量。这不是“好差事”。所以让“村外来的人”点秧，便于回避那些斩不断理还乱的亲情关系，防止徇私，以求公平。无奈，知青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再教育”，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天真单纯了。日记中×与农民关系恶化，正是由于知青与农民关系紧张、矛盾激化，知青乘“掌握点秧大权”之机冲动泄愤。幸好这样的紧张没有进一步升级到揪斗知青的地步。

我之所以“傻”，是我对安排拔秧的体弱劳动力（若不是农忙季节，很少下田劳动）“予以优待”，帮助他们减轻一些翻山越岭挑秧的负担。如今看这些日记，回想起那些岁月，不禁想到“将心比心”的老话。村民看到我体弱，在挑谷回家时照顾我，让我少挑一些；而当我看到体弱劳动力也要挑几十斤的秧担翻山越岭，实在于心不忍……。或许现在有人会把这些上升到“水乳交融”之类的美好境界。我以为，这只是表明“良心互动”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第二次参加双抢（续）

回首往日的日记，唤醒了对当年“树标兵、高工效”的记忆。

1970. 8. 8 星期六 晴

今天又是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坚持出了一天工。今天出工特别早。昨晚裘部长要七根今天树标兵。七根在三点半就吹了哨子。我们也起了床。七根、树茂、志和、陆四人组成战斗组，四点半开始战斗，直到七点半才收工，全天割谷2000斤以上，每人平均近六百斤。

春林、国栋、迎祥、润英、惠香、费、李和我，共割谷2000多斤，超额200多斤。

【忆与议】

从1968-11以来的日记中看到，1969冬天修水库开始出现“再来一次大跃进”的口号，同时也出现了“劳动竞赛”“挑战、应战”等形式（参见《亲历“新的大跃进”》），但在1970春插时则没有采用这类形式，到1970双抢时“劳动竞赛”复出，名称是“树标兵”。从无意之中留下的记录来看，这样的“竞赛”并非“群众的自觉行动”，而是来自公社干部的要求，尔后出现此伏彼起的热潮，表明“群众发动起来了”。

1970. 8. 9星期日晴又坚持出了一天工。上午精神还可以，下午就不行，无力割快了。今天由于QG安排不好，竟在下午加了三人，结果未能完成任务，还差80—90斤左右。今公布，昨天七根创纪录，平均每人割谷587斤，每十分底分为716.7斤，超产斤。刘、郭今天早上受FX的气，上、下午未出工。晚上只听得他们大发牢骚，什么“读书无用”，“前途渺茫”，实在刺耳。

【忆与议】

没有记住第一次“树标兵”的超产实绩，但是记下了知青难以发泄的愤懑，录下了知青对插队之路的迷茫。

1970. 8.10 星期一 晴、多云

陆、费两人昨晚决定今天搞栽禾高工效，胃口很大，要栽6.9亩。早上很早就起身了，我因太累，直到5点多才醒来。早工和李到乌坑扯水秧60只。上午到坑后点秧挑秧，挑了三担，秧完结束，三担有秧近500只。挑秧结束，陆身体不适，回家。我就接替了他。中午没休息多久，1点半就出工了。全日栽了4亩。工效不低。

四班除胡、夏外，今天晚上起搞高工效。加恒、高生两人昨晚至今通宵（仅睡两小时），平均每人割谷900多斤。沙、屠两人今搞打禾桶，累得要命，还差4斤。

【忆与议】

这一年的立秋日是8-8，不记得为什么到8-10还在起早摸黑插秧（后季稻）？日记中“高工效”的说法也就是“树标兵”之后的“群起而仿效”，在没有什么新技术新农具的情况下，“高工效”的实质就是延长劳作时间，

拼体力。

1970. 8.11 星期二 晴、多云

今天费、陆、李和我四人加上国栋（5人）组成一个禾戽组，底分低，指标低（当然产量也不高），到中午即完成了近千斤，只剩165斤了。下午加了个志和，增加了98斤，但也无妨，从容得很，不紧不慢，还超额了100多斤。事实上，大家都很累了。费昨天栽禾，陆日前搞标兵，体力消耗很大。我则是在坚持又坚持，真可谓硬撑。

今公布，8月9日，正英、润祥栽禾，每人3.79亩。8月10日，加恒、菊孙割禾，平均每人割谷948.5斤，共割1891斤。8月10日，费、陆栽禾，平均每人2亩。在这以前，德才等5人栽禾，平均每人2.2亩，10分底分3.6亩。风祥禾戽组超产634斤。今天德才禾戽组又和四班竞赛。社会主义革命竞赛轰轰烈烈，蓬勃开展。张因得疟疾，上午起不得不退出战斗。我和费、陆早工后帮四班各挑一担。我一担有137斤。

今公布的红榜中，仅写了陆、费两人的名字。开始我心里怏怏不乐，觉得委屈、懊恼、吃力不讨好。但后来渐渐感到这种思想不对头。我不应该为个人争荣誉。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晚上吃新米饭、新米粥。大家都感到格外香甜和亲切。因为这是辛勤劳动的丰硕果实呀！

【忆与议】

无论是叫“树标兵”还是“高工效”，这样的“竞赛”里面有很多说不明、道不白的名堂。

栽禾（插秧）以田亩数为“竞赛”的目标值。看起来很简单：一块块田的面积数字不是一目了然的吗？恰恰相反！使我们知青不可思议、大惑不解的是，当年农村中最基本的参数之一——农田面积居然是一笔糊涂账！

当时就听村里人说，此事起源于民国时期，政府采用航拍的办法获得照片，并被确定为具有法律效力，以这些照片为依据，对山沟里的梯田逐块确定面积。由于航拍的结果有一定误差，就出现田亩数或紧或宽的现象，即田块的实际大小与航拍照片给出的数字这二者之间不一致，所以，就把实际面积小于法定面积的称之为田亩紧，反之即为田亩宽。对于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又规定了只有政府的有关管理部门才有权更改数字。据称，这些数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与确定粮食征购任务有关，所以不能任意修改。而核准田亩数这一工作从来没有开展过，“名不副实”的田亩数也就一直延续下来。

另外，航拍之后几十年里还发生了不少实际变化，例如有的相邻的小田块合并成大田块，田埂减少了，耕作面积增加了，但是基层无权据实修改田块数量和面积数字；又如开挖了水沟或修筑了拖拉机机耕道这样的农田基本建设，减少了耕作面积，同样无权按实减少面积数字。这就造成了新的“名不副实”。但是，同样也不能由基层生产

队自行修正田亩数。

在开始实行“多劳多得”的“计件记工制”以后，生产队的干部常常在晚上开会，讨论各小组之间在田亩数上合理搭配，防止明显的“合算”和“吃亏”。到了“竞赛”的时候就更加看重田亩数了。如果傻乎乎地自告奋勇地搞“高工效”、随心所欲下到田里就开始“竞赛”，那么十之八九会在田亩数上吃亏。总之，在“竞赛”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猫腻。

1970. 8.12 星期三 晴

今天休息一天。今公布，昨天，汤、毛、董、胡、徐、郜六人共割谷4002斤，超产2566斤，平均每人667斤，十底分千斤以上。另外，德才、年祥、永新、高英、当仔五人昨割谷4005斤，平均每人801斤，十底分925斤。

【忆与议】

这天的“竞赛”结果，知青并没有全盘皆输，“竞赛”对手在人均产量上取胜，但按十底分的计算结果则是知青占优。其原因在于知青的工分底分普遍较低。不过，知青从上述结果中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从对手的组成来看，他们五个人的底分是三个高、两个低，但是按照惯例，他们五人不可能大体平均地获得当天的工分所得，尽管在割禾的此时此事上大家的贡献并不像底分表现出来的那么大的差距，但是有一条是不可逾越的——底分是记工的依据，所以，“同工不同酬”，底分低的人必定吃亏。由此而想到了知青自己，觉得应该提出要求“独立”，即：农忙季节里由知青单独组成小组，就有希望在“计件记工制”的情况下打破知青底分偏低带来的不合理记工结果，这样，至少能使知青在最劳累的农忙季节获得相对合理的报酬。不能公开的说法就是，避免在“混合编组”的情况下知青“被剥削”。后来的情况也是这么发展的，次年（1971年）春插开始就出现插队知青季节性的“独立”成组，并且一度红红火火、轰轰烈烈。

1970. 8.13 星期四 晴

早工割禾，与费、陆、志和、七根等在一起。上午，××叫我去东岭背拔秧。接受了一次锻炼。中午回来时，挑了一担80斤以上的秧（100只水秧），翻山越岭，凯旋而归。这是生平第一次的挑担爬山锻炼，但体力不支，饭后有轻度中暑现象，头昏、恶心、无力。下午割禾。××这一决定，使费、志和、树茂三人仅剩的80余斤上又加了一倍。当然我也只能吃些苦，多出些力了。

【忆与议】

东岭背那个小山村与云庄之间，在卫星图上不足2公里直线距离，估计实际路程在三公里以上，山高坡陡，曾经徒手去过那里。这天到东岭背拔秧挑秧，挑担上坡下山确实不易。当年有九个知青在那里插队，为了碾米等日常生活的必需，不时挑担往来于山岭之间陡坡小道。若是我，很可能早就累得趴下了。

那个小村庄是偏僻之地，没有十户人家，直到现在仍不通汽车。曾经多次要求县政府列入规划，但每每遭到拒绝，理由是东岭背村的人口太少，投入几十万元修公路，效益差，所以，县政府希望那里的村民“下山”，迁移到几里路之外一个通汽车的村子。可是，村民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政府也不修路，就这样僵持不下。有人说，也许是让那个村“自生自灭”吧。

日记中记下了那天下午我被安排去割禾的顾虑和压力，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当年生产安排中最大的忌讳。因为名义上是早工、上午工、下午工按2:4:4的比例计算，实际上，完成全天指标的主要精力与时间是在早上和上午，下午是全天的扫尾，可以相对轻松一些。所以，到下午再被安排到组里去，是很不受欢迎的。

1970. 8.14 星期五 晴

早工与李、树茂三人栽禾。上午起，七根又叫我改去割禾，与七根、志和、国栋和李五人一起。下午，七根又叫李及今休息的费去栽禾。我体力不支，但也只得拼命干，硬是拖着那几位老俵一下午完成了520斤以上！全天超了77斤。中午下了一阵雷雨。

1970. 8.15 星期六 晴

不知为何，××总不让我栽禾，而我是打算以栽禾来调节一下体力的。今天我又被分配去割禾。早工是与费、李、春林、树茂一起。头昏、脚软，故自上午工起休息在家。

昨天刘与队长就出工问题争了一次。据炳新说，队长就此向支书告了状。

1970. 8.16 星期日 晴

早工，费、李、我及七根、国栋、志和、树茂、迎祥全部栽禾。原来七根让我上午跟他及树茂、志和去水库下用禾幅割禾，其余栽禾。我很气愤××老是照顾地富分子YX，故到上午临出工前，自己体力不支，硬是让YX去割禾去了。于是上午我们是五个人栽禾。我们的栽禾也到此全部完成了。身体不好，头昏脚沉，浑身无力，下午没出工。看来得好好休息一二天，以恢复体力。

【忆与议】

如今觉得大惑不解的是，这一年怎么会到立秋以后八天才完成后季稻插秧？翻翻当年十月份的日记，也找得到相应的秋收记载——“栽得晚的田，像割韭菜一样，禾长不到一尺，又没有穗。”既印证了“不栽立秋禾”的正确，更对那年的实况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双抢期间，无论知青还是村民，都渴望有机会被安排去栽禾以调节体力，因为栽禾相对而言要比割禾轻松

一些。我真不记得当年自己曾经有胆量公然与副队长××对着干。但是，值得深思和忏悔的是，当年自己采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来为自己争得一天“轻松”机会。现在想来，人的本性很难说是“性本善”的，而在“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社会生活、只谈阶级性、不谈人性的时候，出于保证自己生活必需也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号，这些说明了社会生活走向极端化是何等可怕，那种阶级斗争理论能够指导实现人类大同么？！

1970. 8.17 星期一 晴

本准备出工，早工一起来就觉得头昏得很，就躺下了。干脆再歇上一天，为的是更好地投入新的战斗。

1970. 8.18 星期二 晴

早上4:45就起床了。因为昨晚干部会上批评了七根组进度慢。早工是七根、树茂、迎祥、春林、国栋、志和加上费、李和我三人在弓梅坑共一部打谷机，共割了5担。上、下午均在牛门口，分两张禾戽，七根、国栋和李、我四人一组，其余5人一组。我们组上午七根打禾，禾不好，虫害严重。下午我和李两人包打包挑，他们两人包割。

晚上队里开大会，批判斗争了地富子女志虎、当仔、康仔、康根。近10点半结束。

【忆与议】

日记中没有记录斗争大会的内容。其实，那样的斗争大会也是为了服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要求而开的，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具体事实依据，却苦了那些地富子女。他们的父辈因为是地主富农而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作为子女的也动辄挨斗，株连九族何其荒诞！

1970. 8.19 星期三 多云，午后雷阵雨

今天到船仔背割禾。七根、春林、迎祥、志和、费和我，早工树茂上午换国栋。照顾我和志和，我俩较少，90斤左右。可也累得够呛，浑身湿透，汗如雨洗。右腿跟淋巴腺肿了起来，实在累极了。午后下起雷阵雨。因此下午未割禾，改耘禾。从身体考虑，下午未去。补了件汗衫。

今队里杀牛两头，一个脑壳半斤。

【忆与议】

如此酷热，如此大忙，直到临近结束之时，犒劳方才姗姗来迟，也不过是人均半斤牛肉而已！

1970. 8.20 星期四 阴雨转晴

早晨刚巧开工，天下起雨来。早工、上午均是耘禾。未出工。午后转晴，下午牛门口割禾，没有去。体力已下

降到最低点。右腿淋巴腺肿三天来一直未消失。昨去船仔背，今天两脚迈不开步，更不能小跑。

食堂至今已5个多月了。出勤高带来的是菜园荒芜。——这是生活上。思想上是工分挂帅的进一步滋长。今传干部会已决定，陆与汤去修井冈山铁路。汤得知后，第一句话就是“这一来，工分没有加了”。

【忆与议】

当年“再教育”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工分挂帅”，“斤斤计较”，先谈活命再说革命。这恐怕是“再教育”的始作俑者也没有预料到的的结果。

1970. 8.21 星期五 多云

今天休息了一天。淋巴腺发炎逐渐消去。

想不到这儿对计件记工制是如此推广，耘禾也将实行分组，分片定任务。这几天为了劳动力分配、田亩分配、定指标，我组吵得不可开交。如此发展岂不是工分挂帅、物质刺激？！

【忆与议】

那时候的思想很混乱、很矛盾，实行“计件记工制”对插队知青来说也确有“实惠”，可以冲破压低知青工分的做法，但在连篇累牍的“社论”文章灌输下，又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计件记工、多劳多得，是不符合大寨精神的，属于修正主义的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了。

其实在这种纠缠不清的“理论”之外，还有许多现实的困难，“田亩分配”就是一个难以越过的坎。详见《1970日记选（33）第二次参加双抢（再续）》。如果说，农忙季节的“竞赛”涉及田亩数还是一种小范围的偶发事件（不会整个农忙季节天天定量化地“竞赛”），那么，农闲时节的耘禾也要“计件记工制”就不得不面对全范围的“田亩数难题”了。云庄村有1500亩田，分成大大小小的数百块，当中究竟有多少田块“名不副实”？“名不副实”的程度又如何？没有人说得清楚。在实行“多劳多得”之前，还可以回避这样的难题，到了“多劳多得”来真格的时候，为求得合理计量，就想出了“田亩分配”的办法，就是把田亩数宽与紧的田块予以搭配。想法是很好的，实际是很复杂的，怎么可能不吵翻天。

1970. 8.22 星期六 多云

今天在乌坑割禾。四个老俵加上费与我两人。树茂上午换国栋，另加龙、春林、迎祥。上午回家时挑一担九十斤，下午整一百斤，均一口气到家。

1970. 8.23 星期日 阴转雷雨

早工和上午工把乌坑割完了。这六成共8个人（七根、国栋、春林、树茂、加龙、迎祥、费和我）。下午七根准备修路去，费休息。六个人把打谷机抬到让陂，才割了一担谷，下起倾盆大雨，到猪场躲雨，但也淋得浑身湿透，等了半个多小时，雨小，回家。

1970. 8.24 星期一 阴有阵雨

今天休息了一天。七根组割禾进度慢，刘、郭调至此组帮忙。

1970. 8.25 星期二 多云

割禾已近尾声。今天上午，春林、国栋、树茂、迎祥、加龙、刘和我七人的打禾机割完了让陂，打禾机、禾桶抬到大长坑。下午开镰收割大长坑。风祥已在上午全部完成，厚德组下午亦完成，均再帮七根组收割。今天与刘俩轮流踏，都是一个人打、五个人割，相当紧张。晚上开大会，布置生产——田间管理。会后三组分了耘禾小组。由风祥、启祥、厚德各带领一组。

1970. 8.26 星期三 晴

三组今天宣告双抢胜利结束，荣获第一。

【忆与议】

那一年的双抢是很有点诡异的，云庄村生产队的三个组中最快的也到8-26才结束，长达39天。据插友回忆，很可能是流行什么疾病了，记得不少村民有气无力地说“nin（第二声）nia（第二声）go（第一声）”，意为自己感觉乏力。

1970. 8.27 星期四 阴有雨

前晚大会上支书通知说，27日晚公社放映电视纪录片《智取威虎山》。并鼓动大家前去观看。可是事到临头却又变了卦。早上，我班包括我在内五个男生兴致勃勃走到村口，迎头遭到支书、风祥等干部的拦阻，他们说，公社来电话说“不准未完成双抢的大队去看电影”，只得折转来。刘、屠、金仍决定去，走村大门“溜”走了。我和郭折回宿舍。后听说拖拉机去二队装柴，并去新干。我决定乘机到新干去一次。下楼到村大门，恰拖拉机经过，便一直抵县城，时为十一时许。在路经裴家生产队见刘等三人在缓缓步行哩。到书店买了一部《马恩选集》及《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工农兵国际问题评论选》。下午1时乘客车于2时抵麦斜，见刘等三人。买了一刀信笺，书家信一封，告知《马恩选集》已购到。晚上冒着小雨观看了《智取威虎山》，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杨子荣等光辉形象给我们以极大教益，在他们鼓舞下，电影结束后，我与刘、屠急速行军，用2小时的时间赶回云庄，12:15回到家，时速12里/小时以上。

【忆与议】

那时候上海的机关与文教单位开始学习马列原著，一时间“洛阳纸贵”，上海的书店里买不到《马恩选集》（四卷八本），所以父亲让我有机会的话到相对偏远的小县城里看看。那天我到新干是顺利完成任务了。似乎也体现了“城乡差别”。

那晚看的电影是第一次把“样板戏”拍成的电影，不过，是黑白的电视纪录片！现在可能已经极少有人记得这个版本的影片了。1970年的时候国内还没有能力生产制造拍彩色故事片的胶卷。即使如此，它毕竟是文革开始四年多来首次新摄制的电影，所以，我们是饥不择食，到几近30里路之外的公社所在地“一睹为快”！如此“长途跋涉”去“享受”电影的乐趣，我是第一次，好像也是自己七年插队岁月中唯一的一次。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五：1970日记选议（10-11月）：

病魔突袭集体户

那年的双抢结束后不久，云庄村的知青真是遇到了多事之秋——在工分问题上知青与“原住民”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冲突（见《1970日记选（36）心潮难平过中秋》），也迎来了知青上调的一线曙光（见《1970日记选（37）心潮起伏过中秋（续完）》），但是没有想到，病魔在不知不觉中突然袭击了知青集体户。尽管当年双抢之前高喊“夺取思想、劳动、体质三丰收”，但是面对肝炎来袭，云庄村五分之一的知青败下阵来。人的意志不可能决定一切。

1970.10. 1 星期四 晴

今天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上午，我们围聚在半导体收音机旁，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收听了首都人民欢庆建国二十一周年盛大集会和游行的实况广播。一颗颗激烈跳动的红心，一张张豪情满怀的笑脸，表达了亿万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敬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全国全军的最高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

下午随手翻阅了一些书籍，有《文学》《十万个为什么》及文革资料等。因感到浑身发烫，头昏不适，还睡了一个多小时。发电站DS生去新干，ZH一人发不了电，结果国庆之夜竟是黑暗，实在不大像话。今年国庆，队里连一幅标语都没有。

【忆与议】

当年的城乡差别体现在节假日氛围上是很明显的。记得当时我们深有体会的是：沿袭千百年的民俗节日与农业经济密不可分——清明在春插大忙之前，端午在春插大忙与双抢大忙之间，中秋在双抢也即早稻收获之后，春节在全年收获结束之后，如此等等，没有一个民俗节日是与农忙挤在一起的。如果说，插队那些年是在“接受再教育”，那么对民俗民风的初步了解与理解可以算作“成果”之一。当然，如果就此认为，当年那种“再教育”是了解民俗民风的好办法，就是不可取的极端化了。

1970.10. 2 星期五 晴（多云）

上午起，继续修水库。我未出工，因前几日着凉，昨起腹泻，今晨起更甚，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就要泄一次。乃近年来第一次。一天中竟泻了9次，4:30，6:00，7:30，9:00，10:30，13:00，16:00，17:30，19:30。

1970.10. 3 星期六 阴

腹泻仍不见好转，今天未出工。一天中又泻了十来次。不过多是脓血。根据书上描写来看，为细菌性痢疾。下午向[赤脚医生]汤买了10粒S.G.，服用治疗，加上挂号5分，共为0.18元。

1970.10. 4 星期日 多云

腹泻不见好转，仍未出工。后半夜竟起床两次。又买了8粒S.G.，仍不见效。晚上郭让我服用土霉素，望能见效。

1970.10. 5 星期一 晴

服用土霉素后，有一定效果。腹泻次数减少，病情好转。

1970.10. 6星期二晴腹泻经服用土霉素治疗，今天已有明显好转，次数骤减为3次，近于正常了。但身体垮了不少，虚了。

【忆与议】

这是我到云庄最初两年中最明显的一次病患。日记中的“赤脚医生”也是插队知青，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走马上任”的，但是这样的“赤脚医生”纵然有热忱服务之心，也无奈于未经有效的学习培训，犹如“药品保管员”。真正缓解病情的是歪打正着。现在有人把那时候的农村医疗说得神乎其神的美妙，神马“不要出一分钱”云云，也许真有那样的地方，但其覆盖面究竟是多少，值得研究。因为我们插队的地方别说各级医疗机构里挂号费、医药费等等“一应俱全”，就连“赤脚医生”也都是“一分不能少”。

1970.10. 7 星期三 晴

腹泻已经转为正常了。但感冒又上来了，大概是体虚，各种病菌乘虚而入，兴风作浪起来。

昨天开镰收割一晚。今天全部铺开了。仅有十二个人上水库，东岭背、艾家园昨晚回队的。拿埠今晚回队。晚上无灯。班长们开会，决定了日后萝卜菜管理、搭猪栏事宜，并决定明起由陆、胡暂代李、周两人烧饭。李一周来身体极差，周一人顶两人，亦筋疲力尽也。

1970.10. 8 星期四 多云

身体已复正常，感冒不轻不重，却也恼人。但体虚无力，稍有动作就会满头大汗。据说一晚收起来后要修山哩。早上和早饭后阅完省五七大军办公室编的《极其可贵的第一步》。李由王、周两人陪同去新干检查，诊断为黄疸肝炎。李已决定返沪。王回来为之取衣物，明日即启程回沪。此消息出人意料，十分突然。

【忆与议】

可以在http://book.kongfz.com/12901/88479004/查到确有《极其可贵的第一步》此书，作者：江西省“五·七”大军办公室编印，出版时间：1970-07，开本：32开，装订：平装。仔细一看，封面上的书名下方还有“（二）”字样。看来还是一本连续性的出版物呢。不知道其中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巧合的是，就在看“极其可贵的第一步”的这一天，实际生活中则是可怖的肝炎病魔向知青集体户偷偷袭来，这一天，第一个肝炎患者被确诊，自此以后，接二连三，络绎不绝。

1970.10. 9 星期五 阴

心情竟是那么烦躁，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原由。痢疾带来的体虚是相当恼人的事。一天没做什么事。

【忆与议】

这天的心情烦躁也是情有可原吧，刚刚在9-22有第一个插友跳出农门，仿佛露出了一丝希望的霞光，却又出现肝炎流行的黑色风暴。

1970.10.10 星期六 阴有小雨

送李返沪的王、周今晚回来，说张也患肝炎，已回沪；刘无甚；沙明日看验血结果。

1970.10.11 星期日 阴有雨

刘、沙回来了。张确是肝炎，已在昨天离新干返沪。沙肝炎复发，且较严重，已致函家中“请示”返沪问题。刘则没什么，化验小便结果尚正常。另外，郜近来身体亦不好，今由潘陪同去新干检查。桂也是有肝炎嫌疑，在大家苦口婆心的劝导下，同意明天去新干检查身体。

1970.10.12 星期一 多云

据潘回来说，桂已诊断出肝肿，肝功能如何尚待检查。郜初步诊断为肝炎，今已归队，验血单将由桂带回。然她不准备回沪，引起众人反对。我不知为何，近日来心情不佳，不愿多言。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桂检查结果，亦是肝炎，且比张严重。他已致函家中请示返沪与否。郜验血尚正常，乃腰子病也。

【忆与议】

日记中屡屡记载，知青已被“验明正身”是肝炎患者了，却还要向家里发信“请示”返沪问题。这正是当年插队知青的一大苦恼——就如同农民一样，一年到头几乎没有分文收入，全都盼望年终分红兑现。平日里有急事，向生产队借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知青患病之后要向家长求援，故有“请示”一说。其实，家长同意并资助回沪治疗了，知青心中还是至为痛苦，因为一切医疗费用都是自费的！在插友连续趴下以后，我就开始“保身价”了，减少出工，“自我保护”，总算躲过一劫。

染上肝炎以后治疗、休养的沉重经济负担，唯有父母家庭“全额报销”。插队知青就是这样的迈出“极其可贵的第一步”的“新一代农民”！也许，这些就是当年的插队知青如今不愿意谈论以往经历的原因之一吧。

1970.10.18 星期日 雨

据沙晚上与队干部接触后回来说，县革委来电指示，患肝炎者可予批准返沪。

【忆与议】

当年当时县革委会居然“网开一面”，放松了对插队知青出行的严格管理（参见《知青想回家看看》），足以见得肝炎流行的情况非同一般。不知道这类有关知青管理的电话指示会不会在县革委会存档在案？

从1970-10、11月的日记来看，那场肝炎大流行到11月中旬才告结束。在前前后后一个多月中，云庄有6名知青“中彩”，占知青集体户的20%。另外两个村的插友中也有3人染上此症。至今大家没有忘怀的是，那年肝炎的传染途径是这样的“连环套”：A发现肝炎了，B就送A回上海，按照当时的火车运行班次，在樟树候车大半夜，凌晨三点半左右A上车，当晚可以抵沪；B则返回云庄，当晚也可以回到村里，但一路上乘船、换车加步行，几经折腾，疲惫不堪，一两天以后开始发烧，服退烧药也无济于事，眼珠却开始发黄了。于是，C陪护B到县城检查，确认是肝炎，C再送B到樟树上火车回沪。于是，C“重蹈”B的“覆辙”。于是，就有了D……。每一“覆辙”周期差不多都是一个星期。记得11月16日最后一个云庄肝炎患者回沪进入卢湾区肝炎隔离室的时候，10月8日第一个走进肝炎隔离室的正要出院。在此之前，卢湾区肝炎隔离室早已从病员基本情况中发现，络绎不绝的患者竟然来自同一个生产队。再一打听，患者都是毫无任何防疫措施、孤身一人回沪，不禁惊呼：“你们怎么就这样一路‘放毒’回来啊！？”四十多年前就是这样的农村医疗条件！记得当年刚刚去插队的时候，对伤痛疾病之类并不当一回事。因为六十年代在学校里接受传统教育、引吭高歌“送瘟神”兴奋而自豪，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实在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模样。正是那场“再教育”使我们了解了真实的社会。日记里另有一条实录——

1970 .6.22 星期一 阴有小雨

傍晚5点，楼下一只鸡受惊发出急叫声。这时，从昨天起滴水未进的郭从床上跳了起来，神志昏迷，口中胡语，复倒于床，神志不清，呼叫不应。事情很是火急，小坑医院电话不通，只得送往小坑了，从队里借了一付担架。陆、宋、屠、刘和我以及程抬出村不远，正遇章、张、汤等，就一起去小坑。到医院，医生给他在人中穴打了一针金针，开始有所苏醒。在小坑的几个公社干部闻讯打电话给县革会叫了救护车。本来准备由本队拖拉机送至新干。7点多钟，费与徐也到小坑。救护车在9点钟左右到达。司机对这儿不熟，加上天黑，在调头时，后轮陷到沟里去了。几十个人群策群力，搞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车子搞上来。郭由陆、刘、章三人护送前去新干。余则返回云庄。已是11点。吃了晚饭，直到12点半才睡觉。

【忆与议】

三四里路外的医院（诊所）是呼叫不应，五十多里地之外的县医院更折腾了数小时。插队知青离开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亲历了穷乡僻壤的“集体所有制”下“公社社员”的实际生活，就会有“从天上跌到地下”的真切感受，理解了“三大差别”的真正含义，也领教了“消灭三大差别”的伟大理想。

永远没有绝对真理。再伟大再英明的“最高指示”也不是任何场合都能出现“奇迹”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这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而言，可以说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如何真正落实下去“阳光普照”？同样道理，把城市中学生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遥遥无期的“劳动锻炼”，连篇累牍的“理论学习”，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声色俱厉的“坚持扎根”，就可以实现“消灭三大差别”？

知青究竟挂什么帅

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那年双抢之后出现的工分之争，虽然其势汹汹，又迅即在知青开始上调这样的巨大诱惑面前，骤然而止了（见《1970日记选（36）心潮难平过中秋》），但是这种基于直接利害冲突的纠葛，并不会就此简简单单地归于风平浪静。

1970.10.11 星期日 阴有雨

本来打算出工的，可是事不如愿。早工男劳力掮板，女劳力挑黄土修窑。我们没有撑棍，掮板不得；欲挑黄土，却又有JS来阻挡说：“未分工的不准去挑黄土！”有什么办法呢？上午全劳力们种红花草，我们是不能过问的；却故意叫我们跟那些小姑娘去割禾，只能眼瞪瞪看他们出工，自己回来作罢。

【忆与议】

那个时候对山林大肆砍伐，直径几十厘米的古树被伐倒在深山老林中，再用大锯分割成几厘米厚的板材，然后人工掮出山来。这一步劳作离不开一种工具“撑棍”（也称sa gun），这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原始工具。

简单地说，它是一个歪头的Y形树杈，即一个Y形树杈，经过一个小直段和折弯，然后是一段粗壮的树杆。看似简陋，但是有不简单的功能。本来，掮这个操作是单人的，重量压在一边肩头上。但是，借助“撑棍”的桠杈连着的小直段与折弯，可以把一部分重量巧妙地传递到另一个肩膀上，非常合理，此其一。其二，路途一长，势必要歇下休息，此时，把“撑棍”从肩上取下，竖在身前地上，再把肩上的重物（都是长径比很大的圆柱体，如圆木、杉木、毛竹等）搁置到“撑棍”的桠杈上，物体的另一端则落地。“掮客”只要扶住“撑棍”不致倒下，就获得了休息的机会。由于“撑棍”桠杈的高度正好与“掮客”的肩部基本一致，所以，停下卸肩休息时和休息完毕重新上肩时，都不必大幅度地弯腰，省却了相当多的力气。总之，貌不惊人的桠杈在整个掮物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工具是千百年原始劳动的结晶，制作这种工具也有很苛刻的条件。首先是就地取材，选择材质既硬又韧的油茶树，然后选取其树干与树枝。为此，必须在山上的油茶树林中苦苦寻觅，心急不得。虽说仅仅是一个歪头的Y形树杈。但是要做成撑棍，就不简单了。除了对大小粗细有一定要求以保证工具有一定的强度牢度，更要求在几处弯折处满足更为苛求的角度。所以，在油茶树林里很难找到符合要求的天然原料，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偶尔看到了，就砍下来试用，那几个折弯与角度的苛刻要求，使得淘汰率很高。这样，“撑棍”就更显得珍贵了。有幸入围的树杆树杈，在老人的指点下精心雕凿，还涂上桐油一类的保护剂。家家户户都悉心保养，不肯轻易外借。如此代代相传，“撑棍”也被用得乌红发亮。祖祖辈辈的山民们借助它，从深山老林里掮出了无数板材、原木、毛竹。

当年插队知青下乡后的初期，血气方刚，曾经希望添置这种原始工具，但遭到婉言拒绝，因为太难寻觅原材料了。加之山林砍伐厉害，用“撑棍”、做“掮客”的机会也不大多。所以，缺少这样的工具，知青也不太在意，大不了就“无薪休假”吧。

那年双抢以后知青为工分闹起来了。于是，需要用“撑棍”的“掮客”活就首当其冲地对知青封杀了。其次，种红花草也有一些技术难度，在晚稻尚未收割的稻田里播撒种子，要撒得均匀，的确不易，既不传授经验，当然更不会安排。至此，你们不是要求“同工同酬”吗？就和女劳力一起干活吧！根据当地的惯例，女劳力的最高工分不会超过7分。用这样的“对策”使得知青“自觉自愿”地“屋里坐”（当地方言，意思是留在家里，不干活，自然就没有任何工分收入）。

1970.10.12 星期一 多云

今天出了个早工，在长坑仔（足耒）坎。而上、下午照例只能“屋里坐”。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已是连续两晚出大汗了。昨天早上搞三光时也“热”得出奇，满头大汗。大概是体虚的缘故。今天又只出了个早工，牛门口搞三光。上下午过得竟是如此无聊……。这几天真叫我苦恼极了。古人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青年人正是大有作为的时代，眼下竟如此浪费光阴，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竟一无贡献，真叫人心痛至极！

1970.10.14 星期三　阴

身体似乎的确是虚了，昨夜竟连续第三夜浑身虚汗。今天早上在牛门口搞三光时也是满头大汗，浸湿了半件衣服。昨天下午称一称体重为93斤。7月份即双抢前为101.5斤，8月份双抢期间为90斤。目前应当防止肝炎传染。同昨天一样，只出个早工，牛门口搞三光。

1970.10.15 星期四 阴

已是连续第四天只出一个早工了。也没办法。今天仍在牛门口搞三光。

【忆与议】

连续数天的种红花草使知青不得不“屋里坐”，而当年一些“原住民”的心态在一些公开场合显露无遗——

1970.10.20 星期二 多云

队里说我们上海青年是“工分挂帅”，看来会抓一下我们的出勤的。自己能否过得硬呢？今后的两个月将会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锻炼。各地都在深入广泛地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而我们这儿却背道而驰。例如在工分问题上，公然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计件记工制。今天在卢家斜开荒种麦，用尺量，计算平方。计件记工制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是必须废除！可是有人却在大力提倡、广泛应用、积极推广，实在值得深思！

【忆与议】

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帽子满天飞。“工分挂帅”也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用处。知青对同工不同酬感到不满，可以被批判为“工分挂帅”，这是因为“种田为革命”，知青又是“接受再教育”，所以在工分上有意见就是“工分挂帅”的具体表现。

有鉴于此，知青反唇相讥，把不满情绪扩大到生产队的计件记工制做法上，以大寨不搞计件记工制为理由，把

生产队的计件记工制做法扣上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

1970.10.24 星期六 晴

晚饭后食堂开了会。由徐主持。由徐传达了公社召开的干部会议精神，主要是两个“一”，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高潮和（一个）一打三反运动。我们大队要办五七大军学习班，因为目前问题很多。

一般说来，某些干部心目中的五七大军现存问题就是“翻天”。今天JS与董争执，不管如何，认为我们稍不服从就是所谓“翻天”，这决不是执行毛主席对知识青年再教育的指示，而是背道而驰。

【忆与议】

当时在一些人心目中，知青不服从就是“翻天”。而那个时代的“阶级理论、阶级分析”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之类的“阶级敌人”存在“翻天”的“痴心妄想”，所以要“狠狠打击”“彻底粉碎”。虽然“翻天”这样一顶可怕的大帽子没有正式给知青戴上，但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心理暗流，与之相联，知青如此“被安排”，又怎能使知青安心？

所以，知青仍然关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尽管全然掌握在别人手中——

1970.10.14 星期三 阴

今年冬季征兵将开始。今晚见有“下乡知识青年应征对象情况……统计表”，说明我们之中将有人光荣入伍。

1970.10.18 星期日 雨

据沙晚上与对干部接触后回来说，……此次秋季征兵有三、四名上海青年。

1970.10.25 星期日 阴转有小雨

今天方才知道，徐金花将上调到县办工厂了。

1970.10.26 星期一 阴

据郭等说，今有人来调查钟的情况，估计钟有上调的可能。另据费说，上海青年的档案材料均在公社，故上调概由公社掌握。

1970.10.27 星期二 阴

七根与王被抽去安福修“井铁”，今天下午出发。秋收以后，还要抽一批。据说我大队将有2人留在铁路上当工人。

1970.10.28 星期三 晴

徐今天早上启程去新干农具厂。昨天夜里厂里来电话要其今早出发的。

【忆与议】

当年10-28离开云庄的徐，是这个集体户中“跳农门”的第二人。与第一人仅仅差了三十几天。与此呼应的是，短短几天的日记中，我连续记下了插友动向，反映出当时关心的热点和重点。

也许，这也说明了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确实出现过一次较大的“波动”“反复”，如今在知青史研究中有此一说。

又要“特大跃进”了(2011-06-22 09:59:50)转载▼标签：知青经历日记杂谈分类：插队云庄的七年

在整理1969年日记的时候，曾经使我目瞪口呆的是，1969那一年居然喊出了“再来一次大跃进”的口号，并且真的在基层农村组织了“大跃进”（见《那一年再次号召“大跃进”》《亲历“新的大跃进”》）。而今又一次惊讶不已的是，1970年仿佛是“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喊出了“特大跃进”的惊人口号。

1970.10.13 星期二 阴有雨转多云

据说，明年全省要实现千斤，全县也是千斤，小坑片为900斤。

1970.10.14 星期三 阴

晚上无灯。队里开社员大会，支书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明年小坑片是全县重点，我大队生产指标是800斤/亩，比人家低200斤/亩。另外布置了种冬小麦等生产工作。

【忆与议】

我不记得为什么当年“小坑片是全县重点”，只记得五六十年代的云庄是有名的“老三百”，意为长期在亩产300斤上下徘徊。“小坑片”包括了小坑大队、云庄大队、拿埠大队等大队，听说现在的小坑行政村也差不多是这个范围。

虽然在日记中再一次提到了亩产量这个曾经是农村政绩的唯一指标，但是，我还是没有在日记里找到那些年的亩产量实际数据。不过，可以从侧面进行一些推算。因为当年云庄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水稻生产这项主业，而我们知青插队的那些年里水稻种植面积没有变化，所以，每年的工分值与亩产量应该呈同步变动的关系。据此，从那些年工分值的状况，可以反推得出定性的结论：那些年的亩产量一直没有达到过基本要求——亩产800斤。

1969年，遇到N年不遇的山洪暴发，实在是没有回天之力，代表全年实际收入的重要指标与参数、“公社社员”最终实际到手的工分值（即10个工分折合的人民币）从1968年的1.22元骤然跌到0.88元，打了七折！1969-11，我们第一次听到再来一次农业大跃进的口号，1969-11-19日记记载，公社刘主任“还谈了今年冬季的任务是农业大跃进，口号是拼死拼活地干！其规模要大于1958年大跃进年代。”还说“云庄今年后季稻增产4成，弥补了上半年水灾之损失”。这样的话显然是为社员们鼓劲、不泄气。实际上，后季稻在全年收成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其种植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左右，所以，即使后季稻增产四成，也弥补不了山洪对早稻带来的严重损失。而1969年年终分配时工分值的大幅贬值就是过硬的证据，从中可以推断1969年的亩产量是下降的。1969-12-16日记记载：“各大队都要办土农药、土化肥厂。明年要达到每人一口猪。井冈山地区每亩要增产250斤。”就云庄而言，这样的指标意味着几乎是要翻个倍。可能吗？

1970年的工分值仍然只有0.88元！与大灾之年的1969年居然一致！表明1970年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也可以肯定地说，并没有实现“井冈山地区亩产增加250斤”的预期目标。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的“宏伟目标”又下达了——云庄大队要达到亩产800斤！前一步都没有跨出去，后一步怎么上得去？

这就是那个年代！如此年复一年下达高指标又有什么结果？继续查找那几年的工分值，对那几年的亩产做一些反推。1971年的工分值曾经恢复到1.20元，但以后又出现下滑——1972年1.12元，1973年（待查），1974年1.09元！我留有1974年早稻入库原始记录的复本，其显示：云庄六队500余亩早稻收获了17.7万斤谷子，折合亩产350斤。通常每年的后季稻面积只有早稻的一半，那么，即使后季稻也能达到亩产350斤，那么全年的亩产也只有500多斤。这是工分值为1.09元的1974年。不难想象，那个年代，跃进又跃进，高喊再高喊，仍然没有达到《纲要》的“过淮河”即亩产800斤的要求。一个云庄是如此，全省亩产超千斤又岂是高喊口号就能实现的？换言之，假如当年只有云庄如此拖后腿，云庄也就臭名远扬了，干部群众都会不得安宁。事实上那里一直平安无事，稳坐钓鱼台，这正好说明云庄村的情况并不是独此一家。

回头再看1970年中秋节之前。“预分”的工分值是0.90元，可是到了年底“决分”时，工分值只有0.88元了，这种“逆转”情况是极为罕见的，也说明了那年下半年的收成出乎预料地差！由此看来，1970年云庄村的后季稻遭遇了极大的减产歉收。后详。

1970.11.12星期四阴雨转阴早饭后老周叫我写了些标语，为明年农业特大跃进制造声势。现在又“加码”了：明年要亩产900斤！为此，上级要求半月之内每亩积肥70担。今天又开始开荒，补足60亩缺额。30亩荒地开出来，30亩集田塍大成也。

【忆与议】

当年10-14还在高喊争取明年达到亩产800斤，不到一个月，11-12就“加码”到亩产900斤。实在是把农业生产

当成儿戏了，亩产的增加是拍拍脑袋、喊喊口号就能够实现的吗？每亩70担肥又是一声令下就能办得到吗？就算办到了，成千上万担农家肥放到哪里去？早早地就扔到田里搁一个冬天岂不是浪费？再说那每亩70担农家肥就能换来亩产翻倍的奇迹？诸如这些疑问，即使是在我们这些经过两年摸爬滚打的插队知青面前也一目了然了，所以“特大跃进”这样的口号已经无法使大家再一次“激情燃烧”了。

至于当年的开荒也是劳民伤财的长官命令。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种植水稻的农民们，双季稻已经够辛苦了，想不到还要把难得的喘息之机统统用来种植旱作粮食，真是一年到头“不得闲”了。可是，这样的旱作又不准占用水稻面积，所以，只能寻找一些山坡，砍掉山林树木，种上旱作庄稼。实在限于人力、体力等原因，就对其中的一半指标采用近乎打擦边球的办法，把水稻田里一些比较宽的田埂（方言称之为田塍）不靠迎水面的一边利用起来，冬天种上蚕豆之类，夏天种上黄豆之类，以此凑数，完成旱作粮食的栽种面积指标。记得当时我们就在心里嘀咕不已：这30亩怎么统计出来呢？这种化零为整式的旱作达标之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啊。

如果说，1969年初冬叫响“再来一次大跃进”的时候，云庄的底子是1969年6月底的山洪暴发造成的大减产；那么，1970年初冬喊出“明年农业特大跃进”的时候，云庄又是怎样的底子呢？在我的日记里留下了当年10月底开始收割后季稻的不完整记录，呈现在眼前的是惨不忍睹的大减产景象！

1970.10.27 星期二 阴

天气比昨天还冷。今天开始收割二晚了。

1970.10.28 星期三 晴

天气奇冷。昨晚后半夜竟冷得不能入睡。早上气温仅9℃。早工未出。上午起应小潘之求，为其文艺宣传队刻写蜡纸，翻印《沙家浜》剧本。任务挺艰巨。上午刻了2.5张，下午刻了4.5张。午后不久连长叫我去帮他填“适龄青年统计表”，因填表要求不明，草草了之。半小时就回来了。

1970.10.29 星期四 晴转阴

早上到7时许起床。上午连长又叫我去填写“适龄青年登记表”，并复制留底一份。上午及午后刻了三张蜡纸。晚上冒着严寒，在晒谷场上观看了电影《智取威虎山》。9:45影终。

1970.10.30 星期五 阴有雨

早上七点半起床。天气很冷，又没太阳，故今天刻钢板比前两天要艰苦些。从8点半到下午2点，除去中午吃饭时间外，刻了三张半蜡纸，终于全部完成了这一任务。全剧剧本翻印，共用了13张半蜡纸。

【忆与议】

虽然秋收不如春插、双抢那么紧张，居然还叫我脱离大田生产去刻写蜡纸，以供大队文艺宣传之需，足以见得那个年代把政治挂帅搞到什么地步，革命样板戏被认为是发扬革命精神的有力武器，明明是最高级别的理论刊物《红旗》也用整期的篇幅刊登《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样板戏的剧本全文！当年生产大队居然也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排演《沙家浜》，实在是自娱自乐，究竟有多少教育意义是天晓得。

以下记载中加了下划线的内容，充分显现了当年后季稻的惨状。

1970.10.31 星期六 多云到晴早上起床晚了些，未来得及出早工。上午起参加割禾。厚德、梅发、冬英、海英、姚桂英、曾细女和我共七人共一架打禾机。下午还加了个迎祥。上午几乎踏了半天打谷机，极疲劳，虚汗满面，内衣全部浸湿。打禾机也实在“老爷”，分外累人。下午就一直割禾。下午起，割几坵栽得晚的田，像割韭菜一样，禾长不到一尺，又没有穗。

1970.11. 1 星期日 晴

今天出了一天工，东边割禾。六人组成一个禾戽组：我、梅发、迎祥、冬英和姚桂英、曾细女。（后两人早工不出）除早工外，我踏了一天打禾机。体力很虚，满头大汗。全天共割了4.8亩田，只收到220余斤谷。不过很轻松。下午2点半开工，4:10就收了工。

1970.11. 2 星期一 多云

割禾一天。早工和上午割完东边，下午去禾下。早上很冷，还打赤脚。今天打了一天禾。其中三分之一时间是与他人合作，余则是一个人拼命干，相当疲劳。早上是梅发、海英、东英和我四人。上午加了厚德、曾细女、姚桂英。下午又加了迎祥。今天又割地亩，基本完成任务。下午4点20分左右就回到了家。

1970.11. 5 星期四 晴

今天又打了一天禾。上午与姚桂英、下午与东生，相当疲劳。拿埠口下底的禾也不好，没什么谷。今天九个人，迎祥、东生、富泉、国莲四人为十成，梅发、厚德、我、海英、姚桂英5人为8成。大约还差5百余斤。

1970.11. 6 星期五 晴

今天在拿埠口下底割禾，照例是打禾。又累又脏，尽吃灰。上午与富泉、下午与迎祥。

1970.11. 9 星期一 阴

在罗心仔割禾。早上与国莲、上午与富泉踩打禾机，很有味道：几个“吃十分”的都不愿帮忙，拖机子真是累

死人。加上那两个伙伴不愿着力，再则机子“老爷”，几相一结合就不用说了。下午就坚决不睬，割“韭菜”是很快活而有趣的。早工是梅发、厚德、茶仔、国莲、富泉和我六人，上午减茶仔加曾细女、聂梅英、冬英。下午又加冬生和迎祥。全天共割8.2亩，超额完成近2亩。早饭是“短个”带来的。中午挑90斤。下午挑75斤回来。全天总共只有500余斤。

【忆与议】

我想起了前不久整理那年八月份日记时的感叹——如今觉得大惑不解的是，这一年怎么会到立秋以后八天才完成后季稻插秧？翻翻当年十月份的日记，也找得到相应的秋收记载——“栽得晚的田，像割韭菜一样，禾长不到一尺，又没有穗。”既印证了“不栽立秋禾”的正确，更对那年的实况觉得不可思议。（见《1970日记选（34）第二次参加双抢（续完）》）现在，把十月底十一月初的日记放在一起细细一看，就清楚了，这些日记有两处明白无误地留下了后季稻的产量：4.8亩田，只收到220余斤谷；8.2亩，总共只有500余斤。亩产只有五六十斤啊！而发生这种情况的东边、禾下、拿埠口等地，都是云庄村的“粮仓”啊！如此“轻松”，如此凄凉，原因何在？

在1970-11-6日记中说到，“照例是打禾，又累又脏，尽吃灰。”固然，后季稻在收获时较之于割早稻时要干燥得多，脱粒时确有不少灰尘，但“尽吃灰”似乎也有点不正常。记得1970年早稻遇到虫害（见《1970日记选（31）第二次参加双抢》）的田里收割时才有异常的灰尘，所以，1970年的后季稻既减产又有大量灰尘，是否与虫害有关，不得而知。

如今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当年双抢季节罕见的农活误时，毫无疑问是这年后季稻严重减产的直接原因！那么，农活误时的原因又何在？不能不发人深思。最近与插友言及这段陈年旧事，除了联想到1970-10开始的知青集体户肝炎大爆发以外，插友还回想起当年双抢期间就有不少农民已经出现体力不支的现象，彼此之间连连呼喊“nia go，nia sa li”，意思是好没力气啊。

我重新翻阅那年七八月双抢季节的日记，没有看到当年村民中有流行病的记录，当然也要“归咎于”当时根本没有条件检查身体。但是，我竟然看到1970-8-19有这样的记载：“今队里杀牛两头，一个脑壳半斤”。意思是每人半斤牛肉！难道说在七月下旬打响“双抢战役”之时“忘记”了“犒劳乡亲”的惯例？在插队的那些年，难得有一次吃肉打牙祭的经历，我都会留下记录。

瞻前顾后，倒是不无此种可能——1969-12-16日记有这样的记载：“明年要达到每人一口猪”。尔后，生产队建立了一个养猪场，生猪存栏数成为生产队的重要业绩指标之一。但是，那时候养猪人并没有杀猪的权利，因为自上而下有年度屠宰指标，所以，办养猪场也只是为了确保达到生猪存栏数而已！并不意味着有望吃肉。由于生猪存栏数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高压线”，故而那一年双抢季节的“犒劳乡亲”以牛代猪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是以牛代猪，也是姗姗来迟，一直到双抢结束时才吃到半斤肉！

当然，村民与知青的体力恶化并不一定归咎于那次吃牛肉，但不由得我再一次想到，1970年“再一次大跃进”中强制性地一律实行“矮杆化”，随之而来的“密植”带来了劳动强度的明显上升。在《1970日记选（17）无可奈何的种稻“缺粮户”》中我曾经定量地分析了种植密度与工作量之间的关系。听上去把株距行距缩减一两寸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工作量成倍增加。更不要说从此以后“密植”还上升到“执行革命路线”的高度。这种劳动强度的上升在原本就人少田多的地方会产生什么影响？无疑对及时完成春插是至关重要的。恰恰有这样的记录：1970年居然直到5月15日才最后结束，立夏已经过去了9天！见《1970日记选（20）第二次参加春插大忙（续完）》。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又可以看到，1970年春寒使开插推迟了几天！天啊，都凑到一起来了！至此，已经回溯到1970年春天育秧这个起步环节了。可以把这一年的情况简单归纳一下了：春天寒冷的天气使春插推迟。春插延迟了九天完成。双抢时后季稻滞后了八天完成插秧。这可以归咎于不容置疑的天气客观因素使然。其中完整的原因恐怕是无法查究清楚了。

倒是看到了又一次喊响振奋人心的高昂口号要“实现农业特大跃进”的记载，真是不可思议！有一点不言而喻——那些年，纯属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大跃进”是高喊了一次、一次、又一次，而早在1956年提出的1967年“跨黄河、过长江”宏伟目标则是过期、又过期、遥遥无期……。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六：1970日记选议（11月）

一个月与一辈子

那年的秋收刚刚结束，新的“战斗”就开始打响了，“送行”的一幕使插队知青感慨不已。

1970.11. 3 星期二 晴多云

应征青年今下午在小坑体检。我大队有三个上海青年：章、徐、钟。×因偷窃，未能参加，因而下午闷睡了半天。

晚上是大队召开的“干部大会”（支书语），但徐说是基干民兵也要参加的，于是我与费、屠亦参加了。主要是动员修“井铁”，参加“井铁”第二次大会战。这次会战自11.15—12.15，为期一个月。新干县为4000民工；鸡峰公社是450名。其中要有47人的妇女排。我大队为17人，其中2个妇女。云庄一队3人，二队3人，五队2人，三队是9人。明晚各队开会报名。大家情绪很高，纷纷要求参战。

徐自公社开会回来还带回消息说，上海有三所大学（同济、复旦、华师大）来江西招生。我公社为2名。公社决定各大队派一人，再选2人去。余则将来井冈山大学招生时选用。

【忆与议】

那几年，除了狠抓已有的水稻生产，还要求开荒种杂粮，同时又不断征用民工，把大家弄到了几乎没有时间修身养息、养精蓄锐的地步。“井铁”（井冈山铁路）是全省的重点工程，采用军事化管理，人海战术搞“大会战”，第二次大会战更把“半边天”“娘子军”拉上去了。

就在此刻，忽然又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但没有在日记里看到下文，而且在记忆中也没有什么印象。其中提到的井冈山大学，更是极为陌生。现在从井冈山大学网页上的“学校历史沿革”（参见本文附录）得知，井冈山大学于1958年创办，1963年停办。1977年在原井冈山大学基础上逐步恢复，几经扩大与合并，2007年重新出现井冈山大学。所以，1970年“井冈山大学招生”一事值得琢磨。抑或在1970年有过复办“井大”的打算而未能成为现实。

似乎那一年对知青特别“青睐”，云庄知青中，招工上调刚刚走了两个，马上又来了参军、上学的喜讯。可惜都成了“哑炮”：三人去体检，均未能过关；学校来招生，全然无下文。从此以后更是连续数年几乎断绝了知青“跳农门”的信息，但是知青依旧“蠢蠢欲动”。由于招工招兵招生的信息都不是事先公开的，但是又从未下达关于知青“出路”的正式说法，所以，知青依旧伸长脖子期待着幸运降临，而安心长期扎根农村的宣传就犹如对牛弹琴。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昨晚老周关照我今天写几条标语，欢送修井铁的指战员。七时起床，写标语。午前和刘一起贴出。

参加井铁第二期工程大会战的民工今天午后出发。书记之女正英也在列。支书对她叮嘱再三，极不放心；至于正英之母还掉了泪呢！

【忆与议】

当年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也是二十岁上下，与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年龄相仿。来回几百里、为时一个月，就已经让她的父母放不下心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不难理解。但是，亲眼目睹她们一家的离别情景，我们插队知青又是什么心情？我们是1968-11-20走进“第二故乡”的，到“井铁”二期大会战的民工出发这一天，已经快满两周年了，而知青集体户又遇肝炎突袭，意欲回沪治疗休养也屡遭责难（另详）。此时此刻，亲眼目睹那一幕父女情深、母女泪别，怎不使知青格外地触景生情？在那个时候，我也只敢写下寥寥数语，更多的留作腹诽了。我想，支书亲历了那样的一场离别，应该对插队知青的处境与心情多少有些理解了吧，铁石心肠毕竟是少数呀。

诸如此类的“大兵团”“人海战术”毫无疑问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但是移用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加上“大跃进”“急躁冒进”，违背客观规律，必然是贻害无穷。当年的“井铁”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现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井冈山铁路”，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从http://bbs.hasea.com/thread-8007-1-1.html“海子铁路网”刊载的《人民铁道报》的文章得知，2005—2007年修建的“井冈山铁路位于江西省吉安市西南部，东起京九线上的吉安南站，往西途经吉安县、泰和县、永新县至井冈山，是规划中的衡阳至吉安铁路的东段，正线长度80.824公里”。简而言之是一条东西向的铁路，这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井铁”走向大相径庭，当时是南北向的，从穿越江西境内的浙赣铁路某处向南经过安福、永新等地修建到达井冈山的铁路，可惜我的日记中没有当年完整的记录，只是屡屡提到包括知青在内的民工到安福等地修建“井铁”。现在网上一时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也许，在那个全局性的极左年代里，“井铁”还排不上号。

附录：

井冈山大学的“学校历史沿革”（根据http://www.jgsu.edu.cn/xxgk/xsyg/201008/t20100809_61.htm摘

编1958年，在吉安市创办了吉安工学院、吉安农学院、吉安医学院和吉安师范学院四所高等学校。同年12月，合并成立井冈山大学。1963年7月，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而停办。

1977年10月，在原井冈山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1982年4月设立吉安师范专科学校。2000年3月，合并组建井冈山师范学院。

1978年8月，以原井冈山大学医学院为基础，建立了江西医学院吉安分院。1993年4月，更名为井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984年3月，创办吉安地区工业职工大学，1986年改名为吉安地区职工大学。与此同时，成立吉安地区工交干部学校。2002年4月，成立井冈山职业技术学院。

2003年7月9日，井冈山师范学院、井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井冈山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组建井冈山学院，同时筹建井冈山大学。2007年8月和9月，教育部、江西省政府分别批准井冈山学院更名为井冈山大学。

下乡两周年是这样度过的

这一年秋末初冬，知青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肝炎病魔突袭集体户之中迎来了上山下乡两周年。

1970.11. 4 星期三 晴

徐去新干检查。医生一见他两眼蜡黄，连肝功能也未作，就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还开了准假一个月的单子哩。

1970.11.10 星期二 阴

费今天发烧。上午去小坑配了些药，但到晚上仍未退热。

1970.11.11 星期三 阴，傍晚起有小雨

郭下午感觉不舒服，傍晚又睡倒了，体温又有40℃。费也不大“乐观”，上午虽退了热，下午又有38.2℃了。真叫人担心。

1970.11.12 星期四 阴雨转阴

郭好了些。费有些不妙，上午退了烧，晚上又有热度了。

1970.11.13 星期五 阴

傍晚，费发烧至40℃。上午尚好，午后又发烧了，中饭也呕掉了。真急人的。晚饭后到×处要求打证明。×居然说“现在种麦，不开证明！”“你们生病关我什么事？”“你们上海人吃了饭不做事！”“晚上不开。站在这儿干什么？明天早上再说！”简直可以气爆肚皮。这是什么态度？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天气寒冷，没有出工。费的眼睛已经发黄了，且心跳不正常，可能为肝炎和心脏病症并发。下午费决定去新干检查后返沪。

晚上有一部卡车进庄，马上要出去。是因为车子是江西钢丝厂的，去南昌运货，连长启祥之弟国财随便进来看望一下老家。章陪费连夜搭此卡车去新干了。因为日内无客车。

费曾找书记要求直接开证明返沪。书记硬是要他有了医院的证明才肯批准。他找支书开证明时坐在支书身边，支书一听说费是肝炎症状，竟连忙推开费，说“走开！走开！”费很狼狈，莫名其妙。在旁的徐还以为支书在开玩笑。谁知他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肝炎传给我怎么办？”1970.11.16星期一多云费被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医院已出具休假一个月的证明。费身无分文，乃由我明天去公社取来汇款借与之。

1970.11.17 星期二 多云

起床后帮食堂烧火。早饭后，于8:50出发，去麦斜。11:15抵麦市。取汇款15元。中饭买了半斤小回饼和2只苹果充之。乃于11:50出发归队，于2:20左右回到村里。晚上无灯。6:30就上床了。因为明天还要送费哩！

1970.11.18 星期三 晴

早上五点半多一点就起床了。费烧了几个鸡蛋吃了。我和章用糖水泡了些冷饭吃了。于七点半出发。
于8点45分到新街上。有幸比较顺利地乘到客车。章送费到樟树。我与宋回来。

【忆与议】

当年知青集体户的肝炎蔓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十月中旬县革会就打电话通知“患肝炎者可予批准返沪。”（见《病魔突袭集体户》）但是到了基层就大打折扣。知青患病欲回沪治疗面对的是支书冷漠，恰好与支书女儿“出征一个月”时一家三口挥泪惜别（参见《一个月与一辈子》）形成强烈对比。

时间上又是如此巧合，两年前11-19我和这位插友一起离开上海下乡插队“干革命”，两年后11-19这位插友孤苦伶仃返回上海治病，等待插队知青的是，路费药费一概自费，没有丝毫福利。为什么同为城市中学生，却要承受

如此天壤之别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难道这就叫“上山下乡干革命”“接受再教育”？正是如此残酷的现实，在不断地教育着知青。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年知青为何与当地干部不能和睦相处，更不难理解数年之后知青“大逃亡”的根本原因所在。现在一些高唱“青春无悔”或者“年纪轻吃点苦无所谓”之类高调的人，不是根本没有切身体会，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1970.11. 4 星期三 晴

这些天来自己很烦躁，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自双抢结束、工分只评了6.8分后，心中就一直闷闷不乐。近来许多人接连回沪，思想波动更大。自己觉得，这中间内因——长期打算不足——是主要的，但毕竟还有外因作条件的。这就是队里某些干部把我们单纯作劳动力使用，甚至最好只劳动不取报酬，把我们当作包袱、负担看待，常常受到“歧视”，是会使人安心的吗？！我常常想，有些人的工分挂帅走到了“按酬付劳”的极端，我可不能这样呀！在劳动中也是尽力而为，拼命地上。像九月下旬修水库时和前两天割禾时，思想上是很革命的。但这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摇摆性一时带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常常让私字挂了帅。所以，近来思想上的苦闷、情绪上的低落就是私字的病症！回忆、总结两年来的经历，凡是公字当头的时候，干劲就大，身体也好；凡是私字占了上风，干劲就小，身体也往往“差”起来了。思想领先真是对极了！

【忆与议】

重新阅读、整理这些日记，太有感触了。这些想法可谓下乡（11-20到达云庄）两周年之际的一次“思想总结”。虽然总体上还是处于无知蒙昧状态，尚未走出天真幼稚，但也确实产生了并增加着对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困惑，出现了一些觉醒的前兆，不仅质疑知青究竟为什么难以安心，而且觉察到这不是知青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与诸多方面有关。当然，又颇像“原教旨主义”者，把希望寄托于正统、正确……。也就是以“左”批“左”。

对于那时候留下的以“左”批“左”的想法，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更没有必要拒绝自我否定。在那个疯狂而荒唐的年代里，的确会有许多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言行，常常有人就以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愿意否定自己的过去，还强调要维护“无私奉献的知青精神”的崇高与圣洁。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发展起来的。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徐今天从县里回来了。她问了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回沪。她说，支书不大可能批准无病的人返沪了，因为已走的人太多了。徐说“68年11月时，支书在我们来以前，要去开会，开会前几次关照要把床铺等安置好，还亲自检查之后才放心地走了”。我们记得很清楚，68.11.20我们八班八个男生挤在五块床板上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今看到了前不久×的一封信。信上说准备返赣了。因为四个月不劳动将会使自己变成“老样子”。我觉得，这

个人思想上常常“左”得很。难道上海是如此一无是处？！思想改造没有艰苦环境就不成了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论断的。照×的说法，上海工人阶级岂不是不可设想的吗？那么上海不就成了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了吗？思想改造处处都可以，即使在繁华的城市中也是无妨的，或许还更艰巨些。南京路上好八连不是一个极光辉的榜样吗？所以，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是不对的。我倒觉得返沪一次能学到不少东西。“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归根结底，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其次×说，他不愿意成为二流子。这种说法也不见得妥当。

【忆与议】

知青的想法是在变化与分化之中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可能铁板一块。下乡两周年之际，知青对1968-11的感受就已经有差异了，有感激支书“悉心关怀”的，也有对“和衣而卧”耿耿于怀的。这是各自不同的处境与心境所决定的。在《插队落户的最初三天》中，我根据日记的记载，厘清了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续两天，我们七个人挤在六块不到二尺宽的床板上，连衣服都没脱，熬过了寒冷的两夜。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忘记那难忘的两个冬夜。永远也不可能弄清楚这件事的原委了，而越来越清楚的则是对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的本质的认识。

这天日记中，出现了下乡两周年之际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艰苦环境里改造思想”的莫大怀疑。直到今天，“青春无悔”者仍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文革前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既然工人阶级也是劳动人民，而且是劳动人民中间的先锋队。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城里的中学生就近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却要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进而，既然是再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继续，那么究竟是什么期限呢？为什么又莫名其妙地把再教育变为“扎根农村一辈子”，还把在知青中招工招生说成是“拔根”，更把“拔根”“扎根”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如此这般的折腾，又怎么能对这样的“继续革命”理念与方法产生信任与信心？

1970.11.19 星期四 晴

今天是上山下乡干革命两周年，没有出工。因为疲劳，到近九点才起床。早饭后，书家信。午饭后直到晚上七时一直在食堂。为庆祝两周年，今晚上吃饺子。15个人共15斤面粉，30余斤菜。自愿参加制作。午饭后先烧了会火，后整理芋头。2点半起，郭、屠、刘、董、黄、胡、王、汤等九人一起做饺子，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晚上大家都可谓“撑饱了”。晚上无灯，和郭与宝仔[老俵]吹牛皮至八点上床。

1970.11.20 星期五 晴

今天是11月20日了。来到云庄是两周年。这两年的生活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一言难尽，感触最多的还是如毛主

席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插队落户固然是接受再教育的捷径，但终究是要依靠主观努力的。不是有人堕落成现行反革命吗？不是有人在车站、公路上拦路抢劫或敲诈勒索或聚众打架而被专政机关依法拘留甚至判刑吗？不是有小部分人思想颓废、以唱黄色歌曲、讲下流故事、抽烟酗酒为荣吗？当然这只是极小部分人。许多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地成长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光荣地入党、入团。这正反的事实正说明，思想的变化，世界观的改造，毕竟是内因起决定作用的。我自己之所以进步不大，主要的还在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思想上认识不足，没有真正认识到接受再教育的根本意义。所以，在新的一年中，应当踏踏实实地真正地从一点一滴做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改造世界观，在自我革命中，在三大革命中，争取能真正作出成绩来。

【忆与议】

下乡两周年之际的日记中，不乏以“左”批“左”的可笑与幼稚，但是用“内因—外因”理论来大胆质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这在日记中似乎是第一次。

知青又一次“批资反修”

尽管知青在“再教育”下有诸多不满，但自以为识字有文化，能看书读报，保留着相当虔诚的信仰，犹如“原教旨主义者”。这一年的农活中不时采用了“计件记工制”，知青也从中多少得益，但是多年深受“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等等的熏陶，紧抱书本与教条，又一次掀起小小的“批资反修”风浪。而在一年多以前的1969年春末，围绕着副业生产中的“包工”、多劳多得，知青就闹过一次（见《知青发起“批资反修”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在实际生活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计件记工制”却在1970年“严重泛滥”，正说明了农村中那套管理方法已经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或明或暗的抵制。可是，一些知青依旧天真幼稚地“唯书”“唯上”。

1970.11.11 星期三 阴，傍晚起有小雨

不少人都觉得现在没味道。论出工，什么都按底分规定任务，这种计件制度越来越使人厌恶，它根本不能唤起积极性，相反还促使个人主义的膨胀，对集体经济有百害无一利。要想明年实现“保八百争千斤”的目标，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1970.11.19 星期四 晴

队里某些人简直是走倒路。现在搞三光竟采用如同解放前资本家雇佣工人那样的办法：每坵田插上了号码牌，干部定好各坵田的工分。每人包一坵，搞完三面光，取牌向记工员上分。企图凭借此种方法来达到明年农业特大跃进，实在是南辕北辙！某些人的所谓“学大寨”，根本是背道而驰，根本违背大寨精神，是动摇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基础的！

1970.11.23 星期一 阴有间断雨

昨晚屠去上工分，回来说耘连作的工分已决定，其小组中有人最高挣了15分一日。这是采用了这种办法：各小组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就得底分；提前完成，则有加分；反之，则减工分。这是向包产到户倒退的一种反动！上海青年中，可推D、T两人最起劲了。心中可还有一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决不能参加这种倒退向资本主义的勾当！作为一个革命青年，时刻捍卫、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神圣职责！

徐到公社开会回来说，她将此事向公社领导反映了，公社领导说要来云庄处理这件事，并说云庄的根子就是包产到户！这不仅使我想起刚来时支书曾对我们说，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云庄从未搞过。这岂不是赤裸裸的撒谎吗？！事实说明，包产到户云庄就曾推行过！

1970.11.25 星期三 阴有雨

队里某些人竟然还在危险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昨天，支书亲自出马，检查质量，并也参与包工（定分）。下午，我还见FX、FF、FZ、GM几人兴致勃勃、安然自得地在定分哩！现在甚至连劳动小组都不分了，一片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完全是从个人出发，愿到哪就到哪，愿什么时候开工就什么时候开工，收工也完全自由决定……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了！一点集体生产的影子也没有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打倒“包产到户”！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

傍晚徐从公社回来。全省根据省革委常委会议建立八十万人的宣传队，狠抓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徐参加的就是这一宣传工作。因公社负责人另有事，晚几天再去。为时一个半月。她又反映了云庄包工定额事。支书抵赖，公社负责人公开点了名。拿埠也是此类事件，上海青年贴出许多大字报。……徐还说，支书在回队后向徐解释说，这是没办法，但也要看到干劲大，这是毛泽东思想……。真是一派胡言乱语。

【忆与议】

上述日记中留下了我的想法，但在当时最多在几个要好的插友中议论一两句，在公开场合是不声不响的，因为担心因言获罪、祸从口出。

在1970年争论不已的计件记工问题上，云庄大队的这位支部书记又一次显得“另类”：一方面，他看到了“大寨式记工”带来的明显弊端，而且坦陈搞计件记工制是出于“没办法”；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计件记工制下“干劲大”，因而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来自基层的智慧使我们这些知青屡屡感到吃惊。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刚到云庄不久时他对12-21指示的解读（见《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之后又有“没有右，就没有

左”的见解（见《大队支书一语惊人》）。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晚上队里开会，由支书传达梅峰学哲学现场会精神。

1970.11.18 星期三 晴

午饭后，应老周之命，抄写毛主席哲学语录。至4点完成。

1970.11.19 星期四 晴

早饭后应老周之命书大字十七个“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新高潮”。

【忆与议】

几乎与批判计件记工制的同时，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新高潮”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想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上网搜索，看到“收藏热线”中有当年的“红宝书”——《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具体是指什么？只回想起了《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什么？求助于百度百科，才知道还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至于为什么会在1970年掀起这样的“活学活用新高潮”，只记得它发生在1970-8～9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在网上没有见到直接相关的资料，找到一篇《人民日报》1970-10-30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它一开头就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全国各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工农兵学哲学的好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讲亲身的经验，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新气象，推动着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接着反复讲述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当年这样的说法是迂回曲折地告诉民众，党内发生了危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条路线斗争。公开见之于报章的说法是在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而内部传达的则是“批陈（陈伯达）整风”。如今许多文章书籍描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全会以后那个时期的，也是聚焦在党内高层的斗争方面，尤其是从1970-9开始的批陈整风到1971-9的副统帅折戟沉沙，没有谈及面对基层与群众的活学活用哲学新高潮。所以，那段历史在我们这些过来人心目中依然显得诡秘莫测。

那样的“学习”到了基层，演变成了知青在农村生产队“批资反修”“学习大寨”的有力“理论依据”，这在那个年代也并不奇怪，“活学活用”就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大打语录仗的实用主义罢了。

1970.11.28 星期六 阴有雨

已下了一星期雨了。这种天气实在不愿出工。早上翻看《世界分国地图册》。近来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声望越来越高，外交战线上奏响了一曲又一曲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胜利的凯歌，形势空前大好。

【忆与议】

在下乡的时候，我带去的书籍中有一本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世界分国地图册》，那是1964年我考上初中以后，理出了一些小学时用的书籍报刊，到废品回收站换来一些钱，买了两本地图册。另一本是《中国分省地图册》。在那个无书可读的文化沙漠里，地图册是我百看不厌、浮想联翩的读物。

日记中记下的一早就看《世界分国地图册》，是因为我国外交有所突破，根据我的专题记录，短短一个多月里，就与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拿大，1970-10-13；赤道几内亚，1970-10-15；意大利，1970-11-06；埃塞俄比亚，1970-11-24。

虽然日记里也在高呼“形势空前大好”，心底里却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加、意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啊，埃还是“帝国”呢，为什么要同这样的国家建交？“支援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一篇真正说清楚那次大突破的缘由的文章。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六：1970日记选议（11月）

一个月与一辈子

那年的秋收刚刚结束，新的“战斗”就开始打响了，“送行”的一幕使插队知青感慨不已。

1970.11. 3 星期二 晴多云

应征青年今下午在小坑体检。我大队有三个上海青年：章、徐、钟。×因偷窃，未能参加，因而下午闷睡了半天。

晚上是大队召开的“干部大会”（支书语），但徐说是基干民兵也要参加的，于是我与费、屠亦参加了。主要是动员修“井铁”，参加“井铁”第二次大会战。这次会战自11.15—12.15，为期一个月。新干县为4000民工；鸡峰公社是450名。其中要有47人的妇女排。我大队为17人，其中2个妇女。云庄一队3人，二队3人，五队2人，三队是9人。明晚各队开会报名。大家情绪很高，纷纷要求参战。

徐自公社开会回来还带回消息说，上海有三所大学（同济、复旦、华师大）来江西招生。我公社为2名。公社决定各大队派一人，再选2人去。余则将来井冈山大学招生时选用。

【忆与议】

那几年，除了狠抓已有的水稻生产，还要求开荒种杂粮，同时又不断征用民工，把大家弄到了几乎没有时间修身养息、养精蓄锐的地步。“井铁”（井冈山铁路）是全省的重点工程，采用军事化管理，人海战术搞“大会战”，第二次大会战更把“半边天”“娘子军”拉上去了。

就在此刻，忽然又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但没有在日记里看到下文，而且在记忆中也没有什么印象。其中提到的井冈山大学，更是极为陌生。现在从井冈山大学网页上的“学校历史沿革”（参见本文附录）得知，井冈山大学于1958年创办，1963年停办。1977年在原井冈山大学基础上逐步恢复，几经扩大与合并，2007年重新出现井冈山大学。所以，1970年“井冈山大学招生”一事值得琢磨。抑或在1970年有过复办“井大”的打算而未能成为现实。

似乎那一年对知青特别“青睐”，云庄知青中，招工上调刚刚走了两个，马上又来了参军、上学的喜讯。可惜都成了“哑炮”：三人去体检，均未能过关；学校来招生，全然无下文。从此以后更是连续数年几乎断绝了知青“跳农门”的信息，但是知青依旧“蠢蠢欲动”。由于招工招兵招生的信息都不是事先公开的，但是又从未下达关于知青“出路”的正式说法，所以，知青依旧伸长脖子期待着幸运降临，而安心长期扎根农村的宣传就犹如对牛弹琴。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昨晚老周关照我今天写几条标语，欢送修井铁的指战员。七时起床，写标语。午前和刘一起贴出。

参加井铁第二期工程大会战的民工今天午后出发。书记之女正英也在列。支书对她叮嘱再三，极不放心；至于正英之母还掉了泪呢！

【忆与议】

当年大队支部书记的女儿也是二十岁上下，与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年龄相仿。来回几百里、为时一个月，就已经让她的父母放不下心来，这也是人之常情，不难理解。但是，亲眼目睹她们一家的离别情景，我们插队知青又是什么心情？我们是1968-11-20走进“第二故乡”的，到“井铁”二期大会战的民工出发这一天，已经快满两周年了，而知青集体户又遇肝炎突袭，意欲回沪治疗休养也屡遭责难（另详）。此时此刻，亲眼目睹那一幕父女情深、母女泪别，怎不使知青格外地触景生情？在那个时候，我也只敢写下寥寥数语，更多的留作腹诽了。我想，支书亲历了那样的一场离别，应该对插队知青的处境与心情多少有些理解了吧，铁石心肠毕竟是少数呀。

诸如此类的“大兵团”“人海战术”毫无疑问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但是移用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加上“大跃进”“急躁冒进”，违背客观规律，必然是贻害无穷。当年的“井铁”就是一个失败的例证。现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井冈山铁路”，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从http://bbs.hasea.com/thread-8007-1-1.html“海子铁路网”刊载的《人民铁道报》的文章得知，2005—2007年修建的“井冈山铁路位于江西省吉安市西南部，东起京九线上的吉安南站，往西途经吉安县、泰和县、永新县至井冈山，是规划中的衡阳至吉安铁路的东段，正线长度80.824公里”。简而言之是一条东西向的铁路，这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井铁”走向大相径庭，当时是南北向的，从穿越江西境内的浙赣铁路某处向南经过安福、永新等地修建到达井冈山的铁路，可惜我的日记中没有当年完整的记录，只是屡屡提到包括知青在内的民工到安福等地修建“井铁”。现在网上一时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也许，在那个全局性的极左年代里，“井铁”还排不上号。

附录：

井冈山大学的“学校历史沿革”（根据http://www.jgsu.edu.cn/xxgk/xsyg/201008/t20100809_61.htm摘

编1958年，在吉安市创办了吉安工学院、吉安农学院、吉安医学院和吉安师范学院四所高等学校。同年12月，合并成立井冈山大学。1963年7月，由于国家经济困难而停办。

1977年10月，在原井冈山大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1982年4月设立吉安师范专科学校。2000年3月，合并组建井冈山师范学院。

1978年8月，以原井冈山大学医学院为基础，建立了江西医学院吉安分院。1993年4月，更名为井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984年3月，创办吉安地区工业职工大学，1986年改名为吉安地区职工大学。与此同时，成立吉安地区工交干部学校。2002年4月，成立井冈山职业技术学院。

2003年7月9日，井冈山师范学院、井冈山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和井冈山职业技术学院合并，组建井冈山学院，同时筹建井冈山大学。2007年8月和9月，教育部、江西省政府分别批准井冈山学院更名为井冈山大学。

下乡两周年是这样度过的

这一年秋末初冬，知青在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肝炎病魔突袭集体户之中迎来了上山下乡两周年。

1970.11. 4 星期三 晴

徐去新干检查。医生一见他两眼蜡黄，连肝功能也未作，就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还开了准假一个月的单子哩。

1970.11.10 星期二 阴

费今天发烧。上午去小坑配了些药，但到晚上仍未退热。

1970.11.11 星期三 阴，傍晚起有小雨

郭下午感觉不舒服，傍晚又睡倒了，体温又有40℃。费也不大“乐观”，上午虽退了热，下午又有38.2℃了。真叫人担心。

1970.11.12 星期四 阴雨转阴

郭好了些。费有些不妙，上午退了烧，晚上又有热度了。

1970.11.13 星期五 阴

傍晚，费发烧至40℃。上午尚好，午后又发烧了，中饭也呕掉了。真急人的。晚饭后到×处要求打证明。×居然说“现在种麦，不开证明！”“你们生病关我什么事？”“你们上海人吃了饭不做事！”“晚上不开。站在这儿干什么？明天早上再说！”简直可以气爆肚皮。这是什么态度？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天气寒冷，没有出工。费的眼睛已经发黄了，且心跳不正常，可能为肝炎和心脏病症并发。下午费决定去新干检查后返沪。

晚上有一部卡车进庄，马上要出去。是因为车子是江西钢丝厂的，去南昌运货，连长启祥之弟国财随便进来看望一下老家。章陪费连夜搭此卡车去新干了。因为日内无客车。

费曾找书记要求直接开证明返沪。书记硬是要他有了医院的证明才肯批准。他找支书开证明时坐在支书身边，支书一听说费是肝炎症状，竟连忙推开费，说“走开！走开！”费很狼狈，莫名其妙。在旁的徐还以为支书在开玩笑。谁知他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肝炎传给我怎么办？”1970.11.16星期一多云费被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医院已出具休假一个月的证明。费身无分文，乃由我明天去公社取来汇款借与之。

1970.11.17 星期二 多云

起床后帮食堂烧火。早饭后，于8:50出发，去麦斜。11:15抵麦市。取汇款15元。中饭买了半斤小回饼和2只苹果充之。乃于11:50出发归队，于2:20左右回到村里。晚上无灯。6:30就上床了。因为明天还要送费哩！

1970.11.18 星期三 晴

早上五点半多一点就起床了。费烧了几个鸡蛋吃了。我和章用糖水泡了些冷饭吃了。于七点半出发。
于8点45分到新街上。有幸比较顺利地乘到客车。章送费到樟树。我与宋回来。

【忆与议】

当年知青集体户的肝炎蔓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十月中旬县革会就打电话通知“患肝炎者可予批准返沪。”（见《病魔突袭集体户》）但是到了基层就大打折扣。知青患病欲回沪治疗面对的是支书冷漠，恰好与支书女儿“出征一个月”时一家三口挥泪惜别（参见《一个月与一辈子》）形成强烈对比。

时间上又是如此巧合，两年前11-19我和这位插友一起离开上海下乡插队“干革命”，两年后11-19这位插友孤苦伶仃返回上海治病，等待插队知青的是，路费药费一概自费，没有丝毫福利。为什么同为城市中学生，却要承受

如此天壤之别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难道这就叫“上山下乡干革命”“接受再教育”？正是如此残酷的现实，在不断地教育着知青。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年知青为何与当地干部不能和睦相处，更不难理解数年之后知青“大逃亡”的根本原因所在。现在一些高唱“青春无悔”或者“年纪轻吃点苦无所谓”之类高调的人，不是根本没有切身体会，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1970.11. 4 星期三 晴

这些天来自己很烦躁，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自双抢结束、工分只评了6.8分后，心中就一直闷闷不乐。近来许多人接连回沪，思想波动更大。自己觉得，这中间内因——长期打算不足——是主要的，但毕竟还有外因作条件的。这就是队里某些干部把我们单纯作劳动力使用，甚至最好只劳动不取报酬，把我们当作包袱、负担看待，常常受到“歧视”，是会使人安心的吗？！我常常想，有些人的工分挂帅走到了“按酬付劳”的极端，我可不能这样呀！在劳动中也是尽力而为，拼命地上。像九月下旬修水库时和前两天割禾时，思想上是很革命的。但这终究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和摇摆性一时带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常常让私字挂了帅。所以，近来思想上的苦闷、情绪上的低落就是私字的病症！回忆、总结两年来的经历，凡是公字当头的时候，干劲就大，身体也好；凡是私字占了上风，干劲就小，身体也往往“差”起来了。思想领先真是对极了！

【忆与议】

重新阅读、整理这些日记，太有感触了。这些想法可谓下乡（11-20到达云庄）两周年之际的一次“思想总结”。虽然总体上还是处于无知蒙昧状态，尚未走出天真幼稚，但也确实产生了并增加着对知青“接受再教育”的困惑，出现了一些觉醒的前兆，不仅质疑知青究竟为什么难以安心，而且觉察到这不是知青单方面的问题，而是与诸多方面有关。当然，又颇像“原教旨主义”者，把希望寄托于正统、正确……。也就是以“左”批“左”。

对于那时候留下的以“左”批“左”的想法，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更没有必要拒绝自我否定。在那个疯狂而荒唐的年代里，的确会有许多符合那个时代要求的言行，常常有人就以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而不愿意否定自己的过去，还强调要维护“无私奉献的知青精神”的崇高与圣洁。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发展起来的。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徐今天从县里回来了。她问了我们打算什么时候回沪。她说，支书不大可能批准无病的人返沪了，因为已走的人太多了。徐说“68年11月时，支书在我们来以前，要去开会，开会前几次关照要把床铺等安置好，还亲自检查之后才放心地走了”。我们记得很清楚，68.11.20我们八班八个男生挤在五块床板上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今看到了前不久×的一封信。信上说准备返赣了。因为四个月不劳动将会使自己变成“老样子”。我觉得，这

个人思想上常常“左”得很。难道上海是如此一无是处？！思想改造没有艰苦环境就不成了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论断的。照×的说法，上海工人阶级岂不是不可设想的吗？那么上海不就成了一团漆黑、一无是处了吗？思想改造处处都可以，即使在繁华的城市中也是无妨的，或许还更艰巨些。南京路上好八连不是一个极光辉的榜样吗？所以，片面强调客观条件是不对的。我倒觉得返沪一次能学到不少东西。“问题在于善于学习”！归根结底，还是内因起决定作用！其次×说，他不愿意成为二流子。这种说法也不见得妥当。

【忆与议】

知青的想法是在变化与分化之中的，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不可能铁板一块。下乡两周年之际，知青对1968-11的感受就已经有差异了，有感激支书“悉心关怀”的，也有对“和衣而卧”耿耿于怀的。这是各自不同的处境与心境所决定的。在《插队落户的最初三天》中，我根据日记的记载，厘清了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续两天，我们七个人挤在六块不到二尺宽的床板上，连衣服都没脱，熬过了寒冷的两夜。多少年过去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忘记那难忘的两个冬夜。永远也不可能弄清楚这件事的原委了，而越来越清楚的则是对上山下乡这场政治运动的本质的认识。

这天日记中，出现了下乡两周年之际对“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艰苦环境里改造思想”的莫大怀疑。直到今天，“青春无悔”者仍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文革前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既然工人阶级也是劳动人民，而且是劳动人民中间的先锋队。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城里的中学生就近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却要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乡、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进而，既然是再教育，是学校教育的继续，那么究竟是什么期限呢？为什么又莫名其妙地把再教育变为“扎根农村一辈子”，还把在知青中招工招生说成是“拔根”，更把“拔根”“扎根”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如此这般的折腾，又怎么能对这样的“继续革命”理念与方法产生信任与信心？

1970.11.19 星期四 晴

今天是上山下乡干革命两周年，没有出工。因为疲劳，到近九点才起床。早饭后，书家信。午饭后直到晚上七时一直在食堂。为庆祝两周年，今晚上吃饺子。15个人共15斤面粉，30余斤菜。自愿参加制作。午饭后先烧了会火，后整理芋头。2点半起，郭、屠、刘、董、黄、胡、王、汤等九人一起做饺子，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晚上大家都可谓“撑饱了”。晚上无灯，和郭与宝仔[老俵]吹牛皮至八点上床。

1970.11.20 星期五 晴

今天是11月20日了。来到云庄是两周年。这两年的生活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一言难尽，感触最多的还是如毛主

席所说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插队落户固然是接受再教育的捷径，但终究是要依靠主观努力的。不是有人堕落成现行反革命吗？不是有人在车站、公路上拦路抢劫或敲诈勒索或聚众打架而被专政机关依法拘留甚至判刑吗？不是有小部分人思想颓废、以唱黄色歌曲、讲下流故事、抽烟酗酒为荣吗？当然这只是极小部分人。许多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下，茁壮地成长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光荣地入党、入团。这正反的事实正说明，思想的变化，世界观的改造，毕竟是内因起决定作用的。我自己之所以进步不大，主要的还在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思想上认识不足，没有真正认识到接受再教育的根本意义。所以，在新的一年中，应当踏踏实实地真正地从一点一滴做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改造世界观，在自我革命中，在三大革命中，争取能真正作出成绩来。

【忆与议】

下乡两周年之际的日记中，不乏以“左”批“左”的可笑与幼稚，但是用“内因—外因”理论来大胆质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这在日记中似乎是第一次。

知青又一次“批资反修”

尽管知青在“再教育”下有诸多不满，但自以为识字有文化，能看书读报，保留着相当虔诚的信仰，犹如“原教旨主义者”。这一年的农活中不时采用了“计件记工制”，知青也从中多少得益，但是多年深受“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等等的熏陶，紧抱书本与教条，又一次掀起小小的“批资反修”风浪。而在一年多以前的1969年春末，围绕着副业生产中的“包工”、多劳多得，知青就闹过一次（见《知青发起“批资反修”争论》），后来不了了之；在实际生活中“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计件记工制”却在1970年“严重泛滥”，正说明了农村中那套管理方法已经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或明或暗的抵制。可是，一些知青依旧天真幼稚地“唯书”“唯上”。

1970.11.11 星期三 阴，傍晚起有小雨

不少人都觉得现在没味道。论出工，什么都按底分规定任务，这种计件制度越来越使人厌恶，它根本不能唤起积极性，相反还促使个人主义的膨胀，对集体经济有百害无一利。要想明年实现“保八百争千斤”的目标，不抓政治思想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

1970.11.19 星期四 晴

队里某些人简直是走倒路。现在搞三光竟采用如同解放前资本家雇佣工人那样的办法：每坵田插上了号码牌，干部定好各坵田的工分。每人包一坵，搞完三面光，取牌向记工员上分。企图凭借此种方法来达到明年农业特大跃进，实在是南辕北辙！某些人的所谓“学大寨”，根本是背道而驰，根本违背大寨精神，是动摇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基础的！

1970.11.23 星期一 阴有间断雨

昨晚屠去上工分，回来说耘连作的工分已决定，其小组中有人最高挣了15分一日。这是采用了这种办法：各小组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就得底分；提前完成，则有加分；反之，则减工分。这是向包产到户倒退的一种反动！上海青年中，可推D、T两人最起劲了。心中可还有一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决不能参加这种倒退向资本主义的勾当！作为一个革命青年，时刻捍卫、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神圣职责！

徐到公社开会回来说，她将此事向公社领导反映了，公社领导说要来云庄处理这件事，并说云庄的根子就是包产到户！这不仅使我想起刚来时支书曾对我们说，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云庄从未搞过。这岂不是赤裸裸的撒谎吗？！事实说明，包产到户云庄就曾推行过！

1970.11.25 星期三 阴有雨

队里某些人竟然还在危险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昨天，支书亲自出马，检查质量，并也参与包工（定分）。下午，我还见FX、FF、FZ、GM几人兴致勃勃、安然自得地在定分哩！现在甚至连劳动小组都不分了，一片混乱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完全是从个人出发，愿到哪就到哪，愿什么时候开工就什么时候开工，收工也完全自由决定……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了！一点集体生产的影子也没有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打倒“包产到户”！彻底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

傍晚徐从公社回来。全省根据省革委常委会议建立八十万人的宣传队，狠抓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徐参加的就是这一宣传工作。因公社负责人另有事，晚几天再去。为时一个半月。她又反映了云庄包工定额事。支书抵赖，公社负责人公开点了名。拿埠也是此类事件，上海青年贴出许多大字报。……徐还说，支书在回队后向徐解释说，这是没办法，但也要看到干劲大，这是毛泽东思想……。真是一派胡言乱语。

【忆与议】

上述日记中留下了我的想法，但在当时最多在几个要好的插友中议论一两句，在公开场合是不声不响的，因为担心因言获罪、祸从口出。

在1970年争论不已的计件记工问题上，云庄大队的这位支部书记又一次显得“另类”：一方面，他看到了“大寨式记工”带来的明显弊端，而且坦陈搞计件记工制是出于“没办法”；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计件记工制下“干劲大”，因而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来自基层的智慧使我们这些知青屡屡感到吃惊。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刚到云庄不久时他对12-21指示的解读（见《另类解读12-21指示的一位“农村同志”》），之后又有“没有右，就没有

左”的见解（见《大队支书一语惊人》）。

1970.11.15 星期日 多云

晚上队里开会，由支书传达梅峰学哲学现场会精神。

1970.11.18 星期三 晴

午饭后，应老周之命，抄写毛主席哲学语录。至4点完成。

1970.11.19 星期四 晴

早饭后应老周之命书大字十七个“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新高潮”。

【忆与议】

几乎与批判计件记工制的同时，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新高潮”在神州大地掀起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想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了，上网搜索，看到“收藏热线”中有当年的“红宝书”——《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具体是指什么？只回想起了《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有什么？求助于百度百科，才知道还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至于为什么会在1970年掀起这样的“活学活用新高潮”，只记得它发生在1970-8～9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在网上没有见到直接相关的资料，找到一篇《人民日报》1970-10-30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它一开头就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认真学习毛主席哲学著作的号召。全国各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工农兵学哲学的好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用通俗的语言，讲亲身的经验，给政治思想战线带来了新气象，推动着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著作的群众运动继续前进。”接着反复讲述了“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当年这样的说法是迂回曲折地告诉民众，党内发生了危及无产阶级专政的两条路线斗争。公开见之于报章的说法是在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而内部传达的则是“批陈（陈伯达）整风”。如今许多文章书籍描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全会以后那个时期的，也是聚焦在党内高层的斗争方面，尤其是从1970-9开始的批陈整风到1971-9的副统帅折戟沉沙，没有谈及面对基层与群众的活学活用哲学新高潮。所以，那段历史在我们这些过来人心目中依然显得诡秘莫测。

那样的“学习”到了基层，演变成了知青在农村生产队“批资反修”“学习大寨”的有力“理论依据”，这在那个年代也并不奇怪，“活学活用”就是取我所需、为我所用、大打语录仗的实用主义罢了。

1970.11.28 星期六 阴有雨

已下了一星期雨了。这种天气实在不愿出工。早上翻看《世界分国地图册》。近来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声望越来越高，外交战线上奏响了一曲又一曲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胜利的凯歌，形势空前大好。

【忆与议】

在下乡的时候，我带去的书籍中有一本六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世界分国地图册》，那是1964年我考上初中以后，理出了一些小学时用的书籍报刊，到废品回收站换来一些钱，买了两本地图册。另一本是《中国分省地图册》。在那个无书可读的文化沙漠里，地图册是我百看不厌、浮想联翩的读物。

日记中记下的一早就看《世界分国地图册》，是因为我国外交有所突破，根据我的专题记录，短短一个多月里，就与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拿大，1970-10-13；赤道几内亚，1970-10-15；意大利，1970-11-06；埃塞俄比亚，1970-11-24。

虽然日记里也在高呼“形势空前大好”，心底里却有许多不理解的地方——加、意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啊，埃还是“帝国”呢，为什么要同这样的国家建交？“支援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到了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一篇真正说清楚那次大突破的缘由的文章。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七：1971日记选议（1月、2月）：

（1）第二次回城探亲的“农民”

自从1968-11到江西新干云庄“插队落户”以后，再怎么“认真接受再教育”，也难以抹杀对家人和故乡的思念，当时这种人之常情被斥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必须“坚决批判、彻底肃清”，所以1969-2那个春节就留在村里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但是自此以后，不得人心的做法有所收敛，取而代之的是可以回家看看。1970年春节前后是我第一次回沪，在沪两个半月。回云庄后，依旧春插秧、夏双抢，“拼命干革命”，没有盼来新的知青上调，却遭遇夏秋之际肝炎肆虐，我有幸躲过一劫，在人心浮动的大氛围中，也早早回沪探亲，1970-12-13到沪，1971-3-12离沪，在沪整整三个月之久！相比之下，回沪时间更长、更频繁的大有人在。现在看来，如此这般“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造就一代新型农民”只可能意味着上山下乡运动最终走向失败。

每一次回沪探亲，都是机会难得的老同学重逢，而在那个消息封锁闭塞的“革命时代”，各种真实信息的交流不啻为对“革命理想”的冲击与打击。

1970.12.15 星期二 多云

……刘、周、江、张四人来我家。与江是两年不曾见面了。叙谈了约半小时。江约我们明晚去她家吃饺子。

1970.12.18 星期五 多云

……十一时许，周来了，硬把我拖到他家。刘、费、江和江的妹妹都已在场。周请我们吃了汤团和肉丝豆瓣面。吃完又到人民广场、南京路和国际饭店等处摄影留念。……江在20号离沪。此次是她半个月病假加半个月事假来沪的。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几位都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刘、费与我一起在江西插队。周是因其哥哥在黑龙江、姐姐在崇明而有幸进了上海的工厂，对我们这些跨省插队的同学十分关心，只要他有时间就来一起玩乐散心。江、张是到淮北

插队，1969年初下乡，一年不到，江就上调进了阜阳毛纺厂，是我班同学中下乡时间最短的一位。一旦脱离“农门”，既有病假、又有事假，还不影响工资收入，如此“工农差别”怎能不在插队知青中产生极大的心理波动？难道我们就这样干一辈子吗？

1970.12.30 星期三 阴

上午，九时许，金、刘来我家。据刘所知，明年口粮仍为640斤，口油仅2斤。这样，我自己估计无甚超支了。800个工分，即使工分值只有9角，也有72元，粮油共需62余元，食堂补贴100个工分是有的了。……据刘说，刘（H）已在昨天返赣，以后将带三个徒弟。

【忆与议】

我第一次回沪以后，是在1970-3-20回到云庄的。到十月初肝炎开始横行肆虐之前，我的出工正常，尔后两个月为免遭病魔侵袭，出工很少，用当年上海人的说法是“保身价”。所以这一年是认真劳动了半年，挣得800个工分，成为下一年度赖以生活的“资本”。与留城、做工的同学是不可比拟的，但与不幸患病的插友相比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他们治病养病期间不仅没有分文“病假工资”，相反还要父母家人承担巨大的治疗费与生活费。

日记中提到的刘（H）是云庄村插队知青中第一个上调的幸运儿，下乡不足两年就进了工厂，随即到上海的有关工厂培训了几个月，居然就成了师傅。

1971. 1. 2 星期六 晴

我到西门路、吉安路口的煤球店买煤球时，遇到汪。匆匆讲了几句，他已是石油开采工人，14日回来探亲，5日就要回去了。……据郑说，黄已准备结婚了，老婆是个社会青年，她家里有一套红木家具在等着黄呢！

1971. 1. 5 星期二 晴

午饭后遇汪，便邀他到我家，汪在去年五月调到扶余油田（原在梨树插队），靠近大庆油田，是中小型油田，去年年产100万吨，储藏量在1～2亿吨。大庆至大连要建一输油管，直径1公尺，地下2.5公尺（防冻）。现在是用火车把油运到大连，再用船运到上海提炼，成本较高。汪是搞会战的，没有休息日，工资每月25元，加上加班费可有二十七、八元。来回车费达80元之巨。所在油田有一万工人，“四五计划”要发展到八万（大庆现在十万人）。汪说那里上海青年思想消极，当地领导也很松。

朱已批准入伍（海军），9号将出发。星期四上午（7号）到费家欢聚。

【忆与议】

日记里的汪，与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成为同学，后来又成为中学同班同学，他在1969年初去吉林插队，一年多就上调成为工人。真叫我们羡慕。相比之下，留城的同学则是“遥遥领先”——虽然那位黄同学年龄稍大一两岁，但是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记得我们这些插队同学闻得此事，不由得惊呼：不要和我们谈论这种事情，什么结婚啊，不要热昏噢！另外一位朱同学，是1969年初到崇明农场的，差不多两年也幸运地“跳农门”。

1971. 1. 6 星期三 晴

意想不到，章回来了！他是昨晚八点到上海的。遂同去刘家，又去费家。叙谈至十一点多才回家。两年多未见了，真是快乐极了！

【忆与议】

章同学是我在“复课闹革命”的一年间最为密切的合作伙伴，当时班级里“大批判专栏”的第一“抄手”是我，而章是“多面手”，虽然毛笔字不及我写得快，但他的行书极为老练，美工绘画更是远胜于我。我在1968-11-19离开上海以后，他独当一面，几乎一个人完成了以后几期的抄写与美工的全部工作，直到他赴皖插队，那个专栏也就寿终正寝。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他最初的去向是“普工”（市内普通工矿企业），他的弟弟去“外农”（外地农村），这是他家的安排，也获得兄弟俩所在的两个学校的认可。谁知，我们班级里竟然有人到“领导一切”的工宣队告状，声称“章与女同学江某谈恋爱，不能留在城市、工厂。”工宣队迅即把章的去向改为“外农”，而且“一锤定音”不得更改。毕工组的老师急忙与章弟所在学校联系，打算把章弟由“外农”换到“普工”，岂料该校的分配方案已定，无法帮忙！于是，章兄弟俩只得一起赴皖插队。那个绯闻女主角也随之而去。毕竟他们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小孩子，不谙世事，纵然平日里接触多一些，但并不等于恋爱。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到了淮北以后，尤其那个女同学上调以后，两人的关系就破裂了。遭此打击，两人的人生之路都相当艰难。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把此悲剧称为“章江号”，因为我一直记得1965-8-6在闽南海域发生的国共之间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剑门号”“章江号”被击沉。而章同学、江同学的姓氏合起来恰好是“章江”。

1971. 1. 7 星期四 晴

昨天约定今天上午到费家中集合，然后去摄影，为的是朱入伍（海军）。……走嵩山路到了人民广场，在广场、体育宫、上图、中百等处“揿完了4卷胶卷”。……后又碰到程国梁，把他也拉进了我们的队伍，在中百我们四个“江西老俵”合了影。

【忆与议】

日记中的程同学是我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的同班同学，十年同窗。1969年他去赣南插队。由于性格极为内向，与同学关系中断。1971-1-7在上海街头的邂逅，虽有合影，但我没有看到照片，而且此次以后再也没有了音讯。传闻

他是在“大回城”时回来的。

1971. 1.20 星期三 阴

王在月初回沪。为吃鱼一事，……队里对“上海人”是“要么干脆全部走，为何留这么几个人？”【忆与议】

云庄村是“山清水不秀”之地，只有水深及膝的小溪，也就没有什么大鱼。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每年春天在村口的一口池塘里放养一些鱼苗，到年底起鱼，分给大家，得以品尝河鲜，大快朵颐，欢度春节。记得1969年春节前看到过“拷浜”、分鱼、吃鱼这样的欢乐场景，可是没有留下记载。想不到1971年的春节吃鱼留下了值得深思的一笔——生产队显然不欢迎插队知青，巴不得三十个插队知青统统回沪过年，偏偏还有几个“上海人”留在村里，不得不给知青一份。说明知青并不是“铁板一块”，不可能整齐划一行动。

1971. 1.23 星期六 晴

章来信（1.17）。内中云庄三队工分值仅0.88元，很使我吃惊。

1971. 1.25 星期一 晴

午后，费、刘曾来一次。带来徐的一封信，阅后真叫人吃惊。队里扣义务工分，男：7.5天，女：4天。我被扣后仅780分。一些病人免扣，郭等人半扣。更叫人不着边际的是（主要是徐未表达明白），公社还要扣公益金，如扣15%，那么工分值仅0.78元；若12%，可有0.88元。大队请求扣12%，未见公社意见。另外大食堂每人要补贴90分，加上今年伙食费用每人扣10分，共100分。真倒霉，工分值竟如此之低，我的“如意算盘”——即口粮费用及食堂补贴完全自给——可谓“破产”矣！若0.78元的话，更连口粮都不够买呢！倒是两个老师和食堂炊事员是最乐胃，都在1200以上！胡更是达1500分！然而她们扣除的义务工分要比我们少将近一半。

【忆与议】

这样的分配方法是大大出乎意料的，什么义务工分、公益金等等，在1969年遭遇水灾的时候未曾听说，1970年的情况是否就是正常年景时的正常做法，也不得而知，因为没有相关的记录可查。日记中提到的“两个老师”是指1969年下半年开始，大队办的小学校让两个体弱有病的女知青担任教师，使她们的收入得到一定的保障；“食堂炊事员”是指1970年云庄村三十多名知青合办的“大食堂”，每天安排两人为大家烧饭、种菜，由于这不属于“集体生产劳动”，所以生产队不记工分，只能由知青分摊她们应得的报酬，维持生计。

（2）近乎疯狂的“影迷”

整理四十年前的日记，又一次想起自己当年回沪探亲期间“痴迷”于看电影的往事，重读自己的日记，愈发感

到自己在1990年写的回忆录《有这样一个“影迷”》是相当的简单甚至空洞，日记里留下的1971年元旦春节期间我的“影迷行踪”，较之于上一次回沪探亲时的“影迷行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乎疯狂。

1970.12.15 星期二 多云……

下午，刘、周、江、张四人来我家……叙谈了约半小时。……我送他们至门口，周忽然想起有两张6:10大众剧场“智取威虎山”的电影票，他们今晚去章敏立家，就让给我了。此时已5:40分了。匆匆吃完晚饭，就与小妹一起乘了一站17路电车赶到剧场，还差那几分钟。

【忆与议】

那个时代的文化娱乐是极其匮乏的，城里各种电影戏剧的票子十分紧俏，当初有幸留城的同学就为我们这些回城探亲的“农民”留意那些最热门的票子。像《智取威虎山》这样的“样板戏”，是先有黑白版的“电视影片”，然后有彩色电影，于是两次出现趋之若鹜、一票难求的场面。

1970.12.17 星期四 多云

午后到中百一店一带逛了一次。……回来时到上海音乐厅买了张当场票《欢迎来自反美斗争前线的朝鲜战友》。

1970.12.18 星期五 多云……

2点，我去“大上海”观电影“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上前方之路”，都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解放制片厂摄制的纪录片。后到战斗电影院看了“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声明”“英雄的昏果岛”。前者是上海电影系统《～》摄制组拍的彩色纪录片，反映上海军民坚决拥护毛主席5.20声明；后者是越人民军电影制片厂拍的，反映昏果岛上的人民军坚决反击美帝侵略的英雄事迹。

【忆与议】

从1971年元旦春节期间的日记记录来看，当时的电影确实就像后来流传的戏谑语“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蟋蟀叫……”，至于“又哭又笑”的朝鲜电影在1971年初还没有出现在中国的银幕上。

日记中提到了三部越南电影，恰好在网上查到的“上海地方志”中有相关的记载——

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4509/node15168/index.html

专业志>>上海电影志>>大事记1970年 9月1～7日　庆祝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25周年，上海举办“越南电影

周”，上映《决心战胜美国侵略者》、《上前方之路》、《英雄的昏果岛》3部影片。

1970.12.20 星期日 阴转雨

早饭后……路过“建国”，正好有两小孩退票，是下午2:15的《奇袭》，……2时许到建国看电影。电影是八一厂60.12摄制的。内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一支小分队（一个排）深入敌人腹地破坏敌人桥梁，保证整个战局的胜利，反映了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动人情景。影片扣人心弦，表现出志愿军战士英勇机智，坚决完成任务，为祖国、为人民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奋勇杀敌的精神。晚上5:50在战斗影院又观看了彩色纪录片《欢迎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朝鲜后来京》《西哈努克亲王、宾努首相观看体育表演》。

【忆与议】

不记得当时解禁了哪几部文革前拍摄的国产故事片。但从上海地方志的“上海电影志>>大事记”得知，“1970年10月　为纪念“抗美援朝”20周年，上海各影院重新上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5部影片。”所以，这天日记中提到的《奇袭》以及稍后日记中记录了观看《战友》、《铁道卫士》、《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抗美援朝”题材的故事片，应当就是那5部影片了。看来，当年我是力求一部不漏、通通看到。

1970.12.24 星期四 阴有雨

午后与祖父、小妹同去中华剧场观看了电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同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一周年招待会》。宏伟的场面是多么激动人心呀！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决心用实际行动让您老人家放心，祝您万寿无疆。

1970.12.26 星期六 晴

下午，到外逛马路，走了红光、大众、上海音乐厅等剧院，最后到新风影剧场，正是当场《红灯记》有票。买了一张，又看了一次《红灯记》。

【忆与议】

当年一些电影在江西山村放映过，但总觉得不过瘾，因为都是露天放映，声光效果必差无疑，所以在回沪探亲的时候到电影院里重新看一次。

1970.12.27 星期日 晴

下午2时许外出。先到上海音乐厅，后走延安路、马当路到淮海路，向西直到新华书店，然后回到红光影院，

观看了电影《战友》。影片描写朝鲜战争中，中朝人民军队紧密配合，打败了美帝侵略者，还生动描写了志愿军战士姚志刚奋不顾身掩护受到美帝强盗飞机扫射的朝鲜儿童二龙，自己受伤；也描写了人民军战士金龙的父亲为掩护志愿军伤员老郑自己光荣牺牲在美机枪弹之下。中朝军民紧密合作，终于全歼了守敌。今天，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妄图重新侵犯中国、朝鲜和亚洲，必将是在中朝人民钢铁团结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彻底灭亡！

【忆与议】

既仿照报纸上“影评”的说法，又照搬报纸上的“新闻”口吻，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吧。

1970.12.28 星期一 晴

上午没做什么事，除帮着拣菠菜外，看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剧本。午后去淮海电影院看了电影《无限风光在险峰》。观完到上海音乐厅、大世界等处转了一圈后回家。

【忆与议】

当年把几个“革命现代京剧”的剧本全文在“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刊登出来，也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但在“文化沙漠”的年代，除此之外，大众化的通俗读物实在少得可怜。

1970.12.31 星期四 晴

下午出去，买了沪光电影院3:20的《毛竹》《水面庄稼》，时间还有一小时，就在西藏、南京、黄陂等路上转了一圈，再看电影。前者是介绍毛竹生长、用途等的科教片，后者是介绍莲花、菱等水面作物的彩色科教片。均是上海科影厂64年摄制的。

1971. 1. 1 星期五 晴

3点半，楼下翁家又送来两张电影票：国泰影院4:15的《热烈庆祝柬埔寨王国国庆十七周年》《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我国西北地区》。乃与小妹同乘24路电车赴院。

【忆与议】

邻居送来的电影票，多半是工作单位逢年过节发给职工“欢度节日”的，然而，电影的稀少使得元旦之日也只能用新闻纪录片来充数了。

1971. 1. 6 星期三 晴

午后，章来我家，同去新风影剧场观看电影《广阔的天地》，刘、费两人是早已购票了。电影介绍了知识青年

在云南、贵州、江西、上海、安徽、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情况。看起来特别有劲，特别亲切，特别兴奋。

【忆与议】

恰好在上海地方志的“上海电影志>>大事记”上看到，“1971年上半年　上影新闻片组摄制完成《工农兵上大学》、《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广阔的天地》、《自力更生奏凯歌》、《捕鱼的哲学》等5部纪录片。”看来当时我们这几个插友对那部刚刚上映的纪录片《广阔的天地》都很感兴趣，无非是想知道自己的“第二故乡”有没有上电影镜头。当然，这是太天真太幼稚的想法。

1971. 1. 9 星期六 晴

刘、章在下午四时多来我家。通知我，朱为我们四人（刘、章、费和我）买了4张《沙家浜》的影票，晚上7:20在大庆剧场。……《沙家浜》映时2小时零10分。

1971. 1.10 星期日 晴

午后去“大众”看了《铁道卫士》。不错！挺有劲儿的。不过。整个抓特务的情节还有些模糊，决意过几日再看一遍！

1971. 1.11 星期一 晴

午后去“红光”观看了电视影片《白毛女》，祖父、妈妈和小妹一同观看。

1971. 1.14 星期四 晴

下午到“长征”看《英雄儿女》。此电影文革以前就看过，主要人物王成、王芳、王福标、王东及张团长、王东的警卫员、炊事员老李、老张，等等，都很熟悉。所不同的是，这次看了以后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次看后，体会要更深些。

1971. 1.15 星期五 晴

下午2点20分看电影，《铁道卫士》蛮有劲，公安人员在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支持、配合下，终于破获了美蒋特务网，粉碎了敌人破坏铁路运输的阴谋，从而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

【忆与议】

我在文革前看电影很少，只限于学校组织观看的一学期一两次。所以，那些“老电影”对我来说都很新鲜，甚至还会接连看上两遍。

（3）近乎疯狂的“影迷”（续）

1971. 1.21 星期四 小雪转阴

午后到“新风”，欲购“地下游击队”的电影票，可是尽管天气寒冷，仍有几十米长的队伍呢！看来无望了，回头到“红光”，买了张明天的“伏击战”，又走淮海路、云南路到“中华”去瞧瞧，仍是老样子——客满，只有回家了。

1971. 1.22 星期五 晴

午后到“红光”看了电影“伏击战”。内容尚佳，情节较简单。后来到“新风”一看，排队不长，可明天第1、3场已无，只有时间尴尬的第2场，本想再晚几天，可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还是买了。

1971. 1.23 星期六 晴

午后，此次返沪后第一次去外滩，从福州路去，南京路回。4:35到“新风”影剧场看电影“地下游击队”。回来已6点半了。

【忆与议】

这几天日记中对《地下游击队》《伏击战》是“紧盯不放”，但又没有留下其他信息，遂到网上百度了一下，原来，那是两部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估计是1970年11月底阿国庆节时开始上映的。在那个年代，那些不入流的外国故事片也成了求之不得的抢手货。

1971. 1.24 星期日 晴

晚上去文化革命广场观看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江青同志呕心沥血培育起来的革命舞剧，真无愧为当今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宝库中的最光辉夺目的一颗艺术明珠！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9:15散场，电车拥挤，步行回家。

【忆与议】

对“样板戏”如此奉承恭维，在当时的环境中是正常的。虽然属于盲从，但是也值得反思，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即使悲剧重演也会改头换面，这就是历史活剧与舞台戏剧的不同之处。

1971. 1.27 星期三 辛亥年正月初一 晴

今天是七十年代第二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上午与爸爸到大光明看电影《红旗渠》。河南林县人民改天换地，劈开太行山，把漳河水引到林县，改变了十年九旱的旧貌。他们的英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在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战斗中学习的。

【忆与议】

又是一个节日看电影，又看一次新闻记录片。

1971. 2. 1 星期一 晴

早饭后去刘家。刘去看病（胃口不佳等）。到“长征”影院一看，恰开始预售2～7日《红灯记》早场（7:30）余票，均是加座票。我排了会队，买了4张2月7日的票子，就再去刘家。刘未回，我把3张今天下午“大光明”的《大寨之花遍地开》的影票交给了刘的弟弟，要其转告刘送费、章各一。下楼正遇刘回转，交谈几句即分手。……午后1点半，走西藏路、凤阳路、黄河路、南京路一直到南京西路石门路才回转。主要是到几个影（剧）院看看有否电影票（走过下列几个影（剧）院：红光、大众、新风、红旗、大上海、长江、新华）。4:20回到大光明。离开映还有5分钟。刘、费、徐已到。章未在家。此电影还不错，动人方面还有些欠缺。5点半散场，走黄陂路、西门路回家。

【忆与议】

极其有趣的巧合。1970-2-1，我在我家附近兜了老大一个圈子，在日记里记下了“足迹”。（详见《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一文）。四十年后整理日记，惊讶地发现，竟然在整整一年之后的1971-2-1，我又兜了一个大圈子，路径大体相同！差异在于省去了人民路方浜中路东南角附近的“中华剧场”，但南京路上的脚印从黄陂路向西伸展到石门路；沿途涉及的影剧院中增加了“新风影剧场”（系“大世界游乐场”所属的放映场地，文革伊始“大世界”被作为“四旧”予以关闭，1970年恢复开放了电影放映功能，取名“新风影剧场”，其出入口在宁海路上，但内中的座位是清一色的硬木板椅子，一两个小时下来很不舒服）以及“新华电影院”（在南京西路的石门路与成都路之间）。

1971. 2. 7 星期日 晴

上午7:30与祖父、爸爸、小妹到长征电影院观看了彩色影片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

1971. 2.11 星期四 阴雨转阴

下午1:30～4:00外出。看了电影《送瘟神》，后去新风影剧场购了明日《打击侵略者》。又到上海音乐厅、红

光、大众转了一转回家。

晚上7:40又在上海音乐厅观看彩色影片《红色娘子军》（是妈妈在馆里退来的）。她真是源于舞台、又高于舞台，政治、艺术都达到了完美程度，深深吸引了每个人的心。革命的内容情节，高超的艺术表演，使我感到浑身血液在沸腾，心潮久久不能平静。看一次电影，就受了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忆与议】

虽然把当时对样板戏的阿谀逢迎之词又一次写进了日记，但是真正的想法不敢流露出来：红色娘子军等戏剧电影里，一次次表现出那种你死我活的阶级仇恨，可是在我们插队的乡村里实在看不到，孰真孰假？

1971. 2.12 星期五 阴

下午1:30～4:00外出。先到上海音乐厅排队买了张明天的《泥石流?台风》，后走武胜路、西藏路、福州路、浙江路、延安路、西藏路转了一圈，2:45观看《打击侵略者》。中朝人民并肩战斗，互相支援，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侵略者。今天，美帝在老挝、在印度支那疯狂扩大战争，其结果也必然是彻底的灭亡！

1971. 2.13 星期六 阴雨

午后2:00～4:00外出，观看了科技片《台风》《泥石流》。

【忆与议】

这一年“探亲假”期间的“影迷”行踪到此基本结束。当时正在放映的5部“样板戏”电影、5部恢复上映的文革前摄制的故事片以及2部阿片、3部越片“尽收眼底”了。真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影迷”——从1970-12-15到1971-2-13的60天里，竟然有26天、看了29场电影；如果加上事先买票的因素，60天中几乎有大约40天与影剧院打交道！合计涉及14家影剧院：

位于人民路上、老西门附近的中华剧场（2次）。

位于西藏路上的，自南向北有大众剧场（3次），新风影剧场（大世界）（4次），战斗（和平）电影院（2次），大上海电影院（1次）。

位于淮海路上的，自东向西有红光（嵩山）电影院（3次），淮海电影院（1次），国泰电影院（1次）。

位于延安路上的，自东向西有上海音乐厅（3次），沪光电影院（1次）。

位于南京路上的大光明电影院（2次），顺昌路上的大庆（大同）剧场（1次），复兴路上的长征（长城）电影院（1次），建国路上的建国电影院（1次）。

乍一看，如此密集的“享受”在当时是够“奢侈”的了，但是找出当时的“收支流水账”，发现那29场电影只有16场是自己购票的，其余都是留城同学、邻居、亲朋赠与的，再就是父母单位发的。而“自费”购票中，只有一次在“红光”看阿片《伏击战》是二毛五的“高价”，另一次在“长征”看《红灯记》是二毛的“次高价”，其余的故事片都是一毛钱，科教片则是五分钱。

这使我想起，当年“频繁奔波”于那些影剧场之间，固然有票子紧张的因素，更多的是为了降低经济压力而寻觅低价场次。当时电影院中有“首轮”档次的，如大名鼎鼎的“大光明”“大上海”等影院，新片上映得早，且硬件设施上乘，因而票价也高。所以，当时我们这些回城探亲的“农民”在客观上很难获得先睹为快的“首轮”机会（不少单位包场，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在主观上则是降格以求，到“首轮”以外的影剧院以相对较低的支出来“聊以解馋”。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可能就是那两部同期上映的阿片。据“收支流水账”记载，“红光”的《伏击战》是二毛五，“新风”的《地下游击队》是一毛五。那两个电影院都排不进“首轮”档次，充其量属于“次轮”，但是“新风”的硬件设施要差于“红光”，再加上场次也不理想（正好是吃晚饭的时候），所以票价要便宜百分之四十。虽然绝对值只低了一毛钱，但对于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辛苦工分的插队知青来说也是额外的“优惠”了。也许正因为如此，“新风”在上述统计数据中“独占鳌头”，光顾次数“高居榜首”。

那十多家影剧院的情况，大多在《七十年代沪市中心文娱场所分布一瞥》中有所忆及，该文中未提到的淮海路上的淮海、国泰两家电影院，离我家稍远一些，前者在1.5公里以上，后者还要向西大约800米，所以当时去得不多。另一家未提及的是我家往西大约500米的大庆剧场，文革以前叫大同戏院。当年它坐落在顺昌路近兴业路口，坐西朝东，其特点之一是位于顺昌路小吃街的北端，夜宵市面相当红火。九十年代建设“太平桥人工湖”以后，那一带“沉入”湖底了，唯有脑海里残存些许痕迹。

图中横的红线是“沉入”湖底的一段兴业路，竖的红线是“沉入”湖底的一段顺昌路，褐色圆圈处就是当年的大庆剧场（大同戏院）。

（4）苦中求乐

前述《近乎疯狂的“影迷”》，看上去“探亲”期间里很潇洒颇自在，忙碌着看电影，其实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百无聊赖，枯燥乏味。因为不可能老是与留城的同学以及母校老师在一起玩乐，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所以，日记里留下的活动记录是逐步趋向于“独来独往”，与1970春节期间相比，很少回母校，与老师同学的来往大大减少。而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由沪赴赣插队两年多了，从安徽吉林等地不断传来知青上调的消

息，兀然发觉自己前途渺茫，此种感受到1971-3离沪回队以后愈加明显，忍不住在日记和家信里“和盘托出”，后详。

那年元旦春节期间我在家的时候，蜗居斗室里是冷冷清清、极为萧条：弟弟在1970-3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春节期间也没有获准回家团聚；妹妹还是中学生，不幸罹患肺结核而休学，到江苏下乡外祖父母家去疗养，为的是有一方空气新鲜的环境，以有利于康复；父亲虽然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毕竟已入“另册”，从文化系统发配到航道局“战高温”，到了航测船上以后出海、值班等使得父亲常常数日不归，至此，一家三代七口竟然只有三人常驻。即使如此，仍然厄运不断，祖父明明在文革以前的1963年就被宣布“回到人民队伍”，文革伊始他又被列为“群众专政的对象”，翻云覆雨的政治环境持续不断残酷无情地折磨着年过花甲的老人……。

所以，那年我呆在家里的时候，不仅仅是终年不见阳光的朝北房间在冬天愈加萧瑟阴冷，更多的是心理心灵心境的郁闷压抑痛苦。从日记上可以看到当年在沪期间，读了几本书：列宁回忆录、国家与革命（列宁著作）、南京长江大桥（报告文学集）、林海雪原（小说）、红岩（小说）以及新编的《十万个为什么》，但是没有留下什么感想心得体会。倒是在离校两年多之后，居然在家里研磨砚台，练习毛笔字，自得其乐。

1970.12.30 星期三 阴

下午，理了一下抽屉，发现一本我65年习字的小楷簿。兴致突上，提笔抖抖索索地写了二页（8×14字/页）。几年未练习小楷了，手不听使唤。

【忆与议】

记得小学高年级与初中都有毛笔字课，但是文革开始以后“大字报”席卷大地，而小楷没有什么用处，从66年到71年，四年多没有摸过小楷笔了，难怪在翻理抽屉的时候看到留有空白的习字本会突发兴致。

1971. 1.13 星期三 晴

晚饭后在茶几肚里，看到弟弟64年的日记。金色的童年，难忘的学生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惜的、最感可惜和心痛的是，64年到67年初的日记竟未能保存下来。回过头来看看自己64年进中学后，思想上确是展开了新的一页。这一点，当时也曾感染给了弟弟。弟弟被少年文艺上《在团旗下》一文很快地就吸引住了，这不正是自己的影子吗？68年11月，离开了学校，告别了学生时代，跨入了社会，这又是一个里程碑。两年多来，我又懂了不少东西啊！

【忆与议】

我在1964到1967年写过日记，未能留存，详见《我的跨世纪(记)》。当年弟弟也写过日记！1964年他才10岁挂

零。我1971年看到他当初的日记，感慨不已。尤其是关于入团的内容，已经成为“敏感话题”了。因为1970下半年山村里就开始谈论“建团”即恢复团组织活动。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那是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但是，从小就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给我留下了“阶级”“成分”之类的深刻烙印，所以回想起曾经看过的《在团旗下》，更多的是踏入社会之后的无限感叹，然而又只能含糊其辞、一笔带过。这一年，云庄的知青中发展了首批团员。我在“成分论”的沉重压抑下直到1974年才递交申请报告，此时距离1964年看到那篇少年文艺已经整整十年。容当在整理1974年日记时再细细梳理。

1971. 1.14 星期四 晴

下午到“长征”看《英雄儿女》。……回来后，书写大楷3张（4×4）。

1971. 1.15 星期五 晴

早饭后，书了大楷十张（4×4）。……后去粮管所换布票。因未带户口簿，又因可全部换，又回家一次再去。

【忆与议】

似乎还是练习大楷的兴趣大一些。毕竟已经不是潜心练功的氛围了，所以更显得一曝十寒。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各省市自治区的布票不仅数量上不一样，而且无法通用。但上海市对跨省下乡的知青“网开一面”，允许回沪探亲时把下乡地的布票调换成上海市布票，以每人一丈为限。那年回沪前，布票下发了，我把先期回沪插友们的布票一起带回，分发到人。调换布票的原因之一是，上海市场供应的布料的门幅比较宽，所以，同样一尺布票可买布料的面积差异不小。这就是物资匮乏条件下的平等！

记得当年江西的布票是每人一丈五尺五寸。我是循规蹈矩带了一丈布票去粮管所票证组办理调换手续的，不料又可以全部调换，结果“白跑一趟”，但由于能够获得多一些的上海布票，还是心甘情愿的。这也是那个“票证时代”的苦中求乐。

1971. 1.19星期二雨转阴下午1点多出去。欲购“中华”的《地下游击队》，竟是“今明全满”的闭门羹。于是从1点半到2点半，来了一个“环城行军”，在中华路、人民路兜了一圈，倒也蛮有趣。

【忆与议】

上海近代的城墙就是现今的中华路、人民路形成的“环路”。百无聊赖之际，环城步行一周，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

1971. 1.2 7 星期辛亥年正月初一 晴

今天是七十年代第二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12点多，爸爸带我和小妹去姨祖母家。12:55到，1:50离。后去爸爸工作的航道局航测大队“航锋”一号轮“观光观光”。直到5点半才回到家。冷而乏。

【忆与议】

时已三九严寒，父亲仍在航道局“战高温”，就不难理解所谓“战高温”实在是整人之术。我有机会领略了一下航测工作的环境。正是春节假期，该船停靠在浦东东沟船厂的码头上。不记得是在浦西什么地方乘坐航测大队的工作艇摆渡过去的。只记得我在船上因江水的微微波动起伏也会觉得头晕，爸爸说我出海绝对不行。可是，十年后，1981年夏天我由海路从上海到青岛，并无不适之感。也许与不同环境下不同的心境有关吧。

1971. 1.29星期五晴转多云

舅来函，今下午自南通返沪，要妈妈等晚上到他岳母家去。……舅在国棉二厂战高温至今，人很消瘦，显得老些了。午前，照新出的《行书字帖》临摹了一段。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舅舅也是入了“另册”的。他在1957年中了那个“阳谋诡计”，被戴上“右派”帽子，虽然很快“摘帽”了，但是永远背上了“黑锅”，1968年“领导阶级”占领大学以后，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被逐出校园，“战高温”就是一招。直到拨乱反正才重见天日。

1971. 2. 1 星期一 晴

……后来到老西门转了一圈。回来后“涂涂”墨笔。

1971. 2. 2 星期二 晴

早饭后洗了衬衣一套。其他未做什么事，学学隶书。

【忆与议】

这年的练毛笔字就到此中止了，匆匆开始，草草结束。百无聊赖之中寻找乐趣，我注意到一个“新鲜事儿”——曾经八面威风地到处树敌的对外路线似乎有所变化，从1970-10开始，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非洲的封建帝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三个月里就有五个国家（欧美的加拿大、意大利，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当时是帝国>、赤道几内亚，南美洲的智利）。上海的工人造反报刊出一张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与地区一览表，引起我的兴趣。

1971. 1.21 星期四 小雪转阴

……傍晚前把今天“工人造反报”上载的资料“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和日期”按日期列了分洲的数字表（表示各个年份、各洲建交国家数字）。

1971. 1.22 星期五 晴

天气寒冷。上午又把昨天“工人造反报”上的资料按建交日期顺序排列成表（即不按洲别排列）。

【忆与议】

上述记录还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真正“修成正果”则是二十天以后——

1971. 2.11 星期四 阴雨转阴

上午听到我国与尼日利亚建交的消息，极为兴奋。把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和建交日期编列成表。

【忆与议】

日记所述“编列成表”，竟然保存了四十年——

上述表格的首页右上角，我特地注明“根据71.1.21第421期工人造反报所载，按日期编列”。在背面的右下角则注明“71.2.11制”。我注意到，1970年以前，保持外交关系的有47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有7个国家断交。于是又编制了一张逐年的统计表——

想不到，心血来潮做成的表格一直没有丢弃，而是不断及时增补，且坚持了二十余年，直到九十年代初，因工作紧张繁忙而不得不放弃业余爱好，从此“淡出”了十多年。2007年下半年，我重睹旧表，感慨不已，一时兴起，上网寻找有关的资料，试图补充十多年中断记录而留下的空白，并制成电子表格。

不料就此产生了一个偌大的问号——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各种国际资料中，都没有把欧洲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列入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名单，不知何时开始，该国成了1950-9-14就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现在从外交部网站上得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oz/1206_24/sbgx/ 根据列支敦士登公国与瑞士联邦于1919年签订的协议和1951年瑞士驻华公使馆同我国外交部的换文，中瑞1950年9月14日建交时，中列两国同时建立了外交关系。1988年9月，中国驻苏黎世兼驻列支敦士登公国总领事馆开馆，中国向列国首次派驻了总领事（由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兼任）。

由此看来，也许是在1988-9两国确认于1950年建交！？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那么多年里正式出版的国际资料中不把列支敦士登列入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呢？大惑不解，容当继续关注。

相关图表链接：

http://wangzongren1952.blog.163.com/blog/static/99595901201241591910436/

（5）冷酷的严冬

在极左横行无忌的年代，一面高喊“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一面又深感陷入豺狼虎豹重重包围，仿佛刹那间就会爆发战争，于是乎，风声鹤唳，“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磨刀霍霍，“时刻准备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在江西偏僻山村里，我亲历过几十个人合用一支空膛无弹“三八大盖”的“民兵训练”；回到上海探亲，则知道上海大城市里有城市民兵的“拉练”，我的老师及留城的同学都有过“拉练”的经历。

不知道“拉练”一词的出典究竟何在。网上百度的结果多是说，拉出去训练，简称“拉练”，就是野外训练云云。我记得自己当年对“拉练”这个词颇为反感，想象之中雄赳赳气昂昂的威武之师行进在广袤的大地上，怎么和小小的服装附件“拉链”走到一起了呢？所以，我在日记中一概写作“野营训练”。

1971. 2. 6 星期三 晴

晚上，刘、周又来约我去章家。周是昨天出发野营训练（第一次，全市30万，卢湾区2个团），到了龙华，又宣布暂不进行，因郊县接待工作未安排适当（计划是到金山，兜个圈子），故又回来了。

1971. 2. 7 星期四 晴

周明天参加野营训练，正式出发。

1971. 2.19 星期五 晴

……2:20左右三人同去母校东风中学。薛老师不在。沈、罗两老师昨出发野营训练去了。

【忆与议】

日记中的周同学是有幸留城进了工厂的，此时又有幸亲历“拉练”。假如当年日记没有笔误或讹传的话，第一次30万之众的民兵“拉练”可谓壮观矣。记得当年听说“拉练”只限于本市郊区地界之内，可省去跨省市行军住宿、后勤接待等等的诸多麻烦。至于中学教师也去“拉练”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从网上略知一二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金大陆在《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发表的《“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野营拉练”为例》一文（见http://www.lsfyw.net/thread-15445-1-1.html）对当年上海工人、学生的“拉练”有详尽的介绍。由该文得知，“拉练”是由伟大领袖1970-11-24最高指示发动起来的。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查得——

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月）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根据该文的注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七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说，卫戍区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八月，先后分四批组织了十三个团进行一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六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毛泽东的批语发出后，周恩来十二月八日送审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中央通知稿，毛泽东的批语是“照发。”中央通知稿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不知道当年这种“拉练”的代价如何？如此“全民皆兵”到底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当年极左路线最暴戾的手腕之一是“群众专政”，尤其是在保家卫国、加强战备的旗号下，一方面采用“画地为牢”的办法管制“阶级敌人”，另一方面为加紧战备施工强制“阶级敌人”提供无偿劳动。

1971. 2. 8 星期一 晴

祖父今去日晖港卸石子，到下午4时10分方才回来。

1971. 2.16 星期二 晴

昨晚祖父到三五工地劳动，直到11点半才回。我等到11点，实在太倦，就睡了，早上到8点才起床。

1971. 2.19 星期五 晴

……午11点到家。祖父运土去了。

1971. 2.21星期日阴有雨

上午祖父被集中在专政队，因为西哈努克亲王今到沪。12:30才回来吃饭。

【忆与议】

上述片言只语仅仅是文革期间我的祖父在街道里弄里“监督改造”的简短一瞥，远非全貌。我记得不止一次听祖父说起那种“画地为牢”式的专政队集中管制——多是在有外宾访沪之类“重大政治活动”的时候采取这种办法，把一个里委会范围内的“管制对象”（大约二三十人，均为无业在家）集中在里委会的会场或天井里，由派出所民警一人、里委会干部若干人、里弄团支部选派来的小青年若干人组成临时的看管组，每次都是先由民警和里委会干部进行训话，接着由团支部指定的团员青年对“管制对象”宣读“两报一刊社论”一类的学习文件，最后由“管制对象”逐一“汇报思想”，……如此磨蹭到上级下达解严通知，遂结束看管，各自回家。相比之下，更为冷酷无情的是从事苦役。当时，祖父已经65岁，高血压、心脏病、疝气等疾病缠身，仍被毫无人性地强制从事强体力劳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与劳动报酬，犹如囚犯一般，美其名曰“加强思想改造”，何等的残暴残忍残酷！

1971. 2.25 星期四 阴雨

早上7点20分就到刘家，章已在。费到7:35才到，即出发。因今欢送西哈努克亲王，18路电车只到淮海路，经售票员指点，到西门乘14路到吴淞路，此处到北区不远。月台票亦停售，只得留在外边。五个人（除费、章和我外，还有刘的弟弟及一邻居）在雨中等到9点半，未见沙和郭。他们两人乘乱冲了进去。我们三人开动“两脚车”，于10:30到“东风”。（西哈努克亲王在9点20分左右离沪）。曾碰到程，他冲进去与刘会了一面，后骑自行车回家。

1971. 2.26 星期五 阴

午后阅报。1时多，金来，问我何时返队。因我要去南昌，不能同路。他昨天去送郭的，郭因无电车可乘，租了一辆三轮轿车，花了1.05元才到车站的。金后来一齐挤进车站，沙、郭已顺利上车。49次列车延至10:30才开。

【忆与议】

在那个年代，普通民众的出行也不时受到“重要政治活动”的制约，那天插友回山村，岂料那位流亡在华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乘火车离开上海，保密的交通管制并不事先昭示天下，这就害苦了赶火车的乘客，甚至连送客也不得入站。当时知青离沪无不大包小包“满载出发”，亟需亲朋协助送上车厢，突然遇到这样的禁令，叫苦不迭，虽有一些送客强行冲入站台，更多的人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插友小郭家在淮海路雁荡路，交通管制使他没有了可以去火车站（北站）的公交车，不得不忍痛“大出血”，花了1.05元“打的”（当时的习惯说法是租轿车），这样的价格是我们劳作一天、不吃不喝也换不来的，可“享受”的还是最为简陋的机动三轮车，俗称“癞蛤

蟆”，只有后排可坐两个乘客。

1971. 2.13星期六阴雨

今天一上午和午后一直在学习四角号码查字法。

1971. 2.22 星期一 阴有雨

下午查四角号码字典，已基本掌握查法。

【忆与议】

当年我在百无聊赖之中看到家里有一本《四角号码新字典》，对其中的“四角号码检字法”产生兴趣，很快就学会了，留下深刻印象。它把每个字分成四个角，每个角有一个号码。号码来自汉字笔形，分为十类：头、横、垂、点、叉、插、方、角、八、小，分别用0～9来表示。口诀：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七角八八九是小，点下有横变零头。相比于拼音字母检字法，它可以在不知道读音的情况下检字；相比于部首笔画检字法，它避开了笔画数目的纠葛。我很感兴趣，但奇怪的是新华字典等工具书都没有采用。爸爸妈妈告诉我，原因在于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的王云五是“人民公敌蒋介石”手下的“战犯”之一！（现从网络查知，王云五是1948年12月中共公布的首批43名“战犯”中的第15名。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到台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后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其热衷的文化事业。曾被聘为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台湾有“博士之父”的誉称。）所以民国政权离开大陆以后，“四角号码检字法”也就在大陆泯灭了。在“阶级斗争”理论至上的年代，胆敢自学和推崇“战犯”的发明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于是我把此事深埋心底……。直到八十年代后期，我注意到大陆有一些工具书（如《辞海》）十分低调地重新列入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如今在网上也有了四角号码在线查询。

（6）迷茫复迷茫

在1971春节之前，得知1970年年终生产队的分红是出乎意料的差劲（见《第二次回城探亲的“农民”》），我虽然躲过肝炎流行的一劫，但是全年工分还是入不敷出，而罹患肝炎的插友不得不“仰仗”家庭。插队两年多，依旧养不活自己，成为摆在绝大多数插队知青面前的严酷现实。春节过后，又到了打点行装返回农村的时候，虽然已经是第三次“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愈来愈不知道计从何来、路在何方。

1971. 2. 5 星期五 晴

午后1点，去费家。昨午刘来通知将要讨论一些事情。费与程在门口等候。楼上，刘、郭、屠、金、桂、

徐JC已在，李、郜来后，我们五人一起上楼。后来，张L、张YH、汤JM、黄也都来了。共有15人之多。李把徐LH几次来信让大家传阅了。最大的问题是食堂经费已无！但又无从解决。虽决定上书县革委会、公社革委会，但无人敢于执笔，最后硬让金承担。当然大家都明白，肯定是不行的。另外还就陆随信附来的一张上海青年重排的名单议论了一番。反对的有之，赞成的有之。如郭、屠对调离三组摆脱“可恶”的FX很感高兴。大多数人是不作声，抱着“干了再说”的态度。

【忆与议】

云庄村知青如此规模的在上海聚会来讨论新一年的前途是唯一的一次，到场人数几乎是在沪人数的一半。一年前留村的插友想出了“合起来办大食堂”的办法，大家曾经寄予莫大期望，但在实际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知青生活的窘境、与当地干部的矛盾等等现实问题。所以，再来一次聚会，还是想不出有效对策，也只能“干了再说”。“食堂经费已无”试图要求县和公社帮助解决云云，未见下文，多半是一时兴起的玩笑和胡闹。

1971. 2. 7 星期日 晴

前天在费家里，看到徐给李、郜的信。信上说，潘、李和我被评为五好民兵。被评为五好的还有桂、周。徐本人是三五十五好了，五好社员、五好民兵、五好教师。我对自己竟被评上“五好”，又奇怪又不奇怪。奇怪的在于我这“懒汉”也成为五好。不奇怪的是，自己平日与干部关系尚好，与民兵连长则更好一些。所以评上五好也无大怪了。

【忆与议】

当年对各种“五好”的评比结果还是颇在意的，记得我还把“五好”奖状收藏了好些年。应该说，1970年春插、双抢期间我是问心无愧了，然而此后为躲避肝炎而大幅度减少出勤，确实招来“懒汉”的恶名。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评上“五好民兵”，感到意外的还不仅仅是我自己。我的那张奖状上，执笔写奖状的人竟然把我的名字写成别人了，可是上级发下的空白奖状又没有多余，就只能在奖状上涂改了，却又没有盖印予以确认，不知情者十之八九会认为这是造假的奖状。见1971. 3.31日记——早饭后徐LH交给我一张去年被评为五好民兵的喜报。美中不足的是陆在写名字时误写为郭、涂掉后改上了我名字，然而又无公章作证，虽然落款盖有新干人武部的公章。

至于与民兵连长等干部的关系不错，主要是由于他们遇到“刷标语”“填表格”之类挠头事的时候，我能“召之即来”，迅速而满意地完成任务，且不公开计较工分。这一点恐怕是“五好”之外的“最好”了。事实上，那些年我并没有刻意巴结过哪一个干部，这在《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中可以得到证实。

1971. 2.12 星期五 阴

晚上孃孃来，听听我们对其大女儿70年分配的意见。另外，我第一次得知，家里欲通过她的丈夫的兄弟来把我送进厂矿。我对此不感兴趣。不管怎样，我不舍得离开农村。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孃孃，是我祖父的同乡人，认了干亲，于是我就有了这么一位姑母。她的独生儿子是69届“中学生”，1970年“毕业”正赶上“一片红”，就投靠了在江西南昌附近工作的叔父，成为“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并且有希望尽快离开农业连队换到农场后勤部门去。1971年，姑母的大女儿行将70届“毕业分配”。由于68、69连续两届“一片红”，一些70届学生的家长为子女的出路惶惶不可终日，姑母打算让大女儿走儿子的那条“捷径”。她的想法是，反正在学校无书可念，读书也无用，还不如趁早到拿工资的兵团去，因为“一片红”使兵团名额愈来愈抢手，所以要“抢先一步”“先下手为强”。我不记得当年是怎么和姑母谈论这件事的，只记得后来她真的不等毕业分配开始，就把大女儿送到小叔子那里去了。不久，70届分配开始，恢复“四个面向”，姑母为自己的决策懊悔不已。

那天我是第一次知道我家正在为我的出路“动脑筋想办法”。虽然我在日记里说“对此不感兴趣”，但是肯定没有对祖父和爸爸妈妈直言相告，我知道绝不能让他们伤心。日记里那句“我不舍得离开农村”则是一句反话。我的眼界颇高，不想去兵团，因为姑母的小叔子那里可以进的“厂矿”还是属于农场管辖，而我希望的是彻底离开农村。若要实现这一点，只能留在农村，等待上调，进入县属工厂一类的厂矿企业。当然，不久以后，随着当地上调持续“按兵不动”，这样的奢望就更加是一枕黄粱了。

1971. 2.17 星期三 晴

9点半，刘来。刘、沙、郭已定25日返队。另外还说，宋、汤已回沪，3月中旬返江西。宋说，工分已普遍加了，男生在6分以上，桂最高，为7.6，陆有7.4，宋为7.。70年决分，30名上海青年共超支100多元，工分值已定，为0.88元。周4、5月间将去井冈山大学。社员劳动力也重新安排。我与刘所在三组有GM、DC、CG，真不好办。

【忆与议】

插队两年多，知青工分“涨”了，但是“拼命干革命”脱颖而出的男知青也只有每天7.6个工分，不难想象知青的情绪会怎样。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会有人认为知青对工分的斤斤计较是不值得同情的，甚至应该否定。理由是知青的想法与要求无视当地农民千百年来的生活苦楚，知青应该和当地农民比比。

其实，比较是人类进步发展的源动力之一。知青付出了甚至透支了与自己身体不相符的体力，而得到的回报与留在城里的同龄人相比是天壤之别。知青的不满心理归根结底是来自亘古不变的“人往高处走”。幻想用“斗私批

修”“反修防修”等等的空洞教条把城里年轻人的基本需求强行压抑下去甚至退回到数十年乃至几百年前的状态，必然遇到源于人类本性的抵抗，更不可能以此实现“消灭三大差别”。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是农村被迫接受大量知青，知青被迫从事自己不乐意的劳作，而最为关键的农民生活、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并没有得到发展，所以当地农民与外来知青的利益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极左路线垮台以后，农村的变化有目共睹，而新一代农村青年人离乡背井并无怨言，因为他们是去追求更新更美的生活。所以，重弹乌托邦老调，责难当年知青与农民的矛盾纠葛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在那个时代是很难这么思考的，知青只能在迷茫复迷茫之中蹉跎复蹉跎。

1971. 2.18 星期四 晴

今天，整理了一下我留存家中的一些东西，其中有初中代数、平面几何的预习本子，还有初中的周记本。翻阅之余，有说不出的感慨。

晚上抄了一份中央文件，主席1.8重要批示。

【忆与议】

初中的周记本是当年思想教育结果的一个缩影，也是几十年极左路线愚弄民众百姓、从小学会盲从的真实记载。如果在我的“废纸碎片”中能够找到，那将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了。

日记中说的中央文件、重要批示是什么？在网络上查知，那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还可以了解到有关背景。见本文附录一、二。

1971. 2.19星期五晴

……途中，称了体重，我竟有124斤，【忆与议】

在上海呆了两个月，体重从盛夏季节双抢农忙剩下的90多斤恢复到124斤，但是也意味着新一轮的下跌即将来到。

1971. 2.27 星期六 阴

9:00～12:00到校。先去约周，到校后唯恐薛还未起床，就到中、北两大楼上下兜了一圈。学生时代幸福的一切又重现在眼前……

【忆与议】

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在母校的教学大楼里游荡。到1972年初再次回沪探亲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已经身陷囹

圄了。说来话长，参见《我的一年间》。自此以后就没有兴致回母校玩乐了。

附录一：（来自http://www.xj71.com/2009/0108/515237.shtml）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

中发［1971］3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极为重要的批示，并指出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

我们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通思想，提高觉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将毛主席、林副主席批示和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认真学习。希望你们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中，适时地向中央写出这样的报告。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军委总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毛主席批示林、周、康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

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一月八日林彪批示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

林彪八日

附：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军委、总政治部：

经过学习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林副主席“现在更要特别注意谦虚谨慎”的指示和中央首长关于克服骄傲自满情绪的讲话以及解放军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社论，许多同志说：“我们再也不能麻木不仁了”。各单位通过举办干部学习班、召开各种会议、四好总评等活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军区“三代会”又进一步作了贯彻，并结合学习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克服骄傲自满问题的报告》。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把骄傲自满上升到路线上来认识，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待自己，在灵魂深处挖骄傲自满的根子，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指示无比英明正确，是对我军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革命路上不反骄，早晚都要摔大跤”。

我们在贯彻毛主席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

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如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比较好地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或历史上有战功，工作有成绩，就自以为“一贯正确”，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针对这些问题，许多单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一分为二”的教导，批判“一贯正确”的形而上学思想，摆自己的成长史。有的说：在战争年代虽然打过仗，流过血，但也不是每一仗都符合毛主席的要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受过处分，但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他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篡夺党、政、军大权的阴谋看得不清、或跟着办了错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对毛主席在各个阶段的伟大战略部署，并非都是自觉地紧跟、坚决照办的。通过这一回忆，使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深受教育。认识到：“一贯正确”的本身已经是不正确了，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十六军党委先后两次集中团以上干部学一分为二，查骄傲自满，破“一贯正确”，决心把骄傲自满搞得臭臭的，让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头脑中树得牢牢的。

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有的单位例举了有的老干部

不注意思想改造，“眼睛长在头顶上，尾巴翘在天上”，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变成了走资派的事例，说：有了官气，就会发展骄气，丢掉革命朝气：就会由革命的动力转化为革命的阻力，由依靠群众转化为脱离群众，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化为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迟早总会被淘汰”。

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有的同志总认为自己“战争年代经过‘火线’锻炼，文化大革命经过‘路线’考验，就凭这些资本，也可以再过半辈子”。因此，学习不刻苦，作风不深入，工作无创造，靠吃“老本”过日子。在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中较普遍地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的放下“战功”与“新功”的两个包袱。二〇三师副师长杨育才，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曾产生过有“资本”的念头。学习中，他深有体会的说：成绩、进步、荣誉，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代替将来。职务提升了，不见得思想觉悟就提高了；资格老了，不是革命到头了；荣誉多了，不是为人民服务到顶了。要不断地改造世界观，在紧跟毛主席进行新的万里长征中，为人民立新功。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毛主席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加倍为人民立新功。

目前，在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克服骄傲自满问题上，发展还很不平衡，取得的效果也不一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作为搞好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学习元旦社论中，集中一段时间，组织领导干部反复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有关论述，发动群众，开门整风。同时，通过新年、春节和野营拉练的机会，在全区部队进行一次以反对骄傲自满、虚心向地方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拥政爱民教育。对三支两军人员普遍进行一次整训，反骄破满。“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努力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以上报告，不当之处请指示。

济南军区政治部

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附录二：（摘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

一林、周、康〔１〕三同志：

此件〔２〕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

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３〕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　泽　东

一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二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　释

〔１〕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说，我们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使一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认识到，“一贯正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放下“战功”与“新功”两个包袱。“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在“无限的精力”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

〔３〕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指出：“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

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我们的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通知下发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网中人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十八：1971日记选议（3月、4月）

（7）绕道恒湖返云庄

我的弟弟是69届“中学生”，1970-3“毕业分配”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见《时隔一年又遇“一片红”》、《磕磕碰碰，弟弟进“兵团”》）。虽然他在南昌郊区新建县，距离我插队所在地新干县200余公里，但要换车数次，相当不便，加之经济拮据，近在咫尺也就成了咫尺天涯。一年后，1971-3，我在结束探亲返回山村的路上才绕道那里。不过，在此之前，元旦春节期间，我就在上海感受了兵团的“魅力”。

1971. 1.19 星期二 雨转阴

午后肖德洪老师送来一份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的慰问信。

【忆与议】

诸如此类的慰问信似乎并不多见，更不曾听说知青“接收地”通过母校等渠道向“输出地”发送慰问信的。也许这是因为建设兵团的领导层来自部队，他们带来了部队稳定新兵的系列做法。相比之下，农村人民公社体系没有这类对知青及其家庭的“维稳机制”。

1971. 2. 3星期三晴晚上6时半，我和爸爸一起去七一书场参加卢湾区革委会乡办举行的“欢迎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大会”。十团最近派了12人的学习汇报小组，代表843名上海青年来沪学习汇报。12人中一个是张股长（宣传），一个是赵参谋，其余十个是知识青年，其中九人是团员，有三人是排长。十人中有两个是东风中学的，一是三班夏玲银，一是5班郑言国，均与我弟弟认识，我亦有些认识他们。赵参谋一一介绍了十位知青代表。张股长作了汇报。843名上海青年有450多（460？）评为“五好战士”，占50%以上（全团是30%），有107人入团。然后，夏玲银等三人作了个人汇报。（十人中女生占70%）夏原与义弟同在十二连，她在蔬菜班，70-9调到营部任小学教员。郑言国从小学起即与弟弟是同学，到江西后即分配在农机连。散会后先后找郑、夏打听了去十二连途径。夏建议与她们同返，大约还有十来天。但太匆促。她主动介绍了自己住址：柳林路85/2。

学习汇报小组是28日动身，29日抵沪，已走访了500多同学家庭。9点半与周云良的父亲同回。

今晚的大会值得参加。三位知青的汇报很使我感动，心中感到有说不出的惭愧。

【忆与议】

派出“汇报小组”向“新兵”的家长汇报，短短几天就走访数百个家庭，大概也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特色之一。几乎就在一年前，1970-1-15，我在日记里写到，从留村过年的知青来信中得知，“县革会组织了一个赴上海家庭访问学习慰问队，7日动身赴沪，25日离沪返赣。鸡峰公社有两个代表，由梅峰和乐门各派一人参加。该队的任务是，1、向上海青年家长汇报，2、动员返沪同学回江西度春节。他们说，要搞春节战备，防止苏修在春节搞突袭。”那个“慰问队”来无影去无踪，连在沪探亲的知青本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来自“第二故乡”的“慰问队”在上海活动过！（参见《第一次回城探亲的农民》）看来，同属“县团级”领导层，“政治思想工作”的水平就是大不一样耶。由此，不得不再次感叹，三四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配角”们——知青“输出地”和“接收地”的管理部门——究竟做了些什么，至今没有什么披露，某些号称“全景式”描写知青历史的文艺作品更对此避而不谈，如此“历史画卷”可信吗？

1971. 3. 8 星期一 阴

下午，4:30东风母校李梅标老师送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十团司令部、政治处的喜报（弟弟被评为五好战士）。李老师记性不错，还记得我是同徐、金、刘、费等同去井冈山插队落户的。

【忆与议】

早在一个多月前，1970-12-24，我在日记里写道：“中午收到弟弟来信（12.21）。四好总评初步名单中，他也评上了。不错！要向他学习。”1月底，我得知也被评上“五好”，但是相关的奖状直到3月底回村后才看到。（详见《迷茫复迷茫》）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教育鼓动工作，建设兵团要比一般农村来得“到位”，因而对城市中学生的“吸引力”也强一些。当然，也不能就以此断定农村人民公社体系下的知青管理部门无所作为，毕竟他们面对的是插队知青，颇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态势，而管理干部没有军营式管理的权力，却有与当地农民千丝万缕的联系，维稳难度可想而知。

1971. 3.12 星期五 晴

77次很挤。多亏章帮忙安置好行李。19:28准时开出。妈妈今拉练去虹口公园，送至18路车站。祖父、父亲、小妹均送至火车站。呵，再见吧！上海。

1971. 3.13 星期六 晴

经过15小时又12分钟旅程，于10:40到达英雄城——南昌。

近南昌时结识了一个进贤上车、到十三连去的青年。由他作向导，到小件行李寄放处寄放两只旅行袋。因要上车票，由他看管行李，买了3月15日11:30 385次南昌→萍乡列车到樟树，1.50元，于是得以寄放行李。在那个进贤青年指点下，乘1路汽车到八一大桥，步行二、三里即到船码头，购了下午1:00到昌邑山的船票。那人有个表兄住胜利路，便邀我去他家里。大约有1里多路光景。我有幸看到了南昌城内陈旧的房屋之状。后来他到其表嫂店里去，我独自去码头，正巧开始上船。在船上向去昌邑山的人打听了去十二连路径。后来又碰到马当中学一个在崇义插队、亦去12连看同学、昨天到此、今去南昌退车票的同学。那再好也没有了。4:30到达昌邑山。想不到弟弟已在那儿等候已久。乃步行3小时，晚上七点多到达西沙港。排长聂三龙晚上来和我谈了会儿。弟弟买了饭。已有24小时多未吃饭了，根本就不愿吃、不想吃。晚上弟弟与周云良合睡。那个进贤青年在同行到团部即分了手。

【忆与议】

时隔四十年，对十团十二连所在地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只是在日记和收支流水账里留下了火车站到十二连的路径：火车站乘1路汽车（票价0.16元）到八一大道，步行二三里到船码头，船行三个半小时（票价0.80元），到达昌邑山，再步行3小时，到达西沙港。路途不易，可见一斑。

1971. 3.14 星期日 晴

上午和弟弟到大堤上玩了玩。后来就在宿舍里谈谈。午后和弟弟到营部（恒波分场）去了一次。本想再去八连，人实在疲劳，脚底亦痛，没有去。晚上同弟弟直谈到十点多钟。

1971. 3.15 星期一 晴

早上5点多就起床了。吃了点早饭，6:30即登上返队的路途。大约8点10分左右，到达团部（恒湖）。本拟兄弟俩合影，可是服务部要到九点才开始。我再三叮嘱弟弟一定要留影。早上我假借了家里的名义给了弟弟10元钱，因他手头通常只有2元多钱。可到了团部，硬给我2元钱作路费。一瓶带给他的鱼肝油也硬给了我。8:30乘上汽车，与弟弟告别。这次与他见面仅40小时。

汽车于10:45到达八一大桥。到八一大桥看了一下，即乘1路去车站，乘机观光了南昌八一大道。领了行李（因超过一天，各加1角），立即上车，很快就开动了。12:09到向塘，2点到樟树。正赶上汽车到汽车站（8分）。去新干汽车已无。转去船码头，亦无当日船了。即买了明天5点的船票。于是就开始了10多个小时之久的难熬的“日脚”。

在这里结识了一个南昌70届学生（去峡江看望姐姐）、一个去高岭大队的苏北瓦匠、一个湖南涟源去新干的瓦匠、一个在溧江公社玉山大队插队的上海青年、一个去吉水的上海青年，五、六个人相互交流交流也不感寂寞。深

夜天寒地冻，南昌学生搭起了火，就暖和得多了。0:26 49次列车到樟树后，上海青年成批来到，仅行李就有7车之多。

【忆与议】

离开十二连（西沙港）回南昌，换了一条路径，不乘船了，改由西沙港步行一个半小时到恒湖，坐汽车两个多小时到达南昌八一大桥（票价1.50元）。著名的八一大桥、八一大道也是匆匆一瞥，远远看了看“万岁馆”。具体模样已经毫无印象。参见http://bbs.hsw.cn/read-htm-tid-3572053-page-1.html等网络资料。

1971. 3.16 星期二 晴

4点开始售票时，就到入口处候船。4:30上船，5:00开船，8:45到新干。未看到大队拖拉机，就到汽车站候车。又结识了一个去艾家园的浙江人，是带着一个3岁小孩的妈妈。互相照顾，彼此协助。她为我看行李，使我可去街上：我则帮她排队买票，上车时自己的行李寄托，帮她提20来斤的旅行袋。到麦斜，其公公来接，也上了车。1:50新街上，下车后，天气极热，走了一里多路，就只得把棉衣、球衫裤、绒线衫、绒线背心全都脱了。到小坑休息了一会儿，取了信件，于下午3:30安抵云庄。

在快到新干时，见到69年春来我大队贫宣队的老李，他是去安源学习回来。新干发现了百米地下的煤矿，在大洋洲发现了盐矿。另外还听说在樟树机场下发现了石油。

【忆与议】

当时只以为发现了矿藏就可以开发，殊不知必须通过“究竟有无开发价值”的评价关。

（8）又到早春时节

在“小别”云庄将近三个月以后，1971-3-16，我回到云庄。日记里留下了如下“心情随笔”——

1971. 3.18 星期四 阴转多云

早上起床写信。上午书毕。写了满满四大张。心情很不舒畅。主要是为了自己至今非但不能减轻、反而在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而感到说不出的难过。……今年究竟怎么干，自己心中无数，茫茫然。看来刘TN也是如此：他写“几度寻芳此处来，何时能逢春。自问自答”和“桃红柳绿春满园，深山仍如故”等字句。还说云庄“山清水秀，地薄人瘦”等等。这也正反映了他的思想活动。

【忆与议】

这是当年插队知青真实“活思想”留下的一斑痕迹。两年多的“再教育”“艰苦奋斗”，曾经幼稚地幻想实现自给自足已然成为泡影，大多数人还是过不了“养活自己”这一关。尤其是回沪期间与同龄人的比较，加剧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日记中刘TN在“宿舍”墙上的涂鸦，用当年的习惯性语言就是，“不健康情绪的赤裸裸的大暴露”。我记录下来也是因为存在着某种共鸣。

十多天后，3-30日记里说，“今天收到了盼望多日的家中来信。”我在1971-10-19留下了摘录，内容就是爸爸3-24写给我的信里对我3-18去信的答复：

——父七一年三月廿四日来信来信讲，今年怎么干，心中没有底。这说明你思想上有急躁情绪。我们看来，还是安心劳动，劳动之余，尽可能挤些时间，认真读点书。把带去的几本经典著作好好读一下。不要像去年那样浏览一遍，而是遇到问题认真想一想。能够做笔记，当然更好，不能做就算了。另外，看到报纸上的问题讨论，自己有看法，最好能用笔写下来，这样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更有条理，对问题的认识更深刻。至于今后会有怎样的变化，不必多去想它。想了不仅没有用，而且有害——产生灰心情绪。总之，一切听其自然发展。这样既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盲目乐观。事情就是那样复杂多变的。……我感到对于以后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和发展，不必多想，多想的结果，是自寻烦恼。

类似的摘录与笔记，起始于1971-10-19，并且有如下开场白——

这本本子记得还是在69年下半年一次去新干时顺便买的。当时想作为笔记本来用的。可是，一直没有用它，也没想到记些什么东西。今天是离开上海的第35周月了。近三年中，同亲人、亲友、朋友都有些通信。大都处理了。今年才感到，应当录下一些，一是留念，二是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亲人们来信中不仅是对我生活上关心，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关怀，录下的意义也就在这儿。

不过此类摘录并没有持之以恒，到1972年底就停止了，也算留下了当年家信的极小一部分。

1971. 3.19 星期五 晴

队里的温室育秧，今天早饭后搬到田里去了。我正巧被七根看到，也一同参加了。

【忆与议】

当年的农业生产上几乎年年有些“新花样”，恰恰缺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措施，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温室育秧”是又一个实例而已。不禁使我回想起，1970年春天曾经红火一时、随即不了了之的“试验田热潮”（见《突如其来的“科研小组”》《科研怎么搞？“随便你们”》《“科研小组”人去楼空》）。

1971. 3.20 星期六 晴

早上是掮杉木，没有去。上午、下午在禾下搞田园化，填废沟，扩耕田。上午有6个人，董、金、两个三湖人、冬生和我。下午仅金、冬生和我，共三人。没有干部，要自由些，精神负担亦轻些。

【忆与议】

所谓“田园化”，是当时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在1969年冬天提出的“一化带七化”中的一项内容，在那种体制下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效果。“两个三湖人”则是当时强制本县县城附近的“地主富农”全家老小搬到偏僻山区，云庄接受了三户，分别姓蒋、卢、肖。听说知青回城以后，他们也全部返回了三湖老家。时至今日，我一直不知道当初是谁制定这个“驱赶地富”政策的。

1971. 3.21星期日多云晚上的政治夜校我是第一次参加，没有干部在场，吵闹不堪，根本收不到一点实效。

【忆与议】

政治夜校又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副统帅”提出“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等口号，先是部队里推行，然后“全国学解放军”，政治夜校也就“遍地开花”，凋零于“副统帅”折戟沉沙之后。

1971. 3.22 星期一 阴有雨

早工未出。上、下午均在庙下填窟。

1971. 3.23 星期二 多云

早工在高坑修圳。上、下午在发电站挖圳。中午收工时带柴比挖圳还要累。晚上政治夜校，下放干部王锡琪上课，讲毛主席给新华社负责人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

【忆与议】

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封信也是不可违逆的最高指示。当年很少言及此信的由来，现在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查得——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十月）

吴冷西同志：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

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踏踏，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有手稿）

根据《文稿》的注释，这篇文稿“是为发表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一文给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的一封信。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写这封信时拟的。”我记得在插队云庄的日子里，曾经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过这篇十多年前的“最高指示“，还虔诚地抄录下来。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在报纸上发表？难道也需要对外保密？现在重读此文，伟人真是充满了诗人的浪漫。

1971. 3.24 星期三 晴

早工原是作田塍，可是因为怕水冷，都带了镢头，东寻西找，混了个早工时间。上、下午均在毛竹坑。上午作田塍，下午与富泉一起修圳。

【忆与议】

这样的早工现象不是偶尔的。三月下旬还是春寒料峭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早工“作田塍”，田里的水面上还有一层薄冰，下到田里，咔嚓咔嚓作响，双脚冻得通红，直到麻木得不感到刺骨的寒冷。问题是，如此这般的战天斗地是不是必要？如此的付出有多少回报？

1971. 3.25 星期四 晴

早工是掮板。先掮了两次花皮，后来是几个人合作，因我个子小，无人合作，站着一旁打打帮。最后与几个矮个仔掮了一块收工。上午与两个三湖老俵及七根在高坑，先是在秧田起圳，后作田塍。下午先挑三担种谷，后在仓库背后耘秧田。晚上夜校，支书讲话，什么也未听进去。

【忆与议】

又是“政治夜校”。不记得当时“政治夜校”是几天一次。

1971. 3.26 星期五 多云

早工在晒场给场地育秧浇水，……上午起是食堂的公差，与郭两人磨豆腐，豆25斤。相当疲劳。上午坐了半天，屁股都坐痛了。晚上县宣传队在仓库演出2小时，7:30～9:30，没味道。午、晚两餐吃豆腐渣。

【忆与议】

早春时节，也是蔬菜青黄不接的时候。插队知青不像当地农民家里有主妇，每年会早早安排应对菜荒，所以知青的“吃白饭”日子是很难避免的。好在还能到粮站买些黄豆回来佐餐，而做豆腐的下脚料豆腐渣也不舍得拿去喂猪，而是加些葱花、食盐炒一下用来下饭……！

（9）又到早春时节（续）

1971. 3.27 星期六晴

接公社通知，今天全体五七大军去公社开会，听取省、地、县三级五七大军工作会议精神传达。7:10开始与沙、老周三人同行。行至新街上，扒上拖拉机，九时许抵麦斜。十时多才开始开会，秩序混乱。下午的会亦是如此。散会后与徐JC、老周三人同行。到新街上休息，与郭、金、陆等一同回云庄。沙、桂、徐继续开会二日。

【忆与议】

无从查考1971年江西省三级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知青及下放干部（日记里的老周属于此列）统称五七大军。又到公社开会，不能不回想起去年的失望而归（见《从盼望到失望》）。既然知青上调工厂已经开了头，“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必然失去号召力，也就不能不让知青望断秋水一样盼望上调。

1971. 3.28 星期日 晴

早工挑土砖，国栋家猪栏间的旧墙拆除了。上午在发电站那儿作田塍。下午男生停工，种芋头。

1971. 3.29 星期一 阴转小雨

早工在禾下挖圳。上午在晒场，挑泥、挑火土、平秧床、播种、压种、插篾等等都做过，总之是参加了温床育秧。下午去船仔背作缺。收工后带柴61斤回来。雨水、汗水流成一气，又冷又湿。

晚上，徐、陆、桂、沙、刘和我在食堂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食堂问题和日前麦斜会议精神。关于炊事员，同意了桂关于让金参加大田劳动的建议，而另拟人烧饭。这一来，就得从郭和我两人中挑选了。而我是不准备在春插期间烧饭的。

【忆与议】

关于“温床育秧”，已无太多的记忆。从日记的片言只语来看，那是在晒谷场上制作秧床，覆以塑料薄膜，以保持地温，故有“温床育秧”之名。然而，如此程序与投入，不仅麻烦而且成本高昂，必定难以大面积推广。实际上也确实是昙花一现，只此一次。仅此而已，岂有它哉。倒霉的是基层百姓，为不断的折腾买单，辛勤劳作仍然换不来年终分红时的收入增加，久而久之，势必怨声载道，最终“离经叛道”。

云庄村知青的“食堂”在1971年进入第二个年头。其实，留在“食堂”里不仅仅是“炊事”，还要种菜，喂猪，乃至近三十人的生活用水（洗脸刷牙及日常饮用，日用量不少于5担，每挑一担单程约200米），总的工作量并不轻松。但是生产队是不给工分的，所以，长时间从事“炊事”而不在“再教育的老师们”面前露脸，是很忌讳的，既影响“钱途”——加工分无望，更影响“前途”——如要博得“再教育的老师们”的好评，积极参加农忙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否则，即便平时出勤率高也会被认为是不能吃苦耐劳。这就是当时我不愿意在春插期间烧饭的原因。

1971. 3.30 星期二 阴有雨

早工在塘di修机耕道。上、下午均在禾下挖bi，树兜很多，挖起来非常费力。……晚上办学习班，贯彻三级五

七大军座谈会精神。将花5个晚上办学习班。

1971. 3.31 星期三 阴

今天仅出了个早工，在榨边作机耕道的圳塍。……晚上学习班是学习中央文件。昨天是九生讲话。

1971. 4. 1星期四晴天气晴热。早上在老hou作田塍。上午在禾下开陂。下午在老hou秧田撒灰肥四担。

晚上学习班是议论我大队五七大军存在问题。开得很不成功。

1971. 4. 2星期五 阴

有时有雨早工和上午在起种谷。上午实际只有半个多小时在起种谷，后来就是收拾浸种的禾戽、谷箩等。……12点即收了工。下午和明发、羊善在禾下开陂，十分腻人。晚上学习班在大队部开。启发、九生讲了话。因众人疲倦，草草结束了。

1971. 4. 3 星期六 阴

时有雨早工在榨边作田塍。锄头多，耙子少，拿锄头的也只得搭泥。上、下午在老hou拖泥船。

晚上学习班告结束。……。确定了周日晚上学习制度及食堂制度。

【忆与议】

又是办学习班，又是学习中央文件，但对具体内容未有记录。这种老生常谈式的“学习”，结果是效果归零。想当初，1968-11刚到云庄插队的时候，晚上政治学习的劲头何其高涨。随着时间推移，接触社会实际不断深入，对空头政治是渐行渐远，特别是农忙对学习的致命冲击。虽然1971-4-3还在制定“周日晚上学习制度”，实际上可谓最后的空谈，接踵而至的春插大忙使之无疾而终。

1971. 4. 4 星期日 阴

早上在榨背作田塍。上午与明发、羊善、王仍在那儿作田塍、作缺。下午仅我们两个上海人在禾下作缺。主要是明发“放白鸽”——未来。在梅发及干才的指点及帮助下总算作出了些成绩来，免遭一事无成的结局。

【忆与议】

日记中提到的“作缺”，是一项工作量不很大、但很重要的农活。当地是山区梯田，田间的水全部采用自上而下的自流灌溉方式，从来不用水车之类的工具，因此，控制每块田的水位是一个“系统工程”。每块田都有一个“缺”，也就是该田块较低一侧的田埂上有一个一尺来宽的缺口，这是控制该田块日常水位的重要“阀门”。尽

管通常每次进水之后只要简单地铲来一块草皮、加上一些烂泥就可以做成“阀门芯”、关闭“阀门”了。由于“缺”这个“阀门”关系到一年里水稻生长的需要和收成好坏，不能有漏水等隐患，所以“作缺”就成为备耕时节的一项重要农事。

现在不清楚，“作田塍”是不是一种传统的农事。所谓“作田塍”，是指当年每年春季水田耕作之前，对田埂进行全面维护，把所有梯田的面向水流方向的田埂统统抹上一层“水泥”，保证不漏水。此中工作量相当巨大。但是我在近几年与云庄人的交往中发现，如今没有“作田塍”的农活，看来，这与冬天不再“搞三光”是呼应的。所谓“搞三光”是当时冬闲季节整修农田的一项内容，把田埂上的杂草除掉，仿佛是剃胡子，因为田埂有三个面需要“修整理光”，所以当地农民称之为“三光”。（参见《令人刮目相看啊——从修圳说起》《下乡三天，开始三光》等文。）那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搞三光”“作田塍”难道也是“集体化”“公社化”时期的特有产物？待考。

1971. 4. 5 星期一 阴有雨

清明早上和上午及半个下午在卢家山栽禾，是场地薄膜育的秧。后半个下午在台面上作田塍。

晚上吃馒头，每人1.5斤。我一下吃了一斤一两。给徐JC2两。

【忆与议】

此处场地薄膜育秧可能就是上面提到的温床育秧。其实，只适用于发生异常春寒的情况，以期保证秧苗生长不违农时，正常年景大面积采用的成本颇高，在效率低下的经济体制下则更加没有优越性可言。

在新干的水稻种植区，当年除了稻谷之外没有什么别的粮食品种。所以，偶尔去买一些面粉，做一点面食，都是以每人一斤为底线的，大吃一“斤”的情况屡见不鲜。

1971. 4. 6 星期二 阴时多云

早工在庙下作田塍。上、下午挑大粪。是从未做过的事，也比任何一次挑大肥要吃力——一担大肥去，一担水回。体质虚弱，汗流浃背。

1971. 4. 7 星期三 阴

早工到船仔背掮板。双肩因昨挑大粪疼痛，未去。洗了4件衣服。

上午与春林、家学、义芽在猪场挑大粪。本来是派×××去的，但他怕脏怕臭未去。我不在乎什么臭不臭。没有大粪臭，哪来大米香？！

午后刘动员我和他去胡狄坑砍柴。两人奋战半天，共砍柴六、七百斤。刘340（160+180），我280（140×2）。另外还有百余斤未挑回来。

晚上夜校由启发、老王谈关于春耕生产问题。

【忆与议】

村子里有几个公用茅厕，属于干式厕所，所以需要人为加水稀释。一担重量在120斤以上，所以一天下来相当辛苦。而砍柴半天，又挑140斤甚至180斤的重担回家，如今更觉得不可思议。

1971. 4. 9 星期五 阴

早工在榨边作田塍。上、下午在禾下栽禾，小苗带土移栽。看来我们组进度最慢。

【忆与议】

此处又有一个新名堂“小苗带土移植”。具体的育秧过程已无记忆。但记得此法给插秧带来的莫大苦楚。此法既然是“带土移栽”，也就是不能像传统秧苗那样洗去根部的泥土，所以挑到大田插秧时，数倍于传统秧苗的重量，而且一担挑不了多少秧；到了大田，又无法像传统的秧把那样把秧苗抛洒散布到大田里，于是，动员大家每人带上一只脸盆，到了田边把秧苗装进脸盆带着下田，才能开始插秧；还必须有人在田埂上为插手的脸盆里补充秧苗，但因脸盆在田里的传递只能是把脸盆抛来抛去，所以又不时造成泥水四溅……。记得当时就有农民抱怨这是“少慢差费”，确实如此！这样的育秧法貌似突破传统，但是在其他因素仍然是维持传统的情况下，是无法大面积推广使用的。

1971. 4.10 星期六 阴

早工在禾下堆缺。上午继续栽禾。下午在猪场边西排作田塍。右腿根淋巴腺发炎，从未有过的疼痛。

1971. 4.11 星期日 晴

早工在石尾作田塍。上、下午在榨背拖泥船。福芽未到，故有两个上海人，上午是王，下午是刘。

【忆与议】

当年在“田园化”中使用“拖泥船”颇多。目的在于把小块的水田合并成为大块。尽管是选择高低尽可能接近的田块予以合并，终究还是存在高差，这在水田里是忌讳的，因此要把高处的泥迁到低处。又没有合适的机械，只能用人力拖动木质的“泥船”。一般是三人一组，先由各人各持四齿钉耙把一块块泥巴装到“泥船”上，然后两人在前面“拉纤”，犹如牛马，另外一人在后面用钉耙顶送助力，拖到低处，大家合力拉翻“泥船”，卸下泥巴。这

种办法毫无疑问是非常原始的。

（10）第三次参加春插大忙

转眼之间，“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插大忙又开始了。1971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加春插大忙，日记中已然不见了前两年的新鲜感，也没有了感叹与谈论，仿佛是在编制和摘抄生产队分组“生产进度简报”，反映了当年“集体生产”过程中的“先近后远”的安排原则。现在看来，当年我似乎是有意把云庄村的一些小地名记录下来。

1971．4.12 星期一 晴

今天，我三组开始栽禾。早工在老头扯秧。上、下午在石枯栽禾。日栽十余亩。

1971．4.13 星期二 晴

早工在老头扯秧。上、下午在卢加山栽禾。

1971．4.14 星期三 雨转阴

出工内容同昨。早工栽了两坵秧田。晚上开大会，布置生产，明天开始打夜工。

【忆与议】

所谓“打夜工”，是当年农忙时加班加点的一种说法。具体而言，一般都是指清晨天不亮就由生产队干部吹哨叫醒众村民下田劳动。而吃过晚饭以后再去干活的情况很少。其实，把第二天插的秧提前一个晚上拔起来、捆成秧把，捂上十来个小时，对秧苗并没有什么好处，对人而言更是有弊无利的“疲劳战术”。即使是每次农忙由蹲点督战的公社干部授意和安排下的“树标兵、高工效”或“搞突击”之类的活动，“积极、主动”地在晚饭后“继续革命”也很罕见。毕竟，“大跃进”年代那种晚上被迫开夜工、实则到山上睡觉的瞎胡闹，在基层民众中是深恶痛绝，失去号召力了。所以，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最多是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回家吃饭，目的是把远离村庄的某一地块的活儿突击完成。

1971．4.15星期四 阴

早工在老头扯秧，57个。上午栽完卢加山，开进榨边。下午栽禾田亩较多。

1971．4.16 星期五 多云

早上4点开始扯秧，101个。然后栽秧田。上下午均在榨边栽禾。

七根、春桂、志新、振家和冬生、菊孙、富泉今天搞突击，分别平均每人栽禾2亩、2.2亩。三组全组栽禾25亩。他们即占14～15亩。

1971. 4.17 星期六 阴有雨

今天我组上海青年被德才激将法匆促上阵搞突击。上午六人，下午董、金休息。栽禾3.8亩。人是疲倦不堪，与全根、顺茂、添仔三人相比要少多了。他们三人全日栽禾4.41亩。

【忆与议】

纵观1971年春插日记，扯秧（学名：拔秧）采用“计件制”的只有两天。不记得为何“夭折”。

用“人均日栽面积”来“搞突击”，这对知道内情的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稀罕，因为名义的田亩数与实际的田亩数不是一回事，“搞突击”完全可以有猫腻。详见1970日记选（33）《第二次参加双抢（再续）》。日记中4-17知青仓促上阵“搞突击”，有两个知青半天就退下阵来，有可能是对猫腻不满，也有可能是连续一周苦战再“搞突击”，体力不支。

1971. 4.18 星期日 阴

继续打夜工。上午栽完禾下。下午开进庙下。

1971. 4.19 星期一 阴有雨

今天是因为下雨，5点开始扯秧。上下午均在庙下。上午栽6.54亩的大坵。仅起线就170分钟！因下雨原定今天吃掉庙下未遂。

【忆与议】

云庄村有一块“超大”的田块，面积号称6亩5分4厘，通称“七sa”或“七sa dei”。当年听说是把邻近地块不断合并起来的结果。现在据说在分田到户之后，它已不复存在了。记得云庄村面积在三到四亩的田都不是很多。那块“七sa”更是大家视为畏途的，因为一下到田里就难有插秧到头、得以站在田埂上、直腰歇歇的机会。日记里说，“仅起线就170分钟”，那是我特意向知青中唯一带表下乡的插友借来，在“大战七sa”时统计那个众人瞩目的时间。由于丘陵和山区的田块没有一块是形状规整的方形、矩形等等，都是“奇形怪状”的，所以插秧时每块田里必有一个高手“起线”，他不仅插秧速度高于常人，还要选定每块田里稻株的走向，所以这个“插手”插的那一路是那块田的第一路，也是最长的一路，还必须横平竖直，成为大家“齐头并进”时的标杆。可想而知，在“七sa”插一路就是将近3小时，而且还有众多“快手”在边上紧追不舍，这在大家心目中是十分恐怖的事情。我在云庄七度参加春插，不止一次参加过“七sa大战”，而且都是紧挨“起线”的位置上。这是因为自下乡后第二

次春插（1970年）时我“脱颖而出”，又快又好，每逢“奋战大坵”（一般把三亩以上就视为“大坵”了）时，常常被“逼上梁山”——生产队干部和社员把我“挤”到“起线”人边上，希望看到我被“吃田螺”的狼狈相。不过这样的尴尬没有发生过。

1971. 4.20 星期二 阴

早上4点扯秧。上午及下午大部分时间、大部分人马攻下庙下。开始攻拿埠口了。

1971. 4.2 1星期三 晴

早上扯秧。上下午在猪场门口栽禾。今天开始分几起人马吃拿埠口。我们六个上海青年在一起，全天栽禾近5亩。

1971. 4.22 星期四 阴

早工扯秧。开进白石坑。下午因汤、程两人回队，董、王两人去接，老周来栽禾。又因田不好，不好栽禾，再加昨天突击，故今天速度很慢，总共大概不过2亩左右。

1971. 4.23 星期五 雨

早工在仓库后扯秧。上午把昨天留下的七分糟糕田吃完后，到路心仔下面栽禾。西坑基本上由老俵在昨天下午完成。下午汤、周两人亦来。下午由我和刘两人负责起线，因为田都小，大坵都未耙好。进度亦很慢，全日不过2亩左右。

1971. 4.24 星期六 大雨

早工仍在仓库背后扯秧。今天吃掉了拿埠口。……两汤、董、金和我五人今天栽了大约2亩多些。主要是因为西排上那块2亩多的萝卜地实在不好栽禾，大大影响速度。下午的倾盆大雨是罕见的。今年的天气有些古怪。

【忆与议】

从4-21的日记开始，几乎每天记录了知青单独统计的当天实绩，说明知青开始成为单独的一个劳动小组，显示了“知青独立成组”的倾向。从1971-5的日记来看，该年春插期间的工分仍然是采取“评定农忙工分”的方式，但这对知青有一定好处，因为平时知青的工分只有当地同龄人的七折左右，而春插“农忙工分”的“折扣”比较小，知青“被剥削感”得到一定的减轻。然而，知青更希望“独立成组”，藉此在工分问题上减少来自生产队的制约，由于这需要“按件计酬”这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所以到1972年春插得以实现。后详。

1971. 4.25 星期日 阴

一夜大雨至清晨方止。绝大部分上海青年都未出工。各组只有一个“代表”去出工：一组陆，二组桂，三组汤。

下午公社五七办公室老李等两人开座谈会，了解我云庄五七食堂情况。我与刘未坐多久即上楼，因为感到无兴趣。

【忆与议】

云庄村知青在1970年春节以后自发办起“大食堂”，与大多数知青由最初的集体户变为各自分灶恰好“背道而驰”，所以，一年后得到有关部门重视。不记得为何那天我们不感兴趣。但是，1971-5-7我在日记里有这样的记录：“公社出的五七专刊上所载云庄食堂之调查，许多地方与事实相违。”不知道那样的座谈会和五七专刊之类会不会进入政府档案之列。如果存档并有一天公诸于世，还有没有人关注其中的细节及其真伪。

1971. 4.26 星期一 阴

早工仍是插秧，5点起床。今天全组奋战一天，吃掉了长坑仔。下午到7点半才收工，天色已漆黑了。

1971. 4.27 星期二 阴多云

早工扯秧。今天吃掉了高坑。此地田亩甚宽。我们8个“上海人”全天栽禾近5亩。

1971. 4.28 星期三 晴

早工扯秧。今天开始吃石尾。因昨天太累，故今天速度较慢。晚上又在高坑扯秧，8～9点。上海青年充满乐观气氛，说说唱唱笑笑，颇为有劲。今天是栽禾以来出工最长的一天。

【忆与议】

上文提到晚饭后再去干活的情况很少。此处记载晚上有一小时的拔秧，这在整个春插农忙十多天中也只有一次。估计是春插大忙的最高潮到了，公社乃至县级干部要下乡“鼓劲”，于是来一次“作秀”，上上下下都可以有所交待。

1971. 4.29 星期四 多云→雨

早上即栽禾。5点起床哨响，我第一个出工。上午吃完石尾。下午基本上扫平高坑。我们上海青年多是栽大坵的排上田。

1971. 4.30 星期五 多云、阴

早工扯秧，在村口。上午与四个短个：顺茂、风生、添仔、志和在老头栽秧田。下午我们上海人（除董）七人，实际6人，金在挑秧，共栽秧田2亩余，6点即完工了。老俵在炉下栽排上的田。

1971. 5. 1 星期六 阴有阵雨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三组今天第一个宣告栽完早禾。早上在门口扯秧。上午因秧不足，未及栽完炉下。下午由汤、汤、王、金和我五人负责栽完。老俵们栽完了牛眼仔（排上）。今年基本上实现了省革委提出的“不栽五一禾”的口号。收工较早，与汤、王二人帮一组知青栽禾至黑。

今年的春插大忙自4.12至今共20天，出勤19天整，收获很大。4月26日黑板报上表扬了一批五七战士，有陆（坚持用架子，日栽1.19亩）；刘TN、我、汤JM（吃苦耐劳、出勤高、质量好）；桂、沙（吃苦耐劳、出勤高、质量好、带病出工）；徐（每天最早起身，吹起床哨）。

我自己稍微作了些成绩，就得到贫下中农的表扬，这是对我最大的教育和鞭策。但是，总结这20天中，自己骄气甚足，也影响了周围的同志。自己没有很好注意同周围同志的关系，也影响到三组上海青年兄弟组上海青年的关系。所以，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指示，反骄破满，批修整风，在自我总结中在思想上有所收获与前进，在今后工作中为人民立新功。

【忆与议】

这天的日记就像是一份小结。也许是我出勤率最高的一次农忙，也可能是心情最好的阶段之一。联系到1970年秋天开始有知青被招工进厂的实际情况，也是1971年农忙时表现上好的原因之一。因为大家都以为招工不会停止，有希望跳农门了。日记所云受到生产队黑板报表扬的徐，“每天最早起身吹起床哨”，是知青集体户中的负责人，此时已经成为“大队革委会”成员之一，而每天吹起床哨恰恰是很会挨骂的苦差事。

回顾在云庄的那些年，应该说，插秧是我最出色的农活。这与我的体力、能力基本上是匹配的。然而，其他的农活需要更强的体力，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所以，在一个多达三十人之众的集体户里显然不可能成为“全能”的“佼佼者”；在以体力劳动为主要特色的情况下，要紧的是有一副好身体，“小车不倒只管推”才是最好的表现；在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年代里，艰苦不在于劳动的本身，而在于思想上的压抑，尤其是一个出身不好的人，纵然“全能”也难以获得招工招生的青睐。



《我的孔化营》

写在前面的话

几天前，晓秋在MSN对我说：“夫子，你写的东西呢？”我莫名其妙，问她：“我写啥东西了？我啥也没写呀？”她马上答到：“给你的长假放完了，赶紧接着写吧！”

夺命小鬼儿又来了！自打前年5月让王版主打捞上来，自己没事找事，写了一篇《夫子日记—我的高二三班》，一下被套牢了，一下成了班网写手了，屁股后头老有人举着鞭子赶着，天天在电脑上码字儿，于是又有了《我的混凝土班》、《我的张湾》和《我的十八号》，已经从呱呱落地起写到了风华正茂，再往下写就是娶妻生子，就是如何从机关小职员混到如今这个不知几品的芝麻官，不过这些故事恐怕是再过三十年才能写的，只不知能不能活那么久？

“不是还有孔化营没写吗？”是的，那段蹉跎岁月，也可歌可泣，可不知为什么，我几次想提笔，却几次又放下，对写孔化营，心里没一点谱。不是往事淡忘了，孔化营的一草一木都镌刻在我心里；不是插队很无趣，恰恰相反，孔化营的两年可与张湾的三年相媲美，是我最难忘的人生岁月。大概正因为她太可歌可泣，太凝聚着悲剧时代的悲凉色彩，所以每当我提笔写她时，那千钧重量总要把我压垮。

知青作家郭小东在《中国知青部落》序言中写到：“不管他们走得多么昂扬，在我的灵魂中，我与他们一样，永远是跪着的。仿佛在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但是极端伟大极端神秘的力量在呼唤着我们，在逼视同时对着我们喊叫：你是有罪的，你该罚！于是我们集体地跪下了。我无法挣脱它的扼制，我只能永远地跪下去。”

这段话我读过多遍，每读一次，心灵总被震撼！每当我想要写插队，我就要反躬自问：你在那段平淡如水又炽热如火的岁月中，究竟是在跪着，还是走的昂扬？疑问幽灵般徘徊在我心头，迫使我去思索，去回答。于是我把视线投向了北方。目光穿透岁月，从记忆的长河中，我看到了什么？

一座神奇的山——海坨山。在官厅水库以北，距插队地永宁公社约有六十华里远。她不列名山之谱，可在我的视野中，她是如此雄伟高大。冬日白雪皑皑，如身披素纱的女神；夏日苍岩峻峭，像守卫塞北的勇士。晨出暮归，

我总爱仰首眺望，从她那里得到一种精神的享受，一种心灵的启迪，一种感情的升华。她与周围那连绵不断的军都山脉谱成一首田园交响乐，将大自然的壮美倾注在我心田。

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在孔化营两年生活中，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形形色色的农村干部，像雷厉风行的公社书记刘富存，干练泼辣的团委书记小侯，积怨甚多的大队书记赵西贵，老实巴交的知青总管魏金宝，猛张飞式的治保主任马照友，古朴幽默的七队队长老二爷子，硬汉子团支书二石……；有各种各样的农民，像七队的热情风趣的国柱，精明强干的进怀，慢条斯理的大先生，假小子孙三儿，苦命的荷莲儿，潮货三锛子……。当然，更少不了一同插队的伙伴们，以及“搭配”给我们户的两个初中生：毫无文学细胞可总想当作家的建生和老北京味十足的德启……。我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看到人人织成一张社会的大网，丝丝缕缕相连，个个像是这网中的一个蜘蛛；看到人人组成一部生活的机器，环环相扣，个个像是这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看到人人构成一个矛盾的整体，正义与邪恶并存，真善美与假恶丑同在，顺流与逆流搅成一个巨大的旋涡，人人都在其中挣扎，希望摆脱命运的束缚，渴望“命运敲门之声”能化作辉煌的晨钟！

当然还有我自己，一个骚动不安的内心世界：对事业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对成功的渴望，对人生的思索，对爱情的梦幻，对文学的迷恋……这一切交织在一起，驱动着一颗年轻的心砰砰跳动，驱动着一个羸弱的身体，总是要去做力所难及之事。我看见1975年国庆节前夕在青纱帐中护秋的景象：一连七天发烧，每天烧退些，就硬撑着下地去看青。裹件脏兮兮的棉大衣，蹲在老玉米地里，月如冰轮，辉似秋水，虽然冻得发抖，仍旧兴致勃勃地吟些豪言壮语般的诗句。那心态，真有一种临战前的兴奋，一种赴汤蹈火的豪情，一种渺小向伟大宣战的悲壮。所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谓：“人定胜天”，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尽在那心态中，宛若一首灿烂的英雄交响乐！

这就是我回首往事时看到的三幅画面：自然，社会，个人；三幅画面重叠在一起，没有一笔灰暗的色调！这就是我追忆旧曲时听到的三首交响乐：田园，命运，英雄；三支曲子交织在一起，没有一个忧郁的音符！于是我似乎完全有理由说：我们那时走得非常昂扬！

可是，当我过了知天命之年，当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角色居高临下俯瞰那段人生时，却发现许许多多自以为崇高的举动，都仿佛唐吉珂德的侠行，是那样的荒唐可笑。我们高喊着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把石头山开出梯田和坑田，却破坏了林木和植被；我在田间地头给社员们大讲评法批儒，无疑是上了政治骗子的当；我夜夜不辞辛劳去大队广播室播讲《金光大道》，让孔化营的父老乡亲企盼一个“高大全”来帮他们脱贫治富，其实那纯属梦呓……；尽管我可以一遍遍自我安慰：这一切都不是我的错，我的所作所为都产生于为人民服务的意愿，都与投机钻营无关……，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这无非说明我不是被迫向愚昧屈服，而是自觉地跪在它的面前。当我自以为走得昂扬时，其实我正跪着。所有如歌如梦的痴迷憧憬，都成了无形的重负，压在我头上，令我自然而然地跪下了，而我还自以为在昂扬地走着。

这是我想要写孔化营时，不得不反复思索的一个痛苦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曾为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奉献了青春和真诚。我们以老一辈人为楷模，舍弃舒适与安乐，苦行僧般地去磨练自己，去改造社会，结果事与愿违：历史发展的环节断裂了，民族前进的脚步延缓了，许许多多人生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失而不能复得。正如郭小东所说：“该扬花的时候，风来了，吹落了一切花蕊；该吐穗时，雨来了，将其打得七零八落；该结果时，收获的季节已经远远地逃遁了……”。虽说青春无悔，可悔又如何？何处再去找回失落的岁月呢？

于是，每当我想要写孔化营时，那三幅画面便有了暗淡的色彩，英雄交响乐也变成了悲怆交响曲。我们对革命的热衷，对政治的参与，对落后势力的斗争，对艰苦生活的藐视，对疾病的乐观精神，对爱情的执着态度，对大自然的强烈的征服欲，都使我们具有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激情；然而我们既征服不了大自然，也无力去改造社会，我们屡屡错过爱情，在政治运动中也成了被愚弄的角色。时代契机使我们从城市到农村，一腔热血要去改天换地，可实际上这是逆潮而动，美好愿望与冷酷现实之间的冲突注定了我们的悲剧性，注定了我们要跪在地上。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值得骄傲的精神吗？难道我们没有走得昂扬的真实的一面吗？我的同学们，像书记唐谦和班长陆惠敏、我的户友京辉、张颐和人璧，还有一队、八队其他男生和五队六队的女生，乃至建生和德起这样的初中生，以及像老二爷子、国柱、二石、荷莲……等等社员们，他们不都有一种精神，一种“人不能够被打败”的韧劲，一种对幸福生活的苦苦求索，一种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厚的爱吗？正是有了这种精神，那段生活才有价值，才值得回顾，才能给人以启迪。我无需刻意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身上去挖掘这种精神，只要把我感受最深的体会和印象剪接在一起，那种精神便自然贯穿在其中，那是一种民族魂。

当年给黄毛写故事，故事里有这样一段话：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北京有大批知青到郊区县插队落户。同“老三届”相比，他们插队的时间是短暂的，他们的生活也很少有英雄史诗的色彩。在后人眼里，他们缺少东北知青那莽原的粗犷和悲壮，新疆知青那戈壁的古朴和苍凉，云南知青那山林的神秘和荒蛮，陕西知青那黄河的雄浑和庄严……他们是知青大潮中最后一次残缺的潮汐，是知青烽火中最后一缕淡淡的轻烟。

然而，他们的生活同样有苦有乐，可歌可泣；他们正处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前夜。他们是历史隧道中延续支撑的巷木，是知青梦幻中最后的思索。最后的思索深沉而成熟，最后的思索预示着觉醒。如今，那梦幻已经消逝，已被淡忘，但是那用青春和生命凝成的最后的思索，却被深深镌刻在历史的路标上，向后人昭示着前进的路。”

当年，正是那种使命感驱使我去写张湾；如今，这种使命感又驱使我拿起笔，来填补孔化营的空白。

但是应该怎样写呢？是写成《我的高二三班》和《我的混凝土班》那样基本写实的回忆录呢？还是写成《我的

十八号》和《我的张湾》那样带有虚构和演绎，更近于小说或叙事散文类型呢？是写全体知青呢，还是只写我们七队呢？思来想去，打算尝试虚实结合的写法，七队为主，其他户为辅；七队的事会有些虚构，使其更具故事性；而其他同学的事，则以日记为准，尽量写实，并作为插叙，嵌在七队的故事之中。这样，整个故事虚实相间，或许不至于让同学们感到冗长而单调。

又要开始抽羊角疯了。打完混凝土后我说过，写东西就像抽羊角疯，疯劲上来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直到最后一个字写完，疯劲儿过了，人清醒了，出窍的灵魂才重新附体。抽疯很痛苦，但疯劲儿一过又有些飘飘然，似乎做了了不起的大事。我希望这是在班网最后一次抽疯，这次写完，我真的可以休息了。

当年在给黄毛的笔记本扉页上，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张湾的我们已经死了，心里的我们却还活着，于是你让我成了掘墓者。当往事的棺椁被撬开时，青春的骸骨已灰飞烟灭，一直跪着的我们，早化做一抔黄土！但是黄毛，不管当年我们怎样跪着，在我的灵魂中，我们永远走得昂扬！"

我想这句话也适合送给我的同学们："不管当年我们怎样跪着，在我的灵魂中，我们永远走得昂扬！"

沁园春.《我的孔化营》题记

几度回眸，几卷丹青，几梦黄粱。忆阳春出塞，孔营种柳；年方锦绣，岁正芬芳。铁灶熬粥，柴锅贴饼，尝尽人间五谷粮。悲欢处、便欲说还住，谁解衷肠？

如今鬓发苍苍，写旧事、孤灯冷墨香。念同窗好友，萍飘四海；西园别后，各付流光。网上重逢，屏间啼笑，情比蜂狂比蝶狂！曾记否，在屋前种豆，藤蔓萧墙？

第一章：新家

一、

插队后才知道，北京北部连绵不断的群山统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

车出北郊市场，进十三陵后走108国道，在山峦之间盘旋上下几个钟头，便到了永宁镇。永宁镇建于明朝，有600多年历史，距县城17公里，是延庆第二大镇，它地处延庆盆地东部，地势东高西低，东、南、北三面为山区及半山区，中部为平原。永宁公社有十三个大队，其中七个分散在南山坳上下，叫南七村；南七村从上往下数，第六个村叫孔化营。孔化营依山傍水，多坡地，村里房院高高低低，参差错落。

阳春天气，京城里已是柳绿花红，永宁镇却还春寒料峭。4月5日下午，孔化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魏近宝领我们到七队住处，关照几句，说："恁先拾掇着，俺去女生户料料，"便匆匆走了。"料料"是永宁话，"看看"的意思。大家坐了大半天长途车，又是走山路，浑身颠得要散架。把行李朝炕上一扔，都躺倒了。我闲不住，学着近宝的话对京辉他们说："恁先歇着，俺前后料料"；京辉张颐人璧噗哧都笑了，京辉说："你料料吧，料着宝贝告诉我们，不许独吞啊！"

新家是个残破的小院，看上去好像很久没人住，屋檐下蛛网密布。绕过影背墙，有间北房，房前有一小块菜地，门口有棵枣树；靠东墙是"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用秫秸杆围个圈，里面平地挖下去一尺多深的长方形的坑，算作茅坑；坑旁堆堆土，解完手铲锹土盖上粪便，等盖到快满时，起出粪土卖给队里作肥料。屋后还有个小院，院中一株桃树，两边厢房破烂不堪，里面堆满了秫秸杆。我们住在前院那间北房，倒也是四梁八柱，只是年头长了，显得老态龙钟，墙皮斑剥像是老年斑，门窗露缝，像是老太太嘴；一推门，吱扭一声，如老头叹气。进门是灶房，东墙南窗下一座新起的灶，大铁锅，带风箱。北墙根码着一张窄窄的桌子——简单得就像是四条腿上钉了块板，上面瓶瓶罐罐，装的油盐酱醋。贴西墙摆着口大水缸，缸上扣着脏兮兮的木头盖子。灶房两边是东西屋，西屋门锁着，透过门缝，看见里面屯着粮食。东屋没门，只挂着个布帘，掀帘进去，就是我们睡觉地方。原本是一间房，在中间又打了个隔断，成了一大一小的里外套间。南窗下一排土炕，铺着新炕席。墙壁和顶棚上裱满了发黄的报纸，糨糊还没全干，冷不丁那报纸就会咔啦一响，让你吓一跳。

"老匡，咱们这叫躺在炕头上，放眼全中国，胸怀全世界！"京辉把头枕在铺盖上，腿翘着，仰望着顶棚上糊得密密麻麻的报纸，一本正经地说。

"就是炕头短了点。要能再长上一尺，让我放眼全宇宙也没意见！"人璧绻着腿。斜靠在铺盖卷上说。

"哈，谁叫你长得跟长脖鹿似的，穿衣服费布票，睡觉冻脚不丫儿！"德起有些兴灾乐祸。

插队前学校分户，非要把初中生插到高中户，我打心眼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插队也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天天一个炕头睡觉一个锅里搅马勺，难免会闹矛盾；三班同学都是干部子弟，又都下过干校，有共同语言，即便有矛盾也好化解，可要是安插个小混混进来，天天不务正业偷鸡摸狗，这日子能过得好吗？为此找白老师软磨硬泡，希望她高抬贵手，别给我们户安排初中生。最后磨得白老师不耐烦了，说："得了，不安排不可能，搭配俩最老实的给你，行吧？"

"搭配"来的俩初中生，一个叫金德起，一个叫吴建生。见面一看，我就知道他们的确都是老实人。德起小矬个，粗壮礅实，黑脸带些浅浅的麻坑。老北京人，祖上在大清朝干的是牢头狱卒之类的行当，传到他爹这，也曾在西城拘留所干过若干年看守，后来不知犯了什么事，被逐出公安系统，弄到一个小厂子当了工人。德起姐妹兄弟多，家里生活挺困难。68年大姐去了北大荒，去年大哥也下延庆插了队，家里少了两张嘴，日子总算缓过点劲儿

来。建生长得矮胖，扁平脸，小眼如珠，乱发如草，大嘴岔，扇风耳。小时一场高烧，留下重听的毛病，左耳尤其厉害，听人说话得侧过脸用右耳朵。他九岁时，父亲因贪污公款被判了八年，母亲气得大病一场，撒手归西。抛下他和14岁的姐姐，靠吃救济混日子。姐姐为了让他念书，自己辍学到街道工厂画彩蛋，含辛茹苦，供他念到初中毕业。因为耳背，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只好插队了。

德起在炕上躺了一会儿，上灶间抄起水舀子舀一瓢水，一饮而尽，抹抹嘴说：

“老社员真够哥们儿，水都给咱挑满了！嘿，我说老匡，天都擦黑儿了，你还那学么什么哪？咱哥几个谁睡里间儿谁睡外脸儿，你这户头倒是分排一下呀！”

“咳，这事还用安排？都是一样的炕，挨着睡吧，”我说。

“得嘞，那我可就睡西头了！不是我犯心眼儿，我看了，咱哥几个的铺盖，顶数我的单薄！”德起说完，马上紧挨西墙摊开褥子。西墙贴灶，生火做饭总是西边炕头先热，眼下春寒料峭，还是热炕头舒服。

小套间能睡两人，因为靠东头，离灶远，炕要冷得多。我知道张颐有荨麻疹的毛病，一受凉就爱犯病，便冲张颐说：“你和京辉、人璧睡外屋吧，我和建生睡里屋。”

“得了吧，”京辉笑着说：“让建生睡凉炕，该说咱们高中生欺负初中生了！张颐爱起疯疙瘩，你太瘦也不经冻，你们俩和建生睡外屋，我和人璧运动员的体格，抗冻，我们俩睡里屋正合适。不过德起你可想好了，眼前是热炕头舒服，等到三伏天，你那可就成了火焰山喽！”“嘻嘻，火焰山就火焰山，先舒服一天是一天，你不是风格高吗？等到夏天我再跟你换过来呀！”德起笑眯眯地说。

京辉人璧在里屋铺好了被褥，张颐挨着外屋东隔断墙铺开，剩下中间两个空位，我想挨着张颐睡，便对躺在炕头望天的建生说：“建生，你挨着德起睡吧？”

“什么，什么？”建生侧过脸，瞅着我，看样子没听清。

“老匡，甭叫他大名，叫他吴胖子他就听见了！自小胡同里都叫他胖子，听惯了。”德起教给我。

“胖子，你挨着德起睡吧？”我又大声问。

“成！成！我不像德起那么多心眼，我最老实，睡哪都成！”建生眯着小眼连连点头答应着。

“这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说话老不招人待见！”

德起笑着骂了他一句。便帮他把铺盖打开。忽见被子里掉出个笔记本，牛皮纸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名言录”三个大字。我打开看看，只见头一页上记了一句话：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

看到这，我噗嗤一笑。建生扭脸瞧见了，慌忙把本儿拿过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这本儿是我姐送我的，瞎记！瞎记！”

德起说：“老匡你不知道，胖子是我们班最爱臭拽的一个。成天揣个本儿记些花哨词儿，逮哪乱用一股，笑话多了！你说就他那德行，还想当作家？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屎壳郎戴帽，硬充大铆钉！”

“您这词挺高！”建生咧着大嘴一笑，掏出杆黑塑料杆儿的钢笔，把那句歇后语记在本上。字写得歪七扭八，十个字倒写错了五个。

铺盖都就了位，德起拉着建生去了屋外边，京辉和人璧躺在炕上看书，张颐拉起小提琴，琴声悠扬。我静静地躺着，心又飞回清晨的京城。

二、

夫子日记：1974年4月5日：

“早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出家，三哥送我到学校。

今日清明。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可今天晴得没有一丝云。动身时，送人的大轿车已排列在校门外.我们列队在师生们的夹道欢送中走出校门，我们恰好坐在头一辆车上，全西城区120辆送行车的头一辆啊！一队小姑娘向我们献花。汽车开动了，车下的人群挥起手来。车上长安街，就像一叶小舟卷入了人群的海洋！从西单一直到豁口，处处鲜花、彩旗、锣鼓、人潮，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特别是车过西单时，大概有新闻制版厂拍电影，场面尤其壮观。五颜六色的纸屑纷纷扬扬抛洒下来，像天女散花；条条彩带飘向车头，像彩虹飞降，今天太美了！……汽车于中午1点多钟抵达永宁，到公社后立即召开欢迎大会，然后我们坐着大队的拖拉机驶向孔化营。永宁的气温明显比城里低，小风吹在脸上有些刺人，出了公社往西没开多远，司机师傅指着一片隐约可见的村庄说，那就是孔化营。

可是此刻我却被西方的一座山峦吸引住了。第一眼，便觉得那山有些特别。一路上的山都是黄灰色，而远方这山却是白色，洁白如玉，在蓝天映衬中，银装素裹。还有那山的形状，壁立高耸，奇峰刺天，像把匕首，要把天空刺个窟窿。山峰上，一团团云雾向山腰两侧浮动，渐渐在峰峦前面汇成一泓雾海。那白色的山被这云雾的海洋淹没了，仅有峰尖凸露在云海上，好似孤独的小岛，又像浮游的小船。在阳光辉映下，在碧空衬托下，那山峰显得静谧、庄严和神圣。我的心灵被她震摄，被吸引，以致同学们对孔化营的议论我一点没听进去。”

到孔化营的当晚，我查了一下北京地图，在延庆县张山营镇北部与河北省赤城县交界处，地图标着一座山，名叫海坨山。主峰海拔2241米，为北京市第二高峰，我想，她应该就是今天我看到的那座山了。在孔化营的两年中，海坨山在我心里简直成了一座神山，她的多姿多彩，庸容华丽，令我着迷；她的雄伟挺拔，迎风斗雪，又常常赐予我力量。听社员说，海坨山到处山泉流淌，有些还是温泉；她的峰项叫大海坨，是一个长近10公里草甸，上面长满金莲花、黄花菜、手掌参、地榆、拳参、山丹等植物；每年初秋至次年初夏，可以看到“海坨戴雪”；晴日可看到“海地层曦”的景色。我忽然发现自己是幸运儿，因为到孔化营的路上，这两种奇丽景观我都看到了！

我正靠着被子写日记，忽听咕咚一声响，震得窗纸乱颤。接着便听见窗外建生带哭腔的声音：“嘿，楞楚子，怎么喳？比划比划得了，还真摔呀？”

接着听见德起说：“嘿，怯勺，甭急齿白脸的，哥哥这是教你一手，不服气？再来再来！”

又是一阵咕咚声。我急忙爬起来，喊了声：“京辉人璧，德起建生他们是不是打架啦？赶紧看看！”说完自己先跑出了屋。晚上八九点钟，月亮刚挂上树梢，小院地上一片银白色。我出门一看，忍不住乐了。德起和建生，竟都光着膀子，正搂在一起摔跤。春天的塞北，夜风凛冽，我穿着厚毛衣尚冻得有些哆嗦，这两小子居然光着膀，摔得顺脖汗流，看样子真用了狠劲。人璧、京辉和张颐出来，一见他俩这样也都笑了。德起看来是练过点摔跤，身上黢黑，毽子肉疙里疙瘩，蛮劲十足；建生显然是生手，身上虚胖，脚底没根儿，劲道也不足，他拼命抓着德起的双臂，哈着腰，低着头，用他的大脑袋使劲顶着德起的胸脯，硬把他向后搡，却冷不防德起一侧身，脚下一绊，把他摔了个狗吃屎。

“你这招‘肥猪拱圈’不灵，防不住我这招‘铁拐李’”！德起得意洋洋，一边拍打着胸脯，一边向我们看着，“怎么样？谁跟小弟练练？不是我吹牛，论摔跤，二龙路谁不知道咱金德起？”

我们几个笑着摇摇头。正这时，恰好八队的亚力来串门，刚才德起摔建生那一交正好他看见了。亚力爸爸是公安学院的，在学校就听说过亚力学过擒拿，但从没见他露过。此时见亚力来了，我们拍着手说“德起你师傅来了，还不跪下磕头！”德起看看亚力，个头和他差不多，也不像是个练家子，一脸不屑地说：“就他呀？姥姥！”我们起哄架秧子，冲着亚力说：“亚力，还不给他露两手！”亚力开始不说话笑着光摇头，经不住我们一个劲窜捣，便走到德起跟前，伸出手说：“握握手”。德起莫名其妙，不知亚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用力握住亚力的手。突然亚力一转身，往下一蹲，手一抡，不知怎地就把德起像扔皮球一样从背上摔了过去。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亚力又笑吟吟地站在那，德起可是重重跌在地上。

“你耍赖皮，突然袭击！”德起爬起来，气急败坏地冲过去，他刚要拽亚力的胳膊，不知亚力怎么一拨弄，身一侧，脚下一跘，他便又摔了出去。

“这叫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建生拍着手大笑着说。我们听了一愣，一琢磨，是说反了，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人璧上前，拍拍站在那发呆的德起，指着亚力说：“他爸是秦城监狱的总管，老公安了，他可是真正学过拳脚的，当你师傅一点没问题。”

德起听了这话，上前拉住亚力的手说：“刘大哥，小弟拜你为师！”

那天夜里，上炕熄灯后，我建议睡之前，每人讲几句感受。我打头，说今天感受最深的是长安街头的送别，那么隆重热烈，像欢送上阵杀敌的勇士。话音刚落，京辉就跟上一句：“我看像欢送倒插门的女婿，”大家哈哈笑了，弄得我挺尴尬。张颐忙打圆场，说今天到孔化营，让他想起下干校，想起说话侉侉的湖北佬。“你们还记得刘岩在班上学湖北佬吗？”说完他拖长音，摹仿刘岩在班上学湖北佬丢东西后大喊大叫的腔调：“京—财！（警察）斤死斤巴粮票块死块巴钱，一哈哈就被巴气克达呀！”我们又大笑起来。接着，德起说，今天亚力露的那一手“大背挎”真让他开了眼！祖上积德，叫他遇上一位武林高手，他一定好好学，再回家时，就不怕“借饼儿”那个三青子了。人璧故意问：“什么是`借饼儿’？是借烧饼还是借烙饼？”德亮忙说不是不是，“借饼儿”就是“隔壁”，是老北京的俗话。最后轮到建生，半天没动静，德起贴脸一瞅，早做上黄粱梦了。德起要捶醒他，我忙摆手说：“睡吧睡吧，明早大队还要开欢迎会呢！”于是都合了眼，不一会儿，里外间鼾声一片。只有我，夜游神似的，睁着眼，望着窗棱上的月光，回味着一天的事。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

第二章： 大队部

在人民公社年代，一个大队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国家有首都，大队有队部；国家有主席，大队有书记；国家有媒体，大队有广播站；国家有军队，大队有民兵；治理一个大队，尤如治国，难事很多，权也很大，在孔化营地界之内，大队书记跺一脚，地皮也要颤三颤。

一条大道，把孔化营分成东西两半。大队部就在路东高场上，门朝西，院内北面一排平房，由西往东，依次是大队办公室、会议室、卫生室、活动室、民兵连部；西南有间广播室，一间仓库；东南都是院墙。西门口南北两间平房中间的过道棚上了顶子，过道两边的墙上做了两块黑板。上面抄着毛主席语录，一块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另一块写着："孔老二鼓吹学而优则仕就是破坏上山下乡必须批倒批臭！"

到孔化营第二天，我们五户知青们早早来到大队部。近宝见人都到了，扭头问一位披军大衣的汉子："西贵，开始吧？"那汉子点点头。近宝咳嗽一声，站起来说："欢迎大家到咱孔化营来插队落户。昨个我和同学们见过面了，我就不多说了。就请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赵西贵同志，给大家讲话。"

披军大衣的汉子站起来，微微一笑，摆摆手说："我也没啥多说的，以后日子长着呢，咱们先认认队干部吧。近宝各位都认识了，他是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主管知青工作。以后各位吃喝拉撒睡，有什么问题就找他。"他用手指指旁边一位蹲在条凳上抽烟的中年汉子说："这位是马德才，革委会委员，管治安、生产"；那汉子扬头向我们笑笑，浓眉络胡，像个猛张飞。西贵又指指旁边一个年轻人，说，"这位是二石，大队团支部书记，也是七队副队长。"我一听说是七队的，便留心看了看：一米八的个头，瘦长脸，厚嘴唇，戴一顶蓝单帽，帽沿和帽边浸透了黑黑的油渍。岁数三十上下，人挺严肃，眼睛挺亮，肩挺宽，坐在那，挺胸直背，一副军人姿态。我注意到他的那双手，又大又宽，骨节凸起，青筋暴露，鹰爪一样透着狠劲，不禁暗暗说："好家伙，这可是条好汉！"

书记接着又给大家介绍了妇女主任赵秀华，贫协主席魏久俊，各知青户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当说到七队

队长魏宗亮时，环顾四周没瞅见人，扭头问近宝："你们队老二爷子咋没来？""刚还料见哩！"近宝四周瞅瞅，喊到："二叔唉！""这哩！这哩！"门口传来苍老沙哑的答应声，见一个精瘦的老头在从门口迈进来，手攥着个旱烟袋，看样子，刚才是蹲在门外吸烟呢。大约五十多岁，穿一件蓝布旧棉袄，身量原不高，又有些驼背，显得更矮。一脸瘦筋，眼泡鼓着，像金鱼眼；额头和眼角都刻着深深的皱纹，头发花白，嘴很大，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得黑黄的牙；笑容有些滑稽，透着憨厚淳朴。

书记看见他，点点头，说："这位是七队队长魏宗亮，大家叫他老二爷子。宗字辈儿在我们孔化营是大辈儿。下边让老魏给大家介绍一下村里的情况吧。"

魏久俊掏出个小本本，描了两眼，说：

"咱孔化营，属永宁公社南七村，南七村中，论地面和人口，除了新华营，就数咱了。咱村共七个生产队，3600亩地，360户共1600人。村里有党员40，团员30多；机井8口，45马力大拖拉机1台；地主富农13户，戴帽6个，摘帽3个；各队分值，高的6毛多，低的4毛多。今年公社下的任务7百亩麦子，8百亩土豆，产量预定450斤；咱村高中毕业生有4个，初中生30多，村里有个民办小学；粮食种类：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莜子、豆子，还种点水稻；村北靠河套有大队的苹果园，南山坡上有大队蚕场。村东头有大队的砖窑，村西挨着新华营有个青龙潭，天旱，就剩个小水洼子，前两年大队在潭里养点鱼，新华营老是偷，还影响以粮为纲，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两年没再养了……"。

那天下午九俊和近宝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了转，看看地形，看看果园和砖窑。我们看见村南不远有座山，山上还有座高高的铁塔，向近宝叔打听，才知那山叫郑柱岭，那铁塔是解放军支的，是给空军用的。"新华营有个飞机场，全是战斗机；那郑柱岭上有很深的防空洞，里面藏着高射炮呢！""真得吗？"我们一听全都兴奋起来。"那还有假？上了郑柱岭，看得真真的！"近宝话音未落，我们已经奔向郑柱岭。那是座石头山，处处岩石裸露，有土的地方都植上了桃树杏树，但花都还没开。越往上爬风越大，爬到山顶时太阳已快落山了。顺着近宝指点，我们向西望去，果然看见一个机场，若干架战机静静停着。大伙可能都是第一次看见军用机场，不免有些惊喜，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而此刻，我的目光忽又被西边那座远山吸引，那座海坨山正处在夕阳的光辉下，峭壁反射着日光，使整座山峰晶光迸发，宛若穿上一件金缕玉衣；落日不断接近山顶，山腰环绕的云雾像被烤着一般，红得像血。转瞬间太阳已没入大山背后，天地万物骤然黑下来，像一个大剧院落下帷幕，熄灭灯火，我们则像一群看完节目的观众，说说笑笑地走回村去

第三章 *搂地*

到村第三天，上午听魏久俊忆苦思甜，下午在村北河套边种扎根树，晚上参加大队青年们开的欢迎会，至此所有仪式走完，我们终于该下地练活了。

第四天天刚蒙蒙亮，屋里的房梁上的小喇叭就响起来。一阵沙沙的唱盘转动声，接着一个男的唱起京东大鼓，声音浑厚而又高亢，京味实足：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大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那啊----”。

张颐一睁眼，听到这，马上扯着嗓子跟着唱起来：

“前面走的是张老汉，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那啊----”

接着，京辉和人璧也跟着扯着嗓子唱起来：

“张老汉今年有五十多岁，红红的脸膛蓝布衫那啊----”

德起爬起来，站在炕上伸伸懒腰，说：“一个个狗脑子，别的事记不住，记这倒挺快！”

“你想，都三天了，一睁眼就听它，就是狗也会唱了。我还纳闷呢，你说一大早不放《东方红》，放什么京东大鼓？这广播员是不是有点二百五呀？”张颐乐呵呵地说。

“可别乱说！”我打断他的话，又推醒还在打呼噜的建生，说：“快起快起！咱们要晚了！”

“还没敲钟呢，着嘛急？”德起慢悠悠地穿着衣服。

这时，门外巷子里，传来了老二爷子沙哑的喊声：

“出来了唉----迎工去喽！出来了唉----迎工去喽！”

“怎么这上工不敲钟啊？”德起一下慌了手脚，把裤子也穿反了。我看看闹钟，刚刚六点多点儿，没想到出工时间这么早。大家匆匆收拾洗漱完毕，顾不上吃饭便去迎工。

迎工就是派活。七队迎工点就在我们住的那条巷北边，老二爷子家门口台阶下。只见二十多老少爷们，全斜倚在路北院墙下一个小坡上。咝拉咝拉地抽着烟，一株光秃秃的老榆树，架在头上，透着稀疏的晨曦。十几个姑娘媳妇，坐在路南房基的青石板上，一面纳着针线，一面唧唧喳喳地小声唠嗑。

老二爷子见我们从巷口走出来，磕磕烟锅，笑眯眯地说：“起早还不惯吧？起两天就习惯咧。”

旁边的二石挺严肃地说："明早早点起，别再让老爷儿晒着屁股！"这的人把太阳叫"老爷儿"，"晒老爷儿"是口头语。

二石说完就站起身，掸掸屁股，对老二爷子说："二爷，派活吧！"

老二爷子别起烟袋锅，瞅瞅眼前众男女，吩咐到：

"进怀带着明子去城里拉磷肥，下午往大隔岭送粪。正义领上焕秀，十斤媳妇，国柱媳妇，去石家坟搂麦子，剩下的，今儿都到西山坡下去搂地。"说完，他又特别叮嘱我们几个："回去拿三齿，知道三齿吗？三个尖儿的。拿上出来跟我走。"

昨天老二爷子带着张颐去了一趟永宁镇，买回粮食、咸菜和干活用的工具，里面有三齿，我们还讨论半天它是做什么用的。最让人难忘的，是买回来的铁锹，大得吓人，德起一见就嚷嚷到"怎么买这么大的家伙呀？想把人累死呀！"

太阳刚爬上山，晨风冷飕飕、湿漉漉的。我穿着厚毛衣，依然有些冷。前两天出京城时，城里已是玉兰花开，扬柳吐绿春风拂面；而这塞外群山中，竟依旧是淡霜衰草，枯树寒鸦，只有冬小麦似在返青，在大片大片的棕褐色之间，镶嵌出一块块绿毯。田间土路上，各队的社员，三五成群，荷锹肩锄，都在慢慢走着。一些出工早的社员，已在田间干上了。

到了西山坡下，社员们便一字长蛇，由南向北搂地了。二石把着东头，老二爷子居中，我们跟在二爷旁边，学着搂地。地很松软，三齿插进去，向后一拉，板结的表层土就被翻松了，一些大块土坷砬，要用齿背使劲敲碎；土层中的一些碎石瓦砾，则需猫腰拣起，仍到田头上。活很简单，但要干得巧，干得既出活又省力，就有些门道。我看看伙伴们，发现德起像是干过农活的人，会使劲，该重该轻，拿得很准，握三齿的姿势也轻松自如。人璧和京辉因为个高，有点哈着腰，使不上劲似的。建生最差劲，一股蛮劲，刨得重，还常常跑偏刨到别人垅里。没干一会儿，他已是满头大汗，连毛衣都甩在了一边。老二爷子也看出他是个生手，特意指点他："建生唉，别急，悠着点劲，这样，这样，懂吗？"建生侧过右耳朵听了听，有点不好意思，点点头说："我知道，知道！"可扭过身，还是照旧玩命似的狠刨着。老二爷子瞅着直乐："这傻小子，咋不开窍？"

一趟地搂到头，约莫小一个钟头。老二爷子直起腰，望着早早就搂到了头、这会儿已返身往回搂的二石，问到："二石唉，不歇歇儿了？"

"搂回去歇吧，还早呢。"二石头也不抬，一股劲搂着。

于是大家接着往回搂。这时太阳已高，阳光照在郑柱岭上，让人有些暖意。地里刮起小风，三齿刨下去，带起细细的尘烟。默默干了半天，社员们都有些乏味，一个叫二臭的十六七的瘦小子，嬉皮笑脸地对老二爷子说："二

爷唉，唱个歌吧！”旁边一个叫国柱的青年人说：“啥？听他唱歌？您赶紧用胰子洗洗耳朵！别让他满嘴脏话把你耳朵堵喽！”老二爷子听了也不恼，一边搂一边说：“瞧恁说的，我不会唱好词儿？”说完，把三齿往地下一住，仰着头，扯着嗓子就唱起来：

“养猪好，养猪好。肥猪就是那个宝中宝。一亩地，一头猪，保证能做到！”

他唱得很用劲，脸憋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露，两眼鼓突着。一唱完，自己先得意地拍两下手。二臭也拍拍手，阴笑着说：“二爷，不是唱这个，唱个老的！”

“老的咱也会！”老二爷子仍用原调，唱出另一段词：

“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帮咱们打虎狼。日本鬼子祸害咱八年，八路一来咱解放！”

“不是这个，唱那个‘十八摸’，敢不？”二臭吸溜着鼻涕，赖皮赖脸地说。

“那有啥？”老二爷子回头看看妇女们，都落得较远。就咳嗽一下，一本正经地唱起来：

“一出村，向正西，迎面碰上个当兵的，我说大娘啊！

当兵的，不说个理，一把拽进了高粱地，我说大娘啊！”

唱到这，戛然而止。二臭竖着耳朵等着下文呢，见没了声音，忙催到：“咋不唱哩？”“有学生呢！”老二爷子说着，瞅一眼我们，脸有些红。国柱哈哈一笑，“我说啥来着？真正狗嘴吐不出象牙！”

老二爷子不吱声，又闷着头刷刷地搂着。我紧赶几下，和他并了肩，边干边问他：“二爷，西北那座高山您去过吗？”

“海坨山？”“是”，“去过”，“离咱这有多远？”“好几十里，腿快的走个大半天吧”；“爬到山顶要多久？”“这不好说，没爬过”。

“那山头为什么是白色的？”我继续问。

“雪呀！那山上可冷呐，老毛子那边的寒流从口外刮过来，先过海坨山。这山尖尖的雪，到六月还不化呐！”

老二爷子抬头看看海坨山，解开棉袄扣，敞开怀让风吹吹，对我说：

“打小日本时，八路军在那山上藏过，在一个山坳里边，叫清风坨。那地方可真难进去，别说外人，就是二臭他们这辈的，也没几个上去过！”

“您什么时候上去的？”我好奇地问。

“三十多年了，那会儿我也就十几岁。日本鬼子把我爹和我都抓到二道沟去修炮楼，老爷子五十多了，有气喘病，上长城搬城砖，搬不动，让鬼子一脚给踹下来，腰摔断了，没几天就咽了气。我火了，想投奔八路给俺爹报仇，就跑出来。二狗子，就是伪军，一个劲追我，我一猛子跑上海坨山，才把二狗子给甩了。我一个四姐夫是八路，我听四姐说在海坨山上，有八路一个营地。我就顺着山道往上爬。那时还没公路呐，全是砍柴割蒿的人踩出的小道，路真陡啊！等爬到山头峰口子，天也黑了，老爷儿也落了，那上面的风就硬得小刀子似的。我找个背风处，扒点蒿草搭个窝。想凑合一觉，等天亮再去找。刚眯上一会，就觉得有动静。一睁眼，好家伙，跟前站着一只狼，正往我身上扬沙子呢！知道为什么扬沙子？它试试你是死是活，你不动弹，它就当你死了，就该吃你了。我抄块石头把它砸跑了，狗日的，一会儿又摸过来，还是扬沙子。我就拿根棍，它一扬沙子，我就拿棍呼啦一下，一直耗到天亮。把狼轰跑了，我又冷又饿，心想，得赶紧找八路去，不然就要让狼叼了。嘿，正巧，就遇上了八路的流动哨！我一提四姐夫的名字，还真认识，马上领着我进了清风坨。那地场，生人甭想找着！七弯八拐，藏在深山坳里，就一条羊肠小道，一边是山谷，一边是峭壁。等我一走进去，好家伙，里面一个小平川！那土黑黢黢的，长满了野刺梅，虎榛子，山核桃，那蒿子都有小孩胳膊粗！要是春天把那地烧荒出来，撒下种子去，恁就甭管它，只要不碰上雹子，到秋天准是遍地粮食，那可真是块宝地！”

“您参加八路了？”我问。

“可不是。还跟小日本打了几仗呢！”

“怎么又回家种地了？”

“嗨，胆小呗。我生来就胆小，连鸡都不敢杀，听见枪响就哆嗦。打枪只敢冲天放。四姐夫见我不成材，说还是回家照顾老娘去吧。把我给轰回来了。”

“不是吧？”二臭在一旁不紧不慢地说：“我听说您是遇到一位俊妞，您把枪一撂，跟着她私奔了，对不？”

“不是不是。”国柱也搭上腔：“我听说二爷是悄悄搞上了一个黄花姑娘，叫大队长知道了，要枪毙他，他四姐夫把他偷偷放跑了。”

“瞧你们俩个揍性（德性）！一点正经没有！”老二爷子笑着骂了一句。

“真可惜，二爷！”人璧感叹到：“您要是一直干下来，现在军长都当上了！”

“可不”，国柱说：“咱哥几个就给二爷当个警卫员，整天吃香喝辣，出门后屁股冒烟！”

大伙哈哈一笑，转眼又搂到了地头。老二爷子脱下棉袄往地头一铺，喊了声：“歇歇儿了！”就慢慢坐在棉袄

上，掏出烟袋锅，扤上一锅烟，美滋滋地抽着。其他人，也都倚着田头歇下了。

二臭忽然捅捅国柱："瞧，二石又跟那犯呆呢！"

我抬头望望，见二石坐在不远处的大渠上边，一边抽烟，一边呆呆地向北望着。我问国柱："二石怎么了？我老看他有什么心事？"

"想对象呢。"国柱说："老大不小了，家境差，一直寻不上媳妇。去年出民工，在外边处上一个对象，大柏老公社的，相貌人品都不错，和二石也挺合得来。可那姑娘家里一打听，二石上有一个瘫痪老母，下有一对乳臭未干的弟妹，全家就他一个整劳动力。那边家里就不乐意了，还算那姑娘情重，寻死觅活的，和家里大闹了一场。最后家里心一软，把'死刑'改了个'死缓'，捎过话来，说等二石三年，三年内，若能盖上三间大北屋，就让姑娘嫁过来。其实这也就是个托词，就二石那家境，没十年八年缓不过劲来。眼下他一门心思就是怎么多挣工分多分红，你看他挺严肃的是不？他是愁的！原来他爱唱爱跳的，可活跃呢，要不怎么让他当团支部书记？嗐，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他当不长了"。

正说着，见二石掐灭了烟卷，快步走到地头，抄起三齿，对老二爷子说了声："干着吧，老爷儿快到头上了"，便挨着新茬又刷刷地搂起来。不少社员面有怨色，大概嫌休息时间太短，小声嘀咕几句，终于都慢慢爬起身，跟着又搂起来。

太阳高悬空中，地里风更大了。风卷尘土直扑人面，迷得睁不开眼。人们都不再说话，不再嬉笑，闷着头向前搂着，空旷的田野里，只有呼呼的风声，和三齿破土的刷刷声。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

第四章：饿的滋味

说老实话，长这么大，没怎么饿过肚子，插队后才知道什么是“饿”。

按政策，知青头一年仍吃商品粮，每月定量四十五斤，油半斤。要说每天吃一斤半粮食，应该够了，可我们全都觉得饿。也难怪，春天正是青黄不接，没有菜，更没有肉，天天咸菜土豆。可每天从睁眼干到闭眼，全是力气活，光靠那一斤半粮食，肯定不够。

干活时，饿劲一上来，胃里咕咕叫，人心慌意乱，直冒虚汗。来前妈妈塞给我一袋奶糖，京辉人璧张颐也各自有些零食，我们把这些“奢侈品”拿出来“共产”，没几天吃得精光。弹尽粮绝，只得任饿摆布。

德起和建生食量大，饿得比我们更狠些。歇歇儿时，德起在长满野草的地边上转悠一圈，便揪来几根草：“老匡，这叫甜根儿，嚼嚼，挺好吃的”，他把草分给我们。其实那草我认识，十八号大院里满地都是，它的根儿较粗，嚼着有点甜滋滋的味道。我用手捋捋草根上的土，放在嘴里嘬一嘬，甜中带辣，味道还行。只是纤维太粗，根本嚼不烂。

“我看见那边地里曲末菜不少，还有马齿苋。等会儿收工咱们摘点回去，凉拌吃。”德起说。

“我不吃，我又不是兔子。”京辉懒洋洋地说。

“老黄，那曲末菜好吃着呢！我姐给我做过，你是没吃过，你要是一吃呀，嘿，保证你想吃成个猪八戒！”建生比划着说。

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德起做的凉拌野菜。大家吃完一致认为根本不像建生说得那么好吃。除了苦味就是涩味。建生说做法不对，和他姐姐做得不一样，德起说是油少的缘故。总之我们都有些失望，越发觉得饿了，便躺在炕上侃起“吃”来。

“北京这会儿香椿芽该摘了，我们院里有棵香椿，年年这会儿我大把大把地掐，开水一焯，滴几滴香油，备儿

香！还有槐花，榆钱，野苋菜，都挺好吃的。夏天可以逮鸡鸟（蝉），刚从土里爬出来，没脱壳的烧着吃、腌着吃，还有蚂蚱，烧着吃也不错。秋天到菜站去捡白菜叶，晒干放着，可以吃到过年春天。城里饭辙就是多。”德起边说边咽口水。

“要在干校，青蛙都满坑叫了，晚上拿个手电筒，到水塘边，照住它，就傻子似的不会蹦了。一抓一个准。用不了一个钟头，咱哥儿几个就能抓它一脸盆！回来一剥皮，只取两条后腿，搁点葱姜丝，油一炒，雪白的肉，香！”张颐说。

“我在沈丘时，春天也是没什么吃的。就两样东西便宜：白薯、变蛋。白薯贱得就跟不要钱似的，我爸一买就一大筐，煮着吃，烤着吃，晒干吃，熬粥吃，吃得我现在一看见白薯就倒胃。变蛋更好吃！变蛋知道吗？其实就是松花蛋，不过是用鸡蛋做的，赶集时一架子车一架子车的，五分钱一个，一根冰棍钱。干校三年，不知吃了多少变蛋，要是现在有变蛋吃，哪会这么饿？”我说。

“春饼，你们吃过吗？”建生小眼放光地问。“切，瞧你显摆的，跟吃了什么山珍海味似的，春饼有什么？不就是烙饼卷豆芽菜么？”德亮一脸不屑。

“老外了吧？我姐做的春饼，真正是仁和坊的正宗！有年立春，我可享了一次口福！那天我姐姐画彩蛋头一回拿了工资，她说：‘今儿姐姐请你吃春饼。’热水烫面，和香油，烙成双合饼，里面夹肘花丝，小肚丝，酱肉丝，豆芽菜，菠菜，韭菜，黄花木耳，摊黄菜，什么是摊黄菜，懂吗？”建生问我们，我们都摇头；“就是炒鸡蛋呀！”建生为考住我们而兴奋起来，好像自己是见过世面的阿Q，而我们是土头土脑的末庄人。他指手画脚地说：“葱丝不可少，卷成细卷，蘸甜面酱，吃个有头有尾，不散开，不流汤。那会儿我长身子正能吃，我姐边做，我边吃，一两一个的薄饼，我一口气塞了十个。我姐问：‘饱了么？’我摸摸肚子，好像还能吃俩，刚想说没饱，就见我姐眼泪直要往下掉。我一瞅，赶情没面了，菜也快见底了，忙说饱了饱了，到了我姐还是对付着又给我卷了一张。那顿饭我吃得可是真足呀！”“上炕栽马趴，正碰你心眼！”德起直咽口水。

“您真不愧是鲁迅的陛下。尽高词儿，太拜您为师了！”建生逮着词儿乱用一股，他边说边掏出名言录，记下德起的歇后语。

“老黄，你也聊两句？”德起冲里间正躺在炕上看《反杜林论》的京辉说。

“别白费吐沫星子了，反正肚里就六两食，说一句少一句，谁说得多，谁夜里先饿！”“对了，老匡，你说大先生做的饭够份量吗？”德起想起什么，挺认真地对我说。

大先生是队里派给我们做饭的社员，大概四十出头，说话做事慢条斯理，又喜欢咬文嚼字，所以社员们叫他大先生。按政策，知青户头一年允许留一人做饭，算出工。队里可能是怕我们不会做，预先就指定大先生给做饭，因

为他会盘灶，我们的灶就是他新盘的。不过盘灶和做饭，各走一经；大先生灶虽盘得好，烹调手艺可实在不敢恭维：炒土豆片能炒成一锅糨糊！

“你说份量不够？”我问德起。

“赶情！我在家做过饭！二两馒头怎么着也得啃七八口吧？他蒸的馒头我用不了四口准啃完！听前院孙三儿说，他儿子这两天尽吃白面馍。别人家棒子面还得搭红薯呢，他哪来的白面？秃头上的虱子，这不明摆着吗？”“没根没据的，别瞎说！传出去影响咱们和社员的关系。”我阻止他说下去。

“哼，不信咱辞了他，我给你们做，份量准不一样，向毛主席保证！”“好了好了，该上队房政治学习去了。”我打个岔，终止了这场关于“吃”的神聊。

大先生好像有心灵感应，知道我们对他起了疑心，第二天就主动向我们辞职：

“老匡唉，我看你们哥几个像过日子的主，饭，你们自己做吧？”我挽留一番，又征求了老二爷子和近宝叔的意见，最后顺水推舟，准予卸任。我冲着德起一乐：“这回瞅你的了！”德起做饭还真不含糊。第一天烙的千层饼，外焦里嫩，一咬流油，锅盖大小，每人三张，外加两大碗稠呼呼的玉米面粥，吃得建生也打起饱嗝。德起抹抹被柴草熏黑了的脸，满心指望大伙给他开个表彰会，谁知人璧吃完一抹嘴，先给他浇了一瓢冷水：“你这是寅吃卯粮，下半月咱还过不过？”我看看油瓶和面缸，的确用得太多。我上对门国柱家借来秤，秤上一斤面，倒在面盆里，齐边做个记号，又拿着调羹对德起说：“明天照记号舀面，炒菜两勺油，不许超！”一较真，才知道真冤枉了大先生，德起的馒头并不比大先生的大。两个半馒头，建生没用十口就全啃完了，然后便馋巴巴地看着我们细嚼慢咽，像猪八戒看着猴哥吃人参果。

过了两天，我发现建生有点反常，吃晚饭时，他吃完一个半馒头，便捏着剩下的那个馒头，神色慌恐地看看大伙，嘟囔一句：“出去溜达溜达”，就走出门去。过好半天才回来，一付挺满足的样。第一天谁都没在意，连着三天如此，大伙就上了心。德起悄悄去探听一番，原来建生溜到东院荷莲家，用馒头和荷莲她弟弟，那个有点傻憨傻憨的“老疙瘩”换白薯吃。一个馒头换四个大白薯，怪不得不喊饿了。大伙一听气得够戗，当晚就把建生训了一顿。

“我也是饿的没辙了。”建生哭丧着脸说。

德起转转眼珠，说：“老匡，明儿我给你们做顿汤面，保证你们甩开腮帮子吃个够！”“真的？”建生乐了。

“得得，想让我们来个水饱是不是？六两面做不出一斤饭来，你少来花活！”京辉又投反对票。

建生急了：“黄大哥，你发扬点革命人道吧，我可是饿的受不了了！”德起噗嗤一笑说：“你这人，给个棒槌

就纫针！老黄开玩笑呢，明儿你们就情等着吃吧！”第二天我们几个起了一天猪圈。活挺累，肚子早早又叫上了。收工回家，一进院门，建生就叫起来：“德起，汤面做好了吗？”“早擀得了，就等你们回来哪！”德起从屋里钻出来，一脑门汗。我进了灶间，见案板上三斤面条摊开着，擀得挺细挺匀，不觉暗暗称赞。“要帮忙吗？”我问。

“不用，不用，累一天了，洗洗，炕上躺着去吧！”德起说着，提起挑水的大桶，满满一桶水，足有三十来斤，全周到灶锅里。点上火，呼哧呼哧猛拉一阵风箱，水开了，一揭盖帘儿，三斤面条倒进大锅，翻上几滚，把一笸箩野苋菜撒进去，抓一大把盐，酱油倒进去小半瓶，再用一把汤勺，放上小半勺花生油，搁点花椒，放火上炸香，往汤面里一泼，嘶拉一声响，一股白烟直冲屋顶。再撒进去一把葱花，一小撮味精，顿时香气扑鼻。大伙摆上炕桌，德起先放上一碗切得细细的酱疙瘩丝，然后把汤面一一端上来，大家顾不上烫嘴，捧着大碗一通喉咙响。头两碗还稠点，到第三碗就面少汤多了。我吃完第四碗，觉得差不多了，盛了小半碗面汤慢慢呷着。人璧京辉和张颐大概也吃了四五碗。最后就剩下建生和德起，两人对着，你一碗我一碗，把灶锅喝了个底朝天。建生热得脱光外衣，就一件千疮百孔的小背心，满头发流汗，小眼越发眯缝着，一点神都没了。

“饱了吗？”我问他。他点点头，长吐了一口气。想爬起身去解手，却怎么也动弹不了：不知是肚子里的水缒着，还是腿麻了。京辉把他拽起来，扶他下炕，他腰也不敢弯，腆着肚子往外走，走一步，肚子里的水咕咚响一下，一直响到厕所里。

那天夜里，我们每人至少爬起来四趟，春夜风寒，顾不得上房东边厕所，站在门前菜地边上就尿，早起一看，竟滋出白花花一片尿碱！

第五章：荷莲

夫子日记：1974年4月24日：

“昨夜大风，今早出门感觉寒气逼人。上午在稻席下种。中午大风又起，天气由晴转阴，即刻浓云密布，天气越发阴冷。下午派活还是去稻席，还未走到稻席忽然天降大雪，雪花竟如鹅毛纷飞，一时漫天银鳞，气温仿佛降到零下。社员们好像早知有雪，都换了厚棉袄，只有我们几个知青傻呵呵的还穿着夹衫，个个冻得发抖。大雪下了个把钟头，渐渐停了，但天色仍时阴时晴，变幻莫测。节气已过了谷雨，京城应该要换夏装了，想不到百里之外的延庆竟会有漫天飞雪的奇景。”没想到刚来几天就病了。我打小瘦，爱发烧，高二肺痨大口吐血，人更瘦得一把骨头。插队时，妈妈很为我担心，我却不以为然。谁知还真不经折腾，那天雪中受寒，回户便隐隐头痛，身上发紧，鼻子不通。吃完晚饭，强挺着到队部去政治学习。队部是间破旧的土坯房，全队男女老少挤在一间屋里，老爷们又

个个一杆烟锅，弄得云雾缭绕，让人透不过气。那天读报，是批男尊女卑的文章，由此便扯到队里评工分上，大姑娘孙三儿说，为啥妇女和老爷们儿干同样的活，评工分却低一等？这不就是男尊女卑？车把式进怀哈哈一笑，说老爷们儿老娘们儿就是不一样，老爷们儿能站着撒尿，你能么？孙三儿姑娘家脸皮薄，当时就恼了，过去同进怀打做一团，吵吵嚷嚷到半夜才散。我头昏脑胀，回去躺在炕上，想快些睡，偏偏大风如虎，整整吼了大半夜，闹得一直没睡着。直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下，鸡打鸣了。我刚爬起来，忽觉天旋地转，一下又躺倒了。一摸头，挺烫，只得歇工。

大家走后，德起归置完屋子，挎着筐到镇上去买粮打酱油。屋里冷冷清清，我孤零零躺在炕上，无比寂寞。风停了，天还阴沉沉的，薄薄的日头偶尔从云隙中洒出点光来，却又被白生生的窗纸没收了。我绻缩在被子里，暗暗自责："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下点雪就冻趴下了？"正迷迷糊糊想睡一会儿，忽听外间有动静，原以为是德起回来了，再听听不对，那动静太轻。我朝门口看看，见门帘一动，帘下露出一个小脑袋瓜，脑囟门上边扎着一根"朝天椒"，原来是个小丫头；接着帘下又探进一个狗头，是只大黄狗，挺警惕地四下嗅着。大概判断没危险，头一扬，把门帘挑起来，那小丫头便摇摇摆摆走进屋。她大概一岁多，走路还不太稳，扶着炕沿，挪到我跟前，瞪着大眼睛瞅着我，小手摸摸我的脸，含糊不清地说着："大—大--，"嘴里三五颗小白牙。我怕她跌着，探身把她抱到炕上。那大黄狗轻轻哼了两声，我拍拍它的头，它便摇摇大尾巴，蹲在炕边。我又躺下，侧身看看炕上的小丫头，脸蛋红仆仆，眼睛黑亮亮，小手圆滚滚，身穿红底白花小棉袄，开裆裤系着个红屁帘儿，小脚上一双农家人自己纳的红棉鞋，鞋面上绣着牡丹花。头顶那根"朝天椒"也是用红头绳扎的，从头到脚，整个一个动画片里的人参娃娃。

"这是谁家的娃娃呢？"我想着，看看黄狗，认出是对门国柱家的狗，没错，那身油亮的毛，支楞着的耳朵和雄赳赳的大尾巴，走起路来威风凛凛的姿态，很像我张湾的虎子。京辉人璧他们都说它肯定有狼狗的血统。

"小丫唉--，小丫唉--，"院门口传来一个少女轻轻的呼唤声。有人进了院，走到外间门口，轻轻地问："有人吗？小丫在里面吗？"我连忙抬起身答应到："在，在，进来吧。"门帘一掀，一女孩走进来。她见我盖着被子躺在炕上，一愣，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呀，大哥，您还睡着哩？这丫头多淘！我这就抱她走。"她慌忙去抱小丫，谁知小丫嘎嘎笑着，藏进炕里头我脚边被窝里，她不上炕就够不着她。上炕又不合适，弄得她左右为难。我看看小丫，一个活泼泼的小生命，头痛似乎也轻了。一个女孩突然闯进屋，我本也有些尴尬，但瞅瞅她，好像也就十四五岁样子，比我们要小不少，便放松下来。我对女孩说："让她在这玩吧，挺好玩的。"她笑笑，不再扭捏，大大方方坐在炕沿西头，好奇地东张西望。

我仔细打量这女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细"字。细眉细眼，细胳膊细腿，细细的身挑，细细的脖子和头不成比例，让我想起《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她穿一件绿底暗红格棉布衫，一条蓝的确良裤，衣服很旧，打着好几个补丁，但洗得很干净，一看就是个利索人。

“大哥，那个‘嗞咕嗞’叫啥名？”她指着里间墙上挂着的小提琴问我。

“小提琴。”我答到。

“买一个多少钱？”“便宜点的要五六十块吧。”“是呀？要一年的口粮钱啦！？”她小声叹息着。

“你叫什么？”我问。

“荷莲。”她答。

荷莲？我想起德起说建生拿馒头和东院荷莲弟弟换白薯，那个荷莲就是她了？这么说我们是邻居，可出工时我从没见过她。她一定还在上学吧？

“今天怎么没去上学？”我问。

“上学？”她摇摇头，“我早就不上学了。前一阵我在公社果厂做小工，捡杏核呢，到昨个活结了。今儿歇一天工，我就帮国柱哥看看小丫。”“国柱是你哥哥？”我问；“堂哥。”她说。

她又盯着那把小提琴，端详了一会儿，问：

“大哥，您几个都会拉这玩艺儿？”“不，我不会，京辉、张颐会。你喜欢音乐？”“我爱吹柳叶。吹柳叶可没这玩艺儿好听。”我想起来，有时月上柳梢后，隔墙响起细细的用柳叶吹出的曲子声，常吹的是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那柳叶声音悠扬，清脆，却总又带着点哀愁。

“大哥，北京人吹柳叶吗？”她问。

我笑了，摇摇头说：“你没去过北京城里？”“没有。”她挺遗憾地说。

“怎么会呢？”我惊讶了。这到北京不过半天车程呀？

“去一趟，坐车，住店，吃饭，要好多钱呢！再说我娘眼睛看不见，身边也离不开人。”“怎么，大妈失明了？”“还不是让我那三镑子哥哥给气的！”她恨恨地说。

三镑子？我想起欢迎会上马德才介绍大队情况时提到七队有个三镑子，“潮货”，去年耍流氓被抓去劳改了。原来竟是她哥哥。我默然了，她也不再吭声。

忽然我觉得脚下一阵热，起身一摸，被褥都湿了，荷莲惊叫起来，“小丫尿炕了”！我忙说：“没事，没事，”一把抱过小丫，递给她，她咯咯笑着，接过小丫一阵风走了。

我想睡会儿，可一闭眼，就想到这个瘦弱的女孩。我不明白，她那芦苇杆一样纤细的身体，怎么能支撑起这个

破船一样的家？要是我，可能早就折了。

“老匡在屋吗？”门外有人问，是国柱。“在，快进来！”我忙答应着。国柱走进来，见我要起来，忙按住我说：“躺着吧，我没啥事，听说你不太合适，来料料。”“你没下地？”“今儿浇老麦茬那块地，好浇，收的早。”他说着，坐在炕沿上，卷根烟抽着。抽两口，笑笑说：

“荷莲来过吧？这丫头，老大不小的了，还瞎串门子，也不怕人家甩闲话。我刚熊她几句。”我忙说：“她是来找小丫的，再说她还小呢，怕什么？”“你说她多大？”国柱问我。

“十四？”“属猴的，今年整十八！”“啊？真的？！”我惊讶得大张着嘴。“十八？那和我们差不多年纪呀？她可不像！”“一年到头吃不饱，架子没催起来。我叔过世早，我婶又养出那么两个宝贝儿子，一个潮，一个傻，愣把我婶给气瞎了！就靠她挣那点工分，不够塞牙缝。眼瞅着大姑娘了，连个对对象也寻不上。”我沉默了，国柱也默默吸着烟。窗外的云似乎散了，几缕阳光透了进来。风又在低低地叫了。我想换个话题，便问：“国柱哥，您说，这的活，我钉得住吗？”“那有啥？谁在娘胎里也不是铁蛋蛋！咬咬牙就挺过来了。你们哥几个不草鸡，这些天一个工没落！比头两年那拨女知青强多了！”“咱们队来过女知青？”“71年来的，去年都走了。那几个姑娘真够活宝的。第一天出工，我带她们在库房倒山药种，倒着倒着，我就听见有人吸溜鼻子。抬头一看，有两丫头坐在山药堆里正抹眼泪呢。我吓了一跳，以为她们哪不舒服，一问，说是想家了。你说出息不？”我笑了。我想像得出一群在北京城里娇生惯养，从没离过家门的女孩子，到这穷乡僻壤来是什么心情。国柱一想起那群女知青的轶事，话便滔滔不绝了。

“就说做饭吧，整日蒸窝头，连个贴饼子也学不会。蒸出来的窝头能砸死人！说也怪，她们整天窝头就咸菜的，还直长肉，下来不到一年，一个个胖得都跟那个”六百工分“似的。我就纳闷：她们吃了什么尿素了？有一天中午，我找了个事由，上她们屋里料料。小姐们几个正剁白菜馅儿呢。正巧一只鸡飞到菜板上拉泡屎，你猜怎么着，洗也不洗，冲也不冲，拿菜刀往外一撇，照剁不误！炉上要坐水，也不用水舀子，黑糊糊大铁壶直接就往水缸里杵！我趴缸沿一看，缸底厚厚一层油泥。我就乐了，说怪不得你们长得胖呢，赶情营养丰富，又是蛋白质，又是土霉素！”听到这，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国柱接着说：

“你说她们一个个挺发福的，可养的那头猪瘦得却是柴禾棍似的。挺高的猪圈，一窜就出来。比那个姓倪的世界冠军跳得还高！她们求我把猪圈垒高点，我对付着添了一尺，她们还嫌低，我说不能再高了，再高就成了监狱了。凑巧第二天公社老李到户里视察，走到猪圈边上，那猪就跟见了亲爹似的，一猛子又窜了出来，把老李吓了个屁股墩！几个丫头想上去抓，那猪比狼还利索，逮谁咬谁，吓得她们一窝蜂跑到我这，说不好了，大哥你快去看看吧，我问怎么了？她们说：‘犯人越狱了！’惊得我一头冷汗！寻思不对啊，这也没监狱，哪来的犯人？再一问，才知是猪跑了。你说可笑不？”我笑了。我不是在笑话她们，相反我对她们充满了敬意。我想：她们能在这干上三

年，我这喝过沙河水的男子汉，还怕什么呢？

下午，我又扛上锄头去刨地头了。

相关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1467b0100csb7.html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

第六章：意外重逢

最后一场雪下过，春意越来越浓。北风不再像小刀子刺人，变得暖酥酥的。云也湿润起来，时不时就拧下一阵雨。谷雨过后，小草拱破地皮，杨柳吐了翠芽，河套的白杨挂出满枝穗穗，一串串随风摇摆。随后，老态龙钟的榆树和槐树也做完冬天的梦，慢吞吞地生出新叶。河套背阴处残存的冰雪消融了，蝌蚪和小鱼一会儿在水草中戏耍，一会儿又懒洋洋地躺在水泡子里晒太阳。田野里冒出一丛丛金黄色的野菊花，紫红色的“死不了”，淡兰色的马兰花；花丛中常有棕色的山雀飞起，先直上云霄，啾啾欢叫，又急骤落地；黑黑的蜡嘴母雀在巢中育出小雏，欣喜若狂的雀爸爸歌喉婉转，叫声在郑柱岭上回旋不绝……

谷雨后进入播种季节。玉米，高粱，谷子，豆子，白薯秧，还有各种菜苗，都要赶着种到地里。不管是风和日丽，还是细雨绵绵，田野上总是人影攒动，撒种的、施肥的、埋坑的、压地的，到处是一幅耕耘图。

一天下午在村西头葫芦地修稻席，我望见南山坡上粉红雪白，如霞飞云绕。老二爷子告诉我那红的是桃花。白的是杏花，“永宁春来晚，开花也比城里也要晚一个节气，眼下城里花期已过，咱这才开得正旺呢！”他对我说。

下午活收得早，我托京辉把锹捎回去，一个人跑去南山坡看花。

夕阳下，花正鲜，半坡桃，半坡杏，红白相映，暗香盈盈。我坐在桃树下，拔下一根蛐蛐草，在嘴里轻轻嚼着，望着晚霞在西天燃烧，觉得这眼前的花和那远方的霞真像一幅美妙的水彩画。

西边，新华营的广播喇叭响着，广播声随着小风断断续续地飘过来，一个当地姑娘用半拉子普通话在念一篇大批判稿，磕磕巴巴的。我无心去听，目光又飞向西边那座云遮雾罩的海坨山。此刻落日临峰，红霞将海坨山装扮得像个披着红盖头的新娘子，让我想起小时伏窗眺望西山的情景。

一阵风急，又把广播声送过来，那是另一个姑娘、一个城里姑娘的声音，是十分纯正的普通话；晚风中，我断断续续听到这样几句话：“批林批孔在向纵深发展，……知识青年满怀党的重托……来到新华营……，像海燕在大风大浪中展翅飞翔……”我一下愣住了，忽地坐起身，凝神细听，我觉得这声音似乎很熟悉，它让我想起张湾，在

那沙河之滨，那个银铃般清脆的声音：“我走到窗前，透过汹涌飞奔的乱云，还看见永恒的太空中有几点星星！……”难道是黄毛？这怎么可能？我努力倾听，但风向似乎变了，广播声变得模糊不清。等又一阵风把广播声传过来时，那个姑娘已经讲完了，喇叭中开始播放音乐。我无限怅惘，，慢慢走回村去。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张湾的往事，在脑海里一幕幕过着。我不知黄毛在哪，自从七一年冬她随母亲去了青海后，我一直没有听到她的任何音信；我努力回想她的声音，和新华营广播中的姑娘的声音比较，最后认定那不是她，她肯定不会在新华营，可那声音的却又似曾相识。张湾往事令我百感交集，望着窗上月光，默念出一首蝶恋花：

最是荼蘼南岭树，沐雪衔霜，俏把青衫著。不似梅花香彻骨，红颜只绽春归处。

往事如烟频过目，三载沙河，爱恨无人悟。银汉迢迢千里路，衷肠九曲凭谁诉？

第二天下雨，队里歇一天工，社员们集中在队部评工。过去学校有句顺口溜：“分，分，学生的命根”；插队后才知道，“分”也是农民的命根，只不过这个“分”不是分数，是工分，可以说，不了解工分，就不了解农民。人民公社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三级所有”，指生产资料归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指经济核算以生产队为基础，而生产队每年经济核算的主要依据，就是收入总额和工分总额。工分的大头是人工，劳动力划分三等，一等干一天活记12分，都是十八岁朝上五十岁往下的男爷们儿；二等10分，都是些姑娘媳妇和十五六岁的小子儿；三等7分，全是弯腰驼背的老头老太太，和那些刚刚上完小学的小小子儿。至于三等以下，属不入流者，像荷莲那个傻弟弟老疙瘩，给个4分5分，也没什么脾气。每年秋后卖完公粮，一年收成折成钱，除以全队一年工分总数，就得出了工分的分值，每人拿分值乘以自己全年挣的工分，就知道这一年的辛苦能换来几个大子儿了。（每等劳力记几分，各地不统一，这里僅指孔化营）

所以在生产队，评工（即评劳动力等级）是天大的事。一等和二等，干一天差两分，干一个月就差六十分，如果一分值六分钱，六十分就合三块六，能顶半个月的口粮呢！所以每月评工总少不了吵架斗嘴，有时意见统一不了，还得举手表决，颇费周折。

那天我们第一次参加评工。上午社员们分成三个小组，各组议出个眉目，下午在队房聚齐，由各个小组长亮出本组议案，如意见一致，就算通过，如有分歧，大伙就一起酝酿。酝酿是最头痛的事，张三说李四不够一等，李四说张三心术不正；王五说他妹妹怎么着也应是二等，赵六就说你妹妹够二等那我老爷子评三等岂不太亏？窗外雨急风骤，屋内你争我斗，大家有的嘻嘻哈哈，有的吹胡子瞪眼，吵吵闹闹好一阵，总算都有了结果。我们五个知青全评成二等劳力，老二爷子似乎有点报歉地问我：“二等成不？”我连连点头，“成，成！”评完工，大伙全都放松了神经。屋外雨挺急，一时散不了，有人就想找找乐。二臭蹲在墙角里，一边卷大炮，一边窜掇老二爷子：“二爷唉，给念个花花词儿吧，念那个‘高高山上一窝草’，成不？”“去，去！满屋大姑娘的，也不害臊！”“害臊？那年夏天，谁光着腚在小山嘴拉地，看见道上过大姑娘，就在老玉米地里扯着嗓子喊：‘七尺汉子三尺妻，两头长

短各不齐，只要中间……’”二臭学得绘声绘色，惹得一屋子老爷们哈哈大笑。姑娘媳妇们却上来好几个，要撕二臭的嘴。二臭连忙讨饶。二爷说：“还是听四叔讲个窦娥冤吧。”四叔是个驼背老汉，七十多了，论辈份，在村里算是个老祖宗。一天到晚尽给人看手相，讲古事。老二爷子的建议刚出口，孙三儿就嚷嚷起来：“得了得了！又是那张驴王狗儿的，老掉牙了！还是让知青讲个故事吧，城里人知道事儿多。”社员们都拍手，人璧忙说：“老匡会讲故事，让老匡讲！”老二爷子问我：“大学生，咋样？”我推辞不掉，想起昨天看《朝霞》丛刊，上面有一个故事，写洪秀全反孔老二的事，叫《欢路部的风波》，我就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感谢超尘老师在校栽培，让我在广播室历练一番，还算不怯场，社员们听着挺新鲜，都叫好。近宝叔说：“晚上你在大队广播室给全村人讲讲，大伙一定爱听！”那天晚上我走进了孔化营的广播室，我的声音也像那个唱京东大鼓的老爷子一样，通过沙啦沙啦的小喇叭，到各家各户串了个门，于是全村人都说，七队有个知青，会说书。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在柳条沟种玉米。傍晚刚收工，我正用石头蹭净锹上的泥土，荷莲从西边扛着锨过来，见到我就说：“大哥，下半晌我在西山坡下浇麦子，碰到一个新华营的女知青，问我：‘昨晚上在你们村广播里讲故事的是知青吧？’我说是。她说是不是瘦瘦的，戴眼镜，文邹邹的？我说是。她就笑了，马上说出您的名字，还说是您同学。“她叫啥？”我的心跳得像小鹿，急忙问荷莲；“她没说，”荷莲摇摇头，有些神秘地笑了，她说：“大哥，那知青可俊俏了，像画上人儿！”我忙问：“她收工了吗？”荷莲又摇摇头，“她也在那浇麦子呢，我回来时，她还在浇呐。”我一听，把铁锹朝荷莲手里一塞，撒腿就朝西山坡跑去。

我边跑边想，真的是黄毛在新华营吗？跑到西山坡，老远就见一姑娘，正蹲在地头上擦锨。看见她，我一下呆住了，那不是李明明吗？明明抬头看见我，笑着迎上来，走到我跟前伸出手说：“地球真是太小了，没想到老同学在这碰上了！”我十分尴尬地握握明明的手，前言不搭后语地说：“我听说……那个……不是……你们都留城了吗？怎么……你会在这？”明明抿嘴一笑，“怎么？不想见我了？”我连忙解释：：“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71年回北京的，不是都在城里分配工作了吗？怎么你会来这插队呢？其实前天，我在南山坡听见你广播了，我就觉得声音挺熟，可就想不起是谁！”“你呀，把老同学的声音都忘了？”明明嗔怪地说：“昨晚上我在丁家坟浇地，听见你在喇叭里讲故事，我可是一下就听出来了，这不是匡卫群吗？怎么样，我的耳朵灵吧？”她笑了。

看过《我的张湾》的同学们一定记得，当年在张湾因为黄毛，我和明明简直成了死对头。不过，两年多过去了，当年的恩怨我已看得淡了，而且当我落难时，明明仗义执言，领头为我担保，救我脱离苦海，也算够朋友，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因此在这与她重逢，虽因不是黄毛而有些遗憾，但毕竟从小在一起长大，也算老同学重逢，心里还是很高兴。此刻太阳已落，晚霞似锦，我帮她拿起锨，找一块平坦处坐下。她滔滔不绝地讲起回京后的生活，原来她本该分到首钢的，可是阴差阳错，分配的事一直耽搁，后来听说七一届要恢复高中，而且有可能高中毕业直接考大学，她家长就托关系让她重念初二，毕业后如愿升入高中。谁知又是阴差阳错，高中毕业时，赶上批右倾回潮，不但不能直接考大学，连留城分配也不可能，还是得上山下乡了。

“这么说你和我成了一届了？你一直在上学？可我在大院里怎么从没遇到你呀?”我有些不解地问。“我爸调所里了，我们家搬到张自忠路，不在大院住了”，她向我解释。接着她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她在学校的事，批右倾回潮、学军拉练、排练小话剧《扎根》、到永定门火车站义务劳动等等。“你们也是四月五日来新华营的吗？”我问她。

“哈，我们早一个月！”她不无骄傲地说。“记得吗？二月份清华附、北大附和123中高中毕业生给团市委写信吗？我们班同学看到报道，坐不住了。大伙说，我们应该早些到农村去，不能呆在城里整天混日子。去年野营拉练，我们在新华营住过，和社员挺熟的。同学们一商量，打起背包，又来了一次野营拉练，直奔新化营。到新华营那天还下大雪呢，社员们可是真热情，烧好热炕头，熬好小米粥，大家心里热乎乎的，从此就在新华营扎根了。”天色渐黑，晚风徐徐。田野的社员都已回村，大地空旷肃静。突然她用手向北一指，“你看”，我抬头望去，见暮霭中的霞光涂抹在海坨山上，雪白之中映出一片血红。在整个深蓝色的天幕衬托下，那山越发神秘，越发庄严。

“知道那山吗？”她问。

“知道，海坨山”，我答到。

“我喜欢那山。每当我看到她，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不知怎样形容那种感觉，像临战前的兴奋？像赴汤蹈火的豪情？像挑战大自然的悲壮？我说不出。或许你这个诗人能将它描绘出来，有些情感只有诗能表达！”“我算啥诗人，只不过涂鸦而已”；我虽爱写诗，但最怕别人称我诗人，我觉得“诗人”的名号是项桂冠，只有李杜苏辛才有资格戴。“还记得在干校，有次搞赛诗会，你们女生的一首诗登在了校刊上，让我们男生好嫉妒呢！”“记得记得！那回把你们男生给盖了，女生挺得意，你还在板报上写了首词，提醒我们别骄傲自满呢”。

“有这事？我都忘了！”我笑着说。

“哈，我可没忘！词是这么写的：

张湾打擂颂中华，剑出匣，笑弹铗，金榜夺魁，笔底妙生花。纵使奇才应不傲，诗有径，艺无涯。

补天自古倚娇娲。蔑池蛙，藐寒鸦，志在鸿图，豪气正风发。试玉要烧三日满，成栋木，凤池夺！”我大大地惊讶了，三年前随意写的东西，自己都早忘得一干二净，明明竟能一直记着。“我看你才是诗人呢！”我笑着对明明说。

“我喜欢诗，但写不好。对了，昨天我还胡诌了一首，你听听：“农村正是大课堂，莫误青春好时光。手捧宝书寻真理，身经实践炼金刚。鹏飞大海斗风雨，燕落梁前叹路长，最喜山乡挥汗水，风华一代谱新章。”听了明明

的诗，我咀嚼一番，“前三句好像平仄不太对呢？”我说。明明嗔怪地笑了：“你还是老样子，不会拍马屁！我哪懂什么平仄呀？都是照猫画虎！”“不过你这诗立意挺好！”我赶紧往回找巴。明明乐了，说：“还记得咱俩领诵《沈秀琴》吗？”说完她情不自禁，轻轻唱起当年在干校参加汇演时，贾老师精心为红卫连创作的诗歌联唱《沈秀琴》的主题曲：“高山巍巍，劲松青青，渤海万里，波涛连天。党的好女儿沈秀琴，像高山屹立，光辉的名字万年青，渤海到流从天落，英雄的功勋与一江春水共流……”。

明明没想到，这熟悉的歌词一下触动我心上的伤痕。当年本是我与黄毛领诵，因为她爸被打成“五一六”，甄老师临阵换将，让明明接替了黄毛。为此事我曾和甄老师吵了一架，而黄毛也深受伤害。我沉默下来，不去应和明明，明明马上意识到不妥，停住歌声，尴尬的不知该说些什么。直到分手，我们也没能摆脱那突然袭来的怅惘，各自默默地走回村去。

第七章：唐谦

夫子日记：1974年4月15日

“上午晴，下午刮起大风，在猪场轧草。中午唐谦带林步胜来户，下来才十天，见到步胜却像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老唐房前房后转了一圈，说我们的房子不如他们一队的宽畅，不过小院却不错，处于深巷之中，隐蔽，他们的房子就在村口路边，人来人往不太安全。京辉说，有啥可偷的？除了刘岩那把破提琴，一屋臭鞋烂袜，小偷都不敢进，进去就得熏死！大家哈哈大笑。唐谦又说，你们房前这块空地可以种菜，不过四周都有围墙，窝风，夏天一定很热，要种些耐旱耐热的菜。人璧说，那就种仙人掌，保证热不死！大家又笑了。我对唐谦说，你们一队那通风透气，咱们分分工，你们种黄瓜豆角，我们种茄子辣椒，到时想吃黄瓜扁豆去你那摘，想吃茄子辣椒上我这摘”；张颐说，那得让八队他们也种，不然他们老上咱两队来摘，光吃不出力，咱们亏大啦！”

在我的日记中，从73年初至75年底，唐谦出现最多。自从73年那个早春，我土头土脑、战战兢兢走进一五0，自从第一节课后，那个英俊的、宽额头大眼睛的、很有领导气质只是笑时鼻子有点歪的帅小伙，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自我介绍说他叫唐谦之后，我和唐谦就结了缘。唐谦属于外向型，喜怒哀乐你一眼就能从他脸上读出来；这很对我的脾气，我的大脑一贯简单，不会猜测别人的心思，喜欢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正如唐谦那样。

每想起73年春天那段经历，就觉得人生很奇妙。本已求学无门，山重水复，忽又走进了一五0，可谓柳暗花明。我常想，人生就像一趟行驶在陌生旅途的列车，你不知道前边是哪个驿站，哪些人会上车，哪些人会下车；你也不知道自己的终点站在哪，自己该在哪站下车，又能否在哪站上车；你更不知道前面谁将闯进你的生活，和你结缘。一切似乎都是偶然，一切又似乎都是命中注定。说它偶然，是因为当你人生列车前行时，前面的一切似乎都是未知数；说它是命中注定，是当你抵达终点，回头一看时，原来一切均有定数，前因后果，环环相扣。比如我进了

一五0，来到高二三班，和唐谦相识，看似偶然，其实是命中注定。或许你会问我，这一切是谁的安排呢？是谁让你到了高二三班呢？

同学们看过《我的高二三班》，母校能够接收我，首先应该感谢一五0那天接待我的那位女干部，她没有将我拒之门外，耐心倾听了我的陈述；还应感谢那位老主任，他看了我的档案后马上决定接收我。但往前想，似乎应该感谢西城区教育局接待办的那位男士，是他给我指道，让我来一五0；可再往前捯，如果西城区教育局在一五0办干校子弟班，一切皆成泡影，又似乎应该感谢教育局的决策者；可若无五七干校，又何来干校子弟班？若无文革，又何来五七干校？这样捯来捯去，最后安排我到一五0的，似乎应是毛主席！没有他，就不会发动文革，就没有五七干校，就没有高二三班，就没有我与三班同学相遇，也就不会认识唐谦了。在老毛大手一挥发动文革时，已注定干校子弟的一切缘分。

我也很感激上帝的安排，当我人生的列车驶入1973年时，上帝安排母校为一五0。“一五0”，多么平凡而简洁的名字！如果她叫“师大女附中”，我肯定与她无缘，因为我不是女生；如果她叫“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我也肯定与她无缘，因为我考不上。只有当她取消了性别的路障，抹去了“重点中学”的光环，屈尊接受“一五0”这个称呼时，我才能够走进她的校门，才能与唐谦相识，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无庸讳言，插队与留城工作相比，有天壤之别。唐谦在孔化营的两年中（实际不止两年，因为我们回城时他还留在村里），可以说是历经磨难，甚至险些“与世长辞”。写到他，我便想到一个问题：唐谦为什么要下乡呢？

儿子曾经问我，“当年你们干嘛要插队呢？”这问题让我哑口无言，是呀，当年我们干嘛要插队呢？说是组织分配？似乎不准确，因为是插队好像算不上是一种工作，不是工作何谈分配？虽说现在计算工龄是从插队始，但我心目中，真正参加工作还是从混凝土班起，先前的插队不过是去农村体验一番生活，像演员为了演好农民，先去农村住上一年半载一样。那么，说是响应号召，自愿下乡？似乎也不准确，这说法用在老三届还差不多，到我们七一届，那种写血书、发毒誓，哭着喊着要去上山下乡的人已经罕见，大多是报着一种复杂心态：既然不去又不能留城分配，既然大家都得去，既然去了还有几分光荣，几分自豪，将来总还能回城，那就去吧，用现在话说，有点怕被“边缘化”。由此看来，我们下乡动机有点崇高，也有点投机，也有点无奈。

可唐谦不同，他是独子，按当时政策，独子可以不插队。他在班上是团支部书记，很受学校器重；他父母是知识分子，工作在中科院，家庭条件也很好，我相信他如果留城，会分到一个不错的工作。可是他当时是那样坚决、那样义无反顾，曾为插队的事磨得白老师大发雷霆。如果放在今天，他绝对会被认为是傻冒，没有谁会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可那时候，他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感动了很多同学。

人难免都有些利己主义，想当年，我是巴不得唐谦去插队，而且巴不得和他分在一个户。那时他住三里河，放

学我们常骑车一路走，一路上我总爱给他打气："老唐，顶住，一定和我们一起下去！"华灯下，他的目光是那样坚毅，"老匡你放心，我肯定去！"为他插队的事，我也没少找白老师软磨硬泡，弄得白老师也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唐谦去插队，你们也不能在一个户，唐谦、王英进、你，你们三个班干部必须分开！"最终他兑现诺言，和我们一起去了，在那个春天的黎明，在十万人夹道欢送中，沐浴着彩带花雨，和我们一车同行。可两年后，当我们在大雪纷飞中离开孔化营时，行列中却没有了他，一场大病，使他滞留在村里，没能和我们一起回城。最后他是一个人离开孔化营的，没有彩带花雨和夹道欢送，有的只是疲惫的心灵。在混凝土班炒盘子时，时常想到唐谦还在孔化营，就有些内疚，好像是我把唐谦给忽悠去了，好像自己欠了唐谦什么，就总想啥时把他的事写一写。在决定写《我的孔化营》后，马上想到除了写我们七队的伙计们，第一个要写的就是唐谦！于是脑子里又转悠那个问题："唐谦为什么要插队呢？"如果说他崇高，他不会同意；如果说他投机，我不会同意，那他到底为了啥？

去年国庆之后，媒体报道五中地理老师任铁生独自爬铁坨山失踪，看完报就觉有些宿命：任铁生—铁坨山，都有"铁"字，好像是铁坨山本就是任老师的归宿，是它将任老师召去了。后来得知任铁生竟是人璧的哥哥，更觉得人生命运深不可测。年轻时凡事都爱问个为什么，岁数大了，才知道人间事很多并无确切答案。譬如登山，有些人舍生忘死去攀岩，问他为什么？回答很简单：因为山在那；这话等于没说，可这话才是正解。唐谦当年下乡，也像任大哥爬铁坨山，本无需探究动机的崇高与否，只为山在那：而那山，就是我们的高二三班。一年同窗，唐谦和三班同学情同手足。虽然那时还没发明、所以我们也不会说"紧密团结在以×××为书记的×××周围"之类的啰嗦话，但唐谦作为支部书记，成为三班的带头人，应是无庸置疑。《天龙八部》里面有个"带头大哥"，成了带头大哥，就要身先士卒，就要吃苦在前，就要舍生忘死，就不能对不起众弟兄，那么唐谦即为带头大哥，当众弟兄要落户孔化营时，他怎能不去呢？这是他的宿命。
所以，当年不管我们忽悠不忽悠，唐谦总是要去孔化营的，那是他命中注定的劫难。不经历那场劫难，就没有其后三十年的奋斗史：发愤苦读，远走海外，从工程师干到公司老总，如今功名尘土，八千云月，少年头已白，相对忆蹉跎；当07年校庆我们三十年后重新相聚时，他告诉我前年还独自去过孔化营，去了还想去，好像孔化营有种魔力。其实不止是他，对所有在孔化营插过队的同学来说，谁不为她魂牵梦萦？那里铭刻着我们青春的足迹呀！

（说到校庆与唐谦相聚，还有件趣事。07年校庆前，母校在网上建了同学录。大洋彼岸的王琍自告奋勇当班网管，第一个捞起张颐，第二个捞起我。由于张老弟也在大洋彼岸，打捞国内同学的重任就落在我肩上。向王版主表完决心后，我就琢磨着要打捞唐谦。可三十年没有唐谦音信，上哪找他呢？我依稀记得他家住三里河，心想要是谁记得门牌号，应该不难找。可当我在班网咨询唐谦行踪时，东庄兄十分肯定地说，老唐家在中关村，十号楼一层，说等他夫人回国时，只要在窗户底下喊上一嗓子，定能找到。我对他的说法半信半疑，心想我不至于老胡涂吧？明明记得他家住三里河呀？07年6月五夫人返京，10号我接到莲蒂电话，说五夫人马到成功，找到唐谦母亲啦！惊喜

之余，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老年痴呆，不但近事记不住，当年事也胡涂了。本月初在晓秋催促下，下决心写孔化营，又拿出当年日记看。随手翻开一页，一行草字蹦出来：“74年12月26日：学校突然改变决定，要求明日回京。注意：给唐谦家捎鸡蛋，三里河三区17门13号”。看到此，我几乎要跳起来！原来我并没痴呆，当初唐谦家的确在三里河呀！）

好了，一想到唐谦话就多，赶紧打住，他的故事留给后面慢慢讲吧。07年捞上唐谦时，曾在班网步商隐韵写诗一首相赠，现发于此：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头司庄里栖金凤，孔化营中啼杜鹃。

西岭荷锄迎晓日，东篱把酒看夕烟。韶华已逝常追忆，便到梦中亦惘然。

（注：我班有六位女同学在头司插队）

第八章：学做饭

“老匡，这饭也不能老我做吧？总该轮轮吧？”德起一边拉着风箱一边说。刚做了一周饭，德起就烦了。别看做饭不是体力活，可熬人。早上五点多摸黑爬起来，睡不了踏实觉；晚上我们吃完饭一抹嘴，上炕歇着去了，德起还得刷锅洗碗，擞火劈柴，等归置利落，也该熄灯了。而且众口难调，春季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天土豆萝卜萝卜土豆，我们吃得乏味，德起也做得没劲。他没想到，辞了大先生，把自己给套上了。一个劲想给自己解套，可大家都看出这伙头军不好当，尽管德起提了好几次轮流做饭，可谁都不接他这个茬儿。建生还气他：“你这叫挖坑埋自己，自作自受”！

这天德起实在烦了，给我下最后通牒：“老匡，明儿个不管谁做，反正我是不做了！你们都不做，咱们就饿着，看谁抗不住！”我见德起真是铁了心，知道不换也不行了，就和大家商量：“那就轮着做吧，一人做一周，明儿谁先来？”大家全笑眯眯指着我，“当然是你啦！”我从没做过饭。在家我最小，上有妈妈，有保姆，还有哥哥姐姐，根本不用我做。说真的，我连煮粥都不会。让我做饭真叫赶着鸭子上架。万般无奈，只得对大家说：“我可没德起那本事，做不好你们可别埋怨我呀！”德起如释重负，拍着胸脯说：“老匡你放心，做饭最简单了，一学就会！明儿早上的发糕我已经做得了，你热热就行”；说完又指指炕头上的面盆，“明中午蒸馒头的面我也和好了，放一夜正好发了，你炒个菜就得。”“我可没蒸过馒头，怎么做呀？”我问德起，他说：“多揉，揉透了才暄呢”。

那一夜做梦全是揉面，第二天起大早把玉米面粥熬得，蒸好发糕，好歹把早饭应付过去。等同伴们走了，我拿过面盆，左看右看，不知该如何下手。呆了半天，心想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还是赶紧揉吧。洗净手，抓起面来揉。

那面浮头看挺干燥，谁知手一下去，面里头稠乎乎的，粘得满手都是。怎么也揉不成团，且酸味扑鼻，闻着像泔水。狠命揉了一上午，眼瞅快到收工的时间，赶紧放到屉上蒸。越蒸越不对劲，怎么笼屉里散发出来的味道一点不香，全是酸味呢？等时辰差不多了，正好大伙也收工回来，德起一进院就嚷嚷：“老匡你把醋瓶子打翻啦？怎么那么大酸味呀？”我揭开笼屉一看，傻眼了，满屉黑疙瘩，又酸又硬！德起一瞅，惊叫起来：“老匡你没使碱呀？”“你没告诉我要使碱呀？”我哭丧着脸说。“啊？蒸馒头使碱还用人告诉呀？我在娘肚子里就知道啦！”德起这一说，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多给高二三班丢人呀？连个馒头都蒸不好！京辉听德起这么说，不高兴了，“怎么说话呐，你在娘胎里就会蒸馒头呀？跟你说，老匡这是真人不露相，他要是认了真呀，你给他当徒弟还不要你呢！”人璧也跟我打趣：“老匡，昨晚上你不该看电影”，说完他拿起死面疙瘩就喊上了：“小石头！小石头！”昨晚村里演《艳阳天》，里面有个孩子叫小石头，让地主马小辫给推下悬崖害死了，满村社员去找孩子，都喊“小石头”，人璧学的就是这一口。眼看快晌午了，重新做来不急，大家死面疙瘩就土豆丝，倒也狼吞虎咽；张颐还给我宽心：“老匡，你这叫‘一回生，二回熟’”！

晚上德起又帮我发了一盆面，第二天临走还叮嘱我：“别忘了使碱”！可我望着面盆又犯愁了：使多少碱合适呀？唉，早知有今天，学校就应该开设蒸馒头的课程呀。我正发愣，恰好荷莲来借手电筒，见我发呆，知道正为使碱的事发愁，笑着说：“大哥您放吧，我给您料着”。我可遇见救星了，连忙下手抓盆里面，面还像昨天那样稀，糊了我一手。荷莲又乐了，“大哥，不是这个和法”。她说完，卷卷衣袖，在手上扑点面粉，盆上洒些面粉，兜边往上轻轻翻着揉，几下就揉成一团，又沿盆边滚着揉一圈，面盆里净光锃亮，连点面渣都没了。她把面团往案板上一放，让我使碱。我小心奕奕地拈起一撮放下，她摇摇头，“太少，多掌些”；我有点不放心，对她说：“可别放多了呀，昨天蒸了一屉酸馒头，今天再蒸一屉碱馒头，我可没法交待呀！”荷莲笑着推开我，“看着啊！”她说。

她下手抓了一把碱面洒在面上，一揉，邪了，那面团噗嗤噗嗤往外冒气，按下去，鼓起来，像活了似的！她反复揉了几过，拿起菜刀一切，只见断面上全是密密麻麻的蜂窝孔，“瞧见了吧，这就行啦。蒸什么？”“蒸馒头呀？”“有棒子面为啥不做金银卷？”“啥是金银卷？”荷莲又乐了，“你们城里人连金银卷都不知道？”她把白面擀成一大张饼，棒子面和软了，放点糖精，摊在白面上，卷起来，切成一个个卷子，屉布先浸湿，再放上卷子。“开锅后一刻钟就得”，说完拿起手电急匆匆走了。

我心里先还忐忑怀安，不知荷莲厨艺是否真有把握。等水一开，笼屉里散出味来，我心里算落了梃：闻着那味真香啊！蒸够一刻钟，正好伙伴们收工回来，德起揭锅一看，满屉金的银的，喧腾腾的别提多棒了！德起惊讶地喊起来，“老匡你不显山不露水的主儿，昨天还生手儿呢，今儿怎么一下成大师傅啦！”京辉笑着说：“德起我没说错吧？老匡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我看着大家这么高兴，也乐了，赶紧说：“哪是我的本事，全靠高人指点呢！”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5：

第九章：鸡兔之争

夫子日记：1974年5月6日 立夏。

一立夏，天气骤热，小麦抽穗灌浆正需雨露滋润，偏偏天旱雨少。为抗旱，全队劳力几乎都扑在麦地上浇水，我们也是早出晚归，天天趟出一腿泥。14日天降甘霖，解了旱象，社员们才算松了一口气，都说收成有望。15日去梁南刨地头，路远便带上了干粮。中午歇歇儿时，因离西灰岭近，就跑去看二班在那插队的胥小昭。那天晚上白老师和李吟天突然来村，白老师是送6个初中生去狮子营插队，李吟天留城无事，跟着白老师来看同学们，顺便捎陈老师一封信，信中问寒问暖，让同学们感动不已。

送走白老师和吟天，已经很晚，我们累得不行，全躺在炕上，只有张颐手痒，抱着二胡吱吱呀呀拉个不停。京辉望着已有破洞的顶棚，问我晚上听没听见房梁上有耗子跑？我说没有。德起马上说没错，是有耗子，都是西屋粮食囤招的，是不是应该养只猫呀？本来就不够吃，再让耗子偷点儿，更拉饥荒了！京辉听了若有所思，忽然问我："老匡，明儿咱们上砖窑，捡点没用的砖头吧？""捡砖头干嘛？""砌鸡窝"；大伙一听都来了精神，全看着京辉，"怎么，你想养鸡？"我问。"不是我！是咱们！咱们应该养鸡！"京辉很为自己的点子兴奋不已，没想到德起直摇脑袋，"根本没法养！根本不会养！不能养！不该养！"他这几个"不"字连珠炮似的，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不知是谁不会养？为啥不能养不该养？

"你懂啥？"京辉说。他要是打定主意，轻易不肯变。"我在干校就养过鸡，跟你说，养鸡至少有十大好处，知道吗？"这话又让我们一愣，十大好处？有那么多吗？"哪十大好处，你说说？"我问京辉。京辉马上掰着手指头数起来：

"第一，鸡能下蛋，咱们天天有鸡蛋吃，多棒！"这条大家都知道，催着他往下说。"第二，鸡早上打鸣儿，比闹钟还准！咱那个破闹钟天天慢，有了鸡，就保险了！""那第三呢？""第三，鸡能看家护院。夜里来贼，鸡听见动静会叫的；""鸡不会！鹅才会！"德起爱抬杠，抓住京辉的破绽马上较真儿。"你懂啥？鸡也会的！我在干校养过一只九斤黄，夜里一有响动它就玩命叫！""哈，那是周剥皮半夜鸡叫吧？"德起还是不信，京辉瞪了他

一眼，接着说："第四，鸡粪是最好的肥料，我问过菜地的老园头，鸡粪劲大，是上等好肥；咱们门前菜地该种菜了，种了菜得上肥呀？养了鸡，肥的问题就解决了，自己用不完，还可以交队里，算粪分！"京辉这条倒是有道理，那时不光干活记工分，还有很多能够挣工分之处，像把粪交队上，有粪分，在粮库睡一夜觉，有库分。

京辉见我们点头，更加得意，接着说："第五，鸡能吃虫。咱们种了菜，生虫怎么办？打农药一要花钱二也不安全，把鸡撒到菜地上，又吃虫又不污染环境，一举两得！""哈，恐怕虫没吃着，先把秧苗吃光啦！"德起又抬杠。京辉不理他，接着说："第六，鸡毛是个宝，可做鸡毛掸，做枕头，还能做键子锻炼身体！""我只知道有鸭绒枕头，没听说过有鸡绒枕头呀？"张颐对这条表示质疑。京辉乐乐，"逗你玩！第七，鸡能孵小鸡。咱养上六只鸡，每只鸡平均就算一年孵十只小鸡，明年咱不就有六十只鸡了？可以办个养鸡场啦！""那您光养母鸡？谁打鸣儿呀？"德起问。"那就养十只，六母四公，行了吧？"京辉说。"第八，咱们每天的残羹剩饭可以喂鸡，既节约饲料，又不浪费粮食。""您倒想浪费粮食呢，您那残羹剩饭在哪呀？咱天天盆光碗净，掉个饭渣都得捡起来吃了，剩个啥呀？"德起还是摇脑袋，弄得人璧烦了，冲着德起说："少说两句成不？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第九，鸡能卖钱，在干校我那只九斤黄拿到集上卖了五块钱呢！"这条倒不错，我们都点点头。"这第十……，第十……，唉？这第十是什么来着？"京辉一下卡了壳，左思右想，猛地一拍头，"咳，我怎么把最大优点给忘了？鸡能吃呀！老母鸡炖汤，那滋味，不用我说了吧？咱们从现在开始养，养到明年春节，一人两只，带回家杀了过年，绝对比城里卖的死鸡强一百倍！"这条的确很诱人，一想到老母鸡炖汤，我们直咽唾沫。京辉一口气说出这么多优点，让我们觉得不养鸡简直是天理难容了。"那"，我转头对德起说："你说说为啥没法养？"德起胸有成竹的样子，冲我们说："不用十条，我就说三条，你们就知道没法养了。这一，眼下集上卖的还都是鸡雏，小鸡最难养，受点儿寒一拉稀就完蛋；就算十只保住俩，就咱这院，四面围墙不通风，夏天贼热，最爱闹鸡瘟，一死全死，我养过鸡，我知道！这二，鸡不光吃菜叶，还得喂粮食，至少得喂老玉米，眼跟前儿咱人都吃不饱，哪来粮食喂鸡？这三，您要是把鸡撒出来，祸害了咱的菜苗不说，万一飞到隔壁，把社员家菜地给糟蹋了，看你怎么交待？"听德起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道理，"照你这么说咱不能养？"我不无遗憾地说。"能养！只是不能养鸡！""那养啥？总不能养猪吧？鸡都没粮食喂，猪就更别提了"，我说。"能养兔！"德起大声说。

"养兔？"我们都一愣，"你会养？""小菜儿！"德起也兴奋起来，"跟你们说，除了不会打鸣吃虫，老黄说的那些优点兔子全有！最大优点，一是只吃菜吃草，绝不吃粮食；二是皮实，甭管冷热，从不生病。你们谁听说过兔子感冒吗？"我们都摇头，的确没听说过。"养到春节，咱哥几个一人弄只兔子回家，红烧兔肉，皮剥了还可以做个皮帽子，没治了！傻冒不养兔！是不是，胖子？"德起问建生。建生正捧着名言录看，根本没听见我们在说什么。德起踹了建生一脚："嘿，胖子，问你话呢，是不是应该养兔？"建生一惊，光听见养兔二字，忙不迭地说："对，对，养兔！养兔！"这下六人分了三派：京辉和人璧是养鸡派，德起和建生是养兔派，我和张颐是中间派，养啥都行。最后决定各养各的，优胜劣汰。第二天，京辉人璧在东屋前边砌了鸡窝，德起建生在西屋前砌了兔

窝。第三天永宁有集，京辉买回十只小鸡，德起买回四只兔子，鸡兔竞赛拉开序幕。

果不出德起所料，鸡雏娇气，没养几天就死了四只。剩六只熬过鬼门关，胃口大开，傻吃傻长，做饭那点残渣剩食根本不够吃，只得花钱从社员那里买些小米和棒茬儿掺着喂。相比之下，兔子还真有优越性，四只兔子从不闹病，天天啃点菜帮子烂叶子，还挺肥。德起歇歇儿时挎着筐四处摘野菜，取之不尽摘之不绝，兔子都吃不完，要不是地方有限，德起几乎想开个养兔场了。

一过小满节气，雨水渐多，正是种菜的时候。我们找天把屋前菜地翻了土，第二天上午我和唐谦去趟永宁，在集上买了些菜苗，有西红柿、黄瓜、青椒辣椒等。下午下小雨，正是栽苗的好机会，很多社员都从田里赶回家，把菜苗种上，我们也不例外。小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第二天放晴，朝阳一出，菜地里的小苗个个青翠嫩绿，挂着晶莹露珠，生机盎然。社员们都说这雨下得好，墒情好，菜苗都落得下。果然如此，我们栽的苗全都成活了。大家都是第一次种菜，简直把菜苗当自己孩子养，眼瞅着小苗一天一窜，越长越高，想着不久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黄瓜豆角，心里甜滋滋的。

这天轮建生做饭。我们中午收工回来，一进院大吃一惊。只见菜地上，三只大鸡崽正啄菜苗，吃得津津有味。满畦小苗缺胳膊少腿，全都半死不活了。“胖子，你他妈的干啥吃的？怎么让鸡全跑出来了？”德起怒吼起来！我窜进屋里，见建生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拿本成语小词典，正看得入迷。我一把揪住他后脖领，在他耳边大声喊：“建生，是你把鸡放出来的？”建生吓了一跳，回头见是我，乐呵呵地说：“老匡，我考考你，啥叫‘为虎作帐？’”说得我一愣，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个成语呀？京辉反应快，“那叫‘为虎作伥’！还作帐呢，你看看菜地吧！”建生出屋一看，吓得脸刷白，“唉呀，我刚才喂了把棒渣，是不是门没关好呀？我真不是故意的！”人璧说甭啰嗦了，赶快抓鸡呀！于是六个大小伙子，四面围追堵截，像鬼子进村似的，好不容易把鸡抓住关进窝里，发现另三只并没在窝中。前后院找个遍，也没有。正这时，就听后院隔壁宗润大伯的老伴在院里喊起来：“这是谁家鸡呀？咋不关着呀？”我们扒墙头一看，全傻眼了，就见那三只鸡在宗润大伯家的菜地里，正左一嘴右一嘴啄个不停，满畦绿油油的小苗，全给祸害了！

那天晚上全户商量，鸡是绝对不能再养，宗润家的菜苗也得赔偿。京辉人璧连夜把鸡窝拆了，德起第二天去集上买回菜苗给宗润家补种上。那六只鸡崽成了我的刀下鬼，张颐给大家做了个红烧童子鸡。京辉说吃不下，吃着心疼；德起夹起京辉那只，说你不吃我可替你吃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京辉说狗屁老人，小心哪天你那四只兔子也跑出来，祸害了菜地，我可不留情面！红烧兔肉，那吃着才香呢！

第十章：西北风怕东阁老

夫子日记：1974年5月18日：

“早上五点起床，和‘党代表’去浇麦子，一直浇到中午11点完活；下午刨园子地。晚上吃完饭，正在菜地补种西红柿苗，忽然刘岩抱着铺盖卷闯进院来，满脸怒气，进院就往屋里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大家跟在他身后紧着问，怎么了？和谁吵架了？刘岩把铺盖往炕上一扔，长叹一声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谁呀谁呀？’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他和谁闹矛盾了。‘还能和谁？姓尚的呗！’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是和他们户的初中生小尚吵架了。晚上刘岩挤在我和张颐中间睡，我和他打趣说，幸亏我和张颐都瘦，要是都像建生那么胖，就没他睡觉的地方了。刘岩大概是吵架吵累了，哼了一声，躺下就睡着了。（我）今天起得早，也很睏，就写这些吧，但愿唐谦能处理好户内的矛盾”。

1974年5月19日：

“今天仍和‘党代表’去浇麦子，鹰沟洼那块地坑坑洼洼很不好浇，从天不亮一直浇到下午两点，饿得要死。唐谦他们和小尚彻底闹崩了，今天他们把家当都搬到七队来了。下午公社老李来了，向唐谦他们了解了小尚的情况，他也无可奈何，说不行就只能分开过了。我问唐谦，你们五个人怎么管不了一个小尚？唐谦一脸苦笑，光是摇头。下午和正义叔一起干活，说到一队的事，正义叔说老百姓有个说法，叫老鼠怕猫，猫怕狗，狗怕人，人怕西北风，西北风怕东阁老，东阁老怕老鼠。这叫物有所克，老唐他们是让小尚克住了。我问什么是东阁老，他说就是墙，风那么厉害，遇到墙，就刮不过去；可墙怕小老鼠，再高的墙，也挡不住老鼠打洞。不写了，昨晚没睡好，实在太睏了。”

唐谦到孔化营遇到的第一劫，就是小尚。下乡才40多天，户里就打起架来，这让他伤透脑筋，或许后来大病一场也是由这而起，思伤脾怒伤肝嘛。当初为何给一队“搭配”小尚？大概白老师相信，以唐谦的能力和水平，足以感化教化浪子。谁知阎王好惹，小鬼难缠，一个小尚把一队闹得鸡犬不宁。不知当年高中三个班有多少户“搭配”了初中生，也不知“搭配”了初中生的户，有多少能够和谐相处？总之我很庆幸没把小尚给我们户，否则大病一场的就可能是我了。

据东庄回忆，当年孔化营有六个初中生，除了建生德起，一队有小尚和刘国强；八队有洪俊海，另一个叫啥他也忘了。一个户的居然忘记名字，想必那位大概就没来村里。刘国强是到工程处后才熟悉的，洪俊海我早忘了，有印象的，就是小尚。也只是记得大名，长啥模样不知道。

07年把建中捞上岸后，徐警官发了一些老照片，其中有全户人的合影。我盯着照片看，盯着小尚看，看了许久。照片上的他，和我想象中的他，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我以为他一定膀大腰圆，横眉怒目，像庙里的罗汉；谁知照片上的他，个子最矮，瘦小枯干，像个小学刚毕业的孩子。我百思不解，以他一人之力，别说对付三班五个棒小伙，就是与唐谦单挑独斗，他也是不堪一击。他怎么就能把刘岩兄逼得躲来七队，又怎么能让唐谦他们只能摇头

苦笑呢？要知道，在孔化营插队的三班男生共有十三条汉子，一呼百应，而他孤家寡人，并无后援。他怎么就敢太岁头上动土，大闹天宫，弄得公社老李都无可奈何，竟说“我只管你们吃饭睡觉，打架的事只能找公安解决”（这是6月19日的事，小尚和北辰兄打起来，用铁锹把北辰打伤，唐谦他们找到公社知青办老李，老李说了这句话）。难道真像正义叔所说，是一物降一物，西北风怕东阁老吗？

想当年在母校学农，我们到初三作辅导员。一天，初三有个流氓学生绰号叫“小疯子”的，因受到陈老师的批评，竟对陈老师破口大骂，甚至想动手打老师。我当时在场，几次想动手揍他，念及自己是辅导员，打低年级学生影响三班声誉，忍住火气，和初三的同学一起把他推开了。当时刘岩在炊事班当伙头军，他听说此事，火冒三丈，冲我喊到：“老匡你也太熊了！他敢打咱老师你还不动手？下回他再敢犯横你叫我，我不是辅导员，打他白打！”别看刘岩兄平时文质彬彬，发怒时也是血气方刚。谁曾想，插队碰到个小尚，大概也如“小疯子”一般，竟弄得几位仁兄哭笑不得：讲道理吧，他不听，揍他一顿吧，落个高中生欺负初中生的名号，胜之不武；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对小尚，我觉得不是“西北风怕东阁老”，是“投鼠忌器”。

知青户像个家。家有家长，有家规，有家法。家中有违规者，有父母兄长管教，有家法惩处。知青户却是既没家长，也没家规家法，全凭大家互谅互让，团结一心。可居家过日子，两口子还免不了吵架斗嘴，何况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当年一队同学和小尚到底为啥闹矛盾，日记中没有详细记载，如今大概只有唐谦刘岩他们局内人才能说得清，不过三十多年过去，小尚也是五十多张的人了，再来捯旧帐也没啥意思，在这里写出此事，只是想让同学们了解当年唐谦的难处。作为户长，如同家长，讲道理讲不通，又不能打不能骂，天天和你怄气，你说这日子咋过？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7：

第十三章：评工风波

转眼到了六月，酷暑来临，小麦灌浆，秋苗也窜出地面，一年里最苦最累的日子到了。

上学时，参加过好多次麦收，那时叫“双抢”，抢收抢种。我一直以为夏收是农村最累的活计，谁知插队后，夏收还没开始，我们就经历了一番严峻考验。这场考验起因于评工。

六月初的一天，下大雨，队里停一天活，集中评工。前面说过，工分儿是社员们分红的依据，分儿多钱多，分儿是农民的命根子。劳力分三等，一等劳力干一天活挣12分儿，二等10分儿，三等7分儿，剩下不够等的，大概其看着给了。劳力等级由谁决定呢？大民主，完全由社员讨论确定，一般一个月评一次，评上几等，干活就按几等记分儿，队里专有记工员，每个社员有记工分儿的小本本，天天到记工员那记工，自己是不能乱记的。我们五月份第一次参加评工，评的是二等劳力，要说我们这个年龄，正是年轻力壮，队上同龄人全都是一等劳力，把我们评成二等，老二爷子还有些难为情，好在我们也不指着这点工分儿过日子，大家并没计较。

六月那天评工，分了三个组，老二爷子领一组，正义叔领一组，二石领一组。我们六个人拆开了，我和京辉分在二石那个组。上午各组定完等级，下午集中在队部“对工”。对工就是把各组评工结果在全队公布，谁有意见，当众提出，避免暗箱操作。现在一个时髦词儿叫“政务公开”，其实几十年前在生产队就已经“政务公开”了。那天下午在队部“对工”。当对到我们知青时，出现了问题，我和京辉在二石这组，定的仍是二等，而其余四位在另两个组，全给定了一等。我们六人年龄相仿，身体也都没啥毛病，我和京辉更不是干活偷懒之人，把我俩定成二等，另四位定成一等，显然摆不平。于是围绕究竟该给我们评几等，社员们激烈争论起来。

“一等劳力该干啥儿活？大伙都明白！他们几个干活是舍得出力，可总还是生手，马上评一等恐怕早点吧？我看还二等吧！”二石大声说。

“虽说是生手，可人家活一点儿没少干！大老爷们儿评个姑娘分，不是寒碜人家？要我说就给一等！”国柱明确表态。一时间队部里叽叽喳喳，嚷成一片。

我看着场面有点乱，觉得应该表个态。我心里明白，孔化营不是北大荒，人均耕地也就一亩多，队上劳动力完全够用。我们六个大小伙子一来，等于在蛋糕上要分一块，可蛋糕并不会因我们的到来而做大，我们多吃一口，社员们就要少吃一口，本来就有些内疚。现在要给我们全评上一等，就算一年只出工二百天，一个人也能挣两千多分儿，六个人加一块一万多分儿，这口蛋糕也吃得太多了些。我忙说："我们刚下来不久，好多活还不会干，我们还是评二等吧！你们说呢？"我扭脸看看京辉他们，可哥几个全闷着头不说话。

老二爷子见二石脸色铁青，磕磕烟锅，说："这样吧，队干部、知青，咱们都出去回避一下，大伙多议议，有什么话都摆在明面上，发扬民主嘛，你们把话说透，大伙统一意见，该评几等就评几等，成不？"社员们说行，二石心里不乐意，可也不好说什么，只得跟着老二爷子和正义叔到队房外，远远找个阴凉地去抽烟，脸色都挺凝重。我们几个也出了队房，到了北墙根，我着急地说："你们几个刚才怎么都不说话呀？你们到底是什么意见呀？"京辉说："国柱说得对，咱们哪点活少干了？按劳分配嘛，没什么谦让的，评上就要！"德起紧跟着说："对！评上就要，不要是孙子！"我瞪了德起一眼，问人璧和张颐："你们二位呢？"人璧说："要我说，评上一等，是老社员信任咱，咱可不能自己看不上自己。评上就要，王国富不是说卖了孩子买笼屉，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吗？"张颐倒是和我观点相同："咱们评一等是高了点儿，你看二石干活，咱哪比得上？反正一等二等不就差那两分儿吗？何必让社员们为咱们的事闹意见呢？"三比二，就看建生啥意见了。我问建生："建生，你的意见？"建生耳背，一般开会他总是躲在旮旯里打盹，刚才队部里说些什么，他根本没听见。见我问他，忙侧过脸来问："什么老匡？社员们说什么啦？"德起贴着他耳朵大声吼到："胖子，评你个一等劳力，要不要？""要！要！"建生以为已经评上了，乐得小眼里放光："天上掉馅饼，干嘛不要？老匡你要是不要，那你就太赫气啦！"我一愣，建生常说些我不懂的词，"'赫气'怎么讲？"我问他。

"'赫气'你都不懂？你这短小精悍的大文豪都不懂？老匡你别拿我逗乐啦！"建生一本正经地说。

"谁拿你逗乐了？我真不懂！你们懂吗？"我问京辉人璧张颐他们，他们全都摇摇头。

"不可能，你们高中生怎么会没学过'赫气'这个词呢？"建生以为我们拿他打趣，有些起急。德起忙给我出主意："老匡，吴胖子老爱拽花哨词儿，在班上就是，有时连老师都听不懂。我们老师有个办法，碰到听不懂的词，就让胖子用这词造个句，老师就能听懂了。"德起这一说还真救了急，我对建生说，"你用'赫气'造个句行吗？""造个句？我刚才不是造句了吗？""你造什么句了？""我不是说'老匡你要是不要，那你就太赫气了吗？'""这个不算，你另外再造一个！"建生眯缝着小眼想了半天，一拍手说有啦："老匡你天真得就像个孩子，一脸赫气呀！"建生话一出口，我们全猜到他的"赫气"是哪个字了，大家哈哈大笑，几乎把眼泪都笑出来了。建生看着我们不明所以，挠着头说："我造得不对么？"我笑着说，"造句倒不错，只是念白字了，不是'一脸赫气'，是'一脸稚气'！记住，那字不念'赫'，念'稚'！'幼稚'！"我们这刚把稚字讨论明白，队房里

已有了结果。大伙儿招呼队干部和我们进去。我们一进门，一群小小子儿就兴奋地叫起来："一等！一等！""是一等么？"老二爷子问。"是。"满屋社员都点头。

老二爷子笑了："那就定了，一等！"他瞅着二石说。

二石一点笑脸没有。他看看一屋子社员，整整头上那顶黑油油的单帽，高声说："一等劳力干啥活，大伙都明白，咱们可把丑话搁在前边，赶明队干部派活时，大伙心里要有个数！"说完，他特意看了我们一眼。我知道，二石这话里有话。

回到户里，京辉从枕头底下摸出十斤面票两块钱，往炕桌上一拍，冲轮到做饭的人璧吼到：

"人璧，明儿每人加一斤粮，哥几个吃得饱饱的，好练活！"德起也撸袖子拍胸脯说："对，让老社员们瞅瞅，咱小哥几个还真不是废物点心！"

第十四章：二石打擂

第二天派活，二石点着我们知青跟他去庙台薅玉米，他是副队长，有派活权，我们也没话说，但心里都明镜似的：二石跟我们较上劲了。

"薅"字在字典里当"拔"讲，可要是把"薅苗"理解为拔苗，那可大错特错了。春天种下的庄稼，像玉米高粱谷子什么的，到六月份已经窜出地面了。种庄稼时，一坑撒几粒种籽，个把月后一坑钻出好几棵苗。薅苗，一是将多余的苗间去，只留最壮的一棵；二是要将垅土锄松，将野草除去。薅苗不是力气活，小孩子都能干。可农村最累的活计，大概就属这薅苗了。头一条要能蹲得住，一蹲一天，还得能蹲着往前走，蹲着走一天，那滋味可想而知。蹲姿有两种，全蹲式，双腿并着蹲下来；半蹲半跪式，前腿弓，后腿跪。头一种省劲，但走不快，；后一种走得快，但耗力气，要腰腿劲。社员们说：会不会薅地，一看蹲的样子就知道。能蹲着走，还不成，还要有手上功夫和眼力劲。薅垅下土，一边一锄，讲究要贴着苗锄过去，既松了土还不能伤苗；间垅上苗，要拿得准。一窝几棵苗，筷子粗细，四五寸高，要看得出壮苗弱苗。一锄下去，能把弱苗全间掉，才是高手,两锄算一般，三锄以上就不及格了。

庙台是队里地头最长的一块，靠近北河套。那天晴空万里，走到地头上，一轮红日刚刚爬上山。地皮还湿漉漉的。二石说："乘早上凉快，先干着吧。"挽挽裤角，把着边上一垅薅起来。别看他一米八的个子，蹲下去毫不费劲，不塌肩，不含胸，腰板儿挺着，两片大脚一前一后抓着地，小薅锄一起一落，那叫快。一步三锄，没一点多余动作，锄声响过，屁股后头齐刷刷一溜青苗，间距全是一拃宽，土松苗直，煞是整齐。我们头两天也薅过苗，可二石这样的薅法今天头一回见，看得直发呆。德起说："快薅吧，再看更撵不上了！"我们赶快蹲下薅起来。

要说蹲功我还行。在河南下干校时练过。河南人最爱蹲着，吃饭都是捧着大海碗蹲在门坎上。我学老乡，吃饭也捧着碗在地上一蹲小半天，加上人瘦，没肚子，蹲着一点不费力。所差的，是眼神不行，发懵间苗，一锄下去，老找不准地方，不是只间下一棵弱苗，就是连壮苗也伤着了。苗距也瞄不好，一会儿宽一会儿窄，一看就是生手。眼瞅着二石越干越快，把我们拉开一大截，大家只得铆足劲往前追。不一会儿，地上露水把鞋袜和裤腿全打湿了。

头一垅薅到头，太阳已经老高。田里热起来，没有一丝风。我口渴，想找个喝水的地方。但见二石已返身向回薅去，我不敢耽搁，赶忙也往回薅。不一会儿，嗓子眼儿里便冒烟了，偏偏老爷儿又玩命晒着，顺脖子流汗，鞋上裤腿上的露水刚烘干，上衣又让汗水浸透了。越热越渴，身上也犯软，我只好捡一根青苗含在嘴里，压压火气。望望前边，苗垅长长的，离地头还远着呢。看看伙伴们，一个个都闷着头拚命干着。京辉和德起薅得挺快，总是摽在二石身后，张颐和我算中不溜，最惨是建生。人胖肚子大，蹲不下去。开始是弯腰撅着屁股薅，撅了一会儿受不了，还是蹲下去，蹲了一会儿还不行，干脆跪着薅，汗珠子成串往下掉，一张大嘴咧着，表情比哭还难看。
太阳变得热辣辣的，把大地烤得像热炕头。我把外衣甩在一边，想让汗出得痛快一点儿。可发现自己没汗了，皮肤干巴巴的，落上一层黄土，像是把汗毛孔全堵住了。我知道体内水份已流干了，后悔早上棒子面粥喝得少了点。口越渴越想找点解渴的东西，满脑子全是冰棍汽水：三分红果，五分小豆，一毛的大雪糕，冰镇北冰洋……心说现在谁要给我一瓶冰镇汽水，我一定给他烧高香！

终于到了地头。二石早在树荫下吸上了烟。我扔下薅锄，撒腿就往北河套跑。还没跑两步，突然眼冒金星，忙停下脚，闭眼，等血上了头，再飞速跑到河边，一头扎在水里，咕咚咕咚一通牛饮。水有股草腥味，却胜过“北冰洋”，我喝着喝着，听见旁边也有咕咚声，抬头一看，哥几个都撅着屁股狂饮。

下午学乖了，走前先灌个水饱，再带上两个行军壶。薅了不一会儿，又是一身汗，个个背心上都透着一圈一圈汗碱。晌午的太阳真像火炉子，烤得人发焦。田野里只有锄声，谁都懒得说话。我真想老二爷子在这，听他再唱一个“养猪好”。沉闷更容易疲倦，我渐渐感到腰酸腿麻，手上也磨出几个血泡。我看看二石，他简直像个机器人，动作一点不走样，薅得飞快。我心里暗自叹到，他怎么就不知道累呢？

日头偏西了，南山上的石鸡子咕咕叫起来。我们薅完了最后一垅，都一屁股坐在地头上。二石捡块小砖头，把薅锄蹭得雪亮，站起身掸掸土，对我们说：“晚上吃完饭，团员青年去薅丰产方，你们也去吧？”丰产方是团小组包的一块地，由团员和青年义务管理。我们也是团员和青年，自然只能点头。于是回去扒两口饭，又赶快到丰产方，直薅到月亮上了南山，才收工。

回到户里已快九点，人璧已给我们烧好洗脸水。可几个人往炕头一躺，谁也懒得动。建生带着哭腔说：“老匡，我明天没裤子穿了，怎么办呐？”我爬起来一看，建生的裤腿磨了个大窟窿，再看看他的膝盖，皮也磨破了，已渗出血来。我赶紧弄点红药水给他抹上，问他：“你就一条裤子？”建生点点头说：“还有一条灯芯绒的，太

厚，只能冬天穿；”我为难地说：“你这身材，又矮又胖，我们的裤子你也穿不了啊？”德起说我有个主意，把裤腿铰下一半，当短裤穿不就行了吗？建生气得要打德起。人璧说：“咱俩换换，明儿我下地，你做饭，在家把裤子补补，不会就请荷莲帮帮忙”；“行！行！”建生巴不得歇一天，赶紧答应。德起笑嘻嘻地说，“还是人璧大哥风格高，不过建生我告诉你，这两天的饭可不比寻常，你可得做好点做多点，可不能饿着哥几个！”

那一夜老梦见薅地，落在二石后面好远，怎么也撵不上，急得挥胳膊踹腿，突然被张颐叫醒。一睁眼，只觉周身犯紧，胳膊腿沉甸甸的，搁哪都不自在。

“怎么喇叭没响？”我见天色朦胧，以为还早。

“停电了，还不快起，饭都得了！”建生在灶间大声说。天还没亮，屋里黑黢黢的。我们草草洗把脸，建生放上炕桌，一簸箩馒头，一碟咸菜，又给每人盛了粥。我们狼吞虎咽干掉馒头，赶紧吸溜吸溜地喝粥。

“胖子，这棒子面没和开呀？”德起突然喊到。

“瞎扯！我搅和了半天呢，人家都没事儿，就你老事儿妈似的！”“我事儿妈？我这碗粥一堆的面疙瘩！”德起愤怒地说。

“没错，我也吃着一个，不过不太像面疙瘩呀？”人璧说。

京辉离窗近，就着亮，用筷子挑出一团东西，左看右看：“这是什么？”我坐在京辉旁边，凑近看看，不禁喊起来：“建生你没刷锅吧？！”“怎么了？”“这粥里全是潮虫！”没错，京辉筷子上夹着的，正是一只潮虫，灰色的壳壳上糊满棒子面，两排细腿蜷缩着，一副可怜相。潮虫的学名不知叫啥，可我从小就认识它，它专往潮湿阴暗处躲，所以叫它潮虫。小时逮蛐蛐，砖头瓦砾下，只要一翻动，准有潮虫跑出来。我端起自己的粥看看，浮头也漂着若干虫尸。我猜建生早上一定没刷锅，赶上停电没灯，屋里黑，潮虫爬进锅里他没看见。

“胖子你个懒猪！做饭不刷锅，你成心呀！”德起气得骂起来。

建生吓坏了，赶忙分辨：“我怕起晚耽误做饭，昨晚就把锅先刷干净了。没想早上停电，黑古隆冬的，我哪看得见锅里爬进潮虫啊？”看他怪可怜的，大伙也不好再说什么。京辉、张颐和人璧把碗一放不喝了，德起舍不得，把潮虫一只一只挑出来，一边挑一边嘀咕：“老匡，凑合着喝吧，听我爹说这东西入药，碾末做丸，治牙疼。”说着将潮虫挑干净，咕噜喝下去。我看着直恶心，想不喝，又怕今天二石还要鳔着我们干什么累活，若没这碗粥垫底，好像底气不足。犹豫半天，决心喝下去。我也把潮虫一只只挑出来，数到二十多只时，窗外传来老二爷子悠长的招呼声，我顾不上再挑，慌忙仰头，像潘长江喝啤酒，直着脖子把粥倒进肚子里。

到了派工点，二石冲我们点点头，扭脸对老二爷子说：“今儿个让知青们跟我薅金宝地的谷子。”二爷沉吟一

下说："谷子怕他们薅不了吧？""薅不了谷子那还叫一等劳力？"二石答得斩钉截铁。

老二爷子不好再说什么。我们就跟着二石去了金宝地。早听社员说过，薅苗当中，以薅谷子最难。谷子苗扎堆，密密麻麻，寸把长，看着都费劲。要间成三指宽一撮苗，下锄要准，劲儿拿捏得要恰倒好处，劲儿小了间不掉苗，劲儿大了一窝端。男社员都不爱薅谷子，说它像老爷们绣花，有劲使不上。

金宝地既没金也没宝，是队里一块最赖的地。瘌痢头似的，凹凸不平，尽是小石子、节节草，土硬得下不去锄。我们几个蹲下去没薅几下，头就大了；再薅一会儿，眼花缭乱，下锄尽砸在石头上，震得手生痛。

二石仍是小跑一样薅着，屁股后头一溜狼烟，京辉和德起想鳔住他，可很吃力，时时被甩下。我和张颐还是中游，人璧成了垫底。人璧打篮球的身材，个子太高，蹲着比我们都费劲。只得像建生昨天那样跪着薅，别看他投篮挺准，薅苗可不太灵，小锄紧着刨，总锄不利索，没一会儿满脸汗珠。

"人璧，加油！"我给他鼓劲。"老匡，我宁愿去粮仓扛大个，也不愿干这老娘儿们的活，活活把人憋死！"人璧冲我抱怨着。

"张大哥，后悔了吧？放着好好的饭不做，非替吴胖子来受累，胖子这会儿不定怎么偷着乐呢！"德起兴灾乐祸。

"呸！一点同情心都没有！没看见建生的裤子破成啥样啦？你想让他光着腚出工呀？"张颐反驳德起。

"那有啥？你没听二臭说，那年夏天老二爷子光着腚在小山嘴拉地，看见道上过大姑娘，就在老玉米地里扯着嗓子喊：'七尺汉子三尺妻，两头长短各不齐，只要中间……'"德起学得挺像，惹得大伙全笑了。京辉冲德起啐口唾沫，"正经事记不住，记这乌七八糟的倒挺行！"那天在金宝地足足薅了一整天。背上的汗碱一层又一层，肩膀也晒暴了皮，几个人手上都打了血泡。薅完金宝地时，已是暮色苍茫，天边乱云飞渡，远山如画。河套里杨树梢头落满归巢的小鸟，唧唧喳喳叫成一片。二石依旧找块砖头擦净小锄，又问我们：

"晚上丰产方挑粪，去吗？"我想点头，可脖梗子像生了锈，动不了。京辉见状吼了声："去！"二石笑了笑，正正帽子，把褂子往肩头一搭，哼着小曲慢慢地走了。

京辉张颐和德起都已薅到地头，独不见人璧，我回头看看，只见他跪在垅里，薅几下爬一步，脸上黑一道白一道，已是精疲力竭。大家忙过去帮他薅到头，人璧刚想起身，忽然哎唷喊起来，他的腿抽筋了。我想帮他揉揉腿，可握锄的右手也抽筋了，五指像焊在了锄把上，怎么也张不开。我赶快躺在地上，放松全身，慢慢的，那痉挛的手勉强松开，手指像鸡爪子，掌中血泡磨破了，染得锄把一片鲜红。

"狗娘养的二石！成心累老子！我操你祖宗八代！"德起躺在地头上大骂起来。

京辉过去踢了他一脚："想当废物点心啦？要干一等就拿出一等的样子来！"我们一瘸一拐走回村。一进院，正好建生刚把饭做得，迎在门口拍着手大声说："欢迎劳动归来的队伍凯旋而归！"德起一肚子气正没处撒，绷着脸对他说："凯旋个屁！没看见哥几个都成了铁拐李啦？饭做得咋样？我可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建生忙说："全得了，足够你吃成个猪八戒的！"我看看他的裤子，俩膝盖打了补丁，针脚还挺均匀。"建生你手艺不错呀，以后补衣服的活就包给你啦！"我说。建生连忙摆手，"我哪有这本事，是荷莲帮我补的。"吃完饭，大家又去丰产方挑粪。当我们踏着月光回来时，大家简直就像僵尸，胳膊腿全不会打弯了。

那天晚上下起雨来。德起扒着窗户祈祷，求老天爷下一场大大的雨，"下吧，下吧，下它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他这话好像是哪部电影里的台词。村里又停电了，屋里漆黑一片，我们什么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闲聊。大家先是猜测明天二石还会不会摽着我们，如果会，又去哪干活呢？还有没有没薅的谷子地呢？在伙伴们眼里，再没有比薅谷子更令人恐怖的农活了。于是话题转到过去吃过的苦上，德起说最累莫过于去年夏天学校组织的野营拉练，最后一天急行军一百多里地，累得一步也走不动了。京辉也回想起来，说去年拉练也是六月份，一眨眼过了一年了。我说可不是，那次拉练京辉你在炊事班，我当辅导员，行军时为了给初中生鼓劲，使劲吹口琴，吹出个肺结核来。要不是那场病，现在也不至于这么草鸡，老黄知道，去年参加学校运动会，我报的百米，把旁边的同学拉下十多米，都说我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我刚说到这，德起妈呀一声大叫起来，把大家全吓了一跳！"你吃饱了撑的？瞎喊什么？"京辉问他。"兔子！我的兔子！这两天光干活了，把兔子给忘了！"德起急得要哭。我们一想可不是，这两天没喂兔子了，还不饿死了？大家正要起身去看兔子，只听见建生笑嘻嘻地说："甭看啦，我替你喂过啦！""真的？胖子你总算干了件积德的事儿，到时卖兔子的钱多分你点儿！"德起转忧为喜。"你们猜怎么着？晌午我正想打个盹，就听见窗跟前啥东西滋滋叫，我出去一看，只见那四只兔子扒着窝门一个劲想往外窜，我才想起两天没喂了，你们信不？这兔子饿急了也会叫呢！"夜里淅淅沥沥下了大半宿雨，可没能如德起所愿，到早上雨偏停了。早起去迎工，地皮还湿着。社员们见我们走路一拐一拐的，就像踩高跷，都笑了。

老二爷子看看我们，又看看二石，没等二石说话，先派了活："今儿全体上偏岭薅豆子，估摸要多半天活，大伙带上干粮"。

偏岭在梁南边，那片地正好够全队人干一天，既是全体都去，就不会像单独跟二石干那样玩命。我知道这是老二爷子怕我们累坏了，特地安排，心里暗自感激。哥几个乐呵呵回屋拿上薅锄，才想起干粮还没着落：现做来不及，不带又怕饿。人璧想起自己还有一袋油炒面，拿出来给大家作干粮。德起把炒面袋往建生怀里一塞说："胖子，带着，昨你歇了一天！"建生嘿嘿一笑："这狗碎鸡零的事，老找我。"大伙出了门，随社员们上了山道。我觉走路轻飘飘，腾云驾雾一般；可每爬一步又是那么难。我想，今天怕是蹲不下去了，不行就跪着薅，只要胳膊腿

能动，就不能认熊！

好不容易走到了偏岭，太阳也刚刚爬上来。雨后的晨光洒在山坳中，一行行豆苗滚着亮晶晶的露珠。地头上一片片灌木丛，结着一串串紫色的小果，黄雀在其间穿梭跳跃，偶尔有一只松鼠从中窜出爬上松林。年轻人都钻到灌木丛中去摘浆果吃，荷莲拿来一串给我："大哥，尝尝野葡萄。"我咬了一口，又酸又涩，忙吐掉，嘴唇被染紫了。惹得荷莲咯咯笑起来。

二石招呼："干着啵！"头一个下了地。社员们应着。摆成一字长蛇，坑哧坑哧薅起来。

与薅谷子相比，薅豆苗要好得多。可我的腿实在不争气：先是不肯往下蹲，勉强蹲了下去，又不肯向前挪。我运了半天气，好容易把腿开动起来，已是落后了不少。只得咬着牙往前撵。

阳光灼热起来，山坳中没有一点风。我忽然想到忘了带水，顿时嗓子眼就冒烟了。刚刚正常运转的腿，又偷偷在减速。我知道跑马拉松有极限，过了极限，就不会感到累了。"往前！往前！我不断命令自己。为了逃避干渴和疲倦的折磨，我努力想别的事。忽然想到在干校，听爸爸讲他年轻时，跟随爷爷，从高黎贡山赶着马群向耿嘎山迁移。高黎贡山距耿嘎山有千里之遥，马群每天仅能走数十里。山上气候瞬息万变，刚刚晴空万里，眨眼间就狂风大作，大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密林丛中，虎豹穿行，蛇蝎出没，蚊虫成群；一路餐风宿露，栉风沐雨，历经险阻。历时近一个月，终将马群迁至耿嘎山。"吃苦是一种财富，一旦拥有，终生享用"，这是爸爸对我的忠告。此时我不断默念这句话，相信这箴言会赐予我力量。

漫长的垅坡，一墩挨一墩的豆苗，背上驼着的日头，脚下踩着的黄土，老鸹叫得人心烦意乱，散兵线一样蠕动着的长阵，薅锄下扬起的白烟，背心上一圈套着一圈的汗迹，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像个彩色轮盘在我眼前旋转起来，越转越快，渐渐的，眼前只有一片白色，脑海中也只有一片白色。我努力睁开眼睛，盯着白光，朦胧中，像听到二石在说："你不行了，你干不了一等的活，回去歇着吧……""不——！"我努力地喊了一声，猛然从幻觉中挣脱。发觉自己远远落后了。追上已无希望，只能尽最后的力。我跪在地上，发疯一样挥动薅锄，一点一点向前蹭着。突然，眼前的豆苗奇迹般地排列有序，弱苗和杂草倒在一边，有人帮我间了苗。我抬头望去，见荷莲在前面灵巧地挥着锄，一边薅自己垅，一边帮我间苗，动作快得像打闪。纤瘦的身体，像藏着搬山的劲。一袭绿衫，同青山相融，同蓝天相映。我看见了远方的海坨山，那山巅似有一泓冰凉的雪水流下来，润着喉，润着心，清醒了大脑，洗去了幻觉，送一块坚实的大地在我脚下。我蹲起身来，双手握紧锄把，快步向前薅着。炎热，干渴，疲倦，疼痛，一切折磨都已烟消云散，我终于逾越了极限，渐渐追上社员们，像马拉松运动员冲过了终点。

下午完活，大家说说笑笑下了山，我却躺在一棵桃树下睡着了。山风抚弄我的脸，纺织娘在耳边唱着歌，顽皮的松鼠从我身上越过，我都不知道，心中一片宁静。梦中呓语我却记住了：

“我就是一等劳力，干什么活我都不怕！”

第十五章：人璧要去白河堡

偏岭薅完豆苗，大田里该薅的庄稼全薅过了，活计转到给秋地送粪，给麦地浇末茬儿水，还有种白薯，都不算累活。二石和我们摽了两天，见我们不服软的劲儿，也就放我们一马。我们一等劳力的位子算是坐稳了。

那天下午在大北头种白薯，我们几个知青负责往地里挑水浇白薯秧。挑水这活正适合小伙子干，别看两大桶水挺沉，可那扁担能借劲儿，挑在肩上忽悠忽悠的，合到点儿上可以健步如飞。水平高的，手都不用扶桶，只要搁两片荷叶在水面上，袖着手挑，水也洒不出来。哥几个正干得欢，就见一队刘岩挎着一筐菜从路上过，见到我们就喊：“老匡，收了工给帮个忙吧？”“怎么啦？”我问。“咳，今轮我做饭，偏偏炉子不争气，下午火灭了。我这买了菜回去还得现笼火，一个人怕忙不过来，过来帮帮我！老唐晚上大队还有会，好像商量文体活动的事，我怕误了他的点儿。”“成，做什么？馒头面条？”“面条吧，省事，打个卤就成。”

刘岩匆匆走了。人璧挑着水过来，和我边走边说：“老匡，听说一个户给20块钱文体费，想想咱买点啥？”“哈，文艺别想了，20块钱买把二胡都不够。还是体育吧，这是你的专长，你看买点啥？”京辉在一旁听见，笑着说：“肯定买篮球啦，人璧篮球打得多好，别说在孔化营，就是永宁也数一数二吧？”人璧笑着摇摇头，给白薯秧浇了水，直起腰说：“我想了，打篮球得有场地有架子，咱村就大队部和小学校外边有场地和架子，可村里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玩，哪够用？不如买个排球，有个空地就能玩，人多人少都行，简单！”

当晚唐谦在大队开完会，通知我们，每户真的给20块钱文体费。第二天人璧就去县城买了个排球，才10块钱，晚饭后大家拿着排球正想找块空场玩玩，近宝叔来了。“人璧呀，公社知青办老李来电话，叫你后天一早去公社报到”；“到公社报到？什么事呀？”人璧问。“听说是白河堡水库工地要组织篮球队，调你去参加集训呢”。“啊？”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啊了一声，既为人璧高兴，又觉难舍难分。“你明儿个收拾收拾东西，把换洗衣服和随身用的准备好，后天一早去公社，我已经和西贵书记说了，老二爷子我也打招呼了，你这一去可能不是十天半月，弄不好就留在那了。”“咱村还有别人吗？京辉这个头打篮球也行呀！”我问。近宝摇摇头说：“咱村没了，全公社好像就抽调了三个，除了人璧，我只听说有一个姓蔡的，还一个不知叫啥。”

近宝叔走了，我们也没了玩球的兴致，大家坐在院子里，七嘴八舌乱猜。不用说，姓蔡的肯定是一班的蔡念闽，在学校就是篮球队的一员虎将，另一个是谁呢？老黄说可能是阎王阎立明吧，人璧说难说，永宁插队的不光有一五0，还有其他学校的呢。接着扯到白河堡，这地方到底在哪？谁也说不清，但白河堡修水库可是早有耳闻，村里有些劳力就在水库工地呢。又从白河堡扯到篮球队，德起很羡慕，问人璧：“您参加篮球队是不是就算参加革命

工作了？挣工资吃官饭了？去了问问要不要捡球的，要是招捡球的，别忘了我，我打球不行捡球行！”建生也急忙说：“我也行！不成让我做个饭，保证让你们个个吃成猪八戒！”大伙全乐了，人璧说：“建生你要害我们呀，把我们全喂成猪八戒，还能打球吗？”

这时月亮上来，似水月光洒满小院，大家忽然安静下来。的确，虽说在一起刚两个月多点儿，毕竟一个炕头睡觉一个锅里吃饭，已经像一家人；人璧办事稳重，思虑周密，为人正直，与大伙相处得很好，忽然要走，大伙还真有些伤心。人璧知道我们的伤感，赶紧给大伙说宽心话：“咳，也没准训几天又回来呢！德起，我走了你合适了，夏天到了你那个热炕头没法睡了，正好搬到里间睡凉炕了。”京辉急忙摇手说：“不行不行，他打呼噜我受不了，还是让张颐搬进来吧！”

我想人璧去打篮球是件好事，别搞得悲悲切切的。就笑着对大家说，明天咱们是不是改善一下伙食，好好给人璧送个行呀？”一提改善伙食，大家立马来了精神，马上商量菜谱。德起说明儿去队上粉房讨点白薯粉，再买二斤豆腐，就是两道菜；张颐说正好青椒可以摘了，再到一队摘点豆角，肉片炒青椒，肉丝炒豆角，又是两个菜。正说得热闹，京辉忽然一拍大腿，“完了！吃不成了！”弄得大伙一愣，问他怎么吃不成了？京辉说你们忘了？镇上肉铺这礼拜翻修，不卖肉，没肉，改什么善呀？大家一想可不是，镇上只有一个肉铺，还得起大早去排队，因为附近有驻军，有时猪杀得少，还不够部队买的。这几天恰好肉铺翻修，想买都没戏，可要是没肉，这饭还吃什么劲呢？

大伙一下泄了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肉，什么粉条豆腐，全没味道。人璧说不行明天他再跑趟县城，那总该有肉卖吧？张颐摇头说未必，县城的肉铺在哪都不知道，去了现找，等找着了肉也买光了，再说县城说不定和京城一样，买肉要本要票的，不是县城人还不一定卖给你。大家说有理，别大老远的白跑一趟，不值当。正没招，京辉手一拍，说有肉了！大伙又一愣，问他怎么又有肉了？京辉乐了，说你们别一棵树上吊死，猪肉没有咱不兴吃别的肉？大家听得莫名其妙，德起忽然脸发白，“老黄你别是打我兔子的主意吧？不是我舍不得，刚养俩月，还没啥肉呢！”京辉一脸不屑，“哼，别提你那宝贝兔子了，请我吃我都不吃！你们就没听见稻席那边的声音？”我们朝稻席方向侧耳细听，隐约有蛙声传来，大伙一下领悟，老黄是说青蛙！“哈，高，高，实在是高！”张颐一下乐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青蛙肉可好吃了，在干校我们常逮，红烧蛙腿，倍儿棒！”

赶紧找了个编织袋，六人拿着手电直奔稻席。夜晚的青蛙全爬到田埂上找虫吃，手电光一照，就爬着不动，一抓一个准。不到一个钟头，捉了满满一袋，第二天剥皮去肚，整出一海碗腿来，张颐掌勺，烩出一道鲜美的红烧蛙腿；剩下的里脊和青椒炒一起，椒青肉白，色香味俱全。我们请了国柱和老二爷子来，老二爷子见了蛙腿，眼睛登得溜圆：“耶，这玩艺也能吃？”“能吃能吃！”我夹条腿递在他嘴边，他小心奕奕含在嘴里，咂咂，点头称好。那顿饭喝掉一瓶青梅、一瓶延庆酒厂出的烧酒，大家吃得十分尽兴。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8：

第十六章：京辉夜话说迷案

青蛙宴吃完，送走国柱和老二爷子，我们几个躺在炕上，借着酒劲，云山雾罩地聊起天来。德起忽然问我们，可曾听说南山女尸的事？“什么南山女尸？没听说呀？”我们都摇头。德起因得到独家新闻而得意起来，故意吊我们的胃口：“我也是今天干活时听说的，挺吓人的，怎么样？想不想听？”“行啦，有屁快放！肯定又是谁瞎编的，就像什么‘一双绣花鞋’呀，‘梅花党呀’全是杜撰出来的！”京辉不耐烦地说。“这可不是我瞎扯，是真事儿！上午干活时老二爷子亲口说的！”德起分辩到。“好啦好啦，你快说是怎么回事吧！”大家一块催他。

德起清清嗓子，摆开说书的架势讲起来：“话说孔化营有座南山叫郑柱岭，郑柱岭上有个防空洞，洞里猫着高射炮，是守卫新华营的空军机场用的。平时藏在洞里，一打仗，拉出来就能用。防空洞门是用石头垒的，空军每年两次进洞保养大炮。前两天又到了保养的日子，部队来人打开洞门，进去吓一跳，你们猜怎么着？洞里边有具女尸！”说到这，德起的话音没了，屋里静悄悄的，我们都竖着耳朵听他下文，可他却没声了。“快往下说呀！”我忍不住催他。“没啦！”他说。“没啦？怎么能没了？那女尸怎么回事呀？总得有个交待吧？”我们都有些着急。“咳，老二爷子就知道这点儿，往下的事他也不知道了。一发现尸体，当兵的马上把那戒严了，谁也甭想过去，只知道公安局来了法医，其他就一概不知了。”德起的女尸案有头无尾，让我们干着急，女尸究竟是谁？为何会死在洞中？凶手又是谁？为何要害她？凶手是如何打开洞门的？又是如何把她封闭在里面的？她被封闭在洞中时，是已经死了，还是因没吃没喝，衰竭而死的？问题提了一堆，大家只能做出各种猜测，却不可能得到答案。我叹了口气说：“这倒是个推理小说的好题材呢！推理小说专有一类，叫密室案件，案子都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凶手如何进入又如何逃出，成为整个案子的迷，解开这个迷，案子就破了。像《斑点带子案》、《莫格街凶杀案》、还有《黄屋奇案》，都是这一类。这个女尸案，是不是有点像密室案件呀？”“不像不像！”人璧反对：“密室环境或是凶手不可能进去，或是进去了不可能出来；可南山防空洞不是这样的，凶手可以打开石头门进去，在洞中杀人后他也可以出来，在外面再把石头垒上，所以这算不上是密室。”京辉点点头，接着话茬儿说，“要说迷案，这南山女尸不算啥，中国历朝历代，惊天迷案多得是。远的不说，就明清两朝，不就有好多迷案吗？”“可不是！”我说。我素来喜欢看史书，尤其对野史感兴趣，明朝的“梃击案”、“红丸案”，清朝的“顺

治出家”、“狸猫换太子”，都读得津津有味。一听京辉说到历史上的迷案，立马来了精神，显摆起来：“你们知道‘雍正无头’案吗？当年雍正杀戮吕留良一家，有个孙女叫吕四娘幸免于难，后来学成武功，刺杀了雍正，割下首级带走，所以泰陵里葬着的是个无头尸！”张颐点头说没错，雍正遇刺案是清朝一大迷案，据说当初邓拓建议挖十三陵，不是挖定陵，是泰陵，就是想看看雍正的尸首是不是真的没头。”京辉又接着说，就说本朝吧，从66年文革开始，不知出了多少迷案呢！听说过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吧？海军司令，那可是水师提督啊！统领战舰驰骋大海，踏浪逐波如履平地，应该最不怕水吧？可竟淹死在一口水井里！而且那水井井宽不过人肩，水深不没人头，你想淹死都难；可堂堂海军司令，竟就会死在里面了！”“啊？有这事？”我们几个人都惊愕不止。张颐和京辉都是公安学院大院的（文革中叫政法干校），公安系统消息灵通，这方面的事自然比我们知道得多。张颐点点头说：“听说那天午饭后陶勇还散步到招待所，问所长菜地种什么菜，猪圈里养什么猪？又请理发员来理发，说明天外出开会。没想到下午两点多有人发现他落入一口井里，当时还有气，可没抢救过来，医生看见他头上有伤，所以有人怀疑他是被害的。”“我看八成是被害的，那么小一口井，怎么可能淹死人呢？”我提出质疑。

京辉接着说：“老匡你是云南人，云南两任封疆大吏离奇死亡，你应该知道吧？”“两任封疆大吏死亡？我还真不知道，我爸妈从不跟我们说政治上的事！你快说说是怎么回事？”我催京辉。“一是省委书记阎红彦，上将，67年死在省军区警卫团的驻地，据说是服毒自杀，可听说他在死前几小时，还曾和省长说要进城去，怎么会突然自杀呢？第二个是谭甫仁，中将，省革委会主任加军区政委，他死得更蹊跷，竟是被军区保卫部的一个科长给刺杀的！”“啊？有这事？”我们全都惊异地喊起来，保卫部的职责不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吗？怎么会成了刺客呢？

京辉说得更加起劲：“民间传说，谭甫仁死前几天，曾接到北京密电，要他在某日，将一架从缅甸回国的民航客机击落。谭甫仁接到这个命令，心里犯嘀咕，不明白为何要打一架客机，上命不可违，直接击落又不敢，考虑再三，只得先让战斗机拦截这架客机，将其迫降，看看机上到底何人，再见机行事。谁知飞机迫降后，从机上走出来的竟是周总理！谭甫仁吓个半死！没过几天谭甫仁和夫人就在住所内，被一个手持双枪的军人击毙。你们猜怎么着？给谭甫仁下令的竟是林彪，由于他没执行命令，林彪便杀人灭口。”“这不太可能，”我说，“总理专机要过云南，中央肯定会提前打招呼，谭是云南一把手，不可能不知道吧？”京辉笑了，“没错，这只是民间传说，不可为凭。不过，去年有件案子，可称得上公安系统的第一号案件，那可真正是一桩密室迷案呢！”“真的吗？快给我们说说！”我们一齐说。京辉看看窗外，小院寂静无声，他压低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听听就行了，千万别出去讲，这案子可还没破呢！”

大家看京辉说得这么神秘，都催他快说。老黄也卖个关子，沏上一杯花茶，抿上一口，清清嗓子，也摆出个说书的架势：“话说去年10月下旬，一个星期一的中午，正是午休时间，长安街上车辆稀少，天安门广场游客寥寥。在广场东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大院里，突然响起阵阵急促的哨声。哨声将睡梦中的警卫战士惊醒，战士们从

宿舍蜂拥而出，在军官指挥下迅速奔向各自的哨位。转眼间原本宁静的大院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大院里的人都被告知：不经特别许可，严禁随意走动！整个公安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所有工作全都停止，到处一片肃杀之气！”

“出什么事啦？是杀人了还是抢劫了？”性急的德起忍不住问。老黄得意地瞥了他一眼，“让你猜一辈子你也猜不出！知道出了什么事吗？堂堂公安部长，失踪了！”

“啊？公安部长失踪了？谁呀，是谢富治吗？”我问。

“谢富治72年就病死啦，后来的部长是李震！”京辉说。

“李震？没听说过，他怎么会失踪呢？”我很迷惑。

“这事要从头天说起。李震家就在公安部大院里，离五号楼不远，部长会议室在五号楼，所以大家习惯把部长会议室叫做五号会议室；他家离他的办公室也不远，这三处差不多正好是个三角形。头天是个星期天，因为总理有个批示，要求军队来的干部要脱军装，那天上午李震去量了便装尺寸，又到一个生病的副部长家坐了坐，下午还到办公室了解山东一个案子的情况。总之那天他的行动一切正常，丝毫没有要出事的迹象。不过那天秋雨连绵，浓云密布，阴冷潮湿，让人感觉压抑”。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大多案子都发生在天气恶劣的日子”，张颐说。京辉点点头，接着说：“吃过晚饭，李震出家散步，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风雨无阻。他出门不久，卧室的电话响，是黑机电话，高干家里电话分黑机红机，黑机是普通电话，红机是保密电话。开头家里人没听见电话响，等夫人听见去接，对方已经挂了。过了一会儿，李震散步回来，进屋正好卧室的黑机电话又响了，他接了电话，告诉夫人说要去五号会议室开会，就出了门。他女儿见外面挺黑，赶紧找了手电筒送给他，没想到，这竟是家人见他的最后一面！”“是不是出门被特务绑架啦？”性急的德起又忍不住问。“别打岔儿，让老黄说！”我们也有点急，都想赶紧知道下文。

“李震走了不久，大概是晚上八点多钟，家里红机电话响了，是总理秘书打来的，要找李震，夫人告诉他，李震去五号会议室了。秘书又打到五号会议室，李震果真在那，他接了电话后，离开了会议室，门口警卫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那一夜他没有回家，做公安工作，夜里加班是常事，家里人也没在意，以为是总理把他找去了。星期一上午，山东专案组要向部领导汇报案情，八点半，领导都到了，唯独没李震。他秘书赶紧给他家打电话，夫人说他一夜未归，是不是总理找去了？忙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总理办公室说他没去；问司机，司机说他没用车；问各大门的岗哨，都说没见他出门；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去了哪，你们说怪不怪？一个大活人，堂堂公安部长，突然失踪了！”“这有多种可能”；我的大脑飞速开动，做出各种假设：“比如他坐别人的小车出了大院，或者伪装后偷偷溜出大院，或者藏在大院的某个房间里；如果是遇害，凶手大概不会冒险把尸体运出大院，多半藏匿在院内，应该对大院认真搜查”。

“这还用你说？全搜了，每栋办公楼、每间办公室、仓库、锅炉房、洗澡堂子、食堂菜窖，这么说吧，公安部大院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搜遍，别说一个大活人，就是一只老鼠，也插翅难飞！”“哈，‘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难道他会上天入地不成？该不会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吧？”我说。

“行，老匡，你说着了！当时的确想到了地下，下令将大院内所有防空洞、暖气管道、电缆井、地下室，只要是能进去人的地下空间，全部搜查一遍。结果没过俩小时，就在大院东南角的一个暖气管道里把他找着了。”“找着了？”我们松了口气，“活着吗？”我问。

“活着就好了！找到的只是一具尸体，他已经死了！”

“死了？”大家全都一愣，虽说心里已经有预料，但堂堂公安部长死在暖气管道里，实在有些匪夷所思。“是他杀还是自杀？”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问。

“咳，麻烦就在这！从李震尸体被发现开始，围绕他杀还是自杀，就迷雾重重，扑朔迷离；一会儿认定他杀，一会儿又说自杀，让人莫衷一是，简直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最难破的一起死亡案件了！”“怎么会呢？公安部那么多专家，还破不了这么个案子？他杀总有痕迹，枪杀有伤，下药有毒，总该有线索可寻；而自杀总有原因，是工作不顺，是家庭不合，总不会活得好好的，忽然就想死吧？”我说。

“说是这么说，可李震这案子，真是太复杂了，我只能把我知道的讲给你们，是他杀是自杀，你们自己判断吧。俗话说祸起萧墙，李震本是军人，少将军衔，沈阳军区副政委，要是呆在部队，屁事没有。谁知赶上文革，虽说公安部长谢富治还算走红，但主席对公安系统可是多有不满，屡次提出要砸烂公检法。为了改组公安部，中央从军队调了一批人，进领导小组的除了李震，还有工程兵的曾威，21军的施义之等人。从此班子里就分出军队和老公安两派；军队干部根红苗正，看不上老公安的人；老公安以于桑和刘复之为首，又看不上军队干部。两派吵得不亦乐乎。谢富治九大当上政治局委员，公安部的事不太管了，主要由李震主持工作。李震作为一把手，事事需要调解，搞得十分头疼。”“哈，这下有自杀动机了，泥瓦匠的差事最不好干，稀泥和不好，两头受气！”我说。

“可这些老红军都是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久经考验，不至于为了开会吵架就寻短见吧？”人璧说。

“要说是，可毕竟也算个由头。出事头天，领导小组开会，于桑和曾威又吵起来，两人拍桌子瞪眼，争得脸红脖子粗。李震一失踪，两边人都很紧张，都怕出啥事受牵连。部长失踪，群龙无首，倒是谢富治老婆刘湘屏出来主事。地面上没找到，她命令到地下找。结果一个房管员在小东门内一处暖气管道里找着了。那个房管员在黑洞洞的管道里看到李震，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跑出来，赶快向头头们报告。刘湘屏急忙领着几位副部长来到管道口，她要于桑曾威二人下去看看，你们看她多有心眼：军队一个公安一个，互相监督。一会儿于曾二位从管道上来，说李震位于管道内大约30多米深处，半躺半跪，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人已经没气了。于桑立即向总理报告，

总理听说情况极为震惊，说公安部长死在暖气管道里，简直骇人听闻！立即组织专案组，尽快破案！当即由于桑牵头成立破案组，抽调最好的法医勘察现场。打这起，围绕自杀还是他杀，就争论不休。”“这还争论啥呀？明显是自杀嘛！”我挺自信地说。

“喔？你这么有把握？”京辉一脸狡黠的笑容。

“你先告诉我，李震身上有没有枪伤刀伤之类致命伤？”“没有，身上既没有致命的伤痕，也不是中毒身亡。”“那不结了？你们看，这一，他有自杀的原因：工作不顺心，手下老吵架，他压力太大承受不住；这二，他是死在公安部大院之中，这是啥地方？这可是警卫森严重兵把守之地！他又是军人出身，刺客若想杀他，除非一枪一刀毙命，否则只要他一呼叫，哨兵能听不见？既然他身上并无伤痕，而那天晚上哨兵又没听到任何异常声音，说明他不可能是死于非命；这三，暖气管道是啥环境？这我太熟悉了！小时候玩官兵捉贼，我们常躲进暖气管道里。其高不到一米，中间又走着管道，空间非常狭窄，小孩子在里面走都得猫腰，何况一个大人！凶手若想把李震拖进暖气管道里，深入30多米远，几乎不可能。再说，如果隐藏尸体，是为逃脱争取时间，那他只需把尸体藏进管道之中即可，因为平常没人会进去，等搜查搜到，凶手早已远走高飞。他何必辛辛苦苦把尸体拖进如此之深处，还要在脖上勒上绳子，吊在管道上，故意要装成自杀的样子？需知这会留下许多蛛丝马迹，反而弄巧成拙。此案果真是刺客所为，那此人必是高手，一定精心策划，断不会做出这等蠢事。所以李震肯定是自杀无疑！”我这一番分析，得到人璧张颐认同，德起和建生也不住点头，大家一致同意李震是自杀。京辉叹口气说：“老匡，事儿要是真这么简单就好了，其实不然！通过各方面的勘察分析，两边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军队干部认为是他杀，公安部老人认为是自杀，双方各持已见，谁也不服谁。诡异之处，是无论他杀自杀，均有确凿根据，又均有无法解释的问题，李震之死简直像是进入了一个怪圈，令那些破案专家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会呢？自杀他杀都有证据？这不符合逻辑嘛！”我们全都迷惑不解。

“咱先说自杀。实际上，支持自杀的证据，比老匡说的还多。头一条，就是刚才所说，李震身上，除脖颈有一道浅浅的勒痕，从头到脚并无外伤；经解剖，李震胃中有大量安眠药，口袋里还有一些，沾了唾沫，化验证实唾液是李震的，显然是药太多，他没全吞下去，吐出些放回兜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中毒症状，法医判断死因应该是安眠药和上吊双重结果。”

“喔，吃了安眠药，那不是板上钉钉了吗？不是自己吃，他人怎么能把安眠药塞到李震肚子里？”我有些得意。

“这第二条，法医判断死亡时间，是周日晚九点钟左右。而李震离开五号会议室的时间是八点半多，他离开会议室到死亡，间隔时间不长，他不可能走很远。正像老匡分析，公安部大院里岗哨很多，凶手在院内袭击李震，肯定会被警卫发现，可那天值勤岗哨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所以应该是自杀。”听到这，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疑问，

但不想打断京辉，还是听他说下去。

“这三，李震脖上勒的绳子，经勘察，是他办公室的窗帘绳。如果是他杀，那凶手是潜入部长办公室在先，杀人在后，他为何这样做？想勒死李震，随便找根绳就行，干嘛非要跑到他办公室剪下窗帘绳？要知道那里戒备森严，想进去是很难的。从这根绳上看，李震应该是自杀；这四就是老匡刚才分析的，暖气管道空间很小，要把一个大人拖进暖气管道深处，很难，凶手似乎也没有理由这么做。有以上这些，再加上老匡说的有自杀动机，说他自杀是不是合情合理？。”“没错！”大家一致同意。

老黄咕咚喝下一大口茶，润润嗓，接着说：“咱再说他杀。头一条，既然法医判断李震大约在晚上九点左右死亡，那么说他死于安眠药就不成立了，因为安眠药一般不会在很短时间里致人死命。”我点点头说：“刚才我也想到这一点，看来还是吊死的？”“但管道离地面不高，他半躺半跪，身体并没悬空，脖上勒痕很浅，说是吊死的也不太像。”“哈，我知道怎么死的了！”建生突然发话。“你知道怎么死的？”我们全惊讶地看着他。“吓死的呗，不做亏心事，就怕鬼敲门，他肯定遇上鬼了，把他吓死啦！”“不对，是‘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德起又和他较真，大家一笑。

“这第二条，记得当晚两次黑机电话吗？李震接了电话，跟家人说是去五号会议室开会，而且他的确去了，因为他在那用红机和总理秘书通过话。可经查，那天晚上五号会议室根本没开会！”“那是谁打的电话呢？”我问。“他没和家人说，这事成了一个迷，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打电话的人李震认识，且这个人有资格通知李震去五号开会，如果一个陌生人通知他，他肯定会追问，他是部长，一般在五号开会他事先应该知道；第二，既然五号并没有会，那么打这个电话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把李震骗出家来，不就是为了杀他吗？”这条一说，我们原来的立场马上动摇了，黑机电话的确很可疑。

“这三，还得说到自杀原因，李震家庭和睦，十大刚选上中委，政治上也是顺风顺水，虽说领导班子成员间有矛盾，但由来已久，为此自杀似难服人；且李震那天情绪正常，总理秘书说，他和李震通话时，李震谈笑风生，丝毫没有悲观情绪。怎么刚放下电话，就钻进暖气管道自杀了呢？”听到这，我们越发觉得不像自杀了。“第四，李震上吊那根绳，不是用剪刀从窗帘上剪断的吗？可李震出事后，无论在办公室，在通往防空洞的路上，还是在管道内，都找不到那把剪刀了，它不翼而飞了！”

“这第五条最重要。那条暖气管道共有四个出口，一在李震家，一在秘书家，一在五号会议室，一在防空洞。据现场勘察，通往李震家、秘书家和五号会议室的管道里都没脚印，李震不是从这三个口下去的，只可能走的防空洞；可这道上，由于房管员和于曾二位都趟了一遍，地上脚印已一塌胡涂。但据房管员说，他到防空洞时，门是锁着的，他是房管员，有钥匙，是开了锁下去的。”

“什么？”我惊叫起来，如果另三条管道没脚印，防空洞门又是从外边上着锁，那李震是如何进入暖气管道的呢？这事儿简直神了！”

“怎么样老匡？如果断定李震是自杀，那这个案子就真正成了一件密室案：李震是如何进入暖气管道？他没有钥匙，只能撬锁，可那锁没有被撬的痕迹，难道他事先配了钥匙？；就算他事先配了钥匙，他进入管道后，又怎么从外面把门锁上？按常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呀！”

“听你这么一说，倒是他杀的可能大于自杀了。”我有些沮丧。

“可要说是他杀，刚才自杀的理由又该如何解释呢？凶手如何拿到绳子？如何把李震弄进暖气管道？如何让李震吃下大把的安眠药？这些都难以自圆其说呀！”

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禁不住脱口而出：“看来只有一个解释！”

“只有一个解释？是什么？”京辉问。我说：“看来李震的确是自杀，但他的自杀是被逼迫的，或者可以说是自杀中的他杀。”“自杀中的他杀？老匡你把我都弄胡涂了！自杀就是自杀，他杀就是他杀，怎么还会有自杀中的他杀呢？”德起提出异议。“我是说，李震自杀案中，的确有个凶手。这人事先精心策划了‘自杀’的每个环节，比如事先取得窗帘绳，事先配好防空洞钥匙，事先准备了安眠药等等。他在那个秋夜打电话将李震骗出家，逼迫他吃下安眠药，逼迫他走进暖气管道，逼迫他在那里上吊。他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造成李震是自杀的假象。可是百密一疏，他离开防空洞时锁上了门，这一下露了马脚。这人能胁迫李震自杀，想必抓住了李震的把柄，威逼下，李震不得不自杀。要真是这样，那这案子背后，肯定有重大隐情呢！李震是不是第二个谭甫仁呀？”“哈，想象力够丰富的，你可以写推理小说了！可是凶手为什么不在李震散步时就行动？他既然对李震那么熟悉，应该知道李震有晚上散步的习惯，干嘛非等他散完步回了家，再打电话把他骗出家呢？”张颐问我。“这个好解释，如果出去散步没回家，时间长了家人必会寻找；而说去开会，夜里不回家，家人也不会怀疑，这样做显然是要拖延时间。”“那凶手为何要等李震去了会议室才下手？”张颐冲我说。我左思右想，无奈地挠着头说：“这个我也不明白，还是听老黄的吧。”京辉说：“老匡你这个想法倒挺新鲜，不过当时没人这么想，军队干部都认定是他杀且是仇杀，上头也倾向这个观点，可于桑刘复之坚持是自杀，结果没几天，他二人就被逮起来了！”“啊？俩副部长给抓了？”我们都有些震惊。“下面抓得更多呢，像李震的秘书，像房管员，都抓起来啦！抓于刘，是因为他们与军队干部不合，有仇杀动机，而且他们打电话通知李震开会李震不会怀疑；抓秘书，除了他也可能打黑机，还有可能藏匿剪刀；而房管员最倒霉，抓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拿着防空洞的钥匙！你说他冤不冤！”此时窗外有月光透进，树影摇动，屋内墙壁上似有影子起舞。我手枕头下，仰望黑黢黢的顶棚，想象着李震在那个寒冷的秋夜，究竟做了些什么？细雨迷蒙，漆黑的夜色中，他在泥泞的小路上默默走着，身后闪出一个魔影。‘李震，事情败露了，你必须死！’那人的声音像夜猫子。李震脸色苍白，看着那人，不敢反抗。他默默跟随魔影，来到防空洞前。魔影

开了锁，生锈的门张口血盆大口，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李震踉跄地走下管道，魔影打着手电，逼着李震在管道中匍匐而行30多米，逼着他吞下安眠药，逼着他将自己勒在管道上，看着他躺在地上抽搐不已，才悄然离去。这是一个多么冷酷的杀手！

这个杀手会是于桑刘复之？他们能胁迫李震去自杀吗？他们抓住他什么把柄呢？如果李震有什么反革命活动被他们发现，他们肯定马上向中央报告了，这正是打击军队派的好机会，何必要逼李震自杀？这杀手肯定是和李震一条船上的人，或者一起干了什么，或者他指使李震干了什么，当事情要败露时，他只得逼李震自杀，以求自保。若真如此，这人地位当在李震之上，权力比李震更大，曾威施义之肯定不可能，秘书和房管员更是莫须有，那会是谁呢？我越想越觉此案非同小可，绝非我等小老百姓所能弄清楚的。“老黄，这案子到底破没破呀？”我焦急地问。

“破了就好了！这案子越查越复杂，越抓人越多，不但把于刘二人的秘书关了，连部长办公室打扫卫生的都关了，于刘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查个六够。可查来查去，都没有啥线索。到了年底，据说主席听总理汇报案情时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还讲到明朝的三大疑案。主席的口气，有不赞成是他杀的意思。结果风向一转，由原来他杀占上风，变成自杀占上风了。听说今年春天把于桑放了，但刘复之一直没放。所以这案子到底是咋回事，还没个结论。等有了新消息，一定告诉各位，今天太晚了，人璧明天就要去白河堡了，赶紧睡吧！”多年来，李震案件一直烙印在我心里，因为它太离奇、太传奇、令人不可思议。一个负责保卫全国人民生命安全的人，自己却在一个寒冷的秋夜，孤零零地死在狭窄潮湿的地下管道里，这种事，可能只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才会发生吧？他究竟死于他杀还是自杀？我一直想得到确切的结论。终于，在1977年12月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公安部向与会代表传达了中央批准的党组的报告，宣布李震系“畏罪自杀”，李震案至此尘埃落定。

可是，他的自杀是否受人胁迫？那些相互矛盾的线索究竟该如何解释？至今不得而知。如果京辉所述案情属实，那么李震案件完全可以列入密室奇案之中，成为推理小说绝好的题材。只是时代相隔还不够远，为尊者讳，恐怕难以通过审查，只能留给子孙们去写了。

我常常想，如果李震真是自杀，那弄清自杀动机至关重要。说李震是“畏罪自杀”，他究竟“畏”的什么“罪”呢？有个说法，李震是“因追随谢富治参与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我觉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林彪事件发生在71年，到73年8月党的十大之前，林彪集团成员基本清理完毕，凡与其有关的人员，根本不可能出席十大。李震不但出席了，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可见他与林彪并无关联。

时光流逝，岁月更替，随着经历的繁复曲折，我渐渐懂得什么是政治，也懂得自然和人类自身的复杂。今天回头看李震案，我想到，李震如果确系自杀，那么在“畏罪自杀”之外，还有另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比“畏罪自杀”更有说服力，虽不能完全解决“密室”问题，但不失为一种更加人性化的解释。至于这个可能是什么，且让我

也卖个关子，留待以后披露，因为关于它的话题，又足以写成一个长篇故事了。现在还是回到孔化营，继续我的插队之旅吧。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9：

第十七章：建生的苦恼

延庆的节气比京城要晚半个月。近郊六月初开镰割麦，永宁却要到六月下旬。那年七队麦子长势不错，老二爷子领着队干部走了一圈，估算平均亩产在450斤左右，刚好过了“黄河”。（国家在1956年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到1967年，在黄河、秦岭以北地区的粮食亩产要达到400斤，在黄河、秦岭以南地区要达到500斤，就是所谓的‘跨黄河’；要求淮河以南，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的粮食亩产要达到800斤，就是所谓的‘跨长江’，也被人统称为‘跨《纲要》’）

麦子一黄，家家都在磨镰。吃新鲜白面馒头，是一种享受。六月下旬又逢端午，于是磨镰之外，家家又都忙着备黄米和粽叶。农村不重视新节，重视传统节日，因为传统节日都和吃相关。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春节更不用说，有鱼有肉，从除夕吃到正月十五。那年端午是我们插队后碰上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家受社员影响，提前好几天就琢磨着包粽子。永宁不产糯米，包粽子用黄米，学名大概叫黍子，外观类似小米，但有黏性。社员们认为黄米要比糯米好吃得多，油性大，经饿。我们插队头一年还吃的商品粮，没有黄米，端午节每户国家给了二斤江米。国柱又送我们满满一篮干枣，是去年自家枣树上产的，甜极了。每天收工回来，德起都要看看那篮大枣，咽下几口唾沫。这天晚上回来，他望着那篮大枣嚷嚷起来：“老匡，这枣怎么见少呀？”我仔细看看，好像是少了一些，“会不会是耗子偷吃了？”我说。

“是耗子！一只胖耗子！”德起说完，一把揪住建生的脖领，气哼哼地问：“胖子？是不是你偷吃了？”建生一脸尴尬，嘴里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我说你这两天怎么老起夜呢？一晚上尿八泡尿，赶情是去偷枣吃啦！”德起气得要打建生，我忙拽住他说，“行啦，吃点儿就吃点儿吧，不就是个枣吗？别伤了和气！”德起气得直嚷嚷：“那是几个枣吗？那是人家国柱哥一片心意！去年的枣，存到现在舍不得吃，容易吗？国柱哥是送咱包粽子的，可照他这个偷法，到不了端午节，全没了！”我问建生：“建生你老实说，是不是你吃了？”建生无奈地点点头，我说：“既往不咎，但不许再偷吃了，马上就到端午了，到时咱包了粽子，大家一起吃才好！”正说着，喇叭响了：“请五大员到大队部开会”，京辉说快去吧，叫你们开会呢！

自打在广播里讲了一次故事，得到社员们的好评，讲故事就成了我的“第二职业”。当时正赶上江青树小靳庄，搞五大员（理论辅导员、文艺宣传员、革命故事员、广播宣传员、图书管理员），赛诗会、讲故事，热火朝天。知青种地不如老乡，要嘴皮动笔杆可是强项，恰好公社书记高云鹏到大队来蹲点，搞农民政治夜校，任命一批“五大员”；同学中，唐谦当上文艺宣传员，王英进当上理论辅导员，王以然当上广播宣传员，我当仁不让成了革命故事员。不过在农村讲故事不像小时给伙伴们讲故事，不能讲福尔摩斯、儒勒凡尔那，要讲“革命故事”，而那时的“革命故事”，都是为评法批儒编的，没啥文学色彩，情节也不太吸引人，不过农村文化娱乐太少，能有人讲故事，社员总是爱听的。

离端午节还有两天，那天下午，忽然大队传话，说知青办老李叫建生去趟公社。大伙不知啥事，也没在意。我们吃了晚饭，正一起讨论过节的事，建生回来了，一脸疲惫，小眼无光，看上去情绪很低落。我以为他饿过劲，赶紧盛上饭给他，问他公社有什么事，“没、没啥事，”他含糊几句，闷头吃饭。我有些纳闷，一般知青的事，公社老李要找也是找我们高中生，很少找初中生，更不会找建生这样说不出个整话的人。不过他既然说没事，大伙也就不再深究，接着议论过节的事。

“老二爷子说，后天要请咱们吃饭呢。”我说。

“对了，前院孙三她妈也说让咱们上她家去吃粽子呢。”张颐说。

“嘿，要是老社员每家请咱们一顿，一个月不用开伙了！”德起乐了。

“咱不能光吃社员的，咱们也该请一顿。”京辉说。

“对！明儿是建生做饭，记着到镇上拉点肉，咱们把左邻右舍也请请。”我说。

我们一起合计，老二爷子和国柱必请，还有正义叔，开大拖的进明叔。

“二石呢？”我问。

“二石不请！谁让他累咱哥几个。”德起还念念不忘。

“请！别那么小肚鸡肠！”辉京瞪了他一眼。

这时，建生吃罢饭，把我叫到灶间悄悄说：

“老匡，明儿我想回趟家。”“什么时候回来？”“没准。”“那怎么成！马上就要开镰了，刚评上一等，农忙走影响不好；再说后天是端午，正好大伙在一起热闹热闹，你怎么好这时走呢？”“可我家……我家有点事……”他吱吱唔唔。

“你姐姐病了？”他点点头，又摇摇头，使劲抓头皮，就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老匡你俩嘀咕什么呢？”德起在里间问。

“建生想回家呢！”我答到。

“敢！”德起急了，一掀门帘到了灶间，指着建生鼻子说：

“咱哥几个一个锅里搅马勺，过节少了你可不热闹；麦收你想溜号哇？临阵脱逃小心军法问斩！”说完用手朝他脖上一劈，吓得建生一机灵。

“好了，好了。你再坚持两星期，麦收一完就让你走，行吧？”我问。建生不点头，不摇头，进屋躺在炕上发呆。

第二天上工前，我留下个两块钱，叮嘱建生去买肉。上午在菜园子起葱，大伙边干边讨论菜谱：葱头肉片，肉丝炒蒜薹，红烧肉炖粉条，肉末炒豆腐……说得大家直咽唾沫。我有些遗憾地说：“可惜给人璧饯行那顿，把咱种的青椒全吃了，要不炒个青椒肉片，倍儿香！在沈丘，老乡最爱吃的菜就是青椒炒肉片。我小时候不爱吃青椒，可一下干校什么都吃了，有回三连会餐，白米饭青椒炒肉片，我一气干了三大碗，结果消化不良，肚子疼了三天！”“老匡你太秀气，胃没撑开，要是我，吃上十大碗也没事！”德起拍着肚皮说。“你就吹牛吧！等下茬青椒熟了，我给你炒青椒肉片，你给我吃十碗饭，吃不完你是小狗！”京辉说，大家哈哈大笑。

中午收工回户，一进院就见屋前烟雾笼罩。大家吓一跳，以为失火了，跑进屋去，只见建生坐在灶前发呆，秫秸杆把灶膛都塞满了，他还不停地往里续，又不拉风箱，光熰烟。锅里烙的饼，焦碳一般，满屋糊味。大家哭笑不得，德起大喊一声：

“胖子，你发癔症了！？”建生依旧呆坐着，压根没听见。德起上前给他屁股一脚，他才醒过味来，见状大惊，手忙脚乱去抓锅里的饼，烫得啊呀一声叫起来，把手指头放在嘴边使劲吹。我急忙从灶膛里掏出柴草，京辉张颐开门开窗，散了烟。

“做饭可不能走神，小心着火！我责备他。

德起里外转悠一圈，问他：“胖子，肉呢？”“肉？什么肉？”建生两眼直呆呆的，看着怪瘆人。“唉，你忘啦？早上我不是给你两块钱，让你去镇上拉肉吗？”我问他。他嗫嚅到：“我忘了”。

“什么？”德起急得跳起来：“好你个胖子！不准假你就来松蔫坏是不？肉肉你不买，饭饭你胡做，你是一根儿筋就想着走啊？你个死爹哭妈的佞丧种！今不说出个道道儿来，哥几个跟你没完！”“老匡，你让我回趟家吧。”建生抬起头，小眼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你家到底怎么了？火上房了？孩儿掉井了？打雷劈了顶梁柱了？你倒是给个痛快话呀！”德起急得跺脚。

“我姐……我姐……”他吞吞吐吐，嘴里像含个核桃。

“你姐怎么了？要嫁人？请小舅子回去喝喜酒？”“金德起你不是人！”建生突然大怒，一拳闷在德起胸口上。德起也急了，搂住他就摔，两人滚作一团。我们忙把二人拉开，建生气呼呼地跑到后院去哭鼻子，德起也嘟嘟囔囔一肚子不服气。京辉把我拉到一边，说：“事情有些蹊跷，下午你还是去趟公社，问问老李，建生家到底出了什么事，顺便把肉买了。”我点点头。

下午我去迎工点请假，迎工的社员们交头接耳，看见我们来了又都不说话。我告诉老二爷子下午去镇上，二爷点点头，沉默片刻，对我说：“老匡唉，让建生回家吧。”“他家出了什么事，您知道？”我问。

老二爷子滋啦滋啦抽着烟，阴沉着脸，半天不言语。国柱在一旁忍不住说：“他爹自拉自吃！”我没听懂，还想问，京辉捅捅我，示意不要再问。待回屋拿工具时，京辉小声对我说：“听国柱的话音儿，建生他爸乱伦了！”“乱伦？建生他爸？”乱伦这词当时极少用，我一下没反映过来，等琢磨明白，连连摇头说：“不对呀，他爸不是关在监狱里吗？在监狱里怎么可能乱伦呢？”“是不是放出来了？国柱说建生他爸‘自拉自吃’，你想想能是什么意思？”我一琢磨，京辉说的有道理，心中不由一惊。赶快跑到公社找到知青办老李一问，果然如此！

原来建生他爸刑满释放了，在家待业，天天喝酒。前几天酒后乱性，竟把建生姐奸污了。他姐姐没脸见人，喝了敌敌畏，亏得邻居发现早，救回一条性命。那时乱伦是十恶不赦的重罪，他爸二进宫又入了大狱。他姐姐卧病在床，孤苦零丁，由街坊照顾着，捎话来，让建生回去看看。那天公社老李找建生去，就是告诉他这件事，让他火速回城。建生听说此事五内俱焚，要知他九岁时父入狱母归西，是姐姐把他带大的。如今姐姐出事，他能不急吗？可乱伦之事，是极难说出口的，建生本就拙嘴笨舌，碰见这事更不知该如何说，结果社员那边都传开了，我们本户人反到蒙在鼓里。

“你真混呀！你这个户长是怎么当的！”我骂自己，恨不得抽自己俩嘴巴。一看钟点，已赶不上回城的末班长途车。我赶紧拉了肉，匆匆回户。一进门，见建生正光着膀子擀面条，头上围一条湿毛巾，一头乱草龇着，脸上亮晶晶，不知是汗是泪，嘴唇上起了好几个泡。我喉咙堵着，半天说出一句：“今儿和大家一起过了节，明儿回去吧。”大家知道了建生家的事，心里都挺别扭。德起更是不知该如何道歉。晚上请客，大家一个劲儿喝闷酒。正义叔拍拍建生肩膀说：“回去好好照看姐姐，别急着回来”；老二爷子醉醺醺地骂了句：“想不到城里人也有这等潮货！”这一晚上，不断有社员来送粽子，特别都单包给建生一份，嘱咐他带给姐姐。

第二天一大早，我向国柱借辆自行车，驮建生去镇上赶早班长途。天气阴沉沉的，四围山峰烟雾迷蒙，像闷着场大雨。我正使劲蹬车，建生在背后突然问：

“老匡，你说我能写小说吗？”

我一愣，想想说：“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你有恒心，写小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我要能写小说，第一个就写我姐姐，她的命可太苦了！”

建生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心头一热，泪水也噙在眼眶里。自己不知该说什么，只是拼命骑着车，碾过那条崎岖不平的的小路。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6：

第十一章：村北小河

在孔化营村北，有一条小河，日记中将她称作“北河套”。

我似乎一生与河有缘。生我养我的十八号院，大门外就有一条河，现在她叫昆玉河，小时没这名儿，就叫“河”：“去哪啦？”“河边”；“河上结冰啦，去滑冰车吧！”；“昨天我在河里捞到一条大泥鳅！”在十八号院的小伙伴当中，只要一说“河”，就知道是门口那条河，那是我们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童年的梦；童年的梦里，她是那样温柔和慈祥。

到沈丘后，无论在新安集，还是张湾，全紧靠沙河。与昆玉河相比，沙河像一条父亲河，雄浑壮阔，浩浩荡荡。发怒时，他呼啸奔腾，摧枯拉朽；即便平静下来，他跑得也比昆玉河快得多。他赐予我少年的梦，少年的梦里，他像一个不屈的斗士，永远在大平原上驰骋着。

到了孔化营，村北也有条小河，美得不同寻常，神秘、瑰丽、婀娜多姿。说她神秘，因为不知她由何而来，又向何而去？沿永宁向西一路走向孔化营，路边都是青纱帐，你看不到哪有小河，也听不见水声。可一进村，向北一拐，那条河倏地淌了出来，好像清泉从地下涌出一样。记忆中，河是从一片白杨树林中流出，微风从树梢掠过，像水在哗哗响；河水又从另一片白杨树林透迤而去，那树林太茂密，以至无法穿越树林去探寻她的行踪。如果透过树枝间的缝隙向西望去，依稀可见远方那海坨山的倩影，好像这河流到那山去了，但我知那并不可能，于是越发感觉这河的神秘。

小河美在颜色。她置身绿茵中，春天来时青翠欲滴。暖暖的阳光穿过枝头，苏醒的小草上，晶莹的露珠金光闪闪。河水在冰层下润出一抹新绿，五颜六色的野花织着地毯，黄雀在花中跳跃，红靛颏叫得银玲一般。那时躺在草坪上，仰看柳枝上嫩黄的新芽，还有杨树上那白灰色的毛毛，不经意间随风而落，轻轻拂过你的脸，让你心上痒痒，像挨到了姑娘的手。夏天时，小河浓成墨绿色，茂密的树叶在头顶撑起一柄大伞，不管如何炎热，河水永远清凉。一天辛劳后，到河里游一会儿，皎洁的月光随浪花浸满全身，顿消心中的暑气。静坐岸边，听即将收尾的蝉声，和方兴未艾的蛙声，伴着若隐若现的小河流淌声，渐渐的便会有些入禅入静，似乎听到了古刹筝声，叮叮呼咚

咚的，让人心旷神怡。最美是秋天，秋风染遍银杏和黄栌，满林黄叶，随风四散，飞洒在水面上，河水一片金黄；还有水上菱荷，红得醉人，荷上袅娜起舞的蜻蜓，薄翼纱翅，宛若花仙。当花仙子离去时，冬风便呼啸而来，将小河冰封雪冻，天地间一片洁白。

小河更美在旖旎多姿。当姑娘们在河畔捶衣而歌，你会觉得小河也是一位浣纱少女；当羊倌在河套中甩个响鞭，你会觉得小河也是一只温顺的绵羊；小河边是大队的果园，当累累硕果挂满枝头时，你会觉得小河也是一位辛勤的园丁；苎麻成熟了，我们砍下苎麻浸泡在河水里，你会觉得小河也是我们身上厚厚的冬衣。

最惬意的事是在河边读书。万物似很肃静，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哗，没有刺耳的噪音，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流淌的声音。万物又似乎很热闹，风在耳边低语，蜂在花间吟唱，水声轻轻地述说着什么，和着远村的鸡鸣和狗吠。这时倚在杨树下，打开书，一页页读着，似能读出春的芳香，夏的火热，秋的甜蜜，冬的纯净。读累了，放下书卷，掐一片薄荷贴在太阳穴和眼帘上，丝丝凉意沁人心脾，摘一朵蒲公英轻轻吹去，那一缕缕银丝便将思绪牵向天边。那时忽然顿悟，人世间的一切都像这轻丝，转瞬即逝，只有精神可以永恒，只有小河的水，永远流淌。

我最喜欢在小河边读《诗经》，那些诗就像专为小河而写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念着念着，就想到《红楼梦》中说女子是水做的，望着汩汩西去的河水，仿佛水雾朦胧之中，就有古装女子，一抹青丝，低眉敛目，凌波微步，在暮色中款款走去了。那时天地万物静谧而安详，景色美得像梦。

插队很艰苦，吃不饱，睡觉少，干活累，没书看，生活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种种烦恼走马灯般你来我去。遇到心烦时，独自一人走去小河边，看看水洼里的小蝌蚪，无忧无虑地游着；机灵的小河虾从水草中窜出，转瞬间又钻进另一丛水草中；泥鳅不紧不慢地在水底滑行，一有动静，眨眼间便失去了踪影……；那时童心又回，一切烦恼皆烟消云散，小河用她神奇的手，抚平我心上所有的伤痕。

三十年后读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书中有美妙如诗的描写：“我眼中的湖水滑落了它夜色的雾衫，渐渐地，它柔缓的涟漪，或它亮滑如镜的湖面，在远近各处清晰起来。此时的雾霭，如幽灵般悄无声息地隐没于森林中……这是康科德桂冠上最璀璨的一颗钻石”；看到这，我禁不住在心里说，我的孔化营的那条小河，也如这瓦尔登湖一样，是一颗璀璨的钻石呀！

大洋那边，张颐留帖说，“有机会一定来我们现在这里，看看50000人的城市是什么样。时值当下，这里简直是花的海洋，周围雪山，国家森林和太平洋的波涛，油画般的农田，葡萄园，牧场和牛羊。大城市的人来到这里个个留恋忘返。一直记得刘岩说喜欢小城镇，来吧。”从张颐的寥寥数语中，我能想象出，他所在的小城有多么美。这些年我也走过一些风景如画的地方，像碧海蓝天的夏威夷，阳光明媚的黄金海岸，清澈见底的普卡基湖，银装素

裹的北海道，都美得让人惊叹，让人留连忘返；但那毕竟是异乡之美呀，看过后，会渐渐淡忘的；而在我心中永不湮灭、永远美丽的，是我的孔化营的那条小河！

第十二章：北望东灰岭——清明节写给瞿建平

夫子日记：1974年10月21日：

“今早六点半，张颐打来电话，告我他先去车站买票，上午11点半那一趟，在北郊车站见面。我于11点赶到北郊，张颐已经买好票了。他一见我就问有没有听说东灰岭的事？我说没有。他告我东灰岭的大日野出了交通事故，死三人，其中一个是知青，而且是和我们一届的，他不知姓名，只知是二班的女生。二班女生我只认识何晓军，但印象中她好像不在东灰岭，才女，但愿没事。事也凑巧，在车上遇到一位伤号，恰好就是东灰岭的，当时也在日野车上，翻车时甩了出来，大难不死，但摔伤了，在北医看的伤，一问竟还是星的二舅。东灰岭是学大寨先进，县里奖励一辆大日野，车去北京，大队没有司机，请给县头头开车的司机帮忙，村里一个开大拖的跟着，半道上开大拖的手痒，想开，司机就让他开了，结果开翻了，摔到山沟里了。正聊着，车到了麻虎寨，上来一点，正是出事的地方。正好司机要方便，把车停下来，我和张颐下车探看，果然看见一辆车躺在沟底，那沟足有几十米深，挺大一辆卡车，在沟底就像一辆小玩具模型，已然摔得不成样子，特别是车头整个摔瘪了，而且似乎还烧过，漆都熏黑了。站在路边，风很大，很冷，想到死去的知青，当时情景一定很惨，心情很不好。问社员死者的名字，他说叫什么平，看来肯定不是何晓军了。下午三点到孔化营，到六点缝了两床被子。晚上唐谦北辰来。”

妹妹，你在天堂好吗？

开始写《我的孔化营》时，就想到除了写三班的同学，凡日记中出现的另两个班的同学，也都要写一写。虽说三班在一五0只有一年，大家自嘲是后娘养的，可实际上母校对我们疼爱有加，一二两班同学与我们也相处甚欢。本没计划外班同学先写谁，心想看谁在日记中先出现吧，也没有特别留意。可不知咋地，今天将“村北小河”发上博客后，心中总有些恍惚，好像有什么事忘记了。吃晚饭时夫人说到明日清明，要给保母放假，我心里忽悠一下，不知怎么就想到了你！放下碗去翻日记，竟然愣住了，在夫子日记中，一二两班女生，第一个出现的竟是你！

准确说，何晓军的名字在你前边，可提她的起因在你；准确说，你的名字并没有完整地在我日记中出现，因为那位老乡只记得一个“平”字，可一个字已经够了；准确说，我根本不认识你，没见过你的容貌，没听过你的声音，没和你说过一句话，所以我根本写不了你；可当灵魂升入天堂时，天地间的对话完全是心灵的感应，一切人世的阻隔都不复存在。所以与其说是我想到了你，不如说是你呼唤了我，或许是你在天堂也读到了我的回忆，我的回忆让你想起了如烟的往事？

亚初曾将你的墓碑照片放到班网，我读了碑文，知道你小我两岁。算起来，你插队时刚十七岁，十七岁的女孩，一棵娇态可掬的小草。青春像正要绽开的玉兰，纯洁而纤弱。我努力想象着，在麻虎寨那个悬崖峭壁间，一个纤弱的姑娘，怎样像羽毛一样飘然而落，额头吻了一下岩石，就长眠不醒。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到工程处后我听说，快到麻虎寨时，你刚好和高三幸换了一下位置，不知是她怕冷还是你怕冷？就这一换，三幸毫发无损，你却走了。

那年我站在麻虎寨的山路上时，你已经不在，我只感到深秋的寒风掠过我的脸颊，撕扯着我的衣衫，扑打着我的胸膛。我看到石缝中有星星点点的红色，不知那是花？是叶？还是血？虽然素不相识，但我心中却隐隐作痛，因为你是我的校友，是我们高中三个班的小妹妹，半年前我们是一同走出校门，同一车队穿过崇山峻岭，满怀壮志来到永宁。而今壮志未酬，你却走了，十七岁的花季，青春怎会如此短暂？真是“一片花飞减却春”呀！

我没有到过东灰岭，但山上的村庄，定比我们孔化营更艰苦些。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女孩，忽然投身在一个穷乡僻壤，你要克服多少困难，远非我能想象。一班网上有一张泗司的老照片，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山里，道路坎坷不平，夕阳西下，将斑剥树影投射在小路上，天地苍黄，万物萧瑟。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常常看她，也常常想到在山村插队同学，尤其是女生们，是如何日日走在这山间小路上，上工下工，挑水挑粮，住在四壁漏风的陋室中，吃着贴饼子就土豆，那样艰苦的岁月，该是有怎样的毅力才能挺过来？

记得在二班网上看到过孔砺同学的一个帖子，她讲了一个“馋丫头”的故事。她说那时不习惯窗户纸，在炕上活动时老把窗户纸捅破，最后到了千疮百孔，姐妹们决定糊窗户。不知是赵玉霞还是高三幸，用白面打了一小锅浆糊，浆糊比较烫，让一旁准备糊窗户的姐妹们不得不耐着性子等着，不知是谁，试温度时手指头上粘了浆糊，不由自主地把手指放到嘴里,发现很好吃！于大家你一指头，我一指头的，浆糊没凉全吃光啦！没办法只好再打一锅。这回赵玉霞大管家有责任心，两手护着锅，不准大家再吃，总算把浆糊保护下来，把窗户糊上了。孔砺说：“现在想起来那热乎乎甜丝丝的浆糊确实味道不错！”当我看到这个帖子时禁不住笑了，但笑过后，心里又有些酸。我眼前清晰地浮现出一群姑娘抢着用手指蘸浆糊的情景。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其中，只知道赵玉霞是在东灰岭的，想来你应该是其中一员吧？如今我们都回城了，生活都好得多得多了，回忆往事就有了苦中有乐的心态，可当时的那种酸甜苦辣，不是亲身经历，谁能道出是啥滋味呢？

到如今人世的路我已比你多走了三十多年，头发快要花白，近视眼又加了老花眼，牙齿也到了少吃肉多喝粥的地步。有时想想，人要是不会衰老该多好呢？从这上说，或许你当年的离去也是规避衰老的一种方式吧？同学们相聚时，一群老头老太太，只有你还是十七岁，谁也不知你老时的模样，因为你不会老。在班级相册中，人人一脸皱纹，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只有你鲜花一样向我们微笑，让我们看到自己几十年前的影子。返程的车票已经装在口袋里，你在终点站沏好了茶水，我不知哪一站是我生命转弯的地方，但只要能在重过麻虎寨时摘一朵小花，此心已足，拥有她，便拥有了整个花季！

到如今你已在东灰岭的南山上静卧了三十多年，我知道每年清明节，二班同学都会向东灰岭眺望，为你采一束你喜爱的菊花，伴你说几句悄悄话。我不是二班的同学，和你也素不相识，却不知为何在这清明将临的深夜，写出这样一篇文字。或许你不只属于二班，你是全年级的小妹妹；我也不只属于三班，我是母校的儿子。一五0中学七三届高中生皆为兄弟姐妹，即便不曾相识，那亲情友情却让大家心有灵犀！

还记得超尘老师为你写的悼诗吗？老师现在和你同在天堂，想必他一定将那诗念过给你听吧？当年老师的诗被同学们传阅抄录，07年康红同学把她登在班网上，我得以拜读。今晚，我北望东灰岭，又想起超尘老师那悲痛的诗句，就让我诵读那最后一段，作为我，一个你不认识的哥哥，在清明时分，对小妹的祭奠吧：

霹雳心炸碎，长风头晕眩。长夜不能寐，身影常浮现。

悼忆瞿建平，心潮随浪翻。燕雀避风雨，雄鹰高飞旋。

崎岖永宁路，坎坷困难关。奋斗有代价，牺牲重泰山。

悲痛化力量，革命志更坚。来日展宏图，战友互赠勉。

相关图片请移步作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1467b0100cx4k.html

庄生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

第十八章：人虫之战

建生只在家呆三天就回了村。“真不懂事！你不好好照顾姐姐，这么快回来干嘛？”我埋怨他。“我姐不让，她说我刚评上一等，麦收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非赶我回来”，建生一脸委屈。我想想说：“也好，等忙完麦收，多放你几天假。”麦收最怕连阴雨。那年麦子长势好，社员们都盼着响晴薄日的艳阳天。谁知要开镰了，老天偏又捣鬼，一连三天细雨绵绵，闷热潮湿，让人透不过气。大片小麦长了霉病，再不及时收割，怕是要白面变黑面了。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社员们为收麦发愁时，玉米地又闹了黏虫。

6月28日开镰，头天老二爷子把玉米地转悠一遍，心急火燎地来找我。“匡唉，咱队玉米地黏虫实在多，明儿个就开镰了，队里实在抽不出人手，可黏虫不能不治，夏粮损失秋粮补呢。一定得打药！这打药的活，说实话，熏人，没人爱干，可又得要个实在人，要是用那偷懒耍滑的，怕挨熏少搁药，虫子没杀死，庄稼可就完了。”“您想派谁？”我问。老二爷子看着我，似乎有些为难，“你和建生，行不？”“那有啥不行，您是队长，您派活就是了，不就打药吗？行！”我满口答应。老二爷子松口气，掐着手指头把地块数了一遍：北菜园，南拐子，河套，庙台，大隔岭，西南圈，金宝地，石家坟……统算一下，约有三百多亩。“明儿一早你去找保管，领喷雾器，黏虫粉不知有没？没有赶紧去镇上买，量一定使足，黏虫闹得太邪乎，一棵老玉米，眨眼就成光干了！”他叮嘱到。

晚上，天晴了，月光挺亮。京辉、德起拿着镰刀在青条石上磨，我和建生不用割麦了，悠闲地坐在枣树下，和京辉他们逗趣。东院里，荷莲又在呜呜地吹柳叶，小曲渗着浓郁的乡土味，悠悠飘过墙来。

建生说：“德起，明儿你起得早，下炕时瞅着点，别踩着我。”德起试试镰刀，朝建生比划一下说：“胖子，别美！那打药可不是什么好活，熏人着呢！”张颐说：“老匡，有口罩吗？打药时戴上口罩。我在干校干过这活，干长了是头痛。”我想想，还真没备口罩，“我有一个，给你用吧”，张颐说。建生问：“我也没口罩呢，你还有吗？也借我一个？”张颐摇摇头。德起说：“你不用口罩，就你这猪八戒的身子骨，百毒不浸！”我笑了，对建生说：“我管打药，你管挑水，把水供上你就一边歇着去；”“建生乐呵呵地对德起说：”还是户长疼我，德起你好好学着，别老略待人！”大家又听见一新词，都问德起：“略待人怎么讲？老北京土语？”德起挠挠头，“我还真

不知道；”“略待人呀？就是老欺负人，老折磨人嘛！”建生为我们不懂“略待”而惊讶。张颐噗哧一声乐了，“我知道建生说的是啥字了，虎字头，雪字底，对吧？”我听了想想，也笑了说：“雪字底是反的才对；”京辉也明白是啥字了，哈哈笑着说“建生你别老略待我们成不？你天天发明新词让我们猜，这就最大的略待呀！”大家笑够了，我想起件事，忙对大家说：“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二爷今天说，等夏收完了，就要上山采石料，准备给咱们盖新房了。”“万岁！”德起高兴得翻了个跟头。

“知道盖哪吗？”京辉问。“听说是在迎工点北边，那不是有块空地吗？”我说。

“我倒觉得这老房挺好，有个小院能种菜，还能听荷莲吹柳叶”，张颐望望东院，不无惆怅地说。

“离国柱家也远了，我挺爱听他说笑话呢”，京辉望望西院，也是恋恋不舍。

东院的柳叶声悄然而止，大家都不说话，只听见村口池塘一片蛙声。

（当年插队时，国家给每个知青500元盖房钱。我们户六个人，一共三千元。三千元盖起三间又高又大的砖瓦房，可想而知那时的物价有多低，搁现在，三千元买根房梁都不够！）

第二天一早，我领了喷雾器和黏虫粉，带着建生去打药。田野里到处是割麦的社员，走过七队地头时，见社员们一字长蛇割得飞快，京辉和德起与壮劳力摽着，一点不落后。
来到北菜园。说是北菜园，其实是挨着菜园的玉米地。这离河套很近。建生到河边去挑水，我进地里查看。太阳刚从地面露头，晨雾淡淡，晓风徐徐。齐胸高的老玉米，伸展着宽宽的绿叶，叶面一层白绒，闪着亮晶晶的露珠。我发现一些叶上伏着许多寸把长的虫子，样子像蚕，褐色的头，背上黑色条纹，抱着玉米叶咔喳咔喳啃着，犹如蚕食桑叶。一片宽大的玉米叶子，片刻功夫就被咬得残缺不全，软软的耷拉下去。我看看四周，到处都有黏虫，整块庄稼地仿佛都在痛苦地呻吟。

建生挑来清水，我接过水倒进喷雾器，按着保管员的嘱咐，兑上四分之一袋黏虫粉。我蹲下身背起喷雾器，对建生说：“虫多得很，上午得把这块地打完，你别怕累啊”“没问题，这离河套近，挑水不累！”建生说。

我戴上口罩走进地里，左手上下按动手柄，右手持着喷管向玉米喷洒。药水喷洒在叶面上。黏虫顿时不动了，抽搐着纷纷坠地。我笑了笑，小声说：“小东西，你们能祸害庄稼，可你们打败不了人！”太阳慢慢爬上了头顶，早晨的一点凉风没了，天渐渐热起来，脚边的露水也变得暖烘烘的。喷雾器的盖子生了锈，有个洞，随着我的走动，药水便从洞中溅出来，顺着脖子淌到后背上，沙得皮肤又麻又痒。农药的气味越来越呛人，尽管戴着口罩，还是挡不住气味。反而因为戴着口罩让人很憋气。玉米叶很拉人，所以我穿了一件长袖衫，脖上系了一条毛巾，那喷雾器灌满水时死沉，勒在肩头很不好受。在垅中一个来回，一桶水就用完了。这块地有二十多亩，我算了算，估摸着要七八挑水，半天完活够紧张的，可必须快点干，队里三百多亩老玉米都在挨咬呢！

我加快按压频率，让药水喷得猛些，使自己走得快些。结果更多的药水从盖上溅出，从脖上流到背上，从背上流到腿上，弄得全身像泡在农药里。我暗暗诅咒这个倒霉的喷雾器，拔些草塞在那个破洞上，可水仍不断从缝隙中渗出。我看看地上的黏虫，自嘲地说："看来等我把你们都消灭了，我也被毒死了！"建生忽然高声喊起来："老匡，你快来瞧瞧，这虫怎么都没死呀？！"

我赶紧打完药，快步走到建生旁边细瞧，果然，刚才掉在地上的黏虫竟都活了，趾高气扬地沿着玉米杆重又爬上来，那高昂的头像在嘲笑我："你这个笨蛋，别想打败我们！"是药放得不够？还是黏虫有了抗药性？我抄起药袋子，把大半袋黏虫粉全倒进喷雾器里，灌水搅匀，冲着黏虫一阵猛喷，刺鼻的药味顿时弥漫开来，粘着药水的虫子剧烈地扭动，蜷缩着滚落在地，一动不动了。我俩等了一会儿，确信虫子死了，才松了口气。我背起喷雾器，对建生说："亏你看了看，不然咱们就白干了。""搁这么多药，别把你熏着！"建生担心地说。"如果我死了，你可要替我作证，我不是马虎，也不是想要自杀，我是因公牺牲，咱也当个烈士"；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老匡，别吓我，我可胆小，不会有事吧？"建生人实称，听我这么说，还真有些害怕。我哈哈笑起来，说："没事，熏不死人！"说完，戴上口罩走进田垅。

活还得从头干。太阳变得火辣辣的，地面卷起风，把药水吹到脸上，呛得透不过气。渐渐的，人变得麻木，喷雾器越来越重，肩膀勒得生痛。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必须使劲呼吸，全身被汗水浸透。索性脱光膀子，扔掉毛巾，机械地按押着，喷洒着，眼睛只盯着在药水中挣扎的黏虫。垄沟长得像马拉松赛道，我像接近极限的跑者，眼前是铺天盖地的黏虫，黑压压地在周围蠕动。"人不会被打败！"我在心里呐喊着，在虫阵中孤军奋战。

终于打完这块地，我把喷雾器一扔，躺到在地上，一动不动。建生趴在我耳边使劲喊："老匡，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睁开眼，冲他笑笑，"没事，就是有点累。下午打河套，我不回户了，你把饭带来，我在河套歇会儿。对了，你告诉保管，黏虫粉不够，让他赶紧去镇上买，多买点！"建生点点头走了。

我缓上气来，挑上水桶和喷雾器，走向北河套。我走进杨树林，来到幽静的河边，放下挑子，看看四周无人，便跳进水里，河水清凉碧透，汗水和药水被清波荡净，精神为之一爽。我舒适地放松全身，躺在水面上，让穿透树冠的阳光抚摸我的脸。漂浮一会儿，看见不远处有一片浮萍，中央有一朵粉红色的莲花，那幽静和华丽的景色极富诗意，我不觉轻轻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一诗诵完，身上轻松许多。

天擦黑时完了活。因为离水源近，建生很轻松，抽空在河边采了许多蘑菇，用苇叶拴成一串挂在扁担上，带回去做汤喝；还拔了一梱草喂兔子。我背着喷雾器，远远地落在后面，疲惫让我想起和二石薅地。我能把这几百亩地打完吗？这不像和二石打擂，有同伴一起，如今要一个人打完这几百亩地，似乎孤立无援，想到这，浑身都在酸痛。

回到户里，张颐熬得一锅绿豆汤，搁水缸里镇凉了，给我盛上满满一大碗，还特意加了两勺白糖。“老匡，赶紧喝，解暑解毒，去病败火！”我接过来一饮而尽，学着红灯记李玉和，来了句台词：“谢谢妈！”这碗绿豆汤下肚，忽然身上又有了劲，忙又牛饮两大碗，张颐瞧着直乐，“还喝不？”他问。我连忙摇手，“给京辉德起他们留点，他们比我累”。张颐问：“打药够呛吧？”我苦笑一下，“赶上个破喷雾器，一个劲漏！”“要不明儿你做饭，我去打药？”张颐说。“甭，你有荨麻疹，沾农药容易过敏，我反正熏了一天了，适应了，干脆熏到底，这叫以毒攻毒，死猪不怕开水烫！”连着打了六天。每天收工，不论身体还是精神，似乎都要崩溃。“明早上一定去找老二爷子，对他说：我不干了，换人吧！”每晚躺在炕上我都在心里说。可第二天起来，总又咬咬牙，背上喷雾器，和建生杀向玉米地。天气闷热潮湿，农药浸透皮肤，身上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大伙开玩笑说我像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将来我死了，你们告诉医院，不用冷冻，我的肉不会烂！”我傻乐。

第七天傍晚打完西南圈，我终于松了口气。只剩西山脚下的石家坟还没打，那块地不大，半天轻松完活。虫灾基本止住了，社员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像打了胜仗，得到一枚勋章。

晚上京辉德起加班打场，张颐也去帮忙。我正洗衣服，二石匆匆赶来，对我说：“石家坟那块地黏虫黑压压一片，都滚成团了，今天再不打药就没救了！”我一听，赶紧对建生说：“走，咱们加个夜班。”“去哪打呀？”建生耳背，刚才没听清二石的话，问我。

“石家坟，不就剩这一块了吗！”我大声说。

“晚上打？”建生眨巴着小眼问。我点点头。建生挠着头说：“老匡不能去，石家坟晚上闹鬼！”“哪有鬼？你见过？”我以为建生开玩笑，可建生一本正经：“真的！听柱子说，前些日子山上那个女尸就埋在石家坟了，二臭说，他有天晚上从石家坟过，听见女人哭呢！老匡咱还是明天去吧！”“明天庄稼就成光杆了！甭听柱子二臭瞎说，他们逗你呢，案子没破尸体怎么会埋呢？再说又不是让你一个人去，不是还有我吗？我给你做伴，怕啥？”“你瘦我胖，二臭说鬼喜欢找胖子，血多肉多！”建生让我哭笑不得。我看他真是害怕，无可奈何，只好说：“好在那块地不大，有四桶水够了，你去国柱家借水桶，咱俩挑上两挑水去，挑到那你就回来，行了吧？”“你不怕？”建生不相信我的话。

“有什么好怕的？世上本没鬼，全是人自己吓自己。有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等我回家给你拿来，你好好看看。”我说。

于是建生借了桶来。我俩到村西口挑上水，直奔石家坟。到石家坟天已全黑，月亮爬上来，大地一片银光。郑柱岭上偶尔传来几声夜猫子叫，听着挺瘆人；夜风拂动树梢，呜呜作响。建生放下水桶，转身就往回跑，边跑边回头说：“老匡，二臭说，听见鬼唱歌，你就也唱歌，鬼就不缠你了！”“鬼建生，这么胆小！”我笑着摇摇头，走

进地里。借着月光看去，不禁吓了一跳！只见玉米上密密麻麻全是黏虫，许多叶子已被咬成秃杆。我赶紧背起喷雾器，把药水兑得浓浓的，下地干起来。

一阵乌云遮住月光，大地被黑暗笼罩，我看不见黏虫，只听见它们咀嚼的沙沙声。周围逐渐变得漆黑一片，我摸索着，在田垅里深一脚浅一脚走着，有时会踩在土包上，我知道那是坟头。寂静中，除了药水喷洒的声音就是风的哗哗声。远处不知什么野兽嚎叫起来，让人毛骨悚然。我知道山上没有狼，顶多有狐狸和獾，但经过黑暗的包装，所有声响都让人想到鬼哭狼嚎。建生说唱歌能驱鬼，我知道那不过是为自己壮胆罢了，但此时此刻，我也不由自主大声唱起来："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突然一物从垅里窜出，疾速逃遁，把我惊出一身冷汗，险些坐个屁股墩。定神想想，大概是野兔或黄鼠狼，不觉感到可笑，为何变得胆小了？抬头眺望四周，黑黢黢的群山包围着我，知道是孤独让自己胆怯，尤其黑暗中的孤独，更让人丧失勇气。

这时，新华营的广播响了，夜色中传来一个姑娘的声音。是李明明！在这黑暗的田野里，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仿佛走夜路时忽然看见了灯火，让人一下有了前行的勇气。李明明念了一段报纸，是批判晋剧《三上桃峰》的。她的嗓音不像以往那样清脆，变得有些沙哑，"看来她也很累！"我想。随后，她播放了一段芭蕾舞《白毛女》的音乐，这乐曲让我呆住了，她一下把我带回到豫东平原，带回到七一年的那个寒冬。

豫东的寒冬，阴霾低垂原野，沙河只剩一线细流，河岸边，一孔旧砖窑；砖窑旁，一座破茅屋。我独坐在茅草屋中，守着一星火光的小煤炉，听朔风在田野里咆哮。那时我刚从"反标案"中脱身，孤身一人回到林场，在茅草屋中度日。黄毛和庄重去了青海，十多个朝夕相处的同学回了北京，忠心耿耿的虎子也离我而去，我真有些举目无亲。那年冬天冷得出奇，寒风天天在原野上呼啸，大雪一场接一场，将道路封闭。破茅屋四壁漏风，屋内竟也滴水成冰。煤很少，火不敢烧旺，我整日拥抱奄奄一息的炉火，望着窗外光秃秃的泡桐，一边舔着心灵的创伤，一边思念着友人。

寂静孤独中，和我做伴的只有半导体。有一天我打开半导体，蓦然一阵深情而又激昂的交响乐如奔泉飞瀑倾泄出来，那管乐雄壮高亢，那弦乐哀怨悲怆。两个声部此伏彼起，相合相衬，宛如一对老友邂逅，既有泪雨倾盆，又有笑容满面。不知为何，这段音乐让我忧郁的情绪为之一振，心头忽有几分温暖，几分欢乐。我的身心沉浸在那优美的旋律中，曲终人寂，余音绕梁。后来我把《白毛女》从头到尾听了一遍，知道了这是大春和喜儿在山洞相见那一段。爱情赋予音乐永恒的魔力，在那样一种孤独的环境，那样一种悲哀的心态之中，那段音乐竟如一付良药，驱除了我心头的灰暗，也让我永生难忘。

此刻李明明播放的正是这段音乐！难道她知道我在黑夜中独自劳动？知道我对这段音乐情有独钟？我笑了，明白自己在胡思乱想，她播放这段音乐纯属偶然。但我相信，她一定也喜欢这段音乐，她的心也产生了共鸣。

音乐给我勇气，我不再感到害怕，专心致志地打农药。可不想鬼的事了，疲劳又来捣蛋，从天亮到现在，已经连轴干了十多个小时了，衣服被汗水和药水沤得不知啥味儿，贴在身上粘粘的，仿佛自己也变成一只大黏虫。由于暗不见光，看不见喷洒出来的药水落在哪，有时神情恍惚，以为那药水正喷向自己，想象自己像黏虫一样在药水中挣扎，最终倒在地上。“呸！为啥最后一块地叫石家坟呢？我可不愿和骷髅做伴，要死也应该死在北河套！”忽然，远处有两三点亮光闪动，初看以为是鬼火，再看觉得不像，那亮光不飘不散，始终聚着，像几道光柱，且由远近，移动很快。“莫非是动物的眼睛？”我心里揣测，马上又否定，那要是动物的眼睛，这动物一定是个巨毋霸了！正在疑惑，忽然听见远处有人呼喊：“老匡，你在吗？”我听出是京辉张颐和德起的声音，马上明白那亮光是他们打的手电，高兴地喊起来：“我在这呐！”原来京辉他们打完场，听建生说我独自一人在石家坟，气得把建生数落一顿：“你怎么把老匡一个人扔在坟地？有鬼没鬼先甭说，干完活，背着喷雾器，再挑两付桶，还不累死？”说完大家赶紧来接我。见到伙伴们，我一松劲，一屁股坐在地上。京辉忙将喷雾器接过，三下两下将剩下几垅打完。此刻云消雾散，繁星满天，大家踏着月光，说说笑笑回村了。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11：

第十九章：班长陆惠敏

（1）

夫子日记：

1974年8月3日：“今天突然通知到公社办学习班，培训故事员。大队去了三个人：王英进、陆惠敏、我。”1975年8月27日：“天气已渐渐凉爽。今天一天在稻席浇水，一边浇一边想《海赋》，把第二章第一节写完了，标题暂定‘海燕凌云’。昨晚德起早早就躺下，看着好像有些不舒服，问他是不是感冒，他说只是有点拉肚子。我也没太在意。夜里三点多钟，德起把我叫醒，说他大便中有血，吓了我一跳！摸他的头，很热，一试表，40.2度！大家很着急。我和张颐赶忙跑到五队去叫陆惠敏，说实在的，深更半夜去女生户，真不好意思，可德起的病情不明，万一耽误了怎么交待？陆惠敏听说情况拿着药箱来了，看了看，说可能是急性痢疾，打了两针，又吃了点药，说等到早上看。后半夜睡得蒙蒙胧胧，老怕德起有事。到早上摸摸他的头，不那么热，烧竟已渐渐退了，大家全都松了口气，建生说，老匡你们陆大夫真是伯乐在世，妙手回春呀，说得我们莫名其妙，京辉反应快，说应该是华佗在世吧？伯乐是相马的呀！建生连忙说搞错了搞错了，把陆大夫当成兽医了，大家笑作一团。”在插队日记中，第一个写到的本班女生，是班长陆惠敏。按照日记中出现顺序来写插队同学，女生第一个，自然是写陆班长。男生第一个写了唐书记（指七队之外的男生），女生第一个就写陆班长，这可能是巧合吧？不过，翻遍插队日记，写到陆班长的，也就是上面那两段，除此之外，再无记叙。

说来惭愧，07年授命打捞同学时，先想到的男生是唐谦，因为他是书记；先想到的女生是张青，因为把她当作了班长。我在班网贴帖子，问有谁知道“张青班长”的消息？王英进马上纠错：“班长是陆惠敏呀！”看到英进的帖子，不觉坐在电脑前发呆，有点“罪该万死”的感觉，自己好歹也是班委呀，怎么会乱点鸳鸯谱，把班长都搞错了？打开班级相册，看着陆惠敏的照片，自言自语：“老陆当过班长吗？老陆去过孔化营吗？老陆后来上哪啦？”也难怪我对老陆当班长的事没印象，因为老陆实在不太符合我心目中班长的标准。按任命惯例（我想三班班长应该是任命的吧？全是五湖四海，谁也不认识谁），班长一定得是尖子生，德智体都拔尖，还要能组织，能鼓动

（现在叫“忽悠”）；譬如一班班长张晓露，二班班长马向阳，还有唐谦，都是。而老陆似乎不是，掰着指头数三班女生，论学习，论文体，好像老陆哪一项都不拔尖，哪一项都不拔尖的人，怎么当了班长呢？

也难怪我对老陆插队的事没印象，因为老陆在孔化营也实在是不显山不露水。她不像老唐那样当到大队团支书，还入了党；她好像也从没参加宣传队跳舞唱歌，她不像王英进能站在夜校讲台上侃侃而谈，也不像王以然会在大队广播中讲故事。如果不是日记中记了她给德起看病的事，我根本想不起来她还干过赤脚医生。所以，让我写唐谦，我能写出一箩筐；让我写老陆，恐怕就像拧一条经过甩干的毛巾，实在挤不出几滴水来。逝者如斯，三十多年岁月，早已把我大脑中有关老陆的记忆，洗刷得一干二净了！

不过，这三十多年人生历炼，倒是让我明白了，为啥老陆能当班长。干部有两种，有红花型的，适合当头头；有绿叶型的，适合当副手。这秉性几乎是与生俱来，从娃娃起就已经命中注定。一套班子里，有一个红花，一个绿叶，关系就比较和谐，工作就比较好做；俩全是红花，容易不服气；全是绿叶，又缺少主心骨。老唐大概就属于红花型，走哪都是当头的命：在三班当支部书记，到了孔化营还当书记；上大学不知是不是书记？不过一不留神差点当了驸马爷；到美国没书记可当了，转身当了老板。老陆恰好是绿叶型，拾遗补缺，任劳任怨，不图名利，不出风头。我从没见她和唐谦争执过，不光对唐谦，无论对谁，她都是和颜悦色、慢声细语、不急不恼；如此涵养，也不是一两天能修炼出来的，凭这一条，这班长就当得。

07年校庆，和王本中老师聊天，他说在高二一当班主任时，书记蔡念闽和班长张晓露老是吵嘴，他经常居中调解；我就想，大概老蔡和晓露都是红花，不吵才怪，不过后来吵成了一家人，倒也应了那句不打不相识的老话。二班的团支书我不知道是谁，如果也属红花型，不知和马班长吵不吵嘴？反正唐谦实在应该感谢任命陆惠敏的老师（不知是不是陈云澄老师？），深谋远虑，知人善任，唐支书和陆班长同舟共济，相辅相成，才有三班安定团结的73年。

毫无疑问，老陆是班长；毫无疑问，老陆在孔化营插过队。不过接下来我要写的，不是陆班长在孔化营的故事，因为前面说了，她插队的事我早忘得一干二净。我要写的是07年寻找陆班长的故事。当年文革结束，三班48位同学，飘萍四散，大多失去音信。母校九十华诞，在网上建立校友录，王琍在大洋彼岸启动打捞工程。到如今，除一人去世，已有45人重返班集体，剩下娟娟梁琳2人，也有了下落，这个大团圆来之不易。在打捞同学的过程中，有很多趣事，其中顶数寻找陆班长最精彩，最富戏剧性，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其结果印证了那句老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2）

事情要从前年说起。07年的今天，中午我接到个电话，对方女性，声音挺脆：“你是匡卫群吗？”我听了便有

些诚惶诚恐：这么称呼我，少见！一般外人打电话，总爱叫先生或主任，没人会直呼大名的，可见来者不善。我赶紧恭敬回答：“我是，请问你是？”“我是王琍呀，你听不出吗？”对方好像和我挺熟。“王琍？”我的大脑飞速扫描：“女性、中年、王琍”，想了半天，想不出是谁。“抱歉，实在想不起来，您能说的具体点吗？”“你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老同学？”大脑再次搜索：羊二小？57中？新安集？沈印？150？忽然想起三班似乎有个王琍，但模样全忘了。且先作恍然大悟状：“噢，是王琍呀！我想起来了，你好吗?你在哪呢？”“我在美国呀！”我又吓一跳！好家伙，三十多年不见，又在大海那边，时间空间都隔得老远，怎么想起给我打国际长途了？一分钟十几块钱呀！

原来实验中学九十华诞，在网上建了个校友录。王琍初中就在150（当时实验中学叫150中学），熟人多，消息灵通，听说此事，自告奋勇当了高二三班网站的版主。但她在美国，联系同学很麻烦，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我。一找信产部，二找社科院，两个电话就把我捞出来。她告我网址，让我上校网注册。我一边答应，一边心想：都老头老太太了，天涯海角的，三十年不见，还聚啥呀？放下电话，倒头午睡，一觉醒来，早把此事抛在脑后。

五一长假最后一天，家里电话铃响。一接，又是王琍：“匡卫群你怎么一直没注册呀？”好家伙，连家里电话都知道了，克格勃呀！我赶紧上网，完成注册，登录班级网站一看，赶情俺是第二位！没想到，第一位注册的竟是张颐！三十年没通音信，他也去美国了！班网有全班在天安门的合影，我左看右看，想不起哪位是王版主。战战兢兢发出一帖：“不好意思，王版主您能告诉我您在合影中的位置吗？”王琍的帖子像颗炮弹发射过来：“匡卫群,你也真够可以的,居然连‘大名鼎鼎’的大王琍都记不起来了,真该给你推荐一些补脑的保健品了；我在全班合影的第二排从右往左数第六个,那个夹在邓梅和王苏维中间的靓女就是我。”我赶紧拿手指头杵着找，忽然眼前一亮，原来是她呀！她不是也去孔化营插过队吗？怎么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将功折罪，赶紧效犬马之劳。王版主“知人善任”，刚把俺“打捞出水”，便发下一帖：“匡卫群,你是咱们班的文豪,给咱们班写个班级宣言吧，代表全班同学谢谢你!!”班网主页上有一栏叫“班级宣言”，由各班自己填写；见帖不敢怠慢，字斟句酌，写下数语：“最痴情的是回首，最难忘的是分手；虽不能常与青春厮守，却总会把那岁月藏收；一次相聚，终生益受；让我们再将那心儿相授，重走那朗朗的青山隐隐，潺潺的绿水悠悠。”王版主又布置我打捞同学，听她一说，方知打捞的艰难。像张青，只知她父亲原是农林部一位副部长，老红军，可农林今已分家。王琍分别打电话到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老干部局，查找姓张的副部级老红军，至今没有回音。我是机关小职员，清楚机关办事的路子，若非上级布置，或有熟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不会当真办。三十多年没联系，上哪找大伙呢？校庆定在九月，还有三个月时间，王版主说国内你管，国外我管，争取校庆前把同学们都找到，实现高二三班的“全家福”！

放下电话发愣，心想这任务艰巨呀，离别这么多年，和谁都没联系，上哪找呀？猛然想起一人，就是汤丽萍。

汤丽萍插队回城分到邮电医院，和我夫人一个单位，找她应该不难；记得她家是政法干校的（现在叫公安大学），班上有不少同学和她一个院，找到她，就可顺藤摸瓜呀，果如所想，找到丽萍，一拨同学浮出水面，于是就有了我发帖询问“班长张青”踪影和英进纠错的事，寻找陆班长的漫长之旅由此开始。

前面说过，担当打捞任务之后，最先想到的就是唐谦和陆惠敏，一个书记一个班长，找到他俩，班上的事就有了主心骨。可上哪找？进百度搜搜吧，好家伙，搜出四千个唐谦，八百个陆惠敏，大海捞针一般。没辙，还得在班网发帖子问同学，加拿大的国新说“我想找到尹小彬就能找到陆惠敏”，美国的东庄说“唐谦家就住中关村十号楼，等俺家贾老五回京时，站他家窗户低下吼一嗓，准能找到！”结果一喜一忧，喜的是东庄夫人回国省亲，真在十号楼找到了唐母，唐谦顺利上岸；忧的是找到了尹小彬，小彬却也不知陆班长的去向。“记得当年回城，她好像分到邮电部牛街招待所了，和叶秀珍一块，后来去哪我就不知道了”，小彬说。“唉，莲蒂不是在邮电部吗？让她找叶秀珍问问”；我满怀希望。谁知莲蒂找到叶秀珍，依然没问出个名堂，秀珍说老陆当年在招待所时间不长就调走了，去了哪她也不知道。得，转一大圈，又回到起点。

这时我倒也没着急。从一个多月的打捞情况看，找到一个同学，就会发现另外几个同学的线索，没准哪天找到谁会带出陆班长呢？而且六月份随着一位同学上岸，打捞工作突飞猛进，前景一片光明，这位同学就是警官徐建中。

（3）

徐建中，刑侦物证鉴定专家，当年插队孔化营，与唐谦一户。建中心灵手巧，喜欢摆弄照相机，照了自己洗，乐在其中。由于特殊工作性质，打探消息比较灵光，找人更有便利条件，所以他一上岸，就成为打捞工程中的攻坚战士。凡是难找的，没啥线索的，全交给他，其中自然有陆班长。“老陆是重点，”我托付他，“当年回城后，只知在邮电部的牛街招待所呆过，一两年就离开了，去向不详，家庭住址不详，父母姓名单位不详，有无兄弟姐妹不详，上学与否不详，出没出国不详，总之全是不详。唯一线索，就是陆惠敏大名儿，就看你的了！”俗话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建中出马可不是顶俩，简直顶十个！最多时他一天能捞上来五六个。像张青、艾幼林、李钦德、林雅娟、林步圣、李吟天、李亚力等同学，都是当年没插队，毕业后留城工作，加入“独立大队”，早早断了线，若没有建中，找他（她）们肯定要大费周折。

除了建中撒网，其他同学也没闲着，07年7月7日，陈永同学把孔夫子打捞上岸，特别值得一提。孔夫子孔维康，本班老大哥，51年生人。从小患脑瘫，肌肉扭曲，行动困难。当年来班上，陈老师预先通知大家，说有个残疾的同学要来，大家不要惊讶。虽然打了预防针，可老孔一亮相，还是把大家吓一跳！不过别看孔夫子嘴不能说手不能写，心里可明镜似的，什么题都难不倒。据王莉同学披露，当年上数学课，老师出了道难题，全班做不出，孔夫

子急得脸红脖子粗，憋了半天说出一句：“一群笨蛋”！

我们插队后，与老孔失去联系。陈永与老孔家楼上楼下，可孔家如今只有弟弟一人住，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来时不来。陈永只能“蹲坑”，终于逮着孔弟。问出老孔住在大觉寺旁边一个养老院，但具体地址不详。北辰同学得知此事，周末驱车前往大觉寺寻访。到那发现寺周养老院众多，只能挨家打听，最终把孔夫子给找到了。那天我诗性大发，忍不住在班网打油一首：

三班兄弟整十八，最数圣人不好查。清水院边成隐士，大觉寺外度年华。

北辰有志寻踪影，南苑多情绽晚花。今日迎来孔夫子，喜将杯酒对朝霞！

（注：大觉寺因有清泉流入，又名清水院；寺内南配院植有古玉兰，号称京城玉兰之最。因山中温度较低，比城里花期晚了半个月，正应了“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挑花始盛开”的诗句）

随着老孔上岸，三班十八位男生实现大团圆。7月10日那天，为庆贺此事，又在班网打油两首：

一、贺男生团圆：

高二三班是一家，分别卅载向何查？身隔咫尺难寻影，蕾散天涯怎觅花？

幸有网坛集众志，竟从沧海汇金沙。劫波度尽诸兄在，从此中秋月更佳！

二、赞徐建中：

当年手巧又心灵，洗相攒机样样行。塞北并肩锄垅亩，长安携手砌楼层。

四方重案皆勘破，三尺案头走玉龙。一键查出天下事，同窗团聚立奇功！

（注：“长安”一句，指回城后与建中同在邮电部房修处当建筑工人）

到8月上旬，不但男生全都上岸，女生也大都找到，尚未联系上的仅剩李娟娟（巴西）、刘晓梅（英国）、梁琳（美国）、陆惠敏四人。但前三位的父亲或母亲我们已找到，只是现在的老人们警惕性都特高，全报着“打死也不说”的信条，不肯轻易透露女儿行踪，可都承诺女儿回国时一定转达我们的口信，如此也算有了着落。真正杳无踪影的，就剩下班长陆惠敏了。眼瞅离校庆越来越近，我真有些着急了。那日在班网发上一帖：

“各位同学，陆惠敏是咱们的班长，要是校庆时还找不到她可就太遗憾了。到底陆惠敏哪去了？查遍夫子日记，无一字记载，前两天和老徐通话时还问过他，老徐也记不清了。和陆惠敏一个户的同学，还有啥线索没有？其他同学谁有线索赶紧提供，谁知道她的父母情况？现在要争分夺秒了，有提供线索找到陆班长的，重重有奖！”过了几天，尹小彬看到了我的帖子，她跟了一帖：“老匡你好，听国新说，陆惠敏的父母是社科院的，不知跟你是不是一个单位的，但不知她父母的名字。”见到小彬的帖子我大吃一惊，这不是找到自己地盘上了吗？

“找到自己地盘上”，是这次打捞同学过程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少同学，没找到时，你觉得他远在天涯海角，一旦找到，你会发现他竟然就在你身边！这正应了“地球太小”的老话。比如林步圣，多年没有音信，若非建中神通广大，几乎无从下手。他上岸后，和他一聊，发现当年我在邮电部工作时，我顶头上司，机关党委书记，那位和蔼可亲的陶章同志，竟然就是他母亲！他工作在航天部710所，710所有个航天四创，做网络系统集成。97年我院建网招标，有八个公司投标，航天四创是其中之一。谈判大半年，最终航天四创中标。从此我们和航天四创结缘。若知林步圣在710，通过航天四创找他易如反掌。

又比如找刘宇生。刘宇生是高二一的，当年在邮电部房修处，和我同在混凝土班，一块炒了一年多盘子（那时把人工打混凝土叫做“炒盘子”）07年校庆前，一班一直没找到他。当时我写《我的混凝土班》，翻看日记，忽然在一页上发现刘宇生的住址：“铜光楼1楼1号”；心想这条线索或许有用，就在一班网站发了帖子。一班王丽同学见到此帖，一路追踪，真把宇生给找着了。那天和宇生、康永、建华、文尧等混凝土班老兄弟团聚，问到宇生现住何方？他说住在会城门，我大惊，因为我家就在会城门，细细一问，他住的那栋楼竟和我家仅一墙之隔！

如今找老陆，又找到自己地盘上了。可兴奋过后，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社科院三十多个研究所，十多个厅局和直属单位，七八千人头，若不知姓名，不知具体单位，从何查起？于是心急火燎又给小彬发上一帖：“小彬你说老陆父母都是社科院的？要是真的，那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不过北京有俩社科院，一是中国社科院，一是北京社科院，两院人都不少，像我们中国社科院就有六七千人，要是能提供具体单位或父母姓名，查起来就方便些。像小王莉，上次聚会她说她母亲就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她经常来社科院为母亲办事，早知道这些，何苦拐弯抹角，又找王红又找林美香，一个电话打到农发所不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关键是打听到她父母的姓名或具体单位，拜托拜托！”

（4）

9月7日，陆班长的事忽然柳暗花明。那天同学聚会，席上说起陆惠敏，新上岸的王苏维很肯定地说，老陆的父亲当年在社科院历史所工作。王苏维在班上是学习尖子，尤其外语好，她记的事我想错不了，当即打保票：这事包在我身上！第二天到单位，兴冲冲上电脑调出历史所花名册，现职的离退的，一个一个数，结果大失所望，几百人头中，竟无一人姓陆！莫非去世了？打电话问几个历史所的熟人，也没问出所以然。是不是调到别的所了？又把近代史所、世界历史所、考古所、边疆史地中心等等，通通搜索一遍，却一无所获，心里又凉了半截。

校庆前一天，在外交部当领事的邓梅上岸，打捞工作基本结束，全班仅剩陆惠敏一人没有着落；应该最先找到的人，最后也没找到，这大概只能说是天意，老天爷总要给人间喜剧留些遗憾。不过寻找陆班长的努力仍在继续，

校庆那天，汤丽萍去了学校档案室，希望在尘封三十多年的档案中，能找到老陆的资料，哪怕查到父母姓名也好。可惜，仍旧一无所获，丽萍叹口气说："找老陆比找拉登还难呀！"老陆你在哪？正当山穷水尽时，远在纽约的东庄忽然灵光闪现，想起当年一件往事。9月27日，他在班网发上一帖："俺有一线索找到陆大班长惠敏。但不像在唐谦家窗下喊一嗓子那样简单，要到居委会讯问。她家就在白（百）万庄，110中学旁，寅区？"我看帖大喜，心想唐书记就是东庄夫人找到的，看来陆班长还是要落在东庄身上！忙发帖请东庄说得详细些。东庄回复："回匡卫群：俺再说得啰嗦一点儿。110中学马路对过右侧是邮局。邮局马路对过左侧三层楼房即是。俺最后一次见到陆大人即在那里，但也是70年代末了。俺也未与她打招呼。一直没有说是在看，在等待你们找她是否有结果。最好女生去，找到有奖励。"东庄的"马路对过的马路对过"把我绕胡涂了，可是张青看见他的帖子，立马奔了百万庄。

前面说过，我曾误记张青是班长，所以如此，是因为张青当年在班干部中，给我印象深刻。她做事热心肠，有毅力，总是吃苦在前，乐于助人。她在网上看到东庄帖，马上跑到百万庄，先找东庄说的那栋楼，向老住户打听，没打听到；又去寅区居委会，居委会大妈挺热情，花名册翻来倒去，没有查到姓陆的；不过大妈说，寅区和卯区有交叉，会不会在卯区？张青又赶到卯区，真巧，卯区居委会肖主任是实验中学80届校友，一听情况，热心查找，结果还真查到一个叫陆传秀的女士，60多岁，虽说从年龄看，不可能是老陆母亲，但没准是她姑姑呢？张青满怀期望，把电话留给肖主任。第二天肖主任打来电话，她找到陆传秀了，一问，人家压根不认识陆惠敏，咳，又白忙活了！

张青又跑牛街，想查查当年档案，谁知老档案早已上交部里。我知道，三十年前一个小小招待所的档案，部里肯定早已销毁，否则档案室得盖十层楼才装得下！再找叶秀珍问，小叶说，年头太远，实在记不清，印象中，老陆是去她父亲单位了。得，折腾一圈，又转回"社科院历史所"了！东庄看到张青东奔西跑，一无所获，很不好意思，班网发上"罪己诏"："回匡卫群，的确是当年俺的一念之差铸成今日之憾。又烦劳张青东奔西跑，左访右查，至一无所获。悔！憾！叹！若要再有此事那一定要快马加鞭，伺候左右。"时光一天天流过，十一月与邓梅聚会，十二月与国新聚会，一月份给陈老师过生日，每次聚会同学们都会说到老陆，每次都是无限感叹，一切线索都断了，寻找老陆的努力就像电脑中了病毒------死机了。

去年正月初六，国新要回加拿大，同学们为她饯行。饭桌上又说到陆惠敏，莲蒂忽然石破天惊，说了一句："老陆在南京"！大家全都竖起耳朵，盯着莲蒂问："谁说的？你咋早没说？没记错吧？"尹小彬更是摇脑袋，"你是说南京什么公司那个陆惠敏吧？我早问过了，她家是上海的，根本对不上号！""是呀是呀，你别是记错了吧？我记得让建中查过南京呢，他查了说没有呀！"我也怀疑。"绝不是听尹小彬说的！听谁说的？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有谁跟我说过！匡卫群你让徐警官去查吧！"（建中那天有事没来）莲蒂说得异常坚定。

过了春节，赶紧联系建中，请他查南京。他有些诧异，说查过南京，没有呀？我说再查查吧，莲蒂说得很肯定，万一是老陆给莲蒂托梦呢？万一是老天爷看咱们找班长的心诚，给咱们指道呢？再查查看吧！建中说行，再查

查。元宵节前，建中来电话，还是没查着，“真怪了，我不但查了现在的，连出国的、去世的，我都查了，都没有；这么个大活人，就人间蒸发啦？”建中有点沮丧。“会不会改名了？”我对建中说，“咳，不管咋样，建中你算尽力了，咱慢慢找，不着急！”我安慰他。建中说：“明儿南京正好有人来，我托他帮着找找”，建中干事也是韧劲十足！

元霄节响了一天鞭炮，又听见喜鹊叫，是个好兆头。正猜有啥好事，就接到老徐电话：“老匡，咱班最后那个，找着了”；他说最后那个，我以为是刘晓梅，“是刘晓梅吗？”我问他。“不是，是陆惠敏”；老徐的话音挺平静，电话这头我可是差点要蹦起来了！“你说啥？你找着陆惠敏啦？她在哪呀？”“南京审计学院院报，我已和她通了电话，是上过150，是在孔化营插过队，没错，就是咱们的陆班长！”原来那天南京公安局的同事来，建中便请他帮忙。到底是本方土地爷，县官不如县管，那同事一网撒下，便网出南京审计学院陆惠敏，性别年龄正靠谱，还有联系电话，建中一个电话打过去，陆班长霍然出水！

那一刻我拿着电话，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觉得这真是天意了！真是老天爷在冥冥之中给莲蒂托梦了！要不她怎么能说得那么肯定，那么坚决！那一刻，我觉得全班同学付出的努力，全都得到了回报，王琍、丽萍、东庄、张青、苏维、小彬、建中……所有三班同学都会共享这幸福的一刻！

拿到陆惠敏的MSN，我迫不及待地和她对话，我最想知道，“社科院历史所”到底是咋回事？她和社科院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找到老陆后，我给建中发短信，说下次聚会一定有嘉奖，建中回了短信：“这是我应该做的，咱们班同学都在积极做这事。大家都做了很大努力，我只是运气好一点。”）（另，莲蒂和东庄是班上一对孪生姐弟）

（5）

上MSN和陆班长一聊，水落石出。果真应了“地球很小”的老话，果真又一次“查到自己的地盘上”。原来老陆是78年由招待所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所，87年随爱人到杭州，一年后再到南京。老陆在社科院呆了九年，她前脚走，我后脚来，差点碰头。王苏维说她父亲在社科院并没错，可非中国社科院，是北京社科院。我只在本院查，哪里找得到？

还有个疑问，究竟何方神仙告诉莲蒂，老陆在南京的？老陆离京时，即便和哪位同学说过，也应说去杭州。莲蒂冥冥之中蹦出“南京”二字，又说不出所依何据，莫非真是黄粱一梦？

小时读《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常为其寻父之旅艰难曲折而感叹。凭几片碎纸拼凑出的零星信息，靠突发灵感

的猜测和推理，满世界去寻找落难孤岛的父亲。处处危机四伏，时时险象环生，在走投无路，陷入困境之时，忽然否极泰来，绝处逢生，最终阖家团聚。小时一直以为这是作者杜撰，天下哪有这样的巧事！到了天命之年，才知人世间巧事颇多，只要锲而不舍，终会天道酬勤，寻找陆班长，便是明证。

今年春节，惠敏返京，唐谦也从上海回来，三班同学再次相聚。席前先请班长讲话，老陆一语未出，声先哽咽。此情此景，仿佛时光倒流，重回74年春天，在中山公园假山凉亭中，开的最后一次班会。那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晃三十五年，如今重聚，两鬓风霜，虽东隅已逝，可桑榆非晚，心儿依旧年轻，欢声笑语，不减当年。

找到班长那天，夫子即兴“湿”了一把：

遥望金陵喜欲狂，一年辛苦未白忙。中秋月照同窗聚，河汉星失玉兔伤。

莲蒂无端说建邺，建中有志证黄粱。精诚所至金石裂，惠敏原来在异乡！

关于托梦之事，莲蒂在班网写了一篇《痴人说“梦”》，十分精彩。现将该文及文后的夫子跟帖附上，作为此章之结尾。

<u>莲蒂的《痴人说“梦”》：</u>

因家中无电脑，今晨在单位看到班网又洋洋洒洒地添了好几页。主题是终于找到了陆班长。其中也不乏有钦德、雅娟、小彬、丽萍、国新、卫群、刘岩等分析“梦”的由来。惊喜之余且听小女子我细细道来……。

如果说咱们班的这种手足情感动了上天，不如说首先感动了我。先是有感于王俐、黄京辉、谢北辰、汤丽萍、匡卫群等同学的多次倡议“一个也不能少”，又有感于张青的几次不辞辛苦的往返于邮电招待所（陆班长原单位）和百万庄居民楼之间（陆班长原住宅），又被徐警官地毯式的排查和小彬的网上搜索，国新的长吁短叹……，我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于是在积极配合同学们的查找之余，百般思索，希望能在这茫茫的人海中寻找到咱们班长的蛛丝马迹。

忽一日，梦中有一仙人指路说：你们要找的陆大人在南边紫金山，雨花台。话毕便飘然而去……。似睡非醒之中只记住了这六个字。之后又昏睡过去。一觉醒来“紫金山，雨花台”这六个字仍萦绕耳边。难道应了那句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否天将降大任于小女子也。是否将这一线索首先报告徐警官，又恐是空穴来风让徐警官白忙活一场，故犹豫再三，不敢报告。

初六为国新饯行，再次谈到此事。实在不忍再看到同学们的全班大团圆之梦难圆，便豁了出去，将此事和盘托出。是凶是吉，我也颇为忐忑。

又一日徐警官来电说“南京告急，并无此人”。匡领导也在网上批示“查无此人”，便觉甚是懊恼。只因第一

对不起徐警官。第二对不起全班同学的殷切希望。故心中郁闷，无法释怀。现在终于水落石出，真真的是高二三班同学们的手足情感动了上苍，借此托梦，实乃感动于全班同学的手足情，友爱心。

“梦”可信可不信，但我还是很信服弗洛依德的“析梦”，也有兴趣读一点易经、八卦、占卜、禅宗之类的书。说实话大多晦涩难懂，但也有只言片语或有感悟。自认为是无神论者，看这些书只是出于好奇。正像刘名医（指北医三院的刘岩）所说“世上有许多东西可能还未被人们认知……。”我最深有感触的是，白天我总是迷迷糊糊，委靡不振，实乃一痴人也。而梦中却思路清晰，时有灵感。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更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析梦”之学说。我真希望美梦最好能多一点，噩梦最好少一点，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诗情画意，这样美梦成真，不亦快哉！

望早日与陆班长相聚。

夫子跟帖：

今读莲蒂同学“痴人说梦”一文，感触颇多。寻找班长一事，历尽千辛万苦，四时不懈，八方搜索；前有丽萍尘伏于校档案之内，后有张青奔走于百万庄之间；尹小彬驱古狗叟狐于网上，徐警官查两京人海于库里；更有苏维掘沧桑之记忆，东庄献觅人之高策，竟皆与惠敏擦肩而过，错失良机，可感可叹。幸有莲蒂奇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虽不信佛而佛佑之，虽不信神而神助之，竟有土地爷驾临梦中，于万缕千丝中抽出一线，直指紫金山雨花台，真乃仙人指路，拨云见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然初六宴席之上，莲蒂说出此事，众人皆疑之，夫子更觉玄虚。乾坤朗朗，鬼神何在？古有南柯一梦，醒来方知是幻，莫非莲蒂今又蚂蚁援槐乎？虽窃以为此，但莲蒂言之凿凿，力主查找，夫子抱死马当作活马医之心态，重托建中网上钩沉。建中处事有恒心，一网不中，二网不中，不轻言弃，再撒三网。正逢元宵佳节，三网一出，豁然开朗，陆班长端坐网中，悄然出水矣！至此真相大白，莲蒂之梦并非南柯，真乃美梦成真，幻境成实，此事之奇妙，可入史策矣！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12：

第二十章：知青聚会南张庄

（1）

麦收刚过，就听说学校慰问团要来。这消息让我们着实兴奋了一把。提到慰问团，就让人想起《英雄儿女》，想起祖国慰问团在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的景象。披红挂彩，敲锣打鼓，送吃送喝，还有战地演出。于是自我感觉仿佛也是打了胜仗的战士，等着戴军功章。

“不知能给咱送点啥？最好每人一斤猪肉，咱们包饺子。再放场电影，打仗的，才过瘾！”德起满怀憧憬。

“想什么呢？”张颐很为德起的梦想感到好笑。“给你发猪肉？全国多少知青？一人一斤猪肉，还不把猪杀绝了？”“合着光拿话甜和人呀？那多没劲！”德起有些灰心。

“猪肉发不起，一人发包烟吧？大前门，没多贵。咳，可惜咱们都不会抽烟，发了也没用。”建生也跟着瞎猜。

“谁说没用？咱不会送老社员，还落个人情。”德起又有了念相。（“老社员”是当时知青对乡亲们的统称，并非专指上岁数的社员，至于为何这样叫，我也没搞明白）

“想都甭想！”我赶紧给他泼冷水。“不提倡抽烟，还给你发烟？学校穷哈哈的，哪有钱发烟发肉？据我的经验，顶多一人发本儿毛选啥的，精神食粮嘛。”“得，要发毛选，我那本送你了，精神食粮您多吃点儿，看能长点肉不？”德起喜欢拿我的瘦说事儿。

8月6日，我们和老二爷子在北河套耙麦茬地，耙地是让牲口拉着耙子，把拖拉机犁过的地再耙一遍，把大土坷垃压碎。老二爷子让德起站在耙上压秤，他牵牲口，我、京辉和张颐拿着二齿跟在后面，把没压着的坷垃打碎，把石子杂物清除。没干一会儿，忽听大队喇叭广播，要全体知青11点前到南张庄集中。“哈，一定是慰问团来啦！”我们兴奋起来，和老二爷子商量请假，老二爷子有些为难，“得留一个人压耙子呀？”他说。德起马上说我留下吧，反正也不发东西，光扯闲篇儿没啥劲，又不记工分，你们去吧。

于是我和京辉张颐匆匆赶回宿舍，给做饭的建生拿了两块钱，叮嘱他去镇上买肉。“要是陈老师来了，一定留他在咱户吃饭，你务必把肉买回来啊！”“瞧，不发肉，还得自己掏钱买肉，真是赔本儿赚吆喝呀！老匡你放心，保证买肉，万一买不着，不是还有德起的兔子吗？咱红烧兔肉，比猪肉还香呢！”建生乐呵呵地说。“千万别打兔子的主意，小心德起把你红烧了！”京辉说，大家哈哈一笑。

我们赶到一队，唐谦他们已经走了，我们急忙向南张庄赶。时至立秋，天气仍旧闷热，路旁庄稼地里，蝈蝈唧唧歪歪叫个不停；路边杨树上，知了也“伏了伏了”地唱得带劲儿。老玉米和红高粱都已一人多高，形成了大片的青纱帐。过一条小河时，张颐忽然手指河中问我，“老匡那是啥？”我顺他手指方向看去，见水边浸着许多棕色的东西，我还真说不出是啥。张颐乐了，“那是苦杏皮”，他告诉我。我忽然想起荷莲曾说在镇上捡杏核，“啊，荷莲说的捡杏核，是不是就是捡这玩艺儿呀？”“应该是，现在正是收苦杏的时候，镇上的杏仁厂又该招小工捡杏仁了。”“要男的不？咱们也去捡一回试试？听说快手干一天比在队上挣工分多得多呢”我说。京辉笑了，“就咱这大粗手，还不把杏仁全捏碎了？”印象中南张庄是在半山上，东面是王家山、东灰岭，西南有西灰岭、头司和四司，西北是孔化营，这几个村全是150中学学生插队的地方，南张庄恰好位置居中，作为知青聚会地点挺合适。我们赶到南张庄，别村同学们也都赶到了，这可是插队后，第一次高中三个班的大聚会呀，不但有我班在头司插队的老闵丽萍她们，还有一班二班的同学，像张军贺宇铭马向阳何晓军等等，都是我很熟的人，大家难得一见，都很高兴。

学校慰问团由校长宋克带队，成员有肖淑红、白正衡、王本中、刘超尘、储润年、汪洋、张红永、张小玉等，还有高一的同学。让我们略有失望的是陈老师没来，但白老师带来陈老师的一封信，嘘寒问暖，关爱之情跃然纸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信的结尾语，那时信尾处套话都是“此致敬礼”之类，而陈老师用了“临风怀念，不胜依依”八个字。后来在大学读《诗经》，一首“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下子让我想起陈老师信中那两句话，才知道这八个字有着两千年的渊源。今年给陈老师过生日时，陈永同学在班网上也提到陈老师这两句话，不过她记的是“临风怀念，不禁依依”；一个是“不胜依依”，一个是“不禁依依”，不知是我记得不准，还是信非一封？因为“不胜”和“不禁”都可解。可惜我们当年太粗心，没把老师的信保存下来，如果像二班同学那么细心，把超尘的信一直珍存至今，这个小小的差异就有史证可断了。

（注：在《我的孔化营》第一章里，我把孔化营算作南七村中的一个，后来有位“正宗孔化营人”给我留言，告我“头司、四司、东灰岭、西灰岭、南张庄、彭家窑、鲁家园才属于南七村，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的革命根据地，孔化营靠近永宁，是白区”，在此特向“正宗孔化营人”致谢，并为俺孔化营沦为“白区”不胜哀悼！）

（2）

在南张庄那天，除了陈老师的信，还有印象的，是刘超尘老师的发言。很奇怪，我没记住他讲了什么，却记住了他讲话时的表情：天气炎热，他脸上淌着汗，白塑料架的眼镜被体温烤得软绵绵的，有气无力地趴在鼻梁上；乌黑的头发散乱地偏向右侧，消瘦的脸颊因情绪激动泛起潮红。他讲话一贯慷慨激昂，那天更激动得不断挥动着手臂，不时推推滑下鼻梁的眼镜。他的表情绝不欢快，甚至有些愤怒：记得眼睛瞪得圆圆的，而当他微笑时，总是眯缝着眼。这表情让我多年不忘，因为我从未见他生气。或许我是外班学生，和他接触少？或许他在外班学生面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怒气？

曾在校友录的留言簿中，看到有同学写他发火，还有同学说他曾大怒之下打过一个学生，这都是我无法想象的。自从第一次到校广播室诵诗，被根本不认识的他，一把按在广播员的位子上，到进工程处后，为给节目配乐，最后一次和他在学校广播室挑音乐带子，他在我心目中的定格，就永远是一个儒者。像贺宇铭描写的：“中等个儿,穿一件臧青色对襟中式外衣。白皙的面孔略显消瘦,秀郎镜片后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嘴角挂着微笑”。在二班的相册中，有超尘第一次当班主任的老照片，想来是大学毕业不久，二十出头，初涉世事，文质彬彬，面容清秀，带着几分羞涩，腼腆地站在一群姑娘旁边，不敢贴得太近，不敢像少女们开怀大笑。我看到那照片不禁笑了，轻轻说：这就是超尘呀！一生书卷气，一身诗意！

但在南张庄，超尘留给我的印象，的确是很生气的模样。岁月流失，记忆也流失，南张庄的那次聚会，老师和同学都说些什么，我已完全忘却（当天日记里大略记了几位发言者的名字，头一个讲话的是肖淑红老师，最后一个是张小玉同学），但超尘的表情却异常坚定地驻守在我的记忆中，像个梦魇，时时让我发冷。我常常想：超尘那天究竟说了什么？是什么让他有那样不同寻常的表情？搜肠刮腹，冥思苦想，依稀、模糊，电光石火般蹦出几个字眼儿，好像有“辱骂”，有“恐吓”，有“战斗”，串起来，似乎是“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这是鲁迅的话，难道超尘那天说了这句话？可这话和他有什么关系？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为何他的表情会化作我的梦魇？我对自己的记忆一直置疑。

07年7月，在二班相册上，看到张亚初放上的，当年超尘写给东灰岭插队同学的信。信是75年1月写的，是在南张庄聚会5个月之后。淡蓝色的信纸上，“刘体字”龙飞凤舞，言语带着鲜明的“超尘风格”，时而激昂，时而幽默，时而恬淡。我被信吸引，细细读来，忽然一段文字像雷电迸射，穿透心灵，让我震颤：“最近学校较之过去，有些起色。但常有反复，比如最近几天就连续发生了三四起盗窃案，当老师的，生活在这样‘战斗’漩涡中，也可能是一种幸福，一种乐趣。但是一般人总是希望平静些。少受些辱骂和恐吓，不过无论如何，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我们坚信不移。”刹那间，心中的迷有了答案！“生活在战斗的漩涡中”，“少受些辱骂和恐吓”，这应该就是超尘那天在南张庄说过的话啊！

再将超尘信字斟句琢，从他言简意赅的叙述中，我悟出他愤怒的原由。我知道，超尘所说的“辱骂和恐吓”，

绝非是指三四起盗窃案，那绝形不成“战斗的漩涡”，也绝不至于会动摇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心。超尘是以春秋笔法，在警示我们。现在的孩子绝难理解，一个重点中学，北京市的“名校”，身为毕业班的班主任，头戴“园丁”桂冠的老师，怎么会受到辱骂和恐吓？而我们这代人对此可是“心有灵犀”。那时的教书匠，有如狼群中的羊，时刻可能葬身狼口，那狼不是别人，正是做学生的我们。文革就像暴发一场“狼流感”，率先感染的是我们的兄姐，于是卞仲云书记死无葬身之地；73年批右倾回潮，我们也染上狼流感，磨牙吮血扑向老师们。

在《我的高二三班》一文中，我对批右倾回潮专有一章回忆。虽说那时我并没有咬过超尘，但批判英语老师刘珍芬，我确是始作俑者。咬人动机很简单也很恶劣：由于不喜欢外语，外语成绩便不好；外语成绩不好，便不想参加考试；不想参加考试，就想把考试搅黄，而批判刘珍芬，是搅黄考试的最好办法。我的目的果真达到，在满墙大字报的恐吓之中（那时的流感病毒比之文革初期已稍温和，辱骂和肉体折磨基本杜绝，但恐吓依然强劲），刘老师战战兢兢问我们：“期末还考试吗？”我们大言不惭地宣布：“谁爱考就考谁！

07年刘文涛同学告诉我，那时刘珍芬老师很艰难，她有个儿子是智障。我一下呆住了，想到当年批刘之事，恨不得抽自己！我也已作父亲，知道一个傻儿子对父母来说，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是无法治愈的创伤，而当年的我，却在老师撕心裂肺之时，又往老师的伤口上，恶狠狠地洒了把盐！忏悔已无助于事，造孽也无法挽回，我终于明白为何对超尘的记忆像个梦魇，因为他那天的话一定令我震撼，令我羞愧，令我警醒！

踏入社会后我的“狼流感”逐渐治愈，而在孔化营是第一个疗程。我懂得了“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的道理，懂得了“革命口号”背后，往往隐藏着恶毒的阴谋，懂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回看血泪相和流，如今写到南张庄，就想到超尘，心上流血，眼中含泪。超尘已经离开我们十四载，他在世上走了56年，一直在前面引领着他的学生。而今每逢清明，他的学生会去墓前献花，更多的学生，会在网上写他。我不是他的学生，但他是我的老师；他不是诗人，但我是他的诗友。07年8月写《我的高二三班》，写到超尘，曾填《金缕曲》一首，现抄录于此，以示悼念：

魂魄归天阙。看长安，二龙路里，残阳如血。文弱书生真豪杰，几度峥嵘岁月。

育桃李，丹心不灭。只恐鹈鴂催鬓雪，效春蚕，丝尽芳菲歇。烛泪绝，鹃啼咽。

萦怀旧事从头写，忆超尘，彩笺素纸，啸吟诗阕。笔底豪情书锦页，垅上田头相约。更记取，谆谆情切。屏网听师歌一曲，见巍峨，无字丰碑碣。酹忠烈，浪千叠！

注：

1、“垅上田头相约”：在校参加夏收时，超尘办战地小报，与我约定每日一诗。

2、“屏网听师歌一曲”：07年在校网上听到了超尘老师在78年中三三班的元旦晚会上的原唱《桑塔露琪娅》。

（3）

南张庄聚会，还有印象的，是到二班男生的宿舍坐了坐。记得房子很旧，可以说残破不堪，屋瓦长满蒿草，房檐结满蛛网；密密的窗棂上，黄得沧桑的窗纸千疮百孔；墙根堆着散乱的秸秆，土坯墙上用大白刷了条标语，好像是胸怀祖国、放眼天下之类的话。一根脏兮兮的行李绳斜跨小院，上面晒着毛巾和衣物；窗台上晾着球鞋，不小心被麻雀拉了泡屎。屋里光线很差，眼睛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东西。“你们屋太黑了，老看书多费眼儿呀”；我对向阳说。

南张庄的同学后来有好几个去了工程处，如马向阳（木工）、王佳成（架子工）、赵和（架子工）、陈泽时（瓦工）、李建华（混凝土工），何晓军（钢筋工）等。而我也去了工程处，应该说和南张庄同学有缘。不过和马向阳的交情却要早些，进150后，第一次去广播室，就认识了他。

那天在广播室念一首自创诗，念完被超尘扣下。后边接着朗诵的就是马向阳，他嗓子很浑厚，标准男中音，朗诵水平也很高。我在旁边听着，暗自佩服，心说到底是150，学生素质就是不一般。悄悄问超尘他叫啥，超尘小声告我：“马向阳，二班的”；言语之间颇有得意之色。回班后向唐谦打听超尘何许人也？老唐告我超尘是二班班主任，马向阳是二班班长，心想怪不得，原来是向阳是他得意门生呀。从此，在广播室常和向阳碰面，一来二去混得很熟。

就在南张庄聚会前三天，公社在镇上办故事员学习班，在学习班上碰到一班的阎立明和贺宇铭，还有向阳。中午大家在饭馆吃顿素面，然后逛街。说是逛街，其实商店没几家，向阳和我一同进了新华书店，进去就迈不动步，趴在柜台前挑来选去，我买了本小说，向阳则买了好几本。抱着书出来，我说向阳你也是个书迷呀？向阳乐了，说“看书是最便宜的乐趣呀！”

“最便宜的乐趣？”我觉得他这说法挺新奇。“乐趣还有便宜有不便宜的？”我问。

“当然啦。比如打篮球，你得买球鞋吧？得有操场、有篮球架吧？这得多少钱？你爱听戏，得买门票，买收音机，也不便宜吧？打扑克不贵，可你得凑齐四个人吧？这人工成本也不低。看书不一样，书很便宜，没钱买还可以借，一分钱不花，随时随地可以享受乐趣，太值啦！”

“照你这么说，还有更便宜的乐趣呢！”我也幽默一把。

“什么乐趣更便宜？”他问。

“思维呀！也不用花钱，更不用场地，不用凑人数，在家在外，人多人少，都不耽误你海阔天空地想，那多便宜！”

“哈，倒也是，思维也是一种乐趣。不过思维的乐趣一定是建立在读书之上，而且要多读才行。茨威格的《象棋》读过吗？”

“读过，好像是一个人被关在监狱里，没书看，只有一本国际象棋的棋谱。他整天打谱，在脑子里自己跟自己下棋，后来棋艺居然能跟象棋大师抗衡，可是人也神经了，总把自己当成两个人，只要一想到下棋，人就疯颠起来，对吗？”

“对，就是这个故事，你看，光看一本书，能把人看疯了呢！”

向阳的“乐趣便宜论”让我印象深刻。后来在南张庄，他又妙语惊人。南张庄在山坡上，四周群山怀抱，站在他们宿舍门口，抬头见山，我觉得有些憋闷。“老匡你不懂，山里看景才好呢！”他说得那样得意，似乎自己是在夏威夷：“看日出最美。平地看日出，一点悬念没有，因为一揽无余；可山上不一样，太阳藏在山背后，天已大亮，你还没看见太阳，光看见核桃树叶由墨绿到青翠，山崖由土灰到棕黄，那颜色变化可有层次呢。你猜不出太阳会从哪个山尖上露面，因为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好像和你玩捉迷藏。我天天早上看太阳出山，那可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呀！”

向阳的“日出论”让我绝倒。后来读福楼拜，他给女友写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看到最后这句话，我忽然想起向阳的日出论，人一下子置身在南张庄的清晨，核桃树挂满露水，村落上空袅袅炊烟，遍地野花在晨风中婀娜摇摆，向阳站在山坡上，迎着晨曦，享受黎明，他的名字和这景色真是贴切，一幅多么优美的日出图啊！

到了工程处，和向阳同在团支部，一同搞宣传和文体。向阳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在行，是宣传队的中坚。他在木工班学徒一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儿，我和他开玩笑说，结婚时一定要给我打个大衣柜！向阳的幽默也带到工程处，理论小组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大家均百思不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怎么会在先锋队里冒出个资产阶级来？”向阳给出一解：大概是老人家年岁大了，口齿不太清楚，口音又重，说的是“资产阶级分子”，做记录的没听清，记成“资产阶级”，丢了“分子”二字，大家全笑了。

77年恢复高考时，我借调到邮电部机关。那年工程处参加高考共26人，其中有向阳；有13名高考同学参加了体检，其中也有向阳；最终3位同学接到录取通知书，里面还有向阳。我不禁对向阳肃然起敬：不愧叫向阳，前途永远光明呀！向阳上大学后，我们断了联系。直到07年校庆，我才知道他人在美国。直到去年春节前，向阳回国探

亲，我们才又重逢。

相约在西单渝信。一别三十年，见面格外亲。“你真行呀，过五关斩六将，第一年就考上了！”我对他说。“我考不上就麻烦了！那时礼拜天不休息可以攒假，我攒了一些，高考前想用攒的假复习功课，可处干部不同意，不同意我也休。结果老刘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说有的团干部为了考大学，不来上班，你也不想想，如果考不上，你不还得在工程处呆着吗？我一听，看来考不上没好果子吃，一玩命也就考上了”，向阳披露了当年的轶事。

这可谓“谁知上大学，个个皆辛苦”，前有京晖“断骨伤筋”，后有向阳“破釜沉舟”，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都有一本“血泪史”。正因来之不易，方才倍加珍惜，这些年，向阳先在北师大物理系念书，后留校任教，又自费赴美留学，到成为医学物理学家（向阳说也可称作医学物理师，但国内没有这个职称，不知该咋翻译），一步一个脚印，叫做事业有成。当年小木匠，而今医学物理学家，其间的路何等艰辛，不言自明。我不知向阳在大洋彼岸，是否也天天看日出？但我相信，当年在那样一个艰苦环境中，仍有童心天天看日出的人，他的心会永远年轻！

（上一节提到慰问团中有位同学张小玉，晓秋留帖问张小玉是谁？是不是一班的展小玉？说实话，不论张小玉还是展小玉，我全都不认识。当时只是在慰问会上听了一耳朵，回来记在日记里，所以听错了是有可能的，如果七四届高中生里没有叫张小玉的，那很有可能是一班展小玉了。）

相关图片欣赏请移步作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1467b0100dbrn.html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13：

莫听穿林打叶声

慰问团走了两天，公社来电话，让我去县里参加故事员培训班。8月8日一大早，我去永宁赶公交车。

夜里下过雨，晨露沁人心脾。走在乡间小路上，悠然自得。环眺群峰，连绵起伏，像停泊在港湾中的航船。忽然想起明明说过，看海坨山有种特殊的感觉。于是停住脚，远眺海坨山。夏季的海坨山，峰顶的雪色已经消退，青峰壁立，上柱穹庐。凝神注目，渐渐感到一种力量，一种压力袭来，令人心跳加快，肌肉绷紧，有种临战的紧张。我仔细体味这种感觉，明白了这种感觉的由来：与海坨山相比，自己渺小如一粒草芥，而冥冥之中，似乎又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把那座高山踩在脚下；“渺小向伟大宣战，谁为胜者？”我大声问海坨山，大山静默不语，“哈，总有一天我们要比试比试！”我向海坨山挥挥拳头，大步赶向车站。

天公不作美，刚到镇上又下起雨来，更倒霉的是去县城的车已经走了。湿淋淋的我拦了一辆卡车，一问，是3782部队的车，正好去县城。我站在卡车上一路淋到县城，落汤鸡一般。东转西转，好容易找到县文化馆，又说是在县招待所报到。到了招待所，从头到脚一身雨水，冷得打哆嗦。正在报到处签到，就听见有人叫我名字，抬头一看，是李明明。“我猜你会来，老听你在孔化营讲故事！”明明说。“我哪会讲故事？这叫赶着鸭子上架呢！”我脸一红。“你先报到吧，今晚没活动，我找你啊”，明明笑着走了。

晚饭后，我和明明出了招待所，漫步走到灯光球场。球场在城南一块高地上，视野很开阔。东南面离山远，地平线上群峰逶迤；西北面离山近，崇山峻岭历历在目；南面山上有蜿蜒的长城，若隐若现；西天晚霞辉映，云海飞渡，景色甚为壮观。看到这幅云海落日图，不知为何忽然想到了张湾，人也发起愣来。

“你想什么呢？”明明问我。

“你猜我想什么？”我反问她。

“不用猜，你肯定想张湾呢，对吧？”明明一语中的。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地问。

“看你的眼神儿呗！你想过去的事儿时，眼神发呆，从幼儿园就如此，我还不知道？”明明把自己说得像是幼儿园的阿姨，而我在她眼中是个总长不大的孩子。其实她和我同岁，只是我的生日小，比她晚上一年学。不过她的确比我成熟，光说这猜人心事儿的本领，我就甘拜下风。

“就算是想过去，也不一定是想张湾呀？”我不愿服输，和她争辩到。

“只有沈丘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色，不是吗？在城里没有这样开阔的视野，到处有楼挡着。而且，你应该记得，在沈丘，有一个国庆节的傍晚，景色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我一下恍然大悟！怪不得我会想到张湾，一点不错，在那个国庆的傍晚，我们的舞台正好面对夕阳和晚霞，正好和今天看到的一样。“你是指在林场表演《沈秀琴》吧？我高兴地问她。

“对呀！舞台搭在果园边上，红卫连的《沈秀琴》是压轴戏。当我们在台上合唱‘高山巍巍’时，正是日落时分，太阳像高炉的出钢口，晚霞灿烂夺目，奔涌争流，那景色美死了！大家唱得真带劲！”说到这，她禁不住轻轻唱起来：

“高山巍巍，劲松青青，渤海万里，波涛连天。党的好女儿沈秀琴，像高山屹立，光辉的名字万年青，渤海倒流从天落，英雄的功勋与一江春水共流……”。

“你的记忆力真好！”我赞叹到。

“有的事是一辈子也不会忘的”，明明得意地说。

明明的话把我带回到71年那个秋天，我仿佛置身于干校林场那个宽大的舞台上，和明明并肩站着，领诵贾老师倾注心血写成的诗歌联唱。我仿佛看到了坐在台下的黄毛，还有卧在她身边的虎子。黄毛很激动，拼命地鼓掌，虎子似乎也感受到主人的好心情，它不会鼓掌，却会使劲摇动大尾巴，得意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嘿，哥们儿！你演得不错”！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可往事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听说为了换人的事，你和甄老师吵了一架？”明明问我。

“没、没有的事”；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实在不好意思承认，因为明明是当事人。

“哈，别撒谎！”明明步步紧逼：“我听说了，甄老师问你为什么不愿和我领诵，你说了一句‘和李明明一起朗诵，我没感觉’！我没说错吧？”

我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想说点啥，可张开嘴却没词儿。看我窘迫的样子，明明咯咯笑了，笑过之后，她把话

锋一转，手指西方问我，还记得那座山吗？我顺着手指方向望去，见是巍峨耸立的海坨山，连忙点头，“记得，那是海坨山”。“这离海坨山不远了，咱们找个时间去爬海坨山，如何？”“好啊！”我大喜，因为这正是我的期待。

“什么时候去？”我问。明明想了想，“我看了日程表，后天全天讨论，咱们请半天假，应该没问题”。

10日天蒙蒙亮，我俩就出发了。坐车又步行，日上三竿赶到山脚下。吃些干粮，开始上山。明明穿身蓝色的确良学生装，衣裤都洗得发白了，但很干净，脚上穿一双矮腰绿胶鞋。两条辫子盘在脑后，显得头发很短，加上一身男装，远看像个小伙子。她今天很兴奋，步履轻盈，我都有些跟不上。

太阳爬上山，阳光驱散了晨雾，亮晶晶的白露在路旁的灌木丛中闪耀起来，像是山坡上洒满珍珠。她问我那些灌木和野草的名字，好在我知道一些，便拿来显摆，告诉她哪个叫野刺梅，哪个叫虎榛子，还有飞燕草，山萝卜，马先蒿等，数了一大串。我还指给她看曲末菜，野苋菜和甜根儿，告诉她我们吃过这些野菜。

“那是什么花？”她指着路边一束鲜红的花问。

我愣住了。那花似乎见过，可叫不出名。我想了半天，摇摇头。

“山丹丹！”她得意地告诉我。

“山丹丹？”多熟悉的名字！我望着山丹丹，忽然想起来，前年去延安看姐姐，在黄龙山一孔窑洞中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累又饿之时，我在路旁看见了山丹丹，满坡开遍，红得像火，像血。这花陪伴我在荒无人烟的大山中行进，直到抵达终点。我把这段往事讲给明明，她惊讶地看着我，“你没让狼吃了啊？”

天热起来。明明走累了，坐在路边青石上，解开衣领，吹着山风。“还有多远呢？”她问。我抬头望望峰顶，视线被一片松林遮挡，“可能爬了一半？”我猜测到：“听我们队长老二爷子说，半山腰有块巨石，形似巨蝎，叫蝎子石，是上山必经之路；过了蝎子石有一陡坡，一侧悬崖一侧深涧，过了陡坡，就快到山顶了。咱们还没过蝎子石呢，要快点爬了。”

我们起身奋力往上走。天气忽然闷热起来，树梢被风吹动，发出哗哗声。我们转过松林，望见了峰顶。但见峰顶上乌云涌来，瞬间狂风大作，闪电划破云层，似金蛇狂舞，眼看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俩上不着村下不着店，无处躲雨。正在慌张，忽见前面有块巨石探出崖壁，形似蝎子，大概就是老二爷子说的那块蝎子石。幸好那石下凹进一穴，形成天然石洞，正可避雨。我们急步跑到蝎子石下，刚躲进那石穴中，一声霹雳撕裂长空，风夹暴雨呼啸而来，似万箭攒射。打得满山林木一片涛声。我脱下外衣铺在地上，和明明并排坐下。此时大雨滂沱，水气溟蒙，山洪奔下深涧，声如雷鸣。明明解开盘在头上的辫子，让淋湿的头发散开，想不到她乌黑的秀发竟长至垂腰。她把缠着一圈红毛线的皮筋套在腕上，抬头看看我，有些担忧地说：“真倒霉，好不容易爬一次山，偏碰上大雨，这雨

不知要下多久呢？”

“没事，雨越大越下不长。再说风雨之中登山，也别有情趣呢，东坡有首词，写的就是雨中登山的情怀，我特喜欢！”

“是吗？怎么写的？”明明问。

我沉吟一下，轻声背诵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凭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明明听了，噗哧一声乐了，“你呀，老改不了小资情调！”她说。

我一愣，想不到明明对我喜爱的诗这么评价。我不服气地问：“我怎么小资情调了？”

“这首诗写的是达官贵人的生活，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呀！”明明振振有词。

我又一愣，苏轼的确做过官，可做过官就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了？我越发不服气，心想你根本不懂诗，便反问明明：“你说说这诗哪一句写了达官贵人的感情？”

明明记性极好。她说：“有两句，第一，‘竹杖芒鞋轻胜马’，你看，他平常出游是骑马的；第二，‘料峭春风吹酒醒’，你看，他是刚刚喝完酒的。还记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吧？人民群众无衣无食，达官贵人挥霍无度，骑马骑腻了，喝酒喝醉了，穿双草鞋拄个竹杖出来游玩，还说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难道是劳苦大众的感情吗？”

明明灵牙利齿，我从小就说不过她，眼下又让她给说得哑口无言。我心里不服，可不知该如何反驳。明明看出我不服气，又跟上一句：“你不要读古诗了，容易中毒，毛主席就不赞成年轻人学古诗，他说年轻人还是要写新诗。”听了明明的话，我忽然想起班主任陈云澄老师对我说过的话，便理直气壮地说：“可我们陈老师告诉我，多学古诗，对写好新诗会有很大帮助，现在好多新诗不像诗，就是因为丢掉了古典诗词中的好的东西，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给你举个例子：‘香车系在谁家树’和‘伏尔加停在谁门前’，你说哪个更像诗？”

“香车”和“伏尔加”两句是陈老师给我出的一道题，两句话语法结构全一样，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可前句是诗，后句却不是诗。当初我百思不得其解，插队前去老师家辞行，老师告我古人做诗讲究心形契合；心形相应，方为好诗；当时听了还是似懂非懂。此刻拿出来问明明，是想给她出难题，谁知她越发抓住了把柄：“你看，说你中毒了吧？香车是谁坐的？劳动人民坐得起香车吗？‘宝马雕车香满路’，这不正是描写剥削阶级的奢靡生活

吗？”这一问，又把我问哑吧了。

明明看我低头无语，便转移话题：“你想过‘扎根’吗？”

“扎根？”我愕然摇头：“没想过，怎么你想要‘扎根’？”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刚下来时，我是准备要扎根的。那时一心想着，要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可最近，我有点动摇了。艰苦我不怕，但我怕孤独。如果同学们都走了，我一个人留在村里，周围都是社员们，我能和他们聊什么呢？他们很少读书看报，很少关心国家大事，一睁眼想得都是柴米油盐，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很怕时间长了自己也成了一个碌碌无为者，一个村妇，我不能改造农村，倒让农村把我改造了，想到这些我真是失去了扎根的勇气。”

“瞧，刚给我上了一通政治课，刚说我小资情调，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你自己倒嫌弃劳动人民了！”我抓住了明明的漏洞，反戈一击。明明也意识到自己的话前后矛盾，苦涩地一笑。低下头不吭气了。

那场雨下了很久，把我们登顶的雄心完全淹没。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渺小对伟大的征服化为泡影。下山时天色已近黄昏，道路湿滑难行，明明好几次险些跌倒，我不得不拽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冷，我的心也冰凉，不知是因为天凉，还是抑郁的情绪？我望着阴霾紧锁的山峰，在心里默默说，“海坨山，我还会来的！”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14：

第二十二章：割蒿

山路蜿蜒，骄阳似火，八月的蝉声，一到晌午就叫得人心烦。没有风声，没有鸟叫，只有哒哒马蹄声与蝉声做伴。三辆大车，驮着垛得高高的青蒿，缓行在山路上。我坐在头辆大车的青蒿垛上，望着大山出神。

脸上的汗迹黑一道白一道，胳膊腿上，也有一道道被拉拉秧划破的伤痕，全身像散了架。暑热令人困倦，可我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山，丝毫没有困意。割蒿，让我又一次体验了农活的辛苦，掂出这头等劳力的份量。

麦收一过，“割蒿”二字就挂在了社员嘴边上，像城里人念叨春游。“今年雨水好，北刺沟的蒿子准保长得没了腰。”老二爷子乐呵呵地说。“去年怀子割了四百五，不草鸡！今年要是草长得旺，看超得过不？”小伙子们摩拳擦掌。“喂，割蒿你去不？去吧去吧，瞅闲儿能摘山果，榛子，核桃，酸枣，可得呢！”姑娘们唧唧喳喳。

一而再、再而三地听到“割蒿”，还说得那么轻松和浪漫，我忍不住问老二爷子，割蒿干什么用？

“压青肥呀，光指着圈里这点粪肥哪里够，化肥既贵又不能多使，还得靠割蒿沤青肥呀”，老二爷子答到。

“去哪割呀？”我问。

“南山北刺沟上边，坡可陡呢，敢去不？”“去！”我最喜爬山，何况社员们说得那么令人神往。

“割蒿苦着咧”，老二爷子笑嘻嘻地冲我说，“头等劳力至少割满150斤，割不够可不成！”“啊？还有定额呐？”我听了便有些踌躇，怕自己完不成定额。“150斤不算多，怀子去年割了四百五，一天挣了三天的工分呢！”老二爷子的语气，就像怀子买彩票中了大奖。“那您说我割得了150斤吗？”“要能找到好地块，割300斤麻溜的”。老二爷子的话模棱两可。

社员们盼割蒿，可天公偏不作美。从七月中旬，雨就不断。秋庄稼地里野草疯长，社员们天天披块塑料布，拿着大锄钻在青纱帐中拉地，蒸桑拿一般。锄罢草，又该刨山药了。一窝山药一窝泥蛋蛋，两筐山药上百斤，从垅中挑到地头，头上淌水，脚下打滑，壮劳力也累得脸煞白。好容易熬过八月中，天放了晴，山药收完了。老二爷子发

话："明天去割蒿。"半夜里，老二爷子来招呼我们上路。京辉和张颐当时专职负责维护队里的水稻田，割蒿不用去；建生轮到做饭也不去，去的就我和德起。我俩带着干粮到队部，三辆大车坐得满满当当出了村。夜黑黢黢的，车上人挤着靠着打瞌睡。寂静中，偶尔有人突然骂上一句，那准是不小心让镰刀扎着了—一把把镰刀磨得贼快！

也不知在山间小路上摇晃了多久，但见头上星星由银色变金色，又渐渐淡成白色。天光朦胧，东方的群山隐隐露出了轮廓。晨风中，一声雀鸣，蓦然抬首，大车已过了西灰岭。山路弯曲延伸，路边岩石和灌木丛依稀可辨。马蹄惊破寂静，林间小鸟突然唧唧喳喳叫起来。我坐直身，深吸一口气，只觉一股清凉沁入心脾。忽见山林间泛起一层浓雾，贴着地面，无声无息地涌来，把周围裹成苍茫白色。

"瞅着点道，别光迷糊！"老二爷子叮嘱赶车的大先生。大先生哼了一声，赶着辕马往里侧靠靠。雾越涌越急。密密的水气从身边掠过，脸上顿时一层露珠。辕马似乎看不清路，有些不敢往前，大先生跳下车，挽着缰绳，甩着响鞭，吆喝着辕马和梢马奋力向坡上爬。渐渐的，雾淡了，转过一个山湾，忽然云消雾散，晨光清澈，青山壁立，绿草如茵。东山之巅，一轮红日步出山尖，万道霞光，充盈天地之间。

大车过了四司，又往上爬了一会儿，停在一个山坳口。社员们跳下车，顺着山坡上一条小路走向山谷。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小平岗上，有棵老榆树，枝如冠盖。大家把干粮袋放在树下，坐着歇歇儿。我翘首仰望，看不到山顶，便问老二爷子："这离山顶多远？""远咧，还有一半路呢，"老二爷子答到。

"好高的山呀！"我惊叹着。想想在头司插队的女生，感叹她们一定比我们更艰苦。我打量着周围，这片山坡土层很厚，很肥，斜坡上长满茂密的灌木和野草。刺梅、线菊、蔷薇、丁香、死不了，各种野花姹紫嫣红。我正看得入迷，忽见社员们都向山坡上眺望，有的还一边指点一边议论，听听，才知大家是在看草色，从草色中看出何处蒿草长得旺。我和德起跟着瞎瞅半天，看不出个所以。"你们头回割蒿，咋看得出？"老二爷子笑着说。"一会儿跟着个社员，可别费半天劲儿，割些荆条回来"。

社员们散开上山了。国柱带着德起，我跟着老二爷子。坡陡没路，野草没膝，又湿又滑。我一手拿镰，一手拨草，紧跟在老二爷子屁股后头，用力攀登。走到一块坡坎上，老二爷子指指一片野草说："这就是蒿子，这片草能割个四五十斤，你就先割这块吧。"说完，继续朝坡上爬去。

"这就是蒿子？"我乐了！高杆，网叶，嫩绿，味道刺鼻，这草我太熟悉了——十八号大院里有的是。我蹲下身，刷刷割起来。不到一个小时，草已割完。用绳捆上，背起朝下走，，坡陡谷深，脚底又滑，只能半蹲着，两手抓紧捆绳，一步一步往下挪。好容易蹭到下边平岗上，已是大汗淋漓。把草交给掌称的大先生，一约，大先生喊一声："老匡五十斤！"记工员焕秀便记在本本上。"老二爷子眼力真准，说五十斤就是五十斤！"我心里赞叹。

按定额，头等劳力割150斤算完成任务，多割加分。我对加分不敢奢望，定额可必须完成。一看记工本，我的

天，别人都割了一百多斤，有的姑娘也割到百斤了！我不敢松懈，赶紧扭头向坡上爬去。

满坡转悠，偏偏找不到一块像样的蒿草。好容易寻到一片，四周却又长满拉拉秧。拉拉秧伏地蔓延，满藤是刺，拉肉生疼。万般无奈，只得先割拉拉秧，清出一条通路。待进到蒿地中，手脚已被划出道道血痕。烈日当头，暑热逼人，我脱光膀子，钻进草丛割起来。这块草杆粗茎老，镰刀不一会儿就钝了口，半割半砍，越发吃力。玩命半天，总算割完了。归拢一堆捆起来。自觉颇有些分量。咬咬牙背上肩，一步一步往下蹭，心想这回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忽见一旁坡上，二石也背着捆蒿，拄着根棍往下走。那捆蒿大得像座小山包，把魁梧的二石压得涨红了脸，相比之下，自己这捆蒿小得可怜。到了岗上，大先生接过一约，喊一声："老匡60斤！"我听了心说妈呀，玩了半天命，还差四十斤呢，精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不想动了。

"大哥，你割了多少？"荷莲笑吟吟地走过来问，她两手兜着绿衣襟，里面有些酸枣，几枝野花。

"一百，你呢？"我反问。

"一百五，差不多了，摘点酸枣给老疙瘩。大哥，要帮忙不？""不用不用！"我连声说。一骨碌爬起来，又向坡上攀去。心中暗想，自己真废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不如一个姑娘割得多，今天要是割不到150斤，那可现大眼了。眼看四周，有草之处都让社员割完了，无奈往坡高处找。可越往上爬草越稀疏，只能东一把西一把地乱割，出力不出活。眼瞅太阳爬过头顶，估计早到了饭点儿，愈加心慌意乱，没了力气。把割下的草归拢一堆，左看右看到不了五十斤，最后把牙一咬，心说死活就是它，割不够150，还当二等劳力吧。

把第三捆蒿背下来，我已狼狈不堪。一头蛛网，满脸泥土，鞋尖被脚趾头顶破了，大拇趾露出鞋外，裤腿剐了几个大口子，走路趔趄，像个醉汉。坐在大榆树下乘凉的国柱看见了，连忙迎上来，接下蒿草，问我割了多少，我说还差五十斤。他拾起称勾住捆绳，把秤砣打在五十斤的位置上，左手拎称猛地一提，右手一松，秤杆忽地翘起，没等秤砣下落，国柱嗖地捏住秤杆，冲着在老榆树下做针线活的焕秀喊了声："老匡50斤！"焕秀记在小本上。我看着，鼻子有点酸溜溜，身子一松，坐倒在地。德起乐呵呵走过来，问我割够没？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问他割了多少；"我割了一百八，还给兔子割了些苦麻儿，老匡你猜谁最多？"我想想，"是二石吧？""没错！"德起张开巴掌晃晃："整五百！"歇完歇儿，三辆大车垛满蒿草，踏上归程。午后骄阳似火，有些社员嫌热，找树荫处睡个觉再回村；回去的社员在草垛上或坐或卧，也都打起盹来。我在头辆车，坐在松软的草垛上看山景，旁边是孙三和焕秀，俩人背靠背打瞌睡；二石坐在草垛前边，闷着头抽烟；大先生坐在左辕上赶车，荷莲坐在右辕上，靠着草垛用柳叶吹小调。柳叶声悠扬清脆，在单调的蝉声与马蹄声中，显得格外动听。

车到一处下坡，大先生挽挽缰绳，收慢马速。冷不丁路边草丛中窜出一只石鸡子，从马头上一掠而过。辕马猛地一惊，高扬前蹄，长声嘶鸣，突然奋蹄急驰。我们没有防备，全都摔在草垛上,赶紧抓住刹草的大绳，身子随着颠簸的大车上下起伏，几乎滚下车去！"大先生！你奶奶的快刹车！"二石摔了个仰面朝天，边骂边爬起身，朝前

一看，脸一下煞白：左辕把上空空荡荡，大先生已坠落车下！受惊的辕马无拘无束，带着梢马，拖着大车向前狂奔，这段下坡虽不陡却很长，尽头处又是个转弯，里侧岩壁，外侧深谷，若任凭惊马奔跑，必在转弯处冲下山谷！荷莲在车头吓得大叫，孙三和焕秀抱头闭眼，我也束手无策，想跳车可车速太快，眼看坐以待毙。

就在一瞬间，二石纵身从草垛跃到左辕，一手死死拉紧车闸，一手使劲拽住缰绳，高声吆喝：“吁——！吁——！”车闸啃着车轴，发出刺耳的尖叫，车速稍缓，但惊马仍拼命狂奔。眼看离转弯处不到十几米了，二石噌地跳下车，一把拽住辕马嚼子，拼命把辕马向里侧挤。辕马体大膘肥，蛮劲十足，昂头嘶鸣，马蹄怒踏，把二石朝外侧硬拱。眼看已到转弯处，大车仍贴着外道向前俯冲，二石被挤到路边，拽嚼子的手勒出血来。再往前，连人带车就要跌进深谷！

二石大喝一声，双脚蹬住路边水泥墩，全身发力，猛地把辕马向里一顶，大车刷地一甩头，几乎横在路上。左侧轱辘撞在隔离墩上，硬把墩子撞下山谷。辕马站住了，大车停住了，我探头向下一看，好悬，车轱辘有一半已搁在马路牙子外边了！孙三缓过气来，大叫一声我的妈呀，便呜呜大哭，荷莲和焕秀脸色苍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时大先生一瘸一拐地撵上来，所幸只是崴了脚。后两辆大车也赶到了，见此情景社员们都说好悬，再迟一步我们就要去见阎王爷了。

二石让马定定神，扭正车头，从大先生手中拿过鞭子，驾辕前行。仨姑娘说啥也不敢坐车了，宁愿徒步跟在车后。我笑了，“怕啥？有二石掌鞭，啥事没有”。说完爬到草垛上，看着二石赶车，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头等劳力，不服不行！

（未完待续）

庄生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7

【我的孔化营】连载15：

第二十三章：白老师

夫子日记：1974年9月17日：

“上午让建生进城买肉。昨晚白老师带了四个高二女生来，搞社调。约了今晚在我们户吃饭。下午和高二同学座谈，聊了一下午。晚饭做了几个菜：青椒炒肉片，肉丝炒蒜苔，肉末豆付，素炒洋葱头，炖粉条；主食金银卷，大米粥。吃饭时高二女生说（学校）教学秩序很乱，谈到学校的情况，（白）长声叹气，无可奈何，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1974年9月18日：

“晚上到一队为调查队送行。白老师吃完饭突然犯病，（我）和德起忙去请金萍来，看后打针吃药，稍有好转。最后商议，留一名女生（梁年）照顾白老师，我们送另三位女生到盛石营。晚上白老师住在王以然处。送完女生回来，我们在一队聊到很晚。”

1974年9月19日：

“今天轮我做饭，早起和煤、挑水。上午去看白老师，好了一些。早上刘岩和京辉给老师送去五个鸡蛋。上午几位女生在村里给知青照了一些相。”

在《我的高二三班》一文中，我写过白正衡老师。上“150”时，头一次见她，日记中这样写到：“今天向学校管团的白老师报告支部选举情况。第一次见白老师，给我深刻印象；她看上去很苍老，消瘦，额头布满皱纹，头发灰白，面容显得疲倦而又有些憔悴，背有些驼，听人说话有些侧着耳，好像有些耳背，总之像个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可是她扎着两根大辫子，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很快，很干脆，思维很敏捷，走路像小跑，又像是个年青人。”

那年白老师一趟又一趟来到永宁，插队前我跟着她已跑过两趟（第一次遇雪，长途车半路返回），插队后，日记记着她来孔化营至少四次，而她除了孔化营，一定还去过其他知青点。京城到永宁的路大半是山



路，崎岖不平，我每走一回都要晕车，吐得一塌糊涂；白老师羸弱之躯，长途奔波，辛苦可想而知。她每次来村，总要到每一个知青户去看望，我们村的知青户分布在五个生产队，要把这五户转过来，谈何容易！

我时常想，白老师为何要一趟又一趟地来到永宁呢？学校每年都有学生毕业，人走茶凉，学生走向社会，老师责任已尽，学生的冷暖炎凉，与老师无关。可白老师似乎特别牵挂我们，牵挂这些走入山里的孩子们；虽说她不可能在物质上给我们什么帮助，但她的每一次到来，都在精神上给我们慰藉。也可能因为我们是文革期间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像家中的长子，得到了更多的母爱？

那个夜晚老师突然发病，是积劳成疾，还是忧郁成患？我觉得二者兼有。在学校，何时见她，都是一脸倦容，眉头紧锁，像匹负载过重的瘦马，添根稻草都会被压垮。究其原因，大概因为她是做政工的。那个时代凡有良知者而又去做政工的，都是悲剧性人物。因为时代是悲剧时代，政工干部不可避免是悲剧里最尴尬的演员。她要带头批判“十七年”，同时又要品尝批判带来的苦果；她要鼓励学生叛逆传统，同时又要尽量维系到处失控的教学秩序；她要负责把一批批学生安排到贫穷的乡村，却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无能为力。除非泯灭良知，助纣为孽，否则就要时时面对“生存还是死亡”的拷问。

毛老人家说过，要想发动革命的行动，先要制造革命的舆论。从“迎闯王，不纳粮”，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都是如此。小时看了《军队的女儿》，恨不得立刻奔赴天山，投身鲜花盛开的牧场，这样的冲动从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我们，和我们的学弟学妹们。在150，安排我们插队，是白老师的使命，但她从没有向我们编织永宁多么美好的神话，她把每个村的大队干部请到学校，请他们向我们介绍实际情况；在带我们赴永宁踩点时，面对塞外寒风，她语重心长地说：“真是塞外的风呀，像小刀子刺人！同学们，你们要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呀！”

我想，白老师带即将毕业的同学来我们村调查，也是要让她们了解农村的艰苦和落后，对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做好心理准备。同时，她也的确牵挂着我们，就像牵挂她自己的孩子。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他讲到自己残疾后，精神苦闷无法排遣，终日坐着轮椅去地坛沉思。好多回他在园中呆得太久，母亲就来找他，来找他又不想

让他发觉，只要见他好好地在园中，就悄悄转身回去。后来他母亲走了，他才深切体验到母爱的伟大，他这样写到：“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或许，插队时白老师一趟趟来孔化营，来永宁的南七村，那心情就像作家的母亲，一次次去园中探望她的儿子；或许我们也可以说，这孔化营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们的足迹，有过我的足迹的地方也都有过老师的脚印。

【我的孔化营】连载16：

第二十四章：护秋

夜幕笼罩着青纱帐，山野一片寂静。我裹件棉大衣，蜷缩在鹰沟洼玉米地里，一动不动。已是后半夜，寒露初上，雾气渐重。阵阵凉风贴着地皮溜过来，吹得秋虫缄口无声。我仰望天空，觉得颗颗星星像是月光凝成的露珠，将天地之间布满寒气。“塞北的秋夜真冷啊！”我叹息着，缩着脖，裹紧大衣，靠住棒秸堆，细听四周的动静。南山上，偶尔传来一两声野兽的嚎叫，给夜色平添了几分恐怖。“要能拢堆火，烤几个老玉米，该多美！”一想到暖人的篝火，焦黄的棒子，我越发感觉寒冷，肚子也咕咕叫起来。我赶紧抛开遐想，轻轻掏出一个生棒子，慢慢啃着，不敢弄出声响，生怕惊走了我苦苦守候的猎物。

秋天到了，乡村的秋天是四季中最美好的季节，沉甸甸的老玉米，红彤彤的高粱，黄澄澄的谷子，金灿灿的黍子；苹果树挂满了苹果，向日葵结满了葵花籽；菜园里茄紫萝白，大白菜一棵棵站得横平竖直……；秋天是农村的节日，一年的辛苦有了回报，粮食收到仓里，钞票揣进兜里，明年的生活就有了着落。



处暑刚过，大队就组织护秋队，每个生产队出一个人，除了看本队的庄稼，还要看大队的果园。老二爷子找上我，“看青，活茬不算重，就是熬人，早出晚归，耽误家里的活计；还得实称，不偷懒耍滑；还得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老匡你干成不？”

我进了护秋队。8月25日那天晚上，管治安的马德才在大队部召集护秋队布置任务，“今年年景不错，粮食增产板上钉钉。不过要做到颗粒归仓，就得有劳各位，咱村每年都出些妖蛾子，偷三摸四，揩集体的油。大家盯紧点，逮着了，不管他是天皇老子，该罚就罚，决不包辟！”从此我每天四点多爬起来，提着镰刀，下地转悠，虽说辛苦，心里倒也高兴，可以拿本书看。

头几日，除了有小孩偷摘些果子，没丢什么庄稼。我很轻松，抽空还帮社员砍棒子；有时走到山坡上，俯瞰田野，触景生情，总要诌上几句歪诗。快到“十一”了，我想写首诗，借歌颂祖国，反映插队生活。

谁知到九月上旬，地里丢开庄稼了。不是掰走一片棒子，就是葵花给剃了头，而且丢庄稼的地块东南西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马德才召集护秋队训示，逮住小偷要重罚，谁也不许徇私情。我们护秋的，猎犬一般，四处设伏，却每每扑空，这小偷儿显然是个老手，好像故意和我们捉迷藏。一时间，村里议论纷纷，大队书记在喇叭里讲了几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弄得“地富反坏”们惶恐不安，不知又要整到谁头上。

一天上午，我看青转到葫芦头，碰上七队社员砍棒子。二臭看见我，老远就喊，“喂，老匡，抓住贼没有？”我走过去，苦笑着摇摇头。怀子说：“也不知谁这么缺德？摘一个俩的不就成了，越偷还越来劲儿！”孙仨说：“这偷东西像抽大烟，也上瘾呢！”老二爷子说：“早先丢庄稼有个法儿，能查出贼主来。”“真的？什么法儿？”我忙问。“油炸小面人！捏些个面人，写上人名，搁油锅里炸。平常人一炸就浮起来，可若是贼，一下油锅就沉底，浮不起来！”大伙一听，都哈哈笑起来。国柱说：“二爷现在什么年代了，还闹迷信？再说咱村现今一千多口人，都炸一遍，得多少面，多少油呀？”老二爷子也笑了，挠挠腿上瘦筋说：“不过是个玩笑话。其实老人也不一定就信这法儿，只是气不过，总得作个法吓吓贼罢了。”国柱说：“吓贼不打紧，我们清白人也跟着下油锅了！”大伙又都哈哈笑了。



二臭接着说：“依我看，这次不是小偷，保不齐是个黑瞎子啥的，老匡你可要小心，不行找德远，借他那杆火枪带上，免得遇上黑瞎子吃亏。”国柱问：“你咋知道是狗熊干的？咱这山里有狗熊吗？一张嘴就胡勒勒！”“你看那小偷像不像狗能掰棒子？小偷偷棒子要都带走吧？这个小偷拿一半扔一半，不像狗熊掰棒子吗？”老二爷子点点头，说：“也是，这个小偷有点邪，不是偷，简直就是祸害，好像跟咱有仇似的！狗熊不可能，咱这山上现如今连狼都没了，哪来的狗熊？不过这个贼有点不一般，老匡你还是小心点，夜里别走太远，别挂单儿。”“知道了，”我点点头，心里说哪有这么严重？俗话说做贼心虚，咱还能让贼吓着？

立秋后，每晚我都到广播室，讲半小时《金光大道》。那天晚上在广播室讲完故事，一出门遇到马德才和几个看青的，马德才提根棍子，看见我说：“正好，老匡，走，抓赃去！”“找到贼了？”我问，德才点点头。我

喜出望外，紧随德才出了大队部。下了高坡奔西，走着走着，觉着不对劲，竟到了七队，竟到了我们住的那条巷子。“队长，怎么到我们七队了？谁呀？”我急着问。“荷莲”，“荷莲？”我大吃一惊，停住脚说：“搞错了吧？她怎么会偷东西？”

第四夜，正是国庆节的前夜。我躲在鹰沟洼的青纱帐中，啃着生棒子，仰望河汉星空。恍惚间，天空闪烁五彩缤纷的烟火，雪亮的探照灯劈开夜空，一张张小巧玲珑的降落伞像白衣仙子飘然而下……这是小时候随爸爸到天安门看烟火的情景。童年的回忆总是甜蜜的，甜蜜的回忆总勾起对亲人的思念。此刻，京城的父母，内蒙草原的哥哥，延安黄土地的姐姐，他们会梦见我吗？他们会想到我——家中最小最瘦弱的孩子——正固执地守在寂静的田野吗？

长夜即将过去，天上微明，晨雾无声无息地涌来，缓缓覆盖了青纱帐。就在我为徒劳一夜而有些沮丧时，忽然听见了一个脚步声，停了一会儿，便响起嚓嚓的掰棒子声。贼来了！我的心咚咚跳着，全身绷紧了，手握镰刀，蹑手蹑脚绕过去，抄到贼身后。借着晨光，我看见一个黑糊糊的人影，正提着个口袋掰棒子，大的扔进口袋，小的随手丢在地上。我悄悄走上前去，离贼还有五六步远时，脚下咔嚓一响，贼猛地回身，和我打了个照面。我吓了一跳！

这是个陌生人，个头很高，瘦如骷髅，乱发垂肩，脸黑似炭，衣衫褴褛。看年龄，大约三十岁上下，一双大牛眼，透着凶气。看见他比我要高出一头，我有些害怕了；特别是他那蒲扇般的大手，骨节儿上青筋爆起，一看就是常年干重活的样子。我掂量着，单打独斗自己肯定不是个儿；可离村太远，若要叫人也来不急。好容易和贼照了面，偏又不认识，要让他跑了，和社员们如何交待？尤其是荷莲的冤屈如何洗清？想到此，只能壮着胆，和贼对视僵持着。

对视片刻，那贼毕竟心虚，仍下破麻袋，转身要跑。我猛扑上去，搂住贼腰，二人重重地跌倒在地。那人虽然枯瘦，却有蛮力，手如铁钳，抓人生痛。我几次被摔在一边，总又爬起来抱住他。一边打，一边高声呼喊，那汉子急眼了，一拳把我打倒在地，双手死死扼住我的咽喉。我被压在下面，动弹不得，喉节咔咔响，眼前金星乱冒。就在绝望时，忽然掐着我的手松了，那贼歪倒在地。曙光中，我看见了荷莲，手握一根棍子，呆呆地站在面前。是荷莲把贼打晕了，我绝处逢生，猛地翻身压住贼，从兜里掏出麻绳，将贼手紧紧捆上。

“哥——！”荷莲叫了一声，扔掉棍子，慢慢跪在那人身旁。

“哥？”我惊呆了。我知道荷莲有个哥哥叫三锛子，村里人叫他“潮货”，意思大概和城里人说的“二流子”相似。去年因为耍流氓，被抓去劳教了。难道眼前这瘦骨嶙峋的人就是三锛子？他怎么会跑到这来？我望着荷莲，满心疑惑。

“哥，莫怪妹子手狠，你要弄出人命呀！你不该从劳改农场逃跑，更不该跑回村来呀！你说你在西山洞里躲几天就奔口外去，可你不该偷庄稼呀！知青大哥是好人，你若杀了他，下辈子当牛做马也赎不清你的罪孽呀！”荷莲跪在哥哥旁边，流着泪责怪她的哥哥。她抬头看看我，低声说：“大哥，我不该瞒您，都怨我，那天晚上我是出村去了，我是见他去了，打村里一丢庄稼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干的，他恨乡亲们呀，我劝他投案自首，或者走得远远的，可他就是不听，他说他还要看娘一眼，老天爷呀，我真是作孽呀！……”说着，已是泣不成声。

我明白了一切。我马上想到如果抓回三锛子，荷莲将背上什么样的罪名。上有盲母，下有傻弟，这个家如果再失去荷莲，无疑会家破人亡。左思右想，咬咬牙，解开捆着三锛子的绳子，对已经清醒过来的三锛子说：“为你娘，你妹你弟，赶紧走得远远的！”



三锛子消失在青纱帐里，我陪着荷莲往村里走去。长这么大，我第一次抓住一个“坏人”，而第一次抓住坏人就放走了，我不知自己是对是错。我明白，丢庄稼的事终止了，可荷莲背着的耻辱也永远无法洗刷了。晨曦染红了漫川青纱帐，密匝匝的棒叶一齐随风摇曳，轻轻地将太阳捧出了山巅。国庆节到了，想到巍峨的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正冉冉生起，本应是庄严和喜悦的时刻，可我心中却充满怅惘。四个长夜的潜伏竟换来这个结果，我苦笑着暗问自己：“这就是你献给共和国的颂诗么？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

【我的孔化营】连载17：

结语

孔化营的第一年写完了，孔化营农闲，我也该歇歇儿了。六月要去湘西出差，行前要准备材料，而且天气也渐渐炎热，暑天宜闭目养神，让同学们汗流浃背听我絮聒，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每次开头都雄心万丈，可写着写着就胆怯起来，心里总在嘀咕，不知同学们爱看不？不知我该写不？同学们的时间宝贵，精力有限，把宝贵的时间和有限的精力用来听我啰嗦，让我有犯罪之感。休谟说过："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人们或者认为我自己擅写自己的生平，那正是一种虚荣"；高三幸同学也说过："我并不提倡总是回忆往事，毕竟已经相隔三十年，中间成长了整整一代人"；先哲和才女都这样说，可见写回忆是件求虚荣而又费力不讨好的事。

不过我总是忘不了那个年代，忘不了十八号、张湾、高二三班、孔化营和混凝土班。大概这正是我没啥出息的原因：总留恋苦难岁月，必定是受苦受累之命。这也是无法可想，岁月将一种情结烙印在心，其状无法描述，像是魂儿被勾去了，总想回去，这就叫魂牵梦萦吧？91年去张家口出差，回来途中拐到孔化营，直奔国柱家。可惜国柱出远门，只有嫂子（小名二奔儿）和儿子在。那天晚上坐在炕头和二奔儿拉家常，窗外明月当空，蛐蛐声脆，没有闹市的喧哗，没有演不完的电视剧，心变得宁静，好像找到点青春的感觉，或许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可留恋之处，只因我们的青春留在那里了。

日子比当年好许多，可也难免有坎坷。遇到坎儿时，想想当年吃过的苦头，似乎总能抚平心中的伤痛。我看这情结不只我有，插队同学都有，所以大家都爱回村"料料"。在王家山插队的韩密通同学说过："我始终认为，那一段经历是我人生银行中最大一笔存款"，这话说得真棒！那么大一笔存款放在那，咱能不惦记吗？

所以尽管没大出息，还老是冥思苦想，还老是在码字儿，一码码了一大落。可是还有许多插队同学没写到，像

英进、以然、史玮、大宋……；还有许多农村干部没写到，像公社书记高云鹏、团委书记小侯、派出所民警小畅……；唐谦的故事也才开了头，第一年是他的黄金时代，因此他鸿运当头；第二年大概就是他的黑铁时代了，所以他晦气缠身。孔化营接下去的故事应该更精彩，更可读，只是我不知啥时才能重又鼓起万丈雄心，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呢？唉，过一村算一店儿，该歇歇儿时，我还是歇歇儿吧！

沁园春.《我的孔化营》结语

一岁栽桃，岁岁芬芳，几度刘郎。自新春赋笔，屏前百日；键敲河汉，网绘残阳。锦绣年华，多情儿女，十里长安笑一场。出城去，做幽州骏骨，燕赵娇凰。

都说绝塞凄凉。吾独恋、槐花那瓣香。梦辘轳金井，落红堆砌，宅生蔓草，月照萧墙。曲倩乌丝，指拨筝雁，泪洒筝弦第几行？谁解我，效痴僧贾岛，苦炼文章？



附：京晖兄曾在班网写过一篇回忆短文，我以为写得很好，冒昧加上标题附后，以作貂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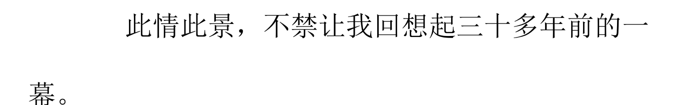
孔化营的一桩往事

黄京晖

看着同学们传上来的孔化营的照片，感慨万千。虽说村里盖了些新房子，然而，大片的旧宅子和泥泞的村间小路却依然如故。一两座主人离世的房屋，由于年久失修，愈发显得破旧不堪。这个塞外山村，三十多年来的变化与

离它仅仅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京城真是天壤之别。当我的目光浏览到国柱的照片上时，一下子像被磁铁吸住，再也挪不开了……。

他那一脸朴实而憨厚的笑容如同三十多年前的他，岁月已使他两鬓苍苍，可他仍然那末健硕，还像他当年七队的头等壮劳力。眉宇间那淳朴而热情的目光，让我感到格外亲切。国柱得知同学们要去，已经激动了好多天了。他为我们七队的每个人（卫群，张颐，人壁和我）都备了罐小米。遗憾的是我们四个，三个在国外，卫群又出差，没人能回去。我只好拜托我未过门的媳妇儿王琍去看望他。国柱见到王琍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也几次中断。他一个劲地对我说，“有时间一定回来，俺盼着你们呢，乡亲们都盼着你们呢……。” 听到他那哽咽的声音，我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此情此景，不禁让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幕。

75年的春天，来的格外的晚，正月十五都过了好多天了，北京还是冰天雪地的。在北京歇过了农闲，我和卫群约好先行回村。长途汽车出了德胜门，过了昌平就上了108公路。塞外的天气比北京更加寒冷，起伏的山川被一片白皑皑雪覆盖着，落光叶子的枯树干和树枝，被寒风刮得呜呜作响。寒风从车窗缝里钻进来吹到脸上，就像刀子割似的。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赶紧把露出的头缩进竖起领子的军大衣里，我突然感到一丝凄凉。心中暗暗的问自己：“我还得在这个广阔天地里干到哪年哪月呵？”

长途车到了永宁，从永宁到孔化营三里的路程对我们当年的年青小伙子来说，不在话下。只是一路上，望着那白皑皑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附近被白雪裹着的小山头，心中愈发凄凉。很快我们进了村，由于还是冬闲，进村后没碰上几个人，街上只见到一条出来觅食的黑狗。还碰到一个小男孩儿，我认出，他是夏天和我们一起下塘抓蛤蟆（青蛙）的我们七队的那个小家伙。他看到我们回来，嚷嚷着，回来了，回来了，跑去报信了。

我和卫群回到了我们住的房门前，吱扭推开了房门，往里刚迈了一步，我们俩就呆儿那了。原先装得满满水的水缸，被冻裂了，里面的水冻成了冰，那冰从冻裂的水缸缝里龇出了牙。我的心扑嗵一下像是掉进了冰窟窿里。我俩一屁股坐在了炕头上，再也不想动了。

这时听到有人叫着，回来了，回来了，就进了门。那是国柱，我们好像一下子有了救星。国柱比我俩大几岁，是我们七队的头等壮劳力。平时下地干活，就经常帮我们。晚上没事时常来我们这唠磕，我们把他当作大哥一样，不懂的事就问他。国柱的媳妇也是个热心肠，教我们怎么用灶和用风箱，怎么烧炕，还教我们怎么做贴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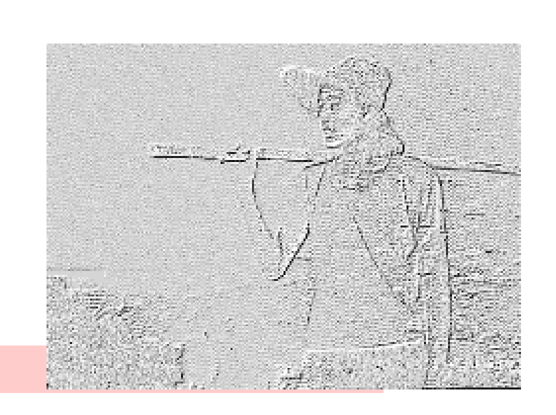
子…。看到国柱来了，我和卫群像是有了依靠。国柱告诉我们，我们回京的时候，不该把水缸装满水。他还告诉我们，队里有缸，先拿一个，叫队里的会计从我们的工分里扣。天大的事，他一来竟然变得如此简单。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过来，刚刚的那些惆怅和凄凉被一扫而光。



在国柱家吃过晚饭，他媳妇把我们放在他那的被褥抱了出来，我和卫群一下子傻了眼儿。被褥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正正齐齐。零下几十度的气温，在当时的条件下全部得用手洗，还得去塘里洗，冰天雪地的，水冷得能刺透骨头。记得第一次冬天挑水没带手套，抓铁桶的手被活生生的粘掉了一层皮，里面的肉都漏了出来，疼了我好多天。看着那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正正齐齐被褥，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还存在着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感情。那一幕被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刻骨铭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插队时从乡亲们身上感受到的那淳朴而真挚的感情，一直铭记在心，难以忘怀！那是我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插队生活中，所得到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受益终身的精神财富，它让我明白了应该如何去做人！





一点苦难一点光荣

我原是陕北老插，1969年到延安府河庄坪乡红庄村插队。在黄土高原上生的久了，土攻了心入了血，注定要带一辈子土气。时日一长，越发油然而自然。

其实咱们都明白，革命洪流天翻地覆，插队只是其中的那么一小截波涛而已。时日长了，除了老插之外，没多少人对此有大兴趣。年老的，一提起那段时光，转过身就泡在仇恨的水缸里。年轻的，现如今多半已然脱了爹娘给的肉身，从灵到体已经换成钱和性了。六亲不认，哪还有功夫跟插队费劲。年少的，睁大一双天真的大眼睛，问我们在那绿色的山野中，当初春的微风刚把嫩草推弯了腰，是否看得到小白兔红宝石般的眼睛在闪烁？当告诉他们庄里老乡绥令一沟子(屁股)坐在干石堆上，猛然间拔地而起，一窝老蝎子狠狠地在他卵子下面蜇起馒头大小的肉蛋时，看的见眼前崩了一个肥皂泡。插队是老插自己的歌，我们唱给自己和老乡。我们坐在黄土峁子上，说了又唱，唱了又说，这歌声飘飘，出了心窝窝，弥漫在荒山蓝天之间，轻盈在时间长河之上。

自从1990年漂泊海外，我几乎每年都回北京，有时两次。感受家乡亲友之情。老插自然聚在一起。这二年从国家到个人，都鸟枪换炮。大家驱车而来，大院里停了一片私家车，代替以往一溜自行车。饭馆里拼了桌子，摆上酒瓶，放下烟雾，于是山崩地裂。黄土地辛艰的往事，化作清美的甘露，滴着心尖，润到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轰轰烈烈事业。讲的热火朝天，都是陕北平常的事情。如今，想借机会和更多的朋友聊聊天。说说陕北老乡、老插们的吃，受和生活(受，受苦，即干活)。中国有八亿六千六百万农民，他们是中国的困难和关键所在。大多数农民非常穷困。三十年了，我们庄的情况改变不大，多数人没见过火车，外人很难想象陕北人的生活。要是今天中国的官儿们、知识人、青年都记着农村父老乡亲们怎么活着，老百姓的希望就大了。

一、吃在陕北

受苦汉简短的一辈子是简单的，只有三件事：吃，受，日。吃是头等。三事之外，没什么其他的。生下听歌剧，走串着旅游，梦里说梦。若老天有情年成好，喝上瓶烧酒，热辣辣地流过食道，人生就一满(彻底)灿烂了；抽上口自家种的新小烟，大个大喷嚏，呛出泪，神经当下就轻松了。我从北京到陕北，插队第一年感到生活变化太大。吃就是大问题。政府一个月配给知青四十五斤粮食，多是玉米面。没菜，我们向生产队借一桩(麻袋)洋芋(马铃薯)煮了放盐。收工回来，天黑实了。大家懒散地倚坐在门槛炕沿缓着。呆望着柔软的火舔着锅沿没话。锅里煮洋芋的声音清晰而有节奏。没油。门背后墙上有个木橛，用麻绳吊着一块汉白玉，半个小碗大。时光久了，上半截落满了土。洋芋煮烂了，做饭的用铁勺在坚硬的汉白玉上咯吱吱刮下点碎渣，接在碗中，小心倒在锅里。于是乎洋芋汤上泛起几圈油花。抱着海碗，吸溜一口，几个圈圈入了胃，真香阿！那木橛上吊的原来是屹蛋老绵羊油。天凉时节，羊油硬如玉石。在知青饥狼似的眼里，它比真白玉还亲。从冬天到春天，那就是我们的油水。节省着用吧，时日还长。天长日久有时尽，最后汉白玉也刮完了。只剩下木橛吊着无绝期之恨。洋芋煮烂了，做饭的拿着勺子，习惯地回头望望墙上的木橛。勺子里大粒的黄盐，含土的糙盐。现在要给你刮点老绵羊油尝尝，膻腥贯脑，如同一头栽在羊圈里。

早上，天色麻麻，受苦汉影影晃晃地上山了。山里苦重(活累)，干了一老气才见老高(太阳)探出个嫩脸蛋蛋。露水打湿鞋裤。晚上，天色麻麻，受苦汉才影影晃晃，当啷着头下了山。听见庄里婆姨们死声(喊)：“受苦的回来了！”看见月亮在溪水里突突地跳。挣了一毛三分钱。饿的万恶(非常)，累的栖惶。要是有一回能油油地吃下一顿，安安地睡上两天，共产主义那就实现了。老天爷，你怎么就不叫共产主义实现个一半天呢？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就该在教室里生着，饭馆里吃着，大街上泡妞。可我们没这等福。我那时身高186公分，50多公斤，胳膊腿象几截棍棍。一个月四十五斤粮食怎么够吃。连女生一顿也能招呼九两一斤的。我天天都饿，想吃点东西，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卷陕北的小烟，猛抽几口，顶住饥饿。直到今天我也长不胖，疑是插队时落下的根。

记得那是开春之后的一天，暖气回升，阳洼上几棵梨树开花了，远远望去，雪片似地挂满枯枝。背崖上还吊着几丈长的冰凌。时节紧，抢种庄稼。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无人知道踏青。受苦汉每日清早就扛着老镢头上山掏地。苦重。早上的然饭(稠米粥)顶不到晌午。太阳还不正我已是肚皮贴着背了，于是不断地回头远远地向庄里张望。好久，送饭的才起身了。七八个后生担着各家的午饭，摇摇出了庄，分不清是谁，寻着线样的山路。我开始估计，大概还有四十分钟就能吃上饭，于是老镢高高送起，慢慢落下。送饭的终于上来了。大家竖起耳朵，等山上掌柜的米如怀大叔死声：“吃来喽！”受苦汉一拥而上，各自认了自家的饭罐子，就地坐在老镢把子上吃饭。知青的午饭常是玉米饼子，按量做的。我总是吃不饱。那天老乡大高坐在我身旁。手上拿着一个大糠饼子。那东西，黑褐色，快有我的玉米饼子两个那么大。我忽然灵机一动，要和大高换午饭。他看看我，疑惑的说：“这你怕不能行

吧？”我说能行，伸手就把那糠饼子拿过来了。陕北老乡非常憨厚。大高不说话，只是望着我吃糠饼子。那是糠掺了麸子和野菜蒸的饼子。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我端着水，慢慢地吃。糠菜饼子可真难吃，酸涩。起初不会咽，顶住嗓子眼，不下去。而后嚼久了才咽，还是刮的嗓子生痛。不管怎么样，肚子塞实了。第二天中午，我又换大高的糠饼子吃，他笑笑问我：“夜黑地(昨晚)把屎(拉屎)了没？”我直当他耍笑我，没理他，专心地吃糠饼子。其实我昨天真没大便。肚子发胀，没当回事。想来受苦人顿顿不见油，每天杂七杂八塞了一肚子，哪能不拉屎？进出未满足守恒律，不平衡，怕是不妙。到了后半晌，肚子越发胀胀且发圆。收工回去，肠胃很不舒服，晚饭也没吃多少。大家有些奇怪，猜疑是糠吃坏了。可我寻思，庄里有多少老乡吃糠，没见有什么不妥。于是安心。只想等阵子方便一下即可。只是肚子胀的难受，有酸嗝反上来，不如到外面走走。

我走出窑洞，轻轻凉风。弯弯的月，依靠着黑黑的山。黑黑之中，点缀着橙橙的暗格，远远的，那是窑窗的光。庄里好静。我瞎转游，细腿支着胀园的肚子。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庄里的孩子有奇特的体形：紧身衣样的皮包住肋骨，细胳膊细腿。弯腰背后有一串糖葫芦，挺胸前边有两个肥皂盒。但是个个挺着很大的肚子，长园，象半个大冬瓜。六岁的大哥背着三岁的小弟，都是一种设计。这样的儿童以前只是在张乐平画的三毛流浪记中见过。严重的，长期的营养不良。那冬瓜是个垃圾袋，各色的叶，各色的菜，各色的块茎，和了糠，收在里面。我常常记起那些冬瓜，高高低低列成一排，向我们窑里张望。尤其看到美国的儿童在超市里安闲地吃着冰淇凌，奶油落在地上，就想到冬瓜们。如果能让我们的孩子们也咬上一口，唉，人间将迸发出多少喜悦。

我转来转去，最后终于转出成果，屎下来了。我心里悄悄欢喜，吃不了，放了吧。便转去厕所里蹲坑。接着是一场躲不了的苦罪。今年遇到同队知青王济州，见面他就说：“王二吃了糠，拉不下屎。”没错。真艰难。我感到肚子下坠，肠子被揪扯，不久，脑上淌下汗，脊背上也湿了。斗争中不断地嘱咐自己，别再吃糠了，不吃了。忽然觉着这话有点熟。想起来我见过同样的场面，只不过我不是主角。有一天早上我和米如怀大叔相跟着去打坝，走过曹家大院，见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个六、七岁的孩子。妇女站住，孩子在外起坡畔上蹲着。小孩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眉头拧成个疙瘩，咬牙，嘴角抖动着，额头也沁出汗。一双手，枯瘦的小手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胳膊，象是万一松手，就会坠落万丈深渊，与妈妈永远分离。见我注意他们，母亲笑着望着我们，菜色的脸上渗出尴尬。

“咋价了？(怎么了)?”我问米如怀。

“把屎(拉屎)。”“娃娃是不是病了？”“吃糠了。”他回答的很平常。

“小娃娃受这么大的罪，别再给他吃糠了。”“再你吃甚了？”一句话顶的我张张嘴。

“糠，捏成个佛佛，也难咽下。白面，捏成个驴球，也香。人人解下(明白)”米如怀说完了理论，我们也走出一大段路。我跟在他后头还回头看看。母亲站在那里，风飘着她的头发。心口莫太沉。你是妈妈吧？如果除了你的血，你只能喂孩子们糠吃，愿你在来生都珍爱他们。

不知过了多久，斗争终于结束。我走出来，没有几步，腿脚麻的如针扎，脑袋也晕。就站在那里等血脉疏通。从小课本就告诉我们：旧社会农民吃糠咽菜，生活苦不堪言，确实不懂其中之苦。到而今我站在这儿，才算明白。

可旧社会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新社会农民还是吃糠咽菜？尤其想到台湾同胞，美英帝国主义，那里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我们吃糠的新社会农民都不如。要肩负解救这么多人的重任，我感到我这种人是根本球事(完戏)。如果这么多人如同饿狼一涌而来，将我们的糠都吃的精光，后果你能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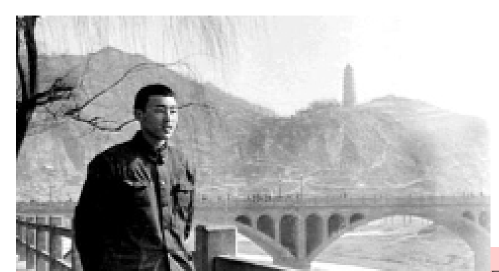
我不是挺着鸡胸的热血战士，看看个自的细腿，哪象坚强斗士。正感到天降大任如山，我辈能完成个蛋时，知青们出来找我。济州打着手电，往这边晃。“怎么啦，掉毛坑里了吧？”“糠受两头，咽不下，拉不出。”“没事吧，回去早睡觉。明儿还得一天。”躺在冷炕上，我觉着这两天人生经历了大事情。咳，想来我才吃了一口糠，就如此的不得了，野草似的陕北人，没声没息，谁听过他们的呻吟？只是插队到山沟沟里，才知道世上有他们。你说，大官们掌握草民命运，他们在忙什么呢？听得见这喘息，看得见这憔悴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又回到了四岁的时候，变成了那个吃了糠的孩子。姥娘(姥姥)从乡下来了，穿着粗布对襟大衫，提着一小篮麻糖(麻花)。姥娘说：“二小，麻糖都给你。谁都不能给二小吃糠！”我高兴极了，伸手抢麻糖。姥娘用满是老茧的大手擦着我的小脊背，给我讲八百老虎攻北京的故事。我噙着麻糖，在姥娘的怀里，睡的真踏实。


去延安了

第二天在山上，米如怀把大高训了一顿：“你兹再不能给他们(知青)换吃糠。你解下，北京娃娃肠胃当根就和我们不一样。受苦汉胃肠生就下装糠，本质上两岔(不同)着．．．”我听米如怀从解剖学上分析了人的脏器的区别，才明白人和人不仅有贫富、贵贱、气质、外表之差，原来内部肠胃也不相同。此乃真理。你看，那些生在特大办公室里头，坐在特大写字台后面，脑特满肠特肥的大官，他们那副装足动物尸体的大下水，哪能和大高、米如怀的一样？而配在这副大下水上的那块肥心，要说是和陕北满身虱子的父母兄弟皮裹着的心是一样的，那才真正是裤裆里拉胡琴儿，胡扯鸡巴蛋。

风吹日晒大雨淋，世上苦不过受苦人。我们庄头有棵老杜梨树。米如怀大叔告诉我们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拦羊(放羊)的九如那阵才七、八岁，赤沟子(光屁股)坐在杜梨树上一整天不下来。吃杜梨。那杜梨大小如指甲盖，熟时甜酸生时涩。吃吧，莫把孩子饿坏了。毛老人家在陕北那阵子光景强，风调雨顺，家家有几石小米一瓮酸菜。毛老在北京坐江山，延安今不如昔。越来越倒塌(糟糕)。问我们，你们知识青年，讲讲，共产主义是咋相，能吃白馍大肉？这些真到是稀罕，只是连下半个月大雨，崖上的路泥泞坍塌，购粮的驴车出不去。二队知青断了粮。吃水都难。知青张天武赤脚担水，脚抓泥地，一手扶桶一手拄铁叉，一步一挪，上得山路。风卷冷雨，打透了全身。好是艰难挨到窑门前，打了个大喷嚏，跌了个大马趴，两桶水泼的光光。后来扛不住饿，在雨地里摘生桃，用水煮桃吃。嫩南瓜拳头大，连蔓子一起煮了吃。那阵，你知道，就快赶上帝修反了，成为三分之二里的人了。早也盼，晚也盼，盼那天空出太阳。


上世纪70年代在延安

云开雾散，万里晴空，共产主义终于实现了。队长贾长高的老子死了。

初夏的一天，收工回来时天色麻麻。我们几个懒散走进庄，见一个人影晃晃而来，分不清是谁。等到了跟前，那人向我扑通跪到，趴下就磕头。我没来得及反应，慌忙把他扶起来，竟然是队长。他擦擦额头，请我明天早上去他家帮忙写簿子(来宾财礼册)；又给阿四嗑了一个头，请他帮忙抬寿材(棺材)。阿四是我们知青里最壮的，好后生，一身腱子肉，故委重任。三言两语，队长转身走了。言语之间并无伤切流露。问了老乡我们才知道，陕北人命溅苦重，活不了太久。凡人过60岁而终，就是喜事。世缘满，了却人间无尽艰辛，故是喜事。所谓红白喜事，结婚与发送老人，人生两大喜事。孝子见人磕头，一是请人帮忙，再是为老人消业。

第二天，艳阳高照，好天气。全队都停工帮忙贾长高发送老人。陕北人，别看穷，不像城里人，自顾自，生怕被邻居沾光，不相往来。庄里一家有事，就是全庄的事情。吃了早饭，孩子们庄头庄尾跑跳不停，一片嬉笑，果然一个大节庆。我睡了个大懒觉，窗外日迟迟，才去上院起贾长高家。他家位在全庄最高处，故称上院起，窑顶上就是脑畔山。红白喜事，陕北都叫“过事情”。操办事情必请总管，安排巨细。米如怀历多识广，受聘为总管。手下有白案掌柜，红案掌柜，迎亲送客，收接财礼，打墓抬棺，布置场面，协调联络，管吹手的，管采买的，管备柴的，管刷碗的等等。米如怀头上歪扎着羊肚子手巾，口里斜叼着石嘴子烟杆，焉然场面总领。收起一脸的和气，改为略有所思的眉眼。各班头领来来往往，反馈情况，听从派遣，井井有条。我受会计米生智领导，在上院起边角上支张方桌。从我屋里带来笔墨砚台，打开簿子。我记人头账目，米生智收钱。来者一家交两块钱，没钱的交四个白

馍。知青想混着交两块钱了事。“那不行。”被米生智挡住，“你们谁和谁一家？谁是婆姨谁是汉？”后来七个人交了十元。有人泡了茶放在我跟前。时光尚早，外庄亲友还没到，事情不多。慢慢看那场面。

贾长高人称精种子。脑水(脑筋)灵光，家境强。上院起六眼截口石窑，一溜排开，真气派。前头两眼兄弟贾长贵生，中间两眼个自生。后面一眼是老汉的，再一眼是仓窑。这场事情前二年贾家兄弟就开始准备上了。可谓钱粮具备。前头窑前支了彩棚，贴了个乱七八糟。棚中木凳上停放黑漆大寿材，多年前做成。估计此刻老汉穿戴停当仰卧其中。棚前两排长凳，五、六个吹鼓手操持长短唢呐鼓板。米如怀歪脑看看日头，挥挥手，吹鼓手于是摇肩骚首，呜哩哇啦，惊天动地。先是《社会主义好》、《东方红》，一阵子又是《走西口》、《三十里堡》。热火朝天。贾长贵的窑是白灶，里面大气如云，从门，窗里涌出，打湿了窗纸。门里一口大锅，下面窜火上面喷云。锅台上支着一架合烙床(压荞麦面条)。云雾中依希可见两个后生赤膊压那床子，荞麦面象蚯蚓样涌入了沸水。中间贾长高的窑是红灶。昨天杀翻了一头大肥猪。巧嘴贺生方大叔任掌柜。肥肉切成寸五见方的块子，能盛一担水的大锅炖满了肉。这阵刚卤透了，油气随风一扬，香倒一道庄。门前堵着闻风而来的冬瓜们，馋虫吐了一地。老汉窑前树立大幡，上贴长纸条，随风舞起。我数数，至少六十五条。显示老汉超过六十五岁，大喜事。婆姨们挤在窑里做纸活，叽叽哑哑。满院喜色，没人悲伤。

日头快正了，院子里熙熙攘攘，远路的亲戚外庄的客人都来了，庄里的狗也都来赶红火，在人堆里钻。打墓的后生回来了，从脑畔山上晃荡下来，象几个土猴。米如怀和土猴们略谈几句，发话打发老汉上路。顿时鼓乐大作，震天价响。吹鼓手在前，孝子贤孙腰上系了麻，徐徐跟上。高潮叠起，一片混乱之中八个后生将棺木缓缓抬起，众人闪开一条路。队伍从院子角落的小路山上，那路又窄又陡，倚着土坡。八个人抬这大寿材，怎么上去？喝的一声“闪开”两后生挥了镢头冲上前，劈斩土坡。没顶什么事。众人赶忙护在一侧。快挪到窑顶那么高的时候，我在下面看见前面两个抬家正是阿四和寅虎。阿四光着膀子弯了腰，粗粗的杠子压在脊背上，肌肉坚硬地绷着，非常吃力，周围一片嘈杂声。他大概这辈子也忘不了。送人的队伍终于转到宽敞的路，上去了。

院子里马上摆放七、八张粗木方桌。人们争先入坐。一桌八人，先孩子后大人，轮流用餐。坐下的搔首摇腚，等着的相互谦让。寻吃的(乞丐)来了，打着二六子(手板)唱起高歌，飘飘悠悠。现在老插中怕只有王克明能唱那歌。陕北人不懂得势力眼，没那种下贱脏病。米生智说同样要招待寻吃的吃好。他们的酸曲(民歌)就是财礼，“不保险跌了年成，大家都得寻吃。”按俗规，凡属事情上的人，除了打墓抬棺的后生，都得等到将众人侍候停当才能入座。我早先就抗不住馋劲，偷偷溜进白灶，向曹富贵弄了碗荞麦合烙，搅了肉汤，端上就吃。菊子大嫂见了，叹了一口气，指指窑后面，“快到后窑掌(窑底)里吃。”我于是蹲在角落里，躲在云雾后面。那地方没人走动，没人注意，好象喧闹也挤不过来。我捧着一大碗合烙，油光光地吃了。我没有立即走开，端着空碗，蹲在那里，等着悠悠升起的幸福。你瞧，今天睡了个好觉，吃了个油光，不山上受苦，这幸福你还能了得？眼看着雾下面人腿晃动，声音渐远，我脑袋空空，抱住这幸福，把它拉长，拉长。

今天事情上吃八碗，红烧大肉块，肉丸子，羊肋子，肉粉条，. . . 四荤四素。荞麦合烙管够。菜用老碗盛

了，尖尖地摆在木盘上。案上的伙计单手脱着木盘，且唱且走。后来王克明写了专门的论文，脍炙人口，研究的就是这盘子。吃食摆在粗木桌上，众人争相称颂。娃娃大人，嬉嬉闹闹，脸上笑成大灿烂。狗以焦急哀求的目光注视着你。扔块大骨头给它，感动的它直把尾巴摇成风扇，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祝福。一切都溶入这真实的幸福之中。我和许小年坐在那里，看看吃糠咽菜的受苦汉如何收拾八碗，好象等着看老光棍如何收拾赤沟子婆姨。

受苦汉长时间没有油水，吃尽糙粮，霍然一大碗大肉摆在面前，香烂人脑，其神情，你想象不到。陕北好劳力讲究好酒量，好烟瘾，好肉量。米大哥是我们庄顶梁柱，也是队里实际主事的。灶上的伙计卖弄身手，单手高举木盘，转动身体穿过人群在米大哥桌上“梆当”放了碗大肉。全是寸五的肥膘，一共九块，在碗里颤悠。我见米大哥坐在那里，左手自然下垂，上身前倾，胸抵住桌子，脖子折下，嘴正在肉碗上方。只见他夹起一块肥肉，用上下门牙轻轻衔住，脖子和身体猛然向上一扬，同时张口，又迅速收下来。于是，那肉飞起来正打在迎面下来的后嗓子上。用后嗓子将肥肉用力挤压几下，再吸那挤出来的油汁，口略一松，剩余的向前掉入嘴中，再用力嚼几下，咕儿，咽下去。这动作一气呵成，连贯流畅。我从来没见有人神情如此专注地吃肉：眼光松散地透过桌子，放在地上，将感觉全部关闭，与嘈杂的外界隔绝。在整个过程中，身体保持着一种姿势。一会，米大哥就吃完了，将些汤也喝净，这才抬起头，目光也恢复如初。我和小年彼此看看，有点惊讶。再有一碗就好了，真希望大哥再能吃一碗肉。为什么想得到的东西总是这么难得到？什么时候受苦汉能常常称心地吃呢？现代都市里腰缠万贯的大款儿，在星级酒店排开生猛酒宴，一掷万金，摆流氓大谱。酸文人刚诱奸了邻居的美妻，就在那里龇牙咧嘴地大讲精神升华，讲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拓延心灵维度和否定物质追求。赶紧让这些人光了沟子坐在老杜梨树上念莎士比亚、唱舒伯特、摆大谱，让我们的米大哥多吃几碗炖肉。天下有多少受苦汉，多少穷人。连施耐庵的白胜都知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可养了这一大帮拉拉蛄吃饱了就无病呻吟，这不是肚脐子杠烟(冒烟)，净些日怪事。


在山上栏羊

二、受在陕北

关于参加有效的社会劳动，陕北人称为受苦，往死受。劳动早就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我的朋友杨军说的好：“手停口停。”陕北人手忙个不停，口还是一个劲儿的要停。这是小人的命运，而君子则动口不动手，生在城里。我们庄地多，有好几架大山，为的是消磨受苦汉。受累一年，人熬的半死，也打不下多少粮食。广种薄收，全看老天赏脸。队里有一块地，麦收时算算，平均亩产才二、三十斤。差不多一半麦子才七、八寸高，其余的不过两尺。人熬了一年，种子也没收回来。“撂了吧，叫荒着。”米大哥和队长说。于是第二年没种庄稼，让土地休息。夏天远远望去，地的边缘杂草茂盛，中间空空，清清楚楚。“咳，人把地都榨干了”。

刚到红庄，第一次给知青评工分，我和许小年是七分半，阿四是八分半。女生也有七分的。队上有点技术的活从来不让我们干，象吆着牛犁地，放羊，牛踩场。我们多作些出蛮力的活，象掏地，打坝，派去河堤出民工。赶上轻活，就是送粪，点豆子。我走运，种了几个月的西瓜小瓜(香瓜)。以前只是在书本上读过农民伯伯扶犁耕地。初次见时感到新鲜。但第一次见到牛踩场时，知青们非常惊讶，以为又回到的前秦刀耕火种的时代。场一般都在山顶平的地方。麦子收下来先垛成四、五米高的麦垛，不怕风雨，以后才脱粒。生产队连大牲口(马，骡)都没有，没人听说过机械化。脱粒是将麦子厚厚铺在场上。老乡站在场中央，左手攥住一把缰绳，右手拿鞭子，吆喝着五、六条牛一圈一圈地在场上转。老牛吹着粗气，用蹄子将麦粒踩下来，屎断断续续地拉在麦粒上。这样一转就是很长时间，奇怪，竟然没转的晕倒在地。

队里羊多。当时红庄人口是168个。我记得有四群羊。每群大约有将近一百只羊。羊毛羊绒是队里的主要收入。羊好，尤其是小羊，白的象一小片云。可摸摸它，挺热。老羊著急，围着你咩咩地叫。我喜欢送粪。整整一冬天拦羊的不断地往羊圈里垫土。羊用小尖蹄把粪蛋蛋和土夯的结结实实的。开春种地，粪土先行。好劳力从羊圈里把粪土刨起来，打散，然后装在麻袋里。一大桩(麻袋)粪土，重的有百多斤。我拉着驴缰绳，队长铆足劲儿，把麻袋拦腰扛起，从嘴里挤出声音：“千万不能叫趟下来(掉下来)。”侧肩将麻袋放在驴背上。我找根软树枝拿在手中，吆喝着驴上山了。走大路，转小路，弯弯绕绕上山顶。走在山顶真愉快，腿脚轻松，风鼓布衫，又没人监督。平时掏地累的半死，休息就趟在草上，不曾好好看看连绵山壑。观山景，远近的山顶都差不多一样高。说明当时是高原。驴见我并不留意它，悄悄将麻袋扭歪，嗵的一声扔在地上。这可大大糟糕。我又要抓着驴缰绳，又要把近百斤的麻袋放上驴背。驴为什么和你配合呢。它巴不得你老也放不上去，好休息。费了老半天劲，刚把麻袋扛在自己肩上，驴又跑了。放下麻袋追它回来，它看我不留意，结实地踢了我一脚。我于是大怒，要惩处驴。手里的枝条太细，扇驴一巴掌，它那老脸上骨硬，不在乎。但自己的手生疼。山上没有树，找不到大条子，驴于是大获全胜。人于是垂头丧气。

夏至前后，山上的庄稼都种停当了。生产队开会，精脑贾长高准备在大路边捡块好地种西瓜小瓜。我们这条沟叫西沟，转来转去三十里长，流水潺潺，冰凉清澈，两侧是山。从沟头到沟掌(底)，红庄、万庄、余家沟、枣圪台，大约有十几个自然村。红庄守在沟口，离河庄坪公社最近。后沟的人走公社，下延安都经过红庄。瓜田刚好选在路边，图谋着天气昏热，进出的农夫走了几十里路，大汗淋淋，专等赚他们的钱。贾长高说的好，：“把棚子架

上，西瓜冰在底沟，后沟亲朋来了好歇息。”于是派倔老汉李丕成和我去种瓜。李老汉是种瓜好手但不识字，我打下手兼记帐。过往路人都认识，受苦汉没多少钱，记录在案，秋后算帐。我高兴得很，听说要住在瓜地，象露营，苦轻。重要的是算算时间可以躲过麦收。早就听说收麦子可怕，苦重的要小命。队上派寅虎，刘二帮助建瓜棚，端端搭在大路的一侧，路的另一侧是斜坡，下去十几米就是沟底小河。棚搭的真好，前面大棚遮阳挡雨，放板凳桌子，能坐七、八个人；后面是三角棚，罩着火炕，能睡两个人。炕头有灶，烧水做饭带烧炕。夜晚田里冷，睡在暖炕正舒服。这里离庄二里地，能听见知青站在庄口喊我回去吃饭。棚子盖好了，我常到这儿转，问李老汉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他总是低着头说：“早着。”过了些日子瓜蔓长了，炕也干结实了，我和李老汉才抱了铺盖拿了杂七杂八搬进去了。天黑了，我们在棚顶吊一盏马灯，象地上的一颗星，孤零零的。李老汉太少说话，蹲在路上望着河水吃旱烟。他爱想啥想啥。我在马灯下看书。夜里气温低，有冷意，不能久坐。躺在暖炕上，听着沟里小河丁丁咚咚价响，心清如夜空，见一念皆无，丁咚声也隐隐而息，梦也没有。

第二天起来太阳已然大高，晒的有劲。四周静的很。我坐在凳子上等着自然清醒，转头看看李老汉不知到哪儿去了。即刻间觉着腿上奇痒，伸手抓抓，越发痒的钻心，好奇怪。挽起裤子看时，腿上一片片红色，如钱币大小。用手一抓，就鼓了起来，痒劲儿也就发了。越抓越发，不可收拾。红斑鼓的好象五分硬币，林林总总，满满两腿。撩起背心看时，肚上，胸上，肩头后背，满了，都是红片片。惊的血液注顶，跳了起来。下意识地用手擦擦，红片一齐发了，通身奇痒。此时已经不能自己，两手上下飞快闪动，抓成一团。背心被扔在地里，大小红片都鼓的高高的，全身象贴满了啤酒盖。后来这痒变成一种全身的针扎刺激，总水平不能抑止，步步升高，脑盖快崩起来了，我口中叫嚷，处于狂乱状态。两手越抓越快，指甲尖沾上了血。忽然，癫狂之中有个念头上升，完了，完了，制止不了刺激水平，今日休矣。急中望见沟底的糙石，赤着脚呼啸颠倒，一路奔将下去。我抓起烫手的石块在身上蹭，在腿上磨。石头面积比几个指甲大的多，粗糙发烫，一磨一大片，这才稳住了总刺激水平。啤酒盖已经磨破，渗出血，完全不知道。抓起这块石头，换那块石头，独自在底沟折腾。慢慢有了效果，恢复了点意念。能看清闪闪流动的河水。我一翻身躺在水里，猛然又坐起来，河水冰冷，激的全身一抽，刚刚抓破的地方，遇到水，变成钻心的疼痛。好在如此一来，痒立即被止住，头脑从疯癫状态镇静下来。我瞪大双眼，咬牙在水里躺了四五次，才把痒平息了。换了一身发热的疼。两个胳膊架起来，不能贴在身上。湿淋淋地坐在底沟一扇大石头上，喘息，发呆。总算救过来了。

不知道多久，我才拖着细腿从底沟上来。这时李老汉已经从庄里回来了。他看见我这付落水模样，很奇怪。我凑过去让他仔细瞧瞧，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怕是虼蚤(跳蚤)咬的”李老汉说。“什么？虼蚤咬的？”我大惊。知青们还算注意卫生，没有虱子，虼蚤。我当然从来没被虼蚤咬过。“野地里头怎么有虼蚤？”我于是非常怀疑李老汉，莫不是他从家里带来的虼蚤？想迁怒于他：“那就是你家里的虼蚤，你铺盖里卷来的。”“我家有到有一个半价虼蚤，没这么囊(多)。”他还挽起袖子让我看看，身上果然没有红斑。我不管那么多，把我们两人的铺盖都吊起来晒。赌气一上午不干活，下午回庄换了干净衣服。找到一袋六六粉，在炕上，草棚外转圈都洒了，连周围草上

也撒上六六粉。李老汉不高兴，嫌气味大，更不说话了。我也不理。我看他找了许多半干的长叶草，编成长辫子吊在棚子里头。我问了他几次这是什么东西吊起来有什么用，他只是简单地说：“艾草。”。晚上黑黑，连月亮也没有，野地里只有棚里的那盏孤星。李老汉把艾草辫子点着。那东西没有火苗，只散出浓浓白烟。轻轻荡荡，沉沉扬扬，在灯光里扭扭作态。转棚子，低帐子，变成薄纱，在田野里留下了艾草摧人的清香。这烧艾草是给我烧的，专为驱蚊虫。睡觉时我把被子卷好，一夜不敢翻身，怕小虫钻进来。第二天醒来仔细查看，并没有新包出现。我心中欢喜。


80年代初回到庄里，和米如怀（中）和贾尚堆（右）聊天

可怕的夏收终于来了。

队上宣布，汉们、婆姨女子、娃娃圪蛋，全队劳力，明天起开始抢收麦子。过了时节麦子太干，碰碰就掉麦粒，那就球事(完蛋)了。只有李老汉例外，不必收麦子，一来老了，六十岁，二来要照顾瓜。我无可奈何，回来收麦子。麦子都种在阳洼上(山的向阳一面)。经常要上了山又下山。从下向上割，边割边捆成捆儿。等割到地头，太阳猛烈了，才将一捆捆的麦子背到山顶的场上。休息的时候和米生智坐在一起。他是我们庄唯一读过中学的后生，他那阵25岁，个头大，是全庄最高的老乡。我抱怨这些天起床太早，白天太长，日头太晒，苦水太重。收了几天，人差不多累坍了。米生智望着我，一脸见人之危的高兴：“哈！这你就球事下了。正是明天峨子峪阳洼，要操心小命运！”我值当他故意吓唬，没往心里去。那天竟然收工早，队长吼了一嗓子：“哎--，回了！明天收拾峨子峪阳洼，兹是把抗硬的吃食函上，白馍回嗑早些儿蒸下！。”听了这话，我心里才正式打开鼓了。

累了一天，正睡的瓷实，队长在曹家大院外起死声：“奥--！受苦的起身喽。”脱长了声音，猛地收住。一遍一遍地死声。我支着身子看看窗上的破洞，外边黑洞洞的。“也没个闹钟，想几点叫几点叫。”我一肺的牢骚。往起扎挣，艰难。难怪陕北人说四大美气：“羊的腿，猪下水，天明觉，小姨子嘴”。天明睡上一觉，有多，他娘美气！没醒，我走在路上脚底下绊蒜，黑麻麻的，盯着前面不知谁的脚跟，沿著对面刘家山的悬崖边，栖栖惶惶地上山。露水湿透了鞋裤。不好受。如今想起来有点害怕，刘家山悬崖，是高耸的直壁，全是青石，鸟在壁上作巢兼飞

翔。西沟在这里转个大弯。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从刘家山悬崖背洼的黑暗里摇上了山顶。头刚探出山顶，山风扑面打来，精神一振。一目千里，火红的日头，腾腾而起。压小了天际的山峦。云山交融不辨。河川宛延终于日下。两侧四面，悬崖背洼焦墨冷冷，立壁阳坡鲜血淋淋。我不禁伸展两手，死声："伟哉--大壮观！"忽然醒悟，这是陕北的文化。裤子短，闪出几寸细杆小腿。收了架式，俯身一望，傻了。连绵的麦田直杵到峨子峪底沟，差几米碰上峨子峪庄口的路。庄口有几个村民，小如虫蚁。这个大上坡，空手上来腿肚子都得转筋，要是背上麦子，顶上太阳，你说腿得转到哪儿去？

麦子多，山顶上有两个场，一高一低连在一起。场上有棵高大杜梨树，叶子唏唏作响，不辨其色。大家陆续入座，坐在场上，面对苍然壮丽的文化，默然不语，和这文化一起构成文化。烟从汉们的嘴角流出来，被风扯过耳根子，忽地散开了。婆姨们上的慢，悄然无声，脸上勾了桔红的边，影子般，加入文化。

我和米生智走到最下面。蹶起屁股向着红太阳的光辉。麦子被露水打了，又湿又冷，老有韧性，用镰刀连扯带割。麦子长的强，棵棵饱满，要和那亩产20斤的地换换多好。米生智低声和我说："捆儿打小些，背上往死压。"全庄劳力从下到上排成几条斜线，来回在麦田里扫荡，越割越高，背后撂下一捆捆的麦子。抬头看看，场上的杜梨树还是个小叉叉。太阳威力大大发扬，背上发烫。没什么人说话，熬时间。打歇了，烈日当头没地方去，用布衫罩着头练忍功。担水的是好汉，从底沟担上两担冷水。嘘哈嘘哈喘作一团，先体验了峨子峪阳洼的厉害。大家争相饮水，灌了一肚子水，没人撒尿。中午早过了，大家越割越饿，胃要填东西，腰要舒展，偏偏米大哥和队长站的最高，赶着人群。一直到放倒了所有的麦子，大家才杵着镰刀直直腰，各自到场上认饭罐子。我记得那天知青的吃食好象是一个白馍一个玉米饼。回头看看各位，满庄的劳力都带了白馍，有的炒菜放了油，啊，事件是重大。吃喝停当，我枕着背绳垫着鞋，在树荫下躺倒。将腰背伸展，肩臂放松，山顶上风大，再一降温，嘿，美哉若神仙。偏偏刘二凑过来，满脸堆好笑容慰问我："你感觉上咋相？蹭定蹭不定(受的住)？"我正当神仙，不爱张(理睬)他，哼了一声："没事儿。"他还在慰问："马下背麦子，从峨子峪阳洼底下背倒山顶场上，黑了(晚上)回嗑给上你个叶咧(扭动)婆姨，压定压不定？"。我闭上眼想睡会儿，烦他。贺生方接上话："后生和老汉敢是不一样，后生聚劲(有劲)，'压压散-，尿到崖(读皑)上'；老汉球也不蛋(没本事)'刍刍(抬)散-，尿到鞋(读孩)上'。"众人一片笑声，放松了筋骨神经。平日里苦水太重，受苦汉只有说儿话(荤话)唱酸曲(民歌)寻欢喜。贺生方越说越来劲儿："穷的球捣炕板石，撇上股闲话寻喜欢。为何受苦汉球捣炕板石？"没人回答。"炕上无席又无毡，裆里没得穿。"又是赞许的一片笑声。风越刮越大，高高地，把笑声扬起，将辛酸吹散。

米大哥和队长观山景，高处风起了。刘家山是最高的山，蹬临场上，送目天际。他俩看了一会，把大家都吆起来，"都往起站，背麦子嗑来，沟掌枣圪台稍雨了。咯情吗哒(迅速)！"我一翻身爬起来抄上绳子就走。到麦田往下没走十来步，热气冲头，一点风也没有，倒运的阳洼！忽然我的脚步停住了，大家都在后头慢慢晃。往下看看就明白，走的最快的要背最下面的麦捆。可我也不能停在这儿等别人先下去，也不能半路上捡高处的麦子背。唉，反正底下的麦子也不能扔，不如走吧。于是跃身一跳，就着斜坡，如同飞将起来，一落四、五米。土晒的虚松，着地

时双腿伸直，脚后跟在土里戳出近一米长的两道沟，真痛快。那些肯定躲不过的后生也学着我，此起彼伏地蹦下去了。我紧靠着麦地的左下角站定。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米生智，远处底边上有阿四，米大哥等。

正当盛夏，太阳的位置在北回归线附近，和北方地面的垂线相交一个角度。峨子峪阳洼正好倾斜一个角度，所以阳光直射阳洼，如同热带。我把头上的烂脏手巾搭在脖子上，莫叫麦芒扎了脖子，等会儿脖子上汗多。背起麦捆，糟糕，沉甸甸的，早上的露水还在。弯腰，罗锅上山，在坡陡的地方头离开地没多远。盯着黄土，顶着毒日头，看着汗从鼻尖下巴掉下来，变成小土珠，滚到脚前。麦芒早就穿过背心，扎在肩背胳膊上，一沾汗，成了红点，刺刺的难受。糟糕！土太虚松，重重的脚步踩上去，一步溜下来半步。身后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摇了没多多远，腿就累了，站在原地歇歇。糟大糕！阳洼中间的虚土被赤道的毒日头晒的太烫了！我急急忙忙竟忘了穿鞋！脚站不住，烫的我负重金鸡独立，左右脚不停的换。结果左右脚都烫的受不住了，急了，我背着麦子一步跳到悬崖边的草丛里，脊椎的反应：绿草不能这么烫。大糟大糕！我想起背麦子就永远不能忘记，左脚踩到长刺的草果上！阿呀，疼的我叫了一声，一只脚站在悬崖边，身体来回晃动。米生智正走在我右后方，听见我喊叫，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厉声高叫："不行！快回来！"我斜眼向悬崖下瞄了一下，有几层楼高，有棵大树，只看到树梢树冠，伸到崖中腰，我的左脚对着树梢。我借着身体的摆动跳回地里头。米生智被结实地吓了一跳，没头没脸地说了许多话，"闪下去就回北京了．．．"。进了我的耳朵，没有听见。我没什么思想，所以没怎么害怕，只是把脚给他看。他帮我放下麦子，拔出棘刺，血流出来。他硬是脱下自己的老乡鞋塞给我穿，我这才说话，死活不要，那地有多烫，赤脚走上去非烙熟脚掌。他听也不听，脱下鞋，背着麦子大步走了。我独自在麦捆上坐了一会儿，还得往山上背。峨子峪阳洼，收了受苦汉多少汗水，也献出多少麦子，能少交点公粮就好了。米生智的大鞋真好，底子帮子都是硬的，我的脚放在里面逛里逛荡。

麦子背上来了，满满两场。场边上堆起两个四、五米高的麦垛。风大了，带着冷意，推着黑云，压暗了后沟的天。听滚滚的雷声，看雨脊弯弯，暗灰色，从云层接到后沟的山顶、沟底。这就是于又远又高处观暴雨之景象。等闲之辈少见。米大哥留下我和曹福贵垛麦子，递给我一把两米长的木叉。我个子高容易把麦子送上麦垛。全队的劳力随即下山。我们俩不敢休息，在大风中快速地垛麦子。曹福贵在上我在下。高大的麦垛很快就垛好了。山雨将至。我抛一条长绳给上面的曹福贵，再用脚踩住，他抓着绳子从麦垛的另一侧溜下来。二人这才大休息。坐在高高的刘家山上，一望数十里。前前后后、峁上沟里，只有我、曹福贵、远处峨子峪山粱上拦羊的和一群羊。真空荡。骤雨之前，天蓝瓦瓦的醉人。我躺在场中央仰望着，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深、这么蓝的天空，有一种浮浮而起的感觉。老杜梨树也把枝叶伸了进来，阳光在叶子上闪亮，和连绵的山构成超现实的画面。我想，应当记住这天空。我坐在上场，背心紧紧地贴在身上，看飞驰而来的黑云把深蓝的天空越挤越小。雷声象紧紧的鼓点。我不敢坐在杜梨树下，怕遭雷击。曹福贵说多少年了树就在这儿。奇怪，每个山上都有场都有树，并没有被雷击过。

大雨来了。起初打在场上啪啪作响，而后四下都是沙沙声。光线骤暗，转头180度，放眼数十里，千山万壑，一片苍苍莽莽。雨落在烫烫的黄土上，蒸蒸化作袅袅云雾，从远近山中到处腾腾升起，在空中变化。山峦如海，被

烟雨轻纱遮蔽，隐隐现现。我扯了脖子呼喊：“哎-嘿-！”。清清晰晰。猛然听见有回音“哎-嘿-！”嗯？刚一奇怪，啊，是峨子峪山梁上传来的歌声。这歌没有词，只有哎嗨之语，穿雨而来。在一片大雨声中，这歌声却陡然向上，其音挺拔，苍然，是紧紧绷住的力量。行在天地之间。多少代周周始始强压的辛酸，苦难，此刻崩发。多少世抑制的呻吟，恶气，如今释放。缓缓的把这浩瀚的天空从中撕裂，显现成天河般的巨大疮口。苍天，衰老的苍天，露出他满是愁容的颜面，一双忧虑的眼睛看到了地上野草般的受苦人。老人的脸上一道道皱纹随心而生，象龟裂开的坚冰，在颤抖脸上叉叉生长。老人的心破碎了，这崩裂的声音化作天空的炸雷。泪水如涧下落，转为纷飞的大雨。

好久好久，我望着这景象发呆，慢慢的才问曹福贵：“峨子峪拦羊的唱的是什么曲儿？”“西凉道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无词的西凉道情。

你瞧，这无边的黄土，祖辈的苦难就是荒原的文化，由粗糙的脏手塑成。听听《黄河船夫曲》、《西凉道情》就知道只能在这里产生，只能在这里声响。穿过苏州的花街柳巷，投足园林池畔，虽然现在不再吟诵《声声慢》、《凤凰台上忆吹箫》还可以轻唱王菲，林忆莲。如果等上陕北受苦汉，挣开千年的苦难，放声《西凉道情》，气势能把林妹妹宝姐姐吓出尿来。反之亦然，不要说在山上受苦的时候，就是你在窑洞里唱王菲，贾长高乓地推门而入：“你大你娘都好着了吧？”惊得以为你娘老子一齐过去了。


刘家山，从背洼看。2005年回陕北时摄。

山顶上绿色就上刘家山麦场的大树。为突出大树，我把颜色修绿了。树下平展展的就是当年的大麦场。刘家山背后远处为峨子峪山梁。

麦收过后我又回到瓜棚，和李老汉种了满田的好西瓜，当然，以他为主。夜里狐狸来吃小瓜，而后把屎拉在山上。因此，山凹里无端地长出小瓜，叫做“狐巴瓜”。笨狼也来吃西瓜，张大了嘴怎么也吃不了，嘴不够大。在瓜棚结识了四方的受苦汉，切开凉西瓜，摆上粗碗茶，听他们倾倒苦乐，往事和而今。吃了瓜记在帐上。顶数知青王济洲的帐最多。后沟临沟的知青吃西瓜一般都记在他帐上。那年秋后分红，扣除买口粮的钱，我净得十三块，而济洲倒欠队里26块钱。后来我们跟着米如怀打坝。后来我去延安出民工，修延安公路。在那里认识了枣园老红军秦继恩，和我特好。后来阿四，王克明，我又到公社出民工，建河堤。天天打炮眼，点炸药，惊天动地。阿四抡起八磅重的大铁锤可以一口气打980多下，堪称聚劲后生。我太累了，累坏了腰，没事儿就疼，一辈子受用。

后来据克明考证我们那条沟的历史不过100来年。连年战乱，早先居住的受苦汉或被杀死或逃窜，整条沟已然荒芜。李丕成老汉70无疾而终。这样应当是本庄历史上最高龄者。贾长高脑筋灵，向吐痰一样将农弃去，经商了。整天在延安，安塞的集市上倒腾牲口。又识牲口又识价钱，老油子，发了。寅虎看的眼红，跟着他当碎摧，打下手。贺生方62岁被强逼着作绝育手术。后来听他讲因为骟家(医生)不忍心，下不了手，放跑了他。他念念不忘恩情，和我说："碰上佛心骟家，叫我蹦了(逃了)。骟不下蛋数，代我在公家伙(政府里面)顶缸(顶罪)，唉，好人来来(是好人)"。和我最熟惯的是枣园莫家弯的老红军秦继恩老汉，当年枣园赤卫队队长，守卫党中央。他参加过送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纪念张思德的讲话，修延安飞机场。我插队的时候他是衣衫褴褛的受苦汉。他告诉我主席早就想让知识人了解中国，了解农村，了解受苦汉。所以毛岸英从苏联回枣园，主席马下把他送去大砭沟受苦。当官不能忘了给受苦汉图谋幸福(见我写的《野草》)。他还悄悄告诉我，当年李鼎明因为在会议上提出共产党对开明地主豪绅杀过头了，而后感到害怕，吞金自杀了。米生智也不受苦了，在公社信用社当头儿。米如怀在家养老，享受天伦之乐。

米大哥是我们认识的最伟大的人。神侃的奇人一个也没见过。他后来是红庄大队的付书记，全庄到大队的主要领导。田里到队里，他全是内行里手。威望高，人和气。他照顾我们，是我们黄土地家乡的亲人。在一个天黑风骤，大雨倾盆的下午，米大哥紧急疏散在沟里打坝的人群。狂怒的洪水随时可以轰然一击，把三层楼高的土坝打得无影无踪。坝前的山，已经被人们削砍成陡峭的黄土崖，随时可能崩塌。当他指挥人群撤离到安全地带时，只有两个延安知青以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定决心，坚持在打坝现场。大哥喝令所有的人在安全地带不得走动，独自一人去大坝前营救知青。在闪电的瞬间能看见中大哥与他们扭作一团，尽力把他们拖到安全地带，大哥不能把他们放在危险之中自己撤离。然而，毛泽东思想的力量在知青血液中化开了，平时强壮的米大哥拼不过他们，和他们扭成泥人。远处的人群在竭尽全力地死声，这呼喊象孩提的呜咽，被磅礴的大雨，震天的巨雷吞噬了。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陡壁悬崖崩塌了，黄土倾天而倒，厚厚地，是一张巨大而温暖棉被，母亲慈爱地把它盖在大哥身上。黄土地以她伟大的胸怀，永远地拥抱着大哥，安抚着她心碎的孩子。


2004年秋回到延安，和米大哥的儿子桂平一起爬上山去看望大哥。

爬了半小时才到地方。桂平气喘："爸，王新华来了，看你来了。"想起有一过年大哥在院子里拉板胡《道情》和《走西口》。墓碑上写着：

米怀亮同志之墓延安市河庄坪公社红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男原籍榆林县固塔公社米家沟人为建设大寨队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廿二日在大坝工程英勇献身终年四十三岁追认为中共模范党员

中共延安市河庄坪公社红庄大队党支部延安市河庄坪公社大队革委会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立

1980年左右，我再次回到陕北，见到米大嫂??永远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大女儿桂娇已经出嫁到枣园乡莫家湾村。大嫂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大点的是女儿桂莲，刚六、七岁；小点的男孩庞生还抱在怀里。米大嫂一身稀烂肮脏，一个不能与天斗，不能与人斗的贫苦婆姨，拉着我的手嚎啕痛哭，倾诉大哥逝世后的时日艰难。米大哥逝世后家里塌了，生产队塌了。没几年，红庄成为西沟最倒塌(糟糕)的村。我们离开后，大嫂劳累忧愁而疾，得了肺癌，躺在破烂的土窑里头，贫苦艰难，撒手去了。她多么不放心两个年幼的孩子，又多么无可奈何。

1985年我从王克明处得知大嫂的小女孩桂莲给人家放牛。从11岁到12岁，放牛一年，挣钱六块。一天工钱不到两分钱人民币。日风雨雪，遍踏山岭野地。每天受苦回来给愣头愣脑的小弟庞生打柴担水做饭。孤儿姐弟，凑合着苟延残喘。克明遂乘飞机往延安，将小弟安排在莫家湾大姐桂娇家，让他们好生照顾。桂娇夫妻两人都是老实八交的庄稼人，向克明叔点头称是。克明带着放牛女再从延安乘飞机回北京，交付给我。我和婆姨林小枫即在首都机场欢迎我们家的新成员。


桂莲临行前和小弟弟庞生在家中合影。分开了，桂莲高兴，庞生忧伤。

我们离开了陕北，都惦念它。我回去过数次，常常希望有机会再回去。离别三十年何日回延安。我友说的好，“安居之福，非同小可。”奈何无福。我还是手停口停，受命之治，不能自在走动。王克明行，常回延安。回了多次，又竟有诗写将出来。我也曾为其诗谱曲。可惜有了花生仁儿，又没了牙。竟不知推销给什么人为好。所以多年来还在探索。时有诵之，现且写出，以尾闲言：

在那遥远遥远的山中，有一块静悄悄的石碑，它记载着我的故事，那是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说不出来它在哪里，举目无边草木丛丛。

它们埋没了我的血汗，连同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曾在哪里血流如注？

沉沉足迹印留在何处？

往事如长梦，醒来空空，别了，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也为岁月作出过牺牲，不是为了留下我的姓名。只为了一块寂寞的石碑，为了一点点苦难、一点点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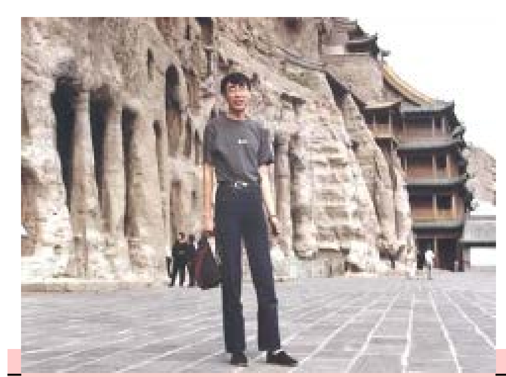
王克明：〈寂寞的石碑〉《回首黄土地》

三、还有几句

我们常常跟着米如怀大叔干活。和绝大多数陕北人一样，他脾气和善。他到是不怎么爱领着我们干活。说我们是“红胡子”，“头等吃烟，赤手空拳”。打歇时知青围着他，要卷他的旱烟抽，他慌忙用手捏捏烟袋儿，表示所剩不多。要问他：“多乎哉？”他也回答：“一满不多了”。他会告诉你，等你们走了，去了好地方，天天吃好烟，可莫惦记老汉这点烂脏烟。

我们走了，离开了黄土峁子，还是惦记这老汉的旱烟，把心也留在最美的地方。那里没有莫名其妙的自尊，没有抱着发了臭的虚荣，没有茅坑里石头般的坚强，没有溶化在血液里的自私，没有尔虞我诈，没有衣冠禽兽。在那里，除了大小当官的，没感到人心险恶。我们度过了自在、与土融合的在一起的日子。和受苦汉生在一起最重要的企图就是软化你那铁硬、顽固的自私心，并在你龌龊厕所般的心地之中打扫出小块立锥之地，从而放上老百姓，放上别人，放上山、猴、什么其他的。这没准救了你的小命，特别是当你正要鲸吞救老百姓的拨款，或者正要下手大干一番自我奸污自己八辈祖宗的操蛋事情，忽然，在你粪场式的心灵中那小块立锥之地上，七色宝石般柔嫩的小花闪烁了，发出一丝清纯的荧光，这使你雄伟地张开的大铁爪不禁停住了，这使你坚固的下体不禁软和了，想到老百姓。所以你免于枪子儿之苦，免于歪脖瞪眼脑浆稀屎般四溅的灾难。

眼下，请你的灵魂发抖吧。


2001年在山西云岗石窟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洛杉矶Om Ah Hoon!



那风中摇曳的紫头巾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达力阿嘎是我到草原认识的第一位阿嘎，时年三十七、八岁，颇有几分姿色，黄黄的眼睛透着中年蒙古女人的精明干练。她的丈夫包音图是公社书记，在我们1968年去草原之前就已经作为走资派被关押了，直到1974年我离开草原都未曾与他见过面。他们夫妇有一儿一女，大的是女儿叫那仁花，儿子叫布和巴特尔，他们的眼睛都随了阿嘎全是黄眼珠。阿嘎是东乌珠穆沁旗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还是大队妇女主任，可由于受丈夫株连，被免了职连羊群也没有。她只得与丈夫胞弟包其木德一起干活儿。

我们蒙古包的5个女知青被分到他们包学牧业活儿。虽然达力阿嘎境遇不佳，但我从内心深处对她很是同情和敬重，不仅因她是全旗最早的女共党，我还隐含着一种的同命相连的情感。那时我的父母也都作为走资派被关押了，我离开北京时连面都未能见上，杳无音讯。

我们学会挤牛奶、赶牛车、下羊夜、拆包、搬家等牧业活，都是达力阿嘎教给的。她干活的麻利劲儿，一看就知里里外外是把好手。

第一次搬家，就是一手由达力阿嘎操持的。当看到我们原来是住在一个“大笼子”里时，大家新奇高兴得像顽童一样惊呼雀跃，就是看到覆盖在木板下圆圆一圈嫩草也要“呀呀”惊叫半天。阿嘎牵着搬家的草原小列车（一头牛拉一个简易木板车拴成一串，远看象一列行走在草原的小火车）的牛耳在前面走着；那仁花采着野花、野韭菜、野葱、野黄花一路告知我们花草的名目；小小的布和巴特尔象个大男人一样骑马赶着几头乳牛在后尾随，永远不离他前后的还有四条狗......多美的一幅草原人家画面啊。

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随着“挖肃”（挖出、肃清“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斗争的展开，达力阿嘎也被专政了，只有她一个女人和一群四类分子被关押在大队部的破土房里。

我们知青也被集中到大队部学有关“挖肃”的文件，参加阶级斗争。某天一男知青带着10个四类分子去冬羊盘起羊粪砖垒羊圈，冬天厚厚的羊粪土冻得硬邦邦的，干活时需要跳起双脚落在铁锹上，用巧劲儿来一块块起动羊粪

铺就的冻土。那男知青看他们蹦蹦跳跳像是在玩耍，以为他们偷尖耍滑对抗劳动改造，就不由分说地将这些四类分子统统赶回大队部训话，训话到冲动时他竟然命令四类分子脱光上衣，一个个低头弯腰撅在墙边，他拿着粗粗的棍子向他们毫不客气地狠狠抡去。

我进屋时，几个挨了棍子的四类分子正疼得哎呦哎呦叫唤着倒在地上，我看到其中的达力阿嘎也在墙角瑟瑟发抖，我赶忙上去拦阻，那个失态的男知青铁青着脸，歇斯底里地喊："你替四类说话？！谁不知你在家保爹保妈，跑这儿保内人党来了！"他竟然掉过头拿棍子对着我便要抡，我心一横瞪圆了眼睛比他还狠地说："你敢？！你简直疯了！"这时另几位知青看不下去，都上前制止他，只见他退后两步，将棍子向地下一摔，气鼓鼓地冲出了屋子，边走边骂怨气难消，他被愤怒蛮横的情绪裹挟着。

土屋里的恐怖气氛顿时缓解，四类们纷纷对我投以感激的目光，达力阿嘎由惊吓恐惧到长叹一口气，她软软跪坐在角落里怯懦地缩成一团。……那以后我便被冠以"保内人党"的帽子，被排斥在参与"挖肃"斗争队伍之外。而且，我与某些知青也从此分道扬镳了。

春天了，关押的四类分子分到各牧业组接羔，我和达力阿嘎分在一个牧业点，我们又在一起了。她一如既往，熟练地接羔、对羔、下羊夜、挤奶、做奶豆腐、拣牛粪、撮毛绳、缝毡子、缝袍子、熟皮子，干起活来灵巧麻利让人叹服。接羔，我第一次听到的"陶爱格"，凄婉的劝奶歌，就出自达力阿嘎的肺腑，为了让母羊认下被遗弃的小羊羔，那充满母爱情怀的善待生灵的"陶爱格"，会让所有听过的人永世难忘。

那年春天，达力阿嘎听说邻队有个女知青因穿"大头鞋"骑马挂蹬，被马不幸拖死，不几天后，她用自己所剩无己的钱（四类的工分都被剋扣了），为我赶缝了一双蒙古保命靴，那双皮靴至少要花去她半年的积蓄。

那年夏天，连绵阴雨一连下了7天7夜，我天天泡在雨水中，淋得无一件干衣可换，浑身湿透沤得难受之极，又是达力阿嘎，在劳顿之余不惜腰酸胳膊疼日夜为我烘烤湿衣。

那年冬天，白毛风袭来，昏天黑地，羊群顺风跑着追之不及，我在迷途无望中，达力阿嘎带着大黑狗寻来，将我和羊群解救于狂风暴雪中。

还有，我不慎被小巴特尔家的大黄狗咬伤，疼痛难忍，阿嘎寻来蒙古草药面及时糊至伤口处，很快消痛愈合。我后来身着的针脚细密的"特利革"（蒙古袍），也是阿嘎一针针一线线在昏暗的油灯下缝制而成。

我和达力阿嘎的情谊就这样一件件一点点的与日俱增。

1974年春天，我和同队几个知青被招回北京当教师。临行前怕惊动四邻，决定悄然离开，就连达力阿嘎也未告知。离开那天，天阴阴的，寒气逼人，飘着小雪，海龙大哥牵来我最喜爱的大黄膘马，正待上马，老远看见达力阿嘎气喘吁吁地赶来，往我手里一个劲儿地塞着黄油、奶豆腐，嘴里千叮咛、万嘱咐要带给我爸妈吃。

我依依难舍地向达力阿嘎、大巴特尔、小巴特尔、大斯楞挥泪道别，几乎不敢多看阿嘎，她已泪如雨下，摘下紫头巾不住擦拭着眼泪。

我跃然马上，一步三回头地依依惜别，心里默默地说：再见了阿嘎！再见了阿爸、额吉！再见了阿哈、阿娘！再见了我的阿尔山宝力格！此刻泪水打湿皮袍长衫，模糊了双眼，送我们走的海龙大声说：走吧，快赶路吧！于是策马扬鞭过了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大约跑出十几里路，来到最高也是还能望到大队部的最后一道山梁，海龙将马嚼子一勒，驻足而立，叫我最后再望上一眼阿尔山宝力格。我回头望去，啊！打草场；我们打过井的地方；我曾迷过路的深沟。啊！大队部，那不是挥动着的紫头巾嘛？海龙眯起眼，定睛望了望肯定地说：是送你的人，他们还没回去呢，等着和你最后一次道别呢！我分明看到：那远远的几个小黑点在不住地挥着手，我看到那紫头巾！我立刻翻身下马，朝着那些晃动的小人影，那摇摆在风中的紫头巾，深深深深地鞠了3个躬，又一次泪如泉涌，怎么也止不住。

去年初夏我回草原，听说达力阿嘎年初过世了，享年76岁，与我母亲一样，都是在76岁时离开了人世。

多少年过去了，眼前总也挥之不去的，是莽莽皑皑山峦起伏的雪原上，阿嘎那在风中摇曳的紫头巾......

（2007年4月11日）

熊窝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58

北京知青与延安的情缘

来源:延安日报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2.8万多名北京知青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到延安农村插队落户。而延安人民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热情接纳了这些远离父母、远离都市的青年学子。从此，一段北京青年与延安的故事就此展开。

插队岁月，成为一代人生命中的永恒记忆。经过两年的紧张筹建，2016年，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在延安枣园路落成开馆，真实记录了那段激荡青春风采的难忘岁月，为传播知青文化，弘扬延安精神，在圆梦中华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发挥资政、存史、育人的作用。展馆开业后，接待了大量知青、红色教育培训班学员等前来参观学习，2018年接待人数达15万人次。

金秋九月，记者走进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带你探寻知青岁月，深入了解北京知青的延安故事

“广阔天地 终生难忘”。步入展馆序厅，首先映入眼前的是习近平的题词，这是整个序厅的展示主题。面前延河大桥雕塑，将人们带入当年知青在延安留影的情景。

● 讲解员王月圆向记者讲述知青的延安故事

展馆前厅顶部有2.8万颗闪烁的星星与墙面知青插队的落户点遥相辉映。在展馆一侧的一棵参天大树，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棵大树象征着当年知青栽下的‘扎根树’已成为擎天之柱、国之栋梁。”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讲解员王月圆向记者介绍道。

“当时的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土地贫瘠、群众生活贫困。北京知青刚到延安，就迎来在农村的第一个农历新年。”讲解员王月圆指着展板上的一张照片向记者介绍道。只见照片中的年轻人倚在门框上，坐在石阶上，一副想家的神情。

破旧的土窑洞、粗粝的饭食、孤单的身影，这些北京知青的心情可想而知。“除夕夜，热情的乡亲把知青拉到自己家里过年，远离亲人的北京知青感受到家的温情。”一张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邢仪的速写画《春节时节派早饭》记录下当时的热闹场景。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为首。“做饭离不开柴，取暖离不开柴。当时知青们为了砍到柴，钻梢沟、攀悬崖，手脚刺破、衣服划烂，往返几十里山路，才能打几十斤柴。”王月圆接着介绍，当年宜君县北京知青王晨因为背柴，有三件上衣后背撕成了布条。

知青们的第一堂劳动课就是在牛圈、羊圈、猪圈里起粪，再把起出来的粪送往地里。当年留下的一张张黑白照片记录了知青们劳作的情形。

他们在延安先后尝到了饥饿的滋味、砍柴的辛苦、吃水的艰难，自理能力更强，渡过了生活关。

无私的爱献给北京娃

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淳朴、厚道、善良的延安人民不顾自身的贫困，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接纳了北京知青，视北京知青为亲人，手把手教会知青们各种生活、生产技能，给了他们无限的关爱。



知青馆一角

“那里虽然穷，但人民热情淳朴，有乐观精神。他们像父兄那样教我们干农活、打水、做饭，经常请我们到家里做客。”

北京知青何立群回忆，有一次她病倒了，昏昏沉沉、浑身发冷，房东大娘来看她，过了一会儿，还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杂面条，让何立群趁热吃。

北京知青刘瑞在富县插队时，把房东大娘认作干妈。在他返城离开富县的23年间，曾17次返回陕北寻找干妈，遍寻无果。直至2008年春，刘瑞偶然得到线索在山东终于找到了干妈，并把她接回北京，像对待亲娘一样侍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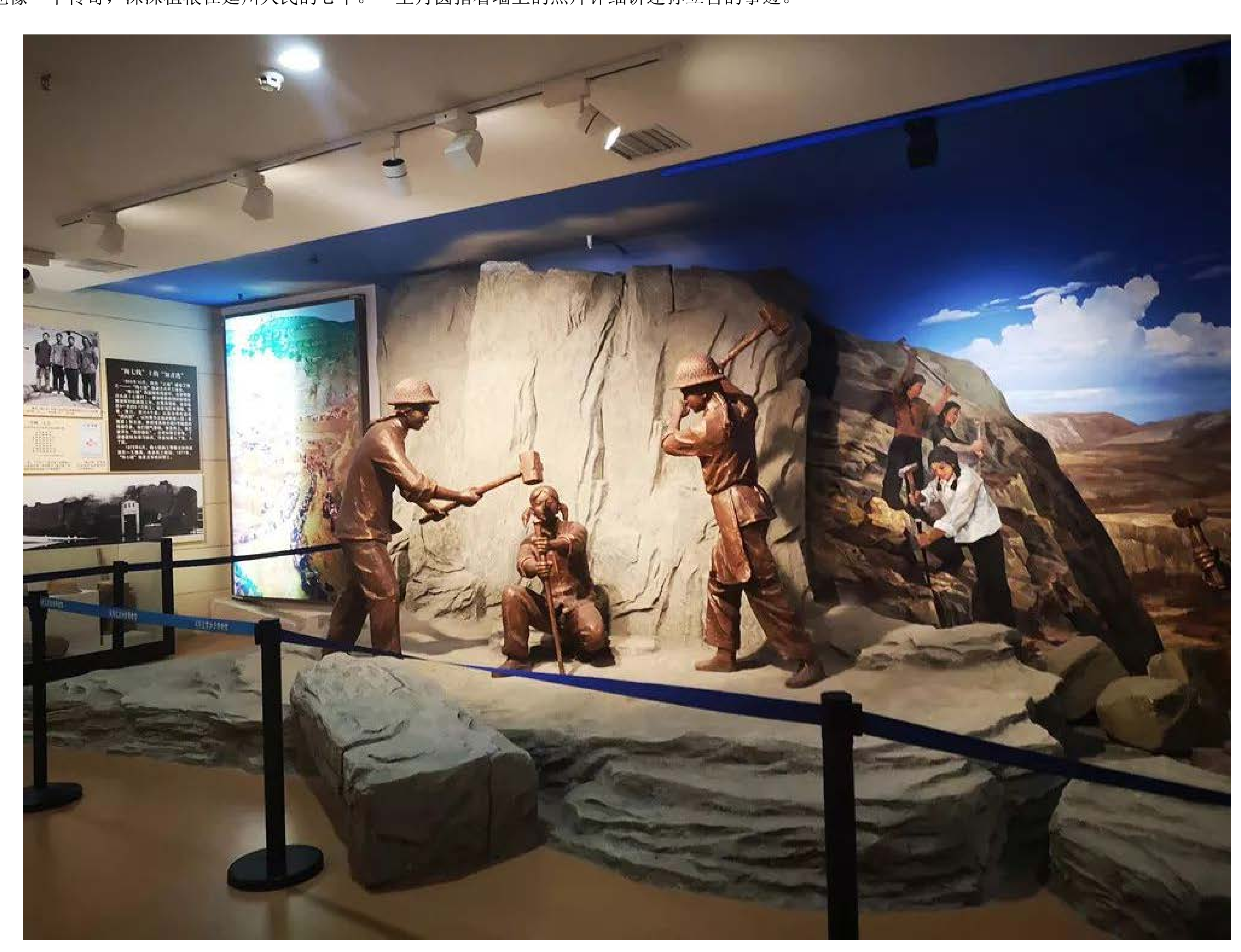
北京娃变成了延安娃

经过一年多的劳动磨炼，北京知青变成了延安娃。他们不仅说话、穿衣、生活习惯像延安娃，有2600余名知青当了村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会计，融入农村工作、生活，真正成了生产队的当家人。

他们带领社员一起规划新农村建设，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把改造农村当作自己的使命，在各个岗位作着平凡而伟大的贡献。

到1971年，北京知青有335人担任赤脚医生，他们刻苦钻研，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在自己身上试针试药，为缺医少药的群众解除病痛，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现状作出贡献。

孙立哲就是赤脚医生的杰出代表。“当年在农村缺医少药、环境简陋、设备简单的小小医疗站，孙立哲做了大小手术3000余例，治疗8万人次。他像一个传奇，深深植根在延川人民的心中。”王月圆指着墙上的照片详细讲述孙立哲的事迹。



用雕塑重现知青劳动场景

不仅如此，还有大批北京知青成为延安科学种田的带头人、农田基建的突击队、乡村学校的新园丁……他们利用空闲时间，珍惜光阴勤奋读书，发挥能歌善舞、吹拉弹唱、能书会画的特长，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小提琴、手风琴、收音机这些“洋乐器”让庄稼人开了眼界，“洋歌曲”让农民大饱耳福。在展馆里，形象的知青雕塑手持乐器吹拉弹唱，让人置身其中，仿佛回到当年的知青岁月。

1970年起，一批批北京知青陆续离开农村，走进工厂、机关、学校、军营，但他们仍将延安视为第二故乡，感恩于善待庇护他们的延安父老乡亲，虽然离开延安，却把心留在了黄土高原，不遗余力地给延安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无私的援助。

在知青馆筹建之初，大批北京知青得知消息后，纷纷将家中珍藏的老物件免费捐献出来，使得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很快达到几万件，展馆工作人员经过两年时间的精心筹备和布展，终于将馆内六个单元数十个模块的内容呈现出来，使得市民游客通过一件件文物和老照片找到当年的场景，感受那个年代的艰苦卓绝，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记者/李星棋编辑/强婷婷



肖复兴：北大荒

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私人史（微信ID：PerHistory）

原载于《家书》 作者：肖复兴

我的心头忽然涌出一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和这里的人彼此有了牵挂。

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一直以为，这样的精神家园，一般都会在青春时建立起来，说其属于精神，但一定也有具体的所指，并非虚渺，而是实在的。

我的精神家园属于北大荒。

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笑，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我21岁。看到队里的三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三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三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三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

烈士的后代，硬说是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一起去北大荒的八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三个“反革命”的家里，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二队最北的一间用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三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救世主。

他就是赵温。我们二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我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三张大字报，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我们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

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们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三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就在这时候，赵温走到我的身旁，很多当地的农民走到我的身旁。他们都不善言谈，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我，约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喝酒。默默的却形成了一股气场，静水无声，却有着渗透和冲击的力量。有一天晚上割高粱，每人一块地，谁割完谁回家。我割地慢，别人早割完回家了，我还在吭哧吭哧地割，等我快割到头的时候，才听见前面嚓嚓的声音，高高的高粱穗全部倒在地上，我看见面前站着的是一脸汗珠的赵温。他什么话没说，和我前后脚回去了，临到他家的门口他叫住了我，说：“你嫂子做好饭等你呢。”

我知道最后我终于幸免于难，在于他们，我才发现，并不是工作组高抬贵手，也不是你自以为是悲天悯人如李玉和一般在救他们，而是他们搭救了我，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如同脚下的土地一般那样结实有力，让我的脚下有了根。

记得1974年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朋友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只有家里的人才会想得这样周到。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长长的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他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知道，我离开了北大荒，但无法忘怀这里的一切。即使你走多远，你的根扎在这里。我的心头忽然涌出一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和这里的人彼此有了牵挂。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彼此不尽相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底层的立场，是唯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也许，这就是现在我所说的精神家园的感觉和力量吧？想想那里，就会让自己的心里踏实，温暖。是那种有了依托的踏实，有了实实在在温度的温暖。

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

2004年夏天，我和伙伴们重返北大荒，临别的那天晚上，农场的领导都出面，为我们饯行。赵温坐在我的身边。他已经70多岁了，牙都快要掉光了，木刻似的皱纹深深地爬满一脸，瘦削的身子，像是一只枯叶蝶一样，瘦得让人心痛。

晚饭前，他就来到了宾馆找我，一直坐在我的身边，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我记得以前他是抽烟的，而且抽得挺厉害的，现在他不抽烟，也不喝茶，就那么静静地听别人讲话，灯光的暗影里，他像打坐入定了那样的安详，瘦削的剪影贴在了白墙上。一直到要吃晚饭了，他对我说："你去吃，我在这里等你。"我拉着他说："走，一起去吃！"才把他拉了去。在饭厅里，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的旁边坐着建三江管理局的局长，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了。我向他介绍着赵温，告诉他这是我们大兴岛二队的一个老人，我们的关系一直很深。他很热情地微笑着冲赵温点点头，赵温有些木然，没有什么表情，岁月让他久经沧海难为水，对于当官的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和拒绝。虽然一直是他手下最基层的兵，但似乎从来没有见过面。这也是可能的。我看见副局长喜子坐在旁边的另一张桌前。我猜想他大概是有意躲开我，昨天晚上的饭桌上，他和我挨着坐在同一桌，快要散席了，我刚想走的时候，喜子突然站了起来，后退了两步，晃晃悠悠地指着我冲我说道："肖复兴，我告诉你，三队那个老孙的老婆子什么都不是，别看你为她哭，你看他家弄的那样子，鸡食都上了锅……"我知道他是喝多了，他手里握着的酒杯还在不停地晃，酒都晃洒了出来。但是，他的这一句话，还是让我惊愕，并把我惹火了，我走到他的面前，打断了他的话，问他："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是什么？"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今天，也许，喜子是对昨天酒醉之后发的话有些后悔，不大好意思了，坐在一旁去了。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过去和他说几句话，毕竟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这里了。晚宴到了尾声，他始终没有过来。我犹豫了一下，就这样散了？要不要有个告别的话和哪怕那么一点的意思？我发现他的眼神有时向这边扫过来，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在犹豫不定。我想了想还是应该我主动一些吧，就端起了一个杯子，往里面斟满酒，站了起来，向他走了过去。

他看见我过来了，显得很高兴，端起酒杯，也站了起来，迎着我笑了起来。如果什么话也不说，就这样把杯中的酒碰了，也许一切都真的一锅煳涂粥喝了，也就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结束圆满得花好月圆。

我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先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从二队从大兴岛调到建三江，为建三江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

开头的这样几句，他静静地听着，很高兴，很受用，没有说话。

我接下去的话，立刻让他的脸上变了颜色。我说："临走了，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别忘本，甭管当了多大的官，别忘了我们都是从二队从大兴岛那里走出来的，那些现在还在那里的人，

他们确实是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你还想让他们是什么呢？你别不高兴，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了，问你的这些话，其实，也是问自己的话，我们都应该提醒我们自己，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忘了他们！”

我光顾着把我心里的话倾诉完，一时没有注意到他是在竭力控制着自己，更没有发现今天他已经又是喝多了，酒精再一次让他没有克制住自己。只见他把酒杯“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说了一句：“你这么说，我不跟你喝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地骂了起来。

我也火了，要和他争吵。这时候，一直沉默的赵温“腾”地站了出来，像母鸡护鸡雏一样，一把把我挡在身后，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东西！”一下子，他不说话了，全场哑口无声。

第二天清早，赵温来为我们送行，我们上了车，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突然跳了上来，70多岁的人，腿脚还像是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我们都知道，赵温特意从他家的地里为我们摘了香瓜和玉米，天没有亮就爬起床，烧开锅，开始烀玉米。他希望我们带走它们，这是他能够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点心意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来了。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答应赵温的要求，车子扬长而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香瓜和玉米都被拎上了车，赵温和他的老婆紧紧地跟着汽车跑的情景。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望着，站在道边的赵温两口子的影子越来越小，飞扬起的尘土毫不留情地淹没了他们的影子。

我常常想起赵温，想起北大荒。我常常会这样想，我们每天生活在最普通而底层的百姓之中，但我们的心不见得就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也许，相反貌合神离与他们离得很远，自以为比他们高明而高贵。我说过，并且我一直坚信，来自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培育的真挚爱情，和来自北大荒这里乡亲培养我们的人民立场，是我们知青岁月里最大的收获，没有了这样的两点，或者我们抛弃了这样的两点，我们的青春才真的是蹉跎而没有丝毫可以回忆的一片空白。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我们怎样思念这里，千里万里来过几次这里，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像赵温却一辈子在那里，在那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随意地践踏，被人无情地遗忘。但是，就是这些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还会再回去吗？是的，不会了，我相信，不会了。大兴岛上正因为有他们在，才让我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去。

回去的感觉和回家一样，那里不仅有你的青春过往，那里更有曾经给予你许多关爱的亲人一样的乡亲，那里有曾经培育你青春期成长的土地，才会如此牵着你的心。所谓精神家园，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或者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涌动在心底里的感觉吧？

有时候，我也会想，即使回去，也只是看看他们而已，我能为他们、为大兴岛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但起码不应该忘记他们，起码不要对他们说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说实在的，我在酒桌上对那个副局长说的那些话，不说出来，憋在心里，我会更难受。那些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包括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我们，不应该时刻问问自己：老孙老邢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我们又都真的人五人六地是些什么了吗？

干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逝去的岁月，残存的记忆，无尽的慨叹，一去不返的青春，都付与历史和我们各自的心去重构和沉淀。

我想起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能够帮助我们拥有重新唤醒自己的能力，是柯林武德说的“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在我看来，这样“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家园的能力。

来源公众号“30号院”

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262　　肖复兴文集

火车上的记忆

作者：朱学勤

来源公众号：新三届

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

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熘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

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

“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

01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

我们是在那一年11月16 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像海潮

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

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哪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

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

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

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

“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49次特快是中午 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

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

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像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

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

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

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

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

“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

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

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

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

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

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

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

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

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

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

我后来听说，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国际了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

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02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

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

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

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

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像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

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

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烟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

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

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

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动，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

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喲小叫起来。

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像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

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

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

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

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

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

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

不料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

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

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就是这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信然！

后来阅世稍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

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干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

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喲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

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嗯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

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嗯喊。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听到了，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信然。

我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我所生活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

他们几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个低洼的盆地里，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一部落，都能对他们投以白眼。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们离开兰考到三百里外的巩县当工人，村里的五保户大娘实在想念，居然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

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像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

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焕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人民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多半会很慈祥地莞尔一笑。

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厂，真是一个奇迹。

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要用中原土音念）。

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勐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嗯小叫，惊动了一座楼！

还有年青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淳朴，富于同情。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

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

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哭，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除了说不出那唯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确实很难听。

兰考民间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

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吭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

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假妞”者，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的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见，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

“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

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

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像在这块版

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

先是老毛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了倒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

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

1997 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或者如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的矫情，都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

我们就像三个平平淡淡的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像“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勐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噫，这不是学勤吗！”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03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杉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

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动。

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

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

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

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

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

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确实“酷”。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个死胡同，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车站，都是两边敞开，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只要有足够耐心，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

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

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作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补票认罚。

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

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边插队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

穿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

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

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着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是先锋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混票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有时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处理。

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了几年。这个

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 60 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

星期天晚上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回来，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成一伙。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

逃票者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

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哪个是好？

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

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 9 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就这么简单。

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

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

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

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

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三百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汴京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

现代化三等火车。

那车厢里空气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吻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

车开不久，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

不看犹罢，一看大惊失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的中山装，上衣口袋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的一个信封，也已拆开；里面装的不是钱，却是比钱更重要的准考证；那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再插还进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盖上！

再抬头看去，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公共汽车的，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啥不丢”。

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锚上了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扔，回头一想，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

这一起转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可供完成：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是怎样交换眼色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

幸亏我那时年青，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象现在那样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煞了风景，把我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

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抬头抱以同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窃贼体面下场，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American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气洁净。

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就像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转圈出入，里面香水、手纸、还有坐便器上的垫圈纸，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

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都有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们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

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

我自然想念开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二十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

扑通一声，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志，也是一个纪念。

它们总在提醒我：别装蒜啦，老伙计。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先写写你的中国底细吧；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就写那五花大绑，就写那三寸钥匙，写你那打开信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贼”！

这就是留在我皮肤下的文字了。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最令人沮丧：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肤。

再难想象还有比这句话更为狠毒的判决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烙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你是无望走出自己的皮肤，也无望走出这三点式褐色标记了。

李银河：我的人生第一课

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人生的第一课。那是在1969年至1971年，我的17岁到19岁，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三年。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庭。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个经验。

从1969年开始，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我一开始按出身不好的人分配到吉林插队，后来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人来招兵，我去申请时怕人嫌我家里有问题不要我，竟然写了血书去申请。那是我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写血书。我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了——看来家里问题还没有大到不让我去“屯垦戍边”的程度。

因为去兵团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我去内蒙跟其他人心情不同。离京那天，记得是爸爸和堂姐到北京火车站去送我。几乎整列列车都是去内蒙的知青，送站的人群非常拥挤，简直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因为我们这些兵团战士都岁数太小（我们连队最小的一个女孩才15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火车启动的一刻，随着咯噔一下晃动，全车爆发出一片哭声，现在想来真是再自然不过，可是我当时的感觉却很意外，因为我没有一点想哭的情绪，而是一种跃跃欲试走向火热的生活的期待。我只是向父亲和堂姐挥了挥手，思绪早已飘向远方，飘向我期待已久的生活。

记得刚上中学时，流行着一本书，叫做《兵团的女儿》，写一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女战士的生活，她患了瘫痪，但还是努力奉献，把个人的病痛放诸脑后。看上去很像身患瘫痪的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像忍受病痛的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脍炙人口的电影《年轻的一代》，也是歌颂在边疆奉献的青年（我记得是杨在葆出演的，他是我的第一个青春偶像），同时批判了一个千方百计逃避边疆艰苦生活想回上海的反角（好像是达式常演的，记得从那么年轻时我就不喜欢奶油小生型的男人，而偏爱粗犷性感的男人）。我们当时都很狂热地希望过一种献身的火热生活，而不愿意当逃避艰苦生活的自私自利享乐主义的落后青

年。记得在初一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做一个勘探队员，因为《年轻的一代》中杨在葆所饰演的英雄人物就是勘探队员。我当时最爱唱的歌是那首《勘探队员之歌》，那支歌曲调动人，歌词浪漫，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是那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

火车开了很长时间，进入内蒙境内，周围景色越来越荒凉，是典型的戈壁滩、大草原景致。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粗犷感觉。后来，去云南插队的知青有很多都爱写小说（王小波也是其中之一），去内蒙的却很少有人写小说（只见过《狼图腾》和老鬼的《血色黄昏》），我想其隐蔽的原因恐怕跟两地殊异的气候地貌及风土人情不无关系。云南的绿草茵茵和边寨风情使人能够寄托浪漫的情怀，而内蒙的戈壁沙漠和粗砾寒冷的景致使人的精神变得粗糙和干硬。

下了火车，又坐卡车，卡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把我们连人带行李卸在了沙漠中间一块荒凉的洼地上。好在我们是自己从卡车上跳下来的，不是像自卸卡车那样由一根自动升起的钢柱把车厢前部顶起来，哗啦一下子卸下来的。后来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的回忆录，有句套话：一见到那荒凉的大沙漠，我的心就凉了半截。可是那不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心中的准备太过充分，周围景致荒凉则荒凉矣，但是还是不如我期待的那么荒凉，我的心也一点儿没凉，而是充满了火一样的狂热。

我们的连队是内蒙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三连，那是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一片平坦的空地上有几排土坯房，是用沙子下面的粘土直接合水脱坯盖起来的小房子。这土房还有另一种盖法，就是把前后各放一块木板，相距一墙之宽，然后用粘土掺水直接灌进去，打成一面墙，俗称“干打垒”。

兵团组建前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叫做太阳庙林场，顾名思义，是以种树为主的，负责在沙漠上种沙枣树，另外还有飞机播种能在沙漠中存活的红柳和白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城市来的学生一到此地，林场就被改为农场了。可能是因为这么多人要吃粮食，所以不得不把种树改成种粮食了。可惜，这个决策大错特错了，因为此地属于黄河河套地区，农地有灌无排，土地长期被水浸泡，很快就盐碱化了，远远看去，土地不是黄色的，而是白花花的一片，那都是水流走之后剩下来的盐碱。听说盐碱的成分是硝，是做炸药的材料，对于庄稼有极大杀伤力。多少年了，我们挥汗如雨辛苦种下的麦子，亩产才七十斤，而光撒下去的种子每亩就有三十斤。里外里，每亩只能收获四十斤麦子。我们去收割麦子的时候，劳累倒在其次，主要的感觉是辛酸——那麦子长得稀稀拉拉，麦秆都很少有超过一尺长的。多年之后，我旧地重游，发现农场又改回了林场，充分证明当初的决定是个错误。



70年代李银河在山西大学

同样是兵团，东北兵团跟内蒙兵团的人心情就不一样。后来看，主要是亩产700斤和亩产70斤的区别导致的。去东北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得到了应得的报偿，心情就比较愉悦；去内蒙的人干了活儿，流了汗，什么也没收获到，而且还被周围的牧民骂，说开荒破坏了他们的草场，造成了沙进草退，心情就更加沮丧。合着大家拼命流血流汗，不但没有建设成果，反而是搞了破坏。这就从根儿上破坏了大伙儿的好心情，所以当其他地方的知青大讲“青春无悔”的时候，我们就不爱听，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完全地虚掷了。这也是我们连总共才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个人的原因。那个癔病发起来就像一般的神经病一样，程度轻些，更精确的说法也许该叫“精神崩溃”。连里专门辟出几间土房，把这些得癔病的人单独关起来，倒也不是私刑的意思，而是保护他们不伤害自己，也不伤害周围的人。因为癔病发作起来，有很强的攻击性，摔盆打碗是轻的，如果打了人就会酿成灾祸。发作人多的时候，一人一间屋子不够用，可是也不敢把两个病人放一起，他们要是互相伤害起来，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相对于内蒙很多的牧区，我们在这个农区干得很苦，带着年轻人的全部理想主义和狂热。残酷的现实把我们的理想主义打得粉碎，盖因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庄稼。不但没有种出多少粮食，造成了我们当中许多人终身疾病（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挑担子压得骨裂）所挖出来的水渠，几场风沙就被填平……上帝惩罚西西弗斯，让他把大石推上山岗，然后滚下山脚，重新再推。我们在那些拼死的劳作中找到了西西弗斯的感觉。在一个被用作流放地的小岛上，犯人们每天被迫从岛

的这边挑起一担水经过汗流浃背的跋涉，把水倒到岛的另一边，或者是把一堆木头从岛的这边搬到那边，再费尽千辛万苦搬回来，如此反复，以至无穷。心理学家认为，毫无意义的劳作对人的心理的折磨远胜过有意义、有结果的劳作，它能把人彻底逼疯。而我们的最美好的年华就浪费在这种毫无意义的劳作上。回想起来，这种日常的平庸而无意义的劳作，对于我们正值青春的花样年华的虚耗，对于人的心灵的戕害，比起酷刑和赤裸裸的残暴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北京，我没见过内蒙那么雄壮的蚊子，得有两公分长，看去像架小直升飞机似的。蚊子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一种叫做“小咬”的飞虫，也就一毫米长，可是咬起人来，狠劲比蚊子一点不差，一咬就是一个红疙瘩，更恐怖的是，小咬体积小，人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它们会钻进人的耳朵眼儿，搞得人生不如死。这都是我们刚去第一年的事情，后来时间一长，就再也没人在乎蚊子小咬了，它们不但从记忆中消失，而且好像也从现实中消失不见了。看来人是世界上最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再恶劣的生存环境，只要有口饭吃，有口水喝，人就能活下来。我们去的地方毕竟不是夹边沟，在那里，人才会像没水的秧苗一样，大批地枯萎死去。

在兵团最值得记忆的是沙漠之旅。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乌兰布和大沙漠。在兵团的三年间，我们到沙漠中去过几次，好像是为了军事训练去的。内蒙兵团的定位是“屯垦戍边”，这是古代留下的一种做法，我们的编制方式全都是按准军事编制，分师团连排，连长和指导员以上的干部都是现役军人。给我们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发津贴（而不是像农场那样发工资，男兵每月6元，女兵每月6.75元，多出来的是卫生费）。刚去的时候还搞夜间紧急集合，拉练，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第一次见到绵延无际的沙漠是令人震惊的。大沙丘有好几层楼高，一面陡，一面坡，我们从坡的一面爬上去，然后在沙丘顶部坐下来，从陡的一面滑下去。后来在一些沙漠旅游地也玩过滑沙，那是专门开辟的滑道，用专门的滑板来滑沙的，而我们当年的滑法才是最原始的滑沙。

在沙丘之上行走，常常能看到小动物一串串细小的脚印，据说是狐狸留下来的。有一次，我们去沙漠拉练，真的在几米的近距离见到一只狐狸，它恐怕一年也不会遇到一个人，所以一见到我们就飞快地连窜带跳地逃走了，但是我们见到它却全都是惊喜。在大沙漠中跋涉了一阵，抬头一看，连长在远处的一座高高的沙丘上骑马伫立，像青铜骑士的雕塑，使人心中莫名感动。他那威风凛凛的风姿让人想起战争中真正的军事指挥员，可惜他领导的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士兵，只是一些干农活的农工，也没有真正的战事，只有以苏联为假想敌的煞有介事的拉练。

在沙丘和沙丘之间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空地，全是龟裂的坚硬如石的粘土，植物大致只有两种，一种是红柳，是一种枝条呈紫红色的灌木；另一种叫白刺，也是灌木，但枝干是白色的。最让人惊喜的是白刺上会结一种黄豆大小的果实，非常甜美多汁，俗称“酸溜溜”，是非常好吃的野果。最不可思议的是，每棵白刺上的酸溜溜味道不同，有的偏酸些，有的偏甜些，所以每次吃酸溜溜都是一种冒险，有意外惊喜，不像你吃香蕉苹果之前早就知道它们会是什么味道。在北方那缺水也缺水果的地方，这种野果简直就像天赐美味，可惜数量有限，只能偶尔吃到。沙漠中还有一种水果，那就是沙枣了。沙枣树就像北方的枣树，只是树叶仿佛在绿色中掺了一些沙的颜色，成了带白色斑点的浅绿，沙枣比起大枣也多了一种沙沙的味道，个头不大，像酸枣。总之，口感不清爽，让人缺少吃它的欲望。

说起吃，那可真是乏善可陈。饿倒是没有饿着，我们因为是准军事编制，粮食定量是很高的，每月45斤粮食，女生觉得多一点，男生觉得还差点，所以，男生常常找我们女生要吃不了的馒头。因为干的是重体力劳动，所以就连女生也能每顿饭吃两三个馒头。米饭是没有的，因为北方不种稻子。蔬菜也很单调，有一个女生排专门种菜，她们种出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什么熟了就吃什么，有了萝卜吃萝卜，结了茄子吃茄子，没有太多的种类可以调换，所以有时能连着一个月吃一种菜。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甜菜，像萝卜一样的圆球形，看上去很好吃，可惜这东西并不适合直接食用，而是用于榨糖的。也有肉，但是不多，多数是猪牛羊，偶尔也有骆驼肉、狗肉。有次过节，男生吃猪肉，女生吃骆驼肉，我们很纳闷，不知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后来听说是因为骆驼肉太“热”，男生是阳性的，本来就属热，再吃热的怕上火；而女生是阴性的，属冷，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不会太上火。这些中医道理听上去永远是似是而非的，用方舟子的话来说：所有拿不出实验室证据的说法都不科学。

有一次，连里出了食物中毒事故。忘了是过个什么节，改善伙食吃炸油条，可能是因为用的油不对，是胡麻油，吃了之后许多人开始呕吐，神志恍惚。据说有的人已经口授遗言，准备告别人世了。我那次反应不是太厉害，可能跟吃的多少和体质有关，很多人用牙刷把儿捅嗓子眼，让自己把吃下去的油条吐出来，逃过了一劫。最终，经过抢救，症状缓解，一个人也没死。那些留遗言的被人们传为笑柄，被大伙儿嘲笑了很长时间。

那时，医疗条件是很差的。虽然按照部队编制，每个连有一位军医，现役军人。叫军医，可也就是个军队卫生员的水平。有一次，我咳嗽，发高烧，军医给我开了病假，打青链霉素，折腾了

很长时间才让我复工。当我问他我得的是什么病时，他却始终缄口不言，不知道是因为以他的水平无法确诊，还是因为怕吓着我，反正这位大夫任我怎么问，就是铁嘴钢牙，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口风。病给你治好了就行了，其他就别多问了。所以那次我得的到底是普通肺炎还是肺结核之类的病，我始终也不知道，只是在几十年后的年度体检中，总是会有肺部陈旧钙化点的报告。公理公道讲，我去的兵团比起许多插队知青去的小山村的医疗水平还是要好很多，很多知青就因为痢疾一类的常见病死去了，再也没有能够从乡下回来。

物质生活的艰苦倒在其次，精神的苦闷才是致命的。在那个地方，我因为和一些人交好，给领导提意见，被作为反派人物批判，并且因为父母的问题和这些事入不了共青团。我早在师大女附中上初一的时候就写过入团申请书，当时被老师当做政治上积极上进的表现，把我的申请书（上面当然是充满了各种理想主义的话语，当然提到了刘胡兰——她15岁就已经为革命牺牲了，我已经13岁了，等等）当做范文给班上的同学传看。我那时在全班40多人中是唯一的“三道杠”（少先队大队委员），我从小一直是拔尖人物，现在居然在周围人都入了团的时候屡试不中，这种遭遇对于人年幼时的理想主义具有致命的杀伤力。因为在这个遭受痛苦折磨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人性的丑恶，这同我过去在文学作品中看到过的丑恶大不一样，它是活生生的丑恶，伴有种种难以想象的丑恶细节，令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由于这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当时的我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如前所述，我们连总共有一二百人，发了癔病的就有十几人，可能的原因既有周边景色的荒凉，也有生活方式的压抑。跟他们比，我的状况算不错的），每次写家信，都有对自己的长篇批判。记忆中信里有过这样的字句：你们在公园里培养出来的小女儿在现实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多年之后（我早已离开兵团之后）才听说，当年我的每次来信都会在妈妈的同事中引起一阵骚动。妈妈会告诉她们：女儿来信了。可见当时家里人已经担忧焦虑到何种程度。她们一定是怕我熬不过去，得神经病。

所以，当我三年后从内蒙回到北京的家，再见到过去的家园，就有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记得我回到北京后，与中学时的旧友相聚。聊了一阵，她突然抬手看看表，说：“哎呀，我要走了，我还没写完小组总结呢！”我马上开始发愣，觉得听到的好像是上辈子的事，这位朋友是留在我上辈子中的一个人，一个记忆。它显得那么不真实，或者说有一种重回娘胎的感觉。那时的我，感觉上已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年人，虽然当时我才刚满20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已经离我远去，我受不了它，无论见到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天真烂漫，都会使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会引起一种轻微的反感。直到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还会反复做一个噩梦，就是我又回到了兵团，可见这段

经历对我是多么不堪回首。

我记得在我刚从内蒙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

我们那一代人都喜欢小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有赎罪情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准备受这样痛苦的洗礼，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也经过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但是心情不是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的悲壮，而是有更多的自嘲和尴尬。我们当时虽然根本算不上是知识分子，连知识青年的称号对于我们当时的那点学历来说都相当勉强，但是，我们的这段生活经历并非毫无价值，毫无意义。痛苦的现实生活的煎熬使我们在20岁时就成熟起来，而现在的孩子们在这个岁数还在大学过着无忧无虑对生活充满憧憬的学习生活呢。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从我们的肌肤血肉上得到的经验呵！从此以后，我们偏爱从自己血肉上得来的真理，我们不再轻信任何人。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来源：成蹊当代艺术中心 公众号）

叶辛：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来源:搜狐黑板报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响应号召下农村

要讲知青回城，就得先说一下知青是怎么到农村去的。

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闻广播中播出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是很想去。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寻找各种理由不去农村的，还是少数。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没有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去插队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

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我们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觉得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现在我脑海中还回响着当时的这些声音。除了豪迈，我的声音中还有些许的悲凉，当时我想：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我们是不

会再回来了。

当时的青年上山下乡，是分层次的，最差的是到外地农村插队落户，国家基本不管，知青参加劳动，拿工分养活自己;第二个层次是到外地的国营农场，每个月32元钱;比外地的国营农场层次更高一点的是军垦农场，每个月有36元钱生活费，发一件7元钱的军大衣，这在当时很有诱惑力，这些数字都是历史的记忆，很珍贵;第四个层次是到上海市郊的农场，比如崇明、奉贤、芦潮港、东海、大丰，尽管劳动也很艰苦，月工资只有24元钱，但是离上海近，回家很方便;还有一个层次叫自行投亲插队。整个20世纪，移民来上海最多的是江苏人和浙江人，只要原籍有亲戚收留，知青就可以过去，在上海111万知青中有5.1万人到江苏去插队，还有3.2万人到浙江去插队。

从现代大都市上海来到偏远、闭塞、贫穷的贵州，路程很遥远，一路上我们的热情在疲劳打击下慢慢地冷却了。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小型城市贵定下车，在那里铺稻草直接在地上睡了一晚，这对我来说还是生平第一次。第二天我们坐着卡车，颠簸了整整一天，才到达修文县久长那个插队的地方。

疲劳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真正踏进山区、踏进山寨，面临和我们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农村时，内心的巨大落差。当我们到达修文县久长时，一些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不愿意下卡车，她们就在卡车上跺着脚叫：我们是听毛主席话来的，是来建设新农村的，怎么跑到这些寸草不生的山区来了。现实从一开始就残酷地颠覆了我们以前的一切美好想法。

当时我们6个年轻人插队落户的地方是砂锅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住的泥墙茅草屋。那个茅草屋从外面看就很阴暗潮湿，没有窗户，门是用牛屎敷的。但是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走进茅草屋，我们开始了插队落户的生活。生活关、劳动关、和贫下中农结合的思想关，命运早就为我们安排了种种的障碍，除了克服，我们别无选择。

初到贵州，我是用城市人的眼光来看这里的一切，山乡是闭塞的、遥远的、僻静的，山乡里风土人情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天天在庄稼地里刨粮食，指望老天爷风调雨顺，把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然而当10年下乡结束，我要回归都市时，我已经和很多农民一样了。

千方百计回城市

10年中，我们是身在农村，心向都市。我们想家，想知道家里的事情，想知道城市里不一样的事情。当时唯一的渠道就是给家里写信，我们一起有6个人，每个人的来信都能激起我们的兴趣，信里总是会有一些上海的情况：夏天了，天气多么酷热;冬天了，上海今年怎么冷呀，甚至黄埔剧场前的流氓行为也会提一笔。都市是跟这些知青的心联系在一起的。

到了农村插队几年后，无论是当初写了血书积极要去的知青，还是很无奈地被动员而去的知青，他们共同的心愿是上调，是回到都市。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吗?不是，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如果不回去，天天劳动，不能养

活自己。我插队的那个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从早干到黑，要爬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煤洞挖煤，一天的收入还不到6毛钱。我身边有一个革命的典型大队，叫白窑大队，每天的收入只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为什么叫“邮票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都是8分钱。在插队后期，我们所有知青的共同心愿，就是我们要活下去完成一个人该完成的事——谈恋爱找对象。

这10年我回上海探亲3次，当时国家规定知青一辈子只能探亲2次，我为什么有3次呢?实际上我这3次都不是用知青探亲的钱，而是出版社要我改稿子回去的。一旦回到都市，我会感觉到上海的马路特别洁净，上海的阳光特别灿烂，上海的人民广场特别宽阔和亲切。我想所有知青的心情和我都是一样的，他们思念城市，特别是在农村的生活不能养活自己时，更加思念都市，更加思念回归。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之所以得到解决，这和1700万知青的心愿是有关系的。

后来，思想慢慢松动，知青开始以各种方式回归城市。1973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指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这仅仅是一句话，但是已经认识到知青问题将来要酿成社会问题。其实，1975年贵州省已开始解决到贵州的10600个上海知青的出路问题。当时，你可以去读6大中专，即地区的师范、林校、卫校、财校、农校、水电学校，去读一到两年，到时候把你分到县里或者是地区部门，很多知青就是通过上6大中专学校解决问题的。我当初是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优待知青，优待上海知青，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安顺师范的教导主任很奇怪，他说你的条件都符合，你的文化程度我们也不考核了，只要你报名，我们就收。但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写小说，所以我留下来了。

后来，政策进一步放宽。当时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具体政策的限制：已婚知青不能回城，另外国家安排过的，上过6大中专的，无论是安排你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或是某某山乡小学，只要国家给你一份工作，给你工资，算是国家给你解决了，你就不能回来了。

根据政策，知青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回归城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考取大学，我有个朋友在当时考取了上海师范大学，读完书后留校任教，从助教做起，一直做到教授;二是在外地参军，转业后回上海;其他大量的普通知青，只要户口还没有离开农村，只要还没有结婚，只要没有在当地安排过工作，都可以回归。1978年、1979年，每个区知青办门口都排着长队，大量知青还都在农村，下乡已经七八年了，都在办手续想把户口迁回来。实事求是地说，只是把户口迁回来，不落实工作。我只举一个我妹妹的例子，1973年，毛主席对李庆霖的信作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批示之后，政策变得人性化了。独生子女、革命烈士子女、革命伤残军人子女可以回来，还有父母有多子女却没有一个在身边的，有一个子女可以回来，我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妹妹又都去插队了，她是根据这个政策回上海的。

虽然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有几平方米的权利。知青回来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利益冲突，家里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各有各的想法。因此，当时法院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当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父母怎样协调都不行，必须写保证书——在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户口进来。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第一次考取大学回归城市的机会我放弃了，同样第二次考取大学的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只要190分，我当时已经出了3本书，招生的老师认识我，跟我说只要你写1篇作文，我们给你把分打得高高的，其他5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当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我知道只有在我自己能掌握时间的环境里，我才能写完这部小说。《蹉跎岁月》完成后，贵州省作家协会把我招去，我就这样离开了农村。1990年，因为领导关心，我回归上海。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省里专门派了两个干部来上海看望我母亲，说贵州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需要我在那里工作，我母亲从来没看过这么大的干部来家里，就说你们实在需要我也没办法，你们就留着吧。后来我获知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确实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调回上海。我调回来时(吴)邦国同志是市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局级干部进来一定要经过他审批。邦国同志对我说，你调回来了，不要把我当成书记，我们是朋友，你有事情直接来找我。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青中运气比较好的。

回来的和留下的

我们这一代知青，大部分人千方百计回归了城里，虽然有一些回城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大部分回来的知青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有很多困顿、不解，遇到了许多问题和困难。

十年动乱，给国家造成的灾难是全国性的，上海也不例外。“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么多人涌回上海，都安排工作很有难度，只能分期分批地由居委会来安排，好一点的由街道工厂来安排。我们上海目前有一些区长、副区长，有一些厅局级干部，是知青出身，他们就是从居委会、街道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也有一部分国营厂矿，比如造船厂、钢铁厂，安置了一部分知青，能够进到这样工厂工作的知青，那是最好的，好的国营大厂一个月可以拿46元钱。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的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前几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个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座谈一下。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也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我们要去上班了。我就奇怪，已到吃晚饭时间还上什么班?原来他们中一个是酒店保安，晚上饭店生意好，车子多，很忙;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帮人家看门。

还有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到一家宾馆，迎面遇到一个当年女知青，她抱了很多换洗下来的被单、枕套什么的，她本想回避我，但迎面走来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打了一个招呼。我问她做什么，她跟我说回

来之后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做这个。我问她每个月收入多少?她说也就是500到700元。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很要好的朋友，我在《孽债1》、《孽债2》中都写到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后顶替妈妈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同学们就形容他：除了暖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录音机坏了他能修，电视机坏了他能修，一个桌子腿坏了，家长说扔出去吧，他说不要扔，一个下午就修好了。就是这样一个聪明的人，现在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元，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太不像话了，这个老总我认识，我去跟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的。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

留下的知青的命运也很坎坷，虽然当地政府比较照顾，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大部分人生活并不尽如人意。前两年北京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青，写了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青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只能去烧锅炉、看大门。

当“上山下乡”成为历史的记忆

当年，1700万知青从中国的大城市、中型城市涌进广阔的农村，真是波澜壮阔。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掀动了社会，触及了很多很多家庭。千千万万的人一拥而下，客观上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生活问题、住房问题、吃饭问题、收入问题、青年人的恋爱问题。很多人都把这些问题提出来，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一轰而下。事实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从1955年开始，我们党和国家为了安置读了初中、高中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就提倡过上山下乡。在1955—1965年这10年当中，整整下去了100万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安置，所谓安置就是说吃饭有保证、住房有保证、你的未来有保证。不是说这10年上山下乡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序。“文化大革命”这10年中知青一拥而下，产生的问题就多了，就像毛主席自己所说的，“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他当时写了很多实际问题，他儿子理发没有钱，每次回到家里来狼吞虎咽地吃饭，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饭，还有严重的开后门现象，当时的确暴露了很多问题。

我们这代人中出现了知青作家群，出了几个全国有名的知青作家，但是在我们这代人中几乎没有出优秀的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为什么?作家在生活当中有了感受，对我们中华语言有了领悟，找到了适合个性的表达方式，就可以成为作家。但是优秀的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的很多东西必须要循序渐进。从这样一个意义来说，这是一段蹉跎岁月。10年动乱给中国带来了很大戕害，蹉跎岁月给整整一代人也造成很大的戕害，有很多没有还清的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孽债》这本书和这部电视剧，有更为深层的意义。我总说7个字，叫“岁月蹉跎志犹存”，在这一代人中，不是没有有志向的人，他们力争要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些贡献，“志”还是存在的。

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对我个人来说，第一，在上山下乡10年7个月的日子里，我思考了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命运，我们经历了三个思想阶段：最早比较虔诚、比较狂热、比较盲目;到了农村这个比较严酷的现实中，产生了困惑，无所适从，想离开;最后开始觉醒，想真正从乡间小路上一步步走出来。第二，10年7个月的插队生活教会我用农民的眼光看待都市、看待省城、看待上海，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笔财富。正是在这些日子里，我思考了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代人的命运，了解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没有更多的需求，希望有一顿饱饭吃，希望在天寒地冻时有一件棉衣御寒。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影响了我的世界观、价值观。第三，因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我由衷地感觉到，我们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人开始聪明起来，开始灵活起来，开始选择了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这30年来，中国不是没有风雨，不是没有波澜，但是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在追赶世界的步伐，要发展经济，要使13亿人口的日子过得好起来，没有解决温饱的解决温饱，解决了温饱的要奔小康，进入了小康的日子，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生活，要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30年是中华民族，或者说是我经历的60年中最好的30年。

?

上世纪70年代北京知青陕北教书记

乡学

2018年08月10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报



1973年，本文作者与他的陕北学生娃 供图/谢侯之

◎谢侯之

枣圪台庄

那一年，我在陕北山里插队。

我们庄插队的知青都走了。剩我和简华。家里都黑五类。简华在队里教书。我在山上干活。

沟底枣圪台庄，知青走光。枣圪台书记跑来，说要借个知青去教书。

我们庄书记拉下乡的梁大夫，找我游说：枣圪台沟底队，土地有肥力，白面清油能天天吃上。梁大夫说：我听大学很可能要考试招生。教书有时间，还有星期天。你可以看书呀。

我就去了枣圪台。

第一堂课

清早起来，特地找出件干净的中山制服换过，将身子挺直了，站到讲台前。

这五个年级的学生都坐在一个窑洞里，还有算术语文各科不同。先把五年级学生叫到前面。

几个学生到了黑板前，便问道："谁有语文课本，你们已经学到哪儿了。"于是接过一本揉卷的册子。翻到一课，见是说历史故事，讲古人好学，说："就讲这课吧。"让个学生来读。那娃捧了书，读得结结巴巴，许多字不识。我把生字挑出来，先讲字意笔画，再带着学生娃们一齐用手望空中画写那字，口里"横竖撇捺"唱那笔顺。然后放学生自己唱。学生们便扯了嗓放声，口唱手画，把那调儿颂得如和尚做法事。耳中一片訇然，窑洞如同大庙。心中叹道：真是书声琅琅啊！这声音好久没听到了。看看有了些时辰，就对娃们说："都坐回原座位去吧。每个字写五行，要按笔顺规矩。然后自己背写熟。我过后来考。"

又叫过四年级的到黑板前。拿了本算术书来，见是讲四则运算。于是讲规则，先乘除后加减，括号优先。黑板上做了演算。又叫两个学生娃做了一回。留一堆题目，叫回位子去做。

然后去对付三年级。见是讲乘法。翻到口诀表，我领着念，娃们跟着直了喉咙吼。看看吼得熟了，打发回到自己座位上去背。过后要考，不会不行。

一气讲下来，在台上手舞足蹈。把所有年级都安顿了，方吐一口气。就觉到有些乏，肚子饿起来。这才想到，上了这半天的课，还没有做过课间休息。于是宣布说："现在下课，休息十分钟，再回来做作业。"娃们齐声呐喊，从座上跳起来，冲锋到场院，土匪般打闹成一团。

我擦净黑板，拍拍手上的粉末，走出学校窑门。站到阳光下，觉得有些刺眼。就看见块烂石头上蹲着个队长，等在那里。队长手上擎管旱烟杆，吃得嘴巴胡子冒烟。见我出来，笑了说："谢老师，上午的课讲少些，能成？"我应道："成么，咋介？"队长又笑："中午咧。课讲到中午就对咧。让娃们吃饭去。你也做上口嘛。下午不累的话，再讲上些。累的话呢，就算讲了。"我也笑："我讲得忘了时间了。下回得留神。让学生们吃饭去。吃过后下午再讲吧。"回身向场院里的娃们发喊道："放学啦，都回家吃饭去！"学生娃们听了，发一片喊叫，顷刻无了踪影，余了个空空的场子。

余家沟村

逢了星期天。不上课了。比较自由。去余家沟串。余家沟也只剩一个知青，王克明，也在教书。

克明见了我，高兴地招呼："嗨，正想找人传话去叫你出来呢。你倒来了。"我说："今儿星期天，我肯定会出来。我弄了瓶清油，枣圪台分我的。"克明接过清油，羡慕说："枣圪台一蛮好吃食。"又说道："老楚老苏今天在我这儿。一会儿简华说好也过来。我在庄里弄了十几个鸡蛋，还有个猪肉罐头。今天咱们可以打平伙（聚餐）了。"

随克明进了窑，见北京支延干部老苏老楚都在窑中。老苏坐灶旁烧火。灶上大锅盖了盖帘，雾气蒸腾。老楚坐炕沿上，面前好大一缸子大叶儿茶，浓得墨汁一般。

老苏原是北京什么机关科员。老楚文化人，先前是北京某校校长。

正招呼时，简华来了。身上一件灰青布褂，已洗得发白。手上提着两个酒瓶，看了大家说："都在呀！"举起酒瓶说："万庄供销社弄来的，够咱们一顿了吧。"

我取出那本《古文观止》，两人眼睛都亮，说："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没等我把陶渊明的那篇打开，克明已跳过来把书抢了去。翻了几页，伸了脖子，忽然大声朗诵起来："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抑扬顿挫前仰后合慷慨激昂，像莎翁的哈姆雷特在台上念独白。正得意，窑外已聚了一群娃娃，都吵嚷说"听王老师唱古经了，一句也解不下！"

克明翻着书说："这书还有篇儿特棒的。"指给大家看时，却是骆宾王讨武曌的檄文。克明直了身子，又是高声："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待读到"入门见嫉，娥眉不肯让人。掩袖功谗，狐媚偏能惑主"两句，大家都失声大叫："好！"倒把老苏吓了一跳，张了口，抬头疑惑地望着大家。

我笑着摇头说："骂得太露，小气了。"克明家里是高干，"文革"中整成个黑帮。听我说，就笑着看看老楚。向我眨下眼，带了分狡黠，说："这骂得才叫过瘾呢！而且几句对仗漂亮，得大声读才有味儿。"

老楚端了缸子，喝口茶。慢悠悠地笑着问："那文章骂谁呢？"克明说："骂的是伪临朝的女皇。"简华解释说："是骂武则天，唐朝的事儿了。"老苏就说："哦。骂唐朝呢。"又说："哎，我说你们几个呀，净管那些唐朝的事儿干什么？喜欢诗，多学学毛主席的诗词嘛。"老楚也说："不要光看古文吧。看点儿现代的，学点儿科学知识。"简华说："大家都在看数理化呢。"老楚鼓励说："你们几个都有程度有基础，我看呀，大学以后可能要恢复，说不定没准儿会考试招生呢。"

正说着，进来个碎娃，对老楚说："我妈饭好了，喊你到我家窑火吃派饭去。"大家慌忙说："不要去吃派饭了，在我们这儿打平伙，吃好的。"老苏就看看老楚。老楚站起身，抻了下筋骨，说是有规矩。捧了茶缸，跟了碎娃，一摇一晃地走了。老苏讷讷地跟了在后面。门前的娃们散去，剩条狗，瘦瘦地卧着。

克明去到酸菜缸，从里面抱出块压菜的石头，说："咱们搭桌子来。"我们找两块石头，地上摆好。简华

去窑洞门口，双手抓住窑门板，用力往上一提，把一扇门从门栓里卸了出来。克明上来相帮着，把门板抬了，铺到两块石头上。地上就搭出一个桌子，只是甚矮。克明有知识，便作的卖弄：“古时候没椅子。桌子矮的，是几。吃饭跪着。咱来帝王将相，席地盘腿儿。”

灶上后锅里，克明已打好一锅黄米饭。大家就都上手，前锅倒清油，炒出一大锅油汪汪的洋芋条子，盛在个大碗里。再把鸡蛋都磕了，加大把葱花打散，收拾了一大碗油汪汪的炒鸡蛋。最后找些洋柿子做了锅西红柿酸汤。几样菜摆定到门板上。克明又把猪肉罐头打开，见是白灿灿一罐头的稀稠猪油，肉倒不见几块。就都倒到个碗里。又将酒分倒进几个大茶缸子。

三个人各自找了块柴木疙瘩，坐下来。将酒杯捉定，各自先灌下去一大口。右手举了筷子，喝声“吃！”一齐动起手来。

那炒鸡蛋金黄灿烂，最是诱人。第一口一大筷子，人香得直酥了半边。又用调羹舀那罐头的猪油，拌进黄米饭里。黄米饭油津津泛一层光亮。几个人一边擎了大杯，一口口的白酒，辣辣地倒下去，肚里心里热烫起来。

一顿吃喝到太阳偏西，大家都有些瘫软。桌上白酒红酒早已倒得瓶空，盘中吃得狼藉。克明扔了筷子，一口把残酒干了，抹一下嘴，表情庄重。说：“来，咱几个,《你们已英勇牺牲》。”几人听了，都干了大杯，带了醉意，嗓音嘶哑地吼唱起来：

多少弟兄们牺牲在斗争中，

他们对人民无限忠诚。

愿为全人类能够自由生存，

一切都贡献，甚至生命。

这是19世纪俄罗斯民运人士的葬礼曲，曲调徐缓，叫大家唱得悲壮。吼叫里带了一种挣扎，叫人想到荒山上兽的干嚎。

西天上，晚霞烧起来，成了一片火海。大块火烧云红得鲜血淋淋，深深浅浅流了满天。晚风送过来，看得见大家都映红热了脸子，就觉着那歌声飘荡起来。我醉醺醺地望着那歌声。看着歌声渐高渐远，看着它飘到血红的云海里去了。

回到古代

早上起来，上了两节的课，我开口说道：“昨天留下的功课，都做完了？现在交作业。”娃们都把作业本

子拿出来放到桌上。我离了黑板，依次收了过去。

待收到山性时，见桌上空着。就问他："作业呢？"山性是个五年级男娃，很机灵的模样。他歪了头，不看我，说："没做。"我记起来，人说这山性是孩子头儿，很是捣蛋。原先枣圪台做教师的女知青被他给气哭过。就问："为什么没做？"他看一下我，垂了眼，说："没时间。"我咽口气，又问："昨天下课你干嘛去了？""耍来咧。"

我抬头看看其他娃，说："昨天耍的还有谁？还谁没做作业？"窑洞里没人答话。我凶起来："还谁没做！"娃们中间，迟迟疑疑地举起来两只手。是来福，是根宝，一个是队长的儿，也是上五年级，都怯怯地看着我。我厉声喝一句："站起来！"两个男娃，加上山性，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窑洞里死一样静。

我心里恨将起来，一路怒喝下去："不像话！你大你妈上山受苦，挣出两口吃喝，供着你们。指望你们能学上两个字儿，过上些好日子。能记账识数，少受穷受累。你们却跑去耍，还敢不做作业！对得起你大你妈吗？良心呢？"我越讲越气，声色俱厉，把些为国家为民族为乡里为父母的大道理小道理，义正词严，铺天盖地拿出来训得滔滔不绝。也不知训了几个钟点。骂到后来人有些累，心里奇怪起来，肚里哪儿来的那么多说教。

正在喝骂，觉得窑门口有人张望。抬眼去看，见是两个婆子。婆子见我看她们，吱溜一下跑没了影子。

抬头看看太阳，已是正午。再看山性儿几个，都低了头悄悄站着。气势已被卸得干净。定了气想想，可怜这些山里娃，听惯的骂都是乡间粗口，大概从没听过有人拿这么多大道理来骂人，自然矮了下来。就住了口，对娃们说："现在放学回家吃饭，没做作业的留下。"娃们都拿了书，逃也似的跑光了。

我对那三个说："你们几个坐过来。先把昨天的作业做了。"又打开语文书，找到个学过的生字表，指着字说："这些生字，每个认真写一页纸。写的时候用心，过后我来考。不会不行！"把书拍到桌上："写吧！不写完不准回家吃饭。看谁今后敢不做作业！"

三个娃都乖乖摊开了书纸，开始写。我找本书，在一旁坐了看。守着。隔阵儿训上两句："今天这事，心里要记下！完成作业是做学生的头等大事。"

又守了一刻，肚里饿起来，就说："我去做饭。你们老实写字。不许胡捣，操心我不客气。"娃们彼此偷看一眼。手上不敢怠慢，加紧了写。

我回到住处窑洞，生火，切菜，揉面，匆匆做成一锅瓜菜馒面。却发现盐没有了。就拿个小罐出来，去到隔壁喂牛老汉陈宝明家，想讨些盐回来。

出了窑，先去学校窑张望一回，转回来到陈老汉家窑前。正是中午，学校小场院静无一人。推开窑门，听

到嗡嗡的说话声，倒叫我吃了一惊，里面竟聚了一窑的人。炕上坐的都是婆姨，三个学生娃的娘也在。脚地闲站了两个吃烟的汉子。

见我推门进来，众人都一愣，忙闭了嘴。陈老汉笑吟吟赶忙招呼：“谢老师，中午做甚吃？”我说：“哦，做镬面。盐没了，能先借给我点儿吗？”众人一听，都齐声说：“这算甚事，要叫谢老师说借！”不待陈老汉动手，都四下动作，拿盐，寻辣子，还有人跑去剥来两颗葱蒜。

我连声道谢，正要走，却看见灶台上放着三个饭罐子，里面装的小米黏饭，上面堆了些下饭小菜。山性娘忙的解释：“是三家给三个娃送的饭，先叫撂着。谢老师尽管去操心管教！”队长婆姨也都相帮了说：“谢老师快忙做饭吃去。我们守着。娃们不写功课，就不能叫吃饭！”

我愣怔在那里。乡里人尊着古，敬先生管教学生呢！外面可多少年没见过这事儿了。这叫人心里热热的。多年来兴的是把读书人踩了在脚下作践。那风尚似早已失却，人心中变得遥远。而今在这贫穷的小山村儿里，遇上这敬读书，敬读书人，像是回到了古代。这是些传下来的根底，积在这些不识字的农人心里，厚得像黄土大山，可叹！只些个秦始皇烧书的歪道理能够打掉！

离了陈家，我忙跑回学校窑。见三个学生娃还在写。每人把纸抄了七八页。拿过一页来看，上面紧紧密密一排排铅笔生字，大大小小，黑黑的一片。心里惭愧，暗骂自己，真是少不更事，下手没个轻重。派这么重的功课，抄到明天早上也抄不完。

我赶忙直了身子，和善了面孔对三个娃说：“好了，今天就做到这儿吧。从今要记下，每天必须完成作业。现在快都吃饭去吧！”三个娃听了，欢呼大作，立刻都扔了笔。逢大赦似地跑了。

吃罢午饭，隔壁陈老汉特地拿了一篮杏儿过来。说是专为给老师摘的。那杏儿大而圆，颗颗润白。我拿了一颗来尝，蜜甜，更带了股清香。

老汉看了我吃，得意地说：“几道沟就数我的杏儿好了，远近再没这么卜（棵）杏树。谢老师爱吃了都拿上吃去！”我不好意思：“拿几个就够了。”老汉笑了说：“都拿上！老师么，古代要叫个先生了。一满该拿好酒烧肉待着的。几个杏儿算甚咧？”我说：“这么好的杏，您该拿上走延安城卖去嘛！”老汉把个烟杆噙到嘴里，摸出火镰点上：“咳，卖什么了，麻烦的！你谢老师好本事，看把这些娃们教的！再想吃杏儿了，上我树上摘去。”喷口烟，竟自夸耀起来：“咱这个人，就好讲个五湖四海，为的朋友！好叫谢老师你们文化人知道，你陈大爷这一辈子，不同他一般乡里人。咱是吃也吃过，喝也喝过，嫖也嫖过，赌也赌过，是见过大世面的！延安城那阵儿有个苏维埃主席林伯渠，你北京街上认得吧？那（方言：他，读nei）和我在一个桌上吃过酒席咧。”

下午下起了大雷雨。我站在窑门口看雨。近晚雨停了。空气清甜如饴。满天沉沉的阴霾，裂开来一道缝

隙，露出天穹青莹的真色。我眼前明亮，心里琢磨："那是天空本来的颜色呢。"

山中日月

一天上自然课，给娃们讲起世界宇宙太阳系："地球是个圆球。不太圆，稍微有点儿扁，"我说。娃们问："那地咋是平的，还有山了？"我在黑板上画个大地球，用粉笔在地球上截一小段，又画个小山，说："看，这一小块不是平的吗？还有山了。地球太大，人太小。人感觉不到它是圆的。有地心引力，所以人能站到地上。"我讲到古人都以为地是平的。后来有个叫麦哲伦的去航海，绕了一圈。有个叫布鲁诺的说地是个圆球，给烧死了。又讲到人坐飞船上天，看到了真的地球，是蓝色的，那是因为大海，很美。

我拿了粉笔，在地球上指点，说："这块儿是我们中国。这小块儿是陕北。这一个小点儿，就是咱枣圪台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呢。"又给解释说："这里是北极南极，中间这一圈叫赤道。赤道很热，住的黑人。"一个娃就说："我那回走延安城看见黑人。皮咋就那么黑来的？"另一个娃就问："黑人，用肥皂洗得白吧？"

第二天上课考试生词，娃们都答得好。我很高兴，正在夸。却不料山性带头，娃们齐声央告起来："谢老师，我们考好了，加一堂自然课吧！"我愣一下，笑了。那一片清脆的童音，一片肮兮兮，被太阳晒得红红的脸蛋儿，一片稚气渴望的眼睛！那是人生路上真情的画儿。而今我忆起那画面，眼里面噙了泪水。我说："今天大家都学得努力。老师也高兴。那咱们就加一节自然课吧。"娃们全体"哇"地一声大叫，互相吵嚷说："都快悄声，听谢老师讲古潮了！"于是人人端坐，大气不出。

谢老师要走了

转眼到1973年了。公社文书老宋来枣圪台开会。叫我参加。老宋跟大家说：上边这次要恢复大学，要考试招生。谢老师想去报考了。"公社叫我朝队里要个谢老师的评语。"

书记说："评语再咋议了，老师教的好嘛。"大家就表示赞同。

队长把烟杆的烟灰扣到炕沿上，想说话："咳！"又犹豫了。停一下，笑了说："要不是怕误了谢老师的前程，咱枣圪台再莫粮吃，一满白面清油管够，咱把谢老师养起。"有人应说："对着咧！"书记欠起身，说："那不能嘛，可不敢叫误了谢老师前程。"会场上都静了，众人点头附和，说："就是嘛。文化人前程重要了。"

我跟队长说："小学校又该没人教了。咋办呢？"队长咧了嘴，笑眯眯地说："谢老师放心走。乡里人有办法了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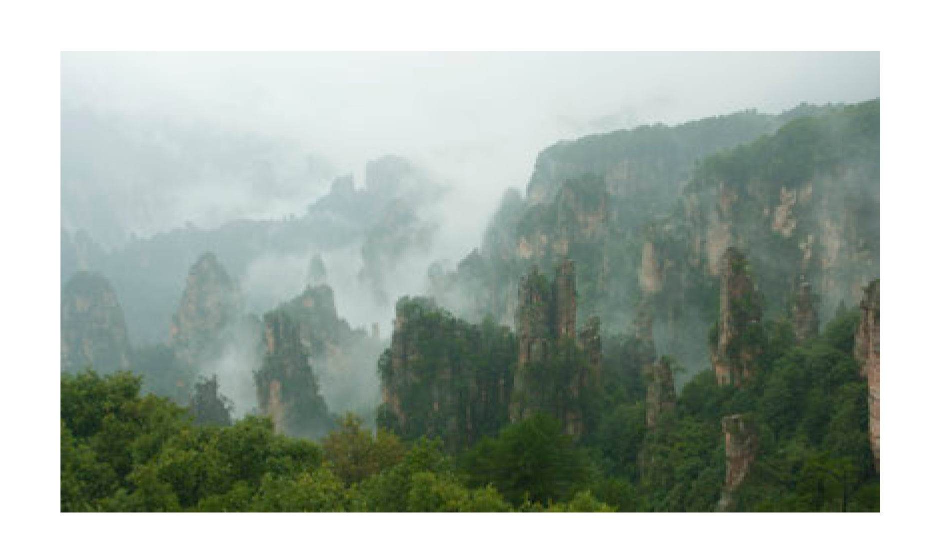
多少年后

多少年后，我在柏林工大，给帕普教授带习题课。上课的那天，我站在讲台上。看到下面一大群男女青年的眼睛，那是洋人蓝色的眼睛。我想到了枣圪台。哦，我那片小鹿小兔般的眼睛！那些娃现在在哪里呢？

作者简介

谢侯之：陕北老知青。柏林工大博士。已退休

编者注：因版面篇幅所限，本版刊发文章为全文的缩写版



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

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为逃避可怕婚姻，跑出荒原寻找她的生母，由此产生了一串揪扯人心的故事……

1970年陕北L县

1989年5月初，如今仍在延安的北京知青自发组织了一次《苍凉青春》讨论会，作为《苍凉青春》的作者，我应邀出席了这个讨论会。延安城内的北京知青现在约有400多名，出席讨论会将近200人。会上，一位脸蛋红扑扑的姑娘声泪俱下地作了发言。她不是北京知青，但她的发言，却把会议气氛推向了高潮。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采访她的过程，我胸中一直翻腾一种复难言的情绪。压抑、哀怜、惆怅在一块搅和着，穿过这些感觉，还有一束温馨明丽的光辉投射在心里。她18岁的经历像一面多棱的镜子，折射出人生和社会许多内容。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L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在离乡背井、孤苦无依的插队生活里，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婴，他们六神无主，泪水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下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自个无休止的检讨。即使撇开这些不顾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更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他们托人为孩子寻找人家，人家找到了，他们顾不得细问，便将孩子送与人。

收养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来孩子的时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探听出孩子的生父姓杨，为了对得起那对可怜人儿送孩子来世上一趟，他们给孩取名叫王杨玲。

小杨玲抱进这户人家时尚不满10天。养母自然不会有奶水喂她，好在家里有只老奶山羊，两个老人每天便从老山羊那干瘪的乳头上捋些奶水喂给她。几个月后，老山羊的乳头实在捋不出什么来了，养母只好把小米压成面，再熬成糊糊抹进她的小嘴里。小杨玲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日出日落，小杨玲一天天长大。她5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的门上。这对知青便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早已结为合法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终于熬完了苦难的岁月，在招工招干的尾声里，被招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远远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来最后看一眼亲生女儿。他们走了，他们的骨血却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也许他们曾经想把小杨玲带走，只是养父养母不肯放弃;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意思，把她带在身边，难免总会勾起痛苦的记忆—他们当时究竟持何种想法，至今小杨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点在唐山。真是这对苦难人儿的劫数，1976年初参加工作，过了半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便在他们脚下发生。之后，有消息传到村里，说那男女二人同死于地震灾难;又有消息说，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伤。无论哪种消息均无法证实，而事实却很清楚——从此以后，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了。

嚼咽着贫寒农家的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

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很发奋，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拔尖儿到了中学，各门功课都优异，对语文则格外感兴趣，她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喜欢对着广袤的高原和空阔的蓝天漫无边际地幻想。她为“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写过一篇名为《我与同学的爸爸》的小说，还给山西《青少年日记》投寄过两篇日记。她暗暗确定了自已未来的志向——当一名作家。

然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命运却把她推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终将难以回避——养父养母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包。红包包里包着她的订婚礼金——200块钱。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她便会像村里众多的姑娘一样，被打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去，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度过一生。农村姑娘普遍的归宿她是清楚的，但从来没有把这归宿同自己联系起来。她有点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养父养母强加给她的婚姻。养父养母不理会她。他们需要的是钱，因为她流泪而抛掉握在手里的钱，那就等于抛掉了过日子的指望，他们不愿听她的。

的确也是这样。光阴不催人自老，把王杨玲养到16岁，她的养父已经71岁、养母已经63岁。这种岁数的老人不可能再在土地上拼气力。家里还有个叔叔，是个精神病患者，也56岁了。地里的活儿，就靠这个精神病叔叔，想干就胡乱干干，不想干就撇下满世界乱跑。经济上没有其它来源，就靠土地，土地经管不善，家里早已穷得叮噹响，有时连买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给杨玲订的这个人家，答应事说成先给200块礼钱，订婚席一摆，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给200块，结婚时给多给少虽由男家说了算，但总还会有一笔数目。老两口抚养杨玲一场，到老来从杨玲身上讨回点补偿，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两口这么看，村里人也这么看，因而，小杨玲的婚事便订定了。

小杨玲则感到自己被拍卖了。家里收了礼金，王杨玲还没有见过男方她哭肿眼睛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不敢抬头，像做了什么丢人事一样。她再也没有心思学习，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她哀叹陕北农村的贫穷落后，恨那坑人的封建习俗，抱怨养父养母，同时又可怜他们。她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到悲伤。

好多天以后，她见到了给她订下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星期六，她刚放学回家，那男的就扛把镢头进了门，看样子是帮她家去地里干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贼溜溜地盯她。她躲进窑里，不一会儿那男的也进了窑，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主动找碴儿和她说话。他说他给她家干了多少活儿，又说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给她买了新的，过几天就送来。他说他也上过学，本来能考上中学，但一见上学没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劳动，做生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外边搞建筑，跟很多包工头是朋友，有时候给包工头订合同。他云山雾沼地吹嘘着自己，一听就知道没有几句实话。看着他那灰黄的脸，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儿，她直犯恶心。

这次见面后，她在学校里写了篇作文一一《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她流着眼泪，倾诉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事儿，她要把自己的心声，把她的苦恼、哀伤和悲愤讲出来。老师看了这篇作文，把她叫去，详细询问了她的遭遇。随后，老师明确表示态度：支持她与那男的解除婚约。

老师的同情鼓励给了王杨玲力量。她向家里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不等她说完，年迈的养父便制止她再说下去。老人眼一瞪，说：“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还不得再找?胡折腾个啥?给我安安稳稳的，甭胡思乱想。”她争辩道：“你们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老人说：“包办?父母给女儿瞅人家，咱这里一辈一辈都这样。不要念了几年书，灌了点洋汤，就给我胡跳腾!”“我还小……“”“还小?都16岁啦!好，你小，你小，让我和你妈再把你养活着….…”老人一生气，痰涌到喉咙，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

反抗失败了。王杨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约，反而家里不再让她上学。老父亲认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念书把心念野了。她被强制性地留在家里。学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别了。

在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开始压在她16岁的嫩肩膀上。每天，她和那个神经病叔叔到地里，从早干到晚，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歇，家里养着鸡，养着羊，还有一条瘸腿老驴，她必须经管，她所在的村子地处塬区，土地虽然相对较多，但水极缺，一口井钻20多米深才能见水，村里人吃水都花钱买，4角钱一桶。她家买不起，只好自已去绞。

井绳上拴着两只小桶，绞动辘轳，一只桶上、一只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离家很远，她要歇几气才能把一担水担回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喘息，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也不原意和村里人说话。有时正在干活儿，看见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上学或放学，心里就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虽然她已回到家里，但仍然遏止不住对学校生活的思念。

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学时的种种情景，有些极为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温馨，那么富有情致，那么值得留恋，想着想着，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泪。她想找些书来看，但家里没有。一次见邻家窗台上扔着本破旧发黄的《农家年历》，便借来读，毫无趣味的一本小册子她竟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上边的农谚、生活小知识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平时走在路上，只要发现地上有片碎报纸，她都会拾起，不管上边印着什么，总要细细去阅读。她尽可能地把那些能阅读的东西都收揽到自己手边，聊以消解精神的饥渴，要不，她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加空虚、更加痛苦。

那个男的经常往她家跑，每次一来，便开始吹嘘自己，她对他讨厌透了。有一次，她终于不能忍受，对那男的说："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咱俩的事，最终肯定不能成。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说："不成?你家把我的钱都花了"她大声说："钱，一定还你!"她陡然下定决心：即使呆在家里，不能上学，也要和这个男的断绝关系，她绝对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开始寻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读过她作文的语文教师，可是去找这位教师，人家能给帮什么忙呢?必须找管这号事情的，比如乡上的干部。她的婚事是包办的，她不自愿，政府应该出面干涉。这么一想，她先后去找过乡政府、县妇联和县政府的干部，谁知，你推我，我推你，了无结果。真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难道她真的就该受那可恶的命运的摆布么?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姑娘。她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走进偏僻的小巷。躲过杂七杂八的眼睛，她哭得更伤心。哭着哭着，她突然想到了死。

死?对，死也是一种反抗，也能表达她对命运不屈从的决心!可是…·…她死了，对年迈的养父养母打击该有多大?不错，她怨恨他们为她订亲、逼她退学，怨恨他们脑筋陈旧落后，但他们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吗?他们也怪可怜的…。

她突然又恨起亲生父母来。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既然他们荒唐地生下她，就应该负起责任，尽到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却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该怎么办?还回到家里去，等待着某一天去给那个脸色灰黄、满口谎话的男人当妻子?不，纵然死她也不愿意这样。她蓦然想起一位同学在县医院当护工。能不能去找这位同学也介绍她当护工?洗被褥，打扫卫生，挣下钱就去外地。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先离开这儿。也不能亏待了养父养母，她会给他们寄钱……主意一定，她便抹净眼泪，奔县医院而去。

谁知到了县医院一问，她的那位同学早就回家不干了。她软沓沓坐在医院走道的长椅上，泪水一下子又涌出来。

"女子，你哭什么?"忽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她。

她抬起头，见是一个女的，三四十岁，手里提着药，像是来看病的。这女的眼睛里充满了真诚。从声音她判断

出这人是一位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一种奇妙的情感使她再难抑制满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声来。那女的在长椅上坐下，抚摸着她的肩头，说：“别哭，说说你有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你。”于是她一边哭，一边把她的身世遭遇讲了一遍。那女的听罢，眼圈儿红了，安慰她说：“我也是个北京知青，县上还有好多我们这帮人，你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女儿，我们会替你想办法。”她告诉杨玲，她叫祝萍，在县农行工作。她说她要先和县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过几天再来找她她把杨玲领到家里认了门儿，还留杨玲吃了顿饭。

10多天后，杨玲又来县上，再次见到祝萍。祝萍高兴地告诉她，她的事儿县上一伙北京知青商量后，决定直接向梁县长反映，因为梁县长也是位北京知青。这一招果真管用，梁县长当即表态说他要干预这件事情。“解除婚约不成问题了”，祝萍轻松而又愉快，一把拉住她，说，“走，大伙都想见见你，往后你该怎么办，大伙还得商量商量哩。”杨玲心里激动，鼻子发酸。她随着祝萍，见到了五六个在县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们个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她、疼她。感受着他们亲人般的体贴抚慰，她索性放声大哭，哭得好不伤心。

这次她没有回家，第二天，她怀里装着叔叔阿姨凑起来的钱，乘车奔向延安。大批北京知青离开延安后，地区劳动人事局下设了个知青处，负责处理知青遗留问题，他们鼓动她去找这个机构。她是知青的女儿，养父养母已那么老，实际上她已无依无靠，往后的事，知青处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着大雨。找到知青处，杨玲又是浑身透湿。正好知青处有一位叫作余风云的阿姨，是北京知青。听完她的诉说，余风云先把她领回家里，从里到外，替她换了身干净衣服，并留她在家住下。随后，余风云便为她的事跑开了。知青处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感到棘手，必须向上请示汇报。事情拖下来了。

王杨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传开。他们纷纷到余风云家中来看她。地区建筑公司陈铁生、刘学军夫妇执意把杨玲从余风云身边带走，他们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姑娘——这棵北京知青伙伴留在黄土高原的可怜的根苗。他们在家里为她支了床，让她安心住下，并交给她一把家里大门上的钥匙。他们知道她渴望学习，喜欢读书，第二天，就领她去新华书店，由她在书架上挑选…。

仿佛进入梦境，在人世间，王杨玲没有想到自己竟能领受到这份温情和爱意，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的泪水止不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泪，没有语言。

在《苍凉青春》讨论会上，当王杨玲发完言后，我看到许多与会知青都哭了。这些流落异地，似乎注定要在黄土高原上生活下去的人们，业已组织了一个团体一一延安地区北京知青同乡会，他们决心紧密团结，互相帮扶，共同去走那艰难的漫长的人生之路。他们纷纷发言，表示对王杨玲的满腔同情。有人提议将王杨玲作为特殊会员吸收进同乡会，大家一致通过。还有人当场为王杨玲捐款。讨论会暂时脱离原来的主题，时间围绕着王杨玲而展开。我静静地坐在会场，目睹眼前这感人的场面，只觉心里一股热流在冲荡……

感谢上苍，王杨玲，这个不幸的姑娘，最终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儿。

1991年北京—陕北

1991年4月的一天，艳阳高照，春光明媚。走出北京站，她便置身首都繁华而喧闹的大街上了。

仿佛如梦境中一样，突然她不敢相信她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是真的，不敢相信脚下这块土地就是传说中她那早已死去的生母现在依然脚踏的地方。她摆脱不掉虚幻的感觉。从黄土高原的小县城走进这现代化的大都市，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这虚幻感觉拨弄得这样强烈，竟使她不由得停住脚步，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

两行热泪悄悄从她脸颊上滚下。

她，就是笔者曾在《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里记述的那个苦命的女孩子王杨玲。作为文字的东西，那里面讲述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有了结尾，但生活里的故事却在继续。这是一个教人感概良多的故事。命运在王杨玲身上涂抹了那么浓重的传奇色彩，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再次投向她。

她的生母没有死，而且被一帮好心的北京知青颇费周折地找到了。此番进京，王杨玲就是来认生身母亲的。

王杨玲，这个被遗落在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她的身世和遭遇，揪扯着延安城内北京知青们的心。大家将她认作共同的女儿之后，她的命运，便开始了连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

知青们经过种种努力，首先让地区有关部门承认了王杨玲的身份—她是北京知青的后代。确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便开始为她的安置问题而奔走了。

从地区到县上，工作多渠道、多层面展开。承认杨玲身份容易，但要安置她就难了，难在一点上：没有政策依据。但他们仍为小杨玲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帝终于被感动了——王杨玲的户口终于从农村转出来，被安置到县上一家门市部当售货员。

命运对王杨玲绽开了笑脸。在荒凉的黄土地上跌滚扑爬了18年的生命突然在她面前展开一片新绿这片新绿让她看得耀眼，让她觉出了生活的芬芳。头顶着崭新的太阳，呼吸着高原上清新的空气，她掀开了青春新的一页。

她从心里感激地区、县上那些待她如亲生女儿般的知青叔叔阿姨们。她知道，他们并不期求她的报答，但她必须报答她们。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便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姑娘，一个有用的人才。

还有乡下年迈体衰的养父养母和那个患有癫痫症的叔叔，是他们将她辛辛苦苦拉扯大，尽管他们没有文化、脑筋落后，尽管他们曾经包办过她的婚姻，中断了她的学业，但他们的养育之恩是她今生今世偿还不清的。她每月工

资57元。工资一发，先给家里捎20元，再交10元房租，吃饭上卡紧点，省下来买点书，每月再攒5元，两个月就能回家看望老人一次。她依然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在家里常干繁重活儿，如今当了售货员，这工作在她看来太轻松了，而且按钟点上班下班，她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和写作。她极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命运新出现的巨大转机将她的心劲鼓得更足了。

谁也不曾料到，就在此时，一个陌生男人意外地闯进她的生活，早就暗暗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股非同寻常的波澜，立即被掀腾起来了。

杨玲还在农村时，曾经收到过一个署名王应立的男人的来信。这位男子自我介绍他在西安国棉某厂工作，说他了解王杨玲的身世，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以后他要想办法帮助她。王杨玲未敢期望得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的帮助，出于礼貌，她给他回了一封表达谢意的信。不久，这个男人又来信了，这次没有署名，落款处写着“叔叔”，说他也是一位北京知青，过去曾在杨玲所在的L县插队，他极想来L县看望杨玲。杨玲从内心感激这位知青叔叔，心想如果他来，一定要好好招待。然而，他没有来，而且从此再无音讯。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了，可是，就在杨玲工作后不久，这位奇怪的王应立第三封信来了，这次落款处令杨玲惊愕地署着“你的父亲”。

信中内容更让杨玲吃惊，说杨玲母亲并没有死，她非常想念杨玲这位女儿;还说他与她母亲有张合影，本想寄给她，但一时又找不见了。信的末尾表示，如果能抽出时间，他就来接她，一块去会会她的母亲。

一封明确而又含糊、直率而又吞吞吐吐、充满矛盾而又极富诱惑力的信。是真?是假?但无论真假，信中所说的一切，都犹如巨石入水，对王杨玲的情感构成极大的冲击力。过去传说她的生身父母一块死于唐山地震，又有传说死的是母亲，父亲还活着。现在，不但突然冒出一个父亲，而且母亲也复活了。

在漫漫10多年的岁月里，记不清有多少次，她设想过假如生身父母尚在人世，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明白这是傻想。每当她看到别的孩子和父母一起高高兴兴说说笑笑，而她只能伶仃一人独缩一隅时，当别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还在妈妈面前撒娇，而她则要担负起侍奉年迈多病的养父养母——每当这时，她只能默默在心里悲叹，不怨天，不怨地，只怨她的命不好。不论别人怎样传说，她相信她的父母早已死了，不然，他们是不会撇下她不管的。这种判断早已根植于她的心里。可是现在，天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声惊雷…•苦命的姑娘真是感情难以自持了。

她拿着这封信，去找延安城里的北京知青叔叔阿姨，让他们替她判断。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这位延安大学生物系的年轻讲师，在安置杨玲工作的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与几位知青分析的结果是，无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不能先下结论，首先应弄清王应立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心里是暗怀一线希望的，希望杨玲的生身父母并没有死，过去关于王杨玲父母的死讯，都是风一股、雨一

股的传闻，从未从正式渠道证实过。同时也有一种担心，担心不怀好意的人让杨玲上当受骗。自是带着希望、疑惑、忐忑相混杂的心理，郝海彦和另外两名知青抽时间赶到西安国棉某厂。结果让人更生疑窦——从人事处到保卫处，查遍了厂里的花名册，没有叫作王应立的。在厂门口，他们又向门房、出出进进的职工打听，终于有人含含糊糊地提示，好象准备车间有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来到准备车间，了解到的情况是："这儿确实曾有个叫王应立的，而且真是位北京知青，但此人多年前就离去了，至于去向，有人说在西安城里干个体户，又有人说早去了山西一个什么县的皮革厂。到此，调查再无法进行下去。

王杨玲心中刚刚升起的热腾腾的希望，看样子就要破灭了，这是郝海彦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王应立既然是北京知青，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说不定此人真有点来头。

作为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是位热心汉子，他对王杨玲有着父亲般的疼爱感情。当初小杨玲为逃婚被众知青收留在延安以及此后为安置杨玲而奔波时，他与杨玲接触很多。杨玲性格中的朴实、要强、聪敏令他非常喜爱。他知道这个表面看去沉静而腼腆的姑娘，内心世界却是极为丰富的。这次，杨玲将那封奇怪的信交给他，尽管她没有表白希望找到生身父母，但他却清楚看出她内心翻起了什么样的波澜。为了补偿姑娘感情上的缺损——一尽管这缺损是由过去时代造成的——他要努力，动员起众知青一块抓住那条模糊线索带来的微弱希望，弄清杨玲生身父母的究竟。

郝海彦和众知青商议之后，决定去看望杨玲的养父养母。如果老人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那就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坐长途汽车，从延安到L县，然后和王杨玲一块，又颠簸着坐车来到距县城100多里路的杨玲家里。

杨玲74岁的养父疾病缠身，早就躺在炕上动弹不得，脑子好像也糊涂了，来人问话，只会哼哈不会回答。65岁的养母常犯关节痛，但还要做饭，去野外给猪扒草。那个害有癫痫症的叔叔农活早就不干了，不犯病时，在村里和人变工放牛。杨玲还有一个出了门的姐姐，也是养父母收养的。

杨玲养母对郝海彦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絮絮叨叨对他讲了许多当初抱养杨玲的事情。老人家一边说，一边惊叹着直咂嘴巴。这是一位非常慈善的老人。说了杨玲许多事情之后，她神情一变，说要央求郝海彦办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郝海彦郑重地看着老人。

老人说，她知道外头有人给杨玲来信了，信是先寄到家里的。如果杨玲的亲生父母还在世上，她央求郝海彦替她找一找。"娃她叔，"老人动情地说，"咱家的光景，你是看在眼里了，我们三个老人，都成孽孽木头了，说不定哪一天脚一蹬，眼就闭上了。当初收玲儿时，是看她爹妈落了难，今个咱不能看着这娃娃葬在这里。她叔，老嫂子求你，你就帮我找找玲儿她妈。

她的光景要是好点，就让她把娃领走。"杨玲的叔叔一直蹲在窑门边抽烟。他接口说道："玲儿是在我背上滚

大的，夏天背在背上和我一起放牛，冬天揣在怀里和我一起楼柴草，苦了娃哩，早点走吧。如今虽说她成了公家人，能挣点钱，可家里简直要把娃拖累死，不如走一个好一个。”养母和叔叔的话，杨玲都听到了，泪水一下子就涌满了她的眼眶。她冲动地大声说道：“我不走，谁也把我带不走，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只有一个家，你们老人家我都要养活!”她把脸转向郝海彦，哽咽着说：“接到那封信，我心里真的乱了。我从小跟别的孩子一块玩，一吵架，人家就骂我是没娘的“野种’。多少次做梦都梦见我站在村头等妈妈，她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来，回来看我来了。我高兴地跑上去大声喊妈妈，我抱着她哭啊，笑啊……·可那毕竟是梦。10多年了，谁来看过我?这么多年没有她，我也长大了，我恨她!……”“玲儿，咋能胡说哩?”养母急忙制止，“做妈的谁不疼自个的孩子?我寻思，你妈兴许有难处，兴许是不好意思回来认姑娘。”老人又转向郝海彦，“她叔，你还是替我们找找看，将心比心，都一理，如今世事好了，人家骨肉是该团聚了!”郝海彦只觉得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直往喉头顶。这位老人的请求令他心头颤栗。来此地看望老人，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应该代表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北京知青，来感谢抚养了他们后代的老人。可是此刻，他什么也说不出。他的心里不再仅是谢意，而且溢满了尊敬。他眼里闪烁着莹莹泪光，深深将身俯下去，向老人恭敬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离开这户人家时，郝海彦除留够返回的车票钱，将身上其余的钱和粮票都掏出来，悄悄塞在一直昏睡的杨玲养父的枕下。

寻找杨玲生身父母的工作，在北京知青中展开了。

其实，该不该寻找，知青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寻找，为了知青和孩子过去经受的那么多苦难，为了偿还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生活所欠人们的一笔宿债，说什么也应该去寻找。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该去作这份努力。找不见则罢，假如真的找见了，叫杨玲怎么办?撇下黄土高原上的三个老人，回到生身父母身边，这岂不是兴一家、败一家?两种意见都有道理，但第一种意见明显占上风，认为只要找着了，往后的事情总会有个妥善的处理，对此，他们坚信不疑。

一些日子后，那个自称为父亲的王应立被弄清楚了。曾在L县插队、现已返城的几位知青依稀记得此人。此人当年在L县知青中因打架斗殴盗窃颇有名气，但可以肯定，他不是王杨玲的父亲。杨玲的生身父母离开L县时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而他从农村走出去时仍是光杆一人。至于他假冒杨玲父亲并说要带杨玲去会母亲是何目的，谁也说不清了。“父亲”是假的，母亲也就不存在吗?关键是要找到当年和杨玲母亲一块插队的同伴。找到他们，杨玲母亲的一切就很容易搞清楚了。

寻找在缓慢而执着地进行着。这个过程中，一件改变如今仍滞留在陕北的知青命运的事情发生了——北京市相对放宽了知青回城政策，许多知青终于告别生活了20年的黄土地，回到了故乡北京的怀抱。最早收留了王杨玲的陈铁生、刘学军夫妇调回北京时，执意要将杨玲当作他们的孩子一块带走，打算往北京调动的郝海彦，也做通了妻子

和北京母亲的工作，决定将杨玲作为他的女儿带回北京。至于杨玲家三位老人日后的赡养，陈铁生、刘学军和郝海彦都表示由他们来承担。杨玲成了他们“争抢”的对象。

当然，这样办不容易，政策方面的关卡太多。寻找杨玲母亲的工作，仍在继续。

为改变自身命运而穿梭于陕北——北京之间的知青们，同时也在为杨玲的事情奔走着。他们先在延安方面努力，争取从知青困难补助年度款中为杨玲申请一笔安置费。为此，郝海彦与另外两名知青——担任延安市法院院长的刘叔珍和在地区财政局工作的周强，数次到L县去。1990年底，寻找工作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那个“假冒父亲”王应立终于在山西省Q县皮革厂找到了。他是杨玲生身父母插队时的同伴。这个插队时劣迹昭著的老知青，在岁月的洗涤与锤炼下，早已变成了另个人。他十分清楚王杨玲的身世，真心地同情小杨玲，他愿意以父亲的名义来对王杨玲履行一个老知青的责任与义务。

王杨玲的生母叫杨惠琳，他知道她还活着，当年死难于唐山地震的只是王杨玲的生父。至于杨惠琳如今在何处，他只是听说过在北京远郊一个什么纺织厂，具体情况不得而知，许多年来她似乎有意识地躲藏起来，避免与过去任何熟人交往。

郝海彦一帮人情绪振奋。郝海彦、周强，还有过去在延安文工团当歌唱演员、如今回到北京在一个街道办事处工作的温宝林，分头跑附近郊县的纺织厂，从厂里的花名册中翻查。

这是一种笨拙的办法，路没少跑，但没结果。他们转而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市有关政府机构，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北京市人口浩如烟海，查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也许是受到这帮知青精神的感染，政府机构竟答应了。

1991年1月12日，刚刚从延安回到北京的郝海彦便接到北京市劳动局知青处李副处长的通知，说是杨惠琳找到了，在郊区C县的毛纺厂工作。郝海彦激动得恨不能大喊一声。他立即将喜讯告知周强和温宝林。三人遏止不住兴奋情绪，不顾满天开始飘起的雪花，立即乘长途汽车，赶往C县。

上了车，他们心中又忐忑起来。不错，杨惠琳是找到了，但她已组成了新的家庭，平静安适地过着新的生活，现在，突然将一个早巳送人的女儿推到她的面前，无疑等于又撕开了她旧日的伤疤。要是她或现在的丈夫不愿与王杨玲相认怎么办?即使愿意相认，他们会怎样处理与陕北三位老人的关系?过去知青中有人担心找到生母会破坏两个家庭的平静，好事变坏，得不偿失，这种可能的确存在的，但最终他们还是坚持寻找，并且终于找到了。

既然如此，他们就必须见到这位杨惠琳。到了这一刻，他们才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他们的寻找，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孩子，不仅仅是为了抚育孩子的三位善良凄苦的老人，不仅仅是为了偿还历史的宿债，也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信念中一个至尊至美至圣至洁的东西不被岁月的灰尘淹没，为了20年他们本不该失去的一切，为了过去的一切不再发生;他们寻找的，是那本不该失落的爱，是人世间最宝贵的真情，是一种内心的平

静!20年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黄土地上度过的，黄土地赐予了他们淳朴而博大的情怀，黄土地告诉了他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苦与乐，什么是爱与憎，什么是责任，人在生活中应该索取什么，奉献什么。现在，他们要把黄土地的述说告诉每一个父亲、每一个母亲，告诉天下每一个人。

纺织女工杨惠琳一见到三位来人，预感便告诉她：许久以来她最牵挂又最恐惧、最渴望了解又竭力回避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多年来，她一直不愿回首那令她心碎的往事。为了忘掉过去的一切，进北京工作后，她连续调了几次工作，从城里调到远郊，从国家的事业单位调到工厂，从轻松岗位调到又苦又累的纺织女工行当。她和过去一切熟人断绝了关系，远远避开他们。过去的生活倾注给她太多的屈辱和苦涩，教人一想起来心里就发酸发痛。她想抚平昔日生活留在心头的创伤。她这样努力了，但是办不到。她摆脱不掉一种紧紧纠缠着她的预感。终有一天，事情会寻到头上来，昔日生活迫使她吞咽下去的那枚苦果，会再次摆到她的面前，让她重新吞咽一次。

三位来人打量着她。他们邀她在雪花纷飞的厂区僻静小道上缓缓散步、交谈。他们给她讲述一个被遗弃在黄土高原的女孩的故事，讲那个女孩怎样在艰难环境中生存下来;讲女孩怎样上学，又怎样失学;怎样逃婚，又怎样参加了工作;讲高原上那户穷苦人家的三位老人，还讲了那个叫作王应立的“假冒父亲”。•…讲述者眼里泪光点点，而她从一开始便泪流满面。

不待讲述者讲完，她的身体便像道旁枯枝上残留的枯叶一样瑟瑟发抖了。

“你们……别讲了!”她放出悲声，“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妈对不起你，我的孩子呀!”数年前，一次杨惠琳与同车间一位女工在自由市场碰见个流浪的女孩，旁边有人说女孩是陕北人，她顿时如遭雷击，脸色惨白，两腿发软，连喘气都很困难了。她摇摇晃晃走到一边，不敢看那女孩。后来与她同行的女工过来告诉她，那女孩说自己是陕北榆林地区人，她才稍稍缓过神。她把那女孩同被她遗弃在陕北的女儿联系在一起，而且最初竟莫名其妙觉得那女孩就是她的孩子。多少个日日夜夜，她思念她的孩子，想象着她的孩子如今的处境，急于了解有关孩子的一切。

但至于这个孩子，她不曾向任何人提起，包括她现在的丈夫和女儿。这种思念是一种默默的揪心扯肺的思念，是一种只能独自咀嚼、独自被煎熬的思念。背过人的地方，她曾多少次为此而饮泣流泪啊!三位来人辞别后，她恍恍惚惚回到家中。她现在的丈夫姓余，两人有一个女孩，读初中了。跟前夫在杨玲之后生的那个男孩，跟这个丈夫结婚前因生计所迫也送了人，如今一家三口，生活得满和谐。丈夫见她气色异样，以为她身体不适，赶紧让她休息，他进厨房去备饭。饭端上桌，她没有动筷子。丈夫这下诧异了，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支开女儿，说有事情要对丈夫谈。

丈夫老余也是个遭受过苦难和不幸的人。这位曾服役于海军航空兵的汉子，因为“文革”中反对军内瞎吹林彪历史而被收监判刑，三年刑满后又发配到劳改农场。他是在遭难之时经人介绍与杨惠琳认识结婚的。她不嫌弃他是“现行反革命”令他很感动。1979年给他平反时，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求，他一不要补发工资，二不求名誉待遇，只提出一点：把妻子从天津郊区调到他的身边来。他觉得今生今世无论如何首先要对得起妻子。妻子曾简单向他讲述插队时的经历，也讲过她有过个男孩，送了人。从妻子颤颤的语调和凄凄然的神情中，他看出妻子心里一定埋藏着深深的创伤，也许这创伤比她表露出来的更巨大、更深重，但他从不去探究她那不愿展示的隐秘。触动那稳秘，肯定会令她痛苦，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不但如此，他还尽力为妻子创造一种可心如意的家庭生活氛围，以冲淡往昔岁月给她留下来的阴影。他待她的这番情意，杨惠琳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她深深感激他。现在，她鼓足了勇气，准备把她埋藏心中10多年的秘密、把她最不愿触动的一块隐痛，彻底向他揭开。

声音打着颤儿，她向他述说了有关杨玲的一切。丈夫听罢，呼吸急促，神色冲动，霍地站了起来，说：“你、你……这事你该早说呀，何必让孩子受这么多年苦!”见妻子泣不成声，他上前扶住她的肩头，转换口气劝慰道：“干吗要哭?好事!孩子终有个讯儿了，咱得到了一个女儿，该高兴才是。这女儿没说的，咱认!应该把女儿接回来!”杨惠琳抬起泪眼，望着丈夫，讷讷说道：“我知道你会是这个态度，但咱平平静静的家里突然插进一个女儿，怕小婧难以接受。话音未落，房门猛地被推开，刚满13岁的女儿余婧冲了进来。这孩子在外屋把一切都听到了，她扑到妈妈面前，急急说道：“妈妈，你怎么这么糊涂?我有一个姐姐多好!我怎能不接受!妈妈，快把姐姐领回来吧，我想见见她!”杨惠琳愣呆呆地盯盯女儿，又盯盯丈夫，把头一埋，眼泪泉水一般又夺眶而出。

“说是喜事，怎么还哭?”丈夫老余嗔怪她，随后兴冲冲吩咐女儿拿笔拿纸：“这就给你姐姐写信，咱们告诉她，全家盼着她尽早来京，这个家庭是她的。她应该回到北京来，回到亲人身边来，陕北家里三个老人的恩德咱们要报，咱们负责养老送终!”王杨玲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

当她接到郝海彦叔叔的电报，说生身母亲已经找到，接着又收到北京的母亲、父亲、妹妹联名写给她的信以后，她哇哇大哭起来。那泪水、那悲声仿佛聚积许久许久，现在一下子决堤了。她恨不得与可怜的妈妈，可亲可敬的爸爸，还有那个可爱的小妹妹立即就会面，但她却迟迟没有动身，她惟恐陕北家里三位老人感情因此受到冲击——尽管她只是小别他们。直到老人们获悉找到了她的生母并再三催她上路，她才决定启程。一旦说走，是那么匆忙，连电报也顾不上给北京家里发，她内心原本竟是这样急切哟!到了北京，她恍惚觉得这又是个梦。她在心里不停地发问：真的我就要见到我的生身母亲了吗?春天的太阳暖烘烘地照着她。她迈开了脚步。她已经打问清楚去妈妈那个远郊工厂的长途公共汽车路线。她的脚步变得匆促起来。她急切期盼着投入母亲温热的怀抱。

这些日子，杨惠琳一直心绪不宁。自从和女儿王杨玲取得联系以后，她便急切地盼望和女儿见面。一连发了几封信，又拍了两封电报，还寄了钱去，都是叫女儿快快来京。然而，杨玲却一日拖一日地不曾动身，说是不忍心撇下养父养母。杨惠琳急得不行，恨不能自己立即赶往陕北把女儿接来，无奈厂里脱不开身。好难熬的日子!丈夫老

余应聘去石家庄一家工厂工作，女儿余婧安慰她：“妈，20年都过来了，急也不在乎这几天。我敢打赌，姐姐说不定哪天蓦地就来啦。”这一日，杨惠琳早上起来就有点神不守舍。上班前，她向小余婧交代：“今天下课后，别参加体育训练了，早点回家。你姐姐要是来了，马上给我打电话。”下午下班前，果真余婧打电话找她了。小余婧兴奋地在电话里大声喊：“妈妈，快回来，姐姐来啦!姐姐真的来啦!”她的心立即呼呼的跳起来。顾不得换下工装，便匆匆骑车往家赶，上楼梯一步跨两三个台阶。推门的一瞬间，她只觉得狂跳的心几乎要蹦到嗓子眼了。余婧见她回来，蹦跳过来搂住她，兴奋得满脸通红，说：“我给姐姐烧了热水，姐姐正洗澡呢。”随后又大声冲卫生间叫道：“姐姐，妈妈回来啦!”卫生间里哗啦哗啦的水声停歇了。杨惠琳僵立在卫生间门口，浑身哆嗦，几乎站立不稳。她把身子靠住墙，扬起头微微眯着眼睛，竭力使自己稳住情绪。卫生间里传出窣窣窸窸的穿衣声。不一会儿，门开了，一个大姑娘从里面走了出来。

一对苦命的母女，在经历了20年的痛苦分离和坎坷磨难之后，就这样相见了。最初的情景与母女俩的想象并不一样。

她们都曾无数次在脑子里勾画过母女相见的情景，都曾认为自己会不顾一切地扑向对方，会哭，会笑，会放开声音呼叫。然而此刻，她们只是默默对望着，彼此的心都怦怦地跳，彼此的神情都有点慌乱，彼此的动作都显得紧张僵硬。

“妈!”“杨玲!”声音是拘谨地、怯怯地发出来的。“这就是我那揪心扯肺的女儿?”杨惠琳盯住眼前这个和自己一般高、两颊被高原的阳光晒得红扑扑的姑娘，鼻根发酸、眼圈有种热辣辣的感觉。“这就是我那在梦中千呼万唤的妈妈?”王杨玲望着站在面前这位微微发胖的中年妇女，喉头袭过一阵一阵干燥的痉挛。谁也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还是小余婧缓和了气氛：“干站在这儿干吗?坐下说话多好!”她笑嘻嘻地牵着两人的手，拉到客厅沙发前。杨惠琳和杨玲一落坐，都再也控制不住，一下子紧紧拥抱在一起，放开声音哭起来……

晚上，杨惠琳和杨玲躺在大床上，20年的离别泪，相思情，道不完，诉不尽。

窗外，一轮明月挂在洁净如洗的夜空。正是阴历十五，这轮满月好大好圆。

杨玲到京的第二天，杨惠琳的丈夫老余正好从石家庄回家休假。这位当年因反对瞎吹林彪历史而受尽磨难的血性汉子，却对王杨玲怀有一副慈爱的柔肠。杨玲和他很谈得来。

一家四口团聚，家里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热烈欢快气氛。邻居和厂里来串门的同事，见这个家庭突然来了一位乡下姑娘，而且家人的情感都被这姑娘搅动了，多少有点惊奇，不由便要打听这姑娘是他家什么人。杨惠琳给人说这姑娘是她的女儿，别人不信，说她瞎说。老余担心人们再往深处追问，又要触动妻子心中的隐痛，便大包大揽地宣布杨玲是他过去的女儿。反正他的经历复杂，别人摸不清楚，更重要的是不论什么样的议论压在他这个男人身上，

总比压在作为女人的妻子身上要好些。这一点让杨惠琳心中既难受又感动。

一家四口逛公园、转商场，买来一卷卷胶卷尽情地拍照。

杨惠琳买了新衣，里里外外替杨玲换了装。小余婧还领着姐姐去一家仿明星化妆照相馆，上上下下仿照外国电影明星的样子妆扮起来，一人照了张大彩照。相聚的日子充满喜悦和甜蜜。老余还陪杨玲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八达岭等名胜古迹。他对杨玲说："爸爸人到中年，突然多了你这个女儿，爸爸好高兴啊!"已经返城工作的一些延安北京知青们，获悉王杨玲来京与生母团聚，分外高兴。他们在原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家里搞了一次盛大的聚会。他们把杨惠琳、王杨玲以及小余婧邀请来，遗憾的是没有请到老余，他已返石家庄上班去了。聚会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大家分享着这一对母女相会的喜悦，美酒频频地举起，歌声、笑声满屋子荡漾…;转眼之间，王杨玲来京已20多天。一个母女俩都不愿轻易触及的话题，这时候不得不提起了。

"玲儿，给妈说说你的想法。"一天饭后，杨玲正要收拾碗筷，杨惠琳挡住她，话语谨慎轻缓，你是不是打算还回陕北去?"王杨玲抬起头，久久望着妈妈，随后郑重地点点头。

"妈在这里可是把工作都给你找下了。"杨惠琳一急，提高了声音，"就在咱家对面的大楼里当售货员，一个月一百六七十元工资。咱们一边工作，一边解决户口问题，好多人，包括你那些知青叔叔阿姨，都愿意出力帮忙哩。"杨玲轻轻摇了摇头。

"怎么，在这儿呆不惯?对妈有意见?放心不下养父养母?"杨惠琳更急了，连珠炮似地追问，小余婧也凑上来，说："姐姐，别回去了，在这儿多好!爸妈早说了，陕北的老人由咱们家养老送终，你还操心什么呀!"杨玲抓住妈妈和妹妹的手，轻声说道："我这趟来，原本就没打算留下。你们和爸爸的心情我理解，但陕北的老人也是我的亲人，你们不知道，他们是多么需要我。养父养母年岁都大了，我不可能和他们一块再呆很长时间了，找到你们，我很幸福，但我不能离开他们。"说到这里，杨玲的眼圈红了。

苦苦思念了20年，一朝团圆，忽又要分手而去，杨惠琳的感情哪能经受得了!她苦苦相劝王杨玲，用各种理由企图说服她留在北京，留在自己身边，对陕北一对老人，也提出种种安排方案以供女儿选择。当年为时势所迫，她把女儿丢弃在荒凉的黄土高原，她觉得她欠了女儿一笔债，她要偿还这笔债。她请来了杨玲非常尊敬、非常信服的知青叔叔阿姨们，这些刚踏进京城的老知青们，同样希望杨玲能留在北京。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杨玲回到陕北以后，那滞重的黄土高原的生活会怎样无情地磨损她青春的生命，会把多大的压力搁在她的心头和肩头。王杨玲在人们的苦劝下，终于答应：她先回陕北去，妥善地安排好两位老人，把麦子收割碾打完，然后再来北京，永远和妈妈、爸爸、妹妹呆在一起。

杨惠琳自然高兴，她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随后几天眨眼就过去了。王杨玲回陕北前一天，爸爸特地从石家

庄赶回来为她送行。在北京整整呆了一个月，又到了月圆之时，全家人又团聚在一起了。月儿皎洁，月儿明亮，月儿看着这一家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人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王杨玲又回到陕北的土地上。

去北京这一个月，与生母重逢带给她的巨大喜悦并没有淹没她对黄土地上将她抚养成人的两位老人的牵挂之情。走时养父身体就很不好，尽管养母曾对她说：“去吧，你的亲妈想你，你该回到她跟前去，在咱家你要把罪遭死哩!”她却觉得，她和养父养母以及患有癫痫病的叔叔相依为命的关系，是很难砍断的。现在，她答应了生母将她转回北京的要求，她知道陕北的老人对此不会有什么意见，但她却摆脱不掉一种沉重的负债感。在陕北老人身边呆的日子已为时不多，她要在他们跟前尽可能多地尽一份心意。

老人们见她回来，自然很是高兴。她拿出北京爸妈捎给老人的各种东西，养母见炕上一下子堆了那么多吃的、穿的、用的，心里过意不去了，连连叹道：“这么远路，给我们这老骨头还捎这么些东西，太费力气，太花钱了。咱家苦了你，你妈对咱家还是这么重的心意，教咱咋受得了哟!”养父依旧躺在炕上起不来，他一时糊涂，一时清醒。清醒时，盯着杨玲看，不说话，只把手往远处指。养母对杨玲说：“他叫你走哩，他不愿看着我们拖累你。”杨玲按住养父的手，一股热辣辣的东西堵在喉头，泪水一下就涌了眼眶。

赶麦子黄还有一个来月时间。王杨玲到180里外的县城门市部又上了一段时间班。收麦时，她请假回到家里，踏进了黄土高原绵延伸展、起伏不定的庄稼地里。

这是最后一次替家里收割庄稼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她就帮家里干农活，沉重的体力劳动曾压得她嫩弱的身子骨几乎要垮了架。她诅咒过不公正的命运，怨恨过苦难的生活，可现在，她突然生出一种十分留恋的感情。这坡坡，这坎坎，这黄土地上的一草一木，她是那样的熟悉，想到很快就要辞别这一切时，她心里酸酸的，直想掉泪。

麦子收割了，登场了，碾打了。与北京爸妈商议好的动身的日子到了。她把养父、养母、叔叔所有的棉衣棉被拆洗了一遍，把家中里外所有该收拾整理的都收拾整理好，该道别的老师、同学、朋友也都道别了，养母把该给北京爸妈带的土特产也准备好了，她该动身回北京。就在这时，养父的病突然加重了。

不能在这个时刻走开。她留了下来。

养母劝她：“只管走你的，他几年就这么拖着，还不知道拖到啥时候哩。”她摇头。她不愿意就这么牵肠挂肚地走开。

养父的病情一日重似一日。1991年8月底，养父终于闭上了双眼。

悲痛袭向王杨玲。她伏在这位像黄土一样质朴、终生劳碌受苦、让她领受过刺心经历更给过她巨大恩德的老人

身上，失声痛苦。

王杨玲一手操办了养父的后事，将老人妥妥帖帖地安葬在村南一块向阳的坡地上。村里人感慨唏嘘：不亲的比亲的还好，女子比儿子还中用!北京爸妈曾多次表示：老人养老送终之事，由他们包了，但杨玲没有指靠爸妈。老人对她的恩德她要自己来报答。她把一切都处理完了，才写信给爸妈告知养父去世的消息。

现在离开陕北，回到生母身边，投身一种全新的生活，从道义上讲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了，从心理上讲也应该感到平衡了。然而，她仍迟迟不肯动身离去。日子一天天地拖下来。终于，她最后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决定——暂时放弃回北京的打算。

也许是养父的去世给了养母太大的刺激，这位已经67岁的老人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双目视力急遽下降，耳朵突然背得厉害，两条腿终日疼痛，走路都很艰难了。王杨玲想，无论如何，她也不能就这样撇下养母自个儿回京。不能，她的良心不允许!也许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牵拽着她的心——她要不要接受一桩婚事?他是当地一个青年农民。他一直把她追得很紧。

她给北京爸妈写了信，告诉了她新的决定。她不知道爸妈获悉她的决定后，会不会同意，能不能理解她，她只是觉得她不可能再动摇了，养母在世之时，这决心她不会再变。她在心里祈求着妈妈和爸爸的原谅。

一个月亮很好的夜晚，王杨玲静静坐在L县城她租住的小屋的窗前。她凝神望着高原上空宛如银盘一般的月亮，回想着在北京时那两个月圆之夜。她依稀记起了曾经读过的两句唐诗：抬头望明月，寄情千里光。月儿能寄情，妈妈此刻也能看见这轮月亮。对着月亮，她无声地把心里的话向妈妈倾诉。

她的眼角有晶莹的闪光。

罗点点：插队记

○ 在路上

对我的诅咒只是斜睨一下大地，说我必须劳动才能得食。

——弥尔顿：《失乐园》

我和很多人有共同的名字，叫老三届。这名字指1966年到1968年的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其特征是没有读多少书，而且上山下乡。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三届是生不逢时或者是无奈的代名词就大错特错了。我今天还记得，得知要下乡插队消息的时候我多么欢欣鼓舞。那时候，在学校和家里已经彻底失去革命信心的我，相信自己可以在农村，在广阔天地里找回它们。所以当我在20多年后读到那一篇毫无感情的，只把上山下乡作为一种政府安置剩余劳动力的措施的文章时，虽然不得不因为它内容的中庸客观，而把它摘录成本章第一个脚注，但我内心深处对它是极端不满意的，因为它毫不留情地抹去了我们这代人热血青春的价值。

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点不对劲。我根本没想到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月台上哭声一片。来送行的知青亲属们人人一张悲痛欲绝的脸，车上要走的人更是哭得抬不起头。

这就帮了我一个不小的忙。

串联中我吃了不少坐火车的苦头，稍后串联变为免费旅游，坐火车的经历更加悲惨。所以我一上车就很老练地占了两个靠窗的座位。忙着哭的人就只能不幸地坐别人捡剩下的地方了。

我们没有忙着哭是因为我们没有可哭的对象。爸爸自从离家再没有回来过。1967年的冬天我们离开了南池子的家，搬进了北京西城华嘉胡同附近一个简陋的四合院。妈妈不久从这里被抓进了秦城监狱。抓人的那天深夜，一些穿制服的人在秘书们的带领下闯进我们的房间。妈妈住在里间。她像紧急集合一样麻利地提出一个小箱子，镇静地

跟着来人走了。走前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没有说话。妈妈说，她对来抓她早有准备，箱子早收拾好的。她没有和我们说话是不想给我们找麻烦。另外她说，她觉得组织上一定会在她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们。这些事情都再次显示了妈妈和我们全家人一贯看重健康、明确和简洁的作风。

车厢里都是同校或同班的女孩子。我看成自己“一伙儿”的，实际上只有三人。我的姐姐朵朵，她的朋友邓毛毛和我。我已经盘算过了，一下子占三个靠窗的座位太显眼。但有两个，我们三个女孩子就可以很舒服地换着或坐或睡了。

邓毛毛大名邓榕，和我同校不同级，比我大一岁，比朵朵小一岁。她和朵朵的友谊大半是在北戴河，朵朵成为干部子弟革命化典型的那段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毛的爸爸是邓小平。文革开始的时候，邓小平不是一开始就被打倒的，所以我们由于前面所说的那幅对联定下的标准而当“狗崽子”的时候，毛毛是“红五类”，参加了学校最高等级的红卫兵组织。后来，邓小平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毛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临下放插队的时候，她说愿意和我们一起走。一开始我还有点不愿意，因为我在学校最难过的时候，毛毛虽然没有落井下石，但对我也表示过出于划清界限的不友好。但是朵朵一口就答应了。等毛毛和我们一起上路的时候，我也已经说服了自己：先受苦并不能成为一种资本。况且毛毛爽朗热情，是一个可爱的朋友。那时候我们和她都没有想到，邓小平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三起三落，后来成为中国改革的设计师。

知青家属们震天的哭声在北京站的月台上打成了一个大疙瘩，重重地压在欢送的鼓乐上面。火车开出北京站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刻之一。但是以忧心忡忡来形容我们的情绪是完全不对的，包括那些刚刚以泪水洗面的大多数人，都在悲伤之余，感觉到前面有一种新的生活。而大家都非常愿意鼓起勇气，迎接革命的新考验。虽然谁也不知道整个中国和我们这些人在文革的狂潮中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但我们的教育和年纪都不允许我们刚刚上路就失去信心。

出了北京，火车上的人都有点闷闷的。在送别的大激动之后，似乎人人都需要休息。学生干部在车厢里鼓动了好几次都不太见效，因为她们自己就遮不住哭得红红的眼睛和鼻子。没有人来计较我占的位置。我有点兴味索然，懒懒地看窗外。列车西行，北方冬天的景致也是越来越没得看。

大约是车过郑州，车厢里起了一阵骚乱，那几个干部紧张起来，说一个同学不见了，恐是逃回北京去了。人们乱了好一阵，然后以那几个学生干部惴惴不安地去向什么人汇报而结束。我猜想那同学不过是买东西或者洗脸上厕所之类的事情误了车。一火车成百上千的知青，实际上还都是孩子呐。

到西安换慢车，到铜川换汽车。景色越来越荒凉。卡车到延安时我们又激动了一下，因为延安的宝塔山太像照片上的了，我们就很误会地产生了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在延安，我们被以学校为单位地分到各个县。去安塞和志丹的继续向北，去延长、延川的向东，去富县和甘泉的又折回向南。记得好像没有向西去的人。大家虽然并不都认

识，但是一道从上北京出来，现在要分手也不免凄凉了一番。我们这些向东的人都乘敞篷卡车。数九寒天的，也没觉得太冷。总之一直到了公社，我们这群人还是麻麻木木的。

有人说到了公社先开的欢迎会，我不记得，只记得吃饭，大米粥、咸菜和猪肉包子。在北京是常见的饭菜，很对我们的胃口。没有桌椅，大家提盆抱碗，几百人在公社食堂前的空地上摆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吃饭阵。

饭吃了一半，各生产队来接学生的人都到了。除了队干部，大多是一些后生和女子。当地方言，把未婚的青年男女称后生和女子。结了婚的就是汉和婆姨。上了年纪就是老汉、老婆。对年轻人不分男女都可以称为“娃”。比如后来我们就被统称为“学生娃”。而更小的孩子准确的叫法是“娃娃”。如果年轻人被人叫做“娃娃”，那就要小心了，因是被嘲讽为黄口小儿的意思。

冷不丁地，这些人闯进了我们的饭阵，闹闹嚷嚷地寻自家的学生。只看到一张张红扑扑急煎煎的面孔，我们也乐了。语言不太通，情急之下，我们就把手里的包子、大米粥递给他们吃。他们很不好意思，我看见许多年轻人羞红了脸。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这些衣食并不富足的人，对于吃饭有比我们更庄重的习惯。他们把无缘故接受别人的食物视为尴尬的事情。公社食堂的管理员急得用马勺“咣咣”地敲着他的大锅，以示对我们慷慨的愤怒。但我们却真正活跃起来。

一会儿，各生产队的人像约好了似的吆喝起来。一开始以为他们在吆喝牲口，后来才听清楚是在喊我们：“相跟上，回啊。”

队里给我们准备了毛驴车，但那几头毛驴太瘦弱了，我们只把行李搁在车上，人都走着。也是这几天实在是坐腻了各种车，想走走。

从公社到村里15里川道。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川道依山水之势，蜿蜒曲折。刚刚下过一场雪。延河已经结了冰，地势迭宕之处，碎裂的冰层下可以听见流水淙淙。空气洁净而透明，天空高远，红日当空。高原上的景色果然不一样。蓝天、冰河、白雪、黄土山，样样真切分明。

我们和后生女子们谈得火热。毛毛很有点语言才能，已经使用刚刚学到的陕北话和他们交谈了。如“夜天”（昨天），“甚”（什么），“咋”（怎么），“会（读‘害’）下会不下”（懂不懂）之类。要在北京，这种高声叫喊早会吵乱了一条街。可在这儿，山也悄悄，水也悄悄。明明扯大了嗓门儿，可就是不大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像声音都被周围的黄土山吃掉了似的。那感觉真怪极了。拐过一个山旮旯，有个叫“花”的女子大吼一声：“看！咱村，杨家湾！”那声音才叫铿锵有力。

只搭眼一望，我的心就醉了，化了。杨家湾像个漂亮的婴儿静静睡在融融白雪的襁褓中。那天的日记我就是这样写的。现在回想起那一眼，还是得用这句话。

走近了，看清了，村口小路上挤满了男女老少。先还跟我们走着的后生女子们几蹦就回到了人堆里，向我们指指点点着，想是在向同伴提供事先得到的信息。锣鼓唢呐响了，放鞭炮，喲口号。我注意到几个赶车的后生拉紧了他们的牲口。后生、汉子多是穿黑布棉袄，婆姨女子们穿得花，且各拥在道路一边。所以我们像进了布店，一边是黑布柜台，一边是花布柜台。好几个干头净脸的婆姨女子使我眼睛一亮。黑布柜台那边的男人们也一个个浓眉大眼，皮肤黧黑油亮，真真好看煞。一路的疲惫、蹩屈竟然一扫而光。知青中不知谁冲动地说："可到了家了。

后来我们接到远在东北插队的弟弟的来信，说他们进村的时候因锣鼓鞭炮齐鸣，惊了牲口，胶皮轱辘大车轧死了一个老乡。于是知青到的第二天村里就办丧事。我又想起了那天在村口紧紧拉住毛驴车的男人，凭空增加了许多对他们的好感。谁愿意在到"家"的第一天就让家里死人呢？

进村后第一件事是分灶。杨家湾生产大队一共三个小队。杨家湾一队、二队与盖头坪队隔延河相望。要把二十几个学生依这三个队分成三个灶。"灶"当然是伙食单位，一个灶上的就是一起吃饭的。用这种方式来划分我们这些到广阔天地来大有作为的革命青年使我们有些不以为然，但我们同时懂得了在这里吃饭是头等大事。时至今日，提起"一个灶上的"在大多数插过队的人来说还是一种简练而强烈的感情标记。

我们灶上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五男四女。以性别区分为两个窑洞住。男生表示骑士风度，认为女性爱清洁，就把自己住的窑洞充作灶房，我们这边连炕的锅里只管烧些温热水就行了，这样不仅暖了炕，洗涮方便，也少了许多油腻。不过，一边男生宿舍兼灶房，一边女生宿舍兼锅炉房，错落出入，天长日久，又是少男少女的风流年纪，不免就有了一些罗曼史。不过，这是后话。

没多久，要过新年了。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听说我们要过年，老乡们一律是两句话：这算个甚年？过年吃什么？这十个字言简意赅地观照了过年的"名"和"实"。对他们来说，新历的两年交替对他们的农耕生存方式意义模糊。如果一定要过，就得先解决一个过年的实质问题：吃什么。

我们说吃饺子。他们说，饺子？甚叫饺子。所以，1969年12月31日晚上就有许多杨家湾人走来看我们如何过年，如何包饺子。窑洞里外很快就站满了人。我们按刚学到的规矩，请来人上炕，他们一律摆摆手说："罢（不），罢（不），生（盛）不哈（下）哩。"就都站着。我们看人多，心里不免发紧。把面和了又和，饺子馅加了又加。一个叫杨中其的男生挽挽袖子走出来，那样子真像表演节目似的。饺子皮像一群圆圆的大蝴蝶从他的擀面杖底下飞出来，看的人都由不得喝彩："好手段！好手段！"我们余下的人们受了鼓舞，就一拥而上如飞地包。第一批饺子刚包出来，没想到满窑洞的人一哄而散了。"哈！饺子？就是扁食哩。"我们赶紧留客："这么多，这么多，留下来尝尝……""哈！饺子？就是扁食哩。"说的人还是管自走了。

原来我们说的饺子，陕北人叫扁食，也是"一张皮皮包个馅馅"，也是过年才吃。所不同的是，他们包扁食的

皮是用手指一点点捏出来，和我们用擀面杖的半机械化比较，更古朴和从容不迫。所以一到制作的共同之处，真相大白，他们便毫不留情地拔脚而去，留下我们继续擀皮、包馅。待完工时个个汗如雨，包的饺子摆了半炕，只有发愁的份儿了。

烧水时大家的头都有点大。第一锅饺子进肚，饱了，也困了，人人想睡，却不行。不仅有半炕的饺子要煮，在集上割猪肉的时候我们贪便宜还买了一副猪下水。陕北人不吃下水和鱼，所以集上的各种下水货格外便宜。要把这些肝肠肚肺一件件洗好卤出来，工程巨大啊。

风箱吧嗒、吧嗒响了半夜。灶角里的石炭（当地一种劣质煤）也用去了大半。凌晨时忽然浓烟满屋，男生们大叫。我们懵懵懂懂跑过去一看，原来炕席烧煳了。一个男生的铺盖也烧了一个大窟窿。好在这人一直在烧火，所以，既未烧伤人，也未再燃着别的东西。

也别说陕北这地方闭塞。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的第一天，杨家湾的学生娃咋过的年，咋吃的扁食，咋煮的猪下水，咋燃着了铺盖，以及半夜惊魂，且有惊无险的故事就在我们的睡梦中传遍了整整一道川。在以后的几天里，老有外村的老乡和知青来看我们。焦煳洞穿的炕席和铺盖索性就挂在涧畔上。如果要建立知青博物馆的话，我想这两件东西是值得收藏的展品。这是我们开始自立生活时，为中国地域辽阔，语言庞杂多样而付出的代价。饺子只是北方人的食品，我们已经知道了它在陕北叫扁食，山东某些地方的人叫它“故渣儿”（因为实在不知该用什么字，这里只得依音注写），满族人则叫它水饽饽。

新历年过完就是旧历年。村里的人也许觉得有点不过意，也许我们进村的头一年还当我们是客，像商量好似的轮流请我们知青去他们窑里吃饭。相比之下，作客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我们便在一个劳碌不堪的新历年之后，过了一个安安逸逸的旧历年。

○ 春末夏初

天神说：“要在地上产生各种有灵性的生物，家畜、野兽、爬行的生物，各从其类！”。

——弥尔顿：《失乐园》

一个人精神世界能有多么纯洁，我是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受到污染以后才知道的。这件事情发生在那年春末夏初，和个叫三娃的漂亮女人有关。

三娃是个绝顶俊俏的年轻婆姨。这女人白皮肤黑头发，一双花花的杏核眼，鼻子尖削而小巧，白生生的碎米牙在两片红艳艳的嘴唇当中闪闪发亮。最妙的是这三娃走起路来脚下生风，整个身子如风中荷叶，摇摆娉婷。看到

她，你禁不住会想起旧版言情小说中的许多句子：颦笑生缱绻啦，顾盼有深情啦等等。这女人站在二三十个年轻女人当中，谁都会一眼看到她。再加上叫了个男孩儿的名字，愈加娇嗔可人儿。

进村不久，我们就听说这女人“作风”有问题，陕北话就是“偷汉”。那个年代，禁欲主义在并没有人提倡的情况下，作为革命的一种伴随现象大行其道。正常的男欢女爱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一种罪恶情感，遑论其他。盛怒之下，我们打听了三娃的成分，记不清了是上中农还是富农，反正不是贫下中农。

碰到问题先打听当事人的出身和成分，也是当时与革命伴随的流行做法。而且出身问题往往最后决定当事人的命运。就我所知，来插队的知青中并没有几个根红苗壮，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红五类”出身。不是父母先后被打成走资派如我们姊妹和毛毛，就是出身压根儿不好，什么小业主啦，知识分子啦，城市平民啦等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之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红卫兵式的决定：教训一下三娃，理由是不能让这个女人败坏了纯洁的革命空气。教训的方式也非常北京红卫兵化：用皮带抽。因为我们深刻感觉到“偷汉”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对我们纯洁的精神世界来说是一种亵渎。

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只要有太阳，黄土高原上就是这种干巴巴的燥热。我们一群人在村子的正当中截住了正要走回家去做饭的三娃。这个聪明的女人几乎是马上就感觉到来头不对。她的脸一下子拉长了，嘴唇颤动，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变得干燥无光。

皮带在空中飞舞，“啪”地一声，我们之中的一人急不可待地动了手。全村静悄悄，家家窑门紧闭。好像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奇怪的是连三娃自己也一声不响。寂静和燥热使人愈发激动不安，皮带抽在肉体上“啪”“啪”的声音沉闷得不可思议。我们站成一个圆圈，皮带在我们手上传递，人人都动了手。

轮到我，我一点没有迟疑地完成了我的动作。我只记得，我希望扬起手来的时候三娃会躲避一下，她果然闪开，我就很满意。不知轮到谁的时候，三娃没有来得及闪开，皮带扣子在三娃的额头上开了一个口子。口子不大，但鲜血马上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这女人仍然咬紧牙关，不哭也不叫喊。当她觉得血流下来了，就伸出手抹了一把，先把手上的血吃到嘴里，然后从地下抓了一把土按在伤口上。三娃流了血，使我们大家都惊骇起来，不约而同住了手，好像我们原本认为皮带不会把人打出血似的。记得有人说了个“走”字，我们便慌慌张张作鸟兽散，谁也没有回头望一眼的勇气。

下午，三娃的公公站在自家的涧畔上破口大骂，仔细听去，骂的竟然不是我们这些打人凶手。

“黑心肠的些们，挑唆学生家打饿（我）窑里的娃哩，黑心肠地么……饿（我）娃惜惶哩！饿（我）娃可怜哩么……”

那声音苍老、宏亮又带点结结巴巴。后来知道，三娃的公公当过生产队长，在“四清”运动中因成分高就不当

了。但他为人厚道老成，在村里很有人缘。不当队长多年了，还人见人称“老队长”。当过干部的，就不免得罪过人。老队长骂声出了口，我们才心虚地想到是不是真的有人挑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三娃是否真的“偷了汉”，而且确实是别人将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的。老天爷，我们竟然没有任何证据，也从没有想到过应当获得任何证据就动手打人！

我们正在暗自心惊，就有一些老婆儿老汉儿走到我们窑里劝：“娃娃们，下回不敢了啊！一个村里生着（住着的意思），打坏了人了不得哩。”我们中间有不知深浅的说：“这算什么？要在我们北京……”“好饿（我）个你哩，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么？”劝的人话里仍然一团和气，但脸上有些硬硬的。我们一时不知再说什么好。

那一边的老队长也被村人劝回去了。但在那个下午，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惶恐和不安。老队长对此事发生有复杂背景的判断，三娃这女人在挨打时表现出的镇静，以及“这不是不在北京你的窑里哩么？”的外柔内刚，都让我们心惊，都在我们的常识和判断能力之外。我们为捍卫道德纯洁所作的努力不知怎么一来显得那么软弱和丑陋。我们觉得自已不仅没有大展威风，反而像在厚重的黄土坡上跌了一个大跟头，跌得鼻青脸肿，又悄无声息。显然那些在北京人们公认的道德标准和“一抓就灵”的手段用在这里，就像旷野里的声音会被大山吃掉一样，也被什么东西吃掉了，而且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更使我心惊的是，第二天早晨出工的队伍里，三娃的身影比从前更加惹眼。她不仅仍然唇红齿白，风摆荷叶，那额头上贴着的一块小小的白纱布更使她俏皮撩人。村里那些后生汉子们像往常一样和她说笑打闹，走成一个疙瘩。歇歇儿的时候，三娃又成了一场放肆玩笑的领头人。这种玩笑的主要内容是：青年男女先因为一个暧昧的消息或者一句轻薄的笑话大惊小怪地滚作一团，最后以全体年轻婆姨把一个或几个汉子按倒在地而告结束。有时候婆姨们忘形到扒那汉子的裤子，而且一定要扒松了裤带，使那男性本质部分半隐半现为止。就算那汉子的新婚婆姨在场，也无法阻止这种玩笑，因为这实际上是一场公共娱乐活动。新媳妇能做到的只是和我们这些女子们用背冲着那群疯狂男女，口里喃喃地骂上一两句。那一天，和这些兴高采烈的人比较，北京知青都显得灰熘熘的，来自北京的纯洁精神世界无疑受到黄土高原上活泼男女们的巨大挑战。

往后又听说，老队长年轻的时候他婆姨就得了重病，有人说是麻疯，又有人说是梅毒，总之不能生育，所以老队长的儿是抱来的。没想到这孩子长大成人后虽不聋不哑，不缺胳膊少腿，却是身心孱弱的一个人物。老队长为传香火，一把屎一把尿带大了这个儿子，又大费钱财地给他说了个漂亮媳妇。三娃过了门一点没耽搁，先后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娃，老队长心头那块传递香火的石头这才落了地。在家里，三娃这媳妇和孙儿孙女子是老队长的心尖尖。听说三娃对老队长也恭敬孝顺。

又过了几天，有人说三娃又“偷了汉”，就在刚起来的青纱帐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们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但这回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了。

后来又听说，老队长一直是受骗的。三娃的一双儿女根本不是娃他大（爸）的。还有人指点给我们看，那女娃像村里的谁，男娃又像谁。还有人说，老队长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不过这时的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种的说法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生活中一个又一个故事罢了。而且，随着日益繁重的田间劳动，我们已经无暇顾及别人的事情和纯洁的精神世界了。

我们打了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听说北京干部和公社都曾经调查过此事，但最终不了了之。

如果你问一个陕北婆姨他的男人到哪里去了，她回答上山受苦。这是下地劳动的意思。陕北话把下地叫上山，劳动叫受苦。农民一律自称受苦人。所以受苦人这称嗯在陕北并不是指阶级分析意义上的受压迫受剥削之贫下中农。我们这些知青这时候也是受苦人。

话说初夏里的一个艳阳天，我和杨家湾的一群受苦人正在山上受苦。此时繁重的农业劳动正在日益失去革命的浪漫意义，正在对我们进行不折不扣的磨炼，并且带领我们向着它的本质——受苦接近。

时近正午，所有人都已饥渴难当，大家都盼送饭的人快点从那条小路转弯处出现。

红桩子是一个健壮的中年人，有好看的长腰和筋踺毕露的长腿。他被公认是一个全面的庄稼把式，所以当组长，是我们这帮子上山受苦人的头儿。此刻我正怀疑他中了魔法，因为他坚定挺拔的背影说明他除了上下挥舞老镢之外，脑子里完全没有别的想法。我也怀疑周围的一切都中了魔法包括天上的太阳，因为它牢牢地粘在我们所有人的嵴背上，半天不肯动一动。我脑子里则是挥之不去的毛主席《愚公移山》中的语录："每天挖山不止，祖祖孙孙挖下去……"有一阵儿我悲哀地认为我们已经变成了愚公，永远不能停止挥舞手中的老镢了。

但我毕竟是个头脑灵活的人，因为我很快发现，左顾右盼对缓解挥舞老镢的疲劳很有作用，我便开始愈来愈频繁地向四处张望。

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延河两岸，也就是当地人称为"川"里的青纱帐已经密密地遮严了黄土地。从我们受苦的黄土山上远远看过去，川里除了庄稼，还有一群驴。

这些驴是杨家湾拉车转磨的宝贝，所以队里派三娃的公公，人称老队长的稳妥老汉经管它们。老队长对这群牲口十分上心，一有空闲就吆着它们出来吃草，使我在饥渴难当的时候能够看见这样一幅悠闲的放驴图而稍感欣慰。忽然，这幅图画中的景物发生了使人不安的变化。我看见一头大驴爬上另一头小一点驴的背，小驴躲了一下，但是大驴不肯甘休，再一次爬上去，这次小驴不再躲闪，而且我有点儿觉出它实际上是半推半就。这还不算完，像受了传染似的，几头大一点的驴都先先后后地爬上了小一点驴的背。小驴们也都是半推半就。按说，就算我从来没有见过，或者是我再傻，也应该从大小驴们的暧昧态度上会意出这是个传种接代的仪式，以及这类仪式的不可言说或者

不宜言说性。但我的智力那时一定因为不停上下挥舞老镢而出了问题，我只觉眼前驴们的游戏生动活泼，与上下挥舞老镢比较显然更有趣和新奇。所以我就干下了平生最大一件傻事。

我对所有人大叫：“看呀！驴打架！”

我一脑门子想，这至少可以使那些上下挥舞的老镢停下来。

果然见效，魔法被解除。所有人在回头看了一眼之后都停止了挖山。男人们大多抱着肚子笑倒在地下，女人们或者羞红了脸，或者追打身边笑倒的汉子们，嘴里骂着：和尚！和尚！好像男人们犯了大错。陕北人骂人家和尚，大约是咒人娶不上媳妇，或者断子绝孙的意思。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逻辑上有问题，因为出家当和尚的人是出于信仰，是主动选择没有妻小家室的。而娶不上媳妇则大部分是出于无奈，是没有办法生儿育女。这里面有个精神境界的问题被混淆了，所以我一时还是不能从众人的态度中领会发生的事情。

组长红桩子先还想压住阵，绷着脸说：“悄悄儿（安静的意思），悄悄儿，笑甚哩！”但是看着这一山坡笑倒的人，又看看仍然蒙在鼓里的我，终于也憋不住，对我说了一声：“好饿（我）个你哩！”和众人一起笑倒尘埃。

我终于恍然大悟。在我的人生经验里，从来没有碰上过如此尴尬的事情。我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真希望黄土山立时三刻裂个缝子，好让我钻进去。幸好这时候送饭的人挑着担子，一摇一晃地出现在小路上，红桩子率领受苦人中几个仁慈点儿的奔向午饭，这才给我解了围。

从此刻骨铭心，对鸡牛猪狗的类似行事均能举一反三，心明眼亮。

一夜，烦躁莫名辗转难眠。夜空晴朗，月到中旬。后半夜，窗纸依旧白花花耀人眼。披衣起坐，无所适从。忽耳有所闻，心有所动，屏息静听时脑畔飒飒作响，似风过竹林而清奇诡谲，如雨洒荷塘更生动神妙，渐渐由远而近，徘徊反复，先寻寻觅觅，后愈发密集，不多时竟觉六合充溢，近在咫尺。然环顾左右，除身边朵朵、毛毛两位姐姐酣睡沉沉，惟一窗明月流泻如水。

忐忑难耐，捻破窗纸凝神向外张望时，不觉目瞪口呆，心旌摇荡。

对面山上一群狗，足足有50条以上的狗，正静悄悄在银色月光下散步。这回我一眼看出，这集体散步的性质和传种接代有关。如风如雨之声竟是狗们的脚步。灿烂的星月之光下，狗的队伍显然正在不断扩大。新来的无声加入，如先前的一样静静地走，先三五成群，摩肩接踵，渐渐耳鬓厮磨，成对成双。整个队伍首尾相衔，似漫无目的，细细推敲，又分明是一场规矩华丽的爱情圆舞。只见狗们的眼睛闪闪烁烁，愉快而激动。它们的步子始终镇定，队伍始终有秩序。干燥黄土正在狗脚下发出沙沙天籁。黄土山在夜空中形成巨大剪影，酷像舞台上的布景。在神秘的表演气氛中，狗们都面露庄严进入冥想，虽与我隔山相望，却高傲地沉浸在一个视我为另类的，不可知的世界里。

我被深深震撼，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宇宙深处，飞越日月星辰，飞越五湖四海，越过我至今建立起来的一切审视和分析生活的方法，不远万里地撞击着我要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愿望。眼前这一群眼睛亮闪闪，正在发情的狗，使我惊异莫名，使我在那个高尚的革命愿望之外，对自然和宿命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敬畏。这种感觉以后我还多次产生过，如面临一个垂死的病人，看到一件出神入化的艺术品或者美丽得吓人的自然风光。最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这种庄严伟大的情感竟然和任何高尚的革命愿望无关。我相信，大自然是在这个春末夏初，差遣了这群眼睛亮闪闪的狗，向我首次昭示庄严。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个夜晚，想起如昼月光下目光如炬的狗群，就禁不住喉头发紧，汗毛倒竖，就进入一种不能自禁的对大自然的崇拜。

我和狗都正人神，忽然村里传来嘈杂的人声和什物碰撞的声音。看样子有人像我一样发现了狗们的行动。他们弄出种种声音把狗驱散。受了惊扰的狗群很快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不知它们是换了地方还是真的被人们驱散。一直到天亮，四下里老有狗在狺狺地叫，使这天清晨怪异而不安。整个白天没有人提这事，当然也没有人出来对昨晚的驱散事件负责。我非常想问问除了我还有谁看见了昨晚对面山上狗们的行事，而且十分想问那些半夜大动干戈的人为什么要将它们驱散。但我记住了上次的教训，所以像人民大众一样成熟地守口如瓶。

时间长了，对这类事儿我也没了问的兴趣，因为在这个不止草木萌动而是许多东西都在萌动的春末夏初，我见到太多畜牲们的类似行事，以及人们反复演出的驱散事件，所谓司空见惯是也。有一次，我竟完全像个当地婆姨一样，下意识地对一只正在踩蛋的公鸡大骂“和尚”！还如临大敌地高举起双手作威吓状。站在母鸡身上雄纠纠的大公鸡着实受了惊吓，落荒而去。之后当我悠悠地意识到什么时，很为自己的举止也变得那么滑稽和没来由而惊异。

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东西之一。最近，一起插队的北京知青聚会。大家对当年事情的记忆简直是南辕北辙，相差千里。他们说我曾经在杨家湾引娃娃，就是带一些学龄前的儿童，让他们的母亲可以无牵挂地上山受苦。我说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是有这事，因为要不然我记忆里的以下这件也是发生在春末夏初的故事就失去线索了：有一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是四五岁的样子吧。有一天我带他们和一群娃娃出去散步，忽然发现这两个娃娃不见了。我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找到他们，我再也想不到他们会在做这样的事！他们竟然在仔细观察，然后抚摸对方的生殖器！显然对它们的截然不同十分好奇。好在农村小孩子惯穿的开档裤，使他们的举动保住了起码的雅观。这时候的我虽然已经成熟老练了许多，但对眼前的事情仍然大紧张起来。我真拿不准自己是应该呵斥他们，还是上演一次驱散事件。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动声色的好。

我联想起一些事情。好几次我和娃娃们散步，碰上过村里无聊男人，他们往往会脸上带着粘糊糊的表情问：“娃娃，夜里你妈在上面还是你大在上面？”

对他们问完后满脸的得意和愉悦，娃娃们大多能够老练而镇静地开口就骂：“和尚！”比我的反应准确迅速得多。

这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个事实：村里的成年夫妇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自古以来从不分室而居。所以这些屁大的孩子从记事起就耳濡目染，知道了我们这些城里学生在生理卫生课上勉强了解的那些神秘知识。发生在我眼前的这个惊世骇俗之举，实际上只是男女孩童之间的游戏吧。而所有游戏中的主要成分只是摹仿。

不久，传来一个坏消息，这件事情让我今天想起来还难受万分。我们班一起来插队的同学中，有一个分在另外的生产队。她和外校的一个男生在劳动和生活中发生了感情，所谓感情充其量是拉拉手，亲亲嘴的事情。但不知道为什么就闹得沸沸扬扬，不晓得哪一级领导还把他们当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了典型。他们问这个女同学是否和那男生发生过肉体关系，偏这个女同学属于精神世界最纯洁的那种，竟然以为拉手和亲嘴就是肉体关系，懵懵懂懂就说那男生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结果那男生因此吃了大亏，给当做“流氓”抓到县大狱里。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男女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想，同样的问题如果让我带的这些屁大孩子，甚至让过完了春末夏初的我来回答，一定不会出这种令人痛心的错误。

秋天的时候，我被队里派到公社的水利工地上，是在一个叫李家湾的地方修水电站。我是队里派出的唯一女生，所以和不同队里派出的女劳力住在一起。

原来和这些婆姨女子睡一条炕还不是对我最大的考验。我很快发现在同住的少数几个人中有一种奇怪的关系。她们总是在大家都睡了以后开始不安分。我原以为她们在聊天或讲故事，后来发现她们不只动口还动手。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同性恋。也不知道人可以同时是同性恋，又是双性恋。所以我虽然被这事搅得心烦意乱，虽然在又一次抓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人把这件事半通不通地汇报上去，说有人搞流氓活动。但由于我已经经历了春末夏初的季节，我现在至少知道它是一种和阶级斗争或者革命理想完全无关的东西。我对前来调查情况的女干部说，女民工干那么重的活，睡觉时已经个个像死人。再说都是女人，耍什么流氓？那个女干部是个回乡知青，脸嫩得要出水，想必是属于精神世界纯洁的一类，听了我的话遂羞得满脸通红，无言而去。

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很坚决地换了一个窑洞住，而且对那些女人说她们必须收敛，必须避人！

她们故意装糊涂，乜斜着眼睛问我：“咋了？”

我强硬地说：“不咋，畜牲可以不避人，你们得避！”

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熟得简直像她们的妈。

不过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尴尬，趁她们还在我的复杂逻辑中打转转儿的时候，我赶紧拔脚而去。

春末夏初真是一个深刻的季节。当我穿行其中，终于走完这个季节的时候，我成了一个复杂的人。我的精神世界不再洁白如雪。但我却更加镇定、老练和有力量，或者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更加“诗意地生活在大地上”。

但是30年过去了，无论怎样镇定或者诗意，我至今没有勇气再回杨家湾，因为我不知道怎样面对现在大概已经做了祖母的三娃。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些当年动手打人的人来说显然是没有权利要求宽恕的，甚至没有权利再在三娃的面前提起。它只能永远留在我们自己心上，它只应该在那里永远不愈合，永远疼痛。深夜醒来，我又常常暗自庆幸，这伤口幸好没有留在脸上，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羞耻标记。

当我纯洁，或者说智力有障碍的时候，我像魔鬼一样伤害别人，现在我有了一颗平常心，成熟得像人家的妈，受益的却只是自己。

还有人说命运是公平的么？

○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四个好汉子

虽忍痛说出豪言壮语，心却为深沉的失望所苦。

——弥尔顿：《失乐园》

据说黄土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但杨家湾一带的人大都只有三四代在这里定居的历史，细问问，大家都是“上头”下来的。所谓上头，就是绥德、米脂、佳县、榆林一带，靠近长城边。

与陕西中部的八百里秦川比较，陕北这地方自古以来并不适宜居住。听说在汉朝以前，这里的绵绵黄土还是由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覆盖着。“十五英寸等雨线”经过陕西最北部，也就是黄土高原的最北部，将北方的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古老农业文明在这里划分开来。秦始皇鬼使神差地沿这条线修起了长城。这样，长城脚下就有了戍边的军人。年深日久，这些为皇帝和朝廷守边疆的人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后代。他们不仅凭借长城，将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阻隔在毛乌素沙漠和阴山之间，更在生产生活和通商贸易中，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和人种在这里交汇融合。与此同时，东部的黄河将中原与这块土地相对隔离，使它的风土人情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糅合了更多来自西北异域的品质和风格。这股西北来风，在吹入黄土高原之前，就已经是一种混合体。它起于北方民族骁勇善战的马上生活，挟带着血污腥膻。在遭到长城的阻隔之后，便沿长城西去。遥远的地中海波涛使这股西北来风湿润温柔，流连往返。但最终，它还是回过头来，沿和平的丝绸之路，经新疆、宁夏、甘肃一路低吟浅唱再回到黄土高原。以我浅薄的文史知识，我相信这确实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

第一次听陕北民歌《兰花花》的时候，我曾被特别地震撼过。第一段歌词比较平稳和熟悉：“五谷里那个田苗

子数上高粱高，三十一省的女儿哟，就数兰花花好。正月里说媒二月里定，三月里交大钱四月里还。兰花花下轿来东望西照。瞧见周家的猴老子好像一座坟。”接下来说兰花花有个情哥哥，没嫁成情哥哥，嫁了个害痨病的人。婚姻不如意当然满怀幽怨，曲调难免凄凉委婉。没想到这以后，原来还在人们常识和意料之中的凄婉情绪忽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三十一省最好的女子兰花花，隔山吼喊给情哥哥的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蓄谋杀人计划：先在饭食里下毒毒死公公，再亲手杀死丈夫。不仅如此，兰花花在接下来的歌词里幻想自己已经得了手，她咬牙切齿地对自己丈夫唱到：“叫你死来你就死，你前晌死，后晌我膈夹包包跟上情哥哥走。”如此理直气壮的婚外恋，如此惊心动魄的杀人预谋，如此这般大声大气地吼喊出来，显见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中原儒家文化联系甚少。

杨家湾有四兄弟：大汉、二汉、三汉和四汉，四兄弟都身材魁梧，高额头大眼睛，是杨家湾里的漂亮男人。杨家湾的男人好看，这是我们一进村就发现的事情。我老想，说不定他们的祖先都是些戍边的军户，更说不定他们的脉管里真的流着匈奴单于、蒙古王爷或者突厥公主、回鹘女郎甚至阿拉伯美人儿的血呢。

没想到，这种历史遐想中的浪漫色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丧失殆尽，这以后的很长时期，我陷在一种悲观主义中。

大汉是延长油矿的工人。延长这地方历史上就出石油和煤炭，中国的第一口石油井就打在这里。杨家湾的人谁能不上山受苦，而是到油矿上当工人，就是最体面的人物。大汉是村里唯一有这好命的一个。

但是我们到杨家湾的时候大汉却因为这好命而坐了牢，说是因为在矿上参加文革武斗打死了人。问起怎样打死人的，没有人能说得清。但是只要谈起大汉，杨家湾人都会露出敬佩的神色：“大汉？那人能行！残得很哩！（这个残忍、残酷的残字用在这里，并不如字面上只有贬义。而是说到做到，果断坚定，大义凛然的意思。）他领几十号人，胳膊上都系红带带，手里提根棍。油罐车顶上坐满，在这川里面忽隆隆上去，忽隆隆下来，威风得不能。”只有他大（爸）他妈提起他叹气，说是不如当初在窑里受苦。

二汉有病，年轻轻地不知怎样就得了慢性肝炎。他的面孔总是蜡黄，但是病中的英俊男子似乎更让人动恻隐之心。每次见到他我都想起《水浒》中那些落草的受难英雄，比如病关索杨雄或者病大虫什么的。他常蹲在自家涧畔上默默瞭望远山。时间长到我开始幻想二汉早晚会化成一尊雕像，这雕像可以命名倔强，也可以命名无望。每逢我沉入冥想的时候，二汉往往很配合我，他一动不动地蹲着，只有两只眼睛犀利有神，使我觉得对面山上的黄土已经被他的眼睛挖出了一对又一对的窟窿。他有文化，先当了几年的民办教师，听说是很不错的教师，很努力，有希望转成公办教师来的，后来得了病就只好收拾行李回村来。他病，自然和我们一起上山受苦的时候不多。加上他待人冷淡而高傲，笑容和话都少。有一次他病得厉害，呕血不止。家人一大早张罗着往公社医院送。三汉和四汉慌慌地套了驴车，从窑洞里把他抱出来。二汉的肚子又大又圆，胀满了水，已经走不了路，但是神志很清醒。他对哭哭啼

啼的婆姨厉声说："哭甚哩！悄悄儿！"婆姨面无人色地住了声。他大他妈慌慌张张跑来，两人心急气短，哆嗦得话不成声。围在近旁的兄弟子侄、嫂子、弟媳妇们虽然有一大堆，但一个个方寸大乱。二汉的脸上只管淡淡的，眼睛里干燥无光，一头乱发被呕出的血凝住，像个扁平的帽壳奇怪地戴在头上，看他的肤色，也已经像黄土一样松散黯淡，那样子竟已是身心俱死。谁也没想到他的病情还会好转，三几日，二汉又回到村里，又蹲在自家涧畔上遥望远山。只是大家这回都知道他得了肝上的病，传染。所以他的日子更冷清些。

有一天傍晚，我路过他家，远远看见他又蹲在涧畔上。正在我琢磨今天这个姿势应该叫倔强还是无望的时候，我听见他婆姨在窑里喊他进去吃饭，他明明听见了，就是不做声。一会儿，暮色中一个男娃磨磨蹭蹭走近他，嗫嚅不清地央告着："大，回窑……吃饭……"二汉抱住那小身影，用自己的衣服紧紧裹住他，两个身影变成了一个。父子两个都不做声，婆姨也没声响，连烧火的风箱也停了，窑里窑外一片寂静。

我心里一阵难过，为这婆姨娃娃将来的无靠，更为这五尺高汉子现在的无奈。但不知怎么一来，我在难过中又有了一种欢快，和二汉比较，我觉得自己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太走运的人。虽然我知道看人家受苦时这样想实在不怎么样，但我就是没办法不这样想。先为自己原来的不知足而出了一身冷汗，又由于自己的幸运高兴得出了一身热汗。寒热往来的，第二天竟然抱病不起床，自己给自己免出一天工。懒懒地躺在炕上时，我又想到二汉一向的冷漠和高傲，而且觉得他这种态度很对头。因为一千个见过二汉的人一定有千个像我这样，在怜悯之外更多是庆幸。二汉难道不应该对报有这种想法的人表示轻蔑和决绝吗？细细想来，我也许是从那个懒懒地躺在炕上的时刻起，下决心不管今后碰到什么事情，绝不抱怨命运对我不公。因为用这种庆幸的自私心理分析了二汉处境，才叫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不幸。

二汉的婆姨高个子，是个爽快利落、干净大方的人。我曾经满怀同情地问她，二汉这么年轻就病得这样子，"你熬煎不？"她想了想，对我说："罢！（就是不的意思）"我又问："咋不熬煎哩？"她回答得更快，因为胸有成竹，所以还是一个雄辩的反问句："哪辈子没有这样人呢？"我小小地吃了一惊，没想到一个陕北乡下女子，能够从这样横贯古今、俯视人生的角度理解自己的命运。我一时很为二汉欣慰，他婆姨有如此坚定的信念，他应算是终身有靠了。

三汉是好看的四兄弟中最好看的一个。健壮挺拔，筋骨匀称。面孔稍显黧黑但肤色油亮。他一笑就露出虎牙，由于他太爱笑，我很容易地发现他有一口在当地人中少见的、洁白整齐的牙齿。

这年春旱，一冬天雪少。立了春，又是一点一滴的雨雪没落。快到播种的时候，地里干得冒烟。干得冒烟并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阵风来，把田里的黄尘刮起，真的冒起一阵黄烟儿。我们这时候已经很有点劳动人民的感情，真为播不下种子，或者耽误了农时而发愁。可村里其他人好像都没有我们知识青年愁得厉害，他们每天照常上山去犁那些冒烟儿的地。眼见得节气就剩两三天了，村里人还是照样。我沉不住气，很想找人问问。这几天上山受苦，

我和一头牛分给三汉，我牵牛，牛拉犁，三汉赶牛和我。犁一天冒烟儿的地，三汉挣十二分，是最好的劳力才能挣的最高分。牛挣一顿草料和两把黑豆，我挣三汉的一半不到：四分半。我们三个当时一定都觉得挺公平，因为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歇歇儿的时候，我问三汉老不下雨怎么办，他露出一对虎牙，暧昧地笑着说："他下呀，他下呀。"这个"他"显然是指老天爷吧，可三汉怎么知道老天爷下不下雨呢？再问也问不出第二句话来。这天夜里，当真就下了一场透透儿的雨。第二天起，全村人上山下川摸爬滚打，把种子全种下了地。等喘过气儿来，我又去问三汉："你咋知道会下雨？"他一下没明白，问我："我咋知道会下雨？"我说："你说他下呀，他下呀，他咋果然就下了呢？"这回三汉听明白了，虎牙又露出来，红着脸说："球实哩，我知道个球实哩，我只知道老天爷不能把人往死里饿哇，他不下咋？他得下哩嘛！"我为三汉这超级智慧而目瞪口呆，一时有又点儿拿不准这到底是不是智慧。就像我后来又有点儿拿不准二汉婆姨说"哪辈子没有这样人"的时候，到底是信念坚定还是痛苦太多以后的麻木一样。但有一点我会意出来了：乐天知命是一种品质，是生产方式落后和命运悲惨的人们的特征。渊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这种东西最有利于安定团结。中国老百姓因此成为世界上最安分守己，最热爱和平的人民。

天天在山上受苦，我们开始讨论什么是最难受的苦。三汉说是伏天在川里锄最后一茬玉米。因为川里本来没有山上风凉，又是一年中的最热季节，一人高的玉米像一顶密不透风的帐子，玉米扬的花落在身上，出汗时特别刺痒难耐。四汉却说是收秋，因为要往窑里"捍"。陕北人将担、扛、背、驮总称为一个"捍"字是有道理的。因为没有大牲口，毛驴车也舍不得用，我们这地方一年收下来的所有粮食：梁、麦、菽、黍都要凭一条绳子和人的肩膀往回运。山陡路远，运粮食的具体姿势常常多变。所以略去担扛背驮的分类，总称为"捍"，意为不拘小节地带回来，是很省事又准确传神的。三汉和四汉一开始各执己见，后来我注意到，四汉抿嘴不做声了，看样子是习惯让着三汉的。四汉比哥哥们还忠厚老实，是四兄弟中唯一没有成家的一个。

秋后听说家里给四汉说亲了，四汉不愿意，因为开始征兵了，四汉想去当兵。三汉是民兵连长，当然也给弟弟使劲儿。但是不知为什么杨家湾一个青年也没当上兵，三汉和四汉那一段垂头丧气的，村里少了许多笑闹声。

四汉不久结婚了，听说女方原来是他中学同学。四汉结婚时，我们知识青年都去串门。那天四汉脸上冷冷的。我先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青中有一个人说了一些要扎根农村，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话。四汉听了竟然激动得红了脸。我不喜欢讲话那人，也不喜欢他讲的这番话。此时看四汉的神色，就幸灾乐祸地凑上去问："咋？说得不对？"四汉说："说得对！可说这些管甚哩，迟早你们是个走，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哩。"我碰了一鼻子灰，没有再说什么。当时我虽然不喜欢有人来不来就念扎根经，但也确实没有想到走，我好像在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上山下乡的安排，并且把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当成今后的革命目标。所以对四汉的说法也不以为然，认为是他没有当上兵，心里不高兴，所以改变了往日忠厚老实与人无争的禀性。可是不知怎么又想起了另一件四汉发火的事情。

收获的季节，我们从山上"捍"谷子回来。一条手指粗的绳子的中间部分用来捆谷子，两头剩余部分挽成两个

圈圈，套进人的肩膀，使谷子和人联成一体，或者说是让谷子长上两条人腿，人和谷子一同走回家。山高路远，进村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朵朵、毛毛和我以及三捆谷子走到场院的时候，我发现朵朵开始以一种怪里怪气的姿势晃动肩膀。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她是没有力气把肩膀从圈圈里挣脱出来了。我想上前帮她一把，但是发现自己双手和双肩也都麻木得不能动。毛毛一定也和我们处在相同的境地，因为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好容易才从那一大捆谷子中脱身。我和朵朵恍然大悟，嘻嘻哈哈正准备照章办理。只听得背后有人凶巴巴地说："操心！闪了腰！"我和朵朵肩上同时伸过一双手，每只手一边使了一点向上提的劲儿，那点儿劲别提多合适多妥帖了，使我和朵朵一齐卸下了肩头的千斤重担（显然千斤不是事实而只是比喻）。帮忙的是四汉。我们想道谢，只听得四汉更凶狠地说："瞎球实闹！一群女子，何苦来受这苦！"说完，自管自走掉了。天已经黑，看不清四汉的表情，但他的口气简直要把我们一口吃掉。真不知道他的火气从何而来。这里是贫困的地方，土地贫瘠，单位粮食产量一直在一两百斤。现在每个百十人的村子里凭空来了十几号大男大女，我第一次想到，也许这里的人并不欢迎我们？看样子不管我们怎样想，怎样说，在他们眼里，我们和他们不是一回事。

这年冬天大汉也从监狱里放回来，说是保外就医。因是戴罪之人，大汉很少走下自家的涧畔，远远地望着大家，他果然是一脸刚毅，神情中有一种优越和隔膜，大概不是因为打死过人，而是曾经拥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生活吧。

大年初一早上，四兄弟齐刷刷从村中走过，大约是给父母拜年。走到与我们知青窑洞一沟之隔的他们父母窑跟前，他们大出来迎。我才发现四兄弟的父亲并不太老，虽然腰微微地弯了，但仍然是个健壮男人。这汉子脸上现出感动的样子，一家人大约很难这样凑在一起。五个魁伟男人站在村子里，不知怎样就聚起了一股雄浑之气，四周的山都矮小了许多似的。我正在这样看着他们时，心里忽然出现了一个怪念头。我对自己说，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回头看我，我从此把他们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人，把杨家湾当亲戚或者可以信任的地方。如果没有人回头，就从此井水不犯河水，熄灭自己进入杨家湾人生活的念头。我敢肯定，他们感到了我的目光，但从始至终，没有人回头。

我就是在这一刻感到了悲观和虚无。无论对别人接受再教育的哗众取宠还是对自己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真诚都大感失望，一堵高墙升起在现实和我的理想之间，身处其中的杨家湾一下子遥远得只可望而不可及，轻盈得可以随风而去。

听说杨家湾现在已经很富了，那整条川地底下发现了更多的石油，油矿打井，付给农民许多钱，农民拿了钱，没了地，所以许多人已经不种地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当年被玉米花子闹得心烦意乱的地方现在都树立着采油树了。四汉说过，"迟早你们是个走"，他说对了，当年的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梦里我没有见到四个汉子，实际上我已经记不太清他们的样子。但我当然是应该梦见他们的，当年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我，对我是太大的恩惠，至少使我知道井水河水确实是不一样的水，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有难以

测量的距离，使我在热情狂热的革命年代少走了许多弯路。

杨家湾，你为何始终这样轻盈、遥远？

四好汉，你们的儿子孙子现在还像你们一样，想离开这个遥远的村庄么？

本文选自《红色家族档案》，罗点点／着，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

丁爱笛：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

来源:北京知青网　　作者:丁爱笛

丁爱笛，1947年5月出生，祖籍山东日照。出生地重庆。清华附中老三届，陕北延川插队十年，做过四年生产队长，四年大队书记兼公社副书记。1978年恢复高考进入上海工业大学。现任天伦度假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1971年秋，作为二队队长的丁爱笛带领社员收割高粱

1969年1月，我离开北京到陕北延川插队。当时热血沸腾，大有上战场，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劲头。从那时起到我1978年2月离开陕北去上海读大学，按阳历算九年多一点，按阴历说就是十年了。四十多年过去了，在陕北十年，有很多事情是永远不会被岁月抹去的。

当队长，先来野蛮的，再来文明的

我们被分配关庄公社张家河大队第二生产队。放下行李，吃完村里款待我们的酸菜饸饹，我就去找了队长，他叫张文贵。“队长，我们明天干什么活？”我问得他愣住了：“歇两天，快过年了，不忙。再说现在只有担粪一种活，怕你们城里来的娃做不成。”“谁说我们不行，我们有的是劲。”我生生把队长的话堵在那里。队长拗不过我们，记得到队里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我们就上手干活了，果然是担粪。土羊粪死沉死沉的，第一挑粪我还找秤称了一下差不多120多斤。六七里的山路，仗着我在学校里练中长跑的底子，把农民追得呼哧带喘，第一天我和陈小悦就被评为十分，成了队里的壮劳力。

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的干了一年，一天都没拉。一年下来挣了三千多工分，是队里挣工分最多的。到年底分红的那天我才分了六块五毛钱，我一向心直口快，马上追问队长是否发错了，队长说没有，小悦告诉我一个工分只值人民币二分七厘。扣除口粮，只有这几块钱了。我一听就急了，问队长他干了几年队长了，他说从合作化开始他就是队长，有十四五年了。我就说你把队长让给我，我来当一年，如果到年终一个工分还是二分七厘，不用赶我就下台。我这一煽动居然获得绝大多数社员的同意，于是分红那天我就当上了生产队长。当时我和队里几个长老级的社员一商量，马上任命陈小悦当会计。当晚我们谋划了多半夜，对生产队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安排。



1970年底，丰收后作为二队队长的丁爱迪与生产队会计陈小悦（左）合影

当上了队长，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鸡刚叫，我就爬起把牛赶到井上喝水戴笼头。鸡叫三巡，天还没亮就敲钟把社员轰到场里安排活。把社员都打发走了以后我发现黑影里场上还蹲着

两个人在抽烟，我一看是队里最壮的两个汉子，一个叫王道，一个叫牛娃。“唉，叫你俩个去担粪，咋不去？”我问。王道把卷烟屁股一丢说：“昨晚上选你当队长我俩没举手。”我一看有人想闹事就急了：“你俩没举手老子也当上队长了，你们知道不知道少数服从多数？”无论我怎么好说歹说，这俩就是不动。我明白了，文的不行这摆开的架势就得来武的。天也亮了，我挨家挨户把六十岁以上能找来的老人无论男女都叫到场上，说：“昨晚大家选我当队长，这天知地知。他俩不想让我当，我偏要当。现在只有一个法子，谁打赢了谁当，请老人们来做个证明，我们立个生死文书，打死了算。”在老人们的劝说下牛娃先草鸡了，说：“这事还要立生死文书？不打不打了。”王道是个五大三粗一身黑肉的西北汉子，站起来嚷嚷着说：“北京学生读了几天书，还闹什么花哨哨，文书我不懂，打架我就先来了。”拿了个架子，一个饿虎扑食就朝我压了过来。我侧身向右一闪，趁机飞起右脚踹在他的左侧肋骨上，把他踹了个跟头。王道从地上爬起来连声嚷着说不算，说他没准备好。我一看他光有劲没反应心中有底了，就说行。王道这次摆足了架子扑上来，我往左一躲，顺手带了一把他的右手，脚下使了个拌，一下就把王道摔了个大马趴。众人一通数落，两人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怏怏地挑粪去了。

中午在送粪的谷子地里，说起大早上的事情众人都把王道当笑料，不想一下把王道的倔驴脾气挑起来了，他站起身摆开一幅要和我决斗的架子。这一次王道双手死死的抓住我的肩膀，我真正感觉到他的力量，僵持之中我闪出个机会来了个过背摔，谷子地里到处都是尖尖的谷茬，王道的屁股被一根锋利的谷茬扎进有三、四公分深，一时鲜血淋漓。到底是西北汉子，地上抓了一把黄土按上，从此服了。我当队长四年当书记四年再也没有跟我闹过逆茬，从来都是我的积极拥护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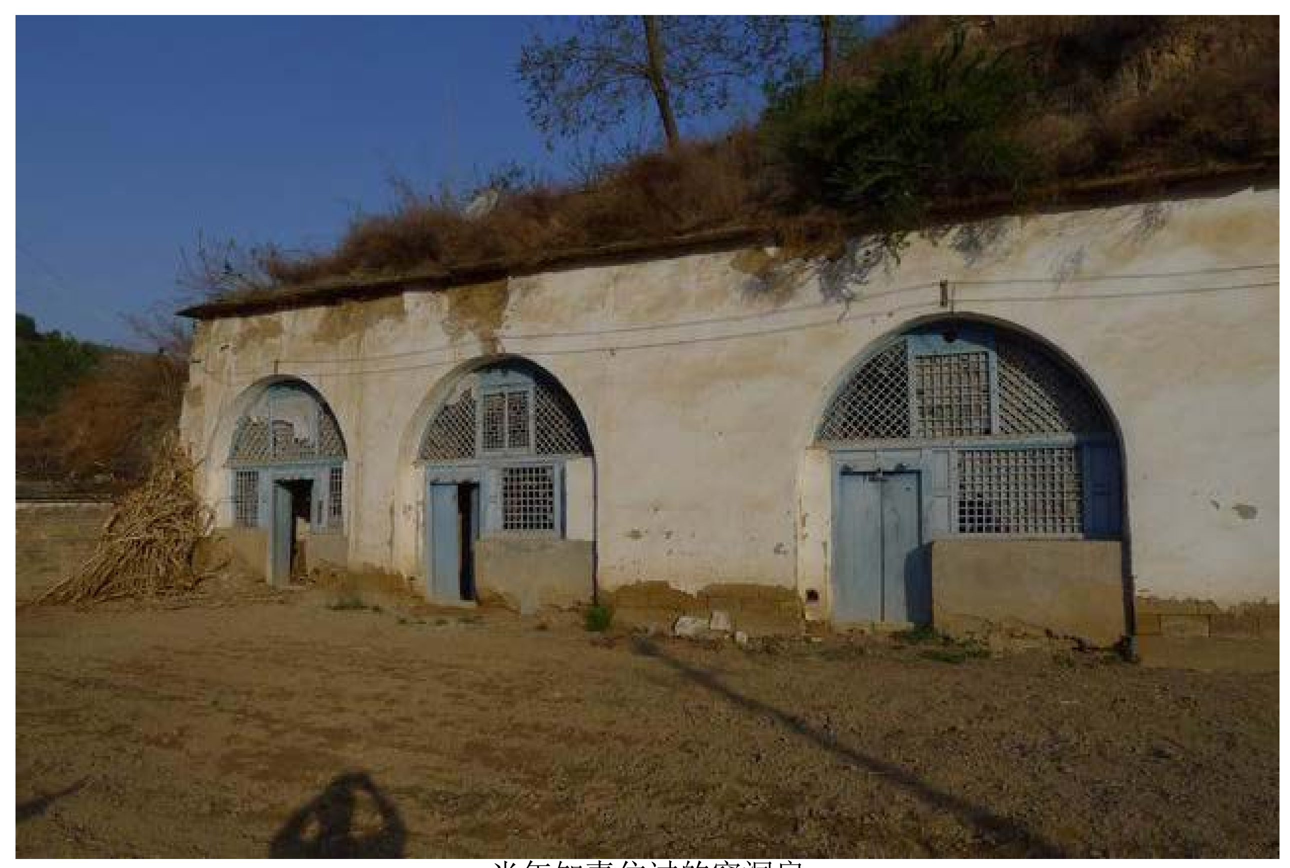
出名出在按劳分配的尝试上

那时的生产队，基本就是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当队长的每天鸡叫就起，带头苦干，可着嗓门喊着骂着，有时成效甚微。夏收刚过，要抢种荞麦，往地里送粪就是关键。按规矩地里每个粪场倒两挑粪，每挑粪要没有百来斤就不够用的。可总有那耍奸溜滑的趁人不注意挑着巴掌大的一点粪倒在山里，这成了我这队长最头痛的事，基本知道是谁干的就是没逮着。

我心生一计，大早鸡刚叫我就挑着一挑粪上山了，顺便提着一杆秤。在上山送粪的必经之路上有一颗老杜梨树，我把秤挂在树上，每来一个社员我就拦下把所担的粪称一称，这下露馅了，有的壮小伙子只挑了25斤不到，而有的婆姨挑了足足一百多斤，最多的满月婆姨挑了150斤还多。谁要是不服气我就让他称称我挑的那挑粪，我至今还记得那是145斤。

晚上我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凡挑过一百斤粪的一年的工分就按十分计，不够一百斤的就按比例减。有几个挑不到25斤的男人每天的工分只有两分多，而平时最多只能挣六分的婆姨居然好几个都挣到了十分。

这下炸锅了，有当街骂的，有去公社告状的，有给县革委会写信的，说北京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现在反过来整贫下中农了。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我生生抗住。当然村里相当多的社员是支持我的，尤其是老年人，农民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付出劳动就没有收获的道理。当年我们队获得丰收，每个工分折两毛四。我在公社范围内开始小有名气了，起码在当地农民口碑里“丁牛”常有人提了。



当年知青住过的窑洞房

分红会上，我趁丰收有业绩，大多数社员对我比较有信心时又提出了一个更让人炸锅的决定，把过去的劳二人八改成劳三人七，也就是把按劳动分配的比例从原来占总收入的20%提高到30%。这样肯定会刺激大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当然也对那些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或者在外工作的干部家属以及军属平时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光等着按人口分配的是个打压。

从那开始整整多半年我就没有安生过，告状的不仅告到公社、县里，还有往地区告的。工作组就来过好几个。这我倒不怕，关键是大队书记比较难缠。为了把我纠正回去，我俩大会小会地吵了无数次。我被老百姓称作“丁牛”，实际上变成“顶牛”了。我心中有底，自从实施了劳三人七后，社员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增加了30%，有工分记录在那摆着呢。这一年我们队又获丰收，一个工折成人民币就值三毛四，家家户户粮囤都是满的。秋收后县委宣传部来了一个小干事，让我写个总结。我也就没含糊，来了篇：“不用采取什么措施，只要提高劳动分配比例10%，社员参加劳动积极性就能提高30%”的总结文章。

过了个把月，我都把写文章的事情忘得差不多了，公社书记白光明突然到我们庄，见面就说：“你小子出名了，省委组织部要调你去省里开会，我打听了一下听说是省领导李登瀛点的你。我怕你现在能的谁的话也不听，调不动你，所以亲自来找你，赶紧去吧。”他又补充了一句：“好啊，你小子行，直接就从我们公社脑袋上跨过去了。”我和他说不清，倒是立刻上路了，笼着白头巾，穿着一身上下都带补丁的衣服，翻过玉皇庙山，步行一百多里到了延安，地委派了一辆212北京吉普把我送到省城西安。

省委组织部长见的我，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由来。原来我的那篇文章被发表在陕西省委的内部刊物“情况通报”上，好几个省领导都看到了，认为写的很好，有见地有实践数据。正好省里要成立一个“农村政策领导小组”，李登瀛同志就推荐了我。组织部长叮嘱我说：“小伙子，好好干，能参加这个小组工作就了不得，虽说不脱产但要按级别划差不多就是厅局级了，你从基层来这就好比坐直升机来的。”他接着带我去见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同志。肖纯是一个略微有点胖的中年人，十分和蔼可亲。他看到我那一身补丁衣裤就笑着说：“基层的同志真是很不容易，辛苦得很。”他说一看我这么年轻就很喜欢，还说：“我们那会儿参加革命工作时也就二十来岁，那时看到三十多岁的人就觉得很大了。小丁，你来得正好，我们就需要有闯劲的年轻人。”

省“农村政策领导小组”一共有七个成员，肖纯、李登瀛，还有省机关的三个干部，再就是来自基层的我和安塞县委书记。平时我们主要各自做些调查研究，不定期的在省里集中就一些政策问题开会研究。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那时叫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也经常参加政策讨论。我因为年轻又口无遮拦，很快就和他们混得很熟，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喜欢我，尤其是两个出身陕北的老同志李瑞山和李登瀛。

认识郝树才，成了好朋友

1973年底，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会，北京知青就我一个，在那时是莫大的荣誉。



1973年，丁爱笛参加第二届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时留影

在会上我认识了陕西省很多劳模英雄，象张秋香、李双印、郝树才等。尤其是老英雄郝树才，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俩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

跟老郝相识，也颇有戏剧性。省贫代会大会的头一晚上，我因为有事去餐厅晚到了一会儿，整桌的饭都已被贫下中农代表们风卷残云般的扫荡没了，服务员就给我端来一整只香酥鸡和四个馒头。我那时的胃口大的出奇，三下五下就搞到肚里，还觉得没太饱。不想服务员又端上一只香酥鸡和四个馒头，说能吃就再吃一份。我就来劲了，把棉袄一脱光穿着小背心抓起鸡就啃。这时，一只有力的手掌紧紧握着我脖子后面被扁担压出来的那一大块死肉疙瘩，洪钟般的嗓门响了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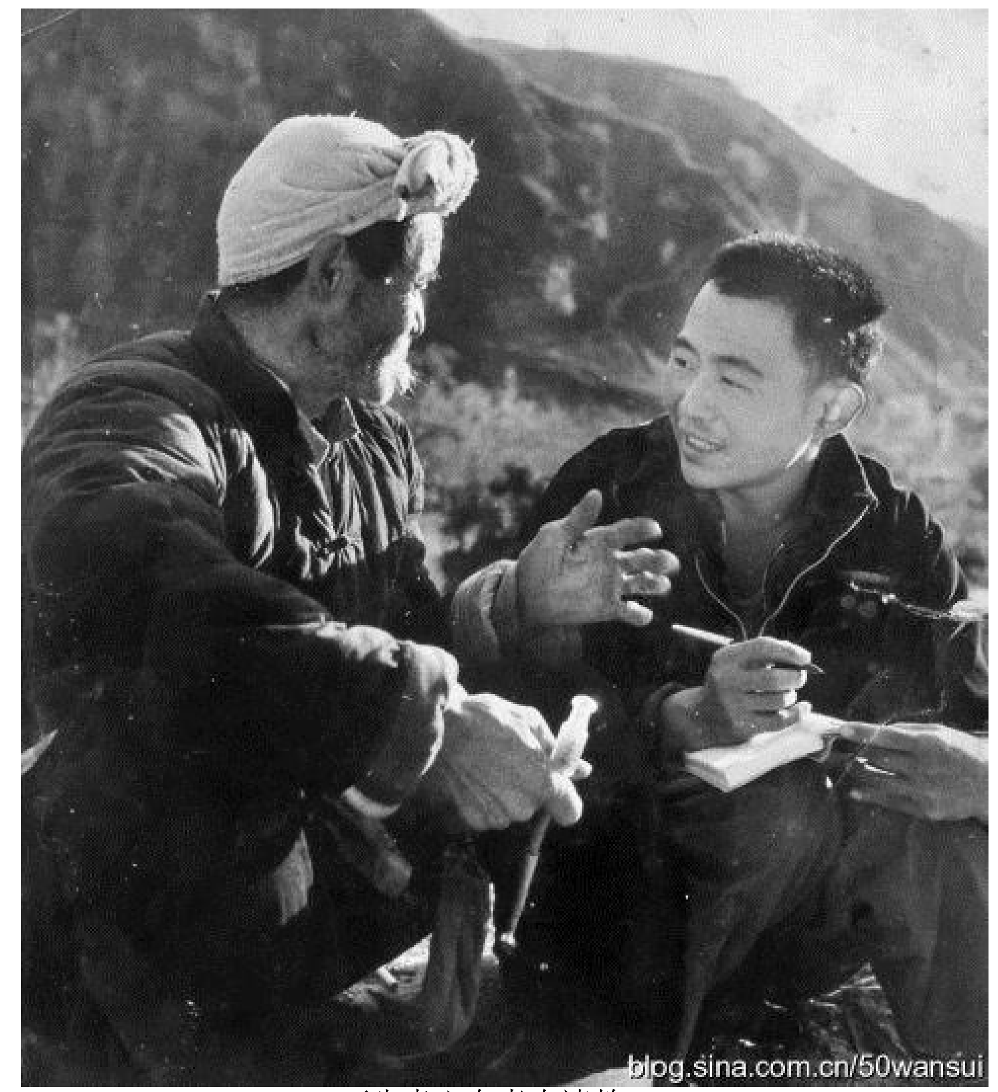
来：“什么都不要说了，就凭这疙瘩肉，这后生吃了多少苦咱一看就明白，真是好样的。”我回头一看，这不是原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人称“气死牛”的郝树才吗。在西安钟楼照相馆，我那箍着白头巾的英俊小照就排在郝老英雄照片的边上，我还琢磨到哪里去认识一下老英雄呢，没想到开会头一晚上就在餐厅见上了。老汉那年快70了，精神矍铄，握起手来你感到他那双厚厚的手掌孔武有力。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来来来，能吃就能干，这只鸡就是我让他们送来的，我在那边看着你估摸你吃了一只不敢下手第二只了，没想到后生真拔尖，准备甩开膀子干了，好样的。我这老汉就过来陪你再吃四个馍，拿馍来！”这里的服务员都认得老英雄，马上去端了一盘馍，又上了一盘谓南肘子，一只香酥鸡。我们两个是一见如故，一边说着，一边吃着。把鸡吃完又用馍夹着肘子全干光。那顿饭我真吃撑着了，尤其让我吃惊的是服务员说老汉已经在那边桌上吃了六个馍了，又陪我吃了四个馍还有这麽多的肉。自打那开始我们两个就成了好朋友，凡向他请教的事情老汉绝不含糊，有些事情他还主动帮过我，这都是后话了。

后来我把吃馍的事情说给省长李瑞山听，他听完后哈哈大笑，说：“用咱们陕北话说，郝树才，那就是一个老二杆子；你丁牛，就是一个小二杆子。二杆子碰到二杆子，能不对事吗？”

郝树才活到82岁，1986年5月29号去世。有时间我回陕北，一定要给老汉上上坟，报报知遇之恩。

机械化，说起容易做到难

我当队长时，计划一大堆，最愁的是没人做，就这点人力怎么计划都不够。北京知青下来插队后又来了一些带队干部，北京市也划拨了一些农业机械。我们张家河地处清平沟最里面，陕北人叫做沟掌，有什么好事也轮不着我们，都被那些靠近县城靠近公社的队近水楼台先得了。每每队里的老百姓还老给我描述北京支援的手扶拖拉机干活如何顶大事，闹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就号召大家拼命干，无论如何也要挣回一台手扶拖拉机。



丁牛虚心向老农请教

秋收后把钱凑了凑还缺二千块钱，怎么办？王道就提议去掏煤，来钱快。我一听好主意，马上带几个壮小伙去掏煤。煤窑就在离我们村十多里的杨家坪大队附近，典型的陕北小煤窑，直上直下八十多米，完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八十多米的下面就是巷子，也就几十公分高，刚够爬过一个人，爬过六七十米我的膝盖就被煤渣磨破了。在巷子里爬时最吓人的是突然“嘭”的一声，头上的岩石裂开一指宽的口子，要塌下来人就被压成肉饼子了。掏煤的地方叫窝子，坐着横抡尖尖的镢头，先把中间的中碳掏出来，它比较软，好掏。然后用撬棍把底碳翘起，每一块都有上百斤重。最后再用楔子、撬棍把上碳敲下来，脖子上套个绳套，拉一个类似爬犁的木板，把掏下的碳拖出去。我一共干了两天，膝盖屁股鲜血淋漓，实在不行了。还是陕北人厉害，几个小伙子生生坚持了一周。尤其是王道，黑不溜秋每天一声都不啃一直在坚持。我们终于挣够了二千块钱，凑够了买手扶拖拉机需要的四千块，真是玩命啊，这辈子让我再下第二回这种小煤窑我绝不下，那简直就是地狱。

有钱了，马上派两个人去县城买拖拉机。全村人翘着脖子等了三天，等回垂头丧气灰头灰脑的两个人，没买到。看见手扶拖拉机了没有？说看见了，县农机公司院子里放着呢。为什么不卖呢？说没我们队的购买计划。还有这种事，我立刻拿着钱披着羊皮袄窜到县城，直奔县农机公司，果然院子里放着七八台手扶拖拉机。卖机子的是一个小伙子，他斜着眼睛看着我说：“张家河家，买手扶没门，怎么又来了？”他说要计划指标，我还是头一回听说。我就问他：“谁管指标？”“王局长，”他大拇指向天上一伸：“王思德。不过你找他也没用。”“为什么呀，他是个老虎？”我说。“真是老虎倒好办了。”小伙子笑着说：“他是延川县有名的倔驴，怕你搬不动他。”我也是有名的“丁牛”，难道牛还怕驴不成，我就直奔王局长的办公室。

王局长果然名不虚传，我刚说明来意他就把我轰出了办公室。我就一屁股坐在他的办公室外面，告诉他晚上跟着到他家吃住，总之不卖我一台拖拉机就不算完。下班后我果然跟到他家，王局长的老婆倒是和蔼可亲，一听我说明来意马上站在我一边，说：“死老头子，院子里放着拖拉机等着放坏了卖废铁不成，赶紧卖给后生一台。”我坐在他们家外面，她还给我端了一碗饸饹让我吃。我裹着老羊皮袄生生在王局长家窑洞外面靠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王局长推门一看我还在外面就说：“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就把我家门口坐出个坑来，我也不卖你。”我就又跟着他去了办公

室，一坐又是一天。下班的时候机会来了，一个自称是商业局长的上门和王局长叫板下象棋来了，看来他们是老搭档，经常在一起下。棋局就摆在王局长办公室外面的院子里，我就在旁边仔细观战。王局长绝对是个好下棋的臭棋篓子，估计从来没赢过那个商业局长。我看出一招棋，赶紧给他出招，王局长看了我一眼："你还懂棋？"按我出的招把马摆过去后呈现出一副抽车将的局面，对面的商业局长马上认输。这下王局长高兴了，哈哈大笑，问我说："唉，你干什么来的？""局长，我不是找你买手扶拖拉机的吗，你咋忘了？""好好好，这就拉一辆。"王局长这句话使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局长，要拉也得你批个字呀。"王局长一点不含糊，批了个：卖张家河手扶一台，3600元。我拿着条子还犹豫了一下，农机公司柜台上明明写着3800元一台，怎麼写成3600元了呢？到了农机公司，那个小伙子倒挺痛快："局长说3600元，写在这里，谁敢要3800元。"

我得意洋洋地把手扶拖拉机开回了村，从那开始，我们一台又一台，队队都有了手扶拖拉机，后来就是各种农业机械。大队也置了推土机、发电机、电影放映机等，可以骄傲的说，我们队里置办的每一台机械，都是我们用双手挣出来的。到我离开张家河去读书时，整个大队累积的农业机械价值约有六七十万，还有几十眼窑洞，满山的苹果树，集体资产估值快有二百多万元了。

七年养育之恩，此生难报

我在李贵章家里整整吃了七年饭，从当队长的1970年开始到1976年我讨了婆姨才基本结束。



丁爱笛（右）与陕北后生在一起

我们去插队时李贵章已经四十好几了，宽宽的肩膀，挺直的身板，接近一米八的个头，典型的西北汉子。他平日里话不多，时间长了村里人告诉我，别看李贵章不爱言传，青化砭战役参加支前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从火线上抢救下七个重伤员。仗打完，部队一个团长看到老李表现好想留他，不想老李扭头就走，说兵是不当，下回再叫支前还来。

他婆姨村里人都叫催要妈的，就是他大儿子叫催要。李贵章的大女儿叫吊吊，因为盼

子心切生了女儿后希望吊出个儿子来。结果第二个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叫转转，要转换一下生儿子了。第三个果然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催要，催着还得再来一个。果然第四个又是个儿，取名叫挨要，就是挨着还要，不过后面就没要着。

李贵章家的窑洞离我们知青的窑洞最近。我当了队长后工作忙经常在知青灶吃不上饭，就跑到催要妈的那里去讨点吃的，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固定成员了。刚开始时村里生活挺困难，主食以高粱，陕北人叫桃粟为主，因为含有氢氰酸，我一吃多就烧胃，冒酸水。催要妈的就尽量把家里很少的玉米面做成发面饼子给我吃，他们一家都吃高粱面。如果有一点白面做成馍，催要妈的一定尽量留给我多吃几顿。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时，一家人刚要吃饭，挨要放学跑进门，一看放馍的篮子里有一个白面馍，刚伸手去拿，催要妈的就把他的手打回去了："你丁哥的。"那孩子当年也就七八岁，正在长身体能吃的时候，失望的眼神至今我都历历在目，一想起来就心酸。他家里养着一群鸡，下的蛋我真不知吃了多少，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每当我累了身体不好时，催要妈的晚上一定从窑掌里搬出一个大葫芦，从里面拿出一块乌黑的红糖，跟石头一样硬，要用斧头才能捣碎，红糖水泼鸡蛋，那时吃得比蜜还甜。

催要妈的身体不算好，左侧脖子上长着一个甲状腺瘤，这是陕北山区老百姓常见病。1975年我专门请来了当时远近闻名的知青名医孙立哲，为她动手术把瘤子拿掉。说来在山区动手术还真够危险的，正动着呢孙立哲在窑洞里面大叫："老丁，老太太晕过去了。"我一听就急了："怎么办？""要氧气，快想办法。" 孙立哲喊着。我立刻召集了二十来个婆姨，每人手拿一个笸箕，分两组轮流往窑洞里扇风，连续扇了两个小时，还真顶了大事，手术成功，术后也没有感染。

有时我经常感叹人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催要妈的平时用陕北话讲不太爱言传，但她坐在那里你会感觉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很慈祥的在看着你，那种感觉不是用一般的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就是那年我参加陕西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临走前我才想起浑身上下没一件像样的衣服，正不知所措时催要妈的叫我到她那里去，笑眯眯地拿出一套全新的行头来：黑色的对襟中式棉袄，黑棉裤，全新的白羊肚毛巾，穿上别提多合身了。转转告诉我，全家为我这身行头整忙乎了多半个月。我感动的不知说什麼好，这套行头一定花了不少钱，当时老百姓没多少钱。后来我给李贵章五块钱让他去小卖部买瓶太白酒喝，好说歹说老头握着五块钱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没买酒，就问为什么，他说一到小卖部手就出了毛病，握钱的手怎么都张不开只好回来了。

1998年我回陕北，催要妈的已经过世了，我跪在她的坟头，祭撒下一瓶她生前爱喝的西凤酒，想起这些往事悲痛欲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她用宽大的慈母之心养育了我七年，我没有回报她的养育之恩，而且永远也不可能了……

碰到张海娥，几经周折做了陕北人的女婿

1974年5月，来回折腾了无数次，我才入了党，成了张家河大队书记兼关庄公社副书记。工作紧张，生活完全没有规律，我闹出了胃病，动不动就胃痛的头冒虚汗。我常背一小军用背包，里面放着针管和阿托品，一闹胃痛就自己在足三里那里打一针阿托品。当时北京知青招工的招工，推荐上学的上学，基本老知青都走光了，我早就是远近闻名的铁杆扎根派，生活问题却成了大问题。村里的老人，尤其是老大娘们就操心给我说媳妇，明的暗的闹了好几回我都没有动心。人说爱情这回事，要碰得时间长了才有可能擦出火花来，这话一点不假。大队党支部经常开会，除了我就是年轻的妇女主任张海娥不抽烟，其他人都是一人卷一根老炮筒在抽，开上个把小时会就把我们不抽烟的薰出窑洞门透透气去。到外面看看月亮聊聊天，慢慢的时间长了就聊到玉米地里去了。我比她年龄大了十岁，我向她求婚，她答应了，不过说还要征得她父母同意。



1976年5月丁爱笛与张海娥在张家河结婚时的合影

我就大着胆子去找未来的老丈人。我和她父亲还是有点缘分的。1970年秋，当时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公社派来工作队说要严查私自扩大自留地的行为。本来工作队咋呼一下，运动就过去了。张海娥的父亲张玉前是个梗直爱说实话的人，居然站起来说大队高书记自留地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下惹了麻烦，工作队在高书记带领下把老张的自留地一量，说扩大了一倍，罚了六斗粮。还是我不服气带着知青们又把老张的地丈量了一下，发现他的地是三角形，面积应该是底乘高除二，工作队故意整人没除二，当然多算了一倍。我就带人去把老张的六斗粮拉回来送他家。

这件事当时闹得惊天动地，大队高书记恨得我牙根痒痒。你能说我和老张缘分不大吗？我找到老张，小心的说明来意，特别强调了我大十岁这个概念。没想到老张倒是很痛快，他说年龄不是大问题，他就比海娥妈大十岁还多。不过他说家里是海娥妈拿事，还要证得她妈的同意。

老头这麽一说倒给我壮了许多胆，就去找到海娥妈。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她就直截了当：“现在婚姻自由了，那就是法，我要是拦住说不行，那是违法；但你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坚决不同意。”“为什么？”我问。“你数数看就咱这张家河孤儿寡母有多少？十三个，都是老红军留下的。外面去当了大官了，进城就甩了，可怜吧。老百姓不图别的，就图一辈子安安稳稳过。”

也是，那些老红军撂下的孤儿寡母在当时陕北农村是常见的事。我们村里出去最小的一个是甘肃省一个厅的厅长，他留下的孤老太太后来找了个老头，留下的儿子我们在时也有三十多岁了。我和海娥妈论了很长时间理，老太太一看我态度挺坚决，最后就说：“你先不要一定让我说个什么，我说个地方你先去转转，回来再找我。”我一看有门马上答应了。

我是趁着“省农村政策领导小组”到基层调查的机会去的，那个村就在我们邻县，到那里我就知道为什么非要我来了。原来这个村是当时陕西省一个有名的领导的老家，他的前妻和儿子至今还在庄里“受苦”着呢。

我在这老太太家住了有十天，天天劈柴挑水不含糊。刚开始时老太太沉默寡语不太爱和我说话，架不住我话多，用陕北话说得那些事常把老太太逗笑，一来二去老太太话匣子也打开了，看得出来老太太年轻时绝对是一个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的人。

临走的头一天晚上，老太太以一种极其平稳的口气和我聊起了往事，我想象她那么聪明的人一定洞悉了我，完全知道我真正的来意。她和那个领导从小是青梅竹马，后来闹革命了男当红军女宣传，大生产支前线她从来没有落在人后，还独自抚养着两人的儿子。每当听到自己男人在队伍里负伤了或生病了，哪怕把家里的牛卖了攒两个光洋也要碾转托人送过去。没想到解放了男人没有回来，在城里又找了一个有文化的大学生。她男人一定是觉得愧疚，刚开始的那些年每个月还会给她寄些生活费来，但这个刚强的女人每次都原封不动的又寄了回去。“这个革命对他说是成功了，可是对我说还没有，我活着走好自己的路。”老太太的这句话让我听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她还跟我说起他的儿子，文化革命后儿子的爹调到陕西工作时，和儿子从小长大的伙伴们凑了一些钱让他去省里找他爹，虽然没见上，但有关部门还是为他在延安城里安排了一个工作，儿子回来告诉她，说在延安城里有了工作从此可以养她。她就跟儿子说：“要么你就跟你爹去，我没这个儿子，我不用你养；要么就跟妈在这里当个老百姓，做个受苦人。”儿子一听就跪下了：“妈，我跟你，我是妈养大的，我有良心。爹连我面见都不见，他不会认我这个儿子，那不是爹。”

我回到张家河，见到海娥妈妈，我跟她说：“你让我办的事我办了。”她问：“那你还想娶海娥作婆姨吗？”“当然。”我一点没含糊的回答。老太太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转过身去用袖子抹了抹眼睛。



丁爱笛和张海娥朴素的窑洞婚礼

我结婚的那天非常热闹，北京知青来了三十多个，海娥的女友来了十几个，还有公社书记白光明等干部不少人都到了。可我老丈人丈母娘没来，老丈母娘倒是按陕北规矩送了七只老母鸡，小姨子过来陪了我们几天。

带婆姨干活，会骂人才叫本事

我当上队长，领着大伙热火朝天的干，逐渐感到劳动力不足。

陕北女人过去是不上山的，因为过去男人上山是精沟子，也就是光屁股。凡看过徐悲鸿愚公移山油画的很多人都被那个画面震撼了，那其实就是西北人过去在山里的真实写照。

过去陕北女人除了家里活忙忙，最多就在夏粮收时在场里闹个连枷什麽的，不进山。大队开会时我一直在倡导把妇女半边天的力量发挥出来，尤其是我们北京知青来了以后，女知青要进山干活这风气确实要改变一下了。

公社大队都发了通知组织妇女干活。一落实到生产队连个妇女队长都选不出来，我本想让我们的副队长带领妇女干活，没想到他死活不愿意，于是只好我来，名誉上是生产队长，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在当妇女队长。

陕北的女人，没结婚当姑娘时一个个老实着呢，一结婚当了婆姨那可是什麽话都敢说。我那时刚刚二十来岁，经常被那些婆姨说得脸红心跳，不知所措，领导力大打折扣。一次在山里我带着二队的妇女正在锄谷苗，不意端端碰到一队的妇女也在那里锄谷苗，两队妇女碰到一起话就格外多，非常影响工作进度，我就想找个茬口压一压。

一队有个女人外号叫红鼻子老C，长着一个通红的鹰勾鼻子。这个女人见过点世面，远近闻名的利害，两队相见数她话多，声音还大。我就借机发作了一下：“嗨、嗨、嗨。你就不能把你那张嘴闭上，瞧你搅和的两个队今天都做不成事了，光听你这嗓门了。”

没想到这个女人居然来了一句：“我的妈呀，咱这母鸡队里咋就冒出只小公鸡来，怕还没打过鸣来的。大伙可听好了，这大山里老娘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二队一把，让他把没见过世面的小家雀拿出来，老娘我一板子夹死他，让他会打鸣了再在母鸡队伍里出头。”

大山里光听着这些妇女笑破了肚子，把我闹得两三个小时没缓过劲来。

自打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把陕北所有的骂人话收集齐全学精，下回逮个机会展示一次，把威信夺回来。于是我经常拿着个小本本晚上走门串户和老年人聊天时向他们请教，什麽王维

雄、韦妈的，村里最聪明嘴最利索的访问个遍，把陕北通用的，稀奇古怪的骂人话基本收集全了。我又把它们编成容易记忆容易说出口的四六句，背了个滚瓜烂熟。

机会终于来了，夏收时正好在山里我们又和一队妇女割麦子碰在一起，歇晌时有意无意我就和红鼻子老C起了冲突。

这个女人跳起来右脚用劲一跺，张嘴就是“我日——，”我不等她第二个字出口接着就是“**妈妈、你妈妈你妈妈你妈妈的，那个太祖妈妈的。”一口气骂了足足有十几分钟，把红鼻子老C急得尿了一裤子。一队两个婆姨上来把红鼻子老C架起就往山下拖：“哎呀，都尿裤子了丢人吧，别跟北京学生斗嘴了，人家有文化，看嘴多利索，你斗不过。”

这件事过后真是再也没有哪个婆姨敢在嘴上和我叫板，一时我是春风得意，但从此养成了我出口就带脏字的坏毛病。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天津第四机床厂，和工人打成一片我这毛病还用得上，但在后来回北京到机关工作改起来就非常难。

在我父亲家不经意说出来，常把老头气的：“这哪里是书香门第家出来的孩子，简直是土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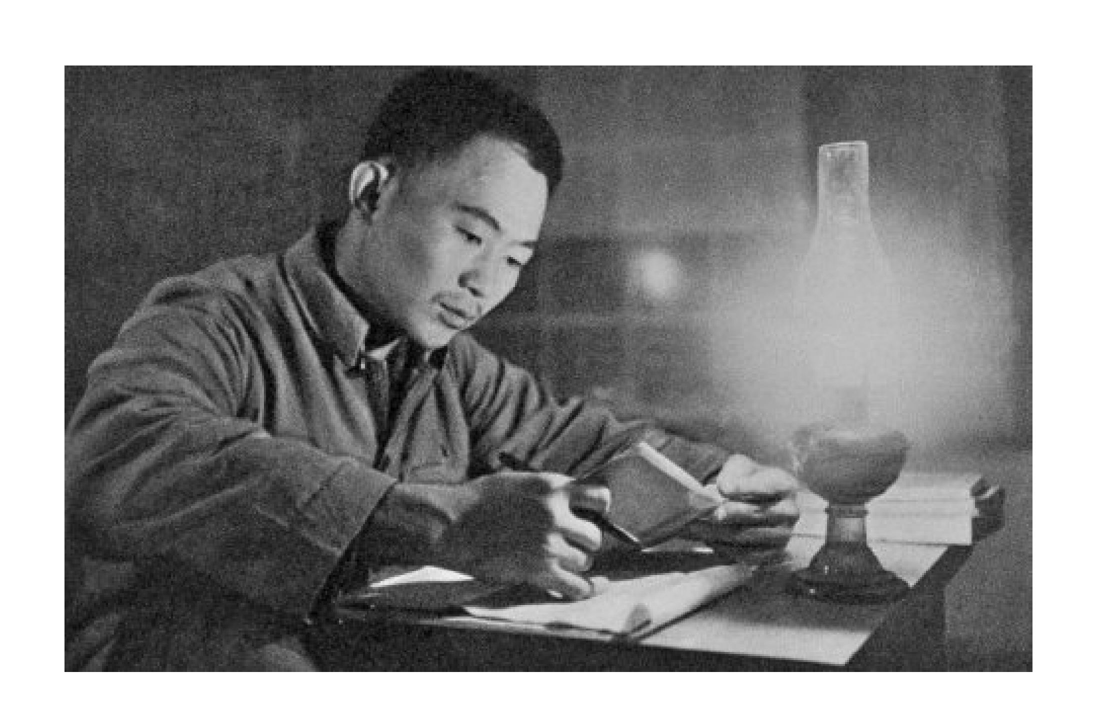
不说米脂婆姨　专说绥德汉

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堡炭。谁都知道这是陕北著名的四大宝。米脂出美女，这确实是名不虚传。

我在陕北的那些年，凡碰到陕西歌舞团漂亮的女演员问起原籍是哪里的，多数都会告诉你是米脂的。米脂我去过，村村户户院里院外到处是桃树，米脂女人为什麼漂亮，当地人会很认真地告诉你：这里水好，米脂人喝的是桃花水。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就是米脂人。说起貂婵，当地人还会告诉你，生貂蝉的那年，米脂的桃花没有开，桃花的精华都被貂婵吸走了。

说米脂婆姨，这是题外话。这里专说绥德汉。绥德我去过好多次，那里是吕布的老家，专出西北大汉，老远看去身材很匀称，肩膀宽宽的倒三角形，煞是好看。等到跟前才发现他比你整整大两号，人家一米八几的大个头，冲你咧嘴一笑，阳光底下你似乎觉得他的眼睛不是黑色的，而有一点蓝光，好像和我们不是一个品种，一问倒也是汉族。西北二千年来战争不断，造成各种民族的大流通大交融，也构成绥德汉这一宝。



丁爱笛插队时的老照片

我要说的是一个绥德汉子，名叫延海。个子比我略高，有一米七五的样子，但肩膀比我宽了快有一半，两只粗胳膊结实得远超出一般人想象。这个人刚开始时是我们队里为了扩大集体饲养窑，雇来打三眼饲养窑洞的。他开出的雇工条件很特殊，带两个小工，两天一斗半小米，一天四升米是吃的，剩下就是挣的工钱，二十天完活，再给三斗小米。这工钱在那个年代是高的，但这三眼窑洞我自己带八个人打过，带石子的硬胶土，一镢下去，只有一个白点，闹了一星期，刚打进二尺多，每个人的手都震裂了。延海就是另外一个阵式，他一镢下去，咬进足足三几公分，左手一翘，比笸箕还要大的一整块土就掉了下来。才干了一上午，我到现场去，窑洞上面的半个筒子，已经进去了五尺多，镢头砍钝了四五把。难怪头天我给他找了二十把镢头他还嫌不够，还要备一个打铁炉说每天要修理工具。他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是惊人的。一眼进深一丈八，面宽一丈的饲养窑，连泥窑面，他们三个六天漂漂亮亮就做完了。这三眼窑洞不到二十天就交活了，延海不但多挣了三斗小米，还被我们三队的寡妇招去做了倒插门的老公，这是后话。

一次，为了队里新办的粉坊，我到永坪镇集上买粉瓮，并用黑豆换几斗绿豆。我牵了一匹骡子，把事情办完之后，正要往回走，就看到围了一大堆人在嚷嚷，原来有两个北京学生模样的人在打一个稍小一点的人，一听口音也是京腔。

我问旁边一个上了岁数的老乡怎麽回事。他非常不满意地说："看你这模样还算是个实在后生，我们永坪镇些北京来的学生，整天价打架斗殴，偷鸡摸狗，我们老百性觉得就像胡宗南第二次进陕北。"我一听这话老大不舒服，本来就好打抱不平，顺手就把骡缰绳递到这老乡手中，冲进场中拦架。那两个哥们还是真野蛮，不但不听劝，其中一个手拿半截柳木棍的还给了我一棍子，幸亏我反应快，一把抓住棍子下面给了一脚，踢在他的膝盖骨上，一瘸一拐的跑了。另一个见势不好也跑了，还对我说："小子，有本事别跑。"好几个老乡劝我赶紧跑，以免惹事。正在这时我看见延海笑眯眯的也在那里，对我说："赶快吧，你骑上骡子跑掉，这些粉瓮粮食我帮你扛回去。"他说只要我两升米做工钱，晚上管饱一顿饭就成。就这样我骑着骡子一路狂奔，从永平镇到我们村三十多里，中间有一个陆家洼山，离我们村还有七八里。我就在山上边放骡子边等延海。

约摸有三个多小时后，我看见延海背着两个老大的粉瓮，瓮里放着几斗绿豆，就跟个山似的上山来了，我几乎被惊呆了。那一背最少也得有快三百斤吧，他背的还显得绰绰有余。晚上在我们知青灶上的饭量也把我们全体知青震的黑响，猪肉粉条白菜不知抡了多少碗，光小米饭就干了一脸盆，足有一升多米，四斤还要多。

我和延海比过抱石头，我勉强把一块重达二百斤的石头抱上差不多80公分高的石墙，延海轻轻松松把一块五百多斤的巨石从二十米开外稳稳的抱过来放到石墙上。陈小悦曾对我说过："其实李自成农民起义时他们哪有什麽武艺呀，就是前面有像延海这样的壮汉几千个，每个人抡上一百多斤的大刀不当回事，谁能挡得住啊。"

申易，我心目中永远的长者

我第一次见到申易是我当队长时去延川县城办事，有在县政府工作的人特意在大街上找到我说县委申书记想见我。

我早就听说过申书记，说北京知青来延安时周总理特意嘱咐过他，还曾调侃过他那个易字含义深刻。申书记对周总理保证，一定要带好这些来自北京的孩子。



申书记（左四）同北京知青在一起

但这次我见申书记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会有个什麽结果，毕竟告我状的太多了。

申书记见了我非常亲热，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来来来，丁牛你哪里是北京娃，整个就是我们陕北娃嘛。"他见我箍着白羊肚头巾，打扮的就像是个陕北老百姓，很感兴趣。几句话说得我那点戒心消失得无影无踪。申书记跟我聊的都是有关科学种田的事，他听我说春天我引进了晋杂五号高粱，种了近百亩长势不错，很高兴。他又听我说夏种全面引进北京五号裸麦，就特别嘱咐我小心，因为北京五号原产地都是种在可灌溉的田地里。我就告诉他放心，北京农业大学在甘泉县已试种了两年，很适应当地气候。申书记对农业非常熟悉，而且特别注意细节，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申书记的小公务员来晚了，匆匆忙忙给我倒开水，手拿玻璃杯一倒把自己烫着了，手一松玻璃杯摔在地上碎了，开水溅到自己和申书记的裤脚上。申书记先用手绢给小公务员擦去水痕，又不厌其烦的亲自给小公务员演示怎么倒水才不会被烫着。申书记感叹地说："孩子小，刚参加工作没经验，得告诉他怎么做。我参加革命队伍时比他还小，也当个小勤务兵，我现在不是当了个县委书记了吗？这世界上还是后生可畏呀。"

就这么和蔼可亲的人也有发脾气的时候，我就碰到过两回。

跟申书记熟了以后，我到县城办事只要有时间就去他那里坐坐，聊聊基层的事。1974年刚过完年，我到县里顺便到他那里，老远就看见他的小公务员站在办公室窑洞门示意我不要说话。我走近了他就悄悄跟我说："正說你呢。你们大队高书记在。"就听申易在大声质问："你敢不敢给我写个保证，查你三代都是根红苗正，只要一个有问题的你就给我自动退党，你敢吗？我看你不敢。你表哥不也是劣绅吗，按说你也不该入党。丁牛舅舅和他有什麽关系，四九年就去台湾了，那时他才两岁多，见没见过都不好说。够不够党员标准要看自己的表现。"

申书记还在说："哎呀，你高书记权力够大的，听说人家丁牛给你递个入党申请书你都不接。我告诉你大队书记没有不接的权利，只有接的义务。"

又听申书记口气稍柔和了点："白书记，人家近平在你们那里表现得不错，几年了怎么也在那里拦住不让入党？这是我们陕北的孩子，我今天就请你来给我说说理由。"申书记说的近平，就是在文安驿公社插队的北京知青习近平，这一年他也入了党，当了大队书记。"没理由，起码在我这说不出理由。"一听就是文安驿公社白光星书记的声音，我认得他。我一看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赶紧溜了。

又一次我在申书记办公室说事，县里哪个部门送了一份报告给他，申书记才看了一眼就大发其火：“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的侄女，你们扯这么远干什么？我们要解救一个孩子，你们写个报告偏偏还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什么意思？”不等来人回嘴，申书记就斩钉截铁的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拿回去你们领导也改不出个样子，我亲自改。”他立刻伏案字斟句酌的对这个报告作修改，完了交给来人说：“拿回去打好再报上来。”

来人走后申书记对我说：“王×，王××的女儿，可怜得很。插队在这里，生活无着落和当地人结了婚，生了娃，男人还常打她。我们要解救她，安排她去上延安师范，你看看这些部门好像不把这孩子和刘少奇联系上就划不清界限。”王×，我知道，她在冯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插队，在那个极左思潮风行的年月有申书记这样的胆略和菩萨般心肠的干部还真是不多见。

我定婚了，一天申书记突然来我们村，在这里住了两天。临走时意味深长的拍着我的肩膀说：“这回来你们张家河，队里的女子我还特意看了个遍，总结了一句话告诉你：憨娥不憨、精孩不精。选对了，哪天到我家请你吃顿便饭，一定来啊。”憨娥是我老婆的小名，精孩是另外一个女孩的小名。

那天还有件事情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申书记临走前我们大队的领导都来送行，有人是开着手扶拖拉机赶过来的。我就和申书记说起越来越多的农业机械运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使这大山里的农民开了眼光，长了见识，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我不经意的提到我们队羊倌刘志远的老妈妈有八十多岁了，腿不利索。每次队里用农机具打场老婆婆一定要孙子们把她背到场里去看，老婆婆高兴的对我说：“这辈子拖拉机是看到了，就剩下汽车没见过，什麼时候让她见一回，就是死也知足了。”也难怪，自打嫁到我们庄快七十年了她从来就没出过庄。

我说者无意，没想到申书记脸色凝重起来，他执意先不要走，要把他的北京吉普开到后沟掌接那个老婆婆看一回车坐一回车。他说：“我这县委书记老百姓说我们是父母官。普通老百姓有这麼一个要求我能做到的，我为什麼不去做？”刘志远家窑洞在后沟掌挺高的地方，我上去把老婆婆背下来，申书记亲自拉开车门把老婆婆安放在前排座位上，自己在后面扶着和她说话。汽车在后沟颠颠簸簸的开了十几分钟，申书记和老婆婆的笑脸和周围的一大群孩子的笑脸一样灿烂。等申书记离开时，全庄的老百姓聚在庄头望着逐渐消失的车灯久久不愿意散去……

申书记请吃饭哪有不去的道理，我如约去了。延川县城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三眼窑洞，正中窑洞就是陕北常见的土炕，摆设极为简单，饭桌就是炕桌。

申书记老婆亲自做的饭，主菜至今我还记得，是一大盆酸菜炖土豆，手压的饸饹。申书记的老婆是陕北最普通的婆姨人，走起路来一拧一拧的，看得出脚很小。

申书记笑着对我说：“我婆姨早先裹过脚，后来闹革命放了，也没长大。”吃饭时他问我：“我说请你吃便饭，没说错吧？”“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一口，酸菜炖土豆外加荞麦饸饹。”

申书记很深情的看着他老婆说：“我参加革命有三十多年了，一直在延安周边转悠，进了城还是老样子。不象有的人进城就把老婆换了，官可能越做越大，但有意思吗？我老婆嫁了我这样一个不称职的男人，我不给她添麻烦就对了。我一个放牛娃出身，我很知足。”这一晚，申书记给我上了堂一生都不会忘记的人生课。

1977年10月，很多知青都在忙于恢复高考前的准备工作，我是铁杆扎根派，这周围发生的一切对我似乎没什么影响。突然有一天申书记通过广播电话找我，让我立刻去见他，而且很急。那时申书记已经调到延安地委了。我没有迟疑连夜翻过鲁家湾山，搭顺车到了延安。

坐在申书记的办公桌前，感到这几年他确实苍老了许多，但是两眼仍然明亮有神。“参加高考，提高自己，跟上时代，这是新时期新任务。”申书记又补充说：“我知道你也许一下转不过弯来，所以我要当面跟你说明白。这几年你已经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表明了有文化的重要性，但你不能满足于仅仅修理一个村庄，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你做。”

他看我还在犹豫，又说：“够了，不要等到我这个年龄才后悔为什么不早点上大学，有了机会不要错过。”

我就说：“天哪，申书记，连今天算上只有十天就要考试了，我十年没摸过书本怎么考？”

“自信，有信心就成。小丁，我相信你根底扎实。”申书记的话句句铿锵有力，我是彻底服了。回到庄里草草翻了几天书，参加高考果然考进上海工业大学。



1978年丁爱笛赴上海读书时张海娥携女儿送行全家在延安合影

我在陕北十年，其间关键几步都得到了申书记的真诚关照，他是我心中永难忘怀的恩师、长者，人生道路上永远不灭的灯塔。



丁爱笛自我简介：

丁爱笛，1947年5月出生，祖籍山东日照。出生地重庆。清华附中老三届，陕北延川插队十年，做过四年生产队长，四年大队书记兼公社副书记。1978年恢复高考进入上海工业大学，机械系学生书记，铸造班长。1982年毕业后到天津第四机床厂，做过技术员，铸工车间主任，技术科长。

国家科委人才交流中心办公室主任2年，北京城建开发公司总工助理2年。1988年下海，海口中海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开发建设了三亚创业大厦。2000年组织天伦度假发展有限公司，任总经理、董事长，致力于中国度假产业开发。插队期间娶了队里羊倌的女儿，育有一女。



丁爱笛再返延安于黄河壶口留影

（责任编辑：东岳）

?

孔捷生：那不是好的年代，却是我们最好的年华

作者：孔捷生　　来源公众号“ 新三届”

作者简历



孔捷生，1952年出生，广东南海人。1968年赴广东高要县农村插队。1970年海南岛建设兵团长征农场农垦工人。1974年回广州，广州展华锁厂工人。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多以知识青年生活为题材。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调作协广东分会从事专业创作。曾任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1989年移居美国。

原题

炎热的冷土

作者：孔捷生



?那不是好的年代

却是我们最好的年华

知青50年祭

1968年秋，十五岁的我到广东西江水乡插队。知青集体宿舍是一座幽暗老祠堂，正梁还悬着缝缀明代铜钱的红布，积尘已令色泽莫辨。传说祠堂蛰伏着有仙气的白蛇，我没见过，只在半夜梁上曾有窸窣细响，潜入混沌少年的梦境。

这座老祠堂后来沉淀为我文学生涯的深意象，然而当时感觉浅淡。我在西江水乡不足两年，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记得离开时就像诀别，少年时代结束了。我将远行，一头扎进热带林莽去书写青春。

空山足音

我转赴五指山区，只缘哥哥是海南兵团知青。我踏上这片炎热的冷土时，年方十七，正是青年期之始。

我的连队隶属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十五团，在琼中县，位于海南岛中部。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谐音，“白”就是白沙县。这两个荒蛮县份山高林密，瘴疠弥漫，都是黎族苗族聚居地。

此前对琼崖的认知，不外蕉风椰雨之文学渲染，影像符号则来自1960年代一部彩色纪录片《海南明珠》。此片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画面尽是蓝天绿海，一派热带美景。想不到我未来会和海南结缘。更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五指山，看不到浩瀚大海，闻不到咸腥海风，连椰林也了无踪影，原来椰树只生长在海滨。不过莽莽丛山另有赐予，

哪怕白昼再酷热，夜间却凉气四合，要拥被入眠。与山外边昼夜高温煎熬相比，这是一项福利。

我的连队位于五指山脉一道襞皱里，朝夕吻吸被热带雨林的气息裹挟，终年看不到黄叶，举目都是蓊郁苍绿。记得张抗抗初到岭南参加花城笔会，看见沿街绿树婆娑，叹曰："这些树木总不落叶，不是活得很累吗？"从北大荒走出来的她，若见过热带雨林会感触更深。那里衰亡周期赶不上生长速度，植物群落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张抗抗之诧异，和我初履北大荒极目辽广黑土地的感觉相似。我在林莽里视线从未逾越一箭之遥。我十七岁的人生，就在生死相缠的浓密藤萝中展开。



连队女知青多在割胶班，男知青则沿着第一代拓荒者的足迹，向原始森林纵深挺进，勘察未来橡胶园。定点后便拉队进山伐木烧荒，建立新连队

初入大林莽的印象至今难忘，我们几个知青组成小分队，用长把砍刀披荆斩棘，从绵密藤萝和芒草中开路前行。林中潮湿闷热，空气密度大，视界被屏障所囿，但声波传递之远和响，疑似幻听。野猿过树，栖鸟惊飞，都哗啦啦响得瘆人；哪怕蠓虫从耳畔飞过，扇翼微音也被放大；每斩断一柄树桠，都从雨林不同方位依次传来回声；雾岚间歇性从幽谷、林梢流泻而来，吞噬同伴的身影……就这样，我们在绿色迷宫辨音觅路，寻找隐匿林间的溪河和开阔地。这是勘定连队新址的座标。

选址后开入伐木队，男知青当然是主力。夜里我们挤在潦草搭就的矮棚宿营，身下铺的是树叶。雨林滴水断续敲打棚顶的野芭蕉，大林莽深处不时传来异响，或是坡鹿惊起，或是蟒蛇蠕动，或是箭猪夜行……幸好五指山中并无勐兽，知青惧怕的是山蚂蟥，被附体吸血毫无痛感，直至衫裤血迹淋漓才惊觉。

雨林蓊郁神秘，又有着难以言喻的美丽。跋涉其中，阳光被密林筛过，光束呈线状投射下来，充满动感的丝缕氤氲如同幻境。林间腐烂气息中伴有扑鼻异香，不知是木香药香还是花香。更时见羽翎鲜艳的热带雀鸟飞起，有一种红鸟群起群落，啼声清越飘逸，堪比百灵。鸟群溅落林间，宛如树冠顷刻开满奇花。多年后我定居美国维州，本

州州鸟为北美红雀。此鸟仅在交配时才比翼双飞，不似海南红鸟那般通体鲜红，啼声少了歌咏感。然而每睹红雀都触动心弦，彷佛梦回琼崖。

于今那些林莽画卷已近湮没。当年垦殖“大会战”，我们用前现代的斧锯工具把热带雨林伐光，开拓梯田种下胶苗。我在伐木时险些送命。那是一棵合抱粗的红椎树，形状扭曲，我们动锯前对它的倒向判断失准。当大树嘎然倒下，我惊觉不对，拔腿狂奔，卒被倒下的树冠埋没。众人合力从浓密枝叶中将我挖出，居然筋骨无损。想必是寄生藤的拉拽缓冲救了我。永难忘记那瞬间知青们让我闪避的惊叫中，我只听到哥哥的声音——人在命悬一线时闪现脑际的唯有亲情。后来哥哥却留在边远新辟连队，和我分开了。

当年垦殖砍倒的树木很多是珍贵树种，鸡翅木、黄花梨、红黄酸枝、紫檀、花榈、香楠、乌木、沉香……更有不受刀斧、入水即沉的罕见子京木。堪叹几百年树龄的参天古木，被伐倒横七竖八躺满山坡，运不出山，也没打算运。那时决策取向是“备战备荒”，因经济封锁无法进口橡胶，于是重中之重是大干快上橡胶事业。木材却非战略物资，竟统统付之一炬。

犹记兵团发过事故通报——五指山另一侧邻师派出知青小分队勘察拓荒新址，在山中迷路，多日之后才从我们师地界走出来。有人得了森林脑膜炎，有人神经错乱，有一女知青葬身野山。我深知热带雨林的阴翳莽苍，连同它的神秘和美丽，都已刻凿进我脑质层的襞皱。其后我的小说《大林莽》正源于这段记忆。

我为这些知青的命运痛惜，亦为森林命运痛惜，更为那个年代的迷狂而嗟伤。我无意亵渎知青的青春热忱，在特定历史时段，我们的奉献都蒙上了一层悲壮色彩。然而，写小说时我还未预见其后沧桑之变。自打开国门到加入世贸，海南橡胶难与东南亚优质橡胶竞争，现在琼崖已基本不种胶产胶，据说种槟榔效益更高，而更长线而效益更丰厚的是种花梨木。曾覆盖五指山黎母山的热带雨林已萎缩至只剩下几块保护区。一代知青抛洒的血汗沉埋于斯，

注入橡胶树的年轮，如同岁月波纹一圈圈扩展，无声而且寂寞。

《大林莽》写到入山勘察小分队迷失于密林，在绝境与生死煎熬之际，他们渐悟时代悲剧和人生真义。最后仅得一女知青生还，此后她每年清明到山边种上四棵树。虽为象征寓意的文学描写，却是我缠绕心底的情结。后来移居美国，漂泊若干年后，我在华盛顿郊区安家，每年清明都在院子植下不同树种，丹枫、黑叶枫、紫李、雪樱、桃李苹果……算来已有十七棵。这既是缅怀，亦为忏悔。

华盛顿国家植物园在国会山之侧，此间有温度湿度调控的热带雨林馆。我不但常去，更引领来美旅游的兵团老知青前去，竟忘却人家要看的是国会山、白宫、林肯纪念堂、国家博物馆。而我每入植物园此馆，呼吸吐纳之间，当年林莽气息扑入胸腔，仿佛裹挟着我梦回五指山。蓦然回首，已阔别数十年矣。

我写的絮语，思绪并非连贯线性，好比山间急涧，林际流岚，都是一堆零散记忆，形同青春剥落的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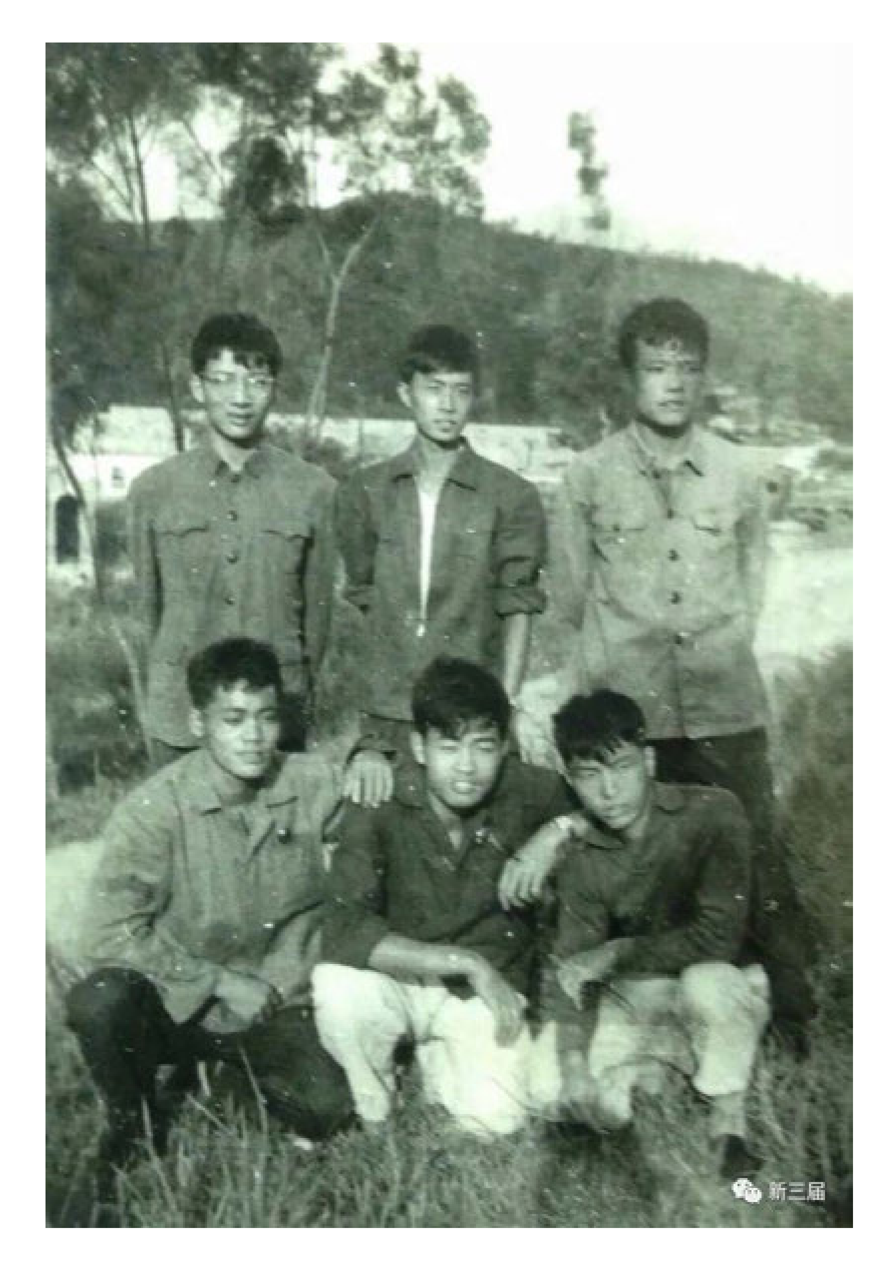
岁月与人

一个时代的面影，必得从生活中辨认。生活首先是人群，我就是从识人开始学会阅世。

我初到美国，面对全然陌生的社会一度茫然。普林斯顿大学有国际中心，帮助国际学生学者熟悉新环境，了解美国文化。当时普林斯顿教授、着名经济学家邹至庄的太太是国际中心主席，她安排我与一家美国人结为国际友好家庭，男主人是犹太裔，美丽优雅的女主人是法国人（后继任国际中心主席），他们也是跨国结合。这家人给了我很多帮助。还有几家美国邻居，都是我融入新生活的引导者。那时我已三十七岁，阅历非浅，哪似此前小少离家，远赴天涯，对人生认知几近白纸一张。

当年我们连队知青分别来自广州、长沙、潮汕。而农场第一代拓荒者，是来自豫西、苏北的退伍军人。他们是彭德怀当国防部长时的老兵，未赶上抗美援朝，复员却赶上大跃进，便分配到琼崖种橡胶。后又有一批复员军人安置到此，是林彪当国防部长时的兵，他们多来自雷州半岛。

知青正值青春期，荷尔蒙旺盛，加上地域不同，冲突难免。新老复员军人亦诸多摩擦。“林彪的兵”有的参加过秘密援越，有的参加过文革“军管”。但前辈“彭德怀的兵”已占据连长、指导员和排长这层位置，后来者顶多只是班长、班副。而他们当中好些人为北越防空和修桥筑路，到底上过战场，于是心底怨忿时时爆出火星。这不同群落的组合序列，形同现代编年表，记录着历史潮汐的涨落水文。但无论知青与老兵，其后都在严酷环境下融为命运共同体。



连队知青合照，后排左一是我

老连长为人憨厚，是“彭德怀的兵”，他只管埋头抓生产，不大懂政治，其实老兵大多如此。后来老知青回海南寻根，发来与农场老职工重聚的照片。我仔细辨读他们苍老的容颜，恍如检索逝去的日子。张张熟悉面孔绽开真诚笑纹，堪比山野每道沟壑，都见证着困厄中缔结的情谊，历半个世纪的热风豪雨而不曾消褪。

然而也有不愿回眸的影像。我委实憎厌连队指导员，他形同革命脸谱，严肃得近乎阴鸷。他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时刻搜寻阶级斗争蛛丝马迹，这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至尊使命。记得他一次半夜拉肚子，上过茅坑就敲钟紧急集合，只因发现有一角揩屁股的报纸上有毛主席头像。于是全连都在“面对面”和“背靠背”的揭发中折腾到天亮……我曾有刻薄之念，那纸片其实是他自己揩的，惊觉铸成大错，便抢先发难。我还记得，某次在被窝里看《烈火金刚》，被指导员发现。那年头历劫存留的小说极稀有，因知青们辗转传阅，加之纸质不好，已呈暗黄色。指导员当即没收此书，我辩称这是写抗日的。他说这本书那么黄，还不是黄色小说！我竟语塞。后来他不知听了谁进言，没有再追究“黄色”问题。我也不敢索还，毕竟文革前的小说亦为禁品。

总之在他治下，本连戴帽分子为各连之最。我因先去插队而后才来兵团，对此前阶级斗争史不甚知晓，眼见本连有三个斗争对像，一个是姓谢的广州知青，一个是汕头知青，首恶是下放改造的会计师。这名单还将延长，并成为我记忆中的暗黑符号。

却说知青和一梁姓复员军人较亲近，他是第二代老兵，服役于林彪时期。他是刺头人物，和处于青春反叛期的我正投契。别看他是农村兵，乒乓球却打得很漂亮，堪与城市知青抗衡。原来他当兵四年，一直在湖南益阳为马共广播电台站岗守卫，闲得发慌，便练成了这门功夫。那阵我们知青刚被文革巨澜冲刷到深山老林，“世界革命”情怀未释，却怎也想不到马共广播电台不在丛林里，竟在湖南罗霄山脉某个禁卫森严之处。



广州、长沙知青合影，右二是我

三山五岳的人物和四极八荒的故事，对我的心智成长留下浓重投影。其中一人在老兵和知青群落之外是个孤独异数，仿佛存留于断层的化石遗孑。我们称他老林头。他满头霜雪，总穿净色府绸衬衫，和那个环境和年代极不相称。他干活时脱下衬衫，里面是白色圆领衫，即便汗流浃背，但从未见过他的汗衫发黄和起霉点。只要一收工他便重新披挂起府绸衬衫，整整齐齐，连疏朗白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在深山襞皱那排茅舍，他看去就像外星人。

老林头在旧中国是化外琼崖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拥有英法承认的会计师证书，曾受聘于广州、香港和越南

（法国殖民地）等地。新中国启元，他作为留用人员在海口市农垦总局“内控”工作，但在海南他仍为这一行的泰山北斗。文革初起，老林头在劫难逃，斗个七荤八素，再发配到最偏远的深山监督劳动。他那些历史老账都是连队批斗会上翻炒冷饭我才得知，原来越南保大王朝曾聘他为宫廷作审计。日据时期保大王朝是“大东亚共荣圈”傀儡，老林头便不当牛鬼蛇神也难。

我到兵团时，老林头已是“老运动员”。我与他结下缘份，中介是另一个戴罪在身的谢姓知青。小谢出身广州三元里旧士绅世家，很有书香味，谙书法丹青。他之罪名好像是肇源于学毛着“天天读”时犯了什么错，被指导员揪住不放，细节记不清了，那都是我到此以前的事。小谢和老林头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我和小谢气味相投，又值求知欲旺盛的年华，老林头学识渊博，谈吐风趣，听他闲聊，很是受用。

回想起来，我总和被洪涛冲刷到死角的畸零者亲近，缘于自己对周围极具压迫感的氛围已生倦意，更隐然萌发叛逆苗芽。加之我虽为一介知青，却天然同情更弱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就是人性。只不过以我极浅的阅历，其实远未能探究老林头的心理幽微，他不是弱者，至少没有想象中那么弱。



连队仅存老屋，老知青返琼拍摄

知青另一身份即失学青年，如同身体处于发育期，求知欲更阴燃不熄。知青抱着半导体收音机贴耳偷听“敌台”，实为凿壁偷光之秘径。我自短波频率搜寻到新加坡电台，每周定期播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俨然消失梦境翩然返魂，听到配乐朗诵的鲁迅《在酒楼上》、茅盾《春蚕》、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萧红《小城三月》……竟在被窝里流下热泪。

我仅系初一生，小谢是高中生，学历相差几年，却是几级落差，足以让我视为亦师亦友。曾经沧海的老林头更不用说，他是故事匣子。旱季垦荒大会战，连队重新编班，我和老林头、小谢分在一起。我们神聊小圈子常把诸多戒律置诸脑后。但老林头言必规避现实，只讲自己读过的书、经历的事。他把广州称为省府，把学校称为学堂，都是旧称谓。老林头饱读闲书。他讲《西厢记》、《牡丹亭》还算是雅文学，讲《火烧红莲寺》和《九命沉冤》已是市井话本小说，他还说了许多“省府”西关巷陌的风土人情，少不了风花雪月。我们听得津津有味。

我对老林头一诉衷肠，说身处没有文学的年代，终日劳作之余，写点东西岂非一种活着的方式？我想搜集旧广州掌故，老林头闻言含笑不语。当我真的动作起来，老林头有问必答，令我获益匪浅。及至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文学》发表的小说《绝响》（后拍成同名电影）和《花城》发表的中篇《黑白之道》，都用上了这些素材。

然而孤悬边陲的海南兵团，岂能自外于时代？彼时漩涡之湍急凌厉，持续刷新革命高潮的标尺。“一打三反”运动骤起，老林头遭人揭发，罪名为精神腐蚀知识青年。我们三人小圈子一同落难，白天劳作依旧，晚上班排的小型批判揭发，直折腾至熄灯号。于是彻夜失眠，那种高压恐惧，不置身其中便无法想像。那年我十九岁。

说来我只是从犯，小谢已是记录不良的“病猫”，老林头更属死老虎，被揭发那点鸡零狗碎，根本算不上一碟菜。他早就申请退休，超龄多年，兵团不给他办，一是旧农垦总局遗留档案无暇处理，二是要留着他作斗争活靶。

孰知沉重磨盘也会碾压出另类智慧，久经历练的老林头早已成精，他授意小谢和我自我批判和抛一点揭发材料，兜出来的不在份量重，而要紧的是鲜货，莫搬出已见过光的旧杂碎，好让政工领导炒出色味香俱全的菜式，斗争方向明确了，运动目标完成了，革命战果赫赫，便可向上报捷。

于是我和小谢在上工时密议，千挑万拣，想出了老林头故事筐里关于“保大王妃”的段子。

果然，全连批斗会开得吼声震天。我发现，当人将自己与集体捆绑，是多么安全，甚至强化出某种力量，足以碾压一切逆集体意志的异己个体。在百多号人的吆喝之下，小谢和我嗫嚅交代思想根源，在于对封资修未能割舍的眷恋，然后把老林头“话本故事”某段发黄发皱的旧章回抛出来。老林的确讲过，他在越南时某次保大王室在剧场看戏，包下好几个包厢，他是聘来的会计师，也有礼遇。他旁边包厢坐的据说是最美王妃。老林整晚都无心舞台，只想看一眼王妃庐山真面目，却因包厢设计角度最终未遂，只看到王妃垂在护栏上的纤纤素手，如象牙雕刻般精致滑腻……

运动轨迹一如老林头所料，这个包袱抖开，成果一出斗争便胜利了。虽说我被打入另册，但在彼时只要不戴帽已属万幸。老林头罪名又添一筹，却无从追加惩罚。越南前朝往事毕竟离现实远了些，再上纲上线也是虚的。小谢也无大事，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也加不出几多斤两。

我最好的年华，就在如此时代氛围下度过。

历史的缝隙

其声隆隆的狂涛不期然拐进弯曲河床。1971年林彪夜奔，折戟沉沙，政治生态陡然一变。好比绷至疲劳极限的丝弦，遭意外拨弄而铮然崩断。连队“天天读”仍然每日如仪，但大家渐地无心向学，竟于“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嘻哈打闹。到底是年轻人，久被压抑的心性觅机释放，如同雨季茅寮滋生的草菇。班组会每有此状，惟独老林头端坐不动，时绽笑纹。

再后来“天天读”取消。团部广播站透过连队高音喇叭，开始播放一些聂耳、冼星海的解禁歌曲。那年春节团部还组织了文艺联欢会。恰巧指导员因此前抓阶级斗争成效卓着，被调任武装连。这个“斗争狂”一去，连队气氛更为松弛。



我在连队出墙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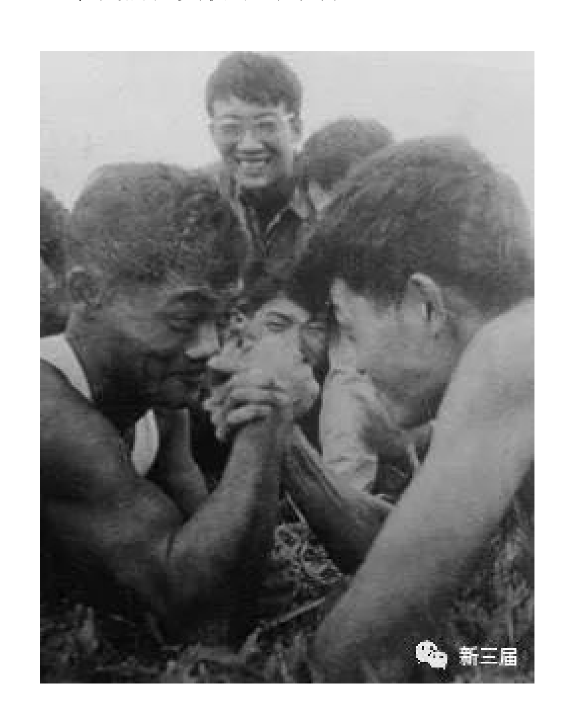
林彪事件只是一个历史错顿，却成了分水岭，对文革的厌倦和集体离弃，始于其时。我和小谢、老林头散而复合，出工收工又结伴同行，聊天更少忌惮。老林头提及上一轮批斗会，说早已心如止水，“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我不懂《华严悲智偈》这两句偈语，请老林头详解之余还琢磨半天。

至此，我方知老林头从未融入陌生时代，他可算真正“残渣余孽”。或许，起初他也曾想过投身新社会，终于做不到。老林头不是革命的敌人，但从来都不是它的朋友。我甚至觉得，他在深山老林劳动改造，仍固执既往的穿着和扮相，实为无言表达，以划清他与现实的距离和界限。回想起我参加过多次对老林头的批斗会，他那白发萧然的脑袋总耷拉着，曾令我恻然。其实他内心比别人更有尊严。

在这段历史间隙，我开始在油灯下写作，文字自是稚嫩之极，但这是一种活法。不管二十岁的我多么浅薄，层

林叠嶂阻拦不了思想翩然飞翔。对时代的叛逆成了自我救赎，大林莽依旧遮天蔽日，却再也吞噬不了我的灵魂。

同一历史间隙，另一年轻人拉响琴弦，创作出传遍大江南北的小提琴叙事曲《黎家节日》（当时曲名叫《黎家代表上北京》）。他是广州音专下乡知青何东，其青春辙印距我仅十公里。莽山野林不曾埋没他的才华，何东被上调海南民族歌舞团。那时半导体收音机开始播放文艺演出节目，我听到海南民族歌舞团黎苗风情《喜送粮》《开山歌》《竹竿舞》，尽管充斥政治羽鳞，却已装载着久违的文化符号。我最喜欢何东演奏的《黎家节日》，那是黯淡岁月稀有的美好记忆，一如逸出林莽烟岚的山歌，伴随猿啼鹿鸣，泉瀑喧响，直扑心扉。何东后来成为着名小提琴家，他八十年代初创作的《鹿回头传奇》，位列《梁祝》之后，成为中国三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我后与何东结为好友，那份琼崖情谊延续到迁居异国，至今我们在美仍不时聚首。



我在琼崖的岁月留痕

然而难得的宽松未能持续多久，钟摆又向更左一端摆荡。只不过，不懈的政治运动已失去引召力，曾摧枯拉朽的集体意志一旦松弛，便再也捏合不起来。

九一三事件后，兵团原农垦总局旧干部地位提升。于是老林头终于办成退休，要回海口市了。

那天我和小谢给老林头送行，一直送到琼中县城车站。我们连队距县城营根颇远，要走二十里山路。我在兵团那么多年，只徒步去过两次营根，一次是去县城电影院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另一次就是送别老林头。当日送别，看着他那头白发在车窗隐现，如芒草白羽飘舞，在红尘中远去，我顿生怅惘……

谁知指导员的命运却跌宕出戏剧性反高潮，他调去武装连任职，该连都是精壮勐男。指导员性格阴郁，身体不好，这或转化为他斗争别人的内驱力。他妻子是三个孩子的妈，出于饥渴，她频频勾引勐男于橡胶林野合，和她有

染的超过一个班！

那时革命意识疲软了，压抑的肉欲却又勃发起来。其实难说是哪方“饥渴”使然，那就是原始本能，好比野火烧荒后再度疯长的藤萝。事发后武装连多名战士受处分。指导员一气之下，卧病不起……不幸年代并未宽免任何人，其实他也很可怜。

回想很多女知青被性侵的斑驳旧事，不免转念，以那位大嫂与武装连男知青的年纪落差，不无性勒索嫌疑。更少人提及，知青也有性侵别人之事，何况被侵犯者根本不属于知青群落。

追溯既往岁月，我从无“苦难崇拜”情怀，亦从不觉得知青有超乎底层芸芸众生的优越感。人性暗翳一面，谁能免俗？以年轻为由去洗白自己，乃至把一代知青塑成殿堂群像，其实知青运动可以祭奠，不堪供奉，那只是特殊年代之产物，令这辈人的经历具有惊人相似性。及至天下回归常识，知青群落就迅速解体，如同北大荒雪甸消融和大林莽茅羽飞絮。

然而总有一些东西沉积下来，结成镶嵌记忆岩层的云母。

黎苗山民

终年烟岚缭绕的五指山，是我青春年轮色泽最深的纹路。连队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点缀于山间，这本来就是琼崖原住民生息之地。连结汉黎苗人的纽带是山间清溪，兵团连队和黎村苗寨都傍水。

我去最偏僻的连队看哥哥，要走十里路，趟过八道小河，其实就是山中盘折蜿蜒的同一条河。这于我亦是深意象，后来我写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就源于此。



旱季的小河，老知青返琼拍摄

少时“蕉风椰雨”之琼崖印象只是美丽误会，来到五指山只见蕉叶不见椰林。入山始知，此间槟榔树才是土着文化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更具观赏性，它挺拔而优雅，花序特别，如同黎家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槟榔树仅在有人烟处始能生长，常在林莽劳作的兵团知青，在烟雨瘴疠中迷途，都晓得高挑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标志。

五指山深处人烟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黎寨有八里山路，汉黎鸡犬之声既不相闻，更不相往来。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打篮球，回乡就把这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每次都被知青以强凌弱，比分几近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输了一球，黎族人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女知青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回望多年知青生涯，我们对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贡献太少，球场劣迹更形同欺诈，此为中原心态不自觉的延续。那时我欠缺史识，千年来中原文化对“九夷”有一种俯视心理。推己及人，类似行为曾在不同朝代都留下过创伤，只不过在历史叙事主流话语中被淡化和掩饰而已。

触动我民族情怀的是一次山中邂逅。那日我去别的连队探访广州知青，路过黎寨正遇那位黎家球友，他留我对酌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很郑重，主人拿出兽肉干，不多，应已倾其储蓄。酒足够，山兰土酿低度，可喝很多。主人说起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便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辈住的茅草船形屋，没有丝毫改变，军营的电灯和自来

水在这里就象神话……后来他双眼濡湿了。

走出黎寨，颇有后劲的山兰酒令我步履趔趄。一钩上弦月在槟榔树梢颠簸，宛如宝船夜航。那刻我第一次听到鼻箫，从犬吠虫鸣中传来。这是用鼻子吹奏的黎族乐器，其声呜咽委婉，如泣如诉……后来我从何东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听到似曾相识的旋律，始知它来自黎家古老的《罗哩调》。



黎寨船形茅寮

山里山外，文革犹狂澜迭起。然而那时我已窥知它的罩门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这又说到苗族。海南苗人历代苦难最深，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苗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更差。但苗人性格比黎胞更强悍，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连队最近的苗寨相隔七里，是我去边远连队探望哥哥必经之路。就我所见，苗人比黎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强壮些，女的漂亮得多；苗人卫生习惯也比黎寨要好。自然我的印象失之偏颇，只缘这个苗寨是被改造过的另类。

该苗寨叫烟园，如此汉化和诗意的名字未必是苗人想出来的。却也难说，毕竟此寨前代苗王读过书，颇重教育，寨中出过一个晚清秀才。烟园苗寨曾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模范典型。及至文革，没人再关心教育，便改为“学大寨”样板。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的样板已属万幸。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五指山中谁去刀耕火种，开垦的旱田就是谁的。苗人没有地主，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头人和峒主。在旧时代苗王亦非“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军阀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总之，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

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

烟园学大寨很滑稽。山中黎苗都不种菜不养猪，吃肉山中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更和土着山民沾不上边。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山地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别贬低黎苗人刀耕火种，兵团被要求学大寨，便在垦植橡胶之余，象征性种点山地旱稻，我们也是刀耕火种。只消放把火将杂草灌木烧光，再用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非“大寨精神”开花结果。

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烟园成了苗家学大寨样板，完全是工作组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在苗寨开垦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山中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



苗村烟园照片。老知青返琼拍摄

为何要给它“整容”呢？原来烟园是文革年代罕有的对外橱窗，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都是特殊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日本左翼人士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琼中山高林密，对外宾少见多怪，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筛选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在路边假装劳动，既为安全保卫，也为点缀升平。

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视

线。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他不便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非因他们作假，而是做假不够得力，就成了“政治事故”。

总之，我每次经过烟园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人造盆景。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更为憨直，作伪之事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要扛的，但我总别有感受在心头。

我终于见到苗人真正性格，是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某日，烟园一位苗家少女放学回寨，却遭到兵团战士袭击。这个被生理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人到了某年龄阶段，身体发育和时代压抑令他陷入漩涡。他瞄着这个漂亮苗女多有时日，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他慌张得未及侵犯就被人血吓怕了，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未几团部就被扛着火统和砍刀的苗人包围，领头的就是烟园苗寨支书。我赶去看热闹，苗人愤怒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这场“苗变”恐难善罢。

团政委是现役军官，他出面交涉，苗人根本不买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老场长出头，把五花大绑的强奸未遂犯推出来示众，然后与苗寨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

就在那次，我见识了苗民血性，以及他们对本寨支书如同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主河道轰隆奔涌，对我们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冲刷却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

岁月悠悠，琼崖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可曾出什么人物？我一直留意，记得八十年代初，黎族运动员吉泽标打破撑杆跳高全国纪录，又在1986年汉城亚运会摘下金牌。我闻之格外欣喜。值得自矜的是，我做了一件事，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方的岸》，改编自我的同名小说，我也是剧本作者之一。我让长影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黎族演员，导演在通什黎苗自治州歌舞团找到一位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只唱了一曲山歌，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位黎族影星，她就是谭小燕。未知这算不算是我对黎家的微薄回馈。

说来知青只是被台风刮到五指山的一把种籽，而黎胞苗胞是山的儿女。外来种籽在炎热冷土中抽芽，和大山有了亲缘。一切都将铭记脑际，宛如山的沟壑，树的年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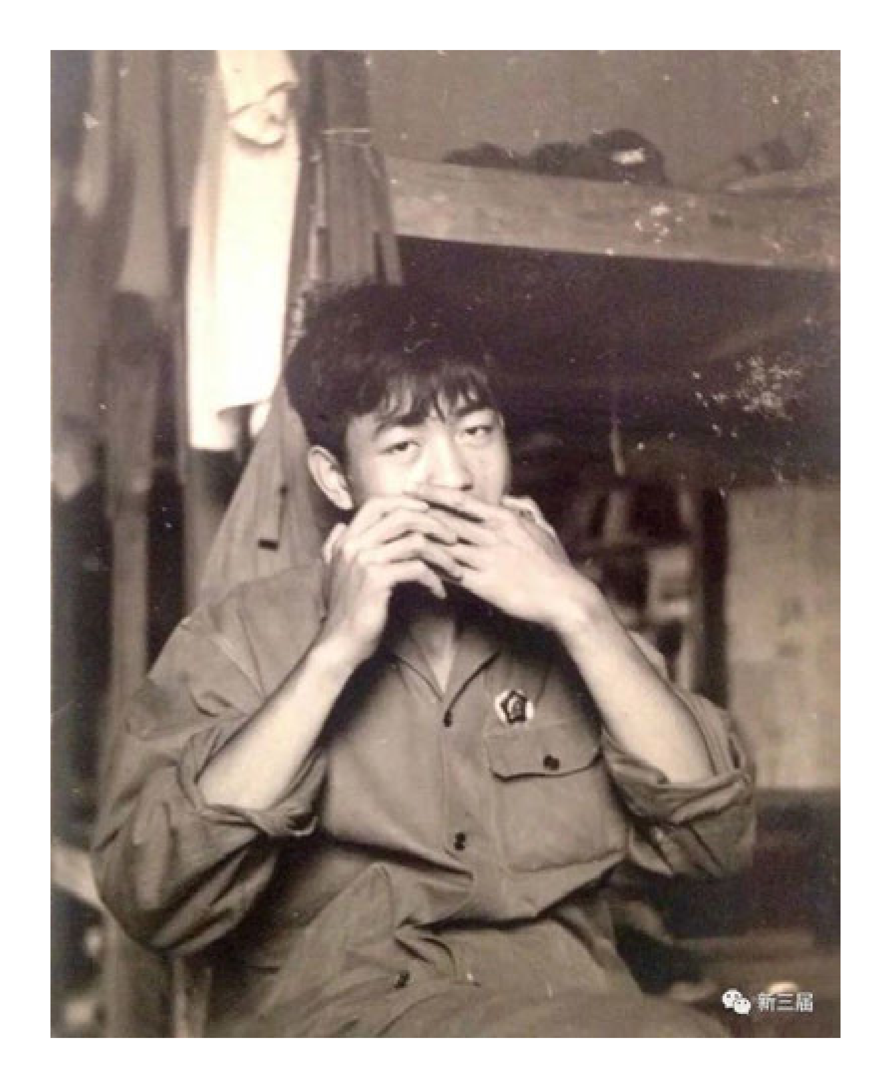
饥饿的青春

知青在禁欲年代的性意识萌动，我在《大林莽》、《在小河那边》都曾写过。但比起性苦闷，饥饿烙印更深。

在此对知青食谱略作钩沉——

兵团是准军事军垦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国家配给口粮，虽有定额，却基本管够，相较别处知青，或许已算幸运。然而油水严重匮乏，知青多在身体发育期，便吃多少都不觉饱，开荒大会战时粮食不再定量，我最高纪录一顿吃了两斤七两糙米饭，仍觉饥肠辘辘。

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溪河暴涨，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只能吃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就盐水下饭。每逢雨季，知青都患上“绿色饥饿症”。准军事建制之下，只有食堂而无小灶，知青惟有互借简陋煤油炉煮点野菜汤。



我哥哥同为兵团知青

至于吃肉，每年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是大日子。每片猪肉每滴肉汁进入食道，在肚腹蠕动的那种幸福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被激活的馋虫爬满全身，益发难受！

孰料其后连珍稀的幸福也遁去。原来连队猪圈由后勤班管，成果却不堪话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皆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果腹？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了。精瘦

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熘烟跑到山中觅食，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连队转悠，便自蹈死地！连部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着锄头砍刀铁壁合围，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胸间都翻腾吃肉狂想，口涎已注满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有几百斤力气，正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奔猪失蹄栽倒，便挣扎不起。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坚韧的猪肉，嚼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享受！

说来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养有几十头菜牛，却直属团部，只让我们连队派人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差事。晨早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艳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嵴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叠嶂，烟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放牧的一队流云……我在《南方的岸》里写过牧牛情景，前述的谭小燕正现身于电影中这一场景。

发现和感受美，是人与兽的重要区分。记得知青入山垦荒，露宿雨林深处，夜间山风骤起，浩大林涛充满听觉，遮天密林被摇开罅隙，一刹间见到墨蓝夜空的闪烁群星，竟如此繁密明灿。后来我在内华达山脉再次见到那般浩瀚的星河，为之心神飘荡。彼处海拔正与五指山相同。足见青春岁月存下的印象，将长久存留于脑质层的某道襞皱，挥之不去。

我没吃过团部分配给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在那个匮乏年代，团部拥有不容置疑的特权。

切莫低估了知青的吃肉渴念。插队知青或会偷鸡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着牛棚那堆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有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之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的吃肉欲望也不弱于我们。更兼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人皆曰杀。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煳答复。于是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就是梁姓复员兵，他入伍前在乡下宰过牛；我被分派打下手。老梁教导：屠牛有三法，最笨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更鲜美。

眼前这头蒙冤的母牛呆滞而立，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自知死期已至。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说那就一刀了结吧。他让我动手，余下技术含量高的解牛工夫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测量，手指点戳着说："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着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我到底肩负着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直捅进去。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竟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不是被我杀的，是被全连集体谋杀的！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屠牛也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牛心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精准。然而这庖丁已不能游刃有余，毕竟刀法生涩了。足足花了大半天才肢解与分类完毕，有的班排已收工，我们还在清理"凶案现场"。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幸福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一块内脏，我不记得是什么器官，反正是下杂。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这天连队食堂袅袅炊烟洋溢着魅惑意味，幸福感随着开饭钟声降临。我吃过这顿，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一排长和苗圃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破门而入，脸色沉鸷，话更难听。原来，据炊事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属上杂，不包括在屠牛者可拿走的下水里头。

老梁盛怒，矢言没有私割牛肝，还把锅中杂碎逐一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不为假象蒙蔽，他言之凿凿，指牛肝刀割痕迹犹在，而且牛肝只剩X瓣，而牛肝应该有X+1瓣云云。老梁闻言冷笑，说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X+1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外行话么？

至今已忘却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只记得他挤兑得指导员悻悻而退，之后几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畅快。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汹涌，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下水便暴起告发，这里头并无几多政治，只是被久旷"肉欲"所折磨的变态想象。



兵团岁月，右二是我

往事已矣，如同空山足音，林莽雨滴，都成了青春注脚，留下的印记却如橡胶树一圈圈割胶刀痕。迄今我拒吃两样东西，牛杂和萝卜干。前者是受辱后遗症，后者是漫长雨季的味蕾记忆。但左半脑中存有两个感应区，就是对大山和森林特别亲近，宛如感情原乡。

悠远的回音

光阴流转，知青垦殖的橡胶林已悄然舒展出五十圈年轮，那代人已渐老去，只有青春记忆历久弥新。

算来我去国已近三十年，在那片炎热冷土生长出来的情感，如小河淌水，喧响不息。几年前，我哥哥回五指山寻踪旧梦，拍了一组农场照片。他说连队侧畔那道小河已不时枯涸。我实难想象郁郁苍苍的五指山深处，山涧竟会涓滴不存！于是睹景追昔，思绪如台风雨季的迅勐山洪，直泻小河故道……闻说尚存几处热带雨林保护区，已成“驴友”露营登山热点。我从某驴友博客看到，他负囊入山只缘年轻时读过《大林莽》。然而小说中只有兽踪而无人迹的鸿蒙未开的森林，已不复见。

我无意陷于“怨悔”有无的纠缠，放到广角历史维度，很容易判断那是什么年代，它的阴影却笼罩着这辈人最

好的年华。正是怨悔与叛逆，让我挣脱藤萝之网，走出无边瘴疠，重新勘定人生意义的座标。



两兄弟在五指山中

我曾在《大林莽》引用过黎族民间故事“鹿回头传奇”——很久以前，有个黎家猎手在山中遇到一只金色坡鹿。他持弩箭穷追不舍，跨过崇山，穿过林莽；这一路他已为坡鹿的美丽而着迷，再也射不出箭了；他一直追随到天涯海角，坡鹿一回头，变成天仙般的少女；猎手丢弃弓弩，拿出鼻箫，和姑娘恋歌和鸣……

十七岁的我就是那猎手，被虚幻目标召唤和驱策。大林莽就是真实世界，让我在迷茫混沌中学会辨别美丑善恶。我失去了很多，有的值得珍惜，有的不堪怀恋。所有这些都沉埋于那片炎热的冷土，如同树脂渐渐凝固成时光琥珀。

我写此文时，窗外庭院树木正摇曳出新绿，春天交配的北美红雀比翼而来，振翅而起，点缀着我一去不返的青春故事。轻风撩起窗帘，我听到了花开的声音。

（原载《北京文学》2018年8期；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难忘山村那盏灯

1972年冬天，一个多雪的冬天。

我们一个大队原先30多位知青，在前几批招工中走的差不多了，只剩下我和邻队的大曹，小潘因家庭出身不好，成了没人要的“豆腐渣”。三个人没有回城过年，挤在我那间四处透风的茅屋里，吃了一顿“惨淡”的年饭。正月初六，就往青弋江上游大切岭引水工地赶，在那儿不仅工分高，而且是集体生活，自己不用烧三顿饭。

那天上午我们挑着铺盖，一袋米、一罐咸菜就上路，百十里路程，工程会战指挥部要求我们第一批民工必须在初七上午赶到，参加会战开工典礼。

傍晚从马头林场摆渡过江，经当地人指点，翻山抄小路走。不料，半途中竟迷了路，越走越远，天又飘起雪花来，一会儿我们的头发和上衣便淋湿了，天色渐黑，脚下是一条羊肠小道，四周没有人家，看不见一星灯火，一缕炊烟，我们又饥又乏，只得继续往前走。翻过一座山，眼前陡地闪现几点灯火，一阵犬吠，前面果然是一个村庄，我们欢呼起来。这是一个只有1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山林寂静,随着犬吠，一户户人家打开门， 惊悚地望着我们三个陌生人。一问才知，我们走错了方向，要朝西南拐才能上大道。眼下首先要解决的是“肚子”问题，在这陌生的山村，该找谁？在当时广大知青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是知青来了，不论是否认识，都要招待一顿饭。但是这个僻远的小山村会有知青吗？于是不存希望地向村里人打听，他们说：“有，还剩一个，”我们放心了，立刻就有几个年轻人为我们引路去寻那位知青。 这是村后紧挨着牛栏的茅棚，没有土墙，仅以玉米秸糊泥搭成的“墙体”，几棵杉木撑起一个茅草屋顶，门也是毛竹编的。我轻轻地叩门，屋里传出一个女人警觉的声音：“谁？”，我大声说：“我们是迷了路的知青，”一阵沉默，接着几束微弱的灯光从墙缝隙透泄出来，挪动沉重物体的声音，门终于打开了，站着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比我们年长的女知青！她手中举着一盏小马灯，她睡意惺忪，表情惊恐。在灯光下可见，她有一张秀气的脸蛋儿，一双乌黑的眸子流露着忧郁，她蓄着短发，体态丰满，棉袄外是一件湖蓝色的罩衫，这是一位气质高雅的女知青。 我们自报了家门,她也作了自我介绍，原来还是老乡，她姓黄，67届高中生，她的母校与我们学校相邻，陌生的我们立刻有了一种亲近感。她请我们进屋，让我们脱下淋湿的上衣，立即在土灶上为我们煮饭、烧水、烘衣衫。我打量这间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茅屋，只有一床一柜一凳， 床头放着一

摞书， 还有一本《外国民歌200首》。

灶膛吐出的火舌映红了她那张秀气的脸，兴许是我们的来临，她那双忧愁的眸子扑闪着一种“风雨故人来”的欣喜。一刻，大米饭的香味从灶上飘来，下饭的菜是一大碗蒸鸡蛋和一碗炒咸菜，这时一位大娘又送来一碗家制的霉豆腐。饥肠辘辘的我们，毫不客气狼吞虎咽起来,将饭菜吃得尽光，连锅底焦黄的锅巴也铲起来吃了。

她象一位慈爱的亲姐姐，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满意地笑了。接着，她又烧了一大锅烧水，让我们烫脚，走了一天的路，而且还要继续赶路，我们不知如何感激她才好，这是一种只能从母亲那儿能获得的温暖。

那位送菜的大娘在一旁抹着眼泪:“伢们造孽，饥一餐饱一顿，深更半夜还要赶路，叫爹娘怎么放心？” 就着跳跃的灯火，我们叙述起各自的遭遇来，原来，这位大姐和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1968年冬，她和同班的三位女生被安置到这个偏僻的山村插队，前年两个招工回城，另一个因心脏病费了不少周折，办理病退回了城，只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她父亲是师范学院的教授，因为历史问题在文革中批斗受尽折磨，在“牛棚”里自杀了，她因为家庭问题，历次招工都没她的份，因为心情不好，没有回家过春节。除了白天出工，晚上就守着这茅棚，用那只沉重的旧木柜抵住门，一早一晚担惊受怕。

她凄楚地说:“一看到你们，我就想到远在广德插队的弟弟”，“看不到希望在哪儿，也许我要在这小山村呆一辈子。”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她告诉我们只有读书，才给她乐趣，使她眼前豁亮。她拿出从家里带来的一本本书：《红与黑》、《傲慢与偏见》、《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简直是一堆瑰宝，使我们的眼睛闪闪发亮。

她另一个乐趣便是唱歌,尤其是风格沉郁的俄罗斯民歌,在我们的央求下,她唱了《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一直通向遥远的前方/我要沿着这条崎岖的小路/跟随爱人去远航......”她的歌声甜润而悲伤，柔弱处象风中的芦苇，舒展处象林中飘落的树叶，奔放处象阳光下流淌的江河水......

她柔美的歌声，高雅的气质与这简陋的茅棚、偏僻的山村极不和谐，我心中涌起一种社会弃儿般的屈辱和悲凉，为她的身世，为她没有爱情，没有欢乐的现状，和她和我们一样的命运。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必须在天明时赶到大切岭工地。我们向她告辞，她不容我们说感谢的话，“我们都是知青，这就够了！”

雪已停了，泥泞的山路一步一滑，她举着小马灯在前面引路，一直把我们送到分叉的路口。当我们挑起担子，向她挥手呼喊道：“再见了，大姐！”她竟放声大哭起来，小马灯在她手中颤悠悠地抖动，从不落泪的我们也掩面相泣。我们走了很远，回头一看那盏小马灯的灯光依旧微弱可见。

20多年过去，我心中难以忘怀这盏山村的小马灯。

素昧平生的大姐，现在你在哪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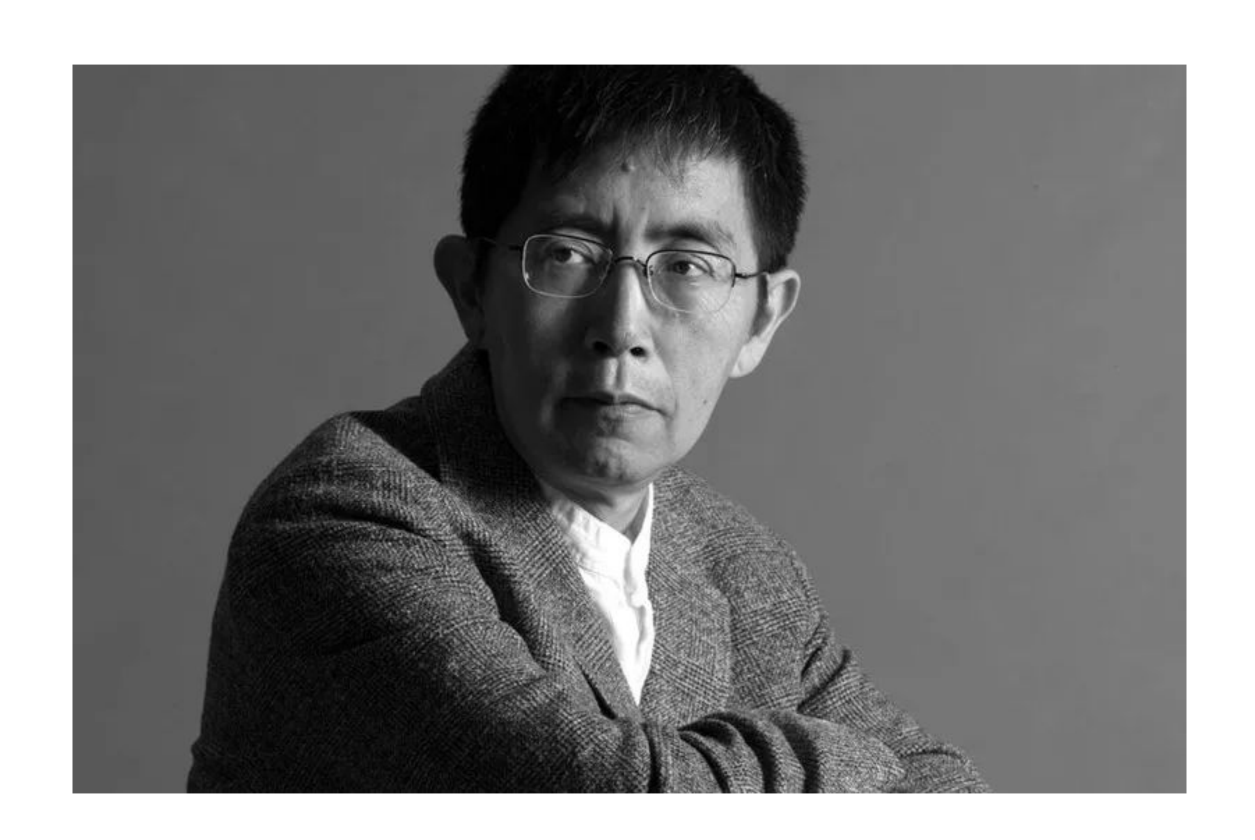
我想你现一定有了理想的工作，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孩子。

你还记得那个冬夜,在那寂静的小山村,我们这三个匆匆的“过客”？

刘晓航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50

北岛：大串联

来源公众号“老知青家园 ”



北岛

大串联

作者：北岛

1966年9月中旬，我们六个同班同学——张潜、潘宗福、杨晓云、张友筑、徐金波和我，踏上南行列车。

从8月18日起，毛主席在天安门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引发“文革”新的高潮——大串联。中共中央文件指示，支持全国各地学生到北京，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交流革命经验，交通及生活补贴由国家支付。于是全国火车及公共交通对大中学生全部免费，各地还纷纷成立接待站，管吃管住。最初那是老红卫兵的特权，外出要政审（家庭出身），但有毛主席推波助澜，闸门一下打开了。

徐金波搞来一张某红卫兵组织的空白介绍信，召集我们几个平民子弟，填上名字——用白纸证明自己清白。我们持介绍信到东单铁路局售票处排队，领来六张免费火车票。

这是我头一次离开父母出门远行。行李简单，除了塞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书包，再就是装四卷《毛选》的小木箱——我自己动手做的，上面用红漆写着“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我们在宝鸡转车。夜里很冷，火车头哧哧喷着浓烟，遮暗站台的灯光。到成都已是后半夜了。扑面而来的是南方湿润温柔的空气，缓缓流动，带有火车行进的震颤感。在车站广场的红卫兵接待处，我们被分到成都十四中。听说我们来自北京，负责接待的师生格外热情，特地准备了消夜——炒笋丝外加大桶米饭。男女分睡不同教室，打地铺，课桌椅堆在一边。我们很兴奋，窃窃私语，直到有人抗议才噤声，倒头昏睡过去。

第二天上午到四川省委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直指西南地区第一把手李井泉。我们还保留学生的习惯：边看边抄。大字报透露了各种惊人内幕。比如，在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死数百万人。而李井泉的名言几乎家喻户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还有那些腐败案例，就像色情小说让人脸热心跳。

离成都百余里的大邑县安仁古镇，因刘文彩地主庄园和“收租院”而闻名，成了大串联的热点。1965年，四川美院雕塑系师生和当地艺人一起，创作了大型泥塑群“收租院”，轰动全国，并在北京美术馆展出，每个学校都组织师生参观。老师还让我们写了观后感。

安仁古镇有不少深宅大院，刘文彩庄园只是其中一个。我们在人流中挣扎，身不由己，无落脚之处。日影西斜，人渐稀疏，忽闻异香，路边有人架油锅炸子鸭，每只一毛五。于是各买一只，放进随身装馒头的塑料袋，啃得仔细，只剩下鸭架碎骨头。回长途车站的路上，我和潘宗福用馒头蘸油汁咂巴滋味，赞不绝口，极尽天下最高级形容词：“真他妈香！”即便是瘟鸭，也足以让我们一路乃至一生回味无穷。

张友筑是我们班篮球中锋，人高马大，一说起他家烙的芝麻酱糖饼就眉飞色舞。我给他起了个外号“芝麻酱糖饼”。可他一到成都拉肚子，卧床不起，只好中途退场返回北京。我把他外号改成“阿痢痢”，除了声音效果，更透着带异国情调的亲昵。

到重庆，我们住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离烈士陵园很近，步行可及。这里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大本营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我们是读《红岩》长大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而歌乐山古木参天，云雾飘荡，有如仙境一般。

二

重庆朝天门码头。鸣笛三声，客轮解缆起航，甲板震颤。我们住三等舱，上下共六个铺位。由于船票紧张，两人一床，即使如此，比坐火车舒服多了——平稳无声，空气新鲜。

在甲板上眺望峭壁，不禁想起课本中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猿是早就绝迹了，而舟因超载随时有倾覆之危。除了播放语录和革命歌曲，各舱房小喇叭反复提醒大家，不要集中在船舷一侧赏景。过三峡正是半夜，我们沉沉睡去，那美景未在梦中留下任何痕迹。

同舱有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一男三女，男的叫徐荣正，外号“老pia”，字不可考，估摸与他骨质增生的下颌（学名“巨颌

症”）有关。我猜是指摔了个大马趴：从pia到pia，头一个象声词，后一个象形词。还有三个厦门集美水产学校的男生，其中有个翁其慧，憨厚寡言，但跟我很合得来。

船上三日，我们三拨人混得厮熟，决定结伴而行。老pia精明强干，先人后己，自然成了首领。他摊开地图，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在武汉登陆，休整几日，经株洲去韶山，再杀向广州。

我们住在汉口一所中学。我去看望大舅。他黄埔出身，后上金陵大学，七七事变后到湖北打游击，任应城县县长兼游击大队司令。“文革”爆发时他是武汉市副市长，由于是民主人士，本无实权，在头一波大浪中幸存下来。

大舅家在天津路一栋小楼，有门卫站岗。客厅宽敞明亮。我生怕陷进那庞大的沙发中，仅坐一角，兔子般警觉。房门开关，表哥表姐进进出出，似乎在等待着最尊贵的客人——暴风雨。平日健谈的大舅神不守舍，笑声空洞，随烟雾飘散在天花板上。只有大舅妈嘘寒问暖，为我做了一大碗热汤面。我虽年幼，但自知多余，喝完热汤面便告辞了。

从武汉到株洲，客车已满，只能搭乘闷罐车。车厢摇摇晃晃，走走停停，从缝隙中隐现外部风景。最麻烦的是上厕所，停车时不敢走远，男女分左右下车，就地解决。列车行进中，男的憋不住转身就尿，女的则用毯子互相遮挡。那气味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到株洲，换卡车去韶山。一路都是举红旗的长途队伍，有的走了一个多月了。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一见我们来了精神，唱歌背语录。

朝圣之旅的终点，只不过几间空荡荡的砖瓦房，周围是半秃的山坡。这就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我从小木箱取出四卷《毛选》，和同伴一起在故居前举行宣誓仪式，举起右臂：把革命进行到底。

三

火车一路向南，气温骤升，车厢燥热难忍，大家纷纷脱掉外衣，最后男生索性光膀子，女生只剩下贴身小褂。

半夜到广州。到处是摇曳的棕榈树，蒲扇般的硕叶裹挟着湿热的风。我们被分到华南农学院。大家冲向水龙头，只穿裤衩，冲洗得痛快淋漓。

我大姨在广州，她和大姨父都是中学老师。他们多少都受到了冲击，但和内地相比处境还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的开放程度远远超过内陆。我们参观了黄花岗、越秀公园、白云山和广交会——对我们来说，大串联正发生微妙的变化：以革命的名义云游四方。

老pia随身带着一台基辅135照相机，为我们留下难忘的瞬间。我手上有几张集体合影。取景框切割场景，摒弃喧哗，让动感世界变成模糊影像。而我们表情僵硬，目光呆滞，有点儿像兵马俑，似乎在等待被某一隐秘的声音唤醒。

广州是另一个世界。对我们北方人来说，那热带风情充满异国情调，甚至就是异国——连语言都不通。半路找厕所，人家根本听不懂，急中生智，用笔写下来才行。更甭提街头那些女孩子了，她们风情万种，即使穿绿军装蓝外套，也会露出藕红杏黄的内衣一角。

四

最后一站上海，住国棉十一厂。我八岁曾随母亲来上海看外公，在同伴中难免透着饱经世故的矜持。是夜，我带队去外滩，展示黄浦江的巨轮和十里洋楼，好像那是我们家产业。在令人晕眩的夜景背后，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弄堂上空晾满花花绿绿的衣衫，好像万国旗；公共汽车转弯到站时，售票员探头窗外，大声吆喝，用木板把车帮敲得山响；到处是举小旗的老人，与其说是维持治安，不如说是为了证明自己健在；一天，我们早起排队领火车票，只见在清晨微光中，家家户户在门前刷马桶，如同某种庄重的晨祷仪式。

我到瑞金路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二姨。到处贴满大字报，医院仍在正常运转。在护理部找到二姨。她作为护理部主任正忙着为护士排班调配。待消停下来已是中午，她带我到附近一家餐厅吃午饭。

餐厅人很少。二姨特地点了鱼和肉，为我补充营养。我们相对而坐，阳光斜照在餐桌上。我说起一路见闻，二姨听着，偶尔插话问问，目光茫然，却说了些鼓励的官话。那竟是我们最后一面——两年后，她在审查中被迫害致死，家属连尸体都没见到就火化了。

那是个寂静的中午，挂钟在墙上嘀嗒走动。脖上奇痒，我顺手一摸，竟是个虱子。大串联中大家管虱子叫“革命虫”，它们生命力极强，药喷火烤水烫冰冻都没用，坚持跟人一起走遍天涯海角。

我捏住虱子，放在桌下，用指甲“咔”地掐死。二姨显然没注意到，否则大惊小怪，非把我拉回医院彻底消毒不可。那声音微小但清脆，若通过扩音器和高音喇叭放大，必有如一声惊雷。

五

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状的一千多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安亭站受阻后Wogui，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二十多小时。这就是着名的“安亭事件”。

恰好就在第二天，我们持回京车票来到上海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候车厅和站台挤得水泄不通，连铁轨上都坐满了人，喧嚣和浑浊的空气如浓雾遮天盖地。

我们从早上等到下午，一筹莫展，断定不可能有任何火车进出。在老pia领导下，我们决定立即行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应运而生。首先由老pia出面，与另一些北京的大中学生协商，纠察队迅速发展成好几十号人；进而开始与上海铁路局造反派组织谈判。

老pia给我布置了任务，即与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的官员沟通。从大字报上早就知道那些名字，什么陈丕显、曹荻秋。以纠察队的名义，我霸占了调度室一部电话机，先通过查号台得到上海市委总机的号码，转拨到曹荻秋办公室，没人接。我又接通华东局陈丕显办公室，终于有人拿起听筒，自称秘书，我先声夺人，坚持要跟他本人讲话。对方不知道“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的来头，穷于应付。我大发雷霆，让他告诉陈丕显，要这位华东局第一书记对上海站的空前混乱负责。秘书唯唯诺诺，答应转达。

由于“中央WG小组”的介入，“安亭事件”的危机过去了。“纠察队”连夜清理车站，赶走坐在铁轨上的人，并把住每节车厢的门，验票上车。我们嗓子喊哑了，仗人多势众，制伏了某些捣乱分子。第二天上午，开往北京的头班火车终于缓缓启动。我们捷足先登，关上车窗车门，“上海站特别纠察队”结束了为时不到两天的历史使命。

车厢严重超载：每节车厢限额一百零八人，实际上却是三倍多。人们在行李架、椅背和地上坐卧，厕所也挤得满满了，根本无法使

用。列车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大家轮流下车找食饮水如厕。往往无预先鸣笛警告，突然启动，车下的人紧追慢赶，从窗口爬进来，而动作慢的则永远被抛在后面。

我的“座位”在椅背上，实在熬不住，就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间睡去，居然借此在梦中保持住平衡。我做了一个回家的梦，又做了一个离家出走的梦。

三天三夜。火车驶进北京。

本文选自“北岛集”之《城门开》，北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7月第1版 文章来源：私人史

感恩与歉意不说就会后悔

——《我的北大荒》之六

城市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上如何评价，对于个人的成长来说，这种经历都是不应全盘否定的，因为它是个人史的重要部分。对于我们，在离开北大荒多年以后重返那里，大家不约而同的心意是感谢，是歉意，是说出来而不是忽略在心的某个角落。

回到连队的北京知青共10位，6女4男，是在我们的新浪博客“荒友爱屋”里发起组织的。陪同我们的几位都是出生在八五二的第二代北大荒人，其中的小邢是老连长的儿子，农场教育科科长。听说老连长夫妇就安葬在不远的林子里，那就去拜谒他们吧。老连长，1956年集体转业的铁道兵，山东人，平时不苟言笑，天生就带威相。连里开会，他很少有长篇大论，队列训话，短短几句，言简意赅，一二三四五，就把任务分配到位。他的妻子江大姐是连里为数很少的家属女党员，在山东老家早早就入了。二人特别有夫妻相，秉性也一样，没有过分的热情，也不善于辞令，忠厚、正直、善良、实在，让人肃然起敬。小雨无声地飘洒在我们身上，北大荒的土地还是老样子，吸饱了雨水，就让你寸步难行。我们无法接近墓地，只好站在大路旁遥望。我们的战友李保成代表大家向邢连长致辞。他刚说了一句“邢连长、江大姐，我们来看你们了”，便突然哽咽，泣不成声。这个曾经的连队副指导员、如今北京某单位的老总，突然回到了从前，成了那个单纯、诚实的阳光男孩。我们都知道，他为什么边哭边诉。大家都悄然落泪，为了自己的青春时代，为了曾经得到的全部关爱与呵护，为了远离后我们集体的冷漠与麻木……

这个场面让小邢感到震惊，后来他几次表示，没有想到父母能留在知青们的心中，没有想到知青对老一辈北大荒人怀有如此深刻的感情。小邢比他的双亲更善于表达，他说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因为你们把知识给了我们，把城市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给了我们，使我们从小就有了榜样，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动力。小邢身材魁梧，集中了父母相貌的特点，浓眉大眼，目光炯炯，言谈举止自有风范。

后来，李保成在博客里写道：“想当初我们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来到几千里之外的北大荒，父母够不上、管不了，就是连队的领导、老职工们呵护着我们，关心着我们的成长。如今我们快到花甲之年了，是应该报答、谢恩的时候了，可惜很多老人已经故去，不给我们这个机会了。所以，当我们遥拜邢连长、江大姐的墓地时，只有失声

痛哭。……他们带着思念，怀着亲情走了，我在心里恨自己没有在他们有病的时候，尽一尽孝心，恨自己没能早几年回来看望这些亲人。我发誓，请你们的在天之灵相信，你们的高风亮节，我将永远铭记在心。”逝者不会听到我们的感谢和抱歉了，但一定要让生者听到。

我的学姐邢淑燕，是在北大荒与我睡在一条大炕上的66届高中生。她到连队不久，就被分配到机务排当农具手，机组的车长闫振营是山东支边青年，对分配来的知青既是师傅又是兄长，处处给予呵护。邢淑燕在852农场没有见到老车长，一打听才知道他已全家回了山东老家。邢淑燕在博客里写道：“回想当年来到北大荒，我在农工排只干了三个月，就被调到机务排426车组，在闫师傅手下干了三年。他手把手地教我学技术，关心我，爱护我。遇到重活、脏活、难活，他都是干在前面。忘不了，人工割大豆，老车长看我跟不上，总是默默地一段一段代我割；忘不了，夏日夜间犁地，老车长总是自己开车，照顾我坐在副座上打磕睡；忘不了，拖拉机误车时，老车长总是第一个跳到淤泥中摘钩……他虽然话不多，但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能拿出办法来，跟他干活心里特别踏实。他，可以说是山东支边青年的杰出代表。我们连里的山东支边青年虽然只年长我们八、九岁，却处处像兄长一样，精心地呵护着我们。年轻时不懂表达，连一个谢字也不曾说过。转眼间近四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去看望过他。当年经常与我一同出车的老职工张继茂已经去世了，于是我就想，我一定要把我的敬佩、感激之情表达出来，不能留下终生的遗憾。”于是，邢淑燕从北大荒回来不久，专程去了山东招远看望回乡的老车长，她终于当面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感激。

在分场，意外看到了当年我招收的最小学生车海燕，长发过腰的海燕身材高挑，五官秀丽，小酒涡和笑容一起闪烁，她说我的名字还是冯老师起的呢。还有马德花，当年热情、爱说话的胖娃娃变成一个娇小消瘦、说话有些拘谨的中年妇女。长大后的马德花也成了老师，做了20多年，由于教育资源整合分场不再办学校，被“一刀切”下了岗，现在跟丈夫一起种地。彼此陌生的师生面对面，我说，马德花，我是你小学一年级的老师啊。马德花立刻拉住我的手说：“冯老师，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你，老跟在你后面啊。那时你特别瘦。”我也看见了六年级的卢则广同学，他远远走来，没到跟前，就叫我冯老师，我说，真对不起，虽然我当过你的老师，可什么有用的知识也没有教给过你们。是的，对不起，马德花、车海燕、卢则广，在我短暂的教师生涯里，我只是一个和你们玩的大姐姐，没有教给你们什么知识，真的很抱歉啊。

在风风雨雨的来路上，到过北大荒的知青有谁未曾接受过老一辈的帮助和恩惠？小到给你磨快一把镰刀，大到帮你修正生活的方向。年轻时欲望多跑得快，对身边的援手可能不察，对得到的呵护可能忽略，血气方刚的心虽然脆弱却不柔软。当我们有了足够的阅历，回望遥远的北大荒时，蓦然发现青涩的自己，汲取了北大荒丰厚的营养才有了今天。那样充沛的阳光、那样洁净的雨水、那样淳朴的笑脸，再到哪里去找？

冯敬兰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53

反思我的上山下乡

从17岁（1967年）报名到内蒙草原插队至现在，不知不觉已经44年了。在草原生活度过的11个年头的青春岁月，给我带来的到底是什么？年华老去时，我感觉有用心玩味的必要了。

勇敢与柔弱心态的交织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陆续听到了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这些叫我心动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学生而毕业后热情奔向乡村务农的人。当从电台、报纸得到这些消息，我热血沸腾了。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我对大队辅导员张老师冲口说了一句：“中学毕业后，我要去农村，扎根一辈子！”

张老师娟秀的脸庞，掠过一丝惊异，她平静下来，赞许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心眼儿……”是的，我不是说着玩的，我准备着……

文革爆发了，革命潮流滚滚向前。自己由于出身“反动”而被列为“黑五类”，过去的“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员”之荣誉，统统化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之嘲讽，我一时不知所措。

在文革期间，学校组织我们到农村（北京顺义）帮助夏收。我很喜欢到农村去干活。我不知道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是个什么滋味；但在其间短短几个星期的劳动，使我收获颇丰，心情舒畅。农民们不叫我“黑五类”——相反，他们对我的劳动劲头颇为欣赏，还特意颁给了我一张奖状。一位大嫂认真说道：“喜欢在咱村干活，就留下吧，以后给你说上个媳妇！”

劳动的愉快，朴实的农民对我的友好，让我对农村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感觉。同学们都走了，我还留下来干了一个星期。话说回来，农村体力劳动对于我这样一个才15岁的城市孩子来说，毕竟有些沉重。在与老农田头情话时，我的心思时而飞向了轻松舒适的城里，恍惚徜徉在四合院中，坐在阳光明媚的北窗前……

一年后，我听说北京有中学生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奔向内蒙等地，心情为之一振。我又听说，内蒙锡林郭勒地处边远，芳草连天，是为牧区，寒天冷冻，那里的牧民大都不会汉话时，更加振奋——既要在寒风中牧羊，又要多

学一门语言，对我来说，太刺激了。另外，我知道，我这一决定，最是证明自己的好时刻：我要让那些说我是“狗崽子”的人们看一看——谁才是革命者的真货色！

我四处打探、八方询问，终于通过市、区政府找到了西城区报名下乡的部门，当下填了表。办事人说：“这栏必须有家长签字同意。”我跑回家，站在母亲面前：“妈，西城区有一批各校的同学跟我一样，见报上登了十名革命小将下乡的消息，都报名了，有四中、十三中的，还有我们学校的哪！这批是去内蒙古牧区，我要一辈子扎根在边疆农村。妈，你在这里签个字吧。”母亲望着她抚育了十七年的儿子，个子不高，又瘦，心痛地说：“妈不反对你扎根农村。可你在大串联后，一瘸一拐回到家，得了关节炎；你可以选气候暖合一点儿的地方去，以后机会还多得很。牧区会加重你的关节炎的！”她的反复劝说，叫我心里嘀咕起来。是啊，万一我的关节炎抵挡不住严酷的寒风暴雪……母亲看出了我的动摇意态，说：“你不必担心，我和你一起到学校和领导谈谈……”

张校长在校长室客气地接见了母亲。我站在操场上，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我心里清楚，如果校领导接受了母亲的请求，再来劝说我，那么，我等待的将是——众人的嘲笑。不过……正在胡思乱想之际——

母亲笑吟吟地和校长一起走出来了。她对我说：“想通了。妈支持你去内蒙！”张校长和我简短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你的关节炎如果不十分重，可以考虑去草原。现在你报名去内蒙的消息，已传遍全校，如果临时退却，对你的面子不好看，对于激励广大学生奔向农村广阔天地，也不大有利。你是勇敢的，一直非常优秀，相信你能够在内蒙保护好自己，治好关节炎，成为草原上的一只雄鹰。如果你的关节炎实在严重……

我抬起了头——面子，勇敢！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惟有牺牲多壮志”！“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活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牺牲自己，是光荣的，也是浪漫的！我点头，坚决地说：“谢谢校长的鼓励，我的关节炎并不重。我去内蒙，定了！”校长点着头，他经过了文革的严酷冲击，是个好人。母亲站在一边，那坚强爽朗的表情里，应是五味杂陈吧——她老人家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在红卫兵的皮鞭下硬是死里逃生；何况，她年轻时也是从富裕人家勇敢地闯出来，扔掉裹脚布，走向社会的一位女大学生——她的经历，使得她有理由相信自己儿子的意志和能力！我那自己那种总想闯一闯的性格气质，大概就是由她传给的吧？

去其它暖和地方插队？不够寒冷，不够劲！若是去这样的地方插队，革命性就大大降低了！我携上母亲亲手为我准备好的背包，象出生的牛犊，下山的幼虎，跃跃欲试。母亲老泪纵横，追着说：“孩子，你一定要常来信啊，需要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啊••••••”

奔赴去内蒙的汽车缓缓开动了。这时，天安门广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口号声、革命歌曲，响成一片。送行的朋友、同学们送来了敬佩的目光，领导们的眼光是亲切的，只有亲人、特别是每一个母亲（包括我的母亲）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站在车厢里，我把这种种眼神，都看得格外清楚。蓦地，红旗招展、歌声如潮的氛围中，我们所坐

之车厢里，一声揪心撕肺的哭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耳膜——我向响亮的哭音方向看去，原来竟是那位一直不断引吭高歌、革命气势夺人的女插友。她的哭声刚从喉咙内发出，马上向周围环顾一下，抹掉眼泪，不好意思地说道："高兴的事，我怎么哭起来了？"

傍在她身旁的同学，理解地说："是啊，我们不应该哭，应该笑！可你的哭，是充满革命激情的哭，不是悲伤的哭啊！"

旁边的女同伴们都齐声说："对！我们过于激动了！我们没有悲伤，我们应该笑！"这一镜头，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回过头来想，也许就是那一声带着悲怆的哭声，象征了我们这一批勇敢的知青们心底的眷恋、惜别、惆怅之心绪——须知，这是和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北京的长别啊。我后来听说，我们这批青年的自发的行动，其实是有大背景的——即使我们不主动走，也会有即将而至的全国性的大动员。我自己，虽然当时不知道上山下乡运动之浪潮即将到来，然而，我的坚决上山下乡举动的背后，也有过摇摆怯懦的时刻。声势浩大上山下乡运动中送行的母亲们的眼泪，以及勇敢的女知青陡然的一声哭泣，已经暗示了在巨大革命潮流下的另一种虽然柔软、平庸然而却是更强大、更持久的人性潮水。毕竟，我们都是凡人，在气势如虹的宣誓口号声下，心底有各种涓涓暗流在不同程度地涌动着。

我们临行时的歌声是嘹亮的，意气是风发的，我们决心到广阔天地锻炼自己，完成与工农结合的世界观的转变。我们的心绪，很像"卷起千堆雪"的浪花，耀眼夺目；我们母亲的眼泪是温情的，我们的女插友在和北京告别时的哭声是脆弱的。而母亲的眼泪与女儿的哭泣，其实才是情感的大海，永远涌动，永远深邃。

也许正是那温情的眼泪和脆弱的哭泣，才最终决定了骤然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结局。

书生意气，严峻考验

牧区现实比我想象要严峻得多。我虽家境贫寒，但母亲从来都是大包大揽，我几乎没有干过家务活，被惯成了一个"穷公子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我身上，竟成虚话。

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将不断革命的理论体现在劳动当中——连续作战。这种作风贯穿在11年中，未有丝毫松懈。恰好，有一位知青朋友——过客，他和我在这方面，也曾完全一致。每当夏天在一起盖草圈时，我们两个从吃完早饭，就和泥，盖棚，挥汗如雨，从不歇息，一直干到中午。下午亦如是。我们的动作是快速的，或者说，是疯狂的。这种"劳动风格"——我作为一种信念，始终坚持。无论是饿得两眼昏花时，还是做了两次大手术后，我都以我能具有的最快速、最持久的频率，干完每一天的体力劳动。这样的近乎玩命的劳动气势，曾使人们惊异，也透支了精力，使我未老先衰。

我认真改造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以为，考虑自己的吃穿是可耻的。一年冬季，我居住在牧民N家中帮工，分得了六只山羊作为冬季肉食。那屠宰后留下的六只山羊皮——按照当地习惯，熟好羊皮，然后缝成宽厚的皮袄，以待寒冬。一些牧民要帮我熟皮，我宛然谢绝，以为私事不必多虑，结果白白烂掉了。严冬已至，我穿着千疮百孔的旧袍子出牧。凛凛寒风，严厉袭击我全身的每一个部位，而以革命情怀自励的我，哆哆嗦嗦地在荒原上奔波，身体几乎成为了一只“冰激凌”。最先发现我在冷风中挣扎的，是我们的邻居——四位包了一群羊的女知青们。她们急于星火地为我缝了新皮袄，新皮裤。这一经历，让我知道了老天之力不可抗，同时从心底涌出一股暖流，感受到了来自亲妈、亲姐之外的异性世界的救星功能。平凡而伟大的汗乌拉女知青们，请在此让我给你们鞠躬再鞠躬——你们不但在劳动方面不弱于我们男青年，而且，在我游牧的初期，已从你们那里尝到了一种母性般的温暖。我有时跑到你们的蒙古包串门，大吃大喝，以解决极度的饥饿问题。你们常常像亲姐姐一样，不断地给我添肉添饭，看着我闷头狼吞虎咽……

和N牧民一家相处的三个年头，是我最难忘的。N一家三口人，父亲早已去世，阿嘎（蒙语“母亲”之意）带着他和弟弟放养数量达1千2百只的一群羊。N那时17岁，小我一岁；弟弟W14岁，小我4岁。没有了父亲，年纪尚轻的N一家的放牧工作是很辛苦的。作为帮工，我风尘仆仆来到了N家。

进入N家时，全家一口一声地哥哥地叫着。让我坐在中间，给我烧茶，煮肉。我带来了用45斤粮票买来的粮食，一块砖茶。这可叫N一家喜出望外。他们每人一月只有20斤或不足20斤的粮食，全家一月才分得一快砖茶。在吃饭时，阿嘎分给我一个大盆，里边盛着很多煮熟的羊肉，给N的肉盆，是中等个的，而小弟弟W的肉盆，则是最小的。

面对阿嘎的这种分配，我很不安，但没有说什么。在阿嘎一家的指导帮助下，我开始学习着一切有关牧业的工作——除了挤牛奶（在草原，男人是不挤奶的）。

我的活儿不固定，有什么，干什么。放羊是N的任务，而我在中午以后接替他回来吃饭。这样一来，就等于我们两个各放半天了。在上午，我要与阿嘎一家拣牛羊粪，牵牛车打水，有时要到山里去砍柴，遭遇干旱无饮水时，攀到山腰去取冰雪。春天接羔，冬天游牧。夜间，为了防止羊群走失或被狼偷袭，我们还要下夜——这个工作就交给我了。

夜间，或是寒风呼啸，或是夏蝇扰扰，我手持长长电筒，警惕地在羊群周围观察。困了，就在外面的棚车里眯一会儿，看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才回到包里睡上两三个小时。阿嘎一家对我非常满意。

一个季度的工钱要发下来了。我和阿嘎家的工分分配，有一难题横在其间。工分一季度一发，按照规定，我的工分并不是从场里直接发给我个人，而是从与N一起挣的这90天工分中作一次再分配。据劳动时间计算，我白天放

羊半天，一整夜看护羊群，应得工分的四分之三，而阿嘎一家，就只能拿到四分之一了。

怎么办？我本是为帮助阿嘎一家解决困难而来，而结果却是我分到更多的工分，使阿嘎一家陷入更贫困境地——这个万万不能。我对阿嘎说：“我单身汉一个，用不了那么多钱。还是我取工钱的三分之一，阿嘎，你们一家拿那三分之二吧。”话音刚落，一丝惊喜浮现于阿嘎一家人脸上。阿嘎不好意思地说：“昭日格图（我的蒙文名字），你吃亏了……”

这种独特的工分分配方式，在我们所在的两个奥特（小组）牧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纷纷为我抱不平。一次开会时，奥特长板着脸，对和一起我前来取钱的小弟W说道：“昭日格图工作那么多，你们还来剥削他，于心何忍！我宣布，把三分之二的工钱发给昭日格图，你们一家只发三分之一……”我默然不言，W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回到家里，W就哭诉了会议上的情况，把三分之一的工钱交给了阿嘎。阿嘎哭了，N哭了，全家哭成一团。这时，我将在会上领到的全部工钱放在毡毯上，对阿嘎说：“这是他们的决定，我还是拿三分之一吧。以后在会议上我接受三分之二，回到家我还取三分之一。”阿嘎和两个儿子听了我的话，笑逐颜开。阿嘎一手收了钱，一边对我赞不绝口。

不过，阿嘎一家人并不因为我对他们的慷慨，就投桃报李了。当阿嘎发现我不大在乎用多大盆来盛肉时，就把最小的盆分给了我。其实，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的饭量大，往往一大盆肉，一顿就吃个精光。给了我小盆，就可以节约点肉食了（其实她忘记了：我的冬季肉食羊，是240斤，根本吃不完，我每次都买来一次性交予她）。他发现我不在乎坐在哪里，就安排我坐在最靠门口的一处。不要小看这座次，它关系到吃晚饭的次序。当地人总是把饭先盛给坐在最中间的那人，然后依次向下分。这样，每次我总是最后分到面条（牧民只吃一顿晚饭，白天喝茶）。阿嘎做的面条是有限的，就那么若干碗。她先盛给N，再就是W，再轮到我。等到我吃第一碗时，N已以极快速度吃下半碗，而结果是：锅里的面条吃光了，我总要少吃一碗。干了一天活儿的我，到了晚上还吃不饱，忍饥睡去。两眼冒金星、发力时骤出虚汗的情形，时常发生。阿嘎节约粮食的习惯依然，面条坚持不多做。她也许忘记了，自从我的到来，她多了45斤粮食，我们四人完全够吃——而且从情理上说，应该给我多吃一点。

蓦地，在吃饭问题上，我那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再教育”的高境界被抛向九霄云外。我加快了吃面条的速度——与N争夺最后的那一碗。我们两个无语地竞赛，吃到舌头、口腔里烫起了大泡。有时我胜，而更多的时候是N胜——您可以想象有了慈母的助力，他必稳操胜算了。

我终于在饥饿中打破了沉默。我对阿嘎说：“我要自己做饭了。”阿嘎吃惊地说：“哪里有在我家吃饭，你自己做饭的道理？你让牧民们怎样看我一家？”

我和她说明了作为一个汉人，我有一天三餐饭的习惯，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以喝茶为主，我实在受不了。阿嘎看我坚决的样子，很不情愿地同意了。我不会做别的，只会做疙瘩汤。这样，总可以支撑一天的劳动了。我自己动手做饭的消息，在附近牧民中很快传开。一位知青大姐告诉我，她听牧民们说，阿嘎一家对我的“剥削”有点过分。我做疙瘩汤时，看着阿嘎一脸的难受与尴尬，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由于吃饭关系到我那渺小的生命，也顾不得她老人家的名声了。

1971年，兵团成立了。我被分配到基建连，与汗乌拉分场告别了。我开始了脱坯盖房的新生涯。三年的牧业工作，让我能说一口很流利（但不大标准的）的蒙语，经受了在严寒中饥饿放牧的严峻考验，这为我以后的奋斗历程，打下了坚不可摧的基础。我在极度饥寒的环境下，度过了难以想象的游牧岁月，余则不足道也！

对于阿嘎一家，从心底里来说，我没有依恋。想想吧，我因砍柴，皮袍子被树林刮烂时，阿嘎有那么多的旧袍子，也没舍得借我穿几天。看我为她放牧实在寒冷难耐后，她才找出一旧袍借与我。而发现我穿丢了一个扣子时，她马上把皮袍收回了。我对阿嘎一家也没有怨恨——一个残缺的家庭，本来就够苦的了，我对他们只有同情，还能有什么怨恨呢？

阿嘎体弱，她的偏头痛或关节炎一犯，躺在毡毯上呻吟不已，实不忍闻；我只能帮她多干活，对其病痛，莫可奈何。想一想，操持家业，游牧于荒野之中，还要为两个孩子取媳妇做长远打算，她不容易啊。

阿嘎一家对我的待遇，虽不令我满意，但不管怎么说，大量的蒙语，与牧业生产的技能，毕竟是阿嘎一家教给我的。对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在那时，我没有动摇过。

<u>过程与结局</u>

1971年，兵团组建。我们五位北京知青被分到了5师45团的基建连——七连，与来自各地的其他知青们组成了一个三百多人的连队，任务是盖房子。

比我们晚到的知青们，初见的印象是：他们比较压抑，苦闷；在开始的一两年里，一些人的聊天总离不开“被骗”的话题。一位来自呼和浩特的小知青，大声控诉着当地领导：“他们说：草原特别好，有房子，有肉吃，有这，有那，广大天地，大有作为；可一来，哪里有房子的影儿？还得自己先搭个地窝棚，又潮又暗，呜呜呜……”其他战士（这些小知青为兵团战士编制）或默然，或垂泪，一片凄然。他们大都本不愿来，而被动员来接收“再教育”的；他们愤愤地说，他们是在连逼带哄的情况下来到草原的；十六七岁的他们身上仿佛还飘着一股奶味。一些人甚至不管不顾地咒骂起来。

肩负领导使命的现役军人们来了。他们普遍比我们岁数大，最年长的约有四十多岁。作为兵团的各级领导者，

他们动员大家扎根草原，自然都是慷慨激昂的。而他们慷慨壮烈讲演背后的真实心理，是藏不住的。我们看出：他们决不会久住草原。当时最能稳定人心的角色，竟由我们北京知青来担当了。三年的草原生活磨练，使得我们脸面黝黑，精神抖擞，小知青们佩服我们，领导干部依靠我们，我们作了干部骨干。

北京知青们，个个身体好（有的还是二级运动员），崇尚实干，朴实耐劳而不善于高谈阔论。在二十一到二十七八岁的年龄，正是大显身手、体力最好时期。说起来，您可能不相信，像我这样一个又小又瘦的北京中学生，痴迷上了体力劳动。我喜爱劳动的节奏感，像脱砖坯，用铁叉子和泥时，身体一起一伏的，颇似健舞；手握钢钎，将那沉重的大石头从山上一撬一撬的，竟生移山的豪情；在麦场上将麦子与糠皮分开的扬场木锨，上下翻飞，真能产生搞艺术的快感。

蒙语因无人交流而逐渐淡忘，我享受这吃掉四五个馒头后享受甩开膀子劳动的愉悦！当然，一天到晚的大量汗水，能产生何种经济效果，我们开垦土地来种粮食，对草原生态会带来什么，我皆在懵懂之中；而我们一亩才能打五六十斤左右的麦子，非但不能自给，还要依靠国家的商品粮——这种劳动，对当地的生产、生活，利弊如何，天晓得！

五六年过去了。一个消息传来，被伟大领袖废黜的高考恢复了。我对这消息的反应，十分麻木。我曾誓言在牧区干一辈子；何况，我曾与北京知青朋友相互激励：在草原奋斗终生。

而就在我做完第二次大手术，回到内蒙，我看到了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们，大都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了。另一些不走考学之路的老朋友，也在陆续办理病退、困退手续，欲和草原说再见了。

一种孤零零的感觉笼罩着我。这些优秀的北京知青，我一生最亲切、可靠，并竭尽全力抢救过我生命的朋友们，每天除了工作之外，紧张地复习功课，要和我长别了。蓦然间，我感觉到了人间誓言的脆弱性。我自己怎么办？我是个死心眼儿的人。认定了对的，不会回头的。但在旁人的眼中，我在北京无家，无人接收，所以也必定断了这份念头（母亲为了照顾在内蒙巴盟插队的姐姐一家，也“插队”于彼，弟弟则在外地）。一些曾经可以离开草原的机会，我不屑一顾。例如，当呼市等城市招聘工人时，我们连队很多人私下打赌：“这回，准有黎烈南！”“对！他不报名谁报名？……”然而他们猜错了。

1977年，远在天津的弟弟向所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负责人请假，探亲来到姐姐家，与前来探亲的我会面。他对我说：“北京市有新精神下来了：只要北京有家，便可以投亲。哥，就靠你了。”我心痛地看着亲弟弟：在年幼时，他因家庭遭难离散，教育缺失，走了弯路，进入了天津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劳动教养；如果不及时设法使他趁新政策出台回京，就会永远闷在学习班里，耽误一生了。我一口答应：“我一定办回北京，把你接回来！”刚说完，我暗自吃惊——对亲人的关心，轻易击溃了扎根边疆的理想。转变好快！

事有凑巧，一位中学时的同学好朋友恰与我在北京相遇。他的母亲知道了我的处境，毫不犹豫地接收了我。我回京的手续很快办完了。

在办手续期间，一直以为是弟弟的救星的我，有千种万种甜情暖意在胸腔里回旋。以前离我很远的北京的林荫道，四合院，现在这样近，这样亲，如睹亲人，如沐春风；走在长安街上，身子像是飘在天堂上。我不禁发笑：原来，在我的草原扎根誓言底下，也埋藏着一种永不熄灭的北京故乡情。看来追求幸福多采的生活，是人的本性……

母亲和姐弟，因为我的回京，都陆续办回来了。北京是我的故乡，有老母，有亲朋；这其实就是事实的基本真相。在中国，运动潮流时起时伏，我们大多数，都是赶潮流之人。

上山下乡的失与得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知青都是被动员下乡的。他们中，多数是不情愿的。从这一点，可以窥见决策者的失误所在——用政治号召、行政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用知青“接受再教育”的指导思想，发动一场运动解决城市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这不但掩盖了城市分配工作困难的真相，而且使上山下乡的知青在心理上产生自卑乃至恐惧。所谓“再教育”，当然也应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番教育之后，对于现在的中学生——将来的知识分子有所担忧，唯恐他们将来演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作的战略部署。这种违反各阶层意愿（知青本人不愿，接受地方要增加负担，尤其是知青家长的孤独悲哀感）的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违反了经济规律，其失败结局是注定的。

这种由国家领导人振臂一呼，全民（不管理解语不理解）立即响应的运动，只有在中国才会产生。我们知道，领导者的成功，在于其决策符合大众的根本利益。不符合人们的利益，不管他有多高的威望，多么强大的组织和宣传能力，和在政治上的震慑力，最终是无效的。以道德的旗帜来号召，来指挥大众，违反了大众意愿的运动，总会被芸芸众生的生命本能需求所终结。陈独秀说的好：“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而上山下乡运动，是以当时接受“再教育”的革命道德要求，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牺牲个人利益的要求，来运作的；这对于那些甘于牺牲个人利益、善于从生活中学习的极少数人来说，能起激励并终生无悔之作用，而对芸芸众生，则只能带来相反的效果。

造成这场运动的风起云涌，一方面，有城市劳动力出现过剩的因素，更是文革内战的必然结果。在内战期间，生产力遭到破坏乃至停顿，国民经济受到了巨大损失与冲击，造成大量大中学生的工作分配困难，它是文革发动者不顾国民经济，抓革命、毁生产（当时有一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的一个严重后果。这样一个后果，就让几届的知青们来承当了。

从宏观上观，文革中废除高考，号召知青上山下乡，不但对学子们是一大损失，同时，整个国家民族，也是重大损失。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知识，整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如果按照读书人到乡下去从事体力劳动这种方式持续发展下去，再由新三届、新新三届学生抛弃学业，源源地走向乡野，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可想而知。知青返城恢复高考，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把知青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统筹大局，融为一体，是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的举措，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知青的欢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行为。它使民族的文化水平降低，对国家的繁荣富强，是极为不利的。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使农民摆脱贫困，融入城市化的进程，让更多的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才是大趋势。知青在乡下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不但无助于农民脱贫，而且自身也陷于贫困境地，难以自拔。

当然，事物总有失与得两个方面。从另一方面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还是有一定收获的。

知青来到农村，受到了极大的艰难困苦的锻炼，这是人生难得的一种磨练。我们在艰苦环境下洒下过自己的辛勤汗水，品尝过各种酸甜苦辣，为缓解国难民困，做出了牺牲。过去所受之苦愈深，现在对美好生活的感受愈切，难道不是这样吗？这种感觉是一笔没有经过困苦之人难以享受的精神财富。

知青来到农村，对生活，对中国的国情，有了第一手材料的了解。我们看到，正是广大的农牧民们，在非常艰苦的情形下，一代又一代地为国人提供者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基本资料，成为民族的坚实支柱；他们是中华民族勤劳与坚韧品质的伟大代表，在他们身上，蕴藏着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是知青永远学习的榜样。想起他们，自己还有什么困难不能面对？

我在上山下乡过程中，还到过内蒙农区，河北农村，逐渐体验到，农民群体，实际生活在我国社会的最底层。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我国的农民，劳动强度极大，营养不良，文化程度低，医疗环境差，平均寿命短，所有插过队的知青，对此感触尤深。就连我们这第一批自动赴蒙插队、热情极高的知青，都觉得在那里长期呆下去，是难以坚持的。知青返城时的如海如潮，势不可挡，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就是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们，作为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军”，本为艰辛的生活而劳累，在给我们以“再教育”方面，他们实在力不从心（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即是教育者也是被教育者的关系，没有等级之分）。比起他们的工人老大哥来，他们不具备城市户籍的种种优势，对于某些人民的“敌人”——比如右派分子，在收入方面，亦远远不如。例如我那曾经划为右派的母亲随插队的姐姐在乡下，每月有42元的退休费——当地农民都羡慕不已，将她看作一棵摇钱树。这一“农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之结论，是我自己在生活中得出的，和我在文件、社论中所见所闻，相差甚远。所以，与其说接受他们的再教育重要，不如说，将他们从困苦中解放出来，更重要——尤其是现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之时。当一些知青感伤自己的前途由于上山下乡而被耽误时，他们应该更对曾经一起劳动的农民朋友们，产生深刻的同情。知青由于返城而脱离了乡村困境，而农

民们将一代又一代地在乡村困境中坚守着。莫忘记，他们中间，能人在所多有，只是乡村能人的被埋没，司空见惯，不被注意罢了。

从知青个人的角度来说，有几种情绪思虑存在。一种是怨天尤人：觉得自己的一生被耽误了，因而怨恨一生。这种情绪，可以理解，然而未臻上乘。一种是返城后工作生活比较顺利，苦尽甜来，对上山下乡讴歌不止，这种情调，也可以理解，然而未必全面。一种是返城后，虽然对自己的缺失有所遗憾，然而由于能积极对待人生，得到了苦中之甜，看到了社会底层的真相，因而有收获的满足感，抓紧后半生的时间，与时俱进。另有一种境界，就是这些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有正反两方面的反思，能以悲悯情怀和实际行动，关心着他们曾共同劳作的乡民们，因此投入了对乡亲们的很大关注与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深知，自己脱离了困窘之地，但那些农牧民朋友，在摆脱困境之方面，还有遥遥之路要走。以我的朋友唐炬为例，他在草原干活，自己奋不顾身不说，返城之后，多次回草原为牧民办事，带领知青们，在京为牧民看病、解决困难，尽了最大努力。牧民第二代亲切呼他“阿爸”（父亲）——这是一个男人在草原能享受到的极高荣誉。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它与文革密切关联，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密切关联。本文是笔者经过11年的草原岁月以及不断反思的一点心得，敬请朋友指教！

黎烈南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30



写在上山下乡卅年之际

（一）知青节？

〖写在前面〗

我自己也已经淡忘了，十年之前，1998年，上山下乡30周年，我曾经留下了近四千字的《青春无悔？》。这次翻出来晒旧作，觉得还是一分为三为宜。原先的三节内容毕竟不怎么完全切合“青春无悔？”一个主题的。

（2008-11-07）

今年是“文革”最重大的“副产品”之一——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十周年。假如当年也有如今动辄就设一个什么“节”的时兴风气的话，那么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新最高指示”的这一天，一定能命名为“再教育节”或“知青节”或“上山下乡节”。尽管当年领袖的最高指示发表时全国各地连夜欢庆，尽管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欢送欢迎知青下乡的锣鼓响遍神州大地，但从未真正成为全民喜庆的节日或公众认可的纪念节日，甚至时至今日，还从未明确定义过上山下乡的起始日期。约定俗成的是，1968年是上山下乡的起始年份，至于具体日期，则由于涉及的面实在太大太广而难以统一，往往是按不同城市奔赴不同省份形成许许多多的知青群体，这种因地域形成的群体又因为下乡日期的差异而形成低一层次的“亚群体”。因此，知青群体是一个由三维空间加上时间组成的四维体，其复杂性可想而知，也许这是至今造不出一个节来的原因之一。

其实，设不设节、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节名，本来就是人为的。纵观古今中外的难以数计的节日，绝大多数是喜庆、欢乐、吉祥的时辰，但也不乏记述灾难、铭记教训的日子，例如“××战争纪念日”、“××死难烈士纪念日”等等。也许对于芸芸众生数以千万计的知青来说，并不在乎有没有什么节，因为几乎每一个知青都不会忘记自己下乡的那个日子，知青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天身不由己地痛别了亲人和家乡，从此开始了刻骨铭心、不堪回首的“青春旅途”，并深刻影响了全部的人生历程。

知青难忘自己的蹉跎岁月，因为时光的流逝不足以抚平一代人心灵的创伤；知青应该有自己的“节日”，一如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那样，以更有力地警示世人与后代，莫忘惨痛的历史教训。事实上，就象“文革”的悲剧已经渐渐被淡忘那样，知青的命运也在慢慢地被涂抹被改写。近些年以《孽债》为代表的所谓知青文学

迎合世俗和猎奇心理，在宣扬爱心的幌子下大写知青“私生子女”的风流韵事，类似的文学作品往往又通过电视剧这一最为普及的大众媒介广泛传播，结果有不少当今的青年人看了那些电视剧后，相当认真地问对当年的知青说：“当年的你们也真够浪漫呀”，“好象并不象你们口头上常说的那样苦嘛”，“你们可曾留下孽债？”也许提问的人确实出于一种天真与好奇，但这种疑问源自《孽债》等大作的误导则是毋庸置疑的。如今的青年人竟然把当年的上山下乡看得如此浪漫，真令历尽人间艰辛的千百万知青痛心不已！中国人不能患“文革健忘症”，中国应该有“文革博物馆”，中国还应该有“知青节”！

（二）“无悔”之谜

〖写在前面〗

卌周年又在眼前了。廿年时兴起的“青春无悔”在卅年的时候褒贬不一。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不赞成“青春无悔”的说法，十年前在一本书上见到解思忠的分析，觉得蛮有道理。（2008-11-07）

真正在社会上形成知青下乡纪念风气的，并不是从“10周年”开始的。因为那时才1978年，是上山下乡运动走向式微的时期，是开始“胜利大逃亡”的时期，千百万知青正面临着又一次人生重大转折和抉择的考验，所以还没有心思去考虑纪念啊什么的。“20周年”的时候，1988年，才开始出现纪念活动的“第一波”。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除了我自己所在的“68 Z大队”亚群体的聚会之外，就是在老知青中轰动一时的《北大荒风云录》、《草原启示录》、《漠南情——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写真》、《青春无悔——云南支边青年生活纪实》等一批知青回忆录相继面世，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青春无悔”那四个字。

记得当时自己曾经激动过一阵，“青春无悔”的喧嚣声似乎也带来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但激动过后总觉得有点不是滋味：黄金般的青春年华在蹉跎岁月中荒废了，我真的无怨无悔吗？自己周围的插兄插妹们如今有几个潇洒人生？都三十好几望四十岁了，还在为文凭、为学历、为职称、为房子、为……苦苦拼搏（有些简直还可以用“挣扎”来描述），而我们的竞争对手正是那些有幸远离了文革劫难的“新生代”，他们接受了正规教育而不是“再教育”，他们年轻气盛无牵无挂而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拖累，他们………。面对现实，我一直想对“青春无悔”的始作俑者说，尽管我也是知青，但我很难从心底里发出“青春无悔”的呼喊，真的很难很难。

我一直想把哽咽在喉的“难”吐露出来，但面壁十年，收获甚微。在“30周年”莅临之际，却遇到了一位知音，帮我解开了心头的疙瘩。这就是解思忠先生的新作《观念枷锁》。解先生因两年前的一本《国民素质忧思录》声名大振，此次新作集中剖析了36种盘踞在我们国民头脑里的陈旧、错误观念，指出，它们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脚，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我以为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解先生在剖析“还是五六十年代好”的错误观念时论及“青春无悔”。他写道：

说起“文化大革命”这10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瞬；我们的国民在这场浩劫中所遭受的灾难，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然而，居然现在也有人能从中找出美好的回忆来，赞叹抚摸。当年的红卫兵，都值青春年华，搞“红色恐怖”固然可恶，但被发配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委实可怜。有些当年的红卫兵，非但不对自己当年的暴行表示忏悔，而且对自己在农村战天斗地的屈辱生活表示“青春无悔”。我想，能把自己“青春无悔”思想向社会传播的红卫兵，都是些有能耐把自己思想变为“铅字”的人。他们忘记了还有多少人由于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再也没有能弥补得起来；有多少人由于生活的折磨，从此就萎缩了下去；还有多少人由于至今还扎根在穷乡僻壤，远离着社会文明……。这些表示“青春无悔”的红卫兵，自己一般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时来运转的，怎么能再去无悔于曾经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的岁月呢？

作家张贤亮在他最近出版的《小说中国》一书中也曾这样写道：“是邓小平才能让他们回城的‘知青’，重返当年插队的‘广阔天地’回忆‘美好时光’，竟然觉得‘青春无悔’，感谢毛主席给了他们一生中难得的锻炼机会……”。张贤亮本人在五六十年代，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历尽磨难。他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作家，不能说与他的这段遭遇没有关系，但他却并未因此而产生“无悔”的思想。如果再有一生，相信他也绝不肯为了能最终成为一名举世闻名的作家，而去重复过去的苦难历程。

解先生揭开了那些高喊“青春无悔”的人的面纱，也就是揭示了隐藏在“无悔”者背后的奥秘——“能耐”。他们并非如同我等一介草民的普通回城知青，正是他们过去和现今在社会上的“能耐”地位造就了他们“无悔”的豪言。解先生的剖析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解先生还说，他自己“至今回想起这段青春年华，有的只是惋惜，绝产生不出‘无悔’的感觉来。如果要再给我一次青春，我绝不选择五六十年代，而要选择改革开放的今天。”

解先生的新作使我突然感悟到，尽管知青身上都有解不开的“知青情结”这一共同特征（无论如何，他们的遭遇将永远铭刻在心中而不可能抹净），但由于各自具有地位、现状等等的不同背景而在具体评价那段经历时、在理解现今处境时将会产生偌大的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确实是真理啊。我自己的一段最新经历，或许还可为此提供最新的佐证。（见“之3”。）

（三）值得回味的掌声

〖写在前面〗

这次卅周年来到之前，有人提议组织一次回访“第二故乡”的活动。这是许多知青向往已久的心愿。但是要真

正实现这一愿望，却想法不一。最终，大范围的“跨大队”的活动没有成功。这种现象的发生并不突然也不奇怪，因为1998年“卅周年庆典”上的掌声就很说明问题了。（2008-11-07）

今年（1998年）五月，全县68知青群体聚会纪念“30周年”。

会议伊始，发起人毛遂自荐担任主持人，向与会的大约三百名老知青介绍此次聚会的发起人以及他们如今的职务。嗬，真显赫，有市府的、区府的、工商银行的，还有这局、那局的……。

“Z大队”的我们马上就意识到，他们是“T大队”的，“原籍”上海H区，难怪今天依然发达。也正因为他们的能耐，才借到那么大的会场召集全县知青。尽管我们要感谢他们为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聚会的机会，但耳朵里满是官位的炫耀，不能不使我们心理失衡：咱们W区的老知青绝对不赖！当年一起下乡的六十余人中至少有七个高级职称了：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等等，不，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全国劳模！

大家把小桂推到前排：“我们Z大队的小桂，是1998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这是我们知青的骄傲！”他回城后全靠自学成材，一步步获得了技术职称，是鲜见的无学历文凭的高级工程师，又由于他兢兢业业的工作业绩，在连年获得省市级劳模称号后，今年摘取了全国劳模的桂冠！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向小桂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曾经在十年前就问过小桂：对“青春无悔”之说，你同意吗？他艰难地摇摇头，没有说更多的话。在今天的聚会上，一向言语不多的他在众人要求下，对着话筒也只说了相当朴实的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在江西的那些日子给我留下的深刻教育。”我想，他是发不出“无悔”的豪言的。他的妻子是和我们一起在江西同甘共苦十个年头的小周，由于从小生长在一个相对贫困的家庭，加上农村十年的磨难和回城后“再创业”的艰辛，她遭到绝症的无情袭击，经过殊死搏斗才坚持到今天“30周年纪念日”。因此，我相信，“青春无悔”永远不会是我们这些人的肺腑之言。……

涂鸦至此，意犹未尽，因为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那次聚会上的三次掌声。

会议发起人在介绍完与会的“显要人物”之后，又特地介绍了应邀与会的两位江西老表，他们曾经是T大队知青担任当地小学教师时的学生，如今也在上海滩上闯荡：他们在上海的大学就读并且毕业后，现在分别就职于两家外资企业。在会议发起人的带头下，会场上对他们报以掌声。

两位老表起立发言，对自己的启蒙老师——当年T大队的知青、如今在市府负责某重要部门的W先生深表感谢，会场上再次掌声迭起。

然而第三次掌声则非同寻常。在轮到K大队知青（记得他们的“原籍”是S区）代表发言时，这位老知青对两位江西老表说：“我非常高兴，我们知青当年教过的学生如今茁壮成材，但我希望更多的当地年轻人在学成之后把知

识奉献给尚未摆脱贫困的江西老区！”在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会场上爆发出更为持久的热烈掌声……。

这掌声和K大队知青代表的发言，至今仍在我耳边回响。同为老知青，当年同走一条“革命”路，如今同堂纪念“30周年”，但所思所想所言所语却是那样耐人寻味的不同。

2008-11-07

网中人文集：http://hxzq05.d68.zgsj.net/showcorpus.asp?id=162

【插队云庄】之六：

蹉跎岁月第一春

〖写在前面〗

这是我的“早期作品”之一。1989年10月底，单位内部小报的编辑开始向我约稿，我从此开始了“爬格子、变铅字”的业余爱好。1990年2月春节来临之际，编辑又来“命题作文”，于是就有了这篇习作。当时的题目是“有那么一个春节——新年忆旧”。后来我自己策划“一系列”的时候，把题目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08-11-03）

除夕之夜，尽管电视节目精彩纷呈，但终究抵挡不住睡意的袭扰，劳碌了一天，一家人就早早熄灯就寝了。可是，没多久，有禁不止的鞭炮、爆竹从四面八方响了起来，在寒冷的冬夜里，它还真有点惊天动地的气派。我被它从睡梦中唤醒，亮灯一看，呵，十二点了，过年了！窗口忽闪忽现的烟火光，窗外联绵不断的鞭炮声，驱散了睡意，脑海中闪现出“蹉跎岁月第一春”的情景。

那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就在两个多月前，六八年的十一月，我被刚刚掀起的“上山下乡革命洪流”卷到了江西中部的一个山村，从此开始了后来被称为“蹉跎岁月”的插队生活。那山村，叫云庄。这村名与邻村“洲老上”、“小坑”、“拿埠”之类的名称相比，还有几分雅趣哩！可是，这里纯朴的乡民们向来只知道，唯有犯了错误的干部才会下放到这偏僻的山村来。所以，当我们这批号称“毛主席的红卫兵”的青年学生从上海志愿来到云庄时，乡民们认为准是从城里下放来的“牛鬼蛇神”。直到一个月后，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来，知识青年才神气了，贫下中农也服气了。

按照江西的规定，我们同当地的下放干部、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五七”之称来源于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又按照从上海出发时的编制，我们在云庄落户的二十九名上海青年分成三个班，“番号”分别为四班、七班、八班。我在八班，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班，九男四女。云庄是全县排得上号的大村庄，所以，安排在这村的“五七大军”也就特别多。

下乡伊始，我们班还是一股子学生气，每周有两个晚上要开会：一次政治学习，一次民主生活，“政治气

氛”甚浓。不过，我们既没有搞揪斗“地（主）富（农）分子”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卷入“路线斗争”幌子下的村内宗派纠纷，而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搞好“革命化”。转眼就到了岁末，班里专门作出决定：要过好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不能追随落后的习俗；要“节约闹革命”，不搞年夜饭大吃大喝那一套；思想上要注意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不要想家，……。

作为“革命化”的具体行动，班里在生产大队的支持下。特地在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时，请了两位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并且共进“忆苦饭”。（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儿的农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种拌杂糠菜的饭食，只是由于“阶级教育”的需要，才从外村引进了“忆苦饭”的配方和制作技术！）岂知到了年初一，班里有人自作主张，多搞了几个菜，请了几位贫下中农来吃晚饭。当晚，就连夜召开了班务会，专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当时叫做“斗私批修解决问题不过夜”！

不过，“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还是相当顽强的。小年夜那天，贫下中农热情地送来了两大盆自制的米酒全班就乘兴聚了一餐、乐了一场。这米酒不凶，吃口尚佳，于是就有人开怀痛饮，一连喝了五大碗，终于醉倒了，酩酊大醉，还开了“罐头”，颇为狼狈。对于这种酗酒行为，大家漠然处之，无人提出异议。毕竟是人心相通，心照不宣：都是十六、七岁、近二十岁的人了，几乎全是第一次不在父母、亲人身边过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不健康”的情调无处宣泄，只得求助于杯中物了。也许还得感谢祖先发明了这种“中性”饮料，既可表示喜庆，也可表达忧愁，此刻，妙就妙在可以借助于它，用表面的欢乐掩饰内在的心酸。

大年夜，当地有烤火、守岁的习俗，几乎彻夜不眠。乍来初到的上海青年对此虽感新奇，却提不起劲头来参与其事。在“忆苦饭”席终人散之后，就钻进了被窝。江西的冬天别有一番风味，又冷又湿。那年的春节前后，整整一个月没有出过太阳，阴霾满天，还不时下点雨雪，寒冷加上潮湿，分外地冷。被窝里尽是潮气，全靠体温来慢慢地暖和它。困乏到了极点，才会迷迷煳煳地入睡。下乡后的头一个大年夜，仿佛人人都有重重心事，谁也不吭声，可谁也没谁着，不时可以听到辗转反侧的身子把床板弄得咯咯作响。沉默了很久很久，忽然，传来了噼噼啪啪的爆竹声。黑暗中有人惊喜地叫起来：“这是过年的鞭炮！”拧亮手电筒一看，九个男生仅有的一只闹钟上，时针正指向12点！“过年了！过年了！”大家兴奋了一阵。爆竹声很快就稀疏、消失了，黑洞洞的屋子里有恢复了平静、沉默。

迷煳之中，听到阵阵尖利的哨声。呀！天亮了。大家不敢留恋温暖的被窝，毫不犹豫地起床、穿衣，匆匆洗漱完毕，就连奔带跑地朝生产大队的仓库跑去。

这是一件当年没有人敢斗胆怠慢的大事情——“早请示”。春节更不能例外了。在冬日的晨雾中，全村的贫下中农、“五七大军”在仓库前的空地上，整整齐齐地排好队，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仰望“宝像”，手挥“红宝书”，由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三唿“万寿无疆！”尔后，全体高歌《东方红》，又高声诵读“最高指

示”；再后，是贫下中农代表、“五七大军”代表慷慨陈词，“献忠心”、“表忠心”，……。每一个人都带着庄重、严肃的神色，仿佛在“灵魂深处”爆发着“斗私批修的大革命”，个人崇拜、现代迷信的幽灵无一例外地徘徊在这偏僻山村的大地上……。

这是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我步入蹉跎岁月后的第一个春节。时光的流逝，冲刷着对往事的记忆，但这“第一春”却是那么令人难以淡忘。

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是那么理所当然、无可非议。如今想起来，仿佛是痴人说梦、不可思议。好在历史已经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我重新进入了温馨的梦乡……。

庚午年春节新年忆旧

那年体验了一次“打麻糍”

说到春节的话题，就忘不了当年在江西的那些蹉跎岁月中度过的那个春节。

1968-11-19离开上海，不到三个月，1969-2-17就是春节了。山村尽管是那么偏僻，过年的气氛还是少不了，重要内容之一是“打麻糍”，快过年时，全村家家动手，热热闹闹打麻糍，是不成文的乡规民俗，似乎不打麻糍就不像过年。许多人家都有打麻糍的石臼和粗大的杵。而我们这些刚到村里不久的上海知青，多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有打麻糍这回事。老乡们说，打麻糍很累，需要集体动手，强劳力轮流上场，挨家挨户逐个打，村子里象过节一样热闹非凡……。但是，到底怎么一回事，是凭空想象不出来的。我们一方面是入乡随俗，另一方面是充满好奇，就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也要打麻糍”！

轮到我们知青打麻糍时，已经是小年夜了，当地老乡已经差不多备好了自家的“年货”，所以听说知青要打麻糍时，热闹程度就愈加非同一般，一边是新奇的“上海人”——兴致勃勃，摩拳擦掌；一边是稀奇的当地人——看看“上海佬”究竟怎么玩。我的日记上有这样的简单记录——

1969-2-15 星期六 阴

……下午在老乡们热心热情帮助下“打麻子”。……

的确，那年打麻糍这件事的全过程都是有老乡们热情帮助才完成的。

我们知青十多个人一个集体户，每人享受生产队社员“同等权力”——生产队按人头定量供应的糯谷，不能多买。生产队的碾米机挑灯夜战，全村人挨家挨户排队碾谷风米。生产队也有人做我们的“指导员”，指挥安排打麻糍的“全过程”。记得第一步是提前若干时辰把糯米洗净，浸泡，让米粒吸足水分。

打麻糍前，把糯米捞出，放进江西等地特有的蒸饭木桶里，用大火蒸熟成为糯米饭，然后把热气腾腾地倒入石臼。石臼不大，用麻石（花岗岩）凿成；三个人各持一根一米多长的杵，交替勐捣，把糯米饭捣烂，直到成为米泥。

打麻糍第一要义是“趁热快打”，趁着糯米饭未凉的时候快打勐打才能省力些，也容易捣得更烂更粘稠。由于蒸熟滚烫的糯米饭极为粘稠，一杵捣下去就很难拔起来，没有几分力气是打不了麻糍的，所以是体力相当的三个人围着石臼边捣边转，打累了还一起喊号子，很有趣的。也有女老乡端来一盆凉开水，用手沾水后，帮着把石臼内的糯米团翻转过来，使糯米更均匀地被捣烂捣粘稠。周围看热闹的妇孺老幼更加起哄不已。在大冷天打麻糍，用不了多久就开始脱衣服，直到一件毛衣，还会冒汗。由于一家一户往往没有没有三个强劳力，所以是一家一家轮着打麻糍。

知青一开始是旁观者，很快就上阵了，无论男女，都尝试打上几下。但这打麻糍真是技术活，节奏要协调，用力要均匀。三个知青齐上阵的时候，力量不均衡，更谈不上节奏，所以，两三下就彻底乱了套，石臼被捣得东歪西斜，最后侧翻在地，引起一阵惊叫和哄笑。真正打成一臼麻糍，还是当地老乡的功劳。

据说，打麻糍的时候，讲究的家庭还要举行一个仪式，由家中最长的男子先捣第一棒，然后按辈份接下来捣……。按照当地的习惯，打好麻糍之后，趁热把米泥伴上豆粉、白糖和成一小块一小块，热啯啯、香喷喷。当场“开销”。不过，大部分是做成一大块，约1寸厚的大饼子，阴干凉透，再切成长条形，便于存放。有的还抹上用山里采来的草药制成的水，最后还可以浸到“晶晶亮透心凉”的山间泉水里，不易发霉变坏，可以保存到开春。正月新年，客人来到，就端上麻糍，表示对客人的敬重。记得是把麻糍切成片，或蒸或煎炸。

那一年我们刚离开上海不久，过年的时候特别想念上海的年味。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男生躺在黑咕隆咚的“阁楼”上，例行的睡前聊天。有人说到上海的汤年糕真好吃呀，把大家的胃口都吊足了。第二天天一亮就有人直奔知青食堂，把麻糍当年糕，切成一片片；另一边，早已有人直奔菜园子，摘来“春菜”（形似上海的莴笋）叶子，把灶膛烧得旺旺的，开水滚烫，青菜碧绿，加上盐、味精等调料，哗，把“年糕片”放进锅里，只要看到沸腾状就能一饱口服啦！在众人围观中，用锅铲晃了几下，……傻眼了，“年糕片”无影无踪了，成了一锅白晃晃的煳煳！于是有人恍然大悟，上海吃的年糕不是纯糯米做成的！

怎么办？吃呀！绝对不可以浪费粮食！于是，这一年春节你吃什么了？鼻涕！那白晃晃、粘稠稠的，真像……。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打过麻糍了，因为我是每年必回上海。至于糯米，都分到个人，带回“物以稀为贵”的上海了。

1969日记选

（1）兴奋的元旦

1968-12-31

到公社买米，因为下起雪来，故在公社留宿一晚，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在家过元旦，尽管我已经离开了老家到了“第二故乡”。1969元旦之日有如下日记——

1969. 1. 1 星期三 阴 有雪

新的一年开始了。

元旦一早，吃过早饭，九点十五分全体同志启程回家。此时开始飘雪花。走了不多路，都感到吃力。正在这时，冬生等四个社员拉着两部劳动车来接我们了！他们一早，连脸都没洗、饭都没吃就赶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四个社员帮我们装好车，去公社吃早饭，我们则先行返云庄。到了新街上，大概十点半，在此等候社员。结果，到了十一点半，他们还没来，雪却下大了，只好背约而行。一路上，大家放声高唱毛主席诗词歌曲，“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迎着扑面而来的雪花，快步往回走。正是“雪里行军情更迫”。到小坑附近，他们赶了上来，随后一同回云庄。大家都十分感慨地说，1968年的最后一天和1969年的第一天过得太有意思了！

一回到家里，大家就忙着看信。・・・章也来信了，章等尚未安排的同学与章的弟弟章、费的弟弟、李的弟弟等进行革命串连，报名到江西插队落户，并要求我们为他们想想办法，他们想到我们这儿来呢！我看完了信，仿佛感到我的心和战友们的心一起在激烈地跳动！多么感动人哪！当场我们决定，尽力满足战友们的要求，尽力实现战友们的迫切愿望。从来信中知道，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发表后，上海掀起了上山下乡新高潮，68届全体毕业生将百分之百插队落户，67届尚未安排的同学则在1月10日前安排停当。毕业分配形势大好！江也写了同样内容的信。薛因没空，托方把我们的红卫兵证及临走前拍的照片寄来了。这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啊！

饭后即给家中写回信，写得老长，从来没有写得这么长。

晚上参加大队召开的“热烈欢呼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发表大会”。

【忆与议】

1968的最后一晚和1969的第一天是下乡插队后第一次过年，尽管不是中国人最重视、最热闹的春节，但在“城里人”心目中，元旦毕竟也不是个小节日。所以，在公社见到了久违的电灯，看到了多种报纸，就相当的兴奋（详见《1968日记选（16）喜见电灯，告别六八》）。元旦之日返回山村时，恰遇风雪，更是“引吭高歌”“斗志昂

扬”“意气风发”“意犹未尽”。

而在当时的上海，12-21最新指示引发的“上山下乡一片红”席卷全城，无论尚未分配的同学及其兄弟姐妹，还是已经达到“第二故乡”的知青，都陷入了狂热之中，用当时的流行语就是“形势大好！”未下乡的想到我们的“第二故乡”来，已下乡的认为“小事一桩，好办”，简直把农村当成了似乎我们可以作主的场所了。这些就是12-21之后的狂潮波及到我们这里的余浪。

日记中又说到，使得“大家是多么高兴”的还有“我们的红卫兵证及临走前拍的照片寄来了”，这说明在此之前我们是“无证”的，难怪乎，当初生产大队的干部还硬说我们是“小牛鬼蛇神”，我们“再三再四地解释，……毫无效果，无人相信。我们都感到是有口难辩的莫大苦衷。”（参见《1968日记选（13）12-21之夜出奇的平静》）12-21指示为我们揭掉了黑锅，当得知将收到兵证时，怎么不让“大家是多么高兴”呢——现在是证件齐全的正正规规的红卫兵啦！记得是离开学校之前发了袖章，那天晚上还让学校“红卫兵团”负责人亲自执印在袖章背面盖章。但是为什么姗姗来迟直到此时才补发兵证？已经记不起来了。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当我们还在为自己获得“正名”而欢喫雀跃的时候，伟大统帅早已是对红卫兵失去了信心并作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四十年后媒体如此披露了当年内幕——

“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见凤凰网，来自人民网http://news.ifeng.com/history/1473893.shtml）。

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停课闹革命，各地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如此等等等等，谁之过？

（2）首次受伤事故，投下心理阴影

1969. 1. 2 星期四 阴

今天气温显着下降。早工修公路。上午、下午继续制毛主席语录牌。

下午，李在砍柴时，不小心将右手砍伤，立即由徐、潘、王护送至小坑医院。不久，潘回来报告说，李的动脉血管已断，小坑无法医治，可能要送新干县医院。她是回来取钱钞和衣服，准备连夜送新干。费、陆闻讯同去。费当然另有任务——为战友们开证明来赣。・・・此时天色已晚，又开始飘雪了，同志们都为他们担心。・・・我没

心思再写给老师们的信了。

【忆与议】

这是下乡四十多天后云庄知青当中首次发生的较为严重的受伤事故。具体细节想不起来了，但这件事情在我心理上投下很重的阴影，因而记忆颇深。这样的受伤在城市、在工矿、即使是在农场都算不了什么大事情，劳保（劳动保护）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对插队落户知青来说就不能比拟了，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与世世代代在农村艰辛苦斗的老乡们一起“战天斗地”，同样没有如何劳保，遇到头疼脑热、跌打损伤的时候，就显现出强烈的危机感。知青离乡背井、举目无亲，固然知青之间可以互相照顾，毕竟不是一种长久之计。

虽然第二天日记说，“费等护送李去公社，今午胜利返回。”但是，从这事故以后，在我尚处于建立之中的“处世信条”里，“小心谨慎、远离伤病”开始上升成为一条位居前列的要义，乃至成为“接受再教育”表现平平的直接根源。

随着时间推移，知青与老乡的关系逐渐密切，知青的病痛也有望得到些许老乡的热情关心——有一年夏天，在知青小徐被毒蛇咬伤的关键时刻，大队支书亲自上山采集草药——但是，这场运动毕竟是一场逆势而动，知青亲历中跌打损伤时有发生，不断动摇着“坚持乡村”的信念（例如李在三年后的72年再次在劳动中滑倒造成手臂骨折而回沪疗伤，后“自寻出路”到了离上海较近的皖南农村），但又可能“因祸得福”，成为争取“病退”的“机遇”（例如我自己在73年劳动中跌倒造成骨折，终于75年病退回沪，参见《1974～1975，我在江西云庄当“专业户”》）。至于到了78年，无须任何伟大号召就出现“胜利大逃亡”则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虽然这些都是时隔多年的后话，但1969-1-2事故的心理影响是即时的，至少对我是如此。

1969. 1.11 星期六 阴 雨

・・・李自2号手砍坏之后，一直不能出工，故她的工分至今只有3.6分，还是办学习班的“外快”。如此下去，非产生严重后果不可。所以，从9号起，根据本人自愿，让她要求参加了搞语录牌的工作。每日才2.9分。如按大寨式评工计分制，照她的出工情况来看，再照我与郭大江的工分计算，应当是4.8分。不管怎样，我们下放知识青年一定要为在云庄实行社会主义的大寨式评工计分制而尽出最大的努力！当然，目前来讲，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忆与议】

李因砍柴受伤直接影响了工分收入。因为砍柴不属于“生产劳动”，尽管知青是个“集体户”，此集体非彼集体，所以只能是井水河水各管各。上述日记中所说的“她的工分至今只有3.6分”就说明了她在生产队的工分帐上，元月的前11天总共只有3.6分，即使按照工分分配水平10个工分在1元左右来计算，也只有3毛6分的收入，这样

的状况显然是无法维持生计的。且不说自从知青到了以后，生产队再也没有达到过1968的分配水平。

“还是办学习班的‘外快’”一说则是指，11天中曾经办过一次学习班，因而得到了3.6分工分。查这11天日记，确实有“1969. 1. 5 今天是分班办元旦社论学习班”这样的记载。但是，学习班不可能天天办，而且不久之后当地干部群众对知青的学习班怨声渐起——办这样的学习班是公社、县里规定的，往往还有公社干部来主持，时间不会少于一整天；而按照当时当地的规定，这样的学习又必须给工分。这种非生产性的“工分”因为知青的来到而大幅度上升，而我们所在的村子接收的知青还达到三十余人之众，给生产队增加的“开会成本”是很明显的，村民们的负担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9号起，根据本人自愿，让她要求参加了搞语录牌的工作。每日才2.9分。”这件事写得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按照现在的志愿者概念，既然是“自愿”，怎么又会有工分？“让她要求参加”的说法也莫名其妙。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哪怕是增加一个临时性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力也不是可以随便决定的事情，可能是要经过生产队乃至大队同意的。因为这又是明摆着要增加其他社员的负担啊！

至于我有感而发的关于“大寨式”的想法，连同那简单的几行字，都是记下了当年面对生产劳动体制的莫大无奈。事实上，在农村那些年，“社会主义的大寨式评工计分制”究竟是什么，从来没有看到过明文规定，都是口头传说、各自理解罢了。

（3）热情与无知

1969. 1. 3 星期五 阴

早工是修公路。继续搞语录牌。

昨天起，大队举办元旦社论学习班，各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上海青年班、排长参加。昨天没有什么名堂，今天上午起发生争论，×××和前民兵连长×××同大队会计×××吵了起来，据说是从向上海青年介绍情况“不符事实”开始的。下午路过此地的公社革委会段主任参加了会议。

徐把章等战友的要求向公社反映了，说明天4号打电话给她回音。薛的意见是不能来江西则去淮北，更利于自我改造。

【忆与议】

记得那些日子搞宣传工作，即制作语录牌，是在大队部办公室做的。所谓办公室，就是把一户地主赶出家而腾出来的，是全村一栋最高大的住宅。中间的厅堂是会议室，两边的厢房除了西后厢房是放手摇式电话机的地方因而“全天候”开放以外，其余的三间都是上锁的，供上级干部来大队、生产队指导、检查工作时住宿，间或也有一

两个存放大队文件资料的柜子，常人难以一窥真面目。

当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办学习班时，我正在厅堂的一角搞语录牌，就成了会议的“旁听”，更有幸耳闻目睹了当地干部因向知青介绍情况“不符事实”而发生的口角。极为巧合的是，日记中提到的两个干部，当年唇枪舌剑、针锋相对、“路线斗争”不可开交的情景仿佛还在耳边眼前忽隐忽现，而我在2005年重返“第二故乡”的时候，竟然恰巧亲眼目睹了这两位耄耋老人促膝谈心的亲密情景，并且还和我一起畅叙旧情。抚今追昔，当年箭拔弩张、誓不两立，早已相逢一笑、泯灭恩仇。我愈加为自己和一些插友当初没有卷入其中加剧宗族纠纷而深感欣慰。

不过，另一方面，虽然当年在上海目睹了两年多的文革斗争局面，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所了解与认识，毕竟还是乳臭未干、稚气十足。此处日记说到，为了自己的同学在“一片红”狂浪中希冀“在井冈山会师”而热情倍增，一有机会就再一次向公社提出了要求，公社答应在第二天就回复。但我的日记里再也没有提及此事。显而易见，这是一厢情愿，以为只要是听从伟大领袖的指挥，就能一路绿灯如愿以偿，农村生产队劳动力的增加与安排哪有“革命学生、红卫兵、知识青年”想象得那么简单！

知识青年实在是没有多少知识的青年，尤其是缺乏社会生活的知识。到了六九届毕业生更是连文化知识也更加可怜，他们于66年夏天小学毕业，68年春天进入中学，70年初春就委以“69届中学毕业生”的桂冠！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贻误多少青年学子！

1969．1．5 星期日 阴

今天是分班办元旦社论学习班。上午没有什么成效，嘻嘻哈哈就过去了。下午至晚上比较好，金、刘下午分别作了比较好的斗私批修，检查了自己到江西一个多月来的生活中所存在的不够之处，气氛严肃也是从此开始的。下午谈得很好。晚上就加强政治学习、生活管理等方面作了几项“决议”。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

想到此次学习班的成功，看着金、刘的诚恳的斗私批修，使我回忆起去年的2月17日我初三（1）的一次极为成功的会议，真是“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忆与议】

我真是“书生气十足”，把社会生活看得如同学生时代那般简单。1969年春天插秧这第一次农忙之后这样的班务会就“名不存、实也亡”了。知青的分化是必然的，“再教育”毕竟不是学生环境。生活在慢慢地教育着我们逐步懂得社会、参透人生。

1969．1.10星期五阴薛老师5号给我们寄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象、薛还附了一张条子，说章他们已等不及我们的回信，已于5号早上报名赴安徽淮北插队落户。据杨来信说，母校学习兄弟学校的办法，大办学习班，要求人人报名插队落户。有些人则被“关”在学校四、五天。不来校者则敲锣打鼓到他家“请”。

看来章等战友上井冈山是不大可能了。他们如果批准的话，15号就要出发的。

【忆与议】

我们这里还在一厢情愿地为同学“在井冈山会师”而奔波祈望，高潮汹涌的上海这边则已经等不及了。1-15日记中又记载，“章5号来信。他已光荣批准赴安徽淮北插队落户了，18日要出发了。”从这些当年日记中摘录下来的信件的片言只语中，多多少少也可以看到“12-21、一片红”的狂热是急不可待，1969-1-18已经是农历十二月初一，离开春节只有一个月，还是要如同“急行军”似的，赶往“农村广阔天地第一线”。回首此等往事，真是不可思议！

（4）从知识青年到五七大军

1969. 1.10 星期五 阴

半夜里又开始下雨了。没有出早工。今天继续搞宣传工作。

大队干部今天开了一天会。上午由老姚传达关于发展林业会议的精神。下午讨论了三、四队合并成三队的领导班子的名单。晚上召开贫下中农大会，通过了这个名单，还将报公社批准。徐和聂作为五七大军的代表参加了这个领导班子。这是贫下中农对我们五七大军的最大信任与支持。

【忆与议】

日记中说“徐和聂作为五七大军的代表”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徐是上海知青，聂是当地的下放干部，记得当年已经是四十多岁了。当时同在云庄村的下放干部有四人，聂最年长；其次是姓姚，年轻一些；均为当地本县人。另外两个下放干部则是上海籍，他们是文革之前的江西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在新干县商业部门，一位姓周，一位姓马，比我们这批知青大十岁。由于同为上海人，所以很快就熟悉起来。

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下放干部放在一起管理，从而把这两部分人员合起来称为“五七大军”，据说在全国仅江西一家。到底是什么时候正式使用这个称唿的，我无从得知。在我的日记中是1969-1-10第一次提到了这个称唿。

五七大军的称唿似乎是想沿用“五七指示”的含义。这个指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到了。该指示是指1966-5-7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他在信中充分表达了对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诗情画意般的构想。乍一看是面面俱到地讲到了各行各业都要全面发展，好象没有错，但仔细看看仔细想想，就有问题了。如今的社会发展潮流则把这种思想叫“小而全”、“大而全”，或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讲，就

是样样都会，样样不精通。这是违背市场经济下专业化发展趋势的。也许，现今还有人在幻想，假如八十年代以来不走市场经济之路而走五七道路呢？其实，这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空想。七十年代初也听说上海确实有一些工厂组织工人去“学农”，真可谓荒唐透顶，结果是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无果而终。

附一：《五七指示》解读光明网2006-05-23 06:00来源：文摘报http://www.gmw.cn/CONTENT/2006_417219.htm《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的新世界宣言书。《五七指示》产生于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砸烂旧世界”之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五七指示》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背道而驰。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对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是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从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一直到《五七指示》，毛泽东一直坚持左倾空想社会主义模式，愈演愈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马立诚着，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附二：五七指示全文http://idof.3mt.com.cn/%u8D34%20---%20ido.3mt.com.cn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

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5）再教育中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

1969. 1. 7 星期二 晴

早工修公路。抓紧天晴之机又砍了半天柴。昨天下午爬的山很高，竟然可以鸟瞰小坑。今天上午和昨天晚上搞应征青年政审材料誊清工作，大开眼界。

【忆与议】

可以“鸟瞰小坑村”的山大概在云庄村的东北方向吧。到这样的地方去砍柴也是乱跑一气的结果。当地老乡心中有底，哪些山上的薪柴林比较丰富。

在我记忆中，参与“应征青年政审材料”是后来几年中的事情，没想到，实际上是下乡后第一次冬季征兵时我就参与了。而三个月前在上海，我这样的“家庭成份”注定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治贱民的第二代，我成为政审重点对象，连报名插队落户还通不过政审关（参见《1968-10“自愿报名”插队落户及其他》）。没有想到，为了凑满插队落户的人数，颇为严格的政审关忽然不见了。更没有想到，到了乡下，又摇身一变，整理起贫下

中农子女应征参加人民军队的政审材料了！如此政审，犹如风云变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算得上是我踏上社会之际最有感触的“触点”之一。

“应征青年政审材料”主要是一份政审表格，给我印象极深的一件事是，在一些空白格子里要一律填上“没有其他问题”。我觉得说不通的是，表格上没有一个地方填写过有问题啊，怎么叫“没有其他问题”呢？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我忍不住问负责此事的民兵连长，他只是说“这是上面的要求”。我还是担心这种的写法会挨批评，连长说“一直是这么做的，没问题”。既然如此，就别动脑筋了，依样画葫芦，誊写清楚即可，轻轻松松地拿工分吧（当然，这最后一句是我在成为“老兵油子”之后的逐步形成的“思想认识”）。

应该说，这是我第一次领受“再教育”中的政治教育——按上级说的办，没错的。

1969. 1. 8 星期三 晴

早工修公路。今天继续搞语录牌。郭和章主要负责搞阶级教育展览馆。

昨天晚上，队里发下每人一块肥皂，各班五包火柴。

1969. 1.13 星期一 阴雨

天不好，整天价下雨。大队阶级教育展览馆的布置工作到今天为止告了一段落。早工未出。

【忆与议】

我至今记得“阶级教育展览馆”是云庄村当年的村中心地带的一栋地主住宅中。那展览占据了那住宅的厅堂，都是些文字与画画。当地住房的建筑结构决定了厢房里必然是黑洞洞的，再说那几个厢房是下放干部的宿舍，所以也不可能用于展览。具体内容是回忆不起来了，这与我没有参与展览馆的布置有关。但是，真要说那个村子里有什么“阶级斗争、深仇大恨”，实在是说不上来，几十户人家，除了偶有一两户外姓，都是一个姓，真可谓“亲不亲，一家人”。在那里插队几年老是听说家长里短的宗族纠纷，却没有听说有过黄世仁杨白劳式的血海深仇。

下乡之初，免不了要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对其内容实在是没有点滴记忆了，倒是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负面印象——当年流行的在“忆苦思甜报告”之后必吃“忆苦饭”，尽管村里的干部和我们一起吃那些难以下咽的糠菜食物，私底下却告诉我们：这村里的人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饭哦，所以根本不知道“忆苦饭”怎么做，都是到别的地方学来的！如此的阶级教育！

更有一次啼笑皆非的“再教育”。大家在田里干活，不知是谁说“啥时候能够收工啊，我的肚子饿啦”。那年头，手表是奢侈品，没有一个人带得起，只能全凭太阳的方位确定收工时间，遇到天阴下雨，就没辙了，只能“跟着感觉走”。那天正是个不见太阳的天气，只要生产队干部不吭声吃饭，大家就得继续干下去。虽然有人喊饿，也

没有人随声附和。又捱过许久，仍然不闻“恰饭”的吆唤。有人就愤愤然地发起牢骚来了：“以前为地主干活，除了供给一日三餐以外，上下午还各有一次点心送到田边地头……”我们知青听了，大惊失色，这就是阶级仇恨？！

所以，“再教育”使我们越来越糊涂了，书本报纸上的理论与耳熏目染的现实之间，距离实在太大太大。

回顾反思我们亲身体会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是不是千篇一律的黄世仁与杨白劳那种状态呢？就云庄村的贫富差距而言，并不显着，最富有的地主只不过住宅比较高大一些，全部采用了青砖，屋内使用了油漆，并没有什么深宅大院或硕大庄园。我们亲眼目睹的“地富分子”大多是农活的行家里手，干出来的农活质量多是一流水平。而阶级的划分则是有点莫名其妙，以某年某月某一天拥有的土地数量为限。有的“老”贫农恰好是在那条“日期决定线”之前不久由于赌博而把家产输给了自己的舅舅，于是一无所有，成为贫农，否则不是地主就是富农了；而真正因为交不出租而被剥夺成为贫农的，则未曾听说。因此要说阶级、要讲仇恨，是有难度的。既然没有达到那样你死我活、水火不容的地步，还用得着大张旗鼓地搞阶级斗争吗？我又想起《1968日记选（14）12-24知青首次评工分》中提到过，1968年底曾经说“编写村史家史，似乎就是一句话而已，说过了也就再无下文，自那以后也再没有任何人提起，更无点滴动静。”现在想来，就凭如此这般的“阶级阵线”能写得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村史家史么？

（6）平生第一次劳动所得与“再分配”

我在1990年写的《第一次分红》，是纯粹的回忆录，乍一看，振振有辞、无懈可击，但是与当年的日记一对照，就漏洞百出了。回忆录中写道，在生产队“分红之后，我所在的知青班开了一个会，一致决议……在班内进行再分配！”其实，回忆录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岂止是一次班会啊，现在发现，前后会议至少有四次之多。

1969. 1.11 星期六 阴雨

天气很冷，又下雨。早工没出，白天继续搞宣传工作。

班中最近气氛不好。自上月24日评工分以来，“工分挂帅”似有出土之势。6号公布了1月份6天分总数后，更有暗中追赶之状。9日队里结算了整个12月份的工分之后，则气氛更不好。金确有“工分挂帅”的思想、行为。另外一些评得较低的同学也有不服气思想。看来，若不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制很难从客观上解决这一问题。

费、刘提议将日工分平分。照此计算，我班每日每人为4.6分（不到一点点），再按出勤率计算全月工分总数。这样比较平衡，不致出现两极分化。此事本在今晚的班务会上提出讨论，但与生产队的会议相冲突。晚上，我挑了一个机会，与近日心情不好的金谈了一下，了解了一些他的想法，也把费、刘的建议对他讲了。看来，此建议不光金接受不了，接受不了的还大有人在，特别在工分较高的人当中。

所以，我觉得，非实行大寨式评工计分不可。

【忆与议】

这是日记中有记录的关于“再分配”的第一次班务会。当时，对云庄村上海知青三十余人首次评定工分时，有两个“最高分”——6分，我是其中的一个。大家在寒风凛冽的冬季里，早出晚归，修水库、卖余粮……，虽然初次干农活然而竭尽全力的知青都只有可怜兮兮的一天三四分、四五分，而我干的活儿是最轻松的“写字”，却比大家高一截，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所以，当有人提出在生产队分红的时候进行“再分配”，我就“高姿态”地积极响应，还主动找其他“高收入者”开展谈心活动，以求取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问题是“再分配”的思路与“工分平分”的方案有不少人无法接受。

1969. 1.15 星期三 阴雨

没有出早工。上午我和大家一起修公路去了。下午仍旧搞语录牌。

晚上开班会，一致通过了费、刘提出的关于平分工分的建议。

【忆与议】

第二次班务会。从日记中“一致通过了……平分工分的建议”这寥寥数语来看，所谓“再分配”就是平分工分，这就是我们当时理解的“大寨式同工同酬”？

1969. 2. 6 星期四 晴

晚上开了第一次新选了领导班子后的班务会。从晚饭后开到近十一点。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一些同志进行了批评、自我批评，并作出了一些决议。每周二晚上为班学习时间。每周五晚上为班民主生活。并就作息时间作了规定，因为最近以来睡懒觉的现象很厉害，往往睡到九、十点钟才起床。现规定每天七点半起床。不出早工时，各人自学毛选。另外，就分红事也作了讨论。

1969. 2. 8 星期六 晴

晚上分红。看来整个云庄数我们班最慢。但是大家反复协商也有好处。办法是：郭和我每人16元。理由是为全班挣的钱多，理应多些。金15元，照顾到他家中还欠着债。余下的，按照总出勤率平分，每工0.51元，再照个人出勤率计算。当中潘打破了老表们的记工，把12月头10天排里烧饭也作为出工算了进去。另，沙、陆为班里买东西去新干，每人加上两天工。一般来看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实际上有些矛盾目前还掩盖着。早工学习元旦社论，没有什么劲，也没学好。

【忆与议】

拖拖拉拉了将近一个月，经过四次班务会，知青首次分红终于在“再分配”中降下大幕。实际上这种“再分配”就是在蛋糕的大小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分蛋糕。

上述日记的内容与《第一次分红》是吻合的。那里回忆并归纳成四项“照顾原则”：

（1）对女同学要有所照顾；（2）对因病因伤影响出勤的要有所照顾；（3）对为班里办事而误工的要有所照顾；（4）对在下乡时家中举债较多的要有所照顾。

除了第（4）条是“补助性质”的以外，其他三条的确是“大胆打破了当地农村的传统”——

第（1）条“照顾女同学”，就是把全班九男四女的日工分一律拉齐，每日每人为4.6分，以为这就是体现“男女同工同酬”。而生产队为我们评定的工分底分男女生相差将近一倍。相形之下，这的确是对生产队的挑战。记得当年就有干部批评我们无视他们作出的决定。

第（2）条“照顾伤病员”，的确打破了农村从来没有病假的惯例，仿佛就是工厂里的病假工资了。

第（3）条“照顾办班务”，这也是农村没有的“集体户”特色，总不能出了力、费了时却没有一点报酬。

有没有道理？似乎有理，“这样比较平衡，不致出现两极分化”。问题是，无论能力大小等因素，只看出勤率，确有忽视差异的平均主义。所以，“再分配”结束后，就不乏对一刀切、大锅饭的异议，及至半年后就再也没有人“旧话重提”了，彻底摈弃了这样的“壮举”。

1969. 2.21 星期五 阴雨

沈老师返乡途中也给我们来了一信，谈了一些问题，如：如何解决矛盾啊，等等，也对我们分红采用“战时共产主义”发表了一些意见，并提了建议。

【忆与议】

那封信是早已不见踪迹了。毕竟是比我们大了十岁的老师，对我们这样的做法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真是一个既保护积极性、又冷静面对现实的恰到好处的评价。在那个狂热的革命时代，我们的老师能够适时地指出关键的幼稚之处，免得我们“一头撞到南墙上”，真是十分及时非常必要。

我在日记本的收支栏里，对自己的平生第一次劳动收获有这样的详细记载——

工分164.4分；工分值1.22元/10分；折合人民币 20.06元。

班里“再分配”扣除 4.06元，本人实得16.00元。

在《第一次分红》中，我写过：“一个多月挣的工分折成人民币达25元之多”。现在根据日记查证，25元是记忆出错了。164.4个工分应该不会有笔误，所以，按日工分底分6分反推，出勤为27.4天。而从68-11-23开始参加劳动到12-31为止的实际出勤情况，我的日记中虽无逐日的详细记载，但与27.4天基本一致。所以，这一个月劳动所得的准确说法应该是20元。

随后的春节期间，我从这平生第一次的劳动所得中取出10元，夹在信封里寄回家中，给全家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这只是稍纵即逝的快乐。因为真正的考验还没有开始……。

（7）五七大军让公社干部头疼

1969. 1.22 星期三 阴

早工搞三光。刘、屠两同志赶了回来。油粮关系也未转成功，还挺气人的。上午搞修路、三光。

刘、屠昨晚在公社就知道公社要召集全公社五七大军开会。大家一听就有意见。上午又来通知，要在今天下午赶到公社，并要带好被子，每人口粮7斤，钞票七角。大家都不赞成这种方式，不大愿意前去。但后来又决定去了。下午五点多，就全部到了公社。伙食搞得很乱。

1969. 1.23 星期四 阴

今天开始“政治工作会议”。早上是学习元旦社论。上午听县五七大军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下午是讨论。无甚意思。借这些机会，看了一些书。费昨天从新干回来，得到一本《语录》，内容相当丰富。

今天晚上还是讨论，根本没有意思。

【忆与议】

这是第一次在公社集中办公社范围的五七大军学习班，正式名称叫“五七大军政治工作会议”。估计在此之前省里、县里先后开过这样主题的会议，然后一层一层地“下达、传达、学习、讨论”，这是当年一成不变的模式。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当时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叫程世清，是“全党全军全民的副统帅”林彪的得力干将，很有可能正是他把下放干部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统一称为“五七大军”了，因为“五七指示”是最高统帅给副统帅的一封信。

日记中提到的转油粮关系，参见《1968日记选（16）喜见电灯，告别六八》，当时第一年我们还属于“非农”户口，粮油关系还在公社粮管所。每个月要往返几十里路去买米买油，就在知青中炸开了锅。首次长途跋涉买

米之后，就开始与有关方面联系——采用简单的办法，把生产队要卖的余粮和知青要买的口粮进行划账。想来简单，谈何容易，几经交涉，才得以实现。在日记中提到过几次，但无细节。

关于“三光”，参见《1968日记选（2）下乡三天，开始三光》。

1969. 1.24 星期五 阴

上午召开“鸡峰公社五七大军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几个比较先进的单位，如梅峰大队五七大军、阳团大队五七大军、小坑大队乐门生产队五七大军均在会上传了经。下午与他们进行了广泛座谈，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比昨天收获要大得多！晚上听忆苦思甜报告，报告人是公社革委会委员、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省农代会代表。这次他作为鸡峰公社三名代表之一光荣地到南昌参加了省首次农代会。

【忆与议】

这也是当年开会的一种模式——连续的会议，不同的名称。

日记中提到的几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单位”，基本上都是当年12-21指示之前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地报名插队落户的，所以在下乡后两个月就表现突出，上台讲用了。但是，这次交流却成为一种“绝唱”——由于五七大军的“参差不齐”使得会议发生了一连串令公社干部头疼的事情，进而使得公社决定以后不再进行这样的“全体大会”，上述那些先进单位、先进分子在以后很多年里再也无缘与大家“近距离接触”对话交流，充其量成为一次次“讲用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会议被传达被宣传的偶像，而在广大五七大军心目中的实际形象则越来越虚幻飘渺、敬而远之。

1969. 1.25 星期六 阴

上午是听省农代会传达。结果有人睡觉，有人逛马路，参加的人很少。我乘此机会把给郑的信也写好了，同给周的信一起寄出了。

下午是分班、排找差距、订措施。也无甚效果。晚上是大歌大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文艺演出。各大队五七大军汇演。

云庄与××发生了矛盾。……云庄的演出及台下的云庄“观众”的的确确存在问题，必须对之实行冲击；××的同志则操之过急，大方向正确，但应注意方法。……

早饭是忆苦饭。有些人不愿吃，虽然吃了，叽里呱啦，议论不止。

【忆与议】

同时同批下乡的知青，同县同公社插队的五七大军，两个月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记得那个晚上的小规模、低烈度的“肢体冲突”起源于对文艺节目“革命性”的争议。云庄的节目中有一个忆苦思甜题材的歌舞节目，主演是一个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知青，舞姿优雅，掌声连连，本大队的知青更是兴奋不已、热烈喝彩；然而，××大队五七大军认为是缺乏“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和反抗精神”，未等演完，就有十来人冲上舞台，高呛最高指示，高喊革命口号；云庄的五七大军则在连续三天的会议中不断遭受批评、好不容易有一些“显示自己”的机会，却遭到当头棒喝，自然不会服气……。于是乎，脸红脖子粗的口水大战，大眼瞪小眼的“短兵相接”，肢体冲突必不可免，几乎重演了1966夏天上海街头“辩论台”“演出台”上屡见不鲜的“冲击”与“反冲击”的一幕。幸亏有关干部竭力劝架，双方脱离接触，演出也匆匆结束，事态才趋于平静。

这也许是决定“今后不再开全体大会”的因素之一吧。那么多血气方刚的小青年聚集在一起，稍有不慎，很容易引发难以收拾的局面。

1969. 1.26 星期日 晴

听说云庄被“评”为：老大难、老骨头、落后的典型等等。早饭前学习时，公社段主任参加了云庄的学习，也弄不出什么名堂来。差距在何，差了多少，何种原因，这些东西连自己也心中无底，却急着要订措施、搞规划，这不成了空中楼阁了吗！

上午算是结业式，也没有什么名堂。许多人没有参加。云庄×队某人拔刀威胁××大队的人，闹到公社。结果云庄大队全部人被留了下来。午饭后由段主任、五七大军办公室刘主任召开会议。这一下不得了。云庄的上海青年欠了四笔账：1、老账，指×班从公社买粮归途中打了拖拉机司机。2、昨天与共大篮球友谊赛时“打”人。3、今天上午，×队某人拔刀威胁××大队的上海青年。4、……反正我也记不起了。段主任、刘主任都作了讲话。弄不懂的是，他们都说要清理五七大军阶级队伍。会开了一刻多钟，就结束了。我们马上启程返云庄。

老天终于放晴了。可就是不逢时机。返云庄的二十多里路真够呛，热得要命。二十度总有的。很早就睡了。共大财会一排有十人到我们云庄大队实习。晚饭后与他们座谈。学生遇上学生，话题就多得说不完。

×班的×与支书吵了一场。支书今晚气得不得了，公开说：我不当这官了，我管不了你们；你们去公社、县、省去告我的状吧，越多越好；我知道你们告我好多次了。支书“辞职”，是云庄的新动向。

【忆与议】

连头带尾持续五天的全公社五七大军参加的学习班是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就传开了，公社领导觉得：五七大军不好办……。我们也在私底下说，虽然有些人的言行确实有些出格，但公社领导对上海知青也太小看了，以为是当地的干部群众那么听话、那么容易摆布？至于要“清理五七大军阶级队伍”，更是惊

人。事实上，公社也确实有点“如临大敌”的态势——1969-1-28日记：“公社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今天下午到云庄来了。速度也是够快的。宣传队有七人组成，下午来了5人，还有两人据说在开会，日后再来。公社五七大军办公室刘主任也在内。”字里行间，不免显得紧张。幸好后来没有成为可怕的现实。“五七大军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也许只是一时无知的气话、过头话，在知青中也要开展阶级斗争未免太极端化了。

知青公开与支书吵架，这在当地也是极为罕见的“犯上”之为。幸而事态没有扩大。

（8）学珠算，无风险，也无用

1969. 1.14 星期二 阴雨

•••天气是够冷的，却老是下着或雨或雪，讨厌得很。故一天都没出工。上午大家聚在大队部烤火、看书报。下午学了整整半天的珠算除法，有所成效。晚上又在大队部烤火玩耍。

【忆与议】

自从1968-11-20到达“第二故乡”以后，冬季不时出现连绵雨雪的天气，无事可做，无处可去，无书可看、无报可读……，愈加觉得无聊乏味。有时候，我们知青去大队部烤火，因为知青没有那么多用于取暖驱寒的柴火或茶籽饼。无意之中，发现大队部办公室里并不把算盘收藏起来，这就给了我“可乘之机”——玩算盘。我记得好几次和插友小郭、小刘等玩珠算的加减法，先是1+2+3+……+99+100的加法，正确答案是5050.；然后是5050-100-99-98-……-2-1的减法，正确答案自然就是0，但要做到又快又准是有一定的难度。这是小学四年级的珠算课上曾经布置的练习，但是练习过几次以后就扔到一边了。没有想到，多年以后，已经从天真学童长大成为“知识青年”的我们，会这样“温故知新”。

按照小学里的做法，把连加、连减复习并且熟练之后，又想出了新花样——“逆序连加”（即100+99+98+……+2+1）和“逆序连减”（即5050-1-2-3-……-99-100），同样要求做到又快又准。初始几次还真的不容易从已经习惯的“顺序”中转变过来呢。因此，有时候会对着算盘一连玩上几个小时。就这样，算盘上的“连加连减”玩得多了，玩得顺了，但也就觉得玩腻了。

恰在此时，我听说小郭把小学课本《珠算》带来了，他大概也是因为小学珠算课上略过不学除法的缘故，没有把这样的课本扔掉，而且还带到了乡下。我就向他借来那本教科书，边看边操作，从二的除法开始，一点点自学，特有趣味。也许较之于小学四年级时毕竟又长大了六年，理解能力增强了不少，原先视为畏途的特别繁多的除法口诀，到此时竟有豁然开窍的感觉，完全用不到死记硬背，什么“逢…进…”“下加”以及乖戾怪气的“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之类，很快迎刃而解，而且很快把二到九的除法口诀都学会弄懂了。

其实，那些口诀是用不到死记硬背的，脑子里想象算盘上珠子是怎么变化的就可以想出写出口诀来。例如，三一三十一的基本含义就是10÷3，商3余1。关键是记住珠算除法中算盘上小数点的定位后退一位的规则，这样，无论是1÷3还是10÷3或1000÷3等等，都可以计算，但在盘面上是“一成不变”，都是把1个珠子变成了3个珠子再在后面跟1个珠子。由于算盘的特殊性，显示出来的过程与结果就是不动盘面左侧的3、把右侧的1变成了31。同理，四一二十二的基本含义是10÷4，商2余2，不动盘面左侧的4、把右侧的1变成了22。把基本原理弄清楚了，到自学六的除法时，不用背也能写出口诀来了。如此的突破，意外的成功，学习的劲头也就更足了。

在蹉跎岁月中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玩算盘，自学珠算除法，并且“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曾经是一大乐趣。因为在当时这一类实用性比较强的“看书学习”不大会招来非议，而看其他书则有风险了，要是翻出文革以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下的书籍，更是大逆不道了。我在《一叠教科书》中曾经回忆到，有一次我把带到乡下去的中学各科教科书翻出来看了老半天，其味无穷。但是，现在从日记里居然找不到一点踪迹。联系到当时的左风甚烈，所以，可想而知，那时候在日记里都不敢写上一笔。

在乡下的这第一个冬天过去以后，去大队部的机会基本上没有了，算盘也不容易找得到，至于运用珠算除法之类更是无人问津。也许村里毕竟富有“庐陵文化”底蕴，初高中生也不在少数；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毕竟只不过是下放到这里的知青而已……。而真正的劳动与生活的考验来到了，我的学习热情也就戛然而止。

网中人文集：http://hxzq.net/showcorpus.asp?id=162